

无政府主义 常见问题解答

An Anarchist FAQ

Iain McKay

Gary Elkin

Dave Neal

Ed Boraas



英文版本：15.6（2024/2/22）

汉化版本：B.5.1（2025/5/1）

汉化进度：22%

A

B

C

D

E

F

G

H

I

J

App.

译者说明

1. 按照 15.6 版本（2024/2/22）翻译，原文可在 <https://www.anarchistfaq.org/afaq/index.html> 中查看

此汉化文档的版本号为 B.4.0（2025/4/2）

2. 中文版保持原版 COPYLEFT 的性质。

3. 即时公开进度表和新近翻译的内容，以便如果有新人愿意参与。（如果你愿意参与这项工作，请联系(单凌锐) [anothercosmos@protonmail.com]。）

2024 年 9 月起，由其他译者校对并继续翻译，并整合这 20 年间其他互联网翻译家零散的翻译。目前参与翻译工作的有：朝歌，单凌锐（按字母排序）。[其中 A.2-A.3.5 整合自未知译者的翻译]

本文采用大语言模型翻译、人工校对的方式进行，尽力做到“信、达”的程度。灰色或蓝色文本，为最初译者（或大语言模型）翻译的、未经过校译的部分。可以关注本翻译项目的 GitHub 页面，An_Anarchist_FAQ_Chinese_Localization（https://github.com/anotheruniverse/An_Anarchist_FAQ_Chinese_Localization），以获取最新进度的翻译版本。也欢迎来信指正本文中的翻译错误 ;D

除非特殊标注，文中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解释性译注，多参考（或援引）自中/英文维基百科（Wikipedia）的相关页面，此部分内容遵循 CC BY-SA 4.0 许可。

Anarchism 在中文中有三种译名：安那其主义（音译）、无政府主义和无治主义。后两者是意译，且不得不说，“无治主义”是一个更好的译名。“无政府主义”，仅仅只包含了安那其主义中反对政府的那一面，但安那其主义不仅仅只是反对政府。加上现有媒体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刻意的）误用与歪曲、互联网意识形态扮演家与左翼朋友们的一知半解与曲解；就仿佛——安那其主义者就“只是一堆（无端地）不满政府而闹事的恐怖主义暴徒”。这种（包含至少三处错误的）刻板印象，至今仍然广泛存在。安那其主义者反对一切压迫性的统治（这根源于等级制度(hierarchy)），其中当然包括资本主义及其剥削；政府只是作为强权者压迫的其中一种形式，而被安那其主义者所反对。

但读者可能注意到在本文中，大部分依旧采用“无政府主义”的翻译，仅仅出于一个缘由——它太流行了。无政府主义这个译名流传的如此之广，以至于我

们与其放弃这个译名，不如占领下这个言论阵地，就如同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一样。此种决定没有经过过多的讨论，如果在后续中文安那其主义者团体中，讨论出一个相对更好的译名，可以对此进行修改。（目前统一翻译也方便后续统一替换）

在本书中，无政府(主义)、无治(主义)、安那其(主义)，三个译名通用。

——单凌锐，2024/11/25

目前遵从的格式是，正文宋体，引文仿宋，引用书名**黑体**，强调部分**加粗+下划线**，西文新罗马。个人认为，这样比较贴合原本网页版的字体。黑体书名的人工替换可能会相当繁杂，后续会考虑使用宏之类的一键替换。

因为部分的翻译源自拷贝和编辑，导致部分章节引号的全/半角不统一。斟酌后决定，正文部分采用全角引号（“），而不采用半角引号排版（“），因为中文引号**就是**全角引号，符合官方的排版规范。其他译者注意，后续可能需要集中订正替换。但目录（或标题）中仍使用半角引号，以使得文本紧凑。

请后续校对者注意。原书在引用时，使用圆括号“（）”代表引文中原有的括号内容，方括号“[]”代表引文中编者添加的注释内容（也适用于我们汉化者）。我在最开始并没有留意这种情况，一律替换为了圆括号，所以 A.1、B、I.1.1-I.5.1 的部分，后续可能需要对照原文重新修正一遍。

目前使用的注释方式为页面脚注，可能在转换到某些格式的时候，会看不太清楚。后续考虑将所有分页符转换为分节符，讨论后重新调整脚注或尾注

——2025/4/5

翻译《An Anarchist FAQ》是铁托工作室（www.subjam.org）和**在蜕变中湮灭**（www.gatherz.org）曾经合作的一个项目。参与翻译工作的有（按字母排序）dk，H.O.L.M，无可就要，杨海崧。

这个项目开始于 2004 年 8 月，并出于各自的原因很快结束。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版本，但是它起码可以给所有以中文为母语的人的阅读带来方便。

——初代译者

目录

Introduction 总引言

第一卷

Intro. to Vol.1 第一卷引言

A - 何为安那其？

Intro. 导言

A.1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 A.1.1 什么是“无政府状态(anarchy)”？
- A.1.2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 A.1.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又被称作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 A.1.4 无政府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吗？
- A.1.5 无政府主义来自何处？

A.2 无政府主义代表什么？

- A.2.1 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 A.2.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自由？
- A.2.3 无政府主义者赞成组织吗？
- A.2.4 无政府主义者赞成“绝对的”自由吗？
- A.2.5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赞成平等？
- A.2.6 为什么团结对无政府主义者很重要？
- A.2.7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拥护自我解放？
- A.2.8 不反对等级制度的有可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吗？
- A.2.9 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怎样的社会？
- A.2.10 废除等级制度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 A.2.11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赞成直接民主？
- A.2.12 协商共识可以代替直接民主吗？
- A.2.13 无政府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
- A.2.14 为什么仅仅自愿主义还不够？
- A.2.15 那么“人性”怎么办？
- A.2.16 无政府主义的运转需要“完美”的人吗？
- A.2.17 为了运作一个自由社会，大多数人不是太愚蠢了吗？

- [A.2.18 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恐怖主义吗？](#)
- [A.2.19 无政府主义者持有怎样的伦理观？](#)
- [A.2.20 为什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是无神论者？](#)

[A.3 无政府主义有哪些类型？](#)

- [A.3.1 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 [A.3.2 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吗？](#)
- [A.3.3 绿色无政府主义有哪些？](#)
- [A.3.4 无政府主义是和平主义的吗？](#)
- [A.3.5 什么是无政府女权主义？](#)
- [A.3.6 什么是文化无政府主义？](#)
- [A.3.7 有信仰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吗？](#)
- [A.3.8 什么是“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
- [A.3.9 什么是无政府原始主义？](#)

[A.4 有哪些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

- [A.4.1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吗？](#)
- [A.4.2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吗？](#)
- [A.4.3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吗？](#)
- [A.4.4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吗？](#)

[A.5 有哪些“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例子？](#)

- [A.5.1 巴黎公社](#)
- [A.5.2 干草市场烈士](#)
- [A.5.3 建立工团主义者联盟](#)
- [A.5.4 俄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 [A.5.5 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 [A.5.6 西班牙革命与无政府主义](#)
- [A.5.7 法国 1968 年的五月风暴](#)

[B -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现行体制？](#)

Intro. 导言

[B.1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威权和等级制度？](#)

- [B.1.1 威权主义社会关系的效果是什么？](#)
- [B.1.2 资本主义是等级制的吗？](#)
- [B.1.3 资本主义产生了怎样的等级价值观？](#)

B.1.4 为什么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

B.1.5 专制文明的大众心理基础是如何形成的？

B.1.6 等级制度可以被终结吗？

B.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

B.2.1 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什么？

B.2.2 国家有辅助职能吗？

B.2.3 统治阶级怎样维持对国家的控制？

B.2.4 国家的中央集权对自由有什么影响？

B.2.5 谁从中央集权中获利？

B.2.6 国家可以成为社会中的独立力量吗？

B.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

B.3.1 私有财产和占有物之间有什么区别？

B.3.2 国家保护那些形式的私有财产？

B.3.3 为什么私有财产是剥削性的？

B.3.4 私有财产能否得到辩护？

B.3.5 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有区别吗？

B.4 资本主义的如何影响自由的？

B.4.1 资本主义建立在自由之上吗？

B.4.2 资本主义建立在自我所有权之上吗？

B.4.3 但是没人逼着你为它们工作！

B.4.4 但是劳动力高度紧缺的时期又怎样？

B.4.5 可是我想“一个人呆着”！

B.5 资本主义是否赋权并基于人类行为？

B.6 但是，个人用自己的钱来作出决定难道不是最好的吗？

B.7 现代社会中有哪些阶级？

B.7.1 可是阶级真的存在吗？

B.7.2 社会流动能否弥补阶级不平等？

B.7.3 为什么阶级的存在被否认？

B.7.4 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意识”是什么？

C — 资本主义经济的神话是什么？

Intro. 导言

C.1 经济出了什么问题？

- C.1.1 经济学真的价值中立吗？
- C.1.2 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吗？
- C.1.3 你能有一个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体制吗？
- C.1.4 均衡分析错在哪了？
- C.1.5 经济体制真的反应了资本主义的实在吗？
- C.1.6 可能存在非均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吗？

C.2 为什么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

- C.2.1 什么是“剩余价值”？
- C.2.2 剥削是如何发生的？
- C.2.3 掌握资本能充分地证明利润的合理性吗？
- C.2.4 利润是否代表资本的生产力？
- C.2.5 利润是否代表资本对生产的贡献？
- C.2.6 货币的“时间价值”能证明利息的合理性吗？
- C.2.7 难道利息和利润不是等待的回报吗？
- C.2.8 利润是创新和创业活动的结果吗？
- C.2.9 利润是否反应了风险的汇报？

C.3 是什么决定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分配？

C.4 为什么市场被大公司主导？

- C.4.1 大公司有多大？
- C.4.2 大公司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 C.4.3 大公司的出现对经济理论和雇佣劳工意味着什么？

C.5 为什么大公司分得了更大的蛋糕？

- C.5.1 大公司的高利润不是因为其高效率吗？

C.6 被大公司主导的市场可以改变吗？

C.7 什么导致了资本主义商业循环？

- C.7.1 阶级斗争在商业循环中起了什么作用？
 - C.7.2 市场在商业循环中起了什么作用？
 - C.7.3 还有什么影响商业循环？
 - C.8 政府对金钱的控制导致了商业循环吗？
 - C.8.1 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行得通吗？
 - C.8.2 凯恩斯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了什么？
 - C.8.3 资本主义是如何适应凯恩斯主义的危机的？
 - C.9 自由放任政策会减少失业吗，正如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宣称的那样？
 - C.9.1 降低工资可以减少失业吗？
 - C.9.2 失业不是由工资太高造成的吗？
 - C.9.3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解决失业问题的答案吗？
 - C.9.4 失业是自愿的吗？
 - C.10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降低贫困率的最佳方式吗？
 - C.10.1 新自由主义难道没有造福世界上的穷人吗？
 - C.10.2 “自由贸易”造福每个人吗？
 - C.10.3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造福每个人，**尤其**造福工人阶级吗？
 - C.10.4 自然地发展意味着人们会生活的更好吗？（发展是硬道理吗？）
 - C.11 智利的新自由主义不是证明了自由市场让每个人获利吗？
 - C.11.1 谁从智利的实验中获利？
 - C.11.2 那么智利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又怎么说呢？
 - C.11.3 新自由主义的智利证实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吗？
 - C.12 香港不是显示出了“自由市场”的潜力吗？
-

D - 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怎样影响社会的？

Intro. 导言

- D.1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干预？
 - D.1.1 是政府干预导致了最初的那些问题吗？
 - D.1.2 政府干预是民主的结果吗？
 - D.1.3 政府干预是社会主义的特性吗？
 - D.1.4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事实上没有政府干预吗？
 - D.1.5 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政府干预吗？

D.2 财富对政治有什么影响？

D.2.1 资本外逃有那么厉害的吗？

D.2.2 商业宣传有那么神通广大？

D.3 财富是怎样影响大众传媒的？

D.3.1 媒体的结构是怎样影响媒体内容的？

D.3.2 广告对大众传媒起到怎样的作用？

D.3.3 为什么媒体依赖政府和商务“专家”作为首要的消息来源？

D.3.4 “高射炮”是如何被用作约束媒体的手段的？

D.3.5 为什么“反共产主义”被用作一种控制机制？

D.3.6 “宣传模式”难道不是一种阴谋论吗？

D.3.7 媒体对政府和企业失败的报道难道不与这种模式相矛盾吗？

D.4 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D.5 是什么导致了帝国主义？

D.5.1 帝国主义是否在随着时间演变？

D.5.2 帝国主义只是私有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吗？

D.5.3 全球化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吗？

D.5.4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中的社会阶级有什么关系？

D.6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吗？

D.7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吗？

D.8 是什么引发了军国主义，其后果又是什么？

D.9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权力为什么会集中？

D.9.1 财富两极分化和威权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

D.9.2 为什么政府不断加强对公民的监视？

D.9.3 是什么导致了种族主义的出现？

D.10 资本主义是怎样影响科技的？

D.11 政治和经济能相互分离吗？

D.11.1 关于权力和自由的愿景，智利告诉了我们什么？

D.11.2 但智利确实证明了“经济自由”创造政治自由啊？

E -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什么造成了环境问题？

Intro. 引言

E.1 是什么从根本上导致了我们的生态问题？

E.1.1 是工业导致了我们的环境问题吗？

E.1.2 环保主义和生态学有什么差异？

E.2 环保无政府主义者建议用什么取代资本主义？

E.3 私有财产权会保护环境吗？

E.3.1 将大自然私有化会拯救大自然吗？

E.3.2 经济力量是如何导致生态危机的？

E.3.3 资本主义对短期效益的关注能解决环境危机吗？

E.4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保护了环境吗？

E.4.1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将会事实上终结污染吗？

E.4.2 自由放任的荒野能在资本主义下留存下去吗？

E.5 道德消费主义能制止生态危机吗？

E.6 什么是人口神话？

F - “安”资是安吗？

Intro. 引言

F.1 “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真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F.2 “无政府”资本主义说的“自由”是什么？

F.2.1 私有财产怎样影响了自由？

F.2.3 “自由意志”资本主义者支持奴隶制吗？

F.3 为什么“无政府”资本主义者通常不重视平等？

F.3.1 为什么对平等的弃置不顾很重要？

F.3.2 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能实现利益的协调吗？

F.4 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在私有财产上的立场是什么？

F.4.5 财产的“宅地”理论有什么问题？

F.5 将“公有物”私有化会增加自由吗？

F.6 “无政府”资本主义反对国家吗？

F.6.1 它的“自由市场”正义哪里错了？

F.6.2 这种制度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后果？

F.6.3 但是市场力量肯定会阻止富人滥用权力的吧？

F.6.4 为什么这种“防卫联盟”是国家？

F.7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历史是怎样反应它不是无政府主义的？

F.7.1 竞争地位的政府是无政府主义吗？

F.7.2 政府和无政府主义兼容吗？

F.7.3 会存在一种“右翼的”无政府主义吗？

F.8 在创造资本主义中，国家扮演了什么角色？

F.8.1 资本主义崛起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社会力量？

F.8.2 “自由放任”说法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F.8.3 政府还采取什么形式干预资本主义的产生？

F.8.4 难道这种圈地运动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神话吗？

F.8.5 美国缺乏圈地运动又怎么解释？

F.8.6 工人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崛起？

第一卷附录 - 安那其的象征

1 黑旗的历史是什么？

2 为什么是红黑色的旗帜？

3 圈-A 来自哪里？

第二卷

Intro. to Vol.2 第二卷引言

G - 个人无政府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吗？

Intro. 导言

G.1 所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吗？

G.1.1 那他们对自由市场的支持又怎么说？

G.1.1 那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支持又怎么说？

G.1.1 那他们对雇佣劳动的支持又怎么说？

G.1.1 为什么社会背景对评价个人无政府主义很重要？

G.2 为什么个人无政府主义拒绝社会无政府主义？

G.2.1 共产无政府主义是强制性的吗？

G.2.2 共产无政府主义是暴力的吗？

G.2.3 共产无政府主义致力于摧毁个性吗？

G.2.4 个人主义者还给出了哪些其他排斥共产无政府主义的理由？

G.2.5 相比于共产无政府主义，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认可个人主义吗？

G.3 “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吗？

G.3.1 “无政府”资本主义是美国无政府主义吗？

G.3.2 “无政府”资本主义和个人资本主义又哪些不同？

G.3.3 那“无政府”资本主义对“防卫联盟”的支持呢？

G.3.4 为什么个人无政府主义认为平等很重要？

G.3.5 个人无政府主义会接受“澳大利亚”经济体吗？

G.3.6 互助银行会导致通货膨胀吗？

G.4 为什么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个人无政府主义？

G.4.1 雇佣劳动符合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吗？

G.4.2 为什么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兼容？

G.5 本杰明·塔克——资本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

G.6 麦克斯·施蒂纳的观点是什么？

G.7 莱桑德·斯普纳——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

H -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有社会主义？

Intro. 导言

H.1 无政府主义者总是反对国有社会主义吗？

- H.1.1 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什么？
- H.1.2 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区别是什么？
- H.1.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希望“一夜之间”就废除国家？
- H.1.4 无政府主义者对要用来代替国家“一无所知”吗？
- H.1.5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利用现有的国家”？
- H.1.6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尝试“在旧世界的骨架里建造新世界”？
- H.1.7 你没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吗？

H.2 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歪曲了无政府主义的哪些部分？

- H.2.1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保卫革命吗？
- H.2.2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阶级冲突”和“集体斗争”吗？
- H.2.3 无政府主义怀念“消逝的过去”吗？
- H.2.4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是最大的敌人”吗？
- H.2.5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夜之内就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吗？
- H.2.6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曲解了无政府主义者对互助的看法？
- H.2.7 无政府主义者把谁看作他们“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 H.2.8 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关系是什么？
- H.2.9 无政府主义者有“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吗？
- H.2.10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领导吗？
- H.2.11 无政府主义者“反民主”吗？
- H.2.12 无政府主义只能在缺乏强大的工人运动时生存吗？
- H.2.13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治”斗争和行动吗？
- H.2.14 无政府主义组织是“无效的”、“精英主义的”和“古怪的”吗？

H.3 什么是国有社会主义的神话？

- H.3.1 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想要的一样吗？
- H.3.2 马克思主义是“来自底层的社会主义”吗？
- H.3.3 列宁主义是“来自底层的社会主义”吗？
- H.3.4 无政府主义不能有选择性的引用马克思主义吗？
- H.3.5 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借用影响了前者吗？
- H.3.6 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曾有效果的革命性政治理论吗？
- H.3.7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哪里错了？
- H.3.8 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哪里错了？
- H.3.9 政府仅仅是经济力量的代理者吗？

- H.3.10 马克思主义总是支持工人委员会的理念吗？
- H.3.11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把权力交到工人组织手中吗？
- H.3.12 大公司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吗？
- H.3.13 为什么国有社会主义就只是国家资本主义？
- H.3.14 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工人掌权吗？

H.4 恩格斯在他的文章《论权威》中没反对无政府主义吗？

- H.4.1 组织暗示着自由的终结吗？
- H.4.2 自由恋爱表现了恩格斯论证的弱点吗？
- H.4.3 无政府主义者打算怎样运行一个工厂？
- H.4.4 阶级斗争是如何驳斥恩格斯观点的？
- H.4.5 工业实行的方案“独立于所有社会组织”吗？
- H.4.6 为什么恩格斯的《论权威》损害了马克思主义？
- H.4.7 革命是“最大的独裁主义”吗？

H.5 什么是先锋队理论，以及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反对它？

- H.5.1 为什么先锋党人是反社会主义者的？
- H.5.2 先锋主义者的设想起效过吗？
- H.5.3 为什么先锋主义意味着党派权力？
- H.5.4 列宁抛弃先锋主义吗？
- H.5.5 什么是“民主集中制”？
- H.5.6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民主集中制”？
- H.5.7 革命者的组织方式重要吗？
- H.5.8 先锋党有效吗？
- H.5.9 先锋党在哪方面有效？
- H.5.10 为什么“民主集中制”产生“官僚集中制”？
- H.5.11 你能提供一个先锋党负面性质的例子吗？
- H.5.12 难道俄国革命不是证明了先锋党是有效的吗？

H.6 为什么俄国革命失败了？

- H.6.1 俄国革命的失败能用客观因素解释吗？
- H.6.2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是否影响了俄国革命的结果？
- H.6.3 俄国工人被“去阶级化”和“原子化”了吗？

I - 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看起来会是怎样的？

Intro. 导言

I.1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难道不是一种矛盾修辞吗？

- [I.1.1 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吗？](#)
- [I.1.2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吗？](#)
- [I.1.3 市场到底有什么问题？](#)
- [I.1.4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难道社会主义就不是吗？](#)
- [I.1.5 资本主义会高效地分配资源吗？](#)

[I.2 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蓝图吗？](#)

- [I.2.1 到底为什么要讨论无政府社会主义是像怎样的？](#)
- [I.2.2 是否可能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
- [I.2.3 无政府主义的框架是如何构建的？](#)

[I.3 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怎样的？](#)

- [I.3.1 什么是“工团”？](#)
- [I.3.2 什么是工人自我管理？](#)
- [I.3.3 社会化意味着什么？](#)
- [I.3.4 各个工团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 [I.3.5 工团邦联将会做什么？](#)
- [I.3.6 工团之间的竞争又如何？](#)
- [I.3.7 哪些不想加入工团的人怎么办？](#)
- [I.3.8 无政府主义者“寻求专注于小规模生产的小型自主社区”吗？](#)

[I.4 无政府主义经济是如何运转的？](#)

- [I.4.1 在无政府中经济活动的重点是什么？](#)
- [I.4.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废除工作？](#)
- [I.4.3 无政府主义者打算如何废除工作？](#)
- [I.4.4 无政府状态将采用什么标准来作出经济上的决定？](#)
- [I.4.5 那么“供求关系”怎么办？](#)
- [I.4.6 无政府共产主义真的不会导致供不应求吗？](#)
- [I.4.7 怎样才能防止生产者忽视消费者呢？](#)
- [I.4.8 那么投资决策应当如何进行呢？](#)
- [I.4.9 科技进步将被看作是反无政府主义的吗？](#)
- [I.4.10 分配过剩物资的广泛基础能带来什么优势？](#)
- [I.4.11 如果社会主义消灭了利益动机，表现不会变差吗？](#)
- [I.4.12 难道资本主义倾向不会重新出现吗？](#)
- [I.4.13 谁会去做脏活累活？](#)
- [I.4.14 那些不想工作的人怎么办？](#)
- [I.4.15 未来的工作场所看起来是怎样的？](#)
- [I.4.16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难道不会效率低下吗？](#)

[I.5 无政府的社会结构将是像怎样的？](#)

- [I.5.1 什么是参与式社区？](#)
- [I.5.2 为什么需要参与式社区邦联？](#)
- [I.5.3 邦联会催生官僚和政客吗？](#)
- [I.5.4 这些会议怎么能决定所有事情呢？](#)
- [I.5.5 参与式社区和邦联难道不是新的国家吗？](#)
- [I.5.6 在自由意志主义下难道不会有产生“多数暴政”的危险吗？](#)
- [I.5.7 如果我不想加入公社怎么办？](#)
- [I.5.8 那么犯罪问题又如何？](#)
- [I.5.9 在无政府主义下，言论自由又如何？](#)
- [I.5.10 那么政党、利益集团和专业机构呢？](#)
- [I.5.11 无政府主义社会如何防御权力渴求者的威胁？](#)
- [I.5.12 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会提供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吗？](#)

[I.6 那么“公地悲剧”呢？](#)

- [I.6.1 “由世界上每个人所拥有的”财产该如何使用？](#)
- [I.6.2 共有制难道不会限制个人的自由吗？](#)

[I.7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不会毁灭个性吗？](#)

- [I.7.1 部落文化表示了社群主义捍卫个性吗？](#)
- [I.7.2 无政府主义者崇拜过去或“高尚野蛮人”吗？](#)
- [I.7.3 需要用法律来保障个体权利吗？](#)
- [I.7.4 资本主义是否保护个性？](#)

[I.8 革命主义西班牙是否展现了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能在实践中起效？](#)

- [I.8.1 西班牙革命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模式了吗？](#)
 - [I.8.2 无政府主义者是如何在西班牙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的？](#)
 - [I.8.3 西班牙的工业集体是怎样组织的？](#)
 - [I.8.4 西班牙的工业集体是如何协调的？](#)
 - [I.8.5 西班牙的农业合作社是如何组织和协调的？](#)
 - [I.8.6 农业集体取得了哪些成就？](#)
 - [I.8.7 农村的集体是靠武力建立的吗？](#)
 - [I.8.8 不过西班牙的集体有什么创新吗？](#)
 - [I.8.9 为什么，如果它真的那么好，为什么没能生存下来？](#)
 - [I.8.10 为什么 C.N.T.与政府合作？](#)
 - [I.8.11 协作的决定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产物吗？](#)
 - [I.8.12 协作的决定是被强加于 CNT 成员的吗？](#)
 - [I.8.13 从这场革命中能学到什么政治上的教训？](#)
 - [I.8.14 从这场革命中能学到什么经济上的教训？](#)
-

J - 无政府主义者们都做些什么？

Intro. 介绍

J.1 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于社会斗争吗？

- J.1.1 为什么社会斗争是重要的？
- J.1.2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改革吗？
- J.1.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改良派？
- J.1.4 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单一问题运动是什么态度？
- J.1.5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尝试去普及社会斗争？

J.2 什么是直接行动？

- J.2.1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喜欢用直接行动来改变世界？
- J.2.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把选举作为一种改变的方式？
- J.2.3 选举的政治含义是什么？
- J.2.4 选举激进党派真的能够起到效果吗？
- J.2.5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不干涉主义，而这一点意味着什么？
- J.2.6 激进派从事竞选活动的效果是什么？
- J.2.7 我们应该在选举中支持改良党派以使得它们原形毕露吗？
- J.2.8 不干涉主义会让右翼政党赢得选举吗？
- J.2.9 除了选举，无政府主义者还能够做些什么？
- J.2.10 拒绝竞选活动是否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政治冷漠？

J.3 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哪些形式的组织？

- J.3.1 什么是亲合力小组？
- J.3.2 什么是“合成”联邦？
- J.3.3 什么是“平台”？
- J.3.4 为什么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平台”？
- J.3.5 还有其他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同盟吗？
- J.3.6 这些组织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 J.3.7 巴枯宁所说的“隐形的专政”是否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暗地里的独裁者？
- J.3.8 什么是无政府工团主义？
- J.3.9 为什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J.4 社会中的哪些倾向帮助了无政府主义运动？

- J.4.1 为什么社会斗争是一个好兆头？
- J.4.2 难道社会斗争不是弊大于利吗？
- J.4.3 新兴的社会运动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发展？
- J.4.4 什么是“经济结构性危机”？

J.4.5 为什么“经济结构性危机”对于社会斗争来说是重要的？

J.4.6 反政府和反大企业的情绪意味着什么？

J.4.7 通信革命意味着是什么？

J.5 无政府主义者创造了哪些替代的社会组织？

J.5.1 什么是社区工会主义？

J.5.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工业工会主义？

J.5.3 无政府主义者对现有工会持何种态度？

J.5.4 什么是产业网络？

J.5.5 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哪些形式的合作信贷？

J.5.6 为什么互助信贷计划很重要？

J.5.7 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互助信贷足够废除资本主义吗？

J.5.8 互助储蓄的现代体制是什么样的？

J.5.9 互助信贷是如何运作的？

J.5.10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合作社？

J.5.11 如果工人真的想要自我管理，为什么现有的合作社如此稀少？

J.5.12 如果自我管理更有效率，那么市场不是应该迫使资本家引入它吗？

J.5.13 什么是现代学校？

J.5.14 什么是自由意志市政主义？

J.5.15 无政府主义者对福利国家持何种态度？

J.5.16 是否有集体自助的历史实例？

J.6 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哪些培养儿童的方法？

J.6.1 培养自由儿童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J.6.2 有哪些自由意志主义的抚养方法？

J.6.3 如果孩子无所畏惧，他们怎么会变成好孩子？

J.6.4 “自由意志主义的儿童养育”不就是宠坏孩子的代名词吗？

J.6.5 无政府主义者对青少年的性解放持何立场？

J.6.9 关注性解放是否会分散对革命的注意力？

J.7 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社会革命”是什么含义？

J.7.1 为什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是革命者？

J.7.2 社会革命是可能实现吗？

J.7.3 革命难道不意味着暴力吗？

J.7.4 社会革命都应该设计哪些方面？

J.7.5 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

J.7.6 无政府主义革命如何进行自我防卫？

补充资料

一、安那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二、俄国革命

【……】

三、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资本主义

【……】

总导言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扪心自问，并依靠自己去寻找和认识真理吧：因为你们不可能在别的任何地方找到它。”

- 彼得·阿西诺夫^①

《马赫诺运动史（The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欢迎来到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答》（*An Anarchist FAQ*）。

这个《常见问答》来自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为了给那些对此政治主张感兴趣的人提供无政府主义的构想和理论而写的。它是一个（线上的）工作小组合作完成的成果，并可以为互联网上的（最好也包括现实世界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提供有效的组织工具。希望它能告诉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驳斥常见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点，以及其他针对我们面对的社会问题所提出的其它的解决方案。

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似乎与“常识”相悖（比如像“我们当然需要国家和资本主义”这样的），我们需要指出**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会有如此想法。和许多政治理论不同，无政府主义反对空洞的答案；相反地，它把观点和理想建立在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分析之上。为了在讨论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让读者去判断，我们在总结讨论时尽量避免简单化。虽然我们知道长篇大论将会吓跑那些仅仅想随便看看的读者，不过它已经不能再短了。

读者大概会认为，我们使用大量的引文是为了如艾伦·米恩^②所说：“引用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可以用来减少独立思考的麻烦”。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大量引用无政府主义人物的资料是出于以下三个理由：其一，为了表明我们**没有**编造某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及主张。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它使我们得以把无政府主义过去的声音和当前的拥护者连接起来。最后，引用引文是因为它们能简明扼要地传递思想，而不是为了诉诸“权威”。

此外，我们大量引用也是为了让读者去探究被引述者想表达的观点，总结事实，以便节省篇幅。以引用诺姆·乔姆斯基^③关于**国家保护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

^① 彼得·阿西诺夫（Peter Arshinov, 1887-1937），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与知识分子

^② 艾伦·亚历山大·米恩（A. A. Milne, 1882-1956），英国作家，著有小熊维尼

^③ 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1928-），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社会批判家

的论述为例，这可以确保我们的论点以事实为基础，而不必去介绍乔姆斯基使用的所有证据和参考文献。类似地，我们引用某些领域专家的话（比如经济领域），也是为了支撑我们的分析和主张。

我们也需要说明一下这个常见问答的历史。它始于 1995 年，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聚集到一起，为了写一篇常见问答，来驳斥自封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者。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在网​​上花了很多时间，驳斥那些声称资本主义可以和无政府主义并存的说法。最终，一群互联网活动家决定，最佳方案是编写出一本常见问答，来解释为什么无政府主义憎恨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不过，在迈克·胡本（“自由主义批判”网站的维护者）的建议之后，我们发现写一本支持无政府主义的常见问答，比写一本反“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常见问答，要更好。所以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答》就诞生了。它依然继承了以往的特点。比如，在 F 部分之外给安·兰德^①，默里·罗思巴德^②等人给予过多的篇幅——可是他们真的没那么重要。然而，他们提出了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设想的极端例子，从他们清晰地表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暗指了对权威的服从，而较温和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尝试去掩盖或减轻这一点上说——他们确有其价值。

我们认为给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者提供了有用的在线资源。也许，据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常见问答》献给许多网上“自由意志主义”资本主义者们——是他们的无稽之谈促使我们开始这项工作。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太抬举他们了。他们在互联网之外与我们毫不相干，在网上也仅仅是招人烦罢了。所以估计你也猜到了，F 和 G 部分包含了大量我们早期所著的反自由主义常见问答。这完全是为了反驳网上相对流行的一种说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可以是资本主义支持者（现实世界里无需多费口舌，因为几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修饰法，且其支持者并非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所以，虽然这本《常见问答》从这么一个很特殊的理由出发，但它已经扩展到我们的最初企划之外——它成为了关于无政府主义及其构想与历史的概述。由于无政府主义认识到不存在一个简洁的答案，并且自由必须建立在个体责任之上，所以这个常见问答非常深入。因为它也挑战了不少设想，所以我们不得不涵盖许多背景知识。我们也承认，我们所包括的“常见问答”里，一部分问题比其它问题“更常见”。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涉及相关讨论和事实，否则它们也不会被写进去。

我们很清楚，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不会 100%地同意我们在《常见问答》里写的东西。作为一个以个体自由和批判性思维为基础的运动，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

^① 安·兰德（Ayn Rand），俄裔美籍作家和哲学家。原名爱丽丝·奥康纳（Alice O'Connor，1905-1982）

^② 默里·牛顿·罗思巴德（Murray Newton Rothbard，1926—1995），美国犹太裔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是奥地利学派的知名学者，对“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发展与传播有极大贡献

的。然而我们确信，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我们所表述的大部分内容，并且尊重他们不同意的、我们将之称为真正无政府主义者理念的部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显著特征是，对各类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如何应用这些思想存在广泛的分析和争论（但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对不同观点也存在普遍的宽容，及抛开少量分歧而共同努力的愿望）。我们尽可能在这个《常见问答》里反映这一点，并希望我们能很好地介绍我们所讨论的所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

我们无意对无政府主义盖棺定论。相反地，这个常见问答是指一个起点，让人们开始理解、学习无政府主义，并把所学转化到直接行动和个体活动中去。通过这么做，我们才能把无政府主义变成活的理论，变成个体及社会自我活动的成果。只有把我们的思想付诸实践，我们才能找到思想的力量与不足，从而从新的方向与新的经验来改进无政府主义理论。我们希望这个《常见问答》反映和帮助了个体活动及自我教育的过程。

我们相信，《常见问答》也遗漏了许多问题。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加上某些问题，或感觉你还有需要被收录的问题和其解答，就联系我们吧。这个《常见问答》不是我们的“财产”，而是属于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因此它旨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有活力的造物。我们希望看到它在尽可能多的人的新想法和新意见的支持下成长壮大。如果你希望参与此常见问答，就联系我们吧。类似的，如果其他人（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想传播它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就放心去做吧，它是整个运动的资源。因此，我们在此常见问答上实行著左权（Copyleft）（详情请参见<http://www.gnu.org/copyleft/copyleft.html>）。通过这么做我们可以保证此《常见问答》一直是免费产品，任何人可以使用。

最后要说的是，这些年语言变化很大，同时影响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使用“他们”（“Man”）^①来指代人们便是其中之一。不用多说，在当今世界，该用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一半的人类。因此，这个常见问答曾试图做到性别中立。不过，这种意识相对较新，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像 Emma Goldman 这样的女性）仍使用“Man”来指代整个人类。当我们引用过去的同志中出现“Man”的时候，显然指的是整个人类而不仅是男性。虽然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加上“她”（“Woman”）、“她们”（“Women”）、“她的”（“Her”）等等，但若这会使引文变得难以阅读，我们只好原样放着。希望这么说能使我们的立场更清楚。

我们也希望这个常见问答给你带来乐趣，并让您有所思考。但愿它可以培养出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加速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建立。即使这一切都失败了，我们也很享受创造此常见问答的过程，并且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可行而有条理的政治理念。

^① Man，在英文中可代指“全体人类”或“（不论性别的）人”，但该词亦特指“男人”。这与“他们”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作用类似。作者在后文的某些引文中，在 Men 指代人们时，会同时加上[and Women]以彰显性别平等。有时汉语直接译作“人们”或“人类”即可。

“我们把这个成果献给成千上万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离世或在世，他们都曾尝试过、或者正在尝试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庆祝 1936 年的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答》于 1996 年 7 月 19 日正式发行。希望我们的作品，能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由。”

下列自称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该常见问答承担（大部分）责任：

Iain McKay（主要贡献者和编者）

Gary Elkin

Dave Neal

Ed Boraas

我们也要感谢下列人士的贡献及反馈：

Andrew Flood

Mike Ballard

Francois Coquet

Jamal Hannah

Mike Huben

Greg Alt

Chuck Munson

Pauline McCormack

Nestor McNab

Kevin Carson

Shawn Wilber

Nicholas Evans

还有我们在 anarchy, oneunion and organise! 邮件列表上的同志。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常见问答”，15.6 版本

版权所有© 1995-2024 The Anarchist FAQ Editorial Collective:

Iain McKay, Gary Elkin, Dave Neal, Ed Boraas

根据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1.1 版或自由软件基金会发布的任何后续版本，和/或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2.0 版或自由软件基金会发布的任何后续版本，允许复制、分发和/或修改本文档。

自由文件协议的细节请查看 <http://www.gnu.org/>

第一卷

第一卷^① 导言

就像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注意到的那样，我们的理念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饱受误解和歪曲的政治理念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解答》（《AFAQ》）旨在通过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历史、驳斥最常见的歪曲和无稽之谈来改善这种情况。并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可以用来帮助他们争论和争取自由的资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AFAQ 中涉及的许多内容，都是在批判其他理论和驳斥对无政府主义的攻击时引发的。

多年来，无政府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将随着环境的变化以及新斗争的展开和（可能的）胜利而继续发展和变化。它不是某种教条的意识形态，而更像是一种理解不断发展的世界并朝着自由意志主义方向改变世界的手段。因此，AFAQ 试图将无政府主义的特定方面置于其历史背景中。例如，只有牢记蒲鲁东生活的时代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才能理解蒲鲁东^②思想的某些特定方面。许多评论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似乎忘记了这一点（他还支持大规模工业合作社）。巴枯宁^③、塔克^④(Tucker)等人也是如此。我希望 AFAQ 能够帮助无政府主义继续发展，通过总结前人的经验来适应新的形势，从而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我们还试图在不否认他们之间差异的情况下，找出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点。毕竟，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Benjamin Tucker）会同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观点，即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形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似乎花了更多的时间，因（最终）通常是微小的分歧来批评和攻击他们的同志，而不是与压迫作斗争，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活动虽然有时是必要的，但很难最有成效地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 - 特别是当它涉及到未来可能的发展时（无论是关于自由社会的经济性质，还是我们对目前不存在的工团主义工会的态度！）。因此，我们既讨论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之间的分歧，也讨论了它们内部的分歧，但我们试图通过强调它们的共同点来搭建桥梁，而不是制造隔阂。

不用多说，并非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 AFAQ 中的内容（毕竟，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An Anarchist FAQ”），而不是某些同志奉承它为“无政府主义者们的常见问题解答”（“The Anarchist FAQ”）。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即使对其中的某些方面有争议。我知道同志们确实会指点他人阅读（我曾经

^① 《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分两卷出版实体书籍。第一卷包含章节 A 至章节 F，第二卷包含章节 G 至章节 J

^②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国政治家、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首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著有《什么是所有权？》

^③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Bakunin, 1814-1876），俄国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是社会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著有《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上帝与国家》

^④ 本杰明·塔克（Benjamin Tucker, 1854—1939），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思想家

看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抱怨说，无政府主义者总是建议他阅读 AFAQ，于是我向他解释说，这就是“常见问答”存在的意义所在。因此 AFAQ 只是一个指南，你需要自己去发掘无政府主义，并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和应用它。希望 AFAQ 能够通过概述无政府主义、指出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信息，来帮助这一过程。

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许多回答过于冗长，这很有道理。但是，有些问题实在没法给出简短而又令人信服的解答。例如，简单地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而其他说法是错误的”这样的回答可能既正确又简短。但对于已经知道一些，如何辩护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发明的利润、利息和租金的人来说，这样的回答很难令人信服。同样，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帮助摧毁了俄国革命”也是正确而简短的，但它绝不会说服一个，强调内战对布尔什维克实践影响的列宁主义者。然后是资料来源问题。我们试图让无政府主义者自己去表述大多数问题，但这很占篇幅。我们使用的一些证据来自书籍和文章，普通读者可能不容易获取，因此我们尽量引用全文，以证明我们使用的证据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我曾尝试追踪过参考文献，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说过他们本应该说过的话，而且这种情况很常见）。^①

此外，驳斥对无政府主义的歪曲和杜撰的部分可能会很长，这仅仅是因为提供佐证很有必要。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够研究原始材料的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和稻草人谬误^②（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做的尤其糟糕，他们只是不厌其烦地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仿佛这些论断就是真理）——假设被堆砌在假设之上，论断被重申得好像是事实。AFAQ 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并给出证据来彻底地反驳它们。仅仅说某些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论断可能是正确的，但除非你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很多了解，否则很难让人信服。因此，我希望读者可以理解，并发现即使是最长的回答，也是有趣和有启发的。（“常见问答”格式的优点之一是人们可以直接跳过其他部分，而进入他们感兴趣的部分）

本卷涵盖了：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哪来的、无政府主义都做了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反对哪些事情（以及为什么反对它们），和无政府主义不是什么（比如展示为什么“无政府”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无政府主义）。

后者可能会让大多数人大吃一惊。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用说普通人，听说过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美国地区）。而听说过它的人可能会想，既然它明显是非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管它。可悲的是，我们之所以需要涉及这一领域，仅仅是因为一些学者坚持将其与真正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并列，而我们需要揭露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很少有严肃的思想家会将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列，无论其支持者是将其意识形态称为“国有社会主义”还是“国家工团主义”（令人毫不奇怪的是，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当苏联自称为“人民民主国家”时，没有人把这当回事，也没有人认为他们的政府

^① AFAQ 在引用时会标注被引者、引用书籍和对应页码，考虑到作者引用自英文书籍，所以对应的引文请从相应的英文书籍中查找，而非任何的汉译本。

^② 稻草人谬误(Straw Man): 一种逻辑学谬误。指曲解对方的论点，然后攻击这个被曲解的论点（如同当替身的稻草人一样），并借此宣称推翻了对方的论点。这偶尔也可被视作“偷换概念”

是民主的。但无政府主义似乎被排除在这种常识之外，因此我们发现学者们将“无政府”资本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时，我怀疑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拒绝承认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警示我们不要轻信这种说法！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没有浪费篇幅来解释为什么另一种基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无政府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虽然有些个别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种族主义者，但认为无政府主义与那些，以种族纯洁的民族主义社区为目标的人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观点，是荒谬的。尽管学者们还没荒诞到把“国家无政府主义”也划到无政府主义这一栏，但对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资本主义和“无政府”民族主义一样毫无意义。

然后是 AFAQ 的历史。正如总导言所指出的，AFAQ 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互联网论战中产生的。然而，尽管 AFAQ 一开始可能是对“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回应，但现在已不再是了。如果认为我们真把他们当回事了，或者认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在关注他们（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曾考虑过是否应该干脆把第 F 节从书中删去，但最终还是决定保留它。部分原因如上所述，部分原因是它确实有另一个更有用的目的。新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建立在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教条的基础上，因此，批判这些教条有助于我们反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和来自当前统治阶级的攻击。

我不希望无政府主义重蹈“自由意志主义者”一词在美国（其次是英国）的覆辙。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自由意志主义者只是无政府主义者或类似社会主义理论的化名。然而，美国自由市场右翼在 20 世纪 70 年代盗用了这一名称，现在它（在美国）指的是小政府（或私有制政府）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这就是由富人支持的思想的力量！“自由意志主义者”名词的变化就好像，有些人谈论“自由意志的无政府主义”——仿佛就可以有一个“专制的无政府主义”！其中这些人包括“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这也表明他们实际上对无政府主义是多么无知，以及这种意识形态与我们的运动是多么格格不入（我看到他们中的不少人宣称无政府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而这也表明了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无知）。同样奇怪的是，这些自称为“自由意志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反而是那些，最热衷于维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专制**社会关系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专制无政府主义者”**能够**存在，那么“自由意志无政府主义者”指的就是他们！

正如 AFAQ 所解释的，反对国家是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作品，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出；从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的性质也可以看出。要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你还必须同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即反对资本主义财产和对劳动力的剥削）。戈德温和蒲鲁东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独立分析私有财产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和克鲁泡特金和塔克均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绝非巧合。否认这种论断就等于否认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社会政治理论，更不用说也是否定它的历史和多年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了。

此外，正如 AFAQ 所强调的，要想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必须认识到自由不仅仅是更换主子的能力。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无权威”

(an-archy)，而支持以威权(hier-archy)为标志的社会关系，则会产生自相矛盾的混乱局面（例如，支持各种形式的统治，如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在本质上与国家统治产生的东西是高度一致的——有时是国家还承认就是这样！）。从根本上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组织理论，其基础是个人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的联合，且否认和限制个体的自由和个性。这意味着，始终如一的无政府主义者会植根于自我管理、权力下放、“自下而上”的决策背景下的自由联合（即植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

AFAQ 还试图深入探讨无政府主义者习惯上比较薄弱的主题，例如经济学（讽刺的是，蒲鲁东就是通过经济批判而成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仅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在自身历史和思想方面的资源，也是我们在斗争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主题方面的资源（希望我们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的批判对其他激进主义者也有用）。我们尽量标明所引用的资料来源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自由意志主义者。如有疑问，请查看网页上的参考书目。它将参考文献分为两部分——自由意志主义者（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非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只是赞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和非自由意志主义者（不用说，包括右派“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言而喻，引用某一问题专家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赞同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引用凯恩斯主义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他们的具体政治建议。

有些人批评 AFAQ 并没有包含无政府主义最与时俱进的发展，这有道理。我曾多次请求这些批评者帮忙更新这些部分，当然，也请求他们指正其他人认为我们所犯的任何错误。我们通常都是自己发现错误并加以改正（尽管指出错别字的电子邮件源源不断）。但我们始终是一个小集体，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A.5 节中没有讨论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件，比如世纪之交阿根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起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群众起义中自发应用于实践的绝佳例子）。可以说，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思想和实践一直在发展，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但如果我们不断增加 AFAQ 的内容来反映这一点，那么它就永远无法出版！因此，我们将大部分附录排除在书籍版本之外（这些附录和冗长的链接页面仍可在网站上查阅）。

我要感谢所有为 AFAQ 提供过帮助和做出过贡献的人（无论直接或间接、无论我们是否知情）。至于作者身份，AFAQ 多年来一直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此外，为出版做好准备和修订的任务也落在了我的身上。总的来说，我乐在其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书上写的是我的名字，而不是集体的名字。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权利。因此，我对书中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负责。为了出版，我对 AFAQ 进行了大幅修订，虽然我试图把它们都揪出来，但我确信我没有完全做到（尤其是在那些重写的章节）。我希望这些不会对本书造成太大的影响。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伴侣和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给了我源源不断的灵感、爱、支持和希望（更不用说耐心了！）。如果这本书能让他们更好地生活在世界上，那么我的付出就是值得的。因为，归根结底，无政府主义只是为了让

世界变得更自由、更美好。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忘记我们之所以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初衷。

Iain McKay

An Anarchist FAQ

结语

“毫无疑问，无政府这个词会让人感到害怕。然而，无政府状态——无治——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它与民主的逻辑与合理结论如出一辙。当然，那些统治者——老板和政客、资本和国家——无法想象人们可以自己统治自己，因为承认人们可以在没有威权和统治者的情况下生活，就会拔掉他们整个意识形态的根基。一旦你承认人们不仅可以——而且今天在他们生活的许多领域确实可以——比公司和政府更容易、更好、更公平地管理事物，那么老板和首相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我想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在我们内心深处都意识到并理解这一点，但学校、文化、警察、所有的专制机构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老板，我们需要被控制，‘这是为我们好’。显而易见，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好——而是为了老板好。”

“无政府主义要求真正的自由和自主”

“但我仍然坚信，一个类似于无政府主义者构想的未来，一个没有主人、没有上帝的世界，一个能让人们、让所有人们，都能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的世界，是可能达到的，也是我们值得去拥有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未来的曙光，因为人们在常常生活中自发组织，而并不依赖于某个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我们从反抗精神中看到了这一点——虽然这种精神常常被愤怒和绝望所扭曲，但却向我们表明，人们并没有放弃。我们从政治行动主义、社会生活、人们对体面、尊重和自主的要求中，看到了这种精神，看到了人们是作为集体一部分时仍希望作为个体愿望。”

“不，虽然我并不认为保龄球联盟^①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但它们就像我们工作场所以外的大部分生活一样，是在没有阶层制度和压迫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在我们生活中最有意义、真正人性化的部分中，无政府主义原则的组织发挥了最佳作用。然而，我也相信，作为一种批判学说和作为对未来的憧憬——也许是唯一一种不会以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灭绝而告终的憧憬，或者正如奥威尔所说的那样，当一只象征暴政的长统靴始终踩在人类的脸上蹂躏时——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取的和必要的。

^① 保龄球联赛(Bowling league)是一种保龄球联盟赛事，其特点是不可以由保龄球馆组织，也可能由不同的团体自发地组织，比如公司、教会或工会

——马克·雷尔^①：《为无政府主义辩护》(The Case for Anarchy)

^① 马克·雷尔 (Mark Leier)，加拿大历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

第 A 节

何为安那其？

第 A 节导言

现代文明潜伏着三个灾难性的危机：(1)包括以下问题造成的——社会崩溃：贫困率上升、流浪者增多、屡见不鲜的犯罪与暴力，层出不穷的精神问题、毒品和酒精滥用，社会隔离、政治冷漠、人格化缺失，自立及互助的社会结构的退化等等；(2)这个星球脆弱的，但是为所有复杂的生命形式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结构的崩溃；(3)（尤其是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激增。

按照传统派的观点，包括各路建制派的“专家”、主流媒体与政客，基本上认为这些危机是独立的、各有成因，并因此可以被在忽略其它两者的情况下，逐个击破。然而显而易见，这种“传统派”的方法根本不起作用，因为这些问题正在变得更糟。如果不尽快找到更好的切入点，那么前方等待我们的只有灾难——要么是毁灭性的战争，要么是生态末日，要么我们在城市废墟中退化回野蛮人——要么，是以上全部。

通过追溯这些问题的共同起源，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一条统一并连贯的方法，来理解这些危机。问题根源存在于一切“文明”社会制度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它就是——**等级制度(hierarchy)**。无政府主义式的分析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所有的主要机构都是等级制度的，比如金字塔式的权力集中，像公司、政府官僚机构、军队、政党、宗教组织、大学，等等。无政府主义接着进一步揭示了在这种阶层权力制度中，固有的专制关系，是如何对个人、社会、及文化产生负面影响的。在这个常见问答的第一部分（A 至 E 部分），我们将详细地介绍无政府主义对阶层权力制度、及其负面效果的分析。

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仅仅是“消极的”和“毁灭性的”，因为它远不止是这些。首先，它同样是一个对自由社会的倡议。艾玛·戈尔德曼对所谓“无政府主义问题”做如下表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自我的同时，与别人合而为一，是如何在和全人类产生共鸣时，依然保留个人的特性”[**Red Emma Speaks**, 第 133-134 页]。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能释放每个人的潜能，但又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社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无政府主义构想了这么一个社会——人类的事务将不再通过等级森严的集权结构“**自上而下**”地加以控制，而是，引用本杰明·塔克的话说，“由个体或志愿团体管理”[**Anarchist Reader**, p. 149]。常见问答的后半部分（I 和 J 部分）将描述无政府主义对如此“从下至上”组织社会的积极建议。但即使在前面部分也能看到无政府主义的一些建设性的核心理念。甚至在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等有缺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批判中（分别为 F 部分和 H 部分），也能看到无政府主义的积极核心理念。

如同 Clifford Harper 漂亮地提出，“就像一切伟大的构想那样，无政府主义归根到底非常朴素——人类的最佳状态便是生活不受权威约束，自主地决定而不是被命令”[**Anarchy: A Graphic Guide**, vii 页]。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最大限

度地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拆除所有压制人民的制度：

“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愿望把社会从阻碍自由人性发展的所有政治的，及社会强制性的制度下解放出来”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第 9 页]

我们将要看到，所有这样的机构都是阶层制度，并且，他们的压迫的本质植根于其等级制的形式。

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社会经济学理论的政治学理论，而非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区别**非常重要**。首先，理论意味着你掌握思想；意识形态意味着思想掌握你。无政府主义是一套思想理论体系，而这些思想是灵活的，一直在革新和演变，并可以便根据新的数据而修改。当社会变化与发展时，无政府主义也同样在变化与发展。相反，意识形态则是一堆“死的”的理念——人们教条地去相信这些观念，常常忽略了现实，甚至“改变现实”去适应这些（根据定义而）正确的意识形态。所有这样“死的”的理念都是暴政和矛盾的基础，也将导致人们尝试让所有人去削足适履、强求一致。无论问题中的意识形态是哪一种——列宁主义，客观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或别的什么——它们具有同样效果：在学说名义下毁灭真正的个人，而这种学说通常为某些统治精英的利益服务。或者，像巴枯宁所指出的：

“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不过是为了一些无情的抽象概念——上帝，国家、政权、民族荣誉、历史权利、司法权利、政治自由、公共福利——而对千百万穷苦的人们展开的永不休止的血腥杀戮。” [God and the State, 第 59 页]

教义是静态的，古板地死气沉沉。他们通常是一些早已辞世的、无论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先知们”的杰作。其追随者把他们的想法塑造成神像、铸造成万古不变的石头。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让生者去埋葬死者，让生者可以继续存活。活人理应统治死人，而不是反过来。意识形态是批判性思维的克星，因此也是自由的克星，因为它提供一本写着规则和“答案”的手册，从而减轻了我们为自己思考的“负担”。

在撰写这个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常见问答时，我们的目的不是给你“正确”的答案或一本新的规则手册。我们解释了一下过去无政府主义是怎样的，但我们将更关注它当代的形式，以及为什么**今天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答旨在引发你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如果你只是在寻找一个新的“意缔牢结” (Ideology)，那么对不起，无政府主义不适合你。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努力变得实在和务实，我们并非“通情达理”的人。“好好先生”们囫圇吞枣地接受“专家”和“权威”告诉他们正确的东西，所以他们将永远是奴隶！无政府主义者知道，如巴枯宁所写的：

“只有当（一个）人坚持自己的真理、言行出于他最深刻信念时，他才是强大的。这样无论处境如何，他都总是知道自己必须说什么、做什么。他有可能倒下，但他不会令自己或自己的事业蒙羞” [Statism and Anarchy—Albert Meltzer 引用, *I couldn't Paint Golden Angels*, 第 2 页]。

巴枯宁描述的是独立思考的力量，也就是自由的力量。我们鼓励你不要变得“通情达理”，不要欣然接受别人告诉你的，而是你自己思考和行动！

最后一点：很明显，本书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定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会不同意这里所写的很多内容，但这正是当人们独立思考时所值得期待的。我们所希望去做的，是指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思想，并根据我们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和运用，给出我们对某些主题的分析。然而我们确信，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我们表达的核心思想，即使他们可能不同意我们某些部分对该思想的应用。

A.1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是一个致力于实现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理论,“没有君王,没有主人。”[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What is Property**), p. 264] 换言之,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希望创造一个人人自由而平等地集体协作的社会。因此,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基于阶层控制的存在形式——特别是被国家或者资本家控制,这种控制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损害个体及其个性。

用无政府主义者 L. Susan Brown 的话说:

“虽然对无政府主义的流行看法是一种暴力、反政府运动,但比起简单的反对政府权力来,无政府主义有着更加精细微妙的传统。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谓权力和支配对一个社会是必要的观念,而是提倡更加合作的、无等级阶层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组织形式、经济组织形式。”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106]

然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和“无政府状态(anarchy)”,无庸置疑是在政治理论中被歪曲得最厉害的理念。通常而言,这些词往往被用来表述“混乱”或者“无秩序”,因此,此种暗示就好像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社会混乱,回归原始的“丛林法则”。

这种被误传的过程,在历史上并非首次。比如说,在那些认为一个人组织的政府(君主制)是必要的国家里,“共和”或者“民主”这些词,用起来就像是“无政府”一样,意味着混乱和无序。那些希望维持既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级显然会暗示说,反对当前体制在实践上行不通的,新的社会形态将只会引起混乱。或者,就像 Errico Malatesta 表述的:

“既然人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并且没有政府就只能变成无序和混乱,那么无论从天性上还是从逻辑上说,安那其就意味着没有政府,听上去就好像没有秩序一样。” [Anarchy, p. 12]

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改变这个对“无政府状态”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样人们就会明白,政府和其他社会上的阶层关系都是有害且毫无必要的:

“改变观念,使公众确信政府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然后,无政府这个词——就是因为它意味着是政府的消失——将开始对每个人意味着:天然的秩序,人类需求和利益的满足,和在完全的团结中的完全的自由。” [同上, pp. 16]

这个常见问题解答(FAQ)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改变,人们一般理解中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观念,但这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除了辩驳“无政府

状态”这一“常识”所带来的歪曲与误解以外，我们还需要打击多年来我们的政治和社会敌人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就像巴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所说，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激进派中的激进派——如同黑猫一般，是许多人的恐惧——所有的偏执狂、剥削者、欺骗者、伪造者和压迫者。因此，我们也是最受诽谤、受曲解、受迫害的人。” [Nicola Sacco and Bartolomeo Vanzetti, *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p. 274]

万泽蒂知道他在说什么。1827年，他和他的同志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被美国以莫须有的罪行诬陷，并因其是外国无政府主义者而被电刑处死。^①所以，本《常见问答》将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来纠正这些来自资本主义媒体、政客、意识形态学者和老板们，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诽谤和歪曲（更不用说我们曾今的激进派朋友们，比如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歪曲了）。希望我们讲完之后，你会理解，为什么哪些当权者要花那么多时间来攻击无政府主义了——因为她是一个能有效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并终结所有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的制度的思想。

A.1.1 “无政府状态”是什么意思

“无政府状态”（Anarchy，安那其）这个词来自于希腊。前缀 an（或者 a），意思是“非”、“缺少”、“缺乏”，或者“没有”；后面加上的“archos”，意思是“统治者”、“管理者”、“领袖”、“主管”，或者“权威”。或者就像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所指出的，安那其来自一个意思是“与权威相反”的希腊词汇。 [Anarchism, p. 284]

虽然希腊词语“anarchos”和“anarchia”通常意味着“没有政府”或者“没有政府的存在”，但如你所见，准确地来说，无政府主义原本的意思并不是简单的“无政府”，“An-archy”的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或者更笼统地说，“没有权威”。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者才频繁地使用这个词。比如克鲁泡特金认为，无政府主义“不仅抨击资本，而且还抨击在资本主义中权力的主要源头：法律、权威，以及国家。” [同上, p. 150]。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政府状态“不一定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没有秩序，而是没有统治”。[本杰明·塔克, *Instead of a Book*, p. 13]。Hence David Weick 对此做了最好的概要：

“无政府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所有权力、主权、控制和等级/阶层划分表示否定的、普通的社会和政治理念，以及一种取消它们的意愿……，因此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反国家主义……（虽然）政府（国家）……的确是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的中心焦点。” [Reinventing Anarchy, p. 139]

由于这个原因，与其说纯粹地反政府或者反国家，无政府主义更主要是一个反对等级制度的运动。为什么？等级制度是使权威具体化的组织结构。既然国家是阶层的“最高”的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从定义上说，的确是反国家的；但是这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充分的定义。这意味着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

^① 注：详见美国干草市场起义，在 A.5.2 小节中有详细介绍

阶层组织，而不是仅仅地反国家。用 Brian Morris 的话来说就是：

“无政府这个术语来自希腊，本意是‘没有统治者’。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任何形式的政府或者强制性的权威，任何形式的等级阶层和统治。所以他们因此反对——如墨西哥无政府主义者 Flores Magon 所说的，‘暗三一’——国家，资本和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也反对任何形态的宗教权威。但是无政府主义也寻求通过各种手段建立或实现无政府状态，即一个没有强制机构的、去中心化的社会，一个通过自愿协会联盟组织起来的社会。” [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no. 45, p. 38]

在这篇文章中涉及的“等级阶层/等级制度 (hierarchy)”^①其实是一个相当新的名词——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古典”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确实用过这个词，但也很少使用（他们通常首选“权威 (authority)”一词，作为“权威主义 (authoritarian)”的简称）。不过，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哲学反对等级制度，反对个人之间的任何特权或权力不平等。巴枯宁在抨击“官方”权威、而为“自然势力”辩护时提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说：

“想让任何人都无法欺压他的同胞吗？那就确保任何人都不得拥有权力”。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71]

就像 Jeff Draughn 所说，“虽然它一直都是‘革命计划’的潜在部分，但直到最近才有了反等级制度这一更广泛的概念。尽管如此，从‘无政府主义’Anarchy 一词的希腊语词根中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根源。” [Between Anarchism and Libertarianism: Defining a New Movement]

我们强调这种对阶层的反对，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绝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或者政府。它包括所有作为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关系上的独裁，尤其是那些和资本财产与雇佣劳动相关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蒲鲁东的论点中可以看到，“资本……在政治领域类似于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政府或权威的政治思想，以及教会的神学思想，是以各种方式相联系的三种相同思想。攻击其中之一就等于攻击所有这些思想……资本之于劳动者、国家之于自由，就如同教会之于精神。这种三位一体的专制主义在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哲学中，都一样有害。压迫人民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同时奴役他们的身体、意志和理性” [quoted by Max Nettlau, 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pp. 43-44]。因而我们发现 Emma Goldman 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意味着“男人（或女人）必须出卖他（她）的劳动力”，并因此，“他（她）的倾向和判断都要服从雇主的意志”。[Red Emma Speaks, p. 36]。40 年前，巴枯宁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人身和自由”，以换取工资。 [同上, p. 187]。

因此“安那其”不仅仅意味着“无政府”，它意味着反对所有专制组织和阶层形式。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起源……（建立在）对阶级组织形式和专制观念的批判上；以及……在人类进步运动中可见的趋势的分析

^① hierarchy 原译“等级制度”，在后文也可能译作“等级阶层”。请后续译者讨论并校核

上” [同上, p. 158]。对 Malatesta 而言, 无政府主义“诞生于对社会不公的道德反抗”, “社会病态的具体归因”可以在“资本主义财产和国家体制”中找到。当被压迫者“寻求推翻国家和财产体系时——无政府主义就此诞生了”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9]。

因此, 任何试图断言无政府主义是单纯地“反政府”的行为, 都是对无政府主义运动及“无政府主义”这个词的歪曲。^①就像布赖恩-莫里斯 (Brian Morris) 所言: “当一个人研究古典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特征时……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们从没有把观点局限在“只是反政府”上。无政府主义始终挑战一切形式的权威和剥削, 并平等地批判资本主义、宗教和国家。” [同上, p. 40]

而且, 显而易见, 无政府状态既不意味着混乱, 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寻求制造混乱或者无序。相反,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 以个体自由与自愿合作为基础构建的社会——换言之, 自下而上的秩序, 而非由权威自上而下强加的混乱。例如一个没有统治者的社会, 才是真正的“安那其”。

虽然我们在第一节中讨论了无政府状态可能是什么样子, 但诺姆-乔姆斯基总结了其中的关键方面, 他指出, 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中, “人类之间任何超出个人范围的互动——无论是在社区、工作场所、家庭, 还是更大范围的社会中, 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制度形式——不管什么情况, 都应由其参与者直接控制。因此, 这就意味着是工业体系中的工人委员会、社区之中的人民民主、社区之间的交互、较大群体中的自由协会, 直至国际社会间的组织。” [Anarchism Interview] 社会将不再分为由老板和工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构成的等级制度。相反, 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以参与性组织中的自由联合为基础, 自下而上地运行。应该指出, 如今, 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组织、活动和斗争中, 正尽可能地试图创造这样的社会。

A.1.2 “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意思

引用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概念, 无政府主义是“没有政府体制的社会主义”。 [Anarchism, p. 46] 换句话说, 就是“废除了人与人的剥削和压迫, 也就是废除了私有制 (即资本主义) 与政府。” [Errico Malatesta, "Towards Anarchism," in Man!, M. Graham (Ed), p. 75]。

因此,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 旨在创建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上都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没有统治者的无政府状态, 是可行的社会体制形式, 也因此致力于最大化的个体自由和社会平等。他们认为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目标是相互支持的。或者, 正如巴枯宁著名的格言所说的:

^① 因此可以说, “无政府主义”这个中文译名, 本身也是对 Anarchism 理念的曲解

“我们确信，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是特权和不公，而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役与暴行。”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69]

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了这个观点。没有平等的自由仅仅是当权者的自由，而没有自由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并且是奴役他人的借口。

虽然有很多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从个人无政府主义到无政府共产主义——详见 A.3 部分），而在所有这些类型的核心中，一直有两个共同立场——反对政府、反对资本主义。以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废除国家，废除高利贷；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统治，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剥削。” [cited in 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 - A Study of Left-Wing American Individualism by Eunice Schuster, p. 140]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把利润、利息和地租看作为高利贷（也就是剥削），因此他们反对利润、利息和地租，也反对创造他们的条件，就像他们反对政府和国家一样。

更一般地，用 L. Susan Brown 的话说，把诸无政府主义“联成一体”的是“对阶层和支配的普遍指责，以及为人类个体的自由而战的意愿。”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108]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个人如果收到国家或者资本主义的支配，那么他就不可能得到自由。正如 Voltairine de Cleyre 所总结到：

“无政府主义……认为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充分满足，所有人的身心都有机会得到全面发展……。[它]让人们知道，如今不公正的生产组织和财富分配组织必须最终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制度，它将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的自由，而不必先去寻找一个主子，向他[或她]交出他[或她]的产品的什一税，从而保证每个人都有获得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自由……从盲目顺从者中，它制造出不满者；从无意识的不满者中，它制造出有意识的不满者……。无政府主义旨在唤起人们对压迫的意识、对更美好社会的向往，以及对资本主义和国家进行不懈斗争的必要性的认识”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理论，它提倡创造无政府状态，即创造一个基于“没有统治者”的座右铭上的社会。为达到这种目的，“就和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土地私有制、资本和国家机器已是时候寿终正寝了，而所有生产必需品必然、也必将，成为社会的公有财产，由财富的创造者共同管理。而且……他们主张社会政治组织的理想状态，就是将政府的职能减少到最低……（并且）终极目标是将政府职能减少到零——那就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无-政府的状态。” [Peter Kropotkin, 同上, p. 46]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它分析和批评当前的社会同时，也构想了一个潜在的新社会——一个将满足人们在当今社会中，某些被剥夺的需求的社会。而这些需求，最基本地——就是自由，平等和团结，这将在 A.2 中论述。

无政府主义将批判和分析与希望联合在一起，因为，就像巴枯宁（在他无政府主义早期时）所指出的，“破坏的主张就是创造性的主张。”一个不理解现在的

社会错在哪的人，是不可能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

然而必须指明，无政府主义不仅仅只是一种分析方法，与对更好社会的愿景。她植根于斗争，植根于为被压迫者争取自由的斗争。换句话说，它提供了一种实现新制度的手段，这种新制度将人的需求置于权力之上，将我们的地球置于利益之上。引用苏格兰无政府主义者 Stuart Christie 的话：

“无政府主义是一场争取人类自由的运动。它是具体的、民主的、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于并将坚持于，一场弱势群体对压迫和剥削的直接挑战。它既反对国家权力的暗中增长，也反对独占性个人主义的有害风气。无论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还是独自存在，他们都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

“无政府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生活事件。从哲学上说，它着力于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最大和谐。从实践上说，它旨在使我们在没有政客、政府、国家及其官僚的情况下，组织和生活。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相互尊重的主权个体将在天然界定的社区内，以非胁迫关系组织起来，并且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于分配权。

“无政府主义者不是痴迷于抽象原则和理论建构的梦想家…….无政府主义者深知，一个完美的社会不可能明天就实现。事实上，斗争将永无止境！然而，正是这一愿景鞭策着我们与现有的事物作斗争，并为可能实现的事物而斗争……

“归根结底，只有斗争才能决定结果；而迈向一个更有意义的社会，必须从抵制一切形式不公的意愿开始。一般而言，这意味着挑战一切剥削，蔑视一切强制权威的合法性。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的话，那就是，一旦丧失了服从政客或意识形态的习惯，养成了反抗统治和剥削的习惯，那么普通人就有能力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由而公平地组织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政府主义者不会置群众斗争于不顾，也不会试图主宰群众斗争。他们寻求尽其所能做出实际贡献，并在其中帮助个人实现最高水平的自我发展和群体团结。在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和革命运动中，都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关于自愿关系、平等参与决策、互助以及批判对一切形式的统治的思想。” [My Granny made me an Anarchist, pp. 162-3]

正如众多无政府主义者所认为的，无政府主义仅仅只是一种理论表达，表达我们可以在没有老板和政客的情况下组织自己和运作社会。它让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者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阶级，所表现出的力量，可以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并未整个社会的变革做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装早一个适合人类生活的社会。

无政府主义并非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无政府主义思想每天都在付出实践。哪里有被压迫者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力、采取行动捍卫自由；哪里有他们团结合作、反抗压迫；哪里他们在没有领导和头头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哪里就有

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力图加强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趋势，并将付诸实践。正如我们在第 J 节中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者以多种方式在资本主义内部应用他们的思想，以便更好地改变资本主义，直到我们彻底摆脱资本主义。I 部分将讨论我们的目标是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什么。

A.1.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又被称作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定义中消极性的一面，于是使用了其他的术语来强调他们理想中固有的，积极性和建设性的一面。使用的最普遍的术语是“自由社会主义”、“自由共产主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互换的。正如万泽蒂(Vanzetti)所说：

“归根到底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世界工联(IWW)，都是社会主义者。而我们与其他人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专制主义者，而我们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相信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或政府，而我们认为不需要国家和政府。”[Nicola Sacco and Bartolomeo Vanzetti, *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p. 274]

但这是正确的吗？在美国赫氏大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的定义中，我们发现：

自由意志主义者 (LIBERTARIAN): *信仰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人；信仰存在自由意志的人。*

社会主义 (SOCIALISM): *一种由生产者支配政治权力、生产方式与产品分配的社会体制。*

把这两个定义拿到一起，就是：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LIBERTARIAN SOCIALISM): *一种信仰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自由意志的社会体制。其中生产者支配政治权力、生产方式与产品分配。*

（尽管我们必须补充说明，字典缺乏政治素养这个观念确实难以扭转。我们只能使用这些定义来表示“自由意志主义者”既不意味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显然其他的字典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定义。那些想要争辩字典定义的人，可以继续这种无休止的且政治上无用的“爱好”，但我们不会。）

然而，由于美国自由意志党（Libertarian Party）的成立，目前许多人认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确实有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企图要将（自由意志党人构想的）“社会主义”中“反自由意志主义”的理念，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从而使那些“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更容易“接受”——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试图从“自由意志主义”的持有人那里窃取它的标签。

事实胜于雄辩。无政府主义者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术语“自由意志主义”，用以描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理想。根据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 Max Nettlau 的说法，早在 1858 年到 1861 年，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派 Joseph Dejacque 就已经在纽约出版名为《自由，社会运动杂志》（Le Libertaire, Journal du Mouvement Social）的书籍；而术语“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使用，可以追溯 1880 年，十月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上采用此说法。[Max Nettlau, *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p. 75]。而在法国从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使得术语“自由意志主义”变得更加的普及，从而试图避免反无政府主义者法律的出台，以及消除“无政府状态”在公众心里所产生的负面联想（比如，1895 年 Sebastien Faure 和 Louise Michel 在法国出版了报纸《Le Libertaire -- The Libertarian》）。

从那以后，特别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这个术语一直与无政府主义理想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举一个更近一些的例子：在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在 1954 年 7 月组织了“自由意志者同盟”；该组织持有坚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并且一直持续到 1965 年。而看看美国本土的“自由意志党”，只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才出现，离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他们的政治观念，已经过了大约 100 年（离第一次采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措辞也有 90 年的时间）。所以说正是那个政党，“剽窃”了这个词，而非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接下来将在第 B 节里，讨论为什么“自由意志”资本主义的观念（就像自由意志党所说的那样），是完全自相矛盾的说法。

同样我们也将第 I 节里说明，只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才能最大化个体的自由。不必说，国家所有制——也就是一般被称作的那种“社会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就像我们要在第 H 节里详细阐述的那样，国家“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形态，没有一丁点社会主义的内容。就像 Rudolf Rocker 所说，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仅简单地是怎么吃得饱的问题，还是对社会的发问：如何争取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由能动性。失去自由，社会主义只会堕落到糟糕的国家资本主义——牺牲所有的个人思想，去为了那虚伪的集体利益。”[Colin Ward 引, *"Introduction"*, Rudolf Rocker, *The London Years*, p. 1]

鉴于“自由意志主义”具有的无政府主义“血统”，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乐于看到这么一个词，被一个与我们几乎没有相似的意识形态所窃取。在美国，正如 Murray Bookchin 提到，“自由意志主义这个‘术语’本身，毫无疑问，提出了一个明摆着的问题：那就是将反威权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对‘纯粹资本主义’与‘自由贸易’这种早已过时的运动产生一种可疑的认同感。这个运动从没有创造过这个词：他只是从 19 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挪用了这个词。而那些反威

权主义者……那些为被压迫者说话的人们，应该收回这个词的使用权，而不要让那些将自由，和企业家精神与利润相提并论的个人利己主义者们，去糟蹋这个词。”因此，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在实践中，去恢复那被”自由市场“所变质的传统” [The Modern Crisis, pp. 154-5]。只要这么做，我们就可以继续称我们自己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

A.1.4 无政府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所有流派的无政府主义都反对资本主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压迫和剥削之上（见第 B 节和第 C 节）。无政府主义否定“除非有一个驱使者从他们的产品中拿走一定比例的抽成，否则人们没法在一起工作”这样的说法；并认为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中，“实际的劳工们会自己制定规则，决定哪些事情，需要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处理。”只有这样，工人们才能从“资本主义可怖的束缚中”解放自己。[Voltairine de Cleyre, "Anarchism", 《Exquisite Rebel》, p. 75 and p. 79]

（我们必须在此处声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基于支配和剥削的经济体制，包括封建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应该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奴隶制等等。我们之所以集中讨论资本主义，是因为此时此刻，它正在统治我们的世界）

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以及像蒲鲁东和巴枯宁这样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就像克鲁泡特金在他的经典文章《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中》(Modern Science and Anarchism)"中所说的那样，“只要理解社会主义广泛的、一般的和真正的意义，即努力**废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无政府主义者就会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携手并进。”[《进化与环境》(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81] 或者，用塔克的话说，“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劳工应该占有自己的财产”，“社会主义的两种流派——国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均认同这一主张。[The Anarchist Reader, p. 144] 因此，“社会主义者”一词在最初定义上，包括“所有相信个人有权占有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人。” [Lance Klafta, "Ayn Rand and the Perversion of Libertarianism," in **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no. 34] 正因为所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剥削（或高利贷），所以他们将自己置于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

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而言，“唯一保证自己的劳动果实不被窃取的方法，就是掌控劳动工具。” [Peter Kropotkin, **The Conquest of Bread**, p. 145] 因此，蒲鲁东支持工人合作社，因为“（在这其中）每个组织中受雇的个体……都占有对公司财产不可分割的份额”，“（像这样）共同分担得失……集体的力量（例如生产的盈余的能力），终于不再是为一小部分管理者生产利润：它变成了所有工人的财产。”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222 and p. 223] 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盼望着资本对劳工剥削的终结，也盼望着一个生产者掌握和控制生

产资料的社会（应该强调，这里的生产资料也包括服务）。而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圈子里，生产者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个目标仍然是所有社会主义者共同的愿景。其中，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由工人直接控制生产，生产的所有权由工人协会或公社拥有。（详见 A.3 节中，不同类型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各自的看法）

此外，无政府主义者还反对在资本主义其中的专制制度以及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既无法自我管理，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劳动产品。因此资本主义很难建立在人人平等自由的基础上，也不可能是非剥削性的，因此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观点（塔克和巴枯宁都是他的启蒙者），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将见证“资本主义剥削和所有权剥削的广泛废止，（以及）工资制度的废除”，因为“工人要么……单纯只是资本家/经营者/推销员的雇员……要么他也可能参与其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处于从属地位，受到剥削：只能永久性地服从……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恢复了作为人和公民的尊严……他虽然成为生产组织的一部分，但无论哪种情况，他都只是生产组织的奴隶……我们不必犹豫，只因我们别无选择……有必要在工人中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上下级的关系将会一直存在，也就依然会出现主人和雇佣工人两个‘种姓’，这与自由民主的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同上，第 233 页和第 215-216 页。]

因此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反资本主义者。（“如果工人们掌握自己生产的财富，那就没有资本主义了” [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 44]）以本杰明·塔克为例——一位最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稍后讨论自由主义的事）——称其理想为“无政府式的社会主义”，并指责资本主义是一个基于“放高利贷者、享受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收受人”的体制。塔克认为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社会，资本家将成为多余的存在，而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也将终止，因为“劳工……将会……留存其天然的工资，以及其全部的生产产品。” [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p. 82 and p. 85] 这种经济形式将建立在互助银行，以及合作社、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自由交换产品的基础上。对塔克以及其他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它以各种法律和垄断为标志，用来确保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优势地位，从而确保通过利润、利息和地租，对后者进行剥削。（更全面的讨论见第 G 节）就算是麦克斯·施蒂纳这位著名的利己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各种“幽灵”也是嗤之以鼻。对他而言，“幽灵”指的是一种被视为神圣或者宗教性的观念，比如私有财产、竞争、劳动分工等等。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将自己视为社会主义者，但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者——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就如同个人无政府主义者 Joseph A. Labadie 所说：（与塔克和巴枯宁如出一辙）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那这就是一个错误。无政府主义是自愿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两种：建制主义的(archistic)^①和无政府主义的、威权主

^① 原文如此

义的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国家式的和自由式的。事实上，每个改善社会的主张，要么增加外部意志和外部力量对个人的影响，要么减少之。当它增加这种影响时，它是建制主义的；而当他减小这种影响时，它是无政府主义的。” [Anarchism: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

Labadie 曾多次表示，“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因此，“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废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Daniel Guerin 的这句话贯穿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无论是社会派还是个人派。[Anarchism, p. 12] 事实上，干草市场烈士阿道夫-费舍尔（Adolph Fischer）用和 Labadie 几乎相同的语言表述了相同的事实，那就是“每位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并非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必要条件。” 同时他也承认，这场运动“分为两派：像蒲鲁东这样共产主义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中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 [The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 p. 81]

与此同时，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的确在某些方面上没法达成共识——比如，真正的（非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是否会实现自由最大化的最佳手段——但他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因其是剥削性和压迫性的，应予以反对；而且根据定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联合劳动而非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只有劳工联合，才能“减少外部意志和力量对个人的影响”；而这种由劳动者自我管理工作的方式，正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核心理想。这一观点可以从 Joseph Labadie 对工会的评价中得出。他认为，工会是“通过联合获得自由的典范”，“相较于参与工会的工人，没有工会的工人更像是雇主的奴隶。”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Labour Question]

然而时过境迁，词语的含义也随之变化。在今天“社会主义”这个词大多数情况指的是**国有社会主义**——一个因其否定了自由以及社会主义真正的理想，而被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的社会体系。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诺姆·乔姆斯基(Noa Chomsky)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

“如果左派被认为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那我会断然与左派划清界限。列宁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之一。” [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 p. 779]

无政府主义是在不断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早在列宁上台之前，米哈伊尔·巴枯宁就曾警告马克思的追随者，如果马克思的国有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实施，“红色官僚”将建立起“最恶劣的专制政府”。显然，无论是施蒂纳还是蒲鲁东，尤其是巴枯宁，他们的作品都相当准确地预测到了国有社会主义的恐怖之处。顺带一提，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最早，和最强烈的批评者与反对者之一。

然而，同作为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确实在**某些**思想上，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有共通之处（而与列宁主义者则完全没有共通之处）。巴枯宁和塔克两

人均认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以及他的劳动价值论（详见第 C 节）。马克思本人也深受麦克斯·施蒂纳的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影响，而该书则对马克思所谓的“庸俗”共产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进行了精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也有一些人持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非常相似的观点（尤其是社会无政府主义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分支）。例如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ie Pannekoek)、罗莎·卢森堡、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等人，他们与列宁的观点相去甚远；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等人在文章中赞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从马克思到列宁有许多连贯性，但从马克思到更加自由意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着连贯性。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严厉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其思想上对平等者自由联合的渴望，近似于无政府主义。

因此基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中，站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国家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社会主义”对立面一种社会主义形式。无政府主义者倡导个体、小组、团队间的自由联合与合作，而不是多数人一提到“社会主义”就与之关联的“中央计划”。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之一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在其中“每个人都只是收工资的，而国家就只是那个发工资的”。[Benjamin Tucker, *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p. 81]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多数人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因为“把社会主义简化为‘让国家当资本家’的思想，正是大社会主义党中，社会民主派正试图做的事” [Peter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1, p. 31] 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把马克思主义、“中央计划”、国家资本主义或国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划等号，至于具体为什么，我们将在第 H 节中详细说明这一点。

所以，因为存在这些与国有社会主义者的区别，为了不使人困惑，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只是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会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就是社会主义者。然而，随着所谓的“自由意志主义”右派在美国的崛起，一些亲资本主义者也开始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有些兴师动众的原因。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讲，我们强调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无政府主义就意味着反资本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关于“无政府”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更全面讨论，请参阅 F 部分）

A.1.5 无政府主义从何而来？

无政府主义是从何而来的？引用俄国革命中马赫诺运动参与者所著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的联合平台》(*The 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来说明这一点，是再好不过了。他们指出：

“工人再被奴役过程中的阶级斗争以及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在压迫中催生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一种对基于阶级和国家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彻底否定，并渴望代之以工人自我管理的、自由的、非国家社会的思想。

“因此，无政府主义不是源于知识分子或哲学家抽象的思考，而是源于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源于工人的需求和需要、源于工人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而这些渴望在工人群众生活和斗争最英勇的时期，变得尤为鲜活。

“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杰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并不是发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只是在群众中发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以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为力量，帮助具体化这个思想并将其传播开来。” [第 15-16 页]

与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样，马赫诺运动是发生在 1917-1921 年间，乌克兰的无产阶级抵抗红军（共产主义者）和白军（沙皇/资本主义者）势力的群众运动。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历来在工农中找到其主要支持者”。[**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652]

无政府主义是在被压迫者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产生的。例如，在克鲁泡特金看来，“无政府主义……起源于日常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运动每次从一些伟大的实践教训中得到启发，都会得到更新：因为它起源于生活本身的教诲”。对蒲鲁东来说，他的互助主义思想的“证据”在于“当下的、革命性的实践活动”，（也就是）“那些在巴黎和里昂……自发组织起来的……劳工联盟，（正在表明）信用组织和劳工组织加起来，就是同一个东西”。[**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p. 59-60] 事实上，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蒲鲁东的结社理想……与里昂互助主义者的纲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似性”，且“（在这些思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趋同性。很可能正是有了里昂丝绸工人的榜样，蒲鲁东才能够更加连贯地阐述他的建设性纲领。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由这些工人实现了。” [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p. 164]

因此，无政府主义源于争取自由的斗争，源于我们对全人类都能够有时间去生活、有时间去爱、有时间去游乐的希望。无政府主义并非由少数脱离生活、在象牙塔^①中俯视社会，并根据自己的是非观对社会做出评判的人创造的。相反，他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权力的抵抗以及对剥削的反抗中生长出的果实。就如同阿尔伯特·梅尔策(Albert Meltzer)所说：

“虽然它产生过一些理论家，对其哲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但应该说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理论家。因为无政府主义始终是一种在行动中实践出来的信条，而不是反过来将一种思想理念付诸实践。很多时候，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出现，写下了工人和农民在实践中已经总结得到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这位作家归结为领导者，然后接二连三的资产阶级作家（引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话），把一开始的那个作家归结为证明工人阶级需要依靠资产阶级领导的又一个案例。” [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p. 18]

在克鲁泡特金看来，“无政府主义起源于群众的创造性、建设性活动，这种活动曾在过去的时代中创造了人类的所有社会制度，也起源于……反对在社会制

^① 象牙塔 (la tour d'ivoire)：源自法语，现在该词用来形容与平民脱节的学术界

度之外的暴力代理人的起义；这些暴力代理人凌驾在这些制度上，利用这些制度为自己谋利”。或者眼光放近一些，“无政府主义是由同样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抗争产生的，而这种抗议催生了整个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举起敢于褻渎的手臂，不仅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反对资本主义的支柱：律法、权威和国家。”无政府主义作家所做的只是“对（无政府主义）原则进行一般化的表述，并给出其学说的理论与科学依据”，而这些理论与科学依据来自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和对整个社会演变趋势的分析之上。[同上，第 19 页和第 57 页。]

然而，早在蒲鲁东于 1840 年提笔宣布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存在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组织。虽然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诞生的（无政府主义“出现于 18 世纪末……（并）接受了推翻资本和国家的双重挑战”。[Peter Marshall, 同上, p. 4]）但无政府主义作家也分析了历史中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例如，克鲁泡特金认为“自古以来就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同上，第 16 页] 他在《互助论》（以及其他著作）中分析了过去社会所具有的自由意志主义方面，并指出了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实施过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或实现了无政府主义中某些内容的社会。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实际例子，往往早于“官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创立，并认为：

“从遥远的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就认识到了让某些人获得个人权力所带来的罪恶……因此，他们在原始氏族、村社、中世纪行会……最后在自由的中世纪城市中发展出了这样的制度，使他们能够抵御那些试图征服他们的陌生人，和那些企图侵犯他们生活和财富、从而建立个人权威的族人。” [Anarchism, pp. 158-9]

克鲁泡特金将工人阶级的斗争（现代无政府主义的起源）与这些更古老的民间组织形式相比较。他认为，“工人联合组织……是对少数人权力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是资本家）的，一种民间抵抗的产物”，就和氏族、村社等传统形式一样，也如同 1793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的‘区会’以及许多小‘公社’那种显著独立且自由联合的活动”。[同上，第 159 页]

因此，尽管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斗争与自主行动的表达；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通过实际行动贯穿人类历史。例如，早在无政府主义作为特定政治理论出现之前，北美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原住民族已经践行了数千年的无政府主义。同样，在每场重大革命中，都曾存在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组织。比如，美国革命期间的新英格兰镇会议、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区会”，以及俄国革命期间的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等（详见默里·布克钦的《第三次革命》（The Third Revolution））。这不足为奇，因为如果无政府主义正如我们所论述的，是对权威的抵抗产物；那么任何有权威的社会都会引发对权威的抵抗，从而产生无政府主义倾向。（当然，任何没有权威的社会无疑都是无政府主义的。）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是对压迫与剥削的斗争的表达、是劳动人民感受与分析现行制度所出现问题的概括，以及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与梦想。这种斗争在被

称为无政府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即有一群人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并致力于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与国家、反对压迫与剥削、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社会的产物。

A.2 无治主义代表着什么？^①

珀西-比希-雪莱的这些话，让人了解到无治主义在实践中代表什么，以及是什么理想在驱动它：

一个人，一个有高尚灵魂的人
既不命令，也不服从：
权力，如同肆虐的瘟疫，
污染它所触及的一切，而顺从，
是所有天才、美德、自由、真理之祸根，
使人成为奴隶，其身躯亦然，
沦落一个自动机械。

正如雪莱的诗句所言，无治主义者高度重视自由，希望自己和他人都能获得自由。他们还认为个性——使一个人成为独特的人——是人类最重要的方面。然而，他们认识到，个性并不能孤悬浮寄，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之外，个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需要其他人来发展、扩大和成长。

此外，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个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成长并被其塑造，同时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帮助塑造和改变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他们自己和其他个人）。一个不以自由的个人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的希望、梦想和想法将是空洞和死寂的。因此，“一个人的形成……是一个集体的过程，一个社区和个人都参与其中的过程。” [Murray Bookchin, *The Modern Crisis*, p. 79] 因此，任何纯粹基于社会或个人的政治理论都是错误的。

为了使个人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无治主义者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基于三个原则的社会：**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些原则是所有无治主义者所共有的。因此，我们发现，共产无治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谈到了一场由“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些美丽的字眼”所激发的革命。[*The Conquest of Bread*, 128 页] 个人无治主义者本杰明-塔克也写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无治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无治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和团结在地球上盛行”。[*Instead of a Book*, 第 363 页] 这三个原则是相互依存的。

自由对于人类智慧、创造力和尊严的充分绽放至关重要。被他人支配就是被剥夺了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机会，而这是成长和发展个人个性的唯一途径。支配还扼杀了创新和个人责任，导致从众和平庸。因此，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个性发展的社会必然是基于自愿联合，而不是胁迫和权威。引用蒲鲁东的话说，“所有

^① 译注：A.2.0 到 A.4.5 整合自未知的译者，并基于此版本进行校对。出于对其的敬意，也供读者熟悉无政府主义的其他译名，此部分内容的 Anarchism 按该译者的版本，翻译为**无治主义**。

的人都是联合的，都是自由的”。或者，正如 Luigi Galleani 所说，无治主义是“个人在结社自由中的自主权”[**The End of Anarchism?**，第 35 页]（详见 A.2.2 节--无治主义者为什么强调自由？）

如果自由对于个人的最充分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平等对于真正的自由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充斥着权力、财富和特权的严重不平等的、阶级分层的等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少数人——处于等级制度顶端的人——是相对自由的，而其他人则是半奴隶。因此，没有平等，自由就成了一个笑话--充其量是选择自己的主人（老板）的“自由”，就像资本主义下的那样。此外，即使是在这种条件下的精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因大多数人的暴政和异化而变得丑陋和贫瘠的社会。由于个性只有在与其他自由人最广泛的接触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精英阶层的成员由于缺乏可与之互动的自由人，而限制了他们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另见 A.2.5 节——无治主义者为什么赞成平等？）

最后，团结意味着互助：与具有相同目标和利益的其他人自愿合作。但是，如果没有自由和平等，社会就会变成一个由竞争的阶级组成的金字塔，其基础是较高阶层对较低阶层的统治。在这样的社会中，正如我们从自己的社会中了解到的，是“统治或被统治”，“狗咬狗”，“人人为自己”。因此，“坚韧的个人主义”是以牺牲社区感情为代价来促进的，底层的人怨恨上层的人，上面的人畏惧下面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团结，而只是在利益对立的阶级内部的部分形式的团结，这削弱了整个社会的力量。（另见 A.2.6 节--为什么团结对无治主义者很重要？）

应该指出，团结并不意味着自我牺牲或自我否定。正如埃里科-马拉特斯塔明确指出的那样：

“我们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们都寻求自己的满足。但无治主义者在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奋斗中找到最大的满足感，为实现一个他[原文如此]可以成为兄弟中的兄弟的社会，成为健康、聪明、受过教育和幸福的人们中的一员而奋斗。但是，那些适应性强，满足于生活在奴隶中并从奴隶的劳动中获取利益的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治主义者”。[**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第 23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真正**的财富是其他人们，和我们所生活的星球。或者，用艾玛·戈尔德曼的话说，它“由实用和美丽的东西组成，由有助于创造强壮而美丽的身体和鼓舞人心的生活环境的東西组成.....（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所有潜在力量.....。只有在完全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下，才有可能实现人类能量的这种自由展示，”换句话说，“社会平等”。[**Red Emma Speaks**，第 67-8 页]

另外，尊重个性并不意味着无治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认为人或思想在社会之外发展。个性和思想是在社会中成长和发展的，是对物质和知识的互动和经验的反应，是人们积极分析和解释这些经验。因此，无治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理论，承认思想是从社会互动和个人的精神活动中发展和成长的（见米哈伊尔-巴枯宁

的 **God and the State** 中关于唯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经典讨论)。

这意味着无治主义社会将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某个神灵或其他超验的原则，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己安排的，尤其是在人类关系中。是人们在安排，他们[原文如此]根据自己的态度和对事物的理解来做的。” [亚历山大-伯克曼，**What is Anarchism?**，第 185 页]

因此，无治主义的基础是思想的力量，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采取行动和改变生活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自由。

A.2.1 无治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知道，“无-治”意味着“没有统治者”或“没有（等级的）权威”。无治主义者并不反对那些特别有知识、有技巧或有智慧的、专家意义上的“权威”，尽管他们认为，就算是这种权威，也不应该有权力强迫别人遵循他们的建议（关于这种区别，见 B.1 节的内容）。所以简而言之，无治主义就是反权威主义。

无治主义者之所以是反权威主义的，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应该支配另一个人。用 L. Susan Brown 的话说，无治主义者“相信人类个体固有的尊严和价值”。[**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107] 支配在本质上是侮辱人格和贬低的，因为它将被支配者的意志和判断淹没在支配者的意志和判断中，从而破坏了只有来自个人自主权的尊严和自尊心。此外，统治使剥削成为可能，并普遍地导致剥削，这是不平等、贫穷和社会崩溃的根源。

那么，换句话说，无治主义的本质（正面表达）是平等者之间的自由合作，以最大化他们的自由和个性。

平等者之间的合作是反权威主义的关键。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发展和保护我们自己作为独特个体的内在价值，并丰富我们的生活和自由，因为“如果不是通过承认他人的人性并为他合作实现人性，任何个人都无法承认自己的人性，从而在他的一生中实现自己的人性.....我的自由就是所有人的自由，因为除非我的自由和我的权利在所有与我平等的男人[和女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得到确认与认可，否则我在思想上和事实上并不真正自由。” [米哈伊尔-巴枯宁，由埃里克-马拉特斯塔引用，**Anarchy**，第 30 页]。

虽然是反权威主义者，但无治主义者认识到，人类具有社会性，他们相互影响。我们不能逃避这种相互影响的“权威”，因为正如巴枯宁提醒我们的那样：

“废除这种相互影响将是死亡。而当我们主张群众的自由时，我们决不是在建议废除个人或群体对他们施加的任何自然影响。我们要的是废除人为的、特权的、法律的、官方的影响。” [引自马拉特斯塔，**Anarchy**，第 51 页]。

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些源于等级制权威的影响。

这是因为像资本主义这样的等级制度剥夺了自由，结果是人们的“精神、道德、智力和身体的素质都被矮化、发育不良和压垮”（详见 B.1 节）。因此，“无治主义的伟大真理”之一是：“真正的自由是允许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只要每个人允许所有人都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为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奋斗，为一个尊重个人及其自由的社会而奋斗。在资本主义下，“所有东西都放在市场上出售：所有东西都是商品和商业”，但有“某些东西是无价的。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幸福，而这些都是未来的社会，即自由社会，将向所有人保证的东西”。因此，无治主义者试图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尊严、个性和自由，并鼓励受制于权威的人的反抗、抵抗和团结的精神。这让我们被权贵们谴责为和平的破坏者，但无治主义者认为，争取自由的斗争比被奴役的和平要好得多。由于我们的理想，无治主义者“相信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除了以自由为代价。但财富生产者，似乎已经失去了这个珍贵的礼物。生命.....他们有；但当生命缺乏那些使人去享受它的元素时，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呢？”[露西-帕森斯, **Liberty, Equality & Solidarity**, 第 103 页, 第 131 页, 第 103 页和第 134 页]

因此，简而言之，无治主义者寻求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互动的方式能够增强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压制许多人的自由（以及潜力）。无治主义者不想把权力交给别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受到惩罚的威胁。也许对于非无治主义者，与其疑惑为什么无治主义者是无治主义者；不如问问他们觉得这种态度还需要任何解释，这本身就说明了什么。

A.2.2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强调自由？

用巴枯宁的话说，无治主义者可以被视为“自由的狂热爱好者，认为它是人类的智慧、尊严和幸福得以发展和提高的独特环境”。[**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96] 因为人类是有思想的生物，剥夺他们的自由就是剥夺他们自己思考的机会，也就是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类的存在本身。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由是我们人性的产物，因为：

“.....一个人有自我意识，有与他人不同的意识，这一事实本身就产生了自由行动的愿望。对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渴望是一个非常基本和主导的特质”。[艾玛·戈尔德曼, **Red Emma Speaks**, 第 439 页]。

为此，无治主义“提议把个人的自尊和独立，从权威的一切束缚和入侵中拯救出来。只有在自由中，他[原文如此！]才能成长到他的全部身量；只有在自由中，他才能学会思考和行动，并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只有在自由中，他才能认识到将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纽带的真正力量，而这些纽带是正常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同上，第 72-3 页]

因此，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由基本上就是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做唤起了个体的活力与力量，这样他们可以为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只有自由才能确保个人的发展和多样性。这是因为，当个人管理自己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时，他们必须锻炼自己的头脑，而这除了发展和刺激有关的个人外，不会有其他效果。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要想让人们接受自由和管理自己利益的教育，就必须让他们自己行动，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结果负责。他们会犯错误，但他们会从后果中明白自己在哪里出了问题，并尝试新的方法。” [Fra Contadini, p. 26]

因此，自由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人潜能的前提条件，而个人潜能也是一种社会产物，只有在社区中并通过社区，才能实现。一个健康、自由的社区会产生自由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又会塑造社区，并丰富组成社区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由的产生是社会化的，“并不因为它们被合法地写在一张纸上而存在，而只有当它们成为一个人的固有习惯，并且任何损害它们的企图都会遇到民众的激烈抵抗时，它们才会存在.....当一个人知道如何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时，他就会迫使别人尊重他。这不仅在私人生活中是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一直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在今天或多或少享有的所有政治权利和特权，都不是因为我们政府的善意，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鲁道夫-洛克尔，**Anarcho-syndicalism**，第 75 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支持“**直接行动**”的策略（见 J.2 节），因为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认为的，我们“愿意去争取多少自由，我们就有多少自由。因此，无治主义代表着直接行动，公开蔑视和抵制所有法律和限制：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和道德上的”。它要求“正直、自力更生和勇气。简而言之，它要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只有坚持不懈的抵抗”才能“最终使（我们）自由。直接行动反对商店里的权威，直接行动反对法律的权威，直接行动反对侵入和干涉我们道德准则的权威，这是无治主义合乎逻辑的、始终如一的方法”。[Red Emma Speaks，第 76-7 页]

换句话说，直接行动是自由的应用，用来在此时此刻抵制压迫；同时也是创造自由社会的手段。直接行动创造了必要的个体思维方式和社会条件，使自由得以蓬勃发展。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而不是在与社会的对立外发展。因此，穆雷-布克钦写道

“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自由、独立和自治，是长期社会传统和.....**集体**发展的产物--这并不是否认个人在这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如果他们希望获得自由，他们最终不得不这样做。” [Social Anarchism or Lifestyle Anarchism，第 15 页]

但是，自由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以便在其中成长和发展。这样的环境**必须**是去中心化的，并建立在由运行者直接管理其运作的基础上。因为集中化意味着强制性的权威（等级制度），而自我管理是自由的本质。自我管理确保了参与的个体使用（并因此发展）他们所有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精神能力。与此相反，等级制度则是用少数人的活动和思想，代替所有相关的个人的活动和思想。因此，

等级制度并非充分发展他们的能力，而是将许多人边缘化，确保他们的发展受到阻碍（另见 B.1 节）。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国家主义。正如法国无治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福尔所指出的，权威“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政治形式，即国家；经济形式，即私有财产。”[转引自彼得-马歇尔，**Demanding the Impossible**，第 43 页] 资本主义和国家一样，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即老板对工人的集权）的基础上的，其目的就是确保工作的管理权不在从事工作的人的手中。这意味着“工人的严肃的、最终的、彻底的解放只有一个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由全体工人占有资本，即占有原材料和一切劳动工具，包括土地。”[米哈伊尔-巴枯宁，由鲁道夫-罗克引用，同上，第 50 页]

因此，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认为的，“坚定的无治主义者必须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作为这一制度组成部分的工资奴役，因为这与劳动必须自由进行并由生产者控制的原则不相容”。[“无治主义笔记”，**For Reasons of State**，第 158 页]。

因此，自由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意味着一个非威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和团体实行自我管理，即自己支配自己。这其中的含义很重要。首先，它意味着无治主义社会将是非强迫性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暴力或暴力的威胁将不会被用来“说服”个人做任何事情。其次，它意味着无治主义者是个人主权的坚定支持者，而且由于这种支持，他们也反对基于强制性权威（也就是等级制度）的机构。最后，它意味着无治主义者对“政府”的反对，只意味着他们反对集权的、等级的、官僚的组织或政府。他们不反对通过分权的、基层组织的邦联自治，只要这些组织是基于直接民主，而不是将权力委托给“代表”（关于无治主义组织的更多信息，见 [A.2.9 节](#)）。因为权力是自由的反面，因此任何基于权力委托的组织形式，都是对受制于权力的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威胁。

无治主义者认为自由是唯一一种，人类的尊严和多样性可以在其中开花结果的，社会环境。然而，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下，对大多数人而言没有自由；因为私有财产和等级制度确保大多数人的倾向和判断将服从于主人的意志，严重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所有物质、智力和道德能力的充分发展”成为不可能。[米哈伊尔-巴枯宁，**Bakunin on Anarchism**，第 26 页]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寻求确保“真正的正义和真正的自由可以在地球上出现”，因为“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这种对人类生命野蛮的浪费——对骨头和筋腱、大脑和心脏的摧残，这种把人们变成可悲的残骸、鬼魂、可悲的讽刺品，失去了他们从出生那天起便应拥有的本质。所谓的‘经济’，即物品的积累，实际上是最可怕的浪费——制造者对所制造事物的牺牲——所有更高尚、更纯粹的本能都被丧失，换来的只有一个令人作呕的特征，那就是有能力去计数和计算。”[Voltairine de Cleyre, **The First Mayday: The Haymarket Speeches 1895-1910**，第 17-18 页。]

（关于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等级与专制天性的进一步讨论，见 [第 B 节](#)）。

A.2.3 无治主义者是否赞成组织？

是的。没有相互联系，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生活。没有社会和组织，自由就无法存在。正如乔治-巴雷特指出的那样：

“为了获得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必须合作，而为了合作，我们必须与我们的同伴达成协议。但如果认为这种协定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那肯定是荒谬的；相反，它们是对我们自由的行使。

“如果我们要发明一种教条，认为达成协议就是损害自由，那么自由马上就会变成暴政，因为它禁止人们享受最普通的日常的乐趣。例如，我不能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散步，因为我同意在某个时间在某个地点和他见面，这违反了自由的原则。我丝毫不能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自己之外，因为要这样做，我必须与别人合作，而合作意味着协议，而这是违反自由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当我和我的朋友同意去散步时，我并没有限制我的自由，而只是行使我的自由。

“另一方面，如果我根据我的高超的知识决定，我的朋友锻炼身体是好的，因此我试图强迫他去散步，那么我就开始限制自由了。这就是自由协定和政府之间的区别”。[**Objections to Anarchism**, 第 348-349 页]

就组织而言，无治主义者认为，“它远不是创造权威，（它）是权威的唯一解药，也是我们每个人习惯于积极和自觉地参与集体工作、而不再是领导者手中的被动工具的，唯一手段”。[Errico 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86] 因此，无治主义者很清楚需要以结构化和公开的方式组织起来。正如 Carole Ehrlich 所指出的，虽然无治主义者“并不反对组织结构”，只是“想废除等级结构”，但他们却“几乎总是被刻板印象认为，根本不想去要任何的结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一个将会建立问责制、在最大数量的人中分散权力、任务轮换、技能共享以及传播信息和资源的组织”，是基于“良好的社会无治主义的组织原则！” [“社会主义、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 p. 47 and p. 46] 。

无治主义者赞成组织这一事实，初看起来会很奇怪，但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只体验过在专制组织中的人来说，”两位英国无治主义者认为，“似乎组织只能是极权主义或民主的，而那些不相信政府的人就一定会因此而不相信任何组织。事实并非如此。” [Stuart Christie and Albert Meltzer, **The Floodgates of Anarchy**, p. 122] 换句话说，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组织形式都是专制的社会中，这使得它们看起来似乎是唯一可能的那一种。人们通常没有认识到的是，这种组织模式是有历史条件的，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中产生的——这种社会的动机是统治和剥削。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家的研究，这种社会到目前只存在了大约 5000 年；它随着第一个基于征服和奴隶制的原始国家而出现，在这其中，奴隶的劳动创造了支持统治阶级的生产盈余。

在那之前，几十万年来，人类社会和原始人类社会都是穆雷-布克钦称之为“有机的”，即基于合作形式的经济活动，包括互助、自由地获得生产资源，以及按需分享公共劳动的产品。虽然这种社会可能会有基于年龄的地位等级，但没有制度化的、统治-服从关系意义上的等级，这种关系由强制的惩罚来执行，并导致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经济剥削的阶级分化（见穆雷-布克钦，**The Ecology of Freedom**）。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无治主义者并不主张“回到石器时代”。我们只是指出，由于等级-权威的组织模式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相对较新的发展，没有理由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会是永久的。我们不认为人类在基因上“被设定”有专制的、竞争的 and 攻击性的表现，因为没有可信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相反，这种行为是社会条件造成的，或者说是后天习得的，因此，可以主动不习得它（见阿什利-蒙塔古，**The Nature of Human Aggression**）。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或基因决定论者，而是相信自由意志，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改变他们做事的方式，包括他们组织社会的方式。

毫无疑问，社会需要更好地组织起来，因为目前社会的大部分--由大多数人生产的--财富、和权力，被分配给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精英。这给其他人、特别是底层的人，带来了剥削和痛苦。然而，由于这个精英阶层通过控制国家控制了强制手段（见 [B.2.3 节](#)），它能够压制大多数人，并无视他们的痛苦--这种现象在所有等级制度中都会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因此，专制和集权结构中的人们开始憎恨它们，认为它们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一点并不奇怪。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的那样：

“任何告诉你无治主义者不相信组织的人，都是在胡说八道。组织就是一切，一切就是组织。整个一生都是在组织，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但这就是有组织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的各个成员都在受苦：就像当你的某个部位疼痛时，你的整个身体都会感到不适，你会生病……，任何组织或工会的某单个成员可以被泰然地歧视、压制或忽视。这样做就像忽视一颗疼痛的牙齿一样：你会全身都会不舒服”。[同上，第 198 页]

然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的情况，其结果是，它确实是“全身都是病”。

由于这些原因，无治主义者拒绝专制的组织形式，而是支持基于自由协议的协会。自由协议很重要，用伯克曼的话说，“只有当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单位，因为共同的利益而从自己的选择中与他人合作时，世界才能顺利运作并变得强大。”[同上，第 199 页] 正如我们在 [A.2.14 节](#) 中讨论的那样，无治主义者强调，自由协议必须由协会本身的直接民主（或无治主义者通常称之为，自我管理）来补充，否则“自由”就只是挑选主人的自由罢了。

无治主义组织的基础是将权力大规模地分散到人民手中，即那些直接受到所做决定影响的人。引用蒲鲁东的话：

“除非民主是一个骗局、人民的主权是一个笑话，否则就必须承认——每个公民在他（或她）的产业领域里，在每个市、区或省议会自己的领土上.....应该自己直接管理它所包括的利益，并且应该对它们行使充分的主权。”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第 276 页]。

这也意味着需要联邦制（federalism）来协调共同利益。对无治主义来说，联邦制是自我管理的自然补充。随着国家的废除，社会“可以、且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但不是自上而下.....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由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盟来完成，首先是他们的工会，然后是公社、地区、国家，最后是国际和普遍的大联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赋予生命的自由和共同利益的秩序，这种秩序非但没有否定，反而肯定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使之协调一致。” [巴枯宁，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第 205-6 页] 因为“真正的民众组织.....是从下层开始的”，所以“联邦制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民众生活自由和自发的组织”。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具有联邦主义的性质”。 [巴枯宁，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第 273-4 页和第 272 页]

因此，无治主义组织的基础是直接民主（或自我管理）和联邦制（或邦联制）。这些都是自由的表达与环境。直接民主（或参与式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由和平等意味着需要一个论坛，人们可以在其中平等地讨论和辩论，并允许自由行使 Murray Bookchin 所说的“异议的创造性作用”。联邦制是必要的，以确保共同利益得到讨论，并以反映所有受影响者的愿望的方式组织联合活动。要确保决策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由少数统治者自上而下强加的。

[A.2.9 节](#)和 A.2.11 节将进一步讨论无治主义者关于自由意志主义组织的想法，以及直接民主和邦联的必要性。

A.2.4 无治主义者是否赞成"绝对的"自由？

不，无治主义者不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有些行为必然涉及对他人自由的剥夺。

例如，无治主义者不支持强奸、剥削或胁迫他人的“自由”。我们也无法容忍权威。相反，由于权威是对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威胁（更不用说人的尊严），无治主义者认识到需要抵制和推翻它。

权力的行使不是自由。没有人有统治他人的“权利”。正如马拉特斯塔所指出的，无治主义支持“每个人的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他人的平等自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并希望尊重：剥削、压迫、命令的'自由'；这就是压迫，当然不是自由”。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第 53 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所有形式的等级权威的抵抗是一个自由人的标志--无论是私人层面上的（老板）还是公共层面上的（国家）。正如亨利-戴维-梭罗在他的 Civil Disobedience（1847）一文中指出的那样：

“不服从是自由的真正基础。而服从者必然是奴隶。”

A.2.5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赞成平等？

如上所述([A.2 节](#))，无治主义者致力于社会平等，因为它是个人自由能够蓬勃发展的唯一背景。然而，关于字面上“平等”有很多无稽之谈，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平等”的很多东西确实非常奇怪。在讨论平等对无治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必须说明平等不意味着什么。

无治主义者不相信“天赋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不存在，而且如果能够实现，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上决定的人类差异不仅存在，而且是“快乐的原因，而非恐惧或遗憾”。为什么？因为“克隆人之间的生活将不值得一提，而一个理智的人只会为其他人拥有他们所不具备的能力而感到高兴”。[诺姆-乔姆斯基， **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第 782 页]

有些人认真地以为无治主义者的“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是完全相同的，这可悲地反映了当今知识文化状况和对文字的破坏——这种破坏被用来转移人们对不公和专制制度的注意力，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生物学的讨论。埃里希-弗洛姆指出：“自我的独特性绝不与平等的原则相矛盾。人生而平等的论点，意味着他们都有相同的基本人类素质，他们有相同的人类基本命运，他们都对自由和幸福有同样不可剥夺的要求。它还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团结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平等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The Fear of Freedom**，第 228 页] 因此，更公平的说法是，无治主义者寻求平等，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寻求对这种独特性的充分肯定和发展。

无治主义者也不赞成所谓“结果平等”^①。我们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商品、住在同样的房子里、穿同样的制服等等这样的社会中。无治主义者反抗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部分原因，就是它们使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标准化了（见乔治-雷策的 **The McDonaldisation of Society**，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驱向标准化和一致性）。用 Alexander Berkman 的话说：

“权威、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传统与习俗的精神，迫使我们进入一个平凡的小树林，使他（或她）成为没有独立或个性的自动化（机器）……我们所有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只有特别强大的人才能成功打破它的枷锁，而且只是部分地打破。” [What is Anarchism? ，第 165 页]

因此，无治主义者从来没有渴望让这个“平凡的小树林”变得更茂盛。相反，我们渴望一开始就摧毁它以及任何创造它的每一种社会关系和制度。

^① 译注：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是一种社会理念，认为每个人应该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都有相同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机会平等。这种平等更类似于一种相同 (Identification)

“结果平等”只能通过武力引入和维持，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平等，因为有些人将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权力！无治主义者特别讨厌“结果平等”，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能力、欲望和兴趣。让所有的消费都一样将会是暴政。显然，如果一个人需要医疗，而另一个人不需要，他们就不会得到“同等的”医疗服务。人类的其他需求也是如此。正如 Alexander Berkman 所说：

“平等并不意味着数量相等，而是意味着机会平等.....不要错误地将自由中的平等与囚犯营的强制平等相提并论。真正的无治主义平等，意味着自由地平等，而非数量上的平等。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吃、喝、穿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工作，或以同样的方式生活。远非如此：事实上恰恰相反”。

“个人的需求和口味不同，正如胃口不同一样。构成真正平等的是满足这些需求的平等机会。

“这种平等远非平庸，而是为活动和发展的最大可能的多样性打开了大门。因为人的性格是多种多样的.....自由表达和展现自己个性的机会意味着发展自然的差异性和变化”。[同上，第 164-5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诸如“结果平等”或“天赋平等”的“平等概念”，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确是相关的。例如，在资本主义下，每一代人所面临的机会都取决于上一代人的结果。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如果没有大致的“结果平等”（在收入和资源的意义上），“机会平等”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对于一个百万富翁的后代和一个道路清扫工的后代来说，没有真正的机会平等。那些主张“机会平等”却无视前人结果所造成的壁垒的人，表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机会不仅取决于畅通的前路，也取决于平等的起点。从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无治主义者渴望“结果平等”是一种误解——但这只适用于等级制度下的社会体系；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我们将看到）情况并非如此。

在无治主义理论中，平等并不意味着否认个人的多样性或独特性。正如巴枯宁所观察到的：

“一旦平等取得了胜利，并得到了很好的确立，各种个人的能力和他们的力量水平是否会不再有差异？有些人将会存在，也许不像现在这么多，但肯定有些人将永远存在。俗话说，同一棵树不会长出两片相同的叶子，这可能永远是真的。对于人类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人类比树叶要复杂得多。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是一种罪恶。相反.....它是人类的一种资源。由于这种多样性，人类是一个集体的整体，其中一个人补充了所有其他人，并需要他们。因此，人类个体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是其团结的根本原因和基础。它是平等的全能论证。”[《全方位的教育》，The Basic Bakunin，第 117-8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平等意味着社会平等，或者用默里-布克钦的术语来说，是“不平等者的平等”（有些人如马拉特斯塔用“条件平等”来表达同样的想法）。他的意思是，无治主义社会承认个人能力和需求的差异，但不允许将这些差异变

成权力。换句话说，个人差异“将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当不平等不能依附于某种法律虚构或制度时，事实上它就会在集体中消失”。[米哈伊尔-巴枯宁，**God and the State**，第 53 页]。

如果基于等级制度的社会关系以及创造这种关系的力量被废除，而代之以鼓励参与并以“一人一票”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那么天然的差异将无法转化为等级权力。例如，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产权，就不会有少数人可以垄断生活资料（机器和土地），并通过工资制度和高利贷（利润、租金和利息）靠别人的劳动致富的手段。同样，如果工人管理自己的工作，就不会有资本家阶级依靠他们的劳动致富。因此，蒲鲁东：

“现在，这种不平等的根源会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这个根源就是社会内部的三重抽象的实在化：资本、劳动和人才。

“正是因为社会把自己分成了与这个公式的三个术语相对应的三类公民.....所以总是能达成种姓的区分，人类的一半被另一半所奴役.....因此，社会主义包括把资本——劳动——才能的贵族公式还原成更简单的劳动公式！.....以便使每个公民同时、平等和在同样程度上，成为资产者、劳动者和专家或艺术家。”[**No Gods, No Masters**，第一卷，第 57-8 页]

像所有无治主义者一样，蒲鲁东把这种功能的整合看作是平等和自由的关键，并提出自我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此，自我管理是社会平等的关键。例如，工作场所的社会平等，意味着每个人在关于工作场所如何发展和变化的政策决定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无治主义者坚信“凡是涉及所有人的，都由所有人决定”的格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忽视专业知识，或者由每个人决定一切。就专业知识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天赋和能力，所以显然他们会想研究不同的东西，做不同的工作。同样明显的是，当人们生病时，他们会咨询医生——一个专家——由他或她自己管理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由一个委员会指导。我们很抱歉不得不提出这些观点，但一旦提到社会平等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话题，有些人就开始胡言乱语了。一个以社会平等方式管理的医院，不会让非医务人员投票决定医生应该如何进行手术，这是常识。

事实上，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影响群体的、集体决策的自我管理（平等），来补充影响个人的、个人决策的自我管理（自由），就不可能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因为如果没有这两者，一些人就会对其他人拥有权力，为他们做决定（即管理他们），因此一些人将比其他人更自由。这意味着，只是声明显而易见的事实，无治主义者寻求生活中所有方面平等，而不仅仅是在财富方面。无治主义者“要求每个人不仅要有他[或她]的全部社会财富，还要有他[或她]的那部分社会权力”。[Malatesta and Hamon, **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20]因此，需要自我管理以确保自由和平等。

社会平等是个人管理和表达自己的需要，因为自我管理意味着“人们在与同伴面对面的关系中工作，以便将他们自己观点的独特性带入解决共同问题和实现共同目标的事业中。” [George Benello, **From the Ground Up**, p. 160] 因此，平等允许个性的表达，所以是个人自由的必要基础。

在 F.3 节（“为什么‘无治’资本主义者很少或不重视平等？”）进一步讨论了无治主义的平等思想。诺姆-乔姆斯基的文章《平等》（载于 **The Chomsky Reader**）是对自由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A.2.6 为什么团结对无治主义者很重要？

团结，或互助，是无治主义的一个关键思想。它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个人能够在支持和培育自由和平等的环境中，共同满足其共同利益的手段。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互助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力量和幸福的源泉，也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社会主义人文主义者埃里希-弗洛姆指出，“人类体验与他人结合的愿望植根于人类特有的生存条件，是人类行为最强烈的动机之一。” [**To Be or To Have**, p.107] 。

因此，无治主义者认为，与其他人形成“联盟”（使用麦克斯-施蒂纳的术语）的愿望是一种天然的需要。这些联盟或协会，为了让加入它们的人完全满意，必须建立在平等和个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以无治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即自愿的、分权的和非等级制的。

团结——一个人之间的合作——是生活所必需的，而且远不是对自由的否定。团结，Errico Malatesta 指出“是人能够表达自己的个性和实现其最佳发展并享受最大可能的福祉的，唯一环境”。这种“个人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走到一起，所有人为了每个人的幸福而走到一起”的结果是，“每个人的自由不受限制，而是得到补充，实际上是在其他人的自由中找到必要的理由”。[**Anarchy**, p. 29] 换句话说，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彼此平等对待，拒绝将他人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创造支持所有人自由的关系，而不是由少数人支配多数人。艾玛·戈尔德曼重申了这一主题，指出“人类的这种独特的个性力量在通过与其他个性的合作而得到加强时，取得了多么美妙的结果……合作——与自相残杀和斗争相反——对物种的生存和进化起到了作用……只有互助和自愿合作……才能为自由的个人和社团生活创造基础。” [**Red Emma Speaks**, 第 118 页]

团结意味着为了满足我们的共同利益和需求而平等地联合起来。不以团结为基础的结社形式（即以不平等为基础的结社形式）将压制服从于它们的人的个性。正如雷特-马鲁特所指出的，自由需要团结，需要对共同利益的承认。

“人类最崇高、最纯粹、最真实的爱是对自己的爱。我希望获得自由！我希望得到幸福！我想欣赏世界上所有的美景。但只有当我周围所有其他人都自由

时，我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只有当我周围所有其他人都快乐时，我才能快乐。只有当我看到和遇到的所有的人都用充满喜悦的眼睛看世界时，我才能感到快乐。只有这样，当我安全地知道其他人也能像我一样吃饱时，我才能纯粹享受这饱足。为此，当我反抗每一个威胁到我的自由和我的幸福的危险时，这是我自己满足的问题，只是我自己的问题.....” [Ret Marut (a.k.a. B. Traven), The BrickBurner 杂志由 Karl S. Guthke 引用，**B. Traven: 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s**, 第 133-4 页]。

实行团结意味着我们认识到，正如**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口号所言，“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因此，团结是保护个性和自由的手段，也是一种自我利益的表达。正如 Alfie Kohn 所指出的。

“当我们考虑合作时.....我们倾向于将这一概念与头脑模糊的理想主义联系起来.....这可能是将合作与利他主义混为一谈的结果.....结构性合作违背了通常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二分法。它将事情设定为，通过帮助你，我同时也在帮助我自己。即使我的动机最初可能是自私的，但我们的命运现在是相连的。我们共同浮沉。合作是一种精明的且非常成功的策略——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在学习和工作中比竞争更有效地完成任务.....也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合作更有利于心理健康和相互喜爱。”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p. 7]。

而且，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团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而且在于它是抵制当权者的必要手段。马拉泰斯塔的话在这里很有意义。

“那些从未完全屈服于压迫和贫困的受压迫群众，.....表现出对正义、自由和福祉的渴求，他们开始明白，除非与所有被压迫者、与世界上所有地方的被剥削者联合和团结，否则他们将无法实现自己的解放”。[Anarchy, 第 33 页]

通过站在一起，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最终，通过组织成团体，我们可以开始共同管理我们自己的集体事务，从而一劳永逸地取代老板。“工会将.....增加个人的财力，保障他被侵犯的财产。” [麦克斯-施蒂纳，**The Ego and Its Own**, 第 258 页] 通过团结行动，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符合我们心意的制度来取代现行制度。“联合中就有力量”。[亚历山大-伯克曼，**What is Anarchism?**, 第 74 页]。

因此，团结是我们可以获得和确保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手段。我们同意一起工作，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他人工作。通过同意相互分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选择，以便我们可以享受更多，而不是更少。互助符合我的自身利益——也就是说，我认为在相互尊重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达成协议对我有利；因为如果我支配某人，这意味着存在允许支配的条件，所以很可能我也会反过来被支配。

正如麦克斯-施蒂纳所看到的，团结是我们确保我们的自由得到加强，并从那些想要统治我们的当权者那里得到保护的手段。他问道：“那么你自己就毫无价值吗？你注定要让任何人对你做任何事吗？保护你自己，就没有人会去碰你。如果千万人在你身后支持你，那么你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你将毫不费力地赢得

胜利”。[引自路易吉-加莱尼的 **The End of Anarchism?**，第 79 页——《自我和它的自我》中的不同译文，第 197 页]

因此，团结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创造自由和捍卫自由的手段，可以对抗权力。团结就是力量，就是我们作为社会人的本性的产物。然而，团结不应该与“羊群主义”相混淆，后者意味着被动地追随一个领导者。为了有效，团结必须由自由人创造，作为平等的人一起合作。“大我”不是团结，尽管对“羊群主义”的渴望是我们对团结和联合的需要的一个产物。但这是一种被等级社会所腐蚀的“团结”，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被调教为盲目地服从领导者。

A.2.7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要主张自我解放？

自由，就其本质而言，是不能被给予的。一个人不能被他人解放，而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自己的枷锁。当然，自我努力也可以是集体行动的一部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为了达到其目的，也必须自我努力。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被压迫的阶级（群体、或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主人那里获得了真正的解放”。[**Red Emma Speaks**，第 167 页]

这是因为无治主义者认识到，等级制度和任何社会关系一样，都会塑造受制于它们的人。正如布克钦所认为的，“阶级社会组织了我们的心理结构，从而命令或顺从”。这意味着人们内化了等级制度和阶级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官僚和强制性机构的组合。它也是一种心态，是一种被灌输的、对现实进行重组的心态……它通过蛮力进行统治的能力一直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社会中最受伤害的阶层（如财产奴隶和农奴）的高度合作，它的权威最终会消散。在国家权力面前，敬畏和冷漠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它使这种权力成为可能”。[**The Ecology of Freedom**，第 159 页和第 164-5 页] 自我解放是我们打破内部和外部枷锁的手段，使我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得到解放。

无治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解放自己。无治主义者所建议的推进这一过程的各种方法将在第 J 节（“无治主义者们都做些什么？”）中讨论，这里不做赘述。然而，这些方法都涉及到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制定自己的议程，用行动赋予自己权力，消除对“领导人为他们做事”的依赖。无治主义的基础是人们“为自己行动”（进行无治主义者所称的“直接行动”——详见 J.2 节）。

直接行动对参与其中的人有一种赋权和解放的作用。自我行动是那些受制于权威的人可以发展其创造力、积极性、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手段。它也是改变社会的手段。正如 Errico Malatesta 所指出的。

“在人和他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作用。人塑造社会，社会塑造人，因此结果是一种恶性循环。为了改变社会，人们必须改变，而为了改变人

们，社会也必须改变.....幸运的是，现有的社会并不是由一个统治阶级的灵感意志创造出来的，这个阶级已经成功地将其所有臣民变成了其利益的被动与无意识的工具。它是无数次自相残杀的斗争、无数人类和自然因素的结果.....。

“由此可见，这种进步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利用目前环境所允许的一切手段、一切可能性和机会，对我们的人类同胞采取行动，唤起他们的良知和需求.....要求并强加那些可能的、有效地为以后的进一步进步开辟道路的，重大社会变革.....。我们必须设法让全体人民.....提出要求，把强加自己的意志，去追求所希望的一切改进和自由，直到达到想要的状态和有要求的权力的时候.....我们必须促使人民总是想要更多，增加它[对统治精英]的压力，直到人民实现完全解放。”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第 188-9 页]

社会在塑造所有个人的同时，也由他们通过行动、思想和理想而创造。挑战限制个人自由的制度，在精神上是一种解放，因为它启动了质疑普遍的专制关系的进程。这个进程让我们深入了解社会如何运作，改变我们的想法，创造新的理想。再次引用艾玛·戈尔德曼的话“真正的解放始于.....女人的灵魂”。我们可以补充说，男人也是如此。只有在这样我们才能“开始[我们的]内在再生，[摆脱]偏见、传统和习俗的束缚”。[同上，第 167 页]但这个过程必须是自我引导的，因为正如麦克斯-施蒂纳所指出的，“被释放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被释放的人.....一条拖着链子的狗”。[The Ego and Its Own, 第 168 页]通过改变世界，哪怕是以一种小的方式，我们也会改变自己。

在西班牙革命期间的一次采访中，西班牙无治主义战士杜鲁提说，“我们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新的世界”。唯有自我活动和自我解放才能让我们创造这样的愿景，并让我们有信心尝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它。

然而，在“光荣革命”之后，无治主义者并不认为自我解放必须等到未来。个人就是政治。鉴于社会的性质，我们在此时此刻如何行动将会影响我们社会和生活的未来。因此，即使在前无治主义社会中，无治主义者也试图创造正如巴枯宁所说的，“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未来本身的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替代性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来做到这一点，在一个非自由的社会中作为自由人行事。只有通过我们在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才能为自由社会奠定基础。此外，这个自我解放的过程一直在进行。

“各种受支配者每天都在锻炼自己的批判性自我反省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主人会受挫、会无法得偿所愿，有时还会被推翻。但是，除非主人被推翻，除非下属参与政治活动，否则再多的批判性反思，也无法结束他们的臣服并为他们带来自由。” [卡罗尔-帕特曼, The Sexual Contract, 第 205 页]。

无治主义者旨在鼓励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自我解放的倾向，以拒绝、抵制和挫败权威，并得到顺理成章的结论——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在自由、自我管理的协会中平等合作。如果没有这种批判性的自我反省、抵抗和自我解放的过程，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无治主义来自于受支配人民努力在一个等级制度的世界中，作为自由个体行动的本能抵抗。这种抵抗过程，

被许多无治主义者称为“**阶级斗争**”（因为工人阶级通常是社会中最底层的群体），或者更广泛地说“**社会斗争**”。正是这种对（各种形式的）权威的日常抵抗以及对自由的渴望，是无治主义革命的关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一再强调，阶级斗争为工人（和其他被压迫群体），提供了实现掌控自己命运的唯一手段”。[Marie-Louise Berneri, **Neither East Nor West**, p. 32] 。

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每一个“自发的革命行动”通常都是由具有“空想家”思想的人，经过多年的组织和教育的耐心工作而产生、并以此为基础的。通过建立替代的制度与关系，（用 **I.W.W.** 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只是革命献身和激进主义的长期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如马拉特斯塔明确指出的那样，“鼓励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符合我们基本思想逻辑的结果，因此这应该是我们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治主义者不想解放人民；我们希望人民解放自己……，我们希望新的生活方式从人民的群体中产生，与他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并随着他们的进步而进步。” [同上，第 90 页]

除非发生自我解放的过程，否则自由社会将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个人在物质上（废除国家和资本主义）和思想上（通过摆脱对权威的顺从态度）都解放自己的时候，自由社会才有可能。我们不应该忘记，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受其支配的人的思想的权力（当然，如果精神上的支配失效，人们开始反抗和抵制，这种权力就会收到相当大的阻力）。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力量，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支配着社会，并渗透到被压迫者的思想中。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工人阶级就会默认权威、压迫和剥削是正常的生活状态。顺从于主人的学说与立场的头脑，不可能有希望获得自由、反抗和斗争的胜利。因此，被压迫者必须先克服现有制度的精神统治，然后才能甩掉它的枷锁（无治主义者认为，直接行动是实现这两者的手段——见 J.2 和 J.4 节）。在物质上击败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前，必须在精神上和理论上击败它（许多无治主义者称这种精神解放为“**阶级意识**”——见 [B.7.4 节](#)）。而通过反对压迫的斗争实现自我解放是唯一的途径。因此，无治主义者鼓励，用克鲁泡特金的术语来说，“**反抗精神**”。

自我解放是斗争、自我组织、团结和直接行动的产物。直接行动是创造无治主义者和自由人的手段，因此，“无治主义者一直建议积极参加工人组织，它们不断从事着劳工反对资本及其保护者——国家的**直接**斗争。”这是因为“这种斗争……比任何间接手段都好，它允许工人在目前的工作条件下获得一些暂时的改善，同时它使他（或她）看到资本主义和支持它的国家所做的罪恶，并唤醒他（或她）考虑在没有资本家和国家的干预下，组织消费、生产和交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考虑自由社会的可能性。克鲁泡特金和许多无治主义者一样，指出工团主义和工会运动，是在现有社会中发展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一种手段（尽管他和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一样，并没有将无治主义活动完全局限在这些运动中）。事实上，任何“允许劳动者实现他们的团结并感受到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的运动……为共产无治主义的这些概念铺平了道路”，也就是，在被压迫者的头脑中克服现有社会的精神统治。[**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第 83 页和第 85 页] 。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引用一位苏格兰无治主义激进派的话：“人类进步的历史（可以被）视为反叛和不服从的历史，个人因屈从于多种形式的权威而被贬低，只有通过反叛和不服从才能保持他/她的尊严”。[罗伯特-林恩，**Not a Life Story, Just a Leaf from It**, 第 77 页] 这就是无治主义者强调自我解放（以及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活动）的原因。难怪巴枯宁认为“反叛”是“构成历史上所有人类发展（集体或个人）的基本条件的三项基本原则”之一。[**God and the State**, 第 12 页] 这只是因为个人和群体不能被他人解放，只能被自己解放。这种反叛（自我解放）是现有社会变得更加自由意志化和令无治主义社会成为可能的，唯一手段。

A.2.8 不反对等级制度有可能成为无治主义者吗？

我们已经看到，无治主义者厌恶专制主义。但如果一个人是反权威主义者，就必须反对所有等级制度，因为它们体现了权威原则。因为，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认为的，“不仅是国家意义上的政府会对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品质有破坏性。整个复杂的权威和制度统治——都会扼杀生命。它是支持权威和制度统治的迷信、神话、托词、借口和奉承。”[**Red Emma Speaks**, p. 435] 这意味着“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需要察觉并克服等级结构、权威和支配，以及那些对自由的限制：奴隶制、工资奴隶制（即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专制学校等”。[诺姆-乔姆斯基，**Language and Politics**, 第 364 页]。

因此，坚定的无治主义者必须反对等级关系，也就是反对国家。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层面上，成为无治主义者就意味着反对等级制度。（如果有人需要的话，）这方面的论据如下：

“所有的专制机构都被组织成金字塔式：国家、私人或公共公司、军队、警察、教堂、大学、医院：它们都是金字塔式的结构，顶端是一小群决策者，底部是为了他们而做决定的广大民众。无治主义并不要求改变层级上的标签，它不希望上面有不同的人，它希望我们从下面爬出来。”[Colin Ward, **Anarchy in Action**, p. 22]

等级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由命令和服从组成的系统”，因此无治主义者寻求“消灭等级制度本身，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等级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布克钦，**The Ecology of Freedom**, 第 27 页] 等级制度是一种金字塔式结构的组织，由一系列伴随着权力、威望和（通常）薪水不断增加的等级、级别或职位组成。研究等级制度存在形式的学者们发现，它所体现的两个主要原则是：统治和剥削。例如，在 Steven Marglin 的经典文章 “What Do Bosses Do?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6, No. 2) 里对一份对现代工厂的研究中，他发现公司等级制度的主要功能不是（如资本家所说）更高的生产效率，而是对工人更强的控制，其目的是更高效的剥削。

等级制度中的控制是通过胁迫来维持的，也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消极制裁：身体上的、经济上的、心理上的、社会上的，等等，进行威胁。因此，这种控制，包括对异议和反叛的镇压，需要被集中化：被一套权力关系集中化。这套权力关系中，由顶端的少数人（特别是组织的负责人）执行最强的控制，而中间层的人的控制要少得多，底层的许多人几乎没有。

由于统治、胁迫和集中是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且这些特征体现在等级制度中，因此所有等级制度都是威权主义的。此外，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任何以等级制度、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为标志的组织，都是类国家的，或者说是“国家主义”的。由于无治主义者既反对国家又反对专制关系，因此，任何不寻求拆除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的人，都不能被称为无治主义者。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公司。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公司的结构在本质上是极其等级化的，实际上是法西斯的：

“法西斯体系……（是）极权主义的——权力自上而下（运作）……理想的国家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公众根本上就是服从命令。

“让我们看看一个公司……如果你看看他们是什么：权力严格地自上而下，从董事会到经理到低级经理，最终到车间里的人，打字的人，等等。这儿没有自下而上的权力或计划的流动。人们虽然可以打断并提出建议，但奴隶社会也是这样。权力的结构是线性的，自上而下”。[**Keeping the Rabble in Line**, 第 237 页]

David DeLeon 很好地指出了公司和国家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他写道：

“大多数工厂就像军事独裁政权。底层的人是下士，主管是中士，这样一直划分等级到上层。组织可以支配一切，从我们的服装和发型，到我们在工作期间和生命中如何度过的大部分时间。它可以强迫我们加班；如果我们有医疗投诉，它可以要求我们去看公司的医生；它可以禁止我们有自由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它可以压制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它可以使用身份证和武装保安警察，以及闭路电视来监视我们；它可以用（正如通用公司所说的）‘纪律性裁员’来惩罚持异议者，或者它可以解雇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被迫接受其中的大部分，或者加入数百万的失业者行列……在几乎每一种工作中，我们只有辞职的‘权利’。重大的决定是由高层做出的，期望我们去服从，无论我们是在象牙塔还是在矿井里工作。”[“为了我们工作地点的民主。社会自我管理的理由”，**Reinventing Anarchy, Again**, 霍华德-J-埃利希（编），第 193-4 页]。

因此，坚定的无治主义者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公司。不这样做就是支持统治——根据定义，无治主义者不能这样做。换句话说，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服从的承诺、（工资）奴役的合同、要求接受从属地位的协议——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们确实地限制和约束了个人的自主权。”[罗伯特-格雷厄姆，“无治主义契约”，**Reinventing Anarchy, Again**, 霍华德-J-埃利希（编辑），第 77 页] 因此，等级制度违背了驱动无治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否认了使我们成为人的原因，“剥夺了人格最完整的特征；它否认了个人不仅有能力处理他或她

的个人生活的管理，而且有能力处理其最重要的背景：社会背景”。[Murray Bookchin, Op. Cit., p. 202]。

有些人认为，只要一个社团是自愿的，那么它是否有等级结构就无关紧要。无治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在资本主义下，工人受经济需求的驱使，向拥有生活资料的人出售他们的劳动（以及自由）。这个过程通过创造“巨大的财富差距……（因为）工人……以不反映其真实价值的价格向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劳动”，这再次强迫工人面对其经济条件。因此：

“例如，将雇佣合同的双方描述为自由且平等，就是忽视了工人和雇主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的议价权。然后再把自然形成的从属与剥削关系，描绘成自由的典范，就是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嘲弄。”[罗伯特-格雷厄姆，同上，第 70 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支持集体行动和组织：它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议价能力，使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自主权（见第 J 节）。

其次，如果我们把关键因素看成是一个社团是否是自愿的，我们就不得不说，目前的国家制度也必须被看作是“安那其”的。在现代民主制度中，没有人强迫个人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中。我们可以自由离开，去别的地方。通过忽视社团的等级制天性，你最终会支持那些否定自由的组织（包括资本主义公司、武装部队，甚至是国家），都是因为它们是“自愿的”。正如鲍勃-布莱克所认为的，“妖魔化国家专制主义，却忽视那些控制全球经济的大型企业中完全相同、尽管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服从性安排，是最糟糕的拜物教。”[作为保守派的自由意志主义者，**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第 142 页] 安那其远不仅仅是可以选择主人的自由。

因此，反对等级制度是无治主义的一个关键立场，否则你只会成为一个“自愿的有治主义者”——这很难说是无治主义。关于这一点，见 A.2.14 节（[为什么仅仅自愿主义是不够的？](#)）

无治主义者认为，组织不需要等级制度，它们可以建立在直接管理自己事务的、平等者之间的合作之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不采用等级结构（即把权力下放到少数人手中）。只有当一个协会由其成员自我管理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具有无治主义性质的。

我们很抱歉唠叨这一点，但是一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显然想占用“无治主义”的名称，因为它与自由有关。他们最近声称一个人可以同时是资本主义和无治主义（如所谓的“无治”资本主义）。现在应该很清楚，由于资本主义是基于等级制度的（更不用说国家主义和剥削），“无治”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关于这一点，详见第 F 节）。

A.2.9 无治主义者希望建立什么样的社会？^①

无治主义者希望有一个基于自由联合的、分权的社会。我们认为这种社会形式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我们上面概述的价值——自由、平等和团结的——最佳形式。只有通过结构上和地域上合理地分散权力，才能促进和鼓励个人自由。将权力委托到少数人手中，显然是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否定。无治主义者不是把自己的事务管理权从人们手中夺走，交到别人手中；而是赞成把权威降到最低限度的组织，把权力放在基层、放在那些受任何决定影响的人的手中。

自由联合是无治主义社会的基石。个人必须能够自由地加入他们认为合适的组织，因为这是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基础。然而，任何这样的自由协议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分散的基础上；否则，它将是一个假象（比如资本主义），因为只有平等才能为自由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因此，无治主义者支持基于“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集体（关于直接民主作为自由协议的政治对应物的理由，见 A.2.11 节——[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赞成直接民主？](#)）

我们应该在此指出，无治主义社会并不意味着某种田园诗般的和谐状态，在其中每个人都欣然同意。事实远非如此！正如 Luigi Galleani 所指出的，“分歧和摩擦将永远存在。事实上，它们是无限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一旦纯粹的、血腥的、动物性的竞争——对食物的争夺——被消除，分歧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而不会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造成丝毫威胁。” [The End of Anarchism?, 第 28 页] 无治主义旨在“唤起个人和团体的主动精神。”这些人将“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创造一种基于自由理解原则的运动和生活”，并认识到“多样性，甚至冲突，就是生命；而统一性就是死亡。” [彼得-克鲁泡特金，Anarchism, 第 143 页]。

因此，无治主义社会将以合作性冲突为基础，因为“冲突本身，并不有害……分歧是存在的（而且不应该被隐藏）……使分歧具有破坏性的不是冲突的事实本身，而是竞争的增长”。的确，“僵硬地要求达成一致，意味着人们将被有效地阻止为团体的努力贡献他们的智慧。” [Alfie Kohn,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p. 156]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拒绝在大规模的群体中实行共识决策（见 [A.2.12 节](#)）。

所以，在无治主义社会中，协会（associations）将基于广泛的讨论与辩论和平等者之间合作性的冲突，由所有参与者的群众集会运作；纯粹的行政任务将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处理。这些委员会将由授权的、可罢免的、临时性的代表组成，在选举出他们的大会警惕地监督下执行任务。因此，在一个无治主义社会中，“我们将自己照顾我们的事务，并决定如何处理它们。而当我们需要将想法付诸行动时，需要让某些人负责某个项目时，我们会告诉他们以这样还是那样的方式来做，而不是其他（方式）……没有我们的决定，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因此，我

^① 译注：本节中遇到的相似概念词汇（比如议会、集会、大会等），为不致混乱，在第一次翻译时给出其英文原词，以防产生歧义

们的代表，不是由我们赋予命令我们权利的人，而是没有权力……的人，只有执行每个人都想做的事的责任。” [Errico Malatesta, **Fra Contadini**, p. 34] 如果代表们的行为违背了对他们的授权，或者试图将他们的影响或工作扩大到大会已决定的事务的范围之外（比如如果他们自己开始做决策），他们可以立即被罢免，他们的决定被被废止。通过这种方式，该组织仍然掌握在创建它的个体联盟手中。

这种由基层团体成员的自我管理和罢免权，是任何无治主义组织的基本原则。国家主义或等级制度与无治主义社区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谁行使权力。例如，在议会（parliamentary）制度中，人们把权力交给一群代表，让他们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内做出决定。他们是否履行自己的承诺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在下次选举前无法撤销他们。权力在顶层，底层的人被期望去服从。同样，在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权力掌握在少数未经选举产生的老板与经理的高层，而工人被期望去服从。

而在一个无治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是相反的。在无治主义社区中，没有任何（无论经过选举或未经选举产生的）个人或团体拥有权力。相反，决策是通过直接民主的原则做出的，在需要时，社区可以选举或任命代表来执行这些决定。在政策制定（对每个受影响的人负责）和任何已通过的政策的管理（这是代表们的工作）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分。

这些由自由协议建立的平等主义社区，也可以自由地联合起来组成邦联（confederations）。这样的自由邦联将自下而上地运行，决定权由基层的集会（assemblies）向上延伸。邦联将以与集体（collectives）相同的方式运作。将定期举行地方、“全国”和国际研讨会（conferences），讨论影响与集体有关的所有重要问题和难点问题。此外，这里也会对社会的基本指导原则和思想进行辩论，并作出政策决定，付诸实施，审查和协调。代表们只是“把他们的委托的任务带到相关的会议上，并试图协调他们的各种需求和愿望。审议工作将始终由授权者的控制和批准”，因此“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被遗忘的危险。” [Malatesta, *Op. Cit.*, p. 36]

如果需要，将会成立行动委员会，以协调和执行集会及其大会（congresses）的决定；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委员会将由下层严格控制。参加这种机构的代表将有一个有限的任期，并且像参加大会的代表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任务——他们不能代表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作出决定。此外，像研讨会和大会代表一样，他们将受到他们最初产生于的、集会和大会的即时罢免。这样一来，用马拉特斯塔的话说，任何需要协调加入活动的委员会都将“始终处于民众的直接控制之下”，从而表达“人民大会上作出的决定。”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75 and p. 129] 。

最重要的是，基层社区集会可以推翻研讨会达成的任何决定，并退出任何邦联。代表在谈判中做出的任何妥协，都必须回到全体大会（general assembly）上获得批准。如果没有得到批准，那么代表做出的任何妥协，对将特定任务委托给特定个人或委员会的社区，没有约束力。此外，他们可以召开邦联研讨会，讨论新的发展，并向行动委员会告知改变的愿望，并指示他们如何完成任何的发展和

想法。

换句话说，无治主义组织或社会中所需要的任何代表（delegates）都不是（像民主政府中那样的）代表（representatives）。克鲁泡特金明确指出了其中的区别：

“想要更好地理解真正的‘授权者’（delegates）与‘代理人’（representatives）的问题，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百到两百人，他们每天在工作中见面，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讨论了与所关心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并作出了决定。然后他们选择一个人，派他（或她）与其他同类代表达成协议.....这位代表除了向其他代表解释导致他（或她）的同事得出结论的因素外，无权做更多的事情。他（或她）不能强加任何东西，他（或她）将寻求一种理解，并将返回一个简单的建议，他的委托人可以接受或拒绝。这就是真正的‘授权者’出现时的情况。” [Words of a Rebel, 第 132 页]

与代议制不同的是，权力没有被委托到少数人手中。相反，从一开始，任何代表只是被选举（或者被选择）为他们的协会的发言人。所有的代表和行动委员会都将被授权，并可以被立即罢免，以确保他们所表达的，是他们所来自的集会的愿望，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愿望。这样一来，政府就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一个由自由协会和社区组成的网络，在授权代表、即时罢免、自由协议和自下而上的自由联盟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合作。

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组织，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由联合会”将从基本的“协会”和它们的联合会（federations）开始，“首先变成公社，然后公社的联盟变成地区，地区的联盟变成国度，国度的联盟变成国际兄弟会。” [米哈伊尔-巴枯宁，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第 298 页] 这种无治主义社区网络将在三个层级上发挥作用。将会有“用于领土组织的、独立的公社；以及于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职能进行组织的、工会联合会（即工作场所协会）；.....（以及）用于满足经济、卫生和教育等所有可能和可以想象的需求、用于相互保护、用于宣传思想、用于艺术和娱乐、等等的——.....自由联合与社会。” [彼得-克鲁泡特金，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第 79 页] 所有这些，都将建立在自我管理、自由联合、自由联盟和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上。

通过这样的组织方式，等级制度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废除了，因为处于组织基层的人民被自我掌控着，而不是被他们的代表控制。只有这种形式的组织才能以无治状态（所有人的积极性和权力）取代政府（少数人的积极性和权力）。这种形式的组织，将存在于所有需要团体工作和多人协调的活动中。正如巴枯宁所说，这将是“将个人纳入他们能够理解和控制的结构中”的手段。[Cornelius Castoriadis 引用，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第 2 卷，第 97 页]。参与的个人将管理他们自己的倡议。

可以看出，无治主义者希望创建一个，基于确保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能够对他人行使权力结构的社会。通过自由协议、邦联和罢免权、不变的授权和有限的任期这些机制，权力将从政府手中移走，并被置于那些直接受决策影响的人手中。

关于无治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更全面的讨论，见[第1节](#)。然而，无治主义并不是什么遥远的目标，而是当下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一个方面。手段和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行动产生了大规模的参与性组织，使人们准备好直接管理自己的个人和集体利益。正如我们在[1.2.3节](#)中讨论的那样，这是因为无治主义者认为自由社会的框架，是建立在被压迫者在此时此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创建的组织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集体斗争创造了无治主义所需的组织和个人态度。反对压迫的斗争是无治主义的学校。它不仅教我们如何成为无治主义者，而且还让我们得以瞥见一个无治主义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它最初的组织框架可能是什么；并获得运作一个无治主义社会所必要的、管理我们自己的活动的经验。因此，无治主义者试图在我们当前的斗争中创造我们想要的那种世界，而不认为我们的思想只在“革命之后”适用。事实上，通过在今天就应用我们的原则，我们就离安那其更进一步。

A.2.10 废除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会达到什么效果？

一个基于自由意志主义组织的、新社会的建立，将对日常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通过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获得权力，我们现在只能猜测这会在哪些方面重塑社会。

然而，许多人认为这些组织形式是不切实际的，并且注定会失败。对于那些说这种邦联式的、非权威的组织会产生混乱和不团结的人，无治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的组织形式会产生冷漠而非参与、无情而非团结、平凡而非统一、有特权的精英而非平等的大众。更重要的是，这种组织破坏了个人的积极性，压制了独立行动和批判性思维。（关于等级制度的更多信息，见 B.1 节——“[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

西班牙无治主义运动表明，自由意志主义组织可以发挥作用，并且是基于（和促进）自由的。英国独立工党秘书 Fenner Brockway 在 1936 年革命期间访问巴塞罗那时指出，“无治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团结，是由于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依赖领导……组织要想成功，就必须与有自由思想的人相结合；不是大众，而是许多自由的个人。”[由鲁道夫·罗克引用，*Anarcho-syndicalism*，第 67 页 f]。

正如已经充分表明的那样，等级制、集权化的结构限制了自由。正如蒲鲁东所指出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规模、简单性和结构方面都很好：它只缺少一样东西——一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中不再属于自己，他无法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生命，根本没有人考虑到他。”[马丁·布伯引用，*Paths in Utopia*，第 33 页]。

在我们周围就可以看到等级制度的影响——它不起作用。等级制度和权威无处不在，在工作场所，在家里，在街上。正如鲍勃·布莱克所说，“如果你在清醒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命令或拍马屁，如果你习惯于等级制度——你就

会变得消极反抗、奴性和昏聩、变为施受虐狂，你会把这种负担带给你生活平衡的各个方面。”[“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第 147-8 页]。

这意味着，等级制度的终结将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巨大转变。这将涉及以个人为中心的组织的创建，在这些组织中，所有人都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并发展他们的能力。通过参与并影响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工作场所的、他们的社区与社会的决策，他们可以确保自己个人能力的充分发展。

随着所有人自由参与社会生活，我们将很快看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终结。人们不再像资本主义下那样为了维持生计而存在，并被用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力；等级制度的结束将见证（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所有人的福祉”，并且“是时候由工人维护他[或她]对共同遗产的权利，并开始占有它了。”[**The Conquest of Bread**，第 35 页和第 44 页] 因为只有占有生活资料（工作场所、住房、土地等）才能保证“自由和正义，因为自由和正义不是被授予的，而是经济独立的结果。它们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能够在不依赖主人的情况下生活，并享受……他[或她]的劳作成果。”[李嘉图-弗洛雷斯-马贡，**Land and Liberty**，第 62 页] 因此，自由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及其支持的“使用权”。（详见 B.3 节）。然而讽刺的是，“财产的废除，反而将使人民从无家可归和一无所有中解放出来。”[马克斯-巴金斯基，“**Without Government**”，**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第 11 页]。因此，无治主义承诺“幸福的两个必要条件——自由和财富”。在安那其社会中，“人类将生活在自由和舒适之中”。[本杰明-塔克，**Why I am an Anarchist**，第 135 页和第 136 页]。

只有社会各个层面的自决和自由协议，才能发展个人和整个社会的责任感、积极性、智慧和团结。只有无治主义组织才能使存在于人类内部的大量天赋得到接触和利用，通过丰富和发展个人的过程来丰富社会。只有让每个人都参与思考、计划、协调和执行那些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定，自由才能开花结果，个性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和保护。无治状态，将释放被等级制度奴役的、广大人民的创造力和才能。

安那其甚至会对那些被认是从资本主义及其权威关系中获益的人有好处。无治主义者“坚持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被权威毁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被剥削毁了。”[彼得·克鲁泡特金，**Act for Yourselves**，第 83 页] 这是因为“在任何等级关系中，统治者和顺从者都要付出代价。为‘命令的荣耀’所付出的代价确实是沉重的。每个暴君都厌恶自己的职责。他们被谴责为在等级制度的征途中，全程拖曳着被征服者沉重且沉睡着的创造潜力。”[为了我们自己，**The Right to Be Greedy**，论文 95]。

A.2.11 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赞成直接民主？

对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在自由联合体内通过直接民主投票对政策进行决定，是自由协议在政治上的对应物（这也被称为“**自我管理**”）。原因是，“许多形式的统治可以是‘自由的’、非强制性的、契约性的方式进行……而认为仅仅反对政治控制本身就会导致压迫的结束……是天真的……”。[John P. Clark, *Max Stirner's Egoism*, p. 93] 因此，我们在一个组织**内部**建立的关系，在决定其自由意志主义性质方面与决定它的自愿性质同样重要（更多讨论见 [A.2.14 节](#)）。

很明显，个体必须协作，才能拥有完整的人生。因此，“（为了）必须与其他人类结合”，个人有三种选择。“他[或她]必须服从他人的意志（被奴役），或使他人服从他的意志（有权威），或为了所有人的最大利益，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兄弟般的协议中（成为伙伴）。没有人可以逃避这种必要性。”[埃里科-马拉特斯塔，*Life and Ideas*，第 85 页]

无治主义者显然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即联合——作为个人能够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类一起协作、尊重彼此的独特性和自由的唯一手段。唯有在直接民主中，个人才能表达自我，实践批判性思维和自我管理，从而充分发展他们的智力和道德能力。就增加个人的自由和他们的智力、伦理和社会能力而言，有时身处少数人，要远比一直受制于老板的意愿压制好得多。那么，无治主义直接民主背后的理论是什么？

正如伯特兰-罗素所指出的，无治主义者“并不希望废除集体决定意义上的政府：他所希望废除的是一种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决定会被强加给那些反对它的人。”[*Roads to Freedom*，第 85 页]无治主义者认为自我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一旦个人加入一个社区或工作场所，他或她就成为该协会的“公民”（暂且用这个词来表达）。该协会以全体成员的集会为组织形式（在大型工作场所和城镇的情况下，这可能是某个功能性小组，比如一个特定的办公室或街区）。在这样的集会上，通过与其他人一起协作，个体的政治义务的内容被界定。在协会内行动时，人们必须进行批判性判断与选择，也就是管理自己的活动。与个人承诺服从（如在国家或资本主义公司这样的等级组织中的那样）截然不同，他们参与作出他们自己的集体决定，他们自己对同伴的承诺。这意味着，政治义务不再是对一个高于团体或社会的单独实体（如国家或公司）的服从，而是对自己作为“公民”的同伴的责任。

尽管集结起来的人们集体制定了管理他们协会的规则，并且作为个人受到这些规则的约束，但他们又高于这些规则，因为这些规则总是可以被修改或废止。从集体上说，关联起来的“公民”构成了一个政治上的“权威”，但由于这个“权威”是基于他们之间的横向关系，而不是他们与精英之间的纵向关系，所以这个“权威”是非等级化的（也就是“理性的”或“自然的”，详见 B.1 节——[“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因此，蒲鲁东提到：

“我们将用合同（即自由协议）代替法律。—— 不再有由多数人表决甚至一致通过的法律；每个公民、每个城镇、每个产业联盟都自行制定自己的法律。”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第 245-6 页]

当然，这样的制度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参与每一个必要的决定，无论是多么琐碎的小事。虽然任何决定都可以提交给大会（也许是大会这样决定的，也许是在一些成员推动的），但在实践中，某些活动（以及如此纯粹的功能决定）将由协会选出的行政机构处理。这是因为，引用一位西班牙无治主义活动家的话说，“一个集体本身不能写一封信，也不能把一系列数字加起来，或做数百件只有个人才能做的杂事”。因此需要“组织管理。”假设一个协会是“在没有任何指导委员会或任何等级制官僚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它“每周或更经常地举行一次大会，在大会上解决其进展所需的所有问题”，它仍然“提名一个具有严格行政职能的委员会。”然而，大会“为这个委员会规定了明确的行动路线，或者对它强制委任”^①，因此“这样将是完全无治主义的”。因为“由此可见，将这些任务授权给事先被指示如何进行的合格个人，.....并不意味着放弃该集体自己的自由”。

[Jose Llunas Pujols, 由 Max Nettlau 引用, 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第 187 页] 应该指出的是，这遵循了蒲鲁东的想法，即在工人协会中，“所有的职位都是选举产生的，而章程要经过成员的批准。” [Proudhon, Op. Cit., p. 222] 。

为了取代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等级制度，自我管理（即直接民主）将是构成自由社会的、自由加入协会的指导原则。这将适用于无治主义社会运作所需的协会联合会。何塞-卢纳斯-普霍尔（Jose Llunas Pujols）恰当地认为：“无治主义社会中提名的所有委员会或代表团，必须随时由选举他们的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永久投票权来替换和罢免。”结合“强制委任”和“纯粹的行政职能”，这“使得任何人都不能使自己攫取一丁点权力。”[由 Max Nettlau 引用, Op.Cit., 第 188-9 页] 同样，Pujols 追随蒲鲁东，后者在二十年前就要求“实施有约束力的授权”，以确保人民不会“恳求自己的主权。” [No Gods, No Masters, 第一卷, 第 63 页]

通过基于授权和选举的联邦制，无治主义者确保决策自下而上的流动。通过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通过自己照顾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排除了其他人对我们的统治。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我管理，对于确保任何人类得以体面地生存所需的、组织内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有些人会争论，如果你是少数人，你就会被别人统治（“民主的统治仍然是统治” [L. Susan Brown,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53]）。但现在，我们所描述的直接民主的概念，不一定与多数人统治的概念相联系。如果有人发现自己在某次投票中处于少数，他或她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同意，要么拒绝承认投票的约束力。剥夺少数人行使其判断和选择的机会，是对其自主权的侵犯，是将其没有自由接受的义务强加于人。强加多数人的意愿与自我承担义务的理想相悖，因此也与直接民主和自由联合相悖。因此，在自由结社和自我承担义务范围内的直接民主，不仅不是对自由的否定，反而是培育自由的唯一途径（“个人

^① 强制委任（imperative mandate）：一种代表制度，其中代表必须服从选民的命令与指令，否则就可以被随时罢免

的自主权受到履行承诺义务的限制。” [Malatesta, 由 Max Nettlau 引用, **Errico Malatesta: The Biography of an Anarchist**]。不言而喻,即使是少数派,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协会中,仍然可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努力说服多数派认识到其可能的错误。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无治主义者对直接民主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总是正确的。远非如此!民主参与的理由不是多数人总是正确的,而是不能相信任何少数派都不会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全体的利益之上。历史证明了我们常识地预测,即任何拥有独裁权力的人(可以是一国元首、一个老板或一位丈夫等)都会利用他们的权力,以牺牲受其决定的人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富足并获得权力。

无治主义者认识到,多数人可能而且确实会犯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结社理论非常重视少数人的权利。这可以从我们的自我承担义务(**self-assumed obligation**)的理论中看出,该理论以少数人抗议多数人决定的权利为基础,并将异议视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因此,Carole Pateman 这么说:

“如果多数人的行为是恶意的……(那么)少数人将不得不采取政治行动,包括酌情采取政治上的不服从行动,以捍卫他们的公民权和独立性,以及政治联合本身……政治上的不服从,只是自我管理的民主所基于的积极公民权的,一种可能表现……。承诺的社会实践,涉及拒绝或改变承诺的权利;同样,如果不在实践上承认少数人拒绝或撤回同意的权利,或在有必要时选择不服从——那么自我承担政治义务的实践就毫无意义。”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第 162 页]

除了协会内部的关系,我们也必须强调不同的协会之间是如何合作的。正如所想象的那样,协会之间的联系与协会本身的特点相同。就像是个人加入协会,协会也会加入邦联。在邦联中各协会之间的联系,与协会内部具有相同的横向和自愿性质——成员有相同的“发言权和退出权”,少数人也具有相同的权利。这样一来,社会就变成了一个由各协会组成的协会、一个由诸社区组建的社区,一个由各个公社构建的公社——其基础是通过最大限度的参与和自我管理,来实现个人的自由。

我们在 A.2.9 节([无治主义者想要什么样的社会](#))中我们概述了这种邦联的运作,并在第 I 节([无治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中更加细致地加以讨论。

这种直接民主制度很适合无治主义理论。当马拉泰斯塔认为“无治主义者否认多数人有权利管理整个人类社会”时,他代表了所有无治主义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多数派无权将自己强加给少数人——少数人可以随时离开社团,并且,用马拉泰斯塔的话说,不必“在他们还没有听到这些决定可能是什么之前,就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第 100 页和第 101 页] 因此,自愿联合体内的直接民主并不创造“多数人的统治”,也不会假定少数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多数人。实际上,直接民主的无治主义支持者认为,它符合马拉泰斯塔的论点:

“当然，无治主义者认识到，只要是在共同生活的地方，往往有必要让少数人来接受多数人的意见。当做事有明显的必要或有用、而做这件事又需要所有人的同意时，少数人应该会感到有必要去适应多数人的愿望……但一个群体的这种适应必须是对等的、自愿的，必须源于对需要和善意的认识，以防止社会事务的运行因顽固不化而瘫痪。它不能作为一项原则和法定准则强加于人……”[同上，第 100 页]

由于少数人有权脱离协会，并拥有广泛的行动、抗议和上诉的权利，多数人统治并不是作为一项原则而强加于人。相反，它纯粹是一种决策工具，允许少数人的异议和意见得到表达（并采取行动），同时确保没有少数人将其意志强加给多数人。换言之，多数人的决定对少数人没有约束力。毕竟，正如马拉特斯塔所说的那样：

“我们不能期望、甚至希望，一个坚信大多数人采取的路线会导致灾难的人，应该牺牲他（或她）自己的信念，被动地看着，或者甚至更糟糕地，应该支持他（或她）认为错误的政策。”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第 132 页]

即使是个人无治主义者莱桑德-斯普纳也承认直接民主有其用途，他指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自愿协会，都给予多数成员或低于全体成员的某些其他部分以权利，以使用某种有限的酌处权来完成所考虑的目的的手段。”然而，只有陪审团的一致决定（它将“判断法律和法律的公正性”）才能确定个人权利，因为这个“法庭公平地代表了全体人民”，因为“协会不能以其法人身份合法地执行任何法律。”（他支持陪审团的原因。是因为斯普纳承认“在实践中不可能”让协会的所有成员达成一致） [Trial by Jury, p. 130-1f, p. 134, p. 214, p. 152 and p. 132] 。

因此，直接民主与个人/少数派的权利，不一定发生冲突。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想象直接民主将被用来在大多数协会内做出大多数决定（也许基本决定需要绝对多数），再加上陪审团制度和少数人抗议/直接行动的某种组合，并在无治主义社会中评估/保护少数派的主张/权利。自由的实际形式，只能通过直接参与的大众的实践经验来创造。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无治主义者对直接民主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都要赞成这种解决方案。例如，许多小协会可能会赞成共识决策（关于共识见下一节，以及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认为它是直接民主的可行替代方案）。然而，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认为，自由协会中的直接民主是最好的（和最现实的）组织形式，这也符合无治主义的个人自由、尊严和平等原则。

A.2.12 协商共识可以代替直接民主吗？

少数无治主义者拒绝自由协会中的直接民主，他们一般支持在决策中达成共

识。共识的基础是团体中的每个人都同意一项决定，然后才能将其付诸行动。因此，有人认为，共识可以阻止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而且更符合无治主义原则。

共识虽然是决策中的“最佳”选择，但大家都同意，它也有问题。正如 Murray Bookchin 在描述他对于共识的经验时指出的那样，它可能暗含着专制。

“为了.....在一项决定上形成充分的共识，少数异见者往往被暗示地敦促或被心理上胁迫，去拒绝对一个烦人的问题进行投票，因为他们的反对意见基本上相当于一票否决。这种做法在美国的共识过程中被称为‘靠一边站’，常常涉及到对异议者的恐吓，以至于他们完全退出了决策过程；而不是即使是作为少数人，也依旧按照他们的观点投票，来体面且持续地表达他们的异议。退出后，他们就不再是政治人物了——这样就可以做出‘决定’.....。只有在持反对意见的成员注销了自己作为过程参与者的资格之后，‘共识’才最终实现。

“在更多的理论层面上，共识压制了所有对话中最重要的方面，即异议。持续存在的异议，即使在少数人暂时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后仍然存在的热情对话，.....（将会）被.....沉闷的独白——以及毫无争议和噤声的共识所取代。在多数人决策中，被击败的少数人可以下决心推翻他们被击败的决定——他们可以自由地公开和坚持不懈地阐述合理的、可能有说服力的分歧意见。共识就其本身而言，则不尊重任何少数群体，而是对他们进行禁言，以支持‘共识’群体的形而上学的‘唯一’”。[“Communalism: The Democratic Dimension of Anarchism”，**Democracy and Nature**, no. 8, p. 8] 。

布克钦并不“否认在彼此非常熟悉的小群体中，达成共识可能是一种适当的决策方式。”但他指出，在实践中，他自己的经验告诉他，“当较大的群体试图以达成共识的方式作出决定时，通常会迫使他们在决策中达到最低的共同智力标准：一个较大规模的集会能够达成的决策往往是最不具争议性，甚至是最平庸的决定——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同意它，否则就退出对该问题的表决。”[Op. Cit.,p.7]

因此，由于其潜在的专制性质，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同意：共识是政治方面的自由联合。虽然试图达成共识是有利的，但这样做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大型团体中——即使不管它的其他负面作用。通常它有损于一个自由社会或协会，因为它倾向于以社区的名义破坏个性、以团结的名义压制异议。当个人发展和自我表达被公众的不认可和压力遏止时，真正的社区和团结都无法得到促进。由于个人都是独特的，他们就会有独特的观点，而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表达这些观点，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因个人的行动和思想而变得丰富。

换句话说，直接民主的无治主义支持者，强调“异议的创造性作用”，他们担心这种作用“往往会在共识所要求的灰色的统一中消逝”。[同上，第8页]

我们必须强调，无治主义者并不赞成机械的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只是把少数人的票走，然后不理睬他们。远非这样！支持直接民主的无治主义者认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辩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和少数人尽可能地相互

倾听和尊重，并创造一个（如果可能的话）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决定。他们认为直接民主协会内的参与过程，是创造共同利益的手段，是一个鼓励多样性、个人与少数派表达的过程；并通过确保在重要问题上进行讨论和辩论，来减少多数人边缘化或压迫少数人的任何倾向。

A.2.13 无治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

简短的回答是：都不是。这可以从自由主义者谴责巴枯宁等无治主义者是“集体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巴枯宁和一般的无治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这一事实中看出。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治主义者拒绝这两种荒谬的意识形态。无论他们喜欢与否，非无治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就是同一枚资本主义硬币的两面。这可以通过考虑现代资本主义而得到最好的证明——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倾向不断地相互作用，政治和经济结构往往从一极摇摆到另一极。资本主义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人类存在的片面性，和所有不平衡的表现一样，都存在很大的缺陷。

无治主义者认为，个人应该为“团体”或“成全大我”而牺牲自己的想法，就是无稽之谈。群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人们只考虑什么是对群体最好的，那么这个群体将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只有群体内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动力才会赋予它们生命。“群体”无法思考，只有个人可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实将专制主义的“集体主义”引向一种最特殊的“个人主义”，即“个人崇拜”和领袖崇拜。这在意料之中，因为这种集体主义将个人混入抽象的群体中，否认他们的个性，最终需要一个有足够个性的人来做决定——而这个问题被领袖原则所“解决”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这种现象的绝佳例子。

因此，无治主义者认识到，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只有个人才有爱好和感情。这意味着他们反对“集体主义”和对群体的颂扬。在无治主义理论中，团体的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和发展参与其中的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以自由意志主义方式构建的团体——只有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才允许团体中的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利益，并创造鼓励个性和个人自由的社会关系。因此，虽然社会和他们加入的团体塑造了个人，但个人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因此，马拉特斯塔认为：

“关于个人主动性和社会行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和进步中各自的作用，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人类世界中的一切，都由于个人主动性而得以维持和发展……真正的存在是人、是个人。社会或集体——以及声称代表它的国家或政府——如果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物，就必须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正是在每个人的机体中，所有的思想和人类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有它们的起源；当它们被或将被许多人接受的时候，它们就从个人的变成了集体的思想和行动。因此，社会行动既不是对个

人主动性的否定，也不是对它的补充，而是构成社会的所有个体的主动性、思想和行动的结果.....问题真正不在于改变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防止某些人压迫其他人的问题；是给予所有个人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行动手段的问题；是取代将主动权交给少数人的问题（马拉泰斯塔将其定义为政府/等级制度的一个关键方面），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其他人的压迫.....” [Anarchy, pp. 38-38]

这些考虑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得到了无治主义者的青睐。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指出的，“‘粗犷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只是掩盖了压制和击败个人及其个性的企图。所谓的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统治）阶级通过法律上的诡计、精神上的贬低和对奴性精神的系统灌输，来剥削大众.....这种腐化的和倒行逆施的‘个人主义’，是对个性的束缚.....（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最大的现代奴隶制，用最粗暴的阶级区分把数百万人逼上了贫困线。‘粗犷的个人主义’意味着所有主人的‘个人主义’，而人民则被编入奴隶种姓，为一小撮追逐私利的‘超人’服务。” [Red Emma Speaks, 第 112 页]

虽然群体无法思考，但个人也无法独自生活或讨论。群体和交往是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由于群体在其性质上产生社会关系，它们有助于塑造个人。换句话说，以专制方式构建的群体，会对身处其中的人们的自由和个性，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由于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抽象性质，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者没有看到以自由意志主义方式结构的群体，与以专制方式结构的群体之间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群体”。由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观点，“个人主义者”最终讽刺地支持一些现存的最为“集体主义”的机构——资本主义公司，而且，尽管他们经常谴责国家，但总是能找到对国家的需要。这些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对不平等社会中个人契约的依赖，即抽象的个人主义。

相比之下，无治主义者强调社会“个人主义”（这个概念的另一个也许更好的术语，应该是“公共个性（*communal individuality*）”）。无治主义“坚持认为社会的重心是个人——他[原文如此]必须为自己思考，自由地行动，充实地生活.....。如果他想要自由和充分地发展，他就必须摆脱他人的干扰和压迫.....。这与‘粗犷的个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掠夺性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软弱的，而不是粗犷的。只要它的安全有一丁点危险，它就会跑到国家的掩护下，哀号着要求保护.....他们的‘粗犷的个人主义’，只是统治阶级为掩盖肆无忌惮的商业与政治勒索，而做出的众多伪装之一。” [Emma Goldman, *Op. Cit.*, pp.442-3]

无治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抽象的个人主义，其思想是受制于他人的、个人的“绝对”自由。这种理论忽视了自由存在和发展的社会背景。马拉泰斯塔认为，“我们想要的自由——对我们自己和他人来说，不是一种绝对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对弱者的压迫——而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可能的自由，它是有意识的利益共同体，是自愿的团结。” [Anarchy, 第 43 页]

一个以抽象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会导致合约双方个体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在他们之上，需要有一个基于法律的权威，并拥有系统性的强制力来执

行他们之间的契约。这一后果在资本主义中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在关于国家如何逐渐形成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在这一理论中，它假设个人在相互孤立时是“自由的”，就像他们最初在所宣称的“自然状态”中那样。一旦他们加入社会，他们就会创造一个“契约”和一个国家来管理它。然而，除了是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幻想（人类一直是社会动物），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国家对社会拥有广泛权力的一个辩护；而这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辩护，因为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还表现出了这个理论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内部，个人“自由地”签订合同；但实际上，只要合同存在，业主就会统治工人。（详情见 [A.2.14 节](#) 和 [B.4 节](#)）。

因此，无治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它是“一种狭隘和自私的个人主义”，而且是“一种贬低个人的、愚蠢的利己主义”；“它根本就不是个人主义。它不会导向被确立的目标——那就是个人性的完全广泛和最完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导致了“个性的贫困化”，而不是个性的发展。与此相反，无治主义者“通过最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交性在其基本需求和与他人关系方面，达到可能最大程度上实现个体发展的——个性。”[**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 第 295 页, 第 296 页和第 297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当我们与周围的人平等合作而不是作为主仆关系时，我们的自由就得到了丰富。

在实践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会导致对个体自由和团体自主性及动力的否定。此外，每一种都暗含着另一种，集体主义会导致一种特殊形式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会导致一种特殊形式的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通过隐性地压制个人，最终使社区变得贫瘠，因为群体只有通过组成它们的个人才能获得生命。个人主义，通过显性的压制以社区（即与你生活在一起的人）的，最终使个人陷入穷困，因为个人不会脱离社会而存在，只能在社会中存在。此外，个人主义最终否定了“少数人”对构成社会其他部分的个人的见解与作用能力，因此是自我否定的来源。这也是个人主义的致命缺陷（和矛盾），即“在‘出色的贵族’压迫大众的状态下，个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他[或她]的发展将仍然是单向的。”[彼得-克鲁泡特金，**Anarchism**, 第 293 页]。

真正的自由和社群存于他处。

A.2.14 为什么仅仅自愿主义是不够的？

自愿主义意味着，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由，结社应该是自愿的。无治主义者，显然，是自愿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在由自由协议创造的自由联合中，个人才能发展、成长和表达他们的自由。然而很明显，在资本主义下，自愿主义本身并不足以实现自由的最大化。

自愿主义意味着承诺（即达成协议的自由），而承诺意味着个人有能力进行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考。此外，它的前提是他们能够评估和改变自己的行动和关系。然而，资本主义下的合同，与自愿主义的这些含义相矛盾。因为，尽管在技术上是“自愿的”（尽管正如我们在 [B.4 节](#) 中所显示的，这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情况），资本主义契约最终导致了对自由的否定。这是因为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涉及承诺服从以换取报酬。而正如 Carole Pateman 所指出的，“承诺服从就是或多或少地否认或限制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以及他们行使（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考等能力的）能力。承诺服从就是说明，在某些方面，做出承诺的人不再能自由地行使她的能力和决定她自己的行动，也就不再是平等的，而是从属的。”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第 19 页] 这导致服从者不再自己做决定。因此，在等级关系中，自愿主义的合理性（即个人有能力为自己思考，必须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个性并做出自己的决定）被违反了，因为一些人负责，而许多人服从（也见 [A.2.8 节](#)）。因此，任何产生从属关系的自愿主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不完整的，并且违背了其自身的合理性。

这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了生活而把他们的自由出卖给老板。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下，你只有在你能选择服从谁的程度上才是自由的！然而，自由必须不只是意味着有更换主人的权利。自愿的奴役仍然是奴役。因为，正如卢梭所说，如果主权“由于使其不可剥夺的同样原因，也不能被代表”，它也不能被出售、或者被雇佣合同暂时取消。卢梭有一个著名的论点：“英国人民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这是大错特错的；它只是在选举议会成员期间是自由的。他们一但当选，奴役就笼罩了它，它就什么也不是了。”[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第 266 页] 无治主义者对这种分析进行了扩展。套用卢梭的话说：

在资本主义下，工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她大错特错了；只有当她与老板签订合同时，她才是自由的。一旦签署了合同，奴役就笼罩了她，她只是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而已。

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其中的不公正，我们只需要引用卢梭的话：

“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在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财产之后，应该对那些想在那里确立自己地位的人强加法律，而且他只允许他们以接受自己的最高权威、服从自己的所有愿望为条件，才可以这样做；这一点，我仍然可以想象……这种暴虐的行为难道不包含双重僭越：对土地所有权的僭越和对居民自由的僭越？” [同上，第 316 页]

因此，蒲鲁东说：“财产可能使人轮流成为奴隶或暴君。”[What is Property?, 第 371 页] 难怪我们会发现巴枯宁拒绝“与任何个体签订任何形式的契约，除非是最极致的平等与互惠”，因为这将“让渡他[或她]的自由”，因此将是一种“与另一个人的自愿奴役关系。”在自由社会（即无治主义社会）中，任何签订这种契约的人都是“缺乏任何个人尊严的意识”的。[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第 68-9 页] 只有自我管理的社团，才能在其成员之间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并主张“工人自己组成民主社会，所有成员享有平等条件，否则就会重新退回封建主义。”[蒲鲁东，**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第 277 页] 出于类似的原因，无治主义者（蒲鲁东是个明显的例外）反对婚姻，因为它把妇女变成了“一个被捆绑的奴隶，她接受主人的名字、主人的面包、主人的命令，并为主人的激情服务.....未经他的同意，她不能控制任何财产，甚至她的身体。”[Voltairine de Cleyre, "Sex Slavery", **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94] 虽然由于女权主义的鼓动，婚姻在许多国家已经朝着平等者自由结合的无治主义理想进行了改革，但它仍然是建立在像戈尔德曼和 de Cleyre 这样的无治主义者所确定和谴责的、父权制原则之上（更多关于女权主义和无治主义的内容，见 [A.3.5 节](#)）。

显然，自愿加入是捍卫个人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它忽略了（或想当然地）达成协议的社会条件，而且，忽略了协议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对于必须出卖自己劳动的工人来说，保持自由是不可能的。”[克鲁泡特金，**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第 305 页]）。任何基于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都可能是基于武力、权力和权威的，而不是基于自由的。当然，这是以自由的定义为前提的，根据这个定义，个人可以行使自己的能力，决定自己的行动。因此，自愿主义并不足以创造一个最大化自由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认为，自愿结社必须由这些协会内部的自我管理（直接民主）来补充。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愿主义的假设意味着自我管理。或者，用蒲鲁东的话说，“正如个人主义是人性的原始事实一样，社团也是它的补充条款。”[**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第 430 页]。

首先回答第二个反对意见，在一个以私有财产（以及国家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拥有财产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权力来延续他们的权威。用阿尔伯特-帕森斯的话说，“财富就是权力，贫穷就是弱点”。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备受赞誉的“选择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变成了选择主人的自由（在奴隶制下，帕森斯嘲弄地说，主人“选择.....自己的奴隶。在工资奴隶制度下，工资奴隶选择他的主人。”）。帕森斯强调说，在资本主义下“那些被剥夺了自然权利的人必须从事工作、服务和听从压迫阶级，否则就得挨饿。没有其他选择。有些东西是无价的，其中主要是生命和自由。自由人是不可以被买卖或出租的。”[**Anarchism**,第 99 页和第 98 页] 而我们为什么要原谅奴役，或容忍那些希望限制他人自由的人？命令的“自由”就是奴役的自由，所以实际上这是对自由的否定。

至于第一个反对意见，无治主义者认罪。我们的确反对将人类降格到机器人的地位。我们偏袒人类尊严和自由。事实上，我们偏袒的是人性和个体性。

（[A.2.11 节](#)讨论了，为什么直接民主是自愿主义（即自由协议）的必要的社会层面的对应物。[B.4 节](#)讨论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建立在财产所有者和无财产者之间平等的议价能力上）。

A.2.15 那么“人性”怎么办？

无治主义远没有忽视“人性”，反而是唯一一种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反思的政治理论。在反对无治主义的争论中，“人性”常常被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抛出，因为它被认为是无法被回答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首先，人的本性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如果所说的人性是指“人类的所作所为”，那么很明显，人性是矛盾的——爱与恨、同情与无情、和平与暴力等等，这些都被人们表达过，那么他们都是“人性”的产物。当然，被认为是“人性”的东西，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几千年来，奴隶制被认为是“人性”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是完全正常的，但几千年后，基督教会却谴责它是反常的。战争只有在国家产生后才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因此，乔姆斯基说：

“个人当然有能力作恶.....但个人也有能力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人性有很多实现自身的方式，人类也有很多能力和选择。以哪种方式实现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结构。如果我们有允许病态杀手放任自流的体制，他们就会管理这个地方。生存的唯一办法将会是让你的本性中的那些元素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的制度将贪婪作为人类的唯一特性，并鼓励牺牲人类的其他情感和热情的、纯粹的贪婪，我们就会有一个基于贪婪的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一个不同的社会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起来，即人类的其它类型的情感和情绪，例如团结、支持、同情，成为主导。然后你就会发现人性和个性展示出了它们的不同方面。” [Chronicles of Dissent, 第 158 页]。

因此，环境，在定义什么是“人性”、它如何发展、以及它的哪些方面被表现出来的层面上——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关于无治主义的最大神话之一，就是以为我们认为人性本善（相反，我们认为人性本群）。人性如何发展和表达，取决于我们生活在所创造的什么样的社会中。一个等级制的社会，会以某些（消极的）方式塑造人们，并产生与自由意志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人性”。因此，“当我们听到人们说无治主义者把人类想象得比实际情况好得多时，我们只是想知道聪明的人们怎么会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在说，使人类不那么贪婪和自负、不那么有野心和奴性的唯一手段，就是消灭那些有利于利己主义、贪婪、奴性与野心增长的条件吗？” [彼得-克鲁泡特金，Act for Yourselves, 第 83 页]。

因此，用“人性”作为反对无治主义的论据，纯粹是肤浅的；而且，这最终是一种逃避。它是一个不加思考的借口。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说，“每个傻瓜，从国王到警察，从头脑简单的牧师到毫无远见的半吊子科学家，都自以为权威地谈论着人性。精神骗子越多，一个人就越明确地坚持人性的邪恶与弱点。然而，在每个人的灵魂都被囚禁，每颗心都被束缚、被损伤和被残害的——今天，又怎么有人能去谈论它呢？”改变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然后我们就可以判断什么是我们天性的产物，什么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为此，无治主义“代表着人类的思想从宗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代表着人类的身体从财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代表着从政府的桎梏和约束中解放出来”。因为“只有自由、发展、机会，

以及最重要的和平与安宁，才能让我们了解到真正主导人性的因素及其所有美妙的可能性。” [Red Emma Speaks, 第 73 页]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有无限的可塑性，每个人出生时都是一块 **tabula rasa**（白板），等待着被“社会”（实际上是指管理它的人）所塑造。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认为的，“我不认为有可能在这个假设（人性不过是历史的产物）上，对异化劳动的概念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为致力于某种社会变革而产生类似于道德理由的东西。除非是基于对人性以及社会结构的可塑性的假设，将更好得解释我们基本天性中一部分的基本需求。” [Language and Politics, 第 215 页] 我们不想参与关于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先天的”人类特征的辩论。我们只想说，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思考和学习能力——我们觉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人类是善于交际的动物，需要他人的陪伴才能感到完整和繁荣。此外，他们有能力认识和反对不公正与压迫（巴枯宁正确地认为“思考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是“宝贵的能力。” [God and the State, 第 9 页]）。

我们认为，这三个特点表明了无治主义社会的可行性。与生俱来的自我思考能力，必然意味着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都是非法的；而我们对社会关系的需要，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困扰现代社会的深深的不快和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的集权主义与独裁主义，正在否定我们内心的一些先天需求。事实上，如前所述，在人类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曾一直生活在无治的社区里，几乎或者完全没有等级制度。现代社会把这种人称为“野蛮人”或“原始人”，这纯粹是一种傲慢。那么，谁还能说无治主义是否违背“人性”？无治主义者已经积累了很多证据，表明它可能不是。

至于指控无治主义者对“人性”的要求过高，事实往往是非无治主义者对它的有最大的要求。因为“虽然我们的反对者似乎承认有一种社会栋梁——统治者、雇主、领导者，他们很高兴地阻止那些坏人——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领导者——变得比他们更坏”，但我们无治主义者“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被权威所腐化、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被剥削所腐化。”因此，“有（一个）区别，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我们承认人性的不完美，但我们对统治者也一视同仁。他们导致了这种情况，尽管有时是不自觉的，而且正因为我们没有为他们开脱，他们就说我们是空想家。” [Peter Kropotkin, Op. Cit., p. 83] 如果人性是如此糟糕，那么给一些人以权力，并希望这能带来正义和自由，岂不是最彻底的空想主义。

此外，如前所述，无治主义者认为，等级制组织带来了人类本性中最坏的一面。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会受到专制关系如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巴枯宁认为：“这是特权的特征并且寓于各种形式特权中——那就是扼杀人的思想和心灵.....这是一条没有例外的社会规律.....这是平等和人性的规律。” [God and the State, 第 31 页] 当特权者因权力而堕落时，无权者（一般来说）则在心灵和思想上会变得奴性（幸运的是，人类的精神是这样的，无论压迫如何，总会有反抗者；因为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因此，也就有希望）。因此，对于无治主义者来说，听到非无治主义者从等级制度产生的（扭曲的）“人性”的角度，来反过来为等级制度辩护，这看起来很奇怪。

可悲的是，太多人恰恰是这样做的——时至今日也是如此。例如，随着“社会生物学”的兴起，一些人声称（几乎没有真正的证据），资本主义是我们“天性”的产物，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这些主张只是“人性”论点的一个新变种，毫不奇怪，它们被当权者抓住了。考虑到证据的匮乏，他们对这一“新”学说的支持必须纯粹是其对当权者有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有助于产生一个“客观的”和“科学的”理由，来合理化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关于这一过程的讨论，见 Steven Rose, R.C. Lewontin 和 Leon J. Kamin 的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这并不是说它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相。正如科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指出的，“我们潜在行为的范围被我们的生物学机理所限制”，如果这就是社会生物学的意思，“通过基因控制，那么我们几乎没有异议。”然而，他们并不是这个意思。相反，这是社会生物学主张的是一种“生物决定论”的形式。他们说特定的人类特征有特定的基因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虽然“暴力、性别歧视和一般的恶劣行为的确是生物性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系列可能的行为的一个子集”，但“和平、平等和善良”也是如此。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创造允许它们蓬勃发展的社会结构，我们可能会看到它们增大的影响力。”从社会生物学家自己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他们“承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常常把那些令人不舒服的‘例外’，当作暂时的和不重要的异常情况来处理。”这令人惊讶，因为如果你相信“反复的、经常的种族灭绝战争塑造了我们的遗传上的命运，那么非攻击性民族的存在就会令人尴尬”。[**Ever Since Darwin**, 第 252 页，第 257 页和第 254 页]。

与之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社会生物学的做法是首先将当前社会的主导思想投射到自然界（往往是无意识的，所以科学家们错误地认为有关的思想既“正常”又“自然”）。布克钦将此称为“历史上的人类价值观”对自然界的“隐晦投射”，而不是“科学的客观性”（的投射）。然后，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自然理论，又被转移回到社会和历史，被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原则（等级制度、权威、竞争等）是永恒的法则，然后将其作为维持现状的理由来加以呼吁！布克钦指出：“这种程序所达到的目的是，通过辩护对男人和女人的命令作为‘自然秩序’的先天特征，来强化人类的社会等级制度。人类的统治，被因此转录到生物学上不可改变的遗传密码中。”[**The Ecology of Freedom**, 第 95 页和第 92 页] 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所谓的聪明人居然认真对待这种巧妙的骗局。

当自然界中的“等级制度”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并以此作为理由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种类比是误导性的，因为它们忘记了人类生活的制度属性。正如 Murray Bookchin 在他对社会生物学的批评中所指出的，“一个虚弱的、无力的、不安的和患病的猿猴，几乎不可能成为‘首领’，更不可能保持这种高度短暂的‘地位’。相比之下[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身体和精神上最病态的人类统治者所行使的权力，则具有破坏性的效果。”这“表达了等级制度之于人的权力，在所谓的‘动物等级’中是完全相反的，在那里，制度的缺乏，恰恰是去理解对‘阿尔法雄性’或‘蜂后’的讨论的、唯一一种方式。”[“社会生物学或社会生态学”，**Which way for the Ecology Movement?**, 第 58 页] 因此，使人类社会变得独特的东西被随便地忽略了；而社会中真正的权力来源，被隐藏在

基因的屏障之下。

当然，对“人性”（或更糟糕的社会生物学）的呼吁所进行的各种各样辩护，是自然的，因为每个统治阶级都需要去证明他们的统治权。因此，他们支持那些，以看似证明了精英权力的方式去定义统治权的学说——无论是社会生物学、神权、原罪，等等。显然，这种学说一直是错误的……当然，直到现在也是。因为很明显，我们目前的社会真正地符合“人性”，而且已经被我们目前的科学祭司科学地证明了！

这种说法的傲慢确实令人吃惊。历史并没有停止。一千年后，社会将完全不同于目前的情况，也不同于任何人所能想象到的情况。目前存在的政府都不会依然存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也不会存在。唯一可能保持不变的是，人们仍然会宣称他们的新社会是完全符合人性的“唯一真正的系统”，即使以前所有系统都不是这样。

当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不会想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会从相同的事实中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更有道理。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没有想到，“客观的”科学家的理论，可能是在他们所处社会的主导思想背景下形成的。然而对于无治主义者来说，在沙皇俄国工作的科学家们发展了一种基于物种内部合作的进化理论，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英国的同行们发展了一种基于物种内部和物种之间竞争性斗争的理论。当然，后者的理论反映了英国社会的主流政治和经济理论（特别是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这纯属巧合。

例如，克鲁泡特金的经典作品《互助论》，就是为了回应英国达尔文主义代表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明显不准确的描述而写的。克鲁泡特金基于俄国对当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主流批评之上，（用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群体或物种内的“互助”、与这些群体或物种内个人之间的“相互的斗争”一样重要（内容详情和对之的评价，见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其 **Bully for Brontosaurus** 一书中的文章“克鲁泡特金并非疯子”）。他强调，这是进化中与竞争并存的一个“因素”，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因素对生存更为重要。因此，合作与竞争一样是“自然的”，这就证明了“人性”并非是无治主义的障碍；因为物种成员之间的合作，可以是对个人有利的最佳途径。

总结一下。无治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并不违背“人性”，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被认为是“人性”的东西是由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我们创造的关系决定的。这意味着等级制社会将会鼓励某些个性特征占主导地位，而无治主义社会会鼓励其他个性特征。因此，无治主义者“与其说是依赖人性会改变的事实，不如说是依赖同一人性在不同环境下会有不同行为的理论。”其次，变化“似乎是存在的基本规律之一”，所以“谁能说人类已经达到了他[原文如此]的可能性的极限。”[乔治-巴雷特，**Objections to Anarchism**，第 360-1 页和第 360 页]

关于无治主义者对人性看法的有用的讨论（它们都驳斥了无治主义者认为人性本善的想法），见 Peter Marshall 的“人性和无治主义”[David Goodway（编辑），**For Anarchism: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第 127-149 页]和大卫-哈特利的

“无治主义共同体和人性”。[*Anarchist Studies* 第 3 卷第 2 期，1995 年秋，第 145-164 页]。

A.2.16 无治主义的运转需要“完美”的人吗？

不是。无治状态不是乌托邦、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它将是一个人类的社会，具有和人类相关的所有问题、希望和恐惧。无治主义者并不认为人类需要“完美”才能使安那其状态运转——他们只需要是自由的。因此，克里斯蒂和梅尔策说到：

“[一个]常见的谬论[是]，革命社会主义[即无治主义]是对工人的‘理想化’，[因此]仅仅陈述他们现在的缺点就是对阶级斗争的驳斥……一个自由社会……没有道德或伦理上的完美就可以存在，这在道德上似乎不合理。但就推翻[现有的]社会而言，我们可以忽略人们具有缺点和偏见的事实，只要它们没有变得制度化。我们可以毫不担心地看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工人在获得”知识分子“的社会风度或摆脱当前社会的——从家庭纪律到仇外心理的——所有偏见之前，可能早就实现了对其工作场所的控制。只要他们能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经营工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偏见在自由中枯萎，只有在社会气候对它们有利的时候才会‘盛放’……我们要说的是……一旦生活可以在没有来自上面强加的权威的情况下继续下去——在劳工撤出他们的服务后，强加的权威将无法生存，专制主义的偏见将消失。除了自由的教育过程之外，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The Floodgates of Anarchy*，第 36-7 页]

不过很明显，我们认为自由社会将会培养出更能将自己的个性与需求、与他人的个性与需求相协调的人，从而减少个人冲突。剩下的争端将通过合理的方法来解决，例如，使用陪审团、互助的第三方集体，或者社区和工作场所的集会加以解决（见 I.5.8 节，讨论如何对反社会活动以及争端进行处理）。

如同“无治主义是反对人性”的论点（见 [A.2.15 节](#)），无治主义的反对者通常会假设“完美”的人——当被置于权力地位时不会被权力腐蚀的人；奇怪地不受等级制度、特权等的扭曲影响所作用的人。然而，无治主义者并没有对人类的完美性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只是认识到，因为人并不完美，把权力交到一个人或一个精英手中绝不是一个好主意。

应该指出的是，无治主义需要一个（完美的）“新”人类的想法，常是无治主义的反对者提出来以诋毁它（而且，通常是为保留等级制度的权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辩护）。毕竟，人是不完美的，也不可能成为完美的。因此，他们抓住每一个政府倒台和由此产生的混乱的例子，来依此否定无治主义，认为它是不现实的。媒体喜欢在“法律和秩序”受到破坏和发生抢劫的时候，宣布一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无治主义者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原因，因为诋毁者犯了一个基本错误，那就是假设一个没有无治主义者的无治主义社会！（另一种

同样意义的说法是，无治主义者的无治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存在的社会。右翼的“无治主义”资本家提出了这个变种的说法，以诋毁真正的无治主义。然而，他们的“反对”反而否定了他们自己作为无治主义者的主张，因为他们隐含地假定了一个没有无治主义者的无治主义社会！)。不用说，一个由仍然认为需要权威、财产和国家主义的人所组成的“无治主义”，很快又会变成专制主义（即非无治主义）。这是因为即使政府明天就消失了，同样的制度也会很快再次成长起来，因为“政府的力量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人民。一个大暴君可能是一个傻瓜，但不是一个超人。他的力量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人民的迷信，认为服从他是正确的。只要这种迷信存在，就算一些解放者砍掉暴政的头颅，也是没有用的；人民会创造出另一个暴政，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依赖自己以外的东西。”[乔治·巴雷特，**Objections to Anarchism**，第 355 页]

因此，亚历山大·伯克曼说到：

“我们的社会机构是建立在某些观念之上的；只要这些观念被普遍相信，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机构就是安全的。政府仍然强大，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权威和法律强制力是必要的。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认为是适当的和公正的，资本主义就会延续下去。削弱当今压迫性的条件与思想，就意味着政府和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What is Anarchism?*，第 xii 页]

换句话说，无治状态需要无治主义者去创造、并让它继续生存下去。但他们不一定是完美的，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从命令-服从关系和“资本主义产权是必要的”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无治主义需要“完美”的人的想法中隐含的假设是，自由可以被给予，而不是被剥夺；因此，明显的结论是，要求“完美的”人的无治主义将会失败。但这个论点忽略了一点：为了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自我活动和自我解放。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历史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彼得·克鲁泡特金，**Act for Yourselves**，第 85 页] 思想通过斗争而改变，因此，在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我们不仅改变了世界，也同时改变了自己。因此，正是争取自由的斗争，造就了能够为自己的生活、社区和地球承担责任的人民。人们能够平等地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因此这就使安那其状态成为可能。

因此，当政府消失时而经常出现的混乱，并不是安那其状态，事实上也不是反对无治主义的理由。它只是意味着创建无治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条件并不存在。无治状态是社会核心集体斗争的产物，而不是外部冲击的产物。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治主义者不认为这样一个社会会在“一夜之间”出现。相反，我们认为无治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它如何运作的来龙去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经验和客观情况不断发展，而不是会立即出现一个完美的形式（见 H.2.5 节对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讨论）。

因此，无治主义者不会得出结论说，“完美”的人是无治主义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为无治主义者“不是具有解放人类的神圣使命的解放者，而是人类的正朝着自由的方向奋斗的、人类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说，无治主义革命是某种现成的、可以被用外部手段强加给人民的革命，那么人民会确实地拒绝他，

并重建旧社会。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发展了他们的自由观念，并自己摆脱了暴政的最后堡垒——政府，那么革命也确实会永久地完成。” [George Barrett, *Op. Cit.*, p. 355]

这并不是说，无治主义社会必须等到每个人都成为无治主义者。远非如此。例如，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突然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并自愿放弃他们的特权，这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面对大规模的、不断增长的无治主义运动，统治精英们总是利用镇压来捍卫其社会地位。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见 [A.5.6 节](#)）和意大利（见 [A.5.5 节](#)）的使用，显示了资本主义阶级可以沉沦到何种程度。无治主义将在少数统治者的反对下产生，因此，它需要捍卫自己，反对重建权威的企图（见 H.2.1 节，驳斥马克思主义声称“无治主义者反对有必要在反革命的情况下捍卫无治主义社会”）。

相反，无治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活动的重点放在说服那些受压迫和剥削的人，告诉他们自己不仅有能力去抵制社会制度及其成因，而且可以通过摧毁这两者来最终终结它们。正如马拉特斯塔所认为的，“我们需要群众的支持，以建立一支有足够力量的部队，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来实现我们彻底改变社会有机体的具体任务。我们必须贴近群众、接受现在的群众，并从他们的队伍中尽可能地寻求‘推动’他们前进。”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p. 155-6] 这将创造使（社会）迅速向无治主义演变的可能条件，因为最初被少数人接受的东西，“但越来越多地找到大众的表达方式，将在人民群众中实现”，“少数人将成为人民，成为广大群众，而这个群众起来反对财产和国家，将向无治共产主义迈进。” [克鲁泡特金, *Words of a Rebel*, 第 75 页] 因此，无治主义者非常重视传播我们的思想，为无治主义辩护。这就从那些质疑资本主义和国家的不公正的人中，创造了有意识的无治主义者。

等级制社会的性质，和受制于它的人中自然形成的抵抗力，帮助了这一进程。无治主义思想通过斗争自发发展。正如我们在 [1.2.3 节](#) 中所讨论的，无治主义组织，往往是作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建立的；而压迫和剥削是每个等级制度的标志，并且有可能成为少数社会的框架。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创建自由意志主义的制度都具有可能性。一个民族的经历可能会让他们得到无治主义的结论，也就是意识到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少数富人和权贵，并剥夺多数人的权力。虽然需要它来维持阶级和等级社会，但不需要它来组织社会，也不可能为所有人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来组织。这是有可能的。然而，如果没有清醒的无治主义者存在，任何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都有可能被寻求对大众的政治权力的政党或宗教团体所利用、滥用并最终摧毁（俄国革命是这个过程中最著名的例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组织起来影响斗争，传播我们的思想（详见 J.3 节）。因为只有当无治主义思想“获得主导性的影响”并“被足够多的人口所接受”时，我们才“实现了无治状态，或向无治状态迈出了一步”。因为无治状态“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而强加于人民。” [Malatesta, *Op. Cit.*, p. 159 and p. 163]。

因此，总而言之，无治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不取决于人们是否完美，而是取决于大多数人是否是无治主义者、并希望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重组社会。这不会

消除个人之间的冲突，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创造出完全成型的无治主义人性；但对于那些彻底改变了参与者的、争取社会变革所做的斗争，所遗留下来的任何偏见或者反社会行为——它将为这些的逐步消除奠定基础。

A.2.17 为了运作一个自由社会，大多数人不是太愚蠢了吗？

我们很抱歉要把这个问题列入无治主义 FAQ，但我们知道，许多政治意识形态，明确地假定普通人太愚蠢，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和管理社会。资本主义政治议程的所有方面，从左派到右派，都有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无论是列宁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费边主义者还是客观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少数人有创造力和智慧，这些人应该管理其他人。通常，这种精英主义被关于“自由”、“民主”和其他陈词滥调的优美流畅的言辞所掩盖——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告诉人们他们想听的东西，来借此钝化人们的批判性思维。

当然，那些相信“天然”精英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最高层，这一点也不奇怪。例如，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客观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二手货”大军中的一员（听到那些只是鹦鹉学舌重复安·兰德对其他人的批判时，总是很有趣！），或者认为自己将会在“真正”资本主义的未知的“理想”中做一个厕所清洁工。每个正在阅读精英主义语句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是“被精选的少数人”中的一分子。在一个精英主义社会中，认为精英的存在是天然的、而自己是其中一个潜在的成员——这种观念是“合理”的！

对历史的考察表明，存在一种基本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它使得所有自青铜时代开始出现的国家和统治阶级，得到了至关重要的合理化（“如果统治的遗产除了支持等级和阶级利益之外还有任何更广泛的目的，那就是试图将对公共能力的信念从社会话语本身驱除。”[布克钦，**The Ecology of Freedom**，第 206 页]）。这种意识形态只是改变了它的外衣，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它的基本内在内容。

例如，在欧洲中世纪（the Dark Ages），它被染上了基督教的色彩，适应了教会等级制度的需要。对牧师精英来说，最有用的“神启”教条就是“原罪”：即人类基本上是堕落和无能的生物，需要“来自上天的指示”；而牧师，就是普通人和“上帝”之间方便的、必要的调解人。普通人基本上是愚蠢的，因此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想法，就是这种教义的延续，是那个黑暗时代的遗物。

对于所有那些声称大多数人是“二手货”或不能发展出比“工会意识”更多的东西的人——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荒谬的说法，甚至经不起对历史、特别是劳工运动历史的哪怕是肤浅的推敲。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的创造性力量，往往是真正令人惊讶的；而如果在“正常的”社会中看不到这种智慧的力量和灵感，这

就是对等级制度和权威所产生的一致性致命影响的一一最清楚的控诉。(更多关于等级制度的影响, 见 [B.1 节](#))。正如 Bob Black 所指出的:

“你做什么, 你就是什么。如果你做枯燥、愚蠢、单调的工作, 很可能你最终会变成枯燥、愚蠢、单调的人。与电视和教育等重要的白痴化机制相比, 工作能更好地解释我们周围毛骨悚然的愚化现象。那些一生都被束缚的人, 从学校开始就被交给工作, 开始时在家庭中被分级, 最后在养老院被分级; 他们习惯于等级制度, 在心理上被奴役。他们的自主能力是如此萎缩, 以至于他们对自由的恐惧, 是他们少数的基于理性的恐惧症之一。他们在工作中接受的服从训练, 会延续到他们建立的家庭中, 从而以更多的方式复制这个系统, 并进入政治、文化和其他一切领域。一旦你在工作中耗尽了人们的活力, 他们很可能在所有事情上服从于等级制度和专业知识。他们已经习惯于此”。[*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 第 21-2 页]

当精英们试图构想解放时, 他们只能想到解放是由善良的(对列宁主义者而言)或愚蠢的(对客观主义者而言)精英们, 给予被压迫者的。那么, 它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自我解放, 才能产生一个自由的社会。权威的压迫和扭曲作用, 只有通过自我行动才能克服。少数这种自我解放的例子证明, 大多数人, 曾经被别人认为没有掌握自由的能力, 却能胜任这项任务。

那些宣称自己“高人一等”的人这样做, 往往是担心一旦人们从权威的衰弱之手中解放出来, 意识到用麦克斯·施蒂纳的话说, “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在跪着。让我们, 站起来”

正如艾玛·戈尔德曼在谈到女性平等时所说: “妇女在各行各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使妇女低人一等的闲言碎语永远消失了。那些仍然坚持这种迷信的人, 是因为他们最讨厌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这是所有权威的特点, 无论是主人对他的经济奴隶, 还是男人对女人。然而, 在任何地方, 妇女都在逃离她的牢笼, 在任何地方, 她都在自由地、大步地前进。” [*Vision on Fire*, 第 256 页] 同样的评论适用于, 例如, 西班牙革命期间非常成功的工人自我管理的实验。

那么, 当然, 认为人们太愚蠢, 所以无治主义不可能起作用的观点也会反作用于那些主张它的人。比如, 以那些用这个论点来主张民主政府而不是无治主义的人为例。正如路易吉·加莱尼所指出的, 民主, 意味着“承认人民有权利和能力来选择他们的统治者。”然而, “谁有选择自己[或她]的统治者的政治能力, 就意味着也有能力没有他们, 特别是当造成经济敌意的原因被根除时。” [*The End of Anarchism?*, 第 37 页] 因此, 支持民主反对无治主义的论点反而破坏了自己, 因为 “如果你认为这些有价值的选民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利益, 他们怎么会知道如何为自己选择必须引导他们的牧羊人呢? 他们又如何能从一大群傻瓜的选票中选举产生一个天才, 从而解决这个社会炼金术 (social alchemy) 的问题?” [Malatesta, *Anarchy*, pp.53-4]

至于那些认为独裁是解决人类愚蠢的办法的人, 有一个问题随之而来: 为什么这些独裁者对这一明显的人类普遍特征免疫? 而且, 正如马拉特斯塔指出的,

“谁是最优秀的？又是谁来认可他们的这些品质？”[同上，第 53 页] 如果他们将自己强加给“愚蠢”的大众，为什么要假定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和压迫多数人呢？或者说，为什么要假设他们比大众更聪明？独裁和君主制政府的历史对此类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类似的论点也适用于其他非民主制度，例如那些基于有限选举权的制度。例如，洛克（即古典自由主义或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关于基于财产所有者统治的国家的理想，注定只是一个压迫大多数人以维持少数富人的权力与特权的政权而已。同样，将资本家精英视为唯一理性的“精英”（即“客观主义者”的愿景），也暗示了一个远不如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完美制度。这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容忍那些，把他们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的压迫性老板。因为如果你从根本上将人们视为“未开化的部落”，又怎么能指望他们认识到并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不可能两全其美，纯资本主义的“未知理想”将和“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一样地肮脏、压迫和异化。

因此，无治主义者坚信，基于大众缺乏能力而反对无治主义的论点，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不是公然地自我服务）。如果人们对无治主义来说太愚蠢，那么他们对你所关心的任何制度来说都太愚蠢。归根结底，无治主义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是反映了等级社会产生的奴性心态，而不是对人类和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的真正分析。引用卢梭的话：

“当我看到众多完全赤身裸体的野蛮人蔑视欧洲人的奢侈，忍受饥饿、火焰、刀剑和死亡，只为维持他们的独立——我觉得不再有必要去让奴隶论证自由。”[引自诺姆·乔姆斯基，*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第 780 页]。

A.2.18 无治主义者支持恐怖主义吗？

不，这有三个原因。

[首先，]恐怖主义意味着要么针对、要么不在乎杀害无辜的人。而无治主义的存在，必须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创造。一个人不能通过炸翻人们来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思想。其次，无治主义是关于自我解放的。而一个人不能炸毁一种社会关系。自由，不能由少数精英代表大多数人破坏统治者的行动来创造。简单地说，“基于几个世纪历史的结构体系，无法用几公斤的炸药来摧毁。”[克鲁泡特金，由 Martin A. Millar 引用，*Kropotkin*，第 174 页] 只要人们觉得需要统治者，等级制度就会存在（关于这一点，见 [A.2.16 节](#)）。正如我们前面所强调的，自由不能被给予，只能被剥夺。最后，无治主义的目标是自由。因此，巴枯宁说：“当一个人为了人类的解放而进行革命时，他应该尊重人们的生命和自由。”[引自 K.J. Kenafick,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p. 125]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手段决定目的，恐怖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侵犯了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不能用来建立无治主义社会。比方说，俄国革命的历史证实了克鲁泡特金的见解：“如果未来的革命只能靠恐怖来取得胜利，那就非常可悲了。”[由 Millar 引用，同上，第 175 页]

此外，无治主义者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导致某些个人对他人拥有权力、

并滥用（即使用）这种权力的——制度和社会关系。因此，无治主义革命是要破坏结构，而不是破坏人。正如巴枯宁所指出的，“我们希望的，不是杀死人，而是废除地位及其特权”，无治主义“并不意味着构成资产阶级的个人的死亡，而是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经济上不同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实体的死亡。” [The Basic Bakunin, 第 71 页和第 70 页]换句话说，“你不能炸毁一种社会关系”（引用一本介绍无治主义者反对恐怖主义的小册子的标题）。

那么，无治主义是如何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呢？部分原因是国家和媒体坚持把不是无治主义者的恐怖分子称为无治主义者。例如，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派经常被称为“无治主义者”，尽管他们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幸的是，抹黑是有效的。同样，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熟悉无治主义运动的人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治主义者不得不承受的大量[暴力]行为，要么源于资本主义报刊，要么是由警察煽动的，即使不是直接实施的。” [Red Emma Speaks, 第 262 页]

从目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一个例子。例如，在西雅图，媒体报道了抗议者（尤其是无治主义者）的“暴力”，但这不过是几扇破窗而已。警察对抗议者的实际暴力要大得多（顺便说一句，这要早于打破一扇窗户之前），但却不被认为值得评论。后来媒体对反全球化示威的报道也遵循了这一模式，将无治主义与暴力牢牢联系在一起，尽管抗议者在国家手中遭受了最大的暴力。正如无治主义活动家 Starhawk 所指出的，“如果打破窗户和在警察攻击时进行反击是‘暴力’，那么给我一个新词，一个语气还要强大一千倍的词，去在警察把不反抗的人打成昏迷时使用。” [Staying on the Streets, 第 130 页]。

同样，在 2001 年的热那亚抗议活动中，主流媒体把抗议者说成是暴力分子，尽管是国家杀死了其中一个人，并使成千上万的人住院。媒体没有提到在制造暴力方面，警察的挑衅者的存在。正如 Starhawk 事后指出的，在热那亚，“我们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家恐怖主义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包括造谣、使用渗透者和挑衅者、与公开的法西斯团体勾结……、故意将非暴力团体作为催泪瓦斯和殴打的目标、警察的普遍暴行、对囚犯的酷刑、对组织者的政治迫害……他们公开地做了所有这些，表明他们不担心反响，期待来自最高层的政治保护。” [Op. Cit., pp. 128-9] 毫不奇怪，媒体没有报道这一点。

在随后的抗议活动中，媒体沉溺于更多的反无治主义的炒作，编造故事，把无治主义者说成是充满仇恨的、计划实施大规模暴力的人。例如，2004 年在爱尔兰，媒体报道说无治主义者计划在都柏林与欧盟相关的庆祝活动中使用毒气。当然，这种计划的证据并没有出现，也并没有发生这种行动。媒体所说的无治主义者正在组织的暴乱，也同样没有发生。类似的错误信息过程，也包括伦敦的反资本主义“五一”示威，和纽约的反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尽管在事件发生后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媒体总是在刊登无治主义暴力的骇人故事（甚至编造西雅图等地的事件，以证明他们的文章是正确的，并进一步妖魔化无治主义）。因此，无治主义等同于暴力的流言，就这样被延续了下来。毋庸讳言，那些大肆宣扬（不存在的）无治主义暴力威胁的报纸，对这些事件中发生的警察对示威者的实际的暴力和镇压，保持沉默。他们也没有在他们的（没有证据的）

厄运故事被后来的事件揭露为无稽之谈后，发表道歉声明。

这并不意味着无治主义者未曾实施过暴力行为。他们有过（其他政治和宗教运动的成员也有）。将恐怖主义与无治主义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无治主义运动中的“**行动宣传**”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 1880 年到 1900 年）的特点是，少数无治主义者暗杀统治阶级的成员（皇室成员、政治家等等）。更糟糕的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成员经常光顾的剧院和商店成为目标。这些行为被称为“用行动进行宣传”。1881 年俄国粹主义者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激发了无治主义者对这一策略的支持（这一事件促使约翰·莫斯特在 **Freiheit** 上发表了题为“终于！”的著名社论，庆祝弑君和对暴君的暗杀）。然而，无治主义者支持这一策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这是对针对工人阶级的镇压行为进行报复；其次，作为一种鼓励人们造反的手段，告诉他们的这些压迫者可以被打败。

考虑到这些原因，在法国政府对巴黎公社的残酷镇压导致两万多人死亡，并在其中许多无治主义者被杀害之后——行动宣传（的策略）在法国率先开始，就并不是巧合。有趣的是，虽然无治主义者为公社复仇而采取的暴力行动，相对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但国家对公社成员的大规模屠杀却相对不为人所知。同样，人们可能知道，意大利无治主义者盖塔诺·布雷西在 1900 年暗杀了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或者亚历山大·贝克曼在 1892 年试图杀死卡内基钢铁公司经理 Henry Clay Frick。但通常人们不知道的是，翁贝托的军队曾向抗议的农民开火并将其杀害，或者弗里克的平克顿公司也曾霍姆斯特德杀害了被困的工人。

这种淡化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暴力的做法并不令人惊讶。“国家的行为就是暴力，”麦克斯·施蒂纳指出，“它把自己的暴力称为‘法律’；把个人的暴力称为‘犯罪’。”[**The Ego and Its Own**, 第 197 页] 那么，无治主义者的暴力受到谴责，而引发它的镇压（往往是更严重的暴力）却被忽视和遗忘，就不足为奇了。无治主义者指出，指责无治主义者是“暴力”的说法是虚伪的，因为这种说法要么来自政府的支持者，要么来自实际的政府本身，政府“通过暴力产生，通过暴力维持自己的权力，并不断使用暴力来压制叛乱和欺凌其他国家。”[Howard Zinn, **The Zinn Reader**, p. 652]。

通过考虑非无治主义者对国家暴力的反应，我们可以感受到身边谴责无治主义暴力的虚伪性。例如，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许多资本主义报纸和个体，庆祝法西斯主义以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相比之下，无治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斗争，并试图暗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显然，支持凶残的独裁政权不是“暴力”和“恐怖主义”，但抵制这种政权才是！同样地，非无治主义者可以支持专制和独裁国家，支持战争，支持用暴力镇压罢工和骚乱（“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不被视为“暴力”。相反，无治主义者却被谴责为“暴力”和“恐怖分子”，因为他们中的少数人试图报复这种压迫、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暴力行为！类似地，如果有人谴责无治主义者的“暴力”，例如让西雅图产生了一些破损的窗户，却支持警察在实施国家统治时的实际暴力，或者更糟糕的是，支持美国在 2003 年入侵伊拉克——这些似乎是这种虚伪的极端例子。如果有人应该被认为是暴力，

那就是国家及其行动的支持者。但人们没有看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并“对国家所谴责的暴力类型表示谴责，并为国家所实施的暴力喝彩。” [克里斯蒂和梅尔策，**The Floodgates of Anarchy**，第 132 页]。

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并不支持这种策略。正如默里-布钦指出的那样，在那些进行“行为宣传”（有时称为“暗杀袭击” (attentat)）的人中，只有“少数……是无治主义团体的成员。大多数人……是独行侠。” [The Spanish Anarchists，第 102 页] 不用说，国家和媒体用同样的笔墨描绘所有的无治主义者。他们仍然这样做，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比如把这种行为归咎于巴枯宁，尽管在无治主义圈子讨论这种策略，或者把非无治主义团体称为无治主义者之前——他早已去世多年！）。

总而言之，无治主义的“行动宣传”阶段是失败的，绝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他“从不喜欢用行动宣传的口号，也没有用它来描述自己的革命行动思想。”然而，在 1879 年，当他仍然“敦促集体行动的重要性”时，他开始“对暗杀袭击表现出相当的同情和兴趣”（这些“集体行动的形式”被认为是在“工会和社区层面”采取的行动）。1880 年，他“变得不再专注于集体行动，对个人和小团体的反抗行为的这种热情有所增加。”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克鲁泡特金很快就“逐渐不重视孤立的造反行为”，特别是在“他看到在新的激进工会主义中发展集体行动的更大机会”之后。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p.92, p.115, p.129, pp.129-30, p.205] 到 1880 年代末和 1890 年代初，他开始不赞成这种暴力行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更恶劣的行为的强烈反感（如针对国家对参与 1892 年赫雷斯起义的无治主义者进行的谋杀，而策划的巴塞罗那剧院爆炸案；和针对国家镇压而进行的埃米尔-亨利的咖啡馆爆炸案）；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意识到这是对无治主义事业的阻碍。

克鲁泡特金认识到，19 世纪 80 年代的“泛滥的恐怖行为”导致了“当局对运动采取镇压性的行动”，并且“在他看来，这不符合无治主义的理想，对促进民众的反抗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此外，他“对运动与群众的隔离感到焦虑”，这种隔离“由于对”行动宣传（的）“专注，不减反增。”他“看到人民革命的最佳可能性是……在劳工运动中发展新的斗争精神。从现在开始，他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革命的少数派在群众中工作，以发展反抗精神的重要性。”然而，即使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即使在他对个人造反行为的支持度最高时（如果不是因为行动宣传的话），他也看到了集体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因此，“克鲁泡特金始终坚持劳工运动在革命前的斗争中的重要性。” [同上，第 205-6 页，第 208 页和第 280 页]

克鲁泡特金并不孤单。越来越多的无治主义者认为，“行动宣传”给了国家一个钳制无治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借口。此外，它给了媒体（和无治主义的反对者）一个机会，将无治主义与盲目的暴力联系起来，从而使许多人疏远这场运动。这种错误的联想一有机会就会被重新提起，而且不顾事实（例如，尽管个人无治主义者完全拒绝“用行动进行宣传”，他们也仍然被媒体污蔑为“暴力”和“恐怖分子”）。

此外，也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行动宣传”背后的假设，即每个人都在等待机会进行反叛——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们是他们所身处制度的产物；因此他们接受了用来维持该制度的大多数谎言。无论如何，随着行动宣传的失败，无治主义者转而回到大多数运动一直在做的事情：鼓励阶级斗争和自我解放的过程。从 1890 年后无治主义工会的兴起，可以看出这种对无治主义根源的回归（见 [A.5.3 节](#)）。这一立场自然而然地源自无治主义理论，与个人的暴力行为的思想不同：

“为了实现革命，特别是无治主义革命，[就]必须让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和力量；必须让他们准备好战斗，准备好把自己的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群众中实现这种思想状态，必须是革命者始终关注的问题，也是他们所有活动必须达到的目标……谁期望人类的解放不是来自所有进步的人类坚持不懈地、和谐地合作，而是来自一些偶然的或天助的英雄主义行为——谁就不会比那些，期望它来自一个聪明的立法者或一个常胜将军的干预的人，更明智。……我们的思想迫使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因为我们不相信有可能用武力强加于人，我们也不希望被命令……今天，这……是我们思想在逻辑上的结果，是我们对革命和社会重组的概念强加给我们的条件……[那就是]生活在人民中间，通过积极参加他们的斗争和痛苦，来赢得他们对我们思想的支持。”[埃里克-马拉特斯塔，“当前的职责”，第 181-3 页，**Anarchism**，罗伯特-格雷厄姆（编辑），第 180-1 页]

尽管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在策略上不同意行动宣传，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是恐怖主义，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考虑暗杀。在战争期间轰炸一个村庄，仅仅因为里面可能有敌人，这就是恐怖主义，而暗杀一个屠戮的独裁者或镇压性国家的首脑，充其量算是防御，最坏的情况是报复。正如无治主义者长期以来所指出的，如果恐怖主义是指“杀害无辜的人”，那么国家就是最大的恐怖分子（同时也拥有地球上最大的炸弹和其他破坏性武器）。如果实施“恐怖行为”的人真的是无治主义者，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伤害无辜的人，而绝不会使用“附带损害”这种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的、国家主义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行动宣传”行为都是针对统治阶级的个人，如总统和皇亲；并且是在此之前国家和资本主义暴力行动的一个后果。

所以，无治主义者实施过“恐怖”行为，这是一个事实。然而，这与无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毫无关系。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认为的，“不是无治主义本身，而是对 11 名钢铁工人的残酷屠杀，[这才]是促使亚历山大-伯克曼采取行动的原因。”[同上，第 268 页] 同样，其他政治和宗教团体的成员也实施过这种行为。正如伦敦的自由集团所认为的那样：

“当街上的人们辱骂无治主义者，或碰巧是他（她）讨厌的任何政党，认为他们导致了刚刚犯下的一些暴行时——他们总是忘记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自古以来，杀人暴行就是被激怒的、绝望的阶级和被激怒的、绝望的个人，对他们（她们）的同胞所遭受的无可容忍的不公的回应。这种行为是对暴力的猛烈反击，无论这个暴力是侵略性的还是镇压性的……其原因不在于任何特殊的信念，而在于……人性本身的深处。整个历史进程，包括政治和社会，都充满了这方面的证据。”[艾玛·戈尔德曼引用，同上，第 259 页]

许多其他政治、社会 and 宗教团体和政党都曾使用过恐怖主义。例如，基督徒、马克思主义者、印度教徒、民族主义者、共和党人、穆斯林、锡克教徒、法西斯主义者、犹太人和爱国者，都有过恐怖主义行为。这些运动或思想很少被贴上“恐怖主义性质”的标签，或被不断地与暴力联系起来——这表明无治主义对现状的威胁。没有什么比——对恶意的和/或消息不灵通的人，把那些相信和实践这种思想的人描绘成完全没有意见或理想的、只是疯狂地想破坏的、“癫狂的炸弹人”——更有可能使一种思想失去信誉和被边缘化。

当然，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等等都反对恐怖主义，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而且会产生反作用。这也正如绝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一样，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同样如此（认为）。然而，就我们而言，似乎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声明，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反对。

因此，总结一下——只有少数的恐怖分子曾经是无治主义者，只有少数的无治主义者曾经是恐怖分子。无治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一直认识到社会关系不可能被暗杀、或被炸得灰飞烟灭。与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暴力相比，无治主义的暴力只是沧海一粟。不幸的是，大多数人记住的是少数无治主义者实施暴力的行为，而不是促使这些行为的、国家和资本的暴力和镇压行为。

A.2.19 无治主义者持有怎样的伦理观？

无治主义者对伦理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一个个体需要在自己的内心发展自己的伦理感。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同意麦克斯-施蒂纳的观点，即个人必须将自己从现有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对这种道德提出质疑——“我决定这对我来说是否正确；在我之外没有正确。”[*The Ego and Its Own*, 第 189 页]。

然而，很少有无治主义者会达到施蒂纳那种程度，完全拒绝任何社会伦理的概念（说起来，施蒂纳确实重视一些普遍的概念，尽管它们是利己主义的概念）。对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这种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几乎和道德绝对主义一样糟糕（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观点，认为除了适合个人之外，没有正确或错误；而道德绝对主义的观点，则认为什么是正确和错误与个人的想法无关）。

人们经常声称，现代社会的解体是由于过度的“利己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这是不正确的。就道德相对主义而言，它比各种道德家和真正的信徒敦促社会的道德绝对主义更进一步，因为它以个人理性的想法为基础，无论多么渺小。然而，由于它否认了伦理的存在（或可取性），所以它只是它所反对的东西的镜像。这两种选择都不能赋予个人权利，也不能使人得到解放。

因此，这两种态度对独裁者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无法对事物形成意见（并且会容忍任何事情）的民众，或者盲目地听从统治精英命令的民众，对当权者来说都有很大的价值。大多数无治主义者都反对这两种做法，而赞成以人类理性为

基础的伦理学进化方法，以发展伦理学概念和人际共鸣，将这些概念概括为社会和个人的伦理态度。因此，无治主义的伦理学方法与道德相对主义中所隐含的批判性个人调查相同，但却将自己建立在对于对与错的共同感受上。正如蒲鲁东所主张的：

“所有的进步都是从废除某些东西开始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建立在对某些弊端的谴责上；每一个新的想法，都是建立在被证明不充分的旧的想法基础上。”

大多数无治主义者的观点是，伦理标准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这导致他们拒绝“上帝的律法”、“自然法”等各种概念，而支持一种基于个人完全有权质疑和评估他们周围世界的伦理发展理论——事实上，他们需要这样做才能真正自由。你不能成为一个无治主义者而盲目地接受任何东西！米哈伊尔-巴枯宁，无治主义思想家的创始人之一，这样表达这种激进的怀疑主义：

“没有任何理论，没有任何现成的系统，没有任何曾经写过的书可以拯救世界。我并不忠于任何体系。我是一个真正的探索者。”

任何不以个人的质疑为基础的伦理体系，只能是专制的。埃里希-弗洛姆解释了原因：

“从形式上看，专制伦理学否认一个人有能力知道什么是好的或坏的；规范的制定者总是一个超越个人的权威。这样的体系不是基于理性和知识，而是基于对权威的敬畏，基于主体的软弱和依赖感；将决策权交给权威的结果是后者的魔幻权力，它的决定不能也不许受到质疑。从物质上说，或者说从内容上说，专制主义伦理主要是以权威的利益而不是主体的利益来回答什么是好的或坏的问题；它是剥削性的，尽管主体可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利益，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Man For Himself, 第 10 页]。

因此，无治主义者在本质上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无治主义者在做出伦理判断时，不依靠精神援助的谬误，而是依靠他们自己思想的长处。这是通过逻辑和理性来完成的，是一条解决道德问题的更好途径，而不是像正统宗教那样过时的独裁体系；当然也比道德相对主义的“没有错或对”要好。

那么，伦理概念的来源是什么？在克鲁泡特金看来，“因此必须承认大自然是人类的第一个伦理学老师。人和所有社会动物与生俱来的社会本能，——这是所有伦理观念和所有之后道德发展的起源。” [Ethics, 第 45 页]

换句话说，生活是无治主义伦理学的基础。这意味着（根据无治主义者的观点），从本质上讲，个人的伦理观点来自三个基本来源：

1) 来自个人所处的社会。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人的道德观念完全取决于他们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所采取的社会生活形式……这种（社会生活），反映在人的道德观念和特定时代的道德学说中。” [同上, 第 315 页]换句话说，就是生活和生存的经验。

2) 个人对其社会伦理规范的批判性评价, 正如上文所述。这是埃里希-弗洛姆论点的核心: “人必须接受对自己的责任, 以及只有利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的事实.....除了人通过展开自己的力量、通过富有成效地生活而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外, 没有任何生命的意义。”[*Man for Himself*, p. 45] 换句话说, 个人的思想和发展。

3) 共情的感觉——“道德情感的真正起源.....。仅仅(是)在同情心的感觉中。”[“无治主义道德”, *Anarchism*, 第 94 页]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人和他人感受与分享经验和概念的能力。

这最后一个因素对于伦理感的发展非常重要。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 “你的想象力越强大, 你就越能向自己描绘任何生命在遭受痛苦时的感受, 你的道德感就越强烈和细腻.....。你越是适应于环境、适应于你周围的人, 或是适应你自己强烈的思想和想象力, 去按照你自己的思想和想象力的要求行事, 道德情感就越是在你心中增长, 越是成为惯常。” [同上, 第 95 页]

所以, 无治主义(本质上)是基于 “在类似情况下, 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 你就怎么对待别人 ” 的伦理格言。在道德立场上, 无治主义者既不是利己主义者, 也不是利他主义者, 他们仅仅只是人类。

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 “利己主义” 和 “利他主义” 的根源都在于同一个动机——“无论这两种行为在人性的结果上有多大差别, 动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快乐的追求。” [同上, 第 85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 一个人的伦理感必须由自己来培养, 并且需要作为社会团体的一部分、作为社区的一部分, 充分发挥个人的精神能力。由于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权威削弱了个人的想象力, 减少了他们在死气沉沉的等级制度下行使其理性的渠道, 以及破坏了社区; 这就难怪资本主义下的生活, 会出现明显的无视他人和缺乏伦理的行为。

与这些因素相结合的是社会中不平等所发挥的作用。没有平等,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 因为 “正义意味着平等.....只有那些视他人为与其平等的人才能遵守这样的规则: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农奴主和奴隶商显然不能承认.....对农奴[或奴隶]的 ‘定言令式’^① [把人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 是因为他们不把他们看作是平等的。”因此, “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维持某种道德水平的最大障碍, 在于缺乏社会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 正义感就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发展, 因为正义意味着对平等的承认。” [彼得-克鲁泡特金, *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第 88 页和第 79 页]

资本主义和任何社会一样, 得到了它应有的伦理行为。

^① 译注: 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 是德意志哲学家康德在 1785 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中所提出的哲学概念。他提出, 客观原则对意志进行理性命令的程式, 叫做 “令式”(imperative)。如果某种行为无关于任何目的, 而出自纯粹客观的必然性, 那么这种令式才是 “定言令式”。如果行为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则被康德称为 “假言令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

在一个于道德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游走的社会，难怪自我主义(egotism)会与利己主义(egoism)相混淆。通过剥夺个人发展自己的伦理观念的权力，转而鼓励对外部权威的盲目服从（一旦个体认为他们没有那个权威的权力，就会出现道德相对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确保了个性和自我的贫困化。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那样：

“现代文化的失败不在于它的个人主义原则，不在于道德美德等同于追求自我利益的想法，而在于自我利益意义的退化；不在于人们过于关注自我利益，而在于他们对真正自我的利益关注不够；不在于他们过于自私，而在于他们不爱自己”。[Man for Himself, 第 139 页]

因此，严格来说，无治主义建立在一个利己主义的参照系之上——伦理观念必须是作为一个“什么会给我们这个整体的（包括理性和感性的，理智和同情的）个体带来快乐”（的问题）的表达。这导致所有无治主义者拒绝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这种错误划分，并认识到许多人（例如，资本家）所谓的“利己主义”，会导致个人的自我否定和个人自我利益的减少。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

“在动物和人类社会中演变的道德，如果不是为了反对促进狭隘的利己主义，并以发展利他主义的精神来培养人类，那么它所追求的是什么？‘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表述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可能有一个没有个人快乐——也就是利己主义掺杂的、纯粹的利他主义。因此，更正确的说法是，伦理学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习惯，削弱狭隘的个人习惯。这些最后的习惯使个人通过对自己的重视而忽略了社会，因此它们甚至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即个人的福利，而培养共同工作的习惯和一般的互助习惯则会在家庭和社会中产生一系列有益的后果。” [Ethics, 第 307-8 页]

因此，无治主义的基础是拒绝道德绝对主义（即“上帝的律法”、“自然法”、“人的天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和道德相对主义容易导致的、狭隘的自我主义。相反，无治主义者认识到，在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之外，才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概念。

这是因为人类的社会性质。根据克鲁泡特金的说法，个体之间的互动确实地发展成了一种社会准则，可以概括为“这对社会有用吗？那么它就是好的。对它有害的吗？那就是坏的。”然而，人类认为哪些行为的正确与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什么是有用的或有害的评估……会发生变化，但其基础是不变的。” [“Anarchist Morality”, 同上, 第 91 页和第 92 页]。

这种基于批判精神的共情感，是社会伦理的根本基础——“应该是什么”，可以被看作是客观的“是什么”的、真理性或有效性的伦理评判标准。因此，在认识到伦理在自然界的根源的同时，无治主义者认为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类思想——是由个人创造的生活、思想和进化、并由社会生活和社区所普遍化的产物。

那么，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什么是不合伦理的行为？基本上任何否认历史上最宝贵的成就的行为：否认个人的自由、独特性和尊严的行为。

个人可以看到哪些行为是不合伦理的，因为由于移情作用，他们可以让自己换位到那些遭受这种行为的人的位置上。限制个性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不合伦理的，这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首先，保护和发展所有人的个性可以丰富每个人的生活，而且由于它产生的多样性，它给个人带来快乐。伦理学的这种利己主义基础，加强了第二个（社会层面上的）理由，即个性对社会有益，因为它丰富了社区和社会生活，巩固了它，并使它能够成长和发展。正如巴枯宁不断主张的那样，进步的标志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或者用赫伯特-瑞德的话说，它“是由一个社会中的差异化程度来衡量的。如果个人是企业集团中的一个单元，他[她]的生活将是受限的、枯燥的和机械的。如果个人是他[她]自己的一个单元，有独立行动的空间和潜力……他可以发展——在这个词的唯一真正意义上发展——在力量、活力和快乐的意识中发展。”[“The Philosophy of Anarchism,” **Anarchy and Order**, 第 37 页]。

这种对个性的捍卫是从自然界中学到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多样性就是力量；因此，生物多样性成为对基本伦理洞察力的来源。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中提供了一个指南，“帮助我们区分我们的哪些行为是为自然进化的主旨服务的，哪些行为是阻碍它们的。”[穆雷-布克钦，**The Ecology of Freedom**, 第 442 页]。

所以，伦理观念“存在于整个动物世界和公平观念中，所固有的社会性感觉，它构成了人类理性的基本初级判断之一。”因此，无治主义者拥护“**双重趋势**”的永久性存在——一方面，是**社会性**的更大发展；另一方面，是随之而来的生活强度的增加，这导致了**个人**幸福的增加，以及身体、智力和道德的进步。”[克鲁泡特金，**Ethics**, 第 311-2 页和第 19-20 页]。

无治主义者对权威、国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等的态度，都来自于我们的伦理信仰：即个人的自由是首要关注的问题，以及我们与他人产生共鸣的能力、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的基本平等和共同个性）。

因此，无治主义，将个人对特定环境和行动的主观评价，与基于移情边界和平等者之间的讨论对这些评价得出的客观人际结论，结合起来。无治主义基于对伦理观念采取人文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随着社会和个人的发展而发展。因此，一个**合乎伦理**的社会是这样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将被尊重，甚至被促进，作为丰富经验与现象的、统一性的元素……[差异者]将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一个个别部分，因为它的复杂性而使整体更加丰富。”[Murray Bookchin, **Post Scarcity Anarchism**, p. 82]。

A.2.20 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是无神论者？

事实上，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他们拒绝神的概念，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尤其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在世俗化的西欧国家，宗教已经失去了它

曾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这往往使无治主义的激进无神论看起来很奇怪。然而，一旦理解了宗教的负面作用，自由意志主义无神论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正是由于宗教及其制度的作用，无治主义者花了不少时间来驳斥宗教的理念、以及宣传反对它。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无治主义者拥护无神论？最简单的答案是，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之所以是无神论者，是因为它是无治主义思想再逻辑上的延伸。如果无治主义是对非法权威的拒绝，那么它也就是对所谓终极权威——上帝的拒绝。无治主义的基础是理性、逻辑和科学思维，而不是宗教思维。无治主义者往往是怀疑论者，而不是信仰者。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认为教会充满了虚伪，而圣经是一部充满了矛盾、荒谬和恐怖的、虚构的作品。它对妇女的贬低和其性别歧视都是臭名昭著的。然而男人的待遇也好不了多少。圣经中没有一处承认人类拥有生命、自由、幸福、尊严、公平或自治的，固有权利。在《圣经》中，人类是罪人、蠕虫和奴隶（无论比喻上和字面上，因为它纵容奴隶制）。上帝拥有所有的权利，人类则什么都不是。

考虑到宗教的性质，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巴枯宁说得最好：

“上帝的观念意味着放弃人类的理性和正义；它是对人类自由的最决然的否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然以人类的被奴役而结束。

“那么，除非我们希望人类被奴役和堕落.....否则我们不能，一定不能对神学的上帝或形而上学的上帝做出丝毫的承认。凡是在这个神秘的字母表中以 A 开头的，将不可避免地以 Z 来结束；凡是渴望崇拜上帝的人必须不能对物质抱有任何幼稚的幻想，只能勇敢地放弃他的自由和人性。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人就是奴隶；现在，人可以而且必须是自由的；那么，上帝就并不存在。” **[God and the State, 第 25 页]**

那么，对于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由于宗教的性质，无神论是必要的。巴枯宁认为，“把人性中所有宏伟、公正、崇高和美丽的东西宣称为神圣的东西，就是默认人性本身无法创造它——也就是说，如果抛弃它自身，人性自有的本性是悲惨的、不公的、卑贱的和丑陋的。因此，我们回到了所有宗教的本质——换句话说，就是为了神性的更大荣耀而贬低人性。”因此，为了公正地对待我们的人性和它所具有的潜力，无治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摒弃上帝的有害神话和它所带来的一切，因此，为了“人类的自由、尊严和繁荣，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从天堂收回它所窃取的东西，并将它们送回地球。” [同上，第 37 页和第 36 页]

除了理论上对人类及其自由的贬低，从无治主义的角度来看，宗教还有其他更实际的问题。首先，宗教一直是不平等和压迫的来源。例如，基督教（就像伊斯兰教一样），只要它拥有任何政治或社会影响力，就一直是一种压迫的力量（相信你有一条通往上帝的直达路线，是建立一个专制社会的可靠途径）。近两千年来，教会一直是社会压迫、种族灭绝的力量，和为每个暴君的辩护。只要有会，它就会像任何君主或独裁者一样进行残酷的统治。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上帝就是一切，现实世界和人类什么也不是。上帝是真理、正义、善良、美丽、力量和生命，人是虚伪、不义、邪恶、丑陋、无能和死亡。上帝是主人，人是奴隶。他没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正义、真理和永恒的生命，只有通过神的天启才能获得它们。不过凡是提到天启的，都要提到上帝自己所感召的启示者、救世主、先知、牧师和立法者；而这些人作为人性的神圣导师，由上帝亲自挑选，引导人类走上救赎之路——就必然行使绝对的权力。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被动的，并对他们无限地服从；因为在神圣的理性面前，没有人类的理性，而反抗了上帝的正义，就没有地上的正义。” [巴枯宁，同上，第 24 页]。

基督教只有在没有权力的时候才会变得宽容和爱好和平，即便如此，它继续扮演着为强权辩护的角色。当教会不是压迫的源头时，它在仍为压迫辩护并确保压迫继续存在，这就是无治主义者反对教会的第二个原因。它通过认可世俗权威的统治、和教导劳动人民与这些权威斗争是错误的，使工人阶级世代处于奴役之中。世俗的统治者从天主那里获得了合法性，无论是政治上的（声称统治者因上帝的旨意而掌权）还是经济上的（富人得到了上帝的赏赐）。圣经赞扬服从，将其提升为一种伟大的美德。最近的创新，比如新教的工作伦理，同样促进了对劳动人民的奴役。

宗教被用来促进权贵的利益，这一点可以迅速地大部分历史中看出。它通过极力主张被压迫者驯顺并等待在天堂获得回报，从而使被压迫者习惯于恭顺地各安其位。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认为的，基督教（就像一般的宗教）“不包含任何对权力和财富的制度有危险的东西；它代表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放弃，代表着忏悔和遗憾。在面对每一种羞辱，每一个强加给人类的暴行时，它是绝对不起作用的。” [Red Emma Speaks, 第 234 页]

第三，宗教一直是社会中的一种保守力量。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并不将它自己置于对现实世界的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是重复着由上天传递的、包含在仅仅几本圣书中的真理。因此，有神论是“猜测的理论”，而无神论是“证明的科学”。“一个悬挂在来世的超自然云端那边，而另一个扎根于土地中。如果人要真正得救，他必须拯救大地而非天堂。”因此，无神论“表达了人类思想的扩展和成长”，而有神论“是静态的和固定的”。这是“有神论的绝对主义，它对人类的有害影响，它对思想和行动的瘫痪作用，无神论正在用它的全部力量与之斗争。” [Emma Goldman, Op. Cit., p. 243, p. 245 and pp.]

正如《圣经》所言，“凭着他们的果实，就可以认出他们来。”^①我们无治主义者同意，但与教会不同的是，我们也将这一真理应用于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体上是无神论者。我们认识到教会所扮演的破坏性角色，以及有组织的一神论，尤其是基督教，对人们的有害影响。正如戈尔德曼所总结的，宗教“是无知对理性的阴谋，是黑暗对光明的阴谋，是服从和奴役、之于独立和自由的阴谋；是对力量和美的否认、之于对生命的喜悦与荣耀的肯定的阴谋”。[同上，第 240 页]

^① 注：出自马太福音 7:16，原文如下：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和合本翻译）

因此，鉴于教会的果实，无治主义者认为，现在是拔掉它、种植新的树，即理性和自由之树的时候了。

也就是说，无治主义者并不否认宗教包含重要的伦理思想或真理。此外，宗教可以成为强大和充满爱的社区和团体的基础。它们可以提供一个避难所，让人们远离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和压迫，并在一个万物都在出售的世界里提供行动指南。比如说，耶稣或佛陀的生活和教义的许多方面，都是鼓舞人心和值得追随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宗教只是权贵的工具，它们早就被拒绝了。相反，它们具有双重性质，既包含过好生活的必要思想，也包含为权力辩护的内容。如果它们不是这样，受压迫者就不会相信，而强权者就会把它们当作危险的异端邪说来压制。

而且，事实上，镇压一直是任何宣扬激进信息的团体的命运。在中世纪，许多革命的基督教运动和教派，被由主流教会坚定支持下的世俗权力所镇压。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天主教会支持佛朗哥的法西斯分子，谴责共和党的支持者杀害亲佛朗哥的牧师，而对佛朗哥杀害支持民选政府的巴斯克牧师保持沉默（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试图将死去的亲佛朗哥的牧师封为圣徒，而亲共和党的牧师却未被提及）。萨尔瓦多的大主教，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Oscar Arnulfo Romero），在一开始是个保守派，但在看到政治与经济势力剥削人民的方式后，成为他们率真的支持者。他因此在1980年被右翼准军事人员暗杀，其他许多解放神学的支持者也遭遇了这种命运（解放神学是对福音书的一种激进解释，试图调和社会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思想）。

无治主义者反对宗教的理由，也不意味着宗教人士不参加改善社会的社会斗争。事实远非如此。宗教人士，包括教会等级制度中的成员，在19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墨西哥革命期间，萨帕塔的农民军队中的宗教信仰，也并没有阻止无治主义者参与其中（事实上，它已经很大程度上受到无治主义激进派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的思想的影响）。正是宗教的双重性质，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民众运动和起义（尤其是农民的起义）都使用了宗教的说辞，去寻求保持他们信仰中好的方面，并与官方代表神圣化的、尘世的不公正作斗争。对无治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与不公正现象作斗争的意愿，而不是某人是否相信上帝。我们只是认为，宗教的社会作用是抑制反抗，而不是鼓励反抗。与主流或右派的牧师相比，激进的牧师人数很少这一点，说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应该强调的是，无治主义者虽然对教会和国教的想法抱有极大的敌意，但并不反对人们独自或集体进行宗教信仰活动，只要这种活动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例如，要求人祭或奴役的邪教，与无治主义思想是对立的，并且将会遭到反对。但和平的信仰体系可以在无治主义社会中和谐地存在。无治主义者的观点是，宗教是个人的事，高于一切——如果人们想相信什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只要他们不把这些想法强加给别人，那就与其他人无关。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讨论他们的想法，并试图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无神论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是某种强制性的东西。远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在A.3.7节所讨论的，有些无治主义者确实相信上帝或某种形式的宗教。例如，托尔斯泰将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与虔诚的基督教信

仰相结合。他的思想和蒲鲁东的思想，共同影响了天主教工人组织；该组织由无治主义者多萝西-戴和彼得-莫林于 1933 年创立，至今仍然活跃。活跃在当前反全球化运动中的无治主义活动家 Starhawk，作为一个主要的新异教主义者，也没有问题。然而，对于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他们的想法在逻辑上将他们引向无神论，因为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说，“在其对神的否定中，同时也是其对人类的最有力的肯定，并通过人类，对生命、目的和美进行永恒的追求。” [Red Emma Speaks, 第 248 页]

A.3 有哪些类型的无政府主义？

任何对无治主义感兴趣的人，很快就会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不存在一种单一形式的无治主义。相反，存在着不同的无治主义思想流派；而不同类型的无治主义，在很多问题上彼此有许多分歧。这些类型通常以策略和/或目标来区分，而后者（对自由社会的愿景）是主要的划分依据。

这意味着无治主义者虽然共享几个关键的想法，但可以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合人类自由的经济安排，再分成大的类别。然而，所有类型的无治主义者都有一个基本方法。引用鲁道夫-洛克尔的话说：

“与社会主义创始者一样，无治主义者要求对所有的经济垄断的废除，和土地与所有其他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所有人都必须无差别地使用这些资料；因为个人和社会自由，只有在人人享有平等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才是可以设想的。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无治主义者代表的观点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必须同时是反对所有政治权力制度的战争；因为在历史上，经济剥削总是与政治和社会压迫携手并进的。人对人的剥削和对人的统治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互为对方的条件。” [Anarcho-Syndicalism, 第 62-3 页]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无治主义者出现了分歧。主要的分歧在于“**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尽管各自所希望的经济安排并不相互排斥。在这两者中，社会无治主义者（共产无治主义者、无治工团主义者等等）一直占绝大多数，而个人无治主义主要限于美国。在本节中，我们指出无治主义运动中这些主要趋势之间的差异。很快就会明白，虽然社会无治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都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但他们对自由社会的性质（以及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同的看法。简而言之，社会无治主义者更倾向于社会问题的公共解决方案，和良好社会的群体愿景（即一个保护和鼓励个人自由的社会）。个人无治主义者，顾名思义，更喜欢个人的解决方案，对美好社会有更多的个人主义愿景。然而，我们决不能让这些差异掩盖这两个流派共同点，那就是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并结束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

除了这一重大分歧外，无治主义者还在诸如工团主义、和平主义、“生活主义（lifestylism）”、动物权利和一大堆其他理念上有所分歧，但这些虽然重要，也只是无治主义的不同方面。除了几个关键的理念之外，无治主义运动（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处于不断变化、讨论和思考的状态——这在一个高度重视自由的运动中是可以预见到的。

关于不同类型的无治主义，最明显的一点是，“没有一个是以某个伟大的思想家命名的；相反，它们总是以某种实践命名，或者最常见的，是以组织原则命名.....无治主义者喜欢通过他们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组织自己去做，来区分自

己。” [David Graeber,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p. 5] 这并不意味着，无治主义没有对无治主义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远非如此，正如在 [A.4 节](#) 中所看到的，有许多这样的人。无治主义者只是认识到，以一个人的名字来称呼你的理论，是一种偶像崇拜。无治主义者知道，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只是人类，因此也会犯错误，辜负他们的理想，或者对某些问题存在片面的理解（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见 H.2 节）。此外，我们看到，世界在变化，显然，在比如说 1840 年代工业化的法国的一个合适的做法或方案，在 21 世纪的法国可能会有其局限性！

因此，可以预见，像无治主义这样的社会理论会有许多与之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流派。正如我们在 [A.5 节](#) 中指出的，无治主义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反对压迫的斗争。无治主义思想在许多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因此，也反映了这些环境。最明显的是，个人无治主义最初是在前工业化时期的美国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与社会无治主义有着不同的观点。随着美国的变化，从一个主要的前资本主义农村社会，变成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无治主义也发生了变化：

“最初，美国的运动，即 1829 年随着约西亚·沃伦产生的本土运动，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研究经济的学生很容易理解这种发展的物质与历史原因。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共产主义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主要归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它促使美国的劳动者抓住了团结的思想，其次是积极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被逐出欧洲。” [Voltairine de Cleyre, **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110]

因此，与其说众多类型的无治主义是无治主义内部某种“不协调”的表现，不如说它只是显示了一个植根于现实生活、而非早已死亡思想家的书本的运动。它还展现了一种明智的认识，即人们是不同的，一个人的梦想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梦魇，一集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和斗争中可能需要不同的策略和组织。因此，虽然无治主义者对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在一般情况下会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创建，有自己的偏好；但他们也意识到其他形式的无治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策略，可能更适合于其他人和环境。然而，仅仅因为某人称自己或其理论为无治主义，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无治主义。任何真正类型的无治主义都必须共享运动的基本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反国家和反资本主义。

此外，批评者对无治主义“不连贯”的说法通常是夸大其词。毕竟，作为马克思和/或列宁的追随者，他们并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者分裂成众多的政党、团体和教派。它也没有阻止它们之间的宗派冲突，基于谁对圣书的解释是“正确”的，或者谁用“正确”的引文来为调整他们的思想与实践的尝试提供改进，以适应一个与 1850 年代的欧洲或 1900 年代的俄国大不相同的世界。至少无治主义者对他们的差异是诚实的！

最后，摊牌地说，本常见问答的作者，坚定地把自己放在“社会”分支的无治主义立场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与个人无治主义相关的许多重要思想，只是我们认为，社会无治主义更适合于现代社会，它为个人自由创造了更坚实的基础，而且，它更能映射出我们希望生活的社会类型。

A.3.1 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虽然两个阵营的人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声称另一阵营的建议会导致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但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两者都是反国家、反权威和反资本主义的。主要的区别有两个方面。

首先的区别，是关于此时此地的行动手段（以及无治状态的产生方式）。个人主义者一般喜欢教育和建立替代的机构，如互助银行、工会、公社等。他们通常支持罢工，和其他非暴力形式的社会抗议（如罢租、拒缴税款等）。他们认为这种活动，将确保目前的社会逐渐脱离政府而发展为无治主义的社会。他们主要是进化论者，而不是革命论者，不喜欢社会无治主义者利用直接行动来创造革命的局面。他们认为革命是与无治主义原则相矛盾的，因为它涉及到对资本主义财产的征用，因此是专制的手段。相反，他们试图通过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经济体系（以互助银行和合作社为基础），将借由财产权从社会中被夺走的财富，归还给社会。这样一来，普遍的“社会清算”将变得容易，而无治主义将通过改革而不是征收来实现。

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认可需要进行教育和创造替代方案（如自由意志主义工会），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这本身就足够了。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一块一块地改革成无治状态，尽管他们没有忽视通过社会斗争进行改革的重要性，这些改革增加了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他们也不认为革命与无治主义原则相矛盾，因为摧毁（无论是国家的还是资本家的）权威，不是专制的。因此，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阶级的没收和对国家的破坏，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自由意志主义行为，而不是威权主义行为，因为它是针对那些统治和剥削绝大多数人的人。简而言之，社会无治主义者通常是进化论者和革命者，试图加强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同时试图通过社会革命废除这一制度。然而，由于一些社会无治主义者也是纯粹的进化论者，这一区别并不是划分社会无治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最重要区别。

第二个主要区别，是关于所提出的无治主义经济的形式。个人主义者喜欢基于市场的分配制度，而社会无治主义者则喜欢基于需求的分配制度。（不过）两者都同意，目前的资本主义财产权制度必须废除，使用权必须取代生活资料的财产权（即废除租金、利息和利润——即“高利贷”，用个人无治主义者对这个邪恶的三位一体的首选术语）。实际上，这两个流派都遵循蒲鲁东的经典作品《**什么是所有权？**》，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占有必须取代财产（关于无治主义者对财产的观点的讨论，见 B.3 节）。因此，财产“将失去现在使其神圣化的某种属性。它的绝对所有权——‘使用或滥用的权利’——将被废除，而占有、使用将是唯一的所有权。我们将看到，如果没有地契、没有一个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地契的政府的支持，一个人要想‘拥有’一百万英亩的土地是多么得不可能。” [Lucy

Parsons, **Freedom, Equality & Solidarity**, 第 33 页。

然而，在这个使用权的框架内，无治主义的两个流派提出了不同的制度。社会无治主义者一般主张公共（或社会）所有权和使用权。这将涉及生产手段和分配手段的社会所有权，个人拥有的东西仍然是你使用的，但不是用来创造它们的东西。因此，“你的手表是你自己的，但手表厂属于人民”。“实际使用，”伯克曼继续说，“将被认为是唯一的所有权——不是所有权而是占有。例如，煤矿工人的组织将负责煤矿，不是作为所有者，而是作为经营机构……集体占有，为了社区的利益而合作管理，将取代为盈利而私下进行的个人所有权。”[**What is Anarchism?**, 第 217 页]

这个体系，将建立在工人对其工作的自我管理和（对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自由分享劳动产品的基础上（即一个没有货币的经济体系）。这是因为“在目前的工业状况下，当一切都相互依存时，当每个生产部门与所有其他部门相連結时，试图为工业产品要求个人主义的起源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估计，每个人在大家所共同积累的财富中的份额”，而且，“劳动工具的共同占有，必然带来对共同劳动成果的共同享受。”[克鲁泡特金，**The Conquest of Bread**, 第 45 页和第 46 页] 社会无治主义者的意思只是说，由所有人生产的社会产品将提供给所有人，每个为社会做出生产性贡献的人都可以拿走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会多快达到这样的理想，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将在 [1.2.2 节](#) 讨论）。一些社会无治主义者，例如互助主义者，反对这样的自由意志（或自由）共产主义制度；但是，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期待着货币的终结，因此也期待着买卖的终结。然而，所有的人都同意，无治主义将见证“资本主义和所有权的剥削再每个地方的终止”，“工资制度被废除”，无论是通过“平等和公正的交换”（如蒲鲁东）还是通过自由的分享（如克鲁泡特金）。[蒲鲁东，**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第 281 页]。

相反，个人无治主义者（像互助主义者）否认这种使用权制度应该包括工人的劳动产品。个人无治主义者提出一种更加基于市场的制度，而不是社会所有制；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将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与其他工人自由交换其劳动产品。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相反，通过国家的手段，资本家为市场设置了镣铐，以创造和保护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权力（换句话说，即工人阶级的市场纪律、统治阶级的国家援助）。这些国家创造的（货币、土地、关税和专利上的）垄断，与国家对资本主义产权的执行，是经济不平等和剥削的根源。随着政府的废除，真正的自由竞争将产生，并确保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终结（见本杰明-塔克的 **State Socialism and Anarchism** 一文中，对这一论点的出色总结）。

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认为，生产资料（土地除外）是个人劳动的产物，因此他们赞成人们应该能够出售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然而，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产权，而是赞成“占有和使用”制度。如果生产资料，比如说土地，没有被使用，它就会重新回到共同的所有权中，供其他人使用。他们认为这种被称为互助主义的制度，将使得工人控制生产，并结束资本主义剥削和高利贷。这是因为，从逻辑上和实践上看，“占有和使用”的制度不能与雇佣劳动相提并

论。如果一个工作场所需要一个团体来经营，那么它必须由使用它的团体来拥有。如果一个个体声称拥有它，那么事实上，它被不止一个人所使用，那么显然，“占有和使用”就被违反了。同样，如果一个老板雇用其他人来使用工作场所，那么老板就可以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这样，就违反了劳动者应该得到其全部产品的准则。因此，个人无治主义的原则指向了反资本主义的结论（见 G.3 节）。

这个第二个区别是最重要的。个人主义者担心被迫加入一个社区，从而失去他或她的自由（包括与他人自由交换的自由）。麦克斯·施蒂纳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共产主义通过废除所有个人财产，只会使我更多地回到对另一个人的依赖，即对普遍性或集体性的依赖……[而这是]阻碍我自由行动的条件，是对我施加的一种主权利力。共产主义恰当地反对我从个体所有者那里体验到的压力；但更可怕的是，它把力量放在集体手中。”[**The Ego and Its Own**, 第 257 页] 蒲鲁东也反对共产主义，他说，在共产主义下，集体成为所有者，所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以财产为基础的，所以也都是以权威为基础的（见 **What is Property?** 中“共产主义和财产的特点”一节）。因此，个人无治主义者认为，社会所有权使个人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都使个人受制于社会或公社。他们担心，除了支配个人道德之外，社会化会有效地消除工人的控制权，因为“社会”会告诉工人生产什么并拿走他们的劳动成果。实际上，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或一般的社会所有制）将类似于资本主义，只是老板的剥削和权威被“社会”的剥削和权威所取代。

不用说，社会无治主义者不同意。他们认为，施蒂纳和蒲鲁东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只是关于威权共产主义。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在 1848 年之前和 1848 年，[共产主义的]理论被提出来，其形式对自由的影响完全可以解释蒲鲁东对其的不信任。旧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在长老或科学界人士指导牧师的、严格统治下的修道院式的思想。如果人类不得经历这样的共产主义，自由和个人能量的最后残余将被摧毁。”[**Act for Yourselves**, 第 98 页] 克鲁泡特金始终认为，共产-无治主义是一种新的发展；并鉴于它起源于 19 世纪 70 年代，蒲鲁东和施蒂纳的言论不能被认为是针对它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熟悉共产无治主义。

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共有制（the communal ownership）不是使个人受制于社区，而是通过（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废除财产所有者的权力，为保护生活各方面的个人自由提供必要的框架。此外，共产无治主义不是废除所有个人“财产”，而是承认个人财产和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发现克鲁泡特金反对各种共产主义的形式，即“希望按照家庭的模式来管理社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从而被迫不断见到同样的‘兄弟姐妹’……把‘大家庭’强加给所有人，[这是一个基本错误，而应该相反，试图保证每个人有尽可能多的自由和家庭生活。”[**Small Communal Experiments and Why They Fail**, pp. 8-9] 再次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共产无治主义的目的是，把“收获的或制造的产品交给所有人处置，让每个人都有自由在自己家里随意消费。”[**The Place of Anarchism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ist Thought**, 第 7 页] 这就保证了个人品味和欲望的表达，从而保证了个性——包括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因为社会无治主义者，是工人自我管理的坚定支持者。

因此，对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个人无治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反对，只对国有或威权共产主义有效，而忽视了共产无治主义的基本性质。共产主义无治主义者并没有用社区取代个性，而是用社区来捍卫个性。社会无治主义不是像个人无治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让“社会”控制个人，而是以重视个性和个人表达为基础：

“无治共产主义保持了所有征服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一个人自由，而且还扩展了它，并给它一个坚实的基础——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就是虚幻的。它并不要求已经拒绝了上帝、普遍的暴君、国王和议会的个人，再给他之上一个比任何程序都更可怕的神——共同体之神，或者让他在圣坛上放弃他（或她）的独立、他（或她）的意志、他（或她）的品味，并让他恢复他曾在被钉死的神面前正式做出的禁欲主义誓言。相反，它对他说：‘只要个人不自由，社会就不自由！...’”[同上，第 14-15 页]

此外，社会无治主义者一直承认自愿集体化的必要性。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工作，这没问题（见克鲁泡特金的 **The Conquest of Bread** 第 61 页和 **Act for Yourself** 第 104-5 页以及马拉特斯塔的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第 99 页和第 103 页）。社会无治主义者强调，这与他们的原则或他们所期望的社会的共产主义性质，没有任何矛盾，因为这种例外扎根于两者所基于的“使用权”制度（全面的讨论见 [1.6.2 节](#)）。此外，对于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社团的存在完全是为了组成它的个人的利益；它是人们合作，去满足其共同需求的手段。因此，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强调自由协议作为无治主义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因此，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同意巴枯宁的观点：

“集体主义只能强加在奴隶身上，而这种集体主义将是对人性的否定。在自由社会中，集体主义只能通过环境的压力而产生，不是通过上面的强加，而是通过下面的、自由自发的运动而产生。”[**Bakunin on Anarchism**，第 200 页]

如果个人主义者希望为自己工作并与他人交换商品，社会无治主义者不会反对。因此，我们的意见是，这两种形式的无治主义并不相互排斥。社会无治主义者，支持个人不加入公社的权利；而个人无治主义者，则支持个人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集中他们的财产，包括共产主义协会的方式。然而，如果在自由的名义下，个人希望要求财产权，以便剥削他人的劳动，社会无治主义者会迅速抵制这种以“自由”的名义重新建立国家主义的企图。无治主义者不尊重成为统治者的“自由”。！用路易吉-加莱尼的话：

“那些在无治个人主义的舒适外衣下，去欢迎统治想法的人，其倾向也同样狡猾.....然而，统治的预兆会以他们自我的名义，而凌驾与他人的顺从、服从或惰性的自我之上，去妄想实践个人主义。”[**The End of Anarchism?**，第 40 页]

此外，对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生产资料可以出售的想法，意味着，在无治主义社会中可能重新引入私有财产。在自由市场上，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正如蒲鲁东所认为的，在竞争中，胜利总归于最强者。当一个人的议价能力比另一个人弱的时候，任何“自由交换”都会使强者受益。因此，市场，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倾向于放大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而不是使它

们平等。在资本主义下，这一点更为明显，因为那些只有劳动能力可供出售的人相比拥有资本的人，处于弱势地位；但个人主义无治主义也会受到（类似的）影响。

因此，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个人无治主义社会将从公平交换中演变回资本主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它的意愿。如果“不成功”的竞争者被迫失业，他们可能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成功”的竞争者，以便生存。这将创造出专制的社会关系，和少数人通过“自由合同”对多数人的统治。执行这样的合同（以及其他类似的合同），很可能“开辟了……在‘防御’国家的所有职能的标题下，重建它们的道路。”[彼得-克鲁泡特金，**Anarchism**，第 297 页]

本杰明·塔克，最受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思想影响的无治主义者，也面临着与所有抽象的个人主义流派相关的问题——特别地，是对专制的社会关系作为“自由”的一种表现的接受。这是由于财产与国家的相似性造成的。塔克认为，国家的标志有两点，一是侵略，二是“对某一特定地区和该地区内的一切承担权威，一般是为了更彻底地压迫其臣民和扩大其边界的双重目的而行使的。”[**Instead of a Book**，第 22 页] 然而，老板和地主也对某一特定区域（或可能的地产），和其中的所有东西（工人和租户），拥有权力。前者控制着后者的行动，就像国家统治公民或臣民一样。换句话说，个人所有权产生的社会关系，与国家创造的社会关系相同，因为它来自同一起来源（对特定区域和使用该区域的人的权力垄断）。

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个人无治主义者对个人所有权的接受，以及他们对个体自由的个人主义概念，会导致通过创造本质上是专制/国家主义的社会关系，来剥夺个人的自由。马拉泰斯塔认为，“个人主义者最重视抽象的自由概念，而没有考虑到或去细想——真正的、具体的自由，是团结和自愿合作的结果——这一事实。”[**The Anarchist Revolution**，第 16 页] 因此，例如，正如公民身份将公民与国家置于的关系一样，雇佣劳动将工人与老板置于相同的关系中，即一方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同样，租户和地主的关系也是如此。

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会不得不产生国家的其他方面。正如 Albert Meltzer 所指出的，这只能产生国家主义的影响，因为“本杰明·塔克的流派——凭借他们个人主义的美德——接受了为保证雇主的‘自由’，警察破坏罢工的需要。所有这一派所谓的个人主义者都接受……警察部队的必要性，从而接受政府（的必要性），而无治主义的首要定义就是无政府。”[**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第 8 页] 这也在部分上说明了，为什么社会无治主义者支持社会所有制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最佳手段。

接受个人所有权的问题，只能与蒲鲁东（塔克的许多经济思想的来源）一样，通过接受需要不止一个工人的合作社来经营的工作场所，得以“回避”。这自然补充了他们对土地“占有和使用”的支持，这将有效地废除地主阶级。如果没有合作社，工人就会受到剥削，因为“谈及（工人）购买手工工具或可以移动的小型机械，还是很好的；但对于经营矿场或工厂所需的巨型机械呢？它需要许多人去工作。如果一个人拥有它，他难道不会让其他人为使用它而支付贡品吗？”这

是因为“除非他的产品能比他所付出的更多，否则没有人愿意雇用别人为他工作，而在这种情况下，交换和再交换的必然过程是，这个人得到的东西少于总数。”[Voltairine de Cleyre, "Why I am an Anarchist", **Exquisite Rebel**, 第 61 页和第 60 页] 只有当使用资源的人拥有它时，个人所有权才不会导致等级权威或剥削（即国家主义或资本主义）。只有当一个行业被合作地拥有时，工人才能确保他们能在工作中管理自己，并在他们制造的商品被出售后，可以获得其全部的价值。

这个解决方案，是个人无治主义者似乎**确实**接受的解决方案，也是唯一符合所有他们宣布的原则（包括无治主义）的解决方案。法国个人主义者 E.Armand 认为，他的无治主义流派与共产无治主义的关键区别在于，除了认为“消费品的所有权代表了[工人]人格的延伸”之外，还“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其产品的自由处置权，视为个人自主权的本质保证。我们的理解是，这种所有权归结为（作为个人、夫妇、家庭团体等）有机会配置必要的土地或生产机器，以满足社会单位的要求，只要所有者不把它转让给别人，或在操作它时依赖别人的服务。”因此，个人无治主义者可以“抵御.....那些想雇佣别人、促使别人为了他的利益工作的某个邻居，对任何人的剥削”，以及“贪婪，也就是个人、夫妇或家庭团体可以拥有超过严格要求的正常生活维系物的机会。”[“Mini-Manual of the Anarchist Individualist”，第 145-9 页，**Anarchism**，罗伯特-格雷厄姆（编），第 147 页和第 147-8 页]

美国个人无治主义者的思想在逻辑上也流向了同样的结论。“占有和使用”自动排除了雇佣劳动，因此排除了剥削和压迫。正如加里-克莱恩（Wm. Gary Kline）正确指出的那样，美国个人无治主义者“期望建立一个主要由个体经营工人组成的社会，其中任何一个人之间都没有明显的财富差距。”[**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第 104 页] 正是这种从他们的原则中顺理成章产生的、对自营职业社会的设想，确保了他们的思想是真正的无治主义。事实上，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将确保消除利润、租金和利息，这使他们与社会无治主义者一起，正当地处于反资本主义阵营。

不用说，社会无治主义者不同意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认为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也会有不理想的特点，从而破坏自由和平等。此外，工业的发展导致了进入市场的**自然**障碍，这不仅使得通过与资本主义竞争来废除资本主义变得几乎不可能，而且可能重新创造新形式的高利贷。再加上在现代经济中难以确定每个工人对产品的确切贡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唯一真正解决办法是确保社区对经济的所有权和管理。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认识，使社会无治主义者拒绝个人无治主义，而赞成在大规模而非仅仅工作场所上，进行自由联合和合作的劳动，实现生产的公共化并因此实现生产的分散化。

关于个人无治主义者的思想以及社会无治主义者为什么拒绝这些思想的更多讨论，见 G 节——“个人无治主义是资本主义吗？”

A.3.2 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无治主义吗？

是的，社会无治主义有四个主要的趋势——互助主义(mutual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共产主义(communism)和工团主义(syndicalism)。差异不大，只是涉及策略的不同。不过，互助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无治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的一个主要区别。互助主义基于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工人合作社通过社区银行系统，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这种互助银行网络将“由整个社区组成，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没有]利息……[和]贷款催缴，但要足以支付风险和费用。”这样的制度将通过“我们在每一处的交换和信贷中引入互助主义，劳动将呈现新的面貌，并变得真正民主”，从而结束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查尔斯-A-丹纳，Proudhon and his “Bank of the People”，第 44-45 页和第 45 页]

社会无治主义版本的互助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形式不同，它让互助银行为当地社区（或公社）所有，而不是成为独立的合作社。这将确保它们向合作社而不是向资本主义企业提供投资资金。另一个区别是，一些社会无治主义互助主义者，支持建立蒲鲁东所说的“**农工业联合会**”，以补充自由意志主义社区（蒲鲁东称之为公社）的联合会。这是一个“邦联……旨在为商业和工业”，以及诸如公路、铁路等大规模发展，“提供互惠的保障”。“具体联合会安排的目的，是保护联合会各国[原文如此！]的公民，免受其内外的资本主义和金融封建主义的影响。”这是因为“政治权利需要得到经济权利的扶持”。因此，农工联盟需要确保社会的无治主义性质，不受市场交换（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不稳定影响。这样一个系统将是团结的实际例子，因为“行业间是姐妹；它们是同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一个人不能没有其他人共同承担它的痛苦。因此，它们应该联合起来，不是为了相互吸收和混淆，而是为了相互保证共同繁荣的条件……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会减损它们的自由；它只会使它们的自由更有保障和力量。”[**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第 70 页，第 67 页和第 72 页]

其他形式的社会无治主义并不赞同互助主义者对市场的支持，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相反，他们认为，自由的最佳方式是生产共有化，在合作社之间自由地分享信息和产品。换句话说，其他形式的社会无治主义，是基于生产者协会和公社的联合会的共同所有权（或社会所有权），而不是互助主义的个人合作社系统。用巴枯宁的话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从下往上地、由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邦进行，首先是他们的工会，然后是公社、地区、国度，最后是国际的和全局的大联合会”，“土地、劳动工具和所有其他资本，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只由工人使用，换句话说，只由农业和工业协会使用。”[**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06 and p. 174] 只有把合作原则扩展到个人工作场所之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见 [1.1.3 节](#)，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反对市场）。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们与蒲鲁东有一些共同点。工业邦联将“保证相互使用生产工具，这些工具是每个团体的财产，并将通过互惠的合同成为整个...联合会的集体财产。通过这种方式，各团体的联合会将能够……调节生产速度，以满足社会波动的需求。”[James Guillaume,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76]

这些无治主义者与互助主义者一样，支持工人在合作社内对生产进行自我管理；但（他们）认为表现互助的焦点在于这些协会的邦联，而不是市场。工作场所的自治和自我管理，将是任何联合会的基础，因为“各个工厂的工人丝毫无意识地，将他们来之不易的对生产工具的控制权，交给一个自称'公司'的高级权力。”[Guillaume, *Op. Cit.*, p. 364] 除了这种全行业的联合会之外，还将有跨行业 and 社区的邦联，以处理那些不属于任何特定行业联合会专属管辖、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的、或具有社会性质的任务。同样，这与蒲鲁东的互助主义思想有相似之处。

社会无治主义者都坚定地致力于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不包括那些纯粹由个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并拒绝个人主义的想法，即这些资料可以被使用它们的人“卖掉”。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就能在自由社会中重新获得立足点。此外，其他社会无治主义者不同意互助主义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引入互助银行而被改革成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唯有通过社会革命，资本主义才能被自由社会取代。

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革命后的“钱”的问题。无治共产主义者认为，废除货币是必要的；而无治集体主义者认为，结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关键。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集体无治主义“表达了这样一种状态：所有生产必需品都由劳动集体和自由公社共同拥有，而劳动的报偿方式[即分配方式]，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其他形式，都将由每个集体自己解决。”[*Anarchism*, 第 295 页] 因此，虽然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都通过生产者协会来组织共同的生产，但它们在如何分配所生产的商品方面，有所不同。共产主义以所有人的自由消费为基础，而集体主义则更倾向于根据所贡献的劳动来分配商品。然而，大多数无治集体主义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区意识的增强，货币将消失。两派都同意，最终，社会将按照共产主义格言所建议的路线运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只是在认为多快可以达成这样的社会上，有所分歧（见 [1.2.2 节](#)）。

对于无治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在革命之后，“共产主义——至少是部分的（共产主义）——比集体主义更有机会建立。”[同上，第 298 页] 他们认为，走向共产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集体主义“从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开始，并通过倒退回按劳取酬的制度而立即扭转自身，这意味着重新引入不平等。”[亚历山大·伯克曼，*What is Anarchism?*, 第 230 页] 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越快，新的不平等现象发展的机会就越少。不用说，这些立场**并没有**那么不同，在实践中，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引入无治主义的人的政治意识水平，将决定在每个领域适用哪种制度。

工团主义是社会无治主义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无治工团主义者，就像其他工团主义者一样，希望在不治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工业工会运动。因此，他们主张分散的、联合的工会，利用直接行动在资本主义下获得改革，直到他们强大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无治工团主义可以被视为集体无治主义的新版本，它也强调无治主义者在劳工运动中工作，并创建预示着未来自由社会的工会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在资本主义下，无治工团主义者也寻求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自由协会”。他们认为，这些协会将作为“无治主义的实践学校”，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巴枯宁的言论，即工人组织必须在革命之前，创造“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未来本身的事实”。

无治工团主义者和所有社会无治主义者一样，“深信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不能靠政府的法令和法规来创造，而只能靠工人在每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中，手脑并用的团结协作[去创造]；也就是说，通过生产者自己在这种形式下接管所有工厂，使独立的集团、工厂和工业部门成为一般经济机体的独立成员，在自由相互协议的基础上，为了社会的利益系统性地生产产品。” [鲁道夫-洛克尔，**Anarcho-syndicalism**，第 55 页]。

同样，像所有的社会无治主义者一样，无治工团主义者把工会中隐含的集体斗争和组织，视为无治主义的学校。正如尤金·瓦林（Eugene Varlin，活跃在第一国际的无治主义者，在巴黎公社结束时被谋杀）所说，工会有“巨大的优势，使人们习惯于集体生活，从而为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做准备。他们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相互相处和相互理解，而且还能组织起来，进行讨论，并从集体的角度进行思考。”此外，除了在此时此地减轻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工会还“构成了未来社会大厦的自然要素；正是他们可以轻易地转变为生产者协会；正是他们可以使社会成分和生产组织发挥作用。” [朱利安-P-W-阿切尔引用，**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France, 1864-1872**，第 196 页]

工团主义者和其他革命的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很小，纯粹是围绕着无治工团主义工会的问题。集体无治主义者同意，建立自由意志主义工会很重要，为了确保“发展和组织……劳动群众的社会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政治力量）”，在劳工运动中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Bakunin,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97] 共产无治主义者通常也承认在劳工运动中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一般认为，工团主义的组织将由工人在斗争中创建，因此认为鼓励“反抗精神”，比创建工团主义工会并希望工人加入工会更重要（当然，无治工团主义者也支持这种自主斗争和组织，所以差别不大）。共产无治主义者也不那么强调工作场所，认为工作场所内的斗争，与工作场所外的其他反对等级制度和统治的斗争同等重要（不过，大多数无治工团主义者也会同意这一点，所以这往往只是一个重点问题）。少数共产主义无治主义者拒绝劳工运动，认为其本质上是无望的改良主义，因此拒绝在其中工作，但这只是少数。

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无治主义者都承认，无治主义者有必要在纯粹的无治主义组织中联合起来。他们认为，无治主义者作为无治主义者一起工作，澄清并向他人传播他们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工团主义者常常否认无治主义团体和联合会的重要性，认为革命的工业和社区工会本身就足够了。工团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可以融为一体，但其他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非工团主义者指出工会的改良主义性质，并敦促为了保持工团主义工会的革命性，无治主义者必须作为无治主义团体或联盟的一部分，在工会中工作。大多数非工团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和工会主义的融合是潜在混淆的根源，会导致这两个运动都无法恰当地完成各自的工作。关于无治工团主义的更多细节，见 J.3.8

节（以及 J.3.9 节，关于为什么许多无治主义者拒绝它的各个方面）。应该强调的是，非工团主义的无治主义者，并不拒绝工人进行集体斗争和组织的需要（见 H.2.8 节关于这一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迷思）。

实际上，很少有无治工团主义者完全拒绝无治主义联合会的需要，也很少有无治主义者是完全的反工团主义者。例如，巴枯宁同时启发了无治共产主义和无治工团主义思想；而克鲁泡特金、马拉特斯塔、伯克曼和戈尔德曼等无治共产主义者，也都支持无治工团主义运动和思想。

要进一步阅读各种类型的社会无治主义，我们推荐以下内容：互助主义通常与蒲鲁东的作品有关，集体主义与巴枯宁的作品有关，共产主义与克鲁泡特金、马拉特斯塔、戈尔德曼和伯克曼的作品有关。工团主义有些不同，因为它更多的是工人斗争的产物，而非一个“著名者”的作品（尽管这并不妨碍学者们称乔治-索雷尔为工团主义之父。即使他写的是已经存在的工团主义运动，工人阶级仍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思想，（把）这种想法潜藏在他们（的行动）之中）。然而，鲁道夫-罗克（Rudolf Rocker），通常被认为是无治工团主义的领跑理论家；费尔南-佩鲁蒂埃（Fernand Pelloutier）和埃米尔-普吉（Emile Pouget）的作品，也是理解无治主义的必要读物。对于社会无治主义的发展和其主要人物的主要作品的概述，丹尼尔-盖林（Daniel Guérin）的优秀文集 **No Gods No Masters** 是无可比拟的。

A.3.3 有哪些类型的绿色无治主义？

强调无治主义思想作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是当今大多数形式的无治主义的一个共同点。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以及彼得-克鲁泡特金和艾丽斯-雷克卢斯的作品中。例如，后者认为，“地球和它所养育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秘密的和谐，而当鲁莽的社会去违反这种和谐时，他们最终总是会后悔的。”同样，也没有一个当代生态学家会不同意他的这个评论：“真正的文明人明白，他[或她]的本性与所有人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或她]修复其前人造成的损害，并努力改善他[或她]的领域”。[引自乔治-伍德科克，“导言”，玛丽-弗莱明，**The Geography of Freedom**，第 15 页]

关于克鲁泡特金，他认为无治主义社会将以社区邦联为基础，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并将工业和农业分散和整合起来（见他的经典作品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这种“小即是美”（借用 E.F.舒马赫的绿色经典著作的标题）的经济理念，在被后来的绿色运动所采纳的近 70 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此外，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一书中记录了，物种内部以及物种与环境间的合作，通常相比竞争而言对它们更有利。克鲁泡特金的工作，加上威廉-莫里斯、雷克鲁斯兄弟（与克鲁泡特金一样，都是世界知名的地理学家），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为当前无治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奠定了基础。

然而，虽然古典无治主义中有许多生态性质的主题，但生态思想和无治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只是在最近才凸显出来（基本上是从 1965 年 Murray Bookchin 的经典文章《*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的出版开始）。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穆雷-布克钦的思想和工作，将生态学和生态问题置于无治主义的核心，也让无治主义的理想和分析进入绿色运动的许多方面。

在讨论绿色无治主义（也叫生态无治主义）的类型之前，值得解释一下无治主义和生态学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引用穆雷-布克钦的话，“生态学家和无治主义者，都非常强调自发性”，并且“对生态学家和无治主义者来说，一个不断增加的统一性，是通过不断的分化来实现的。一个不断扩大的整体，是由其各部分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创造的。”此外，“正如生态学家寻求扩大生态系统的范围、并促进物种之间自由的相互作用，无治主义者也寻求扩大社会实验的范围、并消除其发展的所有镣铐。” [Post-Scarcity Anarchism, 第 36 页]。

因此，无治主义者对自由发展、分权、多样性和自发性的关注，反映在生态学思想和关注中。等级制度、中央集权、国家和财富集中，从本质上减少了多样性，也减少了个人及其社区的自由发展，因此削弱了社会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所处的实际生态系统。正如布克钦所认为的，“生态学的重建信息.....[是]我们必须保护和促进多样性”，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自发的、创造性的和个性化的东西，都被标准化、规范化和大众化所限制。” [同上，第 35 页和第 26 页] 因此，在许多方面，无治主义可以被认为是生态学思想在社会中的应用，因为无治主义旨在赋予个人和社区权力，分散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从而确保个人和社会生活自由发展，也因此在本质上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布莱恩-莫里斯认为，“唯一能补充并与生态学完整连接的政治传统——以一种真正的、真实的方式——就是无治主义。” [Ecology and Anarchism, 第 132 页]

那么，有哪些类型的绿色无治主义？虽然几乎所有形式的现代无治主义，都认为自己有一个生态学部分；但无治主义中专门的生态无治主义路线，有两个主要的焦点，即社会生态学和“原始主义”。此外，也一些无治主义者受到深层生态学的影响，尽管不是很多。毫无疑问，社会生态学是最有影响力和数量最多的思潮。社会生态学与穆雷-布克钦的思想和作品有关，他从 1950 年代就开始写生态问题，从 1960 年代开始，将这些问题与革命的社会无治主义相结合。他的作品包括 **Post-Scarcity Anarchism**、**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The Ecology of Freedom** 和其他许多作品。

社会生态学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牢牢地定位在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上。对自然的统治被认为是社会内部统治的产物，但这种统治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达到危机的程度。用 Murray Bookchin 的话说：

“人必须支配自然的观念直接来自于人对人的支配.....但直到有机的社区关系.....溶入市场关系，地球本身才沦为一种被剥削的资源。这种长达几个世纪的趋势，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得到了最严重的发展。由于其固有的竞争性质，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使人类彼此对立，也使人类大众对立于自然界。就像人被转化为商品

一样，自然界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转化为商品，成为可以被肆意制造和销售的资源……市场对人类精神的劫掠，伴随着资本对地球的劫掠。” [同上，第 24-5 页]

布克钦强调说：“只有当生态学有意识地培养一种反等级制度和非支配性的社会变革的感觉、结构和策略时，它才能保持其作为人类和自然之间新的平衡的声音的身份，以及其对真正的生态社会的目标。”社会生态学家将此与布克钦所说的“环境主义”进行了对比，因为社会生态学“试图通过消除人类对人类的支配来消除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这一概念，而环境主义反映了一种‘工具主义’或技术敏感，在这种感性中，自然仅仅被视为一种被动的习惯，一种外部物体和力量的集合体，必须使其更加‘适合’于人类利用，无论这些利用可能是什么。环境主义……并没有对当前社会的基本概念提出质疑，特别是人类必须主宰自然的观念。相反，它试图通过发展技术来减少支配所带来的危害，从而促进这种支配。” [Murray Bookchin, *Towards an Ecological Society*, p. 77] 。

社会生态学提供了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愿景，这个社会“涉及对标志着资本主义技术和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所有趋势的根本逆转——机器和劳动的细微专业化，资源和人在巨型工业企业和城市实体中的集中，自然和人类的分层和官僚化。”这样的生态乌托邦“建立全新的生态社区，以艺术的方式塑造它们所在的生态系统。”布克钦呼应克鲁泡特金的观点，认为“这样的生态社区……将通过在职业任务的轮换或多样化，将智力与体力劳动、工业与农业融合起来，从而治愈城市与乡村、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割裂。”这个社会将建立在使用适当的绿色技术的基础上，“一种新的技术——或生态技术——由灵活的、多功能的机械组成，其生产应用将强调耐用性和质量，而不是建立在过时伪劣产品的无感知的定量产出，以及消耗性商品的快速流通……这种生态技术将利用自然界取之不尽的能源容量——太阳和风、潮汐和水道、地球的温差和我们周围丰富的氢气作为燃料——为生态社区提供无污染的材料或可回收的废物。” [Bookchin, *Op. Cit.*, pp. 68-9]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正如布克钦所强调的，生态社会，“不仅仅是一个试图阻止存在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日益严重的不平衡的社会。如果将其归纳为简单的技术或政治问题，这种对此社会功能的贫瘠观点，就贬低了生态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并导致他们对生态问题采取纯粹的技术和工具性方法。社会生态学首先，是一种感性，它不仅包括对等级制度和统治的批判，而且包括一种重建的展望……由一种强调多样性、而不将差异结构化为等级秩序的伦理学所引导的……这种伦理学的戒律……[是]参与和区分。” [The Modern Crisis, 第 24-5 页] 。

因此，社会生态学家认为必须攻击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而不是把文明作为生态问题的根源。这是他们不同意“原始主义”无治主义思想的关键领域之一，后者倾向于更多批评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有些人甚至发展到呼吁“文明的终结”，显然，也包括所有形式的技术和大规模组织的终结。我们在 [A.3.9 节](#) 中讨论这些观点。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其他无治主义者虽然普遍同意社会生态学的分析和建议，但对其支持在市政选举中竞选候选人的做法，提出了深刻的批评。虽然社会

生态学派认为，这是创建民众自我管理的议会和创建对抗国家的力量的一种手段，但很少有无治主义者同意。相反，他们认为这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而且对利用选举带来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感到无可救药的天真（见 J.5.14 节对此的更全面讨论）。相反，他们建议将直接行动作为推进无治主义和生态学思想的手段，拒绝选举，并认为这是一条死胡同，最终会冲淡激进思想，并腐蚀参与其中的人（见 J.2 节 - 什么是直接行动）。

最后是“深层生态学”，由于其以生物为中心的性质，许多无治主义者认为它是反人类的。很少有无治主义者认为人，作为人类，是生态危机的原因，许多深层生态学家似乎是这样认为的。例如，默里·布克钦特别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深层生态学，和通常与之相关的反人类思想（例如，见 **Which Way for the Ecology Movement?**）。David Watson 也反对深层生态学（见他以 George Bradford 的名义写的 **How Deep is Deep Ecology?**）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会认为，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现行制度，且只有人可以改变它。用默里·布克钦的话说：

“[深层生态学的问题，]源于粗暴的生物主义中的威权主义倾向，它用‘自然法则’来掩盖不断减少的人性，并通过忽视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个叫做‘人性’和‘社会’的抽象概念，来掩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无知。”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 第 160 页]

因此，正如莫里斯所强调的，“通过完全聚焦于‘人类’这个范畴，深层生态学家忽视或完全掩盖了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或者说，把本质上是社会问题的东西生物化了。”将生态批评和分析淹没在对人类过于简单的抗议中，忽视了生态破坏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因此，确保了（他们）无法找到这种破坏的结尾。简单地说，当绝大多数人，对于影响他们的生活、社区、工业和生态系统的决策中，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时，者很难说是“人们”的责任。相反，它是一个将利润和权力置于人类和地球之上的经济和社会体系。通过（仅仅）关注“人类”（因此也没有区分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白人和有色人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我们生活的系统实际上被忽略了，生态问题的体制原因也被忽略了。这可能“有既反动又威权的影响，用对‘自然’的天真理解，替代了对真正的社会问题与关注的批判性研究。” [Morris, **Op. Cit.**, p.135]

面对无治主义者对他们的某些代言人想法的不断批判，许多深层生态学家已经远离了与他们运动相关的反人类思想。深层生态学，特别是 **Earth First!** 组织 (EF!)，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EF! 现在与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IWW)，一个工团主义的工会，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虽然深层生态学不是生态无治主义的一条主线，但它们有许多共同的想法；而且因为 EF! 拒绝其少数厌世的想法，并开始看到等级制度，而不是人类，才是问题所在——深层生态学正越来越多地被无治主义者接受，（关于默里-布克钦和领导 Earth Firster! 的戴夫-福尔曼之间的讨论，见 **Defending the Earth** 一书）。

A.3.4 无治主义是和平主义的吗？

无治主义中长期存在着一个和平主义的分支，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其主要人物之一。这一分支通常被称为“无治和平主义”（虽然有时也使用“非暴力的无治主义者”这一术语，但这一术语是不当的：因为它意味着该运动的其他部分是“暴力的”，而事实不是这样！）。鉴于无治主义的基本理想和论点，无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结合并不令人惊讶。毕竟，暴力，或者通过伤害或暴力的威胁，是摧毁个人自由的一个关键手段。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鉴于无治主义者对个人主权的尊重，从长远来看，无治主义价值观所暗示的是非暴力而不是暴力。”[**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637] 马拉特斯塔说得更清楚，他写道，“无治主义的主梁是在人类关系中消除暴力”，因此无治主义者“反对暴力”。[**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53]

然而，尽管许多无治主义者拒绝暴力并宣称和平主义，但一般来说，该运动本质上并不是和平主义的（在任何时候都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相反，它是反军国主义的，反对国家有组织的暴力，但承认压迫者的暴力和被压迫者的暴力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无治主义运动总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反对军事机器和资本主义战争上，同时又支持和组织武装抵抗压迫（如俄国革命期间，抵抗红军和白军的马赫诺黑军；以及西班牙革命期间，无治主义者组织的抵抗法西斯的民兵，分别见 [A.5.4 节](#) 和 [A.5.6 节](#)）。

在非暴力问题上，作为一个粗略的经验法则，可以将该运动沿着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路线划分。大多数个人无治主义者，支持纯粹的非暴力的社会变革策略，互助主义者也是如此。然而，个人无治主义本身并不是和平主义，因为许多人支持在自卫时使用暴力对抗侵略的想法。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确实支持使用革命暴力，认为需要使用武力来推翻根深蒂固的权力，和抵制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侵略（尽管的确是 无治工团主义者 Bart de Ligt，写的和平主义经典作品 **The Conquest of Violence**）。正如马拉特斯塔所说，暴力虽然“本身是一种罪恶”，但“只有在必须保护自己 and 他人免受暴力侵害时，才是正当的”，“因为奴隶总是处于合法的防卫状态；因此，他对领导、对压迫者的暴力，在道德上总是正当的。”[同上，第 55 页和第 53-54 页] 此外，他们强调，用巴枯宁的话说，由于社会压迫“远非源于个人，而是源于事物的组织和社会地位”，所以无治主义者的目的是“无情地摧毁地位和事物”，而不是摧毁人，因为无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看到特权阶级“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终结。[由理查德-B-萨特曼引用，**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ichael Bakunin** 第 121 页，第 124 页和第 122 页]。

事实上，对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暴力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不崇拜暴力，并且认为在任何社会斗争或革命中，都应该把暴力降到最低程度。所有的无治主义者，都会同意荷兰和平无治工团主义者 Bart de Ligt 的观点，他认为：“暴力和战争，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特有条件，与个人的解放并不相配，而个人的解放是被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暴力越强大，革命就越虚弱，即使是在故意将暴力用于革命的地方。”[**The Conquest of Violence**, 第 75 页]

同样，所有无治主义者都会同意德·利格特的观点，用他书中一个章节的名字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荒谬性。”对德-利格特和所有无治主义者来说，暴力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任何使资本主义和平化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这是因为，一方面，战争往往只是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的经济竞争。国家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往往会发动战争；他们在经济斗争中无法获得的东西，就试图通过冲突来获得。另一方面，“暴力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暴力，统治阶级就完全无法维持其对每个国家的被剥削群众的特权地位。军队首先被用来压制工人.....当他们感到不满的时候。”[Bart de Ligt, *Op. Cit.*, p. 62] 只要国家和资本主义存在，暴力就不可避免，因此，对于无治和平主义者来说，一贯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是一个无治主义者，正如一贯的无治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对于那些非和平主义者的无治主义者来说，暴力，被视为压迫和剥削不可避免的不幸结果，也是让特权阶级放弃其权力和财富的唯一手段。有权势的人很少主动放弃他们的权力，所以必须让他们被迫放弃。因此，需要“过渡性的”暴力，“以结束使人类大多数处于奴役状态的，更大、更永久的暴力。”[Malatesta, *Op. Cit.*, p. 55]（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上，就是忽略了真正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那些无治主义的和平主义者混淆了这个问题，就像那些认为“卷起袖子准备工作，就应该被认为是工作本身一样”的人。而相反，“革命的战斗部分仅仅是卷起袖子。真正的、实际的任务还在前方。”[*What is Anarchism?*, 第 183 页] 而且，事实上，大多数社会斗争和革命，开始时都是相对和平的（通过罢工、占领等）；只有在当权者试图维持其地位时，才会退化成暴力（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意大利，1920 年，工人占领工厂后，紧接着法西斯的恐怖行动就出现了——见 [A.5.5 节](#)）。

如上所述，所有无治主义者都是反军事主义者，既反对军事机器（因此也反对“国防”工业），也反对国家主义/资本主义战争（尽管少数无治主义者，如鲁道夫·罗克和萨姆·多尔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反法西斯的资本主义阵营，认为相较而言没那么邪恶）。无治主义者和无治工团主义者的反战机器信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就已经宣传过了：英国和北美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治主义者，转发了法国 CGT 的传单，力劝士兵不要服从命令，镇压罢工的工人同胞。艾玛·戈尔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都因为在 1917 年组织了一个“反征兵联盟”而被逮捕并从美国驱逐出境，而欧洲的许多无治主义者则因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拒绝加入武装部队而被监禁。受无治工团主义影响的国际工人协会，被政府无情的镇压浪潮所粉碎，就是因为它的组织和反战信息对赞成战争的强大精英们构成了威胁。更近期一些，无治主义者（包括像诺姆·乔姆斯基和保罗·古德曼这样的人）也一直活跃在和平运动中，并为抵抗仍然存在的征兵制度做出贡献。无治主义者积极参与反对越南战争、福克兰群岛战争以及 1991 年和 2003 年的海湾战争（包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都帮助组织过罢工以示抗议）。而正是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许多无治主义者提出了“不要战争，但要阶级斗争”（*"No war but the class war"*）的口号，这很好地概括了无治主义者对战争——即任何阶级制度的邪恶后果——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国家的被压迫阶级，为了统治者的权力和利润而互相残杀。与其参与这种有组织的屠杀，无治主义者敦促劳动人民，要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主人的利益而战：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避免妥协；加深资本家和工资奴隶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歧；宣扬没收私有财产和摧毁国家，作为保证人民之间的博爱和所有人的正义和自由的唯一手段；我们必须准备好完成这些事情。”

[Malatesta, *Op. Cit.*, p. 251]

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到，马拉特斯塔的话，部分是针对彼得·克鲁泡特金写的。后者出于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拒绝了他几十年来所主张的一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同盟国，认为这是反对德国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较小的罪恶。^①当然，正如马拉特斯塔指出的那样，“所有政府和所有资本主义阶级”都会“对自己国家的工人和反抗者.....犯下恶行。”[同上，第 246 页] 他与伯克曼、戈尔德曼和其他许多无治主义者一起，以他们的名义发表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无治主义宣言》（*International Anarchist Manifesto against the First World War*）。它表达了大部分无治主义运动（在当时和后来）对战争和如何阻止战争的看法。这其中值得引用：

“事实是，战争的原因.....完全是在于国家的存在，它是特权的表现形式.....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国家都只是为了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压迫.....。

“深深眷恋和平的人民的幸福在于，为了避免战争，他们把自己的信心寄托在国家及其阴险的外交家身上、寄托在民主和政党身上.....这种信心被故意出卖，而且还在继续出卖，因为政府在整个新闻界的帮助下，说服各自的人民说这场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

“我们坚决反对人民之间的一切战争，.....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最积极地反对战争。

“无治主义者的作用.....就是继续强调只有一场解放战争：那就是在所有国家中，由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由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发动的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召集奴隶们反抗他们的主人。

“无治主义者的行动和宣传，应该坚持不懈地以削弱和瓦解各个国家为目标，培养反抗精神，引起人民和军队间的不满.....。

“我们必须利用所有的起义运动，利用所有的不满情绪，以煽动起义，并组织我们所希望的、能结束所有的社会错误的革命..... 社会正义会通过生产者的自由组织来实现：永远地消除战争和军国主义；通过废除国家及其破坏性的机关，来赢得完全的自由。”[《国际无治主义者关于战争的宣言书》，*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第 386-8 页] 。

^① 译注：1916 年，彼得·克鲁泡特金和一些其他支持同盟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自由》报刊上联名发表了《十六人宣言书》（*Manifesto of the Sixteen*），以提倡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同盟国阵营的胜利。此举引发了许多来自其他无治主义者的批评，并在战争支持问题上与克鲁泡特金划清界限。详见后文。

因此，和平主义对无治主义者的吸引力是明确的。暴力是专制和强制的，因此使用暴力确实与无治主义原则相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会同意马拉特斯塔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原则上反对暴力，并基于这个理性的愿望，我们希望社会斗争应尽可能人道地进行。”[Malatesta, *Op. Cit.*, p. 57] 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不是严格和平主义者的无治主义者，都同意和平无治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他们认为暴力往往会适得其反，疏远人们，使国家有借口镇压无治主义运动和推动社会变革的运动。所有无治主义者都支持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和非暴力反抗，这往往为激进的变革提供更好的道路。

因此，总结一下，纯粹的和平无治主义者是很少的。大多数人接受使用暴力是一种必要之恶，并主张尽量减少其使用。所有人都同意，将暴力制度化的革命，只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创造国家。但他们认为，用暴力破坏权威、或用暴力抵制暴力，并不是威权的。因此，尽管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大多数人反对暴力除非用于自卫，即使如此，也要保持在最低限度。

A.3.5 什么是无治女权主义？

尽管反对国家和所有形式的权威，在 19 世纪的早期女权主义者中有着强烈的呼声，但始于 1960 年代的较近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建立在无治主义的实践基础上的。这就是无治-女权主义一词的由来，指的是在更大的女权主义和无治主义运动中行动的女性无治主义者，以纪念她们的原则。

现代的女权主义，建立在以前的无治主义者（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女权主义思想之上。事实上，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一直是紧密相连的。许多杰出的女权主义者也是无治主义者，包括先驱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的作者）、公社社员路易丝·米歇尔，以及美国无治主义者（和妇女自由的不懈倡导者）沃尔泰琳·德·克莱尔和艾玛·戈尔德曼（关于前者，见她的文章《*Sex Slavery*》、《*Gates of Freedom*》、《*The Case of Woman vs. Orthodoxy*》、《*Those Who Marry Do Ill*》）。关于后者，见《*The Traffic in Women*》、《*Woman Suffrage*》、《*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Marriage and Love*》和《*Victims of Morality*》等）。**Freedom**，世界上最古老的无治主义报纸，由夏洛特·威尔逊于 1886 年创办。像维吉莉亚·德安德烈亚（Virgilia D'Andrea）和罗斯·佩索塔（Rose Pesota）这样的无治主义女性，在自由主义和劳工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班牙革命期间的“*Mujeres Libres*”（“自由妇女”）运动，是女性无治主义者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基本自由，并建立一个基于妇女自由和平等社会的典型例子（关于这个重要组织的更多细节，请参见玛莎·阿克尔斯伯格的 **Free Women of Spain**）。此外，所有主要的男性无治主义思想家（除了蒲鲁东），都是女性平等的坚定支持者。例如，巴枯宁反对父权制和法律如何“使[女人]受到男人的绝对支配。”他认为，“男女必须权利平等”，以便妇女能够“独立并自由地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期待着“专制的司法家庭”的结束和“妇女充分的性自由。”[Bakunin on Anarchism, 第 396 页和第 397 页]。

因此，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无治主义将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激进批判，与对父权制（男人的统治）的同样有力的批判结合起来。无治主义者，特别是女性无治主义者，认识到现代社会是由男性主导的。正如安娜·玛丽亚·莫佐尼（一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无治主义移民）所说，女人“会发现，诅咒你的牧师是个男人；压迫你的立法者是个男人；把你贬为物品的丈夫是个男人；骚扰你的放荡者是个男人；用你低薪酬的工作使自己致富的资本家，和冷静地将你的身体价格装进口袋的投机者——都是男人。”从那时起，情况几乎没有改变。父权制仍然存在，引用无治主义报纸《社会问题》（**La Question Sociale**）的话来说，通常情况下，女人“在社会和私人生活中都是奴隶。如果你是无产者，你有两个暴君：男人和老板。如果是资产阶级，留给你的唯一主权就是轻浮和娇媚。”[何塞·莫亚引用，**Italians in Buenos Aires' s Anarchist Movement**，第 197-8 页和第 200 页]。

因此，无治主义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即与父权制的斗争和与国家或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样重要。因为“只要妇女作为动产被买卖、圈养、打扮、投喂和保护，就不可能有自由、公正或平等的社会，也不可能有任何接近这样社会的东西。”[沃尔泰尔·德·克莱尔，*The Gates of Freedom*，第 235-250 页，尤金尼娅·C·德拉莫特，**Gates of Freedom**，第 242 页] 引用路易斯·米歇尔的话：

“必须改变的第一件事，是两性之间的关系。人类有两个部分，男人和女人，我们应该携手并进；相反，现在却存在着对立，只要‘强势’的那一半控制着，或认为自己控制着‘弱势’的那一半，这种对立就会持续下去。”[**The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第 139 页]

因此，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一样，都对抗父权制并为女性平等而斗争。两者都有许多共同的历史，都关注女性成员的个人自由、平等和尊严（不过，正如我们将在下文更深入地解释的那样，无治主义者一直对主流/自由派的女权主义，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认为其做的并不彻底）。因此，（19 世纪）60 年代的新一轮女权主义，以无治主义的方式表达自己，并从无治主义人物（如艾玛·戈尔德曼）那里获得很多灵感，这一点来看并不令人惊讶。凯西·莱文指出，在这一时期，“独立的妇女团体，开始在没有男性左翼的结构、领导人和其他派系的情况下运作，同时，独立地创建了类似于许多年代和地区的、无治主义者的组织。这也不是偶然的。”[“暴政的暴政”，**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第 66 页] 之所以这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正如女权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妇女是等级社会的第一批受害者。等级社会，被认为是随着新石器时代后期，父权制和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兴起而开始的。玛丽莲·弗伦奇（在 **Beyond Power** 中）认为，人类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分层，发生在男性开始支配女性的时候，女性实际上成为一个“低等”和“劣等”的社会阶层。

无治主义和现代女权主义之间，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存在联系。著名女权主义思想家卡洛尔·帕特曼指出，她的“[关于契约理论及其专制和父权基础的]讨论归功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即“社会主义运动的无治主义分支”。[**The Sexual Contract**, p. 此外，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指出，“在过去 20 年里，批评专制、等级制、非民主组织形式的主要阵地，是妇女运动……在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击败巴

枯宁之后，无论是劳工运动、国有化工业，还是左派的普遍组织形式，都模仿了国家的等级制度……妇女运动挽救并实践了[巴枯宁等无治主义者]长期埋没的思想，即社会变革的运动和实验，必须‘预示’未来社会组织的形式。”[*The Disorder of Women*, 第 201 页]。

佩吉·科内格 (Peggy Kornegger)，注意到了女权主义和无治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这些紧密联系。她写道：“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几乎是纯粹的无治主义。基本理论认为，核心家庭是所有专制制度的基础。从父亲到老师到老板到上帝，孩子学到的经验，都是服从伟大的匿名权威声音。从童年毕业到成年，这个过程就是变成一个成熟的自动机器，无法质疑，甚至无法清楚地思考。”[“无治主义：女权主义的联系”，*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 第 26 页]。同样，“零数集体”(The Zero Collective)^①认为，无治女权主义“包括意识到女权主义中的无治主义，并有意识地发展它。”[“无治主义/女权主义”，第 3-7 页，*The Raven*, 第 21 期，第 6 页]

无治女权主义者指出：威权的许多特质和价值观，例如统治、剥削、侵略性、竞争性、脱敏等，这些在传统上被认为“男子气概的”的，在等级文明中得到高度重视。相比之下，非威权性的特征和价值观，如合作、分享、同情、敏感、热情等，却在传统上被视为“女子气的”并被加以贬低。女权主义学者将这一现象追溯到青铜时代早期父权制社会的发展，以及他们对以合作为基础的、“有机”社会的征服。在“有机”社会中，“女子气的”特质和价值观普遍存在并受到尊重。然而，在被征服之后，这些价值观被认为是“低等的”，特别是对男人来说，因为在父权制下男人负责统治和剥削。(例如，见 Riane Eisler,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Elise Boulding, *The Underside of History*)。因此，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把建立一个基于合作、分享、互助等的非权威的无治主义社会，称为“社会的女性化”。

无治女权主义者指出，若是没有自我管理和放权，社会的“女性化”就无法实现。这是因为他们希望推翻的父权制威权价值观和传统，会在等级制度中得到体现和再现。因此，女权主义意味着放权，而放权又意味着自我管理。可以看到许多女权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反映在她们对集体形式的女权主义组织的实验中。这些组织消除了等级结构，和竞争性的决策形式。一些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直接民主的组织形式，是女性特有的政治形式。[例如，见 Nancy Hartsock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Strategy," in Zeila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pp.56-77] 像所有无治主义者一样，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自我解放是妇女平等的关键，因此也是自由的关键。因此，艾玛·戈尔德曼（这样说道）：

“她的发展，她的自由，她的独立，必须来自且通过她自己来得到。首先，通过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而不是一个性商品。其次，通过拒绝任何人对她身体的权利；通过拒绝生育，除非她愿意、通过拒绝成为上帝、国家、社会、丈

^① 注：似乎是一个新兴宗教（异教）教会联合集体，同时参与媒体和评论。他们的宗旨是“直到耶稣不再改变生灵”（until ZERO lives are unchanged by jesus.）

夫、家庭等的仆人、通过使她的生活更简单，但更深刻和丰富。也就是说，通过努力学习所有错综复杂生活的意义和实质；通过使自己摆脱对公众舆论和公众谴责的恐惧。”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第 211 页]

无治女权主义，试图使女权主义不被无论右翼还是左翼的威权意识形态所影响和支配。它提出了直接行动和自力更生，而不是“官方”女权运动所赞成的大规模改良运动、创建等级制度与中央集权主义的组织——以及其对有更多的女老板、女政治家和女军人，就是走向“平等”的幻想。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会指出，妇女为了成为资本主义公司的经理而必须学习的所谓“管理科学”，本质上，是一套在公司等级制度中控制和剥削受雇工人的技术。而“女性化”社会，需要同时完全消除资本主义的工资奴役和管理统治。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剥削者或压迫者，并不是通往平等的道路（正如自由妇女组织的一名成员所说，“我们并不想用女权主义的等级制度来取代男性的等级制度” [由 Martha A. Ackelsberg 引用，**Free Women of Spain**, 第 22-3 页]——也可以在 [B.1.4 节](#) 中，看到关于父权制和等级制度的进一步讨论）。

因此，无治主义在传统上敌视自由派（或主流的）女权主义，就是支持妇女的解放和平等。Federica Montseny（西班牙无治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认为，这种女权主义主张妇女平等，但没有挑战现有体制。她认为，（主流）女权主义的唯一野心，是给特定阶层的妇女提供机会，让她们更充分地参与现有的特权制度。如果这些制度“在男人利用它们的时候是不公正的，如果女人利用它们，它们仍然会是不公正的。” [Martha A. Ackelsberg 引用，**Op. Cit.**, 第 119 页] 因此，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妇女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平等的机会成为老板或工资奴隶、选民或政治家；而是成为自由协会中，平等合作的、自由且平等的个人。佩吉·科内格强调说：“女权主义，并不意味着女性企业权力或女总统；它（反而）意味着没有企业权力和没有总统。平等权利修正案，不会改变社会；它只是给妇女提供了插入等级经济的‘权利’。挑战性别歧视意味着挑战所有等级制度——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个人层面上的。而这意味着一场无治-女权主义革命。” [同上，第 27 页]。

可以看出，无治主义，包含了主流女权主义所缺少的阶级和经济分析。同时，也意识到了主流社会主义运动所忽视的，家庭的和基于性别的权力关系。这源于我们对等级制度的憎恶。正如莫佐尼（Mozzoni）所说，“无治主义捍卫所有被压迫者的事业，正因为如此，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捍卫你们[女性]的事业，哦！妇女，在社会和私人领域都受到当前社会的双重压迫。” [引自莫亚，同上，第 203 页] 这意味着，引用一位中国无治主义者的话说，无治主义者“所指的两性平等，不仅仅是男人不再压迫女人。我们还希望男人不再受其他男人的压迫，女人不再受其他女人的压迫。” 因此，妇女应该“彻底推翻统治，迫使男人放弃所有的特殊特权，与妇女平等相处，创造一个既不压迫妇女、也不压迫男人的世界。” [何震^①，由 Peter Zarrow 引用，**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第 147 页]。

^① 何殷震（约 1884 年—约 1920 年），本名何班，又名何震。中国近代女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因此，在历史上的无治主义运动中，正如 Martha Ackelsberg 所指出的，自由主义/主流派女权主义被认为是“作为妇女解放的战略过于狭隘；性斗争不能与阶级斗争或整个无治主义项目分开。”[同上，第 119 页] 无治女权主义延续了这一传统，认为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都是错误的，不仅仅是父权制。如果女权主义仅仅希望让妇女有和男人一样当老板的机会，那么它就与自己的理想相冲突。他们只是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他们“不相信，妇女手中的权力有可能导向一个非强制性的社会”，也不相信“有领导精英的群众运动能产生什么好的结果”。“核心问题始终是权力和社会等级”，因此人们“只有在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权力时，才是自由的”。[Carole Ehrlich, “社会主义、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 第 44 页]。因为，如果像路易斯·米歇尔所说的那样，“一个无产者是个奴隶；无产者的妻子更是个奴隶”，那么确保妻子去经历与丈夫同等程度的压迫，就失去了意义。[同上，第 141 页]。

因此，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所有无治主义者一样，反对资本主义，认为它剥夺了自由。他们对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的批判，并不以父权制为起点和终点。他们希望到处都有自由，希望“打碎……每一个基于奴隶制下的家庭！每一个代表着将一方的个性、出售和转让给另一方的婚姻！每一个站在男性及其权力一方的、社会制度或市政制度；[以及]每一个使他人成为主人或奴隶的纽带。”[Voltairine de Cleyre, **"The Economic Tendency of Freethought"**, 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72] 那种认为“机会平等”的资本主义会解放妇女的理想，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这样的制度，仍然会见证工人阶级的妇女被（无论是男是女的）老板压迫。对于无治女权主义者来说，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不能与反对等级制度本身的斗争分开。正如 L. Susan Brown 所说：

“无治主义-女权主义，作为无治主义情感应用于女权主义关注点的表达，以个人为出发点，在反对统治和从属关系方面，主张非工具性的经济形式，去维护无论男女个体所存在的自由。”[**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第 144 页]

无治女权主义者，对我们理解生态危机在等级文明的威权价值观中的起源，有很多贡献。例如，一些女权主义学者认为，对自然的统治与对妇女的统治是一致的，在整个历史上，妇女与自然是一致的（例如，见 Caroline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1980）。妇女和自然，都是威权人格所特有的、对控制迷恋的受害者。由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激进生态学家和女权主义者都认识到，必须将等级制度大卸八块以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

此外，无治女权主义提醒我们，在平等对待女性与男性的同时，也必须尊重男女差异，必须。换句话说，承认和尊重不只是男性，还有女性的多样性。很多男性无治主义者常常认为，因为他们（在理论上）反对性别歧视，所以他们在实践中就没有性别歧视。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无治女权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问题，摆在了社会活动面前，并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不仅要与外部的约束作斗争，还要与内部的束缚作斗争。

这意味着无治女权主义主张我们要言行一致。正如伏尔泰因·德·克莱尔（Voltairine de Cleyre）所主张的：“我从不指望男人给予我们自由。不，妇女们，

我们不值得被给予，除非我们亲自去夺取。”这包括“坚持在平等自由法则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准则：一个承认妇女完整个性的准则。通过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地方制造反叛。通过我们自己实践我们的信念.....我们是革命者。我们将通过言论、行动，和最重要的生活，去进行宣传——去成为我们所教诲的那种人。”因此，无治女权主义者，像所有的无治主义者一样，把反对父权制的斗争看作是被压迫者为自己的自我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因为“作为一个阶级，我对男人没有任何指望...。如果说历史曾经教给我们什么，那就是教给我们这个：没有一个暴君会主动放弃他的暴政，直到他不得不放弃。因此，我的希望在于在妇女的心胸中制造反叛。”[“*The Gates of Freedom*”，第 235-250 页，尤金尼娅·C·德拉莫特，**Gates of Freedom**，第 249 页和第 239 页]。可悲的是，这句话，无论是在无治主义运动中，还是在它之外的父权制社会中，都一样适用。

面对嘴上说着性平等的、男性无治主义者的性别歧视，西班牙的女性无治主义者组织了 **Mujeres Libres** 组织来对抗这种歧视。她们不相信把她们的解放留给革命后的某一天。她们的解放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从现在开始。在这一点上，她们复述了伊利诺伊州煤炭城的无治主义妇女的结论，她们厌倦了听到她们的男同志“高呼支持”在“未来社会”的性平等，而在此时此刻却无所作为。她们使用了一个特别具有侮辱性的比喻，将她们的男同志比作牧师，“向饥饿的大众做出虚假的承诺.....[说]在天堂会有回报”。他们认为，母亲应该让自己的女儿“明白，性别不同并不意味着权利的不平等”，除了“反抗当今的社会制度”，他们“尤其应该反对男人的压迫，因为他们想保留女人在道德和物质上的劣势。”[Ersilia Grandi, 由 Caroline Waldron Merithew 引用, **Anarchist Motherhood**, 第 227 页] 在她们的西班牙同志组织起来的三十多年之前，她们就在伊利诺伊州上游山谷的煤炭城镇组建了 "**Luisa Michel**" 团体，以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

对于无治女权主义者来说，打击性别歧视是争取自由斗争的一个关键方面。它并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前所争论的那样，说它转移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斗争，而这个问题在革命之后，会以某种方式自动得到解决。反而，它是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任何头衔.....我们不要它们。我们要的是知识、教育和自由。我们知道我们的权利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求这些权利。难道我们没有站在你们身边进行最高的斗争吗？难道你们还不够强大吗，男人们，去把这场最高的斗争的一部分变成为妇女的权利而斗争？然后，男人和女人将共同获得全人类的权利”。[路易丝·米歇尔，同上，第 142 页]

这种革命性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转变当前的两性关系。婚姻特别地罪恶，因为“基于《圣经》的、旧的婚姻形式，‘至死不渝’，.....[是]一个代表男人对女人的主权，代表女人完全服从男人的想法与命令的制度。”妇女被降格为“男人的仆人和孩子的生养者”。[Goldman, **Op. Cit.**, pp. 220-1] 与此相反，无治主义者提出了“自由的爱”，即基于平等者之间自由协议的夫妻和家庭，而不是一方掌权，另一方只是服从。这种结合将不需要教会或国家的认可，因为“两个相爱的人，不需要第三方的允许就能共寝。”[莫佐尼，由莫亚引用，同上，第 200 页]。

平等和自由不仅仅适用于关系。因为“如果社会进步包括社会单元自由平等化的持续趋势，那么只要有一半的社会[即妇女]处于服从状态，进步的要求就无法满足……妇女……开始感受到她的奴役；那就是当在她的主人被打倒、而她被提升到平等的地位之前，还需要从她的主人那里获得必要的承认时。这种承认就是，控制她自己的自由。”沃尔泰因·德·克莱尔，“*The Gates of Freedom*”，同上，第 242 页] 男人、国家和教会，都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对她的身体做什么。这一点在逻辑上的延伸是，妇女必须对自己的生殖器官拥有控制权。因此，无治女权主义者和一般的无治主义者一样，支持堕胎权（即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生殖决定）。这是一个长期的立场。艾玛·戈尔德曼之所以受到迫害和监禁，是因为她公开倡导节育方法、和妇女应决定自己何时怀孕的极端观念（正如女权主义作家玛格丽特·安德森所说：“1916 年，艾玛·戈尔德曼因主张‘妇女不必总是闭上嘴巴而开放子宫’，而被送进监狱。”）。

无治女权主义并没有就此止步。像一般的无治主义一样，它的目标是改变社会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在家庭中发生的事情。因为，正如戈尔德曼所问的，“如果把家庭的狭隘和不自由换成工厂、血汗工厂、百货商店或办公室的狭隘和不自由，又能获得多少独立呢？”因此，妇女的平等和自由必须在每一个地方争取，并抵御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它们也不能通过投票来实现。无治女权主义者认为，真正的解放只有通过直接行动才能实现。无治主义女权主义的基础，之所以是妇女的自我行动和自我解放，是因为虽然“投票权或平等的公民权利可能是很好的要求……[但]真正的解放既不始于投票也不始于法庭。它始于妇女的灵魂……她实现自由的能力所及何处，她的自由就将达到何处。”[Goldman, *Op. Cit.*, p. 216 and p. 224]

妇女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每一个的收获都来自于下层，来自于妇女自己的行动。正如路易丝·米歇尔所说，“我们女性并不是差的革命者。我们没有乞求任何人，在斗争中占据了自己的位置；否则，我们会继续闷头前进，通过各种议案，直到世界结束，却什么也得不到。”[同上，第 139 页] 如果妇女等待别人为她们采取行动，她们的社会地位将永远不会改变。这包括一开始就获得投票权。面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激进运动，英国无治主义者罗丝·威克普承认，“确实，这场运动向我们表明，迄今为止一直顺从于她们的主人——男人——的妇女，终于开始醒悟到，她们并不逊色于那些主人。”然而她认为，妇女不会因为选票而得到解放，而是“靠她们自己的力量”。[Sheila Rowbotham 引用，*Hidden from History*，第 100-1 页和第 101 页]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妇女运动表明了这一分析的真实性。尽管有了平等的投票权，但自 20 世纪 20 年代年代以来，妇女的社会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最终，正如无治主义者莉莉·盖尔·威尔金森所强调的，“对‘投票’的呼吁永远不会是对自由的呼吁。为了什么去投票？难道是为了登记同意去被这个或那个立法者所统治吗？”[Sheila Rowbotham 引用，同上，第 102 页] 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即等级制度和它所创造的专制社会关系，而父权制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集。只有摆脱所有政治、经济、社会 and 性方面的 Boss 们，才能实现妇女真正的自由，“使妇女有可能成为最真实的意义上的人。她内心渴望主张和活动的一切，都应该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所有的人为的障碍都应该被打破，在通往更大自

由的道路上，清除几个世纪以来屈服与奴役的一切痕迹。”[艾玛·戈尔德曼，同上，第214页]

A.3.6 什么是文化无政府主义

基于我们的目的，我们将文化无政府主义定义为，通过社会中传统上被认为属于“文化”领域，而非“经济”或“政治”领域的那些方面，来推广反权威价值观——例如，通过艺术、音乐、戏剧、文学、教育、儿童养育实践、性道德、科技，等手段。

文化表达，只有在故意攻击、削弱或颠覆那些，倾向于推广权威价值观和态度（尤其是支配与剥削）的传统文化形式时，才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因此，一部揭示军国主义罪恶的小说，如果它超越了简单的“战争即地狱”模式，并让读者看到军国主义如何与权威制度（如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或权威塑造方法（如传统家长制家庭中的养育方式）相联系，那么它就可以被视为文化无政府主义。正如约翰·克拉克所表达的那样，文化无政府主义意味着“发展艺术、媒体和其他象征性形式，以揭示支配体系的各个方面，并将其，与基于自由与社区的价值体系进行对比。”这种“文化斗争”将成为一场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后者旨在“通过多维度的解放实践，打击所有统治阶级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权力，无论是经济、政治、种族、宗教或性别的统治阶级。”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扩展的阶级分析概念”和“扩大的阶级斗争实践”，其范围不仅限于“罢工、抵制、工作行动、占领、直接行动组织以及自由工人团体联盟的建立、工人大会、集体和合作社的发展等经济行动”，还包括“政治活动”，例如“积极干预压制性政府政策的实施”，“对社会体制化和官僚化的不服从与抵抗”，以及“参与旨在增加直接决策参与和地方控制的运动。”[The Anarchist Moment, p. 31]

文化无政府主义至关重要，甚至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权威价值观被嵌入在一个全面的统治体系中，这个体系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外，还包含许多其他方面。因此，即便通过经济和政治革命相结合，也无法根除这些价值观，除非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大多数人深刻的心理变革。对当前体系的大规模默许，植根于人类的心理结构（用威廉·赖希的术语来说，即“性格结构”）。这种结构是由许多形式的塑造与社会化所产生的，而这些形式，随着家长制-权威文明在过去五六千年间的发展而逐步演化。

换句话说，即使资本主义和国家明天就被推翻，人们很快也会在其位置上创造新的权威形式。因为权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一条指挥链、某人来发号施令并使人免于独立思考的责任——正是顺从性/权威性人格最感到舒适的东西。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害怕真正的自由，而且事实上，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自由——这从一系列失败的革命和自由运动中可见一斑，其中自由、民主和平等的革命理想被背叛，迅速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这些失败通常归因于反动政治家和资本家的阴谋，以及革命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然而，反动政治

家之所以能吸引追随者，是因为他们发现普通人的性格结构，为其权威理想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因此，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前提是一个意识觉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在的顺从/权威特征，看到这些特征是如何通过社会化塑造的，并理解如何通过新的文化形式，特别是新的儿童养育和教育方法，来减轻或消除这些特征。我们将在 B.1.5 节（“威权文明的群众心理基础是什么？”）、J.6 节（“无政府主义者倡导什么样的儿童养育方法？”）和 J.5.13 节（“现代学校是什么？”）中，更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

几乎所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都共享文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并且将意识觉醒视为任何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践行）“在旧世界的壳中建立新世界”，是至关重要的；而创造无政府主义文化，正是这一活动的一部分。然而，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单纯的意识觉醒就足够了，因此他们将文化无政府主义活动与组织行动、使用直接行动、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自由意志主义替代方案，相结合。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个将实际的自我活动与文化工作结合的运动，这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支持。

A.3.7 有信仰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吗

是的，确实有。虽然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宗教和上帝的观念，认为它们不仅是极端反人性的，而且为世俗的权威和奴役提供了正当性；但少数宗教信仰者将他们的思想推向了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像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这些宗教无政府主义者，将反对国家与对私有财产和不平等的批判立场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并不一定是无神论的。事实上，根据雅克·埃吕尔的观点，“圣经思想直接导向无政府主义，而这是唯一符合基督教思想家观点的‘政治上的反政治’立场。”[彼得·马歇尔引述，《**Demanding the Impossible**》，p. 75]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受到宗教思想启发的无政府主义。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感性的首次明确表达，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中国道家”，并且“佛教，特别是其禅宗形式……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精神。”[同上, p. 53 和 p. 65] 一些人，如反全球化活动家斯塔霍克，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异教和灵性主义的影响结合起来。然而，由于宗教无政府主义通常表现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所以我们将在这里集中讨论它。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认真对待耶稣对他追随者所说的话：“君王和总督有支配人类的权力；你们中间不可有这样的事情。”类似地，保罗的格言提到“除了上帝，别无权威”被推向其显而易见的结论，即否认社会中的国家权威。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国家是在篡夺神的权威，个体则应当自我治理，并发现，（借用托尔斯泰著作的标题）“神的国度就在你们心中”。

同样，耶稣的自愿贫穷、他对财富腐化效应的评论、以及圣经中关于世界是

为人类共同享受而创造的主张，都被视为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基础。事实上，早期的基督教会（可以被视为一个解放奴隶的运动，尽管后来被同化为国家宗教），是基于物质财富的共产主义式分享。这一主题无疑继续出现在激进基督教运动中，灵感来源于诸如“所有信徒都在一起，共同拥有所有的东西，他们卖掉了自己的财产和物品，并根据每个人的需要分配给他”以及“那些信徒的群众是一个心志，一个灵魂，他们中没有人说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是自己的；他们共同拥有一切。”（使徒行传，2:44,45；4:32）

因此也不奇怪，圣经曾被用来表达被压迫者的激进自由意志主义愿望（这些愿望在后来的时代，会以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形式出现）正如布克钦在讨论基督教对“自由遗产”的贡献时指出的那样，“通过孕育不墨守成规的性格、异端的小团体、以及关于个人和信仰的权威问题，基督教不仅创造了一个集中的权威教皇制度，还创造了它的对立面：一种准宗教的无政府主义。”因此，“基督教的混合要旨，可以被分为两大类截然相反的信仰体系。一方面，是一种激进的、行动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基督教生活愿景”，而“另一方面，是一种保守的、静默的、物质上不世俗的和等级化的愿景。”[《自由的生态学》，p. 266 和 p. 274-5]

因此，1381 年英格兰农民起义期间，牧师约翰·巴尔做出这样的平等主义评论（彼得·马歇尔引述 [同上, p. 89]）：

“当亚当犁地，夏娃纺线时，

那时谁是绅士？”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包括中世纪的自由精神异端、众多农民起义以及 16 世纪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s）。基督教中的自由意志主义传统在 18 世纪再次出现在威廉·布莱克的著作中，而美国的亚当·巴卢也在 1854 年出版的《实践基督教社会主义》中得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结论。然而，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是通过著名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明确的分支。

托尔斯泰认真对待圣经传达的信息，并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反对国家。从他对圣经的阅读中，托尔斯泰得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结论：

“统治意味着使用暴力，使用暴力，意味着对受暴力对待的人做他不喜欢的事，而使用暴力的人显然也不希望自己遭受同样的待遇。因此，统治意味着对他人做我们不希望别人对我们做的事，也就是说，做错事。”[《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p. 242]

因此，真正的基督徒必须避免统治他人。从这一反国家立场出发，他会自然地支持从下而上自我组织社会的主张：

“为什么认为非官方的人不能自己安排生活，那为什么政府的人就可以不为自己安排，而是为别人安排他们的生活？”[《我们时代的奴役》，p. 46]

这意味着“人们只能通过废除政府来摆脱奴役。”[同上，p. 49] 托尔斯泰提倡非暴力地反抗压迫，认为个人精神上的转变是创造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关键。正如麦克斯·内特劳所论述的，“托尔斯泰强调的伟大真理是，善良、团结，以及一切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的、被称为爱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可以且必须，在我们的行为中，被唤醒、被发展、被实践。”[《无政府主义简史》，pp. 251-2] 毫不奇怪，托尔斯泰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的……他们唯一的错误在于认为无政府状态可以通过革命来实现。”[彼得·马歇尔引述，Op. Cit., p. 375]

像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托尔斯泰批判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他非常钦佩蒲鲁东，并受其深刻影响，认为后者的“财产即盗窃”是“一种绝对真理”，并且这种真理将“永远伴随人类文明”[杰克·海沃德引述，《**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p. 213] 像亨利·乔治（其思想也对托尔斯泰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样，他反对土地的私有财产，认为“如果不是为了保护土地财产，以及由此导致的土地价格上涨，人们就不会被挤进如此狭窄的空间，而是会分散到世界上那仍然很多的自由土地上。”此外，“在这场争夺[土地财产]的斗争中，受益的不是那些耕种土地的人，而是总是那些参与政府暴力的人。”因此，托尔斯泰认识到，除了使用之外的任何财产所有权都需要国家暴力来保护，因为持有权“总是通过习惯、公众舆论、正义和互惠的感觉来保护的，它们不需要通过暴力来保护。”[《我们时代的奴役》，p. 47] 事实上，他认为：

“数万英亩属于一个所有者的森林土地——而附近成千上万的人没有燃料——需要通过暴力来保护。同样的，几代工人一直受到欺诈并仍然被欺诈的工厂和作坊，也需要暴力来保护。更不用说数十万蒲式耳的粮食，属于一个拥有者，他在饥荒时将其囤积，准备以三倍的价格出售。”[同上，pp. 47-8]

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托尔斯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下，经济条件“迫使[工人]进入对资本家的、暂时或永恒的奴役”，因此“必须出卖自己的自由。”这适用于所有城乡劳工，因为“我们时代的奴隶不仅是那些工厂和车间的工人，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完全把自己卖给工厂和铸造厂的老板；几乎所有农业劳工也是奴隶，他们不停地在别人的田地上耕种别人收割的粮食。”这样一个制度只能通过暴力维持，因为“首先，他们的劳动成果被不公正地和暴力地从工人那里夺走，然后法律介入；仅凭这些一纸条文，就将这些被从工人那里夺走的——不公正地和通过暴力夺走的——东西，宣称为窃取者的绝对财产。”[同上，p. 34, p. 31 和 p. 38]

托尔斯泰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和身体上摧毁了个体，资本家是“奴隶驱使者”。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是资本家，因为“制造商就是一个收入来源于从工人身上榨取的价值的人，他的整个职业都基于强迫、非自然的劳动”，因此，“他必须首先停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摧残人类的生命。”[《神国就在你们心中》，p. 338 和 p. 339] 毫不奇怪，托尔斯泰认为合作社是“一个道德的、自尊的、不想参与暴力的人的，唯一社会活动形式。”[彼得·马歇尔引述，

Op. Cit., p. 378]

因此，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税收、土地所有权、使用物品或生产资料的财产”产生了“我们时代的奴役。”然而，他拒绝了国有社会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政治权力会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创造一种新的奴役形式。这是因为“奴役的根本原因是立法：即存在有权力去制定法律的人。”这需要“拥有权力的人通过组织化的暴力，来迫使别人遵守他们（掌权者）制定的法律——换句话说，迫使别人服从他们的意志。”将经济生活交给国家，意味着“将有一些人获得权力来管理所有这些事务。一些人将决定这些问题，而其他人将服从他们。”[托尔斯泰，Op. Cit., p. 40, p. 41, p. 43 和 p. 25] 他正确预言道，马克思主义胜利后“唯一发生的事情”将是“专制将被转移。现在是资本家在支配，但那时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将去支配。”[彼得·马歇尔引述，Op. Cit., p. 379]

由于他反对暴力，托尔斯泰拒绝了国家和私有财产，并提倡和平主义策略以终结社会中的暴力，并创建一个公正的社会。对托尔斯泰来说，政府只能通过大众拒绝服从、通过不参与政府暴力，和揭露国家主义的欺诈来摧毁。他拒绝了使用武力来抵抗或结束国家暴力的观点。正如内特劳所说，他“主张……反抗邪恶；并且在其中一种反抗方式——通过积极的力量——之上，他增加了另一种方式：通过不服从，通过消极的力量去反抗。”[Op. Cit., p. 251] 在他关于自由社会的理念中，托尔斯泰显然受到了俄罗斯农村生活的影响。他旨在创建一个以农民耕作集体土地、手工业者和小规模合作社为基础的社会。他拒绝工业化，认为工业化是国家暴力的产物，认为“现在存在的这种劳动分工……在自由社会中将是不可行的。”[托尔斯泰，Op. Cit., p. 26]

托尔斯泰的思想对甘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后者激励了他的同胞用非暴力反抗将英国赶出印度。此外，甘地所设想的自由印度作为一个由农民公社组成的联合会，类似于托尔斯泰的自由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愿景（尽管我们必须强调，甘地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美国的天主教工人团体也深受托尔斯泰（以及蒲鲁东）的影响，其创始人多萝西·戴（Dorothy Day）是一位坚定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她在1933年创立了该团体。托尔斯泰和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还可以在拉丁美洲和南美的解放神学运动中找到，这些运动将基督教思想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社会行动结合起来（尽管我们应该注意，解放神学更多地受到国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启发，而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中存在一种少数传统，他们从宗教中得出无政府主义结论。然而，正如我们在 [A.2.20 节](#) 中指出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意味着无神论，并且历史上，圣经思想与等级制度和对世俗统治者的辩护，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因为“崇拜或尊敬任何存在，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总会是一种自我屈服和奴役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将导致社会统治。正如[布克钦]所写的：‘人类一旦向任何高于自己存在的事物下跪，等级制度便已在自由之上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布赖恩·莫里斯，《生态学与无政府主义》，p. 137] 这意味着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同意巴枯宁的观点，即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为了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就必须废除它。鉴于圣经的内容，几乎没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可以用来证明自由意志主义思

想，而不是支持权威主义思想；他们并不感到惊讶的是，基督教的等级化一面，在其漫长（且通常是压迫性的）历史中，占主导地位。

无神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指出，圣经因提倡各种虐待而臭名昭著。那么，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调和这一点呢？他们是首先是基督徒，还是首先是无政府主义者？是追求平等，还是遵守圣经？对一个信徒来说，这似乎是毫无选择的。如果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那么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支持自己更极端的立场，同时又声称信仰上帝、祂的权威和法律？

例如，没有资本主义国家会实施圣经所阐述的，安息日不工作法则。大多数基督徒老板，一直乐意强迫他们的同信者在第七天工作，尽管圣经规定，如果违反此法，应该被石刑处死（“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出埃及记》35:2）。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会支持因违反上帝的法则，而处死工作的人吗？同样，一个允许用石刑处死新婚之夜不是处女之身的女子的国家，显然会被视为极其邪恶的。然而，这正是“圣书”中所指定的命运（《申命记》22:13-21）。那么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会将女性婚前性行为视为死罪吗？或者，像《申命记》21:18-21 中所述的那样，“顽梗悖逆，不听从父母的话”的儿子也会遭遇被“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的命运吗？那么，《圣经》对待女性的态度如何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歌罗西书》3:18）。她们还被命令“在教会里要保持沉默”（《哥林多前书》14:34-35）。里面还明确写到了男性主宰的观念：“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哥林多前书》11:3）

显然，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在应用圣经教义时，必须像非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徒一样，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富人很少宣扬贫穷的必要性（至少对他们自己来说如此），并且似乎（就像教会一样）乐于忘记耶稣关于富人难以进天堂的警告。例如，他们似乎乐于忽略耶稣的告诫：“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得着财宝在天；然后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21）。基督教右翼的信徒，并没有将这一点应用于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者说，甚至是他们的灵性领袖。很少有人将“凡求你的，就给他；拿走你的，不再求还。”（《路加福音》6:30，重申于《马太福音》5:42）作为生活准则。也很少有人像最初的基督徒一样“将所有的东西公有”（《使徒行传》4:32）。因此，如果无政府主义的基督徒，认为非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徒忽视了圣经的教义，那么他们所攻击的对象，也可以说前者同样忽视了圣经的教义。

此外，基督教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也难以与其历史调和。圣经被用来辩护不公的情况，远远多于用来反对不公的情况。在教会**事实上**掌握政治权力的国家，如爱尔兰、南美的一些地方，以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等地，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对宗教持强烈反感的态度，因为教会拥有压制异见与阶级斗争的力量。因此，教会的实际作用，与圣经是无政府主义文本的说法相矛盾。

另外，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是教条主义和极端的，他们认为（有时）需要暴力来反抗更大的邪恶。然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托尔斯泰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即个人价值观的转变是创造无政府

主义社会的关键方面，以及将非暴力作为一种普遍策略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必须强调，极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排斥在无法选择其他选项时，为自卫而使用暴力）。

A.3.8 什么是“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

历史学家乔治·理查德·埃森温（George Richard Esenwein）在其著作中提出，“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without adjectives）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指的是一种没有任何修饰标签的无政府主义形式，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互助主义或个人主义等限定性标签的学说。对于其他人而言……[它]只需理解为，一种容许不同无政府主义流派共存的态度。”（《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运动，1868-1898》，第 135 页）

出生于古巴的费尔南多·塔里达·德尔·马尔莫尔（Fernando Tarrida del Marmol），是这一表述的提出者，他于 1889 年 11 月在巴塞罗那首次使用了这一术语。他的评论针对的是当时西班牙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和集体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各自理论的优劣。“无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旨在展现无政府主义流派之间更大的宽容，并明确表示，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将任何预设的经济计划强加给他人——即使是在理论上，亦是如此。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偏好应当是“次要的”，而消除资本主义和国家才是首要目标，自由实验应是自由社会的唯一规则。

因此，这种被称为“*anarquismo sin adjetivos*”（“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视角，是运动内部激烈辩论的副产品之一。这场争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巴枯宁 1876 年去世后，共产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虽然它与集体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不同（正如詹姆斯·吉约姆（James Guillaume）在《巴枯宁论无治主义》一书中的“建立新社会秩序”一节所述，集体主义者确实认为他们的经济制度将演变为自由共产主义），但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深入发展了巴枯宁的思想，正如巴枯宁曾经发展和深化蒲鲁东的思想一样。共产无政府主义与如艾利塞·雷克吕（Elisee Reclus）、卡洛·卡菲耶罗（Carlo Cafiero）、埃里科·马拉特斯塔（Errico Malatesta）以及（最著名的）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等无政府主义者相关联。

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迅速取代了集体无政府主义，成为欧洲主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除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主要的问题并非共产主义问题（尽管对于里卡多·梅拉（Ricardo Mella）来说这也有一定影响），而是与共产无政府主义所暗示的战略和战术修改有关。在 1880 年代，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地方性的（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小组，普遍反对工会主义（尽管克鲁泡特金并不支持这一立场，因为他看到了工人组织的必要性），并且对组织化持一定的反对态度。毫不奇怪，这种战略和战术的变化引起了西班牙集体主义者的广泛讨论，因为他们强烈支持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

这一冲突很快蔓延到西班牙以外，讨论也进入了巴黎的《革命》（*La Revolte*）

杂志。这促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赞同马拉特斯塔的观点：“至少，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假设而发生争斗。”[引用自马克斯·内特劳（Max Nettlau）《无政府主义简史》第198-199页]在这之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共识，引用内特劳的话说：“我们无法预见未来的经济发展。”[同上，第201页]因此，他们开始强调共同点（即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反对），而强调对非自由社会如何运作的不同构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忽视工人运动使他们的思想未能触及工人阶级，而大多数集体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以及革命之后尽早实现这些理想的承诺。因此，两派无政府主义者能够合作，因为“在我们急于过分强调未来社会某些特征的过程中，因为这些特征在时间和地点上是会有所变化的，没有理由将自己分裂成小的学派。这种社会对我们来说过于遥远，无法让我们设想它的所有调整和可能的组合。”此外，在自由社会中，“联合与协议的方法和个人形式，或劳动和社会生活的组织，不会是统一的，我们现在无法就这些做出预测或决定。”[马拉特斯塔，引用自内特劳，《同上》，第173页]

因此，马拉特斯塔继续说道：“即使在无政府集体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之间的争论，也只是一个修饰、方法与协议的问题。”关键在于，无论采用何种制度，“一种新的道德意识将会诞生，这种意识会让工资制度，像今天的法律奴役和法律强制一样令人厌恶。”如果这一点实现了，“无论社会的具体形式如何，社会组织的基础都将是共产主义的。”只要我们“坚持基本原则……并尽最大努力将其灌输给大众”，我们就不需要“为了一些词语或琐事而争论，而应当引导革命后的社会走向正义、平等与自由。”[引自内特劳，《同上》，第173页和第174页]

同样，在美国，当时也存在着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辩论。本杰明·塔克认为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并非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而约翰·莫斯特则对塔克的观点持类似看法。正如梅拉和塔里达提出的，无政府主义各流派之间应保持宽容一样，伏尔泰琳·德克莱尔（Voltairine de Cleyre）也“仅仅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并像马拉特斯塔一样呼吁‘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因为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实验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以确定（该地区）最适合的社会形式。”[彼得·马歇尔所著的《要求不可能》，第393页]她曾表示，各种经济制度都可以“在不同地方得到有益的尝试。我希望每个社区人民的本能与习惯，能够在自由选择中得以展现；我相信，不同的环境会催生不同的适应形式。”[“无政府主义”，《非凡的反叛者》，第79页]因此，“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中间形态的社会形式，都将根据人民的本能与物质条件，在不同地区进行尝试……只有自由与实验才能决定最优的社会形式。因此，我现在仅仅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成长》，《伏尔泰琳·德克莱尔文集》，第107-108页]

这些辩论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德克莱尔、马拉特斯塔、内特劳、雷克吕等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都接受了“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所体现的宽容态度。（有关此问题的精彩总结，请参阅内特劳所著的《无政府主义简史》第195至201页。）此外，我们补充道，这一立场如今已成为无政府主义

运动中的主流观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承认其他流派对“无政府主义”这一名称的正当使用权，同时，他们仍然会对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所偏好，并提出自身对其他流派的批评。然而，我们必须强调，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如共产主义、工团主义、宗教无政府主义等等），并非相互排斥，人们不必支持其中一种而排斥其他。这种宽容精神正是“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这一表达所体现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试图利用“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所体现的宽容精神，来主张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应当被接纳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仅仅关乎消灭国家，而经济问题只是次要的。然而，这种对“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的利用是错误的，因为在当时，大家普遍认同所讨论的经济模式，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例如，对于马拉特斯塔而言，确实存在“那些预见并提出不同[于共产无政府主义]的解决方案和未来社会组织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与我们一样，渴望摧毁政治权力和私有财产。”他主张：“让我们摒弃思想流派的排他性”，并“在手段和方法上达成共识，共同前进。”[引自内特劳，同上，第 175 页] 换句话说，大家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必须与国家一同被废除，而在此基础上，自由的实验才能得以发展。因此，反对国家的斗争，只是消除压迫和剥削这一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不能将其与这些更广泛的目标割裂开来。由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并不寻求废除资本主义及国家，他们也就并非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所谓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关于“无政府”资本主义为何不属于无政府主义，请参见第 F 节。）

这并不意味着在革命之后，“无政府”资本主义社区不会存在。恰恰相反，如果一群人希望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他们当然可以这样做；就像我们可以预见某些支持国有社会主义或神权政治的社区，在革命后仍然会按照他们的制度生活一样。这样的等级制飞地可能会存在，因为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甚至在某个特定地区——所有人都同时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需要牢记的关键问题是，这样的体系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的，因此它也就不是“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

A.3.9 什么是无政府原始主义？

正如我们在 A.3.3 节中所讨论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情境主义者肯·克纳布（Ken Knabb）的观点，认为，“在一个解放的世界中，计算机和其他现代技术可以被用来淘汰危险或乏味的任务，从而让每个人专注于更有趣的活动。”显然，“某些技术——最明显的例子是核能——确实过于危险，毫无疑问会被迅速终止。许多其他生产荒谬、过时或多余商品的行业，也会随着其商业合理性的消失而自动终止。但许多技术……尽管目前可能被滥用，本身却几乎没有固有的缺陷。关键在于如何更理智地使用它们，将其置于公众控制之下，引入一些生态改良，并将其重新设计为服务于人类，而非资本主义的目标。”[《公开的秘密》，第 79 页和第 80 页] 因此，大多数生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采用适当的技

术，是创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的手段。

然而，一小部分激进的、自称为绿色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对此持不同意见。约翰·泽尔赞（John Zerzan）、约翰·摩尔（John Moore）和大卫·沃森（David Watson）等作家，提出了一种他们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愿景，声称这种愿景旨在批判一切形式的权力与压迫。这一思潮通常被称为“无政府原始主义”，摩尔认为，这只是“一个简要术语，代表从无政府主义视角对文明整体进行批判，并试图促成对人类生活的全面变革的激进思潮。”[《原始主义入门》（**Primitivist Primer**）]

这一思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极端的派别，寻求废除一切形式的技术、分工、驯化、“进步”、工业化，以及他们所谓的“大众社会”，甚至包括符号文化（如数字、语言、时间和艺术）。他们倾向于将包含这些特征的任何体系称为“文明”，并因此其目标是“摧毁文明”。至于他们希望“回归”到何种程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回归到工业革命前的技术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些人则更进一步，拒绝农业和任何超出最基本形式的技术。他们认为，回归自然、采用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是实现无政府状态的唯一途径，并完全排除，利用适当技术来建立基于工业生产、且对生态系统影响最小的无政府社会的想法。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原始主义杂志《绿色安那其》认为，像他们一样“优先考虑个人自主或野性生活价值观的人，有理由反对并拒绝一切大规模组织和社会。因为这些组织和社会无论其设立目的如何，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奴役和等级制度。”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它是“文明当前主要的表现形式。”然而，他们强调“因为文明，而非资本主义本身，才是制度化专制、强制性奴役和社会孤立的起源。因此，如果攻击资本主义而不针对文明，便永远无法消除滋养社会的制度化强制。借由工业集体化实现民主化的尝试注定失败，因为所有大规模的组织，都会采用独立于其成员意图的方向和形式。”因此，他们认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反对工业和技术，因为“等级制度、领土扩张和生活的机械化，都是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所必需的。”在原始主义者看来，“只有由自给自足的个人组成的小型社区，才能与其他生灵——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和平共存，而不对它们施加权威。”这种社区，将具有与部落社会类似的基本特征，“在人类历史的99%以上的时间里，人类生活在小型且平等的扩展家庭结构中，直接从土地中获取生存资源。”[《反对大众社会》（**Against Mass Society**）]

虽然这些部落社区——与自然和谐相处，且几乎没有等级制度——被视为原始主义的灵感来源，但无政府原始主义者展望的是，借用约翰·泽尔赞书名的说法，“未来的原始状态”。正如约翰·摩尔所言，“无政府原始主义所设想的未来……是没有先例的。尽管原始文化为未来提供了启示，并且未来可能会借鉴这些文化的元素，但无政府原始主义的世界将与以往形式的无政府状态大不相同。”[同上]

无政府原始主义者认为，其他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仅仅是在当前基本制度下进行自我管理式的异化。因此，摩尔评论道，“古典无政府主义”试图“接管文明，对其结构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并消除其中最严重的虐待和压迫。然而，在他们的未来设想中，99%的文明生活方式保持不变，因为他们质疑的文明方面微

乎其微……整体生活模式不会有太大改变。”因此，“从无政府原始主义的角度来看，无论它们是否认为自己是革命性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都显得是改良主义。”[同上]

对此，“古典无政府主义者”指出三点。首先，声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严重的虐待和压迫”仅占1%是完全荒谬的，甚至是资本主义辩护者都会欣然同意的观点。其次，从任何“古典”无政府主义文本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摩尔的说法毫无根据。“古典”无政府主义旨在从上到下彻底改造社会，而不是对其进行微小调整。原始主义者真的认为，那些付出巨大努力来废除资本主义的人，会简单地继续以99%的相同方式生活吗？当然不会。换句话说，消除老板并不是终点，而是必要的第一步！第三，最重要的是，摩尔的论点确保了他所设想的新社会根本无法实现。

由此可见，原始主义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其理念几乎没有关联。二者的愿景截然不同，原始主义者认为传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威权主义的，而无政府主义者则质疑原始主义在短期内是否可行，甚至长期上是否值得追求。尽管原始主义的支持者，喜欢将其描绘成最先进、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形式，但其他人对此几乎不认同。许多人同意肯·克纳布的观点，他认为原始主义“包含太多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处，以至于几乎无需对其进行详细批判。它们对过去社会的相关性是存疑的，对当前的可能性更是毫不相关的。即使假设在过去的某个时代生活更美好，我们仍然必须从当前的现实出发。现代技术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如果突然废弃，势必会造成全球性的混乱，数十亿人类生灵涂炭。”[同上，第79页]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和相互联系系统中，其中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在狩猎-采集甚至农业社会中生存所需的技能。此外，即便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技能，六十亿人能否在狩猎-采集的模式下生存，也是极其存疑的。正如布莱恩·莫里斯所指出的，“我们被告知，未来将是‘原始’的。然而，在目前养活近六十亿^①人口的世界中，如何实现这一点？（因为证据表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每平方英里最多只能支持1到2人），”但像泽尔赞这样的原始主义者却未曾解答这个问题。[“人类学与无政府主义，”载于《欲望武装的无政府主义》（*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杂志第45期，第38页]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同意乔姆斯基的总结，即“我不认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所主张的，是对数百万人的大规模屠杀，因为我们的社会是结构化和有组织的……如果消除这些结构，所有人都会死……除非对此进行深思熟虑，否则它根本不具备严肃性。”[《乔姆斯基论无政府主义》，第226页]

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原始主义的支持者同意其批评者的观点，即地球无法支持六十亿人以狩猎-采集者的方式生活。批评者认为，这为原始主义带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人口数量的减少需要时间。因此任何“原始主义”式的反叛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通过某种形式的“文明”崩溃实现；要么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文明”及其工业遗产被安全地废除，人口数量自然

^① 译注：截至目前（2025年1月），世界人口的数字约为81.7亿

下降至适当水平，人们逐步掌握其新生活所需的必要技能。

第一个选择的问题显而易见，但遗憾的是，许多原始主义作家都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例如，摩尔谈到“当文明崩溃时”（“无论是出于自身意愿、还是我们的努力，或是两者的结合”）。这意味着一个极其迅速的过程，而他进一步强调，“在崩溃导致的社会动荡中，将很轻松的创造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与社会真空，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独裁政权可能会蓬勃发展”，因此现在就必须建立“积极的替代方案”[同上]。以“崩溃”、“不安全感”和“社会动荡”为基础的社会变革，听起来就不像是成功革命的良方。

其次，原始主义所宣扬的反组织教条也是一个严重问题。摩尔的观点很典型，他断言“对无政府原始主义者而言，组织不过是个骗局，是一伙试图将特定意识形态推上权力地位的帮派”，并重申原始主义者主张“废除所有权力关系，包括国家……以及任何形式的政党或组织。”[同上] 然而，没有组织，现代社会根本无法运作。如果组织被彻底废除，结果将是全面且即刻的崩溃。不仅会导致大规模饥荒，还会引发生态灾难，例如核电站熔毁、工业废料渗入周围环境、城镇荒芜破败，以及成群饥饿的人在乡村争夺一切能找到的蔬菜、水果和动物。显然，反组织教条只能与文明迅速“崩溃”的想法相一致，而无法支持朝着长期目标的稳步推进。同样，若没有组织，又能建立多少“积极的替代方案”呢？

摩尔无视任何批判，并认为指出“文明”崩溃将导致大规模毁灭，是“纯粹的抹黑手段”，认为这是“一些敌视无政府原始主义的评论者所传播的奇怪幻想，他们暗示原始主义所设想的人口水平，必须通过大规模暴死或纳粹式死亡集中营来实现”。他声称，“无政府原始主义者致力于废除一切权力关系……这意味着此类有组织的大屠杀不仅不可能，而且纯粹是可怕的。”[同上] 然而，批评者并未声称原始主义者希望或计划组织大规模死亡，他们只是指出，文明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技能，而且地球也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来养活六十亿试图以原始主义者方式生活的人。

其他原始主义者则声称，地球是可以支持的，他们表示：“地球上当前六十亿人口，不可能都作为狩猎采集者生存；但对于那些无法狩猎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在显著较小的空间里自己种植食物……正如永续农业、有机园艺和本土园艺技术所证明的那样。”[《反对大众社会》] 不幸的是，他们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主张的真实性，也没有说明即使这一说法成立，人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掌握必要技能。这似乎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却决定了数十亿人的命运，只是为了让人类可以远离诸如医院、书籍和电力等“暴政”、“野性”且自由地生活。

面对这种“崩溃”可能带来的恐怖后果，那些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的原始主义者，最终不得不接受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例如，约翰·泽尔赞（John Zerzan）认为，“似乎有证据证明工业化和工厂不可能立即被消除，但同样清楚的是，必须拼尽全力来清除它们。”甚至城市的存在也被接受，因为“城市内部的耕作是实际过渡的另一个方面。”[《论过渡：〈未来原始主义〉的后记》（**On the Transition: Postscript to Future Primitive**）]

然而，接受过渡时期的必要性无非是暴露了原始主义内部的矛盾。泽尔赞指出，“通过再生产现行幽灵船（即其技术）的方法，不能用于打造一个解放的世界。”他质疑：“我们会保留什么？‘省力的设备’？除非它们不涉及任何劳动分工（例如杠杆或斜面），否则这个概念就是一个虚构；在所谓的‘省力’背后，隐藏的是众多人所凝结的苦役，以及对自然世界的破坏。”然而，这种观点如何与“在一段时间内保留工业化和工厂”的主张相容，却未被解释。同样，他认为，“摆脱工作的强制——如果没有这种强制，现代社会还能维持多少？——一个无拘无束的存在是立即的、核心的目标。”[同上]但这又如何与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工业的主张相容呢？这一问题既未被提出，更遑论被回答。而如果“工作”仍然继续，那么这又如何与原始主义者对“传统”无政府主义的典型批判——即自我管理不过是管理自身的异化，既然没有人愿意在工厂或矿井中工作，因此必须使用强制手段让他们去做——相一致呢？难道在原始主义的过渡时期，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会变得不那么异化和专制吗？

显而易见，人类的人口规模，在短时间内无法通过自愿手段显著减少。为了使原始主义成为可行的现实，全球人口需要减少约 90%。这意味着，即使依靠自愿手段，人口的急剧减少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来实现。考虑到几乎不可能让全球（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不生育，这一时间跨度几乎可以肯定需要几个世纪。因此，农业和大部分工业必须继续存在（城市人口的迅速外迁是不可能的）。同样，可靠的避孕手段是现代技术的产物，因此，生产这些手段的工业必须在这一过渡时期得以维持——除非原始主义者认为，人们在拒绝生育的同时，也要拒绝进行性行为。

然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工业社会的遗产，它不可能被简单地弃置而自行衰败。仅以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说，让核电站自行熔毁，显然并不符合生态环保的理念。此外，统治精英不太可能毫无抵抗地放弃其权力，因此，任何社会革命都必须具备抵御恢复等级制的能力。不言而喻，一个摒弃一切组织和工业、将其视为固有专制的革命，将无法做到这一点（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西班牙革命期间，工人们没有改造并利用他们的工作场所来生产必要的军事物资，那么与佛朗哥法西斯势力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矛盾。如果承认必须从“此处”过渡到“彼处”，那么原始主义就自动将自己排除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之外。原因很简单。摩尔声称“大规模社会”意味着“人们在人工的、技术化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并受到各种形式的强制和控制。”[同上]因此，如果原始主义者关于技术、工业和大规模社会的观点都是正确的，那么任何原始主义的过渡阶段，在定义上都不会是自由意志的。因为“大规模社会”在成功革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几十年，更可能是几个世纪），必须继续存在；而从原始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必然意味着“强制和控制的形式”将持续存在。有一种意识形态，主张需要一个基于强制、控制和等级制的过渡体系，并声称这种体系最终将消失，走向无国家社会。也和原始主义者一样，它同样认为，工业和大规模组织不可能在没有等级和权威的情况下运作。这种意识形态正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当“传统”无政府主义者，听到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重复恩格斯反对巴枯宁的论点，并将其作为支持“无政府状态”的依据时，这无疑是十分讽刺的。（关于恩格斯认为工业排除了自治的论点，可

参见 H.4 节的讨论。)

因此，如果任何过渡都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那么原始主义对“传统”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就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成为对有意义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和社会变革的阻碍。这暴露了原始主义核心的矛盾。虽然其支持者猛烈抨击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技术、组织、工作自我管理、工业化等方面，但他们自己在向原始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却必须依赖他们所反对的事物。而考虑到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激烈批评，不难理解为何其他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原始主义的过渡阶段根本无法实现。既要谴责技术和工业是固有的专制体制，又要在革命后提倡其使用，这在逻辑上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上都说不通。

由此可见，原始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它无法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提供实现其目标的可行手段。正如克纳布所总结的：“[原始主义]从对科学与技术的过度信仰提出合理质疑，最终却沦为一种绝望的、甚至不合理的信念，幻想回归到某种原始天堂；并且未能适应现存体系，而只是抽象地、末世论地加以批判。”要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现实的起点，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过渡时期应对各种实际问题。”[同上，第 80 页，第 79 页]可悲的是，原始主义意识形态排除了这一可能性，因为它将任何真正革命的出发点都视为固有的专制体制。此外，原始主义者通过设定极端的标准，确保任何大众运动都无法达到其革命要求，从而阻碍了真正的社会变革：

“那些自豪地宣布自己‘完全反对’一切妥协、一切权威、一切组织、一切理论、一切技术的人，通常完全没有革命的视角——他们没有任何，关于如何推翻现存体系或如何运作后革命社会的实际构想。有些人甚至试图以‘革命永远无法满足他们永恒的本体论反叛’这一说法，来为自己对现实策略的缺乏辩护。这种全有或全无的夸夸其谈，或许能暂时打动一些旁观者，但最终的效果不过是让人们变得无动于衷。”[克纳布，同上，第 31-32 页]

然后，关于实现原始主义的手段问题。摩尔认为，“无政府原始主义所设想的世界，在所预期的自由程度和类型方面，在人类经验中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不应该对可能发展（这种社会）的抵抗和反叛形式设限。”[Op. Cit.] 非原始主义者回应称，这表明原始主义者既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实现目标。同样，他们强调，必须对可接受的抵抗形式设限。这是因为手段决定结果，因此威权主义的手段将导致威权主义的结果。战术并非中立，支持某些战术实际上暴露了威权主义的立场。

这可以从英国杂志《绿色无政府主义者》(Green Anarchist)中看出来，该刊物代表了“原始主义”的极端派别。由于其对大多数人而言缺乏吸引力，因此它不可能通过自由意志手段（即个体通过自身行动自由的选择和创造）实现，因此不能被视为无政府主义，因为很少有人会自愿接受这样的状况。这导致《绿色无政府主义者》发展出某种形式的生态先锋队理论，借用卢梭的说法，即“强迫人们变得自由”。这一立场，体现在该杂志支持（非无政府主义者）“大学与航空炸

弹客”(Unabomber)^①的行动和理念，并发表了一篇由其中一位编辑撰写的文章《非理性主义者》(The Irrationalists)，其中声明：“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②实施者的思想是对的。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炸毁更多的政府办公楼……东京沙林毒气袭击^③的邪教组织也是对的。遗憾的是，他们在袭击一年前的测试中暴露了自己。”[Green Anarchist, no. 51, p. 11] 该言论的辩护文章刊登在下一期；而后在美国《无政府主义：武装欲望的期刊》(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第48至52期的信件交流中，另一位编辑将这一令人作呕的威权主义观点辩解为“在极端压迫条件下进行的非中介式抵抗。”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手段决定结果”的原则何在？这意味着战术必须有“界限”，因为某些战术并非，也永远不可能是自由意志主义的。

然而，只有少数原始主义者持有如此极端的立场。大多数“原始”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完全反对技术和文明，而是（借用大卫·沃森的表达）主张对“原始生活方式的肯定”，并且比社会生态学更为批判性地看待技术、理性和进步等问题。这些生态无政府主义者既拒绝“一种教条式的、主张我们可以以线性的方式回归原始根源的原始主义”，也拒绝“进步”观念，也就是“超越启蒙和反启蒙”的思想和传统。对他们而言，原始主义“不仅反映了国家兴起之前的生活图景，而且是对文明下现实生活的一种正当回应”，因此我们应当尊重并学习“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智慧传统”（比如与美洲原住民部落及其他土著群体相关的传统）。尽管我们“不能、也不愿意放弃世俗的思维方式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但我们无法将生命的体验，以及为何生活、如何生活的基本且不可避免的问题，简化为世俗术语……此外，精神与世俗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我们对历史的辩证理解，应当肯定一种具有灵性的理性，这种理性不仅尊重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西班牙无神论革命者，也尊重那些宗教和平主义良心犯、拉科塔族幽灵舞者、道教隐士以及被处决的苏菲神秘主义者。”[David Watson, **Beyond Bookchin: Preface for a future social ecology**, p. 240, p. 103, p. 240 and pp. 66-67]

这种“原始”无政府主义与一系列杂志有关，主要集中在美国，如《第五庄园》(Fifth Estate)。例如，在技术问题上，他们认为：“尽管市场资本主义是点燃这场大火的火花，并且仍然处于这一复杂体系的中心，但它仅仅是更宏大事物的一部分：即有机人类社会，被迫适应经济-工具化的文明及其大规模技术体系，这些技术体系不仅是等级化的、外部的，而且日益‘细胞化’并内化于个体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各种因素按照机械式的因果层级排列是毫无意义的。”[Watson, *Op. Cit.*, pp. 127-8] 基于此，原始主义者对技术的各个方面持更为批判的态度，包括社会生态学家所主张的使用适当技术来解放人类和地球的观点：

^① 注：西奥多·约翰·“泰德”·卡辛斯基 (Theodore John "Ted" Kaczynski, 1942—2023)，美国无政府原始主义支持者，本土恐怖主义者。曾在全美范围，针对他所认为推动现代技术和破坏环境的人邮寄或放置炸弹，截至1996年4月3日被捕时共造成3死23伤。因FBI对其案件代号为“大学与航空炸弹”(UNABOM)，得名Unabomber。

^② 注：于1995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发生的本土恐怖主义炸弹袭击，系2001年九·一一袭击事件前，美国本土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共造成168人死亡。

^③ 注：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是由奥姆真理教于1995年在日本东京策划实施的多起本土恐怖主义行为。事件共造成13人死亡，约6300人受伤。沙林(Sarin)，一种神经毒剂，历史上被用作化学武器。

“谈论技术社会实际上是指资本主义内部所产生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又进一步催生新的资本形式。认为存在一个独立的社会关系领域来决定这些技术的观点，不仅是不符合历史的、非辩证的，而且反映了一种简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 [Watson, Op. Cit., p. 124]

因此，技术的影响并不取决于谁在使用它，相反，技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由创造它的社会所决定。换句话说，如果通常是掌权者决定在社会中引入何种技术，那么技术的选择往往会强化等级权力（当然，受压迫者经常有利用技术反抗权力的优秀实践，而技术变革与社会斗争也是相互关联的——参见 D.10 部分）。因此，即使是使用“适当的技术”，也不仅仅是从现有的技术选项中挑选，因为无论谁使用这些技术都会产生特定的效果；而是需要对技术的各个方面进行批判性评估，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或摒弃，以最大化个人的自由、赋权和幸福。

然而，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被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说服。正如布赖恩·莫里斯所指出的那样，它将“最近八千年左右的人类历史”简单地视为“暴政、等级控制、缺乏任何自发性的机械化常规”的源头，“人类创造性想象力的所有产物——农业、艺术、哲学、技术、科学、城市生活、象征文化——都被泽尔赞以一种单一化的方式加以否定。” [Op. Cit., p. 38] 虽然没有理由盲目崇拜“进步”，但同样也没有必要将一切变革与发展一概视为压迫。无政府主义者同样不认可泽尔赞“对人类学文献的选择性筛选”。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的观点：

“生态运动若要真正产生影响，必须传递希望的信息，而不是绝望的信息。它不能倡导一种倒退、无法实现的回归到原始人类文化的路径；而应致力于人类的进步，致力于人类对生命整体的独特同理心……如果生态运动要在社会事务中发挥变革性和创造性的作用，我们必须重新找回乌托邦的冲动、希望，以及对人类文明中值得拯救之物的欣赏，同时认清哪些需要被摒弃。因为如果不改变社会，我们就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导致的、灾难性生态的走向。”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63]

此外，“时光倒流”的立场存在根本缺陷，因为虽然某些原始社会具有高度的无政府主义特征，但并非所有社会都是如此。正如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指出的：“我们对旧石器时代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从一些古老的头骨中获得的零星信息……但在较近的民族志记录中，我们看到的是无穷的多样性。曾经存在有贵族与奴隶的狩猎-采集社会，也有极力维护平等的农耕社会。即使在……亚马逊地区，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群体，比如皮亚罗亚人（Piaroa）；但在他们的旁边却有好战的谢伦特雷人（Sherentre），他们显然完全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pp. 53-4] 即便像泽尔赞所假设的那样，如果我们回溯得足够远，可能会发现人类曾普遍处于无政府部落的状态，然而事实仍然是，其中一些社会最终发展为国家主义和私有制社会。这表明未来的无政府社会，若仅仅以史前无政府社会的某些关键要素为基础，未必能够避免“文明”在相似的社会或环境因素下再度出现。

原始主义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即支持对原始生活方式的字面回归，和支持将原始生活方式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反对后一种立场，因为他们认识到，现状并不等于“更好”，因此，过去的文化和社会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可以为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提供启示。同样，如果“原始主义”仅仅意味着质疑技术的同时质疑权威，那么几乎没有人会反对。然而，这种理性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第一种立场所掩盖，即认为无政府主义社会应回归狩猎-采集社会。这一点可以从原始主义者的著作中看出（尽管一些原始主义者声称，他们并非以石器时代为理想社会的模型，也不主张回归狩猎采集生活，但他们对其他选择的排斥在其批判中显而易见）。

因此，认为原始主义仅仅是一种批判或某种“无政府主义者的推测”（借用约翰·摩尔的术语），似乎难以置信。如果将技术、组织、“大众社会”和“文明”视为固有的威权结构，那么在过渡时期甚至在自由社会中，你便无法再主张使用这些要素。因此，这种批判本身指向了一种行动模式和对自由社会的构想，否认这一点无异于自相矛盾。同样，如果你赞扬过去和现在的采集群体与游耕社区为无政府状态的典范，那么批评者完全有理由认为，原始主义者希望在未来建立类似的体系。这一点也因其对工业、技术、“大众社会”和农业的批判而进一步得到加强。

除非“原始主义者”明确表明他们到底属于上述哪一种立场，否则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不会认真对待他们的思想。考虑到原始主义者无法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例如如何在没有工人控制、国际联系和联邦组织（这些通常被他们视为新的“统治”形式）的情况下，安全地废除工业并避免大规模饥荒——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对其实现，不抱有太大的期望。最终，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革命将在现存社会中发生。无政府主义承认这一现实，并提出了改造社会的途径。而原始主义却回避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因此，在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原始主义并没有多少值得推崇之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原始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由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拥有相同程度的技术。事实远非如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建立在自由实验的基础之上，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将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寻求较低技术生活方式的人将可以自由选择，而那些希望应用（适当）技术成果的人也同样享有自由。同样，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和（资本主义）进步要求的斗争。

关于“原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更多内容，可以参阅约翰·泽尔赞的《未来原始社会》，以及戴维·沃森的《超越布克钦》和《反对巨型机器》。肯·纳布的《原始主义的贫困》以及布赖恩·奥利弗·谢泼德的《无政府主义与原始主义》，则是对原始主义的出色批判。

A.4 有哪些主要的 无政府主义思想家？

尽管早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Gerard Winstanley 和 William Godwin 就分别在他们的书(**The New Law of Righteousness,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中揭示了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原理。但知道 19 世纪后半叶，无政府主义才作为一个被系统化发展的连贯的理论而出现。而这一开始主要归功于这四个人：一位德国人，麦克斯·施蒂纳 (*Max Stirner*, 1806-1856); 一位法国人，皮尔·乔瑟夫·蒲鲁东 (*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 和两位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 (*Michael Bakunin*, 1814-1876)和彼得·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1842-1921)。他们将劳动人民中普遍流传的思想，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

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诞生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氛围中。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提出）的思想，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极端形式。他将每个独特的个体置于一切之上——国家、财产、法律或义务，而他的思想至今仍是无政府主义的基石。施蒂纳抨击资本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而他基于利己主义的、对对资本主义和支持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批判，则奠定了社会无政府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基础。为了取代国家和资本主义，麦克斯·施蒂纳主张建立“利己主义者联盟”，即由唯一个体组成的、平等合作的自由联盟——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的自由，并满足他们的渴望（包括团结这样情感上的渴望，也就是施蒂纳所说的“人际交往”）。这种联盟是非等级性的，因为正如施蒂纳所想，“在这样的联盟中，如果其中大多数成员允许自己最天然、最明显的利益被忽视，这实际上还会是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吗？当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奴隶或仆从时，他们真的能成为联合起来的‘利己主义者’吗？”[**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24]

从定义上说，个人主义并不包括改变社会现状的具体方案，这也是皮尔·乔瑟夫·蒲鲁东，第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所努力去改变的。他的互助主义、联邦主义，以及工人自我管理联合的理论，对无政府主义作为群众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也在其中清楚地阐明了，无政府主义世界应该如何去运作和协调。毫不夸张地说，蒲鲁东的著作奠定了无政府主义作为反国家和反资本主义运动和思想的基本性质。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塔克都声称从他的思想中得到了启发，而这些思想是社会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直接源泉。这之中的每条流派都强调互助主义的不同方面（例如，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互助主义的联合方面，而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方面）。蒲鲁东的主要著作包括《什么是所有权》(**What is Property**)、《经济体系的矛盾》(**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联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和《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the Working Classes**)。他在《大革命的总体思想》(**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中对互助主义进行了最详细的论述。他的思想对法国工人运动以及 1871 年巴黎公社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米哈伊尔·巴枯宁在蒲鲁东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他谦虚地表示，他自己的思想不过是蒲鲁东的“广泛发展并可以直接推得的.....最终结果”。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98] 然而对于他在无政府主义发展中的作用来说，有些过于自谦了，因为巴枯宁是近代无政府主义活动和思想发展的核心人物。他强调集体主义、群众暴动、**革命**和参与激进的**劳工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建立自由的、无阶级社会的手段。此外，他否定了蒲鲁东的性别歧视，并在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社会罪恶中加入了父权制。巴枯宁还强调在人性 and 个性中的社会天性，反对自由主义的抽象个人主义，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否定。他的思想在 20 世纪的激进工人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他的许多思想与后来被称为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几乎相同。巴枯宁影响了许多工会运动，尤其是在西班牙，1936 年那里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他的作品包括《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他唯一完成的著作）^①、《上帝与国家》、《巴黎公社与国家理念》等。萨姆·多尔戈夫（Sam Dolgoff）编辑的《巴枯宁谈无治主义》（Bakunin on Anarchism）是其主要著作的优秀合集。布莱恩·莫里斯（Brian Morris）的《巴枯宁：自由的哲学》则是一本介绍巴枯宁生平和思想的优秀书籍。

彼得·克鲁泡特金是科学家出身，他对现代社会状况进行了精密细致的无政府主义角度的分析，并为未来社会开出了一剂彻底的药方——**共产无政府主义**——一个至今仍是无政府主义者中最广为流传的理论。他认为**互助**是个人发展和成长的最佳途径，指出人类（和其他物种）**内部的**竞争往往不符合物种的最佳利益。与巴枯宁一样，他强调直接的、经济的、阶级斗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任何群众运动，并尤其强调工会的重要性。他借鉴了蒲鲁东和巴枯宁的**公社**思想，将他们的见解概括为：在自由社会当中社会、经济和个人生活是如何运作的。他的目标是将无政府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研究社会中目前明显存在的、且可能预示着社会进一步演变的趋势”，与此同时，他还敦促无政府主义者“直接在劳工组织中宣传他们的思想，并引导这些工会直接与资本斗争，而不要寄希望于议会立法”。[Anarchism, p. 298 and p. 287] 与巴枯宁一样，他也是一位革命家，他的思想也激励着全球各地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互助论》、《面包与自由》、《田野、工厂和作坊》、《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为自己而行动》、《国家：它的历史作用》、《一个反叛者的话》等。他的革命主义书集以《无政府主义》之名出版，是对他的思想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此外，Graham Purchase 的《进化与革命》和 Brian Morris 著的《克鲁泡特金：社群政治学》都是对他的思想，以及为什么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极好诠释。

然而，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创始者”提出的各种理论并不互斥：它们在许多方面相互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个人主义与我们的私人生活密切相关：只有承认他人的独特性和自由，并与他们结成联盟，我们才能保护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独特性和自由；互助主义则与我们与他人的一般关系有关：通过相互协作和合作，我们才能确保自己不为他人工作。无政府主义下的生产是集体主义的，人们为自己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在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世界中，决策也是人们共同做出的。

^① 注：《上帝与国家》一开始是其未完成的手稿，在他死后的 1882 年才发表于世。

还应该强调，无政府主义各学派**并不是**以无政府主义者个人来命名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巴枯宁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或者“克鲁泡特金主义者”^①（这里只是举出三种可能的情况）。引用 Malatesta 的话，无政府主义者“追随思想而非个人，并且反抗这种将思想原理与人绑定的习惯”。但这并不妨碍他称巴枯宁为“我们伟大的大师和启蒙者”。[Errico Malatesta: *Life and Ideas*, p. 199 and p. 209] 同样，由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所写的东西，也并非都必然是自由意志主义的。比如说巴枯宁，仅仅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才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然而这无法阻止马克思主义者利用他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的说的话，来攻击无政府主义）。蒲鲁东则在 19 世纪 50 年代脱离了无政府主义，直到 1865 年去世前，才重新回到相对更偏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如果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与他们类似，克鲁泡特金或塔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协约国的言论，也与无政府主义无关。因此，如果说因为蒲鲁东是一头性别歧视的蠢猪，所以无政府主义就是有缺陷的，这种说法根本无法说服无政府主义者。就好像，没有人会因为卢梭对妇女的看法与蒲鲁东一样具有性别歧视，而否定卢梭提出的民主理念一样。也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分析无政府主义者前辈的著作，是为了汲取灵感，而不是遵循教条。也因此，我们会摒弃他们非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而保留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理论发展的积极贡献。我们很抱歉在此赘述，但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许多“批评”，基本上都是指出早已作古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消极部分，而这种做法的愚蠢之处显而易见。

当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没有因为克鲁泡特金的离世而停止发展；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不仅仅是这四个人的产物。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有许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活动家的理论。例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在世时，也从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那里汲取了一些思想。更具体地说，巴枯宁借鉴了 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中蒲鲁东追随者的实践活动。而克鲁泡特金虽然与共产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发展关系最密切，但在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他只是第一国际中的自由意志主义派别，在巴枯宁死后所形成的思想的、最著名阐释者。因此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全球数以万计的思想家和活动家的产物，而每个人都在其中塑造和发展无政府主义理论，以满足他们作为社会变革运动其中一部分的需要。虽然这里还可以列举许多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只能提及其中的几位。

在德国，施蒂纳也并不是唯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也涌现出了许多独创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曾因观点激进而被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开除，不久后便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对他而言，无政府主义是“人在国家、教会和资本的偶像中解放出来的表现”；他反对“**国有社会主义**、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官僚主义”，主张“自由结社和联合、没有权威”。他的思想是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思想的结合，认为发展自我管理的社区和合作社是改变社会的手段。他最著名的见解是：“国家是一种条件，是人与人

^① 译注：然而时至今日，仍有部分中国政治历史学者，称第一国际时巴枯宁提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巴枯宁主义”。这种称法显然有误。

同时，可能会有读者注意到，英语中会使用 *Makhnovist*（直译为“马赫诺主义者”）来称呼俄国内战中追随马赫诺的人。该词源于乌克兰语 *Махновець*，意为“属于马赫诺的人”，“马赫诺的追随者/支持者”。虽然考虑到马赫诺作为相当具象化的运动家和指挥官（同时也是一名思想家），这样的直译未为不可。但在后文的翻译中，虽更多地采用“（马赫诺）黑军/马赫诺派”或“乌克兰革命起义军”的译名。

之间的某种关系，与行为模式；我们通过缔结其他关系，并彼此之间表现得不同来破坏它。” [quoted by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410 and p. 411] 他是 1919 年慕尼黑革命的领导者，并在之后的镇压期间被德国政府杀害。他的《为了社会主义》一书是对其主要思想的极好总结。

另一位著名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是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起初，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但他看到了投票制度的无用，并在一次撰文反对德皇和神职人员而遭流放之后，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与其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宣传家，他的革命性的话语，激励了无数人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还有鲁道夫·罗克（Rudolf Rocker），一名职业书籍装订工，在东伦敦的犹太劳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详见他的自传《伦敦岁月》（**The London Years**））。他还撰写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导言；在《无政府主义与苏维埃主义》等文章中分析了俄国革命；并在《西班牙的悲剧》等宣传册中为西班牙革命辩护。他的《民族主义与文化》，通过对政治思想家和强权政治的研究，实现了对人类的历代文化透彻的分析。他剖析了民族主义，并解释了为什么民族是国家的结果而非国家的成因，并驳斥了关于种族科学的一派胡言。

在美国，艾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和亚历山大·贝克尔曼（Alexander Berkman）是两位具有领跑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戈尔德曼，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并集两家之大成，形成了一个充满激情和力量感的理论。她还将无政府主义置于女权主义理论和活动的中心地位，同时，她也是工团主义的倡导者。（见她的著作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以及题为 **Red Emma Speaks** 的文章和谈话集）艾玛的终身伴侣，亚历山大·伯克尔曼，编写过一本介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又名《什么是共产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 ABC》）与戈尔德曼一样，他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劳工运动，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演说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生》一书精选了他的优秀文章、书籍和宣传册）两人都参与了无政府主义期刊的编辑工作，其中戈尔德曼主要参与编辑《大地》（**Mother Earth**）（详见 Peter Glassgold 编辑的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而伯克尔曼主要负责编辑《爆破》（**The Blast**）（此杂志在 2005 年全文再版）。1917 年，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因反战活动被捕，两份刊物也因此而停刊。

由于他们在 1917 年的革命活动让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变得激进，1919 年 12 月，他和戈尔德曼两人被美国政府驱逐到俄国。在那里，由于他们被认为是危险分子，而不予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自由。整整两年后，他们的护照到手后，才允许他们离开俄国。1921 年 3 月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屠杀最终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的独裁统治，意味着俄国革命的死亡。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也同样非常乐于看到，这两位坚持原则的真正革命者的离去。离开俄国后，伯克尔曼撰写了大量关于革命前途命运的文章（包括《俄国的悲剧》和《喀琅施塔得叛乱》），并将自己的日记出版成书，名为《布尔什维克的神话》。戈尔德曼在这之后也创作了她的经典作品《我对俄国的幻灭》，并出版了她著名的自传《过我自己的生活》。她还抽出时间在《托洛茨基反对了太多》（**Trotsky Protests Too Much**）一书中，驳斥了托洛茨基关于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谎言。

在美洲的其他地方，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Ricardo Flores Magon）于1905年成立了（名字很奇怪的）**墨西哥自由党**，并在1906年和1908年组织了两次反抗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统治的起义；虽然都没有成功，但却为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奠定了基础。借由他的报纸 **Tierra y Libertad**（《土地与自由》），他影响了当时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以及萨帕塔的农民军。他反复强调，必须把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民不被欺骗”，才能“把土地……工厂和矿山的所有权……还给人民”。在谈及农民军（萨帕塔军队）时，里卡多的兄弟恩里克指出，他们“或多或少都倾向与无政府主义”；且因为双方都是“直接的行动派”，（并且）“他们的行动完全是革命性的。他们追猎富人、权贵和祭司”，“把私有财产权和官方的准则烧成灰烬，且推翻了划分私人财产的藩篱”——所以双方完全可以合作。[quoted by David Poole, **Land and Liberty**, p. 17 and p. 25] 里卡多作为政治犯死在美国监狱中，而讽刺地是，他被墨西哥政府视为革命英雄。他的大量著作收录在《**自由之梦**》一书中。（书中有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传记文章，将他的作品置于历史背景中，讨论了他的影响）

在意大利，也有着强大而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并因此涌现出了一些最优秀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埃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为无政府主义在世界各地奋斗了50多年，他的著作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理论作品中最优秀的那一批。对于那些对他的实用性和启发性思想感兴趣的人来说，他的宣传册《**无政府主义**》是不可不读的。弗农·理查兹（Vernon Richards）编辑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和《**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都收录了他的文章。他最喜欢的写作技巧是使用对话，如《**在咖啡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对话**》。这部作品以他与非无政府主义者的对话为基础，通过清晰、朴实的方式阐释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另一本对话录《**Fra Contadini：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对话**》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马拉泰斯塔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似乎即将到来的1920年，于意大利印刷发行了10万册。当时马拉泰斯塔主编了《**Umanita Nova**》（意大利第一份无政府主义日报，发行量很快达到50000份），并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联盟（一个拥有约20000名成员的全国性无政府主义组织）撰写纲领。在一次工厂占领活动中，67岁的他与其他80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一起被捕。其他值得一提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还包括马拉泰斯塔的朋友路易吉·法布里（Luigi Fabbri）。（遗憾的是，他的作品很少被翻译成英文，比如《**资产阶级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无政府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路易吉·加莱尼（Luigi Galleani）提出了非常有力的反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并在《**无政府主义的终结？**》一书中）宣称“共产主义仅仅是个人有机会调节自己和履行职能的经济基础”。卡米洛·贝尔内里（Camillo Berneri）在西班牙革命期间被共产主义者杀害；他继承了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批判性、实践性无政府主义的优良传统。他对克鲁泡特金联邦主义思想的研究堪称经典（《**彼得·克鲁泡特金：他的联邦主义思想**》）。他的女儿玛丽·路易丝·贝尔内里（Marie-Louise Berneri）在不幸早逝之前，也为英国无政府主义报刊做出了贡献（见她的 **Neither East Nor West: Selected Writings 1939-48** 和 **Journey Through Utopia**）。

在日本，八太舟三（Hatta Shuzo）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将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推向了新的方向。为了给他及他的数千名同志所活跃在的、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提供一种具体的替代选择，他创造了一种被称为“真正的无政府

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摒弃了工团主义的某些方面，组织工人成立工会并与农民合作，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佃农的觉醒”就是“建立我们所渴望的新社会的基石”。他们的新社会建立在工农结合的去中心化公社的基础上，正如八太的一位同志所说：“村庄将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农业村庄，而是一个工农结合的合作社会。”八太驳斥了那些试图回到“辉煌的往日”的观点，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与中世纪主义者完全相反。我们寻求将机器作为生产手段，而且实际上，我们还希望发明出更加巧妙的机器”。[quoted by John Crump, **Hatta Shuzo and Pure Anarchism in Interwar Japan**, p. 122-3, and p. 144]

个人无政府主义的“教皇”，毫无疑问是本杰明·塔克。塔克在他的《代替书籍》(**Instead of Book**)中，用他的聪明智慧攻击了所有他认为是自由的敌人的人（主要是资本家，但也包括一些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塔克将克鲁泡特金和其他共产无政府主义者逐出了无政府主义，而克鲁泡特金没有反过来这么报复）塔克以约西亚·沃伦、莱桑德·斯普纳、斯蒂芬·珀尔·安德鲁斯和威廉·B·格林等著名思想家为基础，将蒲鲁东的互助主义改编成适合前资本主义美国条件的无政府主义（详见鲁道夫·罗克的《**美国自由的先驱**》）。为了防止国家通过干预的手段，有目的地建立资本主义来侵害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农，塔克主张通过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非资本主义市场来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在这之中，通过互助银行以及“占有和使用”土地与资源的权利，用来建立资本主义的四种国家垄断将被废除。他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并与蒲鲁东一样）认识到所有非劳动收入都是盗窃，因此反对利润、租金和利息。他翻译了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经济矛盾体系**》以及巴枯宁的《**上帝与国家**》。塔克的同胞约瑟夫·拉巴迪是一名活跃的工会会员，也是塔克的报纸《**自由**》的撰稿人。他的儿子劳伦斯·拉巴迪在塔克去世后接过了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火炬，他认为“各行各业自由，是将人类提升到更幸福状态的最大可能手段”。

毫无疑问，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是与宗教无政府主义有关的，最著名的作家，并且也在传播与这一理念有关的精神与和平主义思想方面影响最大。托尔斯泰对基督教进行了激进的诠释，强调个人的责任和自由高于无意识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而后者正是主流基督教的标志；这一思想也影响了甘地和创建了天主教工人运动的多萝西·戴（Dorothy Day）。托尔斯泰的作品与另一位激进自由意志主义天主教徒——威廉·布莱克的作品一样，启发了许多基督徒在主流教会的掩盖下，从上帝的信息中解读出自由意志主义的愿景。因此，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与托尔斯泰一样认为，“基督精神的真正意义就是政府的终结”（详见托尔斯泰的《**天国与你同在**》与彼得·马歇尔的《**威廉·布莱克：有远见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近现代，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民主的威慑**》、《**必要的幻想**》、《**新世界和旧世界**》、《**世界秩序**》、《**流氓国家**》、《**霸权还是生存**》等著作中）和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著有《**后稀缺无政府主义**》、《**自由的生态学**》、《**走向生态社会**》和《**重塑社会**》等），使社会无政府主义运动始终处于政治理论和分析的前沿。布克钦的著作将无政府主义置于绿色思想的中心，持续威胁着那些，希望神秘化或腐败化创建生态社会的运动的人。《默里·布克钦读本》收录了他的代表性著作。遗憾的是，在去世前几年，布克钦与他花了近四

十年时间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渐行渐远（尽管他至死仍是一名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乔姆斯基最著名的作品是用详实的资料对美帝国主义、及媒体运作方式的批判，但除此之外，他也写了大量关于无政府主义传统和思想的文章。最著名的是他的随笔《无政府主义笔记》（收录于《国家的理由》），以及他在《客观性与自由主义学术》（收录于《美国权力与新官僚》）中针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为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所做的辩护。这些文章，以及他的其他一些更明确的无政府主义文章和访谈，都收录在《乔姆斯基论无政府主义》（Chomsky on Anarchism）一书中。有关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其他资料来源还有《激进的优先事项》（Radical Priorities）、《语言与政治》（Language and Politics）和宣传册《未来的政府》（Government in the Future）。《理解权力》（Understanding Power）和《乔姆斯基读本》（The Chomsky Reader）也都是介绍他思想的极好读物。

英国也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希伯特·雷德（Hebert Read，可能是唯一一位被授予骑士勋章的无政府主义者！）撰写了多部关于无政府主义哲学和理论的著作（参见他的《无政府与秩序》文集）。他的无政府主义直接源于他的审美关注，而且他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不仅对无政府主义的传统主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表达方式，还经常为无政府主义报刊撰稿（见自由出版社出版的文章集《一个人的宣言》和其他著作）。另一位和平无政府主义者是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除了撰写了《性之乐》，康福特还是一位积极的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特别地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角度出发，撰写关于和平主义、精神病学和性政治的文章。康福特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书籍是《权威与犯罪》。他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册和文章集，以《反对权力与死亡的作品》为名出版。

然而，最著名且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无政府主义者莫过于科林·沃德（Colin Ward）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驻扎在格拉斯哥，接触到当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从而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后，他为无政府主义报社做出了大量贡献。除了担任《自由》杂志的编辑外，他还在20世纪60年代编辑了颇具影响力的《安那其》月刊（沃德挑选的部分文章可在《无政府的十年》一书中找到）。不过，他最有名的一本著作是《行动中的无政府状态》。他在书中更新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一书，揭示并记录了即使是在资本主义下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住房的文章，强调集体自助和社会管理住房的重要性，以对抗私有化和国有化这两大害虫。（详见他的书《占有房屋》和《住房：无政府主义者的处理方式》）他还以无政府主义的眼光看待许多其他问题，包括用水问题（《反映在水中：社会责任危机》）、交通问题（《自由出行：汽车时代之后》）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他的《无政府主义：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是了解无政府主义及其独特观点的良好起点，而《谈谈安那其》则是对他的思想和生活的绝佳概述。最后，我们也必须在这里提一下阿尔伯特·梅尔策（Albert Meltzer）和尼古拉斯·沃尔特（Nicolas Walter），他们两位都为无政府主义报刊做出了大量贡献，并撰写了两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简介（分别是《无政府主义：支持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据》和《关于无政府主义》）。

我们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还有很多作者我们还没有提到。^①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普通”无政府主义激进行动派——他们从未著书立说，却用他们的理智和行动激发了社会中的反抗精神，并帮助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建立新世界。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无政府主义诞生于群众之中；并且只有当它仍然是群众的东西时，它才会继续充满生机和创造力。” [Anarchism, p. 146]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上述只专注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介绍，不应被理解为在运动中，活动家和思想家之间存在某种差异。反而，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是纯粹的思想家或活动家，他们通常兼而有之。例如，克鲁泡特金就曾因行动主义而入狱，马拉泰斯塔和戈尔曼也是如此。马赫诺，作为俄国革命中最为著名的积极参与者，也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为无政府主义报刊撰写过理论文章。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也是如此，她在巴黎公社期间的激进活动，以及巴黎公社后在法国开展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并不妨碍她为自由意志主义的报刊撰写文章。我们只是指出一些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以便感兴趣的人可以直接阅读他们的思想。

A.4.1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吗？

有。而且有数不尽的思想家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有来自自由主义体系的，也有的来自社会主义体系。尽管这可能听起来令人惊讶，但是无政府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有联系。显然，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流派，而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更倾向于社会主义流派。

当然，正如尼古拉斯·沃尔特所说：“无政府主义既可以看成从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发展而来，也可以看作从两者共同发展而来；和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想要平等。”然而，“无政府主义并不仅仅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我们和这两者从根本上相区别。” [About Anarchism, p. 29 and p. 31] 在这一点上他与罗克尔在《无政府工团主义》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而这也对我们了解无政府主义与其他理论之间的联系很有帮助。但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提出了从无政府主义角度的批判，所以我们不应将无政府主义的独特性埋没在其他哲学理论中。

[A.4.2 节](#) 讨论了那些接近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 [A.4.3 节](#) 则集中列举了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这里甚至有马克思主义者将自由意志

^① 作者在这里没有列举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发展的人物，译者这里稍作补充。吴稚晖在 1906 年组织世界社，并于 1907 年创周刊《新世纪》，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因此，无政府主义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之一，并对当时的进步人士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在之后中国共产党崛起后日渐式微。刘师复于 1910 年创立支那暗杀团，从事针对清朝高官的暗杀活动，后随 1912 年中华民国的建立而自行解散。同年他创立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发行刊物《晦鸣录》、《民声》，却因独自负担刊物的所有工作而过劳早逝。前两位均于 1905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为近代中国寻求出路。巴金，近现代著名翻译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翻译过许多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相关的书籍文章，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重要贡献。

主义的思想注入他们的政治理念中，而我们会在[第 A.4.4 节](#)去讨论他们。以及当然，有一些思想家不是能这样很容易地划分，所以我们会把他们放在这里讨论。

经济学家戴维·埃勒曼（David Ellerman）为工作场所的民主所辩护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他在《民主的工人所有制企业》和《经济学中的财产与契约》等书中，明确将自己的思想与英国早期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联系起来，并基于权利和劳动财产为基础，同资本主义为自我管理而辩护。他认为：“当今的经济民主主义者是**新废奴主义者**，他们试图废除整个‘租用’人类的制度，转而支持工作场所的民主自我管理”，而他的（这种）“批判并不新鲜；它发展自启蒙运动中，权力不可剥夺的学说。废奴主义者用它来反对自愿的自我奴役契约，政治民主主义者则用它来反对非民主政府为自愿契约的辩护。” [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 p. 210] 任何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对生产者合作社制替代工资奴隶制感兴趣的人，都会对他的著作产生浓厚的兴趣。

埃勒曼不是唯一指出合作所带来好处的人。阿尔菲·科恩（Alfie Kohn），在克鲁泡特金对互助研究的基础上，也针对合作的益处发表了一些重要著作，因此也引起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的兴趣。在《没有竞争：反对竞争的案例》和《犒赏的惩罚》中，科恩（通过大量经验证据）讨论了竞争对竞争者的负面影响与缺点。他通过在书中探讨了经济和社会问题，表明竞争并不像人们所吹捧的那样。

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卡洛尔·帕特曼，是受自由意志主义影响最明显的思想家。独立于埃勒曼，帕特曼也为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协会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她基于自由意志主义角度分析卢梭的论点，提出了对契约理论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分析。如果一定要给帕特曼的作品赋予一个主题，那就是自由、以及自由的含义。对她来说，自由就是自主决定，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支配关系。因此，她从她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参与与民主理论》开始，就一直倡导参与式民主。在这本关于参与式民主的开创性研究著作中，她揭露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局限性；并通过分析了卢梭、密尔和科尔的著作，提出了参与有益于每个参与的个体的实证性证据。

在《政治义务的问题》一书中，帕特曼讨论了“自由派”关于自由的论点，认为这些论点都站不住脚。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一个人必须同意被另一个人统治，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允许，当然也可能永不会允许被统治。因此，自由主义的国家就缺乏了合理的解释。她进一步分析，质疑为什么自由必须和“同意被统治”划等号，并提出了一种参与式民主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人们集体地进行自主决定（一种对同胞，而非对国家自我承担的义务）。当提到克鲁泡特金，她注意到社会无政府主义传统和她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关联性。

帕特曼在《性契约论》一书进一步发展了上述分析，并在书中剖析了古典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她分析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所谓“契约主义”理论的缺陷，指出它导向的不是自治个体的自由联合，而是基于威权、等级和权力的，少数统治多数的社会关系。她也·对国家、婚姻和雇佣劳动的进行了深刻的自由意志主义角度的分析，表明自由必须不

仅仅意味着“同意被统治”。而这就是资本主义下自由主义的悖论，因为一个人被假定是自由的，从而可以同意签订合同；但一旦签订合同，他们就会面临从属于他人决定的现实。（我们将在 A.4.2 节中进一步讨论）

她的思想挑战了西方文化中对个人自由的一些核心理念；而她对启蒙运动中主要的政治哲学家的批判，也同样令人信服。她不仅批判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还批判了左派中的父权制和等级制度。除了这些作品之外，她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名为《女性的混乱》（**The Disorder of Women**）。

在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表现出对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敏锐意识，而她的作品本身也具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之所以称其为“所谓”，是因为“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员实际上是国际主义者；他们寻求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而非是由少数人强加、为少数人服务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她首次引起广泛关注是通过她的著作《No Logo》，该书记录了消费资本主义的增长，揭露了光鲜品牌背后的黑暗现实；更重要的是，书中突出体现了针对这种现实的反抗。她并非远离现实的学术研究者，而是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这些运动在她的《篱笆与窗》（**Fences and Windows**），一本关于全球化及其后果、以及针对其的抗议浪潮的随笔集中，有所记述。

克莱恩的文章写得精彩且引人入胜，涵盖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正如她所说，“贫富之间的差距，就是言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言与所行之间的差距。全球化做出的承诺与其实际造成的影响之间的差距。”她展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即资本）越“自由”，人们越是遭受着更强大的国家权力和压制的世界。她举例说明，一位未经选举产生的阿根廷总统，是如何将该国的民众集会打上“反民主”的标签的。关于自由的说辞，是如何被用来捍卫日益扩大的私人权力的。（正如她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讨论中，总是缺失关于权力的问题。我们关于全球化理论的许多辩论，实际上是在讨论权力：谁拥有它，谁行使它，谁掩饰它——假装它不再重要”。）[**Fences and Windows**, pp 83-4 and p. 83]

提到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抵制全球化的，她提到：“（这场运动中的）许多人们已经厌倦了在讨论中被代表，他们要求更直接的政治参与形式”。她报道了自己参与的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的目标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一次“建立在透明性、责任心和自决原则基础上的全球化”，一次“解放人民而不是解放资本的全球化”。这就意味着反对“由企业驱动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正在将权力和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同时提出一种替代方案，即“下放权力，建立起基于社区决策的潜力——无论是通过工会、邻里、农场、村庄、无政府主义集体还是原住民自治”——所有这些都是强有力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她希望人们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并记录了世界各地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尝试（克莱恩指出，其中许多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他们中有的知道（自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启发），有的不知道）[同上, p. 77, p. 79 and p. 16]

虽然她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她意识到真正的变革来自于下层，来自于工人阶级为争取更美好世界而进行的自我活动。权力下放是这本书的一个关键思想。

正如她书中所说，她所描述的社会运动的“目标”，“不是为自己夺取权力，而是挑战原则上的权力集中”，从而创造“一种充满活力的直接民主的新文化——一种由直接参与推动和加强的新文化”。她没有敦促让这场运动选一个新领导人，也没有（像左派一样）认为选举几个领导人为我们做决定，就等于“民主”。（“目标不是更合适的、遥远的规则和统治者，而是实实在在的、近距离的民主”）因此，克莱恩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真正的社会变革是对基层民众的赋权，“对自决权、可持续性的经济，和参与式民主的渴望。”并基于此，克莱恩向广大读者传达了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同上, p. xxvi, p. xxvi-xxvii, p. 245 and p. 233]

其他著名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包括亨利·戴维·梭罗、阿尔贝·加缪、阿道司·赫胥黎、刘易斯·芒福德和奥斯卡·王尔德。因此，有许多思想家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并讨论了自由意志主义者感兴趣的主体。正如克鲁泡特金一百年前指出的那样，这类作家的作品“充满了各种思想，显示出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思想中的解放人类的努力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既要解除国家的束缚，也要摆脱资本主义的枷锁。”[《无政府主义》，第300页]与那时唯一的变化是，这份名单上可以添加更多的名字。

彼得·马歇尔在其关于无政府主义历史的著作《追求不可能》(Demanding the Impossible)中讨论了我们在本节及后续章节中提到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非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思想。此外，克利福德·哈珀的《无政府主义：图解指南》(Anarchy: A Graphic Guide)也是了解更多相关内容的有用参考。

A.4.2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吗？

正如在[上一小节](#)提到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中都有一些思想家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理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政府主义与这两个传统都共享某些思想和理念。

然而，正如即将在[A.4.3](#)和[A.4.4节](#)中进一步阐明的，无政府主义与其所归属的社会主义传统有更多共同点。这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极具精英主义色彩的传统。洛克^①及其所启发的自由主义传统，旨在为等级制度、国家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辩护。正如卡罗尔·佩特曼 (Carole Pateman) 指出的，“洛克描述的自然状态，也就是其父系统治者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显然不会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睐”，就像他对社会契约和由此产生的对自由主义国家的设想一样。根据佩特曼的描述，这个国家的“政治相关成员仅限于拥有大量物质财产的男性”，其存在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财产关系，而不是打破它们。”对于大多数没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通过“在成年后选择留在出生国”来表示对少数人“默许的同意”，并接受他们的统治。[《政治义务问题》(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p. 141, p. 71, p. 78 and p. 73]

^① 注：约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英国哲学家，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

因此，无政府主义与可以说与亲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存在根本上的分歧。因为它传统上源于洛克的思想，逻辑上基于他对等级制度的辩护。正如大卫·埃勒曼（David Ellerman）指出的那样，“有一个完整的自由主义传统，基于同意原则为非民主政府辩护，即通过自愿的社会契约将统治权让渡给掌权者。”在经济领域，这一逻辑体现在他们对雇佣劳动及其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专制的支持，因为“雇佣合同是此类契约在现代职场中的有限版本。”[《民主的工人拥有企业》（**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第 210 页] 这一亲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归结为拥有选择主人的自由——或者如果你是足够幸运的少数人，你就拥有成为主人的自由。自由意味着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自我决定权，而在这里，“自由”则是基于“自我所有权”的概念，即你“拥有”自己和自己的权利。因此，你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让渡）你的权利和自由。正如我们在 [B.4 节](#) 中讨论的那样，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在清醒时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婚姻中），都处于专制的规则之下。

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对应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冯·哈耶克（von Hayek）等人相关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传统。由于他们的目标是将国家的作用缩减为仅仅是私人财产的捍卫者，和由社会制度创造的等级制度的执行者，这根本没法想象和无政府主义有任何相近之处。在美国，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传统是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并与无政府主义一样，与那些极力为最小化国家辩护的亲资本主义支持者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虽然后者（有时）愿意谴责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但他们却非常乐意国家捍卫财产所有者的“自由”，并允许国家对使用其土地或资本的人施加完全相同的限制。

鉴于封建主义将所有权与统治权结合在一起，即认为对土地上居民的治理权是土地所有权的附属属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右翼“自由意志主义”传统不过是封建主义的现代的（自愿版本的）形式。相较于自由意志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与封建领主毫无区别——后者反对国王的权力，以保护自己对土地和农奴的控制权。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那样，“在美国和英国流行的‘自由意志主义’学说……在我看来，无非是沦落为对某种非法形式的权威的辩护，而这往往是对真正暴政的支持。”[**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 p. 777] 而且正如本杰明·塔克在谈到他们的前辈时指出的那样，虽然他们乐于抨击任何有利于大众或限制大众权力的国家法规；但对于那些有利于少数人的法律（以及相关法规和“权利”），他们却保持沉默。

然而，还有另一种本质上是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更为接近。正如乔姆斯基所说：

“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源于启蒙运动；其根源在于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洪堡的《国家行动的界限》，以及康德在为法国大革命辩护时坚持的观点，即——自由是获得成熟的前提，而不是在成熟后被授予的礼物……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新的、未曾预料到的非公正体系随之出现。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继承并扩展了启蒙运动的激进人文主义信息，并将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发展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用来维持新兴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事实

上，正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同样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同样是不可容忍的。例如，从洪堡的经典著作《国家行动的界限》中，这一点就很明显。该书预见并可能启发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部于1792年完成的自由主义经典作品，其本质上是深刻的、却有点为时过早的反资本主义作品。其思想必须被大幅削弱，才能被转化为一种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笔记”（Notes on Anarchism），《国家的理由》（For Reasons of State），第156页]

乔姆斯基在他的文章《语言与自由》（Language and Freedom）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点（该文收录于《国家的理由》（Reason of State）和《乔姆斯基读本》（The Chomsky Reader）中）。除了洪堡和密尔，这些“前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者还包括激进派人物托马斯·潘恩。潘恩设想了一个基于手工业者和小农的社会（即一种前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中有大致的社会平等，以及显然的，最小限度的政府。他的思想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激进派。正如E.P. 汤普森提醒我们那样，潘恩的《人权》（Rights of Man）是“英国（和苏格兰）工人阶级运动的，奠基性的文本。”虽然他对政府的看法“接近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理论”，但他的改革建议“为二十世纪的社会立法指明了方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第99页、第101页和第102页] 潘恩对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关注使他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十分接近。

接下来是亚当·斯密^①。虽然右翼（尤其是“自由意志主义”右翼的一些派别）将他视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他的思想比这更加复杂。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的，斯密之所以倡导自由市场，是因为“它将带来完全的平等，即生活条件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机会的平等。”[Class Warfare, p. 124] 正如斯密本人所说：“这一个社会中，哪里让事物按照它原本的进程发展，哪里就有完美的自由”，所以“各种职业的优势将很快回归到其他职业的水平。并因此，劳动和资本的不同职业必须……要么完全平等，要么不断趋于平等。”此外，他并不反对国家干预或国家对工人阶级进行援助。例如，他主张通过公共教育来对抗劳动分工的负面影响。但斯密抵触国家干预的原因是，每当“立法机构试图调整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差异时，其顾问总是雇主。因此，当法规对工人有利时，那它总是公正和公平的；但如果对雇主有利，情况则相反。”他指出，“法律”会“非常严厉地惩罚”工人联合，而对雇主联合则视而不见（“如果公正对待，它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雇主”）。[《国富论》，p. 88 and p. 129] 因此，斯密通常反对国家干预，是因为国家由少数人掌控，且为少数人服务；而这会导致国家干预倾向于有利于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如果斯密目睹了企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很可能不会维持对自由放任政策^②的观点。然而，那些将亚当·斯密归为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人，通常会有意地忽略他作品中的这些批判性内容。

乔姆斯基认为，斯密是“一个具有启蒙运动根源的前资本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他进一步指出，“古典自由主义者，比如（托马斯·）杰斐逊和斯密，反

^① 注：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国富论》等

^②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种认为政府和法律不应该干涉企业、经济和人们生产生活的政策理念

对他们在周围看到的权力集中……但他们没有预见到后来才出现的其他形式的权力集中。如果他们确实地看到了这些新形式，他们将并不喜欢它们。杰斐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强烈反对他所看到的，出现在发展中的权力集中，并警告说，当时刚刚出现的银行机构和工业公司将摧毁革命的成果。”[同上, p. 125]

正如默里·布克钦指出的，杰斐逊^①“在美国早期历史上最明确地与独立农场主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联系在一起。”[*The Third Revolution*, vol. 1, pp. 188-9] 换句话说，他的立场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密切相关。我们还发现，杰斐逊将“贵族派”和“民主派”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前者“害怕和不信任人民、想把所有权力从人民手中集中到上层阶级手中。”而民主派则是“认同并珍视人民，对人民充满信心，并把他们视作公共利益的诚实而安全的保管者”，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最明智的。”[quoted by Chomsky, *Powers and Prospects*, p. 88] 乔姆斯基指出，“贵族派”实际上是“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拥护者，而杰斐逊对此深感不安，他认识到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同上, p. 88] 克劳迪奥·J·卡茨的论文《托马斯·杰斐逊的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Thomas Jefferson's Liberal Anticapitalism"）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 1 (Jan, 2003), pp. 1-17]

杰斐逊甚至曾主张，“偶尔发生一点叛乱是件好事……它是维持政府健康运转所必需的良药……自由之树需要不时地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引自 Howard Zinn, 《美国人民的历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94] 然而，他身为美国总统和奴隶主的身份损害了他的自由主义信誉。不过，与其他“建国元勋”相比，他的自由主义更具民主性质。正如乔姆斯基提醒的那样，“所有建国元勋都憎恨民主——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部分地例外，但仅仅是部分地例外。”美国，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引用詹姆斯·麦迪逊的话说——其设计是为了“保护富裕的少数人免受多数人的侵犯。”或者如约翰·杰伊的原则所言，“拥有这个国家的人理应统治它。”[*Understanding Power*, p. 315] 如果说美国（形式上）是一个民主制国家而不是寡头制国家，与其说是因为有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幸亏有它的影响。

然后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他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中的根本矛盾。一个宣称支持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能够支持那些在实践中系统性地剥夺自由的制度？正因如此，密尔抨击了父权制婚姻，认为婚姻必须是平等的双方之间自愿地结合，基于“平等中的同情……在没有一方拥有权力或另一方必须服从的情况下，在爱中共同生活。”他拒绝了“必须有一个绝对的主人”的观念，并指出在“商业合伙关系中，未曾发现或认为有必要规定在每个合伙关系中，必须由一名合伙人完全控制事务，而其他则必须服从他的统治。”[*"The Subjection of Women,"* quoted by Susan L. Brown,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p. 45-6]

然而，他的观点本身也揭示了自由主义支持资本主义的缺陷。因为雇员受制于雇佣关系中，在其中，权力集中于一方，而另一方必须服从。因此，他主张“如

^①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第三任美国总统，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果人类继续进步，最终应当占主导地位的协作形式，不应是资本家作为领袖、工人没有对管理的发言权的那种形式；而是工人们在平等条件下组成的协会，共同掌握资本……并由他们自己选举和罢免经理。”[《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147] 在工作时间内实施专制管理，显然与密尔的格言相悖——“不论在身体上还是思想上，个人对自己拥有主权”。密尔对中央集权政府和工资奴役的反对，使他的思想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更接近无政府主义。他还指出，“未来的社会原则”是“如何将最大限度的个人行动自由——与全球原材料的共同所有权，以及所有人对联合劳动带来成果的平等分享——结合起来。”[quoted by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164] 密尔对个性的辩护在《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该书并不是完美无瑕。此外，他对社会主义倾向的分析（《论社会主义章节》(*Chapters on Socialism*))也值得一读，从（民主）自由主义的视角，评估了社会主义的优缺点。

与蒲鲁东类似，密尔也是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先驱，同时也是去中心化与社会参与的坚定支持者。对此，乔姆斯基认为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前资本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其根本原因在于更深层次的假设，即人类对自由、多样性和自由结社的需求。基于相同的假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雇佣劳动、竞争以及‘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必须被视为是从根本上反人性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应被视为启蒙运动中自由主义理想的继承者。”[*Notes on Anarchism*", *Op. Cit.*, p. 157]

因此，无政府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形式有共同点。然而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希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破灭。正如鲁道夫·罗克在分析中所指出的：

“自由主义与民主，本质上是非常卓越的政治概念。但是由于大多数最初的支持者仍持有过时的所有权观念，当经济发展开始与民主、与自由主义原始的原则难以调和时，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两者。民主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口号，自由主义则主张‘人拥有对自身的支配权’，但这两者都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现实中触礁。只要每个国家的数百万劳工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少数财产所有者，并在找不到买主时沦为最悲惨的贫困者——那么所谓的‘法律面前的平等’就只是一种虚伪的欺骗，因为法律是由那些掌握社会财富的人制定的。同样，‘拥有对自身的支配权’也无从谈起，因为当一个人为了免于挨饿而被迫屈从于他人的经济支配，这种权利便终结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0页]

A.4.3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吗？

无政府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在非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中，无政府主义找到了最多的志同道合者。

英国最早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即所谓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在罗伯特·欧文的影响下提出了与无政府主义相似的思想。例如，托马斯·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提出了与蒲鲁东互助主义类似的思想，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则发展了一种非国家的、基于“相互合作的社区”的社会主义，而这与无政府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汤普森曾是互助主义者，但在意识到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也存在问题后，转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约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而激进的土地改革主义者托马斯·斯宾斯（Thomas Spence）则提出了一种基于土地共有的社会主义形式，其中包含了许多通常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思想（参见布莱恩·莫里斯的《生态与无政府主义》一书中《托马斯·斯宾斯的农业社会主义》一章）。此外，早期的英国工会运动“逐步发展出了一种工团主义理论”，而这比巴枯宁和第一国际的自由意志派提出类似理论早了 40 年。[E.P. Thompson,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 912 页] 诺埃尔·汤普森（Noel Thompson）的《人的真正权利》（*The Real Rights of Man*）一书中对这些思想家和运动做了很好的总结，而 E.P. Thompson 的社会历史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则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与政治状况）。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并未消亡。在 20 世纪 10 年代和 20 年代，还出现了作为准工团主义者的行会社会主义者（Guild Socialism），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由工人控制工业的去中心化共同体体系。G·D·H·科尔

（G·D·H·Cole）的《行会社会主义再述》（*Guild Socialism Restated*）是该学派最著名的作品，其他代表人物还包括 S.G. 霍布森（S.G. Hobson）和 A.R. 奥雷奇（A.R. Orage）。杰弗里·奥斯特加德（Geoffrey Ostergaard）的《工人控制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Workers' Control*）对行会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出色的概述。另一个行会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对无政府主义思想颇感兴趣，并在其经典著作《通往自由之路》（*Roads to Freedom*）中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并富有见解的讨论。

虽然罗素对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但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社会应该接近的终极理想”。作为一名行会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直到企业中参与生产的工人也能够控制生产的管理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或民主”。他对理想社会的愿景，也是任何无政府主义者都会支持的：“一个充满创造精神、生机勃勃的世界，一个生活将会是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冒险的世界；一个用所有物去建造的冲动，将取代对持有财产的占有欲或对他人的掠夺欲的世界。这个世界必须是一个情感自由流动的地方，爱从支配的本能中净化出来，残忍和嫉妒被幸福所驱散，所有会促进生命与精神愉悦的本能都能得以不受限制地发展。” [quoted by Noam Chomsky, *Problems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 pp. 59-60, p. 61 and p. x] 罗素涉猎广泛，观点深刻，其思想和社会行动主义对许多其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诺姆·乔姆斯基。（他的《知识与自由的问题》（*Problems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也广泛探讨了罗素所关注的一些主题）

另一位重要的英国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是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莫里斯是克鲁泡特金的朋友，曾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者联盟^①，并领导其中的反议会派。尽管他强调自己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与大多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间几乎没有实质性区别（莫里斯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并认为没有必要在其之后附上“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就是民主和解放的）。作为艺术与工艺运动^②的杰出代表，莫里斯主张让工作更具人性化。他在著名的论文《有用的工作与无用的劳作》(Useful Work vs Useless Toil)中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他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描绘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基于共同体手工艺的经济模式取代了工业化。这样的乌托邦长期以来吸引了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有关莫里斯思想的讨论及其在著名乌托邦小说中的体现，可参考《威廉·莫里斯与〈乌有乡的消息〉：我们时代的愿景》(William Morris and News from Nowhere: A Vision for Our Time，斯蒂芬·科尔曼和帕迪·奥沙利文主编)。

值得注意的还有希腊思想家，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起初他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因为托洛茨基斯大林俄国——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分析漏洞百出，卡斯托里亚蒂斯先是拒绝了列宁主义，随后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转变使他得出了自由意志主义的结论，即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谁拥有生产资料，而在于等级制度。因此，他认为阶级斗争的本质是掌权者与被权力支配者之间的冲突。这一观点使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其价值分析抽象化了（也就是忽略了！）作为生产过程中核心的阶级斗争。（虽然自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反对这种解读，但他们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唯一持不同观点的派别）。卡斯托里亚蒂斯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认为未来社会应建立在彻底的自治、普遍的自我管理，以及自下而上的工人委员会基础之上。他的三卷作品合集《政治与社会著作》(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是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彻底批判，以及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政治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作品。

这里还需特别提到莫里斯·布林顿(Maurice Brinton)。除了翻译卡斯托里亚蒂斯的许多作品外，布林顿本人也是一位重要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与卡斯托里亚蒂斯一样，他曾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后来为革命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开辟了一片政治空间；他还反对工党的官僚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警察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导致这一体制的列宁主义中的威权主义。布林顿撰写了大量关键的宣传册，影响了一代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这其中包括《巴黎：1968年5月》(Paris: May 1968)，这是他对法国革命前夕时期的精彩见证；还有重要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揭示了列宁对工人自我管理的敌视态度；以及《政治中的非理性》(The Irrational in Politics)，这是对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早期思想的重新阐释与发展。这些作品与更多的文章，收录在大卫·古德韦(David Goodway)主编的《为了工人权力：莫里斯·布林顿选集》(For Workers' Power: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Maurice Brinton)一书中。

^① 社会主义者联盟(Socialist League)：建立在1884年末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

^② 艺术与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出现在19世纪末的艺术与美术领域的国际趋势

美国激进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有时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并对无政府主义传统有深入了解（他曾为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一本美国版著作，撰写了一篇名为《无政府主义》出色的导论）。除了其经典著作《美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外，他关于公民不服从与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著作也是必读佳作。名为《津恩读本》（The Zinn Reader）的优秀文集，收录了这位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学者的重要文章。其他接近无政府主义的重要自由社会主义者还包括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可参阅希拉·罗博萨姆（Sheila Rowbotham）的《爱德华·卡彭特：新生活的预言家》（Edward Carpenter: Prophet of the New Life））以及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压迫与自由》（Oppression and Liberty））。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基于工人自我管理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有相似之处。这些思想家拒绝中央计划，转而支持由蒲鲁东等人倡导的——工业民主和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尽管同样来自马克思主义背景，但他们与那帮支持中央计划的对头们关系不大。艾伦·恩格勒（Allan Engler）在《贪婪的使徒》（Apostles of Greed）种，以及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在《反对资本主义》（Against Capitalism）和《后资本主义》（After Capitalism）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一种以合作组织的工作场所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构想。虽然在政治理念上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和国家角色，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将经济自我管理置于其经济构想的核心。因此，他们会比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更接近无政府主义。

A.4.4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吗？

在上一节中提到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大多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威权主义的。然而，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流派都是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在自主管理社会的愿景上，与无政府主义高度契合。这些流派包括：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情境主义（Situationism）和自治主义（Autonomism）。或许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些最接近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与无政府主义的诸多分支一样，并未以个人的名字命名。接下来，我们将依次介绍这些思想流派。

委员会共产主义诞生于1919年的德国革命。受到俄国苏维埃启发，并对主流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中央集权、机会主义和背叛行为感到厌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与无政府主义者自巴枯宁以来类似的结论——反议会、直接行动和去中心化。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自由意志派对手相似，他们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以工人委员会的联合体为基础，因此强调建立激进的工作场所组织，从而推动工人委员会的形成。列宁在他的批判性文章《左派共产主义的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中猛烈抨击了这些运动及其支持者；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赫尔曼·戈特（Herman Gorter）则在《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Comrade Lenin）中对列宁的批评进行了有力的驳斥。1921年，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彻底决裂，因为他们已经事实上被排除在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共产国际之外。

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认为俄国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党独裁政权，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并再一次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还主张，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与革命本身一样，除非由人民亲自完成，否则将注定失败。同样，他们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以及工会）的接管破坏了革命，并恢复了压迫与剥削。

想要进一步了解委员会共产主义，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的作品非常值得一读。虽然马蒂克最著名的作品是《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与危机理论》和《经济学、政治学与通货膨胀时代》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但马蒂克自 1919-1920 年的德国革命以来，一直是一名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他的著作《反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布尔乔亚最后的避难所？》是了解其政治思想的优秀入门书籍。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的著作同样不可错过。他的经典之作《工人委员会》从基本原则出发解释了委员会共产主义，而《作为哲学家的列宁》则剖析了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塞尔日·布里希亚内（Serge Bricianer）的《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是对潘涅库克思想发展的最佳研究）

在英国，激进的妇女参政权斗士——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成为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并与盖·奥尔德雷德（Guy Aldred）等无政府主义者一起，领导了反对将列宁主义引入英国共产主义的运动（了解英国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更多细节可参见马克·希普韦的《反议会共产主义：英国工人委员会运动，1917-1945》）。奥托·鲁勒（Otto Ruhle）和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也是该传统中的重要思想家。

在委员会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情境主义者将这些理念往新的方向上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他们将委员会共产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及其他激进艺术形式相结合，深刻批判了战后资本主义。与影响他们的卡斯托里亚迪斯不同，情境主义者始终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扩展为对资本主义全社会的批判，认为异化^①已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中。他们创造“景观”一词，用以描述了这样一个社会体系——在其中，人们与自己的生活相疏离，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和观众。资本主义首先将“存在”转变为“拥有”；而现在的“景观”当中，它又将“拥有”转变为“呈现”。情境主义者认为，我们不能再等待遥远的革命，而应改在此时此地就解放自己——通过创造能够打破日常与常规的事件（“情境”），从而撼动人们被社会赋予的角色，并从中解放出来。基于完全独立的基层大会和自主管理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将会是最终的“情境”，也是所有情境主义者的目标。

尽管对无政府主义持批判态度，情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其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接受了情境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欣赏他们将颠覆性的现代艺术与文化用作革命目的，以及他们对日常生活变革的呼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情境主义将自身

^① 异化（Entfremdung[德]，Alienation[英]）：哲学术语，用以描述原本自然互相归属或和谐的两物彼此分离、甚至互相对立。

视为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尝试，其传统最终却基本被无政府主义吸收。情境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居伊·德博（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和拉乌尔·瓦内盖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由肯·克纳布编辑的《情境主义国际文选》是任何有志成为情境主义者的必读之作，克纳布的《公开的秘密》同样值得一读。

最后是自治马克思主义。该理论汲取了委员会共产主义、卡斯托里亚迪斯、情境主义等思想的精华，将阶级斗争置于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自治马克思主义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意大利兴起，内部派别众多，其中有些与无政府主义的联系更为紧密。最著名的自治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可能是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他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中创造了著名的习语：“金钱只有一张面孔，那就是老板的面孔。”然而，他的思想更接近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若寻求与无政府主义更为接近的自治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可以关注美国的思想家与活动家，哈里·克里弗（Harry Cleaver）。他撰写了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最佳概述之一，在其中清晰地指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与自治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见《无政府主义研究》第 2 卷第 3 期中的《克鲁泡特金、自我增值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他的著作《政治解读资本论》是理解自治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的必读书目。

在克里弗的观点中，“自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广义术语，涵盖了各种运动、政治理念和思想家。他们强调工人的自治力量——一种独立于资本、与其官方性的组织（如工会和政党）的自治。此外，它还包括特定工人阶级群体（如独立于男性的女性）的自治行动能力。“自治”指的是工人阶级自主定义自身利益并为之斗争的能力，尤其强调不仅仅对剥削做出被动的反应，而是主动采取行动，以塑造阶级斗争的方式定义未来。因此，自治马克思主义将工人阶级的力量置于其对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研究其发展、动态以及内部的阶级冲突。这种斗争不仅仅局限于工作场所，比如工人在工厂或办公室通过怠工、罢工和破坏等方式抵制强加的工作；同样也包括失业者抵制将他们的生活简化为“工作”。在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是将来时，而是在工人阶级自我行动的新形式中不断被创造和重塑。

自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自治马克思主义者花费大量时间分析和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以证明他们的观点；否则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效仿列宁对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将他们贴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并忽视他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种频繁引用马克思的做法显得非常有趣。说到底，如果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位自治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为什么自治派要如此费力地重构马克思所要表达“真正”的含义？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同样，为什么要挖掘马克思那些（有时候晦涩难懂的）引言或（偶然提及的）评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马克思未曾提及某个观点，难道它就不再正确了吗？尽管自治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洞见颇有价值，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依赖，可能将其政治理论束缚在两位早已作古的德国思想家的作品中。这就如同 20 世纪 20 年代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围绕“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展开的辩论，双方通过引用列宁的言论进行争论。这样的辩论最终并不能证明某一观点是否正确，而只能显示该权威人物（列宁或马克思）可能持有过该

观点。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建议，自治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与恩格斯时，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自治”精神。

其他接近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他们都尝试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思想结合，提出对资本主义、及其引发的性格障碍的激进分析。埃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为自己的人》《健全的社会》和《占有还是存在？》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而有洞见的分析。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如何塑造个体，并建立起真实生活与自由之间的心理屏障。弗罗姆的作品涵盖许多重要主题，包括伦理学、权威人格的成因与转变、异化、自由、个人主义以及理想社会的样貌。

弗罗姆对资本主义和“占有式”生活模式的分析，即使在当今的消费主义背景下也仍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对他而言，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社会组织的方式，会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发展、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他质疑一个崇尚财产而非人性的社会的理智，批判那种奉行服从与支配理论而忽视自主决定与自我实现的体制。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尖锐地批判，认为它是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孤立与异化的主要根源。在弗罗姆看来，异化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特征（无论是私有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幸福程度取决于自我实现的程度，而要实现这一点，社会必须优先考虑人类的价值，而非无生命的财产。

弗罗姆将自己的思想植根于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读，并拒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认为它们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威权式的扭曲，称“对社会主义的摧毁……始于列宁”。此外，他强调需要一种权力分散和自由意志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偏爱国家与中央集权的质疑是正确的。正如他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以及）他们的中央集权倾向，源于他们在心理和智识上，相比傅立叶、欧文、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等人，更深地植根于 18、19 世纪的中产阶级传统。”关于马克思思想中“中央集权与分权原则之间的矛盾”，弗罗姆认为“与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兰道尔等人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具‘布尔乔亚式的’思维方式。尽管这听起来似乎矛盾，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国家与政治权力概念的回归，而不是欧文、蒲鲁东等人更清晰表达的新社会主义观念。”（《健全的社会》，第 265 页、第 267 页、第 259 页）。因此，弗罗姆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意志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其见解对任何希望改善社会的人都具有深远的重要性。

威廉·赖希与弗罗姆类似，致力于建立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对赖希而言，性压抑会导致人们容易接受威权主义，并乐于将自己置于威权政府之下。他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中对纳粹主义的分析尤其著名，但他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和运动（例如，美国的宗教右翼反对婚前性行为，并通过恐吓手段让青少年将性行为与疾病、污秽和负罪感联系起来，这么看这绝非巧合）。

赖希的论点是，由于性压抑，我们发展出所谓的“性格盔甲”。这种“盔甲”内化了我们的压迫，并确保我们能够在等级化社会中运作。这种社会化过程由父权制家庭产生，并最终有力地强化和延续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并生产出大量服从

性的个体。这些个体将习惯于接受教师、神父、雇主和政治家的权威，并支持现有的社会结构。这解释了为何个体和群体会支持那些剥削或压迫他们的运动与制度。换句话说，他们会出于恶化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去行动、思考和感受；甚至可能将自己的压迫内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们可能会试图捍卫自己的受支配地位。

因此，对赖希来说，性压抑产生了一个适应于威权秩序的个体，尽管这种秩序会带来无尽的痛苦和堕落，这个个体仍会屈从于它。其最终的结果是对自由的恐惧，以及一种保守的、反动的心态。性压抑不仅通过使大众个体变得被动和非政治化，助长了政治权力的巩固；还通过在他们的性格结构中培养出一种积极支持威权秩序的兴趣来达到此目的。

尽管赖希对性的单方面关注存在偏误，但他关于我们如何内化所受的压迫以便在等级制度下生存的分析，对于理解为何许多最受压迫的人似乎反而热爱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的统治者而言，非常重要。通过理解这种集体性格的结构及其形成方式，也为人类提供了跨越这些社会变革障碍的新途径。只有意识到人们的性格结构是如何阻止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切实利益的，才能够有效地对抗这些障碍，从而确保实现社会的自我解放。

莫里斯·布林顿的《政治中的非理性》出色且简要地介绍了赖希的思想，并将其见解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A.5 有哪些

“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例子？

无政府主义最核心的意义，在于过去两个世纪中数百万的革命者为改变世界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将在此讨论这一运动中一些重要的事件，他们都具有深刻的反资本主义的性质。

无政府主义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促进现存制度内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来让现有体制变得不那么非人道；**而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尽管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纯粹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但确实有许多具有高度的无政府主义特征和参与度的革命。尽管这些革命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每一次失败都是源自（无论是由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领导的）外部力量的打击，而非无政府主义内部存在的问题。虽然这些革命未能在压倒性的外力下存续下去，但它们依然鼓舞着无政府主义者，证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可行的社会理论，并可以大规模地实施。

这些革命的共同点在于，用蒲鲁东的术语来说，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它们是“人民自发性的集体活动”的典范。只有通过被压迫者自身的行动，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转型，才能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正如蒲鲁东所问，“哪一场严肃而持久的革命，不是由人民**从下而上**发起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是“**来自底层的革命者**”。所以，我们在本节中所讨论的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正是人民自主活动 and 自我解放的例子（正如蒲鲁东在 1848 年所说，“无产阶级必须自我解放”）。[quoted by George Woodcock, **Pierre-Joseph Proudhon: A Biography**, p. 143 and p. 125] 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对蒲鲁东关于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变革的理念，即通过被压迫者自身的行动创造一个新社会，产生共鸣。例如，巴枯宁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是“所有国家组织的敌人，并相信人民只有在不受任何监护人监督的情况下，从下而上、通过其自主的和完全自由的联盟组织起来——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并创造自己的生活。” [Marxism, Freedom and the State, p. 63] 在第 J.7 节中，我们将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革命的看法，以及涉及的相关内容。

许多这些革命和革命运动对于非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会相对陌生。大多数人听说过俄国革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人民运动为其赋予了怎样的生命力，或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少有人听说过巴黎公社、意大利的工厂占领运动或西班牙的集体化运动。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如赫伯特·里德所指出的，历史“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开发生事件的记录，它们会成为报纸头条并体现在官方记录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表层历史”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历史也在发生，它们为这些公开事件做准备，并预示着后者；他们不会体现在官方记录中，是一种看不见的地下历史。” [quoted by William R. McKercher, **Freedom and Authority**, p. 155]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人民运动和起义就是“地下

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通常会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精英的历史，那些关于国王、皇后、政治家和富人的记载。而这些大人物的名声往往是通过破坏大多数人的历史而获得的。

这意味着我们所举的“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实例，也正是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沃林所称的——“未知革命”的一部分。沃林将这一用词作为他经典作品的书名，并在书中讲述了他所亲身参与的俄国革命；他也用这一词语指代那些鲜为人知的、由人民自己发起的、独立且富有创造性的行动。正如沃林所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研究一场革命”，大多数历史学家“对那些在革命背后默默发生的进展心存怀疑并忽视它们……最多只是匆匆提及几句…… [然而]正是这些被隐藏的事实至关重要，它为我们理解正在讨论的事件及其所处的时代，提供了真正的启示。” [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19] 因为无政府主义基于自下而上的革命，极大地贡献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地下历史”和“未知革命”。本节常见问答将为它的成就提供一些启示。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涌动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政府主义实践暗流，即使在资本主义环境下也是如此。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一书中）和科林·沃德（在《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中），都记录了普通人是如何以平等的方式共同合作，以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的，尽管他们通常并不意识到自己在实践无政府主义。正如科林·沃德所说：“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一个没有权威而自行组织的社会，就像积雪下的种子，始终存在着；它埋藏在国家及其官僚制度、资本主义及其挥霍、特权及其不公、民族主义及其自杀性的忠诚、宗教分歧及其迷信的分裂主义之下。” [《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第 14 页]

无政府主义不仅关乎未来的社会，也关乎今天正在发生的社会斗争。它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一个通过自我活动与自我解放而创造的过程。

然而，到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评论家认为无政府主义运动已成往事。不仅法西斯主义在战争前后摧毁了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且在战后，这些运动也被西方的资本主义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共同压制。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在美国、拉丁美洲、中国、朝鲜（在那里，一场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在朝鲜战争前就被镇压）和日本遭到压制。即便在那些避免了最残酷镇压的少数几个国家，由于冷战和国际孤立，像瑞典工人中央组织（Sveriges Arbetares Centralorganisation, SAC）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会也在之后变得改良主义。

然而，60 年代是一个新的斗争年代。世界各地的“新左派”不仅从无政府主义中汲取思想，也从其他地方获取灵感。法国 1968 年的五月风暴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自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尽管这些运动本身逐渐衰落，但从中走出来的人们保持了这一思想的活力并开始构建新的运动。1975 年佛朗哥的死。预示着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大规模的复兴；甚至有多达 50 万人参加了 CNT（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举办的，第一次后佛朗哥时代的集会。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一些南美国家重新回归有限的民主，这也带来了无政府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增长。最后，在 80 年代末，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率先对列宁主义苏联发起了攻击。1987

年，莫斯科举行了自 1928 年以来的第一次，由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抗议游行。

如今，无政府主义运动虽然依旧薄弱，但在许多国家组织起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西班牙、瑞典和意大利的自由意志工会运动总共拥有约 25 万名成员。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也有数千名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团体首次在包括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南美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也经历了大规模复兴。委内瑞拉的无政府主义团体“**Corrio A**”分发的一份联络名单显示，几乎每个南美国家都有超过 100 个无政府主义组织。

也许北美的复兴最为缓慢，但即便在那里，所有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似乎也在显著发展。随着这一增长的加速，将会有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实例被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将参与到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活动中，使这一部分的常见问答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然而，强调大规模无政府主义成功运作的实例仍然至关重要，以避免我们被指责为“乌托邦主义”。由于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这些无政府主义行动的实例往往被隐藏在鲜为人知的书籍中。它们很少在学校和大学中被谈到（即使被提及，也往往被歪曲）。毋庸置疑，我们列举的几个例子仅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无政府主义在许多国家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无法详尽记录每一个实例，只能选择我们认为重要的案例。此外，我们很抱歉，这些例子可能会显得以欧洲为中心。由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忽略了以下重要事件：英国的工团主义起义（1910-1914）；英国（1917-1921）、德国（1919-1921）、葡萄牙（1974）的工人代表运动；墨西哥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古巴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朝鲜地区对日本（后来是美国和苏联）帝国主义的反抗；匈牙利革命（1956）；1960 年代末的“拒绝工作”运动（特别是意大利 1969 年的“火热之秋”）；英国矿工的罢工运动（1984-1985）；英国的反人头税斗争（1988-1992）；法国的罢工浪潮（1986 和 1995 年）；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意大利的 COBAS 运动；21 世纪初阿根廷起义期间的民众集会与自主管理占领工厂——等等数不清的其他结合无政府主义自我管理思想的主要运动。顺带一提，这些事件中无政府主义的自我管理理念往往由运动本身自发产生，而不一定由无政府主义者主导或“领导”。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革命与群众斗争就是“被压迫者的节日”，是普通人开始为自己而行动、改变自己与世界的时刻。

A.5.1 巴黎公社

1871 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与运动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巴枯宁在当时这样评价巴黎公社：

“革命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刚刚在巴黎公社进行了一次瞩目而实践性的示范……[它]向所有被奴役的人们（难道还有不被奴役的大众吗？）展示了通往解放和繁荣的唯一道路；巴黎公社对资产阶级激进的政治传统给予了致命一击，[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奠定了实在的基础。”[**Bakunin on Anarchism**, pp. 263-4]

巴黎公社是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后建立的。当时，法国政府试图派兵夺回巴黎国民自卫军的火炮，以防落入民众手中。公社参与者路易丝·米歇尔回忆道：“得知凡尔赛士兵试图夺取火炮后……蒙马特的男女居民出奇熟练地一齐（将火炮）攀上山丘。虽然那些攀登山丘的人们认为自己会死去，但他们已经准备好付出代价。”士兵们拒绝向嘲弄的人群开火，转而把武器对准了他们的军官。这就是3月18日，巴黎公社由此开始的那一天。“人民觉醒了……3月18日也许曾会属于国王的支持者、外国势力，或是人民。但在这一天，它属于人民。”[**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p. 64]

在巴黎国民自卫军召集的自由选举中，巴黎市民选出一个由雅各宾派和共和派占多数，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威权社会主义的布朗基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追随者）占少数的议会。该议会宣布巴黎为自治城市，并希望将整个法国重建为公社（即社区）联合会。在公社内部，当选的议员可被选民随时罢免，并领取工人的平均工资。此外，他们必须向选民报告工作进展，并在未履行委托任务时接受罢免。

为什么这一发展引起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兴趣显而易见——它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巴黎公社的例子在许多方面与巴枯宁所预言的革命方式相似——一个主要城市首先宣布自治，自行组织，以身作则，号召世界的其他地方效仿。（参见《致阿尔伯特·理查兹的信》中的《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巴黎公社开始了一个自下而上创建新社会的进程，是“（一次）对政治权力集中化的打击。”[**Voltairine de Cleyre, "The Paris Commune,"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 67]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在公社中发挥了作用——例如路易丝·米歇尔、雷克吕兄弟和欧仁·瓦尔兰（后者在之后的镇压中被杀害）。而在公社发起的改革中，比如将工作场所重新以合作社的方式开放，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自己关于联合劳动的思想开始得到实现。到五月，共有43个工作场所改为由合作社经营，卢浮宫博物馆则成为由工人委员会管理的军火工厂。为了呼应蒲鲁东的观点，机械工会与钣金工人协会在一次会议提出：“我们的经济解放……只能通过工人协会的建立来实现。唯有工人协会才能将我们的地位从雇佣工人转变为合作者。”他们派代表去公社劳动组织委员会支持以下目标：

“废除人剥削人的现象，扫清奴隶制的最后残余；

“在互助协会中组织劳动，确保资本不可被剥夺。”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确保在公社中“平等绝不再是一个空洞的词”。[**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ugene Schulkind (ed.), p. 164]

工程师工会于 4 月 23 日的一次会议上投票决定,由于公社的目标是“经济解放”,因此应该“通过具有共同责任的协会来组织劳动”,从而“消除人剥削人的现象”。[quoted by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pp. 263-4]

除了自主管理的工人协会,公社社员还在大众社团和大众组织的网络中实践直接民主,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直接民主社区议会(“区会”,“*sections*”)。一家社团的报纸宣告到:“人民们,通过你们的公众会议、通过你们的新闻出版社,自我治理吧”。公社被视为人民集会的体现,因为(引用另一家俱乐部的话)“公社的权力存在于每个郡(和街区)中,存在于那些聚集着憎恶枷锁与奴役的人们的地方。”也难怪居斯塔夫·库尔贝,蒲鲁东的艺术家朋友和追随者,称巴黎为“真正的天堂……所有社会团体都建立了自己的联合会,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quoted by Martin Phil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 p. 5 and p. 6]

此外,公社的《告法国人民书》也呼应了许多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该宣告书认为,社会的“政治团结”应建立在“所有地区主动且自愿地联合,自由且自发地汇聚所有个人的力量朝着共同的目标——全体人民的福祉、自由与安全”之上。[quoted by Edwards, **Op. Cit.**, p. 218] 公社社员设想的新社会,是基于“公社的绝对自治……确保公社所有必要的权利;并确保每个法国人无论作为个人、作为公民还是作为劳动者,都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的权利。公社自治的极限,仅限于能够确保所有其他遵守该契约的公社也能平等地自治;公社联合必须确保法兰西的自由。”[“*Declaration to the French People*”, quoted by George Woodcock, **Pierre-Joseph Proudhon: A Biography**, pp. 276-7] 因为提出了公社联合体的构想,巴枯宁敢于断言巴黎公社是“对国家的一种大胆而明确的否定”。[**Bakunin on Anarchism**, p. 264]

而且,巴黎公社对于联合会的设想也显然反映了蒲鲁东对于法国激进思潮的影响。事实上,公社构想中的基于代表联合会的法国公社,代表由选民强制委任,并可随时被罢免,这一理念也呼应了蒲鲁东的思想(蒲鲁东在 1848 年主张“实施性的绑定授权”[**No Gods, No Masters**, p. 63],并在他的著作《联邦制原理》中提倡了公社的联邦制)

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巴黎公社都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经济上,它对蒲鲁东和巴枯宁阐述的联合生产理论进行有意识地革命实践。在政治上,无政府主义者在公社对联邦制和自治的呼吁中,看到了他们的“未来社会组织……(是)自下而上地通过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邦来实现;从协会开始,然后进一步是公社、地区、国家,最终汇聚成一个伟大的国际和普遍的联邦。”[**Bakunin, Op. Cit.**, p. 270]

然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公社的行动还远远不够。公社并未在内部废除国家机构,尽管它在公社之外废除了国家权力。用巴枯宁尖锐的术语来说,公社社员“以雅各宾的方式”组织自己。正如彼得·克鲁泡特金指出的那样,虽然“巴黎人民宣布了自由公社,宣布了一个基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但他们在中途停下了脚步”,并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仿照旧市政委员会的公社委员会”。因此,巴黎公社并未“打破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传统,也未在公社内部尝试从简单

到复杂的组织模式，尽管他们通过宣布公社的独立和自由联合率先开始了这一模式。”这导致了灾难，公社委员开始被“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所困住”，失去了“与群众持续接触所带来的敏锐感……由于远离革命的中心——人民——而陷入瘫痪，他们自己也瘫痪了群众的主动性。” [Words of a Rebel, p. 97, p. 93 and p. 97]

此外，公社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尝试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试图将所有工作场所转变为合作社（即没收资本），也没有将这些合作社组建成联合体来协调和支持彼此的经济活动。沃尔泰琳·德·克莱尔强调，巴黎“未能打击经济暴政，因此未能实现它本可以达到的目标”，即“一个经济事务本应由实际的生产者和分销者群体安排的、消除了当前掌控世界资本的无用与有害因素的、自由的共同体”。 [Op. Cit., p. 67] 由于这座城市不断受到法军围攻，公社成员心中显然有其他更紧迫的事情。然而，对克鲁泡特金来说，这种处境是一个灾难：

“他们把经济问题视为次要问题，认为可以等到公社胜利后再处理……但随之而来的是惨重失败以及中产阶级的血腥报复。这再次证明，如果没有人民在经济领域的同步胜利，人民公社的胜利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 [Op. Cit., p. 74]

无政府主义者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认为“如果治理独立公社不需要中央政府，如果国家政府被抛弃，而国家统一是通过自由联合实现的，那么中央市政政府同样变得无用且有害。同样的联合原则可以在公社内部运作。” [Kropotkin, 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75] 然而，巴黎公社并未通过直接民主的大众议会联合体来废除公社内部的国家机构，类似于 1789-1793 年革命期间巴黎的“区会”（有关这些内容请参见克鲁泡特金的《大法兰西革命》）；而是保留了代议制政府，结果因此遭到了损害。“人民没有亲自行动……而是信任他们的统治者，把采取行动的责任托付给了他们。这是选举产生的必然结果的首要后果。”公社委员会很快成为“革命的最大障碍”，从而证明了““政府不可能具有革命性”这一“政治公理”。 [Anarchism, p. 240, p. 241 and p. 249]

公社委员会越来越疏离选举它的人民，因而两者变得越来越没有联系。而随着这种不相干的增长，其专制倾向也随之增强，雅各宾派占多数的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通过恐怖手段）“保卫”“革命”。这一委员会遭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少数派的反对，所幸，巴黎人民在保卫他们的自由时，实际上忽视了它，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以资本主义文明和“自由”的名义进攻他们的法军。5月21日，政府军进入巴黎，随后发生了七天激烈的巷战。成群的士兵和武装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街头肆意残骸与杀戮。在巷战中，超过 25,000 人被杀，其中许多人在投降后被谋杀，遗体被抛入集体墓坑。作为最后的侮辱，资产阶级在公社诞生地——蒙马特高地建造了圣心堂（Sacré-Cœur），以“弥补”在令他们极度恐惧的激进与无神论起义中所犯下的罪行。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巴黎公社的教训有三点：首先，一个去中心化的社区邦联是自由社会的必要政治形式（“这就是社会革命必须采取的形式——独立公社。” [Kropotkin, Op. Cit., p. 163]）其次，“在公社内部设置政府与在公社之上设置政府同样没有道理。”这意味着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区，需要建立在邻里和

工作场地集会的邦联之上，彼此自由地合作。最后，将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统一为社会革命至关重要。“他们试图首先巩固公社，然后将社会革命推迟到以后，而唯一正确的方式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巩固公社！” [Peter Kropotkin, **Words of a Rebel**, p. 97]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无政府主义者对巴黎公社的观点，可以参阅克鲁泡特金在《反叛者的言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读本》中的文章《巴黎公社》，以及巴枯宁在《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中的《巴黎公社与国家观念》。

A.5.2 干草市场烈士

5月1日对劳工运动来说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尽管这一节日曾被苏联及其他地区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体所劫持，五一国际劳动节仍然是全球团结的日子，是铭记过去的斗争和表达对更美好未来希望的时刻。这一天提醒人们，“对一人的损害即是对所有人的损害”。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为更好的世界所作的斗争密切相关。事实上，它起源于1886年，那一年芝加哥四名无政府主义者因组织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而被处决。因此，五一国际劳动节可以说是“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产物——是工人们通过工会中的直接行动来改变世界的斗争结果。

这一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1884年，在**美国与加拿大组织贸易和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881年，1886年更名为**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声明：“自1886年5月1日起，法定工作时长应设定为八小时，并建议各地区的工会对法规进行调整，跟随此项决议。”为声援这一要求，号召将于1886年5月1日举行罢工。

在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是工会运动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推动下，工会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号召转化为5月1日的大规模罢工。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直接行动和工人团结，才能赢得八小时工作制。在他们看来，争取类似八小时工作制的改革本身并不足够，这只是持续进行的阶级斗争中的其中一场战役；而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和建立自由社会，才能结束这场阶级斗争。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他们进行了组织与斗争。

仅仅在芝加哥，就有40万工人参加罢工，罢工的威胁促使超过4.5万名工人在未参与罢工的情况下也获得了缩短的工作时间。1886年5月3日，警察在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向罢工队伍开枪，至少造成一名罢工工人死亡，五至六人重伤，伤者人数不详。为抗议这一暴行，无政府主义者号召次日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群众集会。据当时的市长说，“至此还没有发生任何事件，或看起来可能会发生什么需要干预的事件。”然而，在集会即将结束时，由180名的警察组成的部

队赶到，命令解散集会。这时，一枚炸弹被扔向警察队伍，警察随后向人群开火。警方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从未被准确统计，但总共有七名警察死亡。（讽刺的是，其中只有一人死于炸弹，而其余六人则死于警察自己的开火[Paul Avrich, *The Haymarket Tragedy*, p. 208]）

一场“恐怖统治”席卷了芝加哥。“那些为资本服务的有组织且毫无良心的强盗与匪徒，封禁了唯一能为那些被关进牢房的人发声的报纸。他们还闯入了任何曾同情和声援那些反对现有掠夺性和压迫性体制者的家中……他们入室搜查，并且对这些人 and 家人施加了难以置信的侮辱。” [Lucy Parsons, *Liberty, Equality & Solidarity*, p. 53] 集会场所、工会办公室、印刷厂和私人住宅（在通常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被突袭，而这些针对工人阶级所在地的突袭，使警方得以逮捕所有已知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许多嫌疑人遭到殴打，有些人行贿从而躲过一劫。当有人质疑警方为何不出示搜查令时，州检察官 J·格林内尔则公开表示：“先斩，后奏。”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 p. 7]

八名无政府主义者因涉嫌是谋杀者的共犯而被审判。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携带了炸弹甚至策划了投掷炸弹的行动。法官裁定，州方无须确定实际犯罪者的身份，或者证明他的行为受到被告的影响。州方也未试图证明被告以任何方式支持或教唆了该行为。事实上，炸弹爆炸时，只有三名被告在场，其中之一的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甚至带着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妻子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和他们的两个年幼孩子参加了集会。

这八人之所以被挑为被告，完全只是因为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和工会组织活动。州检察官对此毫不掩饰地告诉陪审团：“法律在接受审判。安那其在接受审判。这些人被陪审团选中，并因为他们是领导者而起诉。他们并不比成千上万追随他们的人更有罪。各位陪审员，请定罪这些人，杀一儆百，绞死他们，这样你们就拯救了我们的制度和社会。”陪审团由州检察官提名的一位特别法警精挑细选，其中包括企业家和一名被炸死警察的亲属。辩方被禁止提交证据，因为这位特别法警曾公开宣称：“我在处理此案，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些家伙将被绞死，必死无疑。” [Op. Cit., p. 8] 结果毫不意外，被告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七人被判处死刑，一人被判 15 年监禁。

国际社会的声援运动使两名被告的死刑判决减为无期徒刑，但全球范围的抗议并未阻止美国政府的行刑。在剩下的五人中，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于处决前夜自杀，逃脱了绞刑。其余四人——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奥古斯特·斯毕斯（August Spies）、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和阿道夫·费舍尔（Adolph Fischer）——于 1887 年 11 月 11 日被绞死。他们在劳工历史上被铭记为“干草市场烈士”。在他们的葬礼队伍经过的路线上，约有 15 万至 50 万人列队送别，估计有 1 万至 2.5 万人观礼下葬。

1889 年，在巴黎出席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美国代表团提议，将 5 月 1 日定为工人的节日，以纪念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芝加哥八烈士”做出的牺牲。从那时起，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为国际上团结的象征。1893 年，伊利诺伊州的新任

州长正式承认那芝加哥和全世界工人阶级早已知道的事实，赦免了烈士们，理由是他们显然是无辜的并且“那场审判并不公正”。时至今日，仍无人知道是谁投掷了那枚炸弹——但唯一确定的事实是，被审判的八人无一与此事有关：“我们的同志并不是因为与投掷炸弹有关而被政府谋杀，而是因为他们积极组织了美国被雇佣的奴役者。” [Lucy Parsons, *Op. Cit.*, p. 142]

当局在审判时曾认为，这种迫害将摧毁劳工运动的后背力量。然而，作为事件的亲历者，露西·帕森斯 (Lucy Parsons) 在 20 年后指出，干草市场的审判“是一场阶级审判——无情、恶毒、野蛮而血腥。通过这场起诉，资本家试图粉碎在芝加哥——这一伟大运动的风暴中心——所成功发起的八小时工作制大罢工。同时，他们还企图通过对这些人残酷的审判手段威吓工人阶级，让他们退回到他们正试图从中挣脱的，长期工作与低工资的境地。资产阶级妄想通过羞辱性地处决当时工人阶级中最具进步思想的领导者来实施他们的邪恶计划。在执行这一司法谋杀的血腥行径中，他们确实成功了；但在阻止阶级斗争的强大前进浪潮上，他们彻底的失败了。” [Lucy Parsons, *Op. Cit.*, p. 128] 正如奥古斯特·斯毕斯在被判死刑后对法庭发表的陈词中所言：

“如果你们指望通过吊死我们来踩灭工人运动的火焰——这场由数千万受压迫的、深受苦难的人民视作救赎希望的运动——如果这就是你们的目的，那就吊死我们吧！在这里你们踏灭的是一点星火，但是在这里、那里——在你们的面前，在你们的背后，在四面八方——火焰将会熊熊燃烧。这是地下燃烧的烈火，你们不可能将其熄灭” [quoted by Paul Avrich, *Op. Cit.*, p. 287]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这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违抗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在美国。从干草市场事件以来，无政府主义者每年都会在五月一日庆祝劳动节（而改良主义的工会和劳工党则将游行改在每年 5 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向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表达我们的团结，庆祝过去和现在的斗争，展现我们的力量，并提醒统治阶级他们的易碎性。正如内斯托尔·马赫诺所说：

“那一天，这些美国工人通过组织起来，表达了他们对国家与资本所维持的不公秩序的抗议……

“芝加哥的工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地，去解决他们生活和斗争中的问题……

“在今天也是同样……劳动者们……将五月的第一天视为一个相聚的时刻。在这一天，他们会关注自身的事情，并思考关于解放自己的问题。”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tate and Other Essays, pp. 59-60]

无政府主义者坚持五一劳动节的起源，并在这一天庆祝它在被压迫者直接行动中的诞生。这是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和团结原则的经典例子，“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是首次，工人们通过联合而同步的行动尝试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这次罢工是首次的大规模的直接行动，在美国也是首次。”

[Lucy Parsons, **Op. Cit.**, pp. 139-40] 压迫与剥削催生反抗，而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五一劳动节就是这种反抗与力量的国际性象征——这一力量也体现在奥古斯特·斯派斯的遗言中，这句话也被刻在芝加哥瓦尔德海姆公墓的海马克特烈士纪念碑上：

“总有一天，我们的沉默将比你们今天扼杀的声音更为强大。”

要理解为什么国家和资产阶级如此坚决地要绞死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必须认识到，他们为什么被当作是一个庞大的激进工会运动的领导者。1884年，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每日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芝加哥工人报》(*Chicagoer Arbeiter-Zeitung*)。这份报纸由德国移民工人阶级运动所撰写、阅读、拥有并出版。这份日报，连同一份周刊(*Vorbote*)和一份周日刊(*Fackel*)的合计发行量在短短几年内翻倍，从1880年的每期13,000份增长到1886年的26,980份。此外，无政府主义的周刊也存在于其他族裔群体中，包括一份英文版、一份波希米亚文版和一份斯堪的纳维亚文版。

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央劳工联盟（该联盟包括该市最大的十一家工会）中非常活跃，并致力于将其发展为——干草市场烈士之一阿尔伯特·帕森斯所说的——“未来‘自由社会’的雏形团体。”无政府主义者还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也被称为“**黑色国际**”），该协会的成立大会上来自26个城市的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在工会中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并提出了“基层成员直接行动”的理念，以及工会“作为工人阶级完全摧毁资本主义的工具，同时也是新社会形成的核心”的目标。这些理念被称为“**芝加哥理念**”(*Chicago Idea*)。这一理念后来激发了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 p. 4]

这一理念体现在1883年国际工人协会(I.W.P.A.)在匹兹堡大会发表的宣言中：

“第一——通过一切手段摧毁现有的阶级统治，例如通过果断且毫不留情的、国际性的革命行动。

“第二——建立一个基于生产组织合作化的自由社会。

“第三——由生产组织之间通过自由交换等值产品，来取代商业和利润剥削。

“第四——建立以世俗、科学和性别平等为基础的教育体系。

“第五——所有人享有平等权利，不论性别或种族。

“第六——通过自治（和独立的）公社与协会之间形成的，基于联邦主义原则的自由契约，来管理所有公共事务。”

除了工会组织外，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还组织了社会团体、举办野餐、讲座、舞会、开设图书馆以及其他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共同塑造了一种以“美国梦”为核心的独特的工人阶级革命文化。然而这种文化对统治阶级及其制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无法容忍其继续存在（尤其是 1877 年工人大规模的起义仍然历历在目。而与 1886 年一样，那场起义也遭到了国家的暴力镇压——有关这场罢工运动及干草市场事件的详细信息，可参阅 J. Brecher 的《Strike!》）因此，国家对运动展开了镇压，进行不公正的审判，并对那些国家和资本家阶级视为运动“领导者”的人处以死刑。

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干草市场烈士的事，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The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作为唯一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干草市场烈士，阿尔伯特·帕森斯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无政府主义：其哲学与科学基础》（*Anarchism: Its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Basis*），详细阐述了他们的主张。历史学家保罗·阿夫里奇（Paul Avrich）的《海马克特悲剧》（*The Haymarket Tragedy*）是一部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探讨的佳作。

A.5.3 建立工团主义者联盟

在 19 世纪末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取得了最为成功的尝试之一，开始尝试将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理念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这就是大规模革命工会的建立（亦称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正如一位法国激进工团主义的领导者所言，工团主义运动是“一种实践无政府主义的学校”，因为它是“经济斗争的实验室”，并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将工人组织成“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工团主义工会将在资本主义内部建立起“自由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以对抗资本主义，并最终，将之取代。[Fernand Pelloutier, *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57, p. 55 and p. 56]

虽然每个国家之间的工团组织在细节上会有所差异，但是主线是相同的。工人们需要将自己组织起工会（或者工团(syndicates)，法语的工会）。虽然工业上的组织是最常见的形式，但工艺组织和贸易组织也是可行的形式。这些工会由其成员直接控制，并且基于行业和地域的准则联邦化。比如，例如，一个工会既会与所在城镇、地区和国家的所有地方工会联邦化；同时也会与其所属行业的所有工会（如矿工工会或冶金工人工会），共同联邦化为一个国家工会。每个工会都是自治的，其中所有官员都是兼职的（如果因工会事务缺勤，则领取正常工资）。工团主义的策略是直接行动和团结，其目标是用工会取代资本主义，而它将会提供自由的新社会的基本框架。

因此，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来说，“工会绝不是仅仅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存的一种过渡现象，而是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是社会主义总体理念的初级学

校。”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会为其成员提供的“不仅是在为日常生计而斗争中直接行动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通过自身力量，完成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计划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必要准备。”[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p. 59 and p. 62]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目标，用国际工人联合会（I.W.W.）的表达来说，是“在旧世界的壳中构建新世界。”

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无政府主义者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建立了革命工会（尤其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此外，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工团主义工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在古巴、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工团主义运动，尽管欧洲和南美洲的运动规模最大、力量最强。这些工会按照无政府主义原则，以自下而上的邦联制形式组织起来。它们围绕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的问题，与资本家进行日常的斗争，同时向国家争取社会改革。但这些工会的目标不仅仅是改善现状，它们还试图通过革命性的总罢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全世界成百上千的工人曾在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践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证明无政府状态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可以广泛运用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技术鼓励了成员的参与、赋权和战斗精神，并成功地争取改革和提升了阶级意识，这一点从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增长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中可见一斑。例如，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至今仍在激励着工会的活动家，并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创作了许多工会歌曲和口号。

然而，作为一种群众运动，工团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基本上宣告终结。这一现象源于两个主要因素。首先，大多数工团主义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受了严厉的镇压。战后初期，这些工会曾达到顶峰。那一波的斗争精神在意大利被称为“红色年代”，其活动顶峰出现在工厂占领运动中（见 [A.5.5 节](#)）。然而，这些年代也见证了这些工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破坏。例如在美国，I.W.W.遭遇了一波得到了媒体、国家和资产阶级全力支持的镇压浪潮。与此同时，欧洲资本主义开始使用新一武器反攻——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出现，随后在德国最为最臭名昭著；它作为资本主义试图通过暴力摧毁工人阶级所建立的组织的手段，而崛起。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蔓延的激进主义，而这特别是受到俄国的启发。许多几乎是革命的运动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他们转向法西斯主义，试图它来拯救自己的制度。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在与法西斯主义尝试（往往是英勇地）斗争失败后，被迫流亡、销声匿迹，或成为刺客、或成为集中营的牺牲者。例如，在葡萄牙，拥有 10 万成员的强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 CGT，在 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初发动了多次反抗法西斯主义的起义。1934 年 1 月，CGT 号召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总罢工，并进一步发展为为期五天的起义。政府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动用大量武力镇压了这场反抗。CGT 作为起义中发挥了重要和鼓舞作用的工会，被彻底摧毁，而葡萄牙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都维持是法西斯主义国家。[Phil Mailer, **Portugal: The Impossible Revolution**, pp. 72-3] 在西班牙，CNT（最著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斗争。到 1936 年，该工会宣称拥有 150 万成员。与意大利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的资本家阶级也拥抱了法西斯主义，以保护

他们的权力不被剥夺；这些阶层变得越来越自信，坚信自己有权管理自己的生活。（详见 A.5.6 节）

除了法西斯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还面临列宁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俄国革命表面上的成功，使得许多行动派转向了威权主义政治，尤其是在英语国家，以及说法语的部分地区。一些著名的工团主义活动家，如英国的汤姆·曼（Tom Mann）、苏格兰的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和美国的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最终都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最终成为了斯大林主义者）。此外，共产党还故意破坏自由意志主义工会，鼓励内斗和分裂（例如在 I.W.W. 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主义者完成了法西斯主义在东欧所开始但“未竟”的“事业”，摧毁了如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地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在古巴，卡斯特罗也效仿列宁，做到了巴蒂斯塔和马查多政权未曾做到的事情——即摧毁了在古巴有着深远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有关这一运动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的历史，见弗兰克·费尔南德斯的《古巴无政府主义》）。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保加利亚和葡萄牙的大规模且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被法西斯主义摧毁（但必须强调，这一切并非没有抵抗）。在必要时，资本家会支持威权主义国家以镇压工人运动，以确保他们的国家依旧适合资本主义。唯一逃脱这一趋势的国家是瑞典，在那里，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 SAC 仍在组织工人。事实上，也就像许多今天仍在活跃的工团主义工会一样，SAC 正在增长，因为工人们开始远离那些领导层似乎更关心保卫自己的特权、与管理层达成交易，而非捍卫成员利益的——官僚化工会。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工团主义工会正在再次崛起，也证明了无政府主义理念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工团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因此，它并非在 19 世纪 90 年代才被发明出来。确实，工团主义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灾难性的“行动宣传”（propaganda by deed）时期的反应。在这一时期，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刺杀政府领导人以试图激起人民起义，并报复他们对公社社员和其他反叛者的大规模屠杀（有关细节详见 A.2.18 节）。然而，作为对这一失败且适得其反的运动的回应，无政府主义者回归他们的根源，回到了巴枯宁的思想。因此，正如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等人所承认的，工团主义，不过是对第一国际自由意志派思想的一种回归。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巴枯宁主张“必须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但这种组织必须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成果……组织起来，一般而言就是在每一个行业和国家中，组织起工人国际性的武装团结；并记住，无论你们作为孤立的个体或地区有多么弱小，通过普遍的合作，你们将构成一股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如一位美国活动家所评论的，这正是“现在工团主义和 I.W.W. 运动中所呼吸着的同样战斗精神的，最好表达” [Max Baginski,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 71] 与工团主义者一样，巴枯宁强调：“行业部门的组织，它们的联合……本身就承载着新社会秩序的活生生的种子，正是这些种子将取代资产阶级的世界。它们不仅创造了未来的思想，还创造了未来本身的事

实。” [quoted by Rudolf Rocker, *Op. Cit.*, p. 50]

这些思想也被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反复提及。因在在巴黎公社中发挥作用而导致死亡的，欧仁·瓦尔兰（Eugene Varlin），提倡一种基于协会的社会主义。他曾在 1870 年主张，工会是重建社会的“天然要素”：“正是它们可以轻易地转变为生产者协会；正是它们能够将社会的再造与生产的组织付诸实践。” [quoted by Martin Phil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 p. 139] 正如我们在 A.5.2 节中讨论的那样，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工人运动既是实现无政府状态的手段，也是自由社会的框架。正如 Albert 的妻子露西·帕森斯所说，“我们认为，农会、工会、劳动骑士团大会等等，是理想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萌芽组织……” [contained in Albert R. Parsons, **Anarchism: Its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Basis**, p. 110] 这些思想滋养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革命工会主义。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I.W.W.成立大会的议程表明，参与者不仅意识到了‘芝加哥理念’，而且清楚地明白他们的努力与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斗争，与工业工会主义的产生之间存在的延续性。”芝加哥理念代表了“最早期美国人对工团主义的解读”。[Salvatore Salerno, **Red November, Black November**, p. 71]

因此，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相对立的理论，而只是对相同思想的不同解读（有关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 H.2.8 节）。虽然并非所有工团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宣称支持工团主义），也并非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工团主义者（关于这一点，请参见 J.3.9 节的讨论）；但所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有必要参与工人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并在其中鼓励自由意志主义式的组织与斗争。通过这样做，无论是在工团主义工会的内部还是外部，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证明我们思想的有效性。正如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下一次革命必须从一开始就实现工人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夺取，从而其转化为公共财产。只有通过工人、只有当每一处的城市和乡村工人亲自地践行这一目标时——这场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为此，他们必须在革命前的时期就开始自己的行动；（胜利）只有在拥有强大的工人组织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 p. 20] 这些群众自我管理的组织，正是“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

A.5.4 俄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1917 年的俄国革命，见证了这个国度无政府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无政府主义理念的诸多实验。然而，在俄国革命的流行文化中，被看见的不是由普通人为自由而斗争的群众运动，而是列宁对俄国施加独裁的统治手段。事实与此大相径庭，俄国革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在其中，不同思想潮流并存，数百万劳动人民（包括城市与乡村的工人以及农民）试图将他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希望和梦想最终被布尔什维克党的独裁统治所粉碎——首先是列宁的统治，后来则是斯大林的统治。

俄国革命，与大多数历史一样，是“胜者书写历史”这一格言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资本主义者的历史叙述都忽略了无政府主义者沃林所称的，“**未知的革命**”——即由普通人民自下而上行动引发的革命。列宁主义的叙述，顶多，在工人阶级的自主行动与其党的路线一致时对其赞扬；但一旦这种行动偏离了党的路线，就会对其进行严厉地谴责（并将行动归咎于其最卑劣的动机）。因此，列宁主义的叙述会在工人走在布尔什维克前面时，对他们表示赞扬（如 1917 年春夏之交）；但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工人反对其政策时，又加以谴责。更糟糕的是，列宁主义的叙述常常将群众的运动和斗争描绘成先锋党活动的一个背景板而已。

然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俄国革命被视为一场典型的社会革命，工人阶级的自主行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及其他阶级组织中，俄国群众试图将社会从一个充满阶级分化、等级制和国家主义的政权，转变为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因此，革命的最初几个月似乎印证了巴枯宁的预言：“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从下至上，由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合会构成，首先是在他们的工会中，然后是公社、地区、国家，最终形成一个伟大的国际和普遍联合会。”[**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06] 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具体地体现了巴枯宁的思想，而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翻沙皇的最初行动来源于群众的直接行动。1917 年 2 月，彼得格勒的妇女因粮食短缺爆发了骚乱。2 月 18 日，彼得格勒的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到 2 月 22 日，罢工蔓延至其他工厂。两天后，罢工人数达到 20 万，到了 2 月 25 日，罢工几乎演变为全面罢工。同一天，抗议者与军队之间发生了首次流血冲突。转折点出现在 27 日，一些部队倒向了革命群众，并带动了其他部队参与。这使得政府失去了其强制手段，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随之成立。

如此自发的运动让所有政治党派都措手不及。这其中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甚至反对在推翻沙皇的革命即将爆发前夕号召罢工。幸运的是，工人们无视布尔什维克的‘指示’，仍然发起了罢工……如果工人们听从了布尔什维克的指导，革命是否会在那时发生恐怕就要打个问号。”[**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23]

这场革命自下而上的直接行动一直持续，直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大到足以制止这种行动为止。

对于左翼而言，沙皇制度的终结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多年来努力的结果。它象征着人类思想的进步派战胜了传统派的压迫，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地左翼人士的高度赞扬。然而，在俄国，事情还在继续发展。在工厂、街头和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仅仅在政治上废除封建主义是不够的。如果经济上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推翻沙皇便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在整个俄国，普通民众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在俄语中称为“苏维埃”）。这些组织最初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具有可罢免的代表，并通过联邦形式相互联系。

不用说，所有的政党和组织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作为民粹主义农民政党的社会革命党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参与这一运动，鼓励所有走向自我管理，并敦促推翻临时政府的倾向。他们主张有必要将革命从纯粹的政治层面转变为经济与社会层面的革命。在列宁从流亡归来之前，他们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倾向。

列宁说服他的政党采用“所有权力归属苏维埃”的口号，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这标志着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明显决裂，以至于从布尔什维克转为孟什维克的前成员评论道，列宁“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已经空缺三十年的欧洲王位的候选人——巴枯宁的王位！”[quoted by Alexander Rabinowitch, **Prelude to Revolution**, p. 40] 布尔什维克此后转向争取大众支持，倡导直接行动并支持群众的激进行动，而这些政策过去常与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口号……此这之前是无政府主义者特别且一贯倡导的。”[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210]）很快，他们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选举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选票。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口号确实产生了效果。群众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下。”[**What is Anarchism?**, p. 120]

在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活跃于围绕着工厂委员会展开的，工人自我管理生产的运动（有关详情参见 M. Brinton 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他们主张工人和农民没收掌权阶级的财产，废除一切形式的政府，并通过自己阶级的组织——如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合作社等，从底层自下而上地重组社会。他们还能够影响斗争的方向。正如亚历山大·拉比诺维奇（在他对 1917 年七月起义的研究中）所指出的：

“在基层层面，尤其是在（彼得格勒的）驻军和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之间，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实际上很难区分……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争夺的是同一批群众的支持——未经教育、处于压抑和不满状态的群众。事实上，1917 年夏季，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凭借他们在一些重要工厂和军团中的支持，无疑具有足以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并且，在某些工厂和军事单位中，无政府主义者的号召力足够强大，以至于影响了布尔什维克自身的行动。”[**Op. Cit.**, p. 64]

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 1917 年 6 月，针对无政府主义影响力上升的回应中表示：“如果我们将自己与无政府主义者隔离开来，我们可能也会将自己与群众隔离开来。”[quoted by Alexander Rabinowitch, **Op. Cit.**, p. 102]

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合作，共同推翻了临时政府。然而，一旦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权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权力，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使用了许多相同的口号，但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正如沃林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口号）由无政府主义者的说出或写下时，是真诚且具体的；因为它们符合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则，并且号召采取完全符合这些原则的行动。但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这些相同的口号，却意味着完全不同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实际解决方案，也与口号表面上表达的思想不一致。”[**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210]

同样地，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工人控制生产”这一术语。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将其视为“工人对资本家的普遍、全面的控制” [**Will the Bolsheviks Maintain Power?**, p. 52] 他并未将其理解为通过工厂委员会的联合，实现工人对生产本身的控制（即废除雇佣劳动）。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人们的工厂委员会却是这样理解的。正如 S.A. 史密斯准确指出的那样，“列宁使用‘工人控制’这一术语时，其含义与工厂委员会的理解完全不同。”事实上，列宁的“提议……具有彻底的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性质，而工厂委员会的实践本质上是地方性和自治的。” [**Red Petrograd**, p. 154] 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如果工人组织能够[对他们的老板]实施有效的控制，那么他们也完全有能力保证所有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迅速但逐步地消除私人企业，并用集体产业取而代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了模糊而不明确的‘控制生产’口号。他们倡导由集体生产组织——立即、但逐步地——没收私人产业。” [Voline, **Op. Cit.**, p. 221]

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就系统性地削弱了“工人控制”这一术语普遍的含义，并用他们自己的国家主义概念替换之。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个月里，[工厂]委员会领导者，曾三次，试图将他们的模式付诸实践。而每次，党的领导层都否决了他们的做法。结果是管理权和控制权都被赋予了国家机关，这些机关由中央权力设立，并服从于中央权力。” [Thomas F. Remington, **Building Socialism in Bolshevik Russia**, p. 38] 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列宁在 1918 年 4 月主张并引入，以“独裁”力量为武装的“一长制”（即由国家从上而下任命经理）。这一过程在莫里斯·布林顿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中有详细记载，该书还表明了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其意识形态之间的明确联系，以及这两者是如何与大众的活动和思想背道而驰的。

因此，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阿尔希诺夫这样评论道：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点是，[1917 年的]十月革命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参与社会革命的工人和群众，和与他们一同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赋予它的含义；另一种则是由从这种社会革命的愿望中夺取权力的政治党派[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赋予它的含义，这个党派背叛并扼杀了所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两种对十月的解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工人和农民的十月革命，是为了平等和自我管理而消灭寄生阶级权力的革命；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则是革命知识分子政党的权力征服，是其‘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式’统治大众方式的设立。” [The Two Octobers]

最初，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布尔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将他们的基于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隐藏在支持苏维埃的幌子之下。（正如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塞缪尔·法伯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中充当了布尔什维克无名的联盟伙伴。” [Before Stalinism, p. 126]）然而，这种支持很快“消失殆尽”，因为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为自己巩固权力；他们推动的也不是土地和生产资源的集体所有化，而是政府所有化。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布尔什维克系统性地破坏了工人控制/自我管理运动，转而

支持类似资本主义的、基于“独裁权力”武装的“一长制”的，工作场所管理形式。

而对于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则系统地削弱了其所拥有的有限的独立和民主。对于 1918 年春夏“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选举中的重大失利”的回应，“布尔什维克通常会通过武力推翻这些省级选举的结果。”此外，政府“不断推迟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新一轮选举，而其任期已于 1918 年 3 月结束。显然，政府担心反对党会取得进展。”[Samuel Farber, *Op. Cit.*, p. 24 and p. 22] 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失去了原本享有的绝对多数席位”，但仍然是最大的党派。然而，列宁格勒苏维埃选举的结果已经并不重要，因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已经通过工会、区苏维埃、工厂车间委员会、区工人代表大会、红军和海军单位中显著多的代表席位得到了保障，在这些集体中，布尔什维克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Evolution of Local Soviets in Petrograd"*, pp. 20-37, *Slavic Review*, Vol. 36, No. 1, p. 36f] 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充斥自己的代表，削弱了苏维埃的民主性质。面对苏维埃的拒绝，布尔什维克展示了对他们而言“苏维埃权力”就等同于党的权力。而为了保持权力，布尔什维克必须摧毁苏维埃，而他们确实这么做了。苏维埃制度名存实亡。事实上，从 1919 年起，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承认，他们已经实现了一党独裁，且这样的独裁对于任何革命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斯大林主义崛起之后，托洛茨基也支持党派独裁）。

此外，红军，也不再是一个民主化的组织。1918 年的三月，托洛斯基废除了官员和士兵委员会的选举制“

“选举原则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在技术上也不适宜，所以实际上，它已经通过法令废除。”[*Work, Discipline, Order*]

正如莫里斯·布林顿正确总结的：

“托洛茨基，这位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之后被任命的军事委员，迅速地重组了红军。对违反命令的死刑再次被恢复。更进一步地，军官们开始享有敬礼、特殊称呼、单独的生活区以及其他特权。包括军官选举在内的民主组织形式，很快就被废除了。”[*"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For Workers' Power*, pp. 336-7]

不出所料地，塞缪尔·法伯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列宁或任何主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工人的控制或苏维埃中的民主的丧失感到惋惜，或者至少没有将这些损失视为一种倒退，这正如列宁在 1921 年宣布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的那样。”[*Before Stalinism*, p. 44]

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谴责布尔什维克政权，呼吁进行“**第三次革命**”，从而将工人从所有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首领中，最终解放出来。他们揭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言行不一（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表述）。布尔什维克上台后证明了巴枯宁的预言，即“无产阶级

专政”将变成共产党领导人来实施的，“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力开始增长，就像 Jacques Sadoul，一位法国官员在 1918 年初所说的那样：

“无政府主义政党是最活跃的，也是最激进的反对群体，而且也可能是其中最有人气的……布尔什维克非常的焦虑。”[quoted by Daniel Guerin, *Anarchism*, pp. 95-6]

从 1918 年的四月开始，布尔什维克开始对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对手进行物理上的镇压。1918 年 4 月 12 日，契卡（由列宁在 1917 年十二月设立的秘密警察）袭击了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活动中心。其他城市的据点也在随后遭到袭击。布尔什维克除了镇压他们在左派中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他们还在限制了他们声称要保护的，群众的自由。民主的苏维埃，言论自由、反对派政党和团体、工作场所和土地上的自我管理——这些全都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被摧毁。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切都发生在 1918 年 5 月末内战开始之前，而大多数列宁主义支持者将布尔什维克的专制归咎于内战的缘故。而在内战期间，这一过程被加速了；布尔什维克系统性地镇压了各方面的反对声音——包括那些他们声称代表其阶级实施“专政”的、下层阶级的罢工和抗议！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进程在内战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证实了无政府主义理论所认为的“工人国家”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布尔什维克以党的权力代替工人权力（以及这两者之间产生的冲突）并不令人意外。国家就是权力的代表团，因此，如果说“工人国家”能够体现“工人权力”，这种想法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如果由工人在运作社会，权力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果存在一个国家，权力就掌握在少数统治者手中，而不是所有人的手中。国家本质上是为少数人统治而设计的。由于其基本性质、结构和设计，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即大多数人）自我管理的工具。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由工人委员会组成的自下而上的联合会来实现革命；并在资本主义和国家被废除之后，继续以这种方式管理社会。

正如我们在第 H 节中讨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从受大众欢迎的工人阶级政党堕落为支配工人阶级的独裁者，发生这样的事情并非偶然。政治理念与国家权力（以及它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现实之间的结合，注定会导致这种堕落。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先锋队理论，以及对自发行动的恐惧和将党的权力与工人阶级的权力等同的观点，必然意味着党会与它所声称代表的人民发生冲突。毕竟，如果党是先锋，这就同时是在说其他所有人都是“落后”分子。这也意味着，如果工人阶级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或在苏维埃选举中拒绝这些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就被认为是在“动摇”，是受到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分子的影响。先锋队理论滋生精英主义，而当它与国家权力结合时，便成为了独裁。

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强调的，国家权力意味着将权力委托给少数人手中。这必然在社会中产生阶级分化——掌权者与无权者。因此，一旦掌握权力，布尔什维克便与工人阶级相隔离。俄国革命证实了马拉泰斯塔的观点，即“政府，即

一群被赋予制定法律权力、并被授权使用集体力量强迫每个人遵守这些法律的人——已经成为一个特权阶级，并与人民相隔绝。正如任何既定机构都会做的那样，它会本能地寻求扩展其权力，脱离公众控制，推行其自身政策，并优先考虑自己的特殊利益。由于处于特权地位，政府已经与其掌控废除它力量的人民，处于对立地位。” [Anarchy, p. 34] 像布尔什维克建立的那种高度集权的国家，会将责任性降到最低，同时加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隔离。群众不再是鼓舞和力量的来源，而是一个异己的群体；他们缺乏的“纪律性”（比如遵守命令的能力）可能会使革命陷入危险。一位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这样论述：

“无产阶级正逐渐被国家奴役。人民正被转变为仆从，而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管理者阶级——一个主要发源自所谓知识分子之中的新阶级……我们并不是说……布尔什维克党有意建立一个新的阶级体系。而我们要说的是，即使是有最好的意图和愿望，也必然会在任何集中权力体系所固有的弊端面前，破灭。管理与劳动的分离，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割裂，是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绝无可能有其他结果。” [The Anarch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123-4]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同意工人阶级内部政治思想发展不平衡的事实，但拒绝“革命者”应该代表工人阶级掌权的观点。只有当工人真正自己管理社会时，革命才能取得成功。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只能通过……由工人自己，在他们自身的阶级组织中的……直接的、广泛的、独立的行动来实现。这以具体行动和自治为基础，由革命者协助但不控制，在群众中间而非高于群众，在专业、技术、防御和其他分支领域中也是如此。” [Voline, Op. Cit., p. 197] 通过用党的权力取代工人的权力，俄罗斯革命迈出了致命的第一步。也难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在 1917 年 11 月所作的预测成为了现实：

“一旦他们的权力巩固并‘合法化’，布尔什维克——这些中央集权主义者和采取威权主义行动的人——将会开始通过政府和独裁的方法，按中央的指令，重新安排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他们……将会把党的意志强加于整个俄罗斯，指挥整个国家。你们的苏维埃和其他地方组织，将逐渐变成仅仅是中央政府意志的执行机关。取而代之的，不是工人阶级健康的、建设性的工作，也不是自下而上的自由联合——而是一个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机器。它将从上而下运作，并开始用铁腕铲除一切挡在其道路上的事物。” [quoted by Voline, Op. Cit., p. 235]

所谓的“工人国家”，不可能对工人阶级的人民放权或者让他们参政（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因为国家结构本身就不是为了此目的设计的。作为少数统治者的工具所创造的国家，无论它们自己还是之后创造出的“新的”国家，都无法转变为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组织，作为由少数人为建立起和组织起对群众的统治而诉诸的力量，无法成为用来摧毁这些特权的力量。” [Anarchism, p. 170] 就像一本 1918 年写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所言：

“布尔什维克主义一天天、一步步地证明了，国家权力具有不可剥夺的特性；它可以更换标签、更换‘理论’、更换执行者，但本质上它只是以新的形式继续维持权力和专制。” [quoted by Paul Avrich, "The Anarch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 pp. 341-350, **Russian Review**, vol. 26, issue no. 4, p. 347]

对内而言，革命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几个月后死去。对外而言，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则开始代表着“社会主义”，即使他们已经系统性地摧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基础。通过将苏维埃转变为国家机构、用党的权力取代苏维埃的权力、削弱工厂委员会、消除军队和工作场所中的民主、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工人抗议，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将工人阶级从自身的革命中边缘化。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本身，是革命堕落和最终斯大林主义兴起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几十年前预言的那样，在内战开始之前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国家”就已经变成了像任何国家一样，成为了对工人阶级的异己力量和由少数人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是党的统治）。内战加速了这一进程，很快引入了党派独裁（实际上，领导布尔什维克开始声称这队任何革命都至关重要）。布尔什维克镇压了国内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而队喀琅施塔得起义和乌克兰的马赫诺主义运动的摧毁，成为了苏维埃和社会主义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

1921年2月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关这次起义的详细讨论，请参见附录“什么是喀琅施塔得起义？”）。起义开始于喀琅施塔得的水手，支持在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罢工工人。他们提出了一份包含十五条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呼吁苏维埃的民主。布尔什维克将喀琅施塔得起义者诬蔑为反革命分子，并镇压了这次起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它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次镇压无法以（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结束的）内战为借口来辩解；不仅如此，它也是一次普通人民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大规模起义。正如沃林所说：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人民第一次完全独立地尝试摆脱一切枷锁，并继续实现社会革命：这一尝试是由工人阶级群众自己……直接进行的，没有政治上的牧羊人，也没有领导者或导师。这是迈向第三次社会革命的第一步。”[Voline, *Op. Cit.*, pp. 537-8]

在乌克兰，无政府主义思想得到了最成功的实践。在马赫诺运动的保护下，工人阶级人民直接地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和需求组织自己的生活——真正的社会自决。在自学成才的农民内斯托尔·马赫诺的领导下，黑军不仅与红军和白军的独裁政权作斗争，还抵抗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与“民族自决”（即建立一个新的乌克兰国家）的呼声相反，马赫诺呼吁乌克兰乃至全世界实行工人阶级的自决。他鼓舞他的工农同胞为真正的自由而战斗：

“征服或死亡——这是乌克兰的工农在现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但是我们不会为了去重复过去几年犯过的错而征服，那就是将我们的命运交到新的主人手中；我们将会为了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征服，根据我们自己的意志和对真理的理解来引导我们的生活。”[quoted by Peter Arshinov,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58]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黑军拒绝在他们解放的镇子和城市中建立政府，而是提倡创建自由的苏维埃，以便工人能够自我管理。以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Aleksandrovsk）为例，刚一解放了这座城市，马赫诺黑军“立即邀请工人阶级参加一次全体大会……提议让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团体来组织城市的生活和工厂的运作……第二次大会紧随第一次大会之后召开。工人群众以极大的热情讨论并审视了工人按照自我管理原则组织生活的问题，他们对这个点子相当欢迎……铁路工人们迈出了第一步……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该地区的铁路网络……从此刻开始，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无产阶级开始系统性地创建自我管理机构。” [Op. Cit., p. 149]

黑军认为，“工人和农民的自由是他们自己的，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工农自己有权按照他们认为合适和愿意的方式行事、组织自己，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互协商……黑军所能做的只是提供帮助和建议……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也不愿意，进行统治。” [Peter Arshinov, quoted by Guerin, Op. Cit., p. 99] 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布尔什维克向黑军提出了行动范围的建议——由他们的革命委员会（Revkom）负责政治事务，而黑军负责军事事务。对此，马赫诺建议他们“去开始做一些诚实的行当，而不是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工人。” [Peter Arshinov in *The Anarchist Reader*, p. 141]

他们还组织了自由农业公社，虽然“的确……这些公社并不多，仅包括一小部分人口……但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公社是由贫农自己组建的。黑军从未对农民施加任何压力，只是传播自由公社的理念。” [Arshinov,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87] 马赫诺在废除地主的土地占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苏维埃及其地区代表大会，使农民社区的各个部分之间在土地使用方面实现了平等分配。 [Op. Cit., pp. 53-4]

不仅如此，黑军还花费时间和精力让全体人民参与讨论革命的发展、军队活动和社会政策。他们组织了许多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大会，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组织了自由苏维埃、工会和公社。当他们解放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时，他们组织了一个地区性的农民和工人大会。1919年4月，黑军试图召集第三次地区农民、工人和起义者大会，1919年6月又试图召开几个地区的特别大会，布尔什维克将他们视为反革命团体，企图禁止这些大会，并宣布其组织者和代表为非法。

黑军通过继续召开会议予以回应，并质问：“难道可以存在一个由少数自诩为革命者制定的法律，允许他们将一群比他们更为革命的全体人民定为非法？”以及“革命应该捍卫谁的利益：是党的利益，还是那些用自己的鲜血推动革命的人民的利益？”马赫诺本人表示，“工人和农民召开会议、讨论他们事务的权利，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是革命赋予他们的权利。” [Op. Cit., p. 103 and p. 129]

此外，黑军“完全贯彻了革命性的原则，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在黑军占领的所有城市和城镇，他们首先解除了一切禁令，并废除了各种政权对新闻和政治组织施加的所有限制。”实际上，黑军认为“唯一需要对布尔什维克、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国家主义者施加的限制，是禁止

他们成立那些企图对人民实施独裁的‘革命委员会’。”[Op. Cit., p. 153 and p. 154]

黑军排斥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的腐化，提出了“自由且完全独立的、没有威权及其专横的法律的、工人阶级的苏维埃制度。”他们的宣言指出，“工人阶级必须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苏维埃，依靠苏维埃实现工人阶级自己的意愿和需求；也就是说，苏维埃必须是行政的，而非统治性的。”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将与国家一起被废除——土地和工坊“必须属于工人阶级自己，属于那些在其中工作的人的手中，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实现社会化。” [Op. Cit., p. 271 and p. 273]

黑军与红军截然不同，大体上是民主的（尽管诚然，内战的可怕性质确实导致了一些偏离理想的情况——然而，与托洛茨基对红军实施的体制相比，黑军的运动要民主得多）。

这场在乌克兰进行的、自我管理的无政府主义实验，在布尔什维克不再需要黑军之后（他们曾是共同反抗“白军”和亲沙皇派的盟友），以流血的方式收场。这场重要的运动在我们 FAQ 的附录“为什么马赫诺主义运动表明布尔什维克主义存在替代方案？”中有详细讨论。然而，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在马赫诺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那就是布尔什维克所实施的独裁政策，并非是由客观环境强加给他们的。相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理念，在他们所作的决策中有明确的影响。毕竟，马赫诺军虽然和他们在同一场内战中活跃，但他们并没有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执行党派权力的政策。相反，他们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并且面对布尔什维克强烈反对这些政策的情况下），成功地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自由、民主和权力。左翼曾公认的观点认为，（俄国革命）除了布尔什维克，没有其他选择。而黑军的经验反驳了这一点。人民大众以及当权者的政治思想与行为，和那些限制选择的客观障碍一样，都是决定历史结果进程的一部分。显然，思想的确重要。因此，马赫诺运动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曾经有一个（并且现在仍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那就是无政府主义。

自 1987 年，最后一次的无政府主义者游行发生在 1921 年的莫斯科，克鲁泡特金的葬礼上。当时有超过 1 万人跟随他的灵柩行进。他们举着黑色的旗帜，上面写着“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没有自由”和“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任务”。当送行队伍经过布图尔基监狱时，囚犯们摇动着牢房的铁栅栏，高唱着无政府主义歌曲

俄罗斯境内的无政府主义自 1918 年开始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他们也是第一个被新“革命”政权镇压的左翼团体。而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直到从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息来源传来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镇压性本质的消息（在那之前，许多人忽视了负面报道，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来自于亲资本主义的消息来源）。一旦这些来源可靠的报告传来，全球的无政府主义者纷纷拒绝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党的权力系统与镇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验证实了巴枯宁的预言，即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由一批极少数的、新兴的、或真或假的学术贵族统治大众的——高度专制政府。但人民并不博学，因此他们将从对政府的担忧中解放出来，完全被囊括在被统治的羊群中。” [Statism and Anarchy, pp. 178-9]

从大约 1921 年起，俄罗斯之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将苏联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用以表明虽然个体的老板可能已经被消除，但苏联的国家官僚体系在功能上，仍扮演着与西方的个体老板相同的角色（而俄罗斯境内的无政府主义者从 1918 年起就开始这么称呼它）。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俄国革命……试图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这一努力是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党派独裁下的俄国，进行的……在党的独裁铁律下，以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共产主义为基础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我们在俄罗斯学到了，如何不引入共产主义。” [Anarchism, p. 254]

这也揭露了伯克曼所称的“布尔什维克神话”，那就是俄国革命是成功的，应当被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效仿：“必须揭露这个伟大的错觉，否则它可能会把西方的工人带入与他们在俄罗斯的同胞们一样的深渊。对于那些已经看穿这个神话的人，揭露它的真实面目义不容辞。” [“*The Anti-Climax*”, *The Bolshevik Myth*, p. 342] 此外，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作为革命者，他们的革命职责不仅是呈现和学习革命的事实，还要向那些受布尔什维克独裁压迫的人们表示团结。正如埃玛·戈尔德曼所说，她并没有“来俄罗斯看到所期待的，无政府主义的实现。”这种理想主义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尽管列宁主义者却常常说相反的话）。她宁愿期待看到的是“革命所为之斗争的，社会变革的开端。”她意识到革命是艰难的，涉及“破坏”和“暴力”。虽然俄罗斯并不完美，但这并不是她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源。而真正的原因是“俄罗斯人民被”布尔什维克国家使用“刀和枪把人民排除在外，锁在他们自己的革命之外”。而作为一名革命者，她拒绝“与统治阶级站在一起，而在俄罗斯，这个统治阶级被称为共产党。”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p. xlvii and p. xlv]

有关俄国革命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FAQ 附录中的“俄国革命”部分。^①该部分不仅涵盖了喀琅施塔得起义和红军，还讨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是否存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替代方案。

以下是推荐的书籍：由沃林所著的《未知的革命》、由 G.P. 马克西莫夫所著的《断头台的工作》、由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著的《布尔什维克的神话》与《俄国的悲剧》、由 M. 布林顿所著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由艾达·梅特所著的《喀琅施塔得起义》、由彼得·阿西诺夫所著的《马赫诺运动的历史》、由埃玛·戈尔德曼所著的《我在俄罗斯的幻灭》与《活出我的生活》，以及由亚历山大·斯基尔达所著的《安那其的哥萨克——内斯托尔·马赫诺：1917-1921 年乌克兰自由苏维埃的斗争》。这些书籍，为深入了解无政府主义者在俄罗斯革命中的角色和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许多这些书籍是由在革命期间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写，其中许多人被布尔什维克囚禁，并因国际压力被驱逐到西方。这些国际上的压力来自前往莫斯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代表，他们原本是布尔什维克试图争取的对象。大多数此类代表

^① 作者在“补充材料”的附录第二部分中更加详细地介绍了俄国革命，而这部分在早期版本的 AFAQ 中被归于 H.11 节左右。更详细地介绍，也可参看赵京所编著的《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9781458304117)

坚守其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立场，并说服他们的工会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与莫斯科决裂。到 1920 年代初，所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联合会都与无政府主义者一道，拒绝将俄罗斯视为“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党派独裁。

A.5.5 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和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激进化运动。工会成员爆炸性扩增，伴随着雨后春笋的罢工浪潮，抗议与游行达到了相当大规模。这部分是缘于那场战争，也有部分是缘于俄国革命表面上的胜利。对俄国革命的热情甚至影响到了如约瑟夫·拉巴迪这样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他和大多数其他反资本主义者一起，看到了“东方的赤色给予我们对更光明未来的希望”，而布尔什维克正在“做着值得赞赏的努力，至少在尝试找到工业化奴役的出路。”

[quoted by Carlotta R. Anderson, *All-American Anarchist* p. 225 and p. 241]

整个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变得更受欢迎，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在规模上也日渐壮大。比如在英国，（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断地发酵催生了工会代表运动和克莱德河畔的罢工；德国则见证了受工业工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自由意志主义形式——“委员会共产主义”影响下的、IWW 的兴起。西班牙则见证了 CNT 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规模增长。顺带一提，不幸的是，它也目睹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兴起与增长。意大利也不例外。

在都林，新一个平民运动正在酝酿。这场运动围绕着“内部委员会”（internal commissions，临时选举的申诉委员会）开展。这些新生的组织，直接基于共同工作在特定车间的群众。在每 15 到 20 人的工人小组中，选举出一个基于委任制和可撤回的车间代表。这些在某一个工厂选举出来的车间代表，之后会再开一次车间代表集会，选举出此生产设施的“内部委员会”，将一直对车间代表的主体负直接责任。这个委员会也被称作“工厂理事会”

在 1918 年十一月和 1919 年三月之间，内部委员会已成为工会运动中的全国性议题。1919 年 2 月 20 日，意大利金属工人工会（Italian Federation of Metalworkers，FIOM）赢得了一项协议，协议允许在工厂中选举“内部委员会”。随后，工人们试图将这些工人代表机构，转变为具有管理职能的工厂委员会。到 1919 年五一劳动节时，内部委员会“正在成为金属加工业的主导力量，而工会则面临沦为边缘化行政单位的危险。在改良派看来，这些令人不安的发展背后，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推动。”[卡尔·列维，《葛兰西与无政府主义者》，第 135 页] 到 1919 年 11 月，都灵的内部委员会已经转变为工厂委员会。

都灵的工人运动，通常与周刊《新秩序》（L'Ordine Nuovo）联系在一起，该刊物于 1919 年 5 月 1 日首次出版。正如丹尼尔·盖朗所总结的那样，该刊“由左翼社会党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编辑，协助他的是都灵大学的一位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哲学教授，化名为卡洛·佩特里，以及一个由都灵自由意志主义者组成

的核心团队。在工厂中，《新秩序》小组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尤其是金属行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积极分子，皮埃特罗·费雷罗和毛里齐奥·加里诺。《新秩序》宣言，由社会党人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共同签署，双方一致认为工厂委员会是‘适用于未来共产主义管理的机构，既适用于单个工厂，也适用于整个社会。’”[《无政府主义》，第 109 页]

都灵的发展不应被孤立看待。在整个意大利，工人和农民都在采取行动。1920 年 2 月下旬，利古里亚、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爆发了一系列工厂占领行动。在利古里亚，由于工资谈判破裂，工人们占领了塞斯特里·蓬特、科尔尼利亚诺和坎皮的金属加工厂和造船厂。在工团主义者的领导下，他们通过工厂委员会持续管理这些工厂足足四天之久。

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工团主义工会（*Italian Syndicalist Union, USI*）的会员人数增长到约 80 万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工会（*Italian Anarchist Union, UAI*）的影响力也相应增长，拥有约 2 万名成员和每日出版的报纸（《人类新星》，*Umanita Nova*）。正如威尔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格温·A·威廉姆斯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是左翼最始终如一、最彻底的革命派群体……1919 到 1920 年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历史的最显著特点是：快速且几乎连续的增长……工团主义者尤其成功地赢得了工人阶级的激进意见，而社会主义运动完全未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秩序》，第 194-195 页] 在都灵，无政府主义者“在 FIOM 内部工作，并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新秩序》的运动。”[同上，第 195 页] 不出所料，其他社会主义者谴责《新秩序》是“工团主义分子”。

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首先提出了占领工作场所的概念。马拉泰斯塔在 1920 年 3 月的《人类新星》中讨论了这一想法。用他的话说：“抗议的总罢工不再让任何人感到不安……必须寻求其他方式。（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想法：占领工厂……这种方法无疑有前景，因为它符合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并且构成了一种为最终的征收行动做准备的演习。”[《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活与思想》，第 134 页] 同月，“在米兰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工团主义运动中，阿尔曼多·博尔吉（USI 的无政府主义秘书）呼吁进行大规模工厂占领。在都灵，经过两周激烈的讨论，车间委员会的重新选举刚刚结束，工人们感受到了这股热潮。（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们开始呼吁占领。”事实上，“都灵以外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本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不出所料，工团主义金属工人代表“支持都灵的工厂委员会，因为它们体现了反官僚的直接行动，旨在控制工厂，并且可以成为工团主义工业工会的第一个细胞……工团主义大会投票支持工厂委员会……马拉泰斯塔……支持它们作为一种保证能引发反叛的直接行动……《人类新星》和《阶级战争》（*Guerra di Classe, USI* 的报纸），几乎和《新秩序》以及《前进报》（*Avanti*）都一样，坚定地支持工厂委员会。”[Williams, *Op. Cit.*, p. 200, p. 193 and p. 196]

激进情绪的高涨很快引发了雇主的反攻。雇主组织谴责工厂委员会，并开始动员反对工厂委员会。工人们反抗并拒绝服从老板的命令——工厂里的“无纪律”现象愈演愈烈。雇主们赢得了国家对现行工业规定的执行支持。FIOM 在 1919 年获得的国家合同规定，内部委员会被禁止在车间内活动，并且只能在非工作时

间进行。这意味着，都灵的工会代表运动——比如停止工作以举行车间代表选举——违反了合同。该运动实际上是通过大规模的不服从行为得以维持的。雇主们利用这一违反协议的行为，作为打击都灵工厂委员会的手段。

与雇主的最后对决在4月到来，当时菲亚特公司车间代表大会呼吁进行静坐罢工，以抗议几位车间代表被解雇。作为回应，雇主宣布了大规模停工。政府则投入大量武力作为回应，支持停工；军队占领了工厂，并在工厂内架设起机枪阵地。当车间代表运动在罢工两周后，决定在即刻争议问题上投降时，雇主则提出要求：根据FIOM的全国合同，车间代表委员会的活动应仅限于非工作时间，并（由他们）重新实施管理控制。

这些要求直接瞄准了工厂委员会制度的核心，都灵的工人阶级运动对此做出了巨大的反应，发起了大规模总罢工以捍卫这一制度。在都灵，罢工全面展开，并迅速蔓延至皮埃蒙特地区，最高峰时有50万工人参与。都灵的罢工者呼吁全国范围内扩展罢工，而主要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人们则转向意大利总工会（CGL）和社会主义党领导人，然而他们拒绝了这一呼吁。

都灵总罢工的唯一支持，来自那些主要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会，如独立铁路工会和海员工会（“只有工团主义者采取了行动”）。比萨和佛罗伦萨的铁路工人拒绝运输前往都灵的部队。热那亚周围的工人，特别是码头工人和USI有重要影响的工作场所，也爆发了罢工。因此，尽管“被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背叛和抛弃，”4月的运动“仍然找到了民众支持，”这种支持通过“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直接领导或间接启发的行动”表现出来。在都灵本地，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正“被威胁，要从葛兰西和《新秩序》小组手中夺走工厂委员会运动。”[威廉姆斯，《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第207、193和194页]

最终，CGL（意大利总工会）领导层在接受雇主要求，将车间代表委员会活动限制到非工作时间这一主要要求的条件下，解决了罢工。尽管委员会的活动和在车间内的存在感大大减少，但它们在9月工厂占领期间将会经历一次复兴。

无政府主义者“指责社会主义者的背叛。他们批评社会主义者认为存在的虚假的纪律感，这种纪律感让社会主义者屈从于他们懦弱的领导。如果将这种让每个行动都受到‘领导者的计算、恐惧、错误和可能的背叛’影响的纪律，与塞斯特里·蓬特的工人纪律进行了对比，后者在与都灵工人表示团结时参与罢工；与铁路工人的纪律对比，他们拒绝运输安全部队到都灵；以及那些忘记党派和教派考虑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联合会成员对比，他们自愿支持都灵工人。”[卡尔·列维，《葛兰西与无政府主义者》，第161页]可悲的是，社会主义者及其工会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纪律”，将在工厂占领期间重复，结果是惨痛的。

1920年9月，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留厂罢工，作为对雇主减薪和停工的反抗。“危机气氛的核心是工团主义者的崛起。”8月中旬，USI的金属工人“呼吁两大工会占领工厂”并号召“进行预防性占领”以应对停工。USI认为这是“金属工人对工厂的没收”（必须“通过一切必要手段进行捍卫”），并认为“需要召集其他行业的工人参与战斗。”[威廉姆斯，同上，第236、238-239页]确实，“如

果 FIOM 没有采纳工团主义者的工厂占领思想来应对雇主的停工，USI 很可能会从都灵的政治活跃工人阶级中获得重要支持。”[卡尔·列维，《葛兰西与无政府主义者》，第 129 页] 这些罢工从工程制造厂开始，随后蔓延至铁路、道路运输和其他行业，农民也开始占领土地。然而，罢工者们不仅仅是占领了工作场所，他们还将这些工作场所置于工人的自我管理之下。很快，超过 50 万名“罢工者”投入工作，为自己生产。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参与了这些事件，他写道：

“金属工人发动了因薪资问题而起的运动。这是一场新型的罢工。工人们没有离开工厂，而是决定留在工厂里，但不工作……在整个意大利，工人们充满了革命激情，很快他们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工人们认为时机成熟，准备一次性夺取生产资料。他们武装起来进行自卫……并开始自己组织生产……这实际上是取消了私有制……这是一种新政权，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开端。政府对此袖手旁观，因为它觉得自己无力反对。”[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 134 页]

丹尼尔·格林很好地总结这一运动进行的程度：

“工厂的管理……由技术和行政工人委员会负责。自我管理走得相当远：在早期，工人们得到了银行的帮助，但当银行撤回援助时，工厂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来支付工人的工资。需要非常严格的自律，禁止饮酒，并组织了武装巡逻队以进行自卫。工厂之间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团结。矿石和煤炭被放入一个共同的资源池，并公平分配。”[《无政府主义》，第 109 页]

意大利“陷入瘫痪，50 万工人占领了他们的工厂，并在工厂上方升起了红黑旗。”这一运动蔓延到整个意大利，不仅仅是米兰、都灵和热那亚等工业重镇，还包括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巴勒莫。USI 的“抗争者们无疑处于运动的前沿”，而《人类新星》则认为“这一运动非常严肃，我们必须尽全力将其引导向大规模的扩展。”USI 的持续呼吁“将这一运动扩展到整个工业领域，实行他们的‘征收总罢工’。”[威廉姆斯，《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第 236 页和第 243-244 页] 受自由意志主义者影响，铁路工人拒绝运输部队，工人们违抗改良派工会的命令进行罢工，农民占领了土地。无政府主义者全力支持这一运动，毫不意外地，“占领工厂和土地完全符合我们的行动纲领。”[马拉泰斯塔，同上，第 135 页] 卢伊吉·法布里将这些占领行动描述为“揭示了无产阶级以前未曾意识到的力量。”[帕奥洛·斯普里诺，《工厂占领》，第 134 页]

然而，在占领了四周后，工人们决定离开工厂。这是因为社会党和改良派工会的行动。他们反对这一运动，并与国家进行了谈判，以让事情“常态化”为条件，换来了与雇主合作的情况下合法延续工人控制的承诺。革命的问题，在 4 月 10 日至 11 日于米兰举行的 CGL 全国委员会投票决定，而没有征求工团主义工会的意见，因为社会党领导人拒绝作出任何选择。

毫无疑问，这一“工人控制”的承诺并未兑现。缺乏独立的工厂间组织，使工人们不得不依赖工会官僚来获取关于其他城市的情况，而工会官僚则利用这一权力，将工厂与城市、以及工厂之间，隔离开来。这导致工人们返回工作岗位，

“尽管在各个工厂中有个别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拉泰斯塔，同上，第136页]地方的工团邦联，无法提供一个充分协调的、占领运动所需的框架，因为改良派工会拒绝与它们合作；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较大的少数派，他们仍然是少数派：

“在9月12日举行的‘工人内部’大会上（其中无政府主义联盟、铁路工人和海员工会参与了该会议），工团联合会决定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党和CGL的支持，‘我们无法单独做成’，（他们）抗议米兰的‘反革命投票’，声明这一投票是少数派的、武断的、无效的，并最终发出了新的、模糊的，但充满激情的号召，而告终。”[保罗·斯普里诺，《工厂占领》，第94页]

马拉泰斯塔在米兰的一家工厂对工人们发表讲话。他争辩道：“那些庆祝（邦联和资本家）在罗马签订了协议，是作为你们的伟大胜利的人，是在欺骗你们。实际上，胜利属于乔利蒂^①、政府和资产阶级，他们从悬崖边上得救了。”在占领期间，“资产阶级在战栗，政府则无法应对这一局面。”因此：

“当罗马协议把你们推回到本可以摆脱的资产阶级剥削下时，谈论胜利是谎言。如果你们放弃工厂，就要有这样的信念——你们失去了一场伟大的战斗，并且有坚强的决心，在第一次机会来临时就重新开始斗争，并彻底进行下去……如果你们没有对这一胜利的欺骗性特点，产生任何幻想，那么什么都不算失去。那个著名的工厂控制法令，就是一场嘲弄……因为它试图调和你们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像试图调和羊和狼的利益一样。不要相信那些，通过一天天推迟革命来愚弄你们的领导者。你们自己必须在机会来临时进行革命，而不是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命令，或者命令只会指示你们放弃行动。相信你们自己，相信你们的未来，你们一定会胜利。”[引自马克斯·内特劳，《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传记》]

马拉泰斯塔的预见得到了验证。随着工厂占领的结束，唯一的胜利者是资产阶级和政府。不久后，工人们将面临法西斯主义的到来，但首先，在1920年10月，“在工厂被撤离后”，政府（显然清楚谁才是最真实的威胁）“逮捕了整个USI和UAI的领导层。社会主义者（对此）没有反应”并且“几乎无视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迫害，直到1921年春天，年迈的马拉泰斯塔和其他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米兰的牢房中发动了绝食抗议。”[卡尔·列维，《格拉姆西与无政府主义者》，第221-222页]他们在经过四天的审判后被判无罪，随后释放。

1920年的事件表明了四个方面。首先，工人们可以在没有老板的情况下，成功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场所。其次，说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参与劳工运动的重要性。如果没有USI的支持，都灵的工人运动将比当时更加孤立。第三，无政府主义者需要组织起来以影响阶级斗争。UAI和USI的增长，无论在影响力还是规模上，都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提出工厂占领

^① 译注：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当时的意大利首相

的思想、并支持这一运动，运动能否像原本那样成功且广泛，就要打个问号。最后，社会主义组织的等级阶层结构，并不能培养出革命性的会员。由于总是依赖领导者，这一运动被削弱，无法充分发展其潜力。

这段意大利历史解释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崛起。正如托比亚斯·阿布塞指出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崛起，无法与在这之前的“赤色双年”（the *biennio rosso*）——即 1919 年和 1920 年这两个红色年份——中发生的事件，分开来看。法西斯主义是一场预防性的反革命……它是由于革命失败而发起的。”[“The Rise of Fascism in an Industrial City”，《重新思考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大卫·福尔加茨（编），第 54 页] “预防性反革命”这一术语，最初是由无政府主义者路易吉·法布里提出的，他正确地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统治阶级暴力武装防线的组织和代理人，旨在抵御那些对他们而言过于强势、团结且充满干预性的无产阶级。”[“Fascism: The Preventive Counter-Revolution”，《无政府主义》，罗伯特·格雷厄姆（编），第 409-410 页]

尽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证明了马拉泰斯塔在工厂占领时期的警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坚持到底，我们将用血泪偿还如今对资产阶级逐渐滴注的恐惧。”[托比亚斯·阿布塞，同上，第 66 页] 资产阶级和富有的地主阶层在国家的帮助下，支持法西斯主义，以教育工人阶级他们本该处地位。国家确保“在资金和武器方面提供一切援助，对其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并在必要时，以恢复秩序为借口，通过武装力量进行干预。他们还会帮助法西斯分子，当他们开始被打败而非继续施暴时，就会迅速支援。”[法布里，同上，第 411 页] 托比亚斯·阿布塞指出：

“法西斯分子及其在工业界和农业界的支持者，在 1921-22 年的目标很简单：彻底摧毁有组织的工农力量：用子弹和棍棒，抹去‘赤色双年’的所有成果，乃至自上世纪之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底层阶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同上，第 54 页]

法西斯暴徒袭击并摧毁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场所、社区中心、激进报刊以及地方总工会（*Camera del Lavoro*）。然而，即使在法西斯恐怖最黑暗的日子里，无政府主义者依然奋起反抗极权主义势力。“毫无疑问，对法西斯主义最坚决的工人阶级抵抗，发生在……那些拥有强大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的城镇或城市。”[托比亚斯·阿布塞，同上，第 56 页]

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与并经常组织“人民阿迪蒂突击队”（*Arditi del Popolo*，后称“人民敢死队”）^①，这一工人阶级组织致力于为维护工人的利益自卫。“人民敢死队”，组织和推动了工人阶级对法西斯暴徒的抵抗，并多次击败了更大规模的法西斯力量。例如，1922 年 8 月，在帕尔马这一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数千名伊塔洛·巴尔博的法西斯暴徒，被几百名‘人民敢死队’及其支持的工人阶

^① 译注：阿迪蒂突击队（*Arditi*），是一战时意大利皇家陆军的一支精锐特种部队，人称“敢死队”。阿迪蒂（或译为阿尔蒂提），意大利本意是勇敢者。故 *Arditi del Popolo* 也可译为“人民敢死队”。

级社区居民，彻底地羞辱。”[托比亚斯·阿布塞，同上，第56页]

“人民敢死队”成为意大利最接近于马拉泰斯塔和 UAI 所提出的，工人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尝试。该运动“沿着反资产阶级和反法西斯的路线发展，在其地方分支保持独立性。”[《红色年代，黑色年代：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法西斯的抵抗》，第2页]然而，与传统的“反法西斯”组织不同，“人民敢死队”“并不是一个保卫抽象意义上民主的运动，而是一个致力于捍卫产业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大量手工业者利益的，工人阶级组织。”[托比亚斯·阿布塞，同上，第75页]不出所料，“人民敢死队，在那些传统工人阶级政治文化不完全由社会主义主导，而是具有强烈无政府主义或工团主义传统的地区，最为强大且最为成功，例如巴里、里窝那、帕尔马和罗马。”[安东尼奥·索内萨，《Working Class Defence Organisation, Anti-Fascist Resistance and the *Arditi del Popolo* in Turin, 1919-22》，《欧洲历史季刊》，第33卷，第2期，第184页]

然而，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最终撤出了这一组织。1921年8月，社会党与法西斯签订了一纸“和平协议”。共产主义者“宁愿撤回其成员，也不愿让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红色年代，黑色年代》，第17页]事实上，“在协议签订的同一天，《新秩序》刊登了意大利共产党（PCdI）的声明，警告共产党员不要参与‘人民敢死队’。”四天后，共产党领导层“正式宣布退出运动，并对继续参与或与之合作的党员施加严厉的纪律处分。”因此，“到1921年8月的第一周末，意大利社会党（PSI）、劳工总联合会（CGL）和意大利共产党（PCdI）都正式谴责了”该组织。“只有无政府主义领导层，尽管并不总是完全认同‘人民敢死队’的纲领，却从未放弃这一运动。”事实上，《人类新星》报“强烈支持”该运动，认为它“代表了人民反法西斯的抵抗，和捍卫组织自由的表达。”[索内萨，同上，第195页和第194页]

尽管各党的领导层选择放弃，但许多基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依然积极参与这一运动。后者甚至公然“违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日益增长的放弃态度。”例如，在都灵，共产党人参与“人民敢死队”，“并非单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一动态也因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参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对运动支持的拒绝，揭示了布尔什维克式组织形式的破产，这种形式无法对人民运动的需求作出回应。事实上，这些事件表明，“自由意志的自治传统，以及其对权威的抵制，同样适用于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尤其当他们坚持对基层形势的误判时。”[索内萨，同上，p. 200, p. 198 and p. 193]

因此，意大利共产党未能支持反法西斯的人民抵抗运动。共产党的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认为：“党的领导层在‘人民敢死队’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一种需求，即防止党的成员受到非党领导的控制。”葛兰西进一步指出，这一政策“导致失去对一个自下而上发展的群众运动的控制，而这个运动本可以被我们在政治上加以利用。”[《政治著作选集（1921-1926）》第333页]尽管葛兰西对“人民敢死队”的态度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更少些宗派主义色彩，但“与所有共产主义领导人一样，葛兰西期待着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军事队伍的形成。”[索内萨，同上，第196页]换句话说，共产党领导层将反法西

斯斗争视为争取更多党员的手段；而当他们发现这一斗争，可能会导致党员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时，他们宁愿选择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不愿冒此风险。

正如阿布塞所指出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撤回对‘人民敢死队’的支持，使该组织陷入瘫痪。”[同上，第 74 页] 因此，“社会改良主义的失败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宗派主义，使得广泛而有效的武装反抗成为不可能；而那些孤立的人民抵抗行动，最终无法联合成为一场成功战略。”然而，法西斯主义本可以被击败的：“1921 年 7 月在萨尔扎纳和 1922 年 8 月在帕尔马的起义，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在行动和宣传中所主张策略的正确性。”[《红色年代，黑色年代》，第 3 页和第 2 页] 历史学家托比亚斯·阿布塞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分析，他指出：“1922 年 8 月在帕尔马发生的事情……本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生——如果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层，能够响应无政府主义者马拉泰斯塔所呼吁的反法西斯革命统一战线。”[同上，第 56 页]

最终，法西斯暴力取得了成功，资本主义统治得以维持：

“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志和勇气，不足以对抗那些在物资和武器上得到强有力支持，并受到国家镇压机构庇护的法西斯团伙。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只有社会党和劳工总联合会（改良主义工会）也选择直接行动，才能遏制法西斯主义。”[《红色年代，黑色年代》，第 1-2 页]

在帮助击败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确保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即便在法西斯国家建立之后，无政府主义者仍在意大利国内外持续抵抗。例如，在美国，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对抗其社区内的法西斯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他因在 1912 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劳伦斯罢工中的领导作用而闻名。“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在反法西斯领导人中独树一帜，这一地位甚至得到了罗马的墨索里尼政治警察的认可。”[努齐奥·佩尔尼科内所著的《卡洛·特雷斯卡：叛逆者画像》，第 4 页]。1936 年，许多意大利人，无论是否为无政府主义者，都前往西班牙抵抗佛朗哥（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可见翁贝托·马尔佐基所著的《回忆西班牙：西班牙内战中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志愿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政府主义者在意大利的游击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反法西斯运动主要由反资本主义力量主导，才导致美国和英国，在他们“解放”的地区任命了著名的法西斯分子担任政府职务（而这些地方往往是由游击队已经解放的城镇，最终盟军“解放”了这些被其居民解放的城市！）。

鉴于意大利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历史，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人声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工团主义的产物或形式。甚至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持有这种观点。鲍勃·布莱克（Bob Black）认为“意大利的工团主义者大多倒向了法西斯主义”，并引用了戴维·D·罗伯茨（David D. Roberts）1979 年的研究《工团主义传统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来支持他的观点。[《后左翼的无政府主义》，第 64 页]。彼得·萨巴蒂尼（Peter Sabatini）在《社会无政府主义》的一篇书评中也持类似观

点，他认为工团主义的“最终失败”在于“它演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载体”。[《社会无政府主义》，第 23 期，第 99 页]。这些说法的真相是什么？

查阅布莱克的引用，我们发现，事实上，大多数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并未倒向法西斯主义——如果我们将工团主义者，定义为意大利工团主义工会（USI）的成员的话。罗伯茨指出：

“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并未响应工团主义者的号召，而是继续反对（意大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预，拒绝参与这场看似徒劳的资本主义战争。工团主义者甚至未能说服 USI 内部的大多数成员……大多数人选择了 USI 内部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阿曼多·博尔吉的中立立场。随着德·安布里斯带领干预主义少数派退出该联合会，分裂随之而来。”[《工团主义传统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第 113 页]

然而，如果我们将“工团主义者”，定义为战前工团主义运动中的部分知识分子和“领导者”，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的工团主义领导人迅速且几乎一致地支持干预战争。”[同上，第 106 页]。许多这些支持战争的“主要工团主义者”后来确实成为了法西斯分子。然而，仅仅关注少数“领导者”（而多数人并未追随他们！），并据此断言“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大多倒向了法西斯主义”，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正如前文所述，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是最坚定且最成功的反法西斯斗士。实际上，布莱克和萨巴蒂尼的说法无异于对整个运动的诽谤。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些“主导的工团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也不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正如罗伯茨所指出的：“在意大利，工团主义理论更明显地是由一群知识分子构建的，他们在社会党内部运作，并寻求改良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些人“明确谴责无政府主义”，并且“坚持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他们“真诚地希望——并尝试——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开展工作。”[同上，第 66 页，第 72 页，第 57 页和第 79 页]。根据卡尔·列维（Carl Levy）在其关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中所述，“与其他工团主义运动不同，意大利的工团主义是在第二国际政党内部形成的。其支持者部分来自社会主义的强硬派……南方的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倡导共和主义……另一部分则是工人党（Partito Operaio）的残余势力。”[《意大利无政府主义：1870-1926》，载于大卫·古德韦主编的《为了无政府主义：历史、理论与实践》，第 51 页]

换句话说，那些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工团主义者，首先是少数派知识分子，他们无法说服工团主义联盟中的大多数人追随其步伐；其次，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而非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甚至也不是革命工团主义者。

根据卡尔·列维的观点，罗伯茨的著作“侧重于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并指出“部分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帮助催生或同情地支持了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在许多方面，与南方工团主义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和共和主义言辞，存在相似之处。”他认为“对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和全国组织者的关注过多”，并指出

工团主义“在长期活力方面几乎不依赖其全国领导层。”[同上，第 77 页，第 53 页和第 51 页]。如果我们真正考察 USI 的成员，而不是断言其“大多倒向了法西斯主义”，我们会发现他们是一群不屈不挠地与法西斯作斗争、并遭受了大规模的法西斯暴力的人。

总而言之，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工团主义毫无关系。正如前文所述，USI 与法西斯势力展开了斗争，并与意大利无政府工团（UAI）、社会党以及其他激进组织一道，被法西斯势力摧毁。少数战前的马克思工团主义者后来投身法西斯主义，并提出“国家工团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工团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存在关联（正如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载体”一样！）。

无政府主义者是最坚定、最成功的反法西斯力量，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对立——法西斯主义代表着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彻底的国家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则倡导自由、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同样，当资本家的特权和权力受到威胁时，他们依靠法西斯主义来拯救自身，这也不足为奇。这一过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仅列举四个例子：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智利）。

A.5.6 西班牙革命与无政府主义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一个真正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优秀范例——事实上，在我所知范围内最好的例子——就是 1936 年的西班牙革命。在共和派控制的大部分地区，爆发了一场极具启发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涵盖了广阔地区的工业和农业……这一革命，无论从人类社会的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成功的。也就是说，生产得以有效地持续进行；农场和工厂的工人，完全能够在没有来自上层的强制下，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与许多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所想象的，截然不同。”这场 1936 年的革命“是基于三代人的实践、思考和努力，使无政府主义理念深入到了广大民众之中。”[《激进的优先事项》，第 212 页]

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和宣传，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班牙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超过 150 万工农加入了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这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联盟；同时还有三万人加入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FAI）。当时西班牙的总人口为 2400 万。

面对 1936 年 7 月 18 日法西斯政变而爆发的社会革命，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实验。作为最后一个大规模的工团主义工会，CNT 不仅成功抵御了法西斯叛乱，还推动了对土地和工厂的广泛接管。超过七百万人，其中包括大约两百万 CNT 成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实践了自我管理，并且在实际上改善了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

在 7 月 19 日的激动人心的日子之后，CNT 和 FAI 基层成员真正掌握了革命的主动权和权力。正是普通民众——毫无疑问，在 FAI 成员和 CNT 积极分子的影响下——在击败法西斯政变之后，使生产、分配和消费重新启动（当然是在更平等的安排下）；同时，成千上万的人组织并志愿加入民兵队伍，以解放那些被佛朗哥占领的地区。在各个方面，西班牙工人阶级正在通过自身的行动，创造一个基于他们自身对社会正义和自由理解的新世界——而这些理念，毫无疑问，正是受到了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启发。

乔治·奥威尔^①亲眼目睹了 1936 年 12 月底巴塞罗那的那段革命时期，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那场社会变革：

“无政府主义者依然实际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仍在全面进行中。对于那些从一开始就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即使到了 12 月或来年 1 月，可能已经感到革命时期正在走向尾声；但对于一个刚从英格兰来的外人来说，巴塞罗那的景象令人震撼且难以置信。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控的城市。几乎每一座规模稍大的建筑都被工人接管，悬挂着红旗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每面墙上都涂满了镰刀锤子和革命政党的缩写；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洗劫，其圣像被焚毁。工人队伍正系统性地拆除部分教堂。每一家商店和咖啡馆都挂着标志，表明它们已经被集体化；甚至连擦鞋匠也被集体化，他们的工具箱被漆成红黑色。服务员和店员直视你的眼睛，平等地对待你。奴颜婢膝甚至那些仪式化的语言形式暂时消失了。没有人再说‘先生’、‘老爷’甚至‘您’，每个人都以‘同志’或‘你’相称，用‘Salud!’代替‘Buenos días’问好……最重要的是，人们对革命和未来充满信念，仿佛突然步入了一个平等与自由的新时代。人们试图以人的方式行事，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机器中的齿轮。”[《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 2-3 页]

这场历史性的革命全貌无法在这里详尽叙述。其更详细的讨论将在这本 FAQ 的[第 1.8 节](#)中进行。这里只能突出说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点，以期待这些内容能够提示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并鼓励人们去进一步了解。

加泰罗尼亚的所有工业被置于工人自治或工人控制之下（即，在前一种情况下完全接管管理的**所有**方面，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对旧的管理进行控制）。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城镇和地区的经济都被转变为集体的联邦化管理。铁路联合会的例子可以作为典型案例（该联合会被建立起来以管理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瓦伦西亚的铁路线路）。联合会的基础是地方大会：

“每个地方的所有工人每周开两次会议，讨论与工作相关的一切事项……地方大会选举一个委员会，负责管理每个车站及其附属设施的总体活动。在（这些）会议上，该委员会的决定（方针）在报告和回答问题之后，需接受工人的批准或否决。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则继续（在他们先前的岗位上）工作。”

^① 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有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委员会的代表可以随时由大会罢免，而铁路联合会的最高协调机构是“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各分区的工会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加斯頓·勒瓦尔（Gaston Leval）的记述，对铁路线路的控制“并非自上而下运作，如同国家主义和集中化的系统那样。革命委员会没有这样的权力……委员会的成员仅限于监督总体活动，并协调构成铁路网络的不同线路的活动。”[加斯頓·勒瓦尔，《西班牙革命中的集体化》，第 255 页]

在土地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农村日工，自发组织起自主管理的集体。通过合作，他们改善了生活质量，引入了医疗、教育、机械化生产，并对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集体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还扩大了自由度。正如一位成员所言：“生活在集体中……简直太美好了。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村委员会的表现不令人满意，可以直接提出意见。委员会在做出重大决定前，总会召集整个村庄召开大会。这一切都很美妙。”[罗纳德·弗雷泽，《西班牙的血》，第 360 页]

我们将在 FAQ 的第 I.8 节中更详细地讨论这场革命。例如，I.8.3 和 I.8.4 节更深入地探讨了工业集体化，而第 I.8.5 和 I.8.6 节则讨论了农村集体化。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章节仅是这一庞大社会运动的概述，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加斯頓·勒瓦尔（Gaston Leval）的《西班牙革命中的集体化》、萨姆·多尔夫戈夫（Sam Dolfhoff）的《无政府主义集体》、何塞·佩拉特斯（Jose Peirats）的《西班牙革命中的 CNT》，以及其他大量关于这场革命和无政府主义文献。

在社会层面，无政府主义组织创办了理性学校、自由意志主义的医疗服务、社会中心等。自由女性组织（Mujeres Libres）对抗西班牙社会中女性的传统角色，基于成千上万的女性以权力，无论是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还是外部（更多信息可参考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Martha A. Ackelsberg）的《西班牙的自由女性》，这本关于该重要组织的著作）。这种社会层面的活动，仅仅是对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开始的工作的延续；例如，（在这之前，）工会就经常资助理性学校、工人中心等机构。

志愿民兵前往解放佛朗哥控制下的西班牙其他地区，并以无政府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包括男性和女性。这些民兵没有军衔、没有敬礼礼节，也没有官僚阶层，人人平等。乔治·奥威尔作为工人党统一马克思主义党（POUM）的民兵成员，对此有着清晰的描述（POUM 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受列宁主义影响，但并非像共产党声称的那样是托派组织）。他写道：

“[民兵]制度的核心，在于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社会平等。从将军到士兵，每个人领取相同的薪水，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并且完全平等地相处。如果你想拍一拍师长的后背，向他要一根香烟，这完全没问题，也没有人觉得奇怪。理论上，每个民兵单位都是一个民主体系，而非等级体系。大家都知道命令必须被执行，但也明白命令是以同志对同志的方式发出的，而不是以上级对下级的关系。这里的确有军官和士官，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军衔；没有头衔、徽章、脚跟碰击或敬礼。他们试图在民兵中创造一个临时的无阶级社会模型。当然，并非完

全实现了平等，但这比我见过的任何形式的平等都要接近，甚至超出了我在战争时期认为可能的程度……”[同上，第 26 页]

然而，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其他地方一样，被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和资本主义（佛朗哥）夹击摧毁。不幸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将反法西斯的团结置于革命之上，从而间接帮助了他们的敌人击败了自己以及革命本身。至于他们是否是由于环境被迫采取这种立场，还是本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至今仍有争议。（有关 CNT-FAI 为何选择合作的讨论，请参见[第 1.8.10 节](#)；有关为何这种决定并非无政府主义理论产物的分析，请参见[第 1.8.11 节](#)。）

奥威尔对其民兵经历的记述，揭示了为什么西班牙革命对无政府主义者如此重要：

“我或多或少是偶然间进入了西欧唯一的一个大规模社区，在那里，政治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比其对立面更为普遍。在阿拉贡高原，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社区中，主要是工人阶级出身，但也并不完全如此，大家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平等地交往。理论上，这是一种完美的平等，实际上也几乎接近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这里让人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预演，我指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精神氛围。许多文明生活中的正常动机——势利、贪财、害怕老板等等——在这里都不复存在了。社会常见的阶级划分，在这里几乎完全消失了，这在英格兰那种被金钱污染的空气中，是难以想象的；这里除了农民和我们自己，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人拥有别人作为他的主人……在这个社区中，希望比冷漠或愤世嫉俗更为常见，‘同志’这个词真正地代表了同志情谊，而不像在大多数国家那样，只是一个虚伪的托辞。人们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很清楚，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否认社会主义与平等有任何关系。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有一大群党派追随者和油头粉面的教授们，忙于‘证明’社会主义只意味着一种计划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而贪婪的动机依然存在。但幸运的是，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愿景。吸引普通人投身社会主义并愿意为之冒险的东西，即社会主义的‘神秘感’，正是平等的理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无阶级社会，否则就什么都不是……在这个没有人追逐利益的社区中，即使一切都匮乏，但没有人阿谀奉承，也许我们可以窥见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粗略模样。而这一切不仅没有让我感到幻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同上，第 83-84 页]

有关西班牙革命的更多信息，我们推荐以下书籍：

-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由 Vernon Richards 所著
-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及《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由 Jose Peirats 所著
- 《Free Women of Spain》，由 Martha A. Ackelsberg 所著
-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由 Sam Dolgoff 编辑
- 《Objectivity and Liberal Scholarship》（收录于《The Chomsky Reader》），由 Noam Chomsky 所著
-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由 Jerome R. Mintz 所著
-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由 George Orwell 所著

A.5.7 法国 1968 年的五月风暴

1968 年 5 月至 6 月在法国爆发的事件，使无政府主义从很多人认为它早已死去的书本中，重新回到了激进政治的版图上。这场涉及一千万人口的起义，从微不足道的开端逐渐发展壮大。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其中包括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因反对越南战争的活动，被巴黎楠泰尔大学的校方开除后，立即发起了一场抗议示威。80 名警察的到来激怒了许多学生，他们放下学业，加入了与警察的对抗，并将警察驱逐出校园。

受到这场支持的鼓舞，无政府主义者占领了行政大楼并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辩论会。这次占领迅速扩散，楠泰尔大学被警方包围，校方随即关闭了大学。第二天，楠泰尔的学生聚集在巴黎市中心的索邦大学。持续的警方压力和逮捕 500 多人的行为，引发了人们的愤怒，最终爆发了长达五小时的街头打斗。警察甚至用警棍和催泪瓦斯攻击路人。

全面禁止示威活动并关闭索邦大学的决定，将数千名学生推上了街头。警察日益升级的暴力行为促使人们建立起第一道街垒。记者让·雅克·勒贝尔写道，凌晨一点，“成千上万的人帮助建造街垒……妇女、工人、旁观者、穿着睡衣的人，他们组成了人链搬运石头、木材、铁块。”整整一夜的战斗导致 350 名警察受伤。5 月 7 日，一场由五万人参与的反警察示威，演变成了一整天的街头战斗，战场遍布拉丁区狭窄的街道。面对警察的催泪瓦斯，示威者以燃烧瓶回应，高喊着，“巴黎公社万岁！”

到 5 月 10 日，持续的大规模示威迫使教育部长开始进行谈判。然而在街头，已有 60 道街垒出现，年轻工人开始加入学生的行列。工会也谴责警察的暴力行为。5 月 13 日，整个法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浪潮，巴黎街头涌现了一百万人的游行高潮。

面对这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警察撤出了拉丁区。学生占领了索邦大学，并建立了一个群众大会以扩散斗争。占领行动很快扩展到法国的所有大学。从索邦大学涌现出大量的宣传资料、传单、公告、电报和海报。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如“一切皆有可能”、“变得现实，要求不可能”、“没有沉闷时间的生活”和“禁止是禁止的”。“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成为人们口中的流行语。正如默里·布克钦指出的那样，“当今革命的动力……不仅仅是稀缺性和物质需求，还有日常生活的质量……以及掌控自己命运的尝试。”[《后稀缺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第 166 页]

这些标语中许多最著名的内容都来源于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s）。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成立于 1957 年，由一小群持不同政见的激进派和艺术家组成。他们发展了一种高度复杂（尽管充满术语）且连贯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以及如何用一个更自由的新社会来取代它。他们认为，现

代生活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被消费经济所支配，每个人、每件事物、每种情感和关系都变成了一种商品。人们不仅仅是被异化的生产者，也是被异化的消费者。他们将这种社会定义为“景观社会”。生活本身被剥夺了，因此革命的意义在于重新创造生活。革命性变革的领域不再仅仅是工作场所，而是日常生活：

“那些在谈论革命和阶级斗争时，没有明确提到日常生活、没有理解爱情中颠覆性的意义、也没有理解拒绝约束中积极意义的人，他们嘴里含着一具尸体。”[引自克利福德·哈珀，《无政府主义：图解指南》，第 153 页]

与许多影响巴黎事件政治的团体一样，情境主义者主张“工人委员会是唯一的答案。任何其他形式的革命斗争最终都走向了它最初想要反对的东西。”[引自克利福德·哈珀，同上，第 149 页] 这些委员会将由工人自主管理，而不是“革命”政党夺取权力的工具。就像《黑与红》(Noire et Rouge) 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野蛮社会主义》(Socialisme ou Barbarie) 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对自下而上的自主管理革命的支持，对五月事件及其所激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 月 14 日，苏德航空 (Sud-Aviation) 的工人将管理层锁在办公室内，占领了工厂。第二天，克莱昂-雷诺 (Cleon-Renault)、洛克希德-博韦 (Lockheed-Beauvais) 和穆塞尔-奥尔良 (Mucel-Orleans) 等工厂纷纷效仿。当晚，巴黎国家剧院被占领，成为永久性的群众辩论议会。随后，法国最大的工厂——雷诺-比扬古 (Renault-Billancourt) 工厂也被占领。工人们经常在未与工会官员协商的情况下，自行决定无限期罢工。到 5 月 17 日，巴黎的 100 家工厂已被工人掌控。在 5 月 19 日的周末，有 122 家工厂被占领。到 5 月 20 日，罢工和占领活动已呈现全面化，参与人数达到 600 万。印刷工人表示，他们不希望媒体报道被电视和广播垄断，同意印刷报纸，但前提是新闻机构“客观履行其提供信息的职责”。在某些情况下，印刷工人坚持更改报纸的标题或内容，尤其针对右翼报纸如《费加罗报》(Le Figaro) 或《国家报》(La Nation)。

随着雷诺工厂的占领，索邦大学的占领者立即准备与雷诺的罢工工人联合。在黑红相间的无政府主义旗帜带领下，四千名学生前往被占领的工厂。此时，国家、资方、工会和共产党，面临着他们最担心的局面——工人和学生的联盟。一万名警察预备役被紧急召回，慌乱的工会官员则锁上了工厂的大门。共产党呼吁其成员镇压这场反抗，与政府和资方联合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方案。然而，当他们试图将改革方案带到工厂时，却遭到了工人的嘲笑和驱逐。

这场斗争本身及其扩展的活动是通过自主管理的大众议会组织的，并由行动委员会协调。罢工活动也经常由大会管理。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这场叛乱的) 希望在于自主管理的全面扩展——包括总体议会及其行政形式、行动委员会和工厂罢工委员会——至整个经济领域，甚至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些议会中，“一种生命的激情抓住了数百万人，他们感受到了此前从未意识到的觉醒。”[同上，第 168 页和第 167 页] 这不仅仅是工人罢工或学生罢工，而是一场跨越几乎所有阶级界限的，人民的罢工。

5月24日，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一场示威，三万人向巴士底狱广场进发。警察保护了各个部委，使用催泪瓦斯和警棍进行镇压，但证券交易所（Bourse）却无人防守，一些示威者放火烧毁了它。

在此阶段，一些左翼团体开始失去信心。托派组织 JCR（青年共产主义革命者）将示威者引回拉丁区，而其他组织如全法学生联合会（UNEF）和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阻止了财政部和司法部的占领。对此事件，科恩-本迪特（Cohn-Bendit）评论道：“至于我们，我们没意识到清除这些无足轻重之人会有多么容易……现在很明显，如果在5月25日巴黎醒来时，发现最重要的几个部委已被占领，高卢主义（Gaullism）会立刻崩溃……”。当晚，科恩-本迪特被迫流亡。

随着街头示威的扩大和占领行动的持续，国家开始准备以压倒性的手段平息这场反抗。高层将领秘密集结了2万名忠诚部队，随时准备进驻巴黎。警察占领了通讯中心，包括电视台和邮局。到5月27日星期一，政府保证工业最低工资上涨35%，全面工资增加10%。两天后，法国总工会（CGT）的领导人组织了50万工人在巴黎的大游行。巴黎街头贴满了呼吁建立“人民政府”的海报。不幸的是，大多数人仍然想着更换统治者，而不是自己掌控权力。

到6月5日，大部分罢工已经结束，资本主义下所谓的“正常状态”再次回到了法国。在之后任何持续的罢工，都遭遇了投入了装甲车和枪支的军事化镇压。6月7日，当局袭击了弗兰钢铁厂（Flins steelworks），引发了为期四天的激烈冲突，一名工人死亡。三天后，雷诺工厂的罢工者遭到警方开枪镇压，两人丧生。在这种孤立状态下，这些零散的斗争无法取得成功。6月12日，政府禁止了所有示威活动，取缔激进组织，并逮捕其成员。在各方的攻击下，随着国家暴力的升级和工会的背叛，总罢工与占领运动迅速瓦解。

那么，为什么这场反抗失败了？显然不是因为缺少“先锋队”布尔什维克政党。事实上，这场运动中充斥着这样的组织。幸运的是，这些传统的威权左翼派别被孤立，并对运动感到愤怒。参与反抗的人们并不需要一个先锋队来指挥他们，而所谓的“工人先锋队”则急忙追赶运动，试图掌控它，却始终未能如愿。

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独立的、自我管理的联合组织来协调斗争。这导致各个占领行动彼此孤立，最终相继失败。此外，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指出，工人中普遍缺乏“意识到工厂需要被运转，而不仅仅是被占领或罢工”的认识。[同上，第182页]

这种认识的培养，可能会因为反抗前存在一个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得到促进。尽管反威权左翼在这场运动中非常活跃，但他们在罢工工人中力量仍然太过薄弱，因此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和工人自治的理念，并未广泛传播。然而，五月风暴表明，局势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化。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莫里斯·布林顿（Maurice Brinton）指出，“在学生的影响下，数以千计的人开始质疑等级制度的整个原则……在短短几天内，人们巨大的创造潜力突然爆发出来。最大胆——同时往往是最现实的想法——被倡导、被争论、并被付诸实践。那些被官僚

主义的繁文缛节所掏空、被广告操纵者扭曲的——语言，以一种全新而鲜活的形式重新出现了。人们重新掌握了语言的全部力量。从匿名的人群中，涌现出既贴切又诗意的口号。” [“巴黎：1968 年 5 月”，《为了工人的权力》，第 253 页] 在学生的能量与勇气的激励下，工人阶级提出了一些现有体系无法满足的要求。这场总罢工以极其清晰和美丽的方式，展示了工人阶级手中潜在的力量。这些群众大会与占领行动，尽管时间短暂，却为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出色的例子——它显示了无政府主义理念如何迅速传播并被付诸实践。

关于这些事件的更多细节，可以参考丹尼尔和加布里埃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and Gabriel Cohn-Bendit）合著的《过时的共产主义：左翼的替代方案》，或莫里斯·布林顿的亲历报告《巴黎：1968 年 5 月》（收录于《为工人权力》一书中）。由黑星出版社（Dark Star）编辑的《铺路石下》（Beneath the Paving Stones），是一本与巴黎五月风暴相关的、情境主义者作品选集（其中也收录了布林顿的文章）。

第 B 节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
反对现行体制？

第 B 节导言

这部分的常见问答，提供了对现代社会中的基本社会关系、以及创造它们的社会结构的分析。这些分析，尤其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改变的那些方面。

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和资本主义同时诞生。当资本主义逐渐入侵到社会的各部分时，它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也随之受到了影响，逐渐壮大力量。与其说和一些专家断言的那样，无政府主义仅仅只是表达对国家政府的反对；不如说，无政府主义总是反对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威以及其创造的压迫，而这其中，又尤其是反对资本主义以及其私有财产的特别形式。这和第一位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蒲鲁东，在他名为《什么是所有权？》（并给出回答：“那就是盗窃！”）一书中所说的一致，绝非巧合。从蒲鲁东开始，无政府主义同时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两者（显然，这是就算本杰明·塔克和彼得·克鲁泡特金这样意见不同的思想家，也都会同意这一点）。不用多说，从蒲鲁东起，无政府主义已经将其对威权的批判，扩展到了高于这两个社会弊害的地步。其他形式的社会等级制度，比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同性恋恐惧，都作为对平等和自由的限制而被我们拒绝。所以这一部分的常见问答，总结了无政府主义对我们所生活的现行体制的摒弃所背后的，关键思想。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的开端前，未曾出现在社会中。非但如此，那些想法可以被归类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并且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地区。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和私有财产出现的同时，便有了无政府主义。然而，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尽管“自古以来就存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政府主义是由同样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抗议所催生的，这种抗议也催生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然而，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止步于“对资本主义，以及建立在劳动对资本的臣服基础上的社会的否定”，而是更进一步，宣称“反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支柱：国家及其主要支持物——权力集中、法律（始终是由少数人制定并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以及以保护权威和资本主义为主要目的的司法体系。”因此，无政府主义“不仅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支柱：法律、权威和国家。” [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16 and p. 19]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现存的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拥有悠久斗争历史、政治理论和理念体系的思想流派，正是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形成过程中社会变革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们面对这些新社会关系和制度所影响时，反抗、抵抗与对抗的结果。因此，本 FAQ 的这一部分所提出的分析和批判，将集中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政府权力和其它形式的等级制度，依赖于被统治者的认同。恐惧不是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被压迫者）认同统治者的价值观。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同样相信关于权威、阶级、权力的基本

原则” [Colin Ward, *Anarchy in Action*, p. 15]。记住了这些，我们便在这部分的常见问答里给出我们的论点，挑战这种“共识”，论证我们为什么要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为什么威权社会关系和组织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不用说，这项任务并不容易。除非赋予统治阶级权力的制度被其统治对象普遍接受，不然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生存。这种接受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宣传、所谓的教育体系、传统、媒体，以及社会的普遍文化假设。正因如此，社会中主导的观念，往往是统治精英的观念。这也意味着，任何社会运动在试图推翻这些制度之前，都必须首先与这些观念作斗争：

“人们往往甚至没有意识到压迫和支配体系的存在。他们必须首先在现存体系内争取自己的权利，才能逐渐察觉到压迫的存在。看看女性运动的例子。女性运动发展第一步的其中之一，便是所谓的‘觉醒意识的努力’。让女性认识到，她们被支配和控制的状态，并非是这个世界的自然状态。我祖母无法参与到女性运动当中去，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压迫。对她而言，生活本就如此，就像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一样。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情况并不像日出那样不可改变、认识到他们可以反抗，认识到他们不必服从命令、不必忍受敲打，只有当他们开始感觉到哪里出了问题，并最终克服它——我们才能继续前进。而实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便是在现存的压迫体系内推动改革，然后人们迟早会发现，有必要彻底改变这些体系。” [诺姆·乔姆斯基，《无政府主义访谈》]

这意味着，正如马拉泰斯塔所强调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人们”。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所遭受的不幸，以及他们推翻这些不幸的可能性……对于那些饥寒交迫的人，我们将向他们展示如何能够轻而易举地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求。对于那些被压迫和被轻视的人，我们将向他们展示，在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世界中，如何能够幸福地生活……当我们成功地在人们的头脑中，唤起对社会中那些本可以避免的不公正苦难的反抗意识，使他们理解这些苦难的成因，以及如何依靠人的意志来摆脱它们”，那时，我们便能够团结起来，改变现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185-186页]

所以，我们必须解释我们为什么想要改变体制。从接下来的讨论将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不满于现代社会中极其受限的自由，以及为什么他们希望建造真正自由的社会。用 Noam Chomsky 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对现代社会的批评，意味着：

“去寻找并发现权威和阶级结构，以及对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支配，再去挑战它们；除非能指出它们公正的地方，否则它们就是非法的——并为了扩展人类自由的尺度，而理应被废除。它们包括政治权力、所有权和管理、男女关系、亲子关系、我们对子孙后代命运的掌控（生存环境产生的活动背后的基本道德命令……），以及很多其它的东西。这自然意味着挑战庞大的强迫和控制体系：国家、许多数不清的控制国内外经济的私有财产暴君（也就是资本企业和公司），

等等。但不仅仅是这些。”[“Anarchism, Marxism and Hope for the Future”, **Red and Black Revolution**, p. 775]

因为“统治阶级”还并没有“成功地将臣民，完全降格至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被动而无意识的工具”这样一个事实，这项任务还没有那么困难。这意味着，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和希望。即便受到等级制社会关系压迫的人们，通常会接受这一现状；但这些制度，也无法完全熄灭自由的星火。事实上，正是它们运作的方式助长了反抗精神，因为终有一天，人们会忍无可忍，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等级制社会“自身包含着内在矛盾，而（这些）矛盾正如致命的病菌一般”，正是从中孕育出“进步的可能性。” [Malatesta, **Op. Cit.**, pp. 186-7]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将对现有社会的批判，与对任何等级制度下、持续进行的斗争的积极参与相结合。正如我们将在第 J 节中讨论的那样，我们主张人们采取直接行动来对抗压迫。这些斗争改变了参与其中的人，打破了维持等级社会运行的社会规训，使人们意识到其他可能性，意识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不必继续如此生活。因此，斗争是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学校，是创造无政府社会前提条件的手段。无政府主义者努力从这些斗争中学习，同时在其中传播我们的理念，并推动它们发展为一场广泛的社会解放与变革斗争。

被压迫者对压迫的自发抵抗，促进了乔姆斯基（以及无政府主义）所强调的这一批判过程——对权威和支配关系进行批判性审视，瓦解那些直至我们开始质疑它们之前，曾一直被视为“自然”或“常识”的观念。正如前文所述，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鼓励被压迫者的直接行动去对抗其压迫者，同时激发并强化任何等级制社会中，所存在的（无论程度大小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意识。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是鼓励这些斗争，并推动其对社会及其运作方式的质疑。我们的目标，是引导人们深入探究他们所抗争的社会问题的根源，努力改变导致这些问题的基本社会制度和关系。我们希望让人们意识到，压迫不仅可以被反抗，而且可以被终结；不公正制度下的斗争本身，孕育着将取而代之的新社会的种子。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激发希望，并构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积极愿景。

无论如何，这部分的常见问答，直接关注无政府主义关键的或“负面的”方面，暴露权威的邪恶天性，无论来自于国家，私有财产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并因此回答，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寻求“摧毁权力、财产权、等级制度，以及剥削”。 [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1]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在对世界进行分析之后，如何积极地改变它；不过即使在这一节，也会提到部分无政府主义的建设性核心。在对现行制度的广泛批评之后，我们将继续关注更多领域。第 C 节

阐述了无政府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第 D 节讨论了本节所描述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是如何作用到整个社会的。第 E 节讨论了我们当下面临的生态问题的成因（以及一些建议的解决方案）

B.1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 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

首先，有必要说明无政府主义者挑战怎样的权威。虽然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反对者，在习惯上就断言“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威”，但现实情况却复杂的多。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有时确实会表述为反对“一切权威”，但仔细阅读后不难发现，他们实际反对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权威，我们通常称之为等级制度(hierarchy)（详见 H.4 节）。这一点可以从巴枯宁的论述中看出，他认为“权威原则”是一种“极具神学、形而上学和政治色彩的观念，即群众总是无法自我管理，必须随时服从一种智慧和正义的仁慈枷锁；而这种枷锁无论以何种形式，都是自上而下强加的。”[Marxism, Freedom and the State, 第 33 页]

至于其他形式的权威，无政府主义者是否接受，取决于该权威是否成为对他人的支配力量。这是理解无政府主义者针对权威立场的关键——如果权威是等级制的，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就会反对它。其理由很简单：

“任何人都不应被赋予权力，因为一旦有人被授予权威，他必然会……成为社会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49]

这种不同类型权威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像 Erich Fromm 所指出的：“权威”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它具有双重意义：它可以是理性的权威，也可以是非理性的权威。理性的权威以能力为基础，并且帮助那些依靠它发展的人。非理性的权威则建立在权力之上，剥削那些从属于它的人。” [To Have or To Be, pp. 44-45] 而在此 100 年，巴枯宁前指出权威和“自然影响”之间的区别时，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对巴枯宁而言，个体的自由“源于大量的物质、知识和道德影响，这些影响来自他（或她）周围的每一个个体以及整个社会……持续施加的作用……消除这种相互影响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当我们呼吁群众的自由时，我们并不想要消除任何个人或任何群体对群众的自然影响。我们想要废除的是人为的、特权的、法律和官方的影响。” [The Basic Bakunin, p. 140 and p. 141]

换言之，参与一项决策、并在下定决心之前倾听不同观点和专家的声音（“自然影响”）；与一群（无论是否是被选举出来的）、不相关的个体，只因为他们在一个组织和社会中的角色，就替你做决定——之间，存在着差异。对于前者而言，个体运用了自己的判断力和自由（也就是基于理性的权威）。而对于后者，个体从属于他人的意志，从属于等级制的权威（也就是基于非理性的权威）。这是因为对于理性的权威，“不仅允许而且需要，时刻地审查和批判——这总是临

时的，对它的认可依赖于它的表现。”而对于非理性的权威来说，“总是在人民头上施加权力——一方的权力，另一方的恐惧，总是非理智权威得以建立的支撑。”因此，前者基于“平等”，而后者“就其本质而言基于的是不平等” [Erich Fromm, *Man for Himself*, pp. 9-10]

占有权威和成为权威的区别，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成为权威仅仅表示，特定的人由于其个人能力和知识，而被普遍认为在特定工作上拥有能力。换种方式说，他 / 她是社会认可的专家。相反的，对权威的占有是建立在由等级地位产生的地位和权力之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能力。显然，这并不意味着能力不是获得等级地位的一个要素；这只是说，真正的或所谓的最初能力，被转化为权威的头衔或地位，从而变得与个体无关了，即被制度化了（或者用巴枯宁的术语说被“官方化了”）。

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因为人们的行为方式，更多是我们成长于其中的制度的产物，而不是出于天性。换句话说，社会关系塑造了在其中的个体。这意味着并不能通过把集体还原成个体的方式，理解他们所形成集体的特征、行为和后果。也就是说，集体不但包括个体，还包括与个体的相互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会影响集体中的个体。比如，显然地，“权力是通过剥夺他人的权力而行使的”，并且通过“对身体的胁迫、对经济的支配和依赖、对心理上的限制、对社会制度和惯例的影响——的以上加总，影响了每一个人对世界及其地位的观察方式。” [Martha A. Ackelsberg, *Free Women of Spain*, p. 41]

威权主义的社会关系，意味着把社会划分为（少数的）统治者和（多数的）被统治者，使参与其中的个体及整个社会（在精神上、感情上及身体上）贫困。在生活各个方面，人际关系被权威打上烙印，而不是被自由。并且由于自由只能被自由所创造，从而威权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它们所要求的服从），不会也不可能教育人自由——只有对生活个方面的实际参与（自我管理），才能做到。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在一个基于剥削和奴役的社会中，人类本性是退化的”，并且只有“奴役消逝之时”，才是我们“重获我们权利之日。” [Anarchism, p. 104]

当然，有人会指出，在任何集体事业中，都需要合作与协调；而这种要求个人“服从”集体活动的必要性，本身就是一种权威。因此有人声称，一个民主管理的团体，与一个建立在等级权威基础上的团体，同样是“专制”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此类论点并不感到信服。我们的回答是，的确，在任何团体活动中，都需要制定并遵守协议。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将“权威”一词用于描述两种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决策方式，是在玩弄词藻。这样的说法模糊了自由结社与等级强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并将合作与命令混为一谈（正如我们在 H.4 节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尤为热衷于这种谬误）。简单来说，群体内部的个体活动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协调——要么是专制的，要么是自由的。蒲鲁东在谈及工作场所时，就明确区分了这两者：

“要么工人……仅仅是业主-资本家-推销员的雇员；要么他参与进来……[同时]在委员会有发言权，总之他将成为一个同事。”

“在第一种情况，工人成为被剥削的受支配者：服从是一个他无法改变的状况……在第二种情况，他保持作为人和公民的尊严……他构成了生产机构的一部分，而过去他只是其奴隶；像在城镇中里一样，他成为了统治力量的一部分，而过去他只是被统治对象……我们无需犹豫，因为我们毫无选择……有必要在工人中建立一个**联盟**……因为若不这么做，人们会保持上下级关系，接着出现……由主人和工人构成的两个种姓，而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极其厌恶的。”
[Pierre-Joseph Proudhon,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p. 215-216]

换句话说，联盟可以基于**理性权威**的形式，基于**自然影响**，来反映自由与个体的思考、行动、感觉，并管理自己的时间及活动的能力。否则，我们就得在与别人的关系中包含奴隶的成分，包含毒化整体、以负面形式影响我们的成分（参看 B.11 部分）。只有以自由意志的方式重构的社会（并且我们得补充，这个转变，也需要并将会造成精神上的改变），才允许个体“当继续发展时，能或多或少地开花结果”并在脑中驱走“由对他[她]人为的信任所造成的、屈从的灵魂”[Nestor Makhno,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tate and Other Essays*, p. 62]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最想看到的，是[别人]……通过自由接受、与永不强加（的原则），在我们之上行使自然及合理的影响……我们接受所有自然形成的权威，以及所有基于事实而不是权力的影响”[《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p. 255] 无政府主义者对直接民主制的自由联盟的支持，是因为这种组织形式在我们生活中，会增强影响力并减少非理性权威。这类团体的成员可以建立和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批判地评价其他成员的提议和建议，接受他们所同意的或被说服的建议。如果他们对团体的指示感到不悦，也拥有离开的选择。因此，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了最终达成的决定的性质，而且没有人有权把意见强加到别人身上。像巴枯宁所主张的，在这类团体中“没有固定的职能，职能也不会永久不变且不可撤销地附加给某个人。等级制度和晋升将不复存在……在这种制度内，权力，严格意义上也将不复存在。权力被分散到集体中，并成为每一个人自由的真正表达方式”[《Bakunin on Anarchism》，p. 41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非理性的**（也就是非法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等级制度——把社会里的权威制度化的等级制度。等级社会制度包括国家（参看 B.2 部分）、私有财产及其产生的阶级体系（参看 B.3 部分），以及资本主义（参看 B.4 部分）。出于它们的等级性质，无政府主义者强烈反对这些制度。Voltairine de Cleyre 认为：“任何站在人们与其权利之间的社会制度或民事制度；任何使一人成为主人、另一人成为奴仆的羁绊；任何代表暴政的法律、法令或成文的规定”，无政府主义者都致力于将其摧毁。然而，等级也出现在这些制度之外。比如，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参看 B.1.4 部分）在内的等级社会关系。无政府主义者不但反对这一切，而且与它们战斗。因此，德克莱尔不仅反对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如同奴隶般劳作”，尽管“这种奴役在工作时间结束后暂告一段落”），她同样反对父权制的社会关系，因为它造就了一个“建立在奴役之上的家庭”，而这种家庭又源自“一种婚姻关系，在其中，一方的个性被出卖并转让给另一方！”[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72, p. 17 和 p. 72]

不言而喻，尽管我们在不同章节讨论不同形式的等级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些制度及其负面影响是彼此独立的，或者可以轻易地加以区分。例如，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连，不能被视为彼此独立的体系。同样，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等社会等级制度，也会被其他等级制度所利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例如，资本家会利用种族主义来分裂工人阶级，从而实施统治）。由此可见，仅仅废除某一种或几种等级制度，虽然值得追求，但并不足够。如果资本主义被废除，但国家依然存在，社会仍然不会是自由的（反之亦然）——如果这真的可行的话。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

“在经济意义上，一个社会完全可以是无阶级的，甚至是非剥削性的，但它仍可能在社会层面上，保留等级统治和支配——无论这种统治以何种形式存在：父权制家庭、年龄和族群支配、官僚机构、意识形态操纵，或是金字塔式的劳动分工……无论是否消灭了阶级，这样的社会仍将充斥着支配关系，并伴随着命令与服从、不自由与屈辱的普遍状况，更为关键的是，它将扼杀每个个体在意识、理性、自我、创造力方面的潜能，以及掌控自身日常生活的权利。”[由默里·布克钦所著的《走向生态社会》，pp. 14-5]

这显然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挑战阶级构成，还挑战等级制度；不仅反对物质上的剥削，也反对一切形式的支配”[Bookchin, Op. Cit., p. 1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反对等级制度，而不（如一些人错误声称的那样）仅仅是反对国家，或（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仅仅是反对经济阶级和剥削。如前面（A.2.8 节）所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等级制度不但有害而且无需，并认为存在替代品，存在更平等的方式去组织社会生活。事实上，我们主张，等级权威本身会创造出其声称要反对的条件，从而倾向于自身延续。等级化的组织会削弱底层个体直接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因此需要等级制度，以及一些人处于下令的位置，而其他人则服从命令。政府非但不能防止混乱，反而往往是其主要根源之一；而那些表面上为消除贫困而设立的官僚机构，最终却在维持贫困，因为若没有贫困，高薪的上层管理者就要失业。那些打击药物滥用、打击犯罪等等的机构也同样如此。换句话说，等级制度所带来的权力和特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激励，使得身处高位的人不会真正解决他们本该去解决的问题。（更多讨论参看 Marilyn French, 《Beyond Power: On Women, Men, and Morals》, Summit Books, 1985.）

B.1.1 威权社会关系的效果是什么

等级权威，与对无权者的边缘化和弱化紧密相关。这对被施加权威的人造成了负面效果，因为“那些拥有权威象征的人，以及从权威里获益的人，必须愚化从属于他们的人民的现实主义思维，也就是理性思维，并使他们相信谎言（也就是非理性权威是理性的和必要的），……（因此）迷惑人民的思想，去屈从于那些陈词滥调……（并且）由于变得依赖（权威），失去了对自己双眼所见和正义的信任，人民变得麻木愚钝。”[Erich Fromm, **To Have or To Be?**, p. 47]

或者，用巴枯宁的话说，“当权威原则被应用于已经成熟或达到成年的个体

时，它便成为一种畸形现象，成为奴役、智力与道德堕落的根源。”[《God and the State》, p. 41]

这一观点被工团主义矿工所响应，他们写了著作《The Miner's Next Step》，在书中指出了威权组织的本质及对参与其中者的影响。领导地位（也就是等级权威），“暗指了权力被领导者掌握。失去权力的领导者是无能的。对权力的掌握无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即使……初衷是好的……[领导地位意味着]主动权、责任感，由男子气概(原文如此！)的表达而产生的自尊。这种自尊取自人们，并被加固到领导者身上。人们的主动权、责任和自尊的总和，变成了领导者的（主动权、责任和自尊）……[并且]他所维持的秩序和制度，是建立在对别人的压制之上，从自由思考者转变为（仅仅的）‘人’……简单说，他被迫成为独裁者以及民主的敌人。”的确，对于“领导者”而言，这样的边缘化可以是有益的，因为一个领导者“并不需要任何普通成员拥有高等的智力，除了他们懂得为他的行为鼓掌。的确，按照他的理解，由批判和反抗交织而成的智慧，只是一种会造成混乱的障碍。”[《The Miners' Next Step》, pp. 16-17 p. 15]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等级社会关系将对受制于它的人们有负面效应，他们将不再可以自由地使用其批判能力、创新能力和智力。如 Colin Ward 提出的，人们“确实会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潜力时，便终其一生。正是因为人们去创造、参与革新、选择、判断、决定的权力，都被反过来授予了顶层的他们”（并且一般确实是“他们”！）[《Anarchy in Action》, p. 42]。无政府主义基于对制度的权威结构，和个体心理素质与态度之间存在的互相作用的洞察。如果整日循规蹈矩，就很难塑造一个独立、强大和创新的人格。（“权威和奴役，手拉手共同前进” [Peter Kropotkin, *Anarchism*, p. 81]）像 Emma Goldman 清楚表明的，如果一个人“喜好和判断的地位处于统治者的意志之下”（比如老板，因为在资本主义中大部分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那么几乎不用怀疑，这样的独裁关系就“把百万大众宣判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Red Emma Speaks》, p. 36]

由于人脑是一个身体器官，它需要被经常使用以保持最佳状态。权威将决策过程集中到了上层人士手中，意味着大多数人变成了听从别人命令的执行者。如果不使用肌肉，它就会变成脂肪；如果不使用大脑，创造力、理性思维能力和精神力就会变得迟钝，大脑就会将目标转移至边缘问题，例如运动和时尚。这只会有一个负面影响：

“等级制度，催生了参与者之间的隔离和剥削关系，剥夺人们的权利并让他们与自己的真理疏远。等级使一部分人依赖另一部分，抱怨依赖者的依赖性，然后把这种依赖性作为以后施加权威的辩解……那些相对而言的支配者，倾向于给被支配者的特征下定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人若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从未被允许自主行动，那么他就注定会陷入依赖与顺从的状态。那些长期受到命令而无法独立思考的人，很快便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并且）在反抗社会规范、标准和期待时，难以按照（他们）自身的意志行动。” [Martha Ackelsberg, *Free Women of Spain》*, pp. 19-20]

这样，用 Colin Ward 的话说，“制度制造了傻瓜，然后藐视他们的愚蠢无能，

褒奖“少数天才”的稀有罕见”[同上, p. 43]

这种等级制度的负面影响当然不仅限于其受害者,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同样受到影响,只是方式不同。正如我们在 A.2.15 节中所指出的,权力不仅腐蚀被支配者,也腐蚀掌权者。1930 年代,西班牙自由青年联盟(Libertarian Youth)对此表达了如下看法:

“我们反对权威原则,因为它意味着对人类个性的侵蚀。这使一些人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并在掌权者身上激发出某些本能,使他们易于对他人的痛苦变得冷漠与残忍。”[引自何塞·佩拉茨所著的《西班牙革命中的 CNT》,第二卷,第 76 页]

等级制度使人类精神贫乏。正如布克钦所指出的:“等级制心态助长了对生活乐趣的放弃。它正当化了‘下层人’的劳苦、负罪感和牺牲,同时让‘上层人’纵情享乐,随心所欲地满足几乎所有的欲望。社会结构的客观历史,最终内化为心理结构的主观历史。”换句话说,身处等级制度之下,会促使个体内化自身的被压迫地位,以及接受它所必要的个性剥夺。布克钦强调:“等级、阶级,以及最终的国家,都渗透进人类精神的最深处,并在其中建立起无意识的内在强制力量……通过利用负罪感与自我责备,这种‘内在国家’能够在畏惧正式的国家诉诸暴力之前,就有效地控制个体的行为。”[《自由的生态》,第 72 页、第 189 页]

简而言之,“等级、阶级和国家扭曲了人类的创造力。”但这还并不是全部。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等级制度还歪曲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我们支配自然的所有观念,都源自人与人之间真实存在的支配关系……只有当我们消除一切形式的支配时……我们才能真正创造一个理性的、生态的社会。”因为“一个建立在支配关系基础上的、分裂的人性,其内部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扩展为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危机所表现出的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归根结底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尽管“资本主义的崛起,其建立的竞争、资本积累和无限增长基础上的生存法则的崛起,使这些社会与生态问题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但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主要的生态问题根植于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可以追溯到父权文化的最初形成。”[默里·布克钦所著的《重塑社会》,第 72 页、第 44 页、第 72 页、第 154-155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等级制度不仅影响人类自身,也影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当前面临的环境危机,是我们社会核心的等级权力结构的直接结果,这些结构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至少与它们对人类的损害同样严重。社会内部的问题——经济、种族、文化、性别等多重冲突——正是导致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生态失衡的根源。人类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应对生态危机至关重要。归根结底,生态破坏植根于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因为一个堕落的人类社会,最终只能塑造出一个堕落的自然世界(资本主义及其等级制度的历史,已经令人悲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塑造着自身的环境,而任何塑造

我们的东西，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对环境的态度和行为。这意味着，等级制度（以及其催生的独裁思想）所培养出的个人，将以明确有害的方式塑造地球。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环境，以创造最符合其生存模式的条件。如果这种生存模式充满了等级、阶级、国家，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压迫、剥削和支配，那么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几乎不会更好。换句话说，社会等级制度和阶级关系，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提供了正当性，并播下了这样一种观念的种子：自然界和其他人类一样，存在的目的就是被支配和利用。

这也带来了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拒绝等级制度的、另一个关键理由。除了这些否定自由的负面心理效应，威权社会关系还制造了社会不平等。这是因为一个受制于另一个权威之下的个体，不得不服从在等级社会中地位高于他的人的命令。在资本主义里这意味着工人必须服从老板的命令（详见下一节），而这些命令的目的只是让老板变得更加富有。而事实正是如此：1995 年，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薪酬，是美国普通工人的 212 倍，而 30 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44 倍。事实上，仅仅从 1994 至 1995 年，在美国，首席执政官（CEO）的薪水就上涨了 16%，与之相比，工人的只上涨了 2.8%，这甚至都跟不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而工资的停滞并不能归咎于企业利润的下降，因为当年企业利润实际上增长了 14.8% 。

不言而喻，权力的不平等必然会转化为财富的不平等，反之亦然。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极为深远。例如，健康状况会受到不平等的显著影响。与富人相比，穷人更容易生病，并且寿命更短。简单来说，“所处阶级越低，健康状况越差。不仅如此，即便是收入的暂时中断（如失业），也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与较低社会等级相关的长期经济困境，会导致生理、心理和认知功能的下降（“其影响可持续十年以上”）。正如道格·亨伍德指出的：“低收入、不愉快的职业以及长期的歧视，可能会导致一些表面上是生理性的症状，这甚至连经验丰富的生物学家也难以理解……更高的收入还与较低的精神疾病发生率相关，资产持有水平较高的人群同样如此。” [由道格·亨伍德所著的《新经济之后》，pp. 81-82]

不仅如此，不平等的程度也非常重要（例如，贫富差距的大小）。根据《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的一篇社论，“决定一个社会的道德和健康的，更多是财富分配的平均程度，而不是财富总和的多少。财富的分配越平等，社会越健康。” [Vol. 312, April 20, 1996, p. 985]

在美国的研究为此发现了压倒性的证据。George Kaplan 和他的同事，衡量了美国 50 个州内的不平等程度，并将之与包括所有死因在内的“年龄调整死亡率”相比较，便出现了一个图样：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死亡率越高。换句话说，贫富差距，而不是各州平均收入，才是对该州死亡率最准确预测。["Inequality in income and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alysis of mortality and potential pathway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312, April 20, 1996, pp. 999-1003]

这种对收入不平等的衡量，也与包括健康在内的其它社会状况相对应。一个州，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失业率和拘留率就更高，接受救济金和食品券的人、

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的比例越高、新生儿中体重偏低的比率越高，谋杀率和暴力犯罪率越高，平均每人的医疗护理与治安保护的价格越高。此外，收入分配不均越高的州，花在每个人身上的教育经费也就越低，学校里配备给每个人的书更少，教育效果也更糟，体现在更差的阅读水平与数学技能、以及更低的高中毕业率。

当贫富差距增长（表现了在工作场所内外社会等级制度的加剧），一个人的健康恶化，社会结构也随之崩溃。除了对标准化住房、营养、空气质量、休闲娱乐机会、以及穷人享用的医疗护理所产生的影响，处于社会底层的心理压力也对人产生负面效果。[参看 George Davey Smith,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tality: why are they related?"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312, pp. 987-988]

简而言之，不平等对我们的健康有害：社会人口的健康程度，不仅仅关乎于经济蛋糕的大小，还取决于蛋糕是如何分配的。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除了财富的不平等之外，自由的不平等同样对整体人类福祉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迈克尔·马尔莫特（Michael Marmot）所著的《地位综合症：社会地位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与寿命》，在任何等级体系中，个人地位越高，其健康状况通常也越好。自主权也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等级体系中的位置越高，他所享有的自主权也越大。因此，这一实证研究的隐含结论是：自主权是健康的重要来源，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掌控力越强，就越不可能患上那些典型的压力相关疾病，例如心脏病。正如公共卫生学者杰弗里·约翰逊（Jeffrey Johnson）和埃伦·霍尔（Ellen Hall）所指出的，“控制自身环境的能力，在不同阶级之间存在差异性分布。” [引自 Robert Kuttner 所著的《万物皆可售》，p. 153]

正如等级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人身处一个不断受到他人要求、却几乎无法掌控自身处境的生活环境，那么他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威胁。”以心脏病为例，患病风险最高的人群“往往处于高要求、低控制、低社会支持的职业环境中。而那些工作要求高但自主权强的人，患病风险较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相对较小的精英阶层，要求并获得了权力赋予、自我实现、自主权，及其他部分上弥补长时间工作的满足感”，而与此同时，“流行病学数据证实，低薪、低社会地位的工人，更容易经历最具临床危害性的压力形式，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缺乏掌控力。” [Kuttner, 同上, p. 153 和 p. 154]

换句话说，由等级制度导致的自主权与社会参与的不平等，本身就是导致健康问题的原因之一。如果社会不平等——不仅是财富的不平等，更关键的是权力的不平等——得以减少，那么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也就是社会福利，都会得到改善。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主义愿景的强有力支持。一些社会结构能为更多人提供更大的自主权，而促进此类社会正义的行动，正是改善公共健康的重要一步。这意味着，推广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提升自由，还能改善人们的身心健康。而这正如我们之前所论述的那样，等级制度本质上会对其所支配的人产生负面影响。

这与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人自治的支持相契合。工业心理学家发现，工作中的

满足感取决于工人的“自主跨度”。毫无意外，那些能够自主做决定的工人更幸福，寿命也更长。健康的关键，在于掌控自己生活各个方面——尤其是工作方面——的权力，而财富和社会地位往往决定了这种掌控力的大小。研究表明，工作控制度低的男性，其罹患新疾病（如心脏病、中风、糖尿病或普通感染）的风险要高出 50%；女性的风险要略低，但工作控制度仍是影响其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

正是因为“老板就是老板”这一事实，使得雇佣关系在健康问题上（以及对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如此具有破坏性。一般来说，老板越专横，工作环境就越糟糕。因此，自治的一部分是摆脱被指挥的状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此外，等级制度（权力的不平等）和剥削（物质不平等的来源）是相互关联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资本主义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工人将自己的自由出卖给老板，在一定时间内失去自主权。这种情况使剥削成为可能，因为工人所创造的财富，往往多于其工资所能体现的价值。老板将两者之间的差额收入囊中，所以工人自主权的缺失则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进一步地，损害他们的福祉。

此外，等级制度还带来了大量浪费。尽管权威的支持者喜欢强调其“高效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科林·沃德所指出的，权威的存在“源于个人在指挥链中的等级……但知识与智慧并不会按照等级顺序分配，也不会任何情况下被任何个体所垄断。任何等级化组织——无论是工厂、办公室、大学、仓库还是医院，都会因为以下两个特点而变得严重低效。首先，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所掌握的知识与智慧，并未被纳入等级制度中领导的决策层，他们的精力往往不是被用于正式领导结构的执行，而只是使组织能够勉强运作；或者相反，他们可能会选择破坏组织的表面职能，因为这并非他们自愿接受的安排。其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身处其中，不是出于对共同事业的认同和投入，而是由于经济上的必要性才不得不留下。” [同上，p. 41]

换句话说，等级制度阻碍了信息和知识的流动。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统治者“只能利用社会中已存在的力量——除了那些（被他们的行动）抑制和摧毁的巨大潜力，以及所有被冲突所浪费的资源；在这样一个人为的体系中，会产生不可避免而且巨大的损失。”由此可见，等级制度不仅阻碍了个人的发展，浪费了他们未能发挥的潜能；还通过降低效率和创新力，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因为，在等级化组织中，决策过程只限于“那些身处统治地位的人，或者由于自身地位而能够影响政策的人。”这显然意味着，等级制度“不仅不会提升社会的生产力、组织能力和保护能力，反而极大地削弱了它们，把一切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他们当然不可能拥有无所不知的能力。” [《无政府主义》，p. 38 和 p. 39]

大规模的等级化组织，例如国家，往往伴随着官僚主义。为了收集决策所需的信息（当然，也用于控制其下属），这种官僚体系的存在是必要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官僚体系本身会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因为它持久地掌握了信息和资源。因此，等级制度“如果不在自身周围创造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就无法生存”，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与人民相隔绝的特权阶级。” [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p. 37 和 p. 36] 这意味着，机构上层的决策者很少真正了解基层的

实际情况，他们的决策，往往是在对现实影响、具体需求及涉及人群缺乏认知的情况下做出的。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总结自己在世界银行的经历时所指出的：“即便是在一个国际官僚机构内部，想要推动变革也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精力。这类组织缺乏透明度，不仅向外部世界传递的信息极少，甚至外界的信息也更难以渗透到组织内部。这种不透明性也意味着组织底层的信息很难传递到上层。”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p. 33] 这一现象适用于任何等级化组织，无论是资本主义企业、还是民族国家。

此外，正如科林·沃德和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等级制度必然引发上下层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本身也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这些资源和精力本可用于更有成效的活动里，却被消耗在内斗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我们在 H.4.4 节所讨论的，这种斗争所催生的一种武器便是“**按规矩办事**”（work to rule），即工人严格按照老板的指令执行每一项任务，从而让整个工作场所突然陷入停滞。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工作场所之所以能够运转，并不是因为等级制度的命令，而是因为工人在工作时间内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而等级制度则压制并浪费了这种自主性。因此，一个参与式的工作场所，不仅会比资本主义等级制下的工作场所更具效率，而且会减少资源浪费。正如我们将在 J.5.12 节所讨论的，等级制度及其引发的权力斗争，总是阻碍着工人参与所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并维护着资本主义企业的专制结构。

所有这些并不是意味着，等级制度底层的就是受害者，也不是说在等级上层的只是收获了好处——远不是这样。正如沃德和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等级制度就其本质而言，会在那些受其压制的人中创造反抗，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终结它的可能性（更进一步的讨论见 B.1.6 节）。反过来，就算是在金字塔的顶端，我们可以窥见等级制度的邪恶。

如果我们看看在那些处于制度顶端的，是的，他们在物质财富，以及接触教育、休闲活动、健康等方面，经常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人性 and 个性。正如巴枯宁指出的，“权力和权威，对行使它们的人的腐化程度，不亚于对被强迫服从它们的人的腐化程度。”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49] 权力的运转是摧毁性的，甚至对那些拥有它的人也是这样，减弱了他们的个性，因为权力“使他们变得愚蠢又野蛮，甚至即使他们天生具有最高的才能。一个不停地、为了迫使一切去服从机械秩序而奋斗的人，最终会成为机械本身并失去所有的人类感情。”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p. 22]

当一切被归结为等级时，它就是自我挫败的，因为如果“财富即他人”，那么通过轻视他人，限制他们的成长，你就失去了所有这些个体拥有的所有潜在见识和能力，从而使你自己的生活贫瘠，并**限制了你自己的成长**。不幸的是，目前物质财富（作为一种尤其狭隘的“个人利益”的形式），已经取代了对全面发展个体和过上充实创造性生活的关注（一种广义的个人利益，认为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并认识到与别人的关系形成和发展所有的个体）的关注。在一个等级化、阶级化的社会里，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损失，即使是那些处于“顶端”的人。

从环境问题来看，等级制度的自我挫败性同样显而易见。人类生活的命运与

非人类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尽管财富和权力，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等级制度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但它们无法阻止这一进程，最终，这种破坏不仅会影响广大民众，也会波及精英阶层。

因此也就不奇怪，“无政府主义……致力于摧毁一切形式的权威……[并]拒绝所有等级化的组织。” [Kropotkin, *Anarchism*, p. 137]

B.1.2 资本主义是等级制的吗

是的。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没有以他们的劳动力交换产品，而是把劳动力本身兑换成钱。他们把自己出售一段时间，然后以工资作为回报，承诺服从雇主的。那些付钱和发出命令的人——所有者和管理者——在等级制度的顶层；那些服从的人，则在底层。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等级制的。

像 Carole Pateman 说的：

“如果工人不使用他的意愿、理解和经历去发挥其能力，能力与劳动力便不能被有效使用。劳动力的使用需要它‘主人’的在场，否则直到工人以特定方式行动使其发挥作用，或同意、或被迫如此行动，劳动力仅仅是一种潜能；也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劳动。若仅仅签订劳动力使用合同，却无法按照新‘所有者’的要求加以利用，那无异于浪费资源。‘劳动力’这一虚构概念本身无法被使用，真正被要求的是工人按照指令进行劳动。因此，雇佣合同必然在雇主与工人之间，确立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简而言之，所谓工人出售其劳动力的合同，实质上是由于他无法与自身的能力相分离，因此他出卖的，实际是对自身身体及其使用的支配权。而获得支配他人的权利，就是成为（公民社会中的）主人。” [The *Sexual Contract*, pp. 150-1]

只需要将这些话，同我们在 B.1 节引用的蒲鲁东的评论做比较，就能看出，无政府主义者早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等级制的。工人在工作时间内（甚至有时候在歇工时），受老板的权威所支配。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总结的，“一个公司的企业或工厂，在经济上和法西斯主义是等同的：决策和控制严格自上而下实行。” [Letters from Lexington, p. 127] 工人的选择严重受限，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选择无非就是选择把自己出租给哪一位不同的主人罢了（对于一些幸运的少数人，他们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主人）。而“主人”是恰当的词，因为正如 David Ellerman 提醒我们的那样，“社会似乎在大众意识中‘掩盖’了（雇主和雇员的）传统称呼，就是‘主人和仆人’这一事实。” [Property and Contract in Economics, p. 103]

这种对雇佣劳动者的等级控制，造成了使工人疏远其工作，因而也与自我疏远。工人不再在工作时间内无法掌控自我，因此也不再自由。因此，由于资本主义，存在着“土地上的压迫”，一种根植于当前“财产制度”的“奴役形式”，这

种形式制造出“社会战争；只要现有的法律-社会条件持续下去，这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Voltairine de Cleyre, Op. Cit., pp. 54-5]

一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意识到体系的言辞与它对受压迫者实际影响之间的矛盾。于是大多数人使用“工人同意这种等级制度”的论点，却忽视了迫使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自由的经济条件（见 B.4.3 节），问题立即出现：仅仅同意，是否足以证明异化/出卖一个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例如，曾有人为奴隶制和君主制（即独裁制），提供基于同意的辩护。难道我们真的想说，法西斯主义或奴隶制仅仅错在人们不同意它吗？遗憾的是，一些右翼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得出了这个结论（见 B.4 节）。

一些人试图重新定义雇佣劳动中，命令与服从的现实。两位右翼经济学家辩称：“谈论管理、指导或分配工人做不同的任务，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说法，实际上，雇主在不断地参与合同的重新协商，而其中的条款必须对双方都能接受。”[Arman Alchian 和 Harold Demsetz, Ellerman 引述，同上, p. 170] 因此，雇主-雇员（或者使用旧的、更加准确的术语，主-仆）的合同，实际上是一系列不言而喻的合同。

然而，如果连口头合同都不值一纸契约，那未言明的合同又有多大价值？这种“合同的重新协商”究竟意味着什么？雇员决定是否服从命令或离开，而老板决定雇员是否足够服从且生产力是否足够，以便继续留在他的控制之下？这显然不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搭档上的关系！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的辩护“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说法”，实际上是在说明雇员是被付钱来服从的。他们之间的合同，仅仅是单方面的服从与另一方面的权力。即使双方都可以打破合同，但这并不改变这一事实。因此，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尽管存在‘被治理者的同意’这一雇佣合同……（但它）仍然不是民主的……在就业合同中，工人将自己的法律权利转让给雇主，以便雇主在‘雇佣范围内’治理他们的活动。”[David Ellerman, 《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第 50 页]

归根结底，有一种权利是无法放弃或丧失的，那就是人格权。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们的人格，他们将不再是一个人，但这正是雇佣合同所强加的。保持和发展人格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且无法让渡给他人，无论是永久还是暂时的。若持相反观点，便是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时间段内，一个人不是人，而是可以被他人利用的物品。然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由于其等级本质所做的事情。

这还不是全部，通过像对待其它商品那样对待劳动力，资本主义否认了的劳动力和其它“资源”之间的关键区别——即劳动与其承载者，不可分割——劳动不同于其他“财产”，它赋予了意志和能动性。所以当一个人谈到出卖劳动力时，必定存在对意志的征服（等级制度）。像 Karl Polanyi 所写：

“劳动力是人类活动的另一种说法，这种活动伴随生命本身，因而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这种活动既无法与生命本身的其它部分

分离，也不能被储存或调用。……允许市场机制，作为决定人类命运与自然环境的唯一主导力量——终将导致社会的崩坏。因为所谓的商品“劳动力”无法被任人摆布、滥用，甚至被置之不理，而不对作为这种特殊商品承载者的个体产生影响。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系统也顺带处置了与这一标签相关的“人”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实体。”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72]

换句话说，劳动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试图将其简化为商品的范畴。创造性、自我管理的工作，是自豪与喜悦的源泉，也是成为完整人类的一部分。剥夺工人对工作的控制，会深刻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事实上，蒲鲁东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公司“掠夺了工资劳动者的身体和灵魂”，并且是对“人类尊严和人格的侮辱”。[Op. Cit., p. 219] 这是因为雇佣劳动，将生产性活动和从事这项活动的人，转变为商品。人们“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人力资源。对道德盲目的公司而言，他们是工具，用来产生尽可能多的利润。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工具就像一块金属——你想用它就用，不想用就丢掉。如果你能让人类变得像工具一样，那在某种效率标准下是更有效的……这一标准基于灭绝人性。你必须让他非人化。这就是系统的一部分。’” [Joel Bakan, 《公司》，第 69 页]

把劳动力，和生活中的其它活动分离，而且使它被市场规律奴役，意味着湮灭其天然、有机的存在形式——一种数千年来随着人类以共享互助为基础的、合作经济活动而进化的形式——并且用以契约和竞争为基础的原子化和个人化形式，取而代之。毫不奇怪，这种关系是一个非常近期的发展，此外，它也是大量国家行动和强制的产物（参见 F.8 节中的相关讨论）。简单来说，“早期的劳动者……厌恶工厂，因在其中他们[或她们]感到被贬低和折磨。” 尽管国家通过强制执行私有产权，确保了稳定的无地产工人池；早期的制造商也利用国家来确保低薪酬，者 3 主要是出于社会原因——只有一个被过度劳动和压迫、没有其他选择的工人，才会同意做主人要求的任何事情。波兰尼（Polanyi）指出，“像英国那样的法律强制和教区农奴制、像欧洲大陆那样严格的绝对主义劳动警察，像早期美洲那样的契约劳动——都是‘自愿工人’的前提。” [Op. Cit., pp. 164-5]

忽视其源于国家行动的起源，资本主义者宣称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自由”的来源，然而事实上，它是一种（非）志愿奴役的形式（更多讨论参看 B.4 和 A.2.14 部分）。因此一个不支持经济自由（比如，工业、社会主义内的自治）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根本既不是自由意志主义的，也不是相信自由的概念。资本主义建立在等级和对自由的否定之上。除非拒绝雇佣劳动的本质，否则不能实现自由。无论资本主义支持者如何尝试，但——像 Karl Polanyi 指出的——雇佣劳动建立在某种“天然”自由上的观念，是错误的：

“为了把这种（雇佣劳动）原则表示为一种（对自由的）非干扰，就像经济自由主义者习惯做的那样，仅仅是在表达一种根深蒂固的、明确支持干涉的偏见，也就是，这样将摧毁个体间的非契约关系、并阻止自发的关系重建。” [《同上》，p.163]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本身是由国家暴力所创造的，而摧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
社会互动，是它任务的一部分。从一开始，老板们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

打击工人们联合起来反抗他们所处的等级制度、并重新主张人类价值的尝试。这种平等者之间的自由联合形式（如工会）受到了打压，就像民主政府试图规范体制内最恶劣的暴行一样。实际上，资本家偏爱集权的、精英主义的、和/或专制的政权，正是因为他们确信这些政权无法得到民众控制（见 B.2.5 节）。这是能够将基于市场力量的契约关系，强加给不愿接受的民众的，唯一方式。资本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国家下诞生的；除了支持法西斯运动外，它们也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也赚取了高额利润。今天，许多跨国公司“定期与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做生意——同样，因为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事实上，美国公司有“投资这些国家的趋势。” [Joel Bakan, *Op. Cit.*, p. 89 和 p. 185] 或许不足为奇的是，这些政权，恰好最能够执行完全商品化劳动所必需的条件。

B.1.3 资本主义产生了怎样的等级价值观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对伦理行为的影响只能是负面的。这源于其等级化的本质。我们认为，等级制度本质上必然会对道德产生负面影响。

正如我们在 A.2.19 节中所论证的，伦理学依赖于个体的自由和个体间的平等。等级制度侵犯了这两者，因此“道德堕落的主要来源”是“资本主义、宗教、司法和政府”。在“经济领域，强制使我们陷入了工业奴役；在政治领域则使我们陷入了国家……[在其中]，民族……只是变成了顺从中央权威的臣民。”这一切“贡献并有力地推动了现存所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恶行的产生”，并且“证明了其在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方面的绝对无能；甚至未能维持社会已达到的道德水平。”这并不奇怪，因为社会发展出了“专制的偏见”，并且“人们越来越分裂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道德水平逐渐下降……时代的精神逐渐衰退。”通过侵犯平等，通过拒绝平等者之间的社会合作，转而支持自上而下、专制的社会关系，将一些人变成他人的工具——资本主义就像国家一样，不得不侵蚀伦理标准，因为社会的“道德水平”被“权威的实践所堕落”。[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第 137-138 页，第 106 页和第 139 页]

然而，除了促进普遍的不道德行为外，资本主义还生产了一种特有的扭曲价值等级——它将人类置于财产之下。就像 Erich Fromm 所说的：

“人对人的使用[例如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体系的体现。资本——死亡的过去，雇佣劳动力——活着的精力和当下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等级价值观里面，资本高于劳动，累积的物品高于生命力的展现。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资本。掌握资本的人，命令‘仅仅’掌握生命、人类技能、精力和创造力的人。‘死物’高于活人。资本和劳工的冲突，不仅仅是两个阶级的冲突，也不仅仅是他们为了争取分享社会产品的斗争。这是两种价值标准的冲突：在充满物质即其积累的世界，和充满生命及其生产力的世界之间的冲突。” [《The Sane Society》，pp. 94-95]

资本主义把人的价值，仅等同于一定数量的、所谓“劳动力”的商品，换句话说，是一种**物品**。一个人不是作为个体——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道德和精神价值的独特人类存在——而是仅仅以其价格标签来衡量。这种人际关系被经济关系取代，最终导致人类价值被经济价值取代，给我们带来了账本的“伦理”；在这种伦理中，人们的价值由他们的收入决定。正如穆雷·布克钦所指出的，这也导致了人类价值的堕落：

“市场经济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它那肮脏的语言取代了我们最神圣的道德和精神表达。我们现在‘投资’于我们的孩子、婚姻和个人关系，这个词现在与‘爱’与‘关怀’等词等同。我们生活在一个‘权衡’的世界里，任何情感‘交易’都要追求‘底线’。我们使用合同的术语，而不是忠诚和精神纽带的术语。” [《现代危机》，第 79 页]

当人类价值被算计的伦理所取代，并且只有市场和国家的法律将人们“绑”在一起时，社会崩溃是不可避免的。难怪在如撒切尔和里根领导下的“保守派”政府，及其跨国公司掌控的“自由市场”体制中，现代资本主义目睹了犯罪和人性丧失的巨大增加。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是一个人们生活在自我构建的堡垒中、在（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物理上的）墙壁和防御背后才“自由”的社会。

当然，有些人**喜欢**数学的“伦理”。但这主要是因为——就像所有的神明一样——它给崇拜者提供了一本容易遵循的规则书。“五大于四，因此五更好”是很容易理解的。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写作时注意到这一点：

“他们中的一些人[主人]讨厌迫使他们[把农民赶出土地]的数学，一些人感到害怕，一些人崇拜数学，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逃避思想和情感的避难所。” [The Grapes of Wrath, 第 34 页]

这种耗费大量时间，去贬低工作场所中个体的行为，必定影响了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从而反过来带入到他 / 她在生活中其他方面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工作时被认为是一件商品，他就会转而认为自己和别人都是商品。这样所有的社会关系——并且，最终**所有的**个体——都被商品化了。在资本主义里，理论上没有什么神圣的——“什么都有其标价”——也许是尊严、自我价值、骄傲、荣誉——所有都成了供出售的商品。这种贬低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病态。其中的“消费主义”，可以直接追溯到个体在资本主义下的商品化。再次引用 Fromm 的话说：“**东西**没有自我，并且变成东西的人[例如，在劳动市场的商品化]也不可能有自我” [《The Sane Society》, p. 143]

然而，人们仍然感觉得到对自我的**需求**，所以试图用消费来填补空白。“当一个人得到新商品时，生活就会变得完整”这样关于快乐的幻想，驱使人们去消费。不幸的是，由于商品不过是更多的“东西”，它们不能提供自我的替代物，因此必须再次进行消费。这个过程当然是被广告业鼓励的，它试图说服我们购买我们并不需要的物品，因为它们会让我们变得流行 / 性感 / 快乐 / 自由等等（我们已经酌情删减了！）。然而，消费本身并不能真正满足购买商品所试图满足的需求。唯有基于真正人类价值的社会互动，以及创造性的、自主的劳动，才能满足

这些需求。

这当然不等于说，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高标准的生活或物质商品。相反，他们认识到，只有自由和美好的生活，才可能让一个人衣食无忧。自由和每天 16 小时的工作无法共生——平等与贫困、团结与饥饿，也同样如此。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消费主义是由神经质、非人性的资本主义“账本”伦理，导致的对消费的扭曲；它粉碎了个体及其对身份、尊严、自我的感觉。

B.1.4 为什么存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同性恋恐惧

因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①（对同性恋者的憎恨 / 害怕），在整个社会中被制度化，所以对性别、种族和同性恋的压迫成为了一种惯例。这三种恶劣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在等级制中固有的、合理化统治和剥削的意识形态需求——换句话说，是“正名”和“解释”压迫和非正义的“理论”。像 Tacitus 所说的：“我们憎恨被我们伤害的人。”那些压迫别人的人，常常能找到把其受害者当作“劣等人”的理由，并认为他们因此罪有应得。精英需要某些方式去把他们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合理化。因为社会制度很明显不公平，并是为精英服务的，所以注意力必须被转移到对其它较不易获得的“事实”——比如建立在生物学或“自然”基础上的、所谓的优势。因此，关于性别、种族和道德优势的学说，在等级、阶级分层的社会不免要出现。

我们将依次谈到不同形式的偏执。

从经济立场来看，种族主义与国内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以及国外的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美洲和欧洲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因对人民的束缚而加强，尤其是对那些非裔人口。在美洲、澳洲和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对原始居民的屠杀及对他们领土的征用，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对异族的武力支配，对统治民族而言，仿佛这是出于它自身对特殊自然品质的驾驭，换句话说，出于它的“种族”特征。于是，帝国主义者屡次诉诸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以作为他们种族主义的“自然”基础。

欧洲最初的种族优势理论之中，其中有一个是由戈比诺（Gobineau）于 1850 年代提出的，为了给贵族对法兰西的统治建立天然的权利。他论证道，法兰西贵族发源于日耳曼血统，而“平民”则是高卢血统或凯尔特血统，并且因为日耳曼民族是“优异”的，法国贵族也就有了天然的统治权利。尽管法兰西“平民”根本不认为这个理论有说服力，但它随后却被德国扩张的拥护者采用，并成为了德国种族意识形态的起源，被纳粹用来正当化对犹太和“非雅利安”民族的压迫。“白人的责任”（"white man's burden"）和“显而易见的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观念，大约于同时在英格兰发展起来，在美洲也以某种较低的程度地发展起来，并被用来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合理化盎格鲁-撒克逊征服和对世界的支配。

^① 注：三词或译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恐同症”

种族主义与国内外的威权主义始终如影随形。正如鲁道夫·洛克（Rudolf Rocker）所指出的，“所有种族理论的倡导者，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政治和社会反动势力的同盟者和辩护人，是权力原则最残暴形式的鼓吹者……凡是认为所有政治和社会对立，不过是种族血统的决定性表现的人，都是否认了思想的调和作用，否认了道德情感的共同性，并且在每一次危机中都只能诉诸暴力。事实上，种族理论不过是对权力的崇拜。”种族主义通过攻击“个人自由方面的所有成就”、以及平等不过是“我们的工业权力掌控者所设想的未来工业奴役，恐怕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道德辩护理由了。”——来帮助巩固精英阶层的权力，[《民族主义与文化》，第 337-338 页]

种族优势的观念，同样可以发现其中包含很大的国家利益。像 Paul Sweezy 指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冲突的强化……必须被尽可能地导入无害的渠道——这里的无害，就是说，从资产阶级规则的立场出发。以种族为界限激起对抗，便是一个把注意力从阶级斗争转移掉的、很方便的办法，”而阶级斗争无疑对统治阶级利益是个威胁。[《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p. 311] 的确，雇主经常谨慎地在工人之间培养种族界限的分割，以作为一种“分而治之”策略（在其他情况下，如北爱尔兰或苏格兰，雇主也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宗教）。

雇主和政客经常刻意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种族分裂，作为“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在其他背景下，例如沙皇俄国、北爱尔兰或苏格兰，雇主们也曾以宗教作为分裂手段。而在另一些地方，则用移民与本地出生者之间的差异来制造对立。但无论如何，最终的效果都是一样的——社会压迫，从艾玛·戈尔德曼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谴责的美国南方极端暴力（“南方猖獗的暴行，愤怒的人群将黑人私刑处死、折磨并活活烧死，而无人伸出援手，也无人发声保护他们”[《艾玛·戈尔德曼：美国岁月的纪实历史》，第一卷，第 386 页]）或是沙皇俄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到住房歧视、就业歧视、工资歧视等问题。

对于掌权者而言，这种策略极具逻辑性，因为种族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偏见一样）可以被用来分裂工人阶级，让人们把自己所受的苦难归咎于同阶级的其他人，而非真正的根源。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对自身问题的愤怒被引导至替罪羊。例如，白人工人被明里或暗里鼓励，将失业、贫困和犯罪归咎于黑人或西班牙裔，而非造成这些问题的资本主义及其掌控者（通常是白人男性精英），这些掌控者直接从低工资和高利润中获益。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歧视少数族裔和女性符合其利益，因为这能直接或间接地扩大利润。当被边缘化的群体被剥夺工作和投资机会时，他们的工资水平就会被压低，从而增加企业利润。间接而言，歧视通过提高失业率、制造工人间的对立，进一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和统治权力。这些因素，确保了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像一些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通过“竞争”来消除歧视。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不仅曾经从种族主义遗产中获益，并且仍将继续受益。种族主义为资本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来源，并允许社会的一部分群体遭受更恶劣的待遇，从而通过降低劳动条件和其他非工资成本来提高利润。在美国，黑人从事同样的工作时的收入仍然低于白人（即便在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业和其他相关人口统计变量相同的情况下，黑人收入仍比白人工人低约 10%）。这进一步

转化为财富的不平等。1998 年，黑人家庭的收入仅为白人家庭收入的 54%，而黑人家庭的净资产（包括住宅）仅为白人的 12%，非住宅净资产仅为白人的 3%。西班牙裔的情况类似，其收入仅为白人的 62%，净资产仅为 4%，非住宅净资产仅为 0%。而在白人家庭中，净资产为零或负值的比例不到 15%，但在黑人家庭中这一比例为 27%，西班牙裔家庭则高达 36%。即使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下，黑人家庭的财富仍然远远少于白人家庭。[道格·亨伍德，《新经济之后》，第 99 页、第 125-126 页]

这一切都意味着，少数种族“在种族和阶级的双重背景下遭受压迫和剥削，并因此不得不展开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的额外斗争” [Lorenzo Kom'boa Ervin, 《Anarcho-syndicalists of the world unite》]

只要女人开始为自己行动并要求平等的权利，性别歧视则只需要一个“正当理由”。在此之前，性别压迫不需要被“正当化”——它是“自然”的（当然得说，性别平等，在基督教作为一种国家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崛起之前，要更加明显。因此女人的“地位”在过去几百年之内下降了，但归功于妇女运动而再次上升）。

性别压迫的本质可以从婚姻中看出来。Emma Goldman 指出，婚姻伴随着她对丈夫“任性和命令”的“完全服从”，“代表这男人对女人的主宰。”[《Red Emma Speaks》, p. 139] 像 Carole Pateman 所写的，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妻子的合法地位（仍）与奴隶相似……一个奴隶没有独立于其主人的合法身份，并且夫妻成为了‘一个人’，作为丈夫的人。”的确，法律“建立在妻子[像]财产一样的设想上”并唯有婚姻“包含了明显的要求服从的约束” [The Sexual Contract, p. 119, p. 122, p. 181]

但是，当女人开始质疑男权的设想时，就有许多理论被发展出来，用来解释为什么对女人的压迫和被男人支配是“自然”的。因为男人利用力量把他们的规则强加到女人身上，男性的“优势”被说成是其性别的“自然”产物，与更强大的生理力量联系在一起（前提是它“可能带来权力”）。在十七世纪，女性被说成是比男性更像动物，于是“证明”了，在男人面前，女人和绵羊拥有同等的平等权利。更近代一点的精英，则欣然接受社会生物学作为对妇女运动的回应。通过在生物学基础上“解释”对女人的压迫，被男人控制且为男人服务的社会制度，便可以忽略。

女性的屈从地位，同样对资本主义有经济价值（我们应该注释，Goldman 认为资本主义和婚姻一样，也是一种“父权安排”，两者都从人们手中掠夺了“生来就有的权力”，“阻碍”其成长，“毒化”其身体，并把人们维持在“愚昧、贫困和依赖之中。” [《同上》, p. 164]）。女性经常提供必要（并且无偿的）劳动力，用以（时常）维持男性工人的良好状态；并且主要是女性在（照样无偿地）培养下一代供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奴隶。另外，女性的服从为工人阶级男性提供了用以藐视的对象，并且有时候是他们得以发泄挫折（而不是在工作时搅出麻烦）的便捷的靶子。像 Lucy Parsons 指出的，工人阶级女性是“一种奴隶的奴隶”。

性别歧视，与所有形式的偏见一样，直接体现在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差异上。在美国，2001 年女性的平均工资仅为男性的 57%（相比 20 年前的 39% 有所改善）。部分原因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但即使是参与工作的女性，她们的收入也只有男性的 66%（相比 1980 年的 47% 和 1970 年的 38% 有所提高）。对于全职工作的女性来说，她们的收入约为男性的 76%，高于 1970 年代大部分时间的 60%。然而，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样，这一现象部分原因在于男性收入的停滞（1998 年，男性的实际收入仅比 1989 年增长了 1%，而女性的实际收入增长了 14%）。因此，女性收入的增加，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进入了高薪、以男性为主的行业，从而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更是由于自 1980 年代以来对工人阶级的强烈打压——去工会化和去工业化导致的大量高薪男性工作岗位的消失，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确保家庭的经济稳定。[Henwood, 同上, 第 91-92 页]

如果不看平均数，而是具体分析相同职位和相同背景变量（如工作经验、教育程度等）的情况下，女性的薪资仍比男性低约 12%。毫无疑问，与种族歧视一样，这些所谓的“相关变量”本身也是由歧视塑造的。女性，和黑人一样，获得面试和工作的机会都更少。性别歧视甚至影响职业类别，例如，“照护”类职业的薪资低于“非照护”类职业，仅仅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女性化的”，涉及女性在家庭中无偿承担的任务。总体而言，以女性为主的行业薪资较低。1998 年，男性占比超过 90% 的职业，其工资中位数比平均水平高出近 10%；而女性占比超过 90% 的职业，其工资中位数比平均水平低近 25%。一项研究发现，某一行业女性比例每增加 30%，该行业的平均工资就会下降 10%。毫无疑问，生育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有子女的女性收入比无子女女性低 10% 至 15%，而男性则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提供产假制度的国家，女性的“孕产惩罚”要小得多。[Henwood, Op. Cit., 第 95-97 页]

对男女同性恋及双性恋的压迫与性别主义密不可分。一个父权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将同性恋的实践看作是正常的人类变异，因为他们模糊了死板的社会性别角色和性别陈规。大多数年轻的男同性恋者之所以维持他们的性取向，是由于害怕被从家里驱逐；并且所有的男同性恋者都害怕，如果自由地表达性取向，某些“直的”^①人们就会因为性取向赶走他们。与其他受到偏见压迫的群体一样，同性恋者在经济上也遭受歧视（男同性恋者的收入比异性恋男性平均低 4% 至 7% [Henwood, Op. Cit., 第 100 页]）。因此，由于性取向而遭受的社会压迫体现在多个层面：从极端暴力，到在相同工作中获得更低的薪资。

对同性恋的压迫并不是因为异想天开，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对核心家庭的特殊需求。核心家庭作为顺从者（使儿童在习惯于、并“尊敬”等级制和服从的独裁制的家庭中长大——参看 B.1.5 部分）的，原始——也是廉价的——制造者，同时也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和保姆，为了资本主义完成了一个重要需求。非传统的性取向对家庭模型来说象征着恐慌，因为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角色模型。这意味着，每当资本主义试图强化“家庭价值观”（即服从权威、“传统”、“道德”等）时，同性恋者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英国颁布第 28 条（Clause

^① 注：straight：指异性恋，中文语境中称异性恋者为“直的”，而同性恋者则是“弯的”。

28) ^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法律规定公共机构不得推广同性恋性取向（即不得将其呈现为正常现象，而只能作为一种“堕落”或“变态”）。在美国，右翼势力同样试图妖魔化同性恋，将其作为强化父权制家庭价值观和对“传统”权威服从运动的一部分。因此，除非性别歧视被彻底消除，否则人们基于性取向的压迫将没有尽头。

这还不是全部。性别歧视、宗族歧视和恐同症，不但对受压迫者有害，对施行它们（并从某些方面从中获益）的人也一样。只要稍加考虑，便不难发现为什么会这样。这三者隔离了工人阶级，这意味着白人、男性和异性恋者，通过维持一个低薪的、竞争性的劳动力池，确保人力池中他们的妻儿、母亲、亲朋的低工资水平，来反过来伤害他们自己。这种隔离给所有人造成了劣势的状况，因为资本家得到了一个利用这个廉价劳动力人力池的竞争优势，迫使所有的资本家为了在市场中生存，而降低工作环境和工资（另外，通过破坏一致对抗雇主和国家的团结，这种社会阶级也许会产生，由被排斥的、可能在罢工时成为工贼的工人，构成的群体）。而且，“特权”部分的工人阶级也是失败的，因为他们的工资和工作环境，还不如那些团结起来能争取到更好条件的人。只有老板才是真正的赢家。

这些都可以从对此主题上的研究里看出来。研究员 Al Szymanski 系统地洞察并科学地考察了以下设想，那就是白种人工会从种族歧视中获利[“*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White Gai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1, no. 3, June 1976, pp. 403-414]。他比较了美国“白种”和“非白种”（比如黑人、美洲土著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工人的情况，并发现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在美国一个州内，白人与黑人工资差距越小，白人的工资相对就越比其它地方高。这意味着“白人不会在经济上从经济歧视中受益。白种工人在经济上的受益，恰恰显得是因为缺乏经济歧视……不仅在他们的绝对水平上，也在白人之间的相对平等上。” [p. 413]换句话说，对黑种工人工资上的歧视越少，白种工人工资更高。

（2）在美国一个给定的州中，“非白种”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高，白人内部的不平等越严重。换句话说，贫困、受压迫工人群体的出现，降低了白种工人的工资，尽管它没怎么影响非工人阶级白人的工资（“对[非白种]人的歧视越严重，白人内部的不平等越严重” [p. 410]）。所以白种工人明显从这种歧视里遭受了经济损失。

（3）他也发现“种族歧视越强烈，白人的工资越低，这是由于……[它对]工人阶级团结[造成的影响]。” [p. 412]换句话说，种族主义在经济上对白种工人不利，因为它破坏了黑种和白种工人间的团结并削弱了工会组织。

因此，总体来看，白人工人阶级表面上因种族主义获得了一些特权，但实际上却深受其害。因此，种族主义及其他形式的等级制度，实际上违背了那些践行

^① 注：该法条存在于英国 1988 年《地方政府法令》中，饱受争议。第 28 条 2000 年在苏格兰废除，随后 2003 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被废除。

它的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并且它削弱了工作场所和社会的团结，从而让统治阶级得利：

“只要歧视存在，种族或族裔少数群体受到压迫，整个工人阶级就会被削弱。这是因为资本家阶级能够利用种族主义来挑起种族对立，迫使工人阶级的不同群体在工作和社会资源上相互竞争，从而压低工资水平。这种分裂最终削弱了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此外，通过挑拨白人工人与黑人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对立，资本家阶级成功地阻止了工人们团结起来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只要工人们在彼此斗争，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就安如磐石。”[Lorenzo Kom'boa Ervin, Op. Cit., 第 12-13 页]

另外，种族、性别、同性恋带来的一种财富——不同的观点、见解、经验、文化、思想等等——也被拒绝了。他们的头脑被困在牢笼里，因为一元文化而停滞下来——而停滞，是个性的死亡。这种形式的压迫是对施压者的去人性化，因为压迫者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认而存活，而是作为一种**角色**；因此，他们不但被生活限制，还不能**自由地**表达其人格（因此只能以非常有限的方式表达）。这些扭曲了压迫者的人格，并使他们的生活和人格变得贫瘠。同性恋恐慌和性别主义同样限制了所有人的灵活性，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使他们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性表达方式和性关系。性别压迫和同性恋压迫，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或整体发展几乎没有好处。

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基于种族、性别或性征的压迫，在资本主义下，或事实上在任何基于统治和剥削的经济体制下——将永远顽强地持续下去。当“少数”的个体成员，有可能因此繁荣起来时，那么种族主义作为对不平等的合理化，对精英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工具，不会去舍弃。通过利用种族主义的结果（如贫困）来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辩护，对现状的批评又一次被关于“自然”和“生物学”的荒谬论调所取代。性别歧视和对同性恋者的歧视也是如此。

长远的解决方案很明显：拆除资本主义，和与它捆绑在一起的等级化、经济阶级分层的社会。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及它必然导致的帝国主义和贫困，我们将同样消灭那些，用来合理化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压迫、或者被用来分裂和削弱工人阶级的——种族或性别优势的意识形态的需求。然而，对抗偏见的斗争不能被推迟到革命之后。如果这样做，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这场革命很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第二，即使革命成功，这些问题仍然极有可能在新社会中继续存在。因此，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像对抗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一样，在当下进行斗争并加以消除。事实上，正如我们在 B.1.6 节中更详细讨论的那样，通过这样做，我们不仅能在当下改善生活，同时也能加速消除这些不平等的时代到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所有人都能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体，生活在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恐同或宗教仇恨的世界里。

无须赘言，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反对，那些允许其它形式等级制的、那些接受资本主义统治者及国家，并允许以权力和财富之名对人际关系和个性进行贬低的——“平等”。存在让黑人、同性恋或女性，享有当老板或政客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却是没抓住要点的。说“我也是！”而不说“什么乱七八糟

糟的！”，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只是不同的老板和新形式的压迫。我们需要观察社会是被怎样组织的，而不是观察掌权者的性别、肤色、国籍或性征！

B.1.5 专制文明的大众心理基础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在 A.3.6 部分提到，等级、专制制度倾向于自身延续，因为在其影响下的成长产生了服从 / 独裁主义人格——同时（基于恐惧或惩罚）“尊重”权力、和渴望自己对下层人施加权力的人。拥有该性格结构的个体，并非真正希望拆卸等级制，因为他们害怕真正的自由带来的责任。看起来对他们而言，金字塔式的社会制度是“自然”和“正确”的，从独裁制工厂到父权家庭，上层精英进行统治，而下层人只能服从。这样，我们得到了所谓“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呼唤“自由”、却同时拥护工厂法西斯主义和私有制国家的景象。简单的说，专制主义文明在每一代人中自我繁殖。因为通过一个渗透到社会各方面的、错综复杂的调节体系，威权文明建造了支持这种社会状况的群众。

那些对威权文明再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心理机制，进行的最透彻的分析中，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分析是其中之一。赖希把他的分析基于弗洛伊德的四项^[原文如此]最为坚实的发现，也就是：（1）大脑中存在着拥有对行为有着强烈却非理智的影响的、潜意识部分；（2）甚至连小孩也会产生活跃的“生殖”性欲，比如，对与生育完全无关的性快感的渴望；（3）在一夫一妻制和父权制下，伴随出现的亲子关系中的恋母情结冲突与童年的性欲，经常因为对惩罚的恐惧或对性行为和思想的厌恶，而被压抑；（4）这种对儿童自然性活动的阻挡、以及把它从记忆中的消除，非但不能减弱它在潜意识中的力量，反而事实上把它强化了，还使它通过各种病理学的失调和反社会运动得以发泄；以及（5），与神圣的起源相去甚远的，人类的道德法规，是从家长和监护人在儿童早期使用的教育衡量标准中衍生的，其中最有效的便是对童年性欲的压抑。

赖希通过学习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对特罗布里恩群岛^①岛民的研究——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的）、儿童性行为没有被镇压的，并且神经症、倒错与威权专制制度和价值观几乎不存在的社会——他的到这样的结论，父权制和独裁制的最初发展，源于部落酋长开始从他们儿子参与的某种形式的婚姻（“交表婚”^②）而获得经济优势时。在这种婚姻里，儿子妻子的兄弟被迫为她支付嫁妆，作为延续部落的形式，这样才能扩大她丈夫的氏族（比如，酋长的氏族）。通过为他的儿子们（由于酋长一夫多妻制的特权，酋长经常有非常多的儿子）安排许多这样的婚姻，酋长宗族得以聚集财产。这样社会开始基于财产，分层为统治宗族和从属宗族。

为了保障这种“美好”婚姻的永恒，需要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然而事实上，

^① 注：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的群岛。1980 年代时该群岛最大的基里维纳岛上，有大约 60 个村落，人口约 12,000。20 世纪初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此进行实地考察。

^② 注：交错从表（cross cousin）：是指父亲姊妹的子女（即姑表兄弟姊妹）或母亲兄弟的子女（即舅表兄弟姊妹）。交表婚（cross-cousin marriages）则是指交错从表关系中，两者的婚姻，属于表亲婚的一种

如果没有对童年性欲的压抑，一夫一妻制不可能得以保持——因为数据显示，被允许自由表达性欲的儿童，常常不能成功地适应终生一夫一妻制。所以，伴随着阶级分层和私有财产，专制主义的育儿方式被发展去鼓吹新父权制度再生产所依赖的性伦理。这样——一方面，前父系社会、原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主义（或用 Reich 的词“劳动民主”）、经济平等和性自由；另一方面，父系社会、财产私有制经济、经济阶级分层和性压迫——之间，便有了历史联系。像 Reich 说的：

“每个由[母系]发展到父权组织形式的部落，不得不改变其成员的性关系结构，以产生协调其新的生活形式的性欲。这是一个必要的改变，因为权力和财产，从民主氏族[母系氏族]到酋长的独裁家长制中的转移，主要通过性压制的帮助来贯彻。通过这种方式，性压抑成为把社会分割为不同阶级的关键因素。”

“婚姻，及其赠与的法律规定的嫁妆，成为从一种组织到另一种转变的轴心。通过观察妻子宗族对丈夫家庭的婚姻贡品，加强了男性的、尤其是酋长的权力地位的事实；高地位氏族及家庭的男性成员，进化出了对永久化婚姻纽带的强烈兴趣。在这个阶段，换句话说，只有男性对婚姻有兴趣。以这种方法，在当时可以被轻易瓦解的天然的劳动民主简单联盟，由于（在今天依然存在的）父权社会的基本制度，被转化为一夫一妻制。然而为了安全地保卫这种婚姻，有必要越来越强加对自然生殖竞争的约束，并贬低它。”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p. 90]

由母系到父系的社会转变中对自然性欲的压制，产生了各种反社会行为（性虐待、破坏冲动、强奸幻想，等等）；而这些行为，又不得不通过强迫接受——取代了出现在前父系社会里的自然自我调节的——强制性的道德，来被压制。通过这样，性开始被认为是“下流的”、“恶魔的”、“邪恶的”等等——它的确通过衍生驱动力的产生而变成那样了。所以：

“由后来 [母系制度]（酋长家庭在母亲氏族中的经济独立、部落之间货物交易的增长、生产资料的发展等等）的改革过程，导致的父权独裁主义性规则，变成了夺取女人、儿童和青年性自由的威权意识形态的首要基础，把性变成了商品，并把性利益置于为经济征服者而设的服务中。从现在开始，性欲的确被扭曲了；它变得恶魔和邪恶，并应该被抑制。” [Reich, Op. Cit., p. 88]

在父权制刚开始占一席之地时，这样一个基于通过性压制而造成成员的心理残疾之上的、完全独裁社会的产生，将伴随着：

“对儿童天然性欲的道德限制，其最后阶段是对儿童生殖性欲的严重损害，使儿童对权威、服从、‘优秀’和‘听话’等专制意义的词汇，感到害怕、羞愧和恐惧。它严重损伤了一个人的叛逆力量，因为每一种有活力的生命冲动，现在都被加上严重恐惧的负担；并且因为性是被禁止的主题，一般的思维和人的关键才能也受到约束。简而言之，道德的目的是产生顺从的主体；他会将不幸和耻辱弃置不顾、适应专制的秩序。这样，家庭就是专制国家的缩影，在其中儿童必须学会使自己做好准备，以便适应今后他所需要的总体社会调整。人们的专制主

义结构——必须被明确地建立——基本上是通过把性的压抑与恐惧铭记于心”。
[Reich, *Op. Cit.*, p. 30]

这样，通过损害个体反叛的能力和为自己思考的能力，对童年性欲的抑制——当然还有对其它形式的自由、对生物能的自然表达（比如叫喊、哭泣、奔跑、跳跃等等）的抑制——变成了制造保守人格的最重要武器。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保守政客都对“加固家庭”和发扬“家庭价值”（比如，父权制、强制一夫一妻制、婚前贞洁、体罚等等）加以强调。

“因为专制社会通过专制家庭的帮助，来使自己在大众的个体结构里再生产；那么政治反应，就不得不把专制家庭视作为‘国家、文化和文明……’的基础，并捍卫它。[它是]政治反应的生殖细胞，是保守派男女最重要的生产中心。它从特定社会过程中起源并发展，并成为维护形成它的专制制度的最必不可少的制度。” [Op. Cit., pp. 104-105]

家庭，是为此目的最必要的制度。因为儿童在从出生到大约六岁之间，也就是大部分时间被父母管制时，对心理损伤最没有抵抗力。一旦儿童足够大以至于可以离开父母，学校和教堂便接手继续这个过程；但是如果父母没有在儿童生命早期建立适当的基础，它们一般不会太成功。这样，A.S. Neill 发现“托儿所教育非常类似训狗。被鞭打的儿童，就像被鞭打的小狗一样，变成了顺从、自卑的成人。就想我们训练狗去适应我们的目的，我们也能这样训练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狗舍——托儿所里，“小狗们”必须是遵守规则的；当我们认为它们该吃饭时，他们就得吃。1935 年，当希特勒吹口哨发令时，我看见过成百上千顺从、奉承的狗，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①摇着尾巴。” [《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 p. 100]

在性能量到达高峰期的少年时期，家庭同样是实施压制的代理机构。这是因为大部分家长，不但不为青少年提供与同伴不受干扰地发展性关系的隐私空间，反而事实上主动劝阻这类行为；通常（就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家庭中），需要完全禁欲——而在那个时期禁欲是最不可能的！再者，因为在资本主义环境下，青少年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父母，在社会上没有住房供应，集体宿舍也不允许性自由。年轻人除了服从非理智的父母对婚前性行为节制的要求外，没有别的选择。这接着促使他们在轿车后座这种无法放松、无法完全得到性满足的幽境中，偷偷摸摸地进行性行为。如 Reich 发现的，当性欲被抑制并充满焦虑时，结果往往是某种程度的（他称之为）“性高潮无能”：不能完全体会在性高潮释放的能量。而因为性紧张不能被完全释放，导致进入慢性生物能量停滞状态。Reich 发现，正是这种状态滋生了精神病和保守观念。（更多的细节详见第 J.6 节）

在这方面，注意到“原始”社会和它的关联是很有趣的，就如特罗布里恩群岛岛民一样。在他们发展到父权独裁制度之前，为少年提供了特殊社区住房，让他们可以和同伴享受不受干扰的性关系——而这被社会完全许可。这种制度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它是自由观念所暗示的（结果）。（更多关于

^① 注：柏林的一个下属区，现合并为滕珀尔霍夫-舍讷贝格区

青少年性解放的讨论，参看 J.6.8 节）

民族主义情感也可以追溯到威权制家庭。一个儿童依恋其母亲，当然是正常的，并且是所有家庭纽带的基础。主观的说，家乡和民族观念的感情核心就是母亲和家庭，因为母亲是孩子的家乡，正如家庭是“民族的缩影”一样。根据 Reich 的说法，在仔细研究了群众呼吁的、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之后，他发现，民族主义情感是家庭关系的直接延续，并植根于和母亲固着的纽带。如 Reich 指出的，尽管婴儿期对母亲的依恋是自然的，固着的依恋则不是，反倒是社会产物。在青春期，**如果**被强加到青少年身上的非自然的性压抑，使和母亲的纽带无法常存，那么后者将让位于对其它的依恋，比如自然的性关系。正是这种形式的社会条件的具现化，使得对母亲的固着成为成年人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并且它只在这个阶段才能变成保守的社会力量。

此后那些在对保守性格结构产生过程的分析方面、追随 Reich 的作者，扩展了分析的范围，囊括了包括性压抑在内的、其它强加到儿童和青少年身上的重要压抑。比如 Rianne Eisler 就在其著作《Sacred Pleasure》中强调，不仅是对性的否定态度，而是对愉悦的否定态度，产生了各种有问题的人格。对快感价值的否定渗透了我们的潜意识，作为潜意识的反应。比如，在大众观念中，对身体快感的享受是人性种“兽性的”（因此也就是“坏的”）一面；与之相对比的，是精神和“灵魂”的“高级”快感。通过这种否定身体精神层面的二元论，使得人们对享受任何感官愉悦感到罪恶——这种情况却让他们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下，为基于牺牲愉悦（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生活本身）的生活，做好准备。这一切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对群众的服从异化劳动力的要求、剥削、保护统治者利益的兵役等等。并且与此同时，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强调了苦难的价值，例如对那些，因无情的理想而受苦（并把“必要的”痛苦强加到别人身上）的、强硬而冷漠的战士英雄的赞美。

Eisler 也指出，有“足够证据显示，在等级森严并惩罚严酷的家庭中长大的人们，是学会在家长面前抑制愤怒的典型例子。也有足够证据显示，这种愤怒之后常常被转移到传统上的无权群体（比如少数族裔、儿童和女人）。” [Sacred Pleasure, p. 187] 这样被压抑的愤怒之后变成了滋养保守政客的沃土；他们常常基于让少数群体为社会问题当替罪羊，从而获得群众吸引力。

正如心理学家 Else Frenkel-Brunswick 在《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中记载的一样，那些习惯了童年受到虐待、使意志在可怕的独裁家长的需求面前屈服的小孩，同样很大概率，在未来变成在权威领导面前屈服意志的大人。Frenkel-Brunswick 总结道：“换句话说，他们学会把受压抑的狂怒转向他们认为的弱者，也同时学会屈服于独裁的或‘强人’的条规。此外，由于任何反抗的暗示（甚至由于受到不公平待遇而‘顶撞’）而受到严厉惩罚后，他们也逐渐学会了使自己否认童年受到的遭遇存在问题——然后继续对自己的孩子做同样的事。”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187]

这些，只是通过产生崇拜权威及害怕自由的人格、从而延续社会现状的，部分机制。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大体上反对传统的育儿方式、父权独裁制家庭（及

其“价值观”）、青少年时期的性欲压制，以及教会与大多数学校教授的对否定快乐、赞美痛苦的态度。为了代替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赞同非独裁、非压制的育儿方式和教育方法（分别参看 J.6 部分和 J.5.13 部分），其目的是防止，或至少，降低个体的心理残疾，让他们发展自然的自律和自主学习。我们相信，这是唯一使人成长为快乐、创新、真正喜爱自由的个体的途径。而这些个体，将为无政府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繁荣提供心理基础。

B.1.6 等级制度可以被终结吗

因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等级制度以其多种不同形式存在已久，并深刻地塑造着被其支配的人们——所以，一些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终结甚至减少等级制度的想法，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毕竟，既然无政府主义者自己也承认，被支配者会适应等级制度，那岂不是意味着根本不可能培养出能够摆脱它的人？

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这个看法。等级制度不仅可以在具体形式上被终结，也可以在整体上被废除。因为只需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便可知，这种变革是完全可能的。曾经生活在绝对君主制下的人们，已经废除了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奴隶制和农奴制也已经被废除。亚历山大·伯克曼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许多曾被认为是真理的观念，后来被认为是错误和邪恶的。例如君权神授、奴隶制和农奴制。曾几何时，全世界都相信这些制度是正义的、公正的、不可改变的。”然而，这些观念最终“失去了对人民的控制，被摒弃，而那些制度也随之被废除”，因为“它们仅仅对统治阶级有利”，并最终“在人民的起义和革命中，被彻底摧毁”。[《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178 页] 因此，当前形式的等级制度，不太可能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例外。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马拉泰斯塔在一百多年前的评论，现在依然适用：“被压迫的大众……从未完全屈服于压迫和贫困……[并且他们]渴望着正义、自由和福祉。”[《无政府状态》，第 33 页] 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始终在抵抗等级制度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在创造非等级化的生活方式和斗争方式。这种持续不断的自我行动与自我解放过程，可以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中得以体现——在这些斗争中，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自身的梦想和希望创造出了新的替代方案。无政府主义，正是基于这种抵抗、希望和直接行动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被压迫者在等级制度内部以及对抗等级制度的斗争中，不断孕育出自由意志主义的要素，而这些要素被提炼、概括，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正是这些斗争及其所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元素，使得消灭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不仅是可取的，更是可能的。

因此，尽管等级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足为奇，但对它的抵抗也同样不令人意外。这是因为个体“并不是一张任由文化书写其文本的白纸；他（或她）是一

个充满能量、并以特定方式构建起的实体；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会以特定且可察觉的方式对外部条件作出反应。”在这种“适应过程”中，人们会发展出“源于我们本性的、清晰的心理和情感反应。” [Eric Fromm, **Man for Himself**, p. 23 and p. 22] 例如：

“人可以适应奴役，但他的反应是智力和道德素质的下降……人也可以适应要求压抑性冲动的文化条件，但在这一适应过程中，他会发展出……神经症状。他几乎可以适应任何文化模式，但如果这些模式与他的本性相矛盾，他就会产生精神和情感上的困扰，这最终会迫使他改变这些条件，因为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如果……人能够毫无抵抗地适应一切环境，而不去反抗那些违背其本性的条件，那么人类就不会有历史可言。人类的进化根植于人的适应能力，以及其本性中某些不可摧毁的特质；这些特质，会促使他不断寻找更符合其内在需求的生存条件。” [同上，第 22-23 页]

因此，只要存在对等级制度的适应，就会出现对等级制度的反抗。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和任何等级化社会一样，面临着一种直接的矛盾。一方面，这种体系将社会划分为一个狭隘的统治阶层，而绝大多数人（正式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仅仅执行少数人的决定。因此，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疏离和不满。然而，在实践中，人们会试图克服这种无力感；因而等级制度本身，就在被其支配的人群中催生出对抗自己的斗争。这一过程始终在不同程度上持续进行，并且是促成政治意识、社会变革和革命的关键因素。人们拒绝被当作物品对待（这正是等级社会所要求的），而正是这种反抗，使等级制度孕育了自身灭亡的可能性。

因为等级制度，所导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和权力不平等，并非由上帝、自然或其他超人的力量所决定的。它是特定社会体系、其制度及其运作方式的产物——一个建立在专制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体系，它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影响我们，也在心理层面上塑造我们。因此，希望依然存在。正如专制的性格特质是后天习得的，同样，它们也可以被忘却。正如卡罗尔·佩特曼所总结的那样，证据表明，“我们确实是通过参与，来学习如何参与的”，而一个参与性的环境，“同样可能有效地减少个体对非民主态度的倾向。” [Participat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p. 105] 因此，压迫自身会催生对它的抵抗，并在其中播下自身灭亡的种子。

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自我解放的重要性（参见 A.2.7 节），并“支持所有争取部分自由的斗争，因为我们相信，人们是在斗争中学习的，一旦开始尝到一点自由的滋味，最终就会想要全部的自由。” [马拉泰斯塔，《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活与思想》，第 195 页] 通过直接行动（参见 J.2 节），人们发挥自身力量，为自己挺身而出。这不仅打破了等级制度的思想灌输，也破除了等级社会关系所必需且所制造的顺从性。因此，日常反抗压迫的斗争“犹如一个训练场，培养”一个人“（对自己）在社会中应有角色的理解，增强（其）自立与独立意识，教会他们（和她们）互助与合作，并使其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他们将学会自行决策和行动，而不是依赖领袖或政客来处理（自己的）事务、维护（自己的）福利。决定自身诉求及最适合达成目标的方法的，将是他们自己，与

（他们的）同志们共同做出决定。”[伯克曼，《同上》，第 206 页]

换句话说，斗争能够培养所有被等级制度所侵蚀的品质，从而不仅促进人们质疑和抵抗权威，最终还能彻底消灭它。这意味着任何斗争都会改变其中的参与者，使他们政治化，并通过摆脱等级制度所塑造和要求的奴性特征，来改变他们的个性。例如，在 1937 年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静坐罢工之后，一位目击者观察到：“汽车工人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那些积极参与斗争的女性也成为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她们走路的姿态变了，高昂起头，对自己充满信心。”[Genora (Johnson) Dollinger, 收录于霍华德·津和安东尼·阿诺夫（编）的《**Voices of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 349 页] 这样的变化存在于所有的斗争中（参见 J.4.2 节）。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正如在 J.1 节和 J.2.1 节所讨论的，我们早已认识到社会斗争的解放作用，以及它在创造自由个体、构建无政府社会所需的初步社会结构（参见 I.2.3 节）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毫无疑问，一个像资本主义这样的等级制度体系，无法在一个不愿屈服的工人阶级面前存续。因此，资本家们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试图摧毁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使其服从权威——要么是不情愿地服从（因为害怕被解雇），要么是心甘情愿地服从（因为被欺骗，以为等级制度是自然的，或者因顺从而获得奖励）。然而，这一努力从未彻底成功，因此资本主义始终充满着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持续斗争。其中一些斗争取得了胜利，一些则失败了；有些是防御性的，而有些则是进攻性的。有些斗争，如罢工，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些，如消极怠工，则较为隐蔽。这些斗争在等级制度的两端都在进行——被统治者努力限制权威、扩大自身的自主权；而统治者则试图增强其对他人的控制权。斗争的结果各有不同。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被压迫者取得了显著的胜利；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正如我们在 C.8.3 节所讨论的，统治阶级发动了一场无情的阶级战争，并成功地对工人阶级造成了一系列挫败。毫不意外，自那时以来，富人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也更加强大。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与当下社会中持续进行的斗争，力求以唯一可能的方式结束这一斗争——即被压迫者的胜利。其中一个关键部分，便是争取部分的自由，无论是较小的改革还是重大的变革，因为这些斗争能够增强反抗精神，并开启最终消灭等级制度的进程。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强调参与者的自主性，并不仅将其视为能在现存的不自由体系中，争取更多正义与自由的手段——同时，也看作是彻底消灭他们所抗争的等级制度的方式。例如，在阶级斗争中，我们主张“从最基层开始组织，从工厂和作坊开始，在所有工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不分行业、种族或国籍，进行联合。”[由伯克曼所著，《同上》，第 207 页] 正如我们在 J.5.2 节所讨论的，这样的组织应由工作场所的大会运作，并成为取代资本主义工业等级制度的理想工具，从而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即工人对生产的自主管理（参见 I.3 节）。同样，在社区中，我们倡导建立群众集会（参见 J.5.1 节），不仅作为对抗国家权力的手段，也作为取代国家，实现自由、自主管理社区的方式（参见 I.5 节）。

因此，当前的斗争本身就架起了一座桥梁，连接着现实与可能实现的未来：

“集会和社区必须从革命进程内部生长出来；实际上，革命的进程本身，必须是大会和社区的**形成**，并伴随着权力的消灭。集会和社区必须成为‘战斗性的词汇’，而不是遥远的灵丹妙药。它们必须被创造出来，作为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模式**，而非理论上的或纲领性的抽象物。”[默里·布克钦，《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第 104 页]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除了对抗国家与资本主义，我们还必须反抗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不仅仅反对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和经济阶级压迫，还要同样反抗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社会等级制度，并反对恐同、宗教仇恨以及政治国家。这些压迫及其对应的斗争，并不是偏离了**对抗阶级压迫或资本主义斗争**，而是争取人类自由的核心组成部分，若忽视它们，反而将对这一斗争造成致命伤害。

在这一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鼓励并支持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通过抵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反同性恋活动，并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挑战这些观念，以捍卫自身的人性个性。正如卡罗尔·佩特曼所指出的：“性别支配塑造了职场环境，也存在于婚姻家庭中。”[《性契约》，第 142 页] 这意味着，整个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致，对抗我们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迫——我们不仅要斗争反对自身的歧视，同时也必须支持所有正在抗争的群体，不论他们的性别、肤色或性取向。洛伦佐·康布阿·欧文（Lorenzo Kom'boa Ervin）关于反对种族主义的言论，同样适用于对抗一切形式的压迫：

“无论在何处，种族主义都必须被坚决斗争，无论它是否存在于我们的队伍之中，甚至是否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因此，我们必须终结白皮肤的特权制度，这一制度被资本家用来分裂工人阶级，并对遭受种族压迫的工人进行超额剥削。白人**工人**，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白人**工人**，必须抵制利用工人阶级的某一部分来提升自身地位，同时以种族或国籍为由，阻碍另一部分工人阶级取得进步的企图。这种白人**工人**运动中的阶级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必须被直接挑战并击败。在超额剥削制度和全球的白人至上主义被彻底终结之前，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无政府主义与黑人革命》，第 128 页]

在争取平等的道路上，确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至今仍然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言：“无论在何处，女性都不是按照其工作的价值来被对待，而是按照她的性别。”[戈尔德曼，《红色艾玛言论集》，第 177 页] 教育体系依然带有父权制色彩，年轻女性仍常被引导远离传统上被视为“男性”的学科和职业（这不仅教导儿童接受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划分，还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内化这些限制），但女性、黑人和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地位，也确实有所改善。这些进步源自历史上不断涌现的自行组织、自我解放运动，而这些运动不仅是短期内抗击压迫的关键，同时也为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创造了长期变革的可能性。

艾玛·戈尔德曼认为，解放始于“[女性]灵魂之中。”只有通过内心的解放过程——即被压迫者认识自身的价值，尊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他们才能真正有效地对抗（并最终战胜）外部的压迫与偏见。只有当你尊重自己，才能让他人尊重你。那些反对偏见、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男性、白人和异性恋者，必须支持被

压迫群体，并拒绝纵容自己或他人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同性恋恐惧症行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劳工运动中不允许任何一名成员被歧视、被压制、被忽视……工人[及其他]组织必须建立在所有成员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这种平等意味着，只有当每位工人都是自由和独立的个体，并基于共同利益与他人合作时，整个工人组织才能成功运作并变得强大。”[洛伦佐·康布阿·欧文，《无政府主义与黑人革命》，第 127-128 页]

我们必须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同时尊重彼此的差异。因为多样性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乐趣，而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平等与一致性混为一谈。通过内部的自我解放，以及对外部压迫的团结抗争，我们可以与偏见作斗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可以在社会革命发生之前就被削弱，甚至几乎消除。而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受压迫者自行组织，独立自主地反抗，不再接受种族、性别或性取向方面的侮辱，并拒绝让他人逍遥法外（这对促使他人意识到自身的态度和行为——甚至是他们自己未曾察觉的偏见——至关重要）。

20 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的“自由女性”（*Mujeres Libres*）运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参与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和无政府主义伊比利亚联合会（F.A.I.）的女性无政府主义者，自主组织起来，不仅在更广泛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中提出性别歧视的问题，还致力于提高女性在自由意志主义组织中的参与度，推动女性对抗男性压迫，实现自我解放。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不得不与“革命性的”男性同志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作斗争。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所著的《西班牙的自由女性》是对此运动的出色记录，也为所有关心自由的人提供了重要启示。几十年后，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妇女运动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旨在挑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统性别歧视和父权制。她们同样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为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需求而斗争。个体在其中相互支持，并在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获取力量，以推进个人层面的抗争。

这一进程的另一个关键部分，是让这些自主组织积极支持其他正在斗争的人（包括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性别/性取向的成员）。这种切实的团结与交流，在与斗争本身对参与者的激进化作用相结合时，可以帮助消除偏见与歧视，从而瓦解压迫我们所有人的社会等级制度。例如，1984-1985 年英国矿工大罢工期间，同性恋群体对矿工的支持，使得这些群体在许多矿工游行中获得了最显著的位置。另一个例子是 1912 年伦敦的犹太移民工人大罢工，与此同时，伦敦码头工人也在进行一场大罢工。“共同的斗争让犹太工人和非犹太工人团结在一起。他们举行了联合罢工会议，并在大型联合示威中由同样的演讲者发表讲话。”这场犹太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给血汗工厂制度带来了“致命一击。在这次胜利之后，英国工人开始用全然不同的眼光看待犹太工人。”然而，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许多码头工人的家庭陷入极度困境。胜利的犹太罢工者发起了一场运动，“将一些码头工人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中。”这种实际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犹太工人和非犹太工人之间的友谊。”[由鲁道夫·洛克尔所著的《伦敦岁月》，第 129 页、第 131 页] 这种团结在 1936 年 10 月得到了回报，当时的码头工人，站在了阻止莫斯利的法西斯黑衫军穿越犹太社区的最前线（即著名的缆索街战役）。

对于白人、男性和异性恋者而言，唯一符合无政府主义原则的立场，是支持

他人的斗争，拒绝容忍他人的偏见，并根除自身的恐惧与偏见（同时也不应该对自我解放斗争不加任何批判——团结并不意味着放弃思考！）。这显然意味着要在所有工人阶级组织与活动中，纳入对社会压迫问题的关注，确保任何被压迫群体都不会在其中被边缘化。

唯有如此，才能削弱这些社会病症的影响，并创造一个更美好、无等级的社会体系。伤害一人，即是伤害所有人。

B.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

正如之前提到的（参看 B.1 节），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有形式的等级权威。然而历史上，他们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反对特定的两种主要形式上。其一是资本主义，其二是国家。这两种形式的权威有着共生关系，并不能被简单地分开：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事实和观念。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制度相互支撑、相互强化。

“它们之间相互联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通过因果关系紧密相连的。” [由克鲁泡特金所著的《进化与环境》，第 94 页]

因此，在这一节中，除了解释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我们也将有必要分析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国家？如 Malatesta 所说，无政府主义者“使用国家这个词……表示政治、立法、司法、军事和金融机构的总和，通过从人们中夺走——对他们自己事务的管理、对他们个人行为的控制、和对他们个人安全的责任——并委托给别人；而受委托者通过霸占或授权，被授予为每件事和每个人制定法律的权力，并且强迫人们遵守它们。如果需要，就动用集体力量。” [《Anarchy》，p. 13]

他继续道：

“对于我们，政府[或者国家]是为所有统治者而设的……他们有权力设立法律去管理人际关系，并观察它们怎样被实施……[并且]他们或多或少地拥有利用整个社区的社会能力的权力，包括体力、智力和经济上的能力，为了强迫每个人去实施统治者的愿望。而这种权力，在我们看来，构建出了政府和权威的起源” [Op. Cit., p. 19]

克鲁泡特金提出了类似的分析，认为国家“不仅包括社会之上存在的一个权力，还包括领土集中以及多种社会职能的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须发展一个完整的立法和监管机制，以便将某些阶级置于其他阶级的统治之下。” [由克鲁泡特金所著的《国家：它的历史角色》，第 10 页]对于巴枯宁来说，所有的国家“本质上只是通过……一个特权少数阶层来管理群众的机器，所谓的特权阶层声称比人民自身更了解人民的真正利益。” [由巴枯宁所著的《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 211 页] 在这个问题上，穆雷·布克钦写道：

“至少，国家是一个专业的社会强迫体系——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管理体系，正如公众和许多政治理论家仍天真地看待它那样。‘专业’这个词应该像‘强迫’这个词一样受到强调……只有当强迫被制度化成为一种专业的、系统的和有组织的社会控制形式——也就是说，当人们被从社区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不仅要‘管理’它，而且还要在暴力垄断的支持下进行管理——我们才能真正谈论国家。”[由穆雷·布克钦所著的《重塑社会》，第66页]

正如布克钦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国家就是社会”的想法，或者拒绝将任何人类聚集和组织在一起的群体视为一种国家。克鲁泡特金指出，这种混淆解释了为何“无政府主义者常因‘想要摧毁社会’而受到指责，并被批评倡导回到‘每个人与所有人的永恒战争’状态。”这种立场“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在国家出现之前，已经在社会中生活了数千年”，因此，国家“只是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形式之一。”[Op. Cit., p. 10]

因此，国家不仅仅是个人或民族的联邦，正如马拉泰斯塔强调的，不能用来描述“聚集在特定领土上的人类集体，并构成所谓的社会单元，不论这些集体是如何组织的，或它们之间的关系状态如何。”它不能“仅仅作为社会的同义词来使用。”[Op. Cit., p. 17] 国家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基于某些关键特征，因此我们主张，“‘国家’一词……应该保留用于那些具有等级制度和集中化的社会。”[彼得·克鲁泡特金，《伦理学》，p. 317f] 因此，国家“是一种历史性的、过渡性的制度，是社会的一种暂时形式”，而且其“完全消亡”是可能的，因为“国家不是社会。”[巴枯宁，《巴枯宁选集》，p. 151]

总结来说，国家是人类事务在特定地区组织的特定方式，这种方式以某些制度为标志，这些制度又具有某些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是一种单一的实体，从其诞生到今天始终保持不变。国家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它们的权威程度、官僚体制的大小及其组织方式上。因此，我们有君主制、寡头制、神权制、党派独裁以及（或多或少）民主的国家。有古代的国家，其中官僚体制最小化；也有现代的国家，拥有庞大的官僚体制。

此外，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治制度……始终是存在于社会核心的经济制度的表现。”这意味着，无论国家如何变化，它“始终受制于经济体制，并且始终是经济体制的表现，同时也是维持它和使其神圣化的力量。”不用说，并非总是精确匹配，有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会滞后于正在发生的经济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它将被突然抛弃，并以适应新经济体制的方式进行重塑。”[克鲁泡特金，《叛逆者的言论》，p. 118]

有时，国家可以改变其形式，以保护其所代表的经济体制。因此，我们看到，民主国家在面对民众起义和运动时转变为独裁政体。智利的皮诺切特、西班牙的佛朗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都是巴枯宁评论的显著例证。他指出，虽然“没有任何政府能像共和国那样更好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但如果需要镇压“无产阶级的起义”，那个阶级“宁愿……（实行）军事独裁。”[巴枯宁，**Bakunin on Anarchism**, p. 417]

然而，尽管国家可能会改变其形式，但它仍然具有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使社会制度得以识别为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国家有以下三个特征：

- 1) 在一个在特定领土内的“暴力垄断”；
- 2) 这种暴力拥有“专业”、制度化的性质；并且——
- 3) （具有）等级制的本性、中央集权，和少数人手中的主动性。

在这三个方面里，最后一种（中央集权、等级制的本性）最为重要。仅仅因为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就保证了社会分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需要专业机构的产生，以便加强分化）。因此，我们发现巴枯宁提出，“有了国家，就必须伴随而来的是……所有从上至下的社会生活组织，通过立法和政府的形式。”

[《巴枯宁的政治哲学》，p. 242] 换句话说，“人民并没有自我治理。” [克鲁泡特金，《Op. Cit.》，p. 120]

这一方面也暗示了其余的方面。在一个国家中，所有居住在该地区的人都受制于国家，将自己服从于构成权力机构的个人，这些个人统治该领土。为了执行这一少数人的意志，他们必须在该领土内拥有对暴力的垄断。由于国家成员集体垄断了政治决策权，他们作为一个特权团体，与整个社会的其他成员有着地位和身份上的分隔，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依赖其他人来执行自己的意志。这就需要一种专业化的机构来执行他们的决定，这不是由武装人民来做，而是由警察或军队来执行。

基于此，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国家构成的关键。如果没有这种划分，我们就不需要垄断暴力，也不会有任何带有权力和等级制的社会组织（如许多无国家的“原始”部落中所存在的，这在未来的无政府社会中将继续存在）。而且，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划分即使在民主国家中也存在，因为“有了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始终存在等级和身份上的差异。即使它是一个民主制度，在其中我们假设今天的统治者明天不再是统治者，但身份上的差异依然存在。在一个民主体系中，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统治，而且这些人无一例外地来自于精英阶层。” [哈罗德·巴克利，《国家》，p. 23-24]

因此，“政府的本质”在于“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发展出自身的利益”，所以它是“一个为了自身利益存在的制度，掠夺人民，并教导人民任何有助于使其稳固其地位的东西。” [沃尔泰琳·德·克莱尔，《沃尔泰琳·德·克莱尔读本》，p. 27 和 p. 26] 因此，“专制主义并不完全体现在国家或权力的形式上，而是体现在国家和政治权力的原则本身。” [巴枯宁，《Op. Cit.》，p. 211]

由于国家是少数人手中的权力的代表团，它显然基于等级制。这种权利代表团导致被选举人与选举他们的群众隔离，并在它们的控制之外。（见 [B.2.4 节](#)）另外，由于被选举人被给授权各种事务，而且被要求做出决定，所以一个官僚机构很快围绕他们发展起来，以便协助他们做出决定。然而，由于这种官僚机构对信息的控制及其持久性，它很快比被选举的官员拥有更多权力。因此，“一个高度复杂的国家机器……导致了一个特别关注国家管理的阶级的形成，这个阶级利

用其积累的经验，开始为个人利益欺骗其他人。”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与革命的选集》，p. 61] 这意味着那些（所谓的）人民公仆比他们所服务的人拥有更多权力，就像政客比选举人有更多权力一样。所有类国家（即等级制）形式的组织，不可避免地在它们周围滋生出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很快成为体系中事实上的实权集中点，无论官方规章制度是怎么规定的。

这种对普通人的边缘化和弱化（也是对官僚机构的强化），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的关键原因。这种安排保证了个体被弱化，被官僚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条规奴役，以便把一个人降级为物品或数字，而**不是**独一无二的、拥有希望、理想、思想和感情的个体。正如 Proudhon 有力的论证道：

“**被统治**，等于是被即无权力还无德无能的生物，监视、检查、侦察、指导、用法律驱使、编号、登记、灌输、传道、控制、评价、估值、责备、命令 …… **被统治**，等于是在每一次的操纵、每一次交易中，被——记录、注册、登记、征税、贴邮票、测量、编号、评估、认证、审定、警告、禁止、劝诫、修正、处罚。正是在公共事业的借口下，及大众利益名义下，人们被置于贡献、训练、赎身、剥削、垄断、勒索、压榨、迷惑、抢劫——之下；然后，作为最轻的抵抗，抱怨遭来的第一个词，就是镇压、罚款、藐视、骚扰、跟踪、虐待、棒打、缴械、扼喉、监禁、审判、判刑、枪毙、驱逐、牺牲、出卖、背叛；并且，为了粉饰所有这些，便去嘲笑、挖苦、激怒、玷污。这就是政府；这就是它的正义；这就是它的伦理。”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p. 294]

国家的性质如此——**任何**行为，不论多么邪恶，如果有助于推进国家及其所保护的少数群体的利益，都会变得正当。如巴枯宁所言：

“**国家……是对人性最公然、最愚弄、最彻底的否定。**它破坏了地球上所有人类的普遍团结，只是为了把其中一些人聚集在一起，目的是摧毁、征服并奴役其余所有人……”

“这种对人性公然的否定，构成了国家的本质；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其至高无上的责任和最大的美德……因此，冒犯、压迫、掠夺、抢劫、刺杀、奴役人类的同胞，通常被视为犯罪。然而，在公共生活中，如果从爱国主义的角度看，当这些事情是为了国家的更大荣耀、为了国家权力的保存或扩展而做时，一切都会转化为责任和美德。而这种美德，这种责任，是每一个爱国公民的义务；每个人都应该行使它们，不仅针对外国人，也针对本国的同胞……只要国家的福利需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国家诞生以来，政治世界一直并且仍将是无限制的无赖和强盗行为的舞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古代和现代国家的整个历史不过是一系列令人反感的罪行；为什么过去和现在的国王和部长，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官、官僚和战士——如果仅从道德和人类正义的角度来审判——他们早应当被判苦役或绞刑，执行千百次都不足惜。没有任何恐怖、残忍、亵渎、伪证、欺诈、臭名昭著的买卖、损人利己的抢劫、肆无忌惮的掠夺或行径卑劣的背叛——是国家代表者们没有做过或没有每天在进行的，唯一的借口就是那

几个灵活的词汇，这些词汇既方便又可怕：‘出于国家的理由。’” [巴枯宁，《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pp. 133-4]

政府习惯于对它所宣称代表的人民撒谎，以此来为战争、削减（甚至摧毁）公民自由和人权、用多数人的利益惠及少数人的政策，以及其他罪行辩护。如果其臣民抗议，国家便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任何被认为必要的暴力，来将反抗者重新拉回正轨（并将这种镇压称为“法律与秩序”）。这种镇压包括使用暗杀小分队、将酷刑的制度化、集体惩罚、无限期监禁以及其他极端的恐怖行为。

难怪国家通常花费如此多的时间确保其人民的（错误）教育——只有通过掩盖（甚至隐藏）其实际做法，它才能确保那些被统治者的忠诚。国家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其臣民试图控制国家、并将其约束于人们所施加的标准的，一连串尝试。

考虑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是“最终的”等级结构，掌握着广泛的范围和致命的力量，并且拥有包括[上一节](#)所述的所有与权威相关的负面特征，这种行为并不令人惊讶。巴枯宁曾辩称：“任何逻辑学上的和直接的国家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权威原则上的，即这种原则是一种极其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思想，认为大众，始终无法自我治理，必须随时服从于一种以某种方式从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智慧与正义的仁爱枷锁。” [巴枯宁，《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p. 142] 这种权威体系必然是集中的、等级化的和官僚化的。而由于其集中的、等级化的和官僚化的性质，国家成为了社会的巨大负担，限制了社会的成长与发展，使得人民的控制变得不可能。正如巴枯宁所说：

“所谓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一般利益’……[在]实际上是……对各地区、公社和协会、以及大量个体的积极利益的，普遍和永久性的否定……[其中]所有国家的最崇高的愿望和生力，都被伪善地牺牲和埋葬。” [《巴枯宁的政治哲学》，p. 207]

这绝不是问题的全部。除了其明显的等级化形式，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的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作为社会中经济主导阶级的保护者，特别是保护其免受其他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挑战。这意味着，在当前体制下，资本家“需要国家来合法化他们的抢劫手段，保护资本主义制度。” [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p. 16] 国家，正如我们在[B.2.1 节](#)中讨论的，是私有财产的捍卫者（见[B.3 节](#)讨论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私有财产的含义，以及它与个人财物的区别）。

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支配的机制是由企业精英控制的（因此，大公司往往被认为属于更广泛的“国家复合体”）。事实上，正如我们在 F.8 节中更深入讨论的那样，“国家过去一直是，并且现在依然是，资本主义及其对大众的权力的、直接或间接地主要支柱与创造者。” [克鲁泡特金，《进化与环境》，p. 97] [B.2.3 节](#)指出了这种支配在代议制民主中的实现方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仅仅是经济阶级统治的工具。正

如马拉特斯塔所说的那样，“一个特殊的阶级（政府），通过必要的镇压手段存在，旨在合法化并保护拥有阶级免受工人要求的影响……它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创造特权，并且，若可能的话，使得拥有阶级本身也处于支配之下。” [埃里科·马拉特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p. 183] 因此，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与经济统治精英相区别，甚至与其对立。这意味着国家和资本主义都需要被废除，因为前者是与后者是一样独立的（且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阶级。这一国家的特性在 B.2.6 节中有讨论。

作为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国家不仅仅参与政治上的支配，还涉及经济上的支配。这种支配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从仅仅维护资本主义财产权利，到实际上拥有工作场所并直接剥削劳动力。因此，每个国家都以某种方式干预经济。虽然这种干预通常是为了有利于经济上的主导阶级，但它也可能会试图缓解资本主义市场的反社会性质，并规范其最严重的滥用行为。我们在 B.2.2 节中讨论了国家的这一方面。

无需多言，标志着国家特征的发展并非偶然。如我们在 H.3.7 节中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持有进化的视角。这意味着，国家具有等级性特征，以便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和角色。正如 B.2.4 节和 B.2.5 节所指出的，国家的集中化是确保精英统治所必需的，并且是有意地并积极地创造出来的。这意味着，国家从其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机构，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国家“拥有其传统、等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便“无法作为解放的工具”。 [克鲁泡特金，《进化与环境》，p. 78]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旨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一种基于自下而上的决策和消除等级制度的去中心化形式。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国家的共同特征，但他们也承认某些形式的国家比其他形式更好。例如民主国家，通常比独裁政权或君主制具有更少的压迫性。因此，得出“在批评民主政府时，我们就显示出了我们对君主制的偏爱”的结论是错误的。“我们坚信，即使最不完美的共和国也比最开明的君主制好一千倍。” [巴枯宁，《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p. 144]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本质或作用。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并非依赖于国家的善意，而是人民站起来反抗国家并行使自治的结果。如果任其自生自灭，国家很快就会将它所说捍卫的自由和权利变成空头法律——那些在纸面上看起来美好，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施的条文。

因此，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讨论国家、其角色、对社会自由的影响，以及谁从国家的存在中受益。克鲁泡特金的经典文章《国家：它的历史角色》值得进一步阅读，了解这个主题。哈罗德·巴克利的《国家》是一本关于国家起源、及其在千年间变化以及现代国家本质的良好概述。

B.2.1 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什么

国家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集中化的权力和暴力垄断，保证特定社会中现存的社会关系及其来源。用马拉特斯塔的话来说，国家基本上是“财产所有者的**宪兵**”。这是因为有“两种压迫人们的方式：一种是直接通过暴力，使用物理上暴力；另一种是通过剥夺他们的生存手段，进而将他们迫使到投降的状态。”拥有阶级，“逐渐将生产手段、生活的真正来源——农业、工业、贸易等——集中到自己手中，最终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凭借其手段的优越性……最终更多或更公开地将政治权力，即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其成为自己的**宪兵**。” [Op. Cit., p. 23, p. 21 和 p. 22]

因此，国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政治表现”，并因此，“它是拥有或控制社区财富的人们的代表，亦是那些创造财富的工作者的压迫者。” [尼古拉斯·沃尔特，《论无政府主义》，p. 37] 因此，说国家是社会寄生虫的剥削工具一点也不夸张。

国家通过保护某些经济垄断来确保其统治精英的剥削特权，而这些垄断正是其成员财富的来源。这些经济特权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当前体制下，这意味着捍卫资本主义财产权（见 [B.3.2 节](#)）。这种服务被称为“保护私有财产”，并被认为是国家的两项主要职能之一，另一项职能是确保个人“在身体上的安全”。然而，尽管宣称有第二个目标，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关注的是保护财产（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定义的“财产”，见 [B.3.1 节](#)）。

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推断出，“个人安全”、“防止犯罪”等等参考的概念，大多数不过是对国家存在的合理化，以及维持精英力量和优势的掩护烟幕。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处理这些问题。当然，国家会处理这些问题，但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任何“源自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习惯的法律……都被统治者用来为自己的统治神圣化。而这些法律通过对民众的恐惧和惩罚来维持。” [《无政府主义》，p. 215]

简单来说，如果国家“仅仅呈现出一堆对统治者有用的规定，它将很难确保得到接受和服从”，因此，法律反映了“对社会本质上至关重要的习惯”，但这些习惯“巧妙地与统治阶层强加的习俗交织在一起，并且两者都要求群众给予同等的尊重”。因此，国家的法律具有“双重特性”。虽然它的“起源是统治阶级希望使自己为自身利益强加的习惯得以永久化”，它也通过法律化“对社会有益的习惯，这些习惯不需要法律来确保尊重”——与那些“只对统治者有益，对大众有害，并且仅凭恐惧惩罚来维持的习惯”不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p. 205-206] 举个明显的例子，我们看到国家以保护个人财产为名，强加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于广大公众，并借此捍卫精英及其财富和权力的来源，抵御那些受其压迫的人们。

此外，尽管国家在保护人的安全（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安全）方面有次要的兴趣，但绝大多数针对个人的犯罪行为，都是因为贫困和由于国家支持的剥削所造成的异化所驱动的，同时也来自于国家自己保护私有财产的暴力手段、所造成的对暴力的麻木。换句话说，国家通过指责它自己（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帮助制造的社会恶行，来合理化其存在。这样，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如果没有国家和它产生的滋生犯罪的环境，便有可能由分权、志愿的社区协会，来富有同情心地（非刑罚地）处理极少数根深蒂固的有可能常存的暴力人士（参看 I.5.8 部分）。

无政府主义很清楚现代国家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国家，代表着使与私有财产联系的资本主义和权威关系，得以持久的重要强制性机制。对财产的保护，基本上是保证所有者对非所有者进行社会统治的方法；这在社会中都不但以整体形式出现，而且在详细的情况下，也由特定的老板对特定的工人群体进行。阶级统治是财产所有者对财产使用者施加的权威，也是国家维护这种统治（及产生它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职能。用 Kropotkin 的话说，“富人完全知道，如果国家的机制停止保护他们，那么他们对劳动阶级的权力便会立即消失。” [《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98] 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持国家统治是同一件事情。

历史学家 Charles Beard 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因为政府的首要目标，除了单纯的压制身体暴力外，就是制定决定社会成员财产关系的规则。所以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既然其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必然从政府那里获得符合其经济过程延续所需的规则，或者他们必须自己控制政府机关。”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quoted by Howard Zinn, 同上, p. 89]。

国家的这个任务——保护资本主义和财产所有者的财产、权力和权威——同样被亚当·斯密提到：

“财产的不平等……在人们中导致一定程度的权威和服从，而这是在之前不可能出现的。它由此产生了某些程度上、为保存自己而不可或缺的民事政府……[也是]为了保持和保障那种权威和从属地位。特别是富人，必然有兴趣支持那种能够确保他们拥有自身利益的秩序。财富较少的人联合起来捍卫财富较多的人对其财产的占有，以便财富较多的人能够联合起来捍卫他们对自身财产的占有……他们较小的权威的维持依赖于较大权威的维持；而他们的顺从，又依赖于较大权威使他们的下属维持顺从的能力。他们构成了一种小贵族，感到有兴趣捍卫自己的财产，并支持自己小统治者的权威，以便他能够捍卫他们的财产并支持他们的权威。民事政府，若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富人对抗穷人，或者保护拥有财产的人对抗没有财产的人。” [国富论, book 5, pp. 412-3]

这在现代国家的理论和历史中得到了体现。像约翰·洛克这样的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家，毫不犹豫地发展出一种以保护私人财产为核心的国家理论。这一观点在美国革命中得到了体现。例如，美国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就曾说过：“拥有国家的人应该治理国家。” [引自诺姆·乔姆斯基，《理解权力》，第 315 页] 这就是美国“民主”建国国父的座右铭，并且至今依然延续。

简而言之，国家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如巴枯宁所说：

“国家就是权威、统治和力量，由掌握财产的、所谓的开明阶级组织起来，对抗大众……国家的统治……[确保]只有特权阶级能够得到代表。” [The Basic Bakunin, 第 140 页]

在当前体制下，因为国家的“中央集权、法律（总是由少数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制定）以及司法法院（主要是为了维护权威和资本而设立）”，国家被认为是“资本的主要防线”。因此，国家就是“所有政府的使命……就是通过武力保护和维持拥有阶级的特权。”因此，在“个人与国家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站在个人这一边，而不是国家；站在社会这一边，而不是压迫它的权威”，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国家并不超越与社会，而是独立于构成它的阶级。[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第 149-150 页，第 214 页，第 192-193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国家的角色仅仅看作是代表人民或“民族”的利益。因为“民主是空洞的借口，在生产、金融和商业——以及它们带来的社会政治过程——控制在‘私人权力集权’手中时。那些主导社会的人所提出的“国家利益”只是他们的特殊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只会加剧迷惑和压迫。”[诺姆·乔姆斯基，《激进的优先事项》，第 52 页] 正如我们在 D.6 节讨论的那样，民族主义始终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构成一个民族的普通人民的利益。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将这种概念视为一种骗局（即利用你对居住地区的情感，来进一步为统治阶级的目的和权力服务）。

事实上，国家作为统治精英的保护者之一，在国际上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捍卫“国家”（即精英）利益，抵御其他国家的精英。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国家由“与其国内特定利益群体密切相关的部长”代表。“贸易部长反映了商业社区的关切”，“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与金融界紧密相连；他们来自金融公司，在任职期间，服务过后他们就回到这些公司……这些人从金融界的视角看待世界。”不足为奇的是，“任何机构的决定自然反映了做出决定者的视角和利益”，因此，“国际经济机构的政策，常常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商业和金融利益紧密相关。”[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第 19-20 页]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情况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中并没有改变。然而，在这些国家，国家的主要功能被“民主”外表所掩盖，借助代表制选举系统，使得国家看似是由人民自我治理的。因此，巴枯宁写道，现代国家“结合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所需的两种条件：国家的中央集权以及对...人民的实际征服...人民表面上由少数人代表，但实际上是由他们统治。”[同上，第 210 页] 国家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将在 B.2.3 节中讨论。

B.2.2 国家有附属职能吗

有的。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国家是维持阶级统治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仅仅限于捍卫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仅仅停留在这一最低限度的活动上。除了捍卫富人、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所偏好的特定财产权外，国家还有许多其他附属职能。

这些职能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因此，列出所有这些职能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要回答为什么国家会有这些职能则较为直接。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的附属职能。第一种是国家通过某种方式帮助统治阶级，不仅仅是捍卫他们的财产，还在国内或国际上推动他们的利益。第二种是保护社会免受资本主义市场负面效应的影响。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两点，并且为了简洁和相关性，我们将集中讨论资本主义（另见 D.1 节）。

国家的第一种主要附属职能，是当它以某种方式干预社会来帮助资本主义阶级时。这可以表现为显而易见的干预形式，如补贴、减税、非招标的政府合同、对老旧低效产业的保护性关税、给予某些公司或个人实际的垄断权、当被国家官僚认为某些公司“太重要”以至于不能倒闭时对它们的救助，等等。然而，国家的干预远不止这些，还以更隐晦的方式进行。通常，它的干预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通常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这些干预旨在造福整个资本家阶级，而不仅仅是特定的个人、公司或行业。

这些干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包括国家对工业的资金支持（例如军事开支）；建立私人资本无法提供的社会基础设施（如铁路、高速公路）；为公司提供它们无法承担的研究资金；为保护新兴产业免受更有效率的国际竞争而实施的保护性关税（这一政策是成功工业化的关键，因为它允许资本家剥削消费者，从而让他们变得富裕并增加可用于投资的资金）；给予资本家优先获取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机会；为广大公众提供教育，确保他们具备资本家和国家所要求的技能和态度（学校教育的一个关键内容，便是如何忍受无聊、适应等级制度并服从命令）；帝国主义行动，通过建立殖民地或客户国（或保护公民在海外投资的资本）来创造市场或获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在经济衰退和停滞时，政府通过支出刺激消费者需求；保持“自然”失业水平，以便用它来鞭策工人阶级，从而确保他们为更少的报酬生产更多的商品；通过操控利率来尝试减少商业周期的影响，并削弱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

这些行动及类似的行为，确保了国家在资本主义中的关键角色“本质上是将风险和成本社会化，并将权力和利润私有化。”毫不奇怪的是，“尽管有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讨论，但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比重仍然在不断增长。”[诺姆·乔姆斯基，《流氓国家》，第 189 页]因此 David DeLeon 说：

“首先，国家，依然是一个为延续支配性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服务的制度，无论通过例如军队的代理，还是法庭、政治或警方的代理……当前的国家已获得……[相对于国家暴力——作为经常首先使用、总是最后诉诸的手段，]更不原始的方式，去加强它们的财产制度。国家可以通过防止关键企业破产、通过利率操纵经济、通过对教会和学校进行税款优待来支持等级制意识形态、和其它策略——来管理、调整或解决经济压力。在本质上，它不是中性的制度；它对社会现状来说十分有力。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是一个以绕着资本转的、保持着系统平衡的陀螺。假如，某个经济部门赚取某个水平的利润，而这损害了系统的剩余部分——例如石油生产商导致公愤并提升成本——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或鼓励竞争来重新分配那些利润。” [“*Anarchism on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the state: some basic notes*”, **Reinventing Anarchy**, pp. 71-72]

换句话说，国家通过保护资本主义制度，来保障资本家阶级整体的长期利益（并确保其自身生存）。这一角色可能会与个别资本家甚至整个统治阶级的部分利益发生冲突（见 B.2.6 节）。但这种冲突并不会改变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警察”的角色。事实上，国家可以被视为一种手段，（以一种和平且看似独立的方式）用来解决上层阶级之间关于如何维持现有制度的争议。

必须强调的是，这一附属职能绝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成功的工业社会一直依赖于市场正统观念的偏离，同时却将其国内外的受害者推向市场的纪律。” [诺姆·乔姆斯基，《旧与新的世界秩序》，第 113 页]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干预的规模大幅增加，但国家作为资本家阶级的积极推动者，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所暗示的被动保护者（即作为财产的捍卫者）；这一角色一直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特征。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每一个国家通过征税、并通过为地主、棉花大亨、铁路巨头、收税官等建立垄断，迫使农民和工业工人过着贫困的生活……我们只需环顾四周，就会看到在欧洲和美国，国家是如何为了资本家，在本国以及更远的被征服土地上（即其帝国的一部分）建立垄断。” [《进化与环境》，第 97 页]

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泡特金所指的“垄断”，并非指某个公司对市场的完全控制，而是指一般的特权和利益。这一点至今仍然存在，例如通过将产业私有化，但为这些产业提供国家补贴；或者通过（被错误认为的）“自由贸易”协议，对世界市场实施保护主义措施，如知识产权等。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很少依赖纯粹的经济权力，来保持资本家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无论是在国内之于工人阶级，还是在国际上之于竞争的外国精英）。尽管在少数情况下，国家将干预简化为仅保护资本主义财产权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有所接近，但这并不是系统的常态——直接的暴力，即国家行动，几乎总是作为补充。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很少仅仅依赖经济权力来保持资本家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无论是国内对工人阶级，还是国际上对竞争的外国精英）。虽然曾经在少数情况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接近于，将国家的干预简化为仅保护资本主

义财产权，但这并不是该系统的常态——直接的暴力，即国家行动，几乎总是作为补充。

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时期尤为明显。当时，资产阶级希望并利用国家的权力来“调节”工资（即将工资压低到利润最大化的水平，并迫使人们定期上班），延长工作时间，确保工人依赖雇佣劳动作为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例如，通过圈地、强制执行无人占有土地的财产权等手段）。由于资本主义并非社会中的“自然”发展，资本主义的持续运作往往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最初建立该体制就依赖暴力，后来能够在没有进一步的干预存活下去，也不能因此使这个系统变得不再是国家主义体制）。因此，“调节”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继续用于使市场对富人有利，迫使工人按照老板的条件出售劳动力。

这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旨在防止可能威胁到资本主义经济效率、或威胁到资本家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一更大恶果。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为处于精英统治下的人群提供积极的利益（尽管这可能是副作用）。这使得我们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国家干预，即社会通过国家来保护自己免受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侵蚀的努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本质上反社会的系统。通过将劳动（人民）和土地（环境）视为商品，它必须瓦解社区并削弱生态系统。这无疑会伤害到那些受它支配的人，结果导致社会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干预，以减轻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因此，一方面是市场的历史性运动，这一运动没有内在的限制，威胁着社会的生存；另一方面是社会自然的自我保护倾向，推动其创造保护自身的制度。将这一点，与对被压迫者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反对最严重的不平等和权力滥用的立场结合起来——我们便看到国家有可能采取行动，遏制系统的最严重过度行为，以保持整体系统的运作。毕竟，政府“不能希望社会崩溃，因为那将意味着它和统治阶级将失去剥削的源泉。”[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第25页]

毋庸置疑，任何社会保障体系的推动通常来自于底层，来自那些最直接受到资本主义负面影响的人们。在大规模抗议的压力下，国家可能会为了防止在不威胁到整体系统完整性的情况下，而对工人阶级做出某些让步。因此，社会斗争，是理解国家历年来获得的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附属职能的动力（这同样适用于亲资本主义的职能，因为这些通常是为了提升资本家利润和权力，而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

国家立法规定工作日的长度，是这一点的显著例子。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家的经济地位稳固，因此，国家毫不犹豫地忽视了工时延长的问题，允许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并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提高利润率。即使爆发了抗议，军队也会去处理。然而，随着工人开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缩短工作日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要求，革命社会主义的热情也开始围绕这一点发展。为了平息这一威胁（而且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资本家而言是最坏的局面），国家通过了减少工作日长度的立法。

最初，国家纯粹是资本阶级的保护者，利用其权力，在多数人使用财产的情况下，捍卫少数人对财产的控制，（也就是压制工人运动，让资本家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第二个阶段，国家则是为了消除对整体系统完整性构成威胁的工人运动，而向工人阶级做出让步。毋庸置疑，一旦工人的斗争平息下来，那么通过市场的正常运作，工人的议价能力便会减弱（见 [B.4.3 节](#)），关于工作日的立法便很快变成了“空头法律”，被忽视而不再执行。

这表明，在推动建立、维持和扩展“自由市场”，和保护人民及社会免受市场运作后果的努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与冲突。谁能赢得这场冲突，取决于参与方面的相对力量（改革的内容也由此决定）。归根结底，国家所作的让步，它也能够收回。因此，福利国家的兴衰——其最初是为了防止更革命性的变革而设立的（见 [D.1.3 节](#)），并没有根本挑战雇佣劳动的存在，作为调节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它是有用的。但当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发生冲突，且统治精英足够强大时，它便会被“改革”（也就是变得更糟，而非更好）。

当然，这种形式的国家干预，并不会改变国家作为少数人权力工具的性质。事实上，这种性质必然会塑造国家如何实施社会保护；即使在国家承接了某些职能时，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资本阶级的即时利益，而非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在承受来自大众的压力、或试图修复资本主义市场所造成的伤害时，国家的阶级性质和等级性也会扭转结果，使之主要有利于资本阶级或国家本身。这一点可以通过劳动法的执行方式看出。例如，即使是国家的“善意”职能，也受到其等级化性质的渗透和支配。正如 **Malatesta** 所说的：

“政府的基本职能……通常是压迫和剥削群众，是保卫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确，对于这些基本职能……其它的职能已经在历史进展中被补充……（然而）把其它对社会生活有用的活动……与其压迫和掠夺活动相结合的政府……几乎从未出现过。但是这一点无法让我们忽视，政府天生具有压迫性的事实……以及政府的起源和姿态，无可避免地偏向保卫和加强统治阶级的事实；它显然地肯定和加强这种地位……如果明白它如何以及为什么实行这些职能，便足以发现——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被统治欲激发，并总是被武装以便去保卫、延展和保持其优势，以及那些国家同时意味着代表和保护者的阶级——的实际证据。” [**Op. Cit.**, pp. 23-4]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改革应该被废除（替代方案往往更糟糕，正如新自由主义所展现的那样），它仅仅承认国家不是一个中立的机构，不能指望它像中立个体一样行事。讽刺的是，这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中社会保障改革的另一个方面：它们有助于提升公关形象。通过表面上关心那些受到资本主义伤害的群体的利益，国家能够掩盖其真正的性质：

“如果一个政府不把自己的本性隐藏在总体用途的借口后面，就不可能使自己持久；如果它不显现出对所有人类生活的尊重，就不可能强求对特权者生活的尊重；如果它不装作是所有人权力的保护者，就不可能强求对少数特权者的认同。” [《同上》，pp. 20-1]

显然，作为统治精英的工具，国家几乎无法被依赖，来去控制由该精英阶层所运行的系统。正如我们在[下一节](#)所讨论的，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国家也是由富人掌控和管理的，这使得在没有大量民众压力的情况下，有利于人民的立法难以出台或得到执行。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直接行动和议会外组织的原因（详细内容请参见 J.2 和 J.5 节）。最终，甚至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也是直接行动的产物，是“人民之间的群众运动”通过“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这些权利，而他们永远不会自愿同意这些权利”所取得的。[Rocker, 《无政府工团主义》，第 75 页]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统治精英及其辩护者讨厌任何不符合其利益的立法——而当然，对其自身使用国家机器却保持沉默。正如本杰明·塔克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所指出的，“在他大量的例证中……他每次都举出一些法律，至少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劳动、减轻苦难或促进人民福祉……但他从未一次提到那些更为致命且根深蒂固的恶果，这些恶果源于无数创造特权并维持垄断的法律。”[《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第 45 页] 这种虚伪令人震惊，但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支持者中却是司空见惯的。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附属职能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一系列零散的改革，转变为一个主要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仁慈系统。相反，这些职能源于并补充了，国家作为资本主义财产和它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保护者的基本角色——即资本家剥削能力的基础。因此，改革可以修改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但永远无法威胁到它的基础。

总结来说，尽管国家代表雇主阶级进行干预的程度和性质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干预始终存在。无论它执行哪些超出保护私有财产的主要职能，承担哪些附带职能，国家始终充当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原则甚至适用于那些由广大民众强加于国家的附带职能——即便是最受欢迎的改革，如果可能的话，也会被扭曲以便为国家或资本服务。这并不是要忽视所有改革的尝试，而是意味着——我们，这些被压迫者，需要认识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组织来改善我们的境况。

B.2.3 统治阶级如何维持对国家的控制

在一些制度中，经济上的支配少数群体如何控制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封建主义中，土地由封建领主拥有，他们直接剥削农民。经济和政治权力合并同一群体——地主的手中。专制主义时期，君主将封建领主纳入自己的权力之下，封建主义相对分散的特性被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取代。

正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模仿的对象。国王被议会取代，议会最初是通过有限的选举票选产生的。在这种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中，精英如何维持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也是（同样）显而易见的。由于投票权是基于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因此实际上排除了穷人有任何（官方）的权利，去决

定政府的行为。哲学家如约翰·洛克对此提出了理论——工人阶级被视为国家政策的对象，而不是提名政府的公民（即财产拥有者）的一部分。在这一视角下，国家就像一个股份公司。拥有阶级是股东，负责提名董事会成员，而广大的民众则是工人，无法决定管理人员，且只能听从命令。

正如预期的那样，这种制度是大多数受其支配的人所强烈反感的。这样的“古典自由”政权是一种外来、专制的统治，缺乏人民的合法性，且完全不对广大的民众负责。显而易见，凭借有限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可能公平对待那些没有实际财产的人。可以预见，统治精英利用他们控制的国家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利益，并削弱对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潜在抵抗。这也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在“良好治理”和“自由”的幌子下掩盖了他们的权力。此外，像专制统治一样，有限选举被许多受其支配的人，视为对自由和个人尊严的侮辱。

因此，普选权的呼声和反对财产资格限制选举权的立场应运而生。对于许多积极分子（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这样的制度意味着工人阶级将掌握“政治权力”，因此有能力一劳永逸地结束阶级制度。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相信这一点，认为“普选权，在一个基于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中，将不过是一个骗局和陷阱”并且“是巩固拥有阶级在自由主义和正义的幌子下，永久统治人民的最可靠方式，牺牲人民的自由”。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普选权“可以被人民用来争取经济和社会平等。它始终并且必然是一个敌视人民的工具，支持资产阶级的事实上的独裁。”[巴枯宁，《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 224 页]

通过自下而上的广泛民众运动，男性工人阶级和后来的女性工人阶级获得了选举权。虽然精英阶层为维持其特权地位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最终他们被打败了。可悲的是，普选权的历史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是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的独裁政权。现代历史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权力的上升：因民众运动而出现的（代议制）民主，以及资本主义势力持续成功地削弱和控制民主的过程。

这一过程通过三大主要机制得以实现，这些机制共同作用，有效地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这三大机制是财富壁垒、官僚壁垒，最后是资本壁垒。每个机制将依次讨论，所有这些都确保“代议制民主”仍然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克鲁泡特金，《反叛者的言辞》，第 127 页]

财富壁垒是最为显而易见的。竞选需要资金。1976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支出为 6690 万美元。1984 年为 1.036 亿美元，1996 年为 2.399 亿美元。进入 21 世纪后，这些数字又有所增长。2000 年为 3.431 亿美元，2004 年为 7.179 亿美元。这些资金大多数由两大主要候选人花费。2000 年，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什花费了巨额的 1.8592 亿美元，而他的民主党对手阿尔·戈尔花费了 1.2003 亿美元。四年后，布什花费了 3.4526 亿美元，而约翰·克里仅花费了 3.1003 亿美元。

其他选举活动同样花费巨大。2000 年，美国众议院的获胜候选人平均花费 81.6 万美元，而获胜的参议员平均花费 700 万美元。即使是地方选举也需要大量的筹款。例如，一位伊利诺伊州众议院的候选人筹集了超过 65 万美元，而另一

位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候选人筹集了 73.7 万美元。在英国，类似的巨额支出也让人咋舌。在 2001 年的大选中，工党总共花费了约 1094 万英镑，保守党花费了约 1275 万英镑，而（排名第三的）自由民主党则花费了约 136 万英镑。

要筹集这些资金，就需要寻找并讨好富有的捐赠者，换句话说，就是承诺他们的利益将得到积极地照顾。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小额捐款筹集大量资金，但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的。要筹集 100 万美元，你需要说服 50 个百万富翁每人捐赠 2 万美元，或者说服 2 万人每人捐赠 50 美元。考虑到对富人来说，2 万美元几乎是零花钱，所以政客们显然更倾向于争取少数富人，而不是多数普通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大公司和大企业。集中精力争取少数富有的个人或公司，比争取众多普通选民，来得更加高效且节省时间和精力。

显而易见：谁出钱，谁说了算。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这意味着富人和商界。美国的公司竞选捐款和政策回报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部分大额竞选捐款，毫不奇怪，来自公司。为候选人捐赠大额资金的富裕个人，大多数是 CEO 和公司董事会成员。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许多公司会同时向多个政党捐款。

毫无疑问，企业和富人期待他们的投资能得到回报。这一点在乔治·W·布什政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竞选活动一直依赖于能源行业（从他担任德克萨斯州州长时起，这些行业就开始支持他）。那时臭名昭著的安然公司(Enron)（及其 CEO 肯尼斯·雷），是布什 2000 年竞选活动中的最大捐款者之一。上台后，布什推动了许多有利于该行业的政策（比如在全国范围内放松环保法规，就像他在德克萨斯州所做的那样）。他在华尔街的支持者，也没有惊讶于布什试图将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信用卡公司看到共和党在 2005 年对破产人群施加更大压力，也感觉不奇怪。通过资助布什，这些公司确保政府推动他们的利益，而非那些投票选举的人民利益。

这意味着，正如所说的，“由于资源和决策权在社会中的分配……政治阶层和文化管理者通常会与主导私人经济的部门联系在一起；他们要么直接来自这些部门，要么期望加入其中。” [乔姆斯基，《必要的幻想》，第 23 页] 这一点可以从乔治·W·布什在 2000 年总统选举期间，一次精英募款宴会上的一句俏皮话中看出：“这真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体——富有者和更富有者。有些人称你们为精英；我称你们为我的支持者。” 不出所料：

“在现实世界中，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掌握资源的群体决定的，最终是因为这些群体拥有和管理私人经济，或是因为他们是富裕的专业人士。政府行政部门的主要决策职位通常由大企业、银行和投资公司代表担任，一些主要为企业利益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因此代表的是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广泛利益，而非某个狭隘的利益群体……立法机构则更加多样，但其成员仍然大多数来自商业和专业阶层。” [乔姆斯基，《权力与意识形态》，第 116-117 页]

这并不是政治与商业之间唯一的联系。许多政客还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拥有公司股份、土地和其他形式的财产收入等。因此，他们与他们声称代表的绝大多数选民并不相似，反而更像是代表了少数富裕阶层。将这些外部收入与高薪结

合起来（在英国，议员的薪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政客们就能跻身成为那最富有的 1%。因此，我们不仅看到精英阶层共享共同利益，政客们本身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此，他们几乎无法被称为代表普通民众，反而处于一个对涉及财产立法的投票具有既得利益的立场。

一些人为这些第二职业和外部投资辩解，认为它们让政客们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从而使他们成为更好的政治家。然而，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出，那就是这些外部利益，从来不会涉及在麦当劳翻汉堡或在流水线上工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政客寻求体验普通人生活的感觉。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论点确实有其道理。这些工作和收入确实让政客与精英阶层，而非大众，保持联系。而既然国家的任务是保护精英阶层的利益，不得不承认这种与精英共享利益和收入的情况只能有助于实现这一任务！

然后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过程，那就是政客一旦离开政治，便进入企业阶层工作（特别是进入那些，他们曾宣称要代表公众监管的公司）。这一现象被称为“旋转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过程现在变得更加恶化。现在，许多高级政府官员，直接来自强大公司的高管办公室。游说者被任命为曾经试图影响的职位的负责人。那些负责监管的人与那些被监管的，几乎变得无法区分。

因此，政客与资本家密切相连。财富选择他们、资助他们，并在他们任职期间为他们提供工作和收入。最后，一旦他们离开政治，常常会获得企业界的董事职务或其他工作。难怪资本阶级能够保持对国家的控制。

这还不是全部。财富壁垒也间接地发挥作用，其形式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大公司和精英阶层能够借此游说政客。在美国，华盛顿拥有一大批近 24,000 名注册游说者，这些游说者代表着企业利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这些游说者的工作就是说服政客们以某种方式投票，以推动他们公司客户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将政治议程倾向于商业利益。这个游说行业相当庞大，且几乎完全为大企业和精英阶层服务。财富，确保了资源的平等获取机会和影响政治进程的能力，被少数人垄断：“那些为普通公民利益而奋斗的反向游说组织在哪儿？那些为他们利益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去哪儿了？可惜，它们根本没有出现。” [Joel Bakan, 《公司》, p. 107]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最终是由普通民众来投票选举政治人物。这时，财富的间接影响便开始显现，特别是媒体和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 PR）行业的作用。如我们在 D.3 节中讨论的，现代媒体由大企业主导，毫不意外地反映了他们的利益。这意味着媒体对选民如何看待政党、特定政治人物和候选人，有着重要影响。一个激进派政党，最好情况下会被资本主义媒体忽视，最坏的情况则是受到诽谤和攻击。这将对其选举前景产生负面影响，且会迫使受影响的政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应对负面媒体报道。公共关系行业也产生类似的影响，尽管它的优势在于无需表现得如实或公正。再加上精英和企业资助的“智库”影响，政治体制天平的倾向性就显而易见，始终偏向资本阶级（见 D.2 节）。

简而言之：

“商业阶级通过资助政治竞选、购买高价游说者、以及奖励前政府官员以高薪职位，完全主导了政府。[政治人物]完全依赖于这些公司资金，支付新兴的职业阶层，包括公关顾问、市场营销人员和社会科学家——他们管理和推广事业和候选人，这些基本上与广告宣传卖车、时尚、药品和其他商品的方式类似。” [John Stauber 和 Sheldon Rampton, 《有毒污泥对你有益》，第 78 页]

这就是第一个壁垒，财富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成为有效的民主障碍，因此，通常它自身就足够强大。然而，有时人们能透过媒体的扭曲，投票给改革派甚至激进派候选人。正如我们在 J.2.6 节中讨论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竞选公职的最终效果，是将相关政党逐渐去激进化。革命党变成改革党，改革党则最终维护资本主义，并引入与其承诺相反的政策。所以，虽然激进党派不太可能被选上并且在过程中保持激进，但也不是不可能。即使这样一个党派真的进入了政府，剩下的两个壁垒将开始发挥作用：官僚壁垒和资本壁垒。

国家官僚机构的存在，是确保国家保持作为统治阶级的“警察”的关键特征；我们稍后将在 J.2.2 节（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把选举当作改变手段）中，详细讨论。简单来说，选举上任的政治人物相对于国家官僚机构处于劣势。后者是一个永久性的权力集中体，而前者则随时更迭。因此，官僚机构有能力通过官僚惯性，来制服任何的反叛政府，歪曲和隐藏必要的信息，并将自己的议程强加给那些理论上是他们上司、但实际上依赖于官僚机构的政治人物。更不用说，如果一切都失败了，国家官僚机构还可以打出最后的王牌：军事政变。

这种威胁在许多国家中得到了应用，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发展中国家（通常借助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帝国主义）。伊朗（1953 年）和智利（1973 年）的政变，就是这一过程的两个例子。然而，所谓的发达国家也并非免疫于此。意大利、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可以看作是军事政变的变种（尤其是西班牙，在那里法西斯主义是由军方强行推行的）。富有的商人资助了准军事力量来打击工人运动，这些力量由退役军人组成。甚至美国的新政也曾受到过类似政变的威胁。[Joel Bakan, 同上，第 86-95 页] 虽然这些政权保护了资本的利益，因此得到了资本的支持，但它们对资本主义而言也存在问题。正如最初推动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一样，这种政府也可能会有自大情结。这意味着军事政变，只会在最后动用资本壁垒并且失败时，才会发生。

资本壁垒显然与财富壁垒相关，因为它与巨大财富所产生的权力有关。然而，它在应用上有所不同。财富壁垒限制了谁能进入公职，而资本壁垒控制了进入公职的人。换句话说，资本壁垒是一种经济力量，能够施加于任何采取资本家阶级不喜欢政策的政府。

我们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来感知其影响力，例如“市场”对政府、政策和法律变化“表示欢迎”。在 1992 年，美国最富有的 1% 家庭（约 200 万成年人）拥有 35% 的股票，而前 10% 拥有超过 81% 的股票——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市场“意见”实际上代表的是国家人口中最富有的 1-5%（及其财务专家）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他们对投资和生产的控制。考虑到美国底层 90% 人口的投资资本比例仅为 23%，而最富有的 0.5% 拥有 29%，股票的所有权更为集中（前 5% 拥有 95%

的股份)，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 Doug Henwood 认为股市是“非常富有的阶级拥有整个经济生产资本”的方式，是“政治权力”的来源，也是影响政府政策的手段。[《华尔街：阶级勒索》]

机制非常简单。资本能够进行资本外流（资本撤资）并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使国家成为其仆从的强大武器。公司和精英们可以选择在国内或国外投资，参与货币市场投机等。如果大量投资者或公司失去对政府的信心，他们会只需要停止国内投资，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国内的普通民众会感受到这一结果，需求下降，裁员增加，经济衰退随之而来。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

“在资本主义民主中，必须满足的是资本家的利益；否则就没有投资、没有生产、没有工作，也没有可以哪怕稍微满足大众的需求的资源。”[《Turning the Tide》，第 233 页]

这确保了精英对政府的控制，因为私人权力所认为不受欢迎的政府政策，将很快被推翻。所谓的“商业信心”对政治体系的影响，确保了民主臣服于大企业膝下。正如马拉特斯塔总结的那样：

“即使是普选制——我们可以说，即使更甚于普选制——政府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仆人和**宪兵**。如果政府表现得可能采取敌对态度，或者民主可能不再是欺骗人民的伪装——资产阶级会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将迅速反应，并会凭借其财富动用所有影响力和力量，将政府召回其作为资产阶级宪兵的位置。”[《无政府主义》，第 23 页]

正是由于这些障碍，国家虽然在理论上是一个民主制度，但仍然是资本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机器仍然是少数人通过剥削多数人来丰富自己的工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免于受到大众压力的影响。远非如此。正如[上一节](#)所示，被压迫者的直接行动已经迫使国家实施了重要的改革。同样，出于捍卫社会免受脱缰的资本主义负面影响的需要，国家也可能通过民粹主义措施（特别是在替代方案可能比允许改革更糟糕时，例如发生革命）来推动改革。关键在于，这些改变并不是国家的自然职能。

因此，由于他们的经济资产，依赖这些资产获取收入的精英——即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和地主，能够从他们剥削的人群中积累巨额财富。这将社会分化为一个经济阶级的等级体系，顶端是少数拥有财产的精英，底端是没有财产的多数人，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然后，由于选举以及游说或贿赂立法者，需要巨大的财富，拥有财产的精英能够通过“金钱的力量”控制政治过程——进而控制国家。总之：

“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能从富裕阶层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正如它无法解放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化……至少，没有哪个民主国家会危及商业企业的角色。只有富人和有钱人，才能够发起可行的竞选活动并担任这样的职位。在民主制下，政府的变化不过是从一个精英集团到另一个精英集团的轮换。”[哈罗德·巴克利，《同上》，第 47 页]

换句话说，精英通过巨大的财富差距控制政治，从而确保了这些差距的延续，也就确保了精英的控制地位。通过这种方式，顶端的关键政治决策免受底层人民的重大影响。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障碍并非偶然产生，而是源于国家结构的安排。通过有效地削弱群众的权力，并将权力集中到组成政府的少数人手中，国家的本质确保了它始终处于精英控制之下。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资产阶级就支持集权化的原因。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节中讨论这一点。

（关于统治精英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参见 C. Wright Mills 的《权力精英》[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参见 Ralph Miliband 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基础书籍，1969]和《分裂的社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G. William Domhoff 的《谁统治美国？》[普伦蒂斯霍尔，1967]；以及《现在谁统治美国？1980 年代的观点》[塔奇斯通，1983]）。

B.2.4 国家集权是如何影响自由的？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每隔四年左右投票选举一个高度集权和官僚化机器的公众代表，就意味着普通人控制着国家，并因此是自由的。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在任何一个中央集权的权力体系中，普通民众对于影响自身事务的决策几乎没有发言权，因此，他们的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当然，指出这一观点的错误性，并不意味着自由共和制与法西斯或君主制国家之间没有区别。事实远非如此。选举权是人民从统治者手中争取来的重要胜利。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有在赢得普选权之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才成为可能，或者可以通过普选实现。事实也远非如此。我们只是指出，能够选择统治者，相较于被强行赋予统治者而言，确实是一种进步。此外，既然某些人被认为有能力选择他们统治者，那么逻辑上，他们也应当有能力不受统治。

然而，在民主国家中，尽管人民被宣布为“主权者”，但实际上他们却将自身的权力让渡出去，把对自己事务的控制权交给了一小批人。换句话说，自由被简化为每四到五年仅有一次的机会，来“选择统治者”，而这些统治者的职责是“可以对任何事务立法，并使其决定成为法律。” [彼得·克鲁泡特金，《一个反叛者的话》，第 122 页、第 123 页]

换句话说，代议制民主既不是“自由”，也不是“自我管理”。它的本质在于将权力转移给少数人，而这些人随后便以你的名义进行（暴政）治理。任何其他的理解都是无稽之谈。因此，尽管我们可以选择一位政治家来以我们的名义执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任何实质意义上代表投票给他们的人。事实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代议制”政府可以在无视大多数人意见的同时，仍然高谈阔论地赞美自己正在践踏的“民主”（英国的新工党(New Labour)在入侵伊拉克前夕的表

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①）鉴于政治家一旦当选，便可以在接下来的四到五年内随心所欲地行动，因此，仅凭选票来实现人民的控制，显然既无效、也毫无实际意义。

事实上，这种“民主”几乎总是意味着，选出的政客在反对派面前嘴上说一套，执政后做另一套。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会在合适的时候忽视自己的竞选纲领；而最坏的情况，则是推行与其竞选承诺完全相反的政策。这是一种这样的“民主”：即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某项政策，他们的“代表性”政府依然可以无视他们的声音（与此同时，这些代表却极力维护企业利润和权力，并用陈词滥调安抚选民，让他们勒紧裤腰带）。充其量，我们只能说民主政府往往比其他形式的政府压迫性稍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等同于自由。

国家集权正是确保这种局面得以维持，并导致自由被不断贬损的机制。

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即便其高层官员是经选举产生的，也都带有专制和集权的特征。权力集中在中央（或顶层），这意味着社会变成了“一个由外部强加的、服从于中央集权观念的一堆尘埃。”[由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所著，马丁·布伯在《通往乌托邦之路》中引用，第 29 页] 因为一旦当选，高层官员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而在所有官僚体系中，许多重要决策实际上都是由非民选的官员做出的。这意味着，“民主国家”本质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在民主国家中，通过所谓的多数票选举统治者是一种欺骗伎俩，使个人误以为自己掌控了局势。他们选择某些人来为自己执行任务，但他们并无法保证这些任务会按自己的意愿执行。他们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这些人，赋予他们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强加自身意志的权利。选举公职人员无异于在压迫者之间做出有限的选择……议会民主本质上是寡头政治，只是让大众误以为自己已将全部权力委托给议员，让他们按自己的判断行事。”[由哈罗德·巴克莱所著，Op. Cit.，第 46-47 页]

中央集权的本质在于将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代议制民主正是基于这种权力委托的原则，选民投票选出他人来统治自己。这必然会导致自由受到威胁——普选“并不能防止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政治阶层，虽然法律上他们并不享有特权，但由于他们专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最终会演变为某种政治贵族或寡头集团。”[巴枯宁，《巴枯宁政治哲学》，第 240 页]

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建立一个国家，就是将权力制度化，使其成为一个独立于人民之外的机器。它意味着统治和政策制定的职业化，意味着创造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官僚、代表、委员、立法者、军队、警察，乃至无穷无尽

^① 译注：英国新工党，是英国工党在 1990 年代到 2010 年的一段时期。其修改党章，放弃国有化观念，接纳市场经济，试图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新工党在选举中打出这一“新”的旗号，宣称强调社会公正与机会均等、相信自由市场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并随后在 1997 年选举上获得压倒性胜利。然而，1998 年到 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前夕及之后的战争中，时任新工党党魁托尼·布莱尔表明支持美国并提供军事援助。2003 年 3 月，在有超过一百万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情况下，新工党率领的英国政府则直接宣称参加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行动。英国在伊拉克的干涉引发了公众的抗议，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运动。

的其他机构)。无论这一集团最初多么弱小或怀有怎样的善意，最终都会发展出自身独立的腐败力量。” [由默里·布克钦所著，《生态危机、社会主义与重塑社会的必要性》，刊于《社会与自然》，第2卷第3期，第7页]

中央集权使民主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政治决策权被交给了远在首都的职业政治家。在缺乏地方自治的情况下，人们因缺乏共同商讨、辩论和决定自身重要事务的政治论坛，而被孤立（原子化）。选举并不是基于自然的、去中心化的社群进行的，因此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个人只是群众中的又一个“选民”，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选区居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现代国家选举的模糊基础，“意在彻底废除城市、公社和各级地方的政治生活，并通过消灭所有市政和区域自治，来阻止普选权的发展。” [由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所著，马丁·布伯在《通往乌托邦之路》中引用，第29页]

因此，人民被那些宣称让他们表达自我的制度，剥夺了真正的权力。再次引用蒲鲁东的话，在中央集权的国家里，“公民放弃了自己的主权，城镇、县省乃至更高级的行政单位都被中央权力所吞噬，不再是自治机构，而只是受部长直接控制的行政办事处。”他接着写道：

“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公民和城镇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国家的掠夺行为愈演愈烈，纳税人的负担随之成比例增长。政府不再是为人民而设，相反，人民成了政府的附属。权力侵占一切，主宰一切，吞噬一切。” [由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所著的《联邦制原理》，第59页]

正如统治阶级所希望的那样，孤立无援的人们对权力并不构成威胁。这种边缘化的过程在美国历史中尤为明显。例如，城镇会议被选举机构取代，公民被降格为消极的旁观者，仅仅充当“选民”（详见下一节）。一个被原子化的选民群体，尽管政客们口口声声宣扬“自由社会”与“自由世界”的美德，却很难被视为“自由”的理想模式——毕竟，每四五年投一次票，既不能称之为“自由”，更谈不上“民主”。

群众的边缘化，是国家以及所有威权组织的核心控制机制。例如，在欧洲共同体（EC）内部，我们可以发现“EC国家间的决策机制，将权力交到了（来自内政部、警察、移民、海关和安全部门的）官员手中的无数工作组之中。高级官员……在确保各国官员达成一致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由12位总理组成的EC峰会，仅仅是内政和司法部长们达成结论时的橡皮图章。而只有在这一政府间流程完成后，议会和人民才会得到通知（而且仅仅是最基本的信息）。” [由托尼·邦扬所著的《监督新欧洲的国家》，第39页]

除了来自精英阶层的经济压力，政府还面临着由于中央集权带来的官僚体系内部的压力。国家与政府之间存在差异。国家，是一个由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组成的、永久性机构集合体，而政府则是由各种政治家组成的。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是这些长期存在的机构，而非那些来来去去的代表。正如克莱夫·庞廷（一位前公务员）所指出的，“任何国家的政治体系……其功能是进行调控，而不是根本性地改变现存的经济结构及其相关的权力关系。政治最大的幻觉，在于

让人误以为政治家有能力随心所欲地进行任何变革。” [引自《替代方案》，第5期，第19页]

因此，国家不仅使人民被边缘化，还同样使“我们的”代表被边缘化。权力不在民选机构手中，而是在官僚体系中，因此所谓的“人民控制”也就越来越失去意义。正如巴枯宁所指出的：“自由，只有在……[人民对国家的]控制是真实的情况下，才具备意义。相反，如果这种控制是虚假的，那么人民的自由同样只是一种虚构。” [同上，第212页] 国家的中央集权，确保了人民控制的虚无化。

这意味着，国家的中央集权可能成为对大多数人民自由和福祉的严重威胁。“资产阶级共和派，”巴枯宁曾经论证道，“尚未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且已被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经验所证实的事实——即任何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有组织权力，必然排除人民的自由。政治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和延续经济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劳动的剥削，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国家自然而然地与人民的自由相对立。” [由巴枯宁所著的《论无政府主义》，第416页]

因此，“无论在哪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无论为人民做了什么，无论赢得了哪些人权，这些都不是通过国会的冷静审议、总统的智慧或最高法院的巧妙裁决所实现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因为普罗大众、公民和社会运动的行动，而非宪法。”事实上，当统治阶级认为合适时，国家官员便会毫不犹豫地忽视宪法。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①，它“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南方的黑人群众性运动兴起之后才真正获得了意义……正是他们，第一次让宪法和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文字变得有意义。” [由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所著的《拒绝投降》，第69页、第73页]

这正是因为“你拥有一项宪法权利，并不意味着你就能真正享有这项权利。在现场掌握权力的是谁？是街头的警察，是学校的校长，是工作岗位上的雇主。宪法并不适用于私人雇佣关系。换句话说，宪法并不涵盖大部分的现实。”因此，我们的自由并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们公民自由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具体情境的根源与解决方案……我们的实际自由，并非由宪法或法院决定，而是由街头警察对我们的权力，或背后支持他们的地方法官决定；由雇主的权威决定；……如果我们是贫困者，由福利官僚决定；……如果我们是租户，由房东决定。”由此可见，自由与正义“取决于权力和金钱”，而非法律。这也说明了大众参与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创造了用于对抗手持警棍和枪支的警察的力量。这正是运动的本质：它们创造一种对抗性力量，以制衡那些远比宪法或法律文本更重要的现实权力。” [Zinn，同上，第84-85页、第54-55页、第79页]

正是这种大众参与，被中央集权所扼杀。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关切和权力被从普通公民手中剥夺，并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导致正式保障的自由，在人民试图行使时，却可能被当权者肆意忽视。最终，孤立的个人在面对一个集权化

^① “第十四修正案”(Amendment XIV)于1868年7月9日通过。这一修正案涉及公民权利和平等法律保护，最初提出是为了解决南北战争后昔日奴隶的相关问题。

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时，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因此，国家总是不遗余力地破坏此类民众运动和组织（甚至不惜违反自身的法律）。

显而易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指的集中化，不仅仅意味着权力在地理上的集中（如一个国家中，由一个位于特定地区的中央政府垄断权力）；也包括**权力**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类似封建制度的制度，它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即由多个封建领主组成，而非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但在地方上，权力仍然集中于少数封建领主手中，而非整个社会大众。同样，我们也可能看到一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其中，虽然中央权力较弱，但社会却由无数个专制的企业构成。因此，仅仅废除中央权力（比如资本主义中的中央国家或专制政体中的君主），而保留地方上的威权机构（比如资本主义企业和封建地主），并不能确保自由。同理，废除地方自治，也可能只是强化中央权力，并导致自由的进一步削弱。

B.2.5 谁从中央集权中获益？

任何社会制度的存在都必然有利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中央集权，无论对国家还是企业，也都不例外。在所有情况下，中央集权直接有利于位于顶层的人，因为它将他们与下层隔离开来，使后者更易被控制和统治。因此，中央集权符合那些支持它的、官僚和政客的直接利益。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阶级的各个派别同样支持国家的中央集权。这体现了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正如后文（F.8 节）将讨论的，国家在“国有化”市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将“自由市场”强加于社会。通过将权力集中于代表手中，从而形成国家官僚体系，普通民众被剥夺了权力，因此也就更难以干涉富裕阶级的利益。正如巴枯宁所写：“在共和国中，所谓的人民，即法律上的人民，被国家所代表，他们扼杀并将继续扼杀真实的、活生生的人民”，而“官僚世界”则“为了特权有产阶级的最大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服务。[Op. Cit., p. 211]

资本主义历史上，富裕商业利益集团推动政治中央集权的例子比比皆是。“梅里尔·詹森（Merril Jensen）指出：在革命时期的美洲，‘城市政府的性质成为了激烈争论的话题’……市镇会议……‘曾是革命活动的核心’。而在美国革命后的反民主反动浪潮中，人们努力废除市镇会议制度……保守派试图建立一种‘（市政政府的）公司化形式，使市镇由从城市各区选出的市长和议会进行管理’……‘商人阶层始终支持公司化改革，以此逃避市镇会议的约束。’”[穆雷·布克钦，《走向生态社会》，p. 182]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策的制定权被从大众手中剥夺，并集中到了少数人（这些人始终是富人）手中。法国便提供了另一个例证：

“政府发现……全体家庭成员参加的群众大会‘过于嘈杂’，太不服从，因此在1787年，政府引入了选举产生的议会，由一名市长和三至六名市政官组成，而这些人皆从较富裕的农民中挑选。”[彼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pp. 185-186]

这正是通过将决策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来剥夺工人阶级权力的一部分更广泛的运动（正如在美国革命中所发生的那样）。克鲁泡特金描述了这一进程：

“中产阶级此前一直在寻求人民的支持，以便争取宪法法律，并压制高级贵族。然而，现在他们见识到了人民的力量，并感受到了其威胁，于是竭尽全力去支配人民，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再次将他们推入臣服之中。

“[…]

“他们急于立法，以确保正在从王室手中滑落的政治权力不会落入人民手中。因此……有人提议……将法国人民划分为两个阶级，其中只有一个，即‘积极公民’，才能参与政府事务；而另一个阶级，即广大民众，被称为‘消极公民’，则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国民]议会将法国划分为各个省份……但始终坚持将贫困阶级排除在政府之外……他们将广大民众排除在初级议会之外……这些人不再能够参与初级议会的事务，因此也就无权推选选举人[即选举国民会议员的人]，无权选举市政当局或任何地方行政机构……

“最终，选举议会的常设性被禁止。一旦中产阶级的官员被任命，这些议会便不得再次召开。既然这些官员已被任命，他们就不应受到过于严格的监督。很快，就连请愿和通过决议的权利也被剥夺——‘投票，然后闭嘴！’

“至于乡村……原本掌管公社事务的全体居民大会……被法律所禁止。从此，只有富农，即‘积极公民’，才有权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选举市长和市政机构，而这一机构仅由三到四名村中的中产阶级人士组成。

“城镇也被赋予了类似的市政组织……

“[因此]中产阶级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确保市政权力始终掌握在富裕阶层手中。”[《法国大革命》，第一卷，pp. 179-186]

因此，中央集权的目的在于剥夺广大民众的权力，并将其交予富人阶层。人民的权力体现在群众大会中，例如巴黎的“区会”(Sections)和“选区”(Districts)，（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它们“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并且“实行……直接自治”）[Op. Cit., p. 204 和 p. 203]，以及乡村集会。然而，国民议会“竭尽全力削弱各区的权力……[并]消灭这些革命的温床……[通过规定]只有‘积极公民’……才能参与选举和行政会议。”[Op. Cit., p. 211] 因此，“中央政府始终在努力使各区服从其权威”，国家“试图将一切权力集中于自身手中……[它]剥夺了民众组织……所有……行政职能……并在治安事务上将其置于官僚体系的管辖之下，这就意味着各区会的死亡。”[Op. Cit., vol. 2, p. 549 和 p. 552]

正如我们所见，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即富裕阶层将权力集中于自身手中（穆雷·布克钦所著的《第三次革命》第一卷，对法国与美国革命进行了详细讨论）。这一进程确保了工人阶级（即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并受制于少数人的法律和权力。而这一过程无疑最有利于掌握权力的、少数统治阶级的代表。这正是历次革命中中央集权化的基本逻辑。无论是美国、法国还是俄国，中央集权化始终被用作排除大众，使他们无法参与决定自身及其社区事务的手段。

例如，美国的建国国父明确提出了中央集权的必要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对于詹姆斯·麦迪逊来说，关键的担忧在于“多数人”控制了“人民政府”，并有可能“为其统治激情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因此，“公共利益”避开了“多数人”，而且，它并不是——正如你可能想象的那样——公众认为的“利益”（出于某种未加解释的原因，麦迪逊认为多数人能够挑选出能够识别公共利益的人）。为了防范这种情况，他主张设立共和国而不是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民“亲自集会并管理政府……这曾一直被认为与个人安全和财产权不相容。”当然，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拥有财产的人与没有财产的人，始终在社会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利益。”他的框架是确保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从而保护拥有者的利益。因此，需要“将政府权力委托给由其他公民选出的少数人”。这种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的地方集权，与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实行的领土性中央集权相互匹配。麦迪逊支持“较大共和国而非小共和国”，因为“对于纸币的狂热、对债务的废除、对财产的平等分配或任何其他不正当或邪恶的计划，在整个联盟中传播的可能性，将比在其中的某个特定成员中传播的可能性小。”[摘自《Voices of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霍华德·津恩与安东尼·阿诺夫编，pp. 109-113] 这种想要实现形式上的民主的愿望，即让大众成为事件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是资本主义中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可以参考诺姆·乔姆斯基的《制止民主》中的“力量与舆论”章节，从而得到一个全面的概述）。

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联邦和州层面上都鼓励中央集权，因为“宪法的多数制定者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不言而喻，尽管富裕的精英阶层，在制定新秩序的原则时得到了充分的代表，但四个群体却没有得到代表：“奴隶、契约劳工、女性、无产者。”显然，新国家及其宪法并未反映这些群体的利益。鉴于这些群体占据绝大多数，“不仅迫切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保护大规模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存在着对不满的农民发动起义的直接恐惧。”[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p. 90] 其中最主要的事件，是马萨诸塞州西部的谢斯起义^①。在这里，新宪法提高了投票的财产资格要求，因此，没有财富的人将不能担任州政府职务。新国家的建立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起义，保护少数富人阶层免受多数人影响。

此外，国家的中央集权与排斥民众参与，是塑造美国社会为资本主义主导社会的关键：

^① 谢斯起义（Shays' Rebellion），是1786-1787年发生的一场起义，因由前美国独立战争军官丹尼尔·谢斯领导，因此这场起义称为谢司起义。

“在美国内战前的三十年里，法律在法庭上逐渐被解读为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莫顿·霍尔维茨（《美国法的变革》）指出，当英美普通法妨碍商业发展时，它就不再是神圣的……对商人的损害赔偿判决被从不可预测的陪审团手中拿走，交给了法官……在法庭上，公平价格的古老观念，让位于买者自负其责（*caveat emptor*）的概念……合同法的目的是歧视工人阶级，偏向商业……法律的表面假象是，工人与铁路公司之间签订合同时是平等的谈判方……‘循环完成了；法律最终只是批准了市场系统所产生的不平等。’”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p. 234]

美国国家是建立在精英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并旨在（以“个人自由”为名）积极地减少民主倾向。在实践中（毫不奇怪地），富裕的精英利用国家来削弱民众文化和公共权利，以保护和扩展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在此过程中，美国社会被按照他们的形象进行改革：

“到十九世纪中期，法律体系已经被重塑，以便有利于商业和工业界的商人，而牺牲了农民、工人、消费者以及其他社会中较弱势群体的利益……它积极促进了财富在社会中对弱势群体的法律分配。” [莫顿·霍尔维茨，引用自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p. 235]

在现代，国家中央集权和扩张，与迅速的工业化及商业的增长密切相关。正如爱德华·赫尔曼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商业规模和权力的增长促使了工会抗衡的兴起以及政府的扩张。商业的庞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庞大的商业回应。” [《企业控制，企业权力》，第 188 页——另见斯蒂芬·斯科沃内克，《**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国家集权是为了创造更大、更明确的市场，并在其符合商业利益时得到了商业的支持（即随着市场的扩展，国家也在扩展，以标准化和执行财产法等）。另一方面，向“大政府”发展的这一过程，创造了一个大企业得以成长的环境（通常通过国家的补贴和保护主义来鼓励——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国家由富裕阶层掌控），同时进一步将国家权力从大众的影响中剥离，更加牢固地掌握在富人手中。我们看到这些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治理结构往往围绕着国内权力形成，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这种国内权力主要是经济权力。” [诺姆·乔姆斯基，《世界秩序：旧秩序与新秩序》，第 178 页]

国家集权使得商业更容易控制政府，确保政府保持他们的傀儡地位，并影响政治过程。例如，欧洲圆桌会议（European Round Table, ERT）是一个由“主要基于欧盟的大型跨国公司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组成的精英游说团体……[其中 1991 年]，20 家最大欧洲公司中的 11 家，合并销售额超过 5000 亿美元，约占欧盟工业生产的 60%。”该团体充分利用欧盟。正如两位研究此组织的学者所指出的，ERT “精于游说……以至于许多 ERT 的提案和‘愿景’神秘地出现在委员会的峰会文件中。” ERT “主张劳动力市场应该更加‘灵活’，主张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季节性合同、工作分享和兼职工作。1993 年 12 月，在 ERT 提出建议七年之后[且大多数国家已同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其‘社会章程’]，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白皮书……[提议]使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 [多赫提与霍德曼，《道路的骑士》，《新政治家》，1994 年 4 月 11 日，第 27 页]

目前关于全球化、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单一欧洲市场的讨论，表明了一个潜在的转型过程，其中国家的成长沿着经济增长所开辟的路径前进。简单来说，随着跨国公司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扩展，单一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经济上变得多余。随着公司扩展为跨国公司，国家也面临着压力，要求效仿并通过创建多国协议和联盟，来跨越“国家”实现市场的合理化。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的，七国集团（G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是“事实上的世界政府”，并且“跨国国家的机构通常为其他主人服务[而非人民]，就像国家权力通常所做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日益崛起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在金融和其他服务、制造业、媒体和通讯等领域。” [《世界秩序：旧秩序与新秩序》，第 179 页]

随着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突破国界，国家主义就有必要相应增长。此外，“日益崛起的、事实上的治理机构的一个特别宝贵的特点，是它们免受大众影响，甚至是公众意识影响。它们在秘密中运作，创造了一个从属于投资者需求的世界，公众被‘置于其中’，民主的威胁被减少。” [《世界秩序：旧秩序与新秩序》，第 178 页]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希望一切都由国家中央集权管理。事实上，尤其是在社会问题方面，相对的分权通常更受青睐（即将权力交给地方官僚），以增加商业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通过将控制权下放到地方，跨国公司、投资公司等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成比例增加。此外，即便是中型企业也能参与其中，影响、制约或直接控制地方政策，并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来压低工资。私人权力可以确保“自由”的安全——他们的自由。

不管选择哪类官僚阶层，资本家对集权化社会权力的需求，进而边缘化大众——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需要记住，资本家之所以反对“庞大政府”，往往是因为财政方面的原因，因为国家依赖可用的社会剩余，而减少剩余会让市场分配给各资本家竞争的份额更少。

实际上，资本家反对“庞大政府”是因为其对社会项目的支出，特别是那些旨在帮助贫困和工人阶级的“非法”功能——这些支出“浪费”了可能流向资本的部分剩余（同时也使人们变得不那么绝望，因此不太愿意廉价工作）。因此，资本家不断推动将政府缩小到其“经典”角色，即保护私人财产和维护体制，除此之外几乎不做其他事。除了他们与福利国家的表面争执外，资本家是政府（以及“正确”形式的国家干预，如国防开支）的，最坚定支持者，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可以证明：尽管政治家们一直在抱怨“国库里没有钱”用于奖学金、国民健康管理或贫困福利，但是用于建造更多监狱，或派遣部队到国外推进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资金——却总是能在哪里找到。

国家集权确保了“尽管平等主义原则已在其政治宪法中体现，但实际上治理的仍然是资产阶级。人民，工人和农民只是在遵守由资产阶级制定的法律”，而且“资产阶级实际上拥有——尽管不一定是合法的——独占的治理特权。”这意味着“政治平等……不过是一个幼稚的虚构，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而要假设

富人“即使经济和社会存在的条件与人民相隔如此遥远的情况下”，也能“在政府和法律中表达人民的感情、想法和意志”，这需要极大的信念。毫不奇怪，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立法还是政府运作中，资产阶级总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本能行事，几乎不顾人民的利益。”因此，虽然“在选举日，即便是最骄傲的资产阶级成员，如果有任何政治野心，也不得不向……主权人民讨好。”但是“选举日后的第二天，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日常事务中”，而政治家们则可以在他们声称代表的人民名义下，毫无约束地治理国家。[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18 and p. 219]

B.2.6 国家可以成为社会中的独立力量吗？

是的，国家可以。在国家机器的力量面前，很难相信，它总是仅仅是社会中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少数群体的工具。鉴于其结构和权力，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权力来推动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本身就可能是统治阶级。

然而，在正常情况下，正如我们在 [B.2.1 节](#) 中讨论的，国家是资本阶级的工具。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阶级总是“意见一致”。例如，顶级政治家是统治精英的一部分，但他们与其他部分的统治精英在竞争。此外，资本阶级的不同部门之间也为利润、政治影响力、特权等展开竞争。马拉塔斯塔(Malatesta)认为，资产阶级“总是在彼此之间开战……因此，有时的摇摆、策略、让步与撤退，尝试从民众中寻找支持者反对保守派，或在保守派中寻找支持者反对民众。”[Anarchy, p. 25] 这意味着统治阶级的不同部分，将根据自身的利益聚集在不同的政党周围，这些政党将寻求获得权力以推动这些利益。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与资本家阶级的其他部分发生冲突。国家，正是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

考虑到国家的角色是确保资本**整体**的最佳条件，这意味着，必要时，国家会与资本阶级的某些部分的利益对立。为了履行这一职能，国家需要站在单个资本家或公司的上方。这就是国家为何能够呈现为一个中立的社会机构，并欺骗人民认为，它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然而，这种关于单个资本家方面的中立性，仅仅是其作为资本工具角色的表现。此外，如果没有来自成功企业的税收，国家将会削弱；因此，国家与资本家之间，存在为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争夺的竞争。所以，大企业的反国家言论，往往能够欺骗那些未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人。

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

“商业利益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一方面，商业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规范无序的市场，向企业提供服务 and 补贴，增强并保护进入外国市场和资源的机会，等等。另一方面，商业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竞争者，特别是一个可能响应不同的利益，特别是民众利益，并实施无论是在收入还是权力方面，具有再分配效果的政策。” [Turning the Tide, p. 211]

因此，国家常常与资本阶级的某些部分发生冲突，就如同资本阶级的某些部

分利用国家推动自身利益，但这种行为是在保护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的（即，统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国家的角色是平和地解决这一阶级内的争端。在现代资本主义下，这通常是通过“民主”过程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机会选择那些压迫我们最少的精英代表）。

这种冲突有时会给人一种国家是“中立”体系的印象，但这其实是一种幻觉——它存在的目的是捍卫阶级的权力和特权——但到底捍卫哪个阶级的利益，是可以变化的。尽管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国家保护社会中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和地位，但他们也认为，由于国家的等级性质，它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国家视为社会中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工具。因为其结构，国家有其自身的动态，这些动态会产生属于自己的阶级、阶级利益和特权（这也使得它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脱离经济统治阶级的控制，追求自身利益）。正如马拉塔斯塔所言：“政府，尽管起源于资产阶级并充当其仆人和保护者，但像所有的仆人和所有的保护者一样，它趋向于实现自己的解放，并支配它所保护的對象。” [Op. Cit., p. 25]

因此，即使在像资本主义这样的阶级制度中，国家也能够独立于统治精英行事，并且有可能反对他们的利益。由于国家的角色之一是调解个别资本家/公司之间的关系，它需要足够的权力来驯服这些资本家/公司，这要求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它通常捍卫其利益的阶级。而这种独立性可以被用来推动国家自身的利益，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损害资本阶级的利益。如果资本阶级处于弱势或分裂的状态，国家就可以处于有利的位置，使它可以之于经济支配地位的精英，去行使自治；利用通常对单个资本家应用的工具，反对整体资本阶级，从而推动其自身的利益和权力。

这意味着，国家不仅仅是“资本的守护者”，因为“它有自身的生命力，并构成……一个与其他阶级截然不同的社会阶级；而这个阶级有自己特有的寄生性和高利贷性质的利益，和国家所声称代表的整个社会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国家，作为社会最大物质和物理力量的储存者，掌握着太多的权力，无法仅仅充当资本家的看门狗。” [路易吉·法布里 (Luigi Fabbri)，引用自大卫·贝里 (David Berry)，《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史，1917-1945》，第 39 页]

因此，国家机器（和结构），尽管其现代形式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但不能被视为是多数人可以利用的工具。这是因为“国家，任何国家——即使它以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形式出现——本质上是建立在支配和暴力的基础上的，即建立在专制之上——这是一种隐蔽但同样危险的专制。” 国家“意味着权力、权威、支配；它实际上预设了不平等。” [《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 211 页和第 240 页] 因此，国家有其自身特定的逻辑、优先事项和动力。它构成了一个独立于经济阶级权力的权力中心。因此，国家可以超越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控制，它也不必反映经济关系。

这正是由于国家的等级化和集中的性质，它赋予了那些控制国家机器的少数人权力——“每一个国家权力，每一个政府，其本性就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外并高于人民，必然使人民服从于一个与人民的真正需求和愿望相背离的组织和目

标。”如果“整个无产阶级……[都是]政府的成员……那么就不会有政府，也不会有国家，但如果必须存在国家，那就会有被统治者和奴隶。”[Bakunin on Anarchism, 第 328 页和第 330 页]

换句话说，国家的官僚体制本身就是直接的压迫者，并且可以独立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存在。正如巴枯宁在预言中所说：

“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了什么？国家始终是某些特权阶级的遗产：僧侣阶级、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最后，当所有其他阶级都已经耗尽时，官僚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然后，国家就会堕落，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它将上升到机器的地位。”[《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 208 页]

这并不奇怪。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家组织……[是]少数阶级用来建立和组织他们对大众的权力的力量。”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少数阶级必须是一个社会中主导经济的阶级。国家是“为了地主制、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利益而建立的上层建筑。”[《进化与环境》，第 82 页和第 105 页] 因此，我们不能假设废除这一“邪三一”中的一个甚至两个就能带来自由，也不能假定这三者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有着完全相同的利益或权力。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地主阶级可以将其利益置于资本阶级之上（反之亦然），而国家官僚体制，则可能以两者的代价不断壮大。

因此，重要的是要强调，国家所捍卫的少数群体的利益，不一定是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尽管通常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祭司、军事集团或官僚体制，都可以成为统治阶级。这意味着国家也可以有效地取代经济主导的精英阶级，成为剥削阶级。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本身具有（阶级）利益。

正如我们在 H.3.9 节中更详细讨论的，不能仅仅将国家视为（经济）阶级统治的工具。历史上有许多社会表明，国家**本身**就是统治阶级，而没有其他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阶级存在。苏联俄国的经验验证了这一分析。俄国革命的现实，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国家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工人阶级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来统治社会”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相较于“工人阶级可以运作，并将社会按自己的利益转变”的工具，俄国革命所建立的新国家很快成为了它所声称代表的阶级的压迫力量（更多内容参见 H.6 节）。工人阶级不再是被资本家阶级压迫和剥削，而变成了被新国家和其官僚体制压迫和剥削。这一切并非偶然发生。正如我们在 H.3.7 节中讨论的，国家已经演变出了某些特征（如中央集权、委托权力等）。这些特征，确保了它作为少数阶级统治执行者的任务得以实现。保留这些特征，必然要意味着保留它们被创造出来时所服务的任务。

因此，简而言之，国家的角色是压迫工人个体和工人阶级整体，以服务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少数阶级/阶层以及其自身的利益。它是“一个由地主、军事指挥官、法官、祭司，后来还有资本家之间相互保险的社会，为了支持他们对人民的权威，并剥削大众的贫困以使自己变得富有。”这就是“国家的起源；这就是它的历史；这就是它现在的本质。”[克鲁泡特金，《进化与环境》，第 94 页]

因此，虽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并不自动意味着它不会与它所代表的阶级的部分群体发生冲突，或者它必须是经济主导阶级的工具。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家不是保障被压迫者解放的合适工具。

B.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 反对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的三大问题之一，另外两个是等级权威和国家。今天，主导的私有财产制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会将重点放在这一体系及其财产权制度上。我们在此讨论的内容将反映这一点，但不要因此假设，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制度（比如封建主义）就是可以接受的。事实并非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有形式的财产权制度，反对任何导致多数人为少数人工作且加剧不平等的制度。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的立场基于两个相关的论点。这些论点可以通过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的格言来总结，那就是：“财产即盗窃”和“财产即专制”。用他的话说：“财产……通过排他权和增值权侵犯了平等，通过专制侵犯了自由……[并且与]抢劫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第 251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即资本主义），因为它是强制性、等级性权威，与剥削的根源，因此也是精英特权和不平等的根源。私有财产制度基于并产生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

我们将依次总结每个论点。

“财产即盗窃”是无政府主义中最著名的格言之一。实际上，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拒绝这一观点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条格言有两个相关的含义。首先，它承认地球及其资源是所有人的共同遗产，但却被少数人垄断。其次，它认为，由于这一原因，拥有财产的人剥削那些没有财产的人。这是因为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必须向拥有财产的人支付或出售劳动，以便获得他们生活和工作的资源（例如工作场所、机器、土地、信用、住房、专利下的产品等——见 [B.3.2 节](#) 以了解更多讨论）。

正如我们在 [B.3.3 节](#) 中所讨论的，这种剥削（盗窃）源于工人没有拥有或控制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因此，在工作时间内他们被拥有这些生产资料的人所支配。这种控制劳动的异化，将工人置于雇主的控制之下，雇主在此时能够剥削工人的劳动——使工人生产的价值超过他们所获得的工资。这正是为什么雇主雇佣工人的原因。将这一点与租金、利息和知识产权结合，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维持下去的秘密，因为这些制度都允许巨大的财富不平等继续存在，并使世界的资

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然而，劳动是不能被异化的。因此，当你出售劳动力时，你实际上是在出售自己、你的自由，为期是这段时间。这引出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的第二个原因，即私有财产产生了威权的社会关系。对于所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财产是作为权威、实际上是作为专制的来源而被反对的。引用蒲鲁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话：

“拥有者、强盗、英雄、主权者——这些称号都是同义词——他把自己的意志当作法律强加，并不容许反驳或控制；也就是说，他假装自己同时是立法和执行的权力……[因此] 财产滋生专制……这正是财产的本质，要想相信这一点，只需记住它是什么，并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财产就是使用和滥用的权利……如果货物是财产，为什么拥有者就不能是国王，而且是专制的国王——根据他们的**财力**（*facultés bonitaires*）来做国王呢？如果每个拥有者在其财产范围内是至高无上的领主，是自己领域中的绝对国王，那么拥有者的政府怎么可能不是混乱和困惑的呢？”[《什么是所有权》，第 266-267 页]

换句话说，私有财产是小型的国家，财产所有者充当其财产上的“至高无上的领主”，因此他们是使用该财产者的绝对国王。就像任何君主制一样，工人是资本家的臣民，在他们的财产上必须遵循他们的命令、法律和决定。这显然是对自由的完全否定（我们还可以提到，这也是对尊严的彻底否定，因为必须服从命令是屈辱的）。因此，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必然排除那些使用而非拥有生活资料的人参与、影响和控制。

当然，私有财产确实为财产所有者提供了一个不受外界干预的决策空间——但仅限于财产所有者。对于那些不是财产所有者的人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在完全的私有财产制度下，这并不会保证他们拥有任何类似的自由空间。他们唯一的自由，就是选择去把自己的自由，卖给哪个拥有私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如果我被赶出一块私有财产，我还能去哪里？哪里都不能，除非另一个所有者同意允许我进入他们的私有财产。这意味着，在我能站立的每一处地方，都是我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不能站立的地方，因此，我的存在仅仅依赖于财产所有精英的宽容。因此，蒲鲁东说：

“正如平民曾经通过领主的慷慨和恩赐拥有他的土地一样，今天工人通过主人和财产所有者的恩惠和需要拥有他们的劳动。”[《什么是所有权》，第 128 页]

这意味着，私有财产社会不仅没有提供独立的空间，反而使得没有财产的人完全依赖于那些拥有财产的人。这确保了他人劳动的剥削发生，并且一些人会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这与财产捍卫者所承诺的完全相矛盾。考虑到他们所捍卫的财产的性质，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我们的对手……习惯于通过声明财产是自由的条件和保障，来为私有财产辩护。

“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们不是一再地说贫困就是奴役吗？”

“那么，为什么我们反对他们呢？”

“原因很明确：实际上，他们捍卫的财产是资本主义财产，即让拥有者能够通过他人的劳动生活的财产，因此依赖于一类被剥夺和无家可归的阶层，他们被迫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工资，将劳动卖给财产所有者……这意味着工人被迫处于一种奴役状态，尽管它的严酷程度有所不同，但始终意味着社会上的低下、物质上的贫困和道德上的堕落，并且是今天社会秩序所有弊病的根源。”[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革命》，第 113 页]

当然，可能会有人反驳说，没有人强迫工人给特定的老板工作。然而，正如我们在 [B.4.3 节](#) 所讨论的，这种说法，虽然是事实，但却忽略了关键点。虽然工人并不是被迫为某个**特定的**老板工作，但他们必然得为某个老板工作。这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其他生存的方式——所有其他经济选择都被国家的强制手段剥夺了。最终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出卖给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因此，劳动者“已经出售并放弃了他的自由”给老板。[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第 130 页]

因此，私有财产在社会中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使少数人在工作时间支配多数人。这种生产关系本质上是威权主义的，体现并延续了资本主义阶级制度。一旦你走进工厂大门或办公室门口，你就失去了作为人类的基本权利。你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也没有结社权。如果你被要求在进入家门时忽略你的价值观、优先事项、判断力和尊严，并将它们留在门外，你自然会认为那是暴政，但这正是你在工作时间所做的事情——你作为工人，完全没有发言权。你可能与一匹马（如约翰·洛克的比喻——见 [B.4.2 节](#)）或一台机器，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因为无政府状态是“没有主子，没有主权者”[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第 264 页]，他们用资本主义的本质称呼它，那就是**工资奴隶制**！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同意卢梭的下述观点，他曾说：

“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围起来，想要说‘这是我的’，并找到了足够愚蠢的人相信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社会的创始人。人类曾经可以避免多少罪行、战争、谋杀，多少痛苦和恐怖，如果有一个人，在拔掉栅栏或填埋沟渠时，大声对他的同胞说：‘小心听这个骗子的话；你们会迷失的，如果你们忘记了大地的果实属于所有人，而大地属于任何人’。”[“论不平等”，《社会契约论》与《论演讲》，第 84 页]

这解释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它的两个主要特征是“私有财产”（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国有财产——见 [B.3.5 节](#)），以及因此产生的雇佣劳动、剥削和权威。此外，这种制度需要一个国家来维持，因为“只要在社会中存在拥

有财产的群体与没有财产的群体彼此敌视，那么国家对于拥有特权的少数群体的保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鲁道夫·罗克，《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1页] 因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在有国家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能够利用的有组织的强制力机制（见 [B.2 节](#)）。

此外，应该很容易看出，资本主义通过产生一种意识形态上不可剥夺的私人财产“权”，将迅速导致外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又将导致有产者与无产者在相对谈判地位上的进一步不平等。尽管资本主义的辩护者，通常试图通过声称“自我所有权”是一种“普遍权利”来为私人财产辩护（参见 [B.4.2 节](#)——“[资本主义建立在自我所有权之上吗？](#)”），但显然，资本主义实际上使得“自我所有权”这一概念所隐含的普遍自治（因为“自我所有权”概念的吸引力源于人们不被当作手段，而仅仅作为目的本身）的理想，变得不可实现。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却破坏了自治和个人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使用“自我所有权”这一术语作为其进行这一破坏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如 [B.4 节](#)所述，大多数人通常会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他们最好的选择，是让自己被用作那些与真正的自我所有权——即赋予个体自治的概念——根本不兼容的方式。

只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才能继续肯定自我所有权所承诺的有意义的自治和个人自由，同时构建保障这些自由的条件。只有通过废除私人财产，才能让所有人都能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从而使得自我所有权所承诺却无法兑现的自治，成为现实，进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普遍的自我管理。

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反自由意志主义方面之前，有必要明确“私人财产”与“个人财物”之间的区别，并更详细地说明，为什么前者需要国家保护并且是剥削性的。

B.3.1 私人财产与占有物之间有什么区别？

无政府主义者将“私人财产”（简称“财产”），定义为由国家保护的对某些物品或特权的垄断，这些物品或特权用于控制和剥削他人。而“占有物”，则是指拥有那些不用于剥削他人的物品（例如一辆车、一台冰箱、一把牙刷等）。因此，许多物品可以根据其使用方式的不同，被分别视为财产或占有物。

总结来说，无政府主义者支持这种财产：“不能用来剥削他人——即我们从小积累的个人物品，这些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个人占有物”。我们反对那种“只能用来剥削他人”的财产——即土地和建筑物、生产工具和分配工具、原材料和制成品、货币和资本”。[Nicholas Walter, *About Anarchism*, p. 40] 作为一个经验法则，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那些由少数人拥有，却由他人使用的财产。这导致前者控制后者，并利用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无论是直接地，如雇员；还是间接地，如租户）。

关键在于，“占有物”根植于“使用权”或“使用收益权”概念，而“私人财产”则植根于使用者与所有权的分离。例如，一个人居住的房子是占有物，而如果将其出租并从中获利，它则变成了财产。类似地，如果一个人使用锯子以自雇木匠谋生，那么锯子是占有物；而如果一个人雇佣他人按工资使用锯子为自己谋取利润，它就是财产。不言而喻，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其中工人听从老板的指挥，就是“财产”的例子，而一个合作社，工人管理自己的工作，就是“占有物”的例子。用蒲鲁东的话说：

“财产拥有者是一个人，他对一种生产工具拥有绝对控制权，声称有权享用该工具的成果而不亲自使用它。为此，他将其出租。” [Op. Cit., p. 293]

虽然最初可能会觉得区分这两者有些混乱，但理解这一点对于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非常有用。资本家往往将“财产”这个词，用于从牙刷到跨国公司等各种事物——但这两者完全不同，且会对社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因此，蒲鲁东指出：

“最初‘财产’(*property*)一词，与‘专有的’(*proper*)或‘个人的占有’(*individual possession*)同义。它指的是每个个人对某物的使用权。但当这种使用权...变得活跃且至高无上——也就是说，当使用者将自己对物品的个人使用权，转变为通过他人劳动来使用物品的权利时——那么财产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概念也变得复杂。” [Op. Cit., pp. 395-6]

蒲鲁东通过将情人比作占有者，丈夫比作财产所有者，生动地阐明了这一区别！正如他强调的那样，“财产的双重定义——支配和占有——至关重要；为了领悟”无政府主义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就必须清晰理解（这一点）”。因此，尽管有人可能会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蒲鲁东所言，“如果我们将‘财产’这个词保留给前者（占有物），那么我们必须称后者（财产的支配）为抢劫、不满、强盗行为。如果我们反过来，将‘财产’一词保留给后者，那么我们必须用‘占有物’或其他相等的词来指代前者；否则，我们将面临一个令人不悦的同义词问题。” [Op. Cit., p. 65 and p. 373]

财产与占有物之间的区别，可以从它们各自产生的权力关系类型中看出。以资本主义工作场所为例，显然是那些拥有工作场所的人决定工作场所的使用方式，而不是那些实际工作的人。这导致了几乎是极权主义的系统。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的，“‘极权’这个词是相当准确的。没有任何人类机构能像商业公司一样接近极权主义。我是说，权力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你可以在其中的某个位置，你从上接受命令，然后再传下去。最终，它掌握在拥有者和投资者手中。”因此，实际的生产者无法控制自己的活动、劳动的产品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生产手段。在现代阶级社会中，生产者处于服从那些实际拥有或管理生产过程的人之下。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正如所述，实际使用被视为唯一的所有权凭证。这意味着一个工作场所由其中的工人组织和管理，从而减少等级制度，增加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因此，无政府主义对私人财产和资本主义的反对，自然而然地源自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因此，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蒲鲁东的观点：

“占有是一种权利；财产违背了权利。在保留占有的同时，废除财产。”[Op. Cit., p. 271]

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阐述这一区别，无政府主义“废除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私人所有制，随之而去的还有资本主义企业。个人占有仅存在于你使用的东西上。因此，你的手表还是你的，但手表工厂属于人民。土地、机械和所有其他公共设施将是集体财产，既不能买也不能卖。实际使用将被视为唯一的所有权凭证——不是所有权，而是占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p. 217]

这种对不同形式财产的分析是社会无政府主义和个体无政府主义的核心。这意味着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寻求改变人们对“何为有效的财产形式”的看法，旨在让“无政府主义观点，即占有和使用应当限制和规范土地拥有权，成为主流观点”，并确保“个人不应再因他人保护（其土地拥有权），只能保护其个人占有和耕种[即使用]土地的权利。”[本杰明·塔克，《个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p. 159 和 p. 85] 如我们在 [A.3.1 节](#)中提到的，关键的区别在于他们如何应用这一原则。

这种对占有的支持并不意味着要拆解大型组织，如工厂或其他需要大量人力运营的工作场所。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用协会的形式，作为占有原则的补充。这意味着，当多人共同工作时，应用“占有和使用”原则的结果便是联合劳动，即共同劳动的人（即共同使用特定财产的人），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直接民主的平等协会，来管理该财产和他们自己的劳动（通常简称为“自我管理”）。

这在逻辑上来源于占有理论，即“占用和使用”的概念。因为如果生产是由群体进行的，那么谁才是土地的合法占有者呢？是雇主还是他们的经理？显然都不是，因为他们在定义上占有了超过自己能使用的东西。显然，参与工作的人的联合协会才是唯一合理的答案。因此，蒲鲁东的评论是，“所有积累的资本都是社会财产，任何人都不能是它的独占所有者。”“为了摧毁专制和不平等的条件，人们必须……成为协作伙伴。”这意味着工人的自我管理——“领导人、导师、监督员……必须由工人们自己从工人中选出。”[Op. Cit., p. 130, p. 372 和 p. 137]

通过这种方式，无政府主义者寻求，正如蒲鲁东所说，“废除无产阶级”，并认为我们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工业民主制必须……取代工业封建主义。”[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选集》，p. 179 和 p. 167] 因此，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以占有为基础，工人的自我管理的实践，将覆盖从最小的单人工作场所或农场，到大规模工业的各个层面（参见 [I.3 节](#)的进一步讨论）。

显然，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寻求转变和限制财产权。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将被终结，并基于占有和使用的概念引入一个新的制度。虽然这一新制度的具体性质在不同的无政府主义学派中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源自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权？》一书中阐述的无政府主义财产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戈德温在《政治正义探讨》中，在五十年前就提出了关于财产和占有之间差异的，相同观点（尽管表达方式不同），这表明这一观点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占有的核心地位。对于戈德温来说，财产有不同的种类。一

种是“每个人应有的、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然而，另一种是“无论如何建立起的体系——通过它，一个人可以支配另一个人劳动成果。”这种“财产的形式与前者直接对立”（这与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明显相似之处）。对于戈德温来说，不平等会在贫穷者中产生“奴性”的精神，而且，一个“生于贫困的人，可以说在另一个含义下，生来就是奴隶。”[《威廉·戈德温的无政府主义著作》，p. 133, p. 134, p. 125 和 p. 126]

不用说，无政府主义者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有些人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称为“占有阶级”。另一些人则倾向于使用“个人财产”而不是“占有”一词，或者使用“资本”而非“私有财产”。一些像许多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财产”一词，并在涉及土地、住房和工作场所时用“占有和使用”来限定它。然而，无论具体使用什么词语，其核心思想都是相同的。

B.3.2 国家保护哪种形式的财产？

克鲁泡特金认为，国家是“建立有利于统治少数人的垄断的工具”。[《无政府主义》，第 286 页] 在每一个阶级剥削的制度中，统治阶级控制生产资料的使用，以从劳动中提取贡赋。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在这个体系中，国家维持着各种“阶级垄断”（用塔克的话来说），以确保工人不会获得他们的“自然工资”，即劳动的全部产品。虽然一些垄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关税、国家授予的市场垄断等），但大多数垄断是在“幕后”操作，确保资本主义的统治不需要大量的暴力手段来维持。

在资本主义下，国家保护四种主要的财产或剥削性垄断：

1. 发放信用和发行货币的权力，这是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基础；
2. 土地和建筑物，这是地主制度的基础；
3. 生产工具和设备，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
4. 思想和发明，这是版权和专利（“知识产权”）的基础。

通过强制执行这些形式的财产，国家确保经济中的客观条件有利于资本家，工人只能接受压迫和剥削的合同，在这些合同中，他们放弃了自治并承诺服从，否则将面临贫困和困苦。由于这些“暴力行为”发生在任何具体合同签署之前，资本家通过我们的代价让自己变得富有，因为我们“被迫支付重税，给予财产所有者种植土地或运作机器的权利”。[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 103 页] 显然，这些条件也使自由协议成为一种讽刺（参见 [B.4 节](#)）。

这些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被视为如此正常，以至于许多人根本没有将它们视作干预。因此，我们发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在大声疾呼反对那些旨在帮助贫困者的“国家干预”时，却认为——捍卫知识产权、公司、空置地主，和资本家及其政治家设立并保持在法典上的、其他法律和税收，以扭曲劳动市场使自己受益——毫无问题（参见 F.8 节关于国家最初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讨

论)。

毫无疑问，尽管这种在控制工人阶级中的“客观”压力作用，看似微妙；工人阶级的抵抗却使得资本家始终无法摆脱国家权力的直接与间接干预。当“客观”的控制手段失败时，资本家总是转向动用国家进行镇压，恢复“自然”秩序。此时，市场的“无形的”大手被国家的显形的铁拳取代，确保统治阶级利润和权力的间接手段，被国家的更直接手段所补充。正如我们在 D.1 节中所指出的，国家干预超越了保护私有财产的范畴，这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是常态，而非例外，且这一干预是为了确保资本阶级的权力与利润。

为了说明这些国家支持的垄断的重要性，我们将简要概述它们的影响。

信贷垄断，即国家控制谁能够发行或借贷资金，限制了工人阶级创造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能力。由于贷款的高利率（这只可能在竞争受限的情况下发生），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去创建合作社或个人企业。此外，必须以高利率偿还资本主义银行的贷款，确保了合作社往往不得不通过雇佣工资劳工来维持生计，从而破坏了它们自身的原则（参见 J.5.11 节）。因此，也毫不奇怪在巴斯克地区，蒙德拉贡合作社非常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信用合作社，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一实验的成功提供了保障。

正如提高工资是资本主义内部一个重要的斗争问题，信贷问题也是如此。蒲鲁东及其追随者支持建立人民银行的理念。如果工人阶级能够接管并控制越来越多的资金，它就能削弱资本主义的权力，同时构建自己的替代社会秩序（因为货币最终是购买劳动力的手段，从而之于劳动者之上的权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蒲鲁东希望通过将信贷成本降低到最低成本（即降低到管理费用），工人能够购买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料。尽管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工人阶级获得更多的信贷，无法像提高工资那样摧毁资本主义；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到，更多便宜的信贷，就像更多的工资一样，能够让工人生活更轻松。并且工人争取这种信贷的斗争，就像争取工资的斗争一样，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工人阶级力量中发挥正面作用。立刻想到的显而易见的例子，包括工人利用资金资助他们与资本对抗的斗争，从罢工基金和武器、到通过足够高的收入定期避免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便宜信贷的机会，将为工人阶级提供比卖掉自由或面临困境更多的选择（正如提高工资和失业救济也为我们提供更多选择一样）。

因此，信贷垄断降低了（通常比资本主义公司更具生产力的）合作社对资本主义的竞争，同时通过降低劳动力需求，使所有工人的工资下降。反过来，这使得资本家能够利用失业恐惧，从员工那里榨取更高水平的剩余价值，从而巩固资本主义的力量（无论在工作场所内外）和进行扩张（增加设立成本，从而创造出由少数公司主导的寡头市场）。此外，高利率将收入直接从生产者转移给银行。信贷和货币都作为阶级斗争中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统治阶级呼吁中央银行制，并通过国家行动（从直接监管货币本身，到通过操控利率管理货币流动），应对资本主义内部货币性质（和角色）所面临的反复威胁。

信贷垄断对精英阶层还有其他优势。1980 年代，美国家庭债务负担增加，

与此同时，财富集中度加剧。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由于“实际小时工资下降，家庭收入停滞，于是中下阶层借更多的贷款以维持现状”，他们“从已经变得更富有的富人那里借贷”。到1997年，美国家庭共花费了1万亿美元（或税后收入的17%）用于偿还债务。“这代表了收入的大规模上行再分配。”那么，他们为什么借钱呢？收入分配的底部40%“借贷是为了弥补收入停滞或下降的空缺”，而上层20%借贷“主要是为了投资”。因此，“消费者信贷可以看作是为了在工资停滞或下降的情况下，维持大众消费的一种方式。但从债权阶级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额外的社会和政治好处：它通过允许人们购买他们原本负担不起的商品，减少了提高工资的压力。它帮助滋养了在两极分化时期，中产阶级生活标准的假象和现实。而且债务可以是一种强有力的保守力量；有了庞大的每月抵押贷款和/或万事达卡账单，罢工和其他形式制造麻烦的行为，往往就看起来不如它们原本那样具有吸引力。” [Doug Henwood, 《华尔街》，第64-66页]

因此，信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胁迫形式；有抵押的工人更容易被操控。” [Henwood, Op. Cit., p. 232] 金钱即权力，任何减少这一权力、增加工人选择的手段，都会被资本家阶级视为威胁——无论是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国家提供的失业救济，还是廉价的自组织信贷，都会遭到反对。因此，信贷垄断，只能作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广泛攻击的、其中一部分，来加以反对。

总之，信贷垄断通过人为地限制我们自主工作的选择，确保我们为老板工作；同时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为少数人谋取利益。

土地垄断，则是政府执行那些不基于个人占有和使用的土地所有权。这还包括使占据废弃房屋和占领其他形式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这导致了地租现象，地主通过让他人使用他们拥有、但并未实际耕作或使用的土地，来获得报酬。它还允许对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木材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这种垄断特别具有剥削性，因为所有者不能声称自己创造了土地或其资源。直到地主用栅栏将土地围起来并阻止他人使用之前，这些土地对所有人都是开放使用的。

直到19世纪，土地控制，可能是使工人阶级被迫接受低于土地产品价值的工资的、最重要特权形式。虽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垄断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现代很少有人会种地），但它仍然在发挥作用（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方面）。至少，每个家庭和工作场所都需要土地来建造。因此，尽管土地耕作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土地的使用仍然至关重要。因此，土地垄断确保工人阶级在没有支付地主费用的情况下，无法找到可以耕作的土地、设置店铺的空间，或是睡觉的地方——而地主只是拥有这块土地，他们并不创造土地或者使用它们。最好的情况是，工人抵押他们的生活数十年，才得到一小片土地；最坏的情况是，工人支付了租金，依然和以前一样没有土地。不论哪种情况，地主都通过这笔交换变得更加富有。

此外，土地垄断在**创造**资本主义的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另见F.8.3节）。这一过程有两个主要形式。首先，国家将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单一家庭手中。地主们通过武力占领最好的土地，将大片土地转变为公园和狩猎场，迫使农民只能拥挤在剩余的土地上。因此，即使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获得优质土

地的方式几乎也只能通过支付租金来实现。因此，精英阶层宣称拥有空置土地，通过控制对土地的使用权（而不直接占有或耕作土地）来控制当时的劳动阶级。其次，统治精英阶层还直接偷取了传统上由社区拥有的土地，这一过程被称为“圈地运动”，即将公共土地转变为私有财产。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总结了这一过程：

“农业土地的重组[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传统农民农业的可行性……它创造了大量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变得微弱。为了谋生，许多农民转向了‘家庭工业’——在他们的小屋里生产商品……正是 18 世纪家庭工业的扩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节省劳动力的机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纺织制造业……工厂取代了家庭作为主要的生产场所。”[《商业组织与市场经济的神话》，第 3-4 页]

通过“合法”地禁止人们进入“他们的”财产，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垄断，确保产生一类人——他们只剩下劳动力（即自由）可以出卖。土地被从传统上使用它的人手中夺走，违反了共有权利，并被地主用来为自己的利润生产（最近，在第三世界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个人占有被地主制度和农业雇佣奴役制度所取代，“圈地法案……使农业人口陷入贫困，置他们于地主的摆布之下，并迫使大量人们迁往城镇；在那里，他们作为无产阶级，被交给中产阶级制造商的摆布。”[彼得·克鲁泡特金，《大法国革命》，第一卷，第 117-118 页]

这种过程的一个变种，也发生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地方，国家接管了广泛的土地所有权，然后将土地出售给农民。正如霍华德·津恩所指出的，宅地法案“将 160 英亩无人占有且公有西部土地，交给了任何愿意耕种五年的人。任何愿意支付每英亩 1.25 美元的人都可以购买宅地。很少有普通人能够支付所需的 200 美元；投机者进入并购买了大量土地。”[《美国人民历史》，第 233 页]那些确实地支付了费用的农民，往往不得不借债，这就加重了他们的劳动负担。此外，大量土地也被赠与铁路和其他公司，通常是通过直接地的方式（赠与、廉价出售），或租赁的方式（即通过给予特权，允许它们使用国有的土地来提取如木材和石油等原材料）。无论哪种方式，土地的使用权都被限制了，实际耕种土地的人最终都要以某种形式向地主支付贡金（无论直接支付租金，或通过偿还贷款的方式间接支付）。

这就是土地垄断的实际运作（另见 F.8.3、F.8.4 和 F.8.5 节的详细讨论），从中又衍生出了工具和设备垄断，因为家庭工业无法抵挡工业资本主义的竞争。在工业生产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利润迅速致富时，工人拥有自己生产资料的能力逐渐下降。从一个大多数工人拥有自己工具、因此能够自营的情形，到我们现在面对的经济体制，其中工作所需的工具和设备由资本家所有，结果是工人们不得不为老板工作。

工具和设备的垄断与土地垄断类似，都是建立在资本家拒绝工人使用他们的资本，除非工人支付一定的使用费用。用塔克的话说，资本“不过是已经支付过的、积累的劳动”，因此，“资本的出借者理应得到资本的完整归还，而不应额外获得任何报酬”，但由于法律上的特权，资本家能够收取“费用”以换取其使用

权。因为工人阶级在法律上被剥夺了对土地和资本的使用（生存手段），该阶级的成员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同意签署让资本家收取“费用”的工资合同（见 [B.3.3 节](#)）。

因此，资本垄断和土地垄断一样，是由国家及其法律强制执行的。如果你观察这种资本现在的主要形式，即公司，你会看到这一点最为明显。公司不过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在过去的 150 年里，” 乔尔·巴坎指出，“公司从相对的无名小卒崛起，成为世界上主导的经济机构。” 法律发生了变化，赋予公司“有限责任”和其他特权，以“通过废除不受资本家欢迎的公司法限制……来吸引有价值的公司注册业务。” 最后，法院“彻底转变了公司，赋予其‘人格’，使其拥有自己的身份……并赋予其像一个真实的人一样的权力，去开展业务，获取资产，雇佣工人，纳税，并上法庭主张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行为。” 在美国，这一变化是通过第十四修正案实现的（该修正案最初是为了保护解放的奴隶而通过的！）。总的来说，公司“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没有自己的权利、需求和愿望……它是一个由国家创造的工具，用来推动社会和经济政策。” [《公司》，第 5、13、16 和 158 页]

同样，也不能说这种垄断是通过辛勤工作和储蓄得来的。资本垄断是一个较为近期发展的概念；而对于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则常常遭到忽视。通常会编造一个童话故事来忽视它，仿佛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童话里说少数聪明人通过储蓄和努力工作积累了资本，而懒惰的大多数人则涌向这些（几乎是超人般的）天才膝下工作。而在现实中，这些最初用于投资工业的资本，来自于对海外财富的掠夺，或者来自于封建主义和地主剥削的收益。此外，正如我们在 F.8 节中讨论的那样，为了创造出一个工薪阶层，并确保资本能够在最有利的位​​置剥削他们，广泛的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一旦资本垄断站稳脚跟，这种明确的国家干预就会逐渐减少。

而一旦这一目标实现，国家的行动变得不再那么直接，转而集中在捍卫资本家的财产权。这是因为，工人支付的“费用”部分被再投资于资本，降低了商品的价格，破坏了国内产业，从而缩小了工人在经济中可选择范围。此外，投资还增加了潜在竞争者的启动成本，继续剥夺工人阶级的生产资料。因为这些“自然”的市场准入障碍，确保了少数工人阶级成员没有足够的资金创建规模适当的合作社。因此，虽然土地垄断在资本主义形成中至关重要，但从中衍生出的“工具和设备”垄断很快成为了这一系统的动力源泉。

通过这种方式，高利贷变得自我维持，看似“自由交换”的机制成了资本主义统治得以延续的手段。换句话说，“过去的暴力行为”与当前国家对财产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统治仅依赖于“防御性”暴力（即在工会、罢工、占领等行为面前，用暴力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权力），就可持续存在。从前几代工人那里榨取的“费用”，确保了当代工人无法通过“自由竞争”重新获得生活资料（换句话说，支付高利贷确保了高利贷得以延续）。不言而喻，这一代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将用于增加资本积累，从而确保未来几代人继续被剥夺，正如高利贷自我延续那样。更重要的是，国家对“财产”免于工人“盗窃”的保护，确保了财产仍然是盗窃，**真正的**窃贼保持着他们的掠夺。

至于“思想”垄断，它被用来让资本主义公司在牺牲公众和发明人的利益的情况下，获得利润。例如，直到 1970 年代初，意大利并未承认药品专利。结果，罗氏公司（Roche Products）向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系统收取的利眠宁和安定^①的专利成分价格，比意大利竞争对手的价格高出 40 倍以上。正如塔克所说，专利垄断“是通过保护投资者和作者，防止竞争，以便他们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从人民身上榨取比他们劳动付出更高的回报——换句话说，是赋予某些人以一定年限的财产权，对自然事实的所有权，并有权对他人使用这种本应人人共享的自然财富收取贡金。”[《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第 86 页]

这种情况的净效应可能是可怕的。全球贸易谈判中的乌拉圭回合（The Uruguay Round）“加强了知识产权。美国和其他西方药企现在可以阻止印度和巴西的制药公司‘盗窃’他们的知识产权。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制药公司正以西方药企价格的几分之一，向本国公民提供这些救命的药物……西方药企的利润将会上涨……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销售利润并不多，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这些药物……[因此]，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被宣判了死刑，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个人再也无法支付药品的高价。”[Joseph Stiglitz, 《全球化及其不满》，第 7-8 页] 虽然国际社会对艾滋病药物的愤怒，最终迫使药企在 2001 年底按成本价销售这些药物，但知识产权的基本体制依然存在。

值得注意并讽刺的是，正是在一个号称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创造了这个体制。正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正确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是保护主义措施，跟自由贸易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们恰恰是自由贸易的对立面。”[《理解权力》，第 282 页] “思想垄断”的根本性的不公正，加剧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这些专利产品的研发实际上是由政府资金资助的，私人企业则从中获利，享受它们未曾投入过一分钱技术的垄断利润。事实上，政府对研发的援助，被视为新自由主义议程下政府和企业都认为重要且可接受的领域。

“思想垄断”实际上与它本身的理由相悖。专利既抑制创新，又鼓励创新。实际进行发明工作的研究人员，需要签署专利权转让协议作为就业条件；而专利和工业安全程序却被用来加强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实际上阻碍了信息的共享，从而减少了创新（这种恶行在大学里尤为明显，因为新的“知识产权”体制正在向那里扩展）。进一步的研究也会停滞不前，因为基于他人专利的增量创新受到了阻碍，而专利持有者则可以安于现状，因为他们不必担心竞争者改进其发明。专利还会妨碍技术进步，因为按照其性质，它们排除了独立发现的可能性。当然，还有一些公司拥有专利并不因为打算使用它们，而是单纯为了防止其他人使用。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今天像关贸总协定（GATT）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样的贸易协议，“实施了一种自由化和保护相结合的政策，远远超出了贸易的范畴，旨在将财富和权力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投资者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和增强”，其中一个关键要求是“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包括软件和专利，将专利权扩展到工艺和产品”，以确保“美国公司控制未来的技术”，从而“将贫穷的多数人锁定在对西方农业企业、生物技术、制

^① 译注：利眠宁（Librium）与安定（Valium），两种安眠药

药行业等高价产品的依赖中。”[《世界秩序，旧秩序与新秩序》，第183页，第181页，第182-183页]这意味着，如果某个公司发现了一种新的、更高效的药物生产方法，那么“思想垄断”将会阻止他们，进而“这些不仅仅是高度保护主义的措施……它们还是针对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打击——这就说明了在其中到底有多少‘自由贸易’的成分。”[乔姆斯基，《理解权力》，第282页]

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及其政府）正试图通过控制技术流向其他地区，来阻止竞争的出现。所谓的“自由贸易”协议，正被用来为他们的产品创造垄断，从而将会阻碍或减缓竞争的崛起。尽管企业宣传者虔诚地将“反全球化”活动家妖魔化为发展中国家的敌人，指责他们试图利用贸易壁垒，牺牲贫困国家的利益来维持他们（西方）的生活方式，但现实却截然不同。“思想垄断”正在被积极地用来压制或控制发展中国的经济活动，从而让南方国家实际上沦为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除了直接从中获取垄断利润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竞争威胁还可以用来抑制发达国家工资奴隶的反抗，从而维持本国的利润水平。

这还不是全部。像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由此产生的高利贷帮助确保了它的自我延续。通过创建“合法”的绝对垄断并获取这些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资本家不仅以他人为代价的基础上富起来；他们还确保了在市场中的支配地位。由于专利和版权带来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被重新投资到公司中，这通过创造各种“自然”准入壁垒确保了他们的优势。因此，专利对商业结构产生了影响，鼓励了大企业的形成和主导地位的巩固。

到19世纪末，可以看到思想垄断在推动卡特尔（cartels，行业垄断联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因此为20世纪的企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专利被大规模使用，以促进资本的集中、设置市场准入壁垒，并将先进技术的垄断掌握在西方企业手中。历史上，专利的交换或汇集，是创建行业内垄断联盟的关键方式。这一点在电器、通信和化学工业中尤为明显。例如，到1890年代，两家大型公司——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西屋电气（Westinghouse）“垄断了美国电气制造业的大部分，且它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专利控制。”这两家竞争者只是简单地汇集它们的专利，“（然后）又一种专利和市场控制方式随之出现：公司专利汇聚协议。这些协议旨在最小化两大巨头之间冲突的费用和不确定性，极大地加强了它们相对于较小竞争者和新进者的地位。”[大卫·诺布尔，《美国设计》，第10页]

虽然在理论上，专利制度旨在保护小规模发明家，但现实中受益的却是企业。正如大卫·诺布尔指出的，“发明家，专利制度的原始焦点，逐渐‘放弃’了自己的专利，换取了企业的保障；他要么将专利出售或授权给工业公司，要么将其转让给雇佣自己的公司，以自己的才华换取薪水。此外，通过购买、合并、专利池、交叉许可协议，以及通过系统化的工业研究来规范专利生产——企业稳步扩展了它们的‘垄断中的垄断’。”此外，企业还利用“专利来规避反垄断法。”这种通过损害消费者获取的垄断利润，在1900年到1929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这些进展“规模之大，使得后来通过司法和立法手段对企业垄断进行制约，显得为时已晚。”[《美国设计》，第87、84和88页]

事情一直没有大的改变，直到爱德温·普林德尔（Edwin Prindle），一位企业专利律师，在 1906 年写道：

“专利是控制竞争的最佳和最有效的手段。它们偶尔能够完全控制市场，使所有者可以在不考虑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去设定价格……专利是绝对垄断的唯一合法形式……专利持有人在行使垄断权时的支配权力，已被用于几乎整个行业的贸易协议的形成。”[引自 Noble, 《美国设计》，第 89 页]

因此，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手段，不断尝试发展新的私人财产形式，方法是制造人为的稀缺性和垄断，例如要求在特定活动领域（如广播或生产某些类型的药物或产品）从事的企业必须获得昂贵的许可证。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的高利贷（使用费）正成为精英阶层更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一点，在近期的关贸总协定协议中对加强版权和专利执法机制的关注，以及美国对外国（如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尊重此类法律的举措中，有所体现。

这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摧毁潜在的竞争者，并确保它们能够将价格设定得尽可能高（并维持垄断利润的持续性）。同时，它也使得这些公司能够进一步圈占人类的共同遗产，将其转为私人所有，并向之前的使用者收取费用以获得使用权。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美国公司必须控制种子、植物品种、药物以及生存的基本手段。”[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p. 183] 这一现象被称为“生物海盗行为”（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可能是新的圈地运动），它是“国际公司正在为传统药物或食品申请专利”的过程。它们“试图从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和‘资源’中赚取利润”，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扼杀了长期提供这些产品的国内企业。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专利在法庭上是否能够经得起有效挑战，但显然，欠发达国家可能没有足够的法律和财力资源来对抗这些专利。”[Joseph Stiglitz, Op. Cit., p. 246] 这些国家也可能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当国际市场认为这种行为表明该国的体制不够“商业友好”时。那些曾依赖于仿制药或植物的民众无法再负担得起它们；这种情况就好像这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阻碍，和他们毫无关系一样。

换句话说，资本家希望通过确保法律反映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即他们的“产权”，来使“自由市场”偏向他们。通过这一过程，他们确保了社会中的合作倾向被国家支持的“市场力量”所压制。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现代资本主义是“富人的国家保护和公共补贴，穷人的市场纪律。”[“Rollback, Part I”, Z Magazine] 自称捍卫“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人，通常并非真正如此；而那些真正支持自由市场的人，唯一反对的只是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公共补贴”部分，他们倒是乐于支持国家对产权的保护。

所有这些垄断都试图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使资本家变得更加富有（并增加他们的资本存量），限制工人削弱统治精英的权力和财富的能力。它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任何想要为自己工作（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选择都被限制，通过扭曲竞争规则来使我们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我们的劳动力并遭受剥削。换句话说，各种垄断确保了“自然”准入障碍（参见 C.4 节）的存在，使得经济的高层由大企业控制，而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则被边缘化。

因此，正是这些类型的财产以及它们所创造的威权社会关系，才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将私人财产转变为国有（即国有化），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财产关系的性质；它只是用官僚替换了私人资本家的位置（正如我们在 [B.3.5 节](#) 中讨论的那样）。

B.3.3 为什么财产是剥削性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考虑生产“工具和设备”的垄断。这个垄断由工业资本家阶级获得，实际上允许这个阶级向工人收取“费用”，以获得使用这些垄断工具和设备特权。

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正如蒲鲁东所说，财产“逐出”了工人阶级。这意味着私人财产创造了一类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为老板工作，以便支付房东的租金、或购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生产却不拥有的商品。国家执行土地、工作场所等方面的财产权利，这意味着所有者可以禁止他人使用这些财产，并对那些允许使用“他们”财产的人，强加他们的规则。因此，老板“给你一份工作；也就是说，允许你在工厂或磨坊工作，而这座工厂或磨坊并不是他建的，而是像你这样的其他工人建造的。为了得到这个许可，你帮助养活他……只要你为他工作。”[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14 页] 这被称为雇佣劳动，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

这类依赖工资生存的人，有时被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称为“无产阶级”（proletariat）。今天，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通常称其为“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劳工是工资劳动者，而不是农民或工匠（即自雇工人，他们也受到私人财产制度的剥削，但方式不同）。还应注意，以这种方式使用的财产（即雇佣并剥削他人劳动），也被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称为“资本”。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私人财产产生了一个阶级制度：一种由于拥有财富和生产手段的少数人，去统治拥有极少财富的大多数人的制度（有关阶级的更多讨论，请参见 [B.7 节](#)）。

这确保了少数人可以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利：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通常不能为自己工作……所以……你必须找到一个雇主。你为他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工人阶级将其劳动能力出售给雇佣阶级。工人们建造工厂、制造机器和工具、生产商品。雇主将工厂、机器、工具和商品据为己有作为自己的利润。工人们仅仅得到他们的工资……尽管工人们作为一个阶级建设了工厂，但他们的日常劳动的一部分被拿走，作为使用这些工厂的特权……尽管工人们制造了工具和机器，但他们的日常劳动的另一部分也被拿走，作为使用这些工具和机器的特权……”

“你现在能猜到为什么蒲鲁东的智慧说富人的财产是被盗的财产吗？是从生产者、工人那里盗来的。” [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7-8 页]

因此，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日常盗窃/剥削，依赖于财富和私人财产的分配（即拥有阶级对生活手段、土地、工作场所和住房的最初盗取）。由于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生活手段，资本家就处于了一个理想的位置，可以对他们拥有但既没有生产也没有使用的资本，收取“使用费”。工人们别无选择，只得同意签订合同，在合同中他们放弃了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成果。结果，资本家能够获得一种“商品”（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潜在价值高于购买它所需的工资。

为了让这种情况发生，为了雇佣劳动的存在，工人必须不得拥有或控制他们在工作使用的生产资料。结果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间里，被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所控制。由于他们的劳动由老板拥有，而劳动无法与从事劳动的人分开，老板实际上在工作日内拥有工人，因此剥削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在工作时间内，老板可以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这些限制由工人反抗和团结以及客观条件决定，如行业或国家的失业水平），支配工作的组织、水平、持续时间、条件、速度和强度，从而决定产出的数量（尽管老板并没有生产这些产出，但他拥有对此的唯一权利）。

因此，“费用”（或“剩余价值”），是通过所有者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为公司创造的产品或服务所增加的全部价值而产生的。资本家的利润就是这一“剩余价值”的差额，也就是由劳动创造并被劳动所占有（的价值），减去公司的管理费用和原材料成本（参见 C.2 节——“利润从何而来？”）。

因此，财产是剥削性的，因为它允许剩余价值被所有者垄断。财产在工作场所内创造了等级化的关系（“工具和设备垄断”或许更应称为“权力垄断”），而在任何等级制度中，掌握权力的人都会利用这种权力，牺牲他人的利益来保护和推动自己的利益。在工作场所内，工人们对此种压迫和剥削进行反抗，而“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化关系，旨在将这种冲突解决为有利于资本代表的一方。” [威廉·拉佐尼克，《什么是资本主义？》，第 184 页]

不用说，国家始终在场保护财产和管理层的权利，防止被剥夺者的行动。归根结底，正是作为“权力垄断”保护者的国家存在，使得这种垄断能够存在。

因此，资本家之所以能够从工人那里占有剩余价值，完全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是因为他们通过亲自进行生产性劳动来赚取这些价值。当然，一些资本家可能也会参与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理应获得由自己劳动所增加的价值；但通常情况下，所有者会支付自己远高于这一数额的报酬，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国家保障他们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这一权利（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是唯一了解公司投入和产出的主体，并且像所有处于无法问责位置的人一样——滥用这种权力。这也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直接民主作为自由协议的基本对等物，因为不能指望任何掌权者都不会牺牲被决策影响者的利益，而偏袒自己的利益）。当然，许多资本家还雇佣经理人来代为经营企业，从而为自己赚取不做任何事情的收入，仅凭“拥有财产”而已。

因此，资本家的利润是一种由国家支持的剥削形式。银行家收取的利息和房东收取的租金，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国家，这些剥削形式将变得不可能，因为它们所依赖的垄断无法维持。例如，如果没有国家军队和警察，工人们将直接接管并自己运营工厂，从而阻止资本家从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占取不公正的份额。

B.3.4 私有财产能否得到辩护？

不。尽管少数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承认，私有财产，尤其是土地财产，是通过武力获得的，但大多数人仍坚持认为私有财产是正当的。对私有财产的一种常见辩护，可以在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著作中找到（他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在诺齐克看来，使用武力获取财产是不合法的，因此任何现存的财产权都是不合法的（换句话说，盗窃和交易赃物，并不会使这些物品的所有权合法化）。因此，如果土地的最初获取是不合法的，那么所有现存的财产权也同样不合法。而既然土地的私人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资本主义本身也就成了非法的。

为了规避这一问题，诺齐克借鉴了洛克的理论（“洛克条件”，*"The Lockean Proviso"*），其内容可概括如下：

1. 人拥有自己，因此也拥有自己的劳动。
2. 世界最初是共同所有的（或在诺齐克的观点中是无人所有的）。
3. 通过在共同所有（或无人所有）的资源上进行劳动，人们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劳动。
4. 如果不会使他人的处境恶化，你可以在世界上占有比平均水平更大份额的绝对权利。
5. 一旦人们占有了私有财产，资本和劳动的自由市场在道德上便是必然的。

然而，这一理论存在诸多缺陷。最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将你拥有的东西（劳动）与全体共有（或无人占有）的东西混合后，就会使其变成你的财产？实际上，这种情况同样可能意味着你只是单纯地失去了你所付出的劳动。例如，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仅仅因为你在一条河里游泳或捕鱼，你就因此拥有了这条河。即使我们假设这个论点成立，并承认通过在一块土地上劳动可以创造所有权，为何要假设这种所有权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基础上？许多文化并不承认这种“绝对”形式的财产关系，而是仅仅承认对生产物的所有权，而非对土地本身的所有权。

因此，投入劳动就能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的假设并不必然成立。相反，你完全可以主张另一种观点，即劳动虽然能够带来对所创造商品的所有权，但并不会带来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一种占有权。

用蒲鲁东的话来说：

“我坚持认为，占有者因其辛劳和勤奋而获得报酬……但他并未因此获得对土地的权利。‘让劳动者拥有其劳动的成果。’——很好；但我不认为对产品的所有权意味着对原材料的所有权。一个渔夫的技艺使他在同一片海岸比其他人捕到更多的鱼，这是否使他成为该渔场的所有者？一个猎人的高超技艺，是否能成为他对一片狩猎森林的产权凭证？类比是完全一致的——勤奋的农民在其作物的丰收和优良品质中找到了其劳动的回报。如果他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他有占有者的优先权。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能仅凭自己作为农耕者的技艺，就主张对其所耕种土地的所有权。

“要将占有转变为财产，除了劳动之外，还需要其他条件，否则一个人一旦停止劳动，就会失去所有权。而现行法律所依据的产权基础，是久远且无可争议的占有，也就是‘时效’。劳动只是占有的可见标志，是表明占有的物理行为。因此，如果一个农民在停止劳动和生产之后，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如果他的占有权从最初的允许、之后的默认，最终变成不可转让的所有权——那么，这完全是由于民法的许可，以及‘占有’这一法律原则的作用。这是如此的正确，以至于它暗含于所有的买卖契约、土地租赁以及年金合同之中，即使这些后者都不存在……

“人类创造了一切——除了物质本身。而我坚持认为，人类只能在持续劳动的条件下占有和使用这些物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暂且承认他对自己所生产之物的所有权。

“那么，这一点就已经确立：即使承认产品的所有权，这也并不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一点似乎无需进一步论证。士兵拥有其武器，石匠拥有其所看管的建筑材料，渔夫拥有其使用的水域，猎人拥有其所涉足的田野和森林，农民拥有其所耕种的土地——如果你愿意，可以说他们都是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者，但没有一个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产品的权利是专属的——‘对物权’（*jus in re*）；对生产资料的权利是共有的——‘对物请求权’（*jus ad rem*）。”
[《什么是所有权？》，第 120-121 页]

蒲鲁东的论点比诺齐克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历史有效性。土地的共同所有权与个人使用相结合的形式，主导了人类社会数万年的财产权制度；而诺齐克所谓的“自然法”理论，则仅能追溯到 17 世纪洛克的作品（而洛克的理论，本身就是试图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以往习惯法的侵蚀提供辩护）。诺齐克的理论之所以看起来有效，仅仅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以资本主义财产权为主导的。因此，诺齐克是在“循环论证”——他在试图证明某一命题的同时，已经假设了该命题的成立。

撇开这些明显的问题不谈，我们来分析诺齐克的实际论点。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童话故事，一个神话。当前的财产制度及其资源和所有权的分配，是数千年来冲突、强制与暴力的产物。因此，根据诺齐克的

逻辑，它是不合法的，当前的所有者无权剥夺他人对财产的使用权，也无权反对税收或财产征收。然而，正是这一结论是诺齐克试图通过他的理论加以否定的。他通过构建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的思想实验，试图让读者忽视财产的真实历史，以此确保现有财产所有者远离再分配的威胁。诺齐克的理论之所以被严肃对待，首先是因为它假设了它试图证明的前提（即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因此表面上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其次，它对富人而言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用途。

其次，这一论点本身存在严重缺陷。要看清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两个人共享一片土地。按照诺齐克的理论，允许其中一方将土地据为己有，只要“在先前无主物上确立永久可继承财产权的常规过程，若导致他人无法自由使用该物而使他们的处境恶化，则该过程不能产生此类权利。”[《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178页] 据此，我们案例中两位土地共享者中的一方可以通过提供高于对方原生产收益的工资，完成对土地的占有。若达成此条件，依据诺齐克的理论，初始圈地占有行为即具正当性，后续所有市场交易亦随之获得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无主世界转化为有主财产，并催生出以生产资源（土地）的资本主义财产权与劳动力为基础的市场体系。

有趣的是，尽管诺齐克的意识形态自称“自由意志主义”，但他的理论却仅以物质福利的标准来定义“处境恶化”，即将其与基于共同使用原则的社会条件进行比较。然而，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圈占了土地，而另一个人无法靠剩余的土地维生，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后者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成为地主的雇佣劳动者。新地主为他提供的工资或许会高于他最初的生产水平，从而满足“洛克条件”的要求，但这完全忽略了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这个新的“工资奴隶”已经没有了自主谋生的选择，只能为他人工作，并因此受到该地主的支配。换句话说，在诺齐克的理论中，以自由（即自治或自我管理）为标准的“境况变差”完全无关紧要，而这一立场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

虽然诺齐克在他的意识形态中声称要强调“自我所有权”，理由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然而，奇怪的是，在他关于土地占有的论述中，他却没有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事实上，他并没有对任何将某人置于不必要且不可取的、从属和依赖地位的占有行为，提出任何的异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估占有的公平性时，诺齐克完全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个体现在必须服从于其他个体的决定。私人财产的建立导致工资奴隶丧失了重要的自由（即，工资奴隶无法对自己曾经使用的土地的所有权状况，发表任何意见；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如何被使用）。在私人财产产生之前，每个人都能自主安排自己的劳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自治。而在占有之后，新的工资奴隶再无此自由，必须接受雇佣关系的条件，在此关系中，他们不情愿地放弃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如何支配的控制权。然而“洛克条件”竟然对此毫不在意，这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对“自由”的真正关切程度。

考虑到诺齐克多次强调自我所有权的重要性，人们或许会认为，他相当在乎那些被剥夺土地的新生工资奴隶的自主权。然而，他对此却毫不在意——工资奴隶的自主权在他的理论中被视为无关紧要。诺齐克声称，他的无限制财产权理论

是基于人们对人们能够自由过自己生活的关切，但显然这并不适用于工资奴隶。他对私人财产建立的辩护，仅仅考虑了地主的自主权，而完全忽视了被剥夺者的自由。然而，正如蒲鲁东所正确指出的：

“如果人类的自由是神圣的，那么所有个体的自由都是同样神圣的；如果自由需要财产作为其客观行动的条件，即作为其生存的条件，那么所有人对物质的占有权同样是必要的……由此，不正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能阻止另一个人……占有与自己相等数量的物质，那么他同样不能阻止后来的个体这样做吗？”[同上，第 84-85 页]

一旦我们超越最初的占有行为，并考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状况，诺齐克理论的影响便清晰可见。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所有**可用的土地已经被占有；这种在占有土地之间悬殊的差异，会被世代继承。于是，我们便形成了一个拥有世界的（少数）阶级，以及一个只能按照前者设定的条件、才能获得生存资源的（多数）阶级。如果大多数人无法在未经他人（即拥有阶级）许可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又怎能说他们真正拥有自己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被宣称拥有自我所有权，但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拥有独立获取资源的能力。由于他们必须依赖他人的资源，他们便受制于资源所有者。换句话说，私有财产削弱了大多数人的自主性，并创造了一种权力体系，其本质与奴役有诸多相似之处。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言：

“虽然不再因法律的强制而沦为奴隶或附属者，但绝大多数人仍然因财产的力量而沦为奴役；他们依然被束缚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职业上，必须服从雇主的意志，并且仅仅由于出身的偶然性，就被剥夺了享受生活的机会，以及他人无需努力、无需功绩便能继承的精神和道德优势。穷人认为，这是一种与人类迄今所抗争的任何苦难几乎等价的罪恶，这种看法并非错误。”[《社会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377-378 页]

资本主义尽管声称实现了形式上的自我所有权，实际上却不仅限制了工人阶级的自我决定权，还使他们成为他人的资源。在所有可用财产都被先占者圈占的市场中，后来者只能选择依赖施舍，或者为他人工作。而后者，正如我们在第 C 节中所讨论的，必然导致剥削，因为工人的劳动被用来使他人致富。劳动者被迫接受现有的财产制度，并被迫使他人受益。这表明，自我决定不仅需要权利，也需要获取资源的能力。因此，要是真正关心自我决定权（即有意义的自我所有权），就必须导向共同财产、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以及某种形式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而非**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

当然，对土地的掠夺需要国家来保护其免受被剥夺者的反抗，同时也需要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持续的干预。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人们会自由地使用周围的资源，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被他人不公正地占有的资源。而只有持续的国家干预，才能阻止他们违反诺齐克的正义原则（用诺齐克自己的术语来说，“洛克条件”本质上是一种模式化理论，尽管事实与他所声称的相反）。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一个人对某物的私人所有权，意味着其他人的非所有权（“我们这些属于无产阶级的人，被财产放逐！”[蒲鲁东，Op. Cit., p. 105]），因此，“自由市场”不仅创造自由，也限制自由，就像任何其他经济体系一样。因此，资本主义代表“经济自由”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剥夺绝大多数人在工作时间内的自由（而财富集中对社会的影响，也严重限制了人们在工作之外的自由）。

也许诺齐克会主张，私人财产带来的物质利益增长，使其占有变得正当。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一个声称支持“自由”的理论竟然会认为，富裕的奴隶会比贫穷的自由人更好。既然诺齐克认为，工资奴隶是否同意最初的财产占有并不重要；那么他或许会声称，物质福利的提高可以弥补自治权的丧失，从而使得最初的占有行为成为一种家长制行为。但是，既然诺齐克在反对当家长制限制私人财产权时，就使用这一理论——那么当它被用来为私人财产权提供正当性时，他自然也不能援引它。而如果我们排除家长制，并强调自主权（正如诺齐克在其理论的其他地方所声称的那样）；那么要证明私人财产的最初创造是正当的，就变得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如果每个所有者对其财产的所有权，都包含着“洛克条件”下掠夺的历史阴影，那么这样的所有权就是无效的。任何人对不平等资源的所有权，都必须以“财产即盗窃”和“财产即专制”的事实为前提。私人财产是经济自由的说法，显然也是不真实的；因为除了“强权即公理”之外，任何试图为私人财产权辩护的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如果生命权是平等的，那么劳动权也是平等的，占有权亦然。”这意味着，“那些今天不拥有财产的人，与那些拥有财产的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我并不因此主张让财产在所有人之间共享，而是以普遍安全的名义，要求彻底废除财产。”[蒲鲁东，Op. Cit., p. 77 和 p. 66] 简而言之，如果最初对资源的占有是正当的；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后代人也有权废除私人财产，以建立一个尊重所有人自由，而非少数人特权的制度。

关于私人财产、及其为什么它无法被正当化（无论是基于占有、劳动、自然权利，还是其他理由）的更多无政府主义角度分析，请参考蒲鲁东的经典著作《什么是财产权？》。关于资本主义财产权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 F.4 节。

B.3.5 国有财产与私人财产之间有区别吗？

不，根本没有区别。

国家所有权（state ownership），不应与“使用权”概念所暗示的共同所有权

(common ownership) 或公共所有权 (public ownership) 混为一谈。^① 国家是一个等级制的强制工具，正如我们在 [B.2 节](#) 所讨论的，它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于国家在设计上，就排除了广大民众的决策权，这就意味着国家机器控制了相关财产。由于公众以及使用该财产的人被排除在管理之外，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是完全一样的。区别仅在于，私有财产归资本家所有，而国有财产则归官僚机构所有。

我们可以从苏联或中国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例子中，轻松地看出这一点。要说明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只需引用一位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中国为何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论述。根据大卫·施维克特 (David Schweickart) 的定义，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为了获得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人就无法工作），大多数人必须与拥有这些生产资料的人（或者代表他们的人）签订合同。作为工资或薪水的交换，他们同意向所有者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工人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并不属于生产者，而是属于那些向工人提供生产资料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同意施维克特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因此，他正确地指出，“一个由小农和工匠组成的社会……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其中基本不存在雇佣劳动。”然而，他却错误地断言，“一个大部分生产资料由中央政府或地方社区拥有的社会——例如当代的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并不占主导地位。” [《资本主义之后》，第 23 页]

这一点显而易见。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说的（并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财产被国有化，“（那么）它就属于国家，也就是说，政府对其拥有控制权，并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和观点对其进行处置……这样的状况可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若将其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那就太荒谬了。”（因为真正的共产主义需要“土地以及生产和分配的机器社会化”，它们应当“归属于人民，由个人或群体根据自身需求”、基于“自由获取”的原则，“加以安置和使用”。） [《红色艾玛言论集》，第 406-407 页]

因此，按照施维克特自己的定义，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工人显然不拥有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国家才是所有者。同样，工人也不拥有他们生产的商品或服务，而是提供生产资料的国家拥有它们。不同之处在于，资本家不再是许多个，而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警告的，这“仅仅是……用国家这个普遍的资本家，去取代了现有的资本家。” [《进化与环境》，第 106 页] 这正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将这种政权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基本上取代了资本家，成为了工人的老板。

尽管这一点在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它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民主国家。无论是否是民主国家，国家所有制仍然是一种排他的财产所有权形式，它所塑造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共同所有权和使用权能够

^① 在现代，国有制 (state ownership) 和公有制 (public ownership) 的含义基本等同（或者说，两者被刻意地混淆了），均指的是国家或政府所有的资产或事业。威权主义者现在更喜欢用后者，仿佛“公有制”就像其字面意思一样由“公众”所拥有。虽然两者仍优于私有制 (private ownership)，但依然与真正代表大众共同所有的“共有制” (common ownership) 存在关键区别。详见 [1.6 节](#) 和 [1.6.2 节](#)

创造基于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关系；而国家所有制则预设了一个政府机器——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它凌驾于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的所有社会成员之上，并拥有强制和支配他们的权力。换句话说，当国家掌握生存资料时，社会成员仍然是无产者，仍然是非所有者，被排除在控制权之外。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现实中，生存资料都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国家。国家并非悬浮于社会之上的抽象存在，而是由一群具体的统治者组成的社会机构。这意味着这群统治者实际掌控并有效拥有这些财产，而非整个社会、更不是那些真正使用这些财产的人掌控并拥有它。正如拥有阶级排除多数人一样，国家官僚阶层也排除社会成员，这意味着它实际上拥有生产资料，无论这种所有权在法律上是否被正式承认。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始终强调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认为这是任何真正社会主义形式的基础。如果仅仅关注所有权（正如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做的那样），那就是偏离了核心问题。不言而喻，那些用国家财产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政权，已经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在这类问题上的分析是正确的（正如艾玛·戈尔德曼对列宁统治下的俄国总结时所说的：“全能的中央集权政府，其经济表现形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Op. Cit., p. 388]）。国家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并没有根本区别——唯一的变化只是剥削和压迫工人的主体发生了转换。

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 H.3.13 节——“为什么国有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B.4 资本主义是如何影响自由的？

私人财产在许多方面就像是一种私有形式的国家。所有者决定了其“拥有”区域内的一切事务，因此对该区域行使垄断性的权力。当权力是对自身行使时，它是一种自由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下，它则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权威。正如鲍勃·布莱克（Bob Black）在《工作的废除》中指出的：

“那些哀叹极权主义的自由派、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都是伪君子 and 虚伪的人……你会发现在办公室或工厂中存在的等级制度和纪律，与监狱或修道院中的如出一辙……工人是兼职奴隶。老板决定你何时上班，何时离开，以及在这期间该做什么。他告诉你要完成多少工作，工作速度要多快。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将这种控制延伸到羞辱性的程度，如果他愿意，他就会规定你的着装，甚至限制你上厕所的次数。特殊情况下，他可以用任何理由解雇你，或者无缘无故地解雇你。他让告密者和主管监视你，并收集每位员工的档案。顶撞老板被称为‘不服从上级’，就好像工人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而这不仅会让你丢掉工作，还会使你失去领取失业补偿的资格……这种屈辱性的统治体系，掌控着大多数女性半数的清醒时间，以及绝大多数男性的绝大部分生命时光。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制度被称为民主、资本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业主义，这并非完全

错误，但它真正的名字是‘工厂法西斯主义’和‘办公室寡头统治’。任何声称这些人是‘自由’的人，非蠢即坏。”[《工作的废除及其他文章》，第 21 页]

面对这一批评，资本主义的捍卫者通常会回应道：“这里是自由市场，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换一份工作。”然而，这一回应存在诸多问题。最明显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也从未是一个“自由市场”。正如我们在 [B.2 节](#)所指出的，国家的一个核心职能就是保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干预市场，使其向雇主倾斜。因此，捍卫资本主义的人用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理想化概念来回应批评，实在是毫无说服力的。

然而，这种回应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它默认了专制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人际形式。如果说“你的选择要么是忍受这个老板，要么是去寻找另一个（希望更开明的）老板”，那这完全反映出对自由概念的无知。自由并不是拥有一个可以挑选主人的机会，而是能够有机会自主掌控自身的事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就之一，就是让人们误以为选择一个新的主人就是自由，让人们相信只要存在“同意”，就意味着存在“自由”——而完全忽视了塑造这些选择的客观条件，以及这些选择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本质。

虽然我们会在 [B.4.3 节](#)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但现在就有必要先做一些简要的说明。要理解资本主义捍卫者的回应为何没抓住重点，我们只需将这一论点从经济制度转移到政治制度即可。让我们设想一个在岛屿上的专制国家体系，每个国家都是君主制（即独裁政权）。每个国王决定他的臣民应该做什么、可以与谁交往，并且攫取他们劳动的成果，以换取食物、衣物和住所；工作时间也由国王随意决定（国王“仁慈”地允许臣民在晚上和周末拥有一些自由时间）。其中一些国王甚至规定臣民的着装方式，以及他们见面时应如何互相问候。很少有人会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安排下的人是“自由”的。

现在，如果我们增加一个条件，即任何臣民都可以离开自己的王国，但前提是另一位国王愿意接纳他们，这样是否使他们更加自由？或许稍微自由了一点，但不多。臣民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统治者，但他们所受政权的**本质**，却并没有因此改变。我们可以预见，那些拥有被需求技能的臣民可能会获得更宽松、更自由的待遇（只要他们的技能仍然受到需求），而大多数人仍然不得不接受原本恶劣的条件，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被取代。无论如何，所有人仍然处于君主的专制统治之下。两类臣民都不是自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人在君主的需求和心血来潮的影响下，享有稍微宽松的待遇。

这个思想实验准确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这一点不言自明。难怪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呼应蒲鲁东的抱怨，即“我们的大型资本主义联合体，（就是）按照商业和工业的封建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选集》，第 72 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并没有否认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反而试图让我们相信，这种制度就是自由的化身。然而，私人财产的国家主义本质，在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即“古典”自由主义者）推崇的极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理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某人在一片获取方式未曾违反洛克条件（即非侵略原则）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座私人城镇；那么选择迁入或继续留在那里的居民，将无权对城镇的管理方式发表意见，除非城镇所有者所设立的决策程序赋予了他们这一权利。”[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 270 页]

这无异于自愿的封建主义，仅此而已。而事实上，这种制度确实存在。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公司城镇（company towns）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霍华德·津恩总结了科罗拉多矿区这些“私人城镇”的状况：

“每个矿工营地都是一个封建领地，由矿业公司充当领主和主人。每个营地都有一名由公司支付薪水的治安官，作为执法人员。而所谓的‘法律’，就是公司的规则。宵禁被强制执行，‘可疑’的陌生人不得探访居民家中，公司商店垄断了所有商品的销售。医生是公司的医生，学校教师由公司聘请……在科罗拉多，政治权力掌握在经济权力的手中。这意味着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及其他矿业公司的权威，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公司官员被任命为选举监督员，由公司控制的验尸官和法官阻止受伤工人获得赔偿。”[《科罗拉多煤矿罢工，1913-14》，第 9-11 页]

毫不意外的是，一旦工人们奋起反抗这种暴政时，他们就会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而公司的私人执法人员在镇压罢工者方面表现得极为“高效”：“到罢工结束时，死伤者大多是矿工及其家人。”罢工很快演变成一场战争，罢工者及其支持者与公司的雇佣暴徒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国民警卫队被派往矿区“恢复秩序”时，“矿工们在罢工的前五周已经经历了私人保安手中的恐怖统治……因此他们对国民警卫队的到来充满期待。”他们“并不知道，州长是在矿业公司的压力下派遣这些军队的。”事实上，银行和企业甚至向州政府提供资金来支付民兵的费用。这些身穿国家民兵制服的公司暴徒，在 1914 年 4 月 20 日臭名昭著的勒德洛大屠杀（Ludlow Massacre）中，屠杀了妇女和儿童。[同上，第 22、25、35 页]

《纽约时报》毫无讽刺意味地发表社论称，“民兵像法律一样公正无私。”事后，矿业公司雇佣了艾维·李（Ivy Lee，“美国公关之父”）来扭转舆论。值得注意的是，李撰写了一系列宣传小册子，标题为《科罗拉多争取工业自由斗争的事实》。该公司的负责人（洛克菲勒）将他对罢工者的镇压，美化为了捍卫工人自由的举措，是在“捍卫工人的工作权利。”[引自津恩，Op. Cit., 第 44、51、50 页] 所谓“资本主义是自由的化身”就是这样。

当然，有人可能会声称，“市场力量”最终会使最开明的资本家最为成功，但一个“仁慈的主人”依然是主人（更何况，当时的资本主义比今天更接近“自由市场”，这就说明这种想法不过是一个空想）。套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开明的资本家就像一个善良的驴主人。他会为驴子做一切事情——照料它、喂养它、清洗它。唯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从它背上下来！”正如鲍勃·布莱克所指出的：“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这正是奴役的本质……但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有权更换主人。”[《作为保守派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工作的废除及其他文章》，第 147 页] 当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经常声称，这种“更换主人的权利”就是

“自由”的本质时——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所谓“自由”的虚伪。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威权主义并不局限于工作场所。资本家通过国家来巩固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力。只要国家的行动符合他们的利益，支持他们的权威和权力，资本家就会支持并依赖国家。任何国家与资本之间表面上的“冲突”，实际上就像两个黑帮分子在争夺抢劫来的战利品：他们可能会为如何分赃、谁在帮派中的权力更大而争吵；但他们彼此需要，以便共同掠夺财富，并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被那些真正的所有者夺回。

然而，与公司不同的是，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受到公民的影响。公民可以采取行动来（一定程度上）限制统治精英“独享”权力的程度。因此，富人憎恨国家的民主成分，并将普通公民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问题”早在 19 世纪初的美国，就被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指出：

“很容易看出，社会中的富裕阶层对本国的民主制度怀有深深的厌恶。民众既是他们蔑视的对象，也是他们恐惧的来源。”

这种恐惧至今未曾改变，他们对民主思想的蔑视亦如往昔。正如一位美国企业高管所言：“一人一票的原则，最终会导致我们所知的民主制度的失败。”[L. Silk 和 D. Vogel, 《伦理与利润：美国商业信任危机》，第 189 页]

这种对民主的蔑视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反对国家。恰恰相反，正如前文所述，资本家依赖国家的存在。这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一种没有社会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它纯粹是一个谎言，因为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主义者对政府的批判，仅仅是希望削减其某些职能，并让资本家在彼此之间展开竞争，但他们无法攻击政府最本质的镇压职能：因为如果没有宪兵，财产所有者便无法存在。”[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无政府》，第 47 页]

我们已经在 [B.2 节](#) 讨论了国家以及统治精英如何控制国家，因此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也不会详细讨论精英阶级如何利用国家来维护私有财产（见 [B.3 节](#)），或如何利用国家对社会进行干预（见 [D.1 节](#)）。在本节的剩余部分，我们将探讨资本主义如何影响自由和自主性，以及为何资本主义捍卫者的常见辩护站不住脚。

B.4.1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吗？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自由（freedom），既意味着“免于”（freedom from），也意味着“能够”（freedom to）。“免于”指的是免于支配、剥削、强制性权威、压迫或其他形式的屈辱与贬低。“能够”则意味着能够充分发展和表达个人的能力、才华和潜力，并在不损害他人最大自由的前提下，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自由都意味着自我管理、责任感和独立性，也就是说，人们应该对影响自身生活

的决策拥有发言权。由于个体并非存在于社会真空中，自由必然具有集体性，即个体所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如社区、工作团体、社会组织等），应当以使个体能够参与决策的方式运作。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由要求参与式民主，即受影响的人们通过面对面的讨论和投票来决定事务。

那么，资本主义体系满足这些自由的条件吗？显然不满足。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充斥着“民主”之类的说辞，但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仍然仅仅浮于表面——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公民都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在清醒的时间里，至少有一半是在资本主义独裁者（即老板）的控制之下度过的。他们对影响自身生活最深远的经济决策没有任何发言权，并且被迫在不利于独立思考的环境下工作。如果连最基本的自由——独立思考的自由——都被剥夺，那么自由本身也就无从谈起。

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本质上是极端不民主的。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典型的企业等级制度中的压迫性权威关系，如果出现在政治体系中，将被称为法西斯或极权主义。他如此描述道：

“企业完全不是个人主义的。这些是庞大的联合机构，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根本谈不上个人主义。在人类社会中，很少有机构像商业组织那样具有如此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在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别压迫我’的自由，你随时都在被压迫。” [《让乌合之众守规矩》，第 280 页]

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建立在自由之上”，反而破坏了自由。在这方面，西尔斯公司（Sears）首席执行官罗伯特·E·伍德（Robert E. Wood）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强调自由企业制度的优势，我们抱怨极权主义国家，但……事实上，我们在工业领域，尤其是在大型工业中，已经建立了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体系。” [引自艾伦·恩格勒，《贪婪的使徒》，第 68 页]

或者，用乔姆斯基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根本不了解“自由的基本原则，即你应该免受支配和控制，包括免受经理和老板的控制。” [1992 年 2 月 14 日《Pozner/Donahue》节目采访]

在企业威权主义之下，那些被认为最理想的普通公民心理特征，是高效、服从、情感冷漠、缺乏同理心，以及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这些特质使人在公司等级制度中得以生存甚至晋升。当然，对于“非普通”公民（即老板、经理、行政人员等），则需要威权主义的特质；而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支配他人的能力和意愿。

但所有这些主仆关系的特质都与真正的民主（即参与式/自由意志主义的民主）格格不入，而真正的民主要求公民具备灵活性、创造力、敏感性、理解力、情感诚实、直接性、热情、现实主义，以及调解、沟通、谈判、整合和合作的能力。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是非民主的，而且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培养了一种阻碍真正民主（以及自由社会）实现的性格特质。

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的权威结构是“自愿的”，因此不会否定个人和社会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正是这样做的。与大多数资本主义辩护者一样，他无视雇佣劳动中固有的威权关系（在工作场所中，“协调”是基于自上而下的命令，而不是横向的合作）。相反，他关注的是工人选择向特定老板出售其劳动力的决定，从而忽略了这类契约内部缺乏自由的事实。他辩称：“个人事实上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参与任何特定的交易，因此每一笔交易都是完全自愿的……雇员不会受到雇主的胁迫，因为他可以为其他雇主工作。”[《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4-15页]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自由本质，弗里德曼将资本主义与一个基于独立生产者的简单交换经济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这样一个简单经济中，每个家庭“都有直接为自己生产的选择，[因此]除非交换对其有利，否则它不必参与交换。因此，任何交换的进行都必须使双方受益；所以，合作是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资本主义（或所谓的“复杂”经济）下，弗里德曼认为“个人事实上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参与任何特定的交易，因此每一笔交易都是完全自愿的。”[同上，第13页和第14页]

然而，稍作思考就能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像弗里德曼声称的那样，基于“完全自愿”的交易。因为使交易“完全自愿”所需的前提，并非仅仅是自由地选择是否进入某一特定交易，而是自由地选择是否参与任何交易。

这一点——且唯有这一点——才是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基于手工艺生产的）简单经济模型，能够被证明是自愿且非强制的前提条件；若不满足这一条件，就无法证明复杂经济模式（即资本主义）是自愿且非强制的。然而，弗里德曼在上述论证中显然声称，只要有选择是否进入某一特定交易的自由，就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是自由的。因此，只有改变自己的标准，他才能得出资本主义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结论。

弗里德曼的逻辑错误显而易见，但却很难被原谅（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辩护者的论述中，这种错误极为常见）。他在没有提及最关键区别的情况下，就将经济从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简单交换体系，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个关键区别正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在独立生产者的社会中，工人可以选择为自己工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却没有这样的选择。对于像弗里德曼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而言，工人只是选择“是否工作”，而资本家必须支付工资以弥补劳动的“负效用”。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工人面临的选择并非“是否工作”，而是“工作还是挨饿/陷入贫困”。资本主义的存在，依赖于一支无法自由支配资本或土地的劳动力大军，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决定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弗里德曼或许会承认，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就存在强制。因此，他试图证明资本主义无需强制即可进行协调的论证，最终是失败的。

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之所以能够让一些人相信资本主义“建立在自由之上”，只是因为这个体系在表面上，具有某种自由的假象。然而，深入分析后，这些假象往往就会被发现是一种欺骗。例如，资本主义企业的雇员据称是自由的，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辞职。对此，再次引用鲍勃·布莱克（Bob Black）所言：

“有些人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服从命令：这就是奴役的本质。当然，[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自鸣得意地指出，‘至少你可以换份工作’，但你无法避免必须拥有一份工作——正如在国家主义体制下，你或许可以更换国籍，但无法避免受某个国家政权的统治。然而，自由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更换主人的权利。”[《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工作的废除及其他文章》，第 147 页]

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人实际上别无选择——要么接受被统治/剥削，要么流落街头。

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要使选择真正自由，契约和社群必须建立在缔约双方的社会平等基础之上，并且双方都应当从中获得大致相等的利益。然而，在资本家与雇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平等永远无法实现，因为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然催生社会等级制度，并形成强制性的权威与服从关系。甚至连亚当·斯密都曾承认这一点（见[下文](#)）。

曾任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席的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对《瓦格纳法案》出台前美国劳动生活的描述，清楚地揭示了阶级不平等的现实：“不公正就像电车一样常见。工人走进工厂时，必须把他们的尊严、公民身份和人性都留在门外。他们被要求按时报到，无论当天是否有工作可做。在等待主管和工头安排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得不到一分钱报酬。他们可以毫无理由地被解雇。他们必须遵守专横而荒谬的规定……连上厕所都被层层限制。尽管那些大公司的总裁们高谈阔论地宣称，‘他们的大门向任何有投诉的工人敞开’，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机构可以让工人申诉自己的冤屈。工人受到不公待遇的想法，在雇主看来简直荒唐可笑。”这种屈辱性的待遇至今仍然存在，而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工人的谈判地位进一步恶化；这使得过去一个世纪中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只需简单观察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差距，就能看出双方所达成的“契约”所带来的利益远非平等。加拿大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主要理论家，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在讨论职场性骚扰问题时，就清楚地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权力和利益的不对等：

“考虑一下在秘书与上司之间持续发生的性骚扰……尽管许多女性认为这种行为令人反感，但它并不是一种强制行为。相反，它是工作的一揽子交易中的一部分，秘书在接受这份工作时就同意了其所有方面，特别是在她决定继续这份工作时。毕竟，办公室是私人财产。如果这种‘强制’让她无法接受，她可以选择离开。”[引自 Engler, Op. Cit., p. 101]

菲沙研究所的主要目标是让人们相信，所有其他权利都必须服从于财富占有权。在这个例子中，布洛克清楚地表明，在私人财产制度下，只有老板才拥有“能够”（freedom to）的自由；而且为了维护这一权利，他们还希望确保自己拥有“豁免”（freedom from）的自由。

因此，当资本家们高谈阔论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时，他们真正指的是由国家所保护的、通过私人财产占有而剥削和压迫工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使他们能够持续积累巨额财富，并由此确保自身的权力和特权。自由民主国家的资本家阶级给予工人“更换主人”的权利（虽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权利通常并不存在），这绝不能证明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正如彼得·克鲁泡特金所言：“自由不是被赐予的，而是争取来的。” [Peter Kropotkin, *Words of a Rebel*, p. 43] 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你“自由”去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是你的主人允许你做的事情——这种“自由”无异于带着项圈和狗链的自由。

B.4.2 资本主义建立在自我所有权之上吗？

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作为主要的“自由意志主义”资本主义理论家，声称资本主义建立在“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的“基本公理”之上。他将这一“公理”定义为“每个人拥有绝对权利……控制自己的身体，不受强制干预。由于每个个体必须思考、学习、评估，并选择其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因此，自我所有权赋予人类在不受强制骚扰的情况下进行这些至关重要活动的权利。” [For a New Liberty, pp. 26-27]

乍一看，这一观点似乎颇具合理性。我们“拥有”自己，因此我们可以决定如何支配自身——这一概念具有直观的吸引力。这难道不正是自由的体现吗？因此，在这一观点下，自由被定义为“一个人对自己身体和其合法物质财产的所有权，未被侵犯或侵害的状态。”这一定义也使其能够与奴隶制形成对比。在奴隶制下，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拥有，“奴隶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自我所有权；他们的人身及其劳动产出，被奴隶主通过暴力系统性地剥夺。” [Rothbard, *Op. Cit.*, p. 41] 这意味着“自我所有权”可以被描述为奴隶制的对立面：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一种类似奴隶主对奴隶的支配权。这也意味着奴隶制是不公正的，因为奴隶主窃取了奴隶的正当财产，即他们的身体（及其相关能力）。这一概念有时被表达为人类拥有一种“自然的”或“不可让渡的”权利，即拥有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劳动的产物的权利。

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理解“自我所有权”概念的吸引力，但对此并不信服。与奴隶制类似，“自我所有权”将自由和个体性置于私有财产的范畴之内——因此，它与奴隶制最重要的主张相同，即人可以成为私人财产规则的客体。这种观念体现了一种异化的视角，并且暴露了其信条中根本性的缺陷。这一点可以从该公理在实践中的运用方式看出。如果“自我所有权”仅仅是“个体自主权”的同义词，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对此不会有异议。然而，资本主义理论家并不是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一“基本公理”的。“自我所有权”并非旨在捍卫自由，而是旨在为自由的剥夺提供正当性。它试图将社会关系（主要是雇佣劳动）描述为自由的体现，而事实上，这些关系本质上是支配与压迫的体现。换言之，“自我所有权”成为了限制甚至摧毁个体自主性的工具，而这一切竟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

这一点在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口号“人权即财产权”中暴露无遗。如果这一主张成立，就意味着权利可以像其他财产一样被让渡、出租或售卖。此外，如果一个人没有财产，那么他就没有人权，因为他没有可供行使人权的空间。正如另一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安·兰德（Ayn Rand）所说：“在他人财产上，不可能存在不受限制的言论（或行动）自由权。”[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p. 258] 换言之，如果你身处他人的财产范围内（例如工作场所中），那么你就没有任何基本权利，除了免受伤害的权利（然而，老板们往往通过忽视健康与安全问题而公然侵犯这一权利）。

“自我所有权”理论正是对这种状况的辩护。你已经出租了你自身的“财产”（即劳动力），因此雇主就有权决定你做什么、何时做以及如何做。因此，财产权与自由发生了直接冲突。如果认为“人权即财产权”，那么在实践中，人权就必然会被持续侵犯，因为财产权与自由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这并不奇怪，因为“财产权”理论本身，就是为了正当化对他人自由的剥夺以及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而创造出来的。

很明显，一旦考虑到私有财产及其分配问题，“自我所有权”（或“人身财产”）理论就会陷入困境。简而言之，资本家支付工人工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从事罗斯巴德所列出的其他“重要活动”（例如学习、评估、选择目标和手段）——除非这些活动符合公司盈利的需要。否则，工人完全可以确信，任何在公司时间内进行此类“重要活动”的努力都将会受到“强制性干涉”的阻挠。因此，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的基础）在实践中否定了“自我所有权”所包含的权利，从而使个人被剥夺了其基本权利。正如米哈伊尔·巴枯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出卖了自己和自己的自由。”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187]

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中，“财产”不会成为权力的来源，因为使用权与占有权是统一的（即私有财产被占有制取代）。例如，你仍然可以把醉汉赶出你的家门。但是，在一个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制度（即资本主义）中，财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并通过等级制度构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权威。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建立在“一种特殊形式的威权控制之上，即通过私人所有权和控制所实现的，这是一种极其僵化的支配体系。”当“财产”只是个体所实际使用的物品（即占有）时，它不会成为权力的来源。然而，在资本主义下，“财产权”不再与“使用权”相一致，因此它变成了对自由的否定，并成为对个人施加权力和控制的工具。

正如我们在关于等级制度的讨论中所看到的（见 [A.2.8 节](#) 和 [B.1 节](#)），所有形式的威权控制都依赖于“强制性干涉”，即——使用处罚或威胁使用处罚。在资本主义下，公司内部的等级制度无疑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体现。鲍勃·布莱克（Bob Black）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的专制天性：

“[成年人] 度过最多时间并受到最严格控制的地方是工作场所。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普通成年人所经历的最大直接压迫，并非来自国家，而是来自雇佣他的企业。你的工头或主管在一周内发出的‘否则——’的命令，比警察在十

年内对你下达的还要多。” [“The Libertarian as Conservative”, *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 p. 145]

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控制无疑是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公然践踏。在那里，工厂通常“被铁丝网包围。在上锁的门后……工人们受到警卫的监督，他们会因最微不足道的借口殴打和羞辱工人……每个工人每天可能要重复相同的动作——缝制裤带、缝合袖子——达两千次之多。他们在极度明亮的灯光下工作，每班持续十二到十四小时，工厂内部闷热难耐，如厕休息时间极少，且饮水受到限制（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而即使能够获得水源，往往也是污浊不堪、不适合人类饮用的。”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所能创造的利润”，“每项任务的时间都被精确计算到万分之一的单位。” [Joel Bakan, *The Corporation*, pp. 66-7] 虽然在发达国家，由于工人阶级长期的组织和斗争，这种控制的形式通常不会如此极端，但其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只有诡辩家才会宣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拥有”他们自己及其能力——然而，这正是“自我所有权”理论的拥护者所坚持的论点。

因此，如果“自我所有权”一词意指“个人自主权”，那么资本主义显然并非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讽刺的是，“自我所有权”理论反而被用来削弱并摧毁真正的自我所有权，尤其是在工作时间（甚至可能扩展到其他领域）。其逻辑非常简单：既然我拥有自己，那么我也能够出卖自己，尽管很少有“自我所有权”理论的支持者会如此直白地承认这一点（正如我们在 F.2.2 节讨论的那样，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就因为这一原则带来的逻辑上的结果从而接受“自愿奴役”）。取而代之，他们强调我们“拥有”我们的劳动，并将其作为契约对象供他人使用。然而，与其他形式的财产不同，劳动无法被割裂和异化。因此，当你出售你的劳动时，你实际上是在一段时间内出售你自己、你的自由。通过出让你的劳动力，你实际上是在出让你的本质存在、你的个性，在这段时间内被剥夺了自主权。

因此，“自我所有权”反而成了为专制社会关系辩护的工具，而这些关系本身恰恰否定了它所声称捍卫的自主性。事实上，这种关系与奴隶制存在相似之处——而这正是“自我所有权”理论的倡导者们最喜欢用来对比的对象。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否认这一点，但古典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却无意中泄露了真相，他直接将二者进行了比较。这里值得对他的话进行详细引用：

“一个大资本家，一家工厂的所有者，如果他像西印度种植园主那样使用奴隶而不是自由劳工，那么他就会被视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共同所有者。简而言之，他将同时拥有两种生产工具——因此，全部产品都将完全归他所有，不需要与他人分享。

那么，在雇佣工人并支付工资的情况下，有什么不同呢？领取工资的工人出售自己的劳动，无论是一天、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具体时间视情况而定。而支付工资的制造商则购买这些劳动，无论是一天、一年，或任何约定的时间。因此，他与使用奴隶的制造商一样，都是这些劳动的所有者。唯一的区别仅在于购买方式的不同。奴隶主，一次性购买了一个人一生可以提供的全部劳动；而支

付工资的资本家，则仅购买工人在一天或其他规定时间内所能提供的劳动。然而，既然资本家是其所购买的劳动的所有者，就如同奴隶主是其奴隶劳动的所有者一样，那么，这些劳动与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全部产品，自然也全部归资本家所有。在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状态下，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本家同时拥有两种生产工具，而全部生产成果都归其所有。” [《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引自 David Ellerman，《经济学中的财产与契约》，Property and Contract in Economics, pp. 53-4]

因此，奴隶制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之间唯一的“区别”仅在于“购买方式”的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本身及其产出都归“大资本家”所有。正如罗斯巴德所说，在工作时间内，工人“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自我所有权；他的身体和他的劳动成果被他的主人系统地剥夺”。难怪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将雇佣劳动更准确地称为“工资奴役”，因为在工作日的持续时间内，老板实际上拥有工人的劳动能力。而由于劳动能力无法与工人自身剥离，这意味着老板实际上控制着工人——并将他们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以此作为“雇佣”的代价！

当然，其中确实存在关键的差异。在奴隶制时期，成为奴隶并非自愿选择，奴隶无法更换主人（尽管在某些文化中，如古罗马，人们可以主动卖身为奴，而“《圣经》也认可自愿奴役” [Ellerman, Op. Cit., p. 115 and p. 114]）。然而，在工资奴役制度下，即便人们并非被迫接受特定的工作，并且可以更换雇主，这仍然无法改变双方之间所建立的权力关系。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的那样，认为工人可以辞职的论点，实际上无非是在说“喜欢就接受，不喜欢就走人！”，而这种说法完全回避了问题的本质。绝大多数人无法避免雇佣劳动，并且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雇佣状态。将自己的劳动/自由，以碎片化的方式在一生中不断出卖，与一次性出售自己一生的劳动几乎没有本质区别。更换向谁出卖自己的劳动/自由，并不改变劳动被异化的事实及其体验。

这正是“自我所有权”理论的悖论所在。它表面上假定个人具有自主权，但实际上却用来否定这种自主权。为了签订契约，工人必须行使自主权，决定是否“有利”于将其财产（即劳动能力）出租或出售给他人（考虑到另一种选择是贫困，工人“同意”签订契约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被出租或出售的并不是一件普通的财产，而是一个拥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个体。一旦契约达成，财产权发生转移，工人便不再拥有自主权，而是被视为生产要素或商品，与其他生产资料一样被管理和支配。

在“自我所有权”理论中，这种情况之所以被视为合理，正是因为它将人及其劳动能力视为财产。然而，工人无法将其劳动力单独送往雇主处使用。由于劳动力的本质，工人必须亲身处在工作场所才能使其“财产”被购买者所利用。因此，当工人签订契约，将其劳动（即“对自身的财产”）出租或出售给雇主时，其自主权（自由）便会受到限制，甚至被彻底剥夺，具体程度取决于所签署契约的具体情况。这是因为雇主雇佣的不是一件可以单独出售的财产，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建立在“自我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反而在实践中

否定了这一权利，使个人被剥夺了诸如言论自由、独立思考以及自我管理等基本权利——而这些权利，正是个体在被雇佣时必须放弃的。然而，根据罗斯巴德的说法，这些权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产物，因此，雇佣劳动不仅使个体与其劳动能力和创造力相异化，也使其与自身的基本权利相异化。因为工人并不是在出售自己的技能——技能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必须出售自己的时间和劳动能力，也就是说，出售他们自己。因此，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自我所有权”的权利始终被置于财产权之下，工人唯一被留下的“权利”就是寻找另一份工作（尽管在某些国家，如果雇员欠公司债务，这一权利甚至也会被剥夺）。

值得强调的是，这并非“自我所有权”原则的某种奇特悖论，恰恰相反，这一学说最早由约翰·洛克所系统阐述。他认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个体，拥有财产权。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然而，他同时又主张，一个人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出售其劳动服务，以换取工资”。购买了劳动的雇主便同时拥有了劳动本身及其产出。“因此，我的马吃掉的草、我的仆人砍下的草皮、我在与他人共同享有权利的地方挖掘的矿石，都会在经过任何人同意或分配的情况下，成为我的财产。（因为）那些属于我的劳动……已经在他们上烙下了我的财产权。”[《政府论（下篇）》第 27 节、第 85 节和第 28 节]

由此可见，一旦一个人（仆从）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雇主，其地位便与动物（马匹）无异。雇佣劳动否定了工人的基本人性和自主权。私人财产制度并未促成社会中的平等关系，反而制造了支配与异化的关系。对此，蒲鲁东曾作出这样的比较：“只要一个合作关系持续下去，利润和损失便应当由合作双方共同分担；因为每个人的生产行为并非为自己，而是为整个社会。当分配时刻到来，考量的对象不是生产者，而是合作者。因此，种植园主给予奴隶稻草和米饭，资本家向工人支付永远过低的工资——尽管他们同其雇主一起从事生产，但却并未与其建立合作关系，因此在分配过程中，他们被忽视了。同样，那些为我们拉车的马匹……它们与我们共同创造财富，但并未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我们获取了它们的产出，却没有与它们共享。这些被我们雇佣的动物与工人，在与我们的关系上毫无区别。”[《什么是所有权？》，第 226 页]

因此，当资本主义者洛克将人类与动物进行类比时，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则对这种将人变成他人资源的制度的根本不公提出抗议。而我们确实是指“资源”，因为“自我所有权”理论同时也是让穷人沦为富人备用零件的手段。毕竟，穷人“拥有”自己的身体，因此可以将其全部或部分地出售给愿意购买的人。这意味着，经济困境中的人可以将自己的身体部位卖给富人。最终，“如果告诉一个穷人，他之所以拥有财产，是因为他还有胳膊和腿——因为他所忍受的饥饿以及他露宿街头的能力是他的财产——这只是玩弄文字游戏，是对他伤害之上的又一次侮辱。”[蒲鲁东，Op. Cit., p. 80]

显然，劳动的能力并不是一个人的“财产”——而是他们的“占有物”。使用与所有权在其中是融合的，无法被分离。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认为奴隶制错误的理由中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认为奴隶制错误，是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天然的财产权；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奴隶制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每个人都天然地享有自由

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前一种权利是能让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确保了多数人为那些掌握生活资料的人劳动；而后一种权利则是不可让渡的，只要一个人仍然是人，自由或自我决定就不是一种可以被收购或放弃的所有权要求，而是身而为人的一种不可分割的存在方式。

无政府主义者对人类自由不可让渡性的立场，也构成了无产者要求获得必要生产资料的基础。正如蒲鲁东所指出的：“在占有与财产的区分之上，产生了两种权利：其一，*jus in re*，即物之中的权利，即使我的财产落入他人之手，我仍有权利索回；其二，*jus ad rem*，即之于物的权利，它给予我成为所有者的权利……前者是占有与财产的统一；后者则仅仅包含所有权。对于我而言，作为劳动者，我有权占有自然与自身劳动的产物；但作为无产者，我却无权享有这些产物。因此，正是基于 *jus ad rem* 的原则，我要求进入 *jus in re* 的范畴。”[Op. Cit., p. 65] 由此可见，为了使劳动者真正拥有其劳动和劳动产物，而非仅仅成为一场闹剧，必须废除财产制度——不仅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还包括对自由及其真正含义的界定。

因此，与罗斯巴德的主张相反，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利用“自我所有权”的修辞，来剥夺人们对真正“自我所有权”的权利；而这种剥夺正是源自私人财产所造就的威权主义职场结构。如果我们追求真正的自我所有权，就不能在我们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放弃它，沦为“工资奴隶”。唯有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而非资本主义，才能使“自我所有权”成为现实：

“他们谈论‘固有权利’、‘不可让渡的权利’、‘自然权利’等……除非平等的物质条件得以实现，否则宣称人类平等无异于一种嘲弄。而且，除非平等存在（在此我指的是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充分发展自己），否则无论是思想、言论还是行动的自由，都同样是虚妄之谈……只要工人阶级仍然在他们铺设的街道上跋涉，在他们清理的污秽中摸索，在他们挖掘的下水道中劳作，却不得不匆忙离开街头，以免被警察呵斥‘快走开’；只要他们仍然在工厂间奔波，哀求获得成为奴隶的机会，承受老板和领班的侮辱，在他们亲手建造的工厂里，在他们打造的机器旁，一遍遍地听到‘不行’和摇头拒绝的回应；只要他们仍然甘愿像牲畜一般被赶入城市，一年又一年地被逐出被抵押的土地——那片他们曾开垦、施肥、耕种，并赋予价值的土地……只要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某种外部力量，无论是上帝、牧师、政客、雇主，还是慈善机构，来改变现状，那么解放就永远不会到来。唯有当他们认识到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劳动者联合会的可能性，而这一联合会的各组成部分将接管土地、矿山、工厂，以及所有生产工具……简而言之，劳动者自己管理工业生产，不再受立法者或雇主的规制干预，届时我们才可以寄希望于唯一真正有效的救助——自助；才能够保障言论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权利）的惟一条件（且不需要任何书面担保的）。”[沃尔泰丽娜·德克莱尔，《沃尔泰丽娜·德克莱尔文选》，第 4-6 页]

总之，如果“自我所有权”意味着“自我决定”或“个人自主”，那么资本主义与这一理念是根本矛盾的。然而，意识到“自我所有权”理论的真正目的，正是为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及其对自由的限制提供辩护，这并不意外。与其说它是对自由的捍卫，不如说它是为了自由的侵蚀而设计的。要使“自我所有权”概

念所蕴含的自主承诺成为现实，私人财产制度必须被废除。

关于以“自我所有权”和“财产权”来定义自由的局限性、矛盾及谬误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 F.2 节。

B.4.3 但是没人逼着你为他们工作！

当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声称，开始进行“雇佣劳动”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然而，由于历史上暴力手段的介入（例如通过战争掠夺土地），资本家阶级对国家的控制，以及资本积累的趋势——现在少数人掌控着巨额财富，剥夺了其他人自由获取生活资料的机会。因此，对生活资料的自由获取权的剥夺，最终是建立在“强权即公理”的原则之上的。正如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所指出的：“生活资料必须按照它们字面的意义来理解：即没有它们，生命便无法维持。剥夺人们对生活资料的获取，不仅仅是‘盗窃’……更是赤裸裸的谋杀。”[《重塑社会》，第 187 页]

大卫·埃勒曼（David Ellerman）也指出，过去的强制行为，导致了大多数人只能在统治阶级允许的选项范围内做出选择：

“资本主义思想的一个支柱性观点是认为……，奴隶制的道德缺陷在资本主义下已不复存在，因为工人不像奴隶，他们是自由人，可以自愿签订工资合同。然而，这只不过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对自然权利的剥夺程度有所降低，以至于工人仍然在法律上保留了一定的人格，并被视为自由的‘商品所有者’。因此，他们被允许自愿地将自己的劳动生涯投入市场交易。当强盗用枪支威胁他人，使其在‘交出金钱’或‘丧命’之间做出选择时；尽管可以说受害者是在‘自愿’地选择余下的选项，但这显然是一种抢劫。同样，当法律体系本身以资本的特权之名，剥夺工人的自然权利，并由国家的法律暴力予以背书时，‘自由意志’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不仅不会将其视为体制化的抢劫，反而会庆祝工人的‘自然自由’，认为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出卖劳动力和失业之间做出选择。”[引自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读本》，第 186 页]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依赖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主义的自然基础是雇佣劳动，在这种制度下，大多数人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的技能、劳动和时间，出卖给那些确实地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个体自营者的比例低于 10%（1990 年英国的自营劳动者占比仅为 7.6%，美国和加拿大约为 8%——但这个数据还包括雇主，因此真正的自营劳动者数量甚至更少！）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力市场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指出，尽管在法律上，工人与资本家被视为“自由”且“平等”的个体；但事实上，工人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奴隶的地位：

“在法律上，他们是平等的；但在经济上，工人是资本家的奴隶……因此，工人将自己和自己的自由出卖给资本家一段时间。由于饥饿的可怕威胁每天都悬在他的头上，并威胁着他的家庭，工人们处在奴隶的地位上；他不得不接受资本家、工业家和雇主根据盈利计算所强加的一切条件……工人始终有权利离开他的雇主，但他有手段这样做吗？没有，他离开只是为了把自己卖给另一个雇主。驱使他这样做的，正是最初迫使他卖身的那种饥饿。因此，工人的‘自由’……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自由，缺乏任何能够实现的手段，因此它只是一种虚假的自由，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是，工人的整个人生只是一个接一个令人惊恐的农奴制契约——从法律角度来看是‘自愿’的，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却是强制的——这些契约被短暂的‘自由’间隔开来，而这种‘自由’伴随着饥饿。换句话说，这是真正的奴役。”[《巴枯宁政治哲学》，第 187-188 页]

显然，一家公司不能强迫你为他们工作，但通常情况下，你必须为某个人工作。当然，这种情况是如何发展的却通常被忽视。通常会编造一个童话故事来忽视它，仿佛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童话里说少数聪明人通过储蓄和努力工作积累了资本，而懒惰的大多数人则争相为这些（几乎是超人般的）天才工作。正如一位右翼经济学家所说（虽然他专门讨论工业革命，但他的话今天依然被广泛引用）：

“工厂老板并没有能力去强迫任何人去做工厂工作。他们只能雇佣那些愿意接受他们提供的工资的人。尽管这些工资水平很低，但它们仍然远远超过这些穷人在任何其他领域能赚到的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类行为》，第 619-620 页]

请注意其中的假设。工人们恰好处于一种糟糕的选择境地——而雇佣阶层与此毫无关系。这些老板恰好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恰好没有财产，因此被迫按老板的条件出卖他们的劳动。国家执行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并维护拥有阶级的权力——只不过是众多巧合中的另一个。至于雇佣阶级可能直接参与那些减少工人选择权的国家政策，这种可能性甚至连提都不敢提。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用巧合解释一切的说法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事情变得更加严峻，因为拥有阶级显然受益于国家暴力的许多行为，以及一整套法律框架，用以限制工人可用的选择。显然，我们似乎被要求相信，国家由富人和拥有阶级控制，而非工人阶级——只是一种巧合；同时，许多反工人的法律和实施的实施也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事罢了。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荒谬的言论及其背后的假设和捏造今天仍然在被兜售。它被用来回应“跨国公司在贫困国家剥削人民”的抗议。是的，毫无疑问，跨国公司确实在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富裕国家的工资：这也是为什么它们选择去那里做生意的原因。然而，有人辩称，这种情况与其他可用的选择相比，代表了经济上的进步。因为公司并没有强迫工人加入它们，而工人原本会继续做之前的工作，所以所谓的“剥削”指控是错误的。有人还强调，难道你会为了工资更低、条件更差的工作，而离开你现有的工作吗？事实上，老板通过支付如此低的工资，而以高价在发达国家销售这些产品，实际上是在帮工人一个大忙。

因此，正如工业革命时期一样，今天（以跨国公司形式存在的）资本家，也趋向于那些人权记录糟糕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死亡小队会折磨工会和农民合作社的组织者，并让他们“消失”；在最好的情况下，组织工会的尝试可能会让你被逮捕、解雇并列入黑名单。这些国家的农民由于政府政策偏袒大地主而被迫离开土地。同样巧合的是，欧美政府的外交政策专门致力于确保这些反工人的政权继续掌权。显然，这些政权深受跨国公司的青睐，而这些国家也不遗余力地提供一个“市场友好型”的气候，以吸引跨国公司在这些地方设立血汗工厂。同样看起来巧合的是，这些国家的控制者是当地的富有阶层，而这些富人阶层受到了跨国公司在这些地区投资的经济压力。

显然，当一个被抢劫的人将自己的钱交给劫匪时，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比“下一个最好的选择”更好。因此，工人们同意按老板提供的条件卖掉自己的劳动，确实是因为“下一个最好的选择”更糟（极端贫困或饥饿对一些人来说显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指出的那样，资本家们通过国家的系统性手段，限制了大众的选择；通过改变了工人可以在老板条件下出卖劳动的环境，创造了一个劳动处于买方市场^①的局面。然后，当有人对这种状况提出批评时，资本主义的回应是，工人们“自愿同意”在这些条件下工作——这无疑是虚伪。问题是，抢劫者（国家）仅仅是另一个犯罪分子（拥有阶层）的代理人（雇佣的打手），这改变了什么吗？

因此当现实情况是，工人并不需要在枪口下被迫进入特定的工作岗位，因为资本阶级和国家在过去（而且通常是现在），通过“使用暴力”的手段，创造了我们做出就业决策的客观条件时——对于“自由市场”的赞美似乎显得有些虚伪。在任何具体的劳动合同发生之前，工人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而由此产生的“劳动力”市场通常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优势）。虽然我们通常可以选择为哪个资本家工作，但总的来说，我们不能选择为自己工作（自雇的经济部分极为微小，这很好地说明了资本主义自由的虚伪）。当然，离开工作并寻求其他工作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像资本主义下的大多数自由一样，实际用途有限，并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反个体现实。

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说：

“从人类角度来看，这种（关于劳动市场的）假设意味着工人收入的不稳定，职业标准的完全缺乏，卑微地准备好被随意地使唤吆喝，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变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正当地认为，如果工人们‘不是作为工会成员行事，而是根据劳动市场调整自己的要求并改变工作地点和职业，他们最终会找到工作’。这正是基于劳动商品化假设下的局面总结得到的。商品不应决定自己应该在哪里销售、用作什么目的、以什么价格交换、以什么方式消费或被摧毁。”[《大转型》，第176页]

（尽管我们应该指出，冯·米塞斯关于工人“最终”会找到工作的论点，虽然听起来微妙且模糊——例如，“最终”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但却与实际

^① 译注：买方市场，指供应超过需求，导致价格下降的市场状况

经验相矛盾。正如凯恩斯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所指出的，19 世纪的工人“如果失业，必须迅速重新部署，否则就得饿死（即使在 19 世纪的经济环境中，这一特点也未能防止长期的经济衰退）”[《1990 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第 31 页]。工人“减少需求”实际上可能会加剧经济衰退，导致短期内的失业增加，延长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我们将在 C.9 节更详细地讨论失业问题和工人“减少需求”的问题。）

有时有人辩称，资本需要劳动，因此两者在提供的条件上应该平等地协商，因此劳动市场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但为了使资本主义建立在真正的自由或真正的自由协议上，资本和劳动的双方必须在议价能力上平等，否则任何协议都会偏向更强势的一方，牺牲另一方的利益。然而，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以及为保护私有财产所需的国家，无论理论上如何，这种平等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是，在通常情况下，资本家在“自由”劳动市场上拥有三项优势——法律和国家将财产权置于劳动权之上；失业在大部分经济周期中普遍存在；以及，资本家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支撑自己。我们将逐一讨论这些优势。

首先，财产所有者拥有法律和国家的支持，这确保了当工人罢工或采取其他直接行动（甚至当他们试图成立工会时），资本家可以得到国家的全力支持，雇佣临时工、破坏罢工队伍或解雇“罪魁祸首”。这显然增强了雇主在谈判中的优势，使工人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处境可能让工人三思而后行，不敢为自己的权利站出来）。

失业在大部分经济周期中存在，确保了“雇主在劳动市场中具有结构性优势，因为通常会有更多的候选人……而不是职位空缺来填补”。这意味着，“劳动市场中的竞争通常偏向于雇主：这是一个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中，是卖方需要做出妥协。对劳动力的竞争不足，以确保工人的需求总是得到满足。”[朱丽叶·B·肖尔，《超负荷的美国》，第 71 页，第 129 页] 如果劳动市场普遍倾向于雇主，那么这显然使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失业的威胁以及与之相关的困难，会鼓励工人接受任何工作并在就业期间服从老板的要求和权力。换句话说，失业起到了对劳动的规范作用。失业率越高，找到新工作的难度就越大，这提高了失去工作的代价，并使工人更不可能罢工、加入工会或抵抗雇主的要求等等。

正如巴枯宁所言，“财产所有者……同样被迫寻求并购买劳动力……但不是在相同的程度上……提供劳动力的人和购买劳动力的人之间，[没有]平等。”[《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 183 页] 这确保了任何“自由协议”都比工人更有利于资本家（有关于当条件偏向于工人时，充分就业期间的内容，请参见[下一节](#)）。

最后是财富不平等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差异。资本家通常在罢工期间和等待找到员工时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例如，大型公司有许多工厂，如果某个工厂罢工，他们可以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工厂）。通过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资本家可以比工人坚持得更久，从而使雇主在谈判中占据更强的优势，确保劳动合同对他们有利。亚当·斯密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预见[工人和资本家]的哪一方，在所有普通情况下……必须迫使对方同意他们的条件，是不难的……在所有这些争端中，老板们通常能坚持得更久……即使他们不雇佣一个工人，[老板们]通常也能靠自己已经拥有的存货维持一到两年。然而许多工人无法维持一周，仅有少数人能维持一个月，而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年内没有工作地生存下来。从长远来看，工人可能对老板的依赖程度与老板对工人的依赖程度一样重要；但这种依赖性并非如此紧迫……在与工人的争端中，老板们通常占有优势。”[《国富论》，第 59-60 页]

事情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因此，尽管的确没有人强迫你为他们工作，但资本主义体制使得你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在“自由市场”上出卖你的自由和劳动。不仅如此，劳动市场（也就是使得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那个市场），（通常情况下）偏向雇主，从而确保在其中达成的任何“自由协议”都有利于老板，并使工人屈从于统治和剥削。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面对我们所指出的劳动市场上的劣势，无政府主义者支持集体组织（如工会）和抵抗（如罢工）、直接行动和团结，以使我们比我们的剥削者更有力量，甚至取得重要的改革和改善（最终，改变社会）。（用蒲鲁东的话说）与财产相关的专制，是由那些受其支配的人所抵抗的；也不用说，老板并非总能够笑到最后。

B.4.4 但是劳动力高度紧缺的时期又怎样？

当然，确实有一些时期，劳动需求超过供应，但这些时期也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萎缩的种子，因为工人们处于一个极好的位置，可以单独或集体地挑战自己作为商品的角色。这个问题在 C.7 节（是什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中，有更详细的讨论，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再展开。现在只需指出，在正常时期（即大部分商业周期内），资本家往往对工人享有广泛的权威，这种权威源自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平等的议价能力，正如亚当·斯密和许多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

然而，这在劳动需求高涨的时期会发生变化。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假设供需在大致上相当。显然，这种情况对工人是有利的。老板不能轻易解雇工人，因为没有人能取代他们，而工人们可以通过集体的团结或个人的“退出”（即辞职并换工作），来确保老板尊重他们的利益，甚至将这些利益推向极限。老板发现自己很难保持权威，或者无法阻止工资上涨并造成利润萎缩。换句话说，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工人的力量会随之增加。

换个角度来看，赋予某人雇佣和解雇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的权利，会使该个人对这些投入品拥有相当大的权力，除非这些投入品可以毫无成本地流动；也就是说，除非投入品是完全流动的。在现实生活中，这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时期才会接近于现实，因此劳动力的完全流动性会对资本主义企业造成问题，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工人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资本家，因此工人的努力程度更多地由工人们

的决策（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决定，而不是由管理者的权威决定。解雇的威胁不能用作增加工作努力和生产的手段，因此充分就业增加了工人的力量。

由于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源的固定承诺，这种情况是无法容忍的。这种时期对企业不利，因此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中很少出现（我们必须指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设所有投入品——包括资本——都是完全流动的，因此这种理论忽视了现实，甚至假定了资本家生产本身的存在！）。

在上一个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即战后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权威的崩溃以及这种情况对统治精英的恐惧。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1975年的报告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的观点，该报告试图“理解”公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根据该报告，在充分就业时期，出现了“过度的民主”。换句话说，由于工人在劳动需求高涨时期获得了更强的谈判权力，人们开始关注并行动起来，考虑自己作为人的需求，而不是作为体现劳动力量的商品。这自然对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威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人们不再感到必须服从那些他们以前认为在年龄、等级、地位、专业、品格或才能上优于自己的人”。

这种对强制和服从的束缚的松动，导致了“以前处于被动或未组织状态的群体——黑人、印第安人、奇卡诺人、白人族裔群体、学生和女性……开始采取一致行动，提出自己应得的机会、回报和特权，这些他们以前认为自己并不应得的东西。”

这种“过度”的政治参与，当然对现状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对撰写报告的精英们而言，“有效运作的民主政治系统，通常需要一些个人和群体的冷漠和不参与……这些群体的边缘化本身在内在上是民主的，但它也是使民主能够有效运作的因素之一”——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公理。这样的表述揭示了建制派“民主”概念的空洞性：为了有效运作（即服务于精英利益），民主必须“内在地不民主”。

任何让人们感到自己有力量的时期，都会促使他们与同伴交流、识别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并抵抗那些剥夺他们自主管理自己生活自由的力量。这种抵抗对资本主义将人视为商品的需求造成了致命打击，因为（引用波兰尼的话）人们不再认为“商品不应决定自己在哪里出售、用作何种目的、应该以什么价格进行交易，或者如何被消费或摧毁。”相反，作为有思想和感情的人，他们行动起来，重新夺回自己的自由和人性。

正如本节开头所指出的，关于这种赋权和反抗的经济效应将在 C.7 节中讨论。我们将引用波兰经济学家米哈伊·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的话来结束本节，他指出持续的资本主义繁荣并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1943 年，为了回应更加乐观的凯恩斯主义者，他指出：“为了维持高就业水平……在随后的繁荣期，可能会遇到‘商业领袖’的强烈反对……持续的充分就业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喜好。工人们将‘失控’，‘工业巨头’将急于‘给他们一点教训’，因为在永久充分就业的体制下，‘解雇’将不再起到纪律约束的作用。老板的社会地位将受到削弱，工人阶级的自信和阶级意识将增长。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罢工将制造政治紧张……‘工厂纪律’和‘政治稳定’，比利润更受商业领

袖的重视。他们的阶级利益告诉他们，持续的充分就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不稳妥的，而失业则是正常资本主义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自 Malcolm C. Sawyer 的《米哈伊·卡莱茨基经济学》，第 139 页和第 138 页]

因此，当劳动需求超过供应的时期对资本主义并不健康，因为它们使人们能够主张自己的自由和人性——这对系统来说是致命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新增就业岗位的消息会导致股市暴跌，以及为什么资本家如今如此热衷于维持“自然的”失业率（既然必须维持它，就说明它并不是“自然的”）。我们必须指出，卡莱茨基还准确预测了“大企业和租金利益集团”之间会形成“强大集团”来反对充分就业，并且“他们可能会找到不止一位经济学家，来宣称这种情况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各种外力施加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大企业的压力”将“促使政府回归……正统的政策。”[卡莱茨基，引用自 Sawyer，《米哈伊·卡莱茨基经济学》，第 140 页] 这正是 1970 年代发生的事情，货币主义者和其他“自由市场”右翼团体，为企业领导的阶级战争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并且这些“理论”（一旦付诸实践）会迅速产生大规模的失业，从而教会了工人阶级所需的“教训”。

因此，尽管对利润产生不利影响，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的时期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要的，用以“规范”工人并“教训”他们。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很少能产生接近充分就业的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并不符合它的利益（另见 C.9 节）。资本主义的动态使得衰退和失业不可避免，就像它也使得（创造这些动态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一样。

B.4.5 但是我想“被置之不理”!

支持放任资本主义的群体，如“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宣称他们希望“被置之不理”，这本身就很讽刺，因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允许这种情况。正如麦克斯·施蒂纳所表达的：

“无休止的获取让我们无法喘息，无法平静地享受。我们得不到财物带来的安慰……”[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 268 页]

资本主义不让我们“喘息”，因为它需要不断增长，否则就会死亡，这对工人和资本家都造成了持续的压力（见 D.4.1 节）。工人们永远无法放松或摆脱失业的焦虑，因为如果他们不工作，就吃不上饭，也无法确保他们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在工作场所，他们并不会被老板“置之不理”，去管理自己的活动。相反，他们被告诉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如何做。事实上，资本主义公司中关于工人控制和自我管理的实验历史，验证了我们的观点：对于工人来说，资本主义与“被置之不理”的愿望是无法兼容的。我们将使用通用电气公司在 1968 年到 1972 年之间进行的“领航员计划”，作为一个例子。

通用电气公司所提出“领航员计划”，是作为克服他们在马萨诸塞州林河工

程中、引入数控机床时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手段。由于车间内的紧张局势、生产瓶颈和低质量产品，通用电气的管理层尝试了一种基于工人控制生产的“岗位充实”方案，并首先在工厂的一个区域实施。到 1970 年 6 月，参与的工人已经实现“独立自主”（正如一位经理所说的那样），并且“在集团岗位扩大的方面，这时领航员计划才真正开始，立刻产生了提高产量和机器利用率、减少制造损失的效果。正如两年后的一位工会官员所说，‘我们打破了通用电气的一项传统政策（即工会永远不能参与管理业务），这一点本身就让人感到满足，特别是当我们能够把成功展示给他们时。’” [David Noble, 《生产力量》，第 295 页]

在初期的怀疑后，对参与的工人来说该项目最终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工厂中的其他工人也渴望参与，于是工会很快就尝试将其推广到整个工厂，并扩展到通用电气公司的其他地方。该计划的成功在于，它是基于工人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是由老板指示他们做什么——“我们是人类，”一位工人说道，“我们希望被当作人类来对待。” [引用自 Noble, 《生产力量》，第 292 页] 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意味着能够自由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各个方面，包括生产。

然而，在工人们控制自己工作生活的不到一年后，管理层停止了该项目。为什么？“在一些管理层对这项‘试验’的支持者眼中，领航员计划被终止是因为整体管理层拒绝放弃任何传统的权威……领航员计划碰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谁来管理车间？” [Noble, 《生产力量》，第 318 页]

Noble 继续论述，对于通用电气的高层管理来说，“工会希望扩展该计划的愿望，看来是朝着工人对生产的更大控制迈进的步骤，因此，也就对根植于私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传统权威构成威胁。所以，终止的决定不仅是在捍卫生产主管和厂长的特权，也是在捍卫财产所有权所赋予的权力。”他指出，这一结果并非孤立事件，且“通用电气领航员计划的终结，遵循了此类‘岗位充实实验’的典型模式” [Op. Cit., 第 318 页和第 320 页]。尽管“数十个已经经过充分记录的实验表明，当工人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工作决策时，生产率会提高，社会问题也会减少” [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研究，引用自 Noble, 《生产力量》，第 322 页]，但这些方案最终都会被寻求维护自身权力的老板终止，而这种权力正源自于私有财产。

正如一位参与通用电气领航员计划的工人所说：“我们只想被置之不理。”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这种待遇——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根本不允许这种可能性（正如 Noble 正确指出的，“管理层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控制他人的生活” [Op. Cit., 第 294 页和第 300 页]）。尽管生产力有所提高，工人控制的项目却被废弃，因为它们削弱了资本家的权力——而通过削弱他们的权力，你也可能削弱他们的利润（“如果我们都是一体的，从制造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公平地分享成果，就像一个合作社企业一样。” [通用电气领航员计划工人，引用自 Noble, 《生产力量》，第 295 页]）。

正如我们在 J.5.12 节中更详细地论述的，利润最大化可能与效率相冲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可能通过推动不太高效的生产方式（即等级制的生产方式对比平等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损害整体经济，因为这样做符合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

主义市场也会奖励这种行为。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利润是未支付的劳动。如果你赋予劳动者权力，给工人控制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会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最好地完成工作），但你会削弱工作场所中的权威结构。工人会寻求更多的控制（自由会自然地尝试扩展），而这正如领航员计划中的工人所清楚看到的，这意味着一个合作社性质的工作场所，在那里是工人，而不是管理者，决定如何处理产生的剩余价值。通过威胁权力，你也威胁到了利润（或者更准确地说，威胁到谁控制利润以及利润的去向）。在控制生产以及控制剩余价值的局面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企业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方案，回归到旧有的、效率较低的等级制方案就并不意外——“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直到告诉你做完了为止。”这种体制显然不适合自由人，而且正如 Noble 所指出的，取代通用电气领航员计划的体制“旨在‘打破’工人们新获得的‘自力更生、自律和自尊’的‘习惯’” [Op. Cit., 第 307 页]。

因此，资本主义公司中工人控制项目的经验很好地表明，如果你是一个工资奴隶，资本主义是无法“置你不理”的。

此外，资本家自己也无法放松，因为他们必须确保工人的生产力增长快于工人工资，否则他们的生意就会失败（参见 C.2 和 C.3 节）。这意味着每个公司必须创新，否则就会被淘汰，面临破产或停工的命运。因此，老板也无法“置之不理”——他们的决策是在市场力量的压力下做出的，是竞争对个体资本家施加的必然要求下作出的。无休止的积累——在此背景下，为了在市场上生存而积累资本的必要性——始终困扰着资本家。由于未支付的劳动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关键，工作必须持续存在并增长——这就要求老板控制工人的工作时间，以确保他们生产的商品数量超过他们所获得的工资。老板既不能“置之不理”，也置工人不理。

这些基于私有财产相关的权威关系和无情竞争的事实，确保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想要被“置之不理”这一愿望无法得到满足。

正如穆雷·布克钦所观察到的：

“尽管他们声称自治并且不信任国家权威……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最终并不认为，个人能够完全摆脱法律的约束。事实上，他们对自治的解释，实际上预设了超越个人的某些明确安排——尤其是，市场法则。与个人自治相对的是，这些法则构成了一种社会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个体集合’都受制于著名的‘无形大手’——竞争的力量。自相矛盾的是，市场法则压倒了那些‘自由意志’的行使，而这些‘自由意志’本应属于那些组成‘个体集合’的主权个体。” [《公社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民主维度》，《民主与自然》第 8 期，第 4 页]

人类互动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政府主义所提议消除的，只是那些不受欢迎的社会互动和权威强加的东西，而这些恰恰是资本主义及任何等级式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例如国家社会主义）所固有的。隐士最终会变得不像人类，因为社会互动丰富并发展了个性。资本主义可能试图将我们降格为仅仅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隐士；但这种对我们人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必然滋生反抗的精神。

实际上，市场的“法则”和资本的等级制度永远不会“置人不顾”，反而会击碎个性和自由。然而，资本主义的这一方面与人类的“自由本能”相冲突，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描述的那样，因此，任何被压迫的人民都会产生一种反抗和激进化的趋势（参见J节）。

最后一点。想要“置之不顾”的愿望，常常表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一种是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管理自己的事务；另一种是老板和地主希望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更多的控制权。然而，这种财产所有者对财产行使的权力，同样也被用来支配使用这些财产的人。因此，“置之不顾”这一概念在一个阶级分化和等级化的社会中，包含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方面。显然，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第一种本质上是自由意志主义的方面——即渴望以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但我们拒绝第二种方面，以及任何认为让那些掌权者被置之不理，会对被统治者有利的观点。相反，被统治者的利益，在于将那些掌权者置于尽可能多的控制之下——原因显而易见。

因此，劳动人民的自由程度，与他们限制老板被“置而不顾”的能力成正比。无政府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目标，就是确保那些掌权者不会被“置而不理”地行使他们对被统治者的权威。我们视团结、直接行动以及工作场所和社区的组织，为干扰国家、资本家和财产所有者权威的手段，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彻底摧毁这些权威主义的社会关系。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一术语——在一个阶级社会中，它只能意味着保护强者（以“中立地”执行财产权及其所衍生的权力为名义），免受工人阶级的挑战。然而，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想要“被置之不理”所表达的、另一种自由意志主义愿景。这也是我们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永远无法真正实现这一愿望的原因——它被其等级化和竞争性本质所束缚——以及这种愿望如何被扭曲为“加强少数人对多数人控制”的手段。

B.5 资本主义

是否赋权并基于人类行为？

资本主义，特别是“自由意志”资本主义所提出的社会愿景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将“消费者投票”与“公民投票”进行比较。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当你在超市里投票时，你得到的正是你所投的选票，其他人也是如此。”这种通过一个人的腰包进行“投票”的方式，常被宣扬为人们在资本主义下享有的美妙的“自由”（并且与“社会主义”相对立，而且右翼人士总是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国有社会主义，后者将在第 H 节讨论）。然而，在评估这一主张时，消费与公民之间的差异就变得至关重要。

消费者在货架上选择的，是别人为了盈利目的而设计和制造的商品。消费者是最终使用者，本质上是一个旁观者而非行动者，仅仅是在别人创造的选项中做出选择。因此，市场决策本质上是被动的和反动的，即基于对他人发起的变化做出反应。相比之下，“公民”则积极地参与决策过程中所有阶段（至少理想上是如此），要么直接参与，要么通过选举代表参与。因为在去中心化和参与式民主组织中，公民的决策可以是积极主动的，基于人类的行动；这意味着个人主动、自行地设定议程。事实上，大多数支持“公民”模型的人，正是因为它积极地让个人参与社会决策，从而为过程创造了教育意义，培养了参与者的能力和权力。

此外，消费者的权力在社会中并不是均等分配的。因此，在市场背景中的“投票”一词所表达的概念，与通常所联想到的政治投票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政治投票中，每个人拥有一票，而在市场中则是每一美元一票。这种给某个人比其他数万个体还要有更多票数的“民主”，算是什么民主呢？

因此，“消费者”这一概念未能考虑市场中存在的权力差异，并且将个体赋予本质上是被动的角色。至多，他们只能通过购买力作为孤立的个体在市场上行事。然而，这种立场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正如 E·F·舒马赫所言：“买家本质上是一个寻求便宜货的购物者；他不关心商品的来源或生产条件。唯一关心的是用最少的钱获得最大价值。”他接着指出，市场“因此只关注社会的表面，它的意义仅仅关系到此刻的情境。它没有深入探讨背后事物的本质，无论是自然事实还是社会事实。”[《小即是美》，第 29 页]

事实上，“消费者”模型实际上反而阻碍了任何“探究”事物事实的尝试。首先，消费者很少知道他们所购买商品的意义或其影响，因为价格机制对他们隐瞒了这些信息。其次，由于市场的原子化性质，使得讨论“为何”和“如何”生

产，变得困难——我们只能在各种“什么”中做出选择。我们无法批判性地评估某些经济实践的利弊，我们只能在已生产好的商品之间做选择。当损害已经发生时，我们只能反动性地选择带来最少损害的选项（而且通常我们甚至没有这样的选择）。而要了解某个产品的社会和生态影响，我们必须采取积极主动角色，加入提供这类信息的团体（这些信息对理性决策至关重要，但市场无法也不会提供这些信息）。

此外，“消费者”模型也未能认识到，我们在市场上为满足我们的“需求”而做出的选择，实际是由社会和市场力量所决定的。我们所能渴望的东西，是相对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例如，人们之所以选择购买汽车，是因为通用汽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收购并摧毁了有轨电车网络；而人们之所以购买“快餐”，是因为工作时间的增加而使他们没有时间自己做饭。这意味着我们在市场上的决策往往受到经济压力的限制。例如，市场会迫使企业必须尽可能提高成本效益，否则将面临破产。那些污染环境、工作条件恶劣的企业通常会因此获得竞争优势，其他企业要么效仿，要么倒闭。由于“逐底竞争”的存在，个人只能做出“绝望的决定”以求生存。换句话说，个体对某些价值观的承诺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反向的经济压力实在是太过强烈（难怪罗伯特·欧文曾说利润动机是“对个人和公共幸福完全不利的原则”）。

当然，市场无法，也不会，提供我们作为消费者并不需要、但为了后代或出于生态原因所希望保护的商品。通过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和市场上其他“商品”的依赖，资本主义确保了除非我们把钱投入我们所说的事物，否则我们在保护生态系统、历史遗址等方面无从发言。对这些“资源”的长期保护被忽视，转而追求短期主义——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不“消费”这些产品，它们明天就不存在了。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面临生计压力的社会中，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永远无法为我们提供作为人类（无论是为他人、为后代还是为了保护地球）希望获得、但作为消费者无法承受或不愿消费的商品。

的确，将“消费者”模型转移到政治领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益主导的明显标志。这反映了政治机构规模的不断扩大，强化了之前所提到的趋势：选民逐渐变成被动的旁观者，将他们的“支持”寄托于某个“产品”（即政党或领导人）。正如穆雷·布克钦所言：“受过教育、知识渊博的公民，最终仅仅变成了纳税人，用金钱交换去‘服务’。”[《社会重塑》，第 71 页]而在实际上，由于国家的集权主义，这将政治过程变成了市场的延伸，公民被降格为“消费者”。或者用埃里希·弗洛姆的恰当分析来说：“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机器的运作与商品市场的运作本质上并无太大不同。政党与大型商业企业相差无几，而职业政治家试图将他们的商品卖给公众。”[《理性社会》，第 186-187 页]

那么，这重要吗？弗里德曼认为，作为消费者比作为公民要好，因为你能“精确地”得到你和其他人想要的东西。

然而关键在于，人们在购物时是否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购买漂白新闻纸和卫生纸的消费者，难道真的希望河流、湖泊和海岸水域中充满了大量的二噁英和其他有机氯化物吗？那些买车的消费者，真的想要交通堵塞、空气污染、

被马路切割的景观和温室效应吗？至于那些不购买这些东西的人呢？他们也会受到他人决策的影响。认为只有消费者才会受到自己决策影响的观点，完全是胡说八道——同样，把“精确地”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当作终极目标，而无视社会的影响，也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或许弗里德曼会声称，消费也意味着我们批准了其带来的影响。但当我们在市场上“投票”时，我们不能说我们批准了随之而来的污染（或收入分配和权力分配），因为这并非我们所能选择的选项。这些变化是预设的，或者说是一个只能通过集体决策来选择的总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修改那些原本个体无法改变的结果，避免那些对我们整体有害的决策。而与市场不同的是，政治中我们可以改变主意，回到先前的状态，撤销我们所犯的错误。市场上没有这样的选择。

因此，弗里德曼所说的“你投票后得到的东西，通常与你投票时所想的不一樣”，同样也适用于市场。

这些思考表明，“消费者”模型在人类行为的解释上是有限的（至少可以这么说！）。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公民”模型的重要性，而我们应该指出，消费者模型实际上包含在公民模型之中。作为社区中的一个积极成员参与其中，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做出个体消费选择，它只是通过去除令人讨厌的选择（比如生态或利润、廉价商品或劳动权益、家庭或事业）来潜在地丰富我们的可选项。

此外，我们必须强调“公民”模型在培养实践这一模型的人的作用，以及它如何丰富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生活。在参与性的机构中积极活动，培养并发展了一种积极的、具有“公共精神”的性格。作为公民，因为他们在做出集体决策时，不仅要权衡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其他利益，考虑决策对自己、他人、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所有人都受益，通过发展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扩展他们的自我利益定义，理解自己不仅是一个个体，还是社会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然而“消费者”模型，凭借其被动和仅关注个人/金钱的导向，无法发展人们的多种能力，且把自我利益局限到如此狭窄的程度，以至于他们的“理性”行为实际上可能（间接地）伤害他们自身。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性’再也不能被轻描淡写地放在脚注里。任何稍微思考一下当代社会问题的人，都不能忽视消费和生产的社会成本、环境的逐步破坏、当代技术利用中完全的不合理、基于利润或增长最大化的体制无法解决只能通过集体表达的需求，以及这一体制在个人使用商品最大化而非改善生活质量上的巨大偏差。”[《激进优先事项》，第 190-191 页]

“公民”模型考虑到了理性个体决策的总和，可能无法产生合理的集体结果这一事实（我们必须补充说，这种情况伤害了相关个体，从而违背了他们的自我利益）。社会标准会通过讨论和对话的过程得以创造和丰富，这在“消费者”模型本质上无力实现的建设性社会变革的领域中，变得尤为有效，更不用说保护个

体免于“同意”那些“绝望的决策”，这些决策最终会让个体和整个社会更加困境（参见 E.3 和 E.5 节）。

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消除个体决策，恰恰相反。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基于个人决定他们想要消费什么、在哪儿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所以，“公民”模型的目标不是“取代”“消费者”模型，而是改善我们做出个体消费决策的社会环境。“公民”模型所期望的，是将这些决策置于一个社会框架之中，允许每个人在提高我们共同生活质量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尽可能去除“别无选择”这一局限。

B.6 但是，个人用自己的钱做出的决策难道不是最好的吗？

这个问题涉及一个资本主义者常用的论点，用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投资决策脱离了公共控制、由私人投资者做出所有决策而辩解。显然，这个论点背后的假设是，当个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共同利益时，他们的智慧就会突然消失。但显然，通过辩论，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互动丰富我们的思想。在市场上，我们并不讨论，而是作为原子化的个体行动。

这个问题涉及到“孤立悖论”，即个人决策的逻辑与集体决策的逻辑不同。一个例子是“小决定中的暴政”。假设在软饮料行业中，一些公司开始生产（更便宜的）不可回收瓶子。最终的结果是，即使不是所有，大多数生产可回收瓶的公司都会失去业务，转而生产不可回收的瓶子。结果呢？增加了浪费和环境破坏。

这是因为市场价格没有考虑到社会成本和收益，实际上，它**错误地**估计了买卖双方以及那些未参与交易的其他人的成本和收益。正如舒马赫指出的那样，“私人企业的理念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可怕简洁性。它暗示生活的全部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利润……” [《小就是美》，第 215 页] 但生活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方面，否则就会使它贫乏。因此，资本主义“知道一切事物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事物的价值。”

因此，市场促进了“小决定中的暴政”，这可能对参与者产生负面后果。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并非解决方案，也就是马后炮。只有在决策已经做出并且其影响显现之后，才能采取行动。但那时损害已经发生了。起诉一家公司**真的**能替代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吗？此外，经济背景已被显著改变，因为投资决策通常很难撤回。

换句话说，市场的运作为这一论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例子，即追求个人利益

的总体结果可能会对集体造成损害。而集体由个人组成，这意味着它对参与其中的个体也是有害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显著的意识形态成功，在于将反社会的选择与自我利益划上等号，以至于任何有利于我们共同利益的选择，都会被视为自我牺牲。然而，通过将决策原子化，市场常常会与构成市场的个体的自我利益相对立。

博弈论认识到，理性选择的总和并不会自动地产生理性的集体结果。事实上，它将这种情况称为“集体行动”问题。由于没有达成共同标准，可能会出现“逐底竞争”的局面；其中一个社会的选择，最终会导致我们作为个体并不真正想要的结果。理性地追求个人自我利益会让集体，甚至大多数个体，处于更糟的境地。问题不在于个体判断失误（恰恰相反，个体是唯一能够知道自己在特定情况下最需要什么的人）。问题在于缺乏社会讨论和解决方案，迫使人们做出难以承受的选择，因为现有的选择菜单里没有提供好的选项。

如果不去与所有受其决策影响的人讨论决策的影响，相关的个体就无法做出更好的决策。当然，在我们目前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下，这种讨论几乎不可能实现，而其最接近的形式——选举过程——又过于庞大、官僚化且被财富主导，除了通过一些空洞的法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这些法律往往在妨碍到利润时被忽视。

然而，让我们考虑一下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形，其中地方社区大会与工人共同讨论可回收瓶子的问题。在这里，特定利益群体（如消费者合作社、生态团体、工作场所研究与发展行动委员会等）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些群体会发挥关键作用，提供信息。正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所知，知识，在社会中广泛分布；而利益相关方在使这些知识为他人所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些信息以及由此引发的辩论，达成的集体决策很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可回收的瓶子，而非是浪费。这从社会和生态的角度来看，都将是一个更好的决策。同时，这也是有利于那些讨论并同意该决策对他们自身及社会影响的、个体的决策。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制定选择菜单，并从中选择反映我们个人品味和兴趣的选项。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系统并不涉及用讨论和投票决定世间万物，因为那样会使所有活动陷入瘫痪。相反，大多数决策将由相关利益方决定（例如，工人决定工厂内部的管理和日常事务），社区会去决定政策（例如，选择可回收瓶子而非浪费）。这也不是让人们选举代表来为我们决定，因为社区邦联的分散性质确保了权力掌握在当地居民手中。

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社会”决定个体的消费。这些仅仅与个体有关的决策，完全由相关的个人决定。集体决策是用以针对那些既影响个体又影响社会的决策，让受到影响的人们平等地讨论，从而在此过程中创造出丰富的社会背景，个体可以在其中行动。这显然是对当前体制的改进，因为在当前体制下，往往深刻改变人们生活的决策掌握在一个精英管理者和拥有者阶层的手中，他们被认为是“最了解”如何做出决定的人。

当然，任何民主制度中都存在“多数人的暴政”的风险，但在直接的自由意志主义民主中，这一风险会大大减少，具体原因在第 1.5.6 节（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之下是否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问题？）中有讨论。

B.7 现代社会中有哪些阶级？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阶级分析是理解世界及其运作的重要手段。虽然如今，对阶级存在的认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普遍，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只是意味着统治阶级比以往更成功地掩盖了阶级的存在。

阶级可以被客观地定义：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中权力来源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阶级。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拥有比大多数人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而大多数人通常为掌控他们且决定他们命运的少数人工作。这意味着，阶级同时基于剥削和压迫，某些人通过控制他人的劳动来获取自身利益。压迫的手段在[第 B 节](#)的早些部分已有提及，而第 C 节（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的神话是什么？）则准确指出了在一个看似基于自由和平等交换的社会中，剥削是如何发生的。此外，它还突出了这种剥削对经济体系本身的影响。该体系及其所创造的阶级和等级制度的社会政治影响，在第 D 节（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如何影响社会的？）中有深入讨论。

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强调，“工人阶级”仅由工业工人构成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种观念曾经适用过，但时至今日，这种观念已不再适用。权力，尤其是雇佣/解雇和投资的决策，才是关键所在。资本的所有权作为决定一个人阶级的手段，虽然依然重要，但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大公司内部的高级管理层：他们在公司内拥有巨大的权力，基本上接管了小公司中资本家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他们在学术上可能是“薪资奴隶”，但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权力和地位表明，他们实际上属于统治阶级（因此，他们的收入最好看作是利润的分成而非是工资）。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那些政客和国家官僚，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不来源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来源于他们对强制手段的控制。此外，许多大公司通过养老基金、跨国公司等方式，由其他大公司所拥有（1945 年，93%的股份由个人拥有；到 1997 年，这一比例降至 43%）。不言而喻，如果工人阶级的人们拥有股份，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资本家，因为股息不足以维持生计，且并未赋予他们对公司运作的任何决策权。

对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现代社会主要有两个阶级：

(1) 工人阶级——那些必须为生计而工作，但对自己的工作或其他影响自己生活的重大决策没有真正控制权的人，即“命令的接受者”。这个阶级还包括失业者、退休人员等，他们必须依靠国家的救济生存。他们财富有限，拥有的（正

式)权力也很少。这个阶级包括不断增长的服务行业工人群体,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白领”工人以及传统的“蓝领”工人^①。大多数自雇人士也属于这一阶级,如果适用的话,农民和手工业者中的大部分人也是如此。简而言之,就是生产阶级,和那些曾是生产者、或未来将会成为生产者的人。这个群体,占了社会的大多数。

(2) **统治阶级**——那些控制投资决策、制定高级政策、设置资本和国家议程的人。这是位于社会顶端的精英,大公司、跨国公司和银行的所有者或高层管理者(即资本家)、大量土地的拥有者(即地主或贵族,如果适用的话)、高级国家官员、政客等。他们在经济和/或国家中拥有真正的权力,因此控制着社会。简而言之,就是权力(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经济权力)的拥有者,或称之为**主人阶级**。这个群体,大约占总人口的5-15%。

显然,任何社会中都有“灰色”区域,存在一些个体和群体,他们不完全符合工人阶级或统治阶级的标准。这些人包括那些工作但对他人有一定控制权的人,例如拥有雇佣/解雇权力的人。这些人是做出资本或国家运作的、日常小决策的人。这个区域包括低至中层管理者、专家和小资本家。

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有一定的争论是否将这个“灰色”区域视为另一个(“中间”)阶级。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不是,这个“灰色”区域的大多数人仍是工人阶级;而其他人士(如英国的“阶级战争联合会”)则认为这是一个不同的阶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灰色”区域中的大多数人和工人阶级一样,都有着推翻当前体制的利益(我们应当指出,在美国及其他地方通常所称的“中产阶级”则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通常指的是拥有体面工作、住房等的工人阶级。由于“阶级”在美国的礼仪社会中被视为一个粗鲁的词,这种误解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这一阶级划分方案会有例外情况。然而,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同的利益,因为他们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和等级化的社会结构。

我们并非旨在将所有现实都纳入这一阶级划分方案,而是根据我们自身对现代社会变化模式的经验,发展这一方案,以反映现实的本质。这个方案也并不意味着所有阶级成员都拥有相同的利益,或者同一阶级内部成员之间不存在竞争,因为阶级之间确实存在竞争。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竞争性系统。正如马拉特斯塔所指出的,“必须记住,一方面,资产阶级(即财产所有者)之间总是在互相争斗……另一方面,政府虽然源自资产阶级,是它的仆人和保护者;但它的目标,就像所有仆人和保护者一样,是实现自己的解放,并支配它所保护的人。因此,摆动、操控、让步和撤退的比赛,试图在人民中寻找盟友,打击保守派。而保守派与人民对立,正是统治者的科学;这让那些总是等待着上天降临救赎的、

^① 由西方传来生活型态定义词语。“白领”(white-collar)一般指非体力劳动的工作者,例如公司内的行政文书职员、正式职员、或医生等专业人员。因为传统上,他们的工作服装的领子是白色的。“蓝领”(blue-collar)则是指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员,例如工厂作业员、操作圆、各种工人等等。因为传统上,他们的工作环境较为严苛,出于衣服材质和颜色耐脏等原因,工作服装多是蓝色。在现代,由于社会整体专业能力和工作环境的提升,两者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也较少地使用这种说法。

天真和冷漠的人迷失。”[《无政府主义》，第 25 页]

然而，无论精英间的内部竞争如何激烈，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他们从中获利的体制，统治阶级会团结起来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一旦威胁过去，他们会重新回到为权力、市场份额和财富而相互竞争的状态。不幸的是，工人阶级很少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主要是因为其长期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弱势地位。最多，某些群体团结在一起，体验合作带来的好处和乐趣。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并鼓励工人阶级的团结，以抵抗并最终摆脱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他们的活动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帮助：在斗争中的人们通常会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因此开始共同合作，将他们的斗争联合起来，针对共同的敌人。事实上，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发展。

B.7.1 但阶级真的存在吗？

那么阶级真的存在吗，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凭空捏造它们？我们现在甚至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本身就指出了统治阶级为了压制阶级意识而进行的大规模宣传活动，这一点将在后文进一步讨论。然而，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些统计数据来考察这个问题，以美国为例。我们选择美国，是因为该国以“机会之地”和资本主义的代表而著称。此外，阶级在美国也很少被讨论（尽管其商界阶层却**非常**有阶级意识）。而且，当一些国家采纳了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时（例如英国），类似的不平等现象也会随之爆发，同时伴随着贫困率的上升和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

有两种方式可以观察阶级，一个是通过收入，另一个是通过财富。在这两者中，财富分配对理解阶级结构来说最为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你的资产，即你所拥有的东西，而非你一年赚取的收入。鉴于财富是收入的来源，它代表了私人财产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体系的影响力和权力。毕竟，尽管所有受雇工人都有收入（即工资），但他们的实际财富通常仅限于个人物品和（如果幸运的话），房屋。因此，他们的财富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收入，这与拥有公司、土地和专利等资源的所有者不同。毫不奇怪，财富使其持有者免受个人经济危机的影响，如失业和疾病，并且赋予其持有者社会和政治权力。财富及其附带的特权也可以代代相传。同样不奇怪的是，财富的分配远比收入的分配不平等。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总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三分之一的收入流向了收入最高的 10% 人群，接下来的 30% 人群获得另三分之一，而底层 60% 则获得剩下的三分之一。而将财富分成三份，我们发现，最富有的 1% 拥有三分之一的财富，接下来的 9% 拥有三分之一，而底层 90% 则拥有其余的财富。[David Schweickart, 《资本主义之后》，第 92 页] 在整个 90 年代，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持续加剧。1980 年，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是最贫困五分之一的十倍。十年后，这一差距扩大到十二倍。到 2001 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十四倍。[Doug Henwood, 《新经济之后》，第 79 页] 通过查看私人家庭财富的数

据，我们发现，1976 年，美国最富有的 1%家庭拥有 19%的财富，接下来的 9%拥有 30%，而底层 90%的人口拥有 51%。到了 1995 年，最富有的 1%家庭拥有了 40%的财富，超过了底层 92%美国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总和——接下来的 9%拥有 31%，而底层 90%仅拥有 29%的总财富（详见 Edward N. Wolff 的《Top Heavy: A Study of Increasing Inequality in America》）。

因此，从财富所有权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小的少数人拥有生活资料的系统。1992 年，最富有的 1%家庭——大约 200 万成人——拥有个人所持股票的 39%。前 10%的人群拥有超过 81%的股票。换句话说，底层 90%的人口拥有的所有类型可投资资本（23%），比最富有的 0.5%人口持有的（29%）还要少。股票所有权更为集中，最富有的 5%持有 95%的股票。[Doug Henwood, 《华尔街：阶级骗局》] 三年后，“最富有的 1%家庭……拥有 42%的个人股票和 56%的债券……前 10%的人群总共拥有近 90%的股票和债券。”考虑到大约 50%的公司股票由家庭持有，这意味着 1%的人口“拥有美国企业生产资本和未来利润的四分之一；前 10%几乎拥有一半。”[Doug Henwood, 《华尔街》，第 66-67 页] 毫不奇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超过一半的公司利润最终流向最富有的 1%纳税人，而只有约 8%的利润流向底层的 60%。

Henwood 总结了这一情况，指出“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拥有了社会上大约四分之三的财富，而底层一半几乎没有财富——但却背负着大量债务。”大多数中等收入人群将其大部分（有限的）财富投入到房产中，如果我们看非住宅财富，会发现一种“非常、非常集中的”情况。“2001 年，底层一半人口占据了大约 20%的总收入，但仅拥有 2%的非住宅财富。最富有的 5%人口占据了大约 23%的收入，稍多于底层一半人口的总和。然而，它们拥有了近三分之二——65%的财富。”[《新经济之后》，第 122 页]

在收入方面，自 1970 年以来，贫富差距和财富集中也在不断加剧：

“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和埃马纽埃尔·萨伊的估计——这一点也得到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确认——1973 年至 2000 年间，美国底层 90%的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实际上下降了 7%。与此同时，最富有的 1%的收入增长了 148%，最富有的 0.1%增长了 343%，最富有的 0.01%收入增长了 599%。”[Paul Krugman, “霍雷肖·阿尔杰的死亡”，《民族》，2004 年 1 月 5 日]

Doug Henwood 提供了更多关于收入的细节[《华尔街：阶级骗局》，第 90 页]：

1977-1999 年，收入的变化				
	1977-1979 实际收入增长 (%)	总收入的份额 (%)		
		1977	1999	变化率
最贫穷的 20%	-9	5.7	4.2	-1.5
次贫穷的 20%	+1	11.5	9.7	-1.8
中等阶级的 20%	+8	16.4	14.7	-1.7

稍富有的 20%	+14	22.8	21.3	-1.5
最富有的 20%	+43	44.2	50.4	+6.2
最富有的 1%	+115	7.3	12.9	+5.6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财富集中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超级富豪。财富越往上集中，收益就越大。换言之，不仅仅是最富有的 20% 家庭获得的财富增长比例，高于其他群体；而是在这一阶层内部，前 5% 的人群比接下来的 15% 受益更多，前 1% 的人群比接下来的 4% 受益更多，如此递进。

因此，如果有人主张，尽管全国收入中流向最富有的 10% 人群的比例上升了，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任何收入超过 81,000 美元的人都属于这一群体，那么他们就忽略了关键问题。过去 30 年里，这一群体中收入较低的部分并非最大的赢家。在这 10% 人群内部，财富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最富有的 1%（其收入至少为 230,000 美元）。在这些财富增长中，60% 流向了最富有的 0.1%（即收入超过 790,000 美元的人）。而在这 0.1% 获得的财富增长中，近一半流向了最富有的 0.01%——这个群体仅有 13,000 人，他们的最低收入为 360 万美元，平均收入则高达 1,700 万美元。[Paul Krugman, "For Richer", New York Times, 20/10/02]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阶级的确存在，财富与权力正在社会的顶层高度集中，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

如果将这种收入不平等现象放在具体情境中来看，2004 年时，沃尔玛的一名全职普通员工，年收入仅约 17,000 美元。福利极为有限，公司不到一半的工人能够享受其医疗保险计划。而在同一年，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李（Scott Lee Jr.）的收入，则高达 1,750 万美元。换句话说，他每两周的薪酬就相当于他的普通员工一生的总收入。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仅有微幅增长（如果有的话）。以 1998 年美元计算（即考虑通胀之后），美国的平均年薪从 1970 年的 32,522 美元增长到 1999 年的 35,864 美元，在近 30 年间仅增长了 10%。然而，同一时期，据《财富》杂志统计，最富有的 100 名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实际年薪，从 130 万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薪资的 39 倍）跃升至 3,750 万美元，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 1,000 倍。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可能忽视了问题的本质。平均工资这一数据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并不能反映财富分配的具体情况。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英国，三分之二的工人收入低于平均工资，仅有三分之一高于平均水平。因此，谈论“平均”收入往往掩盖了实际的巨大差异。在美国，若考虑了通胀因素，1979 年至 1997 年间，家庭平均收入（即总收入除以家庭总数）增长了 28%。然而，家庭中位收入——即排在正中间的家庭的收入（半数家庭收入高于此数值，半数低于此数值）仅增长了 10%。由于美国的收入分配严重向顶层倾斜，中位数收入更能反映典型美国家庭的实际状况（即平均收入远高于中位数收入）。需要注意

的是，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其收入实际上略有下降。换句话说，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并未真正惠及普通家庭。中位数家庭收入年均增长率仅约 0.5%。更糟糕的是，“这一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于妻子延长工作时间，而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 [Paul Krugman, "For Richer", Op. Cit.]

因此，如果美国的平均收入或人均收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那仅仅是因为富人更富了。这意味着，高平均收入水平可能具有误导性，尤其是当大量国民收入集中在相对少数人手中时。这也意味着，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大量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更为恶化。因此，欧洲人的工作时间普遍比美国人短，假期也更长。尽管他们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美国，但他们没有同样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这使得欧洲中位数家庭的生活水平，大致与美国的中位数家庭相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工资更高。

正如道格·亨伍德（Doug Henwood）所指出的：“国际比较数据让美国丢尽了颜面……卢森堡收入研究（LIS）数据的简要结论是：对于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来说，它却有太多贫困人口。”亨伍德分析了 LIS 提供的收入分配跨国比较数据，考察了收入和贫困的相对与绝对指标，并发现“对于一个自认为普遍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家而言（即中等收入），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在十九个有可靠 LIS 数据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唯一比美国更糟糕的是俄罗斯——一个几近全面崩溃的国家，其中产阶级占比仅为 40.9%，而美国则为 46.2%。根据该研究，家庭收入低于全国中位收入 50% 者被归为贫困阶层，介于 50% 至 62.5% 之间者为近贫困阶层，介于 62.5% 至 150% 之间者为中产阶层，高于 150% 者为富裕阶层。美国的贫困率（19.1%）、近贫困率（8.1%）和中产阶级比例（46.2%）均高于欧洲国家，如德国（11.1%、6.5% 和 64%）、法国（13%、7.2% 和 60.4%）和比利时（5.5%、8.0% 和 72.4%），以及加拿大（11.6%、8.2% 和 60%）和澳大利亚（14.8%、10% 和 52.5%）。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亨伍德指出：“原因很明显——工会力量薄弱，福利国家不健全。那些对市场收入干预最多的社会民主国家，往往拥有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美国的贫困率几乎是其他十八个国家的两倍。”毋庸置疑，以收入定义的“中产阶级”是一个相当粗略的概念（正如亨伍德所言）。这一指标并未反映财产所有权或社会权力等因素。然而，在资本主义媒体中，收入通常被视为定义“阶级”的关键，因此分析收入分配对反驳自由市场促进全民福祉的论调（即自由市场造就更大的“中产阶级”），仍然具有价值。事实上，最推崇自由市场的国家，却拥有最高的贫困率以及规模最小的“中产阶级”，这一现象恰恰印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资本主义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只会通过“自由交换”使强者（统治阶级）受益，而使弱者（工人阶级）受损。正如我们在 C.7 部分所论述的，只有在充分就业时期——或者在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团结与斗争时期——力量对比才会朝着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倾斜。因此，难怪在充分就业时期，不平等也会相应下降——关于失业率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可参阅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所著的《创造不平等》（Created Unequal）。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种衡量贫困和收入的相对标准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美国的收入水平居世界前列，这意味着即便是美国的贫困人口，按照其他国家

的标准来看，可能也算是相对富裕的。对此，亨伍德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即便按照绝对标准衡量，美国的表现依然令人尴尬。LIS 的研究员莱恩·肯沃西（Lane Kenworthy）以美国的贫困线为基准，估算了 15 个国家的贫困率……尽管美国的平均收入最高，但它远未实现最低的贫困率。”只有意大利、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绝对贫困水平高于美国（其中澳大利亚仅比美国高出 0.2%，即 11.9% 之于 11.7%）。因此，无论是从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来看，美国的贫困状况都明显逊色于欧洲国家。[Doug Henwood, *"Booming, Borrowing, and Consuming: The US Economy in 1999"*, pp.120-33, *Monthly Review*, vol. 51, no. 3, pp. 129-31]

因此总而言之，将美国视为发达国家中最具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阶级体系：极少数人掌握着大部分生产资料，并攫取了社会的大部分收入。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的阶级不平等更为严重，社会更加两极分化。此外，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这种不平等现象以惊人的速度加剧，统治精英变得更加富有，而财富并未向下渗透，而是向上集中。

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加剧的原因并不难找。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不断增强，而工人阶级的地位持续削弱。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所强调的，在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任何“自由契约”，最终受益的必然是前者，而非后者。这意味着，如果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被削弱，那么他们将很难维持自身在社会财富中的份额，而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也将继续被资本家阶级所占有，并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

因此，毫不意外的是，资本（即利息、股息和租金等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升，而流向劳动者的份额（工资、薪金和福利）则在下降。此外，劳动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正被高层管理者攫取（例如，在电子行业，在 1991 年高管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42 倍，而仅仅五年后，这一差距就扩大到了 220 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失业率上升和全球化削弱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由于工会的衰落以及劳动者斗争精神的式微，底层工人的工资长期停滞（截至 2005 年，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低于 1973 年的水平！）。再加上“涓滴经济”政策——即通过为富人减税、对工人阶级加税、维持“自然”失业率（削弱工会和工人权力）、削减社会福利等手段——这一系列措施几乎全面侵蚀了除社会上层之外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一过程正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危机，其具体影响将在后续部分讨论（见 D.9 节）。

难怪蒲鲁东曾主张，供求法则是一种“欺骗性的法则……它只不过是为了确保强者战胜弱者，确保有产者战胜无产者。”[quoted by Alan Ritte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121]

B.7.2 社会流动性能弥补阶级不平等吗？

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强调的），许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依然否认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的做法是将种姓制度与阶级制度混淆。在种姓制度下，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出生决定，并贯穿其一生。而在阶级制度下，社会成员的阶级归属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因此，有人主张，关键问题不在于阶级的存在，而在于社会流动性（通常反映在收入流动性上）。按照这一观点，如果社会或收入流动性足够高，那么某一年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就无关紧要。因为在人的一生中，收入的重新分配会是相当均衡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并不重要，因为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此的论述如下：

“设想两个年收入分配相同的社会。在其中一个社会中，流动性很高，收入等级中的家庭排名每年都会发生较大变化。在另一个社会中，流动性极低，每个家庭始终处于相同的位置。显然，从任何有意义的角度来看，后者才是更不平等的社会。一种不平等，是动态变化、社会流动性和平等机会的表现；而另一种则是身份固化的象征。这两种不平等之间的混淆至关重要，正是因为竞争性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往往会用前者取代后者。” [Capitalism and Freedom, p. 171]

与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弗里德曼的论断是错误的（而这仅仅是他的主张，他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事实上，那些实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实际上低于像西欧那样，对经济进行广泛社会干预的国家。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事实显示，实施弗里德曼所推崇的“竞争性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政策，不仅没有增强社会流动性，反而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实际上，和许多其他情况一样，弗里德曼的理论最终被现实所证伪。

以美国为例（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之一），确实存在收入流动性，但远不足以使收入不平等变得无关紧要。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 1985 年收入处于底层五分之一的家庭中，有 81.6% 在次年仍然处于该阶层；而在收入最高的那五分之一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为 76.3%。

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收入等级之间的流动性略有增加，但仍然有限。而那些跨越不同收入阶层的人，通常也只是于类别的边界（例如，从顶层五分之一跌出的家庭往往原本就在该阶层的底部）。真正能够从底层跃升至顶层，或从顶层跌落到底层的家庭比例，仅约 5%。换句话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相当稳固，“绝大部分的上下流动性，只是围绕一个相对固定的长期分配格局进行的波动。” [Paul Krugman, Peddling Prosperity, p. 143]

或许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下，情况会有所不同？然而，罗纳德·里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推动了更具“自由市场”特征的资本主义，但并没有任何迹

象表明收入流动性在那一时期显著增加。事实上，根据密歇根大学的格雷格·邓肯（Greg Duncan）的一项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产阶级规模缩小，贫困家庭向上流动的比例减少，而富裕家庭向下流动的比例也下降。邓肯比较了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在第一个时期（1975 年至 1980 年），收入分配比今天更加均衡。而在第二个时期（1981 年至 1985 年），收入不平等开始急剧上升。在此期间，从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比例，下降了超过 10%。

以下是具体数据：[cited by Paul Krugman, "The Rich, the Right, and the Facts," The American Prospect no. 11, Fall 1992, pp. 19-31]

家庭在五年时间内进入或退出中产阶级的比例（1980 年前后对比）

收入转变	1980 年之前	1980 年之后
中等收入进入低收入	8.5	9.8
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	5.8	6.8
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	35.1	24.6
高收入进入中等收入	30.8	27.6

2004 年，克鲁格曼再次回到了这个话题上过去十二年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指出，美国“更像是一个种姓社会，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而且种姓的界限最近变得更加僵化。”在 1980 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前，美国的代际流动性较高。“1978 年一项经典的调查显示，父亲处于社会和经济地位排名底层的 25% 的成年男性中，有 23% 的人成功跻身于收入排名前 25% 的群体。换句话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三十年左右，美国的向上流动梦对于许多人来说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今天一项针对成年男性的新调查“发现这一数字已经降至仅 10%。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向上流动性大幅下降。很少有下层阶级的孩子能够成功跻身于中等富裕阶层。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白手起家’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罕见，而且父亲和儿子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在近几十年有所上升。在现代美国，看起来你很可能会停留在你出生时所属的社会和经济阶层中。”[Paul Krugman, The Death of Horatio Alger, The Nation, January 5, 2004]

英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威尔·赫顿引用了 2000-2001 年间美国的数据，这些数据“将美国工人的流动性与四个最大欧洲经济体和三个北欧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美国“在将底层五分之一的工人再提升五分之一档次的比例上最低，在进入前 60% 的比例上最低，而且工人无法维持全职就业的比例最高。”他引用了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确认了美国低收入工人相对上升流动性差的现状；它还发现，在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全职工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美国的工人……然而，美国的下降流动性更为显著；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更容易遭受实际收入的下降。”因此，即使是 OECD（这个“放松管制的大主教”）也“不得不得出结论，更多放松管制的劳动和产品市场（尤其是美国），并不意味着更高的相对流动性，低收入工人在这些经济体中也没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性。OECD 在回避问题。美国的情况比欧洲更糟。”许多研究表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要么没有区别，要么美国的流动性较低。” [The World We're In, pp. 166-7]

难怪 Doug Henwood 认为，“美国道路辩护者的最终论点是诉诸我们传奇般的社会流动性”，但这一论点是失败的。事实上，“人们通常不会远离他们出生时所处的收入阶层，美国与欧洲的社会流动模式几乎没有区别。事实上，美国拥有 OECD 所称的最多比例的‘低收入’工人；而且在任何国家中，美国在摆脱工资低谷方面的表现最差。” [Op. Cit., p. 130]

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贫困人口更可能长期保持贫困：那些在一年内贫困的人，几乎一半的人在五年或更长时间内依然贫困，相比之下，加拿大为 30%，德国为 36%。尽管美国宣称有很大的社会流动性，但每年有 45% 的贫困人口脱贫，而英国同为 45%，德国为 53%，加拿大为 56%。而在那些成功脱贫的人中，美国有 15% 的人可能会再次回到贫困线以下，相比之下，德国为 16%，英国为 10%，加拿大为 7%。” [Doug Henwood, *After the New Economy*, pp. 136-7]

伦敦经济学院（代表教育慈善机构 Sutton Trust）2005 年的一份研究证实，市场越自由的国家，社会流动性水平越差。[Jo Blanden, Paul Gregg and Stephen Mach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pril, 2005] 他们发现，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社会流动性表现最差，仅次于美国，在八个欧洲和北美国家中排名最后。挪威最佳，其次是丹麦、瑞典、芬兰、德国和加拿大。

这意味着，在英国和美国，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国家的孩子更难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也比过去更难摆脱他们的家庭背景。换句话说，我们发现比起我们的父母，我们更难赚到更多的钱，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英国的社会流动性不仅是远低于其他先进国家，实际上它正在下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些发现基于对两组孩子的研究，一组是在 1950 年代出生，另一组是在 1970 年代出生。在英国，前者中有 17% 从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上升到顶层，而后者只有 11%。北欧国家的流动性是英国的两倍。而美国是在社会流动性上唯一比英国更差的国家。

至于为什么，没有美国例外论或更高的社会流动性的证据，而这种神话依然存在，答案很简单——这对统治阶级维护现有制度有用。通过推广“人人都能轻松走上顶端”的神话，权力机构将不会受到质疑，只有那些未能成功的人的道德品质会受到批评。

不用说，收入流动性并没有讲完整个故事。收入的增加并不自动反映阶级的变化，远非如此。一个收入更高的工人仍然是工人阶级，因此，在工作时间内仍然受到压迫和剥削。因此，尽管收入流动性很重要，但它并没有解决权力的不平等。同样，收入流动性，也无法弥补阶级制度及其所导致的权威社会关系，和在自由、健康、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差距。事实表明，试图为这一制度辩护的资本主义的“精英主义”教条，实际上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基础。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斥着阶级的体系，尽管每个阶级的构成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它们是异常固定的，尤其是当你跻身进入人口的前 5-10%（即统治阶级）时。

从逻辑上来说，这并不令人惊讶。没有理由认为更不平等的社会应该具有更高的流动性。社会不平等越大，顶层的人拥有的经济权力就越多，因此底层的人

要向上攀升就会越困难。若提出相反的观点，就是在说爬高山比爬丘陵更容易！不出所料，事实支持常识性分析，即：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越高，机会平等性越低，因此社会流动性也越低。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即便收入流动性更高，也不能抵消阶级制度所带来的**权力**差异，这些差异与收入差异是并存的。换句话说，尽管理论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老板，但这并不使老板对工人的权力和权威（或老板财富对社会的影响）变得更加合法（仅仅因为每个人——理论上——都可以成为政府成员，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会变得不那么专制）。即使老板阶级的成员可以变化，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阶级的存在。

最终，利用（通常被高度夸大的）社会流动性来为阶级制度辩护，是站不住脚的。毕竟，在大多数奴隶制的社会，奴隶可以购买自己的自由，自由人也可以将自己卖为奴隶（以偿还债务）。如果有人试图用社会流动性来为奴隶制辩护，那么他会被视为疯子。奴隶制的罪恶，并不会因为少数奴隶通过努力工作可以不再是奴隶而得到减轻。

B.7.3 为什么阶级的存在被否认？

显然，阶级是存在的，同样显然，个人在阶级结构中可以上升或下降——尽管，当然，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而不是贫穷家庭，成为富人会更容易。因此，詹姆斯·W·洛文（James W. Loewen）报告称，“大约在上世纪初，美国95%的高管和金融家都来自上层阶级或中上阶级背景。只有不到3%的人是作为贫穷的移民或农场孩子起步的。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工业家中只有2%来自工人阶级背景。”[在《我的老师告诉我的谎言》中引用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的《美国历史学家与商业精英》一文，见《商业中的男人》，第326-328页；参见大卫·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超越平等》，第15页]而这正是在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根据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进行的一项调查，并在他的《权力精英》一书中报告，大约65%的美国企业中最高收入的CEO来自富裕家庭。毕竟，英才教育并不意味着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只意味着阶级之间存在一定的流动性。然而，我们不断听到阶级是过时的概念；阶级不再存在，只剩下原子化的个体，他们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实是资本主义媒体是“阶级终结”思想的最大推崇者，这应该让我们质疑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否认阶级的存在，究竟服务于谁的利益？显然，正是那些掌控阶级体系的人：他们从中获得最多利益，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认为我们是“平等的”。那些控制主流媒体的人不希望阶级的概念传播，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享有由此带来的所有特权。因此，他们利用媒体作为宣传工具，塑造公众舆论，转移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注意力，避免他们去关注问题关键所在，即他们自身所处的从属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主流新闻来源只给我们

肤浅的分析、具有偏见和选择性报道，以及直白的谎言、不断轰炸的黄色新闻、哗众取宠和“娱乐”内容，而不是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见 D.3 节——“财富如何影响大众媒体？”）。

大学、智库和私人研究基金会，也是统治阶级的重要宣传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主流学术圈中，几乎所有人都忌讳提出“在美国存在统治阶级”这一观点。相反，学生们则被灌输“多元化”和“民主”社会的神话——一个世外桃源，所有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似乎都只由“公众支持”的程度来决定的——而决不是由任何一个权力与规模不成比例的小集团来决定。

否认阶级的存在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个强大工具。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某些观念之上的；只要这些观念被广泛相信，基于它们的制度就会稳固。政府之所以保持强大，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权威和法律强制是必要的。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只要这种经济体系被认为是适当和公正的。削弱那些支持邪恶和压迫现状的观念，就意味着政府和资本主义最终的崩溃。”[《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序言，p. xii]

毫不奇怪，否认阶级存在是加强资本主义、削弱对不平等和压迫的社会批评的重要手段。它描绘出一个只有个体存在的体系，忽视了一部分人们（统治阶级）与其他人（工人阶级），在社会地位、权力和利益方面的差异。这显然有助于那些掌权者维持现状，因为它将分析焦点从权力及其来源（财富、等级制度等）转移开。

它还通过削弱集体斗争来维持阶级制度。承认阶级的存在，意味着承认工人阶级因其在社会等级中的共同地位而有共同的利益。而共同的利益可以引发共同的行动，来改变这种地位。然而，孤立的消费者无法为自己行动。一个单独的个体很容易被击败，而相互支持的个人**联合起来**则不容易被击败。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统治阶级曾多次（且常常成功地）尝试摧毁工人阶级组织。为什么？因为在联合中有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够摧毁阶级制度，还能摧毁国家，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这就是精英阶层否认阶级存在的原因。这是他们争夺思想战场的一部分策略，目的是确保人们保持原子化的个体状态。通过“制造共识”（用沃尔特·李普曼的说法，就是媒体的功能），而无需使用武力。通过将公众的信息来源限制在由国家和企业精英控制的宣传机构中，所有的辩论都可以被限制在资本主义术语和假设的狭窄框架内，任何基于不同概念框架的观点都可以被边缘化。因此，普通人会被引导，去接受现行社会是“公平”和“正义的”，或者至少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因为从来没有允许讨论其他替代方案。

B.7.4 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意识”是什么意思？

考虑到在主流文化中，阶级的存在常常被忽视或被视为不重要（“老板和工人有共同利益”），因此必须不断指出现实的事实，那就是：世界由少数富有的精英控制，而绝大多数人则受到等级制度的支配，并为这一精英的利益工作。阶级意识意味着我们意识到这些客观事实，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改变现状。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阶级意识”的必要性，即认识到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个事实显而易见。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论述的：“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并不相同。没有比所谓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利益一致’更大的谎言了……劳动创造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而]资本是由主人拥有的，它是被盗的财产，是被偷窃的劳动者成果。资本主义工业的过程就是继续为主人阶级谋取利益，剥夺劳动的成果……很明显，你作为工人的利益与资本主义主人的利益不同。而且不仅仅是不同：它们还是完全相反的，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的、敌对的。老板给你支付的工资越高，他从你身上获得的利润就越少。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哲学来理解。”[《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75-76 页]

阶级之间存在冲突，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战后时期可以看出这一点。以美国为例，战后的初期（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充斥着社会冲突、罢工等现象。从 1980 年代起，经历了一段相对的社会和平时期，因为资本家成功地对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打击。工人阶级变得不再那么激进，工会进入了衰退期，而资本主义的成功得到了宣扬。如果两个阶级的利益是相同的，那么我们会预期，社会的各个阶层在 1980 年代之后比在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期间更为受益。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 1950 年到 1980 年代之间的收入稳步增长，但从那时起，财富大量向上集中，而底层民众却发现维持生计变得愈加困难。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 1920 年代，当时亚历山大·伯克曼明确指出：

“主人们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来瘫痪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已经说服工人相信，他们和雇主有着相同的利益……即，雇主有好处的事，对他的雇员来说也有好处……[这样]工人不会考虑为更好的条件与主人做斗争，而是会耐心等待，直到雇主能够‘与他们分享他的成功’。他们还会考虑‘他们’国家的利益，不会通过罢工和停工来‘打扰工业’和‘社区的有序生活’。如果你听从你的剥削者和他们的代言人，你就是‘优良的’；只考虑你主人的利益，你所在的城市和国家的利益——但没有人关心你的利益，也不关心你家庭的利益，你工会的利益，以及你劳动阶级同胞的利益。他们劝你‘不要自私’，而老板则通过你为人善良和无私而变得富有。他们在背后偷笑，感谢上帝你竟然如此愚蠢。”[同上，第 74-75 页]

因此，简而言之，阶级意识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去照顾自己的利益。要意识到社会中存在不平等，你不能期望富人和权势者关心任何人的利益，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只有通过斗争，你才能赢得尊重，获得你所创造却并不拥有的

财富的一部分。并且，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对立”，这“必然源自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前者的财富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后者劳动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人阶级“只渴望着平等”，而统治精英“唯有通过不平等才得以存在”。对于后者来说，“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平等就是死亡”，而对于前者来说，“最微小的不平等就是奴役。”[巴枯宁，《巴枯宁基础文集》，第 97 页和第 91-92 页]

尽管阶级分析乍一看可能是一个新颖的想法，但阶级对立的另一方却早已认识到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例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10 篇中指出：“有财富的人和没有财富的人，在社会中一直形成着不同的利益。”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阶级意识意味着认识到老板们早已知道的事实：与处于相同阶级位置的其他人团结的重要性，并作为平等者共同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不同之处在于，统治阶级希望维持阶级制度，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寻求彻底地终结这一制度。

因此，可以说，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希望发展一种“反阶级”意识——即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理解它们为何存在，并采取行动消除这些阶级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正如弗农·理查兹（Vernon Richards）所说：“阶级意识，但不是想要延续阶级的意义，而是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理解它们为何存在，并且通过知识和斗争精神的推动，决心将其废除。”[《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可能性》，第 133 页]）。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消除阶级，而不是将“工资劳动者”这一阶级普遍化（因为这会假设资本主义继续存在）。

更重要的是，阶级意识并不意味着“工人崇拜”。与之相反，正如穆雷·布克金所指出的，“[工人]开始变得革命性时，是当他[或她]解除‘工人身份’时，是当他[或她]开始厌恶自己现在的阶级地位时、是当他开始摆脱……自己的工作伦理、源自工业纪律的性格结构、对等级制度的尊重、对领导的服从、消费主义以及清教徒主义的残余时。”[《后稀缺无政府主义》，第 119 页]因为，归根结底，无政府主义者“无法去建设，直到工人阶级摆脱它的幻觉，摆脱对老板的接受和对领导的信仰。”[玛丽·路易莎·贝尔内里，《Neither East Nor West》，第 19 页]

有人可能反对，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个体，而无政府主义者正试图将许多人归为一类，并给他们贴上“工人阶级”这样的标签。对此，无政府主义者同意，是的，的确“只”存在着个体；但其中一些是老板，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这是社会中的一种客观分化，统治阶级竭力掩盖，但在社会斗争中却会显现出来。而这样的斗争，是更多受压迫的人通过主观认识到这些客观事实的过程。而通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现实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会希望改变它们。

目前，有一些工人阶级的人希望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也有一些人只是想爬上等级制度，去到一个可以强加自己意志的位置。但这并不改变他们当前的事实——他们目前的地位是受到等级权威的支配，因此可能与之发生冲突。通过这样做，他们必须实践自我活动，而这种斗争可以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看法，从而使他们变得激进。这种自我活动和社会斗争的激进化效应，是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是创造更多无政府主义者、并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无政府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可行替代方案的重要途径。

最终，阶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信仰什么，以及你践行什么。因此，我们看到像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曾是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或者像马拉特斯塔，出生于意大利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拒绝了他们的背景和特权，成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支持者。但无政府主义者将他们的活动主要基于工人阶级（包括农民、自雇手工业者等），因为工人阶级才受到等级制度的支配，因此他们真正需要反抗以求生存。这种反抗现有权力的过程，能够并且确实会，对参与其中的人产生激进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信仰和行动也会改变。受制于等级制度、压迫和剥削，意味着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就是去废除它们。完全可以说，‘工人的解放必须由工人自己完成’，因为没有哪个社会阶级会替他们做这件事……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从束缚中解放自己……只有通过对自己当前处境的真正认识，通过展望他们的可能性和力量，通过学习团结与合作，并加以实践，群众才能获得自由。”[亚历山大·伯克曼，《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第 187-188 页]

因此，我们认识到，只有社会底层的人才具有自我解放的利益，摆脱统治阶级的负担，因此我们看到阶级意识在被压迫者争取自我解放中的重要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并非相信工人阶级的救世主角色，而是要废除工人阶级，特别是这一术语指的是所有现存社会中的贫困大多数……我们所说的是，没有工人阶级这一生产群体的积极参与，任何革命都无法成功……国家的权力和专制社会的价值观，只能通过更大的力量和新的价值观进行挑战和摧毁。”[弗农·理查兹，《渡鸦》第 14 期，第 183-184 页] 无政府主义者还认为，直接行动去反抗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效果之一，将是创造这种力量和新的价值观、基于对个人自由和团结的尊重的价值观（参见 J.2 和 J.4 节，关于直接行动及其解放潜力）。

因此，阶级意识还意味着认识到，工人阶级不仅有结束其压迫的利益，而且我们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种力量，人民的力量，”伯克曼指出，“是现实的：它无法被夺走，不像统治者、政治家或资本家的权力可以被夺走一样。它无法被夺走，因为它不是由财产组成的，而是由能力组成的。它是创造的能力，是生产的能力；是给世界提供食物和衣物，给我们生命、健康和舒适、欢乐和愉悦的力量。”政府和资本的权力“在人民拒绝承认它们为主人时，拒绝让它们统治时便消失了。”这就是工人阶级的“至关重要的经济力量。”[《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87 页，第 86 页和第 88 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被压迫者的这种潜在力量表明，阶级不仅是浪费性和有害的，而且一旦底层的人们决定结束它们并适当地重组社会，这些阶级是可以被结束的。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将经济体系转变为一个无剥削、无阶级的体系，因为“只有一个生产性的阶级才可能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的天性，因为它不需要去进行剥削。”[阿尔伯特·梅尔茨，《无政府主义：支持与反对的论点》，第 23 页]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阶级意识还必须意味着意识到所有形式的等级权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压迫。因此，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不仅仅关乎财富或收入的不平等，而是质疑所有形式的支配、压迫和剥削。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阶级斗争]不仅仅集中在物质剥削上，还包括精神剥削……[以及]心理和环境的压迫。”[布克钦，《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论》，第 151 页] 这意味着我们并不认为经济压迫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忽视工作场所以外的斗争和压迫形式。相反，工人是人类，而不是资本主义和列宁主义神话中的、经济驱动的机器人。他们关心一切影响他们的事情——他们的父母、孩子、朋友、邻居、星球，甚至经常还包括完全陌生的人。

第一卷附录

安那其的象征

引言

无政府主义一直以来都自觉地倡导一种广泛、但有时模糊的政治纲领。这种立场的理由是充分的：固定的蓝图会导致僵化的教条，并扼杀反叛的创造力。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无政府主义者对“纪律化”领导的拒斥，这种领导模式在左翼的许多政治团体中都能找到。拒绝领导的理由同样充分：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领导本质上是等级制的。

从逻辑上讲，既然无政府主义者回避一切静态的事物，那么我们也应该对象征和标志的重要性持谨慎态度。然而，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抗国家与资本的斗争中确实使用了象征符号，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圈“A”符号、黑旗以及红黑旗。本附录试图梳理这三个标志性符号的历史，并探讨它们为何被无政府主义者选用，以代表我们的思想与运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象征之一正是红旗。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公社社员路易丝·米歇尔所言：“里昂、马赛、纳博讷，都建立了各自的公社，而这些公社同我们（巴黎公社）一样，都被革命者的鲜血所浸透。这正是我们的旗帜为何是红色的原因。那些令我们的红旗染上这种颜色的人，为何又如此畏惧它们？”[The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p. 65] 1877年3月18日，克鲁泡特金在伯尔尼参加了一场抗议游行，其中无政府主义者“高举红旗，以纪念巴黎公社”，因为“瑞士联邦法律禁止公开展示红旗。”[Martin A. Miller, Kropotkin, p. 137]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沃尔特和海纳·贝克尔指出，“克鲁泡特金始终更偏爱红旗”[Peter Kropotkin, Act for Yourselves, p. 128]。1899年的五一劳动节，艾玛·戈尔曼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瓦利，向矿工们发表演讲，随后领导了一场示威游行，她“高举一面巨大的红旗。”[Living My Life, vol. 1, p. 245] 历史学家卡罗琳·沃尔德伦·梅里休指出，300名示威者“公然无视警方命令，不肯降下‘安那其的红旗’”[Anarchist Motherhood, p. 236]。

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无政府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并发源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共同的根源意味着共同的象征。然而，随着主流社会主义，在19世纪发展为改良派社会民主主义或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国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基于工人阶级斗争中升起的象征，发展出了自身的反叛图

像。正如本文将展示的，这些象征来源于与更广泛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革命无政府主义，也即主流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传统。正如尼古拉斯·沃尔特所言：

“对无政府主义的严肃研究应当建立在事实之上，而非幻想，并应当关注那些真正使用‘无政府主义’一词的人与运动。无论无政府主义思想多么古老、多么广泛……在（蒲鲁东于）1840 年之前，没有人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在 1870 年日之前，也没有任何运动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由第一国际中反威权的派别创建的……这无疑是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运动，而这个运动无疑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主义版本的阶级斗争概念之上的。”[The Anarchist Past and other essays, pp. 60-1]

毫无疑问，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象征反映了这一阶级斗争运动的起源与思想。黑旗与红黑旗，最初都由革命无政府主义者所使用。黑旗在 19 世纪 80 年代由法国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战士路易丝·米歇尔推广开来。从欧洲传入美国后，国际劳动人民协会的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举起了这面旗帜，随后，全球范围内的革命阶级斗争无政府主义者也纷纷采用了它。红黑旗最早由第一国际的意大利支部使用，该支部也是最早在 1876 年 10 月由集体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无政府主义的组织。[Nunzio Pernicone, Italian Anarchism, 1864-1892, p. 111] 之后，这面旗帜传播到了墨西哥，被当地的无政府主义工人武装所使用；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被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重新塑造。正如无政府主义本身一样，无政府主义旗帜也是社会斗争反对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产物。

需要说明的是，本附录部分内容参考了杰森·韦林（Jason Wehling）1995 年所著的《无政府主义与黑旗的历史》（Anarchism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lack Flag）。毋庸置疑，本附录并未涵盖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象征。例如，近年来，红黑旗也被绿色与黑色组成的旗帜所补充，这面旗帜象征生态无政府主义（绿色的象征意义自不必多言）。其他自由意志主义的流行象征还包括受世界产业工人（IWW）启发的“**野猫**”图案（象征自发性、直接行动、团结及野猫罢工的战斗精神）、“**黑玫瑰**”（显然受 1912 年劳伦斯罢工的 IWW 女性工人“我们不仅要面包，还要玫瑰”的口号启发），以及带有讽刺意味的“**小黑炸弹**”等。本附录将重点讨论其中最为著名的三种象征。

1. 黑旗的历史是什么？

众所周知，黑旗是无政府主义的象征。霍华德·埃利希（Howard Ehrlich）在其著作《再塑无政府主义》（Reinventing Anarchy, Again）中，对无政府主义者为何使用黑旗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值得全文引用：

“为什么我们的旗帜是黑色的？黑色，是一种否定的色调。黑旗是对一切旗帜的否定。它是对国家的否定，因为国家让人类彼此对立，否认了全人类的统一。

黑色，是一种愤怒和愤慨的情绪——针对那些以忠于某个国家之名对人类犯下的种种骇人罪行；针对政府的谎言、伪善和廉价欺骗对人类智慧的侮辱……黑色，还是哀悼的颜色；黑旗不仅在否定国家，也是在悼念那些为了某个血淋淋国家至高的荣耀和稳定、而在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中被屠杀的无数受害者。它为那些被剥削（被征税）以支付战争与压迫开支的人哀悼。它不仅悼念肉体的死亡，也悼念在专制和等级制度下精神的扭曲；它哀悼那些永远无法点亮世界的无数被抹杀的脑细胞。这是一种无法宽慰的悲痛。

“但黑色也是美丽的。它是决心、意志和力量的颜色，它是一种定义和澄清其他所有颜色的颜色。黑色孕育着神秘的生命力，孕育着生长与繁衍，是新生命在黑暗中进化、更新、复苏和再生的温床。深埋在土壤中的种子、精子的奇异旅程、母体子宫中胚胎的秘密成长——所有这些，都是在黑暗的包围与庇护下发生的。

“因此，黑色既是否定，是愤怒，是抗议，是哀悼；同时也是美，是希望，是对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新生活和新关系的孕育与庇护。黑旗象征着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自豪地举起它，却也不得不为这样做而感到遗憾；期待有一天，它不再成为一种必要的象征。”[“为什么是黑旗？”，霍华德·埃利希（编），《再塑无政府主义》，pp. 31-32]

本节中，我们将探讨无政府主义者何时以及为何首次采用黑旗作为我们的象征。

无政府主义者使用黑旗的历史记载十分丰富。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当属俄国革命时期涅斯托尔·马赫诺领导的游击队。在黑色旗帜的指引下，他的军队击败了多个敌对军队，并在乌克兰的大片地区保持了数年之久的自治。在他们的黑旗上，绣着“自由或死亡”以及“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pp. 607-10]。1925 年，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黑色青年联盟**”；而在 1945 年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重新建立时，他们的刊物被命名为《**黑旗**》（**Kurohata**）[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p. 525-6]。1968 年，法国的学生在街头斗争和总罢工中高举黑旗（以及红黑旗），使得 20 世纪 60 年代无政府主义的复兴进入大众视野。同年，在美国“**民主社会学生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全国大会上，黑旗也被升起。两年后，总部设在英国的杂志《**黑旗**》（**Black Flag**）创刊，并持续出版至今。进入 21 世纪，黑旗在反全球化抗议活动的前线高高飘扬。如今，在任何规模较大的示威活动中，通常都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举起黑旗。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使用黑旗的历史远远早于这些事件。1871 年巴黎公社的著名参与者，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在推广黑旗成为无政府主义象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882 年 3 月 18 日，在纪念巴黎公社的公众集会上，她宣布：“红旗已经不再合适；（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升起象征苦难的黑旗。”[Edith Thomas, *Louise Michel*, p. 191]。次年，她将这一宣言付诸实践。据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记载，米歇尔在 1883 年 3 月 9 日的一场巴黎失业者示威中，首次升起黑旗。警方驱散了这场露天集会后，大约 500

名示威者在迈克尔的带领下，高举黑旗，高呼“面包、工作，或子弹！”向圣日耳曼大道进发。示威人群抢夺了三家面包店后，遭到警方镇压。迈克尔被捕，并被判处六年单独监禁，但由于公众压力，最终获得特赦。[Anarchism, pp. 251-2] 同年8月，里昂出版了一份名为《黑旗》（Le Drapeau Noir）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这表明黑旗已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广泛象征。[“Sur la Symbolique anarchiste”, Bulletin du CIRA, no. 62, p. 2] 不过，早在数年前，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开始使用红黑旗（详情见[下一节](#)），因此迈克尔对黑色的采用并非完全没有先例。

不久之后，黑旗传入了美国。据保罗·阿夫里奇（Paul Avrich）记载，1884年11月27日，芝加哥的一场无政府主义示威中首次升起黑旗。据阿夫里奇所述，海马克特事件的烈士之一奥古斯特·斯派斯（August Spies）“指出，这是黑旗第一次在美国土地上飘扬”。到次年1月，“街头游行和大规模户外示威，伴随着红旗和黑旗……成为美国革命无政府主义运动最具冲击力的宣传形式”。1885年4月，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和莉齐·霍姆斯（Lizzie Holmes）在一次抗议游行的最前列，“一人举着黑旗，一人举着红旗。”[The Haymarket Tragedy, p. 145, pp. 81-2 and p. 147] 黑旗继续被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使用。例如，1893年，警察在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失业者示威中缴获了一面黑旗；该次示威中，艾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发表了演讲。[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1, p. 144] 二十一年后，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报道了纽约另一场由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失业者游行，他们在“寄生阶级的自满与伪善的自以为是”面前高举黑旗，“以威胁性的反抗姿态”宣告他们的斗争。[“The Movement of the Unemployed”,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 341]

黑旗似乎直到1905年“黑旗”（Chernoie Znamia）运动成立后，才在俄国出现。随着当年革命的失败，无政府主义再次转入地下。与无政府主义整体的发展相似，黑旗在1917年革命期间重新出现。彼得格勒的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了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示威，他们手持写有“打倒权威与资本主义！”的黑旗。作为其活动的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在大多数城镇和城市组织了武装队伍，被称为“黑卫队”，以抵御临时政府的反革命企图。如前所述，马赫诺军在黑旗下对抗布尔什维克和白军的独裁统治。然而，1921年2月见证了黑旗在苏维埃俄国的终结。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葬礼于当月在莫斯科举行，两万名民众高举写有“哪里有权威，哪里便无自由”的黑色横幅，为他送行。[Paul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 44, p. 124, p. 183 and p. 227] 在克鲁泡特金的葬礼游行仅仅两周后，喀琅施塔得起义爆发，无政府主义在苏维埃俄国被彻底抹除。随着斯大林主义的终结，无政府主义及其黑旗在整个东欧地区，包括俄国，再次复兴。

尽管上述事件广为人知，但如前所述，黑旗的确切起源仍然不甚明了。可以确定的是，19世纪80年代初，大量无政府主义团体采用了与“黑色”相关的名称。1881年7月，“黑色国际”在伦敦成立，旨在重组近期解散的第一国际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同年10月，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促成了北美“国际劳动人民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People's Association）的成立，该组织也被称为“黑色国际”，并与伦敦的组织建立了联系。[Woodcock, Op. Cit., pp. 212-4 and p. 393] 两次会议之后的不久，便发生了1883年路易丝·迈克尔的示威以及1884年芝加哥

黑旗的出现。

因此，19世纪8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与黑旗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阿夫里奇指出，到了1884年，黑旗“成为新的无政府主义象征”。[The Haymarket Tragedy, p. 144] 布克钦也同样提到，在1870年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采用了黑旗”。[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57] 沃尔特和海纳也指出，“黑旗是在19世纪80年代被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采用的”。[Kropotkin, Act for Yourself, p. 128]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黑色？芝加哥的《警钟》报称黑旗是“饥饿、苦难与死亡的可怕象征”。[quoted by Avrich, Op. Cit., p. 144] 布克钦认为，无政府主义者“采用黑旗，作为工人苦难的象征，并表达他们的愤怒与痛苦”。[Op. Cit., p. 57] 历史学家布鲁斯·C·尼尔森也指出，黑旗在1884年芝加哥首次升起时，被视为“饥饿的象征”。[Beyond the Martyrs, p. 141 and p. 150] 尽管它“在无政府主义圈子中被解读为死亡、饥饿与苦难的象征”，但它“也被称为‘复仇的标志’”，在1885年1月辛辛那提^①的一场劳动游行中，“它进一步被公认为工人阶级不妥协斗争的旗帜，上面写着‘决不宽恕’（No Quarter）”。[Donald C. Hodges, Sandino's Communism, p. 21] 在伯克曼看来，黑旗是“饥荒与绝望苦难的象征”。[Op. Cit., p. 341] 路易丝·米歇尔则表示，“黑旗是罢工的旗帜，是饥饿者的旗帜”。[Op. Cit., p. 168]

在这个思路下，阿尔伯特·梅尔策指出，黑旗与工人阶级起义之间的联系“起源于1831年法国兰斯的一次失业者示威（‘工作或死亡’）”[The Anarcho-Quiz Book, p. 49]。他进一步强调，是1883年米歇尔的行动巩固了这一象征性的关联。事实上，从法国的起义到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记载的，在里昂，“1831年，丝织工人……为争取更好的工资标准或合同，而发动武装斗争。他们曾在短暂的时间内实际控制了整座城市，高举红旗和黑旗——这一事件使得他们的起义成为革命象征史上意义深远的时刻。同时，他们使用‘互助主义’（*mutuelisme*）一词来描述他们所向往的社会结构，这使得这场起义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蒲鲁东似乎正是在1843至1844年间短暂居住在里昂时，从这些工人那里得到了这一概念。”[The Third Revolution, vol. 2, p. 157] 谢里夫·杰米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一份寄给里昂省长的警方报告中写道：“克鲁瓦-鲁斯区的丝织工人已决定明天前往里昂，高举黑旗，呼喊‘工作或死亡’的口号。”在这场起义中，黑旗被高高举起：

“上午十一点，丝织工人的队伍从克鲁瓦-鲁斯区的山坡上涌向里昂城。一些人手持黑旗；这颜色既象征着哀悼，也提醒着他们所承受的经济困境。另一些人则将面包插在刺刀上，高高举起。这一行动的象征意义，在他们不断呼喊的口号中得到了强化：‘面包或子弹！’——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无法获得能负担得起的面包，他们便准备迎接枪弹。在起义的某个时刻，一句更具表现力的口号被提出：*‘Vivre en travaillant ou mourir en combattant!’*——‘要么劳动而生，要

^① 辛辛那提（Cincinnati），美国俄亥俄州汉密尔顿县的县城

么战斗而死！’。一些目击者报告称，这句话被写在一面黑旗下。”[Sharif Gemie, *French Revolutions, 1815-1914*, pp. 52-53]

克鲁泡特金本人也提到，这场起义后，黑旗仍在法国工人运动中被广泛使用。他指出，巴黎工人在“1848年6月举起了他们的黑旗，上面写着‘面包或劳动’”[*Act for Yourself*, p. 100]。此外，在1871年3月1日，为了抗议普鲁士军队在普法战争胜利后进入巴黎，巴黎的窗户上也悬挂了黑旗。[Stewart Edwards, *The Communards of Paris, 1871*, p. 2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使用黑旗，正是他们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工人运动中扎根并开展活动的体现。无政府主义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采用黑旗，反映了它作为“饥饿、贫困和绝望的传统象征”的历史，同时它也“在欧洲的民众起义中被举起，象征着绝不投降、绝不妥协”[Walter and Becker, *Act for Yourself*, p. 128]。这一点得到了第一份以“**黑旗**”命名的无政府主义刊物的印证：“在里昂的高地——克鲁瓦-鲁斯区和瓦兹区，工人们在饥饿的驱使下，首次举起这一象征哀悼和复仇的旗帜（黑旗），并因此使其成为工人诉求的象征。”[《Le Drapeau Noir》，第1期，1883年8月12日] 这一点也得到了露易丝·米歇尔的呼应：

“当红旗与黑旗在愤怒的风中飘扬时，会有多少愤怒的人，多少年轻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当红与黑的旗帜围绕着这片残破的旧世界升起时，它将掀起何等巨浪！”

“红旗，它始终象征着自由，却因沾满我们的鲜血而让刽子手们恐惧。黑旗，上面层层叠叠的血迹，属于那些想要靠劳动生存、或准备战斗至死的人，它让那些靠剥削他人劳动而生的人感到畏惧。这些红旗与黑旗在我们头顶飘扬，为我们的死者哀悼，也为破晓的希望飘扬。”[《红色处女：露易丝·米歇尔回忆录》，pp. 193-194]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统治阶级对公社社员的大规模屠杀，也可以解释无政府主义者在此后采用黑旗的原因。在西方文化中，黑色是哀悼的颜色，它象征着“我们对死去同志的哀悼，那些在战场上（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在街头、示威队列上（阶级斗争中）被夺去生命的人。”[Chico, “letters”, *Freedom*, vol. 48, No. 12, p. 10] 考虑到公社牺牲的2.5万名战士，其中许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在此后采用黑旗是合乎情理的。尼加拉瓜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桑地诺（Sandino）同样赋予红黑两色象征意义，他解释道：“红色代表自由；黑色代表哀悼；而骷髅，象征着殊死斗争。”[Donald C. Hodges, *Sandino's Communism*, p. 24]

无论黑旗是否还有其他含义，但显而易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采用黑旗，是因为它与红旗一样，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公认的象征。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无政府主义政治本质上扎根于工人阶级的实践。正如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源于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我们的象征也同样源自工人们在斗争中创造的符号。例如，蒲鲁东不仅从激进工人那里吸收了“互助主义”这一概念，他还指出，合作性质的“劳动联合”已经“自发地、无需推动、无需资本

地在巴黎和里昂形成……（互助主义，即信贷与劳动的组织的）证据……就在当前的实践之中，即革命的实践之中。”[《没有神明，没有主人》，vol. 1, pp. 59-60] 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工人阶级自我实践的表达。正如 K. Steven Vincent 所言，“蒲鲁东的联合体理想……与里昂互助主义者的纲领”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相似性”，甚至“二者呈现出惊人的趋同关系，而蒲鲁东之所以能更清晰地表述他的积极纲领，很可能正是因为里昂丝织工人所提供的实践示范。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实际上已经在这些工人的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p. 164] 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做出类似的论述，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工人阶级反抗压迫与剥削的内在趋势的表达。因此，采用一个传统的工人阶级象征（黑旗），自然也就成为无政府主义斗争的体现。

同样，或许可以用露易丝·米歇尔的评价，来解释 1881 年成立的“黑色国际”这一名称的由来；她曾称，黑旗为“罢工的旗帜”。这也可以解释为何 19 世纪 80 年代初，黑旗在无政府主义者中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在“黑色国际”成立大会前后，克鲁泡特金正在构思这一组织应成为一个“罢工者国际”

（*Internationale Greviste*）——它将是“一个抵抗与罢工的组织” [quoted by Martin A. Miller, *Kropotkin*, p. 147]。1881 年 12 月，他探讨了将国际工人协会重建为“罢工者国际”的问题，因为“要实现革命，工人群众必须组织起来。抵抗与罢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极佳组织方式。”他强调，“罢工能够培养团结的情感”，并指出第一国际“诞生于罢工运动，它本质上是一个罢工者的组织” [quoted by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886*, p. 255 and p. 256]。

一个“罢工者国际”，自然需要一面属于罢工者的旗帜。或许，“黑色国际”因此得名。这一点，当然与无政府主义者使用黑旗作为工人抵抗象征的做法，完全契合；而无政府主义本身正是这种抵抗的政治表达。

然而，黑旗并没有立即取代红旗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象征。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里，红旗的使用仍持续了数十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克鲁泡特金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写道：“无政府主义团体……升起革命的红旗。”正如伍德科克所指出的，“黑旗在当时并未被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普遍接受。许多人，例如克鲁泡特金，仍然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并且认为红旗同样属于他们” [Words of a Rebel, p. 75 and p. 225]。此外，整个 19 世纪 80 年代，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使用黑旗和红旗。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在 1885 年露易丝·米歇尔母亲的葬礼上，举着三面红旗，在 1905 年 1 月露易丝·米歇尔本人的葬礼上亦是如此 [Louise Michel, *Op. Cit.*, p. 183 and p. 201]。例如，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 1908 年 6 月曾在红旗下示威，旗上写着“安那其”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标语 [John Crump, *Hatta Shuzo and Pure Anarchism in Interwar Japan*, p. 25]。三年后，墨西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宣称他们已经“在墨西哥的战上升起了红旗”，以此作为他们“对抗权威、对抗资本、对抗教会的战争”的一部分。他们“在红旗下战斗，高呼‘土地与自由’” [Ricardo Flores Magon, *Land and Liberty*, p. 98 and p. 100]。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使用红旗和黑旗作为自己

的象征。而从红旗向黑旗的转变，必须放在历史背景中考察。19 世纪 80 年代，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逐渐成为主导潮流，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在许多地区相对衰落。因此，红旗越来越多地与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日益趋向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为了将自己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选择黑旗作为象征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黑旗与红旗一样，都是公认的工人阶级反抗的象征。

在俄国革命中，及其向独裁政权（先是列宁统治，随后是斯大林）滑落的过程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减少了红旗的使用，因为它不再“象征自由”。相反，红旗在最坏的情况下，被视为与共产党有关；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则代表官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威权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变化可以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看出。如上所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曾欣然举起红旗，但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他们改为展开黑旗。他们组织了**黑色青年联盟**

（**Kokushoku Seinen Renmei**），并出版了《**黑色青年**》（**Kokushoku Seinen**）。到了 1930 年，无政府主义理论杂志《**黑色战线**》（**Kotushoku Sensen**）被两本期刊所取代，分别是《**黑旗**》（**Kurohata**）和《**黑色斗争**》（**Kuhusen**）。[John Crump, *Op. Cit.*, pp. 69-71 and p. 88]

历史学家坎迪斯·福克（Candace Falk）指出：“尽管自 1883 年以来，黑色在法国一直与无政府主义相关联，但在整个这一时期，红色才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象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黑色才被广泛采用。”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1, p. 208fn] 由于这一变化并非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尽管无政府主义与黑旗的联系最迟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初，但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它才真正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决定性象征。（1925 年，在美国的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仍然宣称要“站在红旗下，那面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纯洁旗帜之下”。[quoted by Nunzio Pernicone, *Carlo Tresca: Portrait of a Rebel*, p. 161]）。在此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使用红旗和黑旗作为象征。在俄国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然会在旗帜上使用红色，但仅仅是与黑色结合使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避免与苏联的残暴统治或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改良主义和国家主义产生联系。

2. 为什么是红黑旗？

红黑旗与无政府主义的联系由来已久。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认为这种旗帜最早出现在西班牙：

“黑旗与红旗同时出现，成为欧洲和美洲无政府主义示威的一个特点。随着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的成立，一种黑色与红色对角分割的单一旗帜被采用，并主要在西班牙使用。” [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57]

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同样强调了这面旗帜在西班牙的起源：

“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旗帜是红黑色的，并以对角线分割。在（第一）国际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一样举着红旗，但后来他们倾向于用黑旗取而代之。红黑旗象征着一种尝试，即将后期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大众号召力结合起来。” [Anarchism, p. 325fn]

根据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1930 年代全国劳工联盟（CNT）战斗员阿贝尔·帕斯（Abel Paz）的记载，1931 年 5 月 1 日，是“历史上红黑旗首次在 CNT-FAI 的集会上飘扬”的日子。这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武装力量、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召开重要会议的结果，他们在巴塞罗那共同策划五一示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应在何种旗帜下游行。”当时，一派被称为“红旗”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更注重劳动议题”），另一派则是“黑旗”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当时）“更远离经济问题”）。然而，随着新共和国的宣布，有着“巨大的大规模动员机会”，因此围绕劳动议题应占多大比重的分歧变得“毫无意义”。这促使双方达成一致，其“物质化的体现”就是“将两面旗帜合二为一：红黑旗。”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06]

然而，红黑旗的使用远早于 1931 年，甚至早于全国劳工联盟的成立。事实上，相较于黑旗，红黑旗，或许才是最早出现的专门代表无政府主义的旗帜。

红黑配色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 1874 年 8 月波隆那起义的尝试，当时的参与者“佩戴着无政府主义的红黑帽徽。” [Nunzio Pernicone, Italian Anarchism, 1864-1892, p. 93] 1877 年 4 月，在另一场旨在引发起义的行动中，无政府主义者进入意大利小镇莱蒂诺（Letino），他们“佩戴着红黑帽徽”，并挥舞着一面“红黑色的旗帜”。这些行动有助于“引起全国关注”，并“让国际工人协会及其社会主义纲领受到广泛瞩目。” [Nunzio Pernicone, Op. Cit., pp. 124-5, 126-7]。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历史学家指出，1874 年的起义者“佩戴着第一国际的红黑色的徽章”，而三年后，他们则“高举红与黑的无政府主义旗帜。” [T. R. Ravindranathan, Bakunin and the Italians, p. 208, p. 228]。因此，与黑旗类似，红黑旗在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象征之前，已是工人运动（尤其是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的标志之一。

几年后，红黑旗在墨西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1879 年 12 月 14 日，在墨西哥城哥伦布公园的无政府主义抗议集会上，“大约五千人聚集在一起，挥舞着许多红黑旗帜，其中一些旗帜上写着 ‘*La Social, Liga Internacional del Jura*’^①。讲台前方悬挂着一面大黑旗，上面写着 ‘*La Social, Gran Liga Internacional*’^②。”墨西哥与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联系非常紧密，因为“19 世纪的墨西哥城市工人运动，直接与欧洲第一国际汝拉的支部保持联系，并在某个阶段公开加入该组织。” [John M. Hart, Anarchism and the Mexican Working Class, 1860-1931, p. 58, p. 17]。1913 年，在成立仅一年后，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世界工人之家”（*Casa del Obrero Mundial*）组织了墨西哥的第一次五一劳动节示威，“约两万至两万五千名工人在红黑旗的引领下聚集在墨西哥城。” [John Lear, Workers, Neighbors, and Citizens, p. 236]

^① 大意：社会联盟，第一国际汝拉支部

^② 大意：社会联盟，国际工人大同盟

尼加拉瓜民族解放斗争的激进领袖，奥古斯托·桑地诺（Augusto Sandino），深受墨西哥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影响，因此他的运动旗帜便采用了红黑配色（桑地诺的旗帜是水平分割的，而非对角分割）。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C·霍奇斯（Donald C. Hodges）所指出的，桑地诺的“红黑旗源自无政府工团主义，是由西班牙移民引入墨西哥的。”毫不意外，他的旗帜被视为“一面象征工人解放斗争的旗帜。”（霍奇斯将桑地诺的政治理念称为“独特形式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暗示他对红黑旗的采用反映了其思想中的强烈自由意志主义倾向。）[*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 p. 49, p. 137, p. 19]

这些历史表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不过在 1931 年是“重新发现”了红黑旗，而非创造了它。然而，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CNT-FAI），似乎是第一个采用红黑对角分割设计的组织（不过也存在其他分割方式，例如水平分割）。在英语世界中，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红黑旗似乎是受到 1936 年西班牙革命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当时，与 CNT-FAI 相关的信息广泛传播，CNT 风格的红黑对角旗也随之扩展，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通用象征。

红黑旗对于某些人而言，更多地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相关，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正如阿尔伯特·梅尔策所言：“工人运动的旗帜（并不一定仅属于社会主义）是红色的。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盟（CNT）首创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红黑旗（即无政府主义加上工人运动）。”[*Anarcho-Quiz Book*, p. 50] 唐纳德·C·霍奇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在墨西哥世界工人之家（墨西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徽章上，红色象征工人对抗有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黑色象征他们的起义斗争。”[*Sandino's Communism*, p. 22]

这并不与红黑旗最早在意大利和墨西哥的使用相矛盾，因为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当在工人运动内部传播自由意志思想。因此，我们在墨西哥和意大利发现使用相同旗帜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两个国家的运动，都曾参与第一国际及其反威权的继承者组织，并且像瑞士的汝拉联盟一样，积极参与工会组织和罢工。考虑到第一国际的集体无政府主义（其最著名的倡导者是巴枯宁）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似性，他们使用类似的象征符号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工团主义无非是国际的重生——联邦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拉丁世界的。”[quoted by Martin A. Miller, *Kropotkin*, p. 176] 因此，它作为重生的象征也不是一种巧合。

由此可见，红黑旗源自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实践，尤其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密切相关，但并不局限于此。黑色代表自由意志思想与罢工（即直接行动），红色代表工人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联系变得不那么显著，许多非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乐于使用红黑旗（例如，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便使用它）。可以大致概括地说，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比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更倾向于使用红黑旗；正如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比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更愿意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结盟一样（至少在现代是如此）。然而，红旗和黑旗都起源于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斗争，这表明将二者结合成一面旗帜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考虑到黑旗与 1831 年里昂起义有关，红黑旗的出现或许并不算

罕见。同样，鉴于黑旗被称为“罢工的旗帜”（引述露易丝·米歇尔——见[上文](#)），而红旗则是工人运动的象征，因此，在强调直接行动和罢工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中，红黑旗的使用是自然而然的发展。

因此，尽管红黑旗最初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相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标准象征，黑色仍然代表无政府状态，而红色象征社会合作或团结。因此，红黑旗比任何单一符号都更能象征无政府主义的目标（“个体的自由与整个社会的合作”[由彼得·克鲁泡特金所著的《Act for Yourselves》，p. 102]），同时也代表其实现手段（“要进行革命，广大工人必须组织起来。抵抗与罢工是建立这种组织的极佳方式”，“罢工能够培养团结精神。”[克鲁泡特金，转引自卡罗琳·卡姆所著的《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186》，p. 255 和 p. 256]）。

3. 圈-A 来自哪里？

圈-A（Ⓐ）作为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或许比黑旗与红黑旗更广为人知（可能因为它非常适合用于涂鸦）。彼得·马歇尔指出，“圈-A”代表着蒲鲁东的格言：“安那其即秩序。（*Anarchy is Order.*）”[由彼得·马歇尔所著的《Demanding the Impossible》，p. 558]。彼得·彼得森进一步补充说，圆圈“象征着团结与坚定”，并“支持了‘无政府主义国际团结’这一长期宣扬的理念。”[“Flag, Torch, and Fist: The Symbols of Anarchism”，Freedom, vol. 48, No. 11, pp. 8]。

然而，“圆圈-A”作为无政府主义象征的起源并不明确。许多人认为它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朋克运动，但实际上它的历史要早得多。彼得·马歇尔指出：“1964 年，法国的‘自由青年’（*Jeunesse Libertaire*）组织，为蒲鲁东的口号‘安那其即秩序’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创造了‘圆圈-A’符号，这一符号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Op. Cit., p. 445]。但这并不是最早的记录。在 1956 年 11 月 25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无政府工人联盟（*Alliance Ouvrière Anarchiste, AOA*）在成立时便采用了这一符号。此外，BBC 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中，也展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民兵，他的头盔后部清晰可见“圈-A”标志。除此之外，有关“圈-A”起源的资料较少。

如今，圈-A 已成为政治象征领域最成功的符号之一。其“惊人的简洁性和直接性，使其成为 1968 年抗议运动后、重振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公认的标志”，特别是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即使不是大多数国家），安那其一词的首字母都是“A”。[Peter Peterson, Op. Cit., p. 8]。

第二卷

第二卷导言

“征服或死亡——在此历史性时刻……这一两难的抉择摆在农民与工人面前……但我们并不是为了重蹈过往数年的覆辙、不是为了再次把我们的命运交由新的主子掌控而去征服；我们征服，是为了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按照我们自身的意愿与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来生活。”

——内斯托尔·马赫诺^①

欢迎阅读《无政府主义常见问答》（AFAQ）第二卷！

如果说，第一卷的核心内容在于概述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和思想，并呈现无政府主义对权威、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批判，那么本卷则围绕两个主题展开。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马克思主义历来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替代方案；其二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

毋庸置疑，第二个主题要远更重要，因为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分析世界的问题，它更着眼于改变世界。

不过，首先我们从个体无政府主义（第 G 节）的论述开始。可以说，个体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论述中，历来处于边缘地位。这无疑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个体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北美的运动，并且始终只是全球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即便在美国，它也被社会无政府主义所掩盖。

正因如此，它常常在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述中被忽视，而 AFAQ 正试图对此进行纠正。不幸的是，本节也必须回应一种主张——即“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个体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花费一定篇幅来驳斥这一论断。当我们做这件事时，内心是沉重的，因为这可能会夸大该意识形态及其影响的重要性；但我们不得已而为之，仅仅是为了反制那些试图混淆两者的意识形态鼓吹者与学者——他们或是出于无知（后者），或是出于私利（前者）。此外，第 G 节的结构也受到 AFAQ 发展历程的影响，其最初是作为一份反“无政府”资本主义的 FAQ，而非支持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如果本书一开始就是以如今这种亲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出现，那么本节内容将有很大不同（最明显地，关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材料将会被放入附录中，那里，才是它应有的位置）。

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第 G 节可以视为第 F 节（即为什么“无政府”资本主义不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延续。个体无政府主义是最接近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形式，因此也最接近“无政府”资本主义。然而，某些相似之处并不意味着前者就是后者——从“无政府”资本主义视角看，是有缺陷的——先驱。如

^① 编者注：引自彼得·阿西诺夫，*The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58

果真是这样，那就如同有人宣称社会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一样。当然，它们之间确有交集，但个体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之间也都有交集。然而，尽管个体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存在差异，它们在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批判上却有重要的共通之处。

个体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理论，把它简化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有缺陷的前身——而该意识形态的起源与目标，却与之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这是对它的歪曲与伤害。个体无政府主义，在更广泛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这与产权主义者却对这些运动所持的轻蔑态度，绝非巧合。同样也非偶然的是，个体无政府主义主要受到劳工、货币与土地改革运动，以及蒲鲁东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影响；而“无政府”资本主义所依据的，则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该学派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对抗这些群众运动而发展起来的。这导致了二者在分析、策略与目标上的根本差异，也无可置疑地表明，这两者根本无法混为一谈。个体无政府主义者绝不能被看作产权主义的前驱，哪怕是以最表层的方式来看，也不行。因此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实属遗憾，但却不得不为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意识形态的创立者，默里·罗斯巴德，在 1950 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虽然未曾正式发表，却意外流传开来，文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文章标题为《自由意志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吗？》，虽然这一标题本身因忽视“自由意志主义”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中的使用，而显得极不准确）。撇开罗斯巴德在文中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解、歪曲与虚构，这篇文章还是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我们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那些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既缺乏词源学依据、也完全无视历史。”这一结论适用于“主导性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即‘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一学说也被称为‘集体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以及被罗斯巴德视为“其中最优秀者”的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因为这两者的理论中都包含了“社会主义元素”。他指出，在“古典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中，确实存在一些思想家，其观念与他自身的意识形态“相似”，但这些人“从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而“所有的无政府主义团体……都在经济理论上拥有共同的社会主义学说”。要是他当年坚持这个分析，并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起一个更为贴切的名称，那么这份 FAQ 本可以大大缩短！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罗斯巴德在文中使用了“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一词，这表明他对“自由意志主义”作为“无政府主义”替代词的传统用法是心知肚明的。有趣的是，在回忆美国所谓“自由意志主义”右翼的起源时，罗斯巴德曾公开承认他们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偷走了“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个词：

“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其中令人欣慰的一点是，我所记得的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这一方’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一个关键性的词语……‘自由意志主义者’……长期以来只不过是左翼[原文如此！]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种委婉称呼，

也就是说，那些反对私有财产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工团主义者。而现在，我们夺过了这个词……”^①

如今，当然，产权主义者却尖锐地谴责无政府主义者使用“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词汇原始且正确的含义，声称他们试图“篡夺”他们的这个称呼，并将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真是充满讽刺……

与那些忙于玷污“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美名、贬低个体无政府主义记忆的产权主义者不同，无政府主义的两个流派的拥护者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当然，个体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真正的差异，我们也将对此进行探讨。我们会指出，某些来自两个阵营的成员试图将对方逐出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做法，最终都是徒劳的（总体而言，个体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这样做，但两个阵营中都存在不容异己的人）。这两个派别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重叠，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在自由社会中和谐共处，并且在某些议题与策略上，也可以在反抗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斗争中展开富有成效的合作。^②

接着，我们将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其缺陷（第 H 节）。说实话，鉴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历史验证，这一节竟然还需要写出来，实在令人震惊。就好比你在写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却不得不花大量篇幅去驳斥拉马克学说^③一样。遗憾的是，许多激进派似乎难以把握历史事实，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已然成真。巴枯宁是对的：社会民主确实沦为了改良主义，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但这番批判，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完全否定马克思的全部观点。^④就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言，自由意志主义者确实有许多可以认同的内容（毫无疑问，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建立在蒲鲁东的分析之上！）。也正是由于这一分析，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延续；而不是像马克思的许多积极贡献那样，与其他思想（如蒲鲁东与巴枯宁的观点）一起被整合进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当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是有力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确的；但在关于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应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性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显得问题重重。因此，就如我们看待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那样，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有效的贡献，同时也必须摒弃其负面部分——特别是当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立场，其实最初正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

^① 编者注：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Right,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 83

^② 编者注：我也希望能借此机会来感谢个人无政府主义者 Shawn Wilbur——他在第 G 节中贡献许多，并在阅读完我寄送他的第一版草稿时，提出了很多建议。若是没有他的帮助，也没有他放在互联网上的许多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的许多作品，这一节可能就无法做到如今这般全面。

^③ 拉马克学说，是由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于 1809 年提出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获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虽然现代生物学表明其在一定程度是正确的，但相较于能更好解释生物演化的达尔文进化论，如今该理论普遍不被接受。

^④ 编者注：当然，也不意味着不存在自由意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我们在第一卷的 AFAQ 的 A.4.4 节指出的，的确存在这种人。至于为什么，他们在拒绝马克思在许多关键问题上的思想（并在此过程中暗含着同意巴枯宁的观点）的同时，却仍然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了。

此外，除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存续另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其表面上的成功。但不用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乐于遗忘：第一个貌似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其实是社会民主主义。恩格斯对它曾有过极尽溢美之词，而如今却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一点；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迅速滑向改良主义，甚至在德国革命期间沦为公开的反革命势力。相反，吸引了众多激进派的，是列宁主义^①在俄国革命中表面的成功。正因如此，亚历山大·伯克曼所称的“布尔什维克的神话”至今仍然存在——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加以驳斥的内容。

毋庸赘言，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承诺在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不出半年，事实上的政党专政便确立下来，统治着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到了1919年初，革命中“党派独裁”已被该党的全部领导人视为理所当然）。如果这都能算是成功，那失败又该是什么样子？所幸的是，与伯克曼那一代人不同，如今那些对俄国所谓“社会主义”抱有幻想的人已大为减少——尽管，仍有一些人一方面谴责斯大林，另一方面，却无法看清其与列宁政权及其意识形态观念（尤其是先锋队思想，但不仅限于此）之间显而易见的联系。正如我们在 H.6 节所展示的，当代列宁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专制辩护的标准理由，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依据上，都站不住脚。因此，我们不仅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也努力将这一批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经验之中。主要包括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布尔什维主义及俄国革命的分析。

我们还花了一些时间，来驳斥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诸多歪曲。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看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对无政府主义的、明显虚假的指控了。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真正读过蒲鲁东、巴枯宁或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他们只是重复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当然，这一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这也解释了为何 H.2 节中引用了大量文献——只是为了向那些熟悉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人，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几条引用可以说是断章取义，但大量引用则不能如此轻易否定。很遗憾我们必须这样做，但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那些低劣的陈词滥调如此常见，以至于实在无法不去做出细致地回应。令人悲伤的是，即使我们在 AFAQ 中已对这些惯常的虚假论断进行了驳斥，我也不认为，这能阻止马克思主义者们继续重复它们。

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种种神话也延伸到了第 G 节，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反国家”而已（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产权主义者出奇地一致）。然而，即使是粗略了解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历史的人也知道，它从未仅仅满足于对国家的批判。自无政府主义成为一个有名称的社会经济理论以来，我们的批判对象始终包括国家与财产二者。《财产即盗窃！》是我编辑的蒲鲁东文选，展示了无政府主义对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反对，自始至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蒲鲁东主张，“资本主义原则”与“政府原则是同一个原则”，因此“废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废除人与人之间的统治，是同一个

^① 编者注：我们注意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说法——我们也表明这一立场存在一些合理性。我们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不仅对无政府主义有所歪曲，也曲解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国家这一关键问题许多方面的思想（比如说，详见 H.3.10 节）

计划”。更进一步，“国家的存在，正是为了保护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同时致力于消灭资本与国家”，并且“若你消灭了前者，你仍然必须消灭后者，反之亦然。”^①

所以，那种将无政府主义简化为单纯反国家的观点，在我们的传统中完全是陌生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将无政府主义虚假地局限为仅反对国家，正好使他们得以将自己传统描绘成唯一的社会主义形式，从而在定义上，将无政府主义排除出反资本主义阵营。

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将转向更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话题，即无政府主义对自由社会可能样貌的构想（第 I 节），以及我们如何在此时此地为实现它而努力、同时改善我们的生活（第 J 节）。

第 I 节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粗略勾勒出了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自由社会的特征。因此，我们在其中讨论了工人自我管理、社区自治、经济与社会联邦主义、自由社会中的反社会行为问题，以及其他诸多议题。尽管很多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讨论未来社会的价值表示怀疑（我们会马上想到马克思的那句“写给未来的食谱”^②），但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更愿意对自由社会的可能样貌做出设想。这可能会让某些人感到惊讶（他们也许过于沉迷于，巴枯宁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的那个名言：“毁灭的冲动也是一种创造的冲动”），但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建设性的社会经济理论，其思想家们也一直乐于描绘一个自由社会的蓝图。

关键在于，这是可能的无政府状态。正如我们再三强调的那样，我们并不是在提出一套蓝图：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原则、反压迫斗争的经验以及既有社会革命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建议。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未仅仅出于对等级制度的抽象反感，而设计某种理想社会结构。相反，我们的自由社会构想，源自于对现实剥削体系的批判性分析，也源自于那些反抗体系的人们所展现出的自我组织与自我活动。

这种反乌托邦式的视角，自蒲鲁东时代起就构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尤其是在《经济矛盾体系》中，蒲鲁东严厉批判了傅立叶、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批评他们沉迷于空想图景并祈求富人资助，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找可超越它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行动力。因此，社会的变革“不应由现存权力产生；它必须是自发的”。变革必须“自下而上”发起，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变革“由公民的协作行动、工人的经验、启蒙的传播与进步来实现，是以自由的方式进行的革命。”^③ 呼应蒲鲁东的观点，克鲁泡特金也强调说：“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方法与空想家的完全不同……他研究的是当今以及过去的人类社会……他尝试发现社会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趋势、不断增长的智识与经济需

^① 编者注：Property is Theft!, p. 496, p. 535, p. 503 and p. 506

^② 编者注：如果马克思当初更愿意提供一些未来的信息，那么斯大林一流就会发现很难再把自己梦魇一般的体制标榜为“社会主义”

^③ 编者注：Proudhon, Op. Cit., p. 325 and p. 398

求，并在其理想中指出进化的方向。”^① 这也就意味着，观察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与抗争，是无政府主义者将现实与未来相连接的关键方式。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常见问题》中，我们讨论了无政府主义一直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过渡的问题，二是新世界如何在旧社会中萌芽。如 [1.2.3 节](#) 详细所示，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强调：新世界诞生于我们反抗旧世界的斗争之中。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仅改变了参与者自身，也创造了那些未来社会将以为之框架的组织形式——如社区议会、工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及其联合体等。正因为如此，“在旧世界的壳中建造新世界”这一 IWW（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口号，早已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信念之一。早在 1848 年革命期间，蒲鲁东就曾呼吁：“应在旧社会的核心中建立新社会”，这一新社会应当基于“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组织的建立……与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相对抗。”^②

这正好引出了最后一节：无政府主义者都做些什么？在第 J 节中，我们总结了无政府主义者如何看待社会变革的发生，如何组织起来以影响阶级斗争，以及我们所创造的组织形式。我们深入讨论了我们所倡导的替代性社会组织形式，以及这些形式如何在我们的抵抗当前压迫性社会的过程中，成为未来自由社会的雏形。例如，我们讨论了如何将我们倡导用以对抗资本家的职场集会联合会，转化为自由社会中组织合作生产的手段；而作为对国家权力的对抗力量而建立的街区集会，则成为自由个体管理其社区的方式。

我们也阐述了，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支持直接行动并拒绝投票（即所谓的“政治行动”）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以及自由意志主义者在社会斗争与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我们是如何组织起来以影响这些过程的。在总结我们关于“我们如何组织”和“我们如何改变世界”这些重大问题的理念时，我们还花时间驳斥了一些常见的对弃权主义的误解，比如我们是否是“去政治的”。可以说，无政府主义对竞选政治的批判已被现实所证实（从世界上曾经的激进政治家和前社会主义政党的数量即可看出）。同样，我们关于直接行动、团结互助和自下而上的工人阶级自我组织所具有的变革力量的论点，也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验证。

还必须指出的是，本卷中的各节内容经过了适度删减，以确保其篇幅大致与第一卷相当。这一过程涉及删减了大约十分之一的内容。我尽量删去了一些非核心的段落和子章节，以确保论证的核心内容得以保留。这意味着，例如 H.2 节（该节揭穿了各种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神话）在印刷版中止于 H.2.11 节，而在线版中则延伸至 H.2.14 节。这一删减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完成的。

自第一卷出版以来，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因其政策的必然后果而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尽管现实重重打击了这种意识形态，但可以公平地说，它仍将继续存在——毕竟，这种意识形态本就极不现实，现实又怎能撼动它对信徒的“美感”呢？更不用说其背后所体现的重大阶级利益了。有一点是确切的：

^① 编者注：Anarchism, p. 47

^② 编者注：Op. Cit., p. 321. 蒲鲁东也在 1845 年做出了相似的呼吁，主张“必须找到一种工业与农业结合的方式，通过这种结合，今日社会的统治者，明日将变为社会的奴隶”，因为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被资本束缚，并被直接地用来反抗无产阶级。”（pp. 225-6）

除非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进行抵抗，否则政府、政治话语、经济体系以及经济意识形态——都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而将为这场危机买单的却不是制造它的统治阶级。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AFAQ 的 [B.1 节](#)指出了财富与权力等级制度如何对受其支配者产生负面影响。《精神层级：为何更平等的社会几乎总是表现得更好》一书由理查德·威尔金森与凯特·皮凯特合著，为这一主题提供了更多证据，指出在几乎所有衡量生活质量或福祉的指标中，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与其社会结果之间都存在强烈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穷人受到不平等的负面影响，整个社会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更平等的社会，犯罪率较低、监禁人数较少，同时还在身体与心理健康、青少年怀孕率与肥胖率较低、识字率和社会信任程度更高等方面持续表现出优势。所有这些，都再次印证了无政府主义对财富与权力不平等之危害的分析。

AFAQ 已经更换了其主站的位置（尽管我们使用的各域名别名仍保持不变）^①。因此，我们也开设了一个博客，用于发布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补充材料，以及 FAQ 本身的相关信息（如更新内容）^②。值得注意的博文包括：2008 年为纪念无政府主义者首次使用“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术语 150 周年而发表的文章（《自由意志主义 150 年》）；对第一卷中附录“无政府主义象征”的补充（《安那其的红旗》）；以及 C 节未完成的附录，从社会主义视角解释古典经济学。

最后，作为个人的一点心愿，我将本卷同第一卷一样，献给我的家人。我希望这部作品，无论贡献多微小，都能有助于为他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在一个更自由、更可持续的世界中成长。但他们是否能够拥有这样的未来，最终取决于我们——当下这一代人。我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我们是否愿意为自由和平等而斗争？——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你可以读完 AFAQ 然后止步于此，也可以选择加入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运动并不完美，也无法给出所有的答案。然而，它依然是我们为独立个体营造一个适于生活与成长的世界的最佳希望。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甘愿继续在资本主义中苟活，还是愿意努力改变自己和我们的世界，使之变得更好？我们可能会失败，也许无法阻止权威主义和原子化倾向的蔓延。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进行抵抗，这种退化只会加速。

而如果我们去抵抗呢？那么，我们或许真的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Iain McKay

www.anarchistfaq.org.uk

^① 编者注：也就是：www.anarchistfaq.org, www.anarchismfaq.org, www.anarchyfaq.org 以及 www.anarchistfaq.org.uk.

^② 编者注：可以从 <http://anarchistfaq.org/afaq/blog/index.html> 里找到相关的信息

第 I 节

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
看起来会是怎样的

第 I 节导言

到目前为止，本常见问题解答（FAQ）主要侧重于批判，集中在等级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等方面，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问题；同时也驳斥了一些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威权主义者所提出的虚假“解决方案”。现在，是时候审视无政府主义的建设性一面——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建设性的理论，与通常被描绘为混乱或盲目破坏的无政府主义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本常见问题解答的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概述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的样貌。这样的社会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如非等级化、去中心化，并且，最重要的是，像生命本身一样自发。引用格伦·阿尔布雷希特(Glenn Albrecht)的话，无政府主义者“非常重视自发秩序的自由呈现，而不依赖外部力量或权威。”【《伦理学、无政府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无政府主义研究》，第二卷，第二期，第 110 页】这种发展的类型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从简单到复杂进行组织：从个人到社区、到生物区域，最终到整个人类共同体。最终形成的社会，是大自然自由展现、走向更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结果，它在伦理上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秩序更为可取，因为它允许最高程度的有机团结与自由。克鲁泡特金如此描述这种真正自由社会的愿景：

“我们预见到，数百万个群体将自由地组成，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所有这些群体将由自由结合的个体组成……‘拿起小石子，’傅立叶说，‘把它们放进盒子里摇一摇，它们会自然排列成一种你无法通过指示他人去摆放的、和谐的嵌合体。’”【《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演进中的地位》，第 11-12 页】

无政府主义对等级制度的反对是“自发有序”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为权威会阻止个体的自由发展。从个体、群体及社会整体的自然成长中，无政府主义者期望一个能够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社会——包括个人与社会自由、满足物质需求的物品，以及满足所谓“精神需求”（即心理与情感健康、创造力、道德发展等）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任何试图将社会或个体，强行纳入一个限制其自由的预设结构的行为，都将产生失序。因为天然的平衡和发展，会在反社会和破坏性的方向上受到妨碍和扭曲。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自由的社会，由自由个体组成，彼此在自由意志主义的结构内结社，而不是由一系列相互竞争的等级制度（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只有在自由中，社会与个体才能发展并创造一个公正与公平的世界。用蒲鲁东的话说：“自由是秩序的母亲，而不是秩序的女儿。”

由于个体并非在社会真空中存在，因此，适当的社会条件，对于个体自由的发展和实现其全部的潜力，是必需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围绕着一个核心论断展开，

即个体及其组织不能被孤立地看待。换句话说，社会结构塑造我们，“制度的权威结构与个体的心理特征和态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而且“参与的主要功能是教育性的。”[Carole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p. 27] 无政府主义以其最连贯和最自由意志主义的形式提出这一立场。换句话说，只有在自由条件下，个体和社会才能维持和保护自由，即自我治理。自由，是获得持续自由所需的成熟度的唯一前提：“只有在自由中，人类才能成长到其完全的高度。只有在自由中，人类才能学会思考和行动，发挥出最好的自己。”[Emma Goldman, *Red Emma Speaks*, p. 72]

由于个体自由，只能通过自治和自由结社来创造、发展和捍卫，那么一个鼓励个性化的系统就必须是去中心化和参与式的，才能让人们发展出一种心理，去接受自我管理带来的责任。在国家或任何其他威权制度下生活会产生一种奴性的特征，因为个体不断地被置于等级权威之下，这通过缺乏使用，削弱了他们的批判性和自治能力。这样的状况无法促进自由，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权力和权威会腐化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正如腐化那些被迫服从的人一样。”[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49]

在审视资本主义时，我们发现——在工资劳动下，人们在一定时间内，将他们的创造性精力和对自己活动的控制权出售给雇主。老板不仅从员工所出售的时间中榨取剩余价值，而且还从时间本身——他们的自由、他们通过工作和与同事共同工作来表达自己的能力——中，榨取价值。工资劳动等同于工资奴役，因为你每天都在工作中出卖自己的时间和技能（即自由），而你永远无法把这些时间买回来。一旦它流逝了，它就永远消失了。它还会产生，引用戈德温的话说，一种“依赖感”和“奴性与拍马屁的精神”，确保了“封建精神依然存在，这种精神将大多数人类降格为奴隶和牲畜，为少数人的服务。”[《威廉·戈德温的无政府主义著作》，第 125-126 页] 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需要“创造一种境况，让每个人可以自由工作谋生，而不必被迫将自己的工作和自由，出售给那些通过劳工积累财富的人。”[克鲁泡特金，《反叛者的言辞》，第 208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社会，使每个人“应当拥有发展其人性的物质和道德手段”，从而“以这样的方式组织社会，使每个个体……应当拥有……大致平等的手段，来发展（其）各种才能，并在（其）工作中加以利用；创造一个使每个个体……处于无法剥削他人劳动的地位的社会”，并且“只要他们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生产，就能分享社会财富。”[巴枯宁，同上，第 409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乔治·奥威尔的看法：“问题非常简单。人们……是否应当被允许，过上现在在技术上可行的、体面而完全的人类生活，还是不被允许？普通人是否应被推回泥潭，还是可以不被推回？”[《奥威尔论西班牙》，第 361 页]

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是有关于改变社会并废除一切形式的权威性社会关系，将生活置于资本主义生存所需的、摧残灵魂的“效率”之上；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立足于他对生命及其所有乐趣的正当权利，这些乐趣包括智力的、道德的和身体的。他热爱生活，并打算充分享受它。”[巴枯宁，《米哈伊尔·巴枯宁：选集》，第 101 页] 因此，引用艾玛·戈尔德曼的话说，“所有人类，不论种族、

肤色或性别，在生命的餐桌面前生来都有平等的权利去分享；为了保障这一权利，必须在人类之间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自由。”[《美国年代文献史》，第2卷，第450页] 这将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等级的社会，一个没有主人、没有仆从的社会，一个基于自由个体自由结合的社会，鼓励和庆祝个性与自由：

“‘无阶级社会’这个词，无疑对任何深思熟虑的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恐惧感。它立刻唤起了沉闷平庸的形象……所有人自给自足的个体在各个层面上都完全一致：住在样板房里，沿着无尽的相同的道路、在完全相同的福特车里旅行……但是……共享这些财富并不会产生生活的一致性，仅仅因为欲望不会一致。一致性是一种愚蠢的噩梦；在一个自由的人类社会中是无法实现一致性的。一致性只能通过极权主义政权的暴政来创造。”[赫伯特·里德，《无政府主义与秩序》，第87-88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基本价值是人类价值，因此，社会是由表达成员意志的各种结合体组成的，这些结合体的目的是促进成员的福祉。我们认为，仅仅让协会在形式上获得成员被动或“默许的”同意，是不够的；只有当社会及其成员以完全自由的方式组织时，社会和个人才能健康运作，即自我治理、自我管理和平等主义。这不仅意味着所有成员，如果愿意的话，都应当有权影响其政策；还意味着每个人应当获得尽可能大的机会来行使这一权利。无政府主义要求社会成员具备积极的公民身份，而非仅仅是被动的。并认为这一原则不仅应当应用于所谓“政治”的特殊社会领域，还应当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社会行动，包括经济活动。

因此，如下所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背后的核心概念是“自我管理”，这一术语不仅意味着工人对工作场所的控制，还意味着公民对社区的控制（在这里它变成了“自治”），这一切通过直接民主和自愿联邦来实现。因此，自我管理是无政府主义的“负面”原则——反对等级权威——的积极体现。通过自我管理，等级权威被溶解，因为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和社区集会/理事会是去中心化的“横向”组织，每个参与者在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不是仅仅服从命令、被他人支配。因此，自我管理是一个世界的基本条件，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以自己的方式共同合作，作为平等者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权威性力量（如政府或老板）的干涉。

或许无需多言，本章节仅仅作为启发式工具，帮助读者设想无政府主义原则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它并不是（不打算，也不希望是）对这些原则必将如何体现的最终阐述。认为少数人能够准确地决定自由社会的模样，这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成长和自由思想原则相悖，而且这远非我们的意图所在。我们在这里仅仅试图指出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包含的一些结构，这些结构基于无政府主义者所持的理想和理念，借鉴了一些已存在的无政府实践例子，并对其局限性和成功进行了批判性评估。正如赫伯特·里德曾说：“制定先验性的宪法总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确立你的原则——公正、个人自由、工人控制的原则。然后社区旨在从地方需求和地方条件出发，去建立这些原则。”[《无政府主义与秩序》，第51页]

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它并非一直存在。因此，会可能存在一种不是国家的社会组织；那些“无法想象没有国家集中形式的社会”的人将产生“困惑”(confusion)，从而将二者相混淆(confuse)。然而，这“忽视了人类在国家出现之前已经在社会中生活了几千年”的事实，且“大量人群过去(曾)在公社和自由联邦中生活(过)”。这些并不是国家，因为国家“只是历史过程中社会所呈现的其中一种形式。那么，为什么不区分什么是永久的，什么是偶然的呢？”[克鲁泡特金，《国家：其历史角色》，第9-10页] 同样，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公理**存在**，但资本主义仅是继一系列经济形态之后的最新形式。正如农奴制取代了奴隶制，资本主义取代了农奴制，那么自由(结社的)劳动就可以取代雇佣劳动。正如蒲鲁东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期……具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工资**。”资本主义，这个工资劳动的制度，并非一直存在，也不必继续下去。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即是“把一个过渡性的状态——即社会的贵族与无产阶级的分化——当作最终的状态来确认。”[《经济矛盾体系》，第198页与第67页] 无政府主义者寻求缩短这一过渡性状态，而非延长它。

最终，基于自我管理的社区和联合劳动的自由社会，在许多方面，是现有社会**之中**所存在趋向的自然演变。例如，生产资料只能以集体的方式使用，因此，基于工人联合的平等且自由的关系，作为基于等级、剥削和压迫的主人与仆人关系的合理替代，就显得十分合理。正是反对那些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斗争，创造了能够征用工作场所并使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的各种联合体(如工作场所罢工大会)。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建立，也不会与过去完全割裂。相反，它一开始将基于社会斗争中所形成的结构(即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体制**内部**，但在**对抗**它们的过程中创造的结构)，并且会体现出在这些斗争中激发和发展出的思想。例如，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集体是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这与革命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全国劳工联盟(C.N.T.)的组织方式类似。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状态并非遥远的目标，而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直接体现。创造当前等级制、压迫性、剥削性和异化性社会的替代方案，不仅是斗争的一部分，也是在这个等级制社会的疯狂世界里、维护自身自由和人性的必要条件。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是各种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所创造的“**行动中的安那其**”模式的普遍化。[见 I.2.3 节]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样貌和运作方式，并非独立于它所产生自的特定社会及其创建方式。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反映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经济条件、在这之前的社会斗争、以及在这种斗争中所存在的思想，这些思想会根据任何特定情境的实际需求而得到调整。因此，本节 FAQ 中所描绘的自由社会的愿景，并非一种可以一蹴而就的抽象构想。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真认为如此，那么我们理应被称为空想家。但不是这样，无政府主义社会是社会斗争的结果，是自我活动的体现，帮助创造一个包含能独立思考、愿意并能够为自己生活承担责任的个体的一一群众运动。

因此，在阅读本节时，请记住这不是一份蓝图，而仅是无政府状态下社会可

能呈现的几种建议。它旨在激发思考，并表明无政府主义社会是可能的。我们希望本节中提出的论点和思想，能够激发更多关于自由社会如何运作的辩论和讨论，并同样重要的是，帮助激励实现这种社会的斗争。毕竟，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建设新世界。除非我们对新社会的样貌有所设想，否则在今天的活动中很难对其进行预设！这一点也并未在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中被忽视，他曾指出，“若事先并没有基于对社会生活的研究，经过极为谨慎的考虑关于我们想建造什么和如何建设的规划”，那这就是很难实现的“——我们必须摒弃（蒲鲁东的）口号（‘我们将在拆除中建设’）……并宣称：‘我们将在建设中拆除。’”[《面包与自由》，第 173 页]。更近期一些，诺姆·乔姆斯基曾指出，“现存的等级制度、支配、私人权力和社会控制的替代方案，在原则上当然是存在的……但要使其现实化将需要大量尽心尽力的工作，这也包括清晰阐述这些方案的工作。”[诺姆·乔姆斯基，**Turning the Tide**，第 250 页]。本节的 FAQ，可以被视为阐述现有社会的自由意志主义替代方案，为我们想要为未来建设的社会提供贡献。

我们并不害怕有人认为本节 FAQ 中所提出的愿景是空想主义的。或许他们是对的，但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经说过：

“如果一张世界地图上没有乌托邦，那么它就不值得一看，因为它遗漏了人类总试图到达的那个国度。当人类到达那里时，它向外望去，看到一个更美好的国度，便重新启航。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社会主义下的人性灵魂》，第 1184 页]

然而，我们尽力在实践和远见之间找到平衡。既呈现现实中的问题，也尽可能提供来自现实生活的证据，来支持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而非提出一系列通过定义排除可能解法的不可行假设。考虑最坏的情况是更为明智的，因为就算这些情况并未出现，那也无妨；但如果出现了，至少我们有了寻找解决方案的起点。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努力在做一名务实的空想主义者！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这通常与“乌托邦”一词相关联）。这就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美竞争的设想一样不可能实现。相反，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基于真实的人类的社会，因此它将会有自己的问题和困难。我们使用“乌托邦”这个词，不应该被理解为，无政府主义者假设所有问题都不存在，并主张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是理想且完美的。没有任何社会曾经是完美的，也没有任何社会将会是完美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比之前的社会有更少的问题，并且会是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任何寻求完美的人应该另寻他处。任何寻求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因为它仍是人类的世界所以因此而不完美的人，或许可以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到他们寻求的最终答案。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中是务实的。我们并不凭空构建无法实现的希望，而是基于对今天社会问题的分析、以及改变世界以使之变得更好的方法，来构建我们的愿景。即使有人称我们为空想家，我们也会对这种指控一笑而过。毕竟，梦想很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常常是现实中变革的源泉，还因为它们表达了希望：

“人们可能……称我们为梦想家……他们没有看到，梦想也是生活现实的一部分，没有梦想生活的将是难以忍受的。没有梦想和梦想家，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唯一永远不失望的人，是那些从不去希望、也从不尝试去实现他们希望的人。”[鲁道夫·罗克，《伦敦岁月》，第95页]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是那些居民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显然，居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地区，将会根据支配该地区的思想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因此，假设当前的国家结构终结后，我们可能会看到无政府主义社区与国家主义社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并存，并且这些社区将根据居民的需求采取不同的形式——在无政府主义社区中，可能是从共产主义到个人主义的形式；在国家主义地区，则可能是从国有社会主义到私人国家的形式，或者是基于宗教教派的形式等等。正如马拉泰斯塔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在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强加和剥削的问题上毫不妥协，并且对所有在不同人类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念保持宽容，只要它们不威胁到他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活与思想》，第174页] 因此，我们尊重他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实验，并选择过自己生活的自由；同时鼓励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主义社区中的人们，站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者，加入无政府主义社区的自由联邦。毋庸置疑，我们在此不讨论非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因为应当由非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他们支持其类型国家主义的论点。

所以请记住，我们并不是在主张每个人都会在自由社会中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生活。远非如此。仍将会存在一些不自由的地方，因为思想的发展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也不用说，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强迫他人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你怎么能强迫某人获得自由呢？）。我们的目标是鼓励那些受到权威支配的人们解放自己，并与他们一起努力创造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但显然，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功程度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自由的地区将与那些受（诸如）国有社会主义、宗教或资本主义支配的地区共存，就像我们可以预期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也会并存一样。

然而，假设仅仅因为有许多社区选项可供选择，就自动使社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社会，这将是一个错误。例如，现代世界拥有200多个不同的国家。对于大多数国家，个人可以离开并加入另一个（如果它允许的话）。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世界政府。这并不使这一系列国家变成无政府状态。同样，基于不同公司构成的系统也不是无政府状态，基于一系列公司城镇的系统也不是，基于多个地主雇佣他们的土地和工作场所、并要求工人支付租金的（准封建或新封建？）制度——也不是。联合的性质和它们的自愿性一样重要。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下一次革命的公社不仅将摧毁国家，用自由联合会替代议会统治；它们还将在公社内部摒弃议会制……正如在公社外是无政府主义一样，它们在公社内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与革命的选集》，第132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一个可以自由加入和离开的社会，是一个内部无等级、无压迫和无剥削的社会。因此，虽然无政府主义社区可以与非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共存，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无政府主义社区在任何方面是无政府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的。

最后总结一下。无政府主义者，显而易见地说，并不追求混乱，也不追求被

普遍理解的那种“无政府状态”（乔治·奥威尔曾指出，某位右翼作者“把‘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状态’随便混用，这种用词错误不亚于说保守主义者是保安一样。”[同上，第 298 页]）。无政府主义者也并不拒绝讨论自由社会的样貌（这种拒绝通常是基于那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即你不能预设自由人会做什么）。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自由社会的基本框架有着相当明确的看法，但始终假定这些框架仅仅是指导方针。这些建议基于自由意志主义原则、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对阶级和等级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未能做到的事情！）的深刻认识。

在阅读 FAQ 的这一部分时，请记住，无政府主义社会将由人民大众的自主行动创造，而不是靠无政府主义者写书来实现。这意味着，任何真实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都会犯许多错误，并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发展。这也意味着，这仅仅是一系列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可以如何运作的建议——它并不是任何形式的蓝图。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能做的，就是呈现我们所相信的内容，以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种愿景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再次重申，我们希望本节中提出的论点和思想，能够激发更多关于自由社会如何运作的辩论和讨论。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激励那些将创造这一社会的斗争。

I.1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难道不是一种矛盾修辞吗？

简而言之，不是的。这个问题通常是由那些接触过所谓“自由意志”右翼的人提出的。正如我们在 [A.1.3 节](#) 所讨论的，“自由意志主义”这个词被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的历史，要远长于亲自由市场右翼的使用历史。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自 1858 年的 150 年以来，就一直将“自由意志主义”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相比之下，所谓的“自由意志”右翼在美国广泛使用这一术语要追溯到 1970 年代（虽然在 1940 年代以后，少数个体开始有限地使用该词）。实际上，在北美以外的地方，“自由意志主义”仍然基本上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使用，并且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的简化版。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

“关于术语，我想说的是，由于我们正好在美国，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在美国，‘自由意志主义’的含义几乎与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意义相反。在这里，自由意志主义意味着极右翼的资本主义。而在欧洲传统中，自由意志主义意味着社会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有时被称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这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因此我们在使用术语时需要多加小心。”[《不情愿的偶像》]

这本身虽然并不能证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没有矛盾。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所展示的，认为这一术语自相矛盾的说法，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社会主义必须依赖国家才能存在，并且社会主义与自由无法兼容（以及同样错误的说法，比如资本主义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并且不需要国家）。这个假设，正如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一样，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在许多权威社会主义者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得到了助长。实际上，真正的自相矛盾，是“国有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这一术语。

可悲的是，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许多右翼和左翼人士的断言，即社会主义等同于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多样的历史，这些思想囊括了共产和个人无政府主义一直到列宁主义。正如本杰明·塔克曾指出的，“国家社会主义……在事实上掩盖了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但这并不能赋予它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垄断权。”[*Instead of a Book*, 第 363-364 页] 不幸的是，许多左翼与右翼人士，正是这样做的。事实上，右翼（当然，还有许多左翼）认为，“社会主义”在定义上，**就是**国家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并且通过中央计划来决定国家经济（从而决定社会生活）。

然而，即便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简单一瞥，也能表明将社会主义与国家所有制和控制相等同的观点并不普遍。例如，无政府主义者、许多行会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罗伯特·欧文的追随者，都拒绝了国家所有制。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生产资料在国家接管其所有权后，并不会改变其作为资本的形式，而工资劳动的本质也不会因为是国家在雇佣劳动力而发生变化（例如，参见 H.3.13 节）。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资本的国家所有制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正如塔克所深知的，国家所有制将每个人（除了国家官僚）都变成了无产阶级——对于一个旨在结束工资奴隶制的政治理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那么，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与自由意志主义的理念兼容吗？“自由意志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可以暂时以词典定义为起点，但我们应当强调，这种方法存在问题，因为不同的词典有不同的定义，而且词典往往缺乏政治学深度。使用某一定义时，别人可能会提出一个他们更喜欢的定义。例如，“社会主义”常常被定义为“国家对财富的所有权”，而“无政府主义”则被定义为“混乱”。这两种定义在讨论政治理念时都没有什么用处，特别是在讨论无政府主义时——显然，根据这样的定义，没有任何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会是社会主义的，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也并不追求混乱。因此，使用词典并不是讨论的终点，且在应用到政治领域时常常具有误导性。

然而，“自由意志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人维护自由原则，尤其是思想和行动的个人自由。无法说社会主义不鼓励这种自由获取生活资料的局面。因为在这种局面下，人们作为平等者结合在一起，正如约翰·莫斯特和艾玛·戈尔德曼曾经争论过的那样，“共产主义的体制在逻辑上就排除了一切主仆关系，实际上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谈论无政府主义”，《黑旗》，第 228 期，第 28 页] 换句话说，基于自由联合和自我管理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必然是自由意志主义的。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使用“自由意志主义”这一术语已经超过 150 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假设右翼最近对这一词汇的占用可以作为基础点呢？这意味着私人财产捍卫个人自由，而不是压制它。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理论诞生之初就已经争辩过的那样，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例如见 [B.4 节](#)），资本主义在工作场所内否认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当然，除非你是老板）。正如一位坚定的资本主义捍卫者（也是一位通常被列为右派“自由意志主义”前辈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轻描淡写地指出的那样，资本家“当然对工人行使权力”，尽管“他不能任意行使”这一权力，因为市场的存在限制了他，但在这一限制内，“企业家可以完全随意地任性”并“即时地解雇工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第 443 页和第 444 页]。右翼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完全忽视了与私人财产相关的、破坏自由的等级制度，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基本上支持资本主义并反对社会主义的（同样不难理解的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倾向于称他们为“财产主义者”（*propertarians*））。正如左翼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森正确指出的：

“按他们自己的逻辑，[这些]市场个人主义者被迫忽视公司组织结构，或者错误地认为市场存在于公司内部。否则，他们就不得不承认，像资本主义这样动态的系统依赖于一种排除市场的组织模式……这……使得市场个体主义者能够忽视私人部门中非市场组织的现实……他们因此可以忽视私人资本主义公司内部的控制和权威现实，但依然批评公共部门的官僚主义和国家规划。”[《经济学与乌托邦》，第 85-86 页]

财产主义者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的矛盾，比如承认国家和私人财产在某一领域共享决策垄断，却只反对前者（见 F.1 节）。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所指出的，私人财产所带来的等级化社会关系与个人自由毫无关系。因此，去除国家但保留私人财产，并不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如果我们摧毁国家，把它替换成一堆小国家，那岂不是在做一桩大生意！杀死了一个头的怪物，却保留了一个有千个头的怪物！”[卡洛·卡菲耶罗，《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渡鸦》第 6 期，第 181 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因为虽然没有国家的社会是实现无政府状态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充分——私人等级制度也限制了自由。正如乔姆斯基所说：

“一切都一般基于这样的想法，即等级和专制结构并不是自我辩白的。它们必须有一个正当理由……例如，你的工作场所是一个接触和联系的地方。所以，工作场所应该由参与者进行民主控制……人们互动的方式有很多种。从这些互动中产生的组织和协会形式应该尽可能非专制、非等级化，由参与者管理和指导。”[《不情愿的偶像》]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必须基于工人自我管理，也就是说，工人必须控制和管理他们的工作，决定在哪里和如何进行工作，以及他们劳动的果实归何处，这反过来意味着废除工资劳动。或者，借用蒲鲁东的话来说，就是“废除无产阶级”。[《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选集》，第 179 页]除非这样做，否则大多数人将成为米塞斯等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支持的、专制社会关系的受害者。正如一位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所说：

“因为个人并不拥有自己，也不能成为真实的自我。他已经成为一个仅仅是市场商品的存在，是积累财产——为别人积累财产的——工具……个体性为商业削足适履……如果我们的个体性是呼吸的代价，那该有多少关于对人格的暴力行为的争论！然而，我们对食物、饮水和住所的权利，常常只在我们失去个体性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这些东西仅仅以换取个体性为代价，给予没有财产的百万富翁（而且是如此微薄！）——他们成了工业的工具。”[麦克斯·巴金斯基，《斯特尔纳：自我与他的自我》，《母地球》，第二卷第三期，第 150 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意味着一个无阶级和反权威的（即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管理自己的事务，既可以作为个体，也可以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取决于具体情况）。换句话说，它意味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工作——都要实现自我管理。无政府主义者一直认为，所谓的“天然的”

自由（亚当·斯密的术语，资本主义支持者误用了该术语）涉及到绝大多数人必须出卖自由才能生存，这一点有些奇怪和自相矛盾（至少可以这么说）。因此，要保持一致的自由意志主义，在逻辑上就是要主张自我管理，从而也就是社会主义（见 G.4.2 节）。这解释了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反对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关的虚伪“个体主义”（即所谓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尽管更合适的说法是“财产主义”，以避免混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埃玛·戈尔德曼抨击“这种个体主义”，“以这种名义……社会压迫被辩护，并被视为美德。”[《红色埃玛讲话》，第 112 页]

正如我们将在 [1.3.3 节](#) 讨论的那样，社会化是为了确保消除工资劳动，并且这是所有真正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共同主题。至少在理论上，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有社会主义非但没有消除工资劳动，反而是普及了它。实际上，国有社会主义表明社会主义**必然是**自由意志主义的，而非国家主义的。因为如果国家拥有工作场所，那么生产者就没有拥有；那么他们将无法自由管理自己的工作，而是会受制于作为老板的国家。此外，将资本家所有阶级替换为国家官员，并不会消除工资劳动；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它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因此，主张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意味着苏联及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国有化的政党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党）。

事实上，将社会主义与国家联系起来，是误解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消除个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以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天然的**不平等无法被消除，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希望这样做）。正如蒲鲁东所说，社会主义“首先是平等主义的。”[《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 1 卷，第 57 页]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权力的不平等，特别是**政治权力**。任何等级制度（尤其是国家）都会表现出权力的不平等——无论是当选的还是非当选的，处于上层的人始终比处于下层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被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驱逐，引发了以下的评论：

“我们可以更有理由地主张，我们是最合逻辑和最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要求每个人不仅得到他（或她）在社会中应得的财富，还要得到他（或她）在社会中应得的社会权力；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使他（或她）及所有其他人一样，在公共事务管理中产生影响的能力。”[马拉特斯塔和哈蒙，《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第 2 卷，第 20 页]

选举某人来**为你**管理公共事务，并不等于拥有一部分社会权力。用法国著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埃米尔·普热（Emile Pouget）的话说，这“是一种放弃行为”，是将权力委托给少数人。[Op. Cit., p. 67] 这意味着，“**所有政治权力不可避免地**为行使权力的人**创造特权地位**。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违反了平等原则。”[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249]

从这简短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意志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要成为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必须支持工人控制，否则就是支持专制的社会关系。支持工人控制，必然意味着必须确保生产者拥有（并控制）他们所创造商品的生产 and 分配手段。没有所有权，他们无法真正控制自己的活动或劳动成果。工人拥

有生产和分配商品的手段的情况,就是社会主义。因此,要成为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必须是社会主义者。

同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必须支持个体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否则生产者只是名义上“拥有”生产和分配手段。如果国家拥有生活资料,那么生产者就不拥有,因此也就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活动。正如列宁领导下的俄国所表明的工作经验,国家所有权很快导致国家控制,并形成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剥削并压迫工人,甚至比他们过去的老板还要更甚。由于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能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支持任何基于权力不平等的制度(正如我们在 [B.2 节](#) 讨论的,国家正是这样的制度)。反对不平等,却不将这种反对扩展到权力不平等,特别是**政治**权力不平等,表明缺乏清晰的思维。因此,要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支持个人自由,反对限制这种自由的、权力不平等。

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不仅不是一种矛盾的修辞法,它反而表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是自由意志主义的,而一个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是伪君子。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工资劳动,他们也必须因同样的原因反对国家。同样,始终如一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必须反对工资劳动,正如他们必须反对国家一样。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拒绝国家对经济的所有权和控制,也拒绝国家本身。通过工人自我管理,它提出要结束生产中的权威、剥削和等级制度。这样一来,非但减少自由,反而会增加自由。那些提出相反意见的人,通常不会主张政治民主会比政治独裁带来更少的自由。

最后一点。可能有人会提出,许多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共有制的方式将国家重新带入其中。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这样的论点混淆了社会和国家。集体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共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不同。这是因为它是基于实际工人与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即联邦化社区整体,我们必须强调,这也包括工人自己)之间的横向关系,而不是像国有化那样的纵向关系(即国家官僚机构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此外,这种共有制是基于让工人管理他们自己的工作和工作场所。这意味着它是基于工人自我管理,并没有取代工人自我管理。另外,所有无政府主义社区的成员可以分为三类:

1. 生产者(即集体的成员或自雇手工业者);
2. 无法工作的人(即老弱病残等**曾是**生产者的人);
3. 年轻人(即未来**将会**成为生产者的人)。

因此,在共有制框架下的工人自我管理,与自由意志主义和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和分配手段由生产者自己拥有的理念——完全兼容。自由意志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相反,自由意志主义理念包含着社会主义理念,反之亦然。正如巴枯宁在 1867 年所说:

“我们坚信,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是特权和不公,而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役和残暴。” [Bakunin on Anarchism, p. 127]

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与其说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名词，不如说国有社会主义和自由意志资本主义才是自相矛盾的。从历史上看（谁最早使用这个词）和逻辑上看（反对所有等级制度的组织），应当称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而不是称私有财产主义右翼为自由意志主义者。

I.1.1 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吗？

1920 年，右翼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①宣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主要成员，他的这个论断建立在以下的基础上：没有私有制的生产资料，就无法形成生产资料的竞争性市场；而没有这样的市场，就无法确定产品的价值。而没有明确的价值，就没有经济的合理性，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将只是混乱：“一个无意义的装置的荒谬产出。”对米塞斯而言，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央计划经济，经济“受制于最高权威的控制”。[“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集体经济计划》，F.A.冯·哈耶克（编），第 104 页和第 106 页] 他将“经济计算论证”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并声称这一论证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包括自由意志主义流派。基于他的论点，许多右翼人士宣称自由意志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

然而，正如大卫·施韦卡特观察到的那样，“长期以来，米塞斯的论点被认为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即使没有生产资料的市场，其货币价值仍然可以被确定。”[《反对资本主义》，第 88 页] 换句话说，基于价格的经济计算，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体制下是完全可能的。毕竟，建设一个工作场所需要多少吨钢铁，多少砖块，多少工时等等；如果我们假设是一个互助主义社会，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可以很容易找到，因为相关的合作社将会在市场上提供他们的服务。这些商品将作为生产资料输入，因此后者的货币价值就能确定。

讽刺的是，米塞斯在他的初稿中**确实**提到了这种互助主义体制的构想。“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关系只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他主张。“当‘煤炭工团’向‘钢铁工团’提供煤炭时，除非两个联盟都拥有其业务中使用的生产资料，否则无法形成价格。这就不是社会化，而是工人资本主义和工团主义。”[Op. Cit., p. 112] 然而，他的论证有许多缺陷。

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社会化（如我们在 [1.3.3 节](#) 中讨论的）仅仅意味着自由获取生活资料。只要加入工作场所的人享有与现有成员相同的权利和自由，那么就存在社会化。换句话说，合作社的市场体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其中没有工资劳动，新的工人会成为辛迪加的正式成员，享有与现有成员相同的

^①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埃德勒·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 1881—1973），奥地利的犹太裔美国国民、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市场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还被誉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院长”。他所创立的理论也影响了之后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及穆瑞·罗斯巴德。米塞斯的经济思想对在二十世纪中期兴起的放任自由资本主义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权利和自由。因此，所有者和工资奴隶之间没有等级关系（即使这些所有者也恰好在此工作）。所有工人都控制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所以这不是资本主义。

其次，这种体制通常也不像米塞斯所说的那样被称为“工团主义”，而是被称为互助主义，而他显然认为其最著名的倡导者——蒲鲁东，以及他关于互助银行的“奇幻梦想”——是一个社会主义者。[Op. Cit., p. 88] 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随后承认，将工团主义称为工人资本主义是“误导性的”，虽然“工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它“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即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因为它“必须将生产资料从市场中撤出。个别公民不得支配分配给他们的生产资料股份。”工团主义，即让做工的人控制他们的工作，是“抢劫部落的理想”！[《社会主义》，第 274 页注，第 270 页，第 273 页和第 275 页]

他的追随者们也得出结论，工团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哈耶克曾表示有“许多类型的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米塞斯的论点针对的是“中央指挥所有经济活动”体系，因此“早期的更多去中心化的社会主义体系，如行会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不必在此讨论，因为现在似乎已经普遍承认，它们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理性指导经济活动的机制。”[“问题的本质与历史”，《集体经济计划》，F.A.冯·哈耶克（编），第 17 页，第 36 页和第 19 页] 可悲的是，他并未指出谁“普遍承认”这一结论。最近，穆雷·罗斯巴德敦促国家在东欧前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强制将私人股份分配给工人，因为所有权“不应赋予集体、合作社、工人或农民整体，这只会以去中心化和混乱的工团主义形式重新带来社会主义的弊病。”[《行动的逻辑 II》，第 210 页]

第三，工团主义通常指的是一种策略（革命工联主义），用来实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而不是目标本身（正如米塞斯在一次抨击工会的长篇演讲中所指出的，“工团主义不过是法国的工会主义一词”[《社会主义》，第 480 页]）。虽然可以认为，这样的互助主义的体制可能是某些工团主义者的目标，但大多数工团主义者曾经并且仍然支持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显然为米塞斯所不知的简单事实）。事实上，米塞斯对工团主义思想的无知是显而易见的，他主张“市场是消费者的民主。工团主义者想将其转变为生产者的民主。”[《人类的行动》，第 809 页] 然而，大多数工团主义者的目标是**废除**市场，并**全都**旨在实现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以**补充**（而非取代）消费者的选择。就像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工团主义者并不如米塞斯所主张的那样，目标是工人控制消费。鉴于米塞斯主张，市场中一个人可能有千票而另一个人只有一票，而他仍将市场称作“民主”，他对工团主义思想的无知或许只是他对现实普遍无知的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他对互助主义的批判的整个前提是错误的。他主张，“生产资料的交换关系，只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如果煤炭工团向铁矿工团交付煤炭，只有在两个工会都拥有生产资料时，才能确定价格。”[《社会主义》，第 132 页] 这一点可能会让许多公司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公司不同的工作场所之间就能互相交换他们的产品！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本身就表明，属于同一机构（在此案例里是一家大公司）的工作场所，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商品。米塞斯做出这样的陈述，充分说明了他的论点与现实的脱节。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为其合作社提供广泛的自治，就像大型资本主义公司一样：

“企业家能够分开计算他的整个企业的每个部分，使得他能够确定它在整个企业中的角色。因此，他可以将每个部分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并根据它对整个企业成功的贡献来评估它。在这种商业计算体系下，公司的每个部分代表着一个完整的实体、一个假定独立的商业。假设该部分‘拥有’企业中使用的某一特定部分的资本，从其他部分购买，并向其他部分出售；那它就拥有自己的费用和收入，其交易的结果要么是盈利，要么是亏损；这些结果归因于其自身的经营方式，与其他部分的结果有所区分。由此，企业家可以赋予每个部分的管理大量独立性……每个经理和副经理都对自己部分或子部分的运作负责。如果账目显示盈利，那是他的功劳；如果显示亏损，那是他的责任。他的个人利益促使他在管理自己部分事务时尽最大努力。”[《人类的行动》，第 301-302 页]

那么，关于共有制使得市场社会主义无法运作的观点，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反驳。毕竟，自由意志主义共同体同样可以像在任何一个市场体系中那样，将其企业的每个部分的计算分开，从而确定每个合作社在经济中的作用。它可以将每个部分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假设每个部分“拥有”（即对其特定部分拥有使用权）其应得的部分，并根据其贡献的份额来评估它。然后，它可以向其他合作社购买并出售商品，利润或亏损可以归因于评估每个合作社独立行动的效果，因此它们自身的利益推动合作社工人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地处理合作社事务。

因此，为了反驳米塞斯，我们只需要重复他自己对大公司的论述！因此，社会主义下的工作场所可以享有广泛的自主性，这一点并不与“所有生产资料都归共同体所有”这一事实相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计算”，Op. Cit., p. 89] 换句话说，社会化并不意味着中央计划，而是意味着自由进入和自由结合。总之，米塞斯混淆了财产权与使用权、占有与所有权。他也并未意识到现在的共同体制度下，互助主义合作社交换产品，是现有剥削和压迫经济体制的可行替代方案。

这种互助主义经济还击中了米塞斯所声称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的核心。既然他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能存在市场，并因此存在消费商品的市场价格，那么他对社会主义不可能性的主张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对米塞斯来说，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生产物品会成为交换的对象，因此无法确定其货币价值。”[Op. Cit., p. 92] 他论点中的缺陷显而易见。以煤炭为例，它既是生产资料也是消费品。如果社会主义系统中可以有消费品市场，那么生产资料的竞争价格也是可能的；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工团，同样会将他们劳动的产品出售给其他工团或公社。正如米塞斯在讨论行会社会主义的一个方案时承认的那样，“协会和子协会保持相互交换关系；它们像所有者一样接受和提供商品。因此，市场和市场价格就形成了。”因此，在决定新的工作场所、铁路或房屋时，相关设计者确实可以使用竞争价格来做出决策。而且，米塞斯的论点也不能反对这种系统中的共有制，因为公社，会像资本主义下公司的一部分购买另一部分的产品一样，从工团那里购买产品。由自主管理的合作社生产的商品具有市场价格，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因为它们废除了工资劳动，基于自由进入（社会化），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按照社会主义者的定义，米塞斯抗议“这与社会主义不兼容”是无效的！）。[社会主义，p. 518]

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认为，自我管理的制度将会失败，并且

认为“完全由自我管理企业组成的系统是不可能的，它将导致……计算混乱和彻底崩溃。”当“每个企业，由所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共同拥有”时，“工人、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将没有任何分离。因此，将无法区分工资收入、利息或租金收入、利润收入。现在，我们终于到达了为什么经济不能完全由这种企业（称为‘生产者合作社’）组成的真正原因。因为，若没有外部市场来决定工资、租金和利息，就没有合理的方法让企业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分配生产要素。没有人知道他该如何分配土地或劳动力，以获得最大金额的收益。没有企业家会知道如何安排生产要素，才能以最具价值的组合获得最大利润。这样生产将没有任何效率，因为所需的知识将会缺乏。”[引用自 David L. Prychitko, 《Markets, Planning and Democracy》，第 135 页和第 136 页]

很难认真对待这个论点。例如，考虑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和工匠。两类人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所使用的土地和工具）。农民种植作物供工匠使用，工匠则为农民提供他们所需的工具。根据罗斯巴德的观点，农民不知道该种什么作物，工匠也不知道该购买哪些工具来满足农民的需求，也不清楚哪种工具能减少他们的劳动时间。可以想象，农民和工匠夜不能寐，担心该生产什么，希望有地主和老板来告诉他们如何最好地利用自己的劳动和资源。

现在，我们将地主阶级加入到这个社会。地主可以告诉农民种植什么作物，因为他们的租金收入指示了如何将土地分配到最具生产力的用途上。当然，实际上仍然是农民决定生产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需要支付租金（用于获取土地的使用权），所以他们会决定将自己的（租赁的）土地用于最具盈利性的用途，以便既能支付租金，又能维持生计。至于为什么在没有租金的情况下，他们不直接寻求最具盈利性的用途，罗斯巴德并没有探讨。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受老板支配的工匠，工人可以评估是否投资于某种新工具能带来更多收入或减少劳动时间，或者某种新产品是否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显然，自我管理的合作社系统能够在不需要经济主人的情况下做出相同的决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米塞斯（Mises）曾声明，老板“当然地对工人行使权力”，但“生产的上帝是消费者。”[《社会主义》，第 443 页] 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不需要充当真正的“上帝”和生产者之间的中介！

总的来说，罗斯巴德确认了克鲁泡特金的评论，即经济学（“那门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无时无刻不在以各种方式赞美个人财产的好处”，然而“经济学家并未得出‘耕者有其田’的结论。相反，他们急于从这一局面中推导出‘地主有其田，工资劳动者来耕种！’”[《叛逆者的语言》，第 209-210 页] 此外，罗斯巴德隐含地将“效率”置于自由之上，偏爱可疑的“效率”增益，而非废除工作场所的专制所能带来的自由增益。面对自由与“效率”之间的选择，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会选择自由。然而幸运的是，工作场所的自由实际上能提高效率，因此罗斯巴德的选择是错误的。还应该注意到，罗斯巴德的立场（如通常情况一样）与蒲鲁东的立场完全相反，后者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工资劳动者，与所有者兼资本家兼承包商这两种职能，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会变得平等且不可分割”，这种情况是“无可避免的”。这正是“新经济的第一原则，一个充满希望和安慰的原则，给没有资本的劳动者带来希望，但对于寄生虫及其寄生工具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原则，因为他们看到他们那句著名的公式：资本、劳动、才能！——

已被化为乌有。”[《蒲鲁东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第 165 页和第 85 页]

似乎有一个奇怪的巧合：一个出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人，在思想上就满怀热情地支持这一制度、并试图为其阶级制度辩护；恰好又从一组公理中，推导出地主和资本家在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要判断一个没有地主或资本家的社会中的人，是否也能从相同的公理中推导出此类阶级的、紧迫的经济学必要性，似乎不会花费太多时间。思考一下，为什么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希腊哲学家，会得出奴隶制是自然的结论，也不会花费太多时间。而且，几个世纪的强制、权威、国家主义、阶级和等级制度，对社会的演变竟然没有任何影响；但历史的最终产物（资本主义经济），恰恰与罗斯巴德从几个假设中推导出的预测结果相同——这确实听起来很奇怪。难怪，“奥地利”经济学更像是为某些意识形态上的既定结果提供合理化，而不是一次严肃的经济学分析。

甚至一些异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认识到罗斯巴德立场的弱点。因此，“罗斯巴德显然误解了生产者合作社和自我管理的普遍原则。”实际上，“作为一种企业组织的民主方法，工人自我管理原则上与市场体系完全兼容”，因此“由自我管理企业组成的市场经济，与奥地利学派理论是一致的……它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市场的体系……它似乎没有遇到”像国家社会主义下那样，“妨碍理性经济计算的认识论障碍。”遗憾的是，社会主义仍然与中央计划相等同，因为这样的系统“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然而，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事实上，它根本不是资本主义；而如果我们假设对工作场所和信贷等资源是自由访问的，那么它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合法所有权不是定义工人自我管理的关键问题——管理才是。工人-经理，虽然不一定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法律所有者，但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实验，并按自己的意愿制定企业政策。”）[David L. Prychitko, Op. Cit., 第 136 页，第 135 页，第 4-5 页，第 4 页和第 135 页] 这表明，非劳动要素可以从其他合作社购买，信贷可以通过互助银行（信贷合作社）按成本提供，等等。因此，互助主义系统是完全可行的。

因此，基于竞争市场价格的经济计算，在社会主义体系下是可能的。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在资本主义下看到这一点的例子。例如，位于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合作社综合体表明，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存在并蓬勃发展。也许有人会表明，一个经济体需要股票市场来为公司定价，就像米塞斯所做的那样。因此，投资“不是股份公司经理的事，实质上是资本家的事”，它发生在“股票交易所”中。他断言，投资“不是”经理的“工资问题”，而是“购买和出售股票、放贷款并收回贷款、在银行存款的资本家的事。”[《社会主义》，第 139 页]

如果指出，在资本主义下，合作社成员完全有能力像大多数工人阶级一样，在银行存款并安排贷款，那将显得有些无礼。然而，在互助主义经济中，工人不会因为银行本身是合作社而失去这种能力。同样，尽管这样做显得有些无礼，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指出，股票市场根本不是资本主义中实际筹集资本的方式。正如大卫·恩格勒指出的，“该系统的支持者……声称股票交易所为企业动员资金。真的是这样吗？当人们买卖股票时，‘没有投资进入公司金库……股票只是为了现金，不断在买卖手中交换’。公司金库仅从新股发行中获得资金。在 1980 年代，美国股票交易量中，仅有 0.5% 的交易来自股票发行。”[《贪婪的使徒》，第 157-158

页]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大卫·埃勒曼的呼应：

“尽管股票市场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但臭名昭著的是，它与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关系并不大（博彩业除外）。绝大多数股票交易都是二手股交易，因此支付给股票的资本通常流向其他股票交易者，而不是发行新股的生产企业。” [《民主工人所有公司》，第 199 页]

这表明，“生产中的资本有效分配并不需要股票市场（参见资本主义下的小企业部门）。”他指出：“社会主义企业常常被批评为天生低效，因为它们没有暴露在市场估值中的股票。如果这个论点有任何道理，那么它意味着西方所有未上市的、由少数人持有的小型和中型企业，都是‘天生低效的’——这一结论必须带有一些怀疑态度。事实上，与上市公司相比，私有的小型企业可能是资本使用效率更高的。” [《民主工人所有公司》，第 200 页和第 199 页]

在股票市场对经济影响的问题上，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股票市场通过产生一系列扭曲的激励和误导性的信息流动，实际上会阻碍经济效率。因此废除它们，实际上有助于生产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首先，股票市场的存在对投资有严重（负面的）影响。正如道格·亨伍德（Doug Henwood）所指出的，“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问题。”这是因为“即使参与者意识到（公司的）盈利预估有向上偏误，并且即使他们做出调整，管理者仍然会有动机去试图愚弄市场。如果你说实话，那么怀疑的市场会降低你准确的预估。所以，管理者完全理性地倾向于短期内通过会计技巧或者只进行那些回报迅速的投资来提升利润。”因此，管理者“面对一个以追求短期利润而非耐心的长期增长为著名的（名为股票市场的）市场时，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其指令。否则，他们的股票将会贬值，公司也会面临被收购的风险。”尽管“公司和经济体不能通过让自己挨饿变得更富裕”，股票市场投资者“可以通过他们拥有的公司变得饥饿而变得更富裕——至少在短期内。至于长期来看，那就是别人等到下个星期该考虑的问题了。” [《华尔街》，第 171 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与斯大林主义的中央计划有一定的相似性。在那个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有动机向计划机构撒谎，夸大自己的生产能力。计划者则会假设更高的产能，从而损害了诚实的管理者，并促使他们撒谎。当然，这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足为奇的是，资本市场对经济体产生的类似影响同样是负面的，且低估了长期问题和投资的影响。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股票市场经常经历经济泡沫和随之而来的破裂。股票市场可能反映了投资者的集体判断，但这几乎无法说明判断的质量。如果股价仅仅反映群体心理、反映那些不了解真实经济或未能意识到泡沫的人们的幻想，那股价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在这种泡沫破裂时，对那些与股市无关的人造成的现实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总之，企业“绝大多数是自我融资的——即大部分投资支出，是通过利润资金资助的（在长期平均水平上，大约是 90%）。”股票市场提供的“投资资金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当然，也有一些“像 1990 年代这样的时期；在那个时期，股票市场作为向投机领域注入大量现金的渠道，而这些大部分已经蒸发了……1990

年代融资的很多，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根本就不值那些钱。”这种繁荣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们“绝对不是我们资本市场效率的广告。”[亨伍德，《新经济之后》，第 187 页和第 188 页]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股票市场对于资本有效配置是必要的”这一观点。在一个基于互助银行和合作社网络的体系中，不需要资本市场。正如亨伍德总结的那样，“股票市场发出的信号对真实的经济活动而言，要么无关紧要，要么有害，而股票市场本身几乎没有作为融资来源的作用。股东……不是什么有用的角色。”[《华尔街》，第 292 页]

接着，关于罗思巴德主张自我管理能够确保“生产中没有效率，因为缺乏所需的知识”的说法，也具有讽刺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是等级制的，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而这种结构阻碍了知识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就像斯大林主义一样，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信息沿着组织层级向上传递，并逐渐简化，重要的地方知识和细节被遗失（如果不是故意被歪曲以抑制坏消息并确保持续的就业）。高层管理根据高度聚合的数据做出决策，而这些数据的质量很难评估。这样，管理层在信息和知识上存在不足，而下面的工人则缺乏足够的自主性来纠正低效现象，同时也缺乏沟通准确信息和改进生产过程的动机。正如科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正确指出的：

“官僚计划，无非是将资本主义在大生产单位中的‘合理’方法扩展到整个经济中。如果我们考虑经济的最深刻特征，以及人们所处的具体情况，我们会发现：官僚计划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高度完善的实现；它将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倾向推向极限。就像在大型资本主义生产单位的管理中一样，这种类型的计划是由一个独立的管理阶层来执行……其本质，如同资本主义生产一样，试图将直接生产者降级为单纯执行上级命令的角色，而这些命令是由一个追求自己利益的特定阶层制定的。这个阶层无法很好地管理，就像（资本主义）工厂中的管理机构……无法有效管理一样。资本主义在个别工厂层面的生产效率神话，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者都共享这一神话，无法经得起最基本的事实检验。任何一位工业工人都能根据自身经验，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提出一份毁灭性的起诉书。

“首先，管理官僚并不知道自己应该管理什么。生产的现实逃脱了他们的掌控，因为这个现实不过是生产者的活动，而生产者并不会将真正发生的事情……告知管理者。他们往往会以一种方式组织自己，避免让管理者知情（为了避免加重剥削，因为他们感到了敌对关系，或者干脆因为他们没兴趣：那不是他们的事）。

“其次，生产的组织方式完全是对工人的不利安排。工人们总是被要求以某种方式做更多的工作，而不获相应报酬。因此，管理层的命令必然会遭遇到那些必须执行命令的工人的激烈抵抗。”[《政治与社会著作》，第二卷，第 62-63 页]

这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可能性的反对所提出的相同异议。事实上，哈耶克对集中计划经济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传统中也被视为资本主义企业

内部的一个问题。”在企业内部存在“与哈耶克对任何集中经济提出的批评所相似的冲突。”[约翰·奥尼尔，《市场》，第142页]。这是因为工人对他们的工作和工作场所有着老板所缺乏的知识；而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会激励工人利用这些信息来提高公司的业绩。在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中，就像在斯大林主义经济中一样，工人没有动机去传达这些信息，因为“由工人发起的生产组织和方法的改进，实质上是为资本带来利润；而资本往往会占有这些改进，并将其转而用于压迫工人。工人们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限制自己参与生产……他们限制产出；他们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在自己之间组织起来进行工作，同时表面上保持对官方规定的工作组织方式的尊重。”[卡斯托里亚迪斯，《政治与社会著作》，第181-182页]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管理层可能会试图垄断工人的知识，以便积累更多的利润、更好地控制或（用更高的生产率作为借口）替换劳动力。因此，自我管理而非等级制度，促进了复杂组织中信息的流动和使用，从而提高了效率。

应当强调的是，这一结论并非空洞的猜测，而米塞斯在与自我管理相关的论断上完全错误。米塞斯表示，人们“错了”，认为利润分配“会激励工人更积极地履行职责”（实际上，它“必然会直接导致工团主义”），并且“把‘劳动’……分配到管理层是毫无意义的。实现这种假设将导致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第268、269、305页] 然而，正如我们在1.3.2节中所指出的，实证证据强烈反对米塞斯的观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地利学派”如此轻视实证证据，因为这会暴露他们热衷的演绎推理体系中的缺陷）。事实上，工人参与管理和利润分配会提高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米塞斯是对的，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往往不会鼓励参与甚至利润分享，因为这向工人们展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虽然老板可能需要他们，但他们并不需要老板。正如我们在J.5.12节讨论的那样，老板们害怕这些方案将会导致“工联主义”，因此他们会迅速制止这些方案的实施，以保持自己的权力——尽管（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因为）这些方案能带来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

埃勒曼总结道：“资本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都受到雇佣关系所导致的、激励效率低下的影响。”[《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第210-211页]。互助主义将更加高效且更加自由，因为一旦去除股市和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将消除信息流动中的严重障碍和扭曲。

不幸的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回应米塞斯的国有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心怀如此自由意志主义的经济模式。作为回应，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帕累托的弟子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早在13年前就已经展示了“市场模拟社会主义”的理论可能性。然而，对米塞斯观点的主要攻击来自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和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有关他们主要论文的汇编，请参见《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他们的工作面前，哈耶克将问题从理论上的不可能性，转移到能否在实践中接近理论的解决方案。这里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国有）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正如米塞斯所保证的那样），那么东欧发生了什么？如果“奥地利学派”声称它曾是“社会主义”，那么他们就处于一个略显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所确保“不可行”的东西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争论的双方都接受某种形式的中央计划这一概念。这意味着米塞斯和哈耶克

的大部分论点并不适用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因为它拒绝中央计划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集中化。

泰勒和兰格的回应本身并不特别具有说服力。因为它更多地基于新古典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而不是对现实的理解。他们用“中央计划委员会”取代了瓦尔拉斯的“拍卖商”（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机器中的神明”，确保所有市场出清），其职责是调整价格以使所有市场出清。新古典经济学家倾向于接受瓦尔拉斯模型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充分解释，他们将被迫接受泰勒和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的模型的有效性。难怪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中，大多数经济学界的学者认为泰勒和兰格是胜者（随着苏联解体，这一决定已经有所修正——虽然我们必须指出通常被评论者忽视的一点，那就是泰勒和兰格的模型并不等同于苏联体制）。

遗憾的是，由于瓦尔拉斯理论与现实关系不大，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那就是泰勒-兰格的“解决方案”也几乎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即使忽略其非自由意志主义方面，例如它基于国有制、集中化、缺乏工人自管理等）。许多人认为泰勒和兰格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先驱，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们其实是“新古典”社会主义者，构建了一个模仿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而非其现实的“社会主义”体系。用一个计划委员会取代瓦尔拉斯所创造的“拍卖商”，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他们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多大吸引力——它不过是一个带有计划委员会和更均等货币收入分配的资本主义复制品。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社会主义”，认为它充其量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更友好的版本。

随着苏联解体，宣称“米塞斯是对的”以及“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的“已成为一种时尚（当然，在冷战期间，这些说法被忽视，因为苏联威胁被夸大并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以及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国家援助的理由）。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国家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理念（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都不接近。斯大林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威权主义的“指令经济”，拥有官僚化的中央计划。因此，它们的失败不能证明去中心化、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无法运作。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对泰勒和兰格的论点，同样不能用于反对一个自由意志互助主义或集体主义体制，因为这样的体制是去中心化且动态的（与“新古典”社会主义模型不同）。事实上，类似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在西班牙革命期间在面对巨大的困难时取得了显著成功，许多工作场所的生产力和产出都有所提高，同时实现了更大的平等与自由（见 I.8 节）。

因此，“计算论证”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米塞斯在断言“一个有市场和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系统，与三角正方形的概念一样是自我矛盾的”时是错误的。[《人类行为》，第 706 页]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单纯由市场所定义，而是由工资劳动所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没有自由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只能将自己的劳动（也就是自由）出售给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引用恩格斯的话并非不合适：“生产的对象——生产商品——并不会赋予工具以资本的性质，生产商品只是资本存在的前提之一……只要生产者只销售自己生产的东西，他就不是资本家；他只有在使用自己的生产工具来剥削他人的工资劳动时，才成为资本家。”[《恩格斯文集》第 47 卷，第 179-180 页] 在这里，恩格斯不过是回响了马克思（而马克思则是重复了蒲鲁东关于财产与占有的区分）。如第

C.2.1 节所述，互助主义通过自我管理和自由使用生产资料来消除工资劳动，因此其使用市场和价格（这两者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社会主义（正如我们在 G.1.1 节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就像米塞斯一样，都承认蒲鲁东是社会主义者）。正如大卫·施韦卡特所指出的，过度关注市场并非偶然：

“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等同起来，是辩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派和大多数左翼反对者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你阅读资本主义的主要辩护者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们的辩护总是集中在市场的美德和中央计划的恶行上。从修辞角度看，这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因为辩护市场，比辩护资本主义的其他两个定义性机构要容易得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非常清楚，最好把关注点放在市场上，而不是工资劳动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辩护》，《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Bertell Ollman（编），第 11 页]

如大卫·施韦卡特等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工作（参见他的《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后》），对一个动态的、去中心化的市场社会主义系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该系统与互助主义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种联系被一些列宁主义者识别并强调，以通过“罪恶关联”^①来抨击市场社会主义（蒲鲁东“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卡尔·马克思的天生敌人……提出了一种社会的构想，这可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的第一次详细阐述。”[Hillel Ticktin，《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第 55-80 页，《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第 56 页]）。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型，并非完全是自由意志主义的，而是涉及在国家拥有资本的框架下进行工人控制（恩格尔在《贪婪的使徒》中描述的例外，他支持社区所有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些列宁主义者拒绝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自相矛盾的、基本上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但他们通常承认，在他们的工人国家下，需要利用市场向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过渡。

因此，正如无政府主义者罗伯特·格雷厄姆所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只是蒲鲁东所倡导的众多理念之一，这一理念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充满争议……蒲鲁东的市场社会主义理念，与他的工业民主和工人自我管理理念密切相关。”

[“Introduction”，P-J Proudhon,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xxxii] 正如我们在 1.3.5 节中讨论的，蒲鲁东的工农联合会体制，可以看作是在市场力量面前保护自我管理、自由和平等的一种非国家化方式（蒲鲁东与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十分清楚市场的负面影响、以及市场力量会如何扰乱社会）。持异见的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森（Geoffrey M. Hodgson）正确地指出，蒲鲁东的体制中，“每个合作社协会都能够与其他合作社建立合同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早期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事实上，“与兰格模型^②不同，‘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更适合用于此类体制。市场社会主义，在这种更为恰当且有意义的意义上，涉及的是工人自主管理并拥有的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市场上销售其产品，进行真正的财产权交换”（令人恼火的是，霍奇森错误地声称“蒲鲁东自称

^① 罪恶关联(guilt-by-association): 诡辩的一种。通过将一个论点与形象不良的人或群体联系起来，从而破坏其可信度。

^② 兰格模型 (Lange model)，是新古典经济学派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所构建的理论模型。

是无政府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然而实际上，这位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多次将自己及其互助主义体制称为社会主义）[Economics and Utopia, p. 20, p. 37 and p. 20]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确实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抑制资本市场和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互助主义体制将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改进，消除一种妨碍资源高效使用、长期投资与社会责任感的扭曲激励机制，此外还能减少不平等、增加自由。正如大卫·埃勒曼曾指出的，许多人“仍然以二分法来看待世界：资本主义或（国有）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有两种广泛的传统：**国有社会主义**和**自我管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于政府对主要产业的所有权，而自我管理社会主义则设想公司由工人自我管理，并非由政府拥有或管理。” [Op. Cit., p. 147] 互助主义是第二种愿景的其中一个版本，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与其意识形态对立面的财产主义右派之间达成的共识，即只有国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最后，应该注意的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非互助主义者，而是追求（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即废除货币。许多人确实将类似互助主义的体制，视为社会革命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是由面临数千年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变革所施加的过渡形式（集体无政府主义包含了互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元素，大多数支持者将其视为一个过渡体制）。这一点在 [1.2.2 节](#) 中有所讨论，而 [1.1.3 节](#) 则阐述了为何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拒绝非资本主义的市场。那么，米塞斯的论点是否意味着废除市场的社会主义（如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鉴于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追求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将在 [下一节](#) 讨论这一问题。

I.1.2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吗？

简而言之，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计算论证”（见 [上一节](#)）常被财产主义者（所谓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作为**共产主义（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不可能的依据，但它基于一些错误的观点，包括对价格作用、市场性质以及一个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如何运作的误解。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米塞斯的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变种、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因此也包括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之上。因此，关于一个真正的（即自由意志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讨论很少，这种社会通过工人自我管理和废除工资劳动**与**货币，彻底改变了现有的生产条件。然而，在这里指出共产主义为何可行，以及为什么“计算论证”作为对其的反对意见是错误的，是有帮助的。

米塞斯认为，没有货币，社会主义经济无法做出“合理”的生产决策。即便米塞斯也没有否认，无货币社会可以估计在一定时间段内可能需要的物品（用确定类型和种类的物品的物理数量表示）。正如他所论证的，“在一个没有交换的经济中的**自然**计算，只能涵盖消费品。”他的论点是，下一步，即确定采用哪种生

产方法，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无法做到“合理”，即避免浪费和低效。生产资料的评估“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经济计算来进行。没有这种帮助，人类的思维无法在大量的中间产品和潜在可能性中正确定位。它只会对管理和分配的问题感到困惑。”因此，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在没有经济计算的罗盘下，在各种可能的经济组合的海洋中挣扎不前。”[“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pp. 87-130,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F.A. von Hayek (ed.), p. 104, p. 103 and p. 110] 由此产生的论点是，基于市场价格的货币计算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这个论点并非没有道理。当一个生产者在制造某个产品时，如果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铁和锡都可用于且都适合他们的目的时，如何知道锡比铁更适合用于资源的配置？或者，如果我们有一种消费品，可以用 $A + 2B$ 或 $2A + B$ 来制造（其中 A 和 B 都是如钢铁、石油、电力等的投入因素），我们如何判断哪种方法更高效（即哪种方法使用的资源最少，从而留下最多资源用于其他用途）？米塞斯认为，若是使用市场价格，这一问题就很简单。如果 A 的价格是 10 元， B 是 5 元，那么显然第一种方法更高效（20 元对比 25 元）。没有市场，米塞斯认为，这样的决策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个决策都将是“在黑暗中摸索”。[Op. Cit., p. 110]

米塞斯的论点建立在三个错误的假设上，其中两个针对共产主义，一个支持资本主义。前两个否定假设是共产主义意味着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没有货币价值就无法做出投资决策。我们将在本节中讨论为什么这两个假设是错误的。米塞斯对资本主义的肯定假设，即市场能够精确且高效地配置资源，将在 [1.1.5 节](#) 中讨论。

首先，米塞斯假设了一个集中化的计划经济。正如哈耶克总结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个没有价格的中央集权经济中，合理计算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经济“涉及到极大规模的计划——由一个中央权威，对几乎所有生产活动进行细致的指导”。因此，“这个中央权威必须解决经济问题，即如何在几乎无限数量的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分配有限的资源”，而且要“以合理的准确性，接近或等同于竞争性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成果，这就是社会主义方法所面临的问题。”[“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pp. 1-40, Op. Cit., p. 35, p. 19 and pp. 16-7]

虽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以及由此派生的列宁主义）中的一个常见观点，但无政府主义拒绝中央集权的组织。正如巴枯宁所言，“哪里有足够强大的智慧，能够容纳真实的利益、愿望、需求所构成的人们集体意志的——无限多样性和差异？并且能发明一种不会成为暴力国家、而强行逼迫不幸社会强求一致的社会组织？”此外，一个社会主义政府，“除非它具备神学家所赋予上帝的全知、全在和全能，否则根本不可能了解和预见人民的需求，或者以公平的方式满足那些最合法、最紧迫的利益。”[《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pp. 268-9 and p. 318] 对马拉泰斯塔来说，这样的制度需要“巨大的集中化”，并且要么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要么如果实现了，就会变成一个庞大且非常复杂的暴政。”[《在咖啡馆》，p. 65]

同样，克鲁泡特金也驳斥了中央计划的概念，他认为，“社会革命所带来的

经济变革将是如此巨大而深刻……以至于一个人甚至一群人，都不可能制定出一个新社会必须诞生的社会形式。新社会形式的制定只能是群众的集体工作。”[《叛逆者的话》，第 175 页] 他认为，“强烈集中的政府”能够“命令按规定数量”将某种商品“在某一天送到某个地方”，并且在“某一天由指定的官员接收并储存在特定仓库中”的观点，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是“荒唐的乌托邦式设想”。在讨论自由协议相对国家监护的好处时，克鲁泡特金指出，只有前者才允许“人民的合作、热情和地方知识”得到利用。[《面包与自由》，第 82-83 页，第 137 页]

克鲁泡特金自己的经验表明，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对他们所要管理的领域“简直是令人发指的无知”，并且“多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社会主义理想“失去了由劳动组织自己去落实的特点，变成了国家管理的产业——事实上，成了国有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深知政府会“与群众脱节”，因此，“社会主义的成功”要求“无政府的理念、自力更生、个人自由创造的理念”与“社会化所有制和生产的理念一同宣扬”。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是分散的、联邦制的、参与式的；我们所渴望的“社会结构”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由“所有工会从基层加以制定”，并且“充分了解每个行业和每个地方的具体需求”。[《革命者的回忆》，第 184 页，第 360 页，第 374-375 页，第 376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同意米塞斯的观点，认为中央计划在实践中无法如其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运作。或者，更准确地说，米塞斯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因为我们早在他之前就已经反对中央计划了。我们早就意识到，任何一个小团体的人，都不可能了解社会的全部情况并进行相应的计划（“没有任何一个大脑，或者任何一个大脑的机构能够处理这样的组织。”[伊萨克·普恩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第 29 页]）。此外，还有有关自由的紧迫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将与现有国家的专制相等，而且还将增加所有资本都进入国家手中的经济专制，而这一切，将通过所有为了这个新国家所需的中央集权被进一步放大。正因如此，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自由的朋友，决心与他们斗争到底。”[卡洛·卡菲耶罗，《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第 179-186 页，《乌鸦》第 6 期，第 179 页]

正如约翰·奥尼尔总结的那样，“反对集中计划的论点是社会主义计划历史中的一种论点，主张民主和分散决策。”[《市场》，第 132 页] 因此，出于良好的经济和政治理由，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中央计划。这个中心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立场直接反驳了米塞斯的论点，因为虽然一个集中的体制需要比较大量（“无限”）的可能选择与大量可能需求，但在一个分散的体制中并非如此。与其面对一个庞大的、足以淹没中央计划机构备选方案；一个工作场所比较不同的替代方案以满足特定需求时，会面临更少的选择，因为项目的客观技术要求（使用价值）是已知的，因此地方知识将排除大部分选项，仅剩下少数几个可以直接比较的选项。

因此，去除中央计划机构的假设自动削弱了米塞斯批评的力度——与集中机构面临的“各种可能的经济组合的海洋”不同；特定的工作场所或社区所面对的，是有限的需求和相对有限的解决方案。此外，任何复杂的机器都是由不那么复杂的商品组成的，这意味着工作场所是其他工作场所商品的消费者。如果，正如米

塞斯所承认的，消费者能够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决定消费品的选择，那么“高级”商品的使用者和生产者，也能够满足需求的消费品之间做出选择。

在决策方面，的确，集中计划机构会被多种选择所淹没。然而，在一个分散的社会主义体系中，单个工作场所和公社将会在数量更少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此外，与集中的系统不同，单个企业或公社确切地知道，满足其需求所需的是什么，因此可能的替代方案数量也减少了（例如，某些材料在技术上根本不适用于某些任务）。

米塞斯的另一个假设同样存在缺陷。那就是没有市场，生产者之间就没有信息传递，只有生产的最终结果。在他看来，评估产品的使用时，仅关注最终产品本身。毫无疑问，确实，如果仅仅知道某个产品的名称，没有更多信息，就无法确定使用该产品是否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然而，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帮助决策。如社会主义者亚当·布伊克和约翰·克朗普所指出，“在个别生产单位或行业层面，社会主义中唯一必要的计算将是实物计算。一方面将记录用于生产的资源（材料、能源、设备、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是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以及任何副产品……社会主义生产仅仅是将使用价值从使用价值中生产出来，仅此而已。”[《国家资本主义：在新管理下的工资制度》，第 137 页] 因此，任何作为生产过程输入的商品都需要传递这种类型的信息。

这种信息的生成和传递，意味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必须存在一个分散的、横向的网络。这是因为，使用价值只有直接使用它的人才能确定。因此，从使用价值中生产使用价值，不能通过中央计划实现，因为中央计划者无法理解所使用或所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知识存在于社会的许多地方，分散在各个群体之间，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本质上要求分散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声称，市场可以利用这种分散的知识，但正如约翰·奥尼尔指出的，“市场可能是将分散知识加以有效利用的一种方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他强调，“市场的认识论论点的强度，部分取决于假设‘所有知识都可以集中到某个特定计划机构中’的不可信性”，但米塞斯的“论点，忽视了分散但主要是非市场性质的知识分配机构的存在……假设只有市场能协调分散的、无法言明的知识，是错误的。”[Op. Cit., 第 118 页和第 132 页]

因此，为了确定某种特定商品对一个人是否有用，这个人需要知道它的“成本”。在资本主义中，成本这一概念已经与价格紧密关联，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将“成本”这个词加上引号。然而，写一本书的真实成本并不是一笔金钱，而是一定数量的纸张、一定量的能量、一定量的墨水、一定量的人类劳动。为了做出理性的决策，判断某个商品是否比另一个商品更适合满足特定需求，潜在的消费者需要这些信息。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信息被价格所隐藏了。

有些讽刺的是，鉴于“奥地利”经济学往往强调，信息限制是社会主义“不可行性”的根源；实际上，市场才是隐藏了做出明智投资决策所需的重要信息。从米塞斯关于“为什么劳动时间不能替代货币作为决策工具”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认为使用劳动“忽略了生产材料因素的使用”，并举了一个例子：两种商品 P 和 Q，生产它们需要 10 小时。P 需要 8 小时的劳动，再加上 2 单位

原材料 A（该原材料通过 1 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生产）。Q 需要 9 小时的劳动和 1 单位 A。他断言，在劳动方面，P 和 Q “是等价的；但在价值方面，P 比 Q 更有价值。前者是虚伪的，只有后者才符合计算的性质和目的。” [《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Op. Cit., 第 113 页]

他的论点中的缺陷显而易见。假设一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为 10 英镑，那么在价格方面，P 的直接劳动成本为 80 英镑，原材料 A 的成本为 20 英镑；而 Q 的直接劳动成本为 90 英镑，原材料 A 的成本为 10 英镑。两者的总成本都是 100 英镑，因此很难理解这如何“符合计算的本质和目的”！在这个例子中，使用较少的原材料 A 是一个额外的判断，而不仅仅是在“计算”。至于是否需要节省 A 的使用的问题，根本无法通过价格来做出决定。例如，如果 P 只能通过一种比 Q 更加破坏生态的过程来生产，或者 P 的生产过程是枯燥、机械的，而 Q 的生产过程则对参与者而言更加令人满足，那么 Q 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然而遗憾的是，这类信息是价格机制所无法传递的。

正如约翰·奥尼尔指出的，“米塞斯早期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的论点，依赖于一种关于可比性的假设。他的核心论点是，合理经济决策需要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可以计算和比较不同情形的价值。”[Ecology, Policy and Politics, p. 115] 这一核心假设在泰勒和兰格为“社会主义”辩护时没有受到挑战，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反对米塞斯的辩论就是防御性的——基于“社会主义计划能够模仿市场、并在资本主义观点下产生高效结果”的论点。

无政府主义者质疑，将所有决策都基于唯一标准而忽视其他所有标准的——价格方法，是否真的可以称之为理性的行为。正如奥尼尔所建议的，“商品的相对稀缺性……几乎不能涵盖社会中分布的所有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与协调经济活动和计划相关。” [The Market, p. 196] 比如说一个商品的价格是 10 英镑，并没有告诉你它的生产或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多少污染、它是在什么样的劳动条件下生产的、是否价格受生产该商品的公司市场力量的影响、是否以生态可持续的方式生产，等等。类似地，另一个类似的商品价格为 9 英镑，并不能告诉你那 1 英镑的差异是由于更高效地使用了投入，还是由于对地球造成了更多污染。

那么，价格真的反映了成本吗？利润这一概念，即拥有资本并允许他人使用资本所得到的回报，显然与劳动、资源等成本并不完全等同（试图将利润解释为类似劳动的牺牲，一直是荒谬且站不住脚的）。在查看价格以评估商品是否有时，实际上无法仅通过价格判断这一点。两个商品可能有相同的价格，但利润水平（也许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可能导致其中一个的成本价格高于另一个。价格机制未能表明哪种使用较少资源，因为它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实际上，正如塔基斯·福托波洛斯（Takis Fotopoulos）所指出的，“如果……中央计划和市场经济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集中；那么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无法产生任何经济系统最佳运作所必需的信息流和激励。”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 p. 252] 此外，在一个压制劳动力的威权国家生产的商品，可能比在一个允许工会组织并拥有基本人权的国家生产的商品——价格更低。因为压制会降低劳动成本，从而使该商品看起来是“更高效”的资源使用。换句话说，市场可以将不人道行为掩盖为“高效”，并通过市场份额实际奖励这种行为。

换句话说，市场价格可能会严重扭曲，因为它们忽视了质量问题。因此，交易是在虚假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是出于反社会的动机——为了最大化资本家的短期盈余，而不顾其他人的损失。因此，它们扭曲了价值评估，强加了一种粗鲁、狭隘且最终自我挫败的个人主义。价格不仅仅由成本决定，例如，市场力量可以将市场价格推高到远高于实际成本的水平。市场价格还未能考虑公共物品，因此在资源分配时对公共物品存在偏见，更不用说忽视了对更广泛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超出了直接买卖双方的影响。同样，要做出关于使用某个商品的理性决策，你需要知道为什么价格发生了变化；因为如果变化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意味着不同的应对方式。因此，单靠当前的价格是不够的。商品的价格是否是暂时性的上涨，比如由于一场罢工？还是因为资源的供应已经耗尽？在前一种情况下做出的理性行动，在后者中则是错误的。正如奥尼尔所建议的，“（市场中的）信息是通过对话传递的。市场若是告知“退出”——（代表）有些产品找到了市场，有些则没有。‘话语’并未得到行使。这种对话的失败……代表了市场的信息失败，而不是一种美德……市场……确实传递信息……它也阻塞了大量信息。” [Op. Cit., p. 99]

因此，一个完全依赖市场的系统，会遗漏用于合理资源分配的信息（或者，至少是隐藏了这些信息）。原因在于，市场系统，充其量，只能衡量个体买家的可用选项中的偏好。这会假设所有生产结果中相关的使用价值，都是供个体消费的东西，而不是集体享用的使用价值（如清洁的空气）。市场中的价格并没有衡量社会成本或外部性，这意味着这些成本没有反映在价格中，因此你无法拥有一个理性的价格系统。同样，如果市场仅衡量能够被垄断并出售给个人的物品的偏好，而不是集体享用的价值，那么就可以推断，市场提供的并不是用于生产中理性决策所必需的信息。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计算”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私人公司对其劳动和原材料投入的社会成本视而不见。

事实上，价格常常误判了商品的价值，因为公司可以通过将成本转嫁给社会（例如通过污染，或者使工人技能退化、增加工作不安全感等）来获得竞争优势。这种将成本外部化的行为，实际上在市场中得到了奖励，因为消费者寻求最低的价格，而不知道为什么价格这么低（这种信息无法从价格中获得）。即使我们假设这种行为会在以后受到罚款惩罚，但损害依然发生且无法挽回。事实上，因为公司最初通过外部化成本获得了利润，所以罚款可能作用不大（参见第 E.3 节）。因此，市场创造了一个有悖常理的激励，通过账外的社会和环境外部性来补贴其投入成本。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

“现在已经广泛认识到了，经济学家的‘外部性’，不再像以前一样被轻描淡写地放入脚注里了。任何稍加思考当代社会问题的人，都无法忽视消费和生产的社会成本、对环境的逐步破坏、当代技术利用的完全非理性、基于利润或增长最大化的制度无法应对只能通过集体表达的需求，以及这一制度强加的巨大的偏见——即个人使用的商品最大化，而不是普遍生活质量的改善。” [Radical Priorities, pp. 190-1]

价格掩盖了生产所涉及的实际成本，无论是对个人、社会，还是环境，而将一切简化为一个因素，那就是——价格。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缺乏对话和信息

交流。

此外，如果不使用价格以外的其他成本核算方法，资本主义支持者又如何知道实际成本和价格成本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呢？是否可以通过将实际成本与价格进行对比，来判断是否存在这种相关性呢？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价格衡量成本的说法就成了一个循环论证（因为价格代表了成本；而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成本，是因为它有价格）。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计算成本，而不是仅仅依赖市场价格，这样“只有市场价格代表成本”的论点就不成立。同样，也可能存在一些成本（如生活质量问题），这些是无法通过价格来反映的。

简单来说，市场无法分配所有相关信息，特别是在价格处于不平衡时，可能会传递出明显误导的信息。正如两位南非无政府主义者所言：“资本主义中的价格至多提供了不完整和部分的信息，掩盖了资本主义的运作，并且会生成和再生产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经济自由主义者忽视了经济的社会特性，他们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也忽视了特定选择的社会成本和外部性问题。” [Michael Schmidt and Lucien van der Walt, **Black Flame**, p. 92] 这表明，价格不能被视为反映实际成本的工具，就像它们不能反映商品的社会价值一样。价格，是这些商品及其投入品（当然包括劳动）引发的冲突的结果。市场和社会力量，远比需求或资源使用，更决定了问题的结果。购买者手段的不平等、企业的市场力量、以及劳动和资本的议价地位，都会发挥作用，扭曲价格与资源使用成本之间的任何关系。因此，价格是畸形的。

难怪克鲁泡特金曾问：“我们不是应该分析我们所称之为价格的复合结果，而不是将其视为我们行动的至高无上的盲目统治者吗？”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Tomorrow**, p. 71] 正是这些被价格隐藏的实际成本，必须传达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才能使他们做出明智且理性的决策，处理他们的经济活动。

值得记住的是，米塞斯曾认为，正是现代经济的复杂性确保了货币的必要性：“在家庭经济的狭小范围内，例如，父亲能够监督整个经济管理时，是有可能在没有（货币计算之类的）辅助思维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准确地确定生产过程变化的意义。”然而，“仅仅一个人的头脑——无论他多么狡猾——也太过于无力，无法理解成千上万种高级商品中的任何一种的意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掌握所有生产的可能性，无论这些可能性有多少；也不至于能够在没有某种计算系统的帮助下，立即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Op. Cit., p. 102]

必须强调的是，一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将会使用各种的“思维辅助”手段，帮助个人和群体做出经济决策。这将通过允许不同选项和资源相互比较，从而减少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因此，尽管一个经济体内有大量商品，但通过使用理性算法程序和方法，能够减少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并帮助这一过程。这样的工具将有助于决策，而非主导决策；因为这些决策关系到人类和地球，所以决策不应当是自动化的。

既然如此，一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将迅速发展出比较特定“高级商品”

实际影响的手段，衡量其实际成本（即劳动、能源和原材料的使用量，以及任何社会和生态成本）。此外，还应该记住，生产资料是由其他商品的投入组成的；也就是说，高级商品是由低级消费品构成的。如果，如米塞斯所承认的那样，消费品的计算可以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进行，那么“高级商品”的生产也能够实现，并且可以建立其成本的记录并传达给那些希望使用它的人。

虽然“思维辅助”的具体形式以及“成本”及其相对权重，将由自由社会中的人们决定；但我们可以推测，它将包括直接和间接劳动、外部性（如污染）、能源使用和材料等。因此，必须强调的是，一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努力传达与任何特定产品相关的“成本”以及其相对稀缺性。换句话说，它需要一种确定不同选择之间所涉及的客观或绝对成本的手段，并且还要指示在某种给定成本（比如其稀缺性）的情况下，某种商品的可用数量。这两者都可以在没有金钱和市场的情况下确定。

[第1.4节](#)讨论了无政府主义经济的可能框架，包括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决策过程的建议。就“思维辅助”而言，这些方法包括通过指示生产商品的绝对成本和特定商品的相对稀缺性等，来比较商品以进行资源分配。这种框架是必要的，因为“呼吁决策中实际判断的必要角色，并不是否定一般原则中的任何角色。它也……并不否定技术规则和算法程序使用的任何地位……此外，经验法则、标准程序、默认程序、可以不加反思遵循的制度安排，在其中扮演着必要的角色，它们可以缩小对不同状态进行明确判断的范围。时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知识的分散性都要求规则和制度。这样的规则和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反思性判断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反思最为重要。”[约翰·奥尼尔，《生态学、政策与政治》，第117-118页]正是这些“规则和制度本身，也需要接受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评估。”[奥尼尔，《市场》，第118页]

换句话说，经济决策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因素，但米塞斯认为，“任何想要对复杂的生产过程进行计算的人，会立即注意到自己是否比别人更经济地工作；如果他通过参考市场中得到的交换价值发现自己无法盈利，那么这表明其他人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相关的高级商品。”[Op. Cit., 第97-98页]然而，这仅仅显示了某人是否比其他人更有利益地工作，而不是是否更经济。市场力量自动模糊了这个问题，正如通过不加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剥削劳动、排放污染或将成本转嫁给他人，来降低生产货币成本的可能性一样。类似地，财富不平等的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如果生产奢侈品比生产穷人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更有利可图，难道这意味着生产奢侈品更好地利用了资源吗？当然，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市场力量的相对强度，在决定“盈利性”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将经济决策建立在单一标准——即盈利性——之上，可能并且确实会导致扭曲的结果。最明显的例子是，资本家为了节省开支而不引入安全设备（“为了节省一美元，资本家就将铁路建设得很差；接着火车来了，很多人死了。如果牺牲他们的生命能为他省钱，那这对他说来这些生命又算得了什么？”[艾玛·戈尔德曼，《美国年鉴文献史》，第1卷，第157页]）。类似地，使工人陷入去技能化和不体面的工作中，会被认为比“浪费”资源去开发机器来消除或减少这种情况——更为“高效”（“有多少机器由于不能立即给资本家带来利润而被闲置！……

有多少发现、多少科学应用，仅仅因为它们没有带给资本家足够的利润而石沉大海！”[卡洛·卡菲埃罗，《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第179-186页，《渡鸦》第6期，第182页]）。同样，由利润驱动的体系，并不会选择那些初期成本较高、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有较小环境影响的投资。

这种做法会产生极不合理的影响，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必须选择能带来最低成本的技术生产方式。而所有其他因素都被置于次要地位，尤其是生产者的健康与福祉，以及对环境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指出，“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危害。例如，加快生产节奏、身体疼痛、精神压力、工伤事故、单调乏味、过度劳累、超长工时等问题——都会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而污染、环境破坏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则严重影响整个地球及其上的所有生物。正如绿色经济学家 E. F. 舒马赫所指出的：

“但当我们说某种事物‘不经济’时，这意味着什么？……某种事物‘不经济’，是因为它未能在金钱意义上赚取足够的利润。经济学的方法不会，也无法给出其他的定义……经济学的判断……是极其片面的判断；在现实生活中，做出决策需要综合考虑众多方面，而经济学只提供一个方面——即从事该活动的人是否能够获得金钱利润。” [Small is Beautiful, pp. 27-8]

舒马赫强调说：“关于经济学判断的片面性，我们毫无疑问。即便是在经济计算的狭隘范围内，这些判断也必然是系统性局限的。首先，它们远远更看重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影响……其次，它们所依据的成本定义排除了所有‘自由物品’……[比如]环境，除非这些部分已被私人占有。这意味着，一项活动即便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也可能被视为‘经济的’；而另一项竞争性的活动如果投入了一定成本来保护和维护环境，则会被视为‘不经济的’。”此外，“不要忽视‘对从事该活动的人而言’这几个词。例如，如果认为经济学的方法，通常用于判断一个社会群体进行的活动是否为整个社会带来利润，那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 [Op. Cit., p. 29]

声称价格已经包含了所有这些“外部性”纯属无稽之谈。如果价格真的涵盖了这些因素，我们就不会看到资本涌向那些几乎没有环保法规或劳动法的第三世界国家。充其量，污染的“成本”只会在公司因环境破坏而被成功起诉后才会反映在价格上——换句话说，也就是等到损害已经发生之后。归根结底，企业始终有强烈的动力以最低价格购买生产要素，而不管这些要素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事实上，市场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任何一家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都会因较高的成本而面临更高的市场价格，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正是这种还原论的会计核算方式及其伴随的“数学伦理”，造成了资本主义对价格（即利润）作为衡量“效率”唯一标准的、“理性中的非理性”。

讽刺的是，米塞斯也指出了价格机制的非理性。他（正确地）指出，存在着“超经济”的因素，而“货币计算无法涵盖”这些因素，因为“它的本质使然”。他承认，这些“因素本身几乎无法被称为非理性”，并以“任何地方，人们看重社区或建筑的美丽、人类的健康、幸福与满足、个人或国家的荣誉”等为例。他还指出，这些因素“同经济因素一样，都是理性行为的动机力量”，但是它们“并

不进入交换关系”。试想，一个忽视“人类的健康、幸福与满足”、或忽视周围环境美丽的经济体系，能有多理性？而且，甚至惩罚那些考虑到这些因素的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米塞斯的评论恰好显示了资本主义的倒错逻辑。米塞斯支持一个从“其本质”上忽视个体需求、忽视幸福、健康、环境等因素的系统，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他提出将这些维度赋予货币价值的建议，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因为只有在假定这些维度可以被货币化的前提下，才显得有其合理性。[Op. Cit., p. 99-100] 事实上，那个试图为友谊定价的人，显然不会有朋友，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友谊；因此，他们也被排除在许多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之外。同样，那些将美丽的地方、幸福、环境等“超经济”物品赋予价格的人，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些事物的真正价值。

所以，做出理智决策所需的基本信息，必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记录并传达，使用已商定的比较方法来评估不同的选择。这与价格机制大不相同，因为它认识到在社会选择中，盲目、自动的计算是不可能的。这些选择必然具有伦理和社会层面，因为它们涉及到其他人类和环境。正如米塞斯自己所承认的，货币计算无法捕捉这些层面。

因此，我们必须在做决策时，运用实际的判断，并充分理解其中涉及的、实际的社会与生态成本，同时，当然也要借助适当的“思维辅助”手段。鉴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是复杂而综合的，这些辅助手段将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其去中心化的特性，它不必依赖价格机制。它可以通过查看对社会造成的实际成本来评估决策的效率，而不是接受价格机制中固有的扭曲定价系统（正如克鲁泡特金曾经说过的，“如果我们分析价格”，我们就必须“区分其中的不同要素”。[Op. Cit., p. 72]）。

总结来说，米塞斯只认为中央计划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去中心化的共产主义没有被充分考虑。权衡如何在数百万种不同商品和它们可能的使用情况之间做出决策，虽然在中央集权系统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去中心化的共产主义体系中，这不是问题。每个独立的公社和工团，都会选择从几种满足其需求的备选方案中做出决定。一旦需求被确定，备选方案之间就可以进行比较——尤其是在使用已达成共识的标准（“思维辅助”）并传达适当的信息的情况下。

在一个没有货币的“经济体”中做出高效的经济决策是可能的，前提是有足够的信息通过工团和公社之间传递，以评估商品的相对和绝对成本。因此，就能够做出旨在减少稀缺商品的使用，或减少资源消耗、减少外部性影响的决策。虽然中央集权系统，可能会被庞大的商品组合和使用方式淹没，但去中心化的共产主义系统则不会。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米塞斯是错的。共产主义是可行的，但前提是它是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最终，真正的指控不是社会主义“不可行”，而是它效率低下。也就是说，它会为了达成既定目标而将资源分配得过多，而且又没有办法去核查，所分配的资源是否真的有必要一开始就投入那么多。虽然有些人可能将此视为计划与市场（无计划）之间的对立，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资本主义中也存在计划（从任何企业都可以看出）；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通过相对价格和盈亏

核算，能够比共产主义（根据需求自由分配）更好地协调更多的计划并满足需求。因此，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系统是否增加了高效协调计划的其他问题？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一点我们将在 [1.1.5 节](#) 中详细讨论）。

所有的选择都涉及失去可能性，因此有效利用资源是为了增加创造其他商品的可能性。至多，我们只能说，通过选择成本最低的选项，市场经济将可以使更多资源用于其他活动。然而，这一假设关键在于将“效率”与盈利等同，而这种情况是无法预见的，并且很容易导致资源的低效分配（尤其是当我们关注满足人类需求时）。再者，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机会成本，即为其用途释放资源；那么就有消费的成本，则应该将处理与金钱相关的活动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也计算在内。尽管这些活动（银行业务、广告、为财产权辩护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至关重要，但从生产使用价值或满足人类需求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多余且低效的。这表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相较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生产上的优势：因为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结构性浪费，将释放大量劳动力和材料用于对社会有益的生产。这还不包括那些所谓的“成本”，它们实际上根本不算成本，而是与资本主义产权相关的费用。因此，“租金”在资本主义下可以被视为一种成本，但如果使用资源的人自己控制资源，而不是支付费用来获取使用权，那么这种成本将消失。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归功于租金、利润、利息和中介的行为，“资本主义系统让我们为一切支付三四倍于其劳动价值的费用”。如果我们“以劳动计算我们消费”得到的价格，但在这样的系统所特有的“成本”下，就会通过提高价格以掩盖（在劳动和资源使用方面的）实际成本。[Op. Cit., p. 68]

此外，有些讽刺的是，市场所声称的“资源节约”并不是为了保护资源以供后代使用，或确保环境稳定。而是为了允许生产更多商品，以便积累更多资本。可以说，基于较低的成本更有可能带来更高的利润，市场迫使生产者将成本最小化。然而，这忽略了这些成本削减的社会影响。例如，强加外在因素确实能降低企业价格，因此在市场上获得奖励，但让劳动变得更加异化和疲惫、或令污染水平上升的做法，似乎并不明智。因此，尽管资本主义企业确实会寻求最小化成本以最大化利润，这一做法乍看之下似乎有助于资源的高效使用，直到这一过程的后果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商品可能会被生产得不如本可以的那样耐用，或者需要不断修理等。因此，在资本主义下“高效”生产的房屋，可能是一个更差的住所，因为通过偷工减料（比如减少隔热层、使用更薄的墙体、不够坚固的材料等）来降低了成本。此外，所有这些“高效”决策的集体结果，在社会层面上可能是低效的，因为它们降低了居住其中的人的生活质量，并导致过度投资、过度生产、利润下降和经济危机。因此，可以说，米塞斯的论点反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更多问题，而非无政府主义。

最后，应该注意，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质疑哈耶克和米塞斯用来判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优点的标准。如前者所说，问题在于“收入分配不依赖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一个自由竞争下、至少大致相同或更大的产出量。”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Op. Cit., p. 37] 因此，问题被简化为产量（数量），而不是自由（质量）的问题。如果奴隶制或斯大林主义下的产量曾经超过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两种制度就值得推崇。事实上，这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中，是一个常见的论点，因为当时中

央计划似乎确实生产了更多商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财产主义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因为应该记住，产量的增加——就像利润和“效率”在市场中一样——依赖于收入分配，而财富从富人向穷人再分配就很可能使更多商品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类似地，资本主义生产更多的酒精和百忧解^①，来满足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对麻醉自己的需求，**不能**成为反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理由！正如我们在 [1.4 节](#) 中讨论的那样，虽然无政府主义者致力于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但我们并不追求像资本主义那样，为此而牺牲其他目标。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最大化产量的目标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有意义，因为在自由社会中，最大化人类的幸福和自由可能意味着较低的产量。一个没有压迫、剥削和异化的社会中的人们，行为会大不相同；他们也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这些特质压迫的人一样，去寻求相同的产量！

此外，产出量是一个有些具有误导性的标准，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产出的分配。如果大部分产出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显然没有合理地利用资源。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这可以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受哈耶克影响的新自由主义中看出。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平均工人的产值“自 1973 年以来几乎增长了 50%。然而，收入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不确定一般的美国人是否从生产力的提升中获益。”这意味着财富流向了上层，“美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在过去三十年里流向了少数富裕的群体。”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p. 124 and p. 244]

总之，资本主义的“效率”并不合理，而要实现完全的人性化和生态效率，则需要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正如布基和克朗普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关注如何有效和合理地使用资源，但‘效率’和‘理性’的标准与资本主义下的标准是不同的。” [Op. Cit., p. 137] 在共产无政府主义下用于决定资源最佳利用的决策系统，并不比市场配置的“效率”更高，因为它超越了基于市场的“效率”概念。它并不试图模仿市场，而是试图去做到市场未能做到的事情。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市场并非其辩护者常常声称的理性系统。虽然将所有决策简化为一个共同因素，无疑是一种便捷的决策方法，但由于其还原论的基础，它也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市场使决策过程变得简化，并因此产生一系列非理性和去人性化的后果。因此，声称共产主义将比资本主义“更有效”，或反之，实际上都是忽视了问题的重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将在完全不同的方式上“有效”，而人们在资本主义狭隘的逻辑下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在自由社会中将被视为理性行为。

关于米塞斯的另一个批评，参见罗宾·考克斯（Robin Cox）的《“经济计算”争议：揭开一个神话》[Common Voice, Issue 3]

^① 百忧解（Prozac）：氟西汀（Fluoxetine）的商品名，一种抗抑郁药。

I.1.3 市场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很多问题。市场很快就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力量”——一种非个人化的力量，确保经济中人们按照经济运作所要求的方式行事。在资本主义护教士中，市场体系通常被呈现为一种自由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没人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自由地”与他人交换。然而，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市场往往会确保人们以与他们愿望**相反**的方式行事，或者迫使他们接受他们可能并不真正想要的“自由协议”。雇佣劳动是这一点的最明显例子，因为正如我们在 [B.4 节](#) 中所提到的，大多数人别无选择，只能同意为他人工作。

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市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市场，而蒲鲁东则希望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对市场进行修改。对许多人来说，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种看法忽视了（经济）阶级的根本问题，即谁拥有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工资劳动为基础，即劳动市场——其中工人并不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必须将自己出卖给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完全有可能存在市场，而这个社会**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例如，一个由独立工匠和农民组成的社会，他们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工人拥有并控制自己的生产资料。同样，蒲鲁东的竞争性自我管理合作社和互助银行体系，也因为相同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在社会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即它产生了威权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被消除，那么造成这些社会关系的所有权方式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因此，所有权问题，仅在它产生我们希望社会类型时才重要（即基于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关系）。单纯地关注“市场”或“财产”意味着忽视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关键方面——即雇佣劳动。右翼人士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权威核心），但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或其他）社会主义者也这么做就不太清楚了。

在本节中，我们讨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市场本身的反对，**而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反对。市场的运作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工资劳动的存在无关，或者被工资劳动的存在所加剧。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对市场持敌对态度，并希望建立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即使我们假设一个互助主义（自由意志市场社会主义）体系，其中有竞争性的、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共产无政府主义者仍然会认为，市场力量很快会导致许多不合理现象的发生。

最明显的问题是，运作市场意味着屈服于利润标准。这意味着，无论工人多么希望在决策中采用社会标准，他们都做不到。忽视盈利性将导致企业破产。因此，市场创造了一种条件，迫使生产者做出对他们自己或别人利益不利的决定，例如引入去技能化或污染性技术、延长工作时间等，以便在市场上生存。例如，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更可能投资于安全设备和工作实践，但这仍然依赖于找到资金进行投资，且可能仍会提高其成品的价格。因此，我们可以指出，正是由于市场力量使得引入适当的安全设备或工作条件变得无利可图，或者因污染和压力水平的增加而缩短寿命——导致了众多的工业死亡和事故（美国的工业死亡人数，

保守估计每年在 14,000 到 25,000 人之间，此外还有超过 200 万残疾人）。

自主管理企业通过增加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强度、将资源分配用于积累设备而非休闲时间或消费——来适应市场力量的倾向，在资本主义下的合作社中可以看到。虽然缺乏老板的存在，可能会在后资本主义经济中减少这种倾向，但它并不会消除这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称市场强迫合作社的成员做出这些不情愿的、令人不快的决策——为一种“自我剥削”形式（尽管这有些误导，因为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剥削，也就是所有者占有未付劳动的剥削）。对于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合作社的市场体系“有严重的局限性”，因为“集体企业不一定是公社——也不一定具有共产主义的前景。”这是因为它可能最终“与类似的企业争夺资源、客户、特权，甚至利润”，因为它们“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并且“受市场的社会压力影响，必须在其中运作。”这种情况“越来越侵蚀它们的更高道德目标——通常以‘效率’的名义，及为了生存必须‘增长’的需求，和获得更多收入的巨大诱惑。”[Murray Bookchin, 《重塑社会》，pp. 193-4]

同样，一个由自主管理企业组成的市场，仍然会经历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因为合作社对价格变化的反应仍然会导致过度生产（参见 C.7.2 节）和过度投资（参见 C.7.3 节）。虽然缺乏非劳动收入有助于减轻经济周期的严重性，但完全消除它似乎不太可能。同样，[1.1.5 节](#)中所讨论的市场增加的不确定性问题，和价格信号的去稳定化方面——同样适用于所有市场，这也包括后资本主义市场。

这与我们在 [B.6 节](#)中提到的“小决策中的暴政”问题相关。这表明，个体决策的总和，会产生出不合理且违背其承受者利益的社会状况。在市场中就是如此：竞争导致经济压力，迫使参与者以某种方式行事；这些方式他们本不愿意，但作为孤立的个体或工作场所，由于市场力量的作用，他们最终依然会这样做。在市场中，人们试图贱买贵卖是合理的。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最小化成本或最大化价格的方式，来最大化自己的收入。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想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考虑其他优先事项是困难的，且深入去考虑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带来竞争上的自杀性后果：它将给企业带来负担，而竞争对手却不需要面对这些负担。

正如我们在 E.3 节中提到的，市场往往奖励那些反社会的行为，并将成本外部化（例如污染等）。在市场经济中，很难判断低成本是反映了实际的效率，还是反映了外部化成本的意愿，即将成本转嫁给他人。市场很少将外部成本内化。两个经济主体之间达成的市场理性交易，不需要考虑他们的交易对其他人的影响，也不需要考虑对地球的影响。因此，实际上，市场交换从来不是双边协议，因为它们的影响会波及更广泛的社会（比如污染、不平等问题等）。这一尴尬的事实在市场中被忽视了。正如左翼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说：“在什么行业、什么业务中，活动的真实社会成本会在账目中体现？哪有定价体系，可以为消费者在呼吸空气和开车之间提供一个公平的选择？”[Contribution to Modern Economics, p. 10]

公平地说，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虽然自雇工人所在的工作场所、去污染自己

所在社区的可能性会降低；但竞争压力和回报却仍然存在，并且似乎不太可能被忽视，特别是在市场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因此，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担心，虽然没有老板、资本家和地主的存在，会减轻资本主义下市场所带来的一些不合理因素，但它不会完全消除这些问题。虽然市场可能是自由的，但人们并不自由。

即使我们假设自主管理的企业抵制市场的诱惑和压力，任何市场体系仍然存在不断扩展生产和消费的需求。从环境影响的角度来看，自主管理的企业仍然必须盈利才能生存，因此经济必须增长。因此，每个市场体系都会倾向于扩展到一个固定大小的环境中。除了对地球生态造成压力外，这种增长需求还影响人类活动，因为它意味着市场力量确保工作持续扩展。竞争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松懈，正如马克斯·施蒂尔纳所论述的，“不停的追求让我们无法喘息，无法安享宁静的**乐趣**。我们不能享有我们财物的舒适……因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意见是有益的，那就是**人类的**劳动不应像在竞争中那样，占据我们所有的时间和劳力。”[《唯一者及其所有物》，p. 268] 价值必须被创造，而这只能通过劳动来实现，因此即使是非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会看到工作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在市场上生存的需求可能会影响更广泛的（非货币性）福利衡量标准，随着长时间工作、减少假期所带来的更高 GDP，生活质量也会下降。这种体制或许对物质财富有益，但对人们却并不友好。

市场还可能阻碍资源的有效利用。例如，节能灯泡曾经比普通灯泡贵得多。然而，从长远来看，它们使用的能源远少于普通灯泡，意味着减少了更多能源的需求（比如减少了烧煤和石油等）。然而，高昂的初期价格确保了大多数人继续使用效率较低的灯泡，从而浪费了资源。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替代能源上，忽视投资（例如）风能，反而偏向一次性且污染的能源。纯粹的市场体系不会做出有利于人们长期利益的决策（例如，通过免费或以低价分发节能灯泡），因为这些会损害尝试这样做的合作社的利润。

此外，市场也无法反映我们未为其定价的事物的价值（正如我们在 [B.5 节](#) 中所论述的）。例如，它无法保护荒野，因为市场要求人们将其转化为财产并作为商品出售。如果你负担不起访问这个新商品，市场就会把它转变成其他东西，不管你多么珍视它。市场还忽视了未来几代人的需求，因为它总是会忽视未来的长远价值。根据任何常用的折扣率，1000 年后支付的款项（在地质年代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瞬）几乎没有市场价值。即使是 50 年后的未来，也无法得到充分考虑，因为竞争压力迫使人们采取有害于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短期视角，且这种视角同样有害于地球生态。

然后，市场对人类个性的腐蚀性影响也是一个问题。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论述的（参见 [B.1.3 节](#)），自由市场中的竞争会带来诸多问题——例如，产生“数学伦理”以及价值观的奇怪颠倒，其中物品（财产/金钱）变得比人更重要。这种现象会让人类丧失人性，使人们变成冷酷的计算者，把利润置于人之上。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中看到这种现象，其中经济决策远比伦理决策重要——尤其是这种不人道的心态在市场上往往能得到奖励。善行并不一定能带来成功，成功者也不一定具备美德。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财富和权力往往会积聚到那些无情、狡猾、贪婪、自私、缺乏同情心和怜悯心、顺从权威并愿意为了物质利益放

弃原则的人身上……这些特质或许正是‘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中，最宝贵的。”[《国家的理由》，第139-140页]

不言而喻，如果市场奖励这些人以成功，那它就不可能被视为一件好东西。一个将赚钱提升到最重要的个人活动地位的体系，显然会导致人类价值的丧失，并增加神经质和精神病行为。正如阿尔菲·科恩所论述的那样，竞争对我们在工作之外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它不仅损害了我们的个人心理，也破坏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因此，竞争“本身就导致了更低的道德标准”的发展，将不惜任何代价的胜利置于公平和正义之上。科恩引用了家庭治疗^①的奠基人内森·阿克曼的话，他指出：“竞争的冲突减少了同情心，扭曲了沟通，削弱了相互支持和分享的互惠性，降低了个人需求的满足感。”[《No Contest》，第163页，第142-143页]因此，市场可能使我们作为个体变得贫弱，破坏自尊，促使从众，毁坏人际关系，使我们变得不如我们本应成为的那样。这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市场，因此非资本主义市场也可能使我们变得更不人性化，甚至像机器人一样。

所有市场决策都深受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影响，因为他们能够用金钱支持需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工作（如病人、老人、儿童等），而对于那些能够工作的人来说，个人情况可能会影响其收入。此外，生产已经变得如此交织，以至于“完全不可能区分每个人的工作”，因此我们应该“把需求放在工作之上，首先承认每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随后是所有参与生产的人安康的权利。”尤其是因为“个人的需求，不总是与他的工作相对应”——例如，“一个40岁的男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的需求与一个20岁年轻人的需求不同”以及“哺乳期的母亲，整夜守在婴儿床前，她无法去与一夜安睡的男人去做相同的工作量。”[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170页，第171页]这就是为什么像克鲁泡特金这样的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不仅要废除工资劳动，还要废除货币和工资制度。

因此，不言而喻，购买力（需求(demand)）与必需(need)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人们往往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所需的东西，例如医疗、住房或食品，而遭受困苦。虽然在非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经济困境可能较少，但它仍然存在、对其恐惧感依旧存在。市场是一个持续的竞标过程，争夺商品、资源和服务，拥有最大购买力的人是赢家。这意味着，当购买力分配不平等时，市场体系在资源分配方面是最糟糕的（这也是为什么正统经济学家在试图通过“帕累托最优”证明资本主义资源分配最优时，会做出一个方便的假设，即“给定收入分配时”）。虽然互助主义体系应当大幅减少不平等，但不能假设在未来不平等不会增加。这是因为资源的不平等会导致市场上权力的不平等；而假设私利的存在，任何交易或契约都将使更有权势的一方受益，从而加剧并可能增加双方之间的不平等与权力差距。类似地，尽管无政府主义社会建立于人们的团结和对平等的渴望之上，但市场往往会侵蚀这种情感；那些因掌握资源（如稀有原材料或仅仅因为投资规模降低了竞争压力）而在市场上占有优势的工团或公社，可能会试图利用其垄断力量在社会中其他群体面前获取更多收入，这往往是以不幸的工团和公社为代价。这可能会退化回资本主义，因为任何在合作社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都会通过竞争加

^① 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一种心理治疗方法，通过帮助家庭成员改善沟通和解决冲突，以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和个体心理健康。

剧，迫使较弱的合作社倒闭，从而创造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池。成功的合作社则可能雇佣这些工人，从而重新引入雇佣劳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可能性会导致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状态。如果不平等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新富人从社会其他部分疏离，他们会重新创造雇佣劳动；并出于必要，建立一个国家来强制执行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抵制公众舆论。

这一切确保了市场实际上无法提供必要的信息来进行理性决策，无论是在生态影响还是在人类活动方面，因此资源的分配变得低效。我们都在承受这一结果的后果——市场力量使我们的环境和生活质量贫瘠。因此，有许多证据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效率不仅不与市场必然一致，而且实际上两者必然不一致。实际上，市场不是回应个人需求，而是回应金钱（更确切地说，是利润）。而金钱本身由于其性质，提供的是对个人偏好的扭曲指示（并且没有考虑到那些集体享有的价值，如清新的空气，或可能享有的价值：如一个人可能永远不会亲自到访的荒原，但希望看到它存在并得到保护）。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禁止”市场——远非如此。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所主张的是让人们意识到，基于利润的市场体系，对个人、社会和地球生态都有着明显的不良影响；并且我们可以通过组织共同的活动，来取而代之，以建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正如麦克斯·施蒂纳所说，竞争“有其持续存在的理由”，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关心自己的事务并达成共识……废除竞争并不等于支持行会。差别在于：在行会中，烘焙等是行会兄弟们的事务；在竞争中，是机会竞争者的事务；在工会中，是那些需要烘焙产品的人的事务，因此，这是我的事务、你的事务，而不是行会或特许烘焙商的事务，而是联合体的事务。” [Op. Cit., p. 275]

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市场非人化效应的斗争中，不仅仅呼吁利他主义，还呼吁利己主义：即合作和互助，符合我们作为个体的最大利益。通过合作和控制“联合体的事务”，我们可以确保一个值得去生活其中的自由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不会被市场力量压垮，并有时间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

“因此，团结是人类获得最大安全感和福祉的状态；因此，利己主义本身，即唯一专注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将推动人类和人类社会走向团结。”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第 30 页]

总而言之，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也会导致每个人都忙于竞争以进一步追求他们的“自我利益”，从而忽视了使生活有意义的东西；最终，将损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归根结底，到底什么被视为自我利益，是由周围的社会制度所塑造的。竞争的压力，很容易导致短期的狭隘利益优先于更深层、更丰富的需求和愿望。而这些更深层次的愿望，是一个共同体体系能够通过提供社会机构，让个人在其中讨论、制定并行动以实现之的方式，让其蓬勃发展的。也就是说，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也会使人们只是在为生存而在市场上辛勤工作，更别提生活了。如果说威权社会主义的悖论，是通过迫使每个人无私地关心他人的幸福，而使每个人都不幸福；那么基于市场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可能会带来另一种悖论：因为市场迫使他们追求一种有限的自我利益观，这确

保了他们没有时间或机会真正感到幸福，并与自己和他人保持和谐——从而使每个人都不幸福。

换句话说，老板们在资本主义下的行为，部分是因为市场迫使他们如此。摆脱老板，并不一定会消除影响老板决策的所有经济压力，反而可能会迫使一群工人以类似的方式行事。因此，竞争体系也将削弱人们在终结资本主义时所追求的许多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社会主义者，错误地称竞争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方案为“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或“自我剥削”——他们只是指出市场的负面方面，而仅仅去除老板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充分意识到市场力量的负面作用，并提出了各种制度结构，如农业-工业联合体，以应对这些问题（因此，尽管他支持竞争，但与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反对自由市场）。共产无政府主义者不出所料地认为，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强调竞争的积极方面，同时忽视或淡化其负面影响。尽管，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使竞争的负面影响比本应该的更严重，但并不自动意味着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不会有类似的（尽管更小的）负面影响。

I.1.4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难道社会主义就不是吗？

一些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列宁主义者）声称，非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奇怪的是，财产主义者（所谓的“自由意志主义”右翼）也认为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认为社会主义反对剥削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而是他们所称的“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因此，一些左翼人士宣称，任何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形式都是资本主义；而右翼人士则宣称，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剥削性的，只有市场体系（他们错误地将其与资本主义等同）才是非剥削的。

两者都是错误的。首先，最显而易见的是，社会主义不等于共产主义（反之亦然）。虽然左右两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都有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的倾向，但实际上，正如蒲鲁东曾指出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宗派或教派创立的；它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学派。”[Selected Writings of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177] 而这些学派中只有少数是共产主义的，就像只有少数是自由意志主义的一样。其次，并非所有社会主义学派都旨在废除市场和契约支付。以蒲鲁东为例，他反对共产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程度，不亚于他反对资本主义的程度。最后，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市场先于资本主义存在，并且对于一些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来说，市场也将会在资本主义之后继续存在。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如[I.1.1 节](#)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是雇佣劳动，而不是市场。

为什么一些社会主义者愿意将人类面临的选择，仅仅限定为共产主义或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呢？——坦率地说，这是很奇怪的，但也可以理解：因为市场体

系（如在资本主义下所示的那样），可能带来去人性化的影响。至于财产主义右派为何如此，这就更为明确了：因为它试图通过将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又等同于中央计划和斯大林主义），来抹黑社会主义的所有形式。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推论。反对资本主义可以意味着两种选择：社会主义（按劳动分配，或是销售劳动的成果）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或是无货币经济）。这些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基于对该制度的分析，认为其根源在于对劳动的剥削（如我们在 C.2 节所讨论的那样），即工人没有得到他们创造的商品的全部价值。然而，这一分析并不必然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尽管它也可以被视为这样的基础。如前所述，蒲鲁东，利用他对资本主义作为剥削体系的批判，作为他提出互助银行和合作社方案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则将与蒲鲁东类似的分析，纯粹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则将其作为他劳动票据体系的基础，而克鲁泡特金则认为这种体系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工资制度，且一个自由社会“在掌握了所有社会财富，勇敢地宣布所有人对这些财富的权利之后……将被迫放弃任何形式的工资制度，无论是货币还是劳动票据。”[彼得·克鲁泡特金所著的《面包与自由》，第 167 页]

换句话说，尽管合作社在市场上销售（某些人错误地称之为“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或交换劳动时间价值的体系，不会是共产主义，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工人并没有与生产资料分离。因此，财产主义者声称它是资本主义的论断是错误的。这也是一系列误导性的论断的例子之一，即，几乎认为除国有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外的所有经济体系，都是资本主义。然而，也可以主张说，共产主义（基于自由获取，和包括劳动产品在内所有资源的共有制），意味着工人将受到非工人（如老弱病残幼等）的剥削。由于共产主义斩断了工作表现与报酬之间的联系，也就可以认为在共产主义下，工人将像在资本主义下那样被剥削：尽管（当然地）并非被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剥削，而是被社区剥削。正如蒲鲁东所言，“社区成员——的确，没有私人财产”，但社区本身“是所有者”，因此共产主义“是不平等的，但并不像财产那样。财产是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共产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剥削。”[由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所著的《什么是财产？》，第 250 页]

不言而喻，蒲鲁东对所有形式共产主义的全面反对，收到了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拒绝。他们认为，这一立场仅适用于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适用于自由意志主义的共产主义。必须记住的是，这种立场是在 1840 年写下的（正如我们在 H.1 节中所提到的，在蒲鲁东时代所称的共产主义就是威权主义的）。可以说，蒲鲁东对共产主义的反对，与财产主义右派的反对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后者反映了典型资本主义捍卫者缺乏个人同情心（也就是缺乏伦理）的悲哀。然而，将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视为剥削，而非社会主义（按劳动分配）的观点，完全忽视了共产无政府主义的核心问题。这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

首先，“无政府共产主义……意味着自愿的共产主义，是从自由选择中产生的共产主义。”[由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著的《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148 页] 这

意味着它不是被强加于任何人的，而是由那些相信它的人创建并实践的。

因此，如何分配劳动成果将由社区和工团自行决定，个体可以加入或创建符合自己是非判断的社区或工团。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平等薪酬，另一些人可能选择以劳动时间为支付标准，还有一些人可能选择共产主义形式的协会。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个人和他们加入的合作社将决定如何处理自己的产出，是否交换或自由分配。因此，因为它是基于自由协议的，共产无政府主义无法成为剥削性的。毕竟，共产主义的公社或合作社的成员是可以自由离开的。不言而喻，合作社通常会将他们的产品分发给自己邦联内的其他成员，并以不同的方式与非共产主义的合作社进行交换。我们说“通常”，是因为在紧急情况下，比如地震等灾难时的情形：需要、并且会促使产生互助，就像今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那样。

而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剥削性的，是因为工人必须同意将他们劳动的成果交给他人（老板、地主），以便首先获得工作（见 [B.4 节](#)）。尽管他们可以选择被谁剥削（并在一定程度上从有限的选项中挑选最好的），但他们无法避免将自己的自由出卖给财产所有者（少数人确实成为了自雇者，有些人设法加入剥削阶级，但这种情况不足以成为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实际选择）。相比之下，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中，工人们自己同意将他们的部分产品分配给他人（即整个社会、他们的邻居、朋友等）。这一切是基于自愿协议的——而资本主义，则以权力、权威和市场力量的坚实（且无形）的大手为特征（必要时，还会有国家有形的拳头作为补充）。在无政府主义下，资源是公有的，人们总是可以选择单独工作的选项（见 [I.3.7 节](#)）。

其次，不像资本主义中那样，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阶级在剥夺生产的财富。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的“非劳动者”，曾经是或者将来会成为工人。正如西班牙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德·桑蒂兰（De Santillan）所指出的：“自然地，儿童、老年人和病人并不被视为寄生虫。孩子们长大后将成为生产力，老年人已经为社会财富做出了贡献，而病人只是暂时未能参与生产。”[After the Revolution, p. 20] 换句话说，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会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使用资本主义的“账本”心态来衡量是错误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无论是工厂或田间的劳动，还是精神上的服务，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对于生产而言，不可能精确地衡量其价值（即所谓的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如果两个人每天为社区工作五小时，年复一年，从事的是他们各自同样喜欢的不同工作，那么我们可以说，总体来说他们的劳动是等价的。但是我们无法将他们的工作分开，去说某一特定日、小时或分钟的工作成果，值不值另一人的某一分、某一小时的工作成果。” [Conquest of Bread, p. 168]

因此，评估一个个体工人或一组工人实际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困难的。这一点可以从工人罢工时看到，尤其是在所谓的“关键”领域，如交通业。此时，媒体充斥着罢工对“经济”造成损失的报道，而这些损失总是远远超过了罢工期间工人失去的工资。然而，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学，工人的工资等于他们对生产的贡献——不多不少刚刚好。换句话说，罢工工人，应该仅仅对经济造成与他们工资等值的损害，但显然，情况并非如此。这是由于任何先进经济体的相互联系性

质，个人的贡献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言而喻，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的人们会容忍那些身体健全的人，仅仅索取而不为社会的大量产品和服务做出贡献。正如我们将在 [1.4.14 节](#) 中讨论的那样，这些人将被要求离开社区，处于与那些不愿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相同的境地。

最终，专注于精确计算和评估每一分钱的贡献，正是导致大多数人最终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狭隘的账本化心态。如果在反对剥削的名义下，继续采用资本主义下“如何计算剩余价值”类似的心态进入自由社会，那将是非常讽刺的。不必担心你是否能负担得起看医生或牙医、是否需要为使用道路和桥梁付费、知道你可以能否去公共图书馆借书等等——会让生活变得更轻松。对于那些希望花时间计算这些活动、并试图为这些活动向社区支付费用的人，仅仅因为他们讨厌被“生产力较低”的人、病人、年轻人或老年人“剥削”的想法；那我们会确信，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会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安排（尽管我们确信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会得到社区医院、消防服务等免费接入）。

因此，将共产主义视为像资本主义那样剥削的观点，完全错失了要点。虽然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指责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其自身的标准，没有支付工人全部的劳动产品；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追求让这种全额支付成为现实。对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来说，生活道阻且长、白驹过隙，以至于无法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精确计算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

“我说工人有权获得自己工作的全部成果：但我承认，这个权利只是抽象正义的一个公式；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不应有剥削，每个人都必须工作，并根据他们之间达成的习惯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

“工人不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存在的孤立存在，而是社会存在……此外，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要确定每个工人贡献的确切劳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要确定每个工人或每个工人群体的生产力差异、衡量土地的肥沃程度，使用的工具质量、地理环境或社会环境带来的优势或困难——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解决方案不应着眼于每个人严格的权利，而应在兄弟情谊和团结的基础上寻找。” [At the Café, pp. 56-7]

总的来说，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人们共享世界（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真正含义）等同于被他人剥削”的看法。与其浪费时间，去记录每个人具体为社会做出了哪些贡献这种细枝末节的小事；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更乐于看到人们大致以相等的时间和精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并根据需要获取回报。将这种自由合作的情况视为剥削简直是荒谬的（就像认为，家庭是其工作成员被非工作配偶和孩子剥削一样）。那些认为的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离开这样的社会组织，自行承担一切（这一任务很快就会让人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简便和实用，正如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

I.1.5 资本主义高效地分配了资源吗？

我们已经在[I.1.1 节](#)中讨论了工作场所等级制度和股市的负面影响；也在[I.1.2 节](#)中讨论了价格的信息问题，以及将利润作为决策有效分配资源的唯一标准的局限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理由质疑“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论点，即（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最早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于 1920 年提出。[“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集体经济规划》，F.A.冯·哈耶克（编），第 87-130 页] 在这里，我们讨论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资本主义能够有效分配资源”的假设，以及这一点如何影响“社会主义”不可能的论断。这是基于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任何（隐性）假设所有价格处于均衡状态的缺陷、不确定性的问题、假设市场力量能最好地服务于人类福祉，以及资本主义下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只有当价格处于均衡状态时，它们才能为理性决策提供足够的知识，因为这能使供需达到平衡。遗憾的是，对于“奥地利”学派及其反社会主义的论点，它拒绝了价格能够处于均衡状态的观点。虽然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注重强调其（尚不完善的）资本主义非均衡分析，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当米塞斯撰写他 1920 年的社会主义论文时，他的经济学派被视为新古典主义的一个分支，这可以从他对中央计划的批评中看出。事实上，可以公平地说，新“奥地利”学派强调价格作为信息和（对）非均衡（的口头承诺），源于“经济计算辩论”^①——特别是他们更正统的新古典主义同行认为，兰格的“解决方案”回应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

因此，米塞斯的论点存在一个根本的不一致性，也就是：虽然奥地利经济学拒绝了均衡和新古典经济学完美竞争的概念；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市场价格是正确的，可以用来做出理性决策。然而在任何真实的市场中，这些正确的价格必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精确”的经济决策是有可能在大规模上出错的（即在经济萎靡时期）。换句话说，米塞斯实际上假设了不确定性，并且未提及这种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中会大幅增加。

这一点可以从现代“奥地利”经济学中看出，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经济计算辩论”之后，它越来越远离了新古典均衡理论。然而，这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削弱了“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的论证。对于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来说，经济不被认为处于均衡状态，而企业家则被视为将其引向均衡的手段。因此，“这种方法假定，常态下稳定的创业参与者，趋向于发现并把握盈利机会”，而这种“趋势使市场向均衡方向推移”。虽然大家口头上承认“创业者可能会犯错”这一明显的事实，但“创业者错误的倾向并不存在”。市场生成的倾向使人们的相互认知更为清晰，而这一倾向不会被相等但相反的倾向所抵消”。因此，“创业市场的进程，可能确实反映出一种系统性均衡的

^① 经济计算辩论（Economic calculation debate，有时也叫做“社会主义计算争论”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表示正在进行的对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在缺少价值规律、货币和资本物品的金融定价以及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计算的话题。该争论产生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与新古典经济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

趋势，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构成一个确保单向的、完美收敛的轨迹”。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创业者的投机行为，他们在不均衡的条件下看到纯利润的机会”。[Israel M. Kirzner,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 An Austrian Approach", pp. 60-85,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5, No. 1, p. 71, p. 73, p. 82, p. 72 and p. 68]

在评估这个论点时，值得记住的是，“假定”意味着“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假定为真”或“视为显而易见的”。最简单地讲，这个论点忽略了创业活动是如何推动经济远离均衡的（与激进经济学家不同，只有少数“奥地利”经济学家，比如那些追随路德维希·拉赫曼的学者，认识到市场力量既有均衡效应也有不均衡效应，这一点在基尔兹纳的论述中也有简要提到：“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他们认为，恰恰是那些创业者的大胆行为，挫败了其他创业者的发现努力。”[Op. Cit., p. 79]）。换句话说，市场活动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和低效的资源配置决策。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会通过他们的行动使他人的计划受挫；最明显的是竞争对手的计划，但也包括那些依赖他们以前生产的商品来生产新商品的人，以及那些因为新产品的出现而收入减少的人。要认为每一个公司的行动，都将朝着均衡或更好的计划协调迈进，特别是如果将那些不成功的企业家也考虑在内的话——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换句话说，市场既可能导致经济失调，也可能导致经济协调，而无法事先“假设”哪种情况会在任何特定时间占主导地位。

有一个明显的创业活动例子，它就导致了不均衡的加剧；（讽刺的是）这个例子直接来源于“奥地利”经济学本身。这就是银行家扩展信贷，从而偏离“自然”（均衡）利率的行为。正如一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个“奥地利”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不仅证明对剑桥资本批评的脆弱……而且还似乎依赖于与‘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更广泛原则不一致的均衡概念（例如‘自然利率’）。”[J.E. King, A history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since 1936, p. 230] 如我们在 C.8 节中所讨论的，这种活动是企业试图通过满足市场需求来赚钱的典型行为。这种活动的最终结果是推动经济远离均衡。这个结论可以推广到所有市场，某些企业的追逐利润的活动会使其他企业的计划受挫。最终，认为所有企业活动都是稳定的、有益的套利行为，从而能够消除不均衡的说法——并不令人信服，因为不均衡价格所传递的误导性信息，可能会对单一商品（如信贷）造成非常大的宏观经济扭曲。当然，关于利率的论点也可以适用于其他不均衡价格，用以回应其他商品的不可持续价格同样可能产生错误投资（这种错误只有在价格调整到“自然”水平时才会显现出来）。毕竟，任何单一价格的扭曲都会导致所有其他价格扭曲，因为它会波及到整个经济中的交换比率。

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均衡的原因之一是，价格只有在均衡状态下才能为理性计算提供基础，因为非均衡价格可能传递出极其误导的信息。当人们在非均衡价格下进行交易时，会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抽象化处理这一问题的原因）。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如果人们“在未能清空市场的价格下进行买卖”，那么一旦“这样的交易发生，就无法保证，即使存在均衡，经济也会朝向均衡收敛。事实上，它很可能会围绕均衡进行周期性波动。”这“不仅仅是一个假设，它是对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情况的准确描述。”[Paul Ormerod, The Death of Economics, pp. 87-8] 一旦我们摒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意识形态驱

动的“假定”，就可以看到这些“纯利润”的机会（当然，买方相应的纯亏损）是如何影响经济的，以及市场系统是如何增加不确定性的。正如异见经济学家史蒂夫·基恩所言：

“然而，一个市场的价格变化，会影响到所有其他市场的消费者需求。这意味着一个市场向均衡的移动，可能会导致一些或全部的其他市场偏离均衡。显然，这种情况可能永远无法稳定在均衡状态。”

“尤其是在交易实际上发生在非均衡状态下——因为在实践中它们必须如此……非均衡交易将意味着，在交易中处于获胜一方的人——如果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则卖方——将以失利方为代价获得实际收入，相较于假定的均衡标准。这种收入分配的转变将影响到所有其他市场，使得多个市场的波动更加混乱。”
[Debunking Economics, p. 169]

“奥地利学派”往往倾向于淡化“价格不仅可能，而且确实会传递出极其误导性的信息”这一事实。然而，在接近他们理想的经济体中（例如，十九世纪的美国），经济衰退发生的频率要远高于二十世纪（通常由金融危机引发，这些危机源于投机泡沫的破裂），因此经济本质上更加不稳定，导致市场“精准地”投资到“错误”的领域。当然，虽然可以辩称当时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例如，存在保护主义、由于州政府的监管而没有真正的自由银行业等等），但这种辩解无异于极端的循环论证（尤其是考虑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投机危机，恰恰发生在那些监管最少的领域）。

因此，认为价格能够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如果价格处于不均衡状态，正如“奥地利学派”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市场并不会自动确保价格向平衡状态调整。没有均衡，我们就无法说，价格能够为公司提供足够的信息以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它们可能是基于误导性价格信息，反映的是市场中的暂时性高点或低点，或者是投机泡沫的结果。基于不平衡价格所隐含的误导性信息做出的投资决策，与基于利率未达到其“自然”（平衡）值所做的决策一样，可能导致错误投资和随后的宏观经济扭曲。因此，除非假设市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处于平衡状态，否则价格既可能反映信息，也可能反映错误信息。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均衡的含义，有助于削弱米塞斯反对社会主义的论点。

即便我们假设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价格处于或至少接近平衡状态，尴尬的事实是，这些价格并不能告诉你未来的价格，也不能告诉你生产完成后将会出售什么产品。相反，它们告诉你的是，在**投资开始**之前，**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价格。在用于计算各种投资成本的价格，与最终售出时市场上的价格之间，总是存在差异，这表明市场提供的是系统性误导的信号。此外，竞争对手公司也会对相同的价格信号作出反应，进行长期投资，从而在投资完成后，创造出过度积累和过度生产的普遍危机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在 C.7.2 节中所讨论的那样，这是商业周期的关键因素。因此，当某一市场价格上涨引发的整体反应，导致市场充斥着过剩商品；从而将市场价格压低时，过度生产的可能性便会反复出现。因此，市场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不可知。因此，读到米塞斯断言“在社会主义的共同体中，每一次经济变化都是一项其成败即无法事先评估、也无法事后回溯的事业。只能是在黑暗

中摸瞎”，似乎颇具讽刺意味。[Op. Cit., p. 110]

在“事先评估”的问题上，米塞斯本质上是在假设资本家能够预见未来。在现实世界中，而非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虚拟世界里，未来是不可知的。因此，能否成功只能是一个猜测。这意味着，在现实资本主义下，任何投资决策同样是“在黑暗中摸瞎”，因为无法事先知道推动投资决策的预期是否会成为现实。正如米塞斯本人在攻击社会主义时所指出的，“静态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经济数据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毫无疑问，投资的成功无法在事先以任何真实的程度进行评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米塞斯指出“经济活动的静态性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并不对应任何真实的状态；然而，它对于我们的思维和经济学知识的完善是必要的。”[Op. Cit., p. 109] 或者，换句话说，是我们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这一点可以从他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例子中看到：

“想象一下建造一条新铁路。它是否应该被建造？如果是，应该选择哪条可行的路线？在一个竞争和货币经济体中，这个问题将通过货币计算来回答。新路将使某些货物的运输成本降低；而这，可能可以通过计算出这种成本的降低，是否超过了建造和维护新线路的费用来完成。这一切只能通过货币来计算。”[Op. Cit., p. 108]

“可能可以”？不可能事先知道。顶多，投资者可以估算公司是否愿意转向新建的铁路，并且这些预期的成本是否会带来固定和运营成本的利润。建设成本可以估算，尽管未来价格的意外上涨可能让这些估算变得毫无意义，但未来的收入是无法估算的。同样，建设新铁路的影响将改变收入的分配，这反过来影响市场上的价格以及人们的消费决策，而这些又影响新铁路投资的盈利能力。然而，为了攻击社会主义，这一切都被忽略了。

换句话说，米塞斯假设未来可以准确预测，从而攻击社会主义。因此，他断言，社会主义社会“将发布一项法令，决定是否建设该项目。然而，这一决策最多依赖于模糊的估计；它永远不会基于对价值的精确计算。”[Op. Cit., p. 109] 然而，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任何投资决策，最多也只能依赖于对未来市场条件和预期投资回报的“模糊估计”。这是因为会计工作是回顾性的，而投资则依赖于不可知的未来。

换句话说，“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经济未来是不确定的（非遍历的），且无法从现有的市场信息中可靠地预测。因此，生产设施的投资支出和人们的储蓄意愿，通常基于对不可知、不确定未来的不同预期。”这意味着，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未来的利润“既无法可靠地从现有的市场信息中预测，也无法通过今天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内生地决定……因此，除非假设企业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直到永远，否则当前对预期收益的预期，必须依赖于企业家的动物性乐观或悲观。”[Paul Davidson, John Maynard Keynes, pp. 62-3] 所以，是的，在资本主义下，你可以确定一座建筑的货币成本（价格），但建造决策是基于对未来的估算和猜测，用米塞斯的话说是“模糊的估计”。市场的变化意味着，即使一座建筑的建造成本完全符合预期，也可能无法产生利润，最终空置。即使在“精确计算”投入的情况下，这些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破坏预计的最终成本以及其利润率。

为了更好地解释不确定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转向凯恩斯，他将不确定性置于对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实际结果在长时间内，很少与最初的预期相符”，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不足以为计算数学预期提供足够的基础。事实上，所有种类的考虑因素都会进入市场估值中，而这些因素与预期收益并无任何关联。”他强调，“影响未来的人的决策，无论是个人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能依赖于严格的数学预期，因为做出这种计算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他还指出，工资灵活性的“主要结果”将是“导致价格的大幅不稳定；它可能如此剧烈，以至于使商业计算变得徒劳无功。”[The General Theory, p. 152, pp. 162-3 and p. 269]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其他价格。正如蒲鲁东在米塞斯宣称“社会主义不可能”的之前几十年就已经指出的那样，利润最终是一个未知的价值。在资本主义下，工资是工人能获得的“最少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资本家“投放市场的商品的价格”将是“他能够获得的最高价格；也还就是，我们依然不知道。”经济学“承认”，“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可以被估算”，而且“这种估算本质上是一个武断的操作，永远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因此，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两个未知数之间的关系”之上的，而这种关系“是无法被确定的。”[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 p. 64]

因此，在资本主义下，所有决策都是“在黑暗中摸索”。这可以且确实会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

“也就是说，这误导了投资。但除此之外，繁荣的本质特征是，那些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际会带来，例如，2%收益的投资，预期的收益却是6%，并因此被如此估值。当幻想破灭时，这种预期被与之相反的‘悲观错误’所取代，结果是那些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际会带来2%收益的投资，反而预期将带来低于零的收益；而随之而来的新投资崩溃则导致了失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本应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带来2%收益的投资，实际上却带来低于零的收益。我们最终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住房短缺，但仍然没有人能负担得起住在现有的住房中。”[凯恩斯，《一般理论》，第321-322页]

因此，不确定性和对利润的预期，会导致大规模的资源配置低效和浪费。当然，米塞斯表面上承认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他指出，“其他经济数据的不断变化”，以及交换关系“不断波动”，但这些“波动仅在极小程度上扰乱价值计算”！他承认，“在这种计算中，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放心，“剩余的不确定性会进入对未来条件不确定性的计算，而这是经济生活动态性质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Op. Cit., p. 98, p. 110 and p. 111] 所以，有些讽刺的是，米塞斯在攻击社会主义时假设，价格如此流动，以至于任何中央计划机构都无法计算出正确的价格，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然而，当涉及到资本主义时，他却认为价格并不那么流动了，以至于它们不会使投资决策变得困难！

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减少了这些不确定性，还是加剧了这些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提出，资本主义增加了两层额外的不确定性。首先，像任何经济体一样，有一个（固有的）不确定性，那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否能够满足他人的实际需

求（即，它是否具有使用价值）。通过使得商品的价格必须超过成本，市场增加了第二层不确定性。最后，资本主义还增加了另一层不确定性，那就是资本家阶级必须获得足够的利润。因此，不管人们有多么需要某一特定商品，如果资本家无法从中获利，那么该商品就不会被生产出来。

当然，不确定性也会困扰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的错误会发生，某些商品有时会过度生产，而有时又会生产不足。然而，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关的额外不确定性：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损失会导致企业的倒闭和失业的增加，所以这些错误不会导致（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的经济衰退。换句话说，没有米塞斯所说的精确经济计算，社会将不再受到与利润系统相关的不确定性的困扰。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内的一些发展，实际上指出了共产主义在减少不确定性方面的优势。这就是大规模企业的兴起。事实上，许多资本主义公司扩张的原因，恰恰是为了减少与市场价格相关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公司计划的（负面）影响。因此，公司通过收购进行横向整合，以便在投资和供应决策上获得更多控制权；同时通过纵向整合，来稳定成本并确保必要投入的需求。

正如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所指出的，当投资规模较大时，“没有一种市场不确定性，比获取资本的条件和条款更为严重。”因此，企业使用内部资金，因为“企业有了一个安全的资本来源”，并且“不再面临市场的风险”。这一点适用于其他投入，因为“如果一个企业不知道它的价格、销售、成本（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成本）以及在這些成本下能获得什么，它就无法令人满意地预见和安排未来的行动或为意外情况做准备。如果市场是失控的，它就无法知道这些事情……企业所称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尽量减少不受控制的市场影响。”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公司会扩张（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主导市场并获取寡头垄断利润）。随着“企业通过纵向整合超越了市场”，企业“接管了供应源或销售渠道”。但这“并未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而是将“关于投入价格的巨大且难以管理的不确定性”替换为“较小、更分散且更可管理的不确定性”，例如劳动力成本。大公司只有通过“减少或消除其销售对象或购买对象的独立行动”来控制市场。这意味着可以控制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对这种行为的不确定性”。最后，广告也被用于影响销售量。公司还通过“签订合同，明确规定价格和提供或购买的数量，且期限较长”，来“消除市场不确定性”。因此，“消除市场不确定性的策略之一，是就消除市场。”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p. 47, pp. 30-6 and p. 47]

当然，这种在资本主义内部减少不确定性的尝试，是不完整的，并且容易出现崩溃。这些规划系统可能与其他系统发生冲突（例如，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日本公司的崛起以及美国工业力量的衰退）。它们是集中的、建构与等级制度的，且基于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因此存在我们在第 [1.1.2 节](#) 中指出的信息问题）。市场力量可能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让即使是最精心组织的计划也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尽管这些在资本主义中超越市场的尝试是不完全的，它们表明了依赖市场和市场价格进行资源配置的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它们增加了一层额外的不确定性，确保投资者和企业决策时与米塞斯所说的中央计划者一样，处于黑暗之中。因此，像米塞斯所说的那样，宣称社会主义中的生产“永远不能基于对价值的精

确计算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偷换概念。[Op. Cit., p. 109] 这是因为，知晓一个投资的“精确”价格是没有意义的，关键问题是它是否能盈利——而这在投资时是未知的，即使它亏损了，它仍然是资源的浪费！因此，知道当前的价格并不能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我们假设，盈利性等同于对社会的有用性）。

总之，米塞斯完全忽视了不确定性的问题（我们不能，也无法知道未来）以及个体决策的集体影响。生产和投资决策是基于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做出的，但這些（预期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决策正在做出或将要做出的内容。这是因为这些决策会影响未来某一商品的总供应量，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投入价格以及有效需求的分布。在米塞斯假设的基于市场（因此是碎片化和原子化）的决策中，任何生产和投资决策都是基于对他人行动及其结果的、不可避免的无知而做出的。当然，不确定性会影响每一种社会制度（例如天气、新能源的来源、原材料和技术的发现、顾客需求的变化等等）。然而，基于市场的体系，通过决策者之间缺乏沟通以及将利润视为经济理性的终极要义，增加了额外的不确定性。

因此，关于米塞斯声称只有资本主义能够确保成功可以“事先评估”的观点，现实情况是，这个体系和其他任何体系一样，都是“在黑暗中摸索”。那么，关于市场唯一能确保项目的成功可以“事后回溯”的主张呢？在这一点上，米塞斯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认为“盈利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这种可疑的论点。于是，经济与盈利划上了等号。所以，即便我们假设价格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以供理性决策，经济从一个均衡状态跳跃到另一个均衡状态，并且资本家可以预测未来——但尴尬的事实是，最大化利润，并不等于最大化人类的福祉。

幸福感和效率并不等同于盈利，因为后者并未考虑到**需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满足需求并不是可以“事后回溯”的，只有利润和损失才是。一个投资可能失败，并非因为它不被需要；而是因为由于收入不平等，市场没有有效的需求。因此，必须记住，收入分配决定了某个资源是否是“有效”使用。正如托马斯·巴洛格所指出的，实际收入“是通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统治的某一价格体系来衡量的，而这些价格将反映收入的分配情况。（若是没有德克萨斯州的石油百万富翁，就几乎不可能以小农场主或佃农十倍年收入的价格，卖掉一辆浅蓝色的劳斯莱斯）”。[《传统经济学的无关性》，第 98-99 页] 商品的市场需求，决定了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它并不是基于消费者的偏好，而是基于消费者之间购买力的分配。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米塞斯在攻击社会主义时也提到了，认为中央计划者无法利用当前价格，因为“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伴随着收入差异的平衡，以及消费结构和生产的相应调整，进而所有经济数据都会发生变化。”[《Op. Cit.》，第 109 页] 他并没有提到这对“效率”或盈利的影响！毕竟，什么是盈利的（“有效率的”），依赖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又依赖于特定的收入分配。通过从富人向穷人收入的再分配，相同的生产过程可能变得高效，也可能变得低效。类似地，市场价格的变化，可能使得曾经有利可图的投资变得无利可图，而这并不会影响它们满足的需求。而这一点，不言而喻，可能对人类幸福感产生严重影响。

如 C.1.5 节所讨论的那样，这在饥荒期间尤为明显。正如艾伦·恩格尔所指

出的，“当人们被剥夺生计来源时，市场力量无形的手并不会介入他们的利益。供需平衡与人类需求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例如，假设一个国家有一百万人，其中九十万人没有生计来源。一百万蒲式耳^①的小麦已经生产出来。所有农作物以每蒲式耳 10 美元的价格卖给了 10 万人。供需虽然平衡，然而 90 万人将面临饥饿。”[《贪婪的使徒》，第 50-51 页]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问题，许多饥荒的例子（从 1840 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到 1980 年代非洲国家的饥荒）正是这种情况在实践中的经典例证：富裕的地主将粮食出口到其他国家，而本国的数百万人却饿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因此，市场体系的分配后果彻底破坏了一切关于什么是“有效”资源利用的定义。由于市场仅通过“退出”来提供信息——一些产品找到市场，而另一些则没有——“发声”是缺失的。以“退出”而非“发声”的方式运作，导致在市场上没有权力的人被抛在了后面。例如，富人不会购买含有添加剂的有害食品，而穷人却消费这些食品。这意味着在两种环境之间形成了分裂：一种是富人所占据的环境，另一种是穷人所处的环境。从当前资本主义的“污染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可能对生态和社会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市场远非基于“一美元一票”的“民主”，而是一个寡头制社会。例如，“1987 年赚取最低工资的 79,000 名美国人，与迈克尔·米尔肯^②（他所‘赚取’的金额相当于所有这些人的总和）享有同等的影响力（或‘票数’）。”[Michael Albert and Robin Hahne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p. 21] 一位异见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市场与民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民主遵循‘每人一票’的原则，而市场遵循‘每美元一票’的原则。显然，前者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重，不论其拥有多少财富，而后者则赋予富人更大的权重。”这意味着市场自动偏向富人，因此，“将一切交给市场，意味着富人甚至可以实现他们最为琐碎的欲望，而穷人却可能连生存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世界每年在减肥药上的研究花费是疟疾研究的二十倍，而疟疾每年在发展中国家夺走超过一百万条生命，致使成百上千万人虚弱不堪。”[Ha-Joon Chang, *Bad Samaritans*, p. 172 and p. 174]

换句话说，市场始终偏向有效需求，即偏向有钱人的需求，因此永远无法（除非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虚构抽象中）将生活必需品分配给最需要它们的人。因此，通过财富再分配（例如通过激进工会或福利国家）可以使以前的“坏”投资变得有利可图，仅仅是因为，新的收入让曾经需要但买不起该商品或服务的人能够购买它。因此，仅仅因为某件事在某种收入分配下造成损失，并不意味着它在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是低效的（而在另一种更平等的财富分配下，甚至可能会盈利）。因此，从价格（即利润）角度来看，“有效”的资源配置往往并非如此，因为少数富人将市场决策倾斜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

需要记住的是，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偏好是通过市场中的行为来体现的；他们对意见不感兴趣，因此任何未通过行动表现出的偏好，对他们

^① 蒲式耳 (bushel)，英制容量及重量单位。通常 1 蒲式耳=8 加仑（约 36.37 升）；1 蒲式耳小麦=60 磅（约 27.22 千克）

^② 迈克尔·罗伯特·米尔肯 (Michael Robert Milken, 1946-)，美国金融家，因在市场中发展高收益债券而闻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在四年内的薪酬超过了 10 亿美元，创下了当时美国收入的最高纪录。截至 2022 年，其净资产为 60 亿美元，于全球富豪榜上留名。

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任何试图优先考虑集体的事情，比如为所有人建造体面的住房、提供全民医疗保健、消除贫困等等——都被认为是“低效”的资源使用，因为那些接受这些服务的人通常无法负担它们，因此他们实际上并不渴望这些东西（因为，毫无疑问，他们不会通过市场交换来表达这种需求！）。然而，这忽略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在市场中，人们只有在有足够的资金来表达他们的偏好时，才能行动。因此，那些有需求却没有钱的人，在决定市场是否高效时根本没有被考虑。市场中根本没有空间，去容纳那些可能被市场伤害的真实的个体。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纯粹”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如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其他产权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可能会产生问题，因为这些权利的实际运作结果，很可能会包括相当可怕的后果。特别是，它可能会导致对个体实现他们非常重视的目标的自由，造成的实质性的侵犯，包括避免不必要的道德困境、获得足够的营养和健康、能够阅读、写字和算数等等。”事实上，“即便也可能发生巨大的饥荒，而之中没有任何人（正当的）自由意志权力被侵犯（包括财产权）。像失业者或贫困者这样的贫困人口，可能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食物”。类似地，像“贫困”这样的状况，如“定期的营养不良”，“缺乏可治愈疾病的医疗照护”，也可以“与所有（正当的）自由意志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并存。”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66]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问题在“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的反对中被完全忽视。最终，如果为富人的宠物提供食物能够获得利润，那么它就成为比为那些无法在市场上购买食物的饥荒受害者提供食物，更为经济和高效率地利用了资源。因此，不应忘记，“奥地利学派”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偏好才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无法在市场上进行行动（即无法购买某物），那么你对它的需求就不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失业并因此失去了他们的家，那么根据这种逻辑，他们并不“需要”一个家，因为他们的“表现偏好”（即他们实际的行为选择）表明他们真心地重视住在桥下（当然，前提是他们得到了桥主的同意）。

顺便一提，这一明显的事实表明，“奥地利学派”声称“市场干预总是减少社会效用”的论断是无法支持的。市场最大化效用的论点，是基于假设自由交换开始之前已经有一个固定的资源分配。如果某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食物或必需的医疗治疗，那么这一点在市场中是无法反映出来的。如果财富得以重新分配，且他们因此能够获得这些物品，那么（显然）他们的效用增加了，而是否社会效用减少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富人被征税以实现这一目标所产生的负效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证明市场中的所有干预都会减少社会效益的观点是失败的。例如，正如一位异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指出，虽然穆雷·罗斯巴德“声称他提出了一个纯粹演绎的”论证，认为国家干预总是减少社会效益，“但他的论点在逻辑上存在缺陷”。他仅仅假设社会效益会减少，但没有给出这种假设的理由，因为他承认人际效用的比较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要求只通过逻辑来检验其主张”的人来说，他关于国家干预的最终结论“并不成立”，并且展示了“一种粗心的自我矛盾” [David L. Prychitko, Markets, Planning and Democracy, p. 189, p. 111 and p. 110]。

总而言之，从反馈的角度来看，认为如果某物能够获利，那就表明它是高效

生产的——这种想法混淆了效率、需求与盈利能力和有效需求。某些东西可以通过施加外部成本和降低质量来获利。同样，尽管某物有需求，它也可能无法获利，仅仅因为人们负担不起它。

因此，米塞斯断言“利润生产和需求生产之间，不存在对立”[《社会主义》，p. 143]是错误的。事实上，任何声称自己是经济学家的人，能发表出这样的言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正如蒲鲁东和马克思（如同之前的史密斯和李嘉图）所明确指出的，商品要能够交换，必须首先对他人具有使用价值（效用）。因此，利润生产，按定义来说，意味着为了“使用”而生产——否则交换根本不会发生。社会主义者通过将利润生产与需求生产进行对比，首先强调的是，需求排在利润之后。因此，没有利润，商品就不会生产，无论有多少人需要它。其次，它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危机时期，资本主义表现为商品过度生产导致利润减少，进而停止生产，而那些需要这些商品的人则无法得到它们。因此，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家可归的人住在空置的房子旁边，饥饿的人看到食物被出口或销毁，以便最大化利润。最终，如果资本家没有赚取利润，那么这就是一次糟糕的投资——无论它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改善他们的生活。换句话说，米塞斯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利润生产），并将其描绘为旨在直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生产。

同样，某物能够获利，并不意味着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例如，如果这种利润是通过将污染外部化或通过市场权力获得的，那么就不能说整个社会受益于此——而是资本家。类似地，非市场化的系统，在结果方面，可能比基于市场的系统更高效。例如，让所有需要医疗的人而非仅能负担得起的人，都能够获得医疗服务，在“奥地利学派”眼中是经济上“低效”的。但只有意识形态者才会因此声称我们不应这样做，特别是我们可以指出一个尴尬的事实，即美国和智利那些更多私有化的医疗系统，反而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国有化系统更低效。行政成本更高，这些社会为同等水平的治疗支付的费用会远远更多。当然，可以争辩说这些私有化的系统并不是真正的私有化，但尴尬的事实依然存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系统，在人口覆盖、治疗成本、官僚系统和每花费一英镑的健康结果方面——都要更差。

此外，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成本会外部化给社会阶层底层的人群。后果是有害的，这一点从用来掩饰这一现实的新闻语气中可以看出。例如，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加”。“灵活性”听起来很棒：僵化的结构令人厌烦，并且不太适合人类成长。实际上，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的，“灵活性意味着不安全。意味着你晚上躺在床上，不知道明天早上是否还有工作。这就叫做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任何经济学家都可以解释说这对经济是有利的；我们此刻在这里将‘经济’理解为盈利。我们说的‘经济’并不是指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对经济有利，临时工作增加了灵活性。低工资也增加了工作不安全感。它们保持低通胀。这对那些有钱的人有好处，比如债券持有人。所以这一切都为所谓的‘健康经济’做出了贡献，也就是高利润的经济。利润很好，企业利润飙升。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情况非常严峻。没有太多未来的希望，严峻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建设性的社会行动，但如果没有社会行动，它们会表现为暴力。”[《让民众保持在轨》，p. 283-4] 因此，不能简单地假设对经济有利（利润）的就等于对人民有利（至少是对工人阶级有利）。

因此，“奥地利学派”将盈利置于一切之上，这一假设是“计算论证”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但这一点只有在效率与利润混淆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煤炭能够带来更高的利润，并在其中导致全球变暖——市场就会投资煤炭。它会拒绝向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因为没有利润，所以认为这是低效的），同时却可能助长比如房地产泡沫，因为它通过向那些实际上买不起房的人提供贷款，而获得短期利润。它会支持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而不顾及其广泛的影响，因此，“效率”（即利润）可能与智慧和伦理相矛盾；最终，也与有效地分配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相矛盾。

最后，我们的批判迄今为止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周期性危机的存在，这些危机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这些危机源于价格机制运作中的主观和客观压力（详见 C.7 节）。在经济上升阶段，当人们的预期乐观时，企业会进行投资，产生相互促进的扩张效应。然而，这种决策的净效应最终导致过度投资、过剩产能和过度生产——错误投资以及资源的浪费。这导致利润低于预期，预期发生恶化，繁荣转为萧条，资本设备被废弃，工人失业，资源要么被浪费、要么被闲置。

在危机中，我们看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爆发。工人的生产力并不比危机开始时低，他们创造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没有减少。生产资料仍然与以前一样具有生产力。两者都与以前一样，有能力为每个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即使人们无家可归，住房也依然空置。即使人们需要商品，生产也停止了。即使人们想要工作，工作场所也关闭了。然而，根据“精确的”“经济计算”逻辑，生产现在被认为是“低效”的，应该关闭。工人失业，并被期望通过压低那些幸运地仍然保持工作的人们的工资，来找到工作；生活资料的所有者认为重新剥削他们和以前一样有利可图（因为一旦困难时期来临，总会有人提出“复苏需要让底层做出牺牲”；不用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通常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这表明，如果资源的有效分配实际上是一个周期——消费者因短缺和高价格而无法获得必需品，随后企业因为过度生产和低价格而倒闭——那么它变得毫无意义。这个过程破坏了大批群众的生活，更不用说浪费了大量的生产设备和商品。总是有人需要过度生产的商品，因此市场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物品（*goods*）的过度生产和商品（*commodities*）的过度生产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了更多商品，这可能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但它不会像资本主义下那样导致危机！

因此，在一个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许多看似理性的投资决策最终失败的原因。这些投资并非生产人们不需要的商品，而是因为“精确的”“经济计算”表明，它们没有产生利润，因此被视为“低效的”资源使用。然而，假设由于经济衰退，工人再也买不起食物，那么让他们饿死真的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这种论证是极其不成立的。类似地，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在新政下）将大约 60% 的失业人口雇佣到公共工程和环保项目中。这些项目种植了十亿棵树，拯救了美洲鹤，现代化了美国的农村，建造了匹兹堡的学习大教堂、蒙大拿州议会大厦、纽约的林肯隧道和三桥大桥综合体、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和其他建筑），以及修建或翻修了 2,500 所医院、45,000 所学校、13,000 个公园和游乐

场、7,800 座桥梁、700,000 英里的道路、1,000 个机场，还雇佣了 50,000 名教师，重建了全国的农村学校系统。所有的项目是否真的能被视为资源浪费，仅仅因为它们永远不会为资本家带来利润？

当然，我们的讨论受到了“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有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的影响。某些干预措施“社会化”了成本和风险，比如公共资金创建基础设施和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鉴于许多 R&D 通过国家资金（通过大学、军事采购等）进行，而（当然）这些研究的利润随后被私人化，问题就来了：如果没有“社会化”的成本，最初的研究是否会继续进行？比如，米塞斯的“精确”计算是否会导致互联网的开发？如果，正如看起来的那样，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当前使用的万维网是否就是一种低效的资源使用？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干预措施，旨在确保某些活动变得“高效”（即，有利可图），例如规定并捍卫知识产权、公司有限责任以及执行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比如土地）。尽管我们在评估资本主义时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活动，但它们是市场中的严重缺陷，因此会影响什么算作“有效”的资源使用。其他国家干预旨在减少不确定性并稳定市场，例如使用福利制度来保持总需求。

去除这些市场中的“缺陷”，将大大影响米塞斯论证的说服力。Doug Henwood 指出：“我们现有的数据并不支持 19 世纪比 20 世纪更‘稳定’的观点……物价水平波动极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出现，过去三十年的 GDP 增长同样非常波动。经济萧条时期非常残酷，导致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以及工人和农民的艰难时光。” [After the New Economy, p. 242] 通过查看美国的商业周期数据，显而易见，19 世纪的一些常规衰退期极为漫长：例如，1873 年的恐慌后，衰退持续了 5 年半。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十天，国家 364 条铁路中有 89 条破产。1873 年至 1875 年间，共有 18,000 家企业倒闭。到 1876 年，失业率达到了 14%，这一时期被称为长期萧条。建筑工作停滞，工资被削减，房地产价值下跌，企业利润消失。

因此，鉴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以及它在有效需求面前忽视真实需求的特性，粗略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要好得多。换句话说，米塞斯所推崇的经济计算常常导致这样的情况：人们遭受苦难，因为它准确地表明，尽管生产力和产品需求没有变化，但工作场所应该关闭，因为它们无法再盈利。在危机中说人们应该失业、无家可归并挨饿，因为经济计算证明了他们不需要就业、住房和食物；这些实际上揭示了将“经济计算”奉为资源配置最终标准的非理性。

综上所述，不仅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可能的，而且资本主义本身使得经济计算变得问题重重，资源配置也因此低效。鉴于市场动态所暗示的系统性的不确定性以及该系统固有的危机倾向，“经济计算”确保了资源的浪费。将利润标准作为“效率”的衡量标准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确保了真实需求被忽视，并使得社会处于频繁的危机之中，在这些危机中，“经济计算”确保了产业关闭，从而确保了人们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不再被生产。正如蒲鲁东所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着“一种痛苦的摆动，介于高利贷和破产之间。” [蒲鲁东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第 63 页]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配置的这些缺陷显而易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米塞斯为何未曾讨论这些问题：最终，就像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奥

地利学派”追求的是颂扬资本主义，而非理解资本主义。

I.2 这是一份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蓝图吗？

不是，而且远非如此。自由社会不可能有所谓的“蓝图”。正如 **Rocker** 正确强调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所有人类问题的专利解决方案，也不是一个拥有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正如它常常被称为的那样，因为无政府主义原则上拒绝所有绝对的计划和概念。它不相信任何绝对的真理，也不相信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相信社会安排和人类生活条件的无限完备性，这些条件始终在追求更高形式的表达，因此不能为此指定明确的终点，抑或设立固定的目标。”[《无政府工团主义》，第 15 页]

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是指出我们所认为的自由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以便使其真正符合自由意志主义的标准。例如，一个在工作场所上基于层级管理的社会（如资本主义），就不是自由意志的社会；并且很快就会看到私人或公共国家的形成，用来保护处于顶层职位的人的权力。然而，超出这些一般性考虑的具体细节——如何构建一个非层级的社会——必须开放地加以讨论和实验：

“无政府主义，即自由，是与最为多样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相兼容的——前提是这些条件不能像资本主义垄断那样，意味着这自由的否定。”[D. A. de Santillan, 《革命之后》，第 95 页]

因此，我们的评论不应被视为一份详细的计划，而应被看作是基于无政府主义者传统上提倡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以及在各种社会革命中试验过的做法的，一系列建议。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对过于详细地阐述未来社会的愿景保持谨慎，因为根据无政府主义原则，在新社会的具体形式上持有教条主义的态度是不合适的。自由的人们将根据他们地区的特定条件，以及他们的需求、愿望和希望，创造属于自己的替代性制度；所以我们提前设定普遍政策的做法会显得傲慢。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一旦通过群众的行动实现了对社会财富的征用，“那么，在一段摸索的时期之后，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生产和交换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将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贴近人们的愿望以及共同生活和相互关系的需求——不论这些理论多么宏伟，都是由改革者的思考和想象力设计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现在预测”在一些受无政府主义者影响的地区，“新组织的基础，将是生产者团体的自由联合、公社的自由联合以及自治公社的自由联合。”[《无神无主》，第一卷，第 232 页]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思想将影响未来，就像现实的经验会影响并改变我们的思维一样。鉴于自由意志主义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就暗示了某些类型的

社会组织。因此，我们认识到雇佣劳动创造了威权的社会关系和剥削；表明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工作场所只能基于合作劳动（即自我管理）。同样，鉴于国家是一个集中化的机构，将权力向上委托；因此不难想象，一个自由社会将拥有从下而上组织的联邦性质的共同体机构。

此外，鉴于我们自身所处的不自由社会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一旦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被解放，去除了目前的权威枷锁，现在的我们或许难以想象未来将会产生什么新的形式。因此，任何试图描绘未来详细蓝图的尝试，注定会失败。最终，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新社会应当在所有相关者的直接参与下组织，从外围到中心、自由且自发地进行，依靠团结的情感推动，并在社会的自然需求压力下进行。” [E. Malatesta and A. Hamon, *Op. Cit.*, vol. 2, p. 20]

尽管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愿意明确一些广泛的原则，指示他们期望的一般框架，使得新社会的制度得以在其中成长。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原则并非象牙塔中知识分子的随意造物。相反，它们是基于实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这些结构在工人阶级群众试图摆脱束缚的时期，自发地产生过：例如巴黎公社、俄国革命、西班牙革命、1956年匈牙利起义、1968年法国、2001年阿根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暴动，这里仅举几例。从这些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出，自我管理的工人委员会和社区大会组成的同盟，在这些人民起义中反复出现，因为人们试图直接管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虽然它们的名称和具体组织结构有所不同，但这些可以视为基本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形式，因为它们在所有革命时期都出现过。最终，这些组织会是对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威的唯一替代——除非我们自己做出决定，否则其他人也会做出决定。

因此，在阅读这些章节时，请记住，这只是尝试勾画出未来可能的轮廓。它绝不是试图精确定义一个自由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样的自由社会将是全社会行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成果。正如马拉特斯塔所说：

“这是一个关于每个人的自由的问题，只要每个个体尊重他人平等的自由。”

“没有人能够确定地判断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离真理最近、或者哪条道路能为每个人实现最大的正义。自由，伴随着经验，是发现真理和最优方案的唯一途径；如果否定犯错的自由，那就没有自由。”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49]

当然，现实生活往往会推翻即使是最现实的理论、思想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货币主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理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的结果往往与预先的理论预测不符（尽管在这四种理论中，它们的负面效应在理论之前就被他人预见到了；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情况下，是被无政府主义者预见到的）。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拒绝意识形态，倾向于以理论为基础，并且也是为何我们对为未来绘制蓝图保持谨慎。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蒲鲁东的正确，他曾说：“每个社会在落入意识形态学者手中时，就开始衰退。” [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 p. 115]

正如巴枯宁所强调的，只有生活才能创造，因此生活必须指导理论——如果理论产生了不良结果，那么修正理论，比否认现实或为它在现实中对人们造成的恶果辩护，更为重要。因此，FAQ 的本节内容并不是一张蓝图，而是一系列建议（我们强调，这些建议来自于工人阶级起义和组织的实际经验）。这些建议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并受到马拉特斯塔以下评论的启发：

“我们并不夸口拥有绝对的真理，相反，我们相信社会真理不是一个定值，不适用于所有时代，也不能普遍适用或事先确定；而是，一旦自由得以保障，人类将不断发现并逐步行动，尽可能减少动荡和摩擦。因此，我们的解决方案始终为不同的、甚至是更好的解决方案，敞开大门。” [Op. Cit., p.21]

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引用巴枯宁的话，认为“革命不仅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进行；它还应当由人民自己来进行。” [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141] 社会问题只有在工人阶级自己解决的情况下，才会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点适用于社会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借助他们自己的组织和力量、自己发动的革命，才能解放工人阶级。事实上，正是在争取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例如通过罢工、占领、示威和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人们才能转变他们对什么是可能的、必要的和可取的看法。组织他们的斗争和行动的必要性的必要性，促使了大会和其他民众权力机构的发展，以便管理他们的活动。这些机构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替代组织方式。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任何一次罢工都能让参与者接受共同管理事务的训练。” [quoted by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p. 233] 人们管理自己生活和社会的能力日益显现；而等级权威、国家、老板或统治阶级的存在，就变得显然不可取且不必要。因此，自由社会的框架将通过阶级斗争的过程而建立，正如工人阶级创造出争取改善和变革资本主义所需的组织一样（见第 [1.2.3 节](#)）。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实际框架，及其如何发展和自我塑造，取决于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们或试图建立这一社会的人的需求和愿望。这也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在社区和工作场所中需要群众大会，并要求自下而上的联合以管理共同事务。只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创造无政府状态。正如马拉特斯塔所言，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建立在“在人民大会上作出的决定，并由志愿者或正式委派的团体和个人执行”的基础上。“革命的成功”依赖于“具有主动性和解决实际任务能力的众多个体：让大众习惯于不再把共同事业交给少数人来管理，并且在必须委派时，只为特定任务和有限时间内进行委派。” [Op. Cit., p. 129] 这种自我管理将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基础，而新的社会将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创造出来。因此，巴枯宁指出：

“革命必须在任何地方由人民自己创造。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必须始终属于由农业和工业协会自由联合起来的人民……这些协会通过革命性的委派手段，自下而上组织起来。”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72]

而且，我们必须记住，尽管我们可以大致猜测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如何开始，但我们无法假装预测它在长期内将如何发展。社会革命只是社会转型过程的开始。不幸的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而不是从我们希望达到的终点开始！因此，

我们的讨论必然会反映当前的社会，因为这是我们将要去转变的社会。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展望可能与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相比，没有质的突变，但它依旧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提供和讨论当下行动的建议，而不是一些仅在革命成功多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实现的空中楼阁。

例如，我们强调，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在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相同工业结构中，实现现有工作场所或行业的自我管理。然而，革命无疑会见证许多现有工业被占领、并置于自我管理之下；所以我们的讨论，将从假设与今天类似的现状开始。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社会将继续像现在这样，我们只是用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展示它初步的阶段。它仅仅是将工业转变为更加生态安全、社会整合、并在个人和集体层面赋权的事物——第一阶段。

有些人似乎真心认为，在社会革命之后，工人们将继续使用相同的技术、在相同的旧工作场所、以相同的旧方式工作，而并不改变任何事情（除了，也许会选举他们的经理）。他们只是将自己的想象力的匮乏投射到全人类身上。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们（工人们）发现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时，他们将以各种方式修改旧系统，以便更好地适应自己的需要……正如常识可能会给自由人以建议一样。” [Charlotte M. Wilson, *Anarchist Essays*, p. 23] 因此，我们毫不怀疑，工人们将迅速改变他们的工作、工作场所和社会，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的社会，拒绝资本主义的遗产，并创造一个我们所无法预测的社会。我们强调，工人占领工作场所，仅仅是转变过程中的第一阶段；这一过程还将改变整个社会。正如 1919 年西雅图总罢工的前夕，罢工者的话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劳工不仅要关闭这些行业，劳动还要在适当的行业管理下重新启动，恢复那些需要保持公共健康和公共和平的活动。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劳工可能会觉得有必要通过重新开放越来越多的活动，来避免公众的痛苦——

“在自己的管理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正走在一条没有人知道通向何方的道路上！”
[quoted by Jeremy Brecher, *Strike!*, p. 110]

在后革命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将不再像现在这样、围绕固定的工作和工作场所展开。生产活动仍将继续进行，但不会像今天那样以异化的方式进行。同样，在他们的社区中，人们将运用他们的想象力、技能和希望，将社区转变为更好的居住地（正如 CNT 所说的，美化公社）。当然，第一阶段，将是接管现有社区并将其置于社区的控制之下。因此，必须记住，我们的讨论只能提供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在成功革命后几个月和几年内如何运作的、一个的大致指引，这一无政府主义社会仍然受资本主义遗产的影响。然而，要是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会致力于改变社会的各个方面，以消除这种遗产，并创造一个适合独特个体生活的社会——就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随着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发展，我们强调，它将以我们现在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社会，基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才华、希望、梦想、想象力。

最后，可以说我们花了太多时间讨论“形式”（即组织的类型以及它们如何做出决策），而不是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内容”（决策实现的性质）。此外，这一区分的意义还扩展到阶级斗争中创建的组织，这些组织很可能成为自由社会的框架。然而，形式，或许比内容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形式”和“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参与性的组织“形式”，能够使得决策、社会或斗争的“内容”发生变化。自我管理对参与者具有教育作用，因为他们意识到不同的思想，思考它们并在其中做出选择（当然，也会提出并呈现他们自己的想法）。因此，这些决策的性质可以并且将会发展变化。因此，形式对“内容”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也因此不为讨论自由社会的形式而道歉。正如穆雷·布克钦所说：

“假设自由的形式可以仅仅作为形式来对待，就像假设法律概念可以仅仅作为法学问题来对待一样荒谬。自由的形式和内容，就像法律与社会一样，是相互决定的。反过来，有些组织形式推动自由的目标，而有些则削弱这一目标……这些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或者改变使用它们的个人，或者抑制他们的进一步发展。”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89]

而决策的内容则由参与者决定。因此，参与性、去中心化、自我管理的组织对于决策内容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是它们，培养了做出这些决策的个体。

1.2.1 为什么要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

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说明为什么人们应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大多数人不喜欢在黑暗中摸索，因此，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理想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可能有助于吸引那些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的人，激励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为了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曾经有过许多不同规模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实验，了解这些实验中发生了什么、什么是有效的，以及哪些是无效的——将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然而，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最重要原因，是为了确保这个社会的创造是尽可能多人的共同行动。正如埃里科·马拉特斯塔在意大利革命的“红色双年”（见 [A.5.5 节](#)）中所指出的，“要么我们所有人都集中精力思考社会的重组，并且立刻行动；在旧有结构被扫除的同时，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加人性化和更加公正的社会，开放于未来的进步——要么，我们就将这些问题交给‘领导者’，那么我们将拥有一个新的政府。”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69]

因此，讨论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越多的人对自由社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我们就越容易创造出这样的社会，并确保重要事务不被他人代为决定。西班牙革命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1936年之前的多年里，C.N.T.和F.A.I.出版了许多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如何运作的书籍（例如迭戈·阿贝尔·德·圣蒂连（Diego Abel de Santillan）的《革命之后》和艾萨克·普恩特（Isaac Puente）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这是西班牙

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在革命前近七十年的组织和教育的成果。当革命终于爆发时，数百万参与者已经共享了类似的愿景，并开始基于这一愿景建设社会，从而亲身了解他们的书籍在哪些地方是错误的，以及哪些生活领域他们没有充分地覆盖。

因此，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讨论，并不是在制定蓝图，也不是试图将未来强行套入过去革命所创造的模式。这纯粹是为了启动人们对自由社会的讨论，并从以往的实验中汲取经验教训。然而，正如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在“旧体制的壳中建设新世界”的重要性一样，我们对自由社会的设想可以为我们今天如何组织和斗争提供参考。反过来，我们今天如何组织和斗争，也将对未来产生影响。

正如马拉特斯塔指出的，这种讨论是必要且至关重要的，因为“认为一旦摧毁政府、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一切都会自动解决’，而不需要那些已经有了明确计划并立即开始付诸实践的人介入——这是荒谬的”，因为“社会生活和个体的生活一样，是不能中断的。”他强调，“忽视所有重建问题，或预先安排完整统一的计划，都是错误的过度行为，这将通过不同的路线导致我们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并使新或旧的专制政权获胜。真理介于两者中间。” [Op. Cit., p. 121]

此外，讨论未来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指出我们的活动——是否在真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毕竟，如果卡尔·马克思当时更愿意讨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那么斯大林主义者就很难声称，他们那种地狱般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鉴于像蒲鲁东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给出了他们的自由社会愿景的宏观轮廓，无政府主义就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被歪曲。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乔姆斯基对此问题的评价：

“左翼运动应该清楚地区分，其长期革命目标，与它可以希望实现的某些更为直接的效果...”

“但是从长远来看，左翼运动如果不能发展出对当代社会的理解、对未来社会秩序的愿景，并且能够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它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也不值得去追求。它的目标和组织形式，必须通过[在最广泛的涵义上的]政治斗争和社会重建中的积极参与来形成。一个真正的激进文化，只能通过广大群众的精神转变来创造。这是任何社会革命的核心特征，旨在拓展人类创造力和自由的可能性……任何严肃的激进运动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必须远高于过去……它不能满足于对一连串各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公。它必须为如何通过革命或大规模改革克服这些罪恶，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左翼必须达到并保持诚实和对自由价值的承诺。” [Radical Priorities, pp. 189-90]

我们希望，FAQ 的这一部分能以它微小的方式，鼓励尽可能多的人讨论自由意志主义社会的样貌；并通过这种讨论，拉近实现它的距离。

I.2.2 是否可能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

有可能，这取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什么意思。

如果指的是一个完全无阶级的社会（有些人不准确地称之为“乌托邦”），那么答案是明确的“不，那是不可能的”。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阶级差异不会大笔一挥地凭空消失——无论是理论家的笔，还是制定法律或法令的官僚的笔。只有通过行动，也就是直接行动（而非通过政府），由无产阶级发起的、针对特权阶级的征用，才能消除阶级差异。”[路易吉·法布里，《无政府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的贫困》，阿尔伯特·梅尔泽（编），第 30 页]

正如我们在 H.2.5 节中讨论的，几乎没有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社会革命会立刻带来一个完全运作良好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社会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尽管，这个过程当然会标志着一系列事件，如总罢工、起义、暴动等）。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我们必须经历一个整体的起义时期，三年、四年，甚至五年，才能完成我们在财产制度和社会组织上的革命。”[《反叛者的话》，第 72 页]

他的著名著作《面包与自由》旨在，借用他的话来说，“证明共产主义——至少部分上的共产主义——比集体主义更有可能建立，特别是在公社引领的情况下”，并试图“指出，在革命时期，如果城市的居民接受了这一理念，一个大城市如何能按照自由共产主义的路线进行自我组织。”[《无政府主义》，第 298 页]换句话说，革命在初期的起义后将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我们知道，一场起义可以在一天内推翻和改变一个政府，而一场革命则需要三到四年的革命性动荡，才能取得切实的成果……如果我们期望革命从最初的暴动就具有共产主义性质，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革命的可能性：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必须有绝大多数人同意进行共产主义方向的变革。”[克鲁泡特金，引自马麦克斯·内特劳，《无政府主义简史》，第 282-283 页]

此外，不同的地区将根据当地主导的影响，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发展。克鲁泡特金认为，“在革命化的公社旁边，”其他地区“将保持期待的态度，继续以个人主义的制度生活……革命将在各地爆发，但每个地方的革命有不同的面貌；在某些国家是国有社会主义，在另一些国家则是联邦制；到处都或多或少是社会主义，但并不遵循任何特定的规则。”因此，“革命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将呈现不同的特点；财富社会化的进程在各地不会完全相同。”[《面包与自由》，第 81-82 页]

克鲁泡特金也意识到，革命将面临许多问题，包括经济活动的中断、内战和孤立。他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革命……将在一次巨大的工业危机中爆

发……目前，欧洲有数百万失业工人。当革命爆发时，这种情况将更加严重……一旦欧洲和美国的街垒建立起来，失业人数将翻倍……我们知道，在革命时期，交换和工业最容易受到普遍动荡的影响……那么，欧洲的革命意味着，至少一半的工厂和车间将不可避免地停工。”他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将“完全解体”，并且在革命期间，“国际贸易将停滞不前”，“商品和食品的流通将陷入瘫痪。”这当然会影响革命的发展，因此，“形势将决定采取哪些措施。”[Op. Cit., pp. 69-70, p. 191 and p. 79]

因此，我们看到无政府共产主义，可能将在“革命时期”、根据遇到的“形势”、在许多（如果不是所有）地区“部分地”引入——而不是瞬间实现，并且。因此，（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承认社会革命在开始后需要时间来发展。正如马拉特斯塔所说：“革命之后，也就是现有权力的失败和起义力量压倒性的胜利之后，渐进主义真正开始起作用。我们将不得不研究所有实际的生活问题：生产、交换、通信手段、无政府主义团体与那些生活在某种权威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共产主义集体与那些过着个人主义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城乡关系……等等。”[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73] 换句话说，“每个社区将在过渡时期，自行决定他们所认为最适合去分配联合劳动成果的方法。”[James Guillaume, "On Building the New Social Order", pp. 356-79,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62]

然而，如果“无政府主义社会”指的是一个已废除国家并开始自下而上转变社会的社会；那么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成功的革命之后，这样的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将是政治上的（废除国家）、经济上的（废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上的（废除等级社会关系）。或者更积极地说，就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自我管理。换句话说，“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必须“一起并且同时完成。”[Bakunin, The Basic Bakunin, p. 106] 这种转型将基于工人阶级在与资本主义和国家斗争中所创造的组织（见[下一节](#)）。因此，一个自由社会的框架，将通过争取自由本身的斗争、通过反对但又在等级化社会之中的阶级斗争而建立。这样的革命将“自下而上”爆发，并将没收资本，摧毁国家（见 H.2.4 节）。正如巴枯宁所说，这样的社会绝不会是“完美”的：

“我并不是说农民[和工人]，自下而上自由组织起来，将神奇地创造出一种理想的组织，完全地符合我们所有的梦想。但我相信，他们所建造的将是生动且充满活力的，比任何现存的组织都要好一千倍，公正一千倍。而且，这个……组织，一方面向革命宣传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又不会因为国家的干预而僵化……将通过自由实验不断发展和完善，尽可能达到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合理期待的程度。”

“随着国家的废除，人民生活自发地自我组织……将恢复为公社。每个公社的发展将以其文明的实际状况为出发点。”[《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 207 页]

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将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共产无政府主义者的所有理想和

希望，取决于客观环境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影响。随着人们开始解放自己，他们将在推动结束特定的等级化社会结构和关系的过程中，经历一种伦理和心理的转变。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需要变得“完美”，也不意味着一个完美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会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相反，这意味着，虽然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即没有国家或私有财产的社会）将通过革命而建立，但它最初将以其来源社会的特点为标志，并且需要一段自我活动的时期，期间个体将重塑并改变自己，同时也重塑和改变周围的世界。因此，马拉特斯塔说：

“即使在一次成功的起义之后，我们能否在一夜之间实现所有愿望，摆脱政府和资本主义的地狱，进入一个人类完全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得到实现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天堂？”

“威权主义者中可能会生根发芽这样一些幻想：他们把群众，看作是掌权者可以通过法令、辅以子弹和手铐，便可以按他们意愿塑造的原材料。但无政府主义者中并未产生这种幻想。我们需要人民的共识，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宣传和榜样来说服……争取更多的人接受我们的思想。”[《同上》，第 82-83 页]

因此，很明显，“一日革命”的理念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拒绝的，它被视为一种有害的谬论。我们清楚地知道，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一致的一点是，国家和资本主义必须尽快被削弱。确实，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无法阻止新国家的产生，或旧国家的存续。这一切取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民众中的支持程度，以及人们愿意采取这些思想的程度。然而，毫无疑问，为了让社会反抗真正成为安那其式的，就必须摧毁国家和资本主义，且不能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压迫和剥削形式。而在这种摧毁之后，我们多快能够迈向完全的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取决于革命所面临的条件以及参与革命的人民的思想和愿望。

因此，一个废除了国家的社会向自由共产主义迈进的程度，取决于客观条件以及自由人民的需求。巴枯宁和其他集体主义者怀疑革命后立即引入共产主义体制的可能性。而对于克鲁泡特金和许多其他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而言，共产无政府主义可以并且必须尽可能快地、尽可能早地引入，以确保革命的成功。我们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如个人主义者和互助主义者，并不支持革命的观点，而是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替代方案应该在资本主义中逐渐成长，并最终取而代之。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一致认为，无法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无政府主义社会，因为假设如此，就意味着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易受影响的民众。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只能自下而上地创造，由那些希望并理解它的人、通过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实现。克鲁泡特金认为：“共产主义组织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工作，是一种自然的成长，是广大群众的建设性天才的产物。共产主义不能自上而下地强加；如果没有所有人的持续和日常合作，它甚至连几个月的时间都无法存活。它必须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第 140 页] 俄罗斯革命的结果早该扫清任何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幻想。每次革命的教训是，人民

在解放自己和转变社会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总是比建立权威的错误要小；因为权威通过摧毁犯错的自由（进而摧毁自由本身）来消除这些“意识形态错误”。自由是社会主义能够建立的唯一真正基础（“通过自由的经验，是通向真理和最佳解决方案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犯错的自由，就没有自由。”[马拉特斯塔，《同上》，第 72 页]）。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马拉特斯塔的观点：

“要大规模组织一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所有经济生活，如生产、交换和消费方式；而这一切只能逐步实现：随着客观条件的允许，并在大众理解能够获得的利益、并能够为而自己行动。”[《同上》，第 36 页]

这意味着，虽然自由社会所需的条件将通过社会革命广泛地创造出来，但想象一切马上就会完美，就是空想主义的。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飞跃是可能的——相反，他们认为，革命通过废除国家和资本主义，创造了向无政府主义社会演变的条件。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认为：“此外，你们不能把社会革命与无政府状态混为一谈。革命，在某些阶段时，是暴力的动荡；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自由与和平的社会状态。革命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手段，但它本身不是无政府主义。它是为无政府主义铺路，建立使自由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然而，“为了实现其目标，革命必须充满并由无政府主义精神和思想所引导。目的决定手段……社会革命必须在方法和目标上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231 页]

这意味着，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承认过渡社会的可能性，但他们极其拒绝将过渡国家的概念与前者混为一谈（并且，正如从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后者也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只能通过无政府主义的手段来实现。因此，法国工团主义者费尔南·佩卢蒂埃（Fernand Pelloutier）有如下评论：

“没有人相信或期望即将到来的革命……会实现纯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它无疑会在无政府主义教育工作完成之前，爆发……[因此]，虽然我们宣扬完美的共产主义，但这并不是因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会成为未来的社会形式：而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教育……以便，当燎原之日到来时，他们能够获得最大的解放。但我们必须忍受过渡国家成为集体主义者（也就是国有社会主义者/国家资本主义者）的牢笼吗？难道不可能废除所有政治制度，而仅限于生产和消费需要的自由意志组织吗？”[《无神无主人》，第 2 卷，第 55 页]

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或群众运动将需要自我防卫，抵御国家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尝试，防止他们打败它。每个人民运动、起义或革命，都必须面对来自维持现状支持者的反扑。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或群众运动将面临（并且确实已经面临）这样的反革命运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摧毁，必须等到反动势力被打败之后才可以进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社会革命和自由社会只能通过反国家的手段来捍卫（有关这一重要问题的更多讨论，请参见 J.7.6 节）。

因此，考虑到一场摧毁国家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由此产生的经济体系的类型和性质将取决于当地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的意识水平。个人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

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将决定未来的发展。显然，任何“过渡期”都是从**此时此刻**开始的，因为这有助于决定未来。因此，尽管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拒绝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改革消除”的观点，但我们同意个人主义和互助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即无政府主义者必须今天，就积极参与在当前社会中构建未来社会的思想、理想和新的解放性制度。等待“辉煌的一天”即全面革命的概念，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就像我们期待在成功革命后的第二天出现一个完美的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观点一样。这两种立场都不反映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社会变革的理念。

1.2.3 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框架如何构建？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抽象地将自由社会与当前社会进行比较。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现有社会与可能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初步框架是在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下，由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抵抗等级制度时创造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

“要进行革命……并不是仅仅有（人民）起义就足够……在起义之后，必须（在构成社会的）制度中出现一些新的东西，这些新东西将允许新的生活形式得以制定并建立。”[《伟大的法国革命》，第1卷，第200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些新的制度与工人阶级抵抗等级制度、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需求紧密相关，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工人阶级抵抗权威、压迫和剥削的尝试。因此，工人阶级在等级化社会中保护和增强他们自由的斗争，将成为一个**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的基础。这一基本洞察，使得像巴枯宁和蒲鲁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能够预测阶级斗争中的未来发展，比如工人委员会（例如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工人委员会）。正如奥斯卡·安维勒（Oskar Anweiler）在他关于俄国苏维埃（工人委员会）的权威著作中指出的：

“蒲鲁东的观点常常直接与俄国的工人委员会联系在一起……巴枯宁……比蒲鲁东更进一步，将无政府主义原则直接与革命行动联系起来，从而得出一些关于革命过程的独特见解，这些见解有助于理解俄国后来的事件……”

“在1863年，蒲鲁东宣布……‘我所有的经济思想，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农业-工业联合会。我的所有政治思想可以归结为类似的公式：政治联合或去中心化。’……蒲鲁东关于以生产者公司（即合作社联合体）为基础的自治国家（原文如此）的构想，肯定与‘生产者民主’的思想相关，这一思想出现在工厂苏维埃中。以此为基础，蒲鲁东可以被视为工人委员会的意识形态先驱……”

“巴枯宁……提议成立革命委员会，由来自街垒、街道和城市各区的代表组成。给予他们具有约束力的授权，向群众负责，并且可以被召回。这些革命代表应当形成‘街垒联合会’，组织革命公社，并立即与其他反抗中心联合……”

“巴枯宁提议成立革命委员会来选举公社委员会，并提出一种社会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通过自下而上的自由联合，工人们在工业和农业中的联合——首先在社区内，然后通过社区联合成地区，再由地区联合成国度，最后联合成国际兄弟会。’这些提案与后来的俄国工人委员会体系的结构惊人地相似……”

“巴枯宁关于革命自发发展和群众基本组织能力的思想，无疑在随后的苏维埃运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回响……因为巴枯宁……始终非常贴近社会斗争的现实，他能够预见革命的具体方面。尽管俄国革命期间的工人委员会运动并非巴枯宁理论的直接结果，但它在形式和进程上常常与巴枯宁的革命理念和预测相吻合。”[《苏维埃》，第 8-11 页]

“早在 1860 年代和 1870 年代，”保罗·阿弗里奇（Paul Avrich）还指出，“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追随者在第一国际中就提出了成立工人委员会的倡议，既作为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武器，又作为未来自由社会的结构基础。”[《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 73 页]

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是当前反对支配、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一部分（即，阶级斗争，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尽管我们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者使用这个术语时，涵盖的是所有反对支配的斗争）。“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认为，“不仅仅是对遥远未来的洞察。无论个人的行动领域如何，他（或她）都可以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行动，或者采取相反的路线。”它“诞生于人民之间——在真实生活的斗争中”，并且“源自人民的建设性、创造性活动。”[《无政府主义》，第 75 页，第 150 页和第 149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通过神圣启示来实现的、未来的理论。它是我们生活事务中的一种活跃力量，不断创造新的条件。”它“代表反抗的精神”，因此“在工厂中对权威的直接行动，针对法律权威的直接行动，针对我们道德规范中侵入性、干涉性权威的直接行动——是无政府主义的逻辑的、一致的方法。”[埃玛·戈尔德曼，《无政府主义与其他文章》，第 63 页和第 66 页]

无政府主义汲取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自主自发行动，并将其融入其政治理论和自由社会的愿景中。反对等级制度的斗争不仅教会我们如何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还让我们一瞥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模样，它的初步框架可能是什么，以及这种社会得以成功运作所需的自我管理经验。

因此，显然，无政府主义者早已清晰地看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模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知道这种社会将从何而来（正如我们在 H.1.4 节中证明的那样，列宁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明确的想法，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替代（国家）”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此，简要总结一下无政府主义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很有用的。

例如，蒲鲁东看到了法国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自我活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尽管他认为这种活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但像后来的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无政府状态的种子“从人民的内部，从劳动的深处，孕育出更大的权威，一种更强大的事实：它将包围资本和国家并征服它们”，因为“改变权力的持有者或在其运作中引入某种变化，是毫无意义的：必须找到一种农业和工业结合体。通过这种方式，今天主宰社会的权力将成为它的奴隶。”[《经济矛盾体系》，第 399 页和第 398 页]工人应当效仿那些已经创建合作社的人：

“此刻，工人的联合会不正是社会革命的摇篮吗……？它们难道不总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公开学校吗？在那里，工人学习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在那里，他完全通过自己的经验，既无老师也无书籍地，学习……工业组织的规律……”[《革命的总思想》，第 78 页]

因此，尝试建立工人协会的“评判标准，不应是它们取得的更多或更少成功的结果，而应仅根据它们默默地主张和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倾向。”它们“工作的意义不在于它们狭隘的工会利益，而在于它们否定了资本家、放贷人和政府的统治。”它们“应当接管各个重要的行业部门，这些是它们的自然遗产。”[Op. Cit., 第 98-99 页]

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 and 自我组织，将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的理想，在巴枯宁的理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与蒲鲁东不同，巴枯宁强调革命活动，因此他认为激进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本身为自由社会提供了基本框架。正如他所说，“工会部门的组织及其在劳动议会中的代表……自身蕴含着替代旧社会的新社会的生动种子。它们不仅在创造思想，也在创造未来本身的事实。”[《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 255 页]

阶级斗争的需求将创造新社会的框架，即工人委员会的联合体，因为“罢工已经表明了某种集体力量，工人之间已经有某种共识……每一次罢工都成为形成新团体的起点。”[《巴枯宁文选》，第 149-150 页]这一前革命的发展将在革命本身的推动下加速：

“革命必须从一开始就彻底摧毁国家……这种摧毁的自然和必要后果将是……（其中包括）军队、法官、官僚机构、警察和神职人员的解散……所有生产资本和生产手段的没收，归工人协会所有，由它们来加以利用……所有工人协会的联合联盟……将构成公社……公社委员会（将）由……代表组成……赋予绝对的、但可追责和可撤换的委任权……所有省份、城市和协会……通过首先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将）组成反叛协会、城市和省份的联合……并组织一支能够打败反动派的革命力量……（并进行）自卫……革命必须由人民创造，至高无上的控制必须始终属于组织成自由农业和工业协会的人民……通过革命的代表制自下而上地组织。”[《米哈伊尔·巴枯宁：精选文集》，第 170-172 页]

像巴枯宁一样，克鲁泡特金也强调“革命改变了参与其中的人们”。正如他在其经典著作《法国大革命》中的论述，“革命逐渐地通过革命本身实现了对人

民的教育。”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是创建新的组织，使广泛的人民能够参与革命的决策。他提出“人民公社”，并认为“革命开始时创造了公社……通过这一制度，它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他强调，正是“通过（公社的）‘区会’……群众不再依赖国家代表的命令，开始习惯自己行动，实践后来被描述为直接自治的概念。”这样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孤立，因为“虽然‘区会’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们也“寻求统一行动，但不是服从中央委员会，而是通过联合会同盟。”公社“因此是自下而上建立的，通过区组织的联合体；它以革命的方式，在人民的倡议下涌现出来。”因此，阶级斗争的过程，即反抗现存体制的需求，创造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框架，因为“巴黎的区会，奠定了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难怪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早在 1789 年就已经存在，它们的起源，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源于伟大的法国革命的实践”，并且“自由意志主义者今天无疑也会这样做。”[《法国大革命》，第 1 卷，第 261 页，第 200 页，第 203 页，第 206 页，第 204 页，第 206 页]

类似地，正如我们在 H.2.6 节中提到的，他在《互助论》中论述了，罢工和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互助的一种表现。克鲁泡特金在其他地方指出，“劳工联合体”就像法国革命中的“区会”一样，是历史上“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民众潮流”之一，体现了“人民反抗少数人日益增长的权力。”[《无政府主义》，第 159 页]对于克鲁泡特金来说，就像巴枯宁一样，（认为）自由意志工会是“与资本主义进行直接斗争的自然工具，也是未来社会秩序构建的组成部分。”[保罗·阿弗里奇引述，《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第 81 页]

如可以看到的，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都指出，由工人阶级自主创建和管理的组织形式是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框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指出了激进的、基于直接行动的工会，而蒲鲁东则指向工人在合作生产和互助信用方面的实验。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遵循了他们的思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指出发展中的工人运动作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框架，为工人协会的自由联合会提供基础，这些工人协会将构成公社。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如俄罗斯的马哈诺、阿西诺夫、沃利涅和马赫诺，则认为 1905 年和 1917 年自发创建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是自由社会的基础，是巴枯宁工人协会联邦化的另一个例证。

因此，对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结构框架是由阶级斗争创造的，是由工人阶级抵抗压迫、剥削和等级制度的需要所推动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在革命中，新的生活形式总是在旧形式的废墟上萌芽……我们无法为未来作出规定。我们能做的，只有模糊地猜测其基本趋势，并为其清开道路。”[《进化与环境》，第 101-102 页] 这些基本趋势是在实践中通过阶级斗争的需要发现的。在资本主义下，互助与团结的实践是生存所必需的（正如在任何其他恶劣环境中一样），这促使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联合起来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因此，像无政府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合作一样，其组织框架也将由反抗资本主义下的压迫和剥削的需要所催生。抵抗的过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组织，这反过来可以成为自由社会的框架，因为斗争的需要推动了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形式，如自下而上的决策、自治、联邦主义、可随时罢免的代表等。

例如，罢工大会将是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斗争中的基本决策平台。

它将组建一个罢工委员会来执行其决策，并派遣代表扩展罢工。这些代表激发了其他的罢工，要求一个新的组织来协调斗争。最终，来自所有罢工的代表会面并组成一个联合会（工人委员会）。罢工者决定占领工作场所，罢工大会接管生产资料。罢工委员会成为工厂委员会的基础；工厂委员会基于工人自我管理，通过工作场所大会（前罢工大会）来管理工作场所。罢工代表的联合会成为地方社区委员会，用自我管理的工人协会联合会取代现有国家。通过这种方式，阶级斗争创造了自由社会的框架。

显然，这意味着任何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构想，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自由社会的实际框架将是实际斗争的产物。这意味着自由社会的形式将由社会变革的过程及其所创造的机构来塑造。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值得反复强调。

因此，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正在斗争中的人民也创造了他们管理社会的手段。通过组织和管理他们的斗争，他们变得习惯于自我管理和自我活动，进而创造出自由社会的可能性以及其中存在的各种组织。无政府状态不是跳入黑暗，而是社会中为自由而斗争的自然进程。自由社会的轮廓将通过创建它的过程来塑造，因此，不会是一个强加于社会的人工构造。相反，它将由社会本身自下而上创造的，当工人阶级开始突破等级制度时。阶级斗争因此不仅改变了参与者本身，也改变了社会，并且创造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所需的组织结构和人民。

这显然表明，无政府主义者所支持的手段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影响着所创造的结果。换句话说，手段影响结果，因此我们的手段必须反映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并赋予使用它们的人以力量。由于当前的社会状态是基于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异化，因此在追求自由社会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任何战术，都必须建立在抵抗和摧毁这些恶劣现象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那些能够增强被压迫人民的力量、自信、自治、主动性、参与性和自我活动的战术和组织。正如我们在第J章（“无政府主义者都做些什么？”）中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支持直接行动、团结和自我管理的组织，而这些组织是自下而上建立并运行的。只有通过自己亲自打响战斗，依靠我们自己和我们自身的能力与力量，在我们自己创造并管理的组织中——我们才能获得改变社会、使其变得更好的所需的力量、自信和经验，并且希望能够在当前的社会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不言而喻，一个革命运动在其开始时，永远不会是纯粹无政府主义的：

“所有发生过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或多或少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这是完全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工人阶级不是在一个充满愿望的世界中行动，而是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他们每天都受到敌对力量的身体和心理打击……工人阶级，不断地感受到资本主义体制和中间群体带来的所有实际条件的影响……因此，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代社会各种条件和特征的烙印。这场斗争不可能一开始就以完备的无政府主义形式诞生，无法满足所有思想要求……当群众参与大规模斗争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从一个错误开始，并容忍矛盾和偏离；只有通过这场斗争的过程，他们才会将努力指向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方向。”[彼得·阿西诺夫，《马赫诺主义运动史》，第239-240页]

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是“帮助群众在斗争和新社会建设中走上正确的道路”，“支持他们首次建设性努力，理智地支持他们。”然而，工人阶级“一旦掌握了斗争并开始进行社会建设，就不再把创造性工作的主动权交给任何人。工人阶级将通过自己的思想来指引自己；它将根据自己的计划来创造自己的社会。”[阿西诺夫，《同上》，第 240-241 页] 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能做的，只是通过成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辩论我们的观点、并争取人们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从而帮助这个过程（更多细节请见 J.3 节）。因此，斗争和辩论的过程将，或许，最终将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斗争，转变为一场为了无政府主义而斗争的运动。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寻求保留并扩展每场斗争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元素，并通过讨论和辩论，作为这些斗争的成员，帮助它们成为自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只有自由社会的初步框架是在阶级斗争中创造的。随着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发展，它将开始以我们无法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人们表达自由和掌控自己生活的形式，必然会随着这些需求和要求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正如巴枯宁所论述的：

“即使是最理性和最深刻的科学，也无法预见未来社会生活的形式。它只能确定一些否定条件，这些条件从对现存社会的严格批判中逻辑地得出。因此，通过这种批判，社会和经济科学否定了继承制的个人财产，进而采取了集体财产这一抽象的、可以说是否定的立场，作为未来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同样，它也否定了国家或国家主义观念，即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因此，它采取了相反的或否定的立场：无政府状态，意味着所有社区单位和部分的自由独立组织、以及它们从下而上的自愿联合，而不是任何权威命令；即使是民选的，也不是任何科学理论的指令，而是生命本身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的自然发展。

“因此，没有任何学者可以教导人民，甚至连自己也无法定义，社会革命后，人民将如何以及必须如何生活。这首先将由每个民族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其次将由在其中最为强烈表现和运作的愿望来决定。”[《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第 198-199 页]

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例如，罢工/工厂大会及其委员会/理事会，将是最初组织生产的框架，但这个框架将随着生产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实际创造的结构将必然随着工业从下而上的转型而发生变化，以满足社会和生产者的真实需求，因为资本主义下工作和工业的结构与性质带有其经济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烙印（“一种激进的社会生态学，不仅提出了农业与工业合并等传统问题，还质疑工业本身的结构。”[穆雷·布克钦，《自由的生态学》，第 408 页]）。因此，在工人自我管理下，工业、工作以及整个生产结构和组织，将以我们今天只能猜测的方式发生转变。我们可以指引出大致方向（即自我管理、生态平衡、去中心化、联邦化、赋权、创造性等），但也只是仅此而已。同样，随着城市和城镇转变为生态整合的公社，最初的社区大会及其联合会将随着我们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转型。它们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我们无法预测，但其基本原则如随时罢免、代表制而非代理制、自下而上的决策等——将保持不变。

因此，虽然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当下孕育着的未来”，即看到自由社会的

初步框架，但我们认识到这样的社会将不断演变和变化。然而，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不会改变。因此，基于这些原则，提出一个总结性描述，去阐明这样的社会如何运作，也是有意义的。

I.3 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结构可能是什么样的？

在这里，我们将探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框架。我们强调是“框架（**frameworks**，复数）”而非“框架（**framework**，单数）”，因为任何无政府主义社会很可能在不同区域看到多种经济体制的共存，这取决于那些地区人民的需求。迭戈·阿巴德·德·圣地亚哥（Diego Abad de Santillan）曾指出：“在每个地方，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或互助主义的程度将取决于当时的条件。为什么要规定规则呢？我们将自由作为旗帜的人，不能却在经济上否定它。因此，必须有自由的实验，自由的倡议和建议展示，以及组织的自由。”因此，无政府主义“可以在多种经济安排中实现，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蒲鲁东提倡互助主义；巴枯宁提倡集体主义；克鲁泡特金提倡共产主义。马莱塔斯塔曾设想混合协议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最初的阶段。”[《革命之后》，第 97 页和第 96 页]

在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并讨论无政府主义经济思想的四大主要流派：个人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至于哪种学派最能实现个人自由与美好生活，这取决于读者自己的评判。正如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约瑟夫·拉巴迪（Joseph LaBadie）明智地指出的：“无政府主义不会对他们施加任何明确的规则，规定他们必须做什么；而是为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实践自己的想法，以增进自身的幸福。”[*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pp. 260-1] 彼得·克鲁泡特金也曾主张：“没有什么比统一化和不容忍，更违背无政府主义的真正精神了。发展自由意味着发展差异，因此也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的多样性。”经验则是“最好的老师，而必要的经验只能通过完全自由的行动来获得。”[quoted by Ruth Kinna, "Fields of Vision: Kropotkin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pp. 67-86, *SubStance*, Vol. 36, No. 2, p. 81]当然，虽然可能还会存在其他的经济实践，但它们未必是自由意志主义的。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所说：

“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没有人应当希望，或有机会，将他人置于臣服状态，并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那么，显然，只有那些尊重自由、承认每个人对生产资料拥有平等权利，并且能使个人完全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生活方式，才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理念。”[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33]

此外，我们必须牢记，在实践中，经济领域不可能与社会和政治领域完全分离，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互联系。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如米哈伊尔·巴枯宁（Bakunin），认为，自由社会的“政治”机构应当建立在工作场所的协会之上；而克鲁泡特金，则将公社置于其共产无政府主义经济和社会愿景的核心。因此，

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社会形式与经济形式的划分并不明确——而这正符合现实，因为社会本身既不是独立于经济的，也不能被视为次于经济的存在。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努力使社会与经济相融合，使经济嵌入社会之中，以避免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外部性被强加于社会。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不再让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是让社会关系嵌入经济体系之内。”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57] 鉴于这种安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政府主义试图加以扭转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我们在首先讨论经济问题时，并不是在暗示：处理经济支配或剥削，比处理整个支配体系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等级制度、父权制价值观、种族主义等）更重要。我们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论述，仅仅是因为需要逐一展开讨论，而这同样可以从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入手。然而，鲁道夫·洛克正确地指出，经济领域的变革只是社会革命的一个核心方面：

“一个朝着这个方向（即无国家社会）的社会发展，若没有对现存经济制度的根本性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专制与剥削生于同一棵树上，并且彼此不可分割。个人的自由只有建立在全体成员的经济与社会福祉之上，才能得以保障……个人的价值越高，其在社会共同体中的根基就越深，而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其道德力量最丰富的源泉。唯有在自由之中，人才能产生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意识，并尊重他人的权利；唯有在自由之中，最珍贵的社会本能——人对同胞的喜怒哀乐的共鸣，以及由此产生的互助冲动——才能充分发展，而这正是所有社会伦理与社会正义观念的基础。” [Nationalism and Culture, pp. 147-8]

任何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目标，都是最大化自由，并让创造性的劳动得到充分发挥：

“如果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正如我所认为得那样正确——是对创造性劳动或创造性探究的需求，是对自由创造的渴望，而不受强制性制度的专断限制；那么显然，一个体面的社会，就应当最大化这种实现人类基本特性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一个由联邦化、去中心化的自由联合体所构成的体系，囊括了经济和社会机构——这就是我所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而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正适用于一个先进的技术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类不必被迫沦为工具，被迫成为机器中的齿轮。” [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诺姆·乔姆斯基与媒体, p. 31]

因此，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既然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在于反对等级制权威，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反对当前经济的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在经济领域的权威体现于集中化、等级制的工作场所，使得一个精英阶级（资本家）对私有的生产资料实行独裁控制，并将大多数人变成服从命令的雇佣奴隶。相比之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将建立在去中心化、平等的工作场所之上，工人将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中，以民主方式自治其生产活动。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包括去中心化、自我管理、社会化、自由结社和自由联邦制。这些原则决定了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形式和功能。在本节中，我们将仅探讨经济体系。巴枯宁对这种经济模式做出了出色的概述，他写道，在一个

自由社会中，“土地仅属于亲手耕种它的人，即农业公社。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属于工人，即工人协会。”这些协会通常被称为“合作社”和“工团”（参见 [1.3.1 节](#)）。这一点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核心经济概念——“工人自我管理”紧密相关。它指的是由劳动者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土地和工作场所“由工人自己拥有和经营：通过他们自由组织的工业与农业工人联合会”（参见 [1.3.2 节](#)）。对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社会化”是自由社会的必要基础，只有社会化才能确保普遍的自我管理，因为它允许所有人自由地获取生产资料（参见 [1.3.3 节](#)）。因此，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的基础在于“土地、生产工具及所有其他资本”被“转变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仅由工人使用，即由他们的农业和工业协会管理。”[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p. 247, p. 400, p. 427] 伯克曼对此进行了总结：

“革命废除了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私有制，随之而去的是资本主义企业。个人占有权，仅限于你自己使用的物品。因此，你的手表属于你自己，但制表厂属于人民。土地、机器以及所有其他公共设施都将成为集体财产，不得买卖。（在共产无政府主义中，）实际使用将被视为唯一的占有权依据，而不是所有权。例如，煤矿工人的组织将负责管理煤矿，但不是以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作为运营机构。同样，铁路工会将管理铁路，依此类推。集体占有、合作管理，并以社区的利益为核心，将取代个人所有和私人盈利。”[什么是无政府主义？，p. 217]

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由**整个社会**共同所有，每个工作场所由其成员以合作的方式管理。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场所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与其他单位建立联系，以获取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并确保其产品能被需要的人获取。这种联系，将基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协议和自愿联邦制原则（参见 [1.3.4 节](#)）。对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一体系还将通过两个层级的联邦机构或协调委员会进行补充：首先，是特定行业内部的所有企业之间的协调；其次，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各个行业（包括农业）之间的协调（参见 [1.3.5 节](#)）。根据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流派，这些联邦机构可能还包括人民的金融机构。

虽然对于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已足够完善；但大多数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经济联合会应当对整个社会负责（即经济必须实现公社化）。这是因为并非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是工人（例如，年轻人、老年人和病弱者），也并非所有人都隶属于某个工团（例如，自营职业者），但他们同样要承受经济决策的影响，因此也应该拥有发言权。换句话说，在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工人负责日常的生产管理，而决定这些生产活动的社会标准则应由全社会共同制定。无政府主义社会建立在自由获取的基础上，资源由使用者掌控。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参与式的、自我管理的组织，其成员可随时退出，并且所有权力和主动性都来自基层，并最终回归基层。这种社会模式结合了自由结社、联邦主义和自我管理，并以公社化的所有制为基础。自由劳动是其核心，而社会化的存在是为了补充和保护这一核心。这种经济联合会体系，与国家集中管理的国有化或国家控制产业的概念，截然不同。

在社会化的自我管理体系中，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流派对其具体运作方式存在差异。最明显的区别，如 [1.3.6 节](#) 所讨论的，个人主义者认为工作场所之间的竞

争没有问题，而互助主义者虽然认识到竞争的负面影响，但认为其是必要的；相反，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则反对竞争，认为自由社会完全可以摆脱它。此外，社会化不应被误解为强制集体化——一个人和团体可以选择不去加入工团，并尝试不同形式的经济模式（参见 [1.3.7 节](#)）。最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体制适用于所有经济体，无论其规模和发展程度如何，并且主张建立基于适当规模技术的经济体系（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相反的观点——参见 [1.3.8 节](#)）。

无论人们期望哪种形式的无政府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都一致强调去中心化、自由协议和自由结社的重要性。克鲁泡特金对无政府社会的描述，生动展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期望的社会形态：

“在这样的社会中，和谐不是通过服从法律或听从任何权威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各种自由组成的团体——无论是地域性的还是职业性的——基于生产和消费的需要，为满足文明个体无限多样的需求和愿望而达成的自由协议来维持的。

“在这样发展起来的社会里……自愿协会将形成一个交错的网络，其中包含无限多样的团体和各级联合会，这些组织可以是地方的、区域的、全国的，乃至国际的；可以是临时的，也可以是较为持久的，并且涵盖所有可能的领域：生产、消费、交换、交通、卫生、教育、相互保护、领土防御等等；同时，也用于满足日益增长的科学、艺术、文学和社交需求。

“此外，这样的社会并非一成不变。相反——正如在整个有机生命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和谐，（正如人们所主张的那样），将是各种力量 and 影响之间不断调整和平衡的结果；而这种调整将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其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从国家获得特殊保护。” [《无政府主义》，p. 284]

如果这种制度听起来像是“乌托邦”，那么应当牢记，它实际上曾在 1936 年西班牙革命期间被成功实施过，并且运作良好；尽管在当时，面临着持续内战带来的巨大阻碍，以及共和派、斯大林主义者和法西斯势力试图摧毁这一制度的不懈（且最终得逞的）努力（参见 [1.8 节](#) 的简介）。

除了这一实例（以及其他类似的“行动中的安那其”例子）外，也有许多关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书面描述。这些方案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如工人自我管理、合作等，我们在此处及 [1.4 节](#) 中进行了讨论。相关著作包括：汤姆·布朗所著的《工团主义》、G.P. 马克西莫夫所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纲领》、G.D.H. 科尔所著的《行会社会主义的再述》与《产业中的自我管理》、迭戈·阿巴德·德·桑蒂良所著的《革命之后》、亚伯拉罕·吉伦所著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学》与《自由意志经济学原理》、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著的《工人委员会与自我管理社会的经济学》等。此外，罗伯特·亚历山大所著的《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一卷）的第三章，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自由社会的愿景做了简要概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所谓的“参与式经济”（简称 **Parecon**），迈克尔·阿尔伯特与罗宾·哈内尔所著的《参与式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及《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参与式经济》值得阅读，它们对这一方案提供了良好的介绍。

在虚构作品方面，威廉·莫里斯的《来自乌有乡》、厄休拉·勒古恩的杰作《一无所有》、马奇·皮尔西的《时间边缘的女人》以及史蒂夫·卡伦的《最后的资本家》都是值得关注的作品。虽然伊恩·M. 班克斯的“文化”系列小说，描绘了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但由于其技术高度发达，仅能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及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提供一部分的见解（《艺术的本质》和《游戏玩家》对比了“文化”社会与等级制社会，前者中的地球设定在1977年）。

1.3.1 什么是“工团”^①？

在我们的讨论中，“工团”（syndicate）是指一种民主自我管理的生产企业，其资产由工人控制。它也被称为“生产合作社”（producer co-operative），或简称“合作社”（co-operative），或被称为“集体”（collective）、“生产者公社”（producers' commune）、“生产者协会”（association of producers）、“行业工厂”（guild factory）或“行业工作场所”（guild workplace）。这一术语用于描述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状态，即“在土地上、工厂里、矿山中等地工作的男女组成的协会……自行管理生产。” [由克鲁泡特金所著的《进化与环境》，第78页]

这意味着，在劳动是集体性的地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应当是集体的。”詹姆斯·纪尧姆正确地指出：“每一个作坊、每一家工厂都将组织成一个工人协会，工人们可以自由地管理生产，并按照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组织他们的工作，前提是要保障每一位工人的权利，并遵循平等与正义的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土地，因为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耕作土地，以及何种占有形式最为合理”的问题。无论农民“保留他们的土地，并依靠家庭成员继续耕种”，还是“对大片土地进行集体占有，并共同耕作”，都无关紧要，因为“革命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即“土地现在属于耕种它的人，农民不再为一个依靠他们的汗水而生存的寄生剥削者劳动。”任何“曾经受雇的农业工人”都将成为“合作伙伴，共享……他们共同劳动所创造的农产品”，因为“革命将废除农业雇佣奴役和债役制度，农业无产者将成为自由的工人，在和平与富足中生活。”与工业工作场所一样，“内部组织……不必完全相同；组织形式和程序将因参与工人的偏好而大不相同。”例如，“社区的管理可以由个人承担，也可以由一个多成员委员会负责”，但无论如何，它都必须“由所有成员选举产生。” [《关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见《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356-379页，第363页，第359页，第360页，第361页]

必须指出，这一旨在废除资本主义等级制的工作场所，并通过工人联合与产业民主化来终结雇佣劳动的自由意志主义目标，与无政府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因

^① 译注：syndicate：一般译作“辛迪加”，源自法语 syndicat，在现代资本主义语境下指代一种垄断形式。该词在法语中同时也有**工会**的意思，也是其在本文中的含义。所以，有时候“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也音译作“辛迪加主义”、意译作“工会主义”。本文同时采用“**工团**”和“**辛迪加**”的译法，但考虑译文一致性，一般优先选用前者。

此，我们可以看到蒲鲁东在 1840 年就曾主张，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主人的、拥有者的”社会（而不是受雇于财产所有者的工资劳动者或佃农），其中“领导者、指导者、监督者”等职务“由劳动者自己，从劳动者之中选出。”[由蒲鲁东所著的《什么是财产？》，第 167 页、第 137 页]

“互惠与互助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下，”蒲鲁东指出，“即行业中的所有工人，不是为某个企业家工作，接受其支付的工资，并将其劳动成果归其所有；而是彼此为对方工作，从而共同生产一种共享收益的产品。如果将这种互惠原则扩展到每个群体的劳动，并将工人社团视为基本单位，那么你就创造了一种从政治、经济和美学等所有方面来看，都与以往文明截然不同的新文明。”归根结底，这就是：“所有人的联合，所有人的自由。”[引自马丁·布伯所著的《乌托邦之路》，第 29-30 页、第 30 页]

然而，这一理念并非蒲鲁东或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独创。相反，它最初是由工人阶级自己提出的，随后才被蒲鲁东、巴枯宁等人采纳。因此，取代雇佣劳动的联合劳动这一根本性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人阶级自主形成的。在 19 世纪的多个国家，这一思想被广泛提出。例如，在法国，它诞生于 1830 年革命引发的罢工和抗议浪潮之中。同年，巴黎的印刷工人就创办了一份报纸（《**工匠：工人阶级的报刊**》，**L'Artisan: Journal de la classe ouvrière**），其中提出，工人摆脱剥削的唯一方式就是成立合作社。在 1833 年的罢工潮中，这一想法得到了其他技术工人的呼应，许多工人将合作社视为摆脱雇佣劳动的解放手段。事实上，蒲鲁东甚至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期从里昂的工人那里借用了“互助主义”（**Mutualisme**）这一术语，并受到了他们关于合作社信贷、交换和生产的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他，而他的理论同样影响了他们。在美国，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回顾工业革命早期的工人运动，看看 19 世纪 50 年代的工人阶级报刊等，我们会发现其中确实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从未听说过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这完全是自发的。他们认为雇佣劳动与奴役无异，工人本应拥有工厂。”[《无政府主义访谈》] 正如我们在 F.8.6 节中所述，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普遍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在许多方面，工团与资本主义下的合作社类似。实际上，蒲鲁东指出，这些合作社实验就是他所期望的社会形态的例子，他认为“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清算”计划的核心部分。[《革命的一般理念》，第 203 页] 同样，巴枯宁也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坚信，合作社将在未来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涵盖各个劳动和科学领域。”[《巴枯宁基本文集》，第 153 页] 因此，即便是资本主义市场中运作的有限合作社实例，也能展现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基本的经济单元，即工作场所，将是一个由平等个体组成的自由联合体，他们将在平等基础上组织共同的劳动。再次引用巴枯宁的话：“只有联合劳动，也就是基于互惠与合作原则组织的劳动，才能胜任维持……文明社会的任务。”[由巴枯宁所著的《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 341 页]

在这种背景下的合作，意味着相关的政策决策将基于“一成员，一票”的原则，行政人员将由全体工人选举产生，并对整个工作场所负责。经济学家大卫·埃勒曼（David Ellerman）的说到：“每个企业，都应当在法律上重组为所有企业中

工作者的合作伙伴关系。每个企业都应当是一个民主的工人所有的公司。” [由大卫·埃勒曼所著的《民主的工人所有公司》，第 43 页] 无政府主义者毫不意外地拒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国有财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的观点，认为这一想法过于简化且混乱。所有权是一个法律关系，真正的问题是管理。资源的使用者是否管理该资源？如果是，那么我们便拥有一个真正的（即自由意志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有某种形式的阶级社会（例如，在苏联，虽然国家取代了资本家阶级，但工人仍然没有正式控制自己的劳动或劳动成果。）

工作场所的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如某些资本主义辩护者所说，知识和技能将被忽视，所有的决策都将由每个人来做。这显然是一个谬论，因为，例如说工程师，会比那些不是工程师的人对他们的工作有更深入的理解；而在工人自我管理下，他们将直接控制自己的工作：

“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行会民主的本质，尤其是它如何影响在同一个行会中不同类别工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行会包括了所有从事共同服务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显然，在行会成员中会有很大的功能差异、技术技能差异以及行政权力差异。因此，无论是行会整体还是行会工厂，都不能通过大众投票来决定所有问题；也不能让行会民主意味着，在所有问题上，每个成员都要算作一个人，或者多于一个人。对于一些只有少数专家才能理解的技术问题，进行大众投票显然是荒谬的；即使忽略技术层面，仅仅靠持续的群众投票来管理工厂既低效也不愉快。行会中将会有因为其知识而占有特殊位置的技术人员，也会有因技能、能力以及个人资质而拥有特殊权威的管理员。” [由 G.D.H. Cole 所著的《行会社会主义的复兴》，第 50-51 页]

这种将部分决策委托出去的做法，常常使人们质疑，工会是否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等级制度。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工人大会及其理事会是对所有工人开放的，工人们会决定哪些类型的决策可以委托出去，从而确保最终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基层手中。此外，这并不意味着权力会被委托出去。马拉泰斯塔明确指出了行政决策（administrative decisions）与政策决策（policy decisions）之间的区别：

“当然，在每个大型集体事业中，劳动分工、技术管理、行政等都是必要的。但权威主义者粗陋地利用言辞，把这种组织工作所需的真实需求，扭曲为政府的正当理由（*raison d'être*）。我们需要重复的是，政府，是拥有或获取了制定法律并强制他人服从权利与手段的、个体的集合；而管理员、工程师等，则是那些被任命或自愿承担特定工作的责任的人。政府意味着权力的委托，也就是将所有的主动权与主权交给少数人；而行政则意味着工作的委托，也就是任务的分配与接收，是基于自由协议的、服务的自由交换……不要混淆政府职能与行政职能，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今天两者常常被混淆，那也只是因为经济和政治特权的缘故。” [由马拉泰斯塔所著的《无政府状态》，第 41-42 页]

既然权力仍然掌握在工人大会手中，很明显，每个集体事业所需的组织不能与政府等同。此外，必须记住，行政人员是由整个协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的。例如，如果某种类型的委托决策活动被滥用，整个工作团队可以撤销该决策。正因为有这种来自基层的控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可能成为权力源泉（并有

可能对所有工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决策活动,将不会被委托出去,而是保持在工人大会手中。例如,现在在资本主义下由管理者以权威方式行使的权力,如招聘和解雇、引入新生产方法或技术、更改产品线、迁移生产设施、确定生产活动的性质、速度和节奏等——都将保持在工人生产者手中,而不会委托给任何人。

新的工团将由社区内的个人主动创建。这些可能是现有工团中的工人希望扩大生产的倡议,或者是当地社区的成员认为当前工团在特定领域没有提供足够服务的情况。无论哪种情况,工团都将是一个自愿的合作组织,旨在生产有用的商品或服务,并将根据需要自发地出现和消失。因此,无政府社会将看到工团自发地发展,因为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会出现本地和联合体层次上的倡议。

尽管所有形式的无政府主义,都在合作的工作场所中有共同的基础,但它们对工团的运作有不同的看法。在互助主义下,工人将自己组织成工团,并分享其盈亏。这意味着在“劳动者管理型企业中,没有利润,只有收入、需要在成员之间分配。在没有雇员的情况下,劳动者管理型企业没有工资账单,劳动成本不像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那样从利润中扣除。”“劳动者管理型企业不雇佣劳动力。它就是一个工人集体,雇佣资本和必要的原料。”[Christopher Eaton Gunn,《美国的工人自我管理》,第41-42页]通过这种方式,蒲鲁东及其追随者认为,剥削将终结,工人将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值。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人会将所有销售收益用于个人消费(即,没有投资)。它意味着工人控制如何使用销售收入,即如何分配投资和消费:

“如果劳动者占有了全部产品,那么除了占有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财产所产生的负债之外,还必须占有生产的产出。现在的劳动者将不得不支付输入供应商(例如,过去的劳动者)来偿还这些负债。”[Ellerman, 同上,第24页]

在互助主义下,剩余价值(利润)将被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合作社成员,或者根据所做工作的类型差异地分配,各类型工作所占的百分比将通过民主投票决定,遵循“一人一票”的原则。这类工人合作社有一个优点,即防止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因为工人不是为工资而被雇佣,而实际上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这意味着工人控制了他们劳动的成果(使他们创造的附加价值不被特权精英占有),并且控制了工作过程本身(因此他们不再将自己的自由卖给别人)。然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有限形式的合作。非互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充其量只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而最终的目标,则是按需分配。

用于满足需要、而非为了利润/货币的生产,是区分集体、共产无政府主义与蒲鲁东所提倡的竞争性互助主义的关键概念。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我们在[1.1.3节](#)中所指出的,市场的有害影响可能使合作社实际上成为“集体资本家”,并像真正的资本家一样在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尽管合作“在最初……本质上具有互助特征”,但它“常常被描述为‘股份制的个人主义’”,而“像现在这样,它无疑倾向于滋生一种合作利己主义,不仅对整个社区,而且对合作社成员之间也是如此。”[《互助论》,第214页]虽然他是在讨论资本主

义下的合作社，但他的担忧同样适用于一个竞争性的、互助主义体系中的合作工团。这也会导致一种情况，即市场力量确保工人为了在市场上生存而做出不合理的决策（从社会和个人角度来看）。对于互助主义者来说，这种“理性的非理性”是为了确保工人能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且任何试图克服这一问题的做法都充满了对自由的威胁。其他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则不同意，他们认为工作场所之间的合作能够增加自由、而不是减少自由。其次，正如我们在 [1.1.4 节](#) 中讨论的那样，按工作分配并没有考虑工人（以及非工人，如病人、儿童和老人）之间不同的需求。因此，互助主义不能产生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认为的，一个体面的社会——一个人们合作为所有人创造体面生活的社会。

那么，如何进入工团呢？用科尔的话说，行会（即工团）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开放性协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当然，任何人都能以绝对的权利，去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这意味着可能会有（例如）培训要求，显然，“除非一个行会需要新的成员来参与工作，不然一个人显然不能进入其中。（工人）有选择的自由，但前提是存在职位的空缺”[《行会社会主义重述》，第 75 页] 正如大卫·艾勒曼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要记住，在自我管理的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将不复存在”，因为劳动力“总是剩余的索赔者。”这意味着资本不会像在资本主义下那样雇佣劳动力，而是工人将寻找可以加入的协会。艾勒曼继续说：“会有一个工作市场，意味着人们在寻找他们可以加入的企业。但它不会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不会是指在雇佣合同中出售劳动的市场。”[同上，第 91 页]

因此，所有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学派都基于特定工团的使用权，而所有权则是社会化的，而不是局限于工团中的工人。这将确保生产资料的自由获取，因为新成员加入工团后将享有与现有成员相同的权利与权力。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新成员将成为现有成员的雇佣奴隶，而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才主张社会化的（参见 [1.3.3 节](#)）。通过社会化，自由准入得以保证；因此所有工人处于相同的地位，从而确保自我管理，进而避免工作场所等级制度的复归。

显然，像在任何社会中一样，个人可能无法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尽管鉴于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性质，他们将有空闲时间将其作为爱好进行追求）。然而，我们可以设想，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关注确保工作的公平分配，因此如果某个工作岗位很受欢迎，会尝试安排工作共享（参见 [1.4.13 节](#)，关于谁来做不愉快工作的讨论，以及更多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工作分配的内容）。

当然，也可能存在某个工团或行会试图出于某种隐秘动机，限制其成员的情况，例如利用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垄断权进行剥削。然而，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个人将自由地形成自己的工团，这将确保此类行为是自我破坏的。此外，在非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体系中，工团将成为一个邦联的一部分（参见 [1.3.4 节](#)）。跨工团的大会，有责任确保工团的会员资格和就业不以任何反社会的方式受到限制。如果某个个人或一组个人，认为自己被不公平地排除在工团之外，大会将组织对该案件的调查。通过这种方式，任何限制入会的企图将被减少（假设它们最初就存在）。当然，个人可以自由地组建新的工团，或如果愿意，也可以离开邦联。

伴随着加入工团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是否能为寻求工作的人提供足够的岗位（这可以被称为“失业”问题）。归根结底，工作场所总是有一个客观的岗位数量：如果没有机器或材料供他们工作，那么让人们加入工团就没有意义！一个自我管理的经济体，是否能确保为那些寻求工作的人提供足够的岗位呢？

或许不足为奇，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且同样不奇怪得，这一结论同样并非基于真实的合作社实证证据，而是基于 1958 年开发的一个抽象模型。该模型假设，劳动管理的（“伊利里亚式”，“*Illyrian*”）企业会寻求最大化每个工人的净收入，而不是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最大化净利润。这导致了与资本主义企业相比的各种反常结果。这样，基于合作社的经济将变得极不稳定和低效，还会导致当价格上涨时，合作社裁员，因为这样能最大化每个（剩余）工人的收入。因此，合作社系统最终会“使用更少的劳动，生产比资本主义对手更少的产出。” [Benjamin Ward, "The Firm in Illyria: Market Syndicalism", pp. 566-589,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8, No. 4, p. 580]

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讨喜，因为不同于理论，实际资本主义的特点却是广泛的失业（正如 C.1.5 节所指出的，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失业是确保老板对其工资奴隶控制的必要手段）。同样，引用一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的话，“这种理论预测的，与观察到的事实毫无关系。” [Branko Horvat, "The Theory of the Worker-Managed Firm Revisited", pp. 9-2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10, no. 1, p. 9] 正如 David Ellerman 总结的：

“顺带一提，关于所谓的‘伊利里亚式公司’有一整套学术文献……这个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它假设企业会在能够增加剩余成员净收入时将成员排除。由此产生的短期反常现象，使得这个模型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中受到青睐。然而，伊利里亚模型一直是现代经济学中许多学术玩具的一部分。预测的短期行为在南斯拉夫或其他地方并未出现，而像蒙德拉贡合作社这样的工人管理企业，则将成员资格视为短期的固定因素……因此，我们将继续以应有的忽视态度去对待伊利里亚模型。” [Op. Cit., p. 150]

西班牙革命期间自我管理的集体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内战引发的严峻经济条件下，集体通过公平分配工作以避免裁员（例如，某个集体“采取了三天工作周的方式，将可用的工作分配给所有在工厂工作的人员——从而避免了失业——并继续支付每个人的基本工资” [Martha A. Ackelsberg, *Free Women of Spain*, p. 101]）。

因此，在评估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合作社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诉诸实证现实和常识”。“实证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即该模型是有缺陷的。“没有证据表明工人在经济好时会裁员，无论是在蒙德拉贡还是在南斯拉夫。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裁员也是罕见的。”不出所料，“在短期内，工人管理的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反应是相似的”，工人会根据需求的增加加入集体。[David Schweickart, *Against Capitalism*, p. 91, p. 92 and p. 93] 这一结论得到了经济学家 Geoffrey M. Hodgson 的认同：

“我们关于现实世界工人合作社行为的大部分证据表明，它们对市场价格变化的反应与资本主义企业类似……因此，模型中的基本假设被证据所质疑。”
[Economics and Utopia, pp. 223-4]

正如布兰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所观察到的，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提出了具体的预测，但“仅仅因为在现实经济中从未观察到类似情况，便没有影响到这些理论的运作。”最多，他们会说，“自我管理的企业可能不会按照理论预测的方式行事，但这是因为它非理性的行为。如果出现问题，那就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有趣的是，如果假设资本主义企业“最大化利润率，即每单位投资的利润”，而不是总利润，那么新古典经济学“也会产生同样荒谬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短期与长期的区分被提出的原因，短期内资本量是固定的。如果这一点应用于合作社，假设“短期内，劳动力是固定的”，那么所谓的劳动管理工作场所的问题就会消失。不言而喻，现实中的合作社是基于劳动力固定的假设运作的，因为“工人不再被雇佣”，这意味着工人经理“在业务萧条时不会解雇同事；他们会减少工作时间或负责盘点工作。当需求暂时增加时，他们会加班或外包工作。” [Op. Cit., pp. 11-13]

总之，劳动者管理企业的新古典理论与现实中的合作社的关系，就像新古典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经济学家通常接受新古典的合作社理论（无疑部分原因是。它确认了他们对所有社会主义形式的反感）。即使是像大卫·L·普里奇特科（David L. Prychitko）这样对自我管理持支持态度的人，也接受这一理论，只是批评它“将企业简化为一个短期目标函数”，并且“只要允许市场进入，劳动管理市场就消除了任何可能的不稳定问题。”
[Markets, Planning and Democracy, p. 81] 虽然这批评是正确的，但完全忽视了新古典理论背后的假设局限性。

总结来说，工团是由工人自愿组成的集体，负责管理他们的工作场所和自身的工作。在工团内部，决定如何发展和改变工作场所的决策掌握在工作的人手中。此外，这意味着每个工作部门管理自己的活动和部门，所有被安排到行政任务（即“管理”）的工人，都必须接受那些受其决策影响的人的选举和罢免。工人的自我管理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最后，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正如在 G.1.3 节中所提到的，一些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尽管并非全部，都不反对（非剥削性的）雇佣劳动，因此他们并没有将合作社置于自己思想的核心。这一立场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中属于少数派，因为它不符合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也不太可能结束劳动剥削（见 G.4.1 节），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个人主义不符合无政府主义（见 G.4.2 节）。其次，重要的是要指出，那些不愿加入工团的人将能够自主工作。在[任何](#)形式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都没有“强制集体化”；因为强迫人们违背其意愿，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兼容的。那些希望自雇的人将能够自由使用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源；前提是，他们既不试图垄断比他们自己和家庭能使用的更多的资源，也不试图雇佣他人为其工作（见 [1.3.7 节](#)）。

I.3.2 什么是工人自我管理？

简单来说，工人自我管理（workers' self-management），有时也被称为“工人自治”、“工人控制”（workers' control），意味着所有受决策影响的工人，都在决策过程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遵循“一个工人，一票”的原则。因此，“革命已使我们走上了工业民主的道路。” [Selected Writings of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63] 也就是说，工人“理应成为工业的真正管理者。” [Peter Kropotkin,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Tomorrow*, p. 157] 这对确保“一个平等的社会至关重要，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再被迫向那些选择雇佣他们的人出卖自己的双手和大脑……相反，他们能够在一个有机体中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进行生产，这一有机体能够将所有人的努力结合起来，以创造尽可能高的社会福祉，同时又为每个人的个体自主性留下充分的自由空间。” [Kropotkin, Kropotki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pp. 113-4] 正如乔姆斯基所说：

“同情、团结、友谊同样是人的需求。这些需求的驱动力不亚于增加个人物质占有或改善工作条件的愿望。除此之外，我毫不怀疑，人类有一个根本性的需求，那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机构的民主控制。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对工业民主的诉求，应成为任何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复兴左翼运动的核心目标。” [Radical Priorities, p. 191]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使用“工人控制”这一术语时，我们需要谨慎，因为其他人也在使用这一术语，并赋予其与无政府主义者原意完全不同的含义。就像“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和“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这两个词一样，“工人控制”也被其他人挪用，用来描述一些并不真正具有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方案。

最早这样做的是列宁主义者。从列宁开始，他们就使用“工人控制”一词来描述一种局势，即工人对资本家或所谓的“工人国家”所任命的管理者，有受限的监督权。这与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此外，这种有限的试验也从未长期持续下去（见 H.3.14 节）。更近些时候，资本家也开始使用“工人控制”一词，以指代某些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工人被赋予对工作场所管理的某些发言权，但工资奴役制度仍然维持不变（即资本家仍然掌握所有权、权力及最终控制权）。因此，在资本家的操弄下，“工人控制”如今被称为“参与”、“共同决定”、“共识”、“赋权”、“日本式管理”等等。正如萨姆·多尔戈夫所指出的：“对于那些职能是解决发达工业资本主义下、工作场所中无聊和异化问题的人来说，‘工人控制’，被视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解决方案——一个工人被给予一定程度影响力的方案，一个工人拥有严格限制的决策权范围的方案，一个在工作条件控制方面至多拥有次要发言权的方案。资本家所批准的有限形式的‘工人控制’，被认为是对工人日益增长的非经济诉求的回应。”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81]

“质量小组”（quality circles）这一新的管理潮流，便是资本家所构想的“工人控制”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些会议上，工人被鼓励提出自己的想法，以改进公司的产品并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当涉及到决定生产何种产品、在哪里生产、

（尤其是）如何分配销售收入等问题时，资本家和管理者却并不会征求工人的意见，也不会听取他们的“建议”。所谓的“民主化”、“赋权”和“参与”就此作罢！实际上，资本主义式的“工人控制”不过是另一种阴险的手段，旨在让工人更愿意充当自己被剥削的“合作伙伴”。不言而喻，这些方案都是虚假的，因为它们从未真正将权力交到工人手中。归根结底，所有者及其管理者始终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因此等级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利润依旧是从工人身上榨取的。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更倾向于使用“工人自我管理”这一术语，这一概念指的是工人通过集体化和联邦化来行使权力。这意味着“从私人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而这又“要求工作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阿贝尔·帕斯所著的《西班牙内战》，p. 55] 这种意义上的自治“不是工人与资本家老板之间的一种新的调解形式，而是指工人推翻管理者、亲自承担自身管理以及工作场所生产管理的过程。自治意味着所有工人……组织成为工人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或农业工会），这些机构将接管过去由所有者和管理者所做出的所有决定。”[多尔戈夫，同上，p. 81] 自我管理（自治），意味着终结职场中的等级制度和专制社会关系，以自由协议、集体决策、直接民主、社会平等及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关系，取而代之。

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定义，工人自我管理，意味着工人对生产、分配和投资的所有方面拥有集体所有权、控制权和决策权。这一目标通过参与式民主的工人大会、委员会和联邦来实现，同时涵盖农业与工业领域。这些机构将承担过去由资本家、管理者、高管和金融家所履行的所有职能——但前提是，这些职能与生产活动本身相关，而非为了最大化少数人的利润和权力（在后者的情况下，它们会随着等级制管理的出现消失）。此外，这些工作场所大会还将由人民金融机构或工团联合会补充，承担过去资本家、管理者和金融家所行使的投资资金或资源分配职能。

工人自我管理的核心，在于全体劳动人口的定期大会，由每个工业或农业工团召开。这些大会是决策的最终权威，决定工作场所内部的政策以及与其他工团的关系。大会选举出职场委员会，负责执行大会决议，并处理日常管理事务。这些委员会对全体工人负责，其成员须接受定期选举和即时罢免。此外，也可能实行委员会成员的轮换机制，以确保无人能垄断管理职位。此外，较小规模的委员会和大会也将根据具体情况，在不同部门、单位和工作小组的内部组织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工人们将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体，共同管理他们的集体事务。他们将在没有外部权威强加的情况下，自愿联合进行合作。他们的集体决策将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由自身力量加以维护。这意味着自治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组织：它使每个人都能最充分地享受自己的自由，但又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他人之上，也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支配他人，除非是通过他（或她）所具备的智力和道德品质所产生的自然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绝不能被强制为一种权利，也不能依赖于任何政治机构。”[巴枯宁所著的《巴枯宁的政治哲学》，p. 271] 在这种体制下，只有说服你的工人同伴接受你的观点，你的想法才能成为工团的共同决策。没有人能够仅凭其职位或所从事的工作，就可以强加自己的意志。

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纯粹的行政性事务和决策可以由选举产生的个人来承担,这样可以让工人和大会专注于重要的活动和决策,而不会被琐碎细节所困扰。正如巴枯宁所言:

“行政管理工作难道不像体力劳动一样,是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更为重要吗?当然,如果没有高效而智慧的管理,生产将会受到严重削弱,甚至完全停滞。但从基本正义和效率的角度来看,生产管理不应被一人或少数人所垄断。此外,管理者并无权获得更高的报酬。工人合作社已经证明,工人们可以从自己的队伍中选出管理者,并支付相同的工资,从而高效地管理和运营行业。行政管理的垄断,不仅不会促进生产的效率,反而只是增强了所有者及其管理者的权力和特权。” [巴枯宁所著的《论无政府主义》, p. 424]

关键在于,哪些事务被认为是重要的或琐碎的,哪些又属于政策决策或行政管理,都应由受其影响的人们自行决定,并须经过他们的持续批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把直接民主奉为神像,也认识到生活中存在比会议和投票更重要的事情!尽管工人大会在自治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它并不是所有决策的唯一焦点。相反,它是制定重要政策决策、批准或否决行政决策,以及决定哪些问题属于重大决策的场所。不言而喻,哪些问题属于重要事项,将由工人们在他们的大会上自行决定。

毫无疑问,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工人自我管理不仅更加自由,而且比资本主义的等级制企业更加高效和富有生产力(在此,“效率”指的是在不浪费宝贵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目标)。资本主义企业未能开发人类丰富的实践知识库,甚至在阻碍它,因为这种知识的任何应用都被用来使所有者受益,而不是那些创造和运用这些知识的工人。因此,等级制企业剥夺了雇员的自主权,将他们降格为仅仅服从指令的角色,从而造成信息、知识和洞察力的明显流失(详见 [1.1.1 节](#) 的讨论)。而在自我管理的体系下,这一庞大的知识与创造力源泉得以充分发挥。因此,工人自我管理和工人所有权,“还可以通过工人的更高动力和更高生产力,带来额外的回报。” [David Ellerman 所著的《民主的工人所有制企业》, p. 139]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企业试图(通过利润分享或“参与”计划)模拟工人控制。正如市场社会主义者 David Schweickart 所指出的,“经验证据是压倒性的”,因此他支持那些主张工人参与管理的人。“证据表明,工人参与管理和利润分享都倾向于提高生产率,而工人管理的企业往往比它们的资本主义同行更具生产力。” [由 David Schweickart 所著的《反对资本主义》, p. 100] 事实上,在对这一问题的 226 项研究中,有 94% 的研究显示了积极影响,其中 60% 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经验数据普遍支持,利润分享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积极联系。”这同样适用于合作社。[Martin L. Weitzman 与 Douglas L. Kruse 所著的《利润分享与生产率》,收录于 Alan S. Blinder (编)的《为生产力买单》, p. 137, p. 139, pp. 131-2] 另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称,“现有证据强烈表明,要使员工所有制对绩效产生强烈影响,它必须伴随着工人参与决策的条款。”此外,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薪资和地位差距缩小能够提高生产力。” [David I. Levine 与 Laura D'Andrea Tyson 所著的《参与、生产力与企业环境》,收录于 Op. Cit., p. 210, p. 211]

这并不令人意外，正如 Geoffrey M. Hodgson 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合作社的模型“错误地假设社会关系和技术是可以分离的……然而，我们有大量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参与和合作可以提高技术效率。生产涉及人类——他们的思想和愿景——而不仅仅是按照物理定律运转的机器。在追求优美的图表和易于处理的数学模型时，主流经济学家似乎常常会忘记这一点。”[由 Geoffrey M. Hodgson 所著的《经济学与乌托邦》，p. 223]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观点，即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将“提供一个远高于以往任何社会组织形式所能实现的生活水平。”[由 Herbert Read 所著的《无政府与秩序》，p. 49] 这也印证了科尔（Cole）的论断，即“真正高效的关键在于自治；任何不以自治为基础的制度，不仅是奴役性的，而且也是低效的。正如雇佣奴隶的劳动优于奴隶制下的劳动一样，……自由人的劳动将比这两者都更加优越。”[由 G.D.H. Cole 所著的《产业中的自治》，p. 157] 然而，尽管这些证据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牢记，真正的社会变革并非源自对“效率”的关注，而是基于理想与原则。无政府主义者确信，工人自我管理的模式会比资本主义更加高效、更加富有生产力，但这仅仅是一个受欢迎的副产品，其更深层次的目标是实现更大的自由。证据表明，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但即便，比如说，证明了奴隶制或雇佣劳动比自由联合的劳动更具生产力——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更可取的制度！

一个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就像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一样，并不意味着专业知识（在其具有实际意义的领域）会被忽视或排除在外。恰恰相反，专家（即对某一特定工作领域感兴趣，并在其中积累了广泛知识的工人）与其他工人一样，都是工作场所集会的一部分。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他们的专业建议应被纳入决策过程。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定专业知识的作用，也不拒绝与之相关的理性权威。正如我们在 [B.1 节](#) 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一位权威”（即在某一特定领域具有知识）与“掌握权威”（即对他人拥有支配权力）之间的区别。正如 H.4 节所讨论的，我们拒绝后者，但尊重前者。

这种专业化并不意味着自我管理的终结，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它。正如巴枯宁所说：“即便是最伟大的智慧，也无法完全理解整体。因此，无论是科学还是工业，都必须进行劳动的分工与联合。”[由巴枯宁所著的《上帝与国家》，p. 33] 因此，专业知识属于联合工人集体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置于他们之上、成为支配性的力量。在工团内部，其他工人可以用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知识来补充专家的专业知识，使决策更加完善。在整个社会中，知识是分布式的，只有自由个人作为平等者联合起来，并管理自己的活动，才能确保这些知识得以有效应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低效性，部分源于其等级制工作场所人为设置的信息壁垒和知识流动障碍）。

例如，工人大会完全可以听取，例如说，工程师的建议，以了解实现不同目标的各种方案（例如，如果你想要 X，那么你需要选择 A 或 B。如果选择 A，则需要 C、D 和 E；如果选择 B，则需要 F、G、H 和 I）。但最终决定采取哪些目标和方法的是大会，而不是工程师。正如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所说：“我们不是在说：人们必须决定做什么，然后由技术人员告诉

他们如何去做。我们是在说：在听取技术人员的意见后，人们将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因为‘如何做’并非中立的，而‘做什么’也不是抽象的。‘做什么’与‘如何做’既不是完全相同的，也不是彼此外在的。‘中立’的技术当然是一种幻觉。一条传送带，与某种产品类型和某种生产者的类型息息相关，反之亦然。”[由 Cornelius Castoriadis 所著的《社会与政治著作集》，第 3 卷，第 265 页]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尽管无政府主义社会会“继承”从阶级社会中延续下来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术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改变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全面的”（或“综合的”）教育，以确保每个人都具备对科学、工程以及其他专业技能的基本理解。正如巴枯宁所主张的，“为了劳动与科学的共同利益……不应再有单纯的工人或学者，而只有人类。”教育必须“使每个孩子——无论性别——既为思想的生活做好准备，也为劳动的生活做好准备。”[由巴枯宁所著的《巴枯宁文选》，p. 116, p. 119]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专业化的终结（个人当然会在某些领域掌握比他人更多的知识），但它确实意味着资本主义所制造的那种人为分工的终结——资本主义通过将知识集中在管理层手中，来削弱和剥夺雇佣工人的技能和权力。

此外，需要明确的是，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让全体工人对专业的事务进行决策。自我管理意味着劳动者对自身工作的自主性，同时在涉及集体事务时进行集体决策。例如，在一个自我管理的医院里，清洁人员不会决定医生如何治疗病人，正如医生不会告诉清洁人员如何打扫卫生。（当然，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里，很可能不会有人仅仅负责清洁工作，而是从事更广泛的任务，我们只是用这个例子来帮助理解。）工团的所有成员，都应对影响他们集体利益的事务拥有发言权；但个体工人或工人小组在集体框架内，仍然拥有管理自身劳动活动的自主权。

不言而喻，自我管理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劳动分工，即命令服从者与发号施令者之间的对立。它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整合在一起（借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确保劳动者不仅从事生产劳动，同时也管理生产，确保工作场所由使用它的人来管理。这种劳动的整合无疑将对生产力、创新能力和效率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制度和异化结构对劳动者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由于劳动的永久性分工，工人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劳动的智力兴趣，这在大型工业中尤为明显；他（或她）已经丧失了创造能力。过去，他（或她）发明了很多东西……但自从大工厂确立统治以来，工人被单调乏味的工作压垮，不再进行任何发明。”[由克鲁泡特金所著的《田野、工厂与车间的未来》，p. 171]

难道所有人的技能、经验和智慧，都必须被等级制度所吞噬和压制？或者，它们是否可以在更优的生产组织形式下成为新的进步源泉？自我管理将确保工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力（这些品质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被压制和消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和应用。再结合“全面的”（或综合的）教育的原则（参见 J.5.13 节），谁还能否认劳动人民能够改造现行经济体系、实现“人人的福祉”？我们所说的“福祉”，不仅仅是物质的满足，更是指合理的技术条件下进行有意义的、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在具有实用价值和美感的产品中塑造强健的体魄，同时

也包括生活在令人振奋且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世界之中。

因此，克鲁泡特金才会指出，自我管理与“消除当前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野”将带来“社会利益”，它不仅意味着“在当今社会斗争中极度缺乏的利益一致与和谐”，还意味着“个体生活的充实——如果每个人都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精神和身体能力”。此外，它还将带来“财富的增长——因为生产者将变得更加受教育且训练有素。”[同上，p. 180]

让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的工人实际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管理着自己的工作时间。资本家或许能够购买工人的一小时工时，但他们必须确保工人在这段时间内服从命令。工人对此强烈抵制，这也导致了车间内部的持续冲突。例如，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科学管理”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工人自我管理自己的劳动活动。正如大卫·诺布尔所指出的，工人“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原因有很多：为了给自己留出时间、为了避免精疲力竭、为了掌控自己的劳动、为了避免因生产过多而导致按件计酬的岗位被削减薪水、为了延长现有的工作时间以防裁员、为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为了表达他们的团结精神以及对管理层的敌意。”这些行为“与工人之间的集体合作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劳动者自行规定的行为准则”，以此实现对生产的“车间控制”。[由大卫·诺布尔所著的《生产的力量》，p. 33] 这正是为什么“按规矩办事”会成为阶级斗争中如此有效的武器（参见 H.4.4 节）。换句话说，工人本能地倾向于自治，而资本家则不断试图打压这种在工作时间内、向自由发展的自然趋势（谁能赢得这场斗争，当然取决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

自我管理将在现有的、非正式的工人控制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充分利用工人在实际劳动过程中积累的生产知识。围绕“谁控制车间”的冲突——究竟是那些进行劳动的人，还是那些发号施令的人——不仅证明了自治的可能性，也揭示了它可能如何实现，因为这一冲突让一个关键事实浮出水面：老板需要我们，而我们不需要他们！

I.3.3 社会化意味着什么？

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对生活资料的社会化。这意味着土地、住房、工作场所等成为公共财产，可供所有需要它们的人使用。对此，艾玛·戈尔德曼作了如下总结：

“每一个个体都是自由的，并且理应拥有自身，享受自己劳动的全部成果；人类不应效忠于权威与资本的君王；仅凭其存在这一事实，他就应当享有自由进入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权利，并完全自由地支配自己努力所得的果实；每一个个体都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利，可以为经济、政治、社会及其他目的，与其他同样拥有主权的个体自由、自愿地结社。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人类必须从对财产神圣

性的信仰、对人造法律的敬畏、对教会的恐惧、对公共舆论的懦弱顺从、对民族、种族、宗教和性别优越性的愚蠢傲慢，以及对狭隘清教徒式人生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2, pp. 450-1]

社会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对集体使用的“财产”（如工作场所和土地）的私人占有，导致了大多数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即自由）出售给少数所有者。这种状况催生了等级制和专制的社会关系，同时也造成了经济阶级的分化。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社会不应分裂为“占有者与非占有者”这样的阶级体系，因为这不仅是一种“社会不公的状态”，而且还使国家“成为占有者的少数派保护其特权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鲁道夫·罗克，《无政府工团主义》，第 11 页] 换句话说，“只要土地和资本未被占有，工人就是自由的；而一旦这些财产有了主宰，工人也就成了奴隶。” [夏洛特·M·威尔逊，《无政府主义论文集》，第 21 页]

尽管国有社会主义者和右翼人士，往往将社会化与国有化等同，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正是名称不同所要表达的含义。国有化在实践中（通常在理论上也是如此）意味着生活资料成为国家财产。这意味着，与其让那些真正需要并使用某一特定部分的合作社成员决定如何运用它，政府将取而代之进行决策。正如我们在 [B.3.5 节](#) 讨论过的，这种模式只会导致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只不过是**由国家取代现有的资本家和地主罢了**。

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论述的，社会化与国有化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她指出：“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是对土地以及生产和分配机器的社会化。社会化的土地和机器属于人民，个人或团体可根据自身需求定居并使用。”而国有化则意味着资源“属于国家，即政府对其拥有控制权，并可按照自身意愿和观点进行处置。”她强调：“当某物被社会化时，每个个体都可以自由获取并使用它，不受任何人的干涉。”然而，当国家拥有财产时，“这种状况可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它具有任何的共产主义性质。” [Red Emma Speaks, pp. 406-7]

社会化的目标是用使用权取代所有权。理解社会化的关键在于，它强调**自由获取（自由使用）**。换言之，每个人对生活资料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会因他人对生活资料的占有而受到剥削或压迫。正如赫伯特·里德所言：

“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人类已发展至可以废除旧有的主-仆关系（资本家—无产者关系）的阶段，并以平等合作的关系取而代之。这一原则不仅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同时也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Anarchy and Order, p. 92]

这一原则包含两个要点。首先，生活资料是公共财产，不存在一个占有它们的阶级。其次，在任何组织内部，个体之间都基于平等建立自由联合，并由此产生工业民主（或自我管理）。

自从无政府主义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以来，这一直是其核心立场。因此，我们可以在 1840 年看到蒲鲁东提出：“土地是我们生存所必需的”，“因此它是公共之物，因此不可被占有”；“所有积累的资本皆为社会财产，无人能成为其独占所有

者。”这意味着“农民不会私占他所耕种的土地”，而且“所有资本……皆为集体劳动的成果”，因此属于“集体财产”。如果没有这一原则，就会产生不平等，并限制自由，因为“工人只能依靠主人的恩惠和需求才能获得劳动机会”。“文明社会的工人，烤一条面包却只能吃一片面包……他并不自由。他的雇主……是他的敌人。”事实上，“无论是商业、工业还是农业协会，都无法在缺乏平等的情况下成立。”目标应是建立一个“没有主人的占有者”社会，而不是让雇佣劳动者和佃农“受制于财产所有者”。在任何经济组织中，民主将成为原则，“领导者、导师、监督者”等职位“应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之中选举产生，并必须符合选举资格要求。所有公共职能，无论是行政还是教育，都应如此。”[什么是财产权？，第107页，第130页，第153页，第128页，第142页，第227页，第167页，第137页]

这意味着“民主组织的工人协会”，并且“在联合的法则之下；财富的传递并不适用于劳动工具，因此无法成为不平等的根源。”[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一卷，第62页]因此，工作场所“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共同且不可分割的财产”，而非“由股东公司所掌控、掠夺雇佣工人身心的工具”。这意味着自由获取，每位“受雇于该协会的个人”都拥有“公司财产的不可分割的份额”，并且享有“担任任何职位的权利”，因为“所有职位均由选举产生，协会章程需得到成员的批准。”每位成员“应根据自身的劳动贡献，参与公司的收益与损失。”[革命总论，第219页，第222页]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提出的由人民银行提供的自由信贷，同样是自由获取和社会化的体现。不言而喻，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正是基于这一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和自由获取的愿景，提出了对社会化的论证。例如，对巴枯宁而言，“土地、劳动工具及所有其他资本必须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并仅由工人——即农业与工业协会——加以利用。”[巴枯宁文选，第174页]。

因此，在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生产资料都是被社会化的，它们皆建立在平等获取的原则之上。当某人加入现有的工人协会时，他将成为该合作社的正式成员，并享有与现有成员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换言之，他将在“一个人一票”的基础上参与决策。至于该协会生产的产品如何分配，不同类型的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些协会本身都根植于自由结合和平等合作之中。与之相对，资本主义社会则将所有者置于支配地位，新加入的工人只是雇员，他们是组织的从属成员，对决策没有任何发言权（见 [B.1 节](#)）。

社会化意味着工作场所将成为“工人的小共和国”。[蒲鲁东，引自多萝西·W·道格拉斯，《蒲鲁东：1848年的先知，第二部分》，载于《美国社会学期刊》，第35卷，第1期，第45页]正如经济学家大卫·埃勒曼所解释的，民主化的工作场所“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一个基于劳动的共同体，而非基于居住的共同体。它是一个共和制组织，即工作场所的**共和国（res publica）**。最终的治理权被确立为个人的权利……赋予企业内部劳动者……这一分析表明，一个企业可以实现社会化，但仍然保持‘私有’性质，即不属于政府所有。”正如 [1.3.1 节](#)所述，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终结，因为工作场所将实现自由使用，工人不再是被老板雇佣的雇佣劳动者。相反，个人会寻找合适的协会加入，协会则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进行协作。埃勒曼指出：“国有社会主义并未废除雇佣关系，而是

将其国有化……唯有民主化的企业——即工人共同自雇的组织——才是私人雇佣制或公有雇佣制的真正替代方案。”[民主工人所有制企业，第76页，第209页]。

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建立在分散式决策的基础上，其框架是社会所有但独立运作、工人自我管理的工团。社会化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为仅仅依靠劳动的自我管理本身并不足以确保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在封建制度下，农民虽可管理自己的劳动，但这种制度并不自由，至少他们仍需向地主缴纳地租。同样可以想象在工业体系下，工人向资本家和地主租赁工厂和土地的情形。正如左翼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森所指出的：

“假设工人是自雇的，但并不拥有全部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能存在强大的工厂、办公室和机器的所有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依然可以从所有权中获得收入。在与这些所有者的谈判中，工人必须让步，承认他们享有收入的权利，因为工人若不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就无法生产。因此，工人仍然会被剥夺……‘剩余价值’。利润仍然来自于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经济学与乌托邦，第168页]

这种经济体制既不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因为工人仍然被剥削），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但仍然存在无产阶级）。因此，真正的无政府主义需要对生活资料进行社会化，以确保自由获取（无高利贷）。换句话说，虽然自我管理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但仅凭自我管理并不足以使一个社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社会。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即对生活资料的自由获取），社会仍会形成新的阶级体系，并根植于剥削之中。为了彻底消除剥削，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生产性资产，如工作场所和土地，应归整个社会所有，并由工会组织和自雇个体进行管理。正如克鲁泡特金说到：“自由的工人，在自由的土地上，使用自由的机器，并自由地运用科学赋予人类的一切力量。”[行动起来，第102页]

这种社会化、自由获取的愿景，同样适用于住房。例如，蒲鲁东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房屋租金的支付应当“计入房产购置款项”，一旦支付完成，该房屋“应转入市政管理……代表所有租户进行管理，并永久性地向他们提供住所，仅收取建筑维护成本。”租赁农地的原则亦相同，一旦租金支付完成，土地“应立即归属于市镇，由市镇取代原有的地主。”此外，还应“制定监督市镇、安置耕种者及划定财产边界的措施。”[革命总论，第194页，第199页] 克鲁泡特金的目标与蒲鲁东类似，即“废除房租”，但其方式有所不同。他主张在社会革命过程中“没收房屋的所有权”，即“将房屋公社化，并赋予每个家庭体面居住的权利。”[面包与自由，第91页，第95页]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强调公社（详见 [1.5 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主张类似“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例如，克鲁泡特金曾极力强调，持续的集体生活对无数人而言是“令人厌恶的。虽然即使是最为内向的人，都必然会感受到与他人共同工作的必要性……但在闲暇时间——那些属于休息和私人生活的时间——情况却截然不同。”集体生活就好像“人类的蜂巢”，“这或许对

某些人、甚至所有人的生命的某一阶段而言，是可取的，但绝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家庭生活（当然，是属于未来的家庭生活）。他们更喜欢独立的住房。”一个社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如果成为普遍规则，那将令人厌恶。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与社交时间的交替，才是人类天性的正常需求。”[前引书，第 123-124 页]。因此，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不是（国有社会主义者曾倡导的）修道院式或军营式的共产主义，而是自由的共产主义——它将收获或制造的产品供所有人自由使用，同时给予每个人在自己家中自由消费的权利。”[《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演进中的地位》，第 7 页]。显然，每个家庭，就像每个工作场所一样，应由其使用者自行管理，而社会化的目的正是确保这一点（即确保人们不会变成房东的租户/附属者）。

有关社会化和自由获取如何运作的讨论，见 I.6 节。

在这一基本的自我管理与社会化愿景之上，各种无政府主义学派有所分歧。互助主义消除了雇佣劳动，使工人能够与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基于自我管理和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所有权。然而，其他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批评这种制度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合作主义”，其中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在市场上彼此竞争，以争取顾客、利润和原材料等——这种竞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下同样的问题，甚至可能回归资本主义（详见 I.1.3 节）。一些互助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一风险。于是蒲鲁东在 I.3.5 节所讨论的那样，主张建立农业-工业联合体，以抵御市场机制导致的不平等和雇佣劳动。此外，互助主义的支持者还指出，现有的合作社极少解雇成员，并且比相应的资本主义企业更加平等化。他们认为，这种特性将确保互助主义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同时通过提供便利的信贷，使失业者能够重新创办自己的合作社。

相比之下，在无政府集体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中，是整个社会共同拥有生活资料。这不仅消除了生存竞争，也避免了工人对自己所工作的企业产生专有利益的倾向。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工厂……完全可以归属于社区……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是乡村的祸害，它导致儿童的过度劳作，使成年男性沦为贫民；因此，工人们以各种方式反对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更为合理的社会组织下，工厂将不会遇到这样的阻碍；它将成为乡村的一种福祉。”毋庸置疑，这样的工作场所将以工人自我管理为基础，因为“工人……应当成为产业的真正管理者。”[《明日的田野、工厂与作坊》，第 152 页，第 157 页]。这种“社会化组织的工业生产”（用克鲁泡特金的说法），将确保体面的生活水平，同时避免市场（即便是非资本主义市场）所带来的问题。

换句话说，经济是公社化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被转变为公共“财产”。社区决定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框架，而工人则在此框架内做出关于生产内容和方式的日常决策。这是因为，一个仅仅依赖工作场所集会的制度，会在事实上剥夺那些虽不直接参与生产、但却承受生产后果（例如生态破坏）之人的发言权。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言，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推动“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导向的经济”，关键的政策决策应由“公民在面对面的集会中做出——以公民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作为工人、农民或专业人士……作为公民，他们应当在这样的议会中发挥自身的最高层次——人类的层次，而不是作为被社会隔离的个体。他们应当表达自己的一般

人类利益，而不是其特定的社会地位利益。” 这些公社化经济体将彼此联合，形成“一个区域性的邦联体系。土地、工厂和作坊应当由自由社区的公民大会控制，而非由民族国家控制，也非由可能对其发展出专有利益的工人-生产者控制。”[重塑社会，第 194 页]

工作场所集会与社区集会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可能局限于特定的行业或岗位，而后者则能够提供更广泛的讨论空间，使人们作为普通公民而非特定行业的工人来共同寻求解决方案。这种模式以公社参与为基础，通过地方社区和邦联议会的面对面投票来运作，并通过自愿联邦加以联系。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因为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并不存在国家（关于社区集会的更多讨论，详见 [1.5 节](#)）。

这意味着，当一个工作场所被公社化时，工人的自我管理将置于社区的更广泛框架之中，成为社区控制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工作内容或工作方式，而是说，他们决策的框架由社区设定。例如，地方社区可能决定生产应当最大限度地实现回收利用，并尽量减少污染，工人则在这一决策的指导下进行投资和生产决策。此外，消费者组织和合作社，可能在工团联合代表大会上，甚至在个别工作场所中拥有发言权（尽管是否会实行，由地方社区自行决定其可行性）。通过这些方式，消费者不仅能够对生产的管理、产品的种类和质量发表意见，还能在产品的创造过程中体现自身利益，而不仅仅是产品被动的消费方。

鉴于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原则以及国家的缺失，集体化的具体形式可能会存在相当大的变通空间，例如在分配方式、是否使用货币等问题上，各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安排——正如 1936-1939 年西班牙革命期间，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制度所展示的那样。然而，如果一些社区贫困而另一些社区富裕，自由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剩余财富的分配方式，必须确保所有社区都能从邦联体系中获得足够的共享收入和资源，同时确保公共服务和基本生活需求的最低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工团和社区应当结合成联合会（详见 [下一节](#)）。

最终，无政府主义各流派之间的一个关键分歧，在于社会化的范围应当延伸到何种程度。互助主义者认为，社会化应当仅限于生产资料；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则认为，若要保持一致性，社会化必须涵盖生产资料以及生产出的产品。无政府集体主义者在这点上往往倾向于认同互助主义者，但许多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和稀缺性的遗留问题被克服，经济最终将演变为共产主义。蒲鲁东在论述互助主义时表示：

“那么，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对产品的所有权（如果我们承认其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一点无需进一步论证……所有人……都是自己产品的所有者——但无人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产品的权利是专属的——**对物权(jus in re)**，对生产资料的权利则是共有的——**对物请求权(jus ad rem)**。”[什么是财产权？，第 120-121 页]

对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而言，社会化应当延伸至劳动产品本身。这意味着，

人们不仅应当能够自由获取生产资料，也应当能够自由获取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必须共享自己使用的私人物品，而是指商品将根据需求自由分配，而无需通过购买获取。如果仅仅社会化生产资料，而不社会化劳动产品，就意味着要在社会中维持“两个完全对立的原则，这两个原则将不断相互矛盾。”[由克鲁泡特金所著的《面包与自由》，第163页] 因此，需要超越单纯地废除雇佣劳动，进而彻底废除货币（即工资制度）。这是因为任何试图衡量个人对社会贡献的方式都存在缺陷，并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在需求量上存在差异。一个年轻的未婚女性，与一个抚养五六个孩子的母亲，他们的需求完全不同。在当今的雇主眼中，这些需求差异毫无意义，而劳动支票……也是如此。”[由克鲁泡特金所著的《行动起来》，第108-109页]

无论具体的个人、工场、公社或地区采用何种分配模式，社会化都将成为其基本原则。自由获取生产资料将确保个体的自由，也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尝试不同的无政府主义经济体系。

I.3.4 各个工团之间会建立怎样的关系？

正如个人会为了共同的问题而联合起来并共同解决它们，工团亦是如此。几乎没有哪个工作场所是完全独立的。它们需要原材料作为投入，也需要消费者来购买它们的产品。因此，不同的工团之间将会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独立工团之间的自由协议；其次，各行业内部以及各地区范围内、工团的邦联（confederation）。

这种对自由合作的追求，与消除中央集权体系的愿望相辅相成。对中央集权的反对往往被错误地理解。例如，市场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历克斯·诺夫曾提出：“存在横向联系（市场），也存在纵向联系（等级制度）。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联系方式呢？”[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p. 226] 换句话说，他认为反对中央计划，就意味着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横向联系未必以市场为基础，纵向联系也未必必须是等级制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必须从根本上，建立在个人与社群之间的横向联系之上；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合作，而不是受制于某个中央机构。这种合作将成为无政府主义经济中众多联系的来源。当一群个体或社群聚在一起，讨论共同利益并作出共同决定时，他们将受自己的决策所约束。这与由中央机构发布命令的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因为在无政府主义的体系下，决策的内容由受其影响的人们共同决定。换句话说，决策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加，而是自下而上地形成。

让我们来看自由协议这一概念。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让人们自行组织生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拒绝中央计划，主张工人协会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自由的工人需要自由的组织，而这种组织不能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唯有自由协议和自由合作，不能牺牲个体的自治。”直接参与生产（以及消费）的人远比任何官僚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因此，自愿协议是自由经济的基础，

这些协议是“基于自由同意而达成的，是在各方都能自由选择不同选项的前提下达成的。” [Anarchism, p. 52 and p. 69] 只有在没有资本主义所伴随的财富与权力集中现象的情况下，自由协议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协议，而不是等级制度的伪装。

无政府主义经济“是自下而上建立的，而非自上而下。就像有机体一样，这种自由社会从最基本的单位成长为复杂的结构。‘个人生存斗争’这一需要……足以让整个复杂的社会机制运转起来。社会是个体生存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与之对立的存在。”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正如每一个自由的个体，都会与他的兄弟姐妹们联合起来生产……一切生活所需物品，并非受任何外在压力，而仅仅是出于一个人对充分享受生活的渴望；同样，每一个组织也是自由的、自治的，并且因为合作和订立协议能够扩大自身的可能性，所以才会与他者进行合作。”这表明，无政府主义经济是去中心化的，甚至比资本主义更加去中心化（资本主义所谓的去中心化实际上只是一种神话，例如跨国公司和大企业中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经济“通过自由和平等的协议不断加强联系，并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George Barrett,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18]

无政府主义经济将建立在自发的秩序之上，工人通过互助与自由联合来组织生产。对于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种经济形式表现为“在没有货币媒介、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根据需求和现有供应进行自由交换。” [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 217] 罗克尔对此总结道：“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建立自由社群的联合体，这些社群因其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相互联系，并通过互相协商和自由契约来安排各自的事务。” [Anarcho-Syndicalism, p. 1] 此类协议的一个例子便是对产品和服务的订单：

“那么，我们的这家工厂，在其服务性质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是一个自治单位：自主管理其生产活动，并可尽情尝试新方法，开发新风格和新产品……工厂的自治……是以防‘平庸化’的保障，是对那些竞争动机曾被认为能够刺激多样性、活力、个性化工作和工艺的制度的——超越性替代。” [G.D.H. Cole,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p. 59]

这意味着自由协议将确保消费者能够自由选择供应商，使得生产单位能够了解自己是否按消费者的需求生产产品，并在正确的时间提供（即是否满足了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如果生产单位未能做到这一点，消费者就会转向同一行业的其他生产单位。需要强调的是，除了这种否定性检查机制（即消费者选择“退出”）作为负面反馈之外，还可能通过消费者团体、合作社以及公社等方式，对生产单位施加正面监督。消费者团体通过制定并传达需求给生产者群体，这会在确保产品质量、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发挥出关键的作用（有关更多细节，见 [1.4.7 节](#)）。

这些直接的横向联系，对于确保生产满足需求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特定的工团，在特定时间请求生产特定的商品以满足特定的需求，经济就无法真正满足人们的需要。例如，一个中央计划，可能会规定在一年内生产 100 万吨钢铁或 2500 万件衬衫，但这并不能说明具体需要生产什么、何时生产，而这恰恰取决于这些物品的用途及其使用者的需求。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盲目地为所有可能

的需求进行生产，而不是计算实际需求并组织起来，并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满足它们，这将是荒谬的能量浪费……解决方案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协商以及他们之间将会达成的协议。” [At the Café, pp. 62-3] 因此，自由联合、自由协议和互助这些经典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尤为关键！正是这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才能传递必要的信息，以确保在正确的时间生产正确的产品！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证的（他根据自己在列宁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俄罗斯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

“生产和交换是极为复杂的事业，以至于国有社会主义者的计划……一旦付诸实践，就会被证明完全无效。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组织生产，如果工人们不能通过他们的工会在各自的行业中自行组织的话；因为在所有的生产过程中，每天都会出现数千种政府无法预见或解决的困难。当然，预见一切是不可能的。只有成千上万的头脑共同努力，才能够推动新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并为成千上万的地方性需求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Anarchism, pp. 76-77]

这便引出了工团之间关系的第二种形式，即同一行业或地理区域内的工团邦联。值得注意的是，跨工作场所的联合，并不仅限于集体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工团联合会的概念，可以追溯到蒲鲁东在 1848 年革命期间首次提出的“农业-工业联合会”（agro-industrial federation），并在他 1863 年所著的《联邦原理》（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中正式命名。法国的互助主义者，提出“农业-工业联合体”作为其自主管理合作社体系的结构性支撑组织。这些工团邦联对于促进工作场所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没有任何工团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机制，使工团能够共同讨论并处理他们的共同利益。因此，邦联既是自由协议的补充，也体现了无政府主义关于自由联合、去中心化组织以及对现实需求的关注：

“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精神……因此，他们设想未来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联邦制的基础之上，从个人到自治市、到公社、到地区、到国度、到国际，皆基于团结和自由协议。这种理想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生产组织中，尽可能地偏向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但这并不是一种必须在所有情况下适用的绝对规则。自由意志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排除了强加单一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Luigi Fabbri, "Anarchy and 'Scientific Communism'", pp. 13-49, The Poverty of Statism, Albert Meltzer (ed.), p. 23]

工团邦联（某些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称之为“行会”（*guild*），而有些人则称之为“产业工会”（*industrial union*））在两个层面上运作：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其基本运作原则与工团本身相同——在平等者之间进行自愿合作，以满足共同需求。换句话说，邦联中的每个工团，都通过横向协议与其他工团相联系，且无须向任何凌驾于团体之上的独立实体去承担义务（关于无政府主义邦联的性质，详见 [A.2.11](#)）。赫伯特·里德对此总结道：

“总的原则很清楚：每个行业都由自治集体组成一个联合会；每个行业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该行业的工人手中，而这些集体则管理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 [《无政府与秩序》，第 49 页]

克鲁泡特金关于公社之间联邦主义的论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工团可以被视为生产者公社）。他指出：“未来的公社将明白，它不能承认任何更高的权威；在它之上，只能是它自己以及其他公社自愿接受的联合会的利益。”因此，联邦主义并不会与自治相冲突，因为每个成员在其边界内都拥有广泛的自主权，因此每个“公社都将完全自由地采用它所希望的所有制度，并进行它认为必要的改革和革命。”[《一名叛逆者的话》，第 83 页]此外，这些联合会将是多样化的，并且具有功能性。经济联合会将创造一个复杂的互联网络，使各个协会和联合会相互联系：

“事实上，我们的需求是如此多样，它们以如此快的速度不断涌现，以至于很快地，单一的联合会将无法满足不同需求。公社届时将感到需要缔结其他联盟，加入其他联合会。例如，它可能加入一个团体来获取食品供应，同时需要加入第二个团体以获得其他商品，如金属，然后加入第三个或第四个团体以获取纺织品和艺术品。”[Op. Cit., 第 87 页]

因此，工团邦联能够适应其成员的需求。正如汤姆·布朗所论证的那样，“工团主义的组织模式极为灵活，这正是其主要优势所在。区域邦联可以根据地方条件和变化的环境进行组建、调整、扩展或重组。”[《工团主义》，第 58 页]

正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这些邦联是自愿性的联合体，并且“正如工厂的自治，对于保持行会制度的生机和活力至关重要一样；在国家行会之外存在各种民主类型的独立工厂，也可能成为个人智慧进行宝贵实验和富有成效的创新的手段。在坚持拒绝将他们的理论推向最终的‘逻辑’结论时，行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忠实于他们对自由和多样化社会事业的热爱。”[G.D.H. 科尔, Op. Cit., 第 65 页]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控制：

“但是，当我们说生产工具（包括工厂本身）的所有权，应归还给社团（即邦联）时，我们并不意味着个别作坊的工人将受制于某种工业政府，该政府可以随意处置生产工具。不，各工厂的工人丝毫不打算将他们艰难赢得的控制权……交给某个上级权力……他们要做的是……确保相互使用彼此的生产工具，并给予其他工厂的工人分享其生产设施的权利，同时在团结互助的协议下，享有同样的权利以使用他们盟友的设施。”[詹姆斯·纪尧姆，《建设新社会秩序》，载于《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 363-364 页]

因此，无论是集体无政府主义、共产无政府主义还是互助主义，其核心都在于工作场所的自我管理。这意味着工人能够选择他们希望从事的生产任务，而不是由某个中央机构分配任务并强制执行（即使撇开官僚主义与自由的问题，这种模式在任何大型、复杂的经济体中也很难有效实施）。相反，各个工作场所将有权选择由其他协会（经济协会和公社）提交的任务，并决定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工人大会和工人委员会将成为核心，它们不仅制定个别工作场所的政策，还通过全体工人的大会讨论整个行业或经济范围内的问题，确保所有人都能参与决策。委员会内的投票是直接进行的，而在更大的联合体中，投票则由临时、无薪、受具体授权并可即时罢免的代表执行；一旦他们的任务完成，他们便恢复普通工人的身份。

在这里，“受授权”意味着工人大会和委员会选出的代表，在前往更高级别的联合会议时，会在邦联的每个层级上都受到选民的具体指示，规定他们在任何议题上的立场和投票方式。这些代表不是“代表”（representatives），而是“受委托者”（delegates），因此，他们在联合会议上必须按照具体授权进行投票。“可罢免”则意味着，如果他们未按照授权投票，他们将被撤换，而投票结果也将被宣布无效。换言之，这些代表将被赋予强制委任权（imperative mandates，即具有约束力的指示），他们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事；并且如果未能执行授权，他们可随时被召回，其决定也可被废除。（这种受授权代表制度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至少可追溯至 1848 年，当时蒲鲁东就认为这“是普选制的必然结果”，以确保“人民……不放弃自己的主权。”[《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 1 卷，第 63 页]。）正因为工人大会拥有授权和罢免代表的权力，所以基层工人大会，将成为整个经济联合协调体系的政策来源，并对所有更高级别的邦联机构拥有最终的“权威”（姑且用这个词）。代表将是普通工人，而不是受薪的全职代表或工会领导，他们在完成被选举时所赋予的特定任务后，将返回原来的岗位工作。这样，决策权始终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而不会集中到官僚体系的顶端，形成一个由职业管理者或工会领导人组成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些邦联可能发挥的作用，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总之，一个自由的社会“是自下至上自由组织起来的，从个人联合成协会，协会逐渐发展，逐步形成越来越复杂的协会联合会。”[马拉泰斯塔，《在咖啡馆》，第 65 页]

I.3.5 工团邦联将会做什么？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工团之间的自愿联合是必要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为了决定管理工团之间关系的政策，并协调它们的活动。这种协调可能涉及从商定技术标准，到制定特定问题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再到达成重大投资决策、或优先考虑某些大规模经济项目或研究领域。此外，联合会还将作为解决争端的机制，并用于识别和应对任何可能导致资本主义或其他阶级社会复辟的趋势。

这一观点可以从蒲鲁东的理论中看出，他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联合需求的人。他曾表示：“过去二十五年来，我所有的经济思想都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农业—工业—联合会。”这是必要的，因为“无论联邦原则在基本逻辑上多么无懈可击……如果经济因素持续倾向于瓦解它，它便无法存续。换言之，政治权利必须以经济权利为支撑。”一个自由社会无法在“资本和商业”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生存，因为它将“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一方是地主、资本家和企业家，另一方是靠工资维生的无产者；一方富有，另一方贫困。”因此，“在经济背景下，联合的目的在于提供商业和工业领域的相互保障……这种具体的联邦安排旨在保护公民……免受资本主义和金融剥削的侵害，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总体而言，它们构成了……一个农工业联合会。”[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 p. 74, p. 67 and p. 70]

资本主义导致“资本利息”和“雇佣劳动或经济奴役，总之是不平等的社会状况”，而“农工业联合会……将通过信用和保险领域的互助制度……保障工作权和受教育权，并组织劳动，使每一名工人都能成为技术工人和艺术家，使每一名受雇者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促进日益增长的平等。”“工业联合会”将在最大范围内实施“互助原则”和“经济团结”。由于“各行业如同姐妹”，它们“是同一机体的组成部分”，“一个行业遭受损害，其他行业也难以幸免。因此，它们应当联合……以保障共同繁荣的条件，而这种繁荣不应被任何个人垄断。”因此，互助主义主张“所有行业相互保障”，同时“以经济的方式组织所有公共服务，并使其脱离国家的控制。” [Op. Cit., p. 70, p. 71, p. 72 and p. 70]

后来，无政府主义者进一步发展、完善并阐明了这些经济联合的理念。基本上，邦联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业联合（即某一特定类型的所有工作场所组成的联合会），另一种是区域联合（即特定经济区域内所有工团的联合会）。因此，每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联合会，而每个地理区域内的所有工团也会有一个联合会。两者将在不同层级上运作，也就是说，在地方、区域及更高层级上，既会有行业内部的联合会，也会有跨行业的联合会。这种行业间及跨行业的网络化合作的基本目标，是确保相关信息能够在经济的各个部分之间有效传播，以便各方能够在协调各自计划的同时，将生态和社会损害降至最低。例如，虽然铁路工人邦联将负责管理铁路网络，但各地的车站、区域和国家级的车务段，将派代表定期与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其他工团会面，以讨论总体的经济问题。

然而，需要牢记的是，每个加入联合会的工团都是自治的。邦联的目的是协调共同利益相关的活动（特别是关于新工厂的投资决策，以及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对现有工厂进行合理化调整）。但邦联不会决定某个工团应从事何种工作或如何开展工作：

“由于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自行管理自身事务，更大的行会组织（即邦联）的职责，主要是协调、调整以及代表行会进行对外事务。它们将在必要时协调不同工厂的生产，使供需保持一致……它们将组织研究……这一庞大的行会组织……必须直接建立在各个行会所属的工厂之上。” [Cole,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pp. 59-60]

因此，必须强调，邦联的最低层级——工人大会——将通过选举具有授权且可被随时罢免的代表，来控制更高层级的联合机构。可以合理地假设，联合会的层级越高，所作的决策就越具普遍性。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负责大范围地区的联合会很难对大型项目进行详细规划；因此，它们在实践中更可能是为指导方针和优先事项达成共识提供论坛，而非具体项目或经济事务的实际规划机构。正如俄罗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G·P·马克西莫夫所言，其目标是“协调一切活动、整合地方利益，建立一个中心，但不是发布命令和法令的中心，而是一个调整和引导的中心——正是通过这样的中心来组织全国的工业生活。” [quoted by M. Brinton, *For Workers' Power*, p. 330]

因此，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体系，因为基层的工人大会和工人委员会对所有政策决策拥有最终决定权，并且可以废除那些由受托决策权的代表所制定的政

策，并罢免这些代表：

“在物质和技术生产方式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没有预设的解决方案或绝对的规定，而是服从自由社会的经验和条件所推荐和规定的事物。重要的是，无论采用何种生产方式，它都必须是生产者们的自由选择，而绝不能被强制施加，就像任何形式的劳动剥削都不可能存在一样……无政府主义者不会先验地排除任何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并且同样承认，在不同时期可能会存在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Luigi Fabbri, "Anarchy and 'Scientific' Communism", pp. 13-49, *The Poverty of Statism*, Albert Meltzer (ed.), p. 22]

邦联的存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正如可以从蒲鲁东的理论中看出的那样，互助主义者意识到，即便是在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市场中，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因此他们创建了支持性结构，以保护工人的自我管理。此外，工业工团很可能会与互助银行（即信贷工团）建立起联系。这些工团的存在旨在为自我管理、新的工团扩张等提供无息信贷。如果资本主义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的话，互助银行还将减少商业周期的波动，因为“像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通常被归类为以银行为中心的经济体——因为银行提供的外部融资多于市场，并且更多企业与银行保持长期关系——在长期投资的增长与稳定性方面，比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体（如美国 and 英国）表现更好……此外，研究对比了德国和日本那些与银行关系紧密的企业与那些没有此类关系的企业，结果表明，与银行有紧密联系的企业在商业周期中的投资稳定性更强。” [Doug Henwood, *Wall Street*, pp. 174-5]

反对合作社的一个常见论点是，它们无法实现风险的分散（即所有工人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一论点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当今大多数工人并没有股份，他们完全依赖工作来维持生计。此外，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企业间的横向联合或企业集团化来分摊商业风险”来解决。“蒙德拉贡合作社通过若干区域集团联合在一起，以不同程度地共享利润。与其让一个工人将资本分散投资于六家公司，不如让六家公司部分地共享利润，以形成一个集团或联合会，从而在不依赖可转让股权资本的情况下，实现同样的风险分散目标。”因此，“合作社联合会中的风险分摊”确保了“无需可转让股权资本，也能实现工人年收入流动的风险分散。” [David Ellerman, *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 p. 104] 此外，正如许多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孤立运作的合作社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支持性网络对于合作社的生存至关重要。蒙德拉贡合作社体系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拥有信用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互助支持网络，使其成为全球最成功的合作社体系。因此，“农工业联合会”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而存在的。

在集体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的框架下，联合会还将承担额外的任务，主要涉及两个核心职能。首先，是共享和协调由工团所生产的信息；其次，是根据这些信息所反映的生产与消费变化来制定应对措施。

邦联（即协商协调机构）将负责明确界定的生产部门，通常情况下，生产单位只会涉及一个特定的生产领域。这些邦联，将与其他邦联以及相关的公社邦联保持直接联系，公社邦联向工团提供决策指导方针（参见 [1.4.4 节](#)），并确保共同问题能够得到突显和讨论。这些邦联的存在，旨在确保信息能够在各个工作场所

之间传播，并确保行业能够对社会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换句话说，这些邦联的主要作用是协调重大新投资决策（即当需求超过供给时），以及决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即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如何调整生产。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邦联所协调的投资决策，将与新工团的创建投资以及工团内部的投资决策并存。并非所有投资决策都必须由邦联来做出（特别是对于新兴行业而言，在其初创阶段甚至还没有对应的邦联！）。因此，在自我管理的生产单位之外，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还将存在大量小规模、地方性的经济活动，以保证创造力、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些活动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扩展开来之后，才会需要联合地协调。因此，尽管生产将主要依赖于自主的网络体系，但对于消费者行为所引发的投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会由该生产部门的工团邦联进行协调。通过这样的机制，邦联可以确保各个独立的工团不会因为生产调整而浪费资源，避免个别单位因过度生产或过度投资而造成损失。通过跨工作场所的信息共享，工人们可以克服市场体系中所固有的协调障碍（参见 C.7.2 节），进而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动荡。

这样一来，重大投资决策将在行业工团的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上，通过一种横向的、协商的协调过程做出。重大投资决策将在适当的层级进行协调，而邦联内的每个单位都保持自治，决定如何利用自身的生产能力以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由邦联（通过横向协商）协调的自主管理生产单位，这既保证了地方自主性（这是灵活性、创造力和多样性的关键来源），也确保了对社会需求变化的理性回应。由于工团之间的联系是非等级制的，每个工团仍然保持自我管理。这一机制确保了权力的去中心化，以及由直接参与生产的工人掌握控制权、发挥自主性并进行实验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班牙革命期间，不同的组织方式成功地实现了联邦化。加斯东·勒瓦尔指出，这些邦联形式并未损害自我管理的自由意志性质：

“一切都由工团掌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由几个高层官僚委员会，在不征求工会普通成员意见的情况下决定的。在这里，自由意志的民主得到了实践。正如 C.N.T. 那样，这里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动结构；从基层……向上延伸，同时也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影响，从这些地方单位的联邦向各个层级延伸，再由源头回溯至源头。”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105]

任何邦联的具体职责都会有所不同，尽管我们“更倾向于分散化管理；但在实践和技术问题上，我们最终还是会听从自由经验的指引。” [Luigi Fabbri, Op. Cit., p. 24] 组织的具体形式显然会根据行业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自我管理与自由联合的基本理念始终不变。此外，“最重要的事情……是（邦联或行业工会的）职能，应尽可能地被限制在最低限度。” [Cole, Op. Cit., p. 61]

跨工团邦联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平衡不平等。毕竟，各个地区在自然资源、土地质量、地理位置、可达性等方面并不相同。简单来说，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由于土壤肥力、健康状况和地理位置的自然差异，确保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相同的劳动条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开始就实现完全的平等是不可

能的”，因此，“出于自然原因，正义与公平无法完全实现……这也意味着自由同样无法实现。” [马拉特斯塔，《无政府主义革命》，p. 16 和 p. 21]

蒲鲁东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由于原材料、土地质量等方面的差异，经济联邦制是必要的。因此，他主张将农业生产收入的一部分缴入一个中央基金，用于均衡补偿，补偿那些处于不利地理位置或土地肥力较差的农民。正如他所说，农业中的经济地租“唯一的原因就是土地质量的不平等……如果有人因这种不平等而有权提出要求……[那应该是]那些耕种贫瘠土地的农民。因此，在我们关于[资本主义]清算的方案中，我们规定，每种类型的耕作都应缴纳一笔按比例计算的贡献款项，以实现农民收益的均衡，并确保农产品的供给。”此外，“共和国的所有城镇应达成共识，以便在它们之间均衡土地质量及耕作条件的差异。”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209 and p. 200]

通过联邦化，工人可以确保“土地……成为所有人的经济领域，其财富将为全人类所享。” [马拉特斯塔，《埃里科·马拉特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p. 93] 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化，将从外部弥补地方在原材料、土地质量及供给上的不足。这将使全人类共享经济活动的成果，从而确保全民福祉成为可能。

联邦化将消除富裕与贫困公社、工团并存的可能性。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意味着共同享受集体生产的成果……当每个人都尽其所能为集体福祉作出贡献时，他[或她]也应按照自己的需求最大限度地享受社会公共财富。” [《无政府主义》，p. 59]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劳工联盟（CNT）在其 1936 年关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议中指出：“就公社间的产品交换而言，公社委员会应与区域公社联邦及生产与分配的邦联委员会进行协调，申请所需物资以及（提供）任何可用的盈余。” [引自何塞·皮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盟》，vol. 1, p. 107] 这一主张显然延续了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社会化”应当建立在“工场归属于联邦化的公社”的基础之上。[《面包与自由》，p. 136]

资本主义的遗留问题，包括富裕与贫困地区、富裕与贫困的工作场所，将是任何革命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阶级社会所造成的不平等，需要时间来改变。而邦联的任务之一，正是确保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化，使人们不因历史的偶然性而受惩罚，并确保每个公社都能发展到一个适当的水平。正如 CNT 在西班牙革命期间所指出的：

“关于社会化的反对意见很多，其中最有趣的一个观点认为，通过社会化某个行业，我们只是简单地接管并运营它，结果会导致一些行业繁荣，使得其中的工人享有特权，而另一些行业却不幸地需要工人付出更多劳动，却得到较少的收益……的确，在繁荣行业工作的工人与那些勉强维持的行业的工人之间存在差异……这些我们并不否认的异常现象，却被归咎于社会化的尝试。然而，我们坚定地认为，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异常现象恰恰是由于缺乏社会化所造成的。

“我们所提出的社会化方案，将解决这些被用来攻击社会化的问题。如果加泰罗尼亚的工业实现了社会化，一切都将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工业、农业以及

工会组织，都将在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下实现协调与规范化，劳动时间将变得更加均等，换句话说，不同行业工人之间的差异将被消除……

“社会化——请那些诋毁者听清楚——是真正的、最正宗的经济组织模式。毫无疑问，经济必须被组织起来；但绝不能按照旧的方式——正是这些旧方式导致了如今我们要加以摧毁的现状，而应当依据新的准则，使我们的人民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榜样。” [《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1937年4月30日，p. 12]

工人自治并不意味着所有形式的经济支配和剥削都会自动消失。毕竟，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可能仅凭其规模或对特定技术或资源的控制，而获取超额利润。因此，蒲鲁东建议“互助主义的倡导者”应“对市场进行调节”，以确保“成本价格的合理分解”，并在“友好协商后确定一个最高和最低利润率”，并“组织调节性社团”。[Selected Writings of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70] 看起来，农工业联合会可能正是承担这一职能的机构。同样，该联合会也将成为公开讨论和解决工团是否垄断其资源的问题的场所，即，它们是否将资源视为私人财产，而非社会化的共有财产。因此，联合会将团结工人，“以保障生产工具的共同使用”，这些工具“通过互惠契约”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James Guillaume, "On Building the New Social Order", pp. 356-79,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76]

跨行业邦联能够确保，当某个工团的成员转到另一个（或同一行业内的）工团工作时，他们享有与新工团成员相同的权利。换句话说，作为邦联的一部分，工人能够确保自己在加入任何一工作场所时，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发言权。这一点至关重要，以确保合作社社会仍然保持合作性质，因为该制度的基础是所有参与劳动过程的人都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如果某些工团正在限制人员进入，从而形成雇佣劳动关系，或者垄断资源并因此收取垄断价格；那么邦联将成为公开谴责这些工团并组织抵制它们的平台。一个寻求保护自身自由的自由社会，不太可能容忍这样的反社会行为。

然而，也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邦联仍然是集中化的，工人仍然需要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任何涉及行业或工厂的决定都直接由相关人员控制。例如，钢铁行业的邦联可能会在某次大会上，决定对行业进行合理化调整。对此，默里·布克钦描绘了可能的应对方式：

“让我们假设，（通过这次大会）设立了一个由高素质技术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提出对钢铁工业的变革方案。该委员会……建议，通过关闭部分工厂、扩大其他工厂的运营规模来优化行业结构……那么，这个委员会是‘集中化’的机构吗？答案：既是，也不是。‘是’，仅仅是因为它处理的是关乎整个国家的问题；‘不是’，因为它无权做出必须由全国执行的决定。该委员会的方案必须由所有（受其影响的）工厂的工人进行审议……委员会本身无权强制执行‘决定’，它只能提出建议。此外，委员会的成员仍受其所在工厂和社区的监督……他们不具备决策权。至于其方案的采纳、修改或否决，则完全取决于……（那些）相关的工人。”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80]

因此，邦联不会处于支配各个工团的权力地位。它不会试图决定哪些工厂生产哪种钢材、供给哪些客户、采用何种方式生产。因此，工团的邦联确保了一个去中心化、自发的经济秩序，同时避免了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即，企业内部和市场中的权力集中、周期性危机等）。

正如可以想象到的那样，这些邦联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收集和处理信息，以判断行业的发展情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顶层建立官僚体系或集中化控制。首先，关于集中化的问题，邦联由代表大会运作，这意味着在大会上选举出的任何职员都只是执行相关工团代表所做的决定。例如，新的投资决策是在邦联的大会和全体会议上制定的。需要记住的关键点是，邦联的唯一作用是协调联合行动和共享信息，它不会干涉某个工作场所的具体运营，也不会决定其如何履行消费者订单。（当然，如果某个工作场所实施了其他工团无法接受的政策，它可能会被驱逐出邦联。）由于参加这些大会和全体会议的代表是受授权的，其决策可以被各生产单位否决或修改，因此，邦联并不是一个集权化的组织。

至于官僚机构问题，收集和处理信息的确需要一个行政团队来执行这项工作。然而，这个问题同样影响资本主义企业；但由于工团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因此显然，与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公司不同，其行政规模将更小。事实上，邦联甚至可能一开始，就根本不设固定的行政机构！在定期大会上，可能会选定某个特定的工团来负责邦联的信息处理，并定期在不同的工团之间轮换这一任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形成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及其附属设备，并使整理信息的任务直接由普通工人执行。此外，这种机制还能防止官僚精英阶层的产生，因为所有参与者都需要熟悉信息处理的相关流程。

最后，邦联需要收集哪些信息？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各个工团会记录其投入与产出，并生成信息摘要。例如，消耗的总能源（以千瓦计算，并区分能源类型）、投入的原材料、消费的劳动时间、收到的订单、接受的订单、产出情况，等等。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处理，例如计算每种产品的单位能耗和劳动时间，以评估生产的效率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对于邦联而言，个别工团的产出数据可以汇总，并计算出地方及其他层面的平均值。此外，通过这一数据聚合过程，可以识别需求的变化，从而判断何时需要投资、何时应当关闭工厂。这样一来，既能避免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周期性萧条与繁荣，又不会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为集权的系统。

I.3.6 工团之间的竞争怎么办？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经常提出。他们认为，工团不会自发合作，除非被强制要求，否则它们将为原材料、熟练工人等资源相互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据他们所说，将导致富有和贫穷的工团并存，导致社会内部及工作场所内部的不平等，以及（可能出现的）来自失败工团的失业工人被那些成功的工团雇佣。换句话说，他们主张，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要么会走向威权主

义，以防止竞争；要么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会很快变成资本主义。

对于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和互助主义者来说，竞争并不被视为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以合作社和互助银行为基础的竞争，将最大程度地减少经济不平等，因为这种基于自由信贷与合作的新经济结构将消除非劳动所得（即不劳而获的收入），例如利润、利息和地租，并赋予工人足够的议价能力，以消除剥削。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资本主义扭曲了竞争，因此他们并不反对竞争本身。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即便竞争可能带来某些好处（假设竞争确实存在的话），但其弊远大于其利：这些负面影响在 [1.1.3 节](#) 中已经列举。因此，这个问题通常是针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指出，个人试图改善自身生活并不违背无政府主义原则。这怎么会是错误的呢？约翰·莫斯特和艾玛·戈尔德曼曾指出：“自私并不是犯罪，只有在社会条件使个体有机会以损害他人的方式满足自己的私欲时，它才成为一种罪恶。在无政府社会里，每个人都会寻求满足自己的自我需求。”但与此同时，他（或她）“也会向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伸出援手，因此，自私将不再是一种诅咒，而是一种祝福。”[*"Talking about Anarchy"*, *Black Flag*, no. 228, p. 28]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将合作与互助视为“私利”的一种表现，因为作为平等的人相互合作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正如约翰·奥尼尔所说：

“实际上，是制度本身界定了何谓自身利益。特别是，市场之所以鼓励利己主义，并不是主要因为它促使个体‘自利’——我们若不期待个体在大多数情况下按‘自利’的方式行事，那是不现实的——而是，因为它以一种极为狭隘的方式界定了个体的利益，尤其是以对特定物质商品的占有来衡量。其结果是，当市场机制渗透到某个生活领域时，那么对超出这一狭隘市场商品范围的物品的追求，就在制度上被定义为了一种利他主义行为。” [The Market, p. 158]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应将竞争与私利混为一谈。一个合作性的社会，将倾向于促进某些制度和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将确保人们认识到：在平等者之间的合作，比起以牺牲一切其他目标为代价来追求物质财富的个人主义行为，更能最大化个体自由和自身利益。归根结底，即便赢得整个世界，但却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又有何益？

当然，这样的社会并不会建立在对所有事物进行完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相反，它意味着平等的机会、以及自由或平等的资源获取权（例如，只有病人使用医疗资源，对平等主义者而言并无问题！）。因此，一个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并不必然是一个非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真正违背无政府主义原则的，是集中化的权力、压迫和剥削，而这些现象正是极端收入不平等和私人财产制度所导致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平等的关注，并非基于某种“嫉妒政治”，而是因为不平等很快就会导致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这种关系不仅扭曲了所有人的个性和自由，还直接影响被压迫者的健康乃至生命。

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使这种压迫关系无法存在的社会，并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式，是赋权于所有人；在被压迫者之中，培育对自由和平等的

利己地关切，并发展鼓励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至于个体改善自身处境的方式，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合作而非竞争才是最佳路径。而且，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例如，阿尔菲·科恩所著的《没有竞争：反对竞争的论证》以及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著的《合作的演化》都提供了丰富的证据，表明合作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并比短期竞争能带来更好的结果）。这也印证了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互助而非相互斗争，才真正符合个体利益。因此在一个自由且理性的社会中，竞争将被最小化，并仅限于体育运动和其他个人消遣活动。正如施蒂纳所言，合作与竞争一样具有自利主义的性质（只不过合作的道德优势过于显著，导致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但如果有一天竞争消失了，因为人们认识到协同努力比孤立行动更有利；那么，社团内部的每个人不依旧是利己主义的，追求着自身的利益吗？”[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22]

现在是时候来看关于“竞争”的反对意见，我们将首先指出，该观点忽略了一些关键点。

首先，假设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社会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竞争确实发生在各个集体之间，并导致巨大的财富不平等，那么新近致富者将不得不建立一个国家，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免受被剥夺者的侵害。因此，导致国家产生的因素是不平等，而非平等。几千年来曾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社群恰好也是平等主义的，这也并非巧合。

其次，正如在 [A.2.5 节](#)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平等”意味着“完全相同”。因此，只有当一个人认为“平等”意味着所有人获得完全相等的份额时，才会认为工资差异，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终结。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因此，在一个按照无政府主义原则组织的工团中，即便存在工资差异，也并不意味着缺乏平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工团的运作方式，因为最具危害性的形式是权力的不平等，即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的不平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不平等会转化为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反之亦然，因为财富可以用于购买私有财产（并获得国家对其的保护），从而使所有者，对该财产及受雇为其生产的人拥有权威。但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即便在本质上平等的工人之间存在轻微或适度的收入差异，也不会导致这种权力不平等，因为自治管理和社会化切断了财富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此外，当劳动在一个由反抗者组成的社会中获得了解放（毫无疑问，无政府主义社会只能是这样），少数人因相对较小的收入不平等而获得权力的情况将很难被容忍。

最后，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假装无政府社会将是完美的。因此，可能会有一段时期，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刚刚被自我管理取代的阶段，由于技能差异等因素，一些人会利用自身的优势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时间和条件等等。这一问题曾在西班牙革命时期的工业集体中存在过。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但无论如何，一些不平等、一些不可避免的不公正无疑仍会存在。在我们的社会中，总

有一些人沉溺于自私自利的深渊，即便再大的社会变革也无法将其拉出。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存在不公正，而在于如何尽可能减少其数量。”[The Conquest of Bread, p. 94]

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确实将会存在，但无政府主义者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尽量减少其影响。在无政府主义社会诞生之前，会有一个“孕育期”，在此期间，社会斗争、新的教育和育儿方式，以及其他提高意识的方法，将增加无政府主义者的数量，同时减少威权主义者的数量。

在这个孕育期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斗争。这种自发行动将对参与其中的人产生重大影响（见 J.2 节）。通过直接行动和团结互助，参与者之间建立起友谊和支持的纽带，并发展出新的伦理观、新的思想和新的理想。这一激进化过程将有助于确保，在无政府社会中，教育和技能的差异不会演变为权力的不平等，因为这不仅会使人们更不容易利用自身优势去剥削他人，更重要的是，让他人也不会容忍这种剥削！

此外，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的教育，应当致力于让成员掌握技术技能，以使他们不再依赖“专家”，从而扩大熟练工人的队伍，使他们能够在自由和平等的环境中愉快地工作。这将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工人之间的差距。然而，从长远来看，推广非威权主义的育儿和教育方式（见 J.6 节）尤为重要。正如我们在 [B.1.5 节](#) 中所指出的，诸如贪婪和对他人的支配欲等次要驱动力，是建立在惩罚和恐惧之上的、威权主义教育的产物。只有当这类驱动力在社会中得到抑制，我们才能确保无政府主义革命不会堕落为某种新的支配与剥削形式。

此外，还有其他原因表明，在任何形式的无政府社会中，经济不平等——比如因竞争“更好”的工人岗位，而导致的收入水平或工作条件差异——都会远远小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

首先，工团将由民主方式管理。这将导致工资差距大幅缩小，因为不会有由富有的董事会成员出于自身利益而决定工资水平的情况。因此，在没有工作场所等级制度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垄断他人的劳动，从而通过剥削致富：

“贫困是症状：奴役才是病因。极端的财富与赤贫，必然源于极端的放纵与奴役。大众并非因为贫穷才被奴役，而是因为被奴役才贫穷。然而，社会主义者往往只关注穷人的物质困境，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植根于奴隶精神上的退化。”[G.D.H. Cole,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 p. 41]

实证研究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因为合作社的工资结构比资本主义企业更加平等。这一点可以从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经验中得到验证，在那里，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比例为 4:1。只有在他们不得不与大型资本主义公司竞争时，这一比例才有所提高，即便如此，新的比例为 9:1，仍然远小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工资差距（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 200:1，甚至更高！）。因此，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证据表明，由工人控制或自我管理的企业所选择的分配方式，比市场规则主导的分配方式更加平等。”[Christopher Eaton Gunn, 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 45] 由于市场规则无法反映权力差异，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意外。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一个完全自我管理的经济体系将是公正的，甚至更为平等，因为权力差异将被消除，失业问题也将得到解决（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在其著作《被创造的不平等》(Created Unequal)中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失业会加剧不平等，这一点也在预料之中）。

一个普遍的谬见是，经理、高管等之所以薪资高昂，是因为他们具备独特的才能。实际上，他们的高薪源于他们作为官僚掌控着庞大的等级制机构。确保不平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性质，而非卓越的才能。即便是资本主义的热情支持者也提供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20 世纪 40 年代，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彼得·德鲁克就驳斥了“企业组织能够让才华出众的管理者脱颖而出”这一说法，他指出：“如果一个机构必须依赖天才或超人来管理，它根本不可能生存。它必须以一种能够在普通人领导下运转的方式组织起来。”对德鲁克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个体成员，而是他们之间的指挥关系与责任分工。”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p. 35 和 p. 34]。时至今日，唯一变化的是公关手段的提升，使企业的官僚结构被赋予了个性化的形象。

其次，由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不会有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如地租、利息和知识产权收益），收入差距将大幅缩小。

第三，管理岗位将实行轮换制度，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积累管理经验，从而减少因劳动分工造成的技能垄断。此外，教育将被广泛普及，确保工程师、医生及其他技术工人，是因为**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从事这些职业，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第四，我们应该指出人们工作的动机，远不止高昂的工资。团结、同理心以及同事之间的友谊，同样能减少工团之间的竞争。

当然，“竞争”这一反对意见的前提，是假定工团及其成员会将经济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少有人会像资本主义教条假设的那样成为经济机器人。事实上，合作社的经验推翻了这一说法（暂且不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自身感官和经历所获得的广泛证据，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的荒谬“经济人”^①假设）。正如 [1.3.1 节](#) 所述，新古典经济理论基于其基本假设，推断合作社成员会为了最大化人均利润，在经济形势良好时反而解雇部分成员。然而，现实与这一理论背道而驰。换句话说，那种认为人类完全按照经济理性运作的假设根本站不住脚——大量证据表明，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会塑造不同的价值考量，并相应地激励人们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

因此，尽管承认竞争可能存在，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担忧它会导致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并因此重建国家。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并提出这一论点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追求自身利益是普遍现象，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关注如何最大化自己的自由，因此不太可能容忍那些威胁自身自由的不平等出现。各公

^① 经济人(economic man): 一个理论上的人物，他在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个体，总是追求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社和工团也会更倾向于与他人分享资源，而不是收取高额价格，因为否则他们可能会遭到其他公社和工团的抵制，从而失去社会合作所带来的好处。此外，他们自身也可能成为类似行为的受害者，因此他们最好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政府主义不可能凭空实现，只有当人们真正渴望它，并开始自行组织自己的生活时，它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此，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成员，必然是那些遵循这一伦理原则的人。

因此，那些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启发的人，不太可能相互收取高价，尤其是考虑到，工团和社区议会可能会投票决定建立广泛的剩余分配机制，以避免这一问题，并确保生产是为了使用而非盈利。此外，其他公社和工团很可能会抵制任何表现出非合作行为的组织，因此社会压力很快就会让那些企图剥削他人的个体或团体重新考虑其立场。合作并不意味着容忍那些试图利用他人的人。换言之，无论是互助原则还是无政府主义理论，都并未假定人是天真的、毫无原则的利他主义者，而是认为人们愿意与他人合作，但同时也会采取行动防止自己被利用。互助原则本质上是建立在互惠关系之上的。如果某个个人或工团拒绝合作，而是试图利用他人，那么其他人完全有权利抵制他们，并采取其他方式表达抗议。自由社会的基础是所有人都能追求自身利益，而非仅仅少数人能这样做。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接受这样的假设，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应当无私地接受失败，并任由竞争摧毁自己的生活。

此外，从 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开始的不平等（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日益加剧，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工资增长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经济不稳定加剧），可以看出，竞争和不平等的加剧对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害的。因此，那些了解这些经济趋势的人（并且，如我们在 F.3 节所论证的，“自由交换”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往往会加剧而非减少不平等），不太可能主动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毫不意外的是，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中的例子表明，人们会通过合作来降低孤立和竞争带来的风险。需要记住的一点是，无政府社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因此潜在的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解决。所有这些反对意见的根本假设是，竞争比合作对所有参与者都更有利。然而，从生活质量的角度来看，即便是收入最高的工人，也会很快意识到合作才是更优越的制度。生活远不止于薪资的高低，无政府主义的存在正是为了确保人们的生活不仅仅是每周重复单调乏味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在短暂的消费狂潮中试图填补那种因利润至上而被掏空的“精神空虚”。

1.3.7 如果有人不愿意加入工团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独自劳动，自食其力。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希望强迫任何人加入工团。艾玛·戈尔德曼明确表达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她曾说：“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不是被强迫服从他人的命

令。”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2, p. 324]

因此，加入工团的决定应是自由的，同时也要保证那些不剥削、不压迫他人的个人和群体有可能在工团之外生活。马拉泰斯塔对此进行了强调，他指出，在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中，“必须立即被摧毁的……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即少数人控制自然财富和生产工具，并因此能够迫使他人**为其劳动**”，但人们必须“有权利和可能性在不同的制度下生活，无论是集体主义、互助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只要不压迫和剥削他人。” [由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所著的《生活与思想》，p. 102] 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尝试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当然一些人会质疑，无政府主义者如何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同时实施资本的没收。对此，我们只能回答，这些批评者支持：不应干涉那些掌握权力者“压迫他人”的“个人自由”。然而，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对个人自由概念的颠倒——它将压迫视为一种“权利”，并将对自由的剥夺伪装成自由本身！

然而，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个体劳动者是否会因大众运动的影响而被迫加入工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废除产权契据并不会损害独立劳动者的权益，因为他们真正的权利来源于对工具的占有和自身的劳动成果。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消灭的不是占有，而是资本主义**财产**。因此，这类劳动者“可能更愿意在自己的小作坊里独立工作”，而不是加入某个协会或联邦。[詹姆斯·纪尧姆，“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载于《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p. 362]

这意味着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独立生产者仍然可以存在，一些工作场所，甚至整个地区，可能不会成为邦联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自由社会中是正常的，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念和理想。此外，独立生产者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相矛盾，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消灭那些剥削他人劳动的所有者的产权，最重要的是在事实上的剥夺，以便……让所有生产资料由真正进行劳动的人所支配。” [马拉泰斯塔，同上，p. 103] 这种独立工作或自由结社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如在 [1.6.2 节](#) 讨论的那样）。因此，在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经济中，“个人始终有权选择独立工作，而不会因此被视为坏公民或可疑分子。” [普鲁东，转引自 K. 史蒂文·文森特所著的《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与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兴起》，p. 145]

总之，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人们既可以选择不加入工团，合作社也可以选择不与其他合作社联合。鉴于我们在 G.2.1 节已经详细讨论了经济安排的自由性，这里不再赘述。

I.3.8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寻求“专注于小规模生产的小型自治社区”？

答案是否定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追求自给自足的小型公社的说法，是列宁主义者的诽谤。他们故意曲解无政府主义思想，声称无政府主义者认真地希望社会建立在“专注于小规模生产的小型自治社区”之上。特别是，他们指责克鲁泡特金“追溯过去以寻找变革的方向”，因为“他曾西伯利亚的农民和瑞士山区的钟表匠中观察到类似的社区。” [Pat Stack, "Anarchy in the UK?", 《社会主义评论》，第 246 期] 另一位列宁主义者多尼·格鲁克斯坦（Donny Gluckstein）也对无政府主义作出了类似指控，声称蒲鲁东想要建立一个由“微型经济单位”构成的联邦。[《巴黎公社》，p. 75]

虽然这个问题更适合在 H.2 节详细讨论，但我们之所以在此回应它，因为它直接涉及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的样态，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阐述这一点。

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如何看待“专注于小规模生产的小型自治社区”这一指控呢？简单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只要阅读无政府主义理论，就会很快明白这一点）。事实上，很难弄清楚这种特定的“无政府主义愿景”到底来源于何处。正如路易吉·法布里（Luigi Fabbri）在回应布尔什维克领袖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提出的类似指控时所指出的那样，“若真有这样的‘理想’，那倒是很有趣的事情——请问在哪个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宣传册或纲领中，曾经提出过这样一条‘铁律’呢？” [《无政府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载于阿尔伯特·梅尔策（Albert Meltzer）编辑的《国家主义的贫困》，p. 21]

如果我们考察（比如）蒲鲁东的观点，很快就会发现他并没有主张“小规模”生产。对蒲鲁东而言，“大工业……是通过大垄断和大地产发展而来的：未来必须让它们由[工人]协会掌控。” [引自 K. Steven Vincent 所著的《蒲鲁东与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兴起》，p. 156]。事实上，这位法国人明确地反驳了 Stack 强加于他的立场，指出“希望废弃分工、机器和制造业，让每个家庭回归原始的个体生产模式——即最字面意义上的‘各自为政，各自为己’——”这不仅是“倒退”，而且“不可能”。[《经济矛盾体系》，p. 206]。历史学家 K. Steven Vincent 对此总结道：

“在这一问题上，必须强调的是，与二级文献所普遍呈现的形象相反，蒲鲁东并不敌视大工业。显然，他反对这些大企业在社会中引入的许多方面。例如，蒲鲁东强烈反对……让个人不断重复单一操作的机械化劳动方式——带来的贬低作用。但他并不在原则上反对大规模生产。他所希望的是使这种生产人性化，使其社会化，以免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属物。根据蒲鲁东的观点，这种对大工业的人性化改造将通过强大的工人协会得以实现。这些协会将使工人能够通过选举，共同决定企业的日常运作和管理方式。” [同上，p. 156]

此外，蒲鲁东并不认为无政府社会是由孤立的社区或独立的工作场所构成

的。正如我们在 [1.3.4 节](#) 讨论的那样，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设想自由社会的生产活动将围绕工团联合会（federations of syndicates）展开。

这种“工场联合会”（federation of workplaces）的设想同样出现在巴枯宁的著作中：“未来社会的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地发展，通过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邦化，首先是工人协会，然后是公社、地区、民族，最终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国际和世界联邦。”[《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一卷，p. 176]。与蒲鲁东一样，巴枯宁也明确反对“小规模生产”的主张，他指出：“如果[工人]试图在他们之间分割现存的资本，那么……将极大地削弱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巴枯宁认为必须实现“资本的集体所有”才能确保“劳动和工人的解放”。[《巴枯宁文选》，p. 91] 巴枯宁再一次和蒲鲁东一样，进一步强调“自由而有智慧的劳动必然是联合的劳动”，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工人为他人工作”，劳动“被剥夺了自由、休闲和智慧”。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自由生产者协会”将成为“自己的主人，并拥有必要的资本”，这些协会将“彼此联合”，并且“迟早”会“超越国界”，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联邦”。[《米哈伊尔·巴枯宁：文选》，pp. 81-83]

这样的“愿景”也不能归因于克鲁泡特金。虽然他像蒲鲁东和巴枯宁一样支持权力与决策的分权化，但他并未否定联邦制在协调活动中的必要性。正如他所说：“未来的公社将明白，它不能承认任何更高的权威；在它之上，只有它自己以及其他公社自由接受的联合会的利益。”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公社“不再意味着一个地域上的集合体；它更像是一个通用名称，是平等者之间的联合的同义词，这种联合不受边界或围墙的限制……公社中的每个团体必然会被其他公社中类似的团体所吸引；它们会汇聚在一起，并且联合它们的纽带将同它们与同胞的联系一样牢固。”[《一个反叛者的话》，p. 83 和 p. 88] 此外，克鲁泡特金也并未反对工业或机械，他曾表示自己“理解机器的诗意”，并指出，虽然“在我们现有的工厂中，机器劳动正在扼杀工人”，但这“是组织不善的问题，与机器本身无关。”[《一个革命者的回忆》，p. 111]

克鲁泡特金的设想是一种去中心化社区的联邦制，在这种体制下，生产将基于“工业在乡村的分布——将工厂带到田野之间……农业与工业相结合……形成工业与农业工作的融合。”他认为，这“必然是我们在现有条件得以重组时应当迈出的下一步”，并且这种发展“是由生产者自身生产需求所决定的。”[《田野、工厂与车间的未来》，pp. 157-8]。他基于对当时经济统计数据与趋势的详细分析提出了这一设想。

克鲁泡特金并不认为无政府主义经济应围绕小型社区展开，他提出，自由社会的基本单位应该是“足够大以便拥有多样化自然资源的区域——可能是一个国度，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地区——它自身生产并消费其大部分农业和制造产品。”这样的地区“会找到最佳方式将农业与制造业结合起来——即田野劳动与去中心化工业的结合。”此外，他认识到“一个国度内工业的地理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自然条件；显然，有些地方最适合发展特定的产业……这些产业总能在某种程度上因自然区域的特性而获得聚集的优势。”[同上，p. 26, p. 27 和 pp. 154-5]

克鲁泡特金强调，农业“如果没有机械的帮助就无法发展，而完美机械的普及又离不开工业环境……乡村铁匠无法胜任这一点。”他支持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主张在“田野与花园的门口建造工厂与作坊”，使“每个社区都能将农业、工业和知识性的活动相结合”，以确保“整体福祉的最大化”。他认为“大型企业”仍将存在，但它们应“合理布局于自然所指示的特定地点”。他强调，“若认为工业必须回归手工业阶段才能与农业相结合，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只要机器能够节省人力劳动，它就会受到欢迎并被采用；实际上，几乎所有工业门类都可以在某些制造环节大幅受益于机械化。”[同上，p. 156, p. 197, p. 18, pp. 154-5, pp. 151-2]

显然，克鲁泡特金并不反对大规模工业，他指出，“如果我们分析现代工业，很快就会发现，在某些行业中，确实需要数百甚至上千名工人聚集在同一地点进行协作。例如，大型冶金厂和矿业企业显然属于这一类别；远洋轮船也不可能在乡村的工厂中建造。”然而，他强调，在许多其他行业中，这种集中化生产并非客观必要，而是资本家为了“控制市场”以及“迎合少数人的短期利益——而绝非全国人民的利益”，而人为维持的。克鲁泡特金明确区分了两种经济趋势：一种是为资本家谋取利润和权力的趋势，另一种则指向不同的未来。当我们考虑到“人类通过在田野与作坊之间分配劳动所能获得的道德与生理优势”，就必须用对工人（以及社会和环境）最有利的标准来评估现代工业的结构，而不是以资本家的利润和权力为准绳。[同上，p. 153, p. 147, p. 153]

由此可见，列宁主义者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概括完全是无稽之谈。克鲁泡特金并未将“小规模”生产视为自由社会的基础，相反，他认为生产应围绕国度或地区这一经济单位展开：“每个地区将成为自己制造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同时也是自己农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工业将进入乡村，但“不会以资本主义工厂的现有形态，而是以社会化组织的工业生产形态，并充分利用机械与技术知识。”[同上，p. 40, p. 151]

工业将实现分权化，并与农业结合，以公社为基础，但这些公社将属于联邦的一部分，因此生产将围绕满足这些联邦的需求展开。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以理性的分权体系为基础，使生产活动和自由社会的工作场所适应适当的层级。对于那些需要大规模组织的行业，它们仍将保持这一组织方式；但对于那些在当前（即资本主义）结构下并无客观需求进行集中化的行业，则将进行分散化，以促进工作方式的转变，使其更有利于工人和社会。因此，将会形成一个生产体系，既有满足地方和地区需求的工作场所，也有为区域乃至更广泛需求服务的大型工厂。

无政府主义拒绝小规模生产和孤立公社的概念，正如我们在 H.2.3 部分所讨论的，它并不追溯过去寻找理想社会。其他形式的自由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例如，G.D.H. 科尔指出，我们“无法回到‘城镇经济’的时代，即普遍的手工业和师徒制、小规模生产。我们既不能拆除铁路、填埋矿井、拆除工厂；也不能在一个为地方市场和狭隘生产需求而发展出来的体系下，经营大规模企业。”其目标是“通过改造工业，使其符合自由合作的公社化动机，从而在工业中重新引入社群精神。”[《行会社会主义重申》，pp. 45-46, p. 46]

列宁主义者对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工业转型思想的批评，其潜台词显然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应与资本主义相同，沿用在阶级社会下发展出来的技术、工业及产业结构，而不对其进行变革（正如我们在 H.3.12 部分所指出的，列宁确实曾作出类似论断）。然而不用多说，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识到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并非出于中立的、单纯的技术需要，而是受到了维持资本家利润和权力这双重要求的扭曲。因此，社会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改造工业结构，而非维持其原貌。社会主义无法以资本主义的手段达成其目标。因此，虽然我们会“继承”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但如果不对其进行变革，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以“社会主义”之名，去加速资本家维持和增强其权力的进程（即集中化和垄断化）——则是更大的错误。

我们很抱歉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强调，但这一误解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述中，令人沮丧地频繁出现。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那些声称无政府主义者追求“面向小型自治社区的小规模生产”的人，实际上只是暴露了他们的无知。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生产应根据社会、经济和生态上的合理性来进行调整。一些生产和工作场所将服务于地方公社，一些将服务于地区联邦，一些则面向区域联邦，依此类推。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工人联合会的联邦制，以此作为结合地方自治与协调及共同活动需求的手段。任何与此相悖的说法，都是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歪曲。

最后，列宁主义者不断强调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小型”或“微型”的工作场所，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或许值得深究。显然，规模对他们而言**确实**至关重要，仿佛他们的生产单位比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要大得多。然而，正如已被证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是适当规模的工作场所，而非执着于大小问题。至于为何列宁主义者如此执迷于规模问题，或许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I.4 无政府主义经济是如何运转的？

这是所有反对现有体制的人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你打算用什么来取代它呢？当然，我们可以说，为未来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如何运转制定蓝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未来是由所有人共同创造的，而不只是由少数撰写书籍和常见问题解答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来创造的。这一点千真万确，我们无法预测一个自由社会未来实际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预测它将如何发展，而且我们在这里也无意去做这样的预测。然而，这种回答（无论它有其他什么优点）忽略了一个关键点：人们在决定用一生去努力创建无政府主义社会之前，需要对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有一些概念。

那么，一个无政府主义体系将如何运转呢？这取决于人们所秉持的经济理念。例如，互助主义经济的运转方式会与共产主义经济不同，但它们会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正如鲁道夫·罗克所说：

“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愿望，是让社会摆脱一切阻碍自由人性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强制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应被视为不允许进一步发展的封闭体系，而仅仅应被看作是为维护自由社区所采取的经济手段的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甚至很可能会同时存在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因为任何社会进步都必然与自由实验以及实际检验相关联；而在自由社区组成的社会中，会为这些提供一切机会。”（《无政府工团主义》，第 9 页）

因此，鉴于无政府主义者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我们所建议的经济体系具有诸如工人自我管理、联合、自由协议等共同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在[上一节](#)所讨论的那样）。对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现代工业社会的任务，是实现如今在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即建立一个真正基于人们自由自愿参与的社会。这些人进行生产和创造，在他们自己掌控的机构中自由地生活，且等级结构有限，甚至可能完全不存在等级结构。”（诺姆·乔姆斯基，引自艾伯特和哈内尔所著《展望未来》，第 62 页）

这是通过“自愿联合来组织劳动，并成为必要商品的生产者和分配者”来实现的，并且“要生产有用的东西。个人则去生产美好的东西。”（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下的人的灵魂》，第 1183 页）例如，机器“将取代普通商品制造中的手工劳动。但与此同时，手工劳动，很可能在许多完全由工厂制造的产品的、艺术精加工方面，拓展其领域。”（彼得·克鲁泡特金，《田野、工厂和作坊》，第 152 页）几十年后，默里·布克钦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机器将消除生产过程中的苦役，而将其艺术完善工作留给人类。”（《后稀缺无政府主义》，第 134 页）

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个人可支配的时间，以表达和发展他们的个性，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正如施蒂纳所说：“劳动组织只涉及那些别人能替我们做的劳

动……其余的劳动仍然是利己的，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创作乐曲，实现你的绘画计划等等；没有人能取代拉斐尔^①的劳动。后者是一个独特个人的劳动，只有他才有能力完成。”施蒂纳批评了他那个时代的专制社会主义者，接着问道：“（通过联合）是为谁争取时间呢？人除了恢复疲惫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之外，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做什么呢？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沉默不语。”然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争取到的时间是为了个人“在尽到了作为人的一份责任之后，能享受作为独特个体的自我！”（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268页和第269页）这恰恰也是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所主张的：

“（我们）认识到，人类除了食物需求之外还有其他需求。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理解人类的所有能力和所有情感，并且不忽视任何一种需求，我们将……设法满足他所有的智力和艺术需求……一个人在完成了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四五个小时的……工作后，他将有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支配……”

“他将完成他在田间、工厂等地方的工作任务，这是他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是他对一般生产的贡献。而在一天、一周或一年的后半段时间里，他将用来满足自己的艺术或科学需求，或者从事自己的爱好。”（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110-111页）

因此，虽然专制共产主义忽视了独特的个体（在施蒂纳撰写他的经典著作时，存在的共产主义形式只有这一种），但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与施蒂纳的观点一致，且并不对此保持沉默。和他一样，他们认为组织劳动的全部意义在于为个人提供表达个性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换句话说，就是去追求“独特个人的劳动”。因此，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将他们对自由社会的论证，建立在这个社会将如何使真实的个体受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概念或模糊的集体（如“社会”）之上。因此，《面包与自由》一书的第9章名为“对奢侈的需求”，而第10章则名为“快乐的工作”。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组织起自愿的工人协会，这些协会将努力尽量减少无意义的劳动，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用于创造性活动的时间，无论是在“工作”之内还是之外。这将通过平等者之间的自由合作来实现，而这种合作被视为基于自身利益。毕竟，虽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能宣称“竞争是自身利益的一种表现”，但事实上，竞争导致大多数人为了少数拥有和控制社会的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你把时间卖给老板，以换取老板对你发号施令并占有你劳动的成果，而这段时间你永远无法挽回。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结束一个压制个性的制度，建立一个团结与合作的制度，让我们有时间享受生活，并自己获得劳动的成果。换句话说，互助比相互争斗能带来更好的生活，所以“为斗争的联合，相较于为生存的斗争及其野蛮的日常竞争，将有效地支撑文明、进步和进化。”（路易吉·贾拉尼，《无政府主义的终结》，第26页）

^① 拉斐洛·桑齐奥·达·乌尔比诺（意大利语：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1483—1520），通称拉斐尔（Raphael）。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建筑师。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成为人性化和个性化我们自身和社会的一种手段；从仅仅为了生存，转变为真正地生活。生产活动应该成为一种自我表达、带来快乐和体现艺术的方式，而不是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情。最终，“工作”应该变得更像是玩耍或爱好，而不是目前这种被异化的活动。生活的优先事项，应该是实现个人的自我满足和使社会更加人性化，而不是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把社会当作市场的附属品来运转”，并把我们自己变成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赞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观点：

“我承认，那些认为‘人类的正常状态是为了出人头地而奋斗’的人所描绘的生活理想，并没有吸引我；那种相互践踏、碾压、推搡和尾随他人的行为，构成了现有的社会生活模式——这绝不是人类最理想的命运，而不过是工业发展某个阶段令人不快的症状而已。”（《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文集》，第三卷，第754页）

无政府主义的目标远不止于消除不平等。因此蒲鲁东评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信条”，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解放无产阶级并消除贫困”。这种解放将通过“民主组织的工人协会”来结束“工资奴隶制”而实现。（《没有上帝，没有主人》，第一卷，第57页和第62页）或者，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是“所有人的福祉”——包括物质、精神、情感和道德方面的福祉！事实上，仅仅关注贫困问题而忽视无产阶级的解放，就会掩盖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

“‘享受幸福的权利’，意味着有可能像人一样生活，并把孩子培养成比我们所处的社会更好的社会成员；而‘劳动的权利’，仅仅意味着成为工资奴隶、苦力的权利，受未来中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享受幸福的权利意味着社会革命，而劳动的权利只不过意味着商业主义的乏味苦役。现在是工人维护自己对共同遗产的权利并占有它的时候了。”（克鲁泡特金，同前引，第44页）

因此，虽然我们拒绝确切地定义无政府主义体系将如何运转，但我们将探讨上述无政府主义原则和理想付诸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请记住，这只是一个可能的体系框架，可供借鉴的历史实例很少。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指出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的大致轮廓。那些寻求具体蓝图和精确规划的人，应该另寻他处。很有可能，我们提出的这个框架会根据人们在创建新社会时所面临的真实经历和问题，而被修改、改变（甚至被忽视）。

我们应该指出，有些人可能倾向于将这个框架与资本主义理论（即完美运转的“自由”市场或准完美市场）进行比较，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相比较。一个完美运转的资本主义体系，只存在于教科书和那些将理论视为现实的空想家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体系是完美的，尤其是资本主义；而将“完美的”教科书上的资本主义与任何现实体系进行比较，是一项毫无意义的任务。正如我们在第C章深入讨论过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甚至都没有描述资本主义的现实，那么为什么会认为，它能为关于后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带来启发呢？又如何指望它去理解那些摒弃了其所有权专制和不平等的、后资本主义体系呢？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对我们的经济关系进行质的改变；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无政府主

义经济的动态将反映它所发展出的具体形式，而不是像资本主义这样充满阶级和等级制度的体系所产生的形式，也不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而发明的那种非历史性的个人主义抽象概念！

因此，任何试图把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化（或者更准确地说，为资本主义辩护和合理化）中得出的概念，应用于无政府主义的尝试，都无法把握非资本主义体系的动态。约翰·克伦普（John Crump）在讨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无政府主义时，强调了这一点：

“当考虑纯粹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制度的可行性时，我们需要明确衡量它的标准。例如，要求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准，如年增长率、贸易平衡等来评估它是不合理的……用为衡量资本主义表现而设计的标准，来评估无政府共产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求资本主义根据纯粹无政府主义者最为重视的绩效指标来评估其运作，比如个人自由、社区团结以及个人无条件的自由消费权利，资本主义会感到困惑。面对这样的要求，资本主义要么会承认这些不是它能够合理衡量自身的标准，要么就不得不采用它经常使用的那种怪诞的意识形态托词，比如将人类自由等同于市场，进而等同于工资奴隶制……纯粹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所倡导的替代社会的信心，并非来自于期望它在国民生产总值、生产力或类似的资本主义标准方面会在数量上超过资本主义。相反，他们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热情源于他们的理解，即它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纯粹无政府主义者对生产和分配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当然相信无政府共产主义将为所有人提供经济上的幸福。但他们也不准备像资本主义经常做的那样，优先考虑狭义的经济扩张，而忽视个人自由和社区团结。”（《八太舟三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的纯粹无政府主义》，第 191-193 页）

最后，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改变经济的运转方式并非一蹴而就。正如在 [1.2.2 节](#) 所讨论的，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摒弃社会瞬间变革的观念，并认为革命需要时间来发展，并改变几个世纪以来阶级社会和等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东西。这种转变以及由此给人们和环境带来的变化，只有通过所有人的充分参与，来克服自由社会将面临的（众多）问题，以及解放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新的相处方式——才能够实现。自由的人们将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实际办法，因为“会有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需要克服，但与中央集权国家控制这一庞然大物相比，（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体系本身要简单得多。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设置了如此不近人情的距离，以至于会从中产生无数的困难。”（赫伯特·里德，《无政府与秩序》，第 49 页）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革命所激发的热情、释放的能量以及由革命所激发的创造力，必须被给予充分的自由和空间，以找到创造性的渠道。”（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第 223 页）因此，我们这个常见问题解答这一部分中的观点，仅仅是建议和可能性而已。

I.4.1 无政府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意义在于确保“所有人的福祉”。在自由社会里，人们不会为了让富人更富而辛苦劳作，而是会共同努力“确保整个社会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这样的经济将建立在“以最少的人力消耗，为社会提供最大数量的有用产品”的基础之上，以满足“人类的需求”。（《面包与自由》，第 43 页、第 144 页和第 175 页）不用说，在今天，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对自然造成的破坏也要最小化。

就需求而言，应该强调的是，这些需求并不仅限于物质商品（尽管物质商品可能很重要，尤其是对目前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来说）。需求还包括从事由自己掌控的、有意义的工作，拥有舒适且生态可持续的环境，在工作内外都能自由地表达自我，以及许多其他与生活质量相关的方面——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无政府主义所寻求的，不仅仅是通过自我管理来解放经济活动（尽管自我管理也很重要），更是要对其进行变革。

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真正的财富包括有用且美好的事物，包括那些有助于塑造强壮、美丽的身体，以及激发生活灵感的美好环境的事物。”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尽可能自由地发挥个人的所有潜在能力”，而这“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才有可能实现：人们能够自由选择工作方式、工作条件，并拥有工作的自由。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制作一张桌子、建造一座房子或耕种土地，就如同绘画对于艺术家、发现对于科学家一样——是灵感的产物，是强烈渴望的结果，并且对作为一种创造力的工作怀有浓厚的兴趣。”（艾玛·戈尔德曼，《红色艾玛发言录》，第 67 页和第 68 页）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根据需要进行生产，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为了生产而组织生产，以便为少数人赚取利润。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生产应该“仅仅成为消费的仆人；它必须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塑造自身，而不是向消费者发号施令”。（《为自己行动》，第 57 页）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寻求为了生产而生产，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远非如此，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这样的制度“意味着耗尽**全部**精力去生产东西，因为从字面上理解，这意味着要工作到筋疲力尽；也就是说，通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需求，我们却毁灭了人性。”换句话说，自由社会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会考虑到生产者的需求（以及我们所生活的星球的承载能力）。因此，会寻求一种平衡。马拉泰斯塔接着说：“我们想要的是，每个人都能以尽可能好的方式生活：这样，每个人只需付出最小的努力，就能获得最大的满足。”（《在咖啡馆》，第 61 页）

所以，虽然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显然是创造财富，即在不使资本家或其他寄生虫在这个过程中致富的情况下，满足个人需求；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没错，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能过上适合人类尊严生活的社会标准的社会。没错，它旨在消除贫困、不平等、个人匮乏以及社会的浪费和肮脏，但它的目标远不止于此。它旨在创造出能够在“工作”内外表

达个性的自由个体。毕竟，从一个工作场所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支持资本主义的人可能会说是利润，其他人可能会说是成品或商品。事实上，从一个工作场所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工人。我们在工作场所的经历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不能被忽视。

正如资本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把“效率”置于一切之上（实际上，资本主义把利润置于一切之上，并且阻碍像工人控制这样虽然能提高效率但会损害权力和利润的发展），就是在否定我们自己的人性和个性。如果不懂得欣赏优雅和美，那么创造东西就不会有乐趣，拥有东西也不会有乐趣。“进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沉闷，而非更加丰富。当技能和细心被认为是奢侈品时（即使不会损害“效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会损害资本家和管理者的利润和权力），一个人又怎能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呢？我们不是机器。我们需要工匠精神，而无政府主义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对自由社会的构想中考虑到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不仅是我们生产有用物品的过程，而且（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来说），是以一种赋予个人力量的方式生产出美的东西的过程。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指责资本主义因其不合理的本质和运作方式而浪费了人类的精力和时间，而这些精力本可以用来创造美好的事物（无论是在个人发展方面还是在劳动产品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为了生活而辛苦劳作，结果是为了辛苦劳作而活着。”（威廉·莫里斯，《有用的工作与无用的劳作》，第 37 页）

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目标，不是创造结果上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得到完全相同的商品。正如我们在 [A.2.5 节](#)所指出的，支持资本主义的人所描述的这种“平等”的“愿景”，更多地反映了这些社会主义批评者在想象力和道德观念上的贫乏，而非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真实描述。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支持社会平等，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包括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各种选择之间进行抉择的自由。平等地对待他人，就是尊重他们的欲望和兴趣，承认他们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让人们和其他人消费同样的东西，并不是尊重每个人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展自身能力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意味着满足欲望和兴趣的机会平等，而不是将抽象的最低（或最高）标准强加于独特的个体之上。平等地对待独特的个体，意味着承认他们的独特性，而不是否定它。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真正目标，是确保“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发展其人性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米哈伊尔·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 295 页）如果你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就无法发展你的人性。不用说，以“平等”（即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独特的个体，简直是一种恶行。比如说，你不能让一位 70 岁的老妇人做和一个 20 岁的男子同样的工作，以获得同样的收入。不，无政府主义者不认同这样的“平等”，这种“平等”是资本主义“数学伦理”的产物，而非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这样的方案与自由社会格格不入。无政府主义者所渴望的平等是一种社会平等，建立在对影响自身的决策的掌控之上。因此，无政府主义经济活动的目标是提供所需的商品，以实现“所有人的平等自由，一种能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平等条件。”（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 49 页）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的不是个体的自然平等，而是社会平等，以此作为正义的条件和道德的基础。”（巴枯宁，同前引，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人类控制生产，而是生产控制着人类。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渴望建立一个经济网络，使个人的自由时间得以最大化，以便他们能够表达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同时创造美好的事物）。所以，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不是仅仅因为“如果不生产经济就会崩溃”而去进行生产，而是要确保我们以一种解放个人、并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赋予其权力的方式，生产出有用的东西。

这种愿望，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资本主义对“效率”的定义。无政府主义者会认同艾伯特和哈内尔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人是有意识的主体，其性格特点以及偏好会随着时间而发展，要评估长期效率，我们必须考虑经济制度对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如我们之前所解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效率极低，因为等级制度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导致社会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和失去权力。正如艾伯特和哈内尔接着指出的那样，“自我管理、团结和多样性都是评判经济制度的合理的价值标准……询问特定的制度是否有助于人们实现自我管理、多样性和团结，这是明智的。”（《参与式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第 9 页）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社会中，任何经济活动都应该以一种尽可能给参与者带来愉悦的方式去做有用的事情。这种活动的意义在于表达参与者的个性，而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掌控工作过程本身。只有通过自我管理，工作才能成为赋予个人权力和发展其能力的一种手段。

简而言之，用威廉·莫里斯的话来说，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有用的工作将取代无用的苦役。

1.4.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废除工作？

无政府主义者期望看到人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会“证明”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废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工作，是我们所面临的、自由的主要威胁之一。

如果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味着自治，那么很明显，在工作场所受制于等级制度会削弱我们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如同任何技能一样，批判性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需要不断地实践，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因此，存在权力结构的工作环境会损害这些能力。亚当·斯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大多数人的认知必然是由他们日常的工作塑造的”。既然如此，“一个人一生都在重复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的结果可能总是相同或几乎相同，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拓展自己的认知……并且通常会变得愚蠢无知到了人类可能达到的极限……但在每一个进步和文明的社会中，劳动阶层的穷人，也就是广大民众，必然会陷入这样的境

地，除非政府努力去阻止。”（引自诺姆·乔姆斯基《501年：征服美洲的编年史》，第18页）

斯密的这一观点（那些声称追随他思想的人通常会忽略这一点）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不同类型的权威结构和不同的技术，对在其中工作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卡罗尔·佩特曼指出，有证据表明“只有某些工作环境才有利于培养适合自由的心理特征”，比如“个人自信和效能感，这些是政治效能感的基础”。（《参与和民主理论》，第51页）她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观点，该专家认为，在基于高度理性化的工作环境和广泛劳动分工的资本主义公司中，工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作节奏和技术，没有机会施展技能或发挥领导才能，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机会解决问题并贡献自己的想法”。根据一项心理学研究，工人“安于现状……依赖他人而非独立自主……对自己缺乏信心……态度谦卑……他们最普遍的情绪状态……似乎是恐惧和焦虑”。（引自佩特曼，同前引，第51页和第52页）

佩特曼总结的证据表明，一个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作环境的权威结构”，那些更加专制且劳动分工更细的工作场所，对个人的自尊心、自我价值感和自主性更为不利。在那些“工人对自己的工作有高度的个人控制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外部控制”，或者基于“一群员工的集体责任”，这些员工“能够控制工作的节奏和方法，而且工作团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我约束”的工作场所中，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性格特征。（佩特曼，同前引，第52-53页）这种特征表现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自主性，以及对大社会中公民身份的坚定认同”，以及“高度发展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因此乐于参与社区的社会和政治机构”。因此，“一个人的工作性质会影响他的社会性格和个性”，并且“工业环境往往会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R.布劳纳语，引自佩特曼，同前引，第52页）

因此，引用鲍勃·布莱克（他指出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批评，就是他“对工作的批判”）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把我们变成了“愚钝的顺从者”，并使我们“处于一种确保人们奴性的监视之下”。出于这个原因，用鲍勃·布莱克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废除工作”。（《废除工作及其他文章》，第26页、第22页和第19页）

在这里，“工作”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生产活动。远非如此。（做必要的事情或生产性活动意义上的）工作，将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无法摆脱它；庄稼需要种植、学校需要建造、房屋需要修缮等等。不，这里所说的“工作”是指工人无法控制自己活动的任何形式的劳动。换句话说，就是各种形式的雇佣劳动。

一个在生产中基于等级关系的社会，将导致典型的工人在工作中很少发挥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工作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控制权，因为在工作时间内他们受老板的管理。这已被证明会降低个人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就像在任何否定自治的社会关系中所预期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劳动分工极度细化，尤其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它把工人贬低为仅仅是听从老板命令的机器操作员。因此，一个不支持经济自由（即自我管理）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根本算不上自由意志主义者。

资本主义将其存在的合理性建立在消费之上，这导致了一种轻视我们在生产活动中所花费时间的重要性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和发展自己独特的属性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认为应该忽视“工作”而青睐消费的观点是完全荒谬的。生产活动是发展我们内在力量和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换句话说，是发挥创造力的方式。资本主义对消费的强调显示了这个制度的贫乏。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

“我们不能仅靠面包为生。的确，如果没有满足物质需求的机会，生存是不可能的。但满足这些需求绝不是生活的全部。可以说，我们目前剥夺数百万人权利的制度，将肚子视为了宇宙的中心。但在一个明智的社会里……人类的同情心、正义感和权利感，也将有机会得到发展、满足、拓展和成长。”（《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152-153 页）

因此，资本主义建立在一种持续的异化消费过程之上，因为工人们试图在一个不存在生产性、创造性、自我管理活动所带来的快乐的地方——商店的货架上，去找到与之相关的幸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盲目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宗教的延续，因为个人试图在生活中找到意义和幸福；而这种意义和幸福，在雇佣劳动和其他等级制度中受到了挫折。

资本主义对个人精神的侵蚀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威廉·戈德温所说：“压迫精神、奴性精神和欺诈精神，这些都是现有财产管理制度的直接产物。它们都同样不利于知识和道德的进步。”（《无政府主义者读本》，第 131 页）任何基于工作中等级关系的制度，都会导致个人的精神麻木，并使人愿意服从经济上的主人。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建立一个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基于自由的社会。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废除工作，仅仅是因为它限制了那些不得不工作的人的自由，并扭曲了他们的个性。引用艾玛·戈尔德曼的话说：

“无政府主义旨在消除劳动中那些令人麻木、枯燥乏味的方面，消除其沉闷和强制的特性。它旨在使工作成为快乐、力量、色彩和真正和谐的源泉。这样，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能在工作中找到消遣和希望。”（《无政府主义及其他论文》，第 61 页）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废除工作后就无需生产必要的商品了。远非如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停止做事。它意味着创造一种基于玩乐的新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是一场顽皮的革命……一场充满普遍欢乐和自由相互依存的活力的集体冒险。玩乐，并非是消极被动的行为。”其目标是“废除工作，并在工作具有有用目的的范围内，用多种新型的自由活动来取代它。要废除工作，需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向入手。”从数量方面来说，“我们需要大幅减少正在进行的工作量”（幸运的是，“大多数工作要么毫无用处，要么更糟；我们应该直接将其摒弃”）。从质量方面来说，“我们必须对剩余的有用工作进行改造，将其转变为各种令人愉悦的、类似游戏和手工艺的消遣活动，这些活动与其他令人愉悦的消遣活动并无区别，只是碰巧能产生有用的最终产品。”（鲍勃·布莱克，同前引，第 17 页和第 28 页）

这意味着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会尽一切努力将枯燥、不愉快的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并确保任何必要的生产活动都尽可能令人愉快，并且基于自愿劳动。然而，记住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观点很重要：“社会主义社会将能够缩短工作日时长，而且必须这样做，但这不会是其首要关注点。它的首要任务将是……改变工作的本质。问题不在于给个人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这些时间很可能是空洞的时间——以便他们可以随意用‘诗歌’或木雕来填充。问题在于让所有时间都成为自由的时间，并让具体的自由在创造性活动中得以体现。”从本质上讲，“问题在于将诗意融入工作中。”（《政治与社会著作》，第二卷，第107页）

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废除“工作”（即那些不由从事者控制的生产活动），以确保任何必要的生产性经济活动，都由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来管理。通过这种方式，工作可以得到解放和转变，从而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手段，而不是自我否定的形式。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想要废除工作，是因为“生活，也就是生活的艺术，已经变成了一个枯燥的公式，平淡而毫无生气。”（伯克曼，同前引，第166页）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将生活的自发性和乐趣带回生产活动中，将人类从资本的束缚中拯救出来。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表达，是人类表达自我和进行创造的内在需求的一种体现。资本主义扭曲了这些需求，通过劳动分工和等级制度使经济活动成为一种令人麻木的体验。我们认为，“工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应该是确保人们的物质生存，并使他们能够享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福祉的一种手段。在那些工业至上、人却被忽视的地方，就会出现无情的经济专制统治，其危害程度不亚于任何政治专制统治。这两者相互助长，且根源相同。”（鲁道夫·罗克，《无政府工团主义》，第2页）

关于废除工作的最后一点。正如我们在 [A.5.2 节](#) 所讨论的，5月1日——国际劳动节——是为了纪念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烈士而设立的。过去和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应该通过罢工行动和大规模示威来庆祝这一节日。换句话说，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际劳动节就应该是一个不工作的日子！这很好地总结了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作的立场——庆祝劳动节应该基于对工作的摒弃。

由弗农·理查兹编辑的《为什么工作？关于休闲社会的论证》一书中的文章集，是了解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对工作看法的一个有用的起点。

I.4.3 无政府主义者打算如何废除工作？

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以及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来实现。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处于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枯燥、重复的劳动等等，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创建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所有人可以同时成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人与人之间仅存的差异，是由天赋的自然多样性所导致的，并且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职能，都赋予人们平

等享受社会资源的权利。”（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第 42 页）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权力分散和使用合适的技术。权力分散对于确保劳动者能够决定如何解放自身劳动至关重要。一个权力分散的体系，能够确保普通人识别出技术创新的领域，进而明白废除某些工作的必要性。如果普通人无法理解和控制技术的引入，那么他们就永远无法充分认识到技术带来的益处，并且会抵制那些可能对他们最有利的技术进步。这就是“合适的技术”的完整含义，也就是说，去使用那些受其影响最大的人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最有益的技术。这样的技术可能在技术层面上是“先进的”，也可能不然，但它必须是普通人能够理解，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够掌控的技术。

从资本主义中可以看出合理利用技术的潜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被用于增加利润、扩张经济，而不是将所有人从无用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当然，它确实使少数人摆脱了这种“活动”）。正如经济学家朱丽叶·B·肖尔所指出的，生产力“衡量的是每小时工作所产生的商品和服务。当生产力提高时，工人要么可以用更少的时间生产出当前的产量，要么在工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就有了拥有更多自由时间的可能性。例如，自 1948 年以来，美国工人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提高了一倍多。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可以用不到当年一半的时间，生产出 1948 年的生活水平……我们实际上本可以选择每天工作四小时，或者一年只工作六个月。”（《过度劳累的美国人》，第 2 页）

而且，请记住，这些数据涵盖了许多在自由社会中不会存在的经济领域的生产活动——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军事武器生产、财产保卫、金融部门等等。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事商业活动……包括广告从业者，以及当前体系中的各种其他中间人”，还有军队以及“大量从事不必要且有害职业的人，比如建造军舰、制造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这些人“将通过一场革命转而从事有益的工作”。（《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224-225 页）所以，仅仅因为会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事必要的工作，每周的工作时长就会减少。此外，商品的制造将更加耐用，因此许多生产活动将变得更加合理，而不再受那种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来最大化利润的、疯狂欲望的支配。另外，这还没有考虑到更公平的消费分配对生活水平和生产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工作时间减半的情况下所达到的生活水平，将远远高于肖尔所提到的 1948 年的基线水平（更不用说自那以后的技术进步了！）。简而言之，不要认为回到 1948 年的工作时长就意味着要回到那个时期的实际生活状态！

此外，每周工作时长的减少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因此，”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总结的那样，“当劳动时间减少时，休息得更好的工人往往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与较之前更长时间内相同甚至更多的产品。”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主之间的竞争使得确定一个最佳的工作日时长不太可能。”此外，“更多的可支配时间可能会更好地促进人们的幸福——也就是说，有助于培养信任、健康、学习、家庭生活、自力更生和公民意识等方面。”虽然这可能会降低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传统经济指标，但事实上这些指标存在缺陷。毕竟，“GDP 的增长可能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减少，同时伴随着商品和服务产出的增加，而这些商品和

服务的唯一效用，要么是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要么是修复因过度劳累或忽视非市场活动所带来的一些社会损害。”（汤姆·沃克，《为什么经济学家不喜欢“劳动总量固定”理论》，第 279-291 页，《社会经济评论》，第 65 卷，第 3 期，第 286 页、第 287-288 页和第 288 页）

所有这些都表明，每天工作四小时来生产有用商品的情况下，生产水平将远远高于 1948 年的水平，当然，工作日时长甚至还可以进一步缩短。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大幅减少生产所需工作时间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水平。一旦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许多工作是为了管理利润体系的各个方面，或者是由这个体系及其造成的损害所导致的——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除了能够生产有用的商品之外，还能为我们提供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不是长时间辛苦工作，为少数人生产剩余价值）。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仅仅减少工作时长，而保持剩余工作的现状就足够了。那将是愚蠢的做法。我们的目标是改变剩余的有用生产活动。当自我管理普及之后，我们将见证劳动分工的终结，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合为一体，并且劳动者同时也是工作的管理者。这将使“人的所有能力在‘工作’内外都能自由发挥”。（彼得·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 148 页）这种发展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将生产活动转化为一种令人愉悦的体验。用默里·布克钦的话来说，工作过程的质量和性质至关重要：

“如果工人委员会和工人对生产的管理，不能将工作转化为一种愉悦的活动、不能将自由时间变成一种美妙的体验、不能将工作场所变成一个社区，那么它们就仅仅是形式上的结构，实际上是阶级结构。它们延续了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产物的局限性。事实上，任何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要求的运动，除非它试图推动工作场所环境的全面变革，否则都不能被视为革命运动。”（《后稀缺无政府主义》，第 88 页）

工作将主要成为一个人对其所从事活动的愉悦表达，并且变得像一门艺术一样——是他们创造力和个性的体现。作为一门艺术的工作，将在工作场所和工作过程中得以体现，工作场所将被改造并融入当地社区和环境之中（见 [1.4.15 节](#)）。这显然也适用于在家中进行的工作，否则“如果一场革命陶醉于自由、平等、团结这些美好的词汇，却在家中维持着奴役状态，那它就不能被称为革命。一半的人类遭受着家庭奴役，仍然不得不起身反抗另一半人。”（克鲁泡特金，同前引，第 128 页）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将工作中最美好的部分（实际上，也是唯一美好的部分）——使用价值的生产——与玩乐中最美好的部分相结合……即它的自由、乐趣、自愿性和内在的满足感”。简而言之，就是将生产（创造“看似必需的东西”）转化为“生产性的玩乐”。（鲍勃·布莱克，《烟囱闪电》，《Friendly Fire》，第 48 页和第 49 页）

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见 [1.3.2 节](#)）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只有那些受制于特定工作模式的人，才能够将这种工作模式及其工作场所，转变为适合自

由个体进行创造的环境。只有那些了解一个，在像资本主义这样的等级制度中才会存在的工作场所的人，才能够安全、迅速地使其停止运作。自由联合的基础将确保工作的废除，因为个人会申请从事他们喜欢的“工作”，因此会有兴趣将他们不想做的“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将通过确保劳动者真正掌控自己的工作来废除工作。“个人的主动性将受到鼓励，任何追求一致性和集权化的倾向都将受到抵制。”（克鲁泡特金，引自马丁·布伯《乌托邦之路》，第42页）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不会选择专注于某一种生产活动，而不选择其他活动。远非如此，在自由社会中，人们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¹活动，将其作为自我表达的主要焦点（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相同的游戏和消遣，那么为什么要期望在生产性玩乐中也是如此呢？）。“显然，”克鲁泡特金指出，“并非所有男女都同样喜欢从事科学工作。人们的兴趣各不相同，有些人会在科学中找到更多的乐趣，有些人喜欢艺术，还有些人则对众多创造财富的领域中的某一个感兴趣。”这种“工作的分工”在人类社会中很常见，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这种做自己感兴趣且擅长之事的自然愿望将受到鼓励。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认识到知识专业化的必要性，但我们坚持认为，专业化必须在接受通识教育之后进行，而且通识教育必须同时涵盖科学和手工艺两个方面。我们反对将社会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将这两种活动结合起来……我们提倡全面教育（integral education），即完整的教育，这意味着消除那种有害的分工。”不用说，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要胜任某些任务需要进行培训和学习，而自由社会将确保个人在承担这些任务之前，达到公认必要的水平（例如，通过一个组织认证程序的专业机构来实现）。然而，克鲁泡特金也意识到，多样化的活动和扎实的基础知识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处：“但是，无论每个人喜欢从事何种职业，如果他（或她）拥有扎实的科学知识，那么他（或她）在自己的领域中就会更有价值。而且，无论他是谁……如果他一生中花一部分时间在车间或农场（车间和农场）工作，与人们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并因知道自己作为一名无特权的财富生产者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感到满足，那么他将从中受益。”（《田野、工厂和作坊》，第186页、第172页和第186页）

然而，虽然专业化会继续存在，但将个人永久划分为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个人将管理所需“工作”的各个方面（例如，工程师也将参与对自己工作场所的自我管理），人们将被鼓励从事多样化的活动，资本主义那种严格的劳动分工将被废除。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用工作分工（the division of work）来取代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ur）。我们必须强调，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约翰·克伦普，很好地总结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八太舟三关于这种区别的观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八太所区分的‘劳动分工’……和‘工作分工’……虽然八太认为，劳动分工……是阶级分化和剥削的根源，但他并不认为工作分工有什么险恶之处……相反，八太认为工作分工是任何生产过程中良性且不可避免的特征：‘不用说，在社会中，无论何种生产，都必然存在工作分工。’……[对于]八太[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如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一样]所指出的[劳动分工的]危险，并非源于在任何特定时间，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然而，

真正危险的是，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人们沿着职业路线永久地划分……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包括]将劳动降格为一种机械性功能；对其他生产部门缺乏责任感、理解或兴趣；以及需要一个上级管理机构来协调各个生产部门。”（《八太舟三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的纯粹无政府主义》，第 146-147 页）

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虽然在每一项单独的事业中，暂时的职能分工仍然是成功的最可靠保证，但永久的分工注定会消失，并将被各种各样的追求所取代——包括知识、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追求——这些追求与个人的不同能力以及每个群体中多样化的能力相适应。”（同前引，第 26 页）

顺便说一句，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综合劳动一定比分工劳动效率更低，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并没有采用综合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很多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论断的非人道逻辑。毕竟，即使奴隶制实际上比雇佣劳动更具生产力，也很少有人会支持奴隶制，但这正是这种论点的逻辑结论。如果有人认为奴隶制没有成为主要劳动模式的唯一原因，仅仅是因为它效率低下，我们会认为这种人毫无人性可言。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病态的意识形态，它为了稍微多一些的产品而欣然牺牲个人利益。遗憾的是，这正是许多资本主义捍卫者最终所主张的观点。

其次，资本主义企业并非中立的结构，而是一个等级制度体系，有着根深蒂固的利益和需求。管理者只会采用能够维护他们权力（进而维护他们的利润）的工作技术。正如我们在 J.5.12 部分所讨论的，虽然工人参与的实验显示出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但管理者却停止了这些实验，仅仅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工人的控制权会通过赋予工人权力来削弱他们的权力；而工人一旦获得权力，就能够为自己在生产的价值中争取更大的份额（更不用说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老板需要他们工作，但他们并不需要老板来管理他们！）。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缺乏综合劳动，仅仅意味着它无法增强管理者的权力，也无法保障他们的利润和权力，而不是因为它效率更低。

第三，管理者和老板通过取缔工会来引入“灵活性”的尝试表明，综合劳动是更有效率。毕竟，针对工会合同的主要抱怨之一是，它们明确记录了工人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例如，工会成员会拒绝去做超出他们商定工作描述的工作）。这通常被视为监管弊端的一个例子。然而，如果我们从合同和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它揭示了这两者作为合作手段的低效率和缺乏灵活性。毕竟，这种拒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工人拒绝做合同中未明确规定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描述表明了他们在合同中约定要做的事情，而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事先达成一致。合同明确规定了工作场所中工人和老板之间清晰、具体且商定好的劳动分工。

虽然这是一份精心设计的合同的绝佳范例，但管理者发现，由于这些合同，他们无法运营自己的工作场所。相反，他们需要一份通用的“按吩咐行事”的合

同（当然，这很难说是一份减少权力的合同），这样的合同将众多工作任务整合为一个。管理者对工会合同的抨击表明，生产实际上需要某种形式的综合劳动才能顺利进行（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合同的虚伪性，因为劳动“灵活性”仅仅意味着劳动“商品化”——机器不会质疑自己的用途，而资本主义的理想，是让劳动也具有类似的不质疑的性质）。工会的工作描述表明，生产需要劳动的整合，同时也需要工作分工。正如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蒂斯所说：

“现代生产已经摧毁了许多传统的职业资格。它创造了自动或半自动机器。由此，它自身拆除了工业劳动分工的传统框架。它催生了一种通用工人，这种工人经过相对较短的学徒期后，能够操作大多数机器。一旦超越其阶级层面，在大型现代工厂中将工人‘分配’到特定岗位的做法，越来越不符合真正的劳动分工，而越来越像是一种简单的任务分工。工人被分配到生产过程的特定领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业技能’始终与管理层‘所需的技能’相匹配，而仅仅是因为恰好存在某个空缺的职位。”（《政治与经济著作》，第二卷，第 117 页）

通过用工作分工取代劳动分工，一个自由社会将确保生产活动能够转化为一项（或一系列）令人愉悦的任务。通过综合劳动，生产者的所有能力都能够得到发挥，从而消除社会中异化和不幸福的一个主要根源。“社会经济的主要课题，”克鲁泡特金认为，“是满足人类需求所需的能量经济。”这些需求，显然，既包括生产者对能够赋予他们权力且有趣的工作的需求，也包括他们对健康、平衡环境的需求。因此，克鲁泡特金讨论了“将工业追求与精耕细作的农业相结合，以及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所能带来的“好处”。“当每个社区将各种农业、工业和知识追求相结合时，就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而且，当一个人能够将自己多样的能力应用于农场、车间、工厂、书房或录音室中的多种追求，而不是一生都只专注于其中一种追求时，他（或她）才能展现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同前引，第 17-18 页）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厂没有理由接受目前普遍存在的、人为的严格劳动分工。将会有充分的理由鼓励工人在车间和部门之间、生产区域和办公区域之间进行轮换。”“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残余将逐渐被消除”，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打破这种分工，就无法生存。”（卡斯托里亚蒂斯，同前引，第 117 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去中心化的社会体系将使“工作”被废除，使经济活动人性化，并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即生产有用的物品，并解放个人）。正如鲁道夫·洛克所言，这一目标将通过“自由男女团体的联盟来实现；该联盟基于合作劳动，并以社区利益为依归，按照计划管理事务。”然而，由于物品是由人生产的，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意味着对“人的计划管理”（尽管提出这一危险的人很少会将其应用于资本主义企业，而资本主义企业本质上类似于微型的中央计划国家）。这一反对意见是错误的，因为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从根本上重建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并是在社会主义精神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而且“只有生产者本身才适合承担这一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中唯一创造价值的因素，只有他们才能孕育新的未来。”这种重建的经济生活将以无政府主义原则为基础，即“基于邦联主义原则，自下而上的自由结合；将每个成员的自决权置于首位，并仅承认基于相似利益和共同信念的有机协定。” [Anarcho-Syndicalism, p. 72, p. 62 and p. 60]

换句话说，生产者同时也是管理者，因此他们在自由联合中自治。（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联合会都会进行“计划”和“规划”，关键在于谁制定计划，谁执行计划。在无政府状态下，这两个职能由同一群人承担。）对“事务的计划管理”将由生产者自身在其独立的团体内完成。这种管理方式很可能采取（正如我们在 [1.3 节](#) 所述的）工团邦联的形式，各工团之间相互交流信息，并根据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变化，合作地（即“有计划地”）调整所需的生产资料投入。这里不存在“中央计划”或“中央计划者”来管理经济，而只有工人们作为平等者的相互合作。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自由社会主义“必须源自成千上万个独立的地方行动，这些行动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它不能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指挥，而必须来自无数地方性的需求和愿望。” [Act for Yourselves, p. 54]

事实上，任何形式的联合都需要协议。因此，即使是建立在共产无政府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基础上的社会，也需要达成协议，以确保合作事业的成功。换句话说，合作社成员必须在内部以及彼此之间制定并遵守协议。例如，工团成员需要共同商定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如果个体想要更换“工作”，则需要提前通知工团等。任何集体行动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合作和协议。此外，在各工团之间，也可能达成协议，以确定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所需承担的最低工作时间。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基于其成员之间的最低工时“契约”：

“我们承诺为你们提供房屋、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学校、博物馆等的使用权——条件是，在你们二十岁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之间，每天贡献四到五个小时的劳动，这些劳动被认为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加入任何生产团体，或者组织一个新的团体，只要它能够承担起生产必需品的责任。至于你们的剩余时间：可以随意结伴，从事娱乐、艺术或科学活动，完全取决于你们的兴趣……每年工作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个小时……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全部要求。而作为回报，我们保证你们可以自由使用所有这些团体所生产的、或将要生产的物品。” [The Conquest of Bread, pp. 153-4]

这种“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工作将由个人自主认可，并通过生产工团对劳动力的需求得以体现。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从事何种工作，这取决于各个现有联合体所提供的职位。一张工会会员卡，或许可以作为记录工时并确保个人能够享有社会共同财富的一种方式。同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个人和团体也完全可以选择独自劳动，并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与他人交换，包括与工团邦联进行交换。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尽可能保持灵活性。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社会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建立在两种基本安排之上——首先，在所选择的工团内，每周约定最低工作时长，例如 16 小时；其次，个人可以自由选择额外的“工作”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例如艺术创作、科学实验、自主修缮、演奏音乐、作曲、园艺等。最低工作周的具体安排，会因工作场所和公社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有些工团可能选择每周工作 2 天，每天 8 小时，而另一些工团可能安排每天 4 小时，持续 4 天。有的工团可能采用弹性工作制，而有的则可能设定较为固定的工作时间。毫无疑问，为了适应消费模式的变化，各工团需要扩展或缩减生产，并需要吸引志愿者来完成必要的工作，尤

其是那些被认为危险或不受欢迎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可能会安排每天从事数小时此类工作，以换取更多的自由时间；或者可以约定，某些不受欢迎的工作一小时，可抵消其他更受欢迎工作的多小时劳动（关于这一点，可参考 [1.4.13 节](#)）。毋庸置疑，技术进步的目标是消除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任务，并逐步减少基础工作周的时间，直到必要的“工作”和“自由时间享受”这一概念被彻底废除。无政府主义者深信，在自由社会中，权力的去中心化将释放无穷的创新潜力，确保不受欢迎的工作被最小化并公平分配，同时使必要的生产活动尽可能变得愉悦和有吸引力。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协议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因为它是“人为的”（而非“供求法则”这一“自然法则”）。例如，个人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以此为理由为非资本主义市场辩护，以反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然而，尽管从理论上讲，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声称，在他们设想的社会中，只要不侵害他人，个人如何谋生、何时何地工作都无关紧要；但事实上，任何经济体系都建立在个体之间的互动之上。“供求法则”很容易，且经常使“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这一理念变成笑话——现实中，个人往往不得不按照市场力量的要求来工作（即受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但这种力量却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围，详见 [1.1.3 节](#)）。这意味着，个人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而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工作。意识到“市场力量”是长时间劳动的根源，并不会让这种现象变得更令人接受。

而对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来说，将自由个体之间的某些协议视为专制，而其他协议却不被如此看待，这种观点是令人费解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合作以减少劳动是“专制的”，而市场上的个人协议却不是，但这种逻辑在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是荒谬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让个体被“看不见的大手”迫使劳动时间远超过自身的意愿，会要比他们与他人共同协商以管理自身事务、最大化自由时间更加合理。

因此，在权力去中心化和适当技术运用的基础上，自由和平等个体之间的自由协议，就会被认为是废除工作的关键所在。

1.4.4 无政府状态下可采用哪些经济决策标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希望看到货币的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将共产主义强加给人们。恰恰相反，只有当共产主义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时候，它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会认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在考虑某种解决方案时，不要“预先决定生产者在他们的不同团体中，应该接受何种分配形式——无论是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劳动券、平等的工资，还是任何其他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当下某种解决方案是最佳的。（《无政府主义》，第 166 页）自由实验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关键要素。

虽然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想要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有特定的偏好，并为此进行争论，但他们也意识到，客观环境和社会意愿将决定在革命期间会采用何种制度（例如，虽然克鲁泡特金是一名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并且认为革命应尽快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也意识到，共产主义不太可能立即全面推行——详见 [1.2.2 节](#)）。然而，我们将概述一些可能的经济决策标准，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们将说明在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中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

在互助主义或集体主义制度下，答案很简单。价格将会存在，并被用作决策的一种手段（不过，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这种非共产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将“寻求一种方法，以确保货币真正代表其持有者所完成的有用劳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靠他人劳动生活的手段”[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 101 页和第 100 页]）。互助主义比集体主义更以市场为导向，集体主义则基于集体联盟来应对需求的变化（即决定投资决策，并确保供应与需求保持一致）。互助主义以合作社和互助银行网络为基础，实行基于市场的分配体系；由于其基本运作方式与任何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相同，在此无需赘述。而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则需要更深入地讨论。然而，所有制度都基于工人的自我管理，因此，直接受到影响的个人会来决定生产什么、何时生产以及如何生产。通过这种方式，工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劳动成果。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之间的差异在于：这些决策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工人用于做出决策的标准。

尽管集体主义倡导工人协会拥有最大程度的自主权，但不应将其与互助主义或个人无政府主义支持者所倡导的市场经济相混淆。集体化的工厂和作坊所生产的商品，不是按照从消费者那里榨取的最高价格进行交换，而是根据其实生产成本进行交换。这些“诚实的价格”的确定，将由每个社区的“交换银行”来完成（显然，这个想法借鉴了蒲鲁东的观点）。这些银行将代表社区中的各种生产者联盟和消费者/公民团体，并会协商确定这些“诚实的”价格（很可能会包括污染等“隐性”成本）。这些协议将由相关各方的大会批准。

正如詹姆斯·纪尧姆所说：“商品的价值将由地区合作联盟和各个公社之间的合同协议预先确定，这些公社也将向交换银行提供统计数据。交换银行将向生产者发放代表其产品价值的可转让凭证；这些凭证在公社联盟所涵盖的整个地区都将被接受。”例如，这些凭证可能与工作时长相关，并且在用作投资决策的参考时，还可以辅以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中可能使用的那种成本效益分析（见下文）。尽管这个方案与蒲鲁东的“人民银行”有很强的相似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交换银行以及“公社统计委员会”旨在同时发挥规划职能，以确保供应满足需求。这并不意味着是斯大林式的指令经济，而只是简单的记账工作，因为“每个交换银行都要提前确保这些产品有需求，（以避免）立即向生产者发放支付凭证所带来的风险”。（《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第 356-379 页，《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 366 页和第 367 页）工人联合会仍将决定生产哪些订单，每个公社也可以自由选择其供应商。

正如后面将更深入的讨论（见 1.4.8 节），关于消费模式的信息将被记录下来，供工人参考，以便他们做出生产和投资决策。此外，我们可以想象，生产联合会

将鼓励公社、消费者团体和合作社参与这些决策的制定。这将确保生产的商品能够反映消费者的需求。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社“银行”的交换功能，（很可能）将逐渐被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的商品分配所取代。换句话说，大多数集体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它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发展之前的一种临时措施。

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类似，即一种由集体、公社和分配中心（公社商店）组成的联盟体系。然而，在无政府共产主义制度下，价格不再被使用。那么经济决策将如何做出呢？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如下：

“至于涉及一般性选择的决策，例如使用何种能源形式、在生产特定商品时选择使用两种或多种材料中哪一种、是否建造新工厂等，可以使用一种……技术……（名为）‘成本效益分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采用一种点数方案来确定各种相关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赋予这些因素的点数将是主观的，因为这将取决于社会的审慎决策，而不是某种客观标准；但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必须为某些‘成本’或‘效益’赋予货币价值时，情况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正是将人类从资本主义对生产时间/金钱的执着中拯救出来，因此，作为一种考虑其他因素的手段，成本效益分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适用。以这种方式使用点数系统来确定相对重要性……只是为了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下，采用一种技术来促进决策的制定。”（亚当·别克和约翰·克伦普，《国家资本主义：新管理下的工资制度》，第 138-139 页）

这个点数系统将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确定某种特定商品的使用是否有效率。与价格不同，这种成本效益的分析系统，将确保生产和消费反映社会 and 生态成本、意识以及优先事项。此外，这种分析将作为决策的指导，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决策和评估。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

“很明显，在决定是建造一座桥还是一条隧道时，存在一个属于人类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比成本低廉或机械可行性问题更重要：即，实际建造过程中会损失多少生命？或者让一定数量的人在地下监督隧道交通，去度过他们整个工作日是否明智？……同样，在丝绸和人造丝之间的社会选择，也不能仅仅基于不同的生产成本或纤维本身的质量差异来做出：在决策中还需要综合考虑的是，养蚕和参与人造丝生产之间在工作乐趣上的差异。产品对劳动者的贡献与劳动者对产品的贡献同样重要。一个管理良好的社会可能会改变汽车装配流程，尽管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速度和降低成本，但目的是为工人创造一个更有趣的工作流程：同样，它要么会花费成本为干法水泥厂配备除尘器——要么用一种危害较小的替代品来取代这种产品本身。而当没有其他选择时，它则会将需求本身大幅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技术与文明的未来》，第 160-161 页）

显然，在今天，我们还应将生态问题以及人类问题考虑在内。任何忽视工作质量或对人类和自然环境影响的决策过程，都是不合理的。然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运作的，市场奖励那些引入非人性化和对生态有害做法的资本家和管理者。实际上，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和环境如此偏见，以至于许多经济学家和资本主义支持者认为，出于这些社会关切（比如，通过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可以体现）而降低“效率”，实际上对经济有害，这完全颠倒了常识和人类情感（毕

竟，经济肯定应该满足人类需求，而不是为了经济而牺牲这些需求吧？）。他们的论点是，由于资源（人力和物力）将从更“高效”的生产活动中转移出去，消费将受到影响，从而总体上降低我们的经济福祉。这种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消费并非与经济的其他部分孤立存在。我们想要消费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这又受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我们拥有的社会关系类型、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满意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工作令人感到疏离且质量低下，那么我们的消费决策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的工作受到等级控制且本质上是奴性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期望我们的消费决策是完全理性的一——事实上，它们可能会成为一种通过购物来寻找幸福的尝试，这是一种自我挫败的行为，因为消费无法解决生产中产生的问题。因此，猖獗的消费主义可能是资本主义“效率”的结果，所以对具有社会意识的生产的反对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除了绝对稀缺性之外，资本主义下的价格也反映了相对稀缺性（从长期来看，市场价格趋向于生产成本加上基于市场垄断程度的加价，而在短期内，价格会因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如何考虑这种短期变化并在整个经济中传达这些变化，将在 [1.4.5 节](#) 进行讨论。此外，它很可能也会考虑到所从事工作的受欢迎程度，以表明生产过程中涉及的人类时间的潜在浪费（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讨论，见 [1.4.13 节](#)）。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与人们讨厌生产的资源相比，人们**喜欢**生产的资源能更好地利用个人时间这一稀缺资源。做出合理决策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商品的相对稀缺性。毕竟，在做决策时，选择使用一种稀缺的商品而不选择更为丰富的商品，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虽然成本效益点数系统将显示绝对成本（所需的工作时长、能源使用、污染等），但这将由关于特定商品稀缺程度的信息、以及生产该商品所需工作的受欢迎程度来补充。

因此，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将围绕一个各工团之间相互交流信息的网络来构建。与资本主义中工作场所之间传递价格信息不同，实际的物理数据（成本）将会被发送。这些数据是对商品的这些（负面）使用价值（例如生产该商品所使用的资源、劳动时间和能源、污染细节）以及相对稀缺性的总结。将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根据共同商定的共同价值观，确定在特定情况下使用哪种商品是最佳的。这些信息将用于为使用哪些商品的决策提供参考，将商品满足生产要求的程度（正面的使用价值），与其在劳动力、资源使用、污染等方面的影响（负面的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相对可获得性，进行比较。

一个特定工作场所的数据可以与整个行业的数据进行比较（因为工团邦联会收集和整理这些信息——见 [1.3.5 节](#)），以确定该工作场所是否能高效地生产所需商品（这个系统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即可以指出哪些工作场所需要投资，以便在工作条件、工作时长等方面，追上或超过行业的平均水平）。此外，可能会达成一些通用的经验法则；例如，除非别无选择（要么是那些需要大量劳动力、能源和时间来生产的商品，要么是那些当前需求超过供应能力的商品），否则不使用稀缺材料的协议。

同样，在订购商品时，相关的工团、公社或个人必须告知工团为什么需要该商品，以便工团决定是否愿意生产该商品，并使他们能够对收到的订单进行优先

排序。通过这种方式，资源的使用可以受到社会因素的引导，而“不合理”的请求将被忽略（例如，如果一个人表示他们“需要”一个造船工团为他们个人建造一艘船，造船联合会可能认为没有“必要”建造这艘船，而是会建造供公社使用的船只，供所有人轮流免费使用——见 [1.4.6 节](#)）。然而，在几乎所有个人消费的情况下，就不需要这样的信息，因为公社商店会像现在一样批量订购消费品。因此，经济将是一个由相互合作的个人和工作场所组成的庞大网络，任何社会中存在的分散知识都能得到有效利用（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果**更好**，因为它不会像市场价格那样掩盖社会和生态成本，而且合作将消除商业周期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

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单位，由于它们在联合会内的自主性，了解生产对社会有用的产品；又由于它们与公社的联系，也了解生产所需资源的社会（人类和生态）成本。它们可以将反映整体社会优先事项的这些知识，与它们对工作场所和社区具体情况的本地知识相结合，来决定如何最好地利用其生产能力。通过这种方式，联合会可以有效地利用社会中的知识分工，同时克服价格机制（见 [1.1.2 节](#)）和资本主义内部工作场所等级制度（见 [1.1.1 节](#)）对知识交流施加的限制。

此外，生产单位通过在联盟内的联合，确保了它们之间的有效沟通。这就产生了一个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协商协调的过程（即横向联系和协议），以做出重大投资决策，从而将供求结合起来，并使各个单位的计划能够得到协调。通过这种合作过程，生产单位可以减少重复劳动，从而减少与过度投资相关的浪费（以及价格机制相关的繁荣与衰退的不合理性，因为价格机制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使工作场所能够有效地协调它们的计划）。

在评估生产方法时，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考虑社会和生态成本，并且必须对这些成本进行评估。当然，哪些成本将被考虑在内，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重要程度（即如何对它们进行权衡），将会由相关人员决定。在决策过程中，要考虑哪些因素以及如何权衡这些因素，将定期进行评估和审查，以确保其反映实际成本和社会关切。由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认为，鼓励所有人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很重要，因此公社邦联的作用是确定给定投入和产出的相对点数价值。通过这种方式，社区中的**所有人**都能决定他们的社会如何发展，从而确保经济活动对社会需求负责，并考虑到受生产影响的每个人的愿望。这样，消费和生产就可以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需求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需求相协调。行业邦联将努力确保这些信息被记录和传达，并（也许会）制定全行业的平均值，通过让工团和公社将特定商品的点数与典型值进行比较，来辅助决策过程。

因此，用于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因素将达成一致，并且信息将在工作场所和公社之间进行传达，以便商品的消费者能够从生态影响、资源利用和人力劳动等方面评估商品的成本。成本效益分析中任何商定的投入值，都可以纳入与产出相关的信息中。因此，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将寻求基于多个标准来做出决策，而不仅仅是利润或（比如说）劳动力。这样做的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单一标准很少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但市场力量和不平等限制了这种能力（如果人们需要维持生计，他们往

往会购买更便宜的产品），同时价格机制和公司的自身利益确保了成本信息被隐藏（例如，很少有公司公开承认它们的外部性，而且大多数公司会花费大量资金进行广告宣传，以粉饰它们的产品）。

为了处理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中传达的成本信息，可以创建会计工具（如电子制表软件或计算机程序）。这些工具可以将已确定的因素作为输入，并返回对可用选择的成本效益分析。因此，虽然这些算法程序和指导方针可以（而且确实应该）手动计算，但很可能会广泛使用计算机来获取输入数据并将其处理成合适的格式。实际上，许多资本主义公司都有这样的软件，可将原材料投入和成品记录到数据库和电子表格中。这样的软件可以成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决策算法的基础。当然，目前此类数据被货币所掩盖，并且没有考虑到外部性和所涉及工作的性质（而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会考虑这些因素）。然而，这并不限制它们的潜力，也不能否认在共产主义中使用此类软件可以为决策提供参考。

因此，声称“共产主义由于缺乏价格而无法评估不同的生产方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看看资本主义市场的实际情况——其特点是议价能力和市场权力的差异、外部性以及雇佣劳动——很快就会发现，价格准确反映成本的说法根本不准确。然而，客观情况可能会导致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无法立即推行（正如在 [1.2.2 节](#) 所讨论的，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因此，在特定经济中可能会有一个过渡时期，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元素会共存。很容易看出，一个互助主义经济（社会革命通常的初始产物）如何能够演变为集体主义经济，然后再演变为共产主义经济。最初，市场产生的价格可以由非市场信息（针对客观成本和稀缺指数）来补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据将取代市场价格，成为工团和公社的主要决策标准。

关于这个主题的最后一点。使用何种方法、选择哪些标准、传达哪些信息以及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将由自由的人民来决定。本节只是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如何做出关于生产的明智决策的、一种可能性的建议。它并非是一张蓝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I.4.5 那么“供求关系”呢？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忽视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即在特定时刻，某种商品会有一些的产量，同时也会有一定量消费或使用它的需求。我们也不否认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兴趣和喜好。然而，这并非通常所指的“供求关系”的含义。在一般性的经济辩论中，这个公式常常被赋予某种神秘色彩：既忽视了其背后的现实，也忽略了该理论的一些不良影响（例如，正如在 [C.1.5 节](#) 所讨论的，市场能够通过将粮食出口到有需求的地区，从而极为高效地制造饥荒）。至少可以说，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供求法则”并非最“高效”的分配手段，因为决策往往偏向于富人。

就分配稀缺资源方面的“供求关系”而言，无政府主义者深知，有必要生产并向有需求的人分配必需的商品。问题在于，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如何知道宝贵的劳动力和材料没有被浪费呢？人们如何判断哪些工具最为合适？如果不同的材料都符合技术规格，他们又该如何在这些材料中做出选择呢？某些商品比其他商品重要多少呢？玻璃纸和真空吸尘器的集尘袋相比，哪个更重要，而又应该生产哪一个呢？

市场的支持者声称他们的体系能够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个人主义和互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他们所倡导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会通过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差异来传达这类信息，个人和合作社也会相应地做出反应。而对于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甚至排斥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答案就没那么简单了。正如在 [1.1.3 节](#) 所讨论的，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尽管市场确实能回答这些问题，但它是以不合理且非人性化的方式来作答的（虽然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为明显，但不能假定在资本主义之后的市场中，这种情况就会消失）。问题是：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吗？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所以，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排斥市场。在某些人看来，这种排斥往往意味着实行中央计划。正如市场社会主义者大卫·施韦卡特所说：“如果资源的使用和生产技术不是由利润因素决定的，那么就必然由中央指令来决定。如果利润不是生产组织的目标，那么实物产出（使用价值）就必然成为目标。”（《反对资本主义》，第 86 页）然而，施韦卡特的观点是错误的。横向联系不一定基于市场，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合作也不一定是等级制的。他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模式——要么是雇佣关系（纯粹靠金钱维系），要么是等级关系（如国家、军队或资本主义工作场所中的关系模式）。但实际上，人们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模式，比如友谊、爱情、团结、互助等等。因此，你可以帮助他人或与他人合作，而不必被命令去这样做，也无需为了金钱而为之——我们一直都是如此。你可以与他人合作，因为这样做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益处。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方式，即互助与自由达成共识的方式。

所以，施韦卡特忽视了任何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际关系。例如，爱情或吸引力，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而利润因素并不会介入其中。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施韦卡特的论点存在缺陷，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资源的使用和生产技术可以根据人类的需求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共识来组织，而无需考虑利润或中央指令。这种体系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必须彼此相爱（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相反，它意味着我们认识到，通过平等自愿的合作，我们能够保持个体的自由，并且能够从资源共享和协作中获益（例如，减少每日和每周的工作时长，在安全卫生的工作条件下进行自我管理的工作，以及自由选择整个社会的产出成果）。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狭隘且贫乏的利己主义的、自身利益。

因此，自由达成的共识和横向联系并不局限于市场交易——它们的形成有诸多原因，无政府主义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乔治·巴雷特所说：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工人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抗，他们通过直接行动掌握了局势。难道很难去想象，在某条街道上忍饥挨饿的人很快会列出所需面包的清单，然后把清单拿到罢工工人占领的面包店去吗？难道难以想象面包店会根据这份清单烤制出所需数量的面包吗？这时，面包师们会知道需要哪些手推车和送货车来把面包分发给人们；如果他们把这个需求告知车夫和货车司机，这些人难道不会尽最大努力提供车辆吗？……如果……（面包师们需要）更多的工作台（来制作面包）……木匠们就会提供（诸如此类）……就这样，这种无尽的连续性得以维持下去——各个部分之间保持着良好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需求就是这一切背后的驱动力……就像每个自由的个体出于对充分享受生活的渴望，在没有其他外力驱使的情况下，与他（或她）的兄弟姐妹们联合起来生产面包、制造机器以及所有生活必需品一样，每个机构都是自由且独立的，它们相互合作并与其他机构达成协议，因为这样做能够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这里不存在剥削或发号施令的中央集权国家，整个结构得以稳固支撑，是因为每个部分都依赖于整体……这将是一个能够响应人民需求的社会；它会像满足人民的最高理想一样，迅速地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它不断变化的形式将成为人类情感的即时表达。”（《无政府主义革命》，第 17-19 页）

为了做出生产决策，我们需要了解他人的需求以及相关信息，以便评估我们可以选择的各种方案，从而满足这些需求。因此，这是一个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传递信息的问题，而市场常常会隐藏（或积极封锁）这些信息，或者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歪曲这些信息（也就是说，在市场中，需求并不重要，“有效需求”才重要，而这使得市场向富人倾斜）。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部分讨论了这样的信息网络，其中探讨了一种基于使用价值对不同材料、技术和资源进行比较的方法。此外，在做出决策时，还需要考虑到当前库存、生产和消费的波动情况。

为了表明某种特定商品稀缺程度的相对变化，有必要计算出可以称之为“稀缺指数”的数值。这将告知该商品的潜在使用者其需求是否超过了供应，以便他们能够根据其他人的决策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策。例如，这个指数可以是一个百分比数字，用来表示某种商品的订单数量与实际生产数量之间的关系。例如，某种需求高于供应的商品，其指数值可能为 101%或更高。这个数值会提醒潜在使用者开始寻找该商品的替代品，或者节约使用该商品。每个工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稀缺指数，并且（可能）在地区、“国家”等层面上，整个行业也会有一个综合的数值。

通过这种方式，就会关注到某种特定商品的高需求情况，因此只有那些真正需要该商品的生产者才会下单订购（从而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不用说，也会采用库存水平和其他基本的记账方法，以确保某种特定商品存在合适的缓冲库存水平。这可能会导致生产出一些多余的商品作为库存，以应对某种商品总需求的意外变化。这样的缓冲系统将在单个工作场所层面和公社层面发挥作用。工团显然会有自己的库存，包括原材料和成品库存，这些库存可以用来应对需求的意外增长。公社商店、医院等也会储备物资，以应对供应的意外中断。

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实际需求与预期需求之间的差异会通过意外的库存变化来调节。如今的企业也会保留一定的闲置产能，以

应对需求的突然增长。在无政府主义制度下，维持库存和闲置产能的这些策略也会继续存在。可以假定，如果工团及其邦联意识到有必要调整产能，他们会希望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为了提供需要进行此类调整的信息，无需根据需求变化来调整价格。这是因为“需求的变化首先会表现为在现有价格下（或在无货币体系中被消费的）销售量的变化，因此会反映在库存或订单的变化上。这种变化是需求与当前产出之间出现不平衡的非常好的指标或信号。如果某个生产单位产品的需求变化被证明是永久性的，那么它会发现自己的库存减少，订单积压增加，或者库存增加而订单减少……因此，为了提供关于需要调整产能的信息，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价格并非必要之举。”（帕特·迪瓦恩，《民主与经济计划》，第 242 页）

所以，工团、公社及其邦联，会建立商品缓冲库存，以应对供求关系中无法预见的变化。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使用过类似的库存机制，以防止农产品和其他战略原材料的市场状况发生变化，从而避免出现剧烈的现货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认为，这种机制所带来的商品价格的稳定“是 1945 年至 1972 年间世界经济空前繁荣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总统尼克松废除了这些缓冲计划，导致了“剧烈的商品价格波动”，并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争议》，第 114 页和第 115 页）同样，无政府主义社会很可能会利用这种缓冲系统来消除供求关系的短期变化。通过减少商品供应的短期波动，不良的投资决策将会减少，因为工团不会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在做出决策时被过高或过低的市场价格所误导（正如在 [1.1.5 节](#) 所讨论的，这种不均衡的价格会传递错误信息，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扭曲）。

这与 [1.4.4 节](#) 中描述的成本效益分析相结合，将使无货币经济中的变化信息能够迅速在整个系统中传播，并影响所有的决策者，而大多数人无需了解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这将使一个联合会能够确定哪种商品消耗的资源最少，从而为其他用途留出最多的资源（即相对成本或稀缺性），同时也能让他们了解到生产该商品所使用的资源情况（即所涉及的绝对成本）。相关信息会传达给所有相关方，而无需像在列宁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中那样，由一个“无所不知”的中央机构来下达命令。正如在 [1.1.2 节](#) 中所论述的，无政府主义者早就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集权机构，能够掌握分散在整个经济中的所有信息来组织生产；而且如果这样的机构试图这么做，由此产生的官僚体制实际上会减少决策者可获取的信息量，并使其变得匮乏，从而导致物资短缺和效率低下。

为了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让我们以铜行业的变化为例。假设某个铜矿意外停产，或者对铜的需求增加。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首先，最初的变化会表现为每个工团为应对意外的需求变化而维持的铜库存减少。这将有助于缓冲供应或需求的短期变化。其次，自然地，生产铜的工团对铜的需求会增加。这会立即提高这些企业及其产品的**稀缺指数**。例如，该指数可能会从 95%（表明相对于当前需求，生产略有过剩）上升到 115%（表明对铜的需求相对于当前生产水平有所上升）。这种**稀缺指数**的变化（再加上难以找到愿意接受订单的铜生产工团）会进入其他工团的决策算法中。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他

们的计划发生变化。例如，这些工团可以寻找其他稀缺指数较低的供应商，或者使用铜的替代品，因为替代品可能成为更高效的资源选择。

通过这种方式，对铜产品的需求会下降，很快就只会反映出那些真正需要铜的需求（即没有现实可行的替代品）。这将导致需求相对于当前供应下降（从其他工团的需求，以及维持缓冲库存水平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样，整个经济体系就收到了一个普遍的信息，即铜变得（相对）稀缺了，并且各工团也根据这一信息调整了计划。这些决策并非由中央计划者做出，也无需货币来推动。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非市场的系统，它基于自治组织之间的产品自由交换。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如何应对铜的供需变化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铜业工团和跨行业工团会定期开会，铜行业形势的变化问题会摆在桌面上，他们必须考虑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其中一部分是要确定这种变化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短期变化（例如由矿难引起的）不需要规划新的投资。然而，长期变化（例如新的需求是由另一个工团开发的新产品导致的，或者现有矿山即将枯竭）可能需要协调一致的投资（我们可以预期工团会根据变化制定自己的计划，例如投资新的机械设备以更高效地生产铜或增加产量）。如果这些计划的预期变化大致与预测的长期变化相符，那么工团就无需采取行动。然而，如果两者不相符，那么可能就需要对新的铜矿进行投资，或者在整个行业进行大规模的新投资。联合会将会提出这样的计划。

毫无疑问，未来是难以准确预测的，只能进行猜测。因此，某些行业可能会出现过度投资的情况，因为预期的变化并未成为现实。然而，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这不会导致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缺乏利润，企业会不顾社会需求而关闭）。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一些生产出来的商品不会被使用，一些劳动力和资源会被浪费，工团会对生产进行合理化调整，关闭相对低效的工厂，并将生产集中在更高效的工厂中。资本主义那种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将成为历史。

总之，每个工团都会接收自己的订单和物资供应，并将自己的产品发送给特定的消费者。同样，公社配送中心会从其选定的工团订购所需的商品。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者可以选择那些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工团，这样生产单位就会了解到生产对社会有用的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资源的社会成本。这样，一个横向关系网络就会在整个社会中展开；其中的协调是通过联合会的平等性实现的，而不是依靠企业结构的等级制度。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了“孤立悖论”（见 [B.6 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公社应该替人们决定消费什么。那将是一种禁锢。不，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同，应由个人来决定自己的需求，而他们所加入的集体则决定诸如公园、基础设施改善等社会需求。然而，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讨论做出这些决策的框架是有益的。例如，这可能意味着公社将同意生产环保产品，减少浪费，并在总体上通过社会互动来做出更完善的决策。个人仍然会根据集体生产的产品来决定自己想要的商品种类，但这些商品将基于社会达成的共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原子化消费带来的浪费、污染和其他“外部性”。例如，虽然个人开车上班是合理的，但从集体角度来看，这会导致严重的**非合理**现象（例如交通堵塞、污染、

疾病以及糟糕的社会基础设施)。一个理智的社会将会讨论与汽车使用相关的问题，并会同意建立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公共交通网络，这将减少污染、压力和疾病等等。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认可个人的品味和需求，但他们也意识到这些品味和需求对社会的影响，所以试图创造一个社会环境，让个人能够通过他人的想法来丰富自己的决策。

与此相关的是，显然不同的工团会生产略有差异的商品，从而确保人们有选择的余地。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不同公司（有时甚至是同一家跨国公司！）生产的多种功能相同的产品所带来的当前这种浪费现象，是否会继续存在，这是值得怀疑的。然而，生产仍会是“主题变奏曲”的形式，以确保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并让生产者了解消费者更喜欢哪些产品特性。事先坐下来列出某种商品应具备的所有特性是不可能的——这假定了拥有完美的知识，并且技术相当稳定。但这两个假设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都有限。因此，合作社将生产具有不同特性的商品，并且生产会根据这些差异所反映的需求进行调整（例如，A 工厂生产了一款新的 CD 播放器，消费模式表明这款产品很受欢迎，于是其他工厂也会进行相应的转型）。此外还有研发实验和试用群体。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者的选择将得到维持，并且会得到增强，因为人们能够（在某些情况下）作为生产者影响工团的决策，也能够通过工团与公社之间的对话来产生影响。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有点煞风景，但资本主义只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幻想世界中才使供求相等。正如我们在 [1.1.5 节](#) 所讨论的，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并且往往会为了追求之前供应不足的商品所带来的更高利润而过度生产，从而导致危机时期的出现；在危机期间，有效需求下降，供应也相应减少。更不用说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了，即真正的需求（需要）得不到满足，仅仅是因为人们太穷，买不起这些商品（即没有有效需求）。因此，认为“只有非市场体系才存在确保供求平衡的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忽视“供求关系”。相反，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对这一常识性概念的诠释存在局限性，并指出资本主义是基于有效需求的，而这种有效需求与资源的有效利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不是市场体系，而是一种基于生产者之间横向联系的体系。这种体系能够有效地在社会中传递关于供求相对变化的信息，反映的是社会的实际需求，而不是银行账户余额。关于如何根据供求变化做出投资回应，将在 [1.4.8 节](#) 进行讨论，而 [1.4.13 节](#) 将讨论工作任务的分配问题。

I.4.6 无政府共产主义真的不会导致供不应求吗？

非共产主义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将消费与所完成的工作量联系起来，从而自动地将需求与生产联系起来，但在共产无政府主义中并非如此。在那种体系下，分配是按需进行的，而非按劳分配。鉴于此，一个常见的反对观点是，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会导致人们取用超过自身需求的资源，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例如，克鲁泡特金就曾指出：“自由共产主义……将收获或制造出的产品置于所有人的支配之下，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在家中按其所愿进行消费。”[《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演变中的地位》，第7页]但是，有人会说，如果有人声称他们“需要”一栋豪华别墅或一艘私人游艇，那该怎么办呢？简而言之，工人们可能“没必要”去生产这些东西。正如汤姆·布朗所说：“这类东西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在工团主义制度下……任何贪婪、自私的人都不太可能哄骗一整个造船厂的工人，为他一己之私建造一艘船。会有豪华的蒸汽游艇，但它们将是供大家共同享用的。”[《工团主义》，第51页]

因此，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由获取产品是建立在真实个体的实际劳动之上的——“社会”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是人们共同劳动才有所产出。这反映在共产主义的经典表述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生产者有需求，而接受分配的人也有（生产的）能力。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需求都必须被考虑在内，这意味着生产者必须觉得有必要去进行生产。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工团或个人愿意生产某一特定订单的产品，那么这个订单就可以被归类为“不合理的”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不合理”指的是没有人自愿同意去生产它。当然，如果个人真的想要某样东西，他们可能会同意通过交换服务来让别人生产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但这种行为绝不会破坏共产主义社会。

这同样适用于对稀缺商品的需求，因为生产这类商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无论是作为特定的工团还是其联盟组织）会拒绝满足这样的“需求”，或者公社及其联盟组织会认为这是对资源的浪费。归根结底，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会努力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之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利润的追逐导致了为生产而生产、为消费而消费的现象，而且许多人不得不更加努力、长时间地工作，以满足少数（富裕）阶层的需求。自由的人们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评估任何活动的利弊。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所说：

“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显然，并不意味着人们拥有满足自身所有需求的绝对权利，因为需求是无限的……所以需求的满足总是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而且，如果社区为了满足少数个人的过度需求（也可称之为任性的要求），去承担超出所生产效用比例的工作，这既无益处也不公平……我们所期望的是，每个人都能以尽可能好的方式生活：这样，每个人只需付出最少的努力，就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在咖啡馆》，第60-61页]

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生产和消费一样，都必须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然而，有人认为，自由获取资源会导致浪费，因为人们在无需为此付费的情况下，会取用比需要更多的资源。但这个反对意见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严重。在当今社会中，有很多例子表明自由获取资源并不会导致滥用。举几个例子：在公共图书馆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整天坐在那里看书，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这么做。人们也不会总是一次借走最多数量的书。相反，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图书馆，并不觉得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构。尽管图书馆是免费开放的，但有些人也从不去图书馆。在供水方面，也很明显，人们不会因为水通常是免费供应或收取固定费用，就整天开着水龙头。同样，对于人行道，人们也不会因为可以自由行走

就走遍每一个地方。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都是根据自身需要来使用资源的。同样，素食主义者不会仅仅因为朋友聚会的自助餐是免费的，就开始吃肉。

我们可以预期，当其他资源也变得可自由获取时，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实际上，这种观点就如同认为“如果公共交通实行固定收费制，人们就会坐到超过目的地的站点”一样荒谬！显然，只有傻瓜才会为了“物有所值”而坐过头。然而，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世界似乎充满了这样的傻瓜。也许对于这些批评者来说，在街头分发政治传单是个不错的检验方式。即使传单是免费的，也很少有人成群结队地围着发传单的人，尽可能多地索要传单。相反，那些对传单内容感兴趣的人会拿走传单，其他人则会对其视而不见。如果自由获取资源必然导致人们取用超过自身所需的量，那么自由共产主义的批评者们就会对他们所分发物品缺乏需求的现象感到困惑了！

部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创造了一种虚构的人物类型——“**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其欲望是无限的：这种人总是想要更多，因此只有在资源无限的情况下，他们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不用说，这样的人从未存在过。实际上，人们的欲望并非是无限制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品味，很少有人想要得到所有能得到的东西，也很少有人想要超出自身需求的物品。

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还认为，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购买习惯来评判他们在自由社会中的行为。毕竟，广告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是通过让人们对自己感到不安来创造需求。简单地说，广告并不是放大人们已有的需求，也不是推销人们已经想要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广告就不必堕落到使用操纵性的广告手段，为产品塑造虚假形象，并为广告商自己制造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广告或许看起来很自然，但它建立在制造不安全感的基础上，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模糊人们的理性思维。在一个人们受到等级制度控制的异化社会中，拥有不安全感以及对自身缺乏掌控力和影响力的感觉是很自然的。广告正是利用并放大了这些恐惧——如果你无法拥有真正的自由，那么至少你可以买些新东西。广告是让人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和自己本身感到不满的关键手段。声称广告对接受者的心理没有影响，或者说市场仅仅是对大众的需求做出反应而不试图塑造他们的思想，这种想法是天真幼稚的。如果广告没有效果，企业就不会在这上面投入大量资金了！广告会让人们对一些理所当然的事物产生不安全感，从而引发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中本不会存在的非理性购买冲动。

然而，关于消费主义，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观点。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而非自由之上。这不仅导致了个性的削弱，还使人失去了自我认同和归属感。这两种感觉都是人类的深层需求，而消费主义常常是人们克服自我与他人之间异化的一种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和毒品则是其他的逃避方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反映了它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人性”。所以，仅仅因为一个公司或行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满足“需求”而获利，并不能得出“在自由社会中人们也会有类似需求”的结论（也就是说，“需求”往往并非独立于周围社会而存在）。正如鲍勃·布莱克所说：

“我们想要的东西，以及我们能够想要的东西，是与社会组织的形式相关的。人们‘想要’快餐，是因为他们必须赶紧回去工作，是因为超市里的加工食品味道也不怎么样，也是因为核心家庭（对于数量日益减少的少数人来说，他们至少还有个家可回）规模太小、压力太大，无法在烹饪和用餐方面营造太多欢乐氛围——诸如此类的原因。只有那些无法得到自己真正想要东西的人，才会无奈地想要更多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无法拥有朋友和爱人，所以我们才会渴望得到更多的糖果。” [《Friendly Fire》，第 57 页]

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消费主义是等级社会的产物；在这样的社会的人们，与自我、以及能够让自己真正幸福的事物（即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自由、自我管理的生产活动等等）相异化。消费主义是一种填补资本主义在我们内心造成的精神空虚的方式，因为资本主义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违背了平等的原则。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塑造出的人，是通过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己，而不是通过他们本身来定义自己。这就导致了为消费而消费的现象，因为人们试图通过消费更多的商品来让自己快乐。但是，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指出的，这种方式无法长期奏效，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安全感（进而导致更多的消费）：

“如果我，就是我所拥有的东西；那么当我失去我所拥有的东西时，那我又是谁呢？”我不过是一个失败的、沮丧的、可怜的证言，证明了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因为我可能会失去我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必然会一直担心自己将会失去它们。” [《占有还是存在》，第 111 页]

这种不安全感，很容易让消费主义看起来像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共产主义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猖獗的消费主义更多是异化社会中，一种缺乏有意义的自由的产物，而不是人类存在的“自然法则”。在一个通过非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来鼓励和保护个性的社会中，个人会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不太可能盲目地进行消费。正如弗洛姆所说：“如果我就是我本身，而不是我所拥有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剥夺或威胁到我的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我的核心，就在我自身。” [同上，第 112 页] 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无需无休止地消费，就能在内心建立起安全感和幸福感。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社会所培养出的充分发展的个性，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通人，对消费的需求会更少。这并不是说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生活就会单调乏味、没有奢侈品，远非如此。一个基于个性自由表达的社会，必定会在财富上富足，在商品和体验上丰富多样。我们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不必担心猖獗的消费主义导致需求持续超过供给，恰恰是因为自由将带来一个没有异化、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

不应忘记的是，共产主义有两个条件，即各取所需以及各尽所能。如果后者这一条件得不到满足，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为可用的商品做出贡献，那么前者这一条件也不太可能被容忍，他们会被要求离开，从而减少对商品的需求。自由结社意味着也有不结社的自由。因此，在一个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供应和需求都会得到合理的安排。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所主张的：

“在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生活方式之前，无政府主义体系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契约；完整共产主义的规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适用于那些接受它的人，当然也包括使其切实可行的条件。”[引自卡米洛·贝内里《工作的问题》，第 59-82 页，《为什么工作？》，弗农·理查兹（编），第 74 页]

所以，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应该注意的是，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很清楚，不可能立即实现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获取（详见 H.2.5 节）。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总结的：“当社会革命发展到能够为所有人生产足够产品的阶段时，就会采用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按需分配’……但在达到这一阶段之前，平等分配的制度……作为唯一公正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不言而喻的是，必须对病人、老人、儿童以及怀孕期间和产后的妇女给予特殊照顾。”[《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216 页] 詹姆斯·纪尧姆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他认为，只要某种产品“供应短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实行配给制。最简便的做法是出售这些稀缺产品”，但随着生产的增长，“就没有必要对消费进行配给了。作为一种抑制过度消费的手段而采用的售卖做法将被废除”，商品“将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分配”。[《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第 356-379 页，《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 368 页] 其他可能性还包括，公社决定某些稀缺商品只提供给从事不愉快工作（如收集垃圾）的人；或者人们有平等的获取机会，但实际的商品是共享的，并且只能在短时间内使用（就像目前公共图书馆的情况一样）。正如情境主义者肯·克纳布在有益地讨论了“仅有的一些可能性”之后所建议的那样：“通过尝试不同的方法，人们将自己发现哪些所有权、交换和核算形式是必要的。”[《公共秘密》，第 73 页]

是否能够立即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这在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社会最终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发展。当然，对于习惯了资本主义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可能完全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也许，确实如此。然而，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看的。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上面所描述的发展没有出现，并且由于浪费和需求超过供给而导致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那么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会做出必要的决策，并引入一些限制供给的手段（例如劳动券、平等工资等等）。不过请放心，“困难将会得到解决；那些在生产系统的具体运作及其与消费的关系中、进行必要变革所面临的障碍，将在无数热切关注并努力克服这些障碍的头脑的智慧面前消失。”[夏洛特·M·威尔逊，《无政府主义论文集》，第 21 页]

I.4.7 怎样才能防止生产者忽视消费者呢？

人们常常声称，没有市场的话，生产者就会忽视消费者的需求。如果没有失业和贫困的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惧），也没有更高利润的诱惑，生产者就会生产出劣质商品。持这种观点的人以苏联为例，因为苏联就曾因产品质量糟糕、

消费品匮乏而声名狼藉。

与前苏联阵营相比，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让生产者对消费者负责。如果生产者忽视了消费者的需求，那么他们的生意就会被那些关注消费者需求的生产者抢走，甚至可能被迫停业（当然，大公司凭借其资源，能比小公司坚持得更久）。因此，这里有胡萝卜（利润）和大棒（对贫困的恐惧）——当然，这根胡萝卜也可以当作大棒来对付消费者（没有利润，就不卖东西，无论消费者多么需要）。先不说这个比喻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毕竟我们是人，不是驴子！），但它确实包含了一个重要观点。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怎样才能确保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呢？

在个人主义或互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体系中，由于其基于市场，生产者会受到市场力量的制约，因此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集体无政府主义以类似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为在合作社之间的买卖过程中，生产者要对消费者负责。正如詹姆斯·纪尧姆所说，工人协会会“把他们未售出的商品，存放在（公社的）交换银行提供的设施里……交换银行会向生产者发放代表其产品价值的可转让凭证”（这个价值“已由地区合作联盟和各个公社之间的合同协议预先确定”）。（《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第 356-379 页，《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 366 页）如果这些商品没有需求，那么生产者协会就无法将他们的劳动产品卖给交换银行（或直接卖给其他工团或公社），因此他们会相应地调整产量。当然，由于这些体系建立在市场基础上，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如 [1.1.3 节](#) 所讨论的），不过蒲鲁东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他主张建立一个农工联盟，以保护自我管理免受市场力量的负面影响（如 [1.3.5 节](#) 所述）。

虽然互助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认为，生产者会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回应，否则他们就没有收入；但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无货币的社会），就不能认为他们的体系会以这种方式奖励生产者。那么，存在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所有人的需求”实际上都能得到满足呢？无政府共产主义如何确保生产成为“消费的纯粹仆人”，并且“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塑造自身，而不是对消费者发号施令”呢？（彼得·克鲁泡特金，《为自己行动》，第 57 页）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消费者的需求会得到满足。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具有去中心化和联邦制的性质。

那么，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中，是什么机制让生产者对消费者负责呢？首先，公社将在分配网络中行使其“退出”的权力。如果一个工团生产的商品质量不达标，或者在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时拒绝调整产量，那么公社商店就会转而向那些正在生产所需商品的工团采购。那么原来的工团就只是在为自己的库存生产，这是一项毫无意义的任务，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做。毕竟，人们通常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有用。仅仅为了工作而生产没人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几乎没有理智的人会这么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忍受着摧残精神的工作，是因为有收入总比没有好；但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这种“激励”将不复存在）。

由此可见，“退出”机制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中仍然存在。然而，有人可能

会说，反应迟钝或效率低下的工团仍然会存在：它们压榨其余部分的社会，生产劣质产品（或质量低于平均水平的商品），却消耗他人的劳动成果；并且深信没有了对贫困和失业的恐惧，它们就可以无限期地继续这样做。有人认为，没有了市场，就需要（或会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将有权惩罚这样的工团。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中继续存在，“上级”机构会对“下级”机构使用强制手段，以确保它们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或生产出足够的产品。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它存在缺陷。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不仅基于“退出”，还基于“发声”。与资本主义不同，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基于联合与沟通。每个工团和公社都与其他工团和公社自由达成协议并结成联盟。因此，如果某个特定的工团生产的商品质量差，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那么与它们有联系的人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首先，对某个工团的工作不满意的人会直接呼吁他们整顿自己的行为。如果这不起作用，那么他们就会通过拒绝在未来与该工团合作来表达不满（也就是说，他们会行使“退出”的权力，同时拒绝向该工团提供其所需的任何商品）。他们还会通过媒体让整个社会都知道这件事，同时联系消费者团体、合作社以及他们和其他工团所属的相关生产者和公社邦联，这些邦联会反过来将问题告知其成员（相关邦联可能包括地方和地区公社邦联、一般跨行业邦联、该工团所属的行业/公社邦联，以及没有尽到责任的工团所属的邦联）。在当今社会，类似的“口口相传”的警告和建议也在不断传播，同时还有消费者团体和媒体的参与。我们这里提出的建议是对这种常见做法的延伸（这种做法的存在表明，价格机制实际上并没有为消费者提供做出决策所需的所有相关信息，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如果存在问题的工团在收到一定数量的投诉后，仍然不改变其行为，那么它将遭受非暴力的直接行动。这将包括抵制该工团，（也许）还会抵制它所在的公社（比如拒绝向其提供产品和投资），从而使该工团被排除在联合所带来的利益之外。该工团将面临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人愿意与它合作，并且它所能获得的商品，包括其成员的消费品，都会减少。实际上，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家公司失去客户进而失去收入的过程类似。不过，我们怀疑一个自由的社会是否会让任何人遭受贫困或饥饿的痛苦（就像资本主义那样）。所以确切来说，维持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商品仍然会提供给他们。

在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如果这种全面抵制没有让其回心转意，那么还有两种选择。要么解散这个工团，为其成员找到新的工作场所；要么将该工团转让或出售给其当前的使用者（也就是说，将他们，排除在他们显然不想成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之外）。选择哪种方案，将取决于相关工作场所的重要性以及该工团成员的意愿。如果该工团拒绝解散，那么第二种选择将是最合理的（除非该工团控制着一种稀缺资源）。第二种选择可能是最好的，因为这会让被驱逐的工团深刻认识到联合的好处，因为它将不得不靠自己生存，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来维持生计，并且很快就会重新回到联合的行列中来。

克鲁泡特金在 100 多年前就曾这样论述：

“当一家与其他公司联合的铁路公司未能履行其承诺，当它的火车晚点，货物被搁置在车站而无人理会时，其他公司就会威胁要取消合同，而这种威胁通常就足够了。

“人们普遍认为……商业活动之所以遵守承诺，只是因为害怕打官司。事实并非如此；十有八九，违背诺言的商人是不会出现在法官面前的……仅仅是迫使债权人提起诉讼这一事实，就足以让绝大多数商人，永远地拒绝与一个迫使同行打官司的人有任何生意往来。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今天……商人之间的贸易活动中、以及铁路公司在运输组织中所采用的手段，在一个基于自愿劳动的社会中就不能去采用呢？”（《面包与自由》，第 153 页）

因此，为了确保生产者对生产与消费负责，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不需要官僚机构。相反，那些受到反应迟钝的生产者影响的人，通过沟通和采取直接行动，将是确保生产对消费负责的有效且高效的手段。

I.4.8 那么投资决策应当如何进行呢？

显然，一个特定的社会需要考虑消费方面的变化，因此要对新的生产方式进行投资。无政府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正如行会社会主义者 G.D.H. 科尔指出的：“对于一个社群来说，根据因时而异的各种因素，始终在‘为最终用途的生产’和‘为进一步生产的用途的生产’之间保持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种平衡是一个应该由整个社群来决定，并代表整个社群来处理的问题。”（《重述行会社会主义》，第 144 页）

如何确定这种平衡，会因所考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过，所有人都认同，这样一项重要的任务应该处于社群的有效控制之下。

互助主义者认为，解决投资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互助银行体系，将利率降至零。这将通过“根据互惠或互助原则组织信贷……在这样的组织中，信贷被提升到一种由社群管理的社会职能的高度；而且，由于社会从不拿其成员进行投机，它将以实际交易成本……贷出信贷”来实现。（查尔斯·A. 达纳，《蒲鲁东和他的“人民银行”》，第 36 页）这些贷款，将被分配给互助银行认为有可能成功并能偿还原始贷款的项目。通过这种方式，提供信贷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货币不是随意创造的，而是用于那些被认为有可能增加经济中商品和服务供应的项目（见 G.3.6 节）。另一个关键的投资来源将是内部资金（即留存储蓄），就像如今合作社的情况一样：“工人管理者的新投资，部分来自内部资金，部分来自外部贷款……工人管理者的创业活动……会产生利润和亏损，也就是说，每个工人的收入会有高有低。”（布兰科·霍尔瓦特，《重新审视工人管理企业的理论》，第 9-25 页，《比较经济学杂志》，第 10 卷，第 1 期，第

21 页)正如在 [1.1.1 节](#)所讨论的,取消股票市场不会损害投资(几乎所有的投资资金都来自其他来源),并且会消除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负面影响。

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信贷是基于人类活动的,而人类活动是以货币的形式体现的。正如科尔所指出的,“对(投资)这一点的理解,取决于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对资本的所有实际增加都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引导一部分劳动生产力、并使用某些材料。这不是为了制造产品以及提供与这种制造相关的服务,而是为了进一步生产的目的。”(同上,第 143 页)所以,当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说:“所有信贷都以劳动为前提,如果劳动停止,信贷就不可能存在”,并且“信贷的合法来源”是“劳动阶级”,他们“应该控制信贷”并且“信贷应该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被使用”时——他们与互助主义的同仁观点一致。(达纳,出处同上,第 35 页)

因此,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会为工团、公社及其社群的(“人民的”)银行设立投资基金。这些基金将用于储存折旧基金,以及用于工团商定的其他投资项目的资金(例如,工团联盟可能会同意将其劳动券的一定比例,分配到一个共同账户,以便为重大投资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同样,各个工团和公社也会为自己的投资项目设立资金储备。此外,与这些“人民银行”相关联的工团邦联在投资决策中也将发挥明确的作用,通过召开决定“哪些投资计划应获得资金”的论坛,来确保生产满足需求(我们强调,这很难说得上是“中央计划”,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也会为满足预期需求而规划未来的投资)。在这方面,集体无政府主义类似于互助主义,因此我们也期望(这样的社会里)会安排无息信贷以促进投资。

而在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情况会略有不同,因为这个社会不会使用互助主义和集体主义中所采用的劳动券。这意味着生产工团将达成共识,即他们的总产出和活动的一定部分将用于投资项目。实际上,每个工团,都能够以一种对社会劳动力的、商定索取权的形式,去利用合作共同体批准的资源(投资“本质上是对物质和劳动力的分配,而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人类生产能力的分配。”[科尔,出处同上,第 144-145 页])通过这种方式,互助确保了为未来储备合适的资源池,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应该记住的是,在发放信贷之前并不需要储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银行经常发放超过其实际现金储备的信贷(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其一,它们就不是合格的资本家,其二,经济就将陷入停滞)。利率也并不反映对未来商品的偏好(正如在 [C.2.6 节](#)所讨论的,利率反映的是市场权力、信贷行业的垄断程度、个人的社会 and 阶级地位,以及许多其他因素)。此外,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会用空间上的过程取代了时间上的过程。在农民社会和部落社会中,个人通常确实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制作自己的工具(猎人必须停止狩猎,以便制作一把新的改良弓箭或长矛)。然而,随着劳动分工的合理发展,不同的人生产其他人使用的工具,并且可以在其他人进行生产的同时进行生产。如果生产投资品的工人必须等到积累了足够的储蓄之后才能开始工作,那么任何发达的经济是否能够正常运转都将值得怀疑。因此,“投资”需要储蓄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恰当的,因为不同的工作场所生产消费品,而其他工作场所生产投资品。问题就变成了:要确保有足够的人力和资源同时投入到这两项活动中。

这将如何运作呢？显然，投资决策对整个社会都有影响。这些决策的实施需要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因此必须由相关的合适层级的邦联来负责。在生产单位以上层级做出的投资决策，会以对工团当前产出的需求的形式，得以实现（这些工团有能力生产所需商品）。这将要求每个工团“编制一份预算，说明其对即时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估计，以及对扩建和改进的需求估计。”（科尔，出处同上，第 145 页）这些预算和投资项目将在邦联的相应层级进行讨论（在这方面，共产无政府主义与集体无政府主义类似）。

工团/公社的邦联，将是讨论（交流）各种所需投资计划、以及在不同目标之间分配稀缺资源的理想平台。这可能涉及到将投资分为两类——必要投资和可选投资——并使用统计技术来考虑投资决策的影响（例如，使用投入产出表来查看——比如说——钢铁行业的某个特定投资决策，是否需要为能源生产进行投资）。通过这种方式，社会需求**和**社会成本都将被考虑在内，确保投资决策不会相互孤立地做出，从而避免因其他行业投入不足而导致的瓶颈和生产不足。

必要投资，是指由相关邦联商定的投资项目。这意味着资源和生产能力会按照商定的投资项目优先投入到这些项目中。不需要精确确定**哪些**工团将为某个特定的投资项目提供必要的商品，只需要确定该项目优先于其他请求即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银行向一家公司提供信贷时，它很少会询问当这笔钱被花掉时具体会与哪些公司签订合同，而是（直接）给予了该公司通过提供信贷/资金来指挥其他工人劳动的权力。同样，在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工人已经通过将某个项目指定为“**必要投资**”，而同意为该项目提供劳动。这意味着当一个“**必要投资**”的请求到达一个工团时，该工团必须尝试满足它（也就是说，假设它有能力满足该请求，它必须将该请求纳入其生产计划中“可选”请求之前）。所有工团都可以获取一份必要投资项目的清单，包括这些项目的需求以及是否已经下单，以确保这样的请求是真实的。

可选投资，只是那些未被联盟商定的投资项目。这意味着当一个工团或公社向一个工团下订单时，这些订单可能不会得到满足，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得到交付。该项目可能会继续进行，但这取决于该工团或公社是否能找到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工人。这适用于小规模的投资决策，或者是那些其他公社/工团不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投资项目。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投资策略。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将通过使用“**必要**”和“**可选**”投资项目，来优先考虑某些形式的投资。这种投资的社会化将使一个自由的社会能够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保持一个去中心化且充满活力的经济。满足社会需求的重大项目将得到有效组织，而小型项目则具有多样性。确保投资生产、订购特定商品等等任务，将像自由经济的其他方面一样去中心化，因此无政府主义“提议……生产工具（包括土地）的用益权，应向所有工人或工人团体免费开放”，“工人应该自行组织起来，并根据他们的理性和意愿安排工作”，并且“各个行业之间的必要联系……应该按照同样的自愿原则来管理。”（夏洛特·M.威尔逊，《无政府主义论文集》，第 21 页）

至于何时需要投资，很明显，在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中，这将

基于商品需求的变化。正如纪尧姆所说：“通过收集一个地区所有公社的统计数据，就有可能科学地平衡生产和消费。根据这些统计数据，也将有可能在生产不足的行业增加人力，在生产过剩的行业减少人力。”（《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第 356-379 页，《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 370 页）显然，对需求较高的生产部门进行投资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可以从集体和公社生成的统计数据中很容易看出。汤姆·布朗指出了这一显而易见的观点：

“商品将像现在一样以更多样的形式生产出来，因为工人喜欢生产不同种类和新型号的商品。现在，如果某些商品不受欢迎，它们就会留在货架上……而其他更受欢迎的商品，商店里的存货会被抢购一空。显然，[商店]店员会减少对不受欢迎商品的订购量，增加对受欢迎商品的订购量。”（《工团主义》，第 55 页）

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投资品的工团会倾向于先满足那些需求过剩的工团的需求。由于有这样的指导方针以及生产者之间的沟通，投资将流向那些实际需要投资的行业。换句话说，客户的选择（通过个人在不同工团的产出之间进行选择来体现）将产生与投资决策相关的信息。

由于只要合理且可行，生产就会去中心化，每个地方/地区将能够了解自身的需求，并根据自身的判断来满足这些需求。这意味着大规模的规划将不会进行（当然，假设它在实践中可行的话），仅仅是因为不需要去这样做。将这种做法与广泛的通信网络相结合，将会确保投资不仅不会重复建设经济中未被利用的工厂，而且投资会考虑到每个地方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机会。当然，集体会对新的生产线和技术以及现有的生产线进行试验，因此会对新技术和产品进行投资。就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在对新产品做出重大投资决策之前，会进行广泛的消费者测试。

此外，投资决策还需要展示不同选择的不同结果的信息。我们的意思是，对不同投资项目在投入和产出方面、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将采用成本效益分析的形式（如 [1.4.4 节](#) 所述），并将表明何时将工业技术转换为更高效、更具赋能作用、更符合生态要求的方法，从经济、社会和生态角度来看是合理的。这样的评估将指明投入水平，并将其与可能的产出进行比较。例如，如果一种新的生产技术在减少总工作时长（将生产机器所需的工时与使用该机器所减少的工时进行比较）的同时，对于类似的产出还减少了废品的产生，那么这种技术就会被采用。

社区方面也是如此。一个公社显然必须决定并规划市政投资（例如新公园、新住房等等）。他们也将对本地区的工业发展拥有决定权，因为如果一个工团在一个住房合作社旁边建造一个水泥厂、而住房合作社不希望这样做，这是不公平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地公社将对其辖区内工团的投资决策做出决定（例如，一个工团可能会制定多个方案，这些方案将在当地公社进行讨论，并在辩论后确定最终方案）。地区性的决策（例如新建一家医院）可以在相应的层级做出，相关信息由卫生工团和消费者合作社提供。投资决策的实际地点将由相关人员确定。然而，当地工团必须成为开发新产品和投资计划的核心，以鼓励创新。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制度下，不需要资本市场来决定是否需要投资以及投资应采取何种形式。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声称目前由股票市场完成的工作，可以被去中心化的邦联网络中工作场所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所取代。生产者可以评估一种产品的不同消费者的相对需求，并就该产品最适合的使用方向做出明智的决策。没有了私有财产，住房、学校、医院、工作场所等等，将不再被尽可能地挤在最小的空间里。相反，它们将建在一个“绿色”的环境中。这意味着人类的建筑将融入自然环境中，不再与自然隔绝。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的生活可以得到丰富；而将尽可能多的人和物“经济地”塞进一个小空间所带来的弊端，也可以得到克服。

只有将投资决策从“专家”手中夺走，交到普罗大众手中，当下一代才能根据他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利益进行投资。而建立一个旨在让富人更富，且富人的一时兴起就可以决定数百万人的生活的制度——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

I.4.9 科技进步应该被看作是反无政府主义的吗？

不一定。这是因为技术能让我们“事半功倍”，技术进步能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还能用于增进个人自由：例如，医疗技术，就能将人们从痛苦、疾病和“天然”短暂的寿命中解放出来；技术能把劳动力从与生产相关的繁琐杂务中解放出来；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增强我们自由交往的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工业）技术的发展，最终为人类提供了摆脱奴役性劳作的机会。”（《伦理学》，第2页）

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通常会导致进一步的剥削和统治、工人失业、经济危机等。然而，在无政府主义的世界里并非必然如此。举例来说，设想有一个公社，其中5个人想成为面包师（或者说公社的面包房需要5个人来工作），每人每周花20小时生产面包。现在，如果工人们自己期望、规划和组织引入自动化，将面包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减少到每人每周15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显然，没有人会有损失——即使有人的工作“被取代”，那个人仍能像以前一样获得生活资料——甚至还可能有所收获。这是因为从面包生产中节省出了5个工时，这些时间现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或转为休闲时间；而无论哪种方式，都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显然，这种理想的结果不仅源于所使用的技术，还（关键地）源于在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对技术的运用：归根结底，没有理由认为技术的使用不能赋予人们权力并增加他们的自由！

当然，技术也可以被用于压迫性的目的。人类的知识，就像所有事物一样，即可以被用来增加自由，也可以用来减少自由；即可以用来加剧不平等，也可以用来减少不平等；即可以用来帮助工人，也可以用来征服他们，等等。正如我们在D.10节中所论证的，不能脱离技术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来孤立地看待技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意识到，用专家大卫·诺布尔的话来说，“资本投入到那

些会强化[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内的]统治体系的机器上；而这种投资决策，从长远来看可能会使选定的技术具有经济性，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经济决策，而是一个得到文化认可的政治决策。”（《没有人民的进步》，第6页）在一个等级制社会中，引入的技术将服务于权贵的利益，有助于边缘化和剥夺大多数人的权力（用诺布尔的话说，“技术是政治性的”）。它并非独立于人类以及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而发展。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无政府主义者对人类知识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持有广泛的观点。一些人，如彼得·克鲁泡特金，自己就是科学家，他们看到了利用先进技术来扩大人类自由的巨大潜力。其他人则对技术保持一定的距离，担心其被用于压迫性目的，还有少数人完全拒绝科学和技术。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不过在看待资本主义中技术是如何被（滥）用时，会带有适度有益的、实践的卢德主义^①色彩（“只有当有一天，机器成为工人的朋友，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成为他们的敌人，夺走工作、害死工人时——工人才会尊重机器。”——埃米尔·普热，引自大卫·诺布尔，同上，第15页）。弗农·理查兹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

“我们认为，只有当所有生产都服务于公共需求时，‘生产力’这个词才有意义，或者说在社会层面上才是重要的……”

“如果生产力的提高，既提高了生活水平、又增加了所有人的休闲时间，那么它才有意义。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生产力’并不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是实业家希望为自己和股东赚取更多利润的手段，因此应该遭到劳动人民的坚决抵制，因为它既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也没有将他们从工资奴役中解放出来。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失业……”

“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精简工业的尝试，遭到了大多数工人的本能抵制，即使他们头脑中没有两个能相互对抗的政治理念；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抵制变革，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这种‘变革’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当然，他们是对的！然而，这种态度是消极的，无政府主义宣传者的任务应该是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指出唯一的替代方案；大致来说，就是财富的生产者必须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来控制财富。”（《为什么工作？》，弗农·理查兹编，第206页）

这意味着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必须对技术进行改造和/或发展，以赋予使用者权力，从而减少与之相关的任何压迫性方面。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我们（有可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在文明史上，人类第一次达到了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超过了需求本身的程度。因此，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为了

^① 卢德主义（Luddism）：源于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该运动中工人常常会毁坏纺织机，因为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工厂可以用廉价的无技术劳动力来操作机器，致使许多技术娴熟的手工工人失业。后世也将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称作“新卢德主义者”

确保少数人的幸福和进一步发展，而将苦难和堕落的诅咒强加给广大民众——已不再必要：所有人都能获得幸福，而无需让任何人承担压迫性的、有辱人格的劳作负担；人类最终可以在正义的基础上构建其整个社会生活。”（同上，第2页）问题在于，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相较于摧毁技术，我们如何才能使这种技术人性化并加以改造，使其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上具有解放性（当然，在适用的情况下，某些形式的技术和工业会因其内在的破坏性将被消灭）。

对克鲁泡特金来说，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使技术和工业人性化的方法是让“工人掌控工厂、房屋和银行”，这样“当前的生产将因这一简单事实而彻底变革”。这将是一个将工业和农业整合起来的过程的开端，因为“车间、铸造厂和工厂，在田野附近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面包与自由》，第190页）这样一个过程显然将涉及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技术进行改造，而不是简单地、不加思考地应用。正如在 [A.3.9 节](#) 中所讨论的，虽然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确实试图消灭所有形式的技术，但大多数人会同意巴枯宁的观点，他认为“摧毁……所有的劳动工具……将意味着对全人类进行宣判——如今人类数量太多……无法仅靠大自然的馈赠去生存——（宣判人类）走向……饿死的结局。”他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克鲁泡特金的一样，是让技术为使用者服务，创造“资本与劳动的紧密而完整的结合”，这样它就“不会……仍然集中在一个独立的剥削阶级手中”。只有这样才能“粉碎资本的暴政”。（《巴枯宁基本著作》，第90-91页）所以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改造而不是消灭技术。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掌握生产资料，然后才能决定保留什么、改变什么以及抛弃什么是不人道的。换句话说，仅仅摆脱老板是不够的，然而这依然是必要的第一步！

所有类型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到批判性评估技术、工业等的重要性。任何革命的第一步都是夺取生产资料。第二步是立即开始由使用者和受其影响的人（即社区、使用其生产产品的人等）对其进行彻底改造。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有的话）试图维持当前的工业结构，或原封不动地应用资本主义技术。即使如此，我们怀疑使用那种技术并在工业中工作的许多工人，也不会让自己原封不动。相反，他们将试图把自己使用的技术从资本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就像他们解放自己一样。

当然，这将涉及（可能是立即地或在一段时间内）关闭许多工业部门，并放弃那些无法转化为更适合自由个体使用的技术。当然，许多工作场所将被改造，以生产满足革命人民需求的新商品；或者由于社会革命会扰乱其商品市场而必然会关闭——比如奢侈品出口生产商，或为国家安全部队提供镇压设备的供应商。总之，社会革命意味着技术和工业的变革，就像它意味着社会的变革一样。

这种改造工作的过程可以从西班牙革命中看到。在接管生产资料后，西班牙工人立即开始对其进行改造。他们消除了不安全和不卫生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场所，并在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基础上创建了新的工作场所。由于从事工作（并因此了解工作）的人管理工作，工作实践也发生了转变。许多工作场所被改造，以生产战争所需的产品（如武器、弹药、坦克等），并生产消费品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因为正如克鲁泡特金所预测的，由于经济混乱和孤立，无法从正常供应来源获得此类商品。不用说，这些只是这个过程的开始，但它们清楚地指出

了任何自由社会革命的发展方向，即工作、工业和技术的全面变革。技术变革将沿着新的路线发展，这些路线将考虑到人类和生态需求，而不是少数人的权力和利润。

无政府主义明确地认为，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方法不能用于社会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目的。在我们为工人和社区自我管理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意识到工作场所不仅仅是生产场所——它们也是再生产的场所，是基于发号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之间、特定权力关系的某些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场所。使工作场所民主化、将直接生产者的集体主动性置于任何生产活动中心的斗争，显然是一场改变工作场所、工作性质以及必然——改变技术的斗争。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

“革命不仅仅是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改变。它意味着人类智慧的觉醒，意味着发明精神十倍、百倍地增长；它是一门新科学的曙光……它是人类思想的一场革命，比他们的制度变革还要深刻，甚至更为深刻……仅仅是接管中产阶级财产这一事实，就意味着有必要在车间、造船厂、工厂中彻底重组整个经济生活。”（同上，第 192 页）

而有些人认为，工业和技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会改变，工人将继续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工作！

对克鲁泡特金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生产都走上了错误的方向，因为它不是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福祉而进行的。”（同上，第 101 页）所有人的福祉显然包括生产者，因此它也涵盖了工业结构和所使用的技术过程。同样，福祉也包括一个人的环境和周边环境，因此必须从生态角度评估技术和工业。不用说，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技术进步，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其他被认为相关的因素，否则“所有人的福祉”这一理想就会被摒弃（关于未来的工作场所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讨论，见 [1.4.15 节](#)）。

所以，技术总是体现并表达其所处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如果你有一个异化一切的制度（资本主义），它自然会产生异化形式的技术，并使这些技术朝着强化自身的方向发展。资本家会选择那些强化他们权力和利润的技术，并使技术变革朝着那个方向倾斜，而不是朝着赋予个人权力、使工作场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所有这些都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中立的，而是取决于谁来做决策。正如大卫·诺布尔所说，“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机器创造历史而不是人创造历史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变革似乎是必要的，那是因为它们并非源于任何脱离实体的技术逻辑，而是源于一种社会逻辑。”技术符合“权力的利益”，但由于“技术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那么“它像所有社会过程一样，充满了冲突和斗争，因此其结果最终总是不确定的。”将技术发展视为“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一种自主的、超然的、决定论的力量，可能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因为它开启了一个长期被否定的自由领域。它再次将人们恢复到他们作为故事主体的恰当角色，而不是仅仅作为技术的棋子……而技术发展本身，现在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成为一个新的变量，而不是首要原因；它包含了一系列可能性，并预

示着多种未来。”（《生产的力量》，第 324-325 页）

这并不意味着，就因为它们是在阶级社会中形成或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拒绝所有的技术和工业。当然，某些技术极其危险，因此在任何一个理智的社会中，它们无疑都会被迅速叫停。同样，某些形式的技术和工业过程因其本质上是为压迫性目的而设计的，将无法被改造。许多其他生产荒谬、过时或多余商品的行业，当然会随着其商业或社会存在理由的消失而自动停止。但是许多技术，无论它们目前可能被如何滥用，几乎都没有内在的缺陷。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改作其他用途。当人们从统治中解放自己时，他们将毫不费力地拒绝那些有害的技术，同时将其其他技术改作有益的用途。

改变社会，所引入和利用的技术也会相应改变。通过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新的变量，取决于做决策的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类型，我们将可以看到技术发展并非天生就反无政府主义。一个非压迫、非剥削、生态的社会，将发展出非压迫、非剥削、生态的技术，就像资本主义发展出了有利于剥削、压迫和环境破坏的技术一样。因此，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质疑技术：最好的技术？对谁最好？对什么最好？根据什么标准、什么愿景来评判最好？又是根据谁的标准和谁的愿景去评判的？

不用说，不同的社区和不同的地区会选择不同的优先事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正如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在萨拉戈萨关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议所明确指出的，“那些拒绝工业化的公社……可以商定一种不同的共存模式。”以“自然主义者和裸体主义者”为例，决议认为他们“将有权拥有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不受”公社及其联合会所达成的“一般承诺的约束，他们派往……自治自由意志公社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将有权与其他农业和工业公社建立经济联系。”（引自何塞·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盟》，第 1 卷，第 106 页）

然而，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技术进步在自由社会中很重要，它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每个人的自由时间，用有意义的工作取代无意义的劳作。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使用**适当**的技术（而**不是**对技术本身的崇拜）。只有通过批判性地评估技术，引入那些赋予权力、易于理解、能被个人和社区控制，并尽量减少生态破坏的技术形式，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只有这种对技术的批判性态度才能公正地对待人类思维的力量，并反映最初发展技术的创造力。不加质疑地接受技术进步，与不加质疑地反对技术一样糟糕。

I.4.10 广泛分配剩余产品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之前（在 [I.3.1 节](#)）提到，工团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合作利己主义”（借用克鲁泡特金的术语）。而为了消除这个问题，集体化的基础需要扩大，使生产基于需求，结果是盈余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广泛的盈余分配的好处在

于，它能让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并阻止市场力量迫使人们为了在经济中生存而更加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见 [1.1.3 节](#)）。原本会相互竞争的工团实现合并，有望带来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从而改变劳动模式，并减少我们在生产所需花费的时间。我们将用西班牙革命以及当今社会体系中的实例来支持这一观点。

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化不仅涵盖了市政交通和公用事业等主要行业，也包括了较小的企业：小工厂、手工作坊、服务和修理店等等。奥古斯丁·苏希（Augustin Souchy）对这一过程描述如下：

“工匠和小作坊主，连同他们的雇员和学徒，常常加入他们所在行业的工会。通过在兄弟情谊的基础上整合他们的力量并共享资源，这些店铺能够承接非常大的项目，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供服务……理发店的集体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小规模制造业和服务业如何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在 1936 年 7 月 19 日（革命爆发的日子）之前，巴塞罗那有 1100 家理发店，其中大多数由勉强糊口的穷人所拥有。这些店铺往往又脏又破。5000 名理发师助手是收入最低的工人之一……因此，店主和助手们都自愿决定将他们所有的店铺社会化。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所有店铺直接加入了工会。在一次大会上，他们决定关闭所有不盈利的店铺。1100 家店铺减少到了 235 家，每月在租金、照明和税收方面节省了 13.5 万比塞塔^①。剩下的 235 家店铺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装修得十分精美。从节省下来的钱中，工资提高了 40%。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能拿到相同的工资。以前的店主并没有因社会化而受到不利影响。他们被雇佣并获得稳定的收入。所有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工作，获得同等的报酬。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区别消失了，他们变成了一个平等的劳动共同体——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集体》，山姆·多尔戈夫（编），第 93 至 94 页]

这些集体除了改善了工作条件之外，还确保了工人阶级能够获得在以前市场力量所剥夺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在整个西班牙共和国内，城镇和乡村的集体组织了医疗保健服务。例如，在马格达莱纳德普尔皮斯的村子里，住房“是免费且完全社会化的，医疗保健也是如此……药品、物资、转送至巴塞罗那或卡斯特利翁的医院、手术、专科医生的服务——所有这些费用都由集体支付”。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集体创办并运营学校、学院和大学。例如，黎凡特地区农民联合会见证了每个集体组织了“一到两所免费的儿童学校”，并且“几乎消除了文盲现象”（在内战之前，西班牙农村的识字率达到了 70% 以上）。它还创办了一所“蒙卡达大学”，该大学“开设了畜牧业、家禽养殖、动物育种、农业、树木科学等课程”[加斯顿·莱瓦尔，同前引，第 156 页和第 125 页]。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些例子表明，合作确保了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并且通过减少不必要的竞争将浪费降至最低。它还确保了满足人类福祉和发展关键

^① 比塞塔（peseta）：是西班牙及安道尔在 1869-2002 年使用的法定货币，1 欧元=166.386 比塞塔。

领域的必要商品和服务能为所有人所用，而不是仅为少数人享有。这样的合作非但没有减少选择，反而通过让所有人都能获得这些商品和服务而增加了选择（而且由于消费者可以选择从哪个工团消费，并且消费者合作社和生产单位之间可以直接沟通，因此生产合理化几乎不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广泛的盈余分配的另一个好处体现在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方面。通过设立一个独立于个体工团财富的研发基金，整个社会可以通过获得有用的新技术和工艺而得到改善。因此，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社区中）可能会决定从可获得的社会产出中拨出大量资源用于基础研究。这是因为这项研究的成果将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从长远来看对每个人都有帮助。此外，由于工人直接控制他们的工作场所，并且当地社区实际上“拥有”它，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都会对探索那些能够减少劳动、污染、浪费等，或者在对社会几乎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增加产出的研究，感兴趣。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随着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和教育越来越感兴趣，研究将越来越多地得以开展。当人们从日常生活的苦差事中解放出来时，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兴趣去探索各种可能性，因此，研究将在社会的多个层面上进行——在工作场所、社区、教育机构等等。

这意味着研究和创新将符合所有相关人员的直接利益，而且所有人都将有能力进行研究和创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研究的开展，是为了通过提高生产力或把生产扩展到新的（以前无人问津的）领域，来在市场获得优势。任何生产力的提高往往会给相关人员带来失业、技能退化和其他负面影响。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就不会面临这个问题。此外，应该强调的是，基础研究并不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所擅长的领域。正如道格·亨伍德所指出的，基础科学研究“主要由公共部门和像大学这样的非营利机构所资助的”。例如，互联网和计算机最初都是五角大楼的项目，“几十年来，政府承担了基础研发的费用，而华尔街和私营企业对此毫无兴趣。事实上，只有当启动成本全部由公共部门承担，并且最终开始盈利时，资本才产生了兴趣……优秀的美国个人主义者不喜欢谈论公共部门，因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勇敢的企业家。”[《新经济之后》，第196页和第6页] 世界各地这样的体系的兴起表明，基础研究往往需要公共支持才能进行。甚至像肯尼斯·阿罗这样杰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力量是不够的：

“基础研究的成果仅作为信息投入用于其他发明活动，特别不太可能获得回报。事实上，只有在其他公司被阻止使用这些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基础研究的公司才有可能从商业角度受益。但是，这种限制总体上降低了发明活动的效率，因此也会减少发明活动的数量。”[引自大卫·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第132页]

从那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变。如果没有五角大楼体系、太空竞赛等等，现代社会还会产生这么多创新吗？以互联网为例，如果没有公共资金的支持，它不太可能得以发展。当然，不用说，这些技术中的许多是出于邪恶的原因和目的而

开发的，在自由社会中使用这些技术之前，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予以废除）。然而，事实仍然是，一个纯粹基于市场的体系，不太可能产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大多数技术。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

“[艾伦·]格林斯潘（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在美国给报纸编辑们做了一次演讲。他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市场的奇迹、消费者选择带来的好处等等。他还举了一些例子：互联网、计算机、信息处理、激光、卫星、晶体管。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清单：这些都是公共部门创造力和生产的典型例子。就互联网而言，在 30 年的时间里，它主要是由公共部门设计、开发和资助的，大部分来自五角大楼，然后是国家科学基金会——这包括了大部分的硬件、软件、新想法、技术等等。就在最近几年，它才被移交给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就互联网而言，消费者的选择几乎为零，在关键的发展阶段，计算机、信息处理以及其他所有领域也是如此……

“事实上，在格林斯潘所举的所有例子中，唯一还算说得过去的例子也许就是晶体管了，而它们也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实际上，晶体管是在一个私人实验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开发出来的，该实验室还对太阳能电池、射电天文学、信息论以及许多其他重要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市场和消费者选择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结果再次证明，毫无作用。AT&T 是一家由政府支持的垄断企业，所以没有消费者选择的余地，而且作为垄断企业，它们可以收取高昂的价格：实际上这是对公众征收的一种税，它们可以用这些钱来支持像贝尔实验室这样的机构……所以这又是公共补贴的结果。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一旦该行业解除管制，贝尔实验室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公众不再为它买单了……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的确，贝尔发明了晶体管，但他们使用的是战时技术，而这同样是由公共补贴和国家发起的。此外，当时没有人会购买晶体管，因为其生产成本非常高昂。所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政府是主要的采购方……政府采购为创业提供了动力，并引导了这项技术的发展，然后这项技术才得以推广到各个行业。”[《流氓国家》，第 192 至 193 页]

自由市场也可能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为了用更高的股价取悦股东，公司可能会减少用于实际投资以及研发的资金，从长远来看，这也会抑制经济增长和就业。股东们可能会谴责那些他们认为“不经济的”（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和研发）活动，而这些活动实际上能够而且确实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好。然而，这些收益是从长远来看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短期收益才是重要的。当下更高的股价对于生存和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一个盈余和资源得以广泛共享的社会化经济，能够轻松地研发、长期投资、创新等等分配资源。通过互助银行或工团和公社的邦联，可以根据长期优先事项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成本来分配资源，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会被考虑的（事实上，忽视这些因素反而对资本主义有利）。社会化经济不会惩罚长期投资和研发，而是会确保有足够的资源可用，这将以某种方式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益。

如果我们看看职业培训和教育，广泛的盈余分配基础也将极大地有助于此。

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职业培训受到影响，因为追求利润的企业不会承担那些会让其他企业受益的成本。这意味着，如果企业担心受过培训的工人很快会被其他能够提供更高工资的企业挖走（因为这些挖墙脚的企业并没有承担提供培训的成本），它们就会不愿意在培训上花钱。结果是，很少有企业会提供所需的培训，因为它们无法确定受过培训的工人不会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当然，由于技术熟练，受过培训的劳动力在工作场所内也拥有更大的权力，而且更难以被替代）。因此，除了技术发展之外，广泛的盈余分配基础将有助于提高社区成员的技能和知识水平。正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图尔特所指出的，“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都有理由认为，市场力量会导致研发支出、教育和培训的供给不足”[《20 世纪 90 年代的凯恩斯》，第 77 页]。

通过工作场所的邦联将培训社会化，工团可以通过提高成员的技能水平来提高生产力。当与工人的自我管理相结合时，更高的技能水平也往往会增加创新以及对“工作”的享受。这是因为，掌控自己时间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不太可能忍受单调、乏味、像机器一样的工作，他们会寻找方法来消除这种工作、改善工作环境，并提高生产力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

除了工团、教育机构、公社等等所开展的工作之外，为个人和小团体提供资源以开展“偏好型项目（pet projects）”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工团和联盟会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但也不可低估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所起的创新作用。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

“促进创新精神所需要的是……思想的觉醒，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使这种大胆的构想变得萎靡不振；需要普及科学教育，这将使探究者的数量增加数百倍；需要相信人类将向前迈出一步，因为正是热情、做好事的希望，激励了所有伟大的发明家。而只有社会革命才能给思想带来这种动力、这种勇气、这种知识，这种为所有人而努力的信念。

“然后我们将拥有庞大的机构……向所有探究者开放的大型工业实验室，在那里，人们在履行了对社会的义务之后，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实验；在那里，他们会遇到其他行业的专家同志，这些同志也来研究一些难题，因此能够相互帮助和启发——他们的思想和经验的碰撞，会带来期待已久的解决方案。”[《面包与自由》，第 117 页]

如今，自由软件（操作系统、编程语言、特定软件包和代码）的例子，就显示了这种概念的潜力。因此，社会化将通过为这类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源（包括自由时间）来促进创新和科学发展。此外，它还将提供推动科学向前发展所需的社区精神。正如约翰·奥尼尔所说：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抑制信息交流的因素。市场鼓励保密，而这与科学领域的开放性是相悖的。它预设了一种财产观念，即所有者有权排斥他人。在科学领域，这种排斥他人的权利限制了信息和理论的交流，而这与知识的增长是不相容的……当信息交流是开放的时候，科学往往会发展……[此外，]一个理论或实验结果被接受的必要条件是，它要经过有能力的科学评委的公开、

批判性审查。一个私人的理论或结果是不受科学可接受性标准检验的。”[《市场》，第 153 页]

如今，发明家们常常“小心翼翼地对彼此隐瞒自己的发明，因为他们受到专利和资本主义的束缚——资本主义是当今社会的祸根，是知识和道德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社会化将确保发明家们能够借鉴包括前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知识。人们不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对他人隐瞒知识，而是会分享知识，使所有参与者以及社会的其他成员都从中受益。因此，“普及科学教育，这将增加探究者的数量”，“相信人类将向前迈出一步”以及“激励所有伟大发明家的热情和做好事的希望”，将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创新也将得到提升。[克鲁泡特金，同前引书，第 117 页以及第 116 至 117 页]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还会通过考察现存社会来表明，社会化会带来更多的益处。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证据表明，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国有产业私有化，虽然未能实现其宣称的提供更廉价、更好服务的目标，却在实现其未明说的向上重新分配财富的目标上大获成功（详情见《我们信任政府：市场失灵与私有化的幻想》，作者沃里克·芬内尔、罗伯特·朱普和简·安德鲁）。铁路和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例子、加利福尼亚的能源危机（像安然^①这样的公司获取了巨额的投机利润，而消费者却面临停电）以及澳大利亚悉尼的水处理丑闻，都不幸地非常典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英国，经过 30 年的撒切尔主义政策（先是保守党执政，然后是新工党执政）之后，支持这些政策的右翼报纸读者们看到一篇又一篇文章，开始抱怨“宰客的英国”以及私有化公用事业、服务和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国有化（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社会化和工人的自我管理），而是要表明，将资源私有化并不会使特定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受益。

还应该注意的是，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对其中的几乎每个人都不利。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在他们的著作《精神层面：为什么更加平等的社会几乎总是表现更好》中表明，几乎每一个现代社会和环境问题（包括健康不佳、缺乏社区生活、暴力、毒品、肥胖、精神疾病、长时间工作、大量的监狱人口）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比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更有可能发生。基于三十年的研究，该书表明了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不平等对我们有害。因此，财富的社会化将使我们所有人受益。

最后，还有那些无法工作的人以及公共产品的普遍供给问题。通过广泛的盈余分配，可以建立起社区医院、学校、大学等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任何社会都有一些成员无法（实际上也不应该）工作，除非他们自己愿意，比如青少年、老年人和病人。在个人无政府主义社会中，除非有人（家庭成员、朋友或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支付医院费用等所需的资金，否则实际上不会为这些人提供任何保障——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情况太像我们目前正在反对的制度了，毫无吸引力可言。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有权接受教育、享受医疗保健等等，并且有权过上充实的、人性化的生活，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

^① 安然公司（ENRON）：美国能源业巨头，财富 500 强公司之一。

需要付费才能得到的特权。基于社区的分配方式，将确保社区的每一个成员在需要时都能自动获得这些服务。例如，消除私有化医疗保健所带来的担忧，可以被视为社会化的一个好处，而这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或类似的经济指标所无法体现的（更不用说它所体现的道德意义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非私有化的医疗保健系统效率更高。竞争以及拒绝为人们提供治疗也会导致效率低下，因为价格会被抬高，以支付广告费用、与竞争相关的管理成本、向股东支付股息等等。这会增加那些幸运地享有保险的人的成本，更不用说由于不断担心失去保险、或因保险公司做出不利于病人及其医生的决定而被拒绝赔付，所带来的压力了。例如，1993年，加拿大的医疗计划将0.9%的支出用于管理费用，而美国医疗保险（Medicare）的这一比例为3.2%，私人保险公司则为12%。此外，当加拿大在1971年采用公共资助系统时，它和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都刚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到1990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2.3%，而加拿大为9%。从那以后，成本持续上升，这使得医疗保健改革成为了深受其苦的公众极为关注的问题（当然，前提是他们足够幸运拥有私人保险）。

私人医疗保健的混乱局面，凸显了全社会范围盈余分配的好处。竞争损害了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进而伤害了民众。根据阿尔菲·科恩的说法：

“越来越多的医院和诊所由营利性公司经营；许多机构为了争夺‘客户’，似乎更看重一位熟练的营销主管，而非一位熟练的护理人员。就像在其他任何经济领域一样，对利润的追逐转化为降低成本的压力；而在这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削减对那些无利可图的病人的服务，也就是那些比富人的病情更重的病人……结果是：在病人竞争更激烈的地区，医院成本实际上更高。”[《没有竞争》，第240页]

美国自由主义者罗伯特·库特纳也表示认同：

“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是一个充满不平等和低效率的混乱体系——而且随着私人市场力量试图使其合理化，情况还在不断恶化。转向全民医疗覆盖系统将一举解开这个死结。它不仅会更高效、更公平地提供明确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且通过将健康状况不佳的成本社会化，还会为整个社会创造一个强大的经济激励，促使其重视一级预防……每个拥有全民医疗系统的国家，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都低于美国……而且几乎每个拥有全民医疗系统的国家，从出生时起的预期寿命都更长（尽管从成年时起的预期寿命大致相当）……大多数拥有全民医疗系统的国家的患者满意度也更高。

“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从本质上讲，全民医疗系统在浪费性的管理费用上花费更少，而在一级预防上投入更多。仅美国的医疗保险管理费用就消耗了约1%的GDP，而加拿大仅为0.1%。尽管医疗费用上涨在各地都是一个问题，但全民医疗系统的成本上涨速度要低得多……在1980年至1987年期间，美国的医疗总费用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2.4倍。在拥有全民医疗系统的国家，

费用增长速度要慢得多。瑞典、法国、西德和英国的这一数字分别为 1.2%、1.6%、1.8%和 1.7%……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最多，但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量最少，入院率最低，病床占用率也最低——同时还伴随着最高的每日费用、最高的技术密集度，以及每张病床最多的员工数量。”[《一切都可出售》，第 155-156 页]

1993 年，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占其 GDP 的 13.4%，而加拿大为 10%，瑞典和德国为 8.6%，英国为 6.6%，日本为 6.8%。只有 40% 的美国人口享有公共医疗保健，在 1991 年全年，超过 3500 万人（占人口的 14%）没有医疗保险^①，而在这一年中，大约有两倍于此的人在某个时期没有保险。从健康指标来看，美国民众的钱花得并不值当。加拿大、瑞典、德国、日本和英国的预期寿命都更高。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最高，在基本健康指标方面也排名垫底，而且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低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总的来说，美国的医疗系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全民医疗系统。

当然，有人会争辩说美国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所以进行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然而，奇怪的是，竞争越激烈、私有化程度越高的系统，却比全民医疗系统效率更低、更不公平。同样奇怪的是，竞争的捍卫者们乐于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例子来阐述他们的观点，但却拒绝接受那些负面例子，认为它们是“不纯粹”系统的产物。他们既想享受好处，又不想承担坏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从西班牙革命中可以看出，盈余还被用于社区服务（如医院和教育）。许多集体为其成员资助新建了医院和学院，为数十万人提供了他们仅凭自己的劳动曾永远无法获得的服务。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合作帮助合作者取得了远比他们各自孤立行动所能取得的更大成就。关于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医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其他公共服务将如何组织，将在 [1.5.12 节](#) 中讨论。

所以我们可以从对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经验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如果你想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受过良好教育，如今在宜人的环境中平等地工作，并有充裕的闲暇时间去从事自己的项目和活动——那么就需要广泛地分享社会盈余。否则，你可能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为了在市场中生存而长时间努力工作，没有时间或机会接受教育和享受休闲时光，并且在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要听从少数富人的指挥，以使他们能够过上悠闲的生活（反过来，尽管这种高度的不平等会导致社会流动性低下，但这也会激励你更加努力地工作）。在一些人看来，前一种社会是一个充满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而后者显然是一个基于“个人主义”和自利主义的社会……

^① 截至 2025 年 4 月，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工业化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卫生系统覆盖的国家。文中 30 年后的 2021 年，统计的美国无保险覆盖者依然接近 3000 万人，占比约为 12%。["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Early Release of Estimates from the NHIS, January-June 2022". CDC. January 27, 2023.]

I.4.11 如果社会主义消灭了利润动机，绩效不会变差吗？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说的利润动机指的是金钱利润。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合作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受益”于合作——我们并不否认“人们通常会为改善自身处境而行动”这一事实。然而，金钱利润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自身利益”形式，实际上狭隘到在许多方面（无论从个人发展、人际关系、经济和社会福祉等方面来看）对个人是有害的。换句话说，不要把我们在这里对“利润动机”的讨论，理解为否定自身利益，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只是拒绝“那种认为‘利润是人类社会唯一主导动机’的、狭隘的生活观念”。[彼得·克鲁泡特金，《田野、工厂和作坊》，第 25 页]

其次，我们无法详尽阐述竞争和利润动机的有害影响。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我们推荐阿尔菲·科恩的《没有竞争：反对竞争的理由》（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以及《被奖励所惩罚：金星、激励计划、优异成绩、赞扬及其他贿赂的问题》（Punished by Rewards: The Trouble with Gold Stars, Incentive Plans, A's, Praise and Other Bribes）。他记录了大量已积累的证据，这些证据反驳了资本主义的“常识”：即竞争和利润是组织社会的最佳方式。

根据科恩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奖励会降低绩效水平，尤其是当绩效涉及创造力时。他的书总结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因完成某项任务而获得奖励时，对该任务的内在兴趣——即认为某件事本身就值得去做的感觉——通常会下降。关于创造力和动机的许多研究，是由布兰迪斯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特蕾莎·阿马比尔进行的，她始终发现，那些被承诺给予奖励的人所做的创造性工作最少。因此，“奖励扼杀了创造力，而且无论任务的类型、奖励的类型、奖励的时机或涉及人员的年龄如何——情况都是如此”。[《被奖励惩罚》，第 45 页] 这类研究对“经济奖励是激励人们的唯一有效方式，甚至是最佳方式”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它们挑战了行为主义的假设，即任何活动如果得到奖励，就更有可能发生，或者在结果方面会更好。

这些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生物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都提供了证据，支持合作才是作为人类互动的自然基础。例如，民族学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土著文化都是在高度合作的关系基础上运作的，人类学家也提供了证据，表明推动早期人类进化的主要力量是合作性的社会互动，这使得原始人类有能力发展文化。这甚至已经渗透到资本主义中，如今工业心理学正在提倡“工人参与”和团队协作，因为这明确地比等级管理更具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合作型的工作场所比基于其他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作场所生产力更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者合作社平均而言将比资本主义企业或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即使在设备和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合作社也往往能够实现更高的生产力。此外，组织越接近合作的理想模式，生产力就越好。

对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而且这应该会让个人无

政府主义者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彼得·克鲁泡特金认为,“如果我们……向大自然提问:‘谁是最适者:是那些不断相互争斗的生物?还是那些相互支持的生物?’我们立刻就会看到,那些养成互助习惯的动物无疑是最适者。它们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并且在各自的类别中,它们达到了智力和身体组织的最高发展水平。”[《互助论》,第24页]

应该指出的是,正如一位生物学家所指出的,“克鲁泡特金的观点虽然并非正统,但在科学上是值得尊重的,而且事实上,互助可以成为提高适应性的一种手段这一论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物学的一个标准部分。”[道格拉斯·H·鲍彻,《互助的理念:过去与未来》,第1-28页,《互助的生物学:生物学与进化》,道格拉斯·H·鲍彻(编),第17页] 弗兰斯·德瓦尔(一位顶尖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和杰西卡·C·弗莱克认为,克鲁泡特金是更广泛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个传统中,人们认为动物相互帮助,恰恰是因为通过这样做,它们能够获得比从直接竞争中获得的短期利益更有价值的、长期集体利益”。他们总结道,“[克鲁泡特金的]观点的基本信条是正确的。大约七十年后,在一篇题为《互惠利他主义的进化》的文章中,[罗伯特·]特里弗斯完善了克鲁泡特金提出的概念,并解释了合作,更重要的是,一种互惠体系(特里弗斯称之为‘互惠利他主义’)是如何进化的。”[《“任何一种动物”:猴子和猿类道德的达尔文主义基石》,第1-29页,《意识研究杂志》,第7卷,第1-2期,第4页]

所以现代研究强化了克鲁泡特金的论点。这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非人类的动物。对于人类来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具有合作的内在能力和需求,以及内在的公平感和道德感。这表明合作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那些表明这种行为比竞争更具生产力的研究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这些证据令人印象深刻。如前所述,阿尔菲·科恩也是《没有竞争:反对竞争的理由》一书的作者,他花了七年时间回顾了400多项关于竞争与合作的研究。根据科恩的观点,竞争有三个主要后果:

首先,它对生产力和优秀表现有负面影响。这是由于焦虑增加、效率低下(与共享资源和知识相比),以及内在动机受到削弱。竞争将焦点转移到战胜他人上,而远离了好奇心、兴趣、卓越和社会互动等内在激励因素。研究表明,相比之下,合作行为始终能产生良好的表现——且这一发现在广泛的被试变量下都成立。有趣的是,随着任务变得更加复杂,或者需要更高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时,合作的积极效益也会变得更加显著。

其次,竞争会降低自尊心,并阻碍健全、自主个体的发展。当自我评价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比较时,很难获得强烈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那些根据自己对团队努力的贡献来形成自我认同的人,通常拥有更强的自信心和更高的自尊心。

最后,竞争还会破坏人际关系。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最能体现我们的人性。通过制造胜者和败家,竞争对人类的团结具有破坏性,并阻碍了亲密的社会情感的形成。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这些观点。在竞争模式下,人们的工作

目的相互冲突，或者纯粹是为了（物质上的）个人利益。这不仅导致社会的贫困化和等级制度的产生；还因为缺乏社区关系，导致所有相关个体在精神、道德以及最终在物质上的贫困化。这不仅会导致个性的削弱和社会的混乱，还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因为精力浪费在阶级冲突中，并且被投入到建造更大、更好的“牢笼”中，以保护富人免受穷人的侵害。人类活动不是用于创造有用的东西，而是浪费在无用的劳作中，以延续不公正和专制的制度。

总而言之，竞争的结果（正如许多科学学科所记录的那样）显示了其弊端，同时也表明合作是最适者生存的方式。

此外，认为物质奖励会带来更好工作表现的观点，也根本上是错的。基于简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此类论点，无法经受住长期成功的检验（事实上，可能会适得其反）。的确，这意味着把人类看得不比宠物或其他动物好到哪里去（科恩认为，“‘做这个，你就会得到那个’背后的理论，源自对其他物种的研究；或者行为管理经常用更适合描述动物的词语来进行表述，这都并非偶然”）。换句话说，它“本质上是不人道的”。人们并非像无意识的机器人那样，仅仅受到外部刺激的驱使，人们也不是被动的。我们是“对自己和周围环境有着天然好奇心的生物，我们寻找并克服挑战，我们努力掌握技能并获得能力，我们在所学和所做的事情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复杂性……总的来说，我们对环境的作用和环境对我们的作用一样多，而且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奖励。”[《被奖励所惩罚》，第 24 页和第 25 页]

科恩提供了大量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即奖励会损害活动和个人。我们在此无法详尽列举，所以仅举几个例子。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那些被付钱去做拼图的学生，在可以选择是否继续做拼图时，“比那些没有得到报酬的学生花在上面的时间更少”。“看起来为了奖励而工作会让人们对这项任务的兴趣降低。”另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表明，“外在奖励会降低内在动机”。[同前引书，第 70 页和第 71 页] 大量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奖励实际上在传达一个信息，即某项特定活动本身不值得去做——而且为什么有人会想去做一件必须被贿赂才去做的事情呢？

在工作场所，也发生着类似的过程。科恩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即使在那里，外在动机也同样是失效的。事实上，他认为“如果经济学家把工作视为一种‘负效用’——一种我们为了能够购买所需物品而必须做的不愉快的事情，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么他们就错了”。科恩强调，“假设金钱是驱使人们工作的动力，就是对人类动机的一种贫乏理解”。此外，“任何激励或绩效薪酬制度都存在这样的风险，即它会让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因此不太可能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并致力于追求卓越。而且，我们将薪酬（或其他奖励）与绩效联系得越紧密，造成的损害就越大。”[同前引书，第 131 页、第 134 页和第 140 页]

科恩认为，如果“负责任行动的能力、对学习的天然热爱以及做好工作的愿望，已经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那么认为人类只会为了利润或奖励而工作的观点，“就可以恰当地被描述为是不人道的”。而且，这是“一种试图控制人们的方式”，因此“对于任何对主要基于‘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的理念而建立的人际

关系模式而感到不安的人来说，都必须思考，奖励，是否真的像有时被描述的那样无害”。所以“不可否认的是，‘绩效工资的基本目的是操纵性的’。一位观察者更直白地将激励措施描述为‘有辱人格的’，因为它们真正传达的信息是，‘讨好大老板，你就会得到老板认为合适的奖励’”。[同前引书，第 26 页]

鉴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工作受到他人控制，而且可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就必须是那样。显然，即使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大多数工人也能够并且确实会发现工作很有趣，并努力把工作做好——不是因为可能的奖励或惩罚，而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寻求意义，并努力把事情做好。鉴于研究表明，以奖励为导向的工作结构会损害生产力和卓越表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希望。这类研究证实了克鲁泡特金的观点：

“雇佣劳动是农奴式的劳动；它无法，也决不应该，发挥出它所能发挥的全部生产力。现在是时候不再相信那种，把雇佣制度视为对生产性劳动最佳激励的传说了。如果如今的工业产出比我们的祖父辈时代多了一百倍，那是因为在[18 世纪]末，物理和化学科学突然觉醒；这并非是因为得益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而是尽管存在这种制度（，我们依然达成了这种成就）。”[《面包与自由》，第 150 页]

基于这些原因，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坚信，在自我管理的背景下消除利润动机，非但不会损害生产力和创造力，反而会增强这两者（在一个工人只是增强了官僚的权力和收入的专制制度下，我们可以预期会有不同的结果）。当确保了对自己工作和工作场所的控制权时，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这将带来创造力和主动性的爆发，而不是减少。

I.4.12 难道资本主义倾向不会重新出现吗？

这是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常见的一种反对观点。例如，罗伯特·诺齐克就设想了以下情形：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非被禁止，否则小工厂将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熔化了自己的一些私人物品，用这些材料制造了一台机器。我每周为你和其他人举办一次哲学讲座，以换取其他东西，诸如此类……有些人甚至可能想辞去在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全职投入到这个私营部门中……[这就是]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得不禁止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的行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 162-163 页]

这个论点存在许多有缺陷的假设，我们将在此进行讨论。其关键缺陷在于将交换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以及典型的那种狭隘的财产主义观念，即认为自由本质上就是出卖自己自由的自由、成为雇佣奴隶从而失去自由的自由。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首先，虽然市场和交换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资本主义并非如此。雇佣劳动是相对较近的时期才发展起来的，并且充其量，也只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次，很少有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会自愿成为雇佣奴隶。就像奴隶的子女常常将奴隶制视为“天然”的秩序一样，如今的工人也是如此。然而，就像动产奴隶制^①一样，这种“天然”制度的实现需要国家的大量强制力。

正如在 F.8 节中所讨论的，现实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并非是按照诺齐克所描述的过程产生的——它需要国家的大量干预，将工人与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并最终确保他们将自由出卖给财产所有者的这种情况，被视为是“天然”的。如果没有这种强制力，人们就不会主动寻求将自己的自由出卖给他人。默里·布克钦总结历史记录时指出，在“每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存在着限制市场经济的……制衡力量。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设置了他们认为是不可能逾越的障碍，以阻止国家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他提到了“乡村社区抵制贸易和专制政治形式侵入社会的、持久的公共基础力量”。[《自由的生态学》，第 207-208 页]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指出，在古代地中海世界，“虽然人们确实会周期性地发现，一些在现代人看来像是雇佣劳动契约的安排，但仔细考察后会发现，它们几乎总是实际上是租用奴隶的契约……因此，自由的男女会避免任何类似雇佣劳动的事情，实际上将其视为一种奴役，把自己租出去。”这意味着雇佣劳动“（与，比如说，为专业服务收取费用相对）涉及一定程度的从属关系：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听从雇主的命令。这正是为什么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的男女往往会避免雇佣劳动，以及为什么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从未出现。”[《可能性》，第 92 页]

因此，尽管如今“人们会欣然成为雇佣奴隶”的观点可能颇为常见（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中），但历史证据表明，人们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自主就业，并抵制雇佣劳动（常常不惜牺牲生命）。正如 E.P.汤普森所指出的，对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工人来说，“‘仆人’，即受雇主命令和纪律约束的雇佣劳动者，与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由’的工匠之间的地位，差距非常大，人们甚至会为此流血抗争，也不愿被从一种身份推向另一种身份。而且，在社区的价值体系中，那些抵制身份贬低的人是站在了正义的一侧。”[《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 599 页] 一百多年后，阿拉贡的农村工人阶级也表现出了对雇佣奴隶制同样的厌恶。在共产党军队摧毁了他们的自我管理集体后，“被剥夺了财产的农民，那些坚定的集体主义者，拒绝在私有制体系下工作，甚至更不愿意出租自己的劳动力。”[何塞·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 258 页] 由于前集体主义者拒绝成为少数人的仆人，农村经济陷入了崩溃。

品尝过自由滋味的人不太可能再回到被压迫的状态。因此，任何认为在自由社会中人们会自愿成为雇佣奴隶的观点，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因生活所迫而接受的东西，会原封不动地延续到自由社会中。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旦人们为自由而奋斗并体验到自由的乐趣，他们就不会再自愿接受身份的降格、再次回到有主人的状态——而且正如历

^① 动产奴隶制（chattel slavery）：将奴隶视为财产，可以进行买卖和交换的奴隶制

史所示，我们有一些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思考人们是否会“自由地”放弃自己的自由，这似乎是一种对自由进行奇怪贬低观点——这有点像宣称“禁止”拥有奴隶是对自由的限制（而且，正如在 F.2.2 节中所指出的，诺齐克确实支持自愿奴隶契约）。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诺齐克所设想的从自由中产生不自由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正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杰夫·斯坦指出的那样，“工人想要受雇于资本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没有其他谋生手段；除了出卖自己，他们无法获得生产资料。要使资本主义部门存在，就必须有某种形式的生产资源私有制，并且缺乏其他选择。工人们必须处于经济绝望的境地，才会愿意放弃对日常事务管理的平等发言权，并接受一个老板的指挥。”[《市场无政府主义？购者自慎！》，《自由意志主义劳工评论》，第 13 期]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无需任何人去“禁止”资本主义行为。所有人需要做的，只是**避免**帮助那些潜在的资本家建立生产资产的垄断。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在 [B.3.2 节](#) 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国家来保护这种垄断，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当然，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中，从一开始就不会有国家，所以也就不存在它“阻止”人们做任何事情的问题，包括保护潜在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换句话说，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潜在的资本家在招募工人时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这是因为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能够为工人提供比潜在的资本主义企业更多的福利（如自治权、更好的工作条件等）。潜在的资本家不仅要提供优厚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而且很可能还得给予工人对企业的控制权，以及对所使用资本的分期付款购买权。一旦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垄断被废除，他们获利的机会就很渺茫。

因此，潜在的资本家“将无法获得帮助，也找不到可以剥削的人”，并且“将一无所获，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生产资料，并且可以自由地独自工作，或者在大型生产组织中与他人平等合作——没有人会愿意被一个小雇主剥削”。[马拉泰斯塔，《埃里克·马拉的生泰斯塔：他平和思想》，第 102-103 页] 那么，这位想成为资本家的人要到哪里去找为他工作的人呢？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

“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发现富人的财富源于穷人的贫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必担心[百万富翁]在其中定居。如果社区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经过几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后，他[或她]将有权享受文明所带来的所有乐趣，有权享受艺术和科学为所有追求它们的人提供的、所有的更深层次享受，那么他[或她]就不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没有人会自愿为了让你[百万富翁]的致富而工作。”[《面包与自由》，第 61 页]

然而，让我们假设存在一位自主创业的发明家，弗格森，他在没有社会化部门帮助的情况下，想出了一项新的发明。无政府主义者会窃取他的创意吗？当然不会。根据假设，那些相信给予生产者其产品全部价值的人所组织起来的工团，会为弗格森的创意支付一笔公平的费用，然后这个创意将在整个社会中得到推广。然而，如果他拒绝出售自己的发明，而是试图通过申请专利垄断，来聚集一群雇佣奴隶进行剥削，那么没有人会同意为他工作，除非他们能完全掌控自己的

劳动成果以及劳动过程本身。而且，假设他确实找到了愿意为他工作的人（并受他管理），这位潜在的资本家将不得不提供非常优厚的条件和高额的工资，以至于他的利润几乎为零。此外，他还必须面对这样的工人，这些工人的邻居会鼓励他们成立工会，并为争取**更好的**条件和工资而罢工，包括工人对企业的控制权等等。这样一支激进的劳动力队伍将是资本家最不想要的。此外，我们可以想象，除非他们在合同结束时能得到所使用的资本（即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分期付款购买”制度），否则他们也会拒绝为某人工作。换句话说，通过消除资本主义的国家支持，潜在的资本家会发现很难与合作部门“竞争”，并且无法剥削他人的劳动。

在（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公社生产体系，以及（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互助银行体系下，**高利贷**——即为垄断物品收取使用费用（专利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将不再可能，发明家将和其他任何工人一样，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正如本杰明·塔克所主张的，“专利垄断……在于保护发明者和作者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免受竞争。使他们能够从民众那里，勒索到远远超过他们服务所付出劳动价值的回报——换句话说，就是给予某些人在数年时间内，对自然法则和事实的财产权，并赋予他们从他人那里榨取贡赋的权力，而这些自然财富本应向所有人开放。废除这种垄断，会让其受益者对竞争产生一种有益的恐惧，从而使他们满足于获得与其他劳动者相同的服务报酬，并通过一开始就以低价将他们的产品和作品推向市场来确保这一点，这样他们的业务领域就不会比其他领域更吸引竞争对手。”[《无政府主义者读本》，第 150-151 页]

所以，正如塔克曾经指出的——如果有人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他们理应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样做。这样的环境会使寻求就业的人数变得极少，从而确保剥削率为零。毫不奇怪，当面对自主创业的工匠劳动力时，资本家们会不断求助于国家来创造“合适的”市场力量。因此，如果没有国家主义来支持基于阶级的各种资本主义特权垄断，资本主义就不会占据主导地位。

还应该指出的是，诺齐克在他的论述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假设无政府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使用权”，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产权”是相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他的论点站不住脚，失去了说服力。简单地说，不存在绝对的或“自然的”财产法。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指出的，“排他性使用和控制权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差异很大。”因此，诺齐克在他的例子中，错误地将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社会）解释为在分配财富的同时也分配资本主义财产权，从而偷换了意识形态概念。正如密尔所主张的：“人类事务中最常犯的错误之一，也是导致最大实际错误的根源之一，就是认为同一个名称总是代表相同的概念集合。没有哪个词比‘财产’(*property*)这个词更容易产生这种误解。”[《社会主义章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432 页]

换句话说，诺齐克假设在**所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财产权都是与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一起分配的。正如切尼·C·瑞安所评论的，“不同的正义观念不仅在如何分配社会财富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个人对已分配到的财富拥有何种权利方面，也存在差异。”[《财产权与个人自由》，第 323-343 页，《解读诺齐克》，杰

弗里·保罗（编），第 331 页] 这意味着，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物品时，接受或获取这些物品的人对其拥有特定的（使用）权利。只要一个人仍然是公社的成员，并遵守他们在公社中帮助制定的规则，那么他们就可以充分使用该公社的资源，并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财产（甚至可以“熔化”它们来制造一台新机器或其他玩意儿）。如果他们利用这些物品创建一个企业来雇佣（即剥削和压迫）他人，那么实际上他们已经宣布自己退出了文明社会，结果将被剥夺合作带来的好处。因此实际上，他们将自己置于与那些不想加入工团的人相同的境地（见 [1.3.7 节](#)）。如果一个人确实想利用资源雇佣雇佣劳动力，那么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将自己从“社会主义社会”中脱离出来了，因此这个社会将禁止他们使用其资源（即他们必须通过购买，才能获得目前认为可以理所当然使用的所有资源）。

这会是对自由的限制吗？虽然按照资本主义狭隘的定义可能会这么认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上，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人所拥有的财产并不完全等同于他或她的（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的）财产；就如同公司的汽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目前并不属于员工的财产一样。虽然员工可以在工作之余使用这辆车，但他们没有“自由”将其出售或熔化并将其改造成机器。在自由社会中，这种缺乏绝对“所有权”的情况，并不会比上述情况更多地限制自由。

这一点凸显了诺齐克论点的另一个缺陷。如果他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每周 40 多个小时，工人受雇于老板。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被给予一些资源去使用，但他们绝对不被允许熔化这些资源来制造机器，或者利用所获得的资源来推进自己的计划。这同样也适用于出租房屋的情况，例如，当房东禁止在家工作或出售所提供的家具时。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将不得不禁止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行为”——而且它一直都在这么做。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除了禁止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行为之外，资本主义还不断禁止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行为。例如，如果工人同意成立工会，老板可以开除他们。如果他们决定自主管理自己的工作，老板可以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他们。因此，资本主义——至少对大多数人，即雇佣奴隶——禁止了诸如结社和言论等基本自由。为什么人们会在自由社会中寻求这样的“自由”呢？

当然，诺齐克对这一点的回应可能是，相关的个人在签署合同时已经“同意”了这些规则。然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人们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离开。要加入一个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只需同意自由地与该社会的其他成员“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不在其中建立压迫性或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如果这被认为是“专制的”，那么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强调，至少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是基于自我管理的，因此相关个人在他们所遵循的义务方面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还要注意的，诺齐克将交换与资本主义混淆了（“我每周为你举办一次讲

座，以换取其他东西”）。对于一个自称是资本主义专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不是交换（显然交换在资本主义出现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而是涉及雇佣劳动的劳动合同。诺齐克的例子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劳动契约，它不涉及雇佣劳动，而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所阻止的，正是后一种类型的交易——而且不是通过“禁止”它，而仅仅是通过拒绝维持其发生所必需的条件，即对资本主义财产的保护。

此外，我们必须指出，诺齐克还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资本主义混淆了。当“私有制”仅限于个体自主创业工人所使用的东西，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财产时（见 G.2.1 节），自由的社会主义很容易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容。换句话说，诺齐克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与（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混淆了（见 G.1.2 节）。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可以接受自由公社之外的人拥有生产资料（见 [1.6.2 节](#)）。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对于诺齐克（有缺陷的）论点会采取灵活的态度。个人，在他们的自由时间里，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交换”他们的时间和财产。无论诺齐克怎么说，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行为”。然而，一旦一个人雇佣了雇佣劳动力，那么通过这一行为，他们就违反了与同伴的约定，因此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这将意味着他们不再能够享受公社生活的福利以及使用公社的财产。实际上，他们将自己置于社区之外，必须自力更生。毕竟，如果他们渴望创造（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的）“私有财产”，那么在没有为此付费的情况下，他们无权使用公社的财产。对于那些（愿意）成为雇佣奴隶的人，社会主义社会可能不会那么严格。正如巴枯宁所主张的：

“由于每个人的自由都是不可剥夺的，社会绝不允许任何个人在法律上让渡自己的自由，或者与他人签订任何不平等、非对等的契约。然而，社会也无权排斥那些如此缺乏个人尊严感，以至于与他人签订自愿奴役契约的人，但社会会认为他们依靠私人慈善生活，因此在奴役期间不适合享有政治权利。”[《米哈伊尔·巴枯宁：选集》，第 68-69 页]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诺齐克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获取必须先于转让，这意味着在“双方自愿”的资本主义行为发生之前，个人行为必须先出现。正如在 [B.3.4 节](#) 中所论述的，诺齐克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解释为什么原本由大家共同持有的自然资源能够被个人所占有。这意味着他对于“转让商品中绝对的资本主义财产权”的辩护，是没有根基的。此外，他支持这种占有的论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私有财产无疑会限制人们的自由（而且应该记住，诸如乡村公地这类共有资源的破坏，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见 F.8.3 节）。正如在 F.2 节中所指出的，右翼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更适合被称为“财产主义者”（*Propertarians*）（为什么在反对社会主义时将自由置于首要重要的位置，但当私有财产限制自由时却不这样呢？）。正如切尼·C·瑞安所指出的，诺齐克“援引个人自由，作为拒绝（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模式化正义原则以及对资本所有权限制的，决定性理由……但是当私有财产权无可否认地限制了普通人的自由时，他似乎非常乐意用这些自由去换取整个社会的物质利益。”[同前引，第 339 页] 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于资本主义禁止了成年人之间在双方，在自愿情况下进行

社会主义行为、更不用说许多资本主义行为本身，却对这种情况未置一词中看出来。

因此，诺齐克所设想的准资本家获取资源的方式，实际上是窃取了归社区共同所有的资源，并阻止其他人使用这些资源。这显然会限制那些目前正在使用这些资源的人的自由，因而会遭到社区成员的强烈反对。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一个自由的社会是建立在“用益权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即社区中的个人仅仅凭借正在使用资源这一事实，就拥有占有这些资源的自由。“只要这些资源还在被使用，它们就属于使用者。”[《自由的生态学》，第 116 页] 由于准资本家实际上并不使用他们所创造的机器，他们将会一直担心，自己的雇佣奴隶会在当地公社及其联盟的全力支持下，直接没收这些机器。

所以，总而言之，这个问题包含了一些奇怪的逻辑（以及许多执果索因的假设），并且最终未能成功证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必须“禁止个人之间的资本主义行为”。此外，诺齐克首先就无法支持从公共财产中创造私有财产的合理性。这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禁止个人进行社会主义行为，以及个人之间的社会主义行为。因此，诺齐克所设想的社会，将会禁止占用未被使用的财产或擅自进入私有财产；也会违背财产所有者（他们对自己的财产以及使用这些财产的人拥有绝对权力）意愿，禁止成立工会，或者禁止使用工作场所的资源来满足生产者而非所有者的需求。如此一来，诺齐克反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本质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禁止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行为”。

I.4.13 谁去做脏活累活呢？

这个问题影响着每一个社会，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确保这类工作由社会底层的人来做。换句话说，这根本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它只是确保了一些人在他们大部分的工作生涯中都要去从事这种工作。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有缺陷的解决方案，而倾向于更好的办法，即让人们共同分担好的和坏的工作，从而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具体如何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你所属的自由意志主义社区的类型。

显然，很少有人会反对“人们会自愿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一观点。然而，有些工作几乎没有人（即使有的话）会喜欢（例如，收集垃圾、处理污水、危险工作等等）。那么，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很明显，并非所有的“工作”都同样有趣或令人愉快。有时有人会认为，人们会开始加入或组建那些参与更有趣活动的工团组织。按照这种思路，在更令人愉快的“工作”中会出现劳动力过剩，而那些枯燥和危险的工作，则会面临缺乏愿意从事的工人的情况。因此，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得不强迫人们去做某些工作，而这，就需要一个国家来实施。显然，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

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常正是那些枯燥、危险的工作，报酬最低、工作条件也最差。此外，这种观点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工人自我管理的制度下，枯燥、危险的工作会尽可能地减少并得到改善。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下，人们才无法改善自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环境。正如乔治·巴雷特所指出的：

“目前的情况组织得如此奇怪，以至于正是那些又脏又令人讨厌的工作，人们才会以低价去做，因此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发明机器来替代这些工作。另一方面，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很明显，那些令人讨厌的工作将是首先需要机器来消除的工作之一。因此，可以合理地说，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令人讨厌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消失。”[《对无政府主义的异议》，第 361 页]

此外，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那种认为会有大量工人涌入“轻松”工作岗位的观点是抽象的，并且忽视了现实社会的动态。虽然许多人会试图创建新的生产工团组织，以便在现有工团组织的研发工作之外，通过创新工作来表达自己；但认为“大多数人会立刻放弃当前的工作，去做其他事情”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个工作场所就是一个社区，同时也是更大社区的一部分，人们会珍惜他们与同事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对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所以，虽然我们预计工团组织之间会有工人流动，但上述观点中所声称的大规模人员转移，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大多数想要尝试新工作的工人，会去申请那些需要新人的工团组织的工作岗位，而不是自己去创建新的组织。正因为如此，人员调动将会是适度的，并且很容易处理。

然而，大规模人员流失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因此必须加以解决。那么，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将如何应对大多数工人都决定去做有趣的工作，而让那些枯燥和/或危险的工作无人问津的情况呢？当然，这取决于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类型，并且每种类型都提供了不同的方式，以确保个人对某些工作类型的偏好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匹配。

在个人无政府主义和互助主义的体系下，那些希望完成某种特定形式工作的人，会与工人或合作社达成协议，并支付报酬让他们来完成这项工作。正如蒲鲁东所主张的，在一个合作社内部，一个人的“教育、指导和学徒期应该……这样安排：既要允许他完成自己那份令人不快和讨厌的任务，同时也要让他从事多样化的工作并获得知识，并且要确保他……具备广博的知识和足够的收入。”[《革命的总观念》，第 222 页] 就为他人承担令人不快的任务（例如，收集和处理社区的垃圾）而言，个人会组建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必须找到市场中的位置，这将确保这类工作得以完成，因为他们会与他人签订合同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然而，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人一直从事令人不快的工作，所以这很难说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就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人从事糟糕的工作，只是因为工作总比没工作好。这是一个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支持的解决方案。

在集体主义或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会尽可能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诺姆·乔姆斯基指出了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在尽最大努力使那些不受欢迎的工作变得有意义之后，由大家共同分担”，另一种是“那些不受欢迎的工作会得

到高额的额外报酬，这样个人就会自愿选择去做”。这样的方案“也与无政府主义原则……相一致”，而不像当前的情况，“那些不受欢迎的工作被分配给雇佣奴隶去做”。[《激进的优先事项》，第 220 页] 还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的方式，是借鉴“农民对劳动的态度”以及他们“最显著的特点”，即“任何一种社区劳动，无论多么繁重，都能被工人们自己转化为欢乐的场合，从而加强社区的联系”。[《自由的生态学》，第 342 页]

不难想象，一个自由的社区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尽可能公平地在成员之间分配这类任务：例如，每月安排几天时间，让社区内所有身体健康的成员去做那些没有人自愿去做的工作。这很快就能确保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特别是如果这些工作是节日活动的一部分，或者是在聚会前进行的话。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都分担了令人不快的任务以及令人愉快的任务（当然，这样也能使任何一个人，在这些任务上花费的时间最少）。或者，对于那些非常受欢迎的工作任务，个人也必须同时承担一些令人不快的任务。这样，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任务就可以相互平衡。或者，也可以通过抽签的方式随机轮换这些任务。可能性有很多，毫无疑问，自由的人们会在不同的地区尝试许多不同的方法。

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遵循约西亚·沃伦（Josiah Warren）的观点，在考虑所获得的劳动券数量或完成的社区工作时长时，将工作的不受欢迎程度纳入考量。换句话说，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从事令人不快工作的个人可能会得到“奖励”（同时也会获得社会的尊重），比如稍微高一些的报酬——例如，这类工作的劳动券数量可能是标准数量的若干倍，实际倍数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程度相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可能有类似的解决方案，个人所需工作的必要时长，会根据所涉及工作的不受欢迎程度相应减少）。实际的“奖励”水平将由各个工团组织之间的协议来决定。例如，如果某一特定类型的工作中，想要从事的人数比实际需求多 50%，那么这个行业中小时工作的劳动价值就会相应地低于一小时。如果申请的人数少于所需人数，那么劳动价值就会增加，假期时间等也会增加。对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工作”岗位，很容易安排工作共享计划，以确保大多数人都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同时还可以采用提高一小时劳动价值、但减少假期分配等方法）。

通过这种方式，对工人的“供求关系”很快就会趋于平衡。此外，集体主义社会比当前的制度更有优势，因为它拥有自我管理的机构，并且通过这些机构内的参与和辩论，人们的社会意识不断提高，这使得集体主义社会能够更好地确保工作共享，并采用其他方法，在社会中公平地分配令人不快和令人愉快的工作任务。

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解决方案与集体主义社会的解决方案类似。其成员之间仍然会就完成的工作达成基本协议，因此对于那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工作岗位，满足商定的最低工作时长要求会相应增加。例如，一个志愿者数量超出实际需求 100% 的行业，其最低工作时长要求可能会从（比如说）每周 20 小时增加到 30 小时。而申请人数少于所需人数的行业，所需工作时长会减少，假期时间等也会增加。正如 G.D.H. 科尔在这一点上所指出的：

“首先，我们要通过充分应用机器和科学方法，消除或减少……那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处理的‘脏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尝试过这样做……剥削和毁掉人类要更加划算……其次，让我们看看哪些形式的‘脏活’是我们可以不做的……[并且]如果任何一种工作不仅令人不快，而且有辱人格，那么无论代价如何，我们都不会去做。不应该允许或强迫任何人去做有辱人格的工作。最后，对于剩下的那些枯燥或令人不快的工作，让我们提供任何必要的特殊条件来吸引所需的工人，不是通过更高的工资——而是通过更短的工作时间、一年中长达六个月的假期，提供足够吸引人的条件，让那些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其他安排的人，自愿去承担所需数量的工作。”[《重新阐述行会社会主义》，第76页]

通过这些方法，随着个人在对有趣工作的渴望和对自由时间的渴望之间找到平衡，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将实现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运用适当的技术力量，即使是这种时间记录的工作，也会随着社会的自由发展而减少甚至消除。在这些工作能够实现自动化之前，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不得不通过这些以及其他方法，鼓励人们自愿从事他们并不特别想做的“工作”岗位。

在任何社会中，哪些工作被认为是令人不快的工作是很明显的——那些很少有人（即使有的话）会自愿去做。就像在任何先进社会中一样，需要额外帮助的社区和工团组织会通过各种现有的媒体形式，将他们的需求告知其他人。此外，每个社区很可能会有一个“活动分配”工团组织，其工作是发布有关这些岗位的信息，社区成员可以前往该组织了解他们感兴趣的“工作”岗位有哪些空缺。这样，工团组织和公社就有了一种方式来招募新成员，而个人也有了一种方式来发现这些工作岗位。显然，有些任务仍然需要相应的资格，工团组织和公社在“招聘”帮助时会考虑到这一点。

重要的是要记住，新的工团组织所需的生产资料不会凭空出现。社会的其他成员将不得不工作来生产所需的商品。因此，工团组织和公社很可能会达成一致，即只有一定（最高）比例的生产资料将被分配给新成立的工团组织（而不是增加现有邦联的资源）。这样的比例显然会定期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决定组建新的生产任务工团组织，或者组建从事相同工作、但独立于现有邦联的工团组织的社区成员，必须得到其他工人的同意，以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就像今天，他们必须得到银行的同意，才能获得必要的信贷来创办新企业一样）。通过对可用资源进行预算，一个自由的社会可以确保个人对特定工作的需求，与社会对有用生产的需求相匹配。

我们必须指出（以免被误解），不会有一群“计划者”来决定哪些资源申请会被接受。相反，个人和团体将向不同的生产单位申请资源，而这些生产单位的工人则反过来决定是否生产所请求的商品。如果这在工团组织商定的预算范围内，那么他们很可能会生产所需的材料。通过这种方式，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将确保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以便创办新的工团组织并加入现有的组织，同时确保社会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不受影响。

当然，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我们确信，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他们最喜欢的工作（我们可以补充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如此）。在无政府主义社会

中，每一种确保个人从事自己感兴趣工作的方法都会得到研究。如果能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一定会去采用。一个自由的社会将确保资本主义市场不会重新发展起来（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会确保大多数人被边缘化成为雇佣奴隶），也不会出现国有社会主义那种“劳动大军”式的分配过程（因为这将确保自由社会主义无法长期保持自由或社会主义的性质）。

通过这种方式，无政府主义将能够确保自愿劳动和自由联合的原则，同时确保那些令人不快和无人愿意做的“工作”得以完成。此外，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随着互助和团结的情感变得越来越普遍，鼓励人们自愿从事令人不快工作的需求，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事实上，很可能人们会因为从事别人可能觉得不愉快的工作而受到尊重，所以从事这类活动可能会变得“魅力四射”。在朋友面前炫耀可以成为从事任何活动的强大动力。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会认同阿尔伯特和哈内尔的观点，他们说：

“在一个竭尽全力贬低除了炫耀性消费之外的一切所带来的尊重的社会里，人们认为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必要条件，这并不奇怪。但是，仅仅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努力让它变成这样，就认为只有炫耀性消费才能激励人们，这是没有根据的。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可以出于对个人财富的渴望之外的原因而做出巨大的牺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心智正常的人来说，财富通常只是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而被渴望，比如经济保障、舒适的生活、社会尊重、地位或权力。”[《参与式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第 52 页]

我们应该注意到，教育工团组织在决定课程结构时，显然会考虑到“工作”岗位需求的趋势。这样，教育将既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也能满足个人的需求（任何生产性的工团组织也会如此）。

I.4.14 那些不愿工作的人怎么办？

无政府主义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之上。如果人们不想工作，那么就不能（也绝不应该）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他们工作。这让一些人不禁好奇，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如果有人拒绝工作会怎样呢？

对于互助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因为商品是根据劳动贡献来分配的。所以，如果有人不工作，那么他们就得依靠那些工作的人的施舍（当然，对于青少年、老年人和病人会有特殊的照顾）。

所以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们如果没有报酬就根本不会去工作。这种观点忽略了很多从事志愿工作的人（他们常常在有“正式工作”的情况下还参与志愿活动）。它也忽视了那些花时间致力于自己感兴趣项目的人（比如爱好者创办的刊物），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活动也可被视为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特别是像

维基百科^①这样的网页，以及像 PHP^②这样的软件项目。还有那些资本主义支持者自己，他们往往是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们几乎总是把共产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这些人在空闲时间里在维基百科、新闻组、网页和刊物上发表言论，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行不通，理由是人们永远不会自愿为社会做贡献！最讽刺的是，那些最痛恨共产主义的人，往往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可行性。

因此，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一个基于自我管理、工作环境宜人，且将每周工作时间减至最少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会拒绝从事任何形式的生产活动。但问题是，对于那些（当然只是少数人）确实拒绝工作的人，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不应该剥夺懒人的生活资料。他们认为，社会舆论的压力，会促使那些只索取而不贡献的人听从自己的良心，开始为支持他们的社区进行生产。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拒绝贡献的人将会被要求离开（自由结社意味着也有不结社的自由）。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首先，很明显，如果一个建立在自由劳动原则基础上的社会真的受到懒人的威胁，它完全可以在没有我们如今这种威权组织的情况下保护自己，也无需采用雇佣劳动制度[即按劳动成果付酬]。

“让我们设想有一群志愿者为了某个特定项目而联合起来。他们都真心希望项目能够成功，并且都满怀热情地工作，只有其中一名成员经常擅离职守……有一天，那个危及项目的同志会被告知：‘朋友，我们很愿意和你一起工作；但由于你经常擅离职守，而且工作也不认真，我们不得不分开了。你去找其他能容忍你这种冷漠态度的同志吧！’

“这是很自然的事，如今在各个行业中都在这么做……如果[一个工人]工作表现不好，或者因为懒惰或其他问题妨碍了同事，又或者他喜欢争吵，那么事情就会有断；他会被迫离开车间。

“威权主义者声称，是万能的雇主及其监工维持着工厂的秩序和工作质量。但实际上……确保工作质量的正是工厂本身，是工人们自己。”[《面包与自由》，第 152-153 页]

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卡米洛·贝内里的观点，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应该基于“不强迫人们工作，但也不对那些不想工作的人承担义务”。[《工作的问题》，第 59-82 页，《为什么工作？》，弗农·理查兹（编），第 74 页]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社会不会继续为那些有能力生产却拒绝工作的人，提供食物、衣物和住所。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受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只消费不生产的富人，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在革命之后还要养活一群新的寄生虫。

^① 维基百科（Wikipedia）是维基媒体基金会运营、全球各地志愿者合作编撰的一个多语言的网络百科全书，特点是自由内容、自由编辑、自由著作权。目前是全球网络上最大且最受大众欢迎的参考工具书，名列全球二十大最受欢迎的网站。本书中的诸多译注，也多参考自其中收录的条目。

^② PHP，是一种开源的通用计算机脚本语言，尤其适用于网络开发。

但显然，不想工作和无法工作是有区别的。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中，病人、儿童、老人、孕妇等都会得到照顾。由于养育孩子和其他更明显的经济任务一样，会被视为“工作”，父母无需为了维持生计而丢下孩子不管去工作。相反，社会也会同时考虑到父母和孩子的需求，并且会设立社区托儿所和儿童保育中心。

我们在此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社会不会剥夺任何人的生活资料。这将违背自愿劳动的原则，而自愿劳动是所有无政府主义流派的核心。与资本主义不同，生活资料不会被任何群体垄断——包括公社。这意味着，那些不想加入公社，或者在公社中没有尽到自己责任而被驱逐或选择离开的人，仍然能够获得谋生的手段。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许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或者更愿意忽视它，从而歪曲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无法获得独自工作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或土地，就被迫加入公社。与资本主义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的途径取决于是否能从资产阶级那里购买（因此，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获得），而无政府主义社会将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些资源，并且在生活在公社里和独立工作之间做出真正的选择。这种获得资源的方式基于占有和财产的根本区别——公社拥有其所需的土地，非公社成员也是如此。他们所使用的资源遵循通常的占有原则——只要他们在使用这些资源，他们就拥有其使用权；如果他们不使用，就不能阻止其他人使用（也就是说，这不是财产）。

因此，无政府主义公社仍然是一个自愿的联合体，并且确保消除一切形式的统治。公社成员可以选择作为社区的一部分参与工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者采用其他组织生产和消费的方式，比如实行平等收入或发放劳动券等等）；或者选择独立工作，这样就无法享受公社的福利，同时也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当然，使用公社资源，比如道路等相关的义务除外）。

所以，即便不是全部，但在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社区中，个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加入公社，作为平等的一员共同工作；要么独立工作，或者加入独立的合作社，与他人交换劳动成果。如果一个人加入了公社，却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即使在其他工友提醒之后仍然如此，那么这个人可能会被开除，并得到足够的土地、工具或生产资料，以便独立工作。当然，如果一个人身心俱疲，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难以承担社区责任，那么他的朋友和工友们会尽一切努力提供帮助，并且灵活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个社区会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社区成员认为哪种方法是最好的。

然而，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人们试图不工作的问题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生产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当工作是自愿且自我管理的时候，它将变得像如今人们的业余爱好一样，而且很多人在自己的爱好上会比在“真正的”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本常见

问题解答本身就是一个例子！^①）。当然，要完全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还不得而知，但自由社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对工作进行变革，并分担剩余的工作负担，以将劳动强度降至最低。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关系本质，以及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使得工作变成了一种“负担”而非乐趣。工作，不一定非得是我们希望快点结束的一天中的一部分。人们讨厌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过度工作、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在他人控制下工作。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并将工作置于自我管理之下，工作就不再会被人厌恶。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确保只有傻瓜才会渴望独自工作，因为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一个希望独自工作来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的人，将会成为自己劳动的奴隶。”[《无政府主义革命》，第 15 页]

因此，开明的利己主义，将确保绝大多数人都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自愿劳动和平等分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寄生现象将成为过去。所以，那些关于“懒人”的问题，既没有理解人性的本质，也没有认识到自由对工作的性质和内容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

I.4.15 未来的工作场所将会是什么样子？

鉴于无政府主义者渴望解放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创造力，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自由的社会将彻底改变工作环境。工人们将不再对自己的工作场所漠不关心，而是会通过将其改造成宜人的地方来展现自我，使其融入当地社区生活和周边环境。毕竟，“任何一场运动，如果它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的要求，却不努力推动工作场所环境的全面变革，就不能被视为革命性的运动。”[默里·布克钦，《后稀缺无政府主义》，第 88 页]

从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可以瞥见未来工作场所的模样。1936 年，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费舍尔车身公司第一工厂为期 40 天的静坐罢工中，“两千名罢工者形成了一个社区……各委员会组织了娱乐活动、信息交流、课程学习，还设立了邮政服务和卫生管理……开设了议会程序、公众演讲、劳工运动史等课程。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们还教授了新闻学和创意写作课程。”[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史》，第 391 页] 同年，在西班牙革命期间，实行集体化的工作场所也创建了图书馆和教育设施，并为学校、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必需品提供资金支持（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做法在革命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无政府主义工会就曾资助过学校、社会中心、图书馆等）。

未来的工作场所将得到扩展，纳入教育和个人发展相关的课程。这遵循了蒲鲁东在 1848 年革命期间提出的建议，即我们应该“组织协作，同时让每个车间都成为一所学校，每个工人都成为师傅，每个学生都成为学徒。”[《没有上帝，

^① 当然，读者现在正在阅读的中文版 AFAQ 也是如此。

没有主人》，第一卷，第 62-63 页] 这意味着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工人协会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公共教育体系相结合，它们将成为生产中心，同时也是教育中心……劳动大众将每天与年轻的工农业劳动力大军接触。长期以来被愚蠢地分隔开来的劳动与学习，最终将以它们自然结合的状态并肩出现。职业教育将不再局限于狭窄的专业领域，而是会涵盖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总体而言，这将确保每个学生都成为全面发展的工人。”[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文选》，第 87 页]

这将使工作成为更广泛社区的一部分，吸引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分享他们的知识，学习新的见解和想法。此外，孩子们将在工作场所完成部分学业，让他们了解许多不同形式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使他们在长大后能够对自己感兴趣的活動做出明智的决定。

显然，由工人管理的工作场所，也会努力使工作环境尽可能舒适宜人。不再有“病态建筑综合症”，也不再有不健康且充满压力的工作区域，因为“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我们怎能怀疑工作不会成为一种乐趣和放松呢？在这样的社会里，‘劳动者’不会被迫出卖自己去劳作，也不必在任何令人厌恶的条件下接受工作。令人厌恶的工作任务将会消失，因为很明显，这些不健康的条件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害的。奴隶可能会忍受这些，但自由的人们会创造新的条件，他们的工作将会愉快得多，也会更有成效。”[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 123 页] 工作场所的设计将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并允许员工在其中展现个性。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地方周围，环绕着由工人自己打理的花园和小菜园，为工作场所营造出宜人的环境。实际上，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将被打破——工作场所将紧邻农田，并融入周边环境：

“把工厂和车间建在你的田地和花园旁边，在那里工作。当然，不是那些需要处理大量金属材料的大型工厂，这类工厂更适合建在大自然指定的某些地点——而是无数种类繁多的车间和工厂，它们能满足文明社会中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在这些工厂和车间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不是因为饥饿而被迫工作，而是被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活动的愿望所吸引。在马达和机器的帮助下，他们将选择最符合自己爱好的工作分支。”[克鲁泡特金，《田野、工厂和车间》，第 197 页]

这种城乡融合的愿景，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未来工作场所设想的一部分。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我们倡导整合……一个劳动整合、协作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既是体力劳动者，也是脑力劳动者；每个身体健康的人都是工人，每个工人既在田间劳作，也在工业车间工作；每个拥有足够自然资源的群体（可以是一个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地区），都能生产并消费自己所需的大部分农产品和制成品。”[同前引，第 26 页]

未来的工作场所将体现出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的愿望。它将以宜人的工作环境为基础，周围有花园环绕，还配备大型图书馆、教育课程资源以及其他休闲活动设施。在一个基于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的社会里、在一个个性不会被权威和资本主义所压制的社会里，所有这些以及更进一步的设想都将成为可能。引用克鲁泡

特金的话来说，未来的工作场所将是“通风良好、卫生整洁，因而也更加高效的工厂，在这样的工厂里，人的生命比机器和获取额外利润更为重要。”[同前引，第 197 页] 因为，显然“如果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车间都污浊不堪、不健康，那是因为工厂的组织管理中，工人根本不被重视。”[《面包与自由》，第 121 页]

“简而言之，”威廉·莫里斯说，“我们的建筑作为车间，将因其简洁之美而显得美观”，而且“除了单纯的车间之外，我们的工厂还会有其他建筑，这些建筑的装饰可能会更加丰富，因为它将需要餐厅、图书馆、学校、各种学习场所，以及其他类似的建筑。”[《工厂可能的模样》，第 9 页] 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只是资本主义将这种自由的愿景斥责为“不经济”而加以阻碍。然而，这种说法忽略了阶级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情况：

“我听到一个反社会主义者说，这不可能。我的朋友，请记住，如今大多数工厂都有大片漂亮的花园，而且常常还有公园……只是这些花园等设施，离工厂有二十英里远，烟雾缭绕，而且只是为工厂的一个成员——也就是不参与实际经营的合伙人——而维护的。”[莫里斯，同前引，第 7-8 页]

基于工作自我管理的舒适工作条件，能够打造出一个既实现经济“效率”，又不破坏个性和环境的工作场所（关于无政府主义与技术的更全面讨论，另见 [1.4.9 节](#)）。

1.4.16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难道不会效率低下吗？

人们常常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市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会导致效率低下和工作缺乏成效。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如果没有市场力量来约束工人，也没有利润动机来激励他们，那么工人就没有动力以节省时间或资源的方式工作。其最终结果将是对资源，尤其是个人时间低效地利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有道理的观点；例如，一个社会（有可能）会从提高生产力中受益，因为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时间和资源越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可用于其他活动（当然，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好处，通常首先会落到上层阶级手中；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其他活动”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工作）。事实上，对于个人而言，一个良好的社会取决于人们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发展自身，享受生活。此外，用更少的投入实现更多的产出，对环境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无政府主义社会会有兴趣在生产过程中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一个自由的社会，无疑会为如何高效利用资源和时间制定新的标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视为“高效”的做法，往往意味着对少数人增强权力和获取利润而言是高效的，却不顾及对个人时间、精力和潜力的浪费，以及环境和社会成本。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不会存在这种狭隘的决策标准或对高效生产的评估标准

（例如，可参考我们在 [1.1.2 节](#) 中对价格机制不合理性的讨论）。当我们使用“效率”这个词时，我们指的是字典中对效率的定义（也就是，减少浪费，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扭曲后的那种定义（即，对老板而言能创造最多利润的方式）。

虽然资本主义，将提高生产力变成了增加工作量、使少数人致富，以及使工人阶级普遍无产阶级化的手段；但一个自由的社会会对这个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正如在 [1.4.3 节](#) 中所论述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基于这样一个原则：“每天付出一定量的劳动（在今天是用金钱衡量，在明天则是用劳动量衡量），你就有权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奢侈品除外。”[彼得·克鲁泡特金，《小型社区实验及其失败原因》，第 8 页]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以特定行业在特定时间内的平均产出，作为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激励标准。如果某个特定的工团组织，能够在比商定的平均/最低时间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至少达到平均质量水平的产品（当然，同时不会造成生态或社会方面的外部问题），那么该工团组织的成员就可以，而且应该，获得相应的休息时间。

这将成为一种强大的激励因素，促使人们进行创新、提高生产力、引入新的机器和生产流程，并且在不重新引入利润动机和物质不平等的情况下高效工作。由于有可能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来开展个人项目，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们会对提高效率产生浓厚的兴趣。当然，如果所从事的工作是他们喜欢的，那么效率的提高只会增加工作的乐趣，而不会消除这种乐趣。

用自由时间来奖励效率，不仅是确保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手段，也是用来减少人们在被认为是枯燥、或其他不受欢迎的生产活动中所花费时间的一种方式。尽快完成令人不快任务的激励措施，将确保这些任务能够高效完成，并且会促使人们针对这些任务进行创新。此外，在进行重大投资决策时，如果某个工团组织享有卓越的声誉，那么它就更有可能让其他组织同意其计划。这同样会鼓励提高效率，因为人们会知道，如果他们的工作高效且可靠，就能够更轻松地为自己的社区和工作场所（也就是他们自己）获取资源。这也将是鼓励高效且有效地利用资源的关键手段。

同样地，一个效率低下或浪费资源的工团组织，也将会受到其他工人的负面评价。正如我们在 [1.4.7 节](#) 中所论述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将建立在自由联合的基础之上。如果某个工团组织或社区，因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声名狼藉，那么其他组织就不会与它们合作（例如，不会为它们提供原材料，或者在决定满足哪些生产需求时，会将它们排在最后等等）。就像生产劣质产品的工团组织一样，效率低下的工团组织也会受到同行的评判。这将营造出一种鼓励高效利用资源和时间的环境。

所有这些因素，包括获得更多自由时间的可能性、因高效出色的工作而赢得的尊重和资源，以及因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可能面临与他人缺乏合作的情况，都将确保无政府共产主义或无政府集体主义社会无需担心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通过将提高效率所带来的好处交到实际工作者手中，效率无疑会得到提升。

在自我管理的模式下，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时间和资源得到高效且富有成效的利用，原因很简单，因为从事工作的人们会对其产生直接且切实的关注。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剥夺他们的自由不同，他们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运用自己的智慧，对生产活动进行改造，使其变得愉快而不是浪费时间。

难怪克鲁泡特金会认为，现代知识可以应用于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借助已发明和即将发明的机器，应该能够自己创造出所有可以想象到的财富。如果生产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技术和科学就不会落后。在观察、分析和实验的指导下，它们将满足所有可能的需求。它们将把创造财富所需的时间减少到任何期望的程度，从而为每个人提供尽可能多的闲暇时间……它们能保证……人们可以在充分多样地发挥自身各种能力的过程中，在无需过度劳累的工作中找到幸福。”[《明天的田野、工厂和车间》，第 198-199 页]

I.5 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结构

可能是什么样的？

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与其经济结构相似，即建立在去中心化的、自愿联合的、直接民主社区集会（公社）基础之上。在这些基层政治单位及其邦联组织中，“自我管理”的概念演变为“自我治理”——一种市政组织形式，旨在让人民从官僚国家及其所服务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回对自身生活环境的控制权。巴枯宁的论述在此尤为适用：

“一个真正的人民组织应当从下而上地建立，从社团、公社开始。因此，联邦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人民生活自由且自发的组织形式，它必须从最低的基层组织出发，并逐步向上发展。”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p. 273-4]

克鲁泡特金也提出：“一个新的经济阶段，必然要求一个新的政治阶段。一场如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深刻的革命，绝不能接受过时的政治体制。一个以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为基础的新社会，哪怕仅仅一周……也无法容忍代议制政府……如果我们想要实现社会革命，就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使其与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相匹配……未来属于自由联合的利益群体，而非政府的中央集权；它属于自由，而非权威。” [Words of a Rebel, pp. 143-4]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将与现行体制完全相反。它不会像国家那样是自上而下的集权体系，而是去中心化的、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必须更加大众化、更加公社化，并且减少对通过选举产生的间接政府的依赖。它必须变得更加自治。” [Anarchism, p. 185] 在这一点上，克鲁泡特金（如同巴枯宁）追随了蒲鲁东的思想，即“除非民主是一场骗局、人民主权是个笑话，否则必须承认，每一位公民在其产业领域，每一个市政、区级或省级委员会在其辖区内，都是唯一自然且合法的主权代表，因此，每个地方都应当直接管理其自身事务，并在这些事务上行使完全的主权。”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276]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种公社体系的具体构成方式存在不同观点（我们将在后文讨论），但他们在这些基本愿景和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

其目标是“建立一种使人民、个人和公民主权的原则，都能得以彻底贯彻的秩序”，并且“社会中的每一名成员，在保持自身独立并继续作为主权者行事的同时，能够进行自我治理”，任何社会组织“仅处理集体事务，因此，社会中将会有一些共同事务，但不会出现中央集权。”这意味着“联邦制、互助共和的情感”（如今以“自我管理”一词概括）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工人民主的胜利。”

[Proudhon, *Anarchism*, vol. 1, Robert Graham (ed.), p. 74 and p. 77]

这种通过去中心化和直接民主，赋予普通公民以权力的方式，将消除当前社会中泛滥的异化和冷漠，并且（正如每当人民获得自由时所发生的那样）在应对当前社会崩溃的问题上释放出巨大的创新活力。庞大的都市、其等级森严且缺乏人情味的行政体系、以及被分割和孤立的“居民”，将转变为由人性化规模的参与式社区组成的网络，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自我治理形式，并通过联邦制与其他社区协作联结，从市政层级、到生物区域、再到全球范围。

这意味着，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会愿景与其经济愿景一样独特。主流社会主义往往支持中央集权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并认为这意味着去中心化。因此，社会主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当人们称某人为社会主义者时，意味着他认为，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垄断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及其伴生问题的根源……社会主义者分为中央集权派和去中心化派，即国家派和联邦公社派。” [Charlotte M. Wilson, *Anarchist Essays*, p. 37] 只有这样一种联邦制的、自下而上的体系，才能确保人民掌控自身命运，并通过大众参与和自我管理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当然，人们可能会（并且已经）提出一种观点，即公众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此外，还有人声称，正是由于这种冷漠，政府才得以存在——人们将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委托给他人，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然而，这种观点在经验层面上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我们在 [B.2.6 节](#)所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期间，权力的集中化并非因为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而恰恰是因为统治阶级认为工人阶级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兴趣过于浓厚，而非相反。（“要是攻击中央权力，剥夺其特权，使之去中心化，解体其权威，那就意味着把事务的管理权交给人民，从而要冒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风险。这正是资产阶级想要进一步巩固中央政府的原因……” [Kropotkin, *Words of a Rebel*, p. 143]）简而言之，国家之所以是集权的，是为了便利少数人的统治，并将大多数人排除在社会决策过程中。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社会结构并非随机演变的——而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和要求而发展起来的。统治阶级的特定需求是统治，而这意味着要将大部分人口边缘化。它的要求是维持少数人的权力，而这种需求正体现在国家的结构之中（见 [H.3.7 节](#)）。

即便我们忽略历史证据，无政府主义者也不会从当今普遍存在的冷漠中得出“人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一结论。事实上，我们认为这种冷漠并非政府存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政府本质上是一个等级制系统，普通人被刻意边缘化。这种体制使人们感到无能为力，从而对政治事务感到冷漠。这正好确保了富裕和强势的精英阶层，能够不受被压迫和剥削的大多数人的干预，顺利掌控社会。

此外，政府通常会干涉那些大多数人实际上毫无兴趣的事务。例如，在工业监管或工人安全与权利问题上，一个自由社会完全可以让相关人员自行决定（例如，我们怀疑工会会主动接受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在其他方面，例如个人道德和行为，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一个自由的人民自然不会对此感兴趣。这进一

步减少了在自由公社中需要讨论的事务。此外，通过去中心化，自由社会中的人们主要会讨论地方性事务，从而降低许多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涉及更广泛的议题时，讨论仍然会进行，但会围绕具体问题具体展开，因此比国家立法机构所涉及的庞杂事务更加集中和明确。换句话说，中央集权与对所有问题都抱有非理性的干涉欲望，正是让“政治”显得枯燥乏味、不具相关性的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这一结果并非偶然，普通民众的边缘化实际上在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中被堂而皇之地赞颂。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

“20 世纪的民主理论家建议‘必须让公众各安其位’，以便‘负责任的人’可以‘免受一群困惑的乌合之众的踩踏与喧嚣’——这些‘无知而多事的外人’的‘职责’，就是作为‘行动的感兴趣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仅仅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个领导阶层中的一员，然后回归自己的私人事务。（沃尔特·李普曼）庞大的普通民众，‘无知且智力低下’，为了‘共同利益’必须被管制好，并喂以‘必要的幻象’和‘情绪上强效的过分简化’（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赖因霍尔德·尼布尔）。而他们‘保守派’的对应者则更加极端地崇拜那些天生应当统治的‘智者’——当然，这些‘智者’只是富人和权贵的仆从，这一点经常被有意遗忘。” [《501 年》，p. 18]

公众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确保了富人可以“安然无恙”地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权力。换句话说，这种边缘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常运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必须被遏制。正如乔姆斯基所言，“乌合之众必须被灌输服从的价值观，并在统治阶级设定的框架内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而真正有意义的民主，即以民众联合和行动为基础的民主，（对他们而言）是必须被铲除的威胁。” [同上, p. 18] 这一理念，在一位美国银行家于委内瑞拉独裁者希门尼斯统治下所说的话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这里，你有随意支配自己财富的自由；而在我看来，这比世上所有的政治自由都更有价值。” [引自乔姆斯基，同上, p. 99]

打消用自由意志主义方案替代国家主义的念头，是当前体系的一个常见特征。通过边缘化和削弱民众，该体系破坏了个体管理自身社会活动的的能力，使其日渐衰退。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种“对自由的恐惧”，转而拥抱威权主义制度和“强势的领导者”，而这一过程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边缘化。

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参与的愿望与参与的能力是共生关系：参与本身会不断推动自身的发展。只要建立起能够促进参与的社会结构，参与度就会随之提高。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们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也会随之增长。必须对影响现实的决策承担责任，这既是挑战，也是个人成长的契机。从过去的无力感中觉醒，开始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争取并掌握有效参与所需的资源，并学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解放性的。一旦人们成为社会事务的主动主体，在生活的某一方面推动现实变化，他们就不太可能在其他方面仍然保持被动，任由事情摆布。

总的来说，“政治”实在过于重要，不应交由政客、富人和官僚掌控。毕竟，政治涉及的是（或者说，至少本应该是）你的朋友、你的社区，乃至你赖以生存的整个星球。这些问题不能交给他人，而只能由你自己来决定。

因此，以自主个体为基础的、有意义的公社生活，并非空想（事实上，它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使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并丧失权力，这正是当前社会冷漠现象广泛存在的根源，哪怕社会与生态危机正日益加剧。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因此主张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体系，以取代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一体系将建立在自治社区的邦联基础之上：“**社会，是一个由社会组成的社会；一个由联盟组成的、联盟的联盟；一个由邦联组成的、邦联的邦联；一个由共和国组成的、共和国的共和国。**唯有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与秩序才能共存，精神才能得以显现，而这种精神即是自足与共同体的结合，统一与独立的并存。” [Gustav Landauer, *For Socialism*, pp. 125-126]

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就必须拆除民族国家，并在社区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基于自决权、自由与平等的、自下而上的邦联制关系。在接下来的各小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为何需要这样一个新体系，以及它可能呈现的形态。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这些只是对社会组织可能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方案的建议。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到，在现有国家被摧毁后，无政府主义社区仍将与非无政府主义社区共存。我们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探讨的自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愿景。至于那些非无政府主义者的未来愿景，则留给他们自己去描绘。

1.5.1 什么是参与式社区？

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参与式社区”（participatory community）。在传统无政府主义理论中，这些参与式社区通常被称为**公社**（communes）（“无政府社会的基本社会和经济单元是自由、独立的公社” [A. Grachev, quoted by Paul Avrich, *The Anarch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64]）。

使用“公社”一词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无政府主义在法国的起源，在那里，“公社”指的是共和国中最低级别的行政区划。在法国，一个公社可以是一个拥有 200 万居民的城市（因此就有了 1871 年的巴黎公社）；也可以是一个拥有 1 万人口的小镇，甚至是一个仅有 10 人的村落。该词起源于 12 世纪的中世纪拉丁语 **communia**，意为“一个共同生活的人群集合”（源自拉丁语 **communis**，意为“共有之物”）。蒲鲁东使用该术语来描述非国家社会的基本单位，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亦沿用了这一用法。然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公社”一词往往指代“意向性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ies），即人们脱离社会，组建自己的反主流文化团体和生活空间。为避免混淆，我们决定使用“参与式社区”这一术语（无政府主义者还曾使用其他术语，包括“自由市镇”（free municipality）等等）。

这些社区组织，被视为是人们参与影响自身及其社区、地区乃至整个星球决策的方式。它们是改造社会环境的手段，使社会摆脱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破坏，转变为适合人类生存与繁荣的空间。建立一个由“参与式社区”（“公社”）构成的网络，并在基层邻里大会中通过直接、面对面的民主实现自治，正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正如我们在 [1.2.3 节](#) 所论述的，这些大会将在社会斗争中诞生，并反映斗争的需求及参与者的利益，因此，我们在此对这些社区的讨论应被视为对其主要特征的概括，而非一成不变的蓝图。

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对自由公社的构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以工作场所代表（workplace delegates）为基础，另一种则以邻里大会（neighbourhood assemblies）为基础。我们将依次进行概述。

第一种参与式社区的模式（其中“所有工人协会的联邦联盟……将构成公社”）主要与巴枯宁的思想相关。他主张“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地建立，通过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邦制，首先是在工会内部，然后是公社、地区、国度，最终形成一个国际性、世界性的伟大联邦。”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70 and p. 206] 这一构想在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中得到了强调。例如，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伊萨克·普恩特认为，在城镇和城市，“自由市镇的角色由地方联邦来承担……工业工会地方联邦的最终主权，属于所有本地生产者的群众大会。” [Libertarian Communism, p. 27]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G. P. 马克西莫夫则认为，“公社邦联”应当“由成千上万个自由运作的劳动组织构成。” [The Program of Anarcho-Syndicalism, p. 43]

这种公社模式在后来的多次革命中得以实践（如 1905 年和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以及 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基于工作场所的公社模式具有一个显著优势，即它以人们日常大部分时间自然聚集的群体为基础（巴枯宁认为，工作场所团体是“群众的自然组织”，因为它们“基于各种不同的劳动类型”，而劳动“定义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The Basic Bakunin, p. 139]）。这一特点有助于组织集会、讨论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并赋予代表以委托权，同时确保代表可以被随时撤换。此外，这种模式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结合在一个组织中，从而确保工人阶级真正掌控社会。

然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应以邻里大会取代工人委员会。这些大会将成为每个社区、城镇和乡村的全民会议，并作为各级联邦协调的政策制定基础。这种类似“城镇会议”的模式能够让人们直接参与政治进程，并在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支持这一模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指出，1789 年法国大革命及其巴黎公社的各“区会” (sections)，是“人民直接自治——在可能的情况下——没有中间人，没有主人的”关键范例。基于这一经验，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源于 1789 年，并且它们的起源并非理论推演，而是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实际行动。” [彼得·克鲁泡特金，《大法兰西革命》，第 1 卷, p. 210 和 p. 204] 无政府主义者还举例说明，1848 年法国革命期间的俱乐部、1871 年巴黎公社的基层组织，以及 21 世纪初，阿根廷反抗新自由主义危机期间建立的社区大会，均体现了这一模式的实践。

对工人委员会的批评者指出，并非所有人都在传统的工作场所劳动（例如，许多父母主要负责抚养子女）。如果公社以工作场所为基础，这些人将被自动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不仅如此，在大多数现代城市中，许多人并不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如果只依靠工人委员会来处理地方事务，许多参与决策讨论的人也实际上不会受到决策的影响。此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体系容易形成“特殊利益”，从而忽视社区整体的需求。只有社区大会才能“超越传统的职业、工作场所、社会地位和财产关系等特殊利益，创造一种基于共同社区问题的普遍利益。”[穆雷·布克钦，《从城市化到城市》，p. 254]

然而，这种社区大会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们能否迅速组织起来，以便做出决策并赋权或撤换代表。在资本主义城市中，由于许多人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相距甚远，这类会议往往只能安排在下班后或周末召开（因此，减少工作时间并将工业共有化就是关键）。因此，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支持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公社模式，同时辅之以社区大会，以便让那些不在传统工作场所劳动的居民（如抚养幼儿的父母、老年人、病患等）也能参与社会治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工人委员会的支持者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有人提出，应当建立包含社区居民代表和企业代表的双重代表制委员会，以保证不同群体的平等参与。

这些立场并非截然对立，远非如此。例如，普恩特认为，在农村地区，主要的公社形式将是“全体村镇居民在一个具有完全管理地方事务权力的集会（委员会）上进行会议。”[同上, p. 25] 克鲁泡特金则支持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认为“苏维埃……即工农委员会……控制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这些委员会，必然由所有通过自身劳动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组成。”[《无政府主义》，p. 254]

至于应采用工人委员会还是社区大会，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地方条件、需求和愿望，因此，制定固定不变的规则是毫无意义的。很可能会出现某种结合两种模式的混合体，在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辅以社区大会，直到工作时间缩短、城市中心实现分权，使得纯粹由社区大会管理的模式变得更加现实。在一个完全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中，社区大会可能会成为主要的公共组织形式，但在革命后的过渡时期，这种情况可能并不现实。客观条件，而非预先设定的理论预测，才将是决定因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政府主义者同时推动这两种组织形式，在阶级斗争中提倡社区联合主义以及产业工团主义（参见 J.5.1 和 J.5.2 节）。

无论公社的具体形式如何，它都具有一些关键特征。首先，它是基于自由联合的，这意味着加入公社的个人是基于自愿承担的义务进行合作的。在自由联合中，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个体能够集体治理自身事务的唯一方式（否则，他们的生活将由其他人决定）。斯蒂纳曾指出：“作为独特的个体，你只能在联合中确立自身，因为联合并不拥有你，相反，你是拥有它的个体，或是将其用于自身利益的人。”这种联合的规则由联合体成员共同决定，并可以由他们随时修改，因此，它比“接受或离开”式的规则有着极大的改进。同样，联合体所执行政策也是由其成员决定的。因此，这种联合“不会以一种凌驾于我精神之上的精神力量强加于我。我并不希望成为自己信条的奴隶，而是希望始终对其进行批判。”[麦克斯·施蒂纳，《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一卷, p. 17]

因此，参与性社区是自由加入并由其成员自我管理的组织，不存在国家体制内那种指令发布者与服从者的分工。相反，加入者自治共管，尽管集会中的成员共同决定管理该社群的规则，并作为个体受其约束，但他们仍高于这些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始终可以被修改或废除（详见 [A.2.11 节](#)）。由此可见，参与性公社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它与国家截然不同，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自我治理的，并建立在个人自主与自由协议的基础上。因此，克鲁泡特金指出：

“代议制是资产阶级为确保其统治而建立的制度，它将随着资产阶级的消亡而消失。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经济阶段，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这种形式的基本原则必须与代议制完全不同。历史发展的逻辑就决定了这一点。”
[Words of a Rebel, p. 125]

这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必须在社会主义原则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加以探索。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新形式必须比代议制**更加贴近大众，更加去中心化，并更接近民众大会式的自治。**”克鲁泡特金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认为通过接管现存国家、或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注定会失败。相反，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只能通过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如自由、自我治理等）的新型组织来构建。因此，他与此前的蒲鲁东和巴枯宁一样，主张“社会革命必须采取这样的形式——独立的公社……[其]居民，决定商品的消费、交换与生产的集体化。”
[Kropotkin, Anarchism, p. 184 and p. 163]

简而言之，参与性社区是一种自由联合，其基础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居民群众大会，它是居民们决定影响自身、社区、生物区域乃至整个地球事务的方式。其核心任务是提供一个讨论公共问题并做出决策的论坛。此外，这些集会不仅是构建社区（及社区精神）和建立、丰富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来培养和提升个人素质的重要途径。在讨论、思考并倾听他人意见的过程中，个体得以发展自身的能力和力量，同时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确保不会由他人代为管理（即，他们自我治理，而不再受制于他人）。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自我管理对实践者本身具有教育意义：

“各区群众大会的‘持续性’——即只要区内成员需要，就可以随时召开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上讨论任何问题……将对每一位公民进行政治教育……持续存在的区大会——一个始终开放的论坛——是保证诚实且理性管理的唯一方式。”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1, pp. 210-1]

除了整合社区的社会生活、并促进其成员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之外，这些自由公社还将融入当地的生态系统。人类不仅要自身内部实现和谐共存，还要与自然和谐共生——正如在 E.2 节中所讨论的，这些公社将成为**生态社区**，与当地生态系统融为一体，形成农业与工业相互平衡的结构（这一点可参考克鲁泡特金在其经典著作《田野、工厂与作坊》中的描述）。因此，自由公社将致力于让个人融入社会与共同体生活，使农村与城市生活整合为一个平衡的整体，并让人类生活纳入更广阔的生态环境之中。通过这种方式，自由公社能够使人类的居住环境真正地符合生态原则，消除人类生活与地球其他部分之间那种尖锐且不必要的（同时也是去人性化、去个性化的）割裂。公社将成为展现人类与地球多样性的

关键载体，同时也将提升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

“公社……将完全致力于改善本地的公共生活。居民可以向相应的工会——无论是建筑工会、公共卫生工会、交通工会还是能源工会——提出需求，从而获得合理的生活便利，包括城市规划、公园、游乐场、街道绿化、诊所、博物馆和美术馆。就像中世纪的城市议会一样，公社将为任何有兴趣的人提供参与并影响自己城镇事务和城市风貌的机会，公社与市政委员会将会截然不同……”

“在古代和中世纪，不同地区的城市和村庄展现出各自独特的地方特色和居民的个性。在红砂岩、波特兰石或花岗岩的建筑中，在灰泥或砖石结构中，在屋顶的坡度、相关建筑的布局或石板与茅草的组合中，每个地方都为旅行者增添了独特的兴趣……每个地方都通过城堡、家园或大教堂表达了自身的特点。

“而当代英格兰的单调乏味、灰暗死板，或炫耀性的浮夸风格，却有何等不同呢？每座城镇都千篇一律。相同的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奥迪安电影院、连锁商店，相同的‘市政住房’或‘半独立式别墅’……无论东西南北，哪里有什么区别，哪里有所变化？

“随着公社的建立，当代城镇和乡村生活的丑陋与单调将被彻底扫除，每个地方、每个地区、每个人都能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表达对生命的喜悦。” [Tom Brown, *Syndicalism*, p. 59]

邻里大会的规模会有所不同，但最终可能会在实践中找到一个理想的规模，既能确保面对面的互动，又能提供足够多样的个人交流渠道。这意味着任何城镇或城市，本身都将是多个大会组成的邦联体——当然，这种模式在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已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治理方式。

这些大会将定期召开，至少每月一次（但很可能更为频繁，尤其是在需要快速而频繁决策的时期，例如革命时期），以处理各种事务。正如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关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议所述：

“这一管理体系的基础将是公社。这些公社将是自治的，并将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联邦化，以实现其共同目标。自治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那些涉及集体利益的协议……[一个]没有任何自愿限制的公社，将承诺遵守在自由辩论后经多数表决，达成任何的一般规范……公社将是自治的，同时与其他公社联邦化……公社有责任关心与个体相关的一切事务。

“公社必须监督居住地的组织、运作和美化工作。它应确保居民得到妥善安置，并通过生产者工会或协会向其提供所需的物品和产品。

“同样，公社还应关注公共卫生、社区统计的维护，以及教育、医疗服务等集体需求，并负责当地交通和通讯设施的维护与改进。

“公社将协调与其他公社的关系，并积极促进所有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发展。

“为了确保这一使命得以顺利执行，公社将设立一个公社委员会……但这些职位不具有任何行政或官僚权力……[其成员]将在完成一天的生产工作后集合开会，在会中讨论那些无需提交公社大会批准的具体事务。

“公社大会应根据公社利益的需求，由公社委员会召集，或按照各公社居民的意愿随时召开……公社的居民应当自行讨论其内部问题。”[转引自何塞·佩拉特斯（Jose Peirats）所著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盟》（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第一卷，第 106-107 页]

因此，公社大会的讨论，将影响社区及其中成员的事务。由于这些地方性的社区联合体将成为更大公社组织的成员，公社大会还将讨论影响更广泛地区的问题，并授权其代表在邦联大会上进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体系曾在多次革命中都被成功实施（见 J.5.4 节），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空想。

然而，自由社会的具体架构必然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正如巴枯宁正确指出的，社会“可以且必须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组织自己，但不能自上而下，也不能依照某种理想化的蓝图。”[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05] 然而，看起来很可能的是，公社之间将需要形成邦联。我们将在下一节探讨这一问题。

1.5.2 为什么需要由参与性社区组成的邦联？

由于并非所有问题都仅限于地方层面，社区大会还将选举受授权并可被撤换的代表，参与更大规模的自治单位，以处理影响城市区域、整个城镇或城市、县、生态区域——乃至全球的问题。因此，大会将在各层级上形成邦联

（confederations），以制定和协调共同政策，应对共同问题。正如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在关于自由共产主义的决议中所阐述的：

“公社的居民应当在内部讨论他们自身的问题……联邦则应就影响全国或省份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商讨，并确保所有公社均能在联邦的会议和大会中获得代表席位，从而使各公社的代表能够传达其民主的意见。

“例如，如果需要修建道路以连接县内的村庄，或涉及农业县与工业县之间的交通运输与产品交换问题，那么当然，所有相关的公社都有权表达其意见。

“对于区域性事务，区域联邦有责任执行能够体现全体区域居民主权意志的协议。因此，自治的起点是个人，接着是公社，再向上发展为联邦，最终形成总邦联。

“同样，所有涉及全国范围的问题也应遵循这一模式……”[引自何塞·佩拉茨（Jose Peirats）所著的《西班牙革命中的 CNT》，第 107 页]。

换言之，公社“不能再承认任何高于自身的权力：在其之上，唯一存在的，只能是它自愿与其他公社共同拥抱的联邦利益”[克鲁泡特金，《无神无主》，第一卷，第259页]。

联邦主义适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如果独立公社不需要中央政府来统治，如果全国政府被废除，全国统一可以通过自由联邦实现，那么，中央市政政府同样变得毫无必要甚至有害。公社内部同样可以适用联邦原则。”[《无政府主义》，第163-164页]因此，整个社会将由自由联邦组成，从地方社区一直延伸到全球层面。而这一自由联邦将完全建立在地方团体的自治与自我管理基础之上。在联邦主义的框架下，合作将取代强制。

这种对合作的需求并不意味着一个集中的机构。通过加入自治组织并参与管理，从而同意遵守自己所参与决策的决定，并不否认个人的自主性（这与加入等级制组织不同，在等级制组织中，个人在组织内部会放弃自主权）。必须强调，在中央集权体系中，权力集中于上层，而下层的角色仅仅是服从（无论掌握权力的人是选举产生的还是任命的，这一原则都是相同的）。在联邦制体系中，权力不会被委托给少数人（显然，所谓的“联邦”政府或国家，本质上依然是中央集权体系）。在联邦制体系中，决策是在组织的基层进行，并自下而上地传递，以确保权力始终去中心化，掌握在所有人手中。共同解决问题、协调努力以实现共同目标，这并不等同于中央集权，而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在于，未能理解二者所产生的不同权力关系，并将服从与合作相混淆。

正如工团的经济联合会一样，较低层级对较高层级进行控制，从而消除当前中央集权政府层级的专断权力。各级邦联的代表，在参加更高级别的协调委员会或会议时，将由其所在的议会指示如何处理相关事务。这些指示具有约束力，确保代表必须在既定的政策框架内行事；并且如果他们未能履行其授权任务，他们的决定可以被撤销，他们本人也可以被罢免。代表的选拔可以通过选举和/或抽签（即随机抽选，类似于当前陪审团制度的遴选方式）来进行。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论述的：

“邦联主义的观点明确区分了政策制定与政策的协调和执行。政策制定，完全属于以参与式民主实践为基础的公民大会的权利。行政与协调的责任，则由邦联委员会承担，这些委员会作为纽带，将村庄、城镇、社区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形成联邦网络。权力自下而上流动，而不是自上而下传递，并且在邦联体系中，随着联邦委员会的地域范围从地方扩展到地区，再到更广阔的区域，权力的自下而上流动也随之减少。” [From Urbanisation to Cities, p. 253]

因此，人民将在政策制定上拥有最终决定权，这就是自治的本质，每位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协调。换言之，自治将体现在人民自身的组织形式之中，包括他们的社区大会及其邦联协调委员会，而代表的职能仅限于执行由人民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仍需经过邻里和社区大会的批准，因为社区大会拥有罢免代表并撤销其决定的权利。不言而喻，邦联的层级越高，其会议的召开频率就越低，需要考虑和决定的事务也越少。在此层面上，仅能就最一般性的问题和决策达成

共识（实际上，这些决策只是为其成员邦联提供指导方针，由各成员邦联根据自身情况加以实施）。

在这样的体系中，毫无疑问，会有一些特定的个人被分配到一定的任务上。我们强调“任务”这一词，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质上是行政性质的，并不具备权力。例如，可能会有一个人或一组人被选举出来，负责调查一个社区的替代能源供应，并就他们所发现的情况进行汇报。他们不能将自己的决定强加于社区之上，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们只是向授予他们任务的机构呈报他们的发现。这些发现**并不是**一项要求选民必须遵守的法律，而是一系列建议和信息，供集会的人民选择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案。或者，换个例子，也可能有人被选举出来，负责监督某个选定的电力供应的安装，但关于使用何种电力供应以及实施哪个具体项目的决策，已经由整个社区决定了。同样，对于任何被选举为邦联委员会代表的人也是如此。

邦联的规模和层次只能通过实践来确定。一般可以安全地说，邦联制度需要在广泛的范围内实施：从城镇和城市开始，逐步扩展到地区和其他层级。没有哪个村庄、城镇或城市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没有哪个地方希望做到这一点——与其他地方的沟通和联系是生活的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希望回归到一种孤立的地方主义形式：

“没有任何社区会希望实现经济专制，也不应该试图这样做。从经济上讲，制造许多我们广泛使用的商品所需的广泛资源，就排除了自我封闭的孤立主义和狭隘主义。与其视之为负担，社区和地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更应视为一种资产——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如果剥离了经济交流所带来的文化交融，市政体便会趋向自我缩小，消失于自身的市民私有主义之中。共同的需求和资源意味着共享的存在，分享带来沟通、由新思想带来的复兴以及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从而产生对新经验的更广泛的敏感度。” [Bookchin, Op. Cit., p. 237]

结合这一考虑，我们还必须提出规模经济的问题。某一层级的邦联可能是为了使某些社会和经济服务高效运作所必需的（我们在这里指的是如大学、医院和文化机构等社会需求的规模经济）。虽然每个公社可能都有一个诊所、幼儿园、地方公共商店和小型工作场所，但并非所有公社都能拥有大学、医院、工厂等。这些将需要在更广的层级上组织，因此需要相应的邦联体制来管理它们。基于一些如地理上集中的矿产资源、气候依赖型作物，以及生产设施最有效率时、集中在一个区域等物质需求的分布——这些生物区域或更大领土之间的联系，将使社区在物质需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联合成为邦联。

这意味着，由公社创建的联邦的规模和层次，将是多样的且广泛的。很难对其进行概括，尤其是不同的邦联将针对不同的任务和利益而存在。此外，任何公社制度都将以现存的资本主义村庄、城镇和城市为基础启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也将有助于确定邦联的初步规模和层次。

在城市地区，城镇或城市必须被划分为多个邦联单位，而这些邦联单位将共同组成城镇或城市的代表大会。对于伦敦、纽约或墨西哥城这样的大都市而言，

除了这种方式，几乎不可能有其他可行的组织形式。相较之下，规模较小的城镇可能能够建立更为简单的邦联结构。必须强调的是，几乎没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存在巨大城市是可取的；因此，社会变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将是将大都市拆分为与当地环境更加紧密结合的较小单位。然而，社会革命仍将发生在这些庞大的城市之中，因此，在我们的讨论中必须将其纳入考量。

总的来说，邦联的规模和层次将取决于实际情况，即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的最优的邻里集会规模，以及各集会之间、城镇、城市、地区等不同层级之间的协作需求。我们既无法，也不愿，预测自由社会的发展。因此，邦联的规模和层次将由那些真正创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人们决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邦联的层级将取决于所需代表的数量。当代表人数超过一定限度时，邦联大会的管理可能会变得困难，从而意味着需要设立新的邦联层级。这无疑将成为决定邦联规模和层次的基础，确保任何邦联大会都能有效管理其事务，并始终处于下级单位的控制之下。

最后，邦联的存在也是为了在极少数情况下应对局部压迫，从而确保团结得以实现。毕竟，历史上充满了对少数群体施加压迫的地方社区（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南部）。因此，邦联的存在使得任何受压迫的少数群体成员都可以寻求帮助与互助，以终结其所受的压迫。同样，邦联还可以确保地方公社能够自由尝试新思想，而无需等待多数人的同意——这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往往是必须的。

因此，公社的邦联化是必要的，以协调联合行动，并就共同的问题和利益进行讨论。同时，邦联还必须维护个体、社区与社会的自由，允许社会实验，并保护各个社区的独特性、尊严、自由与自治，从而确保整个社会的自由。因此，“社会主义是联邦制的”，而“真正的联邦制，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只有当这些人民基层组织[即‘公社、工业与农业协会’]自下而上地逐步组织起来时才能实现。”[巴枯宁，《由巴枯宁所著的〈无政府主义论〉》，第 402 页]

1.5.3 邦联会催生官僚和政客吗？

当然，任何组织都存在这样一种风险：被委派执行特定任务的少数人可能会滥用其职权以谋取私利，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掌控社会其他成员的官僚机构。因此，一些社会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公社与邦联的体系最终不过是政客与官僚的温床。这种情况在国家制度下显而易见，而许多人却将其经验推广到所有形式的社会组织，包括无政府主义公社。

尽管承认这的确是一种风险，但无政府主义者坚信，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中，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这是因为，基于我们对国家的分析与批判，我们长期以来主张采取各种制度性安排以减少这种风险。例如，选举的是受委托人

（delegates）而非代表（representatives），赋予受委托人明确的约束性授权，并允许选民随时罢免他们。一般来说，这些受委托者不会领取薪酬，换句话说，他

们应当尽可能留在各自的社区，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履行公社赋予的任务。对于极少数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况，受委托者的薪酬应与所在公社的平均收入持平——在互助主义与集体主义经济体系中如此；而在共产主义体系下，则不应享有任何特殊的公共资源。此外，受委托人的定期轮换可能会成为一种惯例，甚至可能采用类似于许多国家陪审团选任制度的随机抽选机制。最后，公社也可以选择退出任何变得明显畸形和官僚化的邦联。

通过这些措施，公社机构的受委托人将始终处于选民的掌控之下，而不会像国家体制那样凌驾于公社之上，成为其统治者。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任何公社机构都必须是一个实际运作的组织。这将有助于减少官僚倾向，因为各项事务的执行将由选举产生的受委托者负责，而不是那些通常未经选举产生的匿名官僚。正如巴枯宁在 1868 年所指出的，“公社委员会”（由“持有约束性授权，并随时对选民负责且可被罢免的受委托者”组成）将“从其成员中选出独立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公社革命行政的各个部门。”[Bakunin, 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155] 这样一来，执行机构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人民代表之外的政府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与蒲鲁东在 1848 年的论述如出一辙：

“国民议会应当通过委员会的组织来行使行政权，就像它行使立法权一样……除普选权之外，且作为一种普选权的逻辑延伸，我们主张实施约束性授权。政客们对此颇为反感！这意味着，在他们看来，人民在选举代表时，并非委任受委托者，而是放弃了他们的主权！这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甚至连民主都称不上。”[Op. Cit., p. 63]

由于约束性授权与随时罢免制度的存在，任何滥用职权或投票违背公社议会意愿的受委托者，都会迅速被罢免并替换。因此，尽管这些人可能是社区选出的受委托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权力或权威（即，他们并非代表，而是受委托者）。本质上，他们是受当地社区控制并对其负责的代理人。显然，这类人并不同于政客。他们既不能，也无法代表选民制定政策（即，统治选民）。此外，在特定组织或特定岗位上工作的人会被频繁轮换，以防止政治职业化、以及政客在当选后脱离群众的问题。当然，他们仍会与选民一起生活和工作，并且不会因当选而享有任何特殊待遇（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住房等）。这意味着，受委托者极不可能转变为代表或官僚，因为他们受到选举其担任该职位的组织的严格监督。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社区的全体大会“保持常设——始终开放的论坛——是确保一个诚实而智慧的行政管理的唯一方式”，因为它 “建立在对一切执行权的不信任之上。” [由克鲁泡特金所著的《法国大革命》，第 1 卷，第 211 页]

当前协调大规模行动的方式——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构成了对自由的威胁。正如蒲鲁东所言，“公民放弃了自己的主权，城镇、区、省都被中央权力所吸收，变成了直接受部长控制的机构。”他继续指出，“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公民和城镇被剥夺了一切尊严，国家的掠夺愈演愈烈，纳税人的负担与日俱增。政府不再是为人民服务，反而变成了人民为政府服务。权力侵蚀一切，统治一切，吞噬一切。” [由蒲鲁东所著的《联邦原则》，第 59 页] 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由政客和官僚组成的特权阶层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政治中央集权的原则，公然违背了一切社会进步和自然演化的法则。事实证明，每一种文化进步最初都是在小群体中实现的，并且只有在逐步演化的过程中才能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因此，政治上的分权是确保新实验自由开展的最佳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社区都能够推行自身能够完成的事务，而不必将其强加于他人。实践试验是社会进步之母。只要每个地区能够在其自身范围内实施其公民认为必要的变革，每个实验的示范作用就会对其他地区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其他社区可以衡量这些实验所带来的好处，而无需在不确信其实用性的情况下，被迫接受。这种机制使得进步的社区成为其他社区的榜样，这一结果也符合自然演化的规律。”[由鲁道夫·洛克尔所著的《美国自由的先驱》，第 16-17 页] 国家中央集权制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洛克尔继续说道：

“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情况则完全相反，而即便是最优的代表制度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某个选区的代表可能在其所在选区占据压倒性多数；但在中央国家的立法机构中，他（或她）将仍然处于少数派。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往往不是思想最活跃的地区，而是最落后的地区。由于各个地区虽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在未获得中央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就无法进行任何变革，最具进步性的地区将被迫停滞，而最落后的地区却将成为社会变革的标准。”[同上，第 17 页]

因此也就不奇怪，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强调克鲁泡特金所称的“地方行动”，并将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革命视为“通过宣布独立的公社来推进，这些公社将努力在……其各自的环境中完成经济变革。”[Peter Kropotkin, *Act For Yourself*, p. 43] 因此，先进的社区将通过提供可行的实践示范来激励其他人效仿。只有去中心化和邦联制才能促进自由，并由此带来社会实验，以确保社会进步，使社会成为宜居之地。

此外，邦联制对于最大化自我管理也至关重要，并能减少代表脱离其授权者的可能性。正如洛克所解释的：

“在较小的社区中，个人更容易观察政治动态并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中央集权政府中，这对代表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个体公民还是他的[或她的]代表，都无法完全、或哪怕是大致地——监督庞大的中央国家机器的运作。代表每天都被迫对自己毫无个人了解的事务做出决定，因此，他[或她]在评估这些事务时只能依赖他人[即官僚和游说者]。这种制度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和失误，这是不言自明的。而由于公民出于同样的原因，无法审查和批评其代表的行为，这就给了职业政治家阶层更多在混乱中渔利的机会。”[Op. Cit., p. 17-18]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原则在大规模实践中运作良好。例如，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运作的，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盟（CNT）所展示的那样，在拥有超过一百万名成员的情况下依然运作顺畅。此外，在西班牙革命期间，这些原则也被成功应用，而其催生的集体联合体也有效地运作。

因此，公社和邦联的组织方式能够保护社会和个体免受中央集权的危害，防

止代表蜕变为官僚或统治阶级。正如巴枯宁所强调的，社会有两种组织方式：“一种是像当今社会这样，自上而下、从中心到外围，以强制性统一和集权来构建”；另一种则是未来的模式，即通过邦联制，“从自由的个人、自由的协会和自治公社出发，自下而上、从外围到中心，以自由联合的方式组织。”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88] 换言之，就是“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方式。” [The Basic Bakunin, p. 131] 这表明，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代表堕落为政治家或官僚的风险将微乎其微，因为该社会内部包含了必要的防范机制（选举、授权、罢免、去中心化、邦联制等），从而能将这一风险降至最低，并在可控范围内加以遏制，甚至完全消除。

I.5.4 这些会议怎么能决定所有事情呢？

无政府主义者毫不怀疑，邦联结构将是一种高效的决策机制，而不会陷入无休止的会议之中。我们之所以持这一观点，有多个理由。毕竟，正如默里·布克钦曾指出的：“历史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多个主要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运作实例。它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邦联与联盟的案例，这些案例表明，协调自治社区是可行的，同时并不会侵犯它们的自主权和自由。”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436]

首先，我们不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会把全部时间都花在集会上或组织邦联会议上。某些问题比其他问题更重要，而几乎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将所有时间都耗费在会议之中。自由社会的目标，在于让个体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如果人们总是忙于开会（或准备会议），那他们就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因此，尽管公社大会和邦联大会将在自由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无时无刻地进行，也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希望让会议成为个人生活的中心。事实恰恰相反！

因此，公社大会的召开频率，可能比如说是每周一次、每两周一次或每月一次，以讨论真正重要的事务。几乎没有人会愿意不断地开会，讨论所有琐碎的议题，而大多数人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这意味着会议将会定期举行，并且只在需要讨论重大事务时召开，而不会持续不断地进行（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组织连续的会议或每日集会，但这将是极少数情况）。此外，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次会议，因为“在这里，决定性的是这一原则本身：个体拥有参与的自由，而不是必须被强迫参与。” [Op. Cit., p. 435] 这表明，会议将由对相关议题真正感兴趣的人参加，因此会议内容将更具针对性，更加高效。

其次，一个自由的人民是否会愿意在这样的会议上浪费大量时间，也是极为可疑的。虽然公社和邦联的会议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但它们的功能性极强，并不会成为空谈的场所。在这样的会议上，与会者会迅速向那些浪费时间或沉溺于自我表达的人表明自己的态度。因此，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指出：

“或许有人会认为，人数问题仍然存在，人们永远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一论点并不成立。在超过二十人的集会上，几乎不会出现所有人都想发言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当需要做出决定时，可供选择的方案和论点并不是无限的。在未受干预的基层工人集会上（例如，为了决定是否罢工而召开的会议），从未出现过‘发言过多’的问题。当两三种基本立场被提出，并且相关论点相互交锋后，决策很快便会达成。

“此外，发言的长度往往与其内容的分量成反比。俄罗斯的领导人在党代表大会上，有时可以连讲四个小时却毫无实质内容……关于革命性集会的简洁性，可参见托洛茨基对 1905 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记述，或者 1956 年布达佩斯工厂代表会议的相关记载。” [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vol. 2, pp. 144-5]

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这种情况在西班牙革命时期同样得到了验证。

第三，这些集会和代表大会的关注点，纯粹是集体活动与协调。不同的协会和工团有合作的功能需求，因此它们会更频繁地召开会议，并采取行动来处理影响特定社区或多个社区的具体事务。并非社区成员关心的每个问题，都适合在整个社区的会议或邦联大会上讨论。正如赫伯特·里德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首先通过联邦下放来消除官僚机构”，并因此“将所有……行政职能交由工团管理，”例如“交通、分配、医疗和教育”等事务。[Anarchy and Order, p. 101] 这些议题主要会在相关的工团内部进行讨论，因此社区层面的讨论将更专注于重要议题和整体政策，而非政治家们讨论和制定的具体法律——而这些政客对相关问题或行业往往一无所知。

通过将会议简化为基于具体议题的功能性机构，可以减少甚至完全消除冗长的讨论。此外，由于功能性团体的存在并不局限于这些社区邦联（例如，工业集体组织涉及其行业的代表大会，并邀请消费者团体的代表参与），因此大多数社区会议的议程将相对精简。

换句话说，公社群众大会和研讨会将有明确而具体的议程，因此几乎不存在“政治”（暂且用这个词）占据所有人时间的危险。因此，这些会议不会（像议会那样）讨论抽象法律和无意义的提案，也不会泛泛地涉及各种无人真正了解的事务。相反，会议所讨论的议题，将是对与会者而言真正重要的具体问题。此外，常见的做法可能是，选举一个小组来调查某个议题，并在之后的会议上提交报告和建议，会议则可以对提案进行修改、接受或否决。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述的，无政府状态将建立在“自由协议的基础上，通过书信交流和提案往来，以及代表们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明确议题并达成一致，但不会制定法律。在大会结束后，代表们带回的……不是一部法律，而是一份可接受或否决的契约草案。”[由克鲁泡特金所著的《面包与自由》，第 131 页]

这种制度是否只是空想？鉴于这种制度在多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存在并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有力地证明它并非虚构。显然，我们无法涵盖所有的历史实例，因此这里只举两个例子——革命时期的巴黎和西班牙。

正如默里·布克钦指出的，巴黎“在十八世纪晚期，按当时的标准来看，是欧洲最大且经济最复杂的城市之一，其人口约有一百万……然而，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这座城市在制度上几乎完全由[48个]公民大会管理……其事务由公社进行协调……但实际上，许多事务是由这些大会本身(或称为‘区会’)直接管理的，它们自行建立相互联系，而无需依赖公社。”[“向生态社会的过渡”，载《社会与自然》第3期，第92-105页，第96页]

以下是他对公社自治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的描述：

“那么，这些鲜为人知的巴黎四十八个区会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组织的？它们又是如何运作的？”

“在思想上，这些区会成员（被称为 *sectionnaires*）主要信奉人民主权。正如阿尔贝·索布尔所指出的，对他们而言，这种‘人民主权’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现实中的人民，在区会大会中团结一致，并行使他们的一切权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正如1792年11月西岱区会所宣称的：‘任何自认为拥有主权的人，都将被视为暴君、公共自由的篡夺者，理应处死。’

“主权，实际上，属于所有公民，而不是由‘代表’垄断……因此，1793年的激进民主派认为，每位成年公民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每个区会……都是建立在面对面民主的基础上的：其核心是人民大会，这是区会中最重要议事机构，也是城市特定区域内人民权力的体现……每个区会选举六名代表进入公社，其职能仅限于协调巴黎市内各区会的事务。

“此外，每个区会还设有各类行政委员会，其成员均由人民大会选出。”[由布克钦所著的《第三次革命》，第一卷，第319页]

难怪克鲁泡特金会认为这些“区会”表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并非源于理论上的推演，而是根植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之中。”[由克鲁泡特金所著的《法国大革命》，第一卷，第204页]

西班牙革命期间，工人和农民建立公社及公社联邦（详见 [1.8 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践了公社自治。加斯頓·勒瓦尔对这一经验作了总结：

“西班牙革命，及作为其核心动力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所推动的组织体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结构，符合实在的联邦制与真正的民主……管理和协调委员会虽然显然不可或缺，但它们不会超越选举它们的组织，而是始终置身于组织内部，随时接受成员的监督和接触。如果某些个人在行动上违背了其授权，可以对其提出质询、进行谴责，甚至将其撤换。只有在这样一个体系内，‘多数派才能制定规则。’

“工团大会是自由意志主义民主的体现和实践，它与雅典式民主毫无共同之处。在雅典，公民们会在集市广场上争论数日之久，派系斗争、家族对立、个人

野心相互冲突。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大量宝贵的时间被浪费在无休止的争执之中……

“通常，这些定期的会议不会持续超过几个小时，讨论的都是具体且明确的问题，并以具体且明确的方式加以处理。所有有话要说的人都可以发言。委员会会提出自上次大会以来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某项决议执行后的结果……它还会报告与其他工会的关系情况，以及各个作坊或工厂的生产数据。所有这些内容都会成为报告和讨论的主题。随后，大会将会指定各委员会的成员，这些成员将在委员会内部商讨解决方案。如果出现分歧，则会分别起草多数派报告和少数派报告。

“这一过程，发生在全西班牙的所有行业、所有商业和所有工团的集会上。在巴塞罗那，我们运动初期的大会就已经能够汇聚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人，具体规模取决于各组织的力量。因此，个人对于自身职责和责任的意识不断得到深化，并发展到具有决定性的程度……”

“这种民主实践同样扩展到了农业地区……在各个村庄，是否设立地方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是由全体村民大会做出的；而在不同关键事务中担任不可或缺的协调职能的代表，则是由全体与会的村民提名并选举产生的。但值得补充和强调的是，在所有集体化的村庄以及部分集体化的村庄——仅列举规模较大的集合，如阿拉贡地区的 400 个集体，莱万特地区的 900 个集体，卡斯蒂利亚地区的 300 个集体——居民们每周、每两周或每月定期召开大会，并被充分告知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

“笔者曾亲自参加过阿拉贡地区的多次大会，在这些会议上，各项议题的报告使得居民能够知晓、理解并在精神上深度地融入社会，使他们切实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因此，在那里，并未出现通常在决策权被赋予少数人时——这些少数人是以民主方式、毫无异议地选出的——所不可避免的抱怨和紧张情绪。这些大会是公开的，反对意见和提案都在公开讨论中被充分表达，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参与讨论、批评和提议，就像工会大会一样。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p. 205-7]

这些公社组织了涵盖数千个公社和工作场所的邦联，涉及整个行业部门，影响数十万人乃至整个西班牙地区。这一实践鲜明地印证了蒲鲁东的观点，即在联邦制下，“契约各方的主权……成为公社与个人自由的有效保障。因此，我们不再面对人民主权这一抽象概念……而是劳动群众的真正主权。”“劳动群众实际上、确切地、有效地掌握主权——当经济体系，即劳动、资本、财产和资产完全归属于他们时，他们怎么可能不是主权者呢？” [Anarchism, vol. 1, Robert Graham (ed.), p. 75]

换句话说，这一体系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在现实中运作过。而随着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这种社会模式比以往更加可行。至于是否能够建立这样的自治社会，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渴望自由。”

I.5.5 参与式社区和邦联不就是新形式的国家吗？

不。正如我们在 [B.2 节](#) 中所讨论的，国家可以通过其结构和职能来定义。从结构上看，国家，意味着由统治精英对特定地理区域，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支配；并基于权力的委托，使少数人掌握权力，从而形成等级制度（集中化的权威）。因此，将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与特定形式的国家混为一谈，会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性错误。

正如我们在 H.3.7 节所讨论的，国家的特定特征是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职能所导致的。如果一个社会组织不具备这些特征，那么它就不是国家。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国家的本质”在于“权力的集中，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国家通过所谓‘政府’的暴力组织，享有垄断的强制性权威；在等级专制制度、司法、警察和军事专制制度中，这些制度通过法律对所有人实施统治。” [Luigi Fabbri, "Anarchy and 'Scientific' Communism", in *The Poverty of Statism*, pp. 13-49, Albert Meltzer (ed.), pp. 24-5] 这就是为什么马拉泰斯塔强调，国家“意味着权力的委托，即所有人主动性和主权的让渡，使之归于少数人之手。” [Anarchy, p. 41] 如果一个社会组织不是集中化的、从上而下构筑的，那么它就不是国家。

在一个由联合的参与式社区组成的体系中，并不存在统治精英，因此也没有等级制度，因为权力被保留在邦联体系的最低层单位之中，并通过直接民主以及授权的、轮替且可罢免的邦联代表来行使。这消除了“代议制”民主体系中的权力委托问题，即：当选官员逐渐脱离选民，甚至凌驾于人民之上。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通过“代表大会的方式作出决策，这些代表相互讨论，并向其选民提交提案，而非法律。” [克鲁泡特金所著的《面包与自由》，p. 135] 因此，这种社会是基于自治，而非代议制政府（及其不可避免的官僚体系）。正如蒲鲁东所言，“联邦制是等级制度或行政与政府集权的对立面”，因此“邦联并不完全是一个国家……所谓的联邦当局……不再是政府，而是为共同执行某些职能而设立的机构。” [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 pp. 40-1]

或许有人会反对说，公社式的决策不过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形式，只不过是基于直接民主而非代议制民主——之所以是“国家主义”，是因为个人仍然要服从多数人的决策，因此并不自由。然而，这种反对意见混淆了国家主义与自由协议（即合作）的概念。由于参与式社区和生产工团一样，都是自愿结社，因此其决策是基于成员自愿承担的义务（参见 [A.2.11 节](#)）；而那些不同意这些决策的人，完全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因此，公社并不会比履行承诺更“国家主义”。

此外，在自由社会中，少数群体不仅可以通过辩论、还可以通过异议和直接行动来坚持自己的诉求（或捍卫自己的自由）。正如卡萝尔·佩特曼所指出的，“政治不服从，只是自我管理民主所依赖的积极公民身份的、一种可能的表达方式。”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p. 162] 由此可见，在公社体系下，个人自由可以得到保护，而社会则因反对、对抗和异议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如果缺乏自我管理和少数派的异议，社会将沦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墓地，扼杀思想和个体，因为思想和个体的成长依赖于讨论（“那些能够在相互关系中，实现基于自由理

解的运动与生活的人……会明白多样性乃至冲突本身即是生命，而一致性则是死亡。”[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p. 143]）。因此，一个基于自愿协议和自我管理的社会，将基于人际间的共情与自身利益，将营造出一个鼓励个性和尊重少数群体的社会。

因此，公社的参与式性质恰恰是国家主义的对立面。艾普丽·卡特尔也认同这一观点，指出“在社会政治领域，对直接民主或无政府状态的承诺，与政治权威是不相容的”，而且“直接民主中唯一可能存在的‘权威’是赋予公民集体的‘权威’……然而，一个由平等者组成的群体，通过相互说服的过程达成决定，是否能真正形成‘权威’仍值得怀疑。”[Authority and Democracy, p. 69, p. 380] 这实际上与蒲鲁东的观点相呼应，他曾说“‘民主’一词的真正含义就是政府的消亡。”[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42] 巴枯宁则指出，当“全体人民共同治理”时，“就不再有人被统治，这意味着不再有政府，不再有国家。”[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87] 数十年后，马拉泰斯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所有人都在治理时，就不再政府，至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38] 此外，克鲁泡特金曾论述过，在法国大革命中，群众通过直接民主的区会（sections）“实践了后来被称为直接自治的模式”，并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1, p. 200, p. 204]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体及其所创建的制度不能被孤立看待。威权制度会塑造出顺从的个人，使其无法自治。因此，我们认为，若个体要获得自由，他们必须参与决定那些与邻里共同达成的基本协议，因为这些协议构成了他们的社区。否则，自由社会便无法存在，个人将受制于他人为其制定的规则（服从命令显然与自由意志主义无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高喊“个人主义”并指责公社是新形式“国家”的人，实际上主张一种建立在财产所有者的权威之上的、极端等级制社会关系。换句话说，抽象的个人主义实际上造就了威权（即类国家化）的社会关系（参见F.1节）。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人类的社会性，并指出任何建立在抽象个人主义（比如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都将充斥着权威、不公正和不平等，而非自由。正如布克钦所言：“如果脱离社会根基来谈论‘个人’，就如同谈论一个没有人或制度的社会一样毫无意义。”[Anarchism, Marx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Left, p. 154]

社会无法被回避，正如布克钦所指出的，“除非每个人在心理上完全同质化，并且社会利益具有如此一致的特征，以至于异议变得毫无意义；否则，必须为相互冲突的提案、讨论、理性阐述和多数决策，留出空间——简而言之，就是民主。”[Op. Cit., p. 155] 那些以自由之名反对民主的人（如许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通常也认为法律和等级权威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工作场所中）。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一旦拒绝自我管理，等级权威就成为了协调集体活动的唯一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此产生的机构（如资本主义企业），比自我管理的组织更加接近国家主义的结构。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公社绝非某种“新的国家”，由社会的某个群体（历史上几乎总是富裕精英阶层）强加道德标准于他人。相反，公社只是一个公共论坛；在这里，社区事务（例如公有资源的管理、社会化经济活动的控制等）将得以讨

论，并形成共同的政策。此外，超越地方范围的事务也在这里得到讨论，并由受委托的代表带着社区的具体意愿，参与邦联大会。因此，“对事务的管理”取代了“对人的统治”，各个公社之间的联合体确保所有人的利益由所有人共同管理，从而使自由、正义和平等不再只是空洞的理想。此外，一个自由社会不会设立职业化的武装力量（例如军队或警察）^①，因为它不会拥有强制执行会议和公社决定的手段，避免这些决定反映少数“潜在的政治家或官僚”之利益，而非广大民众的意愿。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同样可能具有压迫性，甚至会像国家一样专制。对此，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清楚，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请记住，在自由社会中，各个公社和联邦都是由自由的个体组成的。他们不会对他人的私人行为过度干涉，除非这些行为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因此，一个社区，不太可能做出例如禁止同性恋或新闻审查的决策。这并不意味着多数不会滥用权力压迫少数，而是说，如[下一节](#)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减少乃至消除这种可能性的方案。简而言之，一个自由社会将努力鼓励多样性，让少数群体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前提是他们并未压迫或剥削他人）。

正因如此，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不会拥有国家。从结构上看，它将建立在平等和去中心化的制度之上，完全对立于等级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从功能上看，它将依赖所有人的广泛参与，以确保他们能够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像国家那样依赖对多数人的排除，以维持少数精英的统治。在自由社会中，公社与邦联并不是换汤不换药的“国家”，而是自由人集体管理自身事务的组织形式，以取代国家及其政治家与官僚的统治。

这正是蒲鲁东所主张的：“在民主的宪法之下……政治和经济……构成了同一个体系……它只基于一个原则——互助……[它]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人道主义有机体……[这]难道不正是旧社会的倾覆？” [Anarchism, vol. 1, Robert Graham (ed.), pp. 74-75]

1.5.6 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会不会存在“多数暴政”的危险？

尽管“多数人的暴政”这一反对意见包含了重要的观点，但它往往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被提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例如《美国宪法》1789年起草者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见[B.2.5节](#)）所关注的“少数人”，往往是富人。换句话说，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本身（当多数人支持他们对财富和权力的占有时，他们并不反对它），而是反对多数人试图改变社会，使其变得更加公平和自由的努力。这种反对意见，很容易被揭露为对少数人统治的狡

^① 至于如果有人会因此质疑，无政府主义革命无法进行自我防卫，请参见 J.7.6 节

猾辩护——尤其是当它的支持者（例如财产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却对财产所有者对雇佣劳动者的专制统治毫无异议时！

然而，正如前述，该反对意见**确实**包含了一个合理的关切，即在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中，少数群体的自由如何得到保障？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且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也**并不一定**是在寻求少数人的统治。例如，对无政府主义持支持态度的乔治·奥威尔曾指出：

“极权主义的倾向……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愿景中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没有法律，理论上也没有强制的社会中，行为的唯一评判人就是公共舆论。然而，由于群居动物的强烈趋同冲动，公共舆论会比任何法律制度都更不宽容。当人类受到‘你不可’的治理时，个人还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叛逆；但当他们受到‘爱’或‘理性’的治理时，他们将持续受到压力，要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与所有人完全一致。” [Inside the Whale and Other Essays, p. 132]

当然，这种危险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存在，无论其决策结构是直接的（无政府状态）还是间接的（某种形式的政府）。然而，仅仅指出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在这方面一直持高度警惕的态度，认识到多数群体往往因其对变革的恐惧，而成为自由的威胁（例如，艾玛·戈尔德曼的经典文章《少数与多数》）。我们深知，群众——只要其中的个体没有真正解放自己——往往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阻碍变革并强化一致性。正如戈尔德曼所说：“比成文的权威更压迫个人的，是社会的一致性和同质性。” [Red Emma Speaks, p. 116] 因此，马拉泰斯塔曾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肩负着特殊使命，要成为自由的警觉守护者，反对一切追逐权力者，也反对可能的、多数人的暴政。”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61]

然而，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不像古典自由主义者那样，从资本主义下的这一社会现实得出精英主义的结论，进而主张限制大众参与的政府和组织形式（从而推动少数人的统治与专制）。相反，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斗争和参与的自我解放过程，才能将“群众”转变为自由、自我管理的个人（正如 H.2.11 节所讨论的，列宁主义者试图将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精英主义者的做法，既虚伪又错误）。此外，我们还主张，参与和自我管理，是多数人理解少数派思想、并认识到保护少数派自由之重要性的唯一途径。这意味着，任何以少数派权利之名来限制大众参与的企图，实际上都会强化从众思想，削弱少数派和个人自由，而非保护它们。正如卡罗尔·佩特曼所论述的：

“现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确实通过参与来学习如何参与，政治效能感更有可能在参与式环境中得以培养。此外，证据还表明，在参与式权力结构中的经验，也可能有助于减少个体趋向非民主态度的倾向。”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p. 105]

因此，尽管“多数人的暴政”这一问题值得关注（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对此问题最为敏感的人之一），但这一反对意见却未能认识到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巨大区别。

在现行制度下，正如我们在 [B.5 节](#) 中所指出的，选民，仅仅是偶尔观看由企业精英预先筛选出的候选人之间、预演辩论的被动旁观者，而企业精英则承担竞选经费。公众仅被期待根据政治广告和新闻简讯做出选择。一旦选择做出，繁琐且低效的罢免程序就确保了当选代表能够随心所欲地行动（或更准确地说，是按照其富有的资助者的意愿行事）。因此，在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府”中，选民的功能仅仅是对已经为他们做出的“选择”进行批准！全民公投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人民并不提出问题：政府才是那个提出问题的主体。而人民只能对政府提出的问题回答‘是’或‘否’，就像问答教学法中的孩童一样。人民甚至没有机会参与修正。” [Proudhon,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148]

相比之下，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决策是在社区大会上经过公开讨论后作出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决策达成后，被否决的少数派——甚至是仅有一个人的少数派——仍然有充分的机会提出理性且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以试图改变决策。在这一过程中，辩论、分歧、挑战与反驳会持续进行，即使失败的少数派暂时服从了多数派的决定，这种过程仍然不会停止。而在代议制系统中，“多数暴政”才是真正的问题。此外，若某项决策对少数群体确实具有强烈的冒犯性，他们还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

我们还必须记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行为或活动的问题不会在社区大会上进行讨论。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设想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都将自己视为独特而自由的个体的社会，因此他们也会认可并主动维护他人的独特性和自由。除非人们受到宗教或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灌输，否则他们能够宽容地对待他人及其个性。如果现实并非如此，那更多是因为威权社会关系的存在——社会关系塑造了特定类型的人，而非源于人类所固有的缺陷。而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会中，这些威权关系将被彻底废除。

因此，在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区中，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将与他人无关。无政府主义者一向强调个人空间和“私人”领域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克鲁泡特金看来，许多“乌托邦”社区的失败，直接源于缺乏个人空间以及“试图按照家庭的模式来管理社区，使其成为‘一个大家庭’。人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因此不得不持续地与同样的‘兄弟姐妹’相处。然而，即使是两个真正的兄弟，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往往也很困难，而且家庭生活并不总是和谐的。因此，强行让所有人过‘大家庭’式的生活，而不是相反，尽可能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家庭生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并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达成持续一致。自由社会的成员“只需就某种有利的共同劳动方式达成一致，其余方面则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Small Communal Experiments and Why they Fail*, pp. 8-9 and p. 22]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点。当无政府主义者谈及民主化或集体化家庭及其他社群关系时，并不意味着这些关系应被剥夺其私密性，从而被纳入单一、普遍的公共领域，接受集体投票的监管。相反，我们的意思是，家庭及其他社会关系也应当体现自由意志主义的特征，并与所有成员的自由相一致。因此，一个以自我管理为基础的社会，并不意味着私密活动领域的消失，而是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原则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这并不意味着公共

领域凌驾于私人领域之上，或相反地，私人领域凌驾于公共领域之上。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看人际关系。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婚姻制度中隐含的（甚至在过去明确存在的）父权制，并主张以自由恋爱作为替代方案。正如 H.4.2 节所讨论的，自由恋爱意味着关系中的双方拥有平等的决策权，而不像传统婚姻制度那样，妻子成为丈夫的财产。因此，在这一背景下，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通过公社的介入来消灭人际关系，而是显然地，意味着创造基于平等和自由的人际关系。

因此，“多数人的暴政”极不可能在最令人担忧的领域施展其影响力——例如个人的家庭生活、与朋友的交往、私人空间、行为方式等。只要个人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人们的私人事务（包括儿童的权利——他们也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父母的财产）便无关紧要。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直接民主仅涉及公共资源及其使用和管理。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人们极不可能去讨论个人行为或道德问题，而是会将其交由当事人自行决定——这正是应有之义，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私人空间和试验的自由，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当今社会，权威主义的世界观通过家庭、学校、宗教机构、俱乐部、兄弟会、军队等组织灌输给人们，使其无法跳脱出支配与服从的框架，从而塑造出一种特定的性格类型——即对任何被认为威胁现存世界观及其制度、价值体系的个体或群体，都怀有强烈的不容忍态度。因此，正如巴枯宁所论述的那样，“舆论”本质上是可能具有排他性和压迫性的，“仅仅因为迄今为止，这种权力本身尚未被人道化；而它之所以尚未被人道化，是因为它所忠实反映的社会生活……建立在对神性的崇拜之上，而非对人性的尊重之上；建立在权威之上，而非自由之上；建立在特权之上，而非平等之上；建立在对人的剥削之上，而非兄弟情谊之上；建立在不公与谎言之上，而非正义与真理之上。因此，其实际作用总是与其所宣称的人道主义理论相矛盾，并始终施加着灾难性和腐化性的影响。”[由巴枯宁所著的《上帝与国家》，第 43 页] 换言之，“如果社会要实现自由，那将是通过解放的个人来实现的，正是这些自由个体的努力才能创造出自由的社会。”[由艾玛·戈尔德曼所著的《无政府主义及其余论》，第 44 页]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人们将自觉地消解那些塑造权威-服从型人格的制度性与传统性来源，从而使“舆论”摆脱其现存的压迫性潜力。

然而，这并不是说自由个体所构成的社会不会陷入惯例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某些挑战公共舆论或社会运作方式的少数群体施加压迫。社会舆论和社会组织可能会在世代更迭的过程中，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展。最著名的（尽管是虚构的）例子，便是厄休拉·勒古恩的科幻经典《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在这部作品中，阿娜瑞斯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由于日常生活的惯性以及无意识的社会舆论压力，逐渐形成了一种松散但实际存在的官僚主义。当主人公薛维克和他的朋友们试图揭示并改变这一现状（包括薛维克离开阿娜瑞斯前往资本主义世界乌拉斯）时，该星球的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正是因为这些行为违背了既定的社会惯例）。但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他们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之所以能够进行，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在根本上仍然是共产无政府主义的，使得异见者能够依托丰富的自由意志主义传统与思维方式，来开

展直接行动、并享有使用资源的权利，以传播他们的思想并实践他们的抗议活动。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自由女性”（Mujeres Libres）（关于这一重要运动的更多内容，可参阅玛莎·阿克塞尔贝格所著的《西班牙的自由女性：无政府主义与妇女解放斗争》）。这一组织的产生，正是对当时许多男性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承诺实现性别平等，但实际上却与他们所反对的制度一样充满性别歧视；因此，他们在潜意识中仍然反映了公众对女性应有地位的压迫性观念。毫不奇怪，许多无政府主义女性对此（完全合理地）感到愤怒，因为在一个旨在废除一切形式的支配与等级制度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中，她们自身却仍然处于边缘化地位。面对这一现实，尽管常常遭遇男性同志的敌意或冷漠，她们依然组织起来，以改变这种状况，努力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及更广泛的社会中，对抗并改造公众舆论。在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胜利之前，她们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如同整个自由意志主义革命一样，这一运动也被镇压了。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公众舆论不太可能变得专制化。这是因为，正如“自由女性”的例子所示，该社会的成员将会组织起来，对抗这类倾向，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意识，并进行斗争。一旦自由社会建立起来，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便是确保其持续保持自由，而这意味着必须持续警惕一切潜在的权威来源，包括那些与组织内部非正式官僚体系、及公众舆论相关的权威。尽管一个自由社会，将会设立多种保障措施来防止这类发展，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因此，持不同政见的少数群体的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他们需要指出并抗议任何可能引发专制倾向的危险。

因此，需要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也认可，自由结社之中隐含的自愿政治义务的实践，也意味着拥有异议和不服从的权利。正如卡罗尔·佩特曼所指出的：

“即使不可能对自己实施不公，我在投票时也不是仅仅为自己投票，而是与所有人一起投票。在政治生活中，关于不公正的问题始终是适用的，因为参与式投票也并不能保证其结果必然符合政治道德的原则。”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p. 160]

如果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认为，某项具体决策威胁到了他们的自由（而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自由正是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那么他们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动，以捍卫这一自由：

“参与式投票的政治实践，建立在对公民身份的意义及其影响的集体自觉之上。政治团体的成员理解，投票既是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其他公民的承诺，同时也是彼此之间的共同承诺……在特定情况下拒绝投票，意味着拒绝者认为……该提案……侵犯了政治团体所基于的政治道德原则……拒绝投票[或采用直接行动]可以被视为对其他公民‘正义感’的呼吁。” [Pateman, Op. Cit., p. 161]

当个人不再同意其社区所做的决定时，他们可以通过直接行动诉诸同胞的“正义感”，指出某项决定可能带来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可能是大多数人未曾意

识到的。因此，直接行动和异议构成了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并有助于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无政府主义拒绝那种“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正是专制组织的典型特征。

这种基于个人自由的自愿义务观，揭示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对民主的批判中所存在的基本缺陷。他认为民主不过是一种政治决策的方法（在他的理论中，民主的唯一作用就是决定谁来统治社会）。熊彼特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一个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做出“迫害宗教异见者”（如犹太人和女巫）的决定。他主张，我们不应仅仅因为这些做法是由多数人决定、或通过民主方法作出的，就认为它们是正当的，因此，民主本身不能作为一个最终目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 240-243 页]

然而，这种系统性的迫害，本身就违反了任何能被称为“民主”的政治程序规则。因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少数派必须有可能通过论证使其理念成为多数人的理念，而这需要言论自由、讨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如果一个国家或社区的多数派迫害或压制少数派，就等于剥夺了少数派影响多数派的机会——少数派不仅在物理上被排除在外，也无法通过辩论来说服多数派改变立场——而且少数派也无法说服多数派决定的错误之处。因此，熊彼特的例子完全违背了民主原则，因此无法与民主理论相契合（卢梭关于“公意”与“多数规则”之间的区分，正是试图表达这一点）。因此，多数人的暴政既是对民主理论的亵渎，也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民主的根基正是个人自由）。

这一论点在自我管理的社区中更为重要。因此，任何以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为基础的制度，本质上都不是自我管理的，因为它使社区的一部分成员无法影响另一部分成员的决策（“一个民族中某些部分的奴役，实际上是否定了联邦原则本身。”[由蒲鲁东所著的《联邦原则》，第 42 页]）。因此，个人自由和少数派权利是自我管理的核心要素。正如蒲鲁东所言：“一种新的精神已经降临于世界。自由本身反对着国家。并且，自由的理念一旦普及，人们就会意识到它不仅仅是个体的事务，更是群体的事务。”[引自马丁·布伯的《通往乌托邦之路》，第 28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集体压迫个人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革命必须摧毁的一种虚假自由。”[由夏洛特·M·威尔逊所著的《无政府主义论文集》，第 25 页]。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防止“多数人的暴政”的方法，是诉诸共识决策（即在每个人都同意之前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或财产权系统（基于合同）。事实上，无论是共识（参见 [A.2.12 节](#)）还是契约（参见 [A.2.14 节](#)），最终都会在“自由”的名义下发展出专制式的社会关系。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寻求的是新的自由协作形式，以取代契约制度，并建立新的决策机制，从而避免以“少数人的真正暴政”取代“多数人的潜在暴政”。

接下来是结社自由的问题。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如果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不公正的，那么反之亦然；而如果少数人有权反抗，多数人也有权自卫……当然，这一解决方案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被排除在社群之外的个人将失去许多社会优势，而这些优势只有通过大量人类的合作才能获得。但你又能如何呢？这些

不满分子又不能合理地要求多数人为他们牺牲自己的意愿。”[《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谈话》，第 29 页] 换句话说，结社自由同样意味着不结社的自由，因此，社区有权将那些持续阻碍社区决策的个人或群体，驱逐出去——前提是这些人没有主动离开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社区。这种自由对多数人和少数人来说都极其重要，也必须加以捍卫。

因此，在自由社会中，少数派固然享有重要的权利，但多数派也同样如此。可以想象，在伦理层面上，参与决策的人不会轻易反对共同决策的执行——毕竟，他们已经参与了决策过程，如果仅仅因为结果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就拒绝接受，难免显得幼稚。此外，他们还需要面对其他决策参与者的反应。那些无视或刻意阻挠集体决策的人，很可能会遭遇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如不合作、社交隔离、抵制等。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少见的。

由于独立于社会的孤立生活是不可能的，社会性联合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只有在一个互相支持的社区中生活，个体性才能得到培养和发展，自由也才能得到真正实现。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也认识到，并非所有人都是完全的社会性动物，有时个人也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因此，我们既支持自由联合和联邦制，同时也强调团结、社区和自我管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追求个人和社会自由最大化的政治体系中，多数决策虽然并不完美，却是最优的决策方式。通过基层联邦大会和工人委员会的自我管理，决策过程能够保持“横向”（即平等者之间的决策）而非“纵向”（即政府式的决策，命令者与服从者的关系）。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支持自我管理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保障自由——而不是因为我们天真地认为多数人永远是正确的。

1.5.7 如果我不想加入公社怎么办？

正如所预期的那样，没有人会被强制加入公社或参与公社集会。任何相反的做法都有违无政府主义原则。因此，公社将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自由将受到尊重并得到鼓励。

然而，如果某些个人居住在公社的边界范围内，但决定不加入公社，该怎么办？例如，一个地方社区可能包括愿意结社的家庭，也可能有少数不愿结社的家庭（这种情况实际上曾在西班牙革命期间发生过）。那么，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会如何呢？

显然，如果个体无法说服其邻居接受自己的理念，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去寻找更符合自身价值观的社区。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离开他们所喜爱的地区。因此，我们必须讨论，那些决定不搬去更合适的社区的人将面临什么情况。公社的决策是否对非成员具有约束力？显然不。如果某个个人或家庭（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不愿加入公社，他们的自由必须得到尊重。然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不能享受公社的公共活动与资源（如免费公园、医院等等），并且必须为其

使用支付费用。只要他们不剥削或压迫他人，无政府主义社区就会尊重他们的决定（例如，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可见 G.2.1 节）。

许多反对无政府主义自治管理的人，会以“自由”之名进行反对，往往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剥削和压迫他人。换句话说，他们反对参与式社区，因为他们（正确地）担心这会限制他们通过他人劳动积累财富的能力（历史上，这种反对态度屡见不鲜，富裕精英们以自由的名义，用代议制或专制形式取代民主的社会决策形式——参见 [B.2.5 节](#)）。

无需赘言，任何社会中的少数群体，都将在其所处社会的伦理规范之内生存，并必须遵守这些规范，就如同他们必须遵守不得谋杀他人的规则一样（几乎没有理智的人 would 认为，禁止谋杀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因此，在最大程度上允许个人持不同意见的同时，无政府主义社区仍然必须将其伦理标准适用于社区之外的个人。任何人都不能以“不属于当地社区”为借口，主张自己可以谋杀、伤害或奴役他人（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犯罪问题，参见 [1.5.8 节](#)）。

同样，个人不能仅仅因为自己的意愿而发展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与个人占有 possession 相对）。对私有财产的拒绝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因为阻止权威的发展并不算是一种威权主义的行为（作为类比，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并不认为禁止盗窃是对自由的限制，并且由于这种观点——目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它被强制施加于少数人）。无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如何宣称，“自愿的双边交换”都会影响第三方，并可能间接地损害他人。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从财富集中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或消费与生产所带来的生态后果中看出。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意识到不平等，以及进而导致的国家主义，可能会再次出现，并采取预防措施加以防范。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一些人“似乎几乎相信，在推翻政府和私有财产之后，我们会因尊重那些渴望成为统治者和财产所有者的人的自由，而允许二者悄然重新建立。这种对我们理念的诠释真是奇怪。” [Anarchy, p. 43]

认为拒绝财产权就是对自由的限制是错误的，因为真正试图剥夺他人自由的，恰恰是那些想成为资本家的人，他们试图在自己的财产上禁止他人自由行动。在自由社会中，公社成员只会拒绝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他们会直接无视那些潜在资本家的幻想和“禁止入内”的标牌。如果没有国家或雇佣暴徒来为其财产要求提供支持，这些人的主张最终只会显得可笑。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支持成为“老板”的自由（无政府主义者乐于与他人合作，但不会为某人工作）。当然，那些想在他人反对的情况下建立私有财产的人，却希望他人尊重他们的意愿。因此，当潜在的财产拥护者兴高采烈地圈起他们的“财产”并将他人排除在外时，难道这些被排除的人，不可以回忆起伍迪·格思里的歌曲《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中的这几句歌词，并据此采取行动吗？

“当我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行走
我看到一个标牌写着‘私人财产’
但在它的另一面却什么都没写

这片土地是为你我而造”

这些“物主”在乐于将他人排除在“他们的”财产之外的同时，却又心安理得地使用社会公有的资源。他们才是最终极的“搭便车的”——想要享受社会带来的利益，却拒绝履行与之相应的责任。最终，这些所谓的“个人主义者”通常会转而支持国家（尽管他们声称憎恶国家），因为国家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工具，来维护私有财产及他们行使权力的“自由”。

这并不意味着剥夺个人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也不意味着限制其使用所需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它仅仅意味着，人们不能宣称对超出自身合理使用范围的资源拥有所有权。换言之，“占用与使用”应当是个人占有的界限——因此，财产应当被定义为“一个人对某物的控制，这种控制要么得到社会的认可，要么获得所有个人的一致认可，当社会利益的法则被完全揭示之时。”[本杰明·塔克，《书籍之外》（*Instead of a Book*），p. 131] 正如我们在 [1.6.2 节](#) 所讨论的，这种关于使用权的观点，既被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接受，也被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接受。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尽可能多的社会实验，同时确保允许这种实验的社会条件免受财富与权力集中的威胁。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无政府主义，包含并仅包含那些尊重自由并承认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以享用自然恩赐及自身劳动产物的——生活方式。”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14]

因此，为了消除少数人试图攫取权力和财产的问题，无政府主义革命将社会财富（首先是土地）置于全体人民手中，并承诺，只保护那些被社会整体视为正义的使用方式。换句话说，承认“财产”是社会的产物，无政府主义社会将确保个体的“财产”，在其基于实际占有与使用的情况下，得到他人保护。因此，任何试图将少数派的异见转化为财产权的企图，都会遭到抵制，例如，人们会直接无视那些属于个人或团体，但未被实际使用的财产上的“禁止入内”标识。因此，个体可以选择不参与社群，但他们对“所有权”的主张将基于使用权，而非财产权。没有国家来支持和保护“财产权”时，我们会发现，所有权利归根结底都是社会所认为的公正权利（关于法律与社会习俗的区别，详见 [1.7.3 节](#)）。国家的作用，恰恰在于强加那些并无社会基础的“权利”（即保护精英阶层财产的权利）或那些因财富而被腐化的“权利”；如果社会能够自由地管理自身事务，这些“权利”本应被改变。

总而言之，个人可以选择不加入参与性社区；并因此，在大多数不涉及社会基本伦理标准的问题上，他们置身于其决策与活动之外。因此，那些希望生活在无政府主义社区之外的人，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他们不能实施谋杀、强奸、创造私有财产或其他伤害他人的行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个人财物会被“社会”夺走，或“社会”会告诉他们该如何处置自己的物品。自由，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意味着这些个体将无法将自己的财物转化为财产，从而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关于“财产”与“所有物”的区别，详见 [B.3.1 节](#)）。这种情况的防止不会依赖于“无政府主义警察”或“禁止的”自愿协议，而是单纯地承认“财产”是社会的产物，并建立一个能够鼓励个体捍卫自身权利、相互合作，以抵御那些试图使他人沦为为其财产工作的仆役的社会体系。

I.5.8 那么犯罪问题如何解决？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犯罪”可以被最好地描述为反社会行为，即损害他人或侵犯他人私人空间的行为。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犯罪行为意味着侵犯他人的自由”，因此，在自由社会中，罪犯将是“那些侵犯他人个体完整性、自由和福祉的人。” [Malatesta, *At the Café*, p. 100 and p. 132]

这种对犯罪的定义，当然，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定义相似；但自由意志主义者指出，国家往往会将许多在理性社会中不会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定性为“犯罪”（例如，成年人在私密空间内的自愿行为，或对私有财产的占用）。与此同时，自由社会则会将许多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国家保护的行为，视为反社会行为（例如，资源的掠夺或对他人的劳动的剥削）。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社会习俗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而演变的。因此，马拉泰斯塔指出：

“我们所谈论的犯罪，自然是指那些反社会行为，即冒犯人类情感、侵犯他人在自由中平等权利的行为，而不是刑法所惩罚的那些行为——仅仅因为它们触犯了统治阶级的特权。”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p. 105-6]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犯罪的根源并非人类天性的某种扭曲，或所谓的“原罪”，而是由于人类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塑造。例如，无政府主义者指出，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可以大幅减少犯罪，因为当今社会的大部分犯罪都源于私有财产带来的恶果，如贫困、无家可归、失业和疏离感。此外，通过采用无政府主义的非权威性的育儿和教育方式，剩余的大部分犯罪也可以被消除——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权威主义养育方式所导致的反社会、病态和残酷的“次级驱动力”（参见 J.6 节）。然而，只要仍然有人“侵犯他人的平等自由……我们就必须自卫。” [Malatesta, *Op. Cit.*, p. 106]

首先，我们不能说政府为了是维护人民免受犯罪侵害所必需的。相反，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政府本身，难道不是在创造并维持着滋生犯罪的社会条件吗？难道所有政府赖以生存的侵略和暴力，不会助长偏执、迫害、仇恨以及更多暴力的精神吗？”因此，犯罪“是经济状况、社会不平等，以及政府和垄断所制造的不公正与罪恶的结果。政府和法律只能惩罚罪犯，但它们既不能治愈也不能预防犯罪。真正治愈犯罪的唯一方法是消除其根源，而政府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存在正是为了维护这些祸根。”这表明，由“政府的压迫与不公、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所导致的犯罪，将在无政府状态下消失。而这些犯罪在所有犯罪中占据了绝大多数。” [What is Anarchism?, p. 151] 我们还应当意识到，今天我们正被真正的反社会者所统治，因为“所有者和统治者”本身就是“罪犯”，只是“他们掌握着权力，并在稳定的基础上组织了他们的统治”——“比起那些靠偷窃工人劳动成果而致富的所有者，还有谁会更像盗贼呢？”

[Malatesta, *At the Café*, p. 100 and p. 130]

因此，“犯罪”无法与其发生的社会相分离。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说，社会得到了它应得的罪犯。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在撒切尔和里根推行的亲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政权下，犯罪的激增是反常或出人意料的。犯罪是社会危机最明显的症状，在英国，犯罪率用了 30 年才翻一倍（从 1950 年的 100 万起案件，增加到 1979 年的 220 万起）。然而，在 1979 年至 1992 年间，犯罪率再次翻倍，1992 年突破了 500 万起。在这 13 年间，政府坚定地奉行“自由市场”和“个人责任”原则。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可以预见，将资本主义从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因此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个体原子化以及贫困加剧，将会撕裂社会并增加犯罪活动。同样不出所料的是，在这些亲市场政府执政期间，我们还见证了公民自由的减少、国家权力的集中以及地方政府的瓦解。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这些政府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可能带来其他结果，因为“随着自由竞争导致更多的冲突和不平等，政府的镇压权力必然增强。” [Anarchy, p. 47]

因此，那些满口“个人权利”、“自由市场”和“摆脱国家束缚”言论的政府，在犯罪激增的同时，却加强国家权力、削减公民权利——这种表面上的悖论其实根本不是悖论。卡罗尔·佩特曼指出：“在契约理论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最隐秘的角落之时，个人自由的修辞与国家权力的大规模扩张并不令人意外。契约理论若被推向极端，将会破坏自身存在的条件。霍布斯早已指出，彻底贯彻契约原则需要绝对主义和武力来维持秩序，以防止战争。” [The Sexual Contract, p. 232]

资本主义，及其建立在契约理论之上的体系，必然会撕裂社会。它的核心理念是将人类视为彼此孤立的个体，除了金钱关系之外毫无联系。这种理念必然会将反社会行为制度化。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述的：“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并非爱，甚至不是同情，而是人类对相互援助的良知——即便这一良知仅仅停留在本能的层面。人们无意识地认识到，每个人都从相互援助的实践中获得了力量，认识到个人的幸福与所有人的幸福息息相关，认识到正义感或公平感促使个体将他人的权利视为与自己平等。” [Mutual Aid, p. 16] 资本主义所要求并制造的社会原子化，破坏了社会最基本的纽带——即人类的团结精神，而等级制度则压制了个体的独立性，使其无法理解自己与他人共享共同的人性，从而无法理解为何必须遵守道德并尊重他人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在《精神层级：为什么更平等的社会几乎总能表现得更好》一书中指出的，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社会往往犯罪率更高，监狱人口也更多（平等不仅能减少犯罪，还能为人们带来其他诸多好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个人责任的概念。以强奸为例，尽管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强奸是源于压抑性欲的社会制度，并植根于父权制（即强奸更多关乎权力，而非性本身），但他们不会“袖手旁观”，仅仅归咎于“社会的错”。个体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认识到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目前“法律法规”所导致的问题之一，正是个人被剥夺了建立自身道德准则的责任，因此也难以形成“文明”的社会标准（见 [1.7.3 节](#)）。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反对法律和专业司法体系的概念，但他们并不盲目地认为，反社会行为在自由社会中会完全消失。他们也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希望自由社会能够减少犯罪，但这一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建成。（“所有的

不良嗜好……不会一蹴而就地消失。长期以来，仍会有人试图以暴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或利用有利环境为自己创造特权。” [Malatesta, *At the Café*, p. 131] 因此，某种形式的司法体系仍然是必要的，以处理残存的犯罪行为，并在个人之间裁决争端。

必须强调的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内部存在某种矛盾。无政府主义者从未主张那种“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概念。当人们反对无政府状态时，他们常常会质问，如果有人行窃、谋杀、强奸等，他们是否就能有这种为所欲为的自由。然而，这种观点完全误解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自由的真正含义。简单来说，如果有人以武力强加于他人，那么“他们便是政府”，“我们将以武力反对他们”，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要发动革命来反抗政府，那么这绝不是为了让自己屈服于新的压迫者。” [Malatesta, *Op. Cit.*, p. 99] 这一原则，即适用于保卫自由社会免受有组织的反革命威胁，也适用于防止社会内部的反社会（“犯罪”）行为。原则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在于规模大小。

我们还应当记住，仅仅因为国家垄断或组织了一项（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废除国家就会导致其提供的有益事务一同消失。例如，许多国家拥有并运营铁路网络，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国家后火车就会消失！在自由社会中，铁路的管理将由铁路工人自行负责，并与社区协作。对于反社会行为的应对亦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克鲁泡特金指出，“自愿协会”将“在所有职能上取代国家”，包括“相互保护”和“领土防御”。 [Anarchism, p. 284]

这同样适用于所谓的“司法”，即争端的解决与反社会行为（“犯罪”）的应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们不会容忍自身的福祉与自由被肆意侵犯，必要时，他们会采取措施抵御少数人的反社会行为。但为此，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群以制定法律为职业的人，而另一些人终其一生去搜寻、去发明‘违法者’呢？” [Malatesta, *Anarchy*, pp. 43-4] 这意味着，在自由社会中，反社会行为的解决将掌握在所有人手中，而不是交由一个独立于群众之上的专业机构。正如蒲鲁东所言，在无政府状态下，“警察、司法、行政事务将完全掌握在工人手中。”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281] 因此：

“让每个家庭、每家工厂、每个协会、每个市镇、每个区都管理自己的警务，并妥善处理自身事务，那么整个国家便会得到治理。我们何须被监督、被统治，并年复一年地支付……数百万金钱？让我们废除长官、专员，以及警察吧。” [Op. Cit., p. 273]

至于具体如何运作，将由自由的人们根据自身所面临的情况决定。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勾勒出可能的模式，并提出建议。

在解决个人之间的争端方面，很可能会形成某种仲裁体系。相关当事方可以自行决定，将案件递交第三方（例如一个社区陪审团，或双方共同认可的个人或群体）处理。如果当事方无法达成一致（或受害者已死亡），那么争议可提交至社区大会，并由大会指派一个“法庭”进行审理。这些“法庭”将独立于公社，其独立性将通过以下方式得到加强：法官由大众选举产生，而非由行政机构任命；

陪审团成员由公民随机抽选，以保障其公正性。此外，“所有争议……都将提交给陪审团，由其不仅对事实作出裁决，还要审视法律本身、法律（或社会习俗）的公正性、其适用性，以及因其被违反而应施加的惩罚或赔偿。”[Benjamin Tucker, *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p. 160] 在塔克看来，陪审团是“防止压迫的主要保障。” [Liberty, vol. 1, no. 16, p. 1]

马拉泰斯塔亦曾指出：“当人们之间出现分歧时，难道自愿接受的仲裁，或是公共舆论的压力——不比一个对所有事务都拥有裁决权、对所有人都享有审判权的、不负责任的法官——更有可能厘清是非？这样的法官必然是无能且不公正的。” [Anarchy, p. 45] 因此，正是在仲裁制度与社区大会中，反社会行为的定义及其处理方式将得到讨论和决定。

至于实际发生的反社会行为，“对于那些不可避免的犯罪残余，相关集体应当自行考虑如何将其置于无法作恶的境地，而非将这一特殊职能委托给任何机构。” [Malatesta, *At the Café*, p. 101] 换句话说，所谓的“警察部队”将不会以公共或私人的专业机构或公司形式存在。如果某个地方社区认为公共安全需要一个可供求助的组织，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将创建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会如现今那样，被托付给一个特殊的官方机构，而是由全体适龄居民轮流承担公社制定的安全措施。” [James Guillaume, *On Building the New Social Order*, pp. 356-79,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71]

这种体系可以基于一支志愿民兵，其中所有社区成员都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参与。参与者不会构成一个职业化的组织，而是由本地居民组成，他们的服役时间较短，并且如果滥用职权，将会被替换。因此，相较于当前的警察机构、或承担治安职能的私人安保公司，社区民兵因权力腐化的可能性将大幅降低。此外，通过让民众习惯于在民兵组织中干预反社会行为，他们即使不再是民兵的一员，也会具备这种能力，从而进一步减少对民兵组织的依赖。正如所言，“我们将自行防卫……而不将社会防卫的特殊职能委托给任何人”，这才是“阻止并减少反社会活动的唯一有效方法”。 [Malatesta, *Op. Cit.*, p. 132]

这样的组织不会垄断保护他人的权力，而只是在人们需要时提供帮助。它的职能不会比现行的消防队更具垄断性——不会因为消防队的存在，而禁止个人去灭火；同样，在无政府社会中，个人或群体仍可自行阻止反社会的犯罪行为。

当然，也存在一些没有目击者的反社会行为，使得“犯罪”者无法被立即确认。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无政府社区可能采取两种行动方案。受害者可以自行调查事实或委托代理人进行调查；更有可能的是，社区集会将选出一个特别工作组，专门调查此类案件（并受到社区的监督与罢免权的制约）。一旦调查机构认为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它将通知社区及相关当事人，并随后组织法庭。当然，在自由社会中，人们将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些可能尚未被设想出来，因此，这些仅仅是可能的建议。

正如人们常说的，预防胜于治疗。这一原则对待犯罪同样适用，因此，与其惩罚那些因社会因素而犯罪的人，不如根除犯罪的根源。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

论，“犯罪不过是被引导错误的能量。只要当今社会的所有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共同作用于将人类能量引向错误的方向，只要大多数人身处不适合自己的位置，做着他们厌恶的事情、过着他们憎恶的生活——犯罪就不可避免，而所有的法律只会让犯罪增加，而不会消除犯罪。” [Red Emma Speaks, p. 71] 数十年后，艾里希·弗罗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个人的破坏性程度，似乎与其生命活力被压制的程度成正比。这里我们所指的，并不是某种本能欲望的个别性挫折，而是整个生命的受阻，是人类感官、情感与智力能力的自然发展和表达被扼杀。生命本身具有内在的活力，它倾向于成长、表达、被体验……生命的冲动与毁灭的冲动并非相互独立的因素，而是处于一种反向的依存关系中。生命冲动越是受阻，毁灭冲动就越强烈；生命越是得到实现，毁灭性就越微弱。毁灭性是被压抑的生命的产物。那些为了压制生命而诞生的个人和社会条件，造就了对毁灭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为了滋养具体敌意倾向——无论是针对他人，还是针对自身——的蓄水库。” [The Fear of Freedom, p. 158]

因此，通过重组社会，使其赋权于所有人，并积极鼓励人们运用自身的智力、情感和感官能力，犯罪很快将不再成为如今如此严峻的问题。至于在这样的社会中仍可能存在的反社会行为或个人之间的冲突，将通过一个尊重个体、并承认问题社会根源的体系加以处理，且限制措施将被降至最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无政府社会中，公共舆论和社会压力将成为预防反社会行为的主要手段，例如对不良行为者施加抵制和排斥，以此作为强有力的制裁手段，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邻里、朋友和同事的广泛不合作，将是阻止损害他人行为的最佳方式。因此，马拉泰斯塔指出：

“若要以理性方式对待犯罪，找出其根源，并真正尽力消除它，就必须将这项任务交给那些直接受到犯罪影响并承受其后果的人，即全体公众，而不是交给那些以犯罪的存在为权力和利益来源的人。” [At the Café, p. 135]

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司法体系可以从原住民社会中学到许多经验，因为这些社会本身就是无国家秩序的范例。事实上，我们今天视为司法核心的一些观念，早已存在于这些社会之中。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当我们认为自己在引入陪审团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时，我们所做的实际上只是回归所谓‘野蛮人’的制度，并且是在此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改造，以使其有利于统治阶级。” [The State: Its Historic Role, p. 18] 与原住民司法体系类似（如鲁珀特·罗斯在《回归教义：探索原住民司法》中所记录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与治愈所有涉事人员来实现正义。对不当行为的公开谴责，将是这一过程的关键部分，但行为人仍将是社区的一员，因此他们能够直接目睹自身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和悲伤。此外，犯罪者很可能被期望通过社区服务或帮助受害者及其家属，来弥补自己的行为。

因此，从实际角度来看，几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在实践和伦理层面上反对监狱。监狱不仅对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还往往会强化犯罪（即反社会）行为。无政府主义者常用“罪犯大学”这一极其贴切的比喻来形容监狱：初犯者在其中

学会新的犯罪技巧，并被迫适应监狱内部的伦理标准。因此，监狱反而会助长犯罪倾向，使被囚禁者更具犯罪性，从而适得其反。此外，监狱并未改变导致许多犯罪行为的社会条件。简而言之，监狱“既不能改善囚犯……也无法阻止他们再次犯罪。它根本无法实现其设定的任何目标。”[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p. 228]更进一步，监狱对囚犯的影响堪称灾难性：“我们知道监狱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身心的摧毁、堕落、消耗和疯狂。”[伏尔泰琳·德·克莱尔，引自保罗·阿夫里奇，《一个美国无政府主义者》，p. 146] 马赫诺黑军采取了无政府主义者对监狱的一贯立场：

“监狱是人民奴役的象征，它们的建立仅仅是为了镇压人民和工农……自由的人们不需要监狱。凡是有监狱存在的地方，人民就不自由……秉持这一立场，[黑军]摧毁了他们所到之处的所有监狱。”[彼得·阿尔希诺夫，《马赫诺运动史》，p. 153]

除本杰明·塔克外，没有任何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支持监狱制度。几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私人监狱（如同私人警察）与自由的理念相悖。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普遍反对当前的“司法”体系，因为他们认为它的运作方式围绕着复仇和惩罚，而非解决犯罪的根本原因。

当然，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存在精神病态者或其他极端危险的个体，他们无法被允许自由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约束措施将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些人可能需要被隔离，以保护自己及他人的安全。或许可以使用精神病院，或者建立一个供他们使用的隔离区域（比如，一座岛屿）。不过，这类案例（我们希望）应该极为罕见，并且“应该按照最人道的方式对待这些精神病患者。”[伏尔泰琳·德·克莱尔，《伏尔泰琳·德·克莱尔文集》，p. 160]

需要避免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专业化、专职化的“司法”体系，因为这将成国家重新构建自身的关键手段。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解释的：“犯罪所造成的主要危害，与其说是对个别个人权利的一次性侵犯，不如说是它可能成为建立某种权威的契机和借口；而这种权威，在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社会，实际上却会奴役和压迫它。”换句话说，“为了防范少数暴力分子、少数游手好闲者和一些堕落之人，而去建立一所教授懒惰与暴力的学校，这无疑是极大的愚蠢。”[Op. Cit., p. 101 and p. 132] 自由意志主义者关于犯罪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对人性的理想化认知之上。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我们并不相信群众的无暇性，甚至不认为群众普遍是善良的”，但，“我们更不相信那些夺取权力并制定法律者的无误性和善良”，因此我们必须“避免建立专门从事警察工作的机构”。[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09 and p. 108] 乔治·巴雷特进一步论证道：

“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在没有权威干预的情况下，争端往往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如果双方是理性的，他们或许会达成共识，选择一位彼此信任的朋友来裁决争议。但如果他们不选择这一合理路径，而决定设立一个固定的权威机构，那么灾难将不可避免。首先，这个权威必须被赋予强制执行其裁决的权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答案很简单。意识到自己是一种优越的力量，它自然会在每一次争端中为自己攫取最佳部分，并将剩余部分分配给它的亲信。

“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奇怪。它假设两个在平等基础上相遇并产生分歧的人，无法做到理性和公正。但与此同时，它又假设一个享有不公正优势并依靠暴力支持的第三方，反而能够成为正义的化身。常识无疑应该让我们对这种假设保持警惕，而如果我们缺乏这种常识，我们也可以从现实中吸取教训。在现实世界里，我们随处可见‘权威’的存在，它打着正义与公平的旗号，利用其组织化的暴力，将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据为己有，供统治阶级享用。”[Objections to Anarchism, pp. 349-50]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用公共舆论和社会压力来阻止反社会行为，而不是依赖监狱、和以惩罚与报复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同时，对于那些实施反社会行为的人，应该通过治疗性的方法进行康复，而不是让他们陷入一个寄生性的法律系统——一个制造并维护不平等和特权的法律系统。对此，无政府主义者赞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自由、平等和实际的人类同情心，是我们能够用来抵抗社会中某些人的反社会本能的最有效屏障。” [Op. Cit., p. 218] 塔克也曾主张：“我们需要的正义，不是僵硬的，而是富有弹性的；我们需要的正义，不是冷酷的，而是蕴含仁慈的，具备足够敏锐的眼光去洞察犯罪的成因、环境和具体情境；我们需要的正义，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 现行由国家强制推行、由法官执行的僵化法律体系，根本不是正义的体现，“任何文明社会都不需要这样的‘正义’。” [Op. Cit., Vol. 13, No. 5, p. 4]

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讨论。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许多人认为犯罪问题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最大弱点，但实际上，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既包括不应采取的措施，也包括如何应对犯罪及其根源的办法。无政府状态的基础是人的自由，但自由并不意味着“自由”地侵犯他人的平等自由。那样做就是压迫、就是剥削、就是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恶根。

我们推荐阅读马拉泰斯塔的《犯罪与惩罚》章节（收录于《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文章《法律与权威》和《监狱及其对囚犯道德的影响》（均收录于《无政府主义》文集中）。此外，艾玛·戈尔德曼的《监狱：一种社会犯罪与失败》（收录于《红色艾玛言论集》）、德克莱尔的《犯罪与惩罚》（收录于《伏尔泰琳·德克莱尔读本》）以及科林·沃德的《你敢越界到何种程度？》（收录于《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也值得一读。此外，《在国家的枷锁之下：无政府主义者对监狱与犯罪的若干回应》（由“黎明集体”编辑），也收录了一系列关于此问题的有价值的文章。

1.5.9 无政府主义下的言论自由又如何？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言论的自由将远远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他们“反对压迫与暴政，追求一个不再有主人与奴隶，不再有富人和穷人，不再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未来……每个人的自由植根

于所有人的自由，而在这种普遍的自由中，便蕴含着个人自由、自我发展、自主性以及言论自由的保障。”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p. 104] 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将不仅体现为广泛的言论自由，还包括新闻自由、媒体自由等各方面的自由。

然而，一些人认为，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会威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权利。这一观点通常是针对国有社会主义提出的，其论证方式如下：如果国家（或“社会”）掌控了所有的通讯手段，那么只有政府支持的观点才能进入媒体。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地回应。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流媒体实际上是由富人控制的。正如我们在 D.3 节所论述的，媒体并非是它们自我标榜的那种独立的自由捍卫者。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报纸、电视公司等媒体，本质上是由富人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其管理者和编辑也多为富有阶层，他们与现有制度有着共同的既得利益。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新闻”实际上受到了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确保其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精英的利益。

然而，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存在这种制度性限制，但公开的审查制度较少。激进派和独立出版商，仍然可以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出版他们的报刊和书籍（尽管市场力量往往会使这一活动变得困难且缺乏经济回报）。但批评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掌握通讯和生产工具，这种自由将不复存在。事实上，从所有“现存的社会主义”案例来看，这种自由往往被统治阶级的观点所取代和扼杀。

由于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这种威胁并不存在。然而，既然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生产的集体化，是否仍然可能出现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有三。

其一，出版社、电台等传播机构将由其工人直接管理。这些机构将由其他工团提供物资，并通过协商达成合作，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官员分配资源（因为这样的官僚机构根本不存在）。换言之，不会有一套官僚体系负责分配（并因此控制）通信工具。因此，无政府主义的自我管理将确保各种刊物和报纸能够表达广泛的观点。社区报纸、广播电台等将在自由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它们不会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各种协会、政党、产业工团等都将拥有自己的媒体，或能够使用由通信行业工团管理的资源，从而确保不同观点都能被表达。

其二，在自由社会中，“最终”的权力掌握在组成社会的个人手中。这种权力将通过公社和工作场所的集会体现出来，而这些集会可以随时罢免代表并推翻其决策。因此，这些集会不太可能容忍某些潜在的官僚，去决定他们可以或不可以阅读、观看或听取什么信息。

其三，在自由社会中，个人将乐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并进行讨论。这是批判性思维的自然结果（而自我管理将促进这种思维），因此，人们会积极捍卫尽可能广泛的媒体接触渠道，以确保不同观点都能得到表达。由于自由社会不存在需要

维护的既得利益，因此它既不会鼓励也不会容忍资本主义媒体中常见的审查制度。“我倾听批评，因为我是贪婪的。我倾听批评，因为我是自私的。我不会拒绝接受他人的见解。” [For Ourselves, The Right to be Greedy, Thesis 113]

因此，无政府主义将在许多重要方面扩展言论自由，尤其是在工作场所（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被剥夺的）。对于一个建立在最大化自由和享受生活的愿望之上的社会，这将是它的自然结果：“我们要求讨论……所有让我们感兴趣的话题——的权利。如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有任何意义的话，它们就意味着讨论自由。” [Goldman, Op. Cit., p. 203]

我们还想指出，在西班牙革命和俄国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地区都保障了言论自由。例如，乌克兰的马赫诺黑军“完全贯彻了革命原则，保障言论、思想、新闻和政治结社的自由。在所有被占领的城市和乡镇……立即宣布全面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各种形式的结社自由。” [Peter Arshinov, *The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153] 这一点也得到了迈克尔·马莱特的确认：“马赫诺派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是他们维护了比任何对手都更广泛的言论自由。” [Nestor Makhno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p. 175] 在革命时期的西班牙，共和派、自由派、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众多无政府主义团体，都享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1936年9月我第一次访问西班牙时，”埃玛·戈尔德曼回忆道，“最让我惊讶的，莫过于我在各地发现的政治自由。当然，这种自由并未扩展到法西斯分子”，但“反法西斯阵线中的所有成员，都享有一种在所谓的欧洲民主国家几乎不存在的政治自由。”至于存在的少数限制，我们必须记住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因此“指望 CNT-FAI 将法西斯分子和其他致力于摧毁他们的势力，也纳入完全的政治自由范围之内，无疑是幼稚的。” [Vision on Fire, p. 147 and p. 228] 其他大量的目击者也证实了无政府主义地区的言论自由，其中包括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记述（事实上，正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共和派和共产党人掌权后，才引入了审查制度）。必须指出，这些无政府主义运动当时正与共产党、法西斯主义者和亲资本主义军队进行生死较量，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坚持言论自由，更显得尤为值得注意。

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一样，适用于所有团体（当然也包括宗教团体）。唯一的例外，正如戈尔德曼所指出的，是那些积极试图奴役自由社会的组织。换句话说，在社会革命期间，那些支持反革命势力的组织和个人，不太可能享有言论自由和组织自由。然而，随着这些势力的暴力威胁减少，他们的支持者所能享有的自由也会随之增加。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讨论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例子——即西班牙革命期间焚烧教堂的事件。事实上，一些人可能会以此，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不宽容宗教及不同意见者的证据。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对此指控予以否认。

众所周知，在1936年7月中旬成功击败法西斯军事政变后，天主教教堂被焚毁、部分天主教会成员也被处决。然而，这些行动并非针对宗教自由或言论自由，而是人民对天主教会西班牙社会中压迫性和反动性作用的反抗；同时也是

对其,在整个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包括支持佛朗哥政变)的回应。正如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頓所总结的:

“宗教是一个可以用来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支持寡头利益的问题。在 1931 年 4 月失去政治霸权后,统治阶级更加依赖教会,将其视为维护自身社会经济统治的关键堡垒。同样,作为主要地主的教会高层也意识到,与正在形成的新右翼政治势力结盟对于捍卫寡头农业利益至关重要。因此,在整个共和国时期,神职人员利用讲坛和忏悔室来捍卫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并为右翼政党进行选举宣传。”[《西班牙内战的来临》,第 42-43 页]

天主教会“是西班牙保守势力的支柱”,而且在 1931 年共和国成立后仅仅 15 天,西班牙大主教“便发表了一封牧函,谴责新政府建立宗教信仰自由和推行政教分离的意图。这位枢机主教号召所有天主教徒,在未来的选举中投票反对他所认为的、意图‘摧毁宗教’的政府。”[安东尼·比弗,《西班牙之战》,第 91 页,第 25 页] 这种对共和国的敌视以及对右翼准法西斯政党(如 CEDA^①)的支持,贯穿了整个 1930 年代,并最终在教会对佛朗哥政变的支持中达到顶点。

此外,不应忘记的是,“天主教媒体,也曾为纳粹摧毁德国社会党和共产党运动而欢呼。由于纳粹主义强调权威、祖国和等级制度——而这三点恰好是 CEDA 的核心关切——因此,纳粹主义在西班牙右翼中备受推崇。”此外,天主教媒体还“敦促其读者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组织起来对抗革命的恶龙”,而当时的纳粹政权“已与梵蒂冈签署协约”^②。CEDA 的目标是“按照奥地利的模式,建立一个具有半法西斯性质的威权政权”。因此,(在教会支持下)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况,对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左翼团体而言是一个清晰的警示,尤其是“西班牙右翼从未掩饰他们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成就的赞赏。CEDA 在组织形式上带有许多法西斯特征”,其领导人“甚至公开宣称,他决心在西班牙建立一个法团国家。”[同上,第 69 页,第 72 页,第 120 页,第 121 页] 正如一位天主教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所说:“基督教与法西斯主义已深深交织在一起,使得[许多人]无法仅憎恶其中之一而不同时憎恶另一个。”[引自安东尼·比弗,同上,第 270 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主教会遭受攻击就毫不令人意外了。如果在一次法西斯政变失败后,人们烧毁了法西斯党及其支持者的党部,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惊讶。那么,为什么一个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教会应该免受这种民众愤怒的波及呢?正如乔治·奥威尔所指出的:

“当教堂被烧毁、牧师被杀害或被驱逐流亡时,没有人能责怪[某人]因此而感到愤怒。但是,我认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更深入地探究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Orwell in Spain, p. 314]

^① 西班牙自治右翼联盟(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 CEDA),是第二西班牙共和国时期的一个西班牙保守主义右翼政党。

^② 1933 年,纳粹德国与梵蒂冈签署《政教协定》(Reichskonkordat),这一协定要求纳粹政权承认天主教机构的独立性,并禁止神职人员参与政治。然而协定签署后,纳粹政权即开始违反相关协定,关闭非严格宗教性的天主教机构、逮捕神职人员。

因此，那些未曾支持右翼、平等对待工人阶级与富人的神职人员，通常都被幸免，这也并不令人惊讶。在巴斯克地区，由于教会支持共和国政权，没有一座教堂被烧毁。同样，犹太教堂或新教教堂也未成为攻击目标。在巴塞罗那，“贵格会^①建立了由流亡妇女负责运作的食堂。” [Gabriel Jackson, *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1931-1939*, p. 446]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在法西斯势力控制的区域，镇压的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在一个由 115,000 名神职人员组成的团体中，有 6,845 人被杀害（“绝大多数发生在 1936 年的夏天”）。这一数据与当时右翼的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在塞维利亚省，仅在 1936 年，法西斯镇压便导致 8,000 人死亡。在科尔多瓦，整场战争期间共有 10,000 人遇害——相当于该地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一旦民族主义势力占领某个地区，在最初的大规模处决被俘士兵、工会和党派领导人之后，“第二波更为激烈的屠杀便会开始”（“事实上，任何被怀疑曾投票支持人民阵线的人都可能面临危险”）。这一屠杀由“地方委员会组织，成员通常包括主导的右翼分子，比如主要的地主、当地国民警卫队指挥官、一名长枪党成员，甚至还经常包括神父”。这“显然不仅仅是出于复仇的考虑，他们的动机还包括建立恐怖统治”。当然，这并未阻止“梵蒂冈和西班牙教会对佛朗哥将军的全力支持”，与此同时，“海外的天主教媒体也纷纷为民族主义起义辩护”。显然，以神的名义屠杀（许许多多的）左翼人士对天主教会高层而言并无任何道德困扰，也未曾阻止“教会对佛朗哥的官方支持”。 [Beevor, *Op. Cit.*, p. 92, p. 101, p. 99, p. 104, p. 250, p. 269 and p. 270]

在佛朗哥统治下，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威，同时服从他们尘世的主宰。佛朗哥极为慷慨地恢复了教会所有的特权和财富，并重新赋予其在教育领域的权力，但作为交换，他期望神职人员几乎成为国家的另一个行政部门”。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统治下的西班牙，几乎就是一个对所有不支持政权者的露天监狱”，“政府鼓励民众将告发他人视为爱国义务。门卫和看守成为了警察的线人……而神父则记录那些没有参加弥撒的人。” [Beevor, *Op. Cit.*, p. 452, p. 453 and p. 454] 而这一切，都得到了天主教会的坚定支持。

在共和派控制区，对天主教会的攻击并非旨在压制宗教本身，而是民众对这一腐败机构愤怒的爆发。天主教会不仅深具反动性、支持法西斯，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地主集团。因此，只要了解教会的本质与作用，“便不会对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东部几乎所有教堂在战争爆发初期被烧毁，而感到疑惑。”反教权主义运动是“一个真正的民众运动，一个根植于西班牙的本土运动。它的根源并不在马克思或巴枯宁，而是在西班牙人民自身的处境。” [Orwell, *Op. Cit.*, p. 300 and p. 315] 相比之下，在佛朗哥统治下，“对‘赤色分子和无神论者’的无情清洗持续了多年”，而在共和派控制区，“最严重的暴力主要是一种突然爆发的、但迅速平息的反应，是对长期被压抑的恐惧的宣泄，并被对过去的复仇欲望所加剧。” [Beevor, *Op. Cit.*, p. 91]

因此，西班牙教堂的焚毁几乎与无政府主义的无神论无关，而更多地，与天

^① 贵格会（Quakers），为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

主教会在西班牙的社会角色、其反动立场、对工会和社会抗议的仇恨、以及其支持法西斯政变的事实——密切相关。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反对言论自由，而是表现了民众对统治阶级及其支持法西斯的机构的反抗。

关于这一问题，还有最后一点值得提出。考虑到天主教会在此期间的实际作用，及其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对法西斯主义的全力支持，教廷如今将当时被杀害的神职人员视为“殉道者”，并称之为有计划的宗教迫害，这种说法令人费解。事实上，如果他们是“殉道者”，那么他们殉的并非信仰，而是他们的亲法西斯政治立场（“当这些宗教受害者被塑造成殉道者时，教会的政治角色却被完全忽视了”）。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会“对民族主义者枪决十六名巴斯克神职人员（包括蒙德拉贡的大司祭）保持沉默”（民族主义者还杀害了约二十名新教牧师）。2003 年，约翰·保罗二世对一名于 1936 年 7 月被杀害的教师行宣福礼^①时，“依然未提及那些被民族主义者杀害的巴斯克神父。” [Beevor, Op. Cit., p. 270, p. 92 and p. 527] 显然，一位被梵蒂冈支持的法西斯所杀害的神父，并不具备封圣的资格。

鉴于天主教会在这一个时期的实际表现，它的高层竟然还试图为自己正名，实在令人惊讶。或许，教廷笃定媒体不会提及这些令人尴尬的事实，尽管正是这些背景因素，解释了 1936 年的屠杀和教堂焚毁事件。如我们在 [A.2.18 节](#)所指出的，似乎屠杀工人阶级并不值得关注，而刺杀统治精英（及其仆从）才是大事。因此，教堂焚毁和神职人员被杀害的事件广为人知，而教会的亲法西斯活动（既是其反动政治立场的结果，也是其身为统治精英一部分的体现）却鲜有人提及，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总而言之，一个自由社会应当保障广泛的言论自由，同时维护其他基本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些自由应当得到尊重、支持和鼓励，涵盖从左翼到右翼的各种政治观点。唯一的例外，是当某个组织**积极**支持那些试图奴役自由民众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对其施加一定限制（具体措施取决于斗争形势，并会随着威胁的减少而逐步放宽）。

对于那些声称，拒绝给予反革命分子言论自由等同于国家主义，或者认为这与自由意志主义理念相矛盾的人——无政府主义者会回答，这种论点是错误的。前者的错误在于，将国家强制实行的审查制度与自由人民的主动反抗混为一谈。在自由社会中，并不存在政府颁布禁令，而是由人民自主讨论，并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集体拒绝支持那些试图奴役他们的势力。缺乏电力、纸张、发行网络等基础资源，反动分子将很难出版或传播其思想。至于后者，并不存在所谓的“矛盾”，因为支持和鼓励自由，同时抵抗奴役自由的企图，这二者根本不相悖！这种指责，实际上犯了恩格斯在其反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所犯的相同逻辑错误，即认为“摧毁权威”本身是一种“威权主义”行为（参见 H.4.7 节）。同样，抵抗那些企图对你施加权威的人，或者抵制其支持者，这显然不是“专制”的表现！这种观点似乎假定，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应当是放任他人对自己施加统治，否则就是“专制”的！——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理解方式……

^① 宣福礼（Beatificatio[拉丁]），又称为宣福、列真福品、列福式，是天主教会追封已过世人的一种仪式，用意在于尊崇其德行，认定其信仰足以升上天堂。

总而言之，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无政府主义都不会危及言论自由。事实上，通过打破当前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并引入工人自主管理的媒体，一个自由社会将能够提供更加广泛的观点表达渠道。媒体将不再仅仅反映富裕精英的利益，而是能够体现整个社会及其中不同个体与群体的多样诉求。

1.5.10 那么政党、利益集团和职业团体呢？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只要人们仍然觉得有必要加入政党或其他利益集团，这些组织就会继续存在。它们不会被禁止，其成员与所有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政治党派或社团的成员可以参与公社及其他形式的集会，并尝试说服他人接受其理念的正确性。

然而，这种政治活动与资本主义民主制下的政治运作，存在根本区别。因为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责任职位的选举不会基于政党推选，也不会涉及权力的委托。埃米尔·普捷（Emile Pouget）生动地描述了工团主义工会与政治选举的区别：

“工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个人。但与民主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因崇拜普选制度而导致的个体人格被压制和贬低的现象不同，工会成员不会经历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在民主制度中，选民唯一能行使个人意志的方式，就是进行一种自我放弃的行为：他的角色就是将自己的‘选票’，‘授予’给候选人，希望他[或她]成为自己的‘代表’。

“加入工会则不具有这样的含义……工人加入工会，仅仅是与一群在意志和潜力上都与自己平等的同志订立了一项契约——一项随时可以被解除的契约……在工会中，例如，当需要选出工会理事会来处理行政事务时，这种‘选择’并不能与‘选举’混为一谈。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采用的投票形式仅仅是一种分配劳动的方法，并不涉及任何权力的委托。工会理事会的职责被严格限制在行政管理的范畴内。它只是履行被赋予的任务，而不会凌驾于其成员之上，不会取代他们，更不会代替他们行使权力。

“工会内所有决策的原则都是如此：它们都被限制在具体的、特定的行动范围内。而在民主制度下，选举意味着当选者被选民授予了一张‘空白支票’，允许其在所有事务上随意决定和行动，即便其决定完全违背了选民的意愿；而选民反对的呼声——无论多么强烈——在当选者任期结束之前都毫无意义。

“因此，工团主义的工会活动与令人失望的政治事务之间，根本无法相比，更谈不上混淆。”——《没有神明，没有主人》（No Gods, No Masters），第二卷，第 67-68 页

换句话说，当个人被选举到行政职位时，他们是被选举来执行其委托，而不

是执行其政党的纲领。当然，如果这些当选者能够说服他们的工人同胞和其余公民，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纲领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委托和纲领就会一致。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我们可以想象，各种集体和公社的决策，将会反映其成员之间复杂的社会互动以及各种政治观点，也会反映出社群内部不同团体的多样性。

无政府主义很可能包含许多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思想。在各个集体和公社内部，这些思想的相对影响力将取决于其论点的力量以及其理念的现实相关性——这正是自由社会中应有的现象。正如巴枯宁所言：“取消这种相互影响，就意味着死亡。而当我们捍卫群众的自由时，我们绝不意味着要废除个人或团体对群众施加的任何自然影响。我们所要求的是废除那些人人为的、特权的、法律的、官方的影响。”[quoted by Malatesta, *Anarchy*, p. 51] 只有当代议制政府取代了自我管理，政治辩论才会导致“被选举出的独裁”以及权力的中央集权化，最终落入某个声称代表整个社会的政党手中，仿佛社会只有一个统一的意志。

这种政治结社的自由在历次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中都曾存在过。在俄国革命期间，马赫诺黑军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组织起苏维埃和地区代表大会，并在这些大会上选举代表，其中包括不同政党的成员。例如，社会主义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SR）的成员积极参与了马赫诺运动，并出席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例如，1919年2月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大会主席，共同起草的。” [Michael Palij, *The Anarchism of Nestor Makhno, 1918-1921*, p. 155]）。在1919年末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大会上、所成立的马赫诺派革命军事苏维埃中，共有三名共产主义者当选；而该次大会的工人代表共有18名，其中6人为孟什维克，其余12人也包括共产主义者。[Micheal Malet, *Nestor Makhno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p. 111 and p. 124] 在马赫诺派对布尔什维克试图禁止其代表大会的回应中，他们这样写道：

“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受来自任何政党的压力和影响，只承认选举它的人民。它的职责是完成人民所托付的任务，并且不对任何左翼社会主义政党传播其思想制造障碍。因此，如果有一天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在工人中占据上风，革命军事委员会……必然会被另一个‘更加革命的’、更加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所取代。” [quoted by Peter Arshinov, *The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p. 103-4]

因此，马赫诺派支持工人阶级的自决权，正如1919年2月一位代表在会议上所表达的那样：

“任何政党都无权篡夺政治权力……我们希望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能在地方层面上自行决定，而不是由任何上级权威下达命令；所有农民和工人都应当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被选举者的职责仅仅是执行劳动者的意愿。” [quoted by Palij, *Op. Cit.*, p. 154]

需要指出的是，一种由部分列宁主义者推动的虚假说法广为流传，即政党被禁止参加这些机构的选举（例如，参见 Jason Yanowitz 那篇糟糕的文章《论马赫诺的神话》[*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no. 53]）。这些说法源于对革命时期

苏维埃的组织方式缺乏基本了解，同时也误解了马赫诺派在 1920 年 1 月的这一声明：

“只有从事那些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工作的工人，才能被选入这些苏维埃。政治组织的代表无权进入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因为他们的参与可能会使苏维埃变成一个政党代表大会，从而导致苏维埃制度的毁灭。” [quoted by Alexandre Skirda, Nestor Makhno: Anarchy's Cossack, p. 164]

在 1917 年彼得格勒及其他俄国城市建立苏维埃时，与 1905 年不同的是，这一举措由各政党发起，并确保其在执行委员会中拥有政党的代表（这与当选代表恰好是某个政党的成员不同）。例如，这种安排使得“高级政党领导人成为苏维埃的投票代表”，而他们的产生方式是“由各政党的领导层选定，而非由苏维埃大会本身选举产生。” [Samuel Farber, Before Stalinism, p. 31] 因此，马赫诺派反对的，是许多苏维埃成员并没有由实际工人直接选举出来的这种做法。

此外，马赫诺派也遵循了俄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张，即建立“真正有效的苏维埃，其组织方式应基于集体原则，由工人和农民直接委派代表……而不是通过政党名单让政治空谈家混入其中，使苏维埃沦为空谈俱乐部。” [The Anarch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aul Avrich (ed.), p. 118] 这种政党名单制度意味着苏维埃代表可以是任何人。例如，左翼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曾回忆，1920 年初，一家化工厂“提名列宁与我竞争[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在一次公开投票中）我获得了七十六票，而他——八票。” [quoted by Israel Getzler, Martov, p. 202] 而这两位知识分子，如何能够真正了解并反映他们所谓“代表”的工人的关切与利益？如果苏维埃是工人的代表机构，那么为何政治党派中的非工人阶级成员能够被选为工厂的代表，而他们甚至可能从未踏足该工厂，除了前来拉选票的目的之外？

这一原则显然也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生活不能仅仅被简化为政治和经济组织。个人有着丰富多样的兴趣与需求，只有在表达这些兴趣的前提下，个体才能真正享有自由并实现自我。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将会出现大量自愿结成的社群与团体，以满足这些兴趣。例如，可能会有消费者组织、音乐团体、科学协会、艺术协会、俱乐部、住房建设合作社和协会、手工艺和兴趣工会、粉丝俱乐部、动物权利组织，以及基于性别、性取向、信仰和族群等建立的团体等等。各种社群将围绕人类的兴趣和活动而建立。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述的：

“一个渴望拥有一架三角钢琴的人，会加入乐器制造者协会。通过在闲暇时间里贡献部分劳动，他很快就能获得自己梦想中的钢琴。如果一个人热衷于天文学研究，他会加入天文学家协会……通过参与合作劳动，他将拥有自己想要的望远镜……总之，每个人在投入数小时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之后，每天仍有五到七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这足以满足各种奢侈品的需求，无论它们如何多样。成千上万的协会将承担满足这些需求的任务。” [《面包与自由》，第 120 页]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建立在各类社群与兴趣小组的

基础之上，每个个体都能基于自己的兴趣自愿地加入这些组织，以表达和发展他们的兴趣。例如，住房建设合作社将让居民自行管理当地事务，设计和维护自己的住房、社区公园和花园。素食主义团体将传播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尝试说服他人戒除肉食的弊端。消费者组织将与行业工团进行对话，以改善产品和服务，确保生产符合消费者需求。环保组织将监督生产过程，确保其不会造成破坏性后果，并向工会和公社提供相关信息。女权主义、同性恋、双性恋和反种族主义团体将表达自身观点，揭示社会层面上仍然存在的平等与偏见。整个社会中，人们将自由结社，表达自身观点，并在各类议题上影响他人。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专业团体，这些团体将确保需要特定资质的工作（如医学等）维持公认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如此一来，社会成员便能确认某位劳动者是否是其领域的公认专家，并具备相应的资格胜任工作或提供建议。尽管自由社会将消除知识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并终结僵化的劳动分工，但现实是，人们仍然希望能够确信，自己所求助的医生或护士具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这正是专业团体的作用所在，它们将基于共同商定的标准和资质体系，组织培训与认证。当然，这并不会阻止其他人尝试从事这些职业，但事实上，很少有人会选择向没有公认资质的个人寻求帮助。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自愿结社将比资本主义社会发挥更强大且更积极的作用。社会生活将展现出多种多样的面貌，个体可以在数以千计的社群中自由选择加入，也可以与志同道合的人创建新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绝不会否认：生活远不止于工作！

1.5.11 无政府主义社会如何防御权力渴求者的威胁？

一个常见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是，自由自治的社会将容易被暴徒或那些追求权力的人接管。类似的论点认为，一个缺乏领导结构的群体使得魅力型领袖趁虚而入，因此无政府状态最终只会导致暴政。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类论点颇为奇怪。社会现在**本就**由暴徒及/或暴徒的后代所统治。国王最初不过是成功的暴徒，他们在特定地域内强行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而现代国家正是从这种强制统治的结构中发展而来。财产亦是如此，许多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可以追溯到某些暴徒通过暴力手段攫取土地，随后将其传给子孙后代，而后者再将其出售或转赠给他们的继承人。当前社会制度的暴力起源，依然可以在国家与资本家持续使用暴力以维持和保护其统治的事实中，得到印证。当统治阶级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他们总会毫不犹豫地回归自己的暴徒本性，诉诸极端暴力以维护特权。欧洲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大范围滑向法西斯主义，或 1973 年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政变，均清楚表明了这帮恶棍可以做到何种地步。正如彼得·阿尔希诺夫（在稍有不同的语境下）所指出的：

“国家主义者惧怕自由的人。他们声称，如果没有权威，人们将失去社会性的支柱、会涣散瓦解，并重新归于野蛮。这种说法显然是胡言乱语，只有游手好闲者、热爱权威和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或者资产阶级社会的盲目思想家，才会去认真对待它。事实上，人民的解放并不会导致人民的堕落和野蛮化；相反，那些依靠权力与特权生存、剥削人民劳动、吸食人民鲜血的人，才会堕落、变得野蛮……人民的解放，将使那些以奴役人民为生的人暴露其原始本性。” [The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8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会被“无政府状态无法阻止暴徒夺取权力”这一论点所折服。此类论点忽视了现实，即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权力渴求者统治的社会之中。作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它完全站不住脚，实际上，它反而是对等级制社会的控诉。

此外，这种观点还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自由，正是因为他们已经推翻了所有现存的或潜在的暴徒，即那些掌握或渴望支配他人的权力者。他们必然会捍卫自己的自由，抵抗任何企图恢复权力统治的势力。他们已经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因此，废除了所有等级权力。那么，我们怎能相信这些曾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会在取得胜利之后，默许另一批暴徒强加他们的统治？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述的：

“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实现方式，是每一个受压迫者都以自由之人的姿态行事，无视任何权威的反对……在实践中，任何个体革命的持久性都需要领土范围的扩展。当我们谈论革命时，我们指的是众多个人和集体起义的汇聚，其成功程度，足以使革命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完全自由地行动……无需时刻担忧旧制度势力的阻挠或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显而易见的镇压行为都将遭到个人或集体革命行动的回应；而维持无政府状态，将比在未曾动摇的旧势力面前争取无政府状态要容易得多……人们有能力迅速遏制权力欲望者，可以通过抵制他们，拒绝向他们提供劳动或任何物资。他们也可以使用武力对抗他们。这种力量既存在于个人之中，也存在于集体之中。作为曾经的反叛者，他们受自由精神的激励、或是自幼习惯于享受自由；因此，他们绝不会对自己认为错误的事态坐视不理。” [克鲁泡特金，《自行行动》，第 87-88 页]

因此，一个自由社会将通过直接行动来抵抗企图掌权者，正如它曾通过直接行动摆脱现有统治者一样。其社会结构本身就促进这种直接行动，因为它建立在团结的网络与互助之上。一个人所受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因此任何试图称王称霸的人都将面对整个已解放社会的集体反抗。面对人民的直接行动（如不合作、罢工、示威、占领、起义等），任何企图掌权者都将发现自己难以施加统治。与习惯于等级统治的现存社会不同，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是由反叛者组成的，因此难以被支配和征服：“在未来社会中，无政府状态本身即是防御，防止任何权威、任何权力、任何国家的重新建立。” [卡洛·卡菲耶罗，《无政府与共产主义》，载于《乌鸦》杂志第 6 期，第 179-186 页，第 180 页]

无政府主义者指出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法西斯崛起的例子。在拥有强大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地区，法西斯势力受到了最强烈的抵抗。在德国，希特勒几乎

没有遇到反对；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不得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才得以掌权。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法西斯势力展开了殊死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直到遭到共和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背叛。基于这一历史经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人们会习惯于去实践直接行动和自我管理，因此会迅速且轻易地击败任何潜在的暴徒——他们不会停止捍卫自身自由的斗争。一个自由的人民会迅速组织起自治民兵进行自卫（正如在社会革命期间，他们会自发组织起来以保卫革命一样——见 J.7.6 节）。

至于自我管理会导致“魅力型”领导人这一论点，其逻辑之荒谬令人惊讶。仿佛等级制结构本身就**没有**依赖于领导体制，也不需要魅力型领袖一样！这样的论点本身就自相矛盾，同时也忽视了现代社会及其领导体制的本质。事实上，与其说群众大会将会被领导者主导，不如说等级制结构才是独裁者的天然温床。世界上所有大独裁者，皆是从**等级制**组织中崛起，**而非**自由自治的组织。以希特勒为例，他并非通过自我管理而掌权，而是利用一个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政党，夺取了一个同样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由于大众被剥夺了权力，他们才会寄希望于领导者代他们行事，因此，“魅力型”领袖的出现是等级社会的必然结果。而在无政府社会中，由于所有人都拥有权力，反倒使得企图掌权的个人更难得逞——几乎没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就他人。

我们对权力欲的讨论显然涉及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无政府社会中，道德行为是否会得到回报？换句话说，一个无政府社会是否能够稳定，抑或是不道德者终将夺取主导权？

在这个争先恐后追逐财富成为生活唯一要义的世界里，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那些遵循道德准则生活之人的遭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道德行为通常无法带来成功，相反，那些背后捅刀、投机取巧、尔虞我诈、赶尽杀绝、唯利是图之人——反而更容易安身立命。忠肝义胆、鞠躬尽瘁、雪中送炭、轻利重义——这些品质在账单面前，分文不值。资本主义社会下，道德和原则性行为通常会受到惩罚，而非回报。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往往鼓励不道德行为，因为这通常能降低成本，从而使实施这些行为的人获得竞争优势。

然而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情况则会截然不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对权力与财富的平等获取之上。在无政府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无论身份如何，都有权分享社会财富。一个社区的生存与繁荣，完全依赖于社区成员的共同努力。在安那其的社会中，道德行为将成为常态。道德行为者的回报不仅体现在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还体现在他人愿意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而那些投机取巧、试图支配他人、拒绝平等合作或以其他方式表现出不道德行为的人，将会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邻居与同事可能会拒绝（或最小限度地）与他们合作，并通过其他非暴力直接行动表明，某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人们会与不道德者展开讨论，试图说服他们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在一个基本生活需求得以保障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遵循道德行为，因为这样能提高他们在社区中的声誉与地位。资本主义与道德行为是互不相容的概念，而无政府主义则鼓励并回报道德行为。不必多言，正如我们在 [1.5.8 节](#) 中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深知自由社会仍需对抗残存的不道德与反社会行为；而试图支配他人，正是定义了何为反社会与不道

德！

因此，正如所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自由社会无须惧怕潜在的恶棍、“魅力型”领袖或不道德之人。无政府社会将建立在自由个体的合作基础之上，这些个体不太可能容忍恶劣行为，而会通过直接行动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来加以对抗。此外，自由合作的本质就会使道德行为得到回报，因为践行道德的人会从同伴那里获得同样的对待。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奋起捍卫自己的自由！

最后再强调一点：有些人似乎认为，无政府主义意味着向掌权者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压迫和支配他人。事实远非如此。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在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拒绝让他人统治他们。这不是对老板或潜在统治者“良善一面”的恳求，而是对服从老板之人摆脱老板的直接抵抗和团结行动——无论老板是否同意，最终都要将其扫除！一旦这一点被正确理解，就会发现“无政府社会容易被权力欲强的人操控”这一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谬论——无政府主义本质上就是对抗权力，因此，它比任何等级制社会都更具抵抗潜在统治者的能力。

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清楚，无政府社会必须同时抵御来自内外的、复辟资本主义与国家的企图。事实上，所有革命无政府主义者都曾强调，革命必须进行自我防卫（正如 H.2.1 节所证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革命无需防卫的说法始终只是神话）。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试图重新引入权威的行为，都必须被坚决抵制。

I.5.12 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是否会提供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

这取决于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类型。不同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例如，在个人主义-互助主义社会中，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将由个人或合作社按付费使用的方式提供。个人或合作社/协会，可能会向各种保险提供者投保，或者直接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签订合同。因此，该体系将类似于私有化的医疗体系，但由于竞争的作用——人们希望竞争能够将价格压低至成本水平——不会有利润空间。

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这样的体系。他们主张对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进行社会化。他们认为，私有化体系只能满足那些负担得起费用的人的需求，因此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此外，这类体系的运营成本更高（最明显的是需要支付股东分红和高层管理人员的高额薪资，更不用说，还需要投入资金用于反对“社会化”医疗的宣传），并且收费更高（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化公用事业往往会向消费者收取更高的费用，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天然垄断的）。

以医疗保健为例，接受医疗服务的需求并不取决于收入水平，因此一个文明社会应当承认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医疗保险公司，会根据被保险人罹患疾病或受伤的风险来设定保费，最容易生病或受伤的人往往根本无法以任何价格获得保险。私人保险公司会将整个行业排除在外，认为这些行业对其利润而言风险过高，因为其中的工人更容易发生事故或罹患疾病。此外，这些公司会定期审查合同，并以最微小的理由取消对病人的保险（这在商业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保险公司通过尽量减少医疗支出来盈利）。这种模式显然无法启发一个自由社会，也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理念相悖。

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出于伦理和效率的双重考虑，支持社会化和普及的医疗保健体系（参见 [1.4.10 节](#)）。毋庸置疑，无政府主义者构想的社会化医疗体系，将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当前国家提供的全民医疗体系（这种体系虽然被其敌人称为“社会化医疗”，但更准确地说应被称为“国有化医疗”——尽管需要强调的是，它仍然优于私有化医疗）。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化医疗体系将自下而上建立，并以地方公社为基础。在社会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医疗服务……将对公社的所有居民免费提供。医生不会像资本家那样，试图从不幸的病人身上榨取最大利润。他们将受雇于公社，并被期望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治疗。”此外，预防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医疗治疗只是医疗保健科学的治愈性的方面；仅仅治疗病人是不够的，还必须预防疾病。这才是卫生学的真正职能。” [James Guillaume, "On Building the New Social Order", pp. 356-79,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71] 其他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也将遵循类似的原则。

在拒绝私有化的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拒绝国有化，而是主张社会化和工人自治。在这一点上，我们追随蒲鲁东的观点，他认为有一系列行业和服务属于“公共工程”，最适合由公社及其联合会管理。因此，“管理这些工程的权力应归属于市政当局及其管辖的地区”，而“具体执行这些工程的权力则应由工人协会掌握”。这是由这些行业的性质以及自由意志主义价值观决定的，因为“地方自治团体直接、主权地发起安排属于它们的公共工程，是民主原则和自由契约的自然结果；而将其交由国家管理……则是向封建制度的倒退。”工人对这些公共工程的自主管理，同样符合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因为“工人必须组织成民主性的社团，所有成员享有平等的条件，否则社会将倒退回封建主义。”铁路应当“交给负责任的公司，但这些公司不是资本家的公司，而是**工人自己的公司**。” [由蒲鲁东所著的《革命总论》，p. 276, p. 277 和 p. 151]

这一原则在西班牙革命中得到了实践。加斯頓·勒瓦尔在其关于集体化的经典著作中讨论了“公共部门的成就”。在加泰罗尼亚，工团组织管理了水、电和煤气等公用事业，而电车和铁路的运营比资本主义管理下更加高效且成本更低。在整个西班牙，卫生行业的工人按照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在集体、自治公社和全国劳工联盟（CNT）的协作下重新组织了医疗服务。勒瓦尔总结道：

“医疗社会化不仅仅是自由意志主义激进派医生的倡议。在我们研究过的那些被革命改造的乡村和小城镇里，医疗服务和现有医院都被市政化，并被加以扩展，置于集体的管理之下。在没有医院的地方，人们就地筹建。医疗社会化已经

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事业，造福于所有人。它构成了西班牙革命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由加斯顿·勒瓦尔所著的《西班牙革命中的集体化》，p. 278]

因此，西班牙革命展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医疗体系的运作方式。在农村，当地医生通常会加入村庄集体，与其他工人一样提供医疗服务。在缺乏本地医生的地区，“集体安排其成员到附近城镇的医院接受治疗。在某些情况下，集体自行建立了医院；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为当地医生购置了所需的设备和其他物资。”例如，阿拉贡地区的蒙松区集体联合会建立并运营了一家医院——比涅法尔的**杜鲁蒂健康之家**（the Casa de Salud Durruti）。到 1937 年 4 月，该医院已有 40 张病床，设有普通医学、防疫和妇科等科室。医院每天接待约 25 名门诊患者，并向整个区的 32 个村庄开放。[由罗伯特·亚历山大所著的《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vol. 1, p. 331 和 pp. 366-7]

在莱万特，CNT 在原有的**莱万特互助救济协会**（Sociedad de Socorros Mutuos de Levante）的基础上推进了医疗社会化。这一机构最初是工会创建的一种互助福利组织，拥有大量医生和专业人士。在革命期间，该互助会有 50 名医生，为所有加入的工人及其家属提供医疗服务。加泰罗尼亚的医疗社会化形式有所不同，但依然遵循自由意志主义原则。加斯顿·勒瓦尔对此作出了精彩的总结：

“医疗服务的社会化是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要充分理解我们同志们的努力，就必须记住，他们在 7 月 19 日后短短一段时间内就恢复了整个加泰罗尼亚的医疗体系。革命能够依靠一批敬业的医生，他们的目标不是积累财富，而是服务于受苦受难者和被剥夺权利的人群。

“1936 年 9 月，卫生工人工会成立。遵循统一各类工种和服务行业的趋势，所有卫生行业的工人——从搬运工到医生及管理人员——都被组织到一个大的卫生工会之中……

“我们的同志们奠定了新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这个新的医疗体系覆盖了整个加泰罗尼亚。它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其各个部分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分布，并按照整体规划运作。加泰罗尼亚被划分为九个区域……这些区域内的所有乡村和城镇都由这些中心提供医疗服务。

“在整个加泰罗尼亚，共有 27 个城镇设立了 36 个医疗中心，确保每个乡村、每个村落、山中孤立的农民、所有妇女和儿童，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获得充足且现代化的医疗服务。在每个区域设有一个中央工会和一个位于巴塞罗那的控制委员会。各个部门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享有自治权，但这种自治并不意味着彼此孤立。巴塞罗那的中央委员会由各部门选出的代表组成，每周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共同问题并实施总体计划……

“卫生工会的项目立刻造福于大众。工会管理所有医院和诊所。在巴塞罗那开设了六家医院……此外，还将八座原本属于富人的豪华住宅改造成疗养院，它们坐落在群山和松林之间，环境优越。但要将这些住宅改造为设备齐全的现代化

医院并非易事。”[由萨姆·多尔戈夫（Sam Dolgoff）编辑的《无政府主义集体化》，pp. 99-100]

医疗服务不再需要个人支付费用。每个集体若有能力，都会向其医疗中心支付一笔捐款。医疗设施得到了改善，并引进了现代化设备。与其他自主管理行业一样，医疗服务的各个层面都由工人大会管理，工人们选举代表和医院管理人员来负责运营。

在未来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我们可以预见类似的社会化进程。医疗体系将建立在自主管理的基础上，并与地方公社及公社联合会紧密相连。每家医院或医疗中心将保持自治，但同时通过联邦制相互联系，以便在需要时共享资源，使医疗服务能够迅速适应当地的需求和情况。医疗行业的工人将组织自己的工作场所，在广泛的自主管理和社会化框架内联合在一起，共享资源和信息、共同制定计划，提升公共医疗服务的质量。而公社及其联合会、工团及其联邦，将提供资源并有效地“拥有”医疗体系，从而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医疗服务。

类似的模式也将适用于其他公共服务。例如，在教育方面，我们可以预见公社成员将共同组织免费的学校体系。这一点在西班牙革命时期已有所体现。事实上，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爆发前便创办了“现代学校”，各地共有 50 到 100 所，由地方无政府主义团体和 CNT 资助。在革命期间，西班牙各地的工团、集体和集体联合会纷纷建立学校。正如加斯頓·勒瓦尔所述：“教育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大部分部分或完全实现社会化的集体和市政当局，都至少建立了一所学校。例如，到 1938 年，莱万特联合会的每个集体都拥有自己的学校。”[引自萨姆·多尔戈夫，同上，p. 168] 这些学校的目标，如 CNT 关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议所述，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在这里使用‘人(men)’是作为泛指——为此，教师必须培养儿童的各种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发展自身的潜能。”[引自何塞·佩里亚茨所著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盟》，p. 70] 自由教育的原则，即在学校中鼓励自由而非权威，在革命期间得到了广泛应用（关于现代学校与自由教育的更多细节，可见 J.5.13 部分）。

这一教育的革命也不仅限于集体和儿童。例如，**莱万特地区农民联合会**（Federación Regional de Campesinos de Levante）在其五个省份各设立了一所学院。第一所学院于 1937 年 10 月成立，设在一座旧修道院内，招收了 100 名学生。该联合会还在瓦伦西亚和马德里建立了两所大学，教授各种农业学科，并采用实验性的教育模式，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阿拉贡的集体也在比涅法尔建立了一所类似的专门学校。此外，CNT 也在加泰罗尼亚积极参与了教育体系的变革。在巴塞罗那，当地 CNT 联合会还创办了一所学校，专门培训女性工人，以替代因参军而减少的男性劳动力。这所学校由无政府女性主义团体“**自由女性**”（Mujeres Libres）管理。[罗伯特·亚历山大，《同上》，p. 406, p. 670, pp. 665-8, p. 670]

社会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公共服务，最终将取决于该社会成员的意愿。例如，如果一个公社或由多个公社组成的联合会，希望建立一个共同的医疗或教育体

系，那么他们将分配资源来实施这一体系。他们可能会将创建该体系的任务，交给一个（比如说）由志愿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这些志愿者来自相关的行业工会、专业协会、消费者团体等利益相关方。例如，在建立公共教育体系时，该委员会或工作小组可能包括教师工会的代表、家长协会的代表、学生工会的代表等。这类体系的运行将如同其他行业一样，由从业者自行管理。功能性的自我管理将成为常规，例如医生管理自己的工作，护士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医院的整体运作则由所有医院工作人员组成的群众大会来决定。这些工作人员将选举并授权行政管理人员，同时决定医院应遵循的政策。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将拥有发言权，例如医疗体系中的患者和教育体系中的学生。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论述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其实施和正常运作如果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工人，或者通过与他人协商达成协议的工人自行负责，并在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直接监督下进行，将会更加可靠。” [Anarchy, p. 41]

毫无疑问，任何公共服务体系都不会被强加给不愿接受的人。这些服务是由公社成员组织并为公社成员提供的，因此，未加入公社的个人若想使用公社资源，则需要支付费用。然而，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太可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冷酷无情，不会拒绝救治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也不会因为患者无钱支付而拒绝紧急救助。同样，正如其他工人没有义务加入工会或公社，医生、教师等专业人士也可以选择公社体系之外独立执业，既可以作为个体工匠行医或授课，也可以加入合作社。然而，考虑到免费医疗服务的普及，他们很难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财富。医学、教育等职业将回归其原本的动机，即帮助他人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正如预期的那样，公共服务将由公众自行组织，并由工会和公社进行管理。它们的基础是工人对自身日常工作的自我管理，以及对整个体系的整体管理。同时，非从业者（如患者、学生等）在这一体系中也不会被忽视，他们将发挥作用，为体系提供必要的反馈，以确保服务质量，并使其能有效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维持和扩展这一体系所需的资源将由公社、工团及其联合会提供。这样一来，公共服务将真正成为“公共的”，而不是一种由国家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体系，也不是少数人利用自然垄断攫取私利、剥削大众的工具。

因此，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公共服务将由提供服务的工人组织，并置于使用者的有效控制之下。这种由工人协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愿景，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作为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改革诉求被提出（更不用说，在经济危机期间，企业获得政府救助时，要求将其转变为合作社的诉求）。同样，与其选择国有化或私有化，不如让公用事业以消费者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即由使用者拥有），而日常运营则交由生产者合作社管理。

I.6 那么“公地悲剧”呢？

“公地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 一词，被用来描述某些人认为的“共有的资源会被破坏性地过度使用”的现象。该术语最早由加勒特·哈丁 (Garret Hardin) 于 1968 年 12 月提出。[“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 pp. 1243-1248] 这一概念一经推出，迅速受到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所有制或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欢迎，并成为许多支持私有化论点的基础。

毫不意外的是，考虑到这一理论深受资本主义捍卫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青睐，哈丁的论点实际上只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实验，完全没有任何实证依据。他假设了一个情境：一片公有牧场对所有当地牧民开放，供他们放牧牛群。在此基础上，哈丁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假设，认为每个牧民都会尽可能地在公地上放养更多的牛，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这将导致过度放牧和环境破坏，因为额外放牧带来的成本由所有使用公地的人共同承担，而收益则归于个体的牧民。然而，当每个牧民都独立地采取同样的行动时，个体的理性行为在集体层面上就变得不理性了。最终结果是，由于土地被过度使用，所有牧民的生计都将毁于一旦。

哈丁的文章被用来为公有资源的国有化和私有化提供正当性（而前者通常是后者的前奏）。随着国家所有制逐渐失去支持，这一逻辑实验的结论变得简单而统一：只有对公有资源进行私有化，才能确保其被有效利用，并防止其过度使用和破坏。虽然哈丁的文章发表时，尚未迎来 20 世纪 7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但它在后来被广泛引用，为那些试图私有化国有企业并摧毁第三世界部落社会中的共有制度的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这些最终政策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

毫无疑问，哈丁的分析存在诸多问题。最根本的是，它只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实验，因此并未参考历史经验或现实实践。换句话说，它并未反映公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现实情况。所谓的“公地悲剧”根本不存在，它实际上是将“自由放任的悲剧” (tragedy of the free-for-all) 强加到共有资源（在本例中为土地）之上。事实上，公地从来都不是“放任取用”的资源，尽管后者可能导致过度使用和破坏，但前者却得以延续数千年。因此，不幸的是，那些经常援引“公地悲剧”来支持私有制的人，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对公地真正含义的无知。正如社会主义者阿兰·恩格勒所指出的：

“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援引他们所谓的‘公地悲剧’来解释森林、渔业和水路的肆意掠夺，但共有财产 [common property] 本身并不是问题。在部落、宗族和村庄共同拥有财产的时代，人们只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并尊重他人的权利。他们珍视共有财产，并在必要时共同行动，以保护其免遭破坏。在资本主义下，并不存在真正的共有财产。（公有财产 [public property] 实际上是一种私人财产，即政府作为法人实体所拥有的财产。）资本主义只承认私人财产和无主财产。在无主财产被某人占有之前，没有人对其负有责任。一旦有人宣称其所有权，他便有权随心所欲地处置它，而这种权利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与共有财产或私人财产不同，

资本主义财产并不因其本身或实用性而受到重视，而是因为它能为所有者带来收益。如果资本家能够通过变卖财产最大化收益，他也就有权这样做。” [Apostles of Greed, pp. 58-59]

因此，正如科林·沃德所指出的：“地方性、大众化的控制，是避免公地悲剧最可靠的方式。” [Reflected in Water, p. 20] 鉴于社会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一个共有制的、去中心化的社会，它几乎不必担心共有资源因非理性使用或滥用而遭到破坏。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将哈丁设想的情境——即对所有人开放的无人管理的资源——与现实中存在的共有物制度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共有物是村庄和部落社区内受集体管理的资源。例如，历史学家 E.P.汤普森指出，哈丁假设公地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这一观点“缺乏历史知识”。事实上，公地是由使用者之间的共同协议进行管理的。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中，汤普森表明，“由于共有资源无人拥有和保护，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被过度开发的观点……尽管听起来符合常识，但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公地的使用者本身并非缺乏常识。长久以来的各个地区，公地的使用者都发展出各种丰富的制度和社区制裁措施，以限制和规范资源的使用……当旧的……制度衰落时，它们所留下的真空便成为政治影响、市场力量和民众诉求相互竞争的场域，而不再有共同的规则加以约束。” [Customs in Common, p. 108fn and p. 107] 科林·沃德则指出了一个更近代的例子，即佛朗哥胜利后的西班牙：

“西班牙的水资源历史表明，‘公地悲剧’并非加勒特·哈丁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公社控制建立了一套复杂而精细的公平分配体系。而哈丁所推崇的私有制，实际上导致了他认为公地开放使用时必然会出现的自私个人主义，或者使大地主们对资源的分配漠不关心。” [Op. Cit., p. 27]

因此，哈丁的文章在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支持公地私有化的论据。然而，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论证表明，哈丁的观点根本不是针对共有制的‘悲剧’……哈丁的论点实际上涉及的并非共有制的问题，而是私有财产制度下开放使用所导致的问题。” [John O'Neill, Markets, Deliberation and Environment, p. 54] 值得注意的是，哈丁后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指出“很明显，我最初的文章标题应该是《无管理公地的悲剧》……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文章可能会误导他人。” [quoted by O'Neill, Op. Cit., p. 199] 但当然，那时错误的影响已经产生。

哈丁的断言中带有某种傲慢，因为他基本上假设农民无法认识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也不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在这种情况下，“开明的精英”（政府和资本家）便有必要介入。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小农及其他群体早已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和规则，以保护资源并确保社区能够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换句话说，哈丁完全忽视了真实公地的运作方式，即公社管理和使用者自身的自我调节，他们会发展出合适的集体制度来维持公地的可持续使用。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类在拥有公地的社会中生活了数个世纪，却并未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推翻哈丁最根本的假设。正如科学家苏

珊·简·巴克·考克斯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误解了公地的真实性质，我们也就误解了传统公地制度消亡所带来的影响。或许，现实中存在的并非是‘公地的悲剧’，而是公地的胜利：在数百年——甚至可能是数千年（尽管没有书面记录能够证明更久远的时期）——的时间里，土地一直被社区成功地管理。”这表明所谓“公地悲剧实际上是荒诞的”，基于一个“历史上错误”的论点，因为“公地是经过仔细而严格的管理的”。她还指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我们对人性的认知是否出现了偏差”，因为“如果真的是‘经济人’在管理公地，那么公地的悲剧很可能确实会发生”，因此，“或许真正管理公地的是另外一种人。”[“No Tragedy on the Commons”, pp. 49-61,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7, p. 60, p. 53, p. 56 and p. 61]

一位经济学家指出，所谓“公地的悲剧”只有在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时才具有意义。如果我们假设个体是原子化的，并且能够自由进入无人管理的土地，那么哈丁的结论便会自然而然地成立。然而，“如果财产是真正共有的，这就意味着必然存在制度性协议……在共有人之间建立管理资源决策的规则。更明确地说，共有财产之所以是真正的共有财产，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正是这种人类建立的制度，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因此，“所谓‘公地的悲剧’更准确地说应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悲剧’”。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哈丁的文章中包含着大量“概念性错误”，而这些错误“已被经济学家系统性地重复使用”。总而言之，“所谓的公地悲剧与共有财产无关，而是与不受限制和不受监管的自由进入有关。”[F. Aguilera-Klink, "Some Notes on the Misuse of Classic Writings in Economics on the Subject of Common Property", pp. 221-8, *Ecological Economics*, No. 9, p. 223, p. 221, p. 224 and p. 226]

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那些认为“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及其他地区的经验表明，公共财产会导致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的论点。这类论点同样反映出对共有财产真正含义的无知（而支持私有产权的右翼势力使用这一论点也绝非巧合）。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在 [B.3.5 节](#) 中讨论的，上述国有的（公有的）资源既非共有，也非公共所管理的一一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独裁统治本就排除了资源的公众控制。因此，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并未显示公地或公共所有制的危害，而是揭示了当资源管理者不受公众监督时可能产生的危险（而且，美国的污染程度远高于西欧，这也绝非巧合——在美国，就像在苏联一样，资源的控制者不受公众控制，因此污染的后果最终由公众承担）。斯大林主义所暴露的，是国家所有制（国有化）的问题，而非共有制（社会化）的问题，尤其是在当权的国家甚至未受到哪怕是代议制民主所隐含的、最低限度的公共监督时。

这种对公共财产与国家所有财产的混淆，当然被用来为富人和国家掠夺共有财产提供辩护。在政治辩论中，这种“混淆”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就像哈丁最初那个存在缺陷的“公地悲剧”理论仍然被反复引用一样，是因为这一理论对富人和权势阶级极具实用价值——他们有着削弱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侵占共有资源的既得利益。事实上，大多数被用来论证“公地悲剧”的例子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假设之上，而这种背景并不适用于真正的公地。

而现实中，只有当财富与私有制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始侵蚀并摧毁公共生活时，“公地悲剧”才会发生。这一点可以从公地制度存在了数千年，而其消亡却只发生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这一事实中，得到有力的印证。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它所依赖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侵蚀了公共价值观与传统。如果没有财富的集中与国家的干预，人们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就如何使用共有资源达成协议，而这一过程已持续了数千年。在富人企图扩大其土地占有、剥夺穷人对土地的使用权，使他们完全依赖于统治阶级的权力与意志之前——公地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成功管理的。

因此，正如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国家“系统性地清除了所有曾经表现互助倾向的制度。乡村社区失去了他们的民众集会、法院及独立的行政管理；他们的土地也被没收。”[《互助论》，第182页] 讨论与协商的自由，被所谓的“绝对”财产权及其伴随的权力和威权所摧毁。无论是政治影响力还是市场力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由财富主导的：“有两个场合要求绝对的精准性：一是法庭审判，二是圈地运动。而这两个场合都让权势者和富人受益，而不利于普通民众。”当国家以富人利益为目标执行财产权时，民众的诉求便毫无意义。最终，“议会和法律将资本主义对排他性所有权定义，强加于土地之上。”[Thompson, *Op. Cit.*, p. 134 and p. 163] 正如考克斯所指出的，许多佃农“在法律上被剥夺了对更有权势的地主滥用行为的救济权”，而“在富有地主的支持下，土地改革往往不过是一场精致的土地掠夺。”[*Op. Cit.*, p. 58 and p. 59] 杰拉德·温斯坦利以及掘地派^①（和原始无政府主义者）所表达的，不过是当时广泛流传的民间愤怒。他控诉道：“在有公地的教区，富有的诺曼人地主，或者那些（更贪婪的）新兴贵族，用羊群和牛群过度占据公地，以至于贫困的佃农和劳动者只能勉强养一头几乎是半饥半饱的奶牛。”[引自莫里斯·多布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第173页] 于是，工人阶级被“置之不理”，只能在饥饿中挣扎。

如F.8节所讨论的，圈地运动，是国家强行将资本主义强加于社会的一个方面。当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往往以圈地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来为其辩护（实际上是重复了洛克早先提出的、但存在缺陷的论点——见B.3.4节）。对此，有三点反驳意见。首先，不能假设只有通过圈地才能实现生产力提高，公地制度，同样可以通过共同体成员采用改进的技术和方法来提高产量，而这些技术和方法正是圈地后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其次，这种论点忽视了自由这一核心问题，而用财产权替代了它（即财富增长被认为比工人阶级的自由更重要）。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这种为国家强制干预辩护的“父权式”理由，与这些辩护者今天反对（某些形式的）国家干预的立场并不相符（例如税收或支持工人的土地改革）。如果“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论点核心）可以用于农村工人阶级身上，那么他们就没有多少立场，去反对民主制度下对富裕精英的征税，或者反对一场旨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土地改革，乃至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

总的来说，“公地悲剧”这一论点在理论上就存在根本缺陷，在经验上也是错误的（这并不奇怪，毕竟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从未提供任何实证证据）。然而，

^① 掘地派（Diggers），也译作挖掘派，英国内战时期的新教激进群体，主要由贫民组成。他们主张农场应该共同拥有并且一起耕作、土地耕种上的共有，建立社会平等、政治平等的小农村社区

这并未阻止哈丁及其追随者，基于对历史和人类本性的可疑理解来提议政策。或许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哈丁的假设（也即他结论的基础）并不是基于真实的人类社会或历史事实，而是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构造。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以及由市场强加的短期主义逻辑下，人们确实可能为了利润而牺牲自身社区的长期生存利益。然而，从人类历史的整体来看，这种短视的逻辑却是相对较新的现象。

事实上，共有制能够激励人们去保护资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后代将需要这些资源，因此会倾向于加以维护。由于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他们能够抵御短期主义的压力，从而避免只关注眼前的生产最大化而不顾未来。而资本主义所有者的激励机制正好相反——正如 E.3 节所论述的，除非他们最大化短期利润，否则他们自身的生存便无法持续（因此，如果砍伐森林能带来更高的短期利润，那么千年的原始森林也会被伐尽）。因此，通过将共有制与去中心化的联邦制公社自治结合起来，无政府主义不仅能够有效管理资源，还能避免私有化与国有化所带来的弊端。

1.6.1 怎么去使用“由世界上所有人拥有的”财产？

首先，我们需要指出这一反对意见背后的常见谬误。它假定了因为某样东西归所有人所有，那么在使用它时必须征求所有人的意见。然而，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将私有财产的原则套用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诚然，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集体“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使用它。共产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卡洛·卡菲耶罗（Carlo Cafiero）对此做出了显而易见的说明：

“共同财富分布于整个地球，虽然它在权利上属于全人类，但只有那些身处这一财富可及范围内并有条件使用它的人，才将会共同利用它。身处一个区域的民众将使用该区域的土地、机器、工厂、房屋等，并共同分享它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直接地、事实上地，行使着自己对一部分人类财富的权利。而如果一位北京的居民来到这个地区，他[或她]将与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与他人共同享用这个地区的一切财富，正如他[或她]在北京时所享有的一样。” [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250]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那些实际使用一部分社会财富的人，对其用途拥有最大发言权（例如，工人控制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并决定在使用这些资料进行劳动时所从事的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者可以随意支配它。如果他们滥用自己的地位，他们将受到当地社区的监督和罢免（例如，如果某个工作场所造成环境污染，当地社区有权采取行动加以制止，甚至在必要时关闭该工作场所）。因此，在自由社会中，“使用权” (use right)，或称“用益权” (usufruct)——取代了“财产权” (property)，并与“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理念紧密结合。

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通常也没有私有财产，这并非巧合。正如默里·布克钦

（Murray Bookchin）所指出的：“个人对物品的占有，对工具、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个人主张……在自然的[即，原始的]社会中相当普遍……与此同时，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合作劳动和资源共享，并达到可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程度，也是非常普遍的……但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关系之上，最根本的仍然是‘用益权’的实践。”这样的无国家社会是基于“用益权原则的，即社区中的个人仅凭借使用资源的事实就能占有这些资源……只要资源仍被使用，它们就归使用者所有。功能，在本质上取代了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概念。”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116] 无政府主义者所期待的未来无国家社会，也将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

批评社会无政府主义的人实际上混淆了财产（property）与占有（possession），并认为废除财产就等同于自动废除了占有权和使用权。然而，正如在 [B.3 节](#) 中所论述的，财产与占有是截然不同的。夏洛特·威尔逊（Charlotte Wilson）对此作出如下阐述：

“财产权意味着一位个体或一个个体联盟对事物的支配权；它并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对事物使用权的主张——后者是用益权，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财产权意味着对财富的垄断，意味着即便‘所有者’自己不需要某物，也有权阻止他人使用它。而用益权意味着个人对其所需财富的使用权。如果某个人将一部分（他自己既不使用、也无实际需要的）财富从同胞手中剥夺出来，那么他便是在剥削整个社区。” [Anarchist Essays, p. 40]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拥有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决定如何使用共有资源，这一方式基于占有与用益权。关键在于，正如 [1.3.3 节](#) 所讨论的，社会化意味着自由获取：资源的使用者不必服从等级化的社会关系才能使用资源。社会化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比如说，随意闯入某个工作场所，直接拿走一台机器或电脑。相反，它意味着当一个人加入某个工作场所时，他是在共享一项公共资源；并且是以自由和平等的合作者身份，而不是作为服从命令的雇佣奴隶。如果某项资源未被使用，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它；而如果该资源正在被使用，那么它将由使用者进行管理，并通过商定的方式分配使用权，以确保关系和结果的平等性与自由。

至于如何决定共有土地的具体用途，则由与其毗邻的地方社区来决定。例如，如果一个自主管理的工厂希望扩建并占用公共土地，那么该地区的社区（即使用并因此控制这一公共土地的居民）将对此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如果少数人强烈反对，他们可以采取直接行动表达立场。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平等者之间进行理性讨论，通常不会导致过多的冲突。或者，假设某人想在一片尚未被规划为公园的土地上开辟一块菜地，那么他或她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如公告栏或报纸）向社区大会通报，如果在下一次大会或规定的时间内无人提出异议，那么便可继续开垦菜地，因为没有其他人主张使用该资源。

其他社区将与该社区结成邦联，并通过讨论决定共同活动的方式，同时任何社区（如同个人一样）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某项联合行动。对于那些破坏生态环境或个人自由的行为，其他社区可以并且应当提出反对。生态系统与自由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自由的个人，不太可能坐视某些成员破坏他

们的星球而无动于衷。

因此，那些使用某一资源的人便掌控该资源。这意味着将会建立“使用者团体”，以管理由多人共同使用的资源。在工作场所，这些团体主要由该处的工人组成（或可能包括消费者团体与合作社的意见）。由租户组成的住房协会将负责住房管理和维修。社会中的各类协会所使用的资源，如共有学校、工坊、计算机网络等，其日常管理将由使用者负责。使用者团体将决定资源的使用规则（例如时间安排、预订规则）、使用方式，并负责维修与改进。这些团体需要向其所在的地方社区负责。因此，如果社区认为某个团体的活动正在破坏共有资源或限制他人的使用权，该问题将被提交至相关的社区大会进行讨论。通过这种方式，相关各方管理自己的事务和所使用的资源（因此他们极有可能关注资源的合理和有效利用），但不会产生私人财产及其所带来的等级制度和对自由的限制。

最后，我们来探讨使用权冲突的问题，即当两个或多个的个体、公社或工团希望使用同一资源时，该如何解决。通常，这类问题可以通过相关方的讨论与决策加以解决。一般而言，如果争议各方都是理性的，他们可能会共同同意让某位值得信赖的朋友进行仲裁，或将争议交由一个随机从社区成员中选出的陪审团裁决。这仅在双方无法达成资源共享协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类争议最好不要借助权威的干预或恢复私有制来解决。如果相关方不遵循上述理性的方式，而是决定设立一个权威机构，那么灾难将不可避免。首先，这一权威机构必须被赋予强制执行裁决的权力。一旦如此，新权威机构必然会争将资源中最好的部分据为己有（当然是作为“提供裁决服务”的报酬！）。如果私有制被重新引入，这种专断的机构很快就会发展起来，并产生两类新的压迫阶级——财产所有者与“司法”执行者。归根结底，设想两方平等相对而发生争执时，他们自己无法在理性与公正的基础上自行解决，而一个凭借暴力维持权力的第三方却能够真正代表正义，这样的想法本身就很荒谬。常识应当警示我们不要陷入这种幻想；而如果常识不足，历史也早已证明，依靠权威或财产来解决争端绝非明智之举！

此外，我们也应指出，列宁主义者所宣称的“只有中央集权才能确保共同获取和共同使用”同样是一种谬误。中央集权将控制权从使用者手中剥夺，并交给一个自称代表“社会”的机构，这种做法不仅不能防止小范围工人集团滥用权力，反而会让整个社会沦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官僚阶层的统治对象。既然一个公社或工团的成员，都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滥用地位和限制他人的使用；那么一个组建起一个中央集权机构和官僚系统的个体，也可能如此（无论该机构是否在理论上，是通过选举对社会负责的）。事实上，正如列宁主义的实践所清楚表明的，后者滥用职权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前者。因此，去中心化才是实现共同所有与自由获取的关键，而非中央集权。

共有制需要公社式的结构才能正常运作。在自由社会中，使用权和平等者之间的讨论取代了财产权。如果自由被囚禁在由公共或私人国家强制执行的法律之中，它便无法存续。

I.6.2 共有制难道不会限制个人自由吗？

这个观点被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位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约翰·亨利·麦凯提出了如下质问：

“在你们所称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你们[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会阻止个人通过他们自己的交换媒介，在彼此之间交换劳动吗？进一步，你会阻止他们占用土地用于个人使用吗？’……[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他回答‘是！’，那就意味着他承认社会对个人拥有控制权，并且抛弃了他一直以来热切捍卫的个人自主权；但如果他回答‘否！’，那就意味着他承认了他刚刚还在极力否定的私有财产权。” [Patterns of Anarchy, p. 31]

然而，无政府主义理论对此有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回答。要理解这一点，只需记住，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使用权取代了所有权。换句话说，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交换劳动，并占用土地以供自己使用。这与废除私有制并不矛盾，因为“占用与使用”原则与私有制直接对立（参见 [B.3 节](#)）。社会化正是建立在“占用与使用”这一概念之上的，这意味着在自由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可以占用和使用他们所需的土地、工具和设备——他们并不一定非得加入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参见 [I.5.7 节](#)）。然而，如果他们选择不加入，他们就无法要求享受他人通过合作和共同生活所获得的好处。

这一点可以从夏洛特·威尔逊在麦凯提出他的“无可回避的”问题的几年之前，所写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中看出。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无政府主义是否……不承认……任何个人财产？”她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取用自己所需之物”，因此“不难想象，个人必然会占有有一些必需品和便利物品”以供自己消费和使用。因为“当财产不再受法律保障、不再有武装力量支持、也无法雇佣私人劳务时，它要想以危及社会的规模复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人所占有的物品数量……必须取决于他的[或她的]良知，以及其邻居们的道德观念和切身利益所施加的压力。”这种“用益权”制度同样适用于“生产工具——包括土地”，并“向所有工人或工人团体开放”，因为“只要土地和资本未被私占，工人们就是自由的；而一旦它们有了主人，工人们就成了奴隶。” [Anarchist Essays, p. 24 and p. 21] 这是因为，与所有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共产无政府主义也是建立在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区分之上的。

换言之，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占有取代了私有财产。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那些决定加入自由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也适用于那些希望置身其外的人。从自由共产主义的众多主要理论家的著作（参见 [G.2.1 节](#)）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都不认为占用土地（或房屋、生产资料）用于个人使用，意味着“私有财产权”。例如，在关于土地的问题上，克鲁泡特金和蒲鲁东的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写道：“那么，谁能占有哪怕是最小的一块土地……而不犯下公然的不公正之罪呢？” [《面包与自由》，p. 90] 后者则直接指出：“土地不可被占为己有。”而他们都没有否认

个人可以使用土地或其他资源，而只是强调这些资源不能变成私有财产。因此，蒲鲁东写道：“每一个占用者，必然是一个持有者或使用受益人——而这一身份排除了所有权。”[《什么是财产？》，p. 103 和 p. 98] 显然，约翰·亨利·麦凯并不像克鲁泡特金那样读过蒲鲁东的作品！正如威尔逊所论述的：

“蒲鲁东那句著名的格言——‘财产即盗窃’——正是另一个同样著名的论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关键。当工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占有铁路、船舶、矿山、田野、农场建筑、工厂、原材料和机械，以及他们劳动所需的一切，并不是为了个人私有，而是为了自由地使用这些由社会劳动创造或曾经利用过的资源，以造福整个社会时；当他们意识到，作为对自己劳动的回报，他们有正当的权利从最终产品中取走自己所需之物时——他们便理解了这一点。”[同上，p. 20-21]

这一点也可以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对蒲鲁东的评价中看出。莫里斯将这位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归为“社会党思想家中的最杰出人物”，并认为他是“一座连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派的桥梁”。在批判财产制度方面，莫里斯认为，在《什么是财产权？》一书中，蒲鲁东的立场“纯粹而直接地属于共产主义。”[《政治著作》，p. 569 和 p. 570]

因此，我们并不意外地发现，克鲁泡特金也主张：“一切物品都属于全体人民，只要人们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劳动来生产必要的物品，他们就有权分享整个社会所生产的一切。”他进一步指出：“自由共产主义……将共同收获或制造的产品提供给所有人，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家中自由地消费这些产品。”[《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演化中的地位》，p. 6 和 p. 7] 这显然暗示了一种“占用与使用”的模式（即实际使用某项资源的人对其拥有控制权）。

这种对占有的支持，当然并不意味着像麦凯所认为的那样与共产主义相矛盾。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让社会的财富由整个社会支配，以便按照社会成员的需求使用 and 消费。因此，个人在取用和使用社会生产的物品时，**并不会**受到阻碍，而这显然也意味着“排除”他人使用和消费相同的物品。但这绝不意味着任何有意义上的私有财产的复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在许多人类社会都是相当普遍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许多语言甚至没有表达单方面所有权的动词。”[大卫·格雷伯，《可能性》，p. 23]

例如，一群朋友去野餐，分享他们各自带来的食物。如果有人从这份共有的食物中拿了一个苹果吃掉，那么显然这个苹果就不再供他人食用。然而，这并不改变此次野餐所基于的食品共有的本质。同样地，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仍然会拥有自己的住宅，并且当然有权限制只有被邀请的人才能进入。人们不会从街上随便闯入住宅，并以某种站不住脚的理由就住进主卧——比如原住户正在客厅看电视、正在度假或拜访朋友。

因此，共产主义的基础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个体会“占用”（使用）社会的产出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前提是有人愿意生产它）。然而，共产主义的核心在于，它剥夺了个体将占有物转化为私人财产的能力，从而阻止他们通过雇佣

劳动或地主制来使他人屈从于自己的意志。

换言之，占有物（个人的“财物”）不会转化为社会性的财产。因此，共产主义者支持那些不加入公社的人，只要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或使用自己的工具，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由于这是基于占有，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共产主义原则及其对私有财产的废除。这是因为这些人正在使用相关资源，因此他们行使的权利与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其他成员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在自由共产主义体制下，那些非其成员的情况也很明确——他们同样可以使用他们占有并使用的资源，如土地、住房和生产资料。区别在于，这些非共产主义者需要与社会其他成员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商品，而不是直接从公社储备中获取所需物品。

重申一点，非共产主义者所使用的资源不会变成私人财产，因为这些资源正在被使用，而一旦它们不再被占用和使用，就会重新归于共有。换句话说，占有物取代了财产。因此，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同意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贝弗利·鲁宾逊的观点，他写道：

“土地所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有权，即‘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是土地的绝对主宰，可以随意使用土地，或任其闲置，完全取决于其个人意愿；另一种是占有权，即土地使用者对其所使用和占据的土地拥有稳定的使用权，但一旦他停止使用，就对该土地不再拥有任何权利。为了对其农作物、建筑物或其他产物享有稳定的占有权，他只需对其所使用的土地拥有占有权即可。” [Patterns of Anarchy, p. 273]

我们必须指出，这一制度曾在西班牙革命期间的农村公社中被采纳，当时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加入集体，只耕种和使用他们凭借自己劳动能够“占有并使用”的土地和工具。同样，在公社内部的个体则实行共同劳动，并根据需要从公共仓储中取用所需之物（参见 [1.8 节](#)）。

麦凯的评论提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鉴于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当前的土地私有制，他们的制度意味着“社会对个人拥有控制权。”如果我们考察塔克等人所推崇的“占有与使用”土地制度，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基于对土地财产权的限制（因此也限制了土地所有者）。正如在 G.1.2 节所讨论的，塔克等人期望有一天，公共舆论（即社会）会限制个人能够获取的土地数量，因此，从麦凯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是在控制个人的行为，侵犯他们的自主权。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个人主义要求，在关于占有物（或“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的规则上，社会整体需要对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这一点。

麦凯接着指出：“每一个严肃的人都必须表明立场：要么支持社会主义，从而支持暴力并反对自由；要么支持无政府主义，从而支持自由并反对暴力。” [Op. Cit., p. 32] 这一论述颇为奇怪，因为正如 G.1 节所指出的，像本杰明·塔克这样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并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尽管令人困惑的是，其中许多人仍然将他们的占有制度称为“财产权”）。

然而，麦凯的言论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私有财产是否支持自由？他既没有探讨，也没有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私有财产必然会导致财产所有者，对使用但并不拥有财产的个人施加控制，从而剥夺他们的自由（见 [B.4 节](#)）。正如蒲鲁东所论述的：

“买主划定界限，用栅栏把自己围起来，说：‘这是我的；各人归各人，各人为自己。’于是，这片土地从此成为一个领地，除了地主及其亲朋好友，任何人都无权踏足；它只能使地主及其仆役受益。随着这样的情况不断扩大，很快人们……将无处安歇，无处栖身，无地可耕。他们将在地主的门前，在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边缘饿死。而地主在看着他们死去的同时，会高喊：‘游手好闲者与流浪者就该如此灭亡！’” [Op. Cit., p. 118]

当然，正如蒲鲁东所指出的，非财产所有者可以通过成为仆役来进入财产之中，即通过向所有者出售自己的自由、接受其权威。因此，他认为“财产的第二个后果是独裁。” [Op. Cit., p. 259] 正如 G.4.1 节所讨论的，这暴露了任何形式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中一个巨大的矛盾，即它在捍卫超越占有、并衍生出雇佣劳动的私有财产制度。这是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财产所有者，**都**在特定区域内对所有事物拥有独占的权威。正因如此，埃米尔·普杰呼应蒲鲁东的观点，指出：

“财产与权威只是同一‘原则’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本质都是人类奴役制度的强制性确立和神圣化。因此，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仅在于视角的不同：从一个角度来看，奴役表现为**财产犯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则体现为**权威犯罪**。” [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66]

因此，当某人占有的资源超出其个人或合作群体能够使用的范围时，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他们试图限制他人使用他们未加利用的资源，那么他人完全有权无视这位潜在垄断者的妄想。缺乏国家来强制执行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时，任何重建私有财产的尝试都将以邻里们的嘲笑而告终；因为这些自由的人们会通过无视潜在资本家的企图，来捍卫自己的自由，从而拒绝让其垄断生存资料，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己利。毫不奇怪，麦凯完全没有讨论这样一个事实：私有财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暴力（即国家）来保护它，使之免遭那些实际使用或可能使用它、但却不拥有它的人们的挑战。

因此，麦凯忽视了私有财产的两个关键问题。首先，私有财产本质上依赖于暴力，以确保所有者能够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利——这正是国家存在的主要原因。其次，他忽略了“财产”在创造雇佣劳动时所展现的反自由意志主义的本质——雇佣劳动正是“私有财产”的另一面：在这种关系下，劳动者的自由显然受到限制，因为他们必须服从那些拥有他们所使用生产资料的雇主。与此相对，在自由共产主义社会中，公社成员在自我管理的社群内享有平等的权利、权力和话语权。而在“私有财产”制度下，财产所有者统治着使用其财产的人。如果所有者和使用者是同一人，那么问题就并不存在（即，占有替代了财产）；但一旦占有被转化为了财产，如蒲鲁东所指出的，专制就随之而生。正如夏洛特·威尔逊所言：

“财产——不仅是使用权的主张，而是禁止他人使用的权利——使那些已经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能够奴役那些一无所有……并且必须通过劳动来生存的人。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土地、材料和工具或机械；因此，这些物品的主人，也就是一贫如洗的工人的主人——他们可以靠着工人的劳动无所事事地生存……我们所寻求的财富社会化，并不是依赖权威对财产施加的限制，而是依靠人民自身的直接行动，消除那些保障财产免受社会正义要求的限制。因为权威和财产都是支配欲望的表现。” [Op. Cit., pp. 57-8]

因此，以“自由”之名，约翰·亨利·麦凯和一大批“个人主义者”最终支持的实际上是权威，并且（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私有财产并不是个人占有的基础，而恰恰是其对立面。所以，总的来说，共有财产不仅不会限制个人自由（或个人对资源的使用），反而是其唯一的保障。因此，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艾玛·戈尔德曼的观点，即“我们的目标是废除私有财产、国家……我们旨在让人类摆脱暴君与政府的桎梏。”[《美国岁月：文献史》，第1卷，第181页]

I.7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不会毁灭个性吗？

不会。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只会抑制那些，肤浅到无法将自我认同与自身所有物区分开来的人的个性。然而，尽管如此，这是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至关重要的一个质疑；并且，考虑到“社会主义”俄国的例子，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这一问题背后的基本假设是，“资本主义会促进个性”，但这一假设在多个层面上都站不住脚。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个体自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依然]更多是幻象，而非现实”，而且“人格发展的缺失（导致群体心理）以及个体创造力与主动性的匮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缺陷之一。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并未兑现其承诺：它并未带来任何显著的个性发展。” [Ethics, p. 27 and p. 28]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已将个性压缩为一种其可能、且应有的形态的，拙劣模仿（见 [I.7.4 节](#)）。难怪艾玛·戈尔德曼会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被时常重复的口号是……我们的时代属于个人主义……只有那些不愿深入探究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观点。难道不是少数人积累了世界的财富吗？难道他们不是局势的绝对主宰和统治者吗？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源于个人主义，而是由于大众的懒惰、怯懦以及彻底的屈服。后者只想被支配、被引导、被强迫。而至于个人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它从未有如此之少的表达机会，也从未有如此之少的正常、健康发展的可能。”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pp. 70-1]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表面上建立在“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上的体系，实际上却使其成员成为标准化的个体，几乎无法真正表达自身的个性。资本主义不仅未能增强个性，反而使其模式化，从而加以限制——一个性能够存续，更多体现的是人性的韧性，而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一个基于等级制度、旨在确保服从与臣服的社会中，个性的贫乏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背景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如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他指出：“至于个体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我不认为它可能会沿着个人主义的方向发展。个体——是的，毫无疑问；但个人主义者——我对此有所怀疑。因为那意味着：狭隘的利己主义——一种退化的演进，甚至这种演进也只会局限于特定群体。” [Kropotkin, quoted by Ruth Kinna, "Kropotkin's theory of Mutual Aid in Historical Context", pp. 259-283,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No. 40, p. 268]

那么，我们能否说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将促进个性，还是说人类的“个人主义”缺失和趋同是一个恒定现象？为了对此做出某种评估，我们必须考察非等级制的社会和组织。关于非等级制的社会，我们将在 [1.7.1 节](#) 探讨部落文化作为案例分析。在这里，我们将简要说明无政府主义组织如何维护并增强个体的自我意识。

无政府主义组织及其策略旨在促进个性的发展。这些组织是去中心化的、参与式的，因此，它们为成员提供了“社会空间”，使他们能够表达自我，并以资本主义所限制的方式发展自身能力和潜力。正如加斯东·勒瓦尔，在其关于西班牙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集体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在集体生活中，每个人的自由意味着有权自发地、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充分地贡献自己的思想、意志和主动性。消极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那只是一种虚无。”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346]

通过参与和管理直接影响自身的决策过程，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得以增强，从而不断发展自身的能力和个性。勒瓦尔所描述的发自性活动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正如埃里希·弗罗姆所言：“在所有自发的活动中，个体都在拥抱世界。他[原文如此]不仅不会丧失自己的个体性，反而会使其变得更加坚定和稳固。因为个体的越是积极行动、就越为强大。” [Escape from Freedom, p. 225]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组织中，个性不会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萎缩。相反，随着人们参与社会组织并在其中行动，个性会变得更加强大。换言之，个性的发展需要社会作为支撑。正如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曾指出的：“当每个人都只顾自身时，个性反而会受到损害……绝对孤立的个体始终只是一个幻象。那些最受推崇的个人品质，如独立性、自由意志、同情心以及正义感，既是社会美德、也是个人美德。一个完全发展的个体，正是一个完全发展的社会的体现。” [The Eclipse of Reason, p. 135]

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个体，既是健康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个人自我实现和欲望满足的结果。事实上，社会往往能够丰富并促进个性的成长，这一趋势贯穿人类历史。这表明，资本主义的抽象个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更像是一个例外，而非一种常态。换言之，历史表明，与他人平等合作，比起资本主义所标榜的“个人主义”，更能有效地增强个性。因此，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言，我们需要“阻

止对人类精神、人格、共同体以及人类对美好生活想象的破坏与简化。”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409]

群体对个性的支持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个性正是社会力量与个人特质互动的产物。一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越少，其个性就越可能受到损害。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得到印证，当时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在英国和美国上台。市场力量的扩张导致了社会原子化、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国家的进一步集中化。随着这种趋势席卷社会，社会生活的破裂导致许多个体在伦理和文化上陷入贫困，社会也变得日益私人化。二十年后，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抱怨英国社会破裂，然而，他却巧妙地避而不谈正是造成这一局面根源的——其前任撒切尔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或者说，许多我们认为属于个体发展的特征（例如思考的能力、行动的能力、坚持自身观点与标准的能力等），（本质上）都是社会性技能，并且是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社区中得以培育的。若剥夺这种社会背景，这些被珍视的个性特质便会因缺乏实践、对权威的恐惧、个体的原子化以及有限的社会交往，而受到削弱。以工作场所为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等级制的工作环境会让个体边缘化，使其无法自由表达意见，无法充分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也无法自主管理自身的活动。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工作场所，而是会波及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等级制度在所有形式上都会带来压迫，并扼杀个性（参见 [B.1 节](#)）。在这样的体制下，正如左翼古典自由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指出的，群体活动的“业务性”方面或许能被“适当地执行”，但这是以个体的牺牲为代价的。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密尔的观点，他将这种体制称为“仁慈的专制”，并质问：“在这样的制度下，会塑造出怎样的人？他们的思维能力或行动能力能获得何种发展？……他们的道德能力同样受到摧残。凡是人为地限制人的行动领域之处，他们的情感也会随之变得狭隘与萎缩。”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pp. 203-4] 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密尔不仅批判政治组织，还将这一批判延伸至所有形式的社群关系，并指出，如果“人类要继续进步”，最终将占据主导地位的社群形式“不会是资本家作为首领、而工人对管理哑然无声的关系；而是，工人们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共同拥有其生产所需的资本，并由他们自己选举和罢免管理者的联合体。”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147]

因此，无政府主义将通过创造各种机制，使所有个体能够参与影响他们自身的决策，从而保护和发展个性。无政府主义建立在这样一个核心原则之上：个体及其所处的制度不可孤立地看待。专制性的组织会塑造出顺从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在服从权威和迎合主流观念时最为安全；而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即建立在参与和自我管理基础上的组织，则会培育出独立而坚定的个性，使个体能够自主思考，并对自身的能力充满信心。

正因如此，巴枯宁主张，自由“并非源自孤立的状态，而是源自相互作用；自由不是排他的事实，相反，它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因为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正是其人性或人的权利在所有自由人、其兄弟、其平等者的意识中的反映。”自由“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极为复杂的、最重要的是高度社会化的事物，因为它只

能在社会中、在严格的平等与团结条件下实现。”等级权力必然会扼杀个体自由，因为“特权及一切特权地位的特点，便是摧毁人的思想与情感”，“权力与权威不仅会腐蚀那些行使它们的人，同样也会腐蚀那些被迫服从它们的人。”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66, p. 268, p. 269 and p. 249]

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重组，将以个体的自我赋权与自我解放为基础，并通过个体参与自我管理的组织，使其在实践中学习自由所带来的责任与喜悦。正如卡罗尔·佩特曼指出的，“参与能够培养并促进其所必需的品质；个体参与得越多，他们便越能够胜任这一过程。”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pp. 42-43] 这无疑意味着个体、社会关系以及组织的相互转变——正如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加西亚·奥利弗所言：“谁没有被革命所改变？如果只是为了维持现状，那就没有进行革命的价值。” [quoted by 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98]

这种社会重组（正如我们将在 J.2 节中所见的），是以直接行动的策略为基础的。这一策略通过鼓励个体以自身的行动来抗争不公，从而促进个性的成长。正如伏尔塔琳·克雷尔所言：

“凡是认为自己有权主张某种权利，并大胆地单独、或与志同道合者共同主张这一权利的人——都是直接的行动主义者……

“凡是曾有计划去做某事，并亲自去践行；或者将其计划呈现给他人，并赢得他们的合作，而不是请求外部权威代劳的人——都是直接的行动主义者。所有合作实验，本质上都是直接行动。

“凡是曾在生活中与他人产生分歧，并直接找到相关当事人解决问题的人……都是直接的行动主义者。例如罢工与抵制……

“这些行动……是那些在特定情境下感受到压迫的人所做出的、自发的回应。” [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p. 47-8]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建立在自我主张的基础上，而这必然促进个性的成长。只有当个体能够独立思考并自由行动时，自主实践才能真正发生。既然自我管理是建立在直接行动原则之上的（“所有合作实验，本质上都是直接行动”），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个性不会受到压制。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极为强调个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正如共产无政府主义者 J. 伯恩斯-吉布森所言：

“破坏个性就是在破坏社会。因为社会只有通过个体成员才能得以实现和存在。社会没有不源自个体成员的动机、没有不以个体为中心的目标、没有不属于个体的意识。‘时代精神’、‘公共舆论’、‘公共福祉’等类似的概念，若被视为悬浮于人群之上的独立存在，则毫无意义。它们所指的，实际上存在于个体之中，并源于个体。因此，个体性与社群性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人类生活的理解。” [quoted by William R. McKercher, Freedom and Authority, p. 31]

那么也就难怪，无政府主义“承认并重视个性，这意味着品格、行为及其动机，自由行动力、创造力、自发性和自主性。” [J. 伯恩斯-吉布森，转引自 McKercher, Op. Cit., p. 31f] 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无政府主义“寻求个性的最充分发展，同时伴随着自愿联合在所有方面的最高发展……不断变化，不断调整。” [Anarchism, p. 123]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真正的自由需要社会平等。因为“如果个体要在最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生活与环境，那么这些领域的权力结构，就必须以一种使他们能够参与决策的方式进行组织。” [Pateman, Op. Cit., p. 43]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个性将比在阶级分化、等级森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更好的保护、鼓励与发展。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证的：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个人发展与自由的最佳基础；这里的个性，不是指那种将人推向‘人人为己’的斗争状态的个人主义……而是指一个人才能的充分展现，人的独特性的高度发展，智慧、情感和意志的最大丰富。” [Op. Cit., p. 141]

正是因为奇迹般的事物能极大地丰富生活，而其中最奇妙的莫过于个性，无政府主义者才会以社会主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即自由个体的自由联合——之名，反对资本主义。

I.7.1 部落文化是否表明社群主义能够维护个性？

是的。在许多部落文化（或原住民文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个性的强烈尊重。人类学家保罗·拉丁（Paul Radin）指出，“无论年龄或性别如何，对个体的尊重”是“原住民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同时他们还实现了“令人惊叹的社会与政治整合”以及“个人安全感的概念。” [引自穆雷·布克钦所著的《重塑社会》，p. 48] 对此，布克钦评论道：

“拉丁首先列出的原住民的特质：对个体的尊重——在当今时代尤为值得强调。一方面，集体性被视为对个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在纯粹利己主义的狂欢中，个体自我的边界却被彻底摧毁，导致个体漂泊无依、孤立原子化。然而，仔细研究某些原住民社会可以发现，一个强大的集体可能比强调自私但贫瘠的‘自由市场’社会，更能支持个体的发展。” [同上, p. 48]

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也注意到了部落文化所展现出的个性化特征。他引用了历史学家加里·纳什（Gary Nash）对易洛魁（Iroquois）文化的描述（这一特征在大多数北美原住民部落中似乎都很常见）：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东北森林地区——没有法律和法令、治安官和警员、法官和陪审团，或法院和监狱——这些欧洲社会的权力机构都不存在。然而，社

会对可接受行为的界限却十分明确。虽然易洛魁人以自主个体为荣，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严格的是非观念。” [引自津恩所著的《美国人民史》，p. 21]

这种对个性的尊重，存在于一个基于社群主义原则的社会中。正如津恩所述，在易洛魁社会中，“土地是共有的，并由集体耕作。狩猎也是集体进行的，猎物在村民之间分配。房屋被视为共有财产，由多个家庭共享。土地和房屋的私有概念对易洛魁人而言是陌生的。”在这一公社社会中，女性“地位重要且受到尊重”，家庭为母系家族。权力在两性之间共享（不同于欧洲的男性支配观念）。此外，儿童“在学习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部落团结的同时，也被教育要独立，不要屈服于专断的权威。他们被教导要维护地位平等，并共享财产。”津恩强调，北美原住民部落“十分注重个性的培养，培养人的意志强度、独立性与灵活性、激情与力量，以及他们彼此之间、与自然之间的伙伴关系。” [同上, p. 20, pp. 21-22]

因此，部落社会表明，社区确实能够捍卫个体性，共同生活实际上会促进强烈的个体意识。这一现象实际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只有在平等的条件下，个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并有机会充分发展其个性。此外，这种共同生活是发生在无政府主义的环境中的：

“印第安政府的基本原则一直是对政府的拒绝。几乎所有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人都将之视为准则，那就是个人自由，远比他[或她]对其社区或国家的责任更为珍贵。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态度支配着所有行为，从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开始。印第安父母在本性上不愿意严格管教子女，他们对孩子任何展现自我意志的行为，都会视为个性成熟发展的积极迹象……” [Van Every, quoted by Zinn, Op. Cit., p. 136]

此外，北美原住民部落也表明，共同生活与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标准可以并存，甚至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切罗基（Cherokee）民族，“土地由集体持有，生活安定而富足”，而美国内政部也承认其社会是“一个进步的奇迹，人们在相当舒适的生活条件下成功地进行生产，其教育水平‘相当于各州普通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工业和商业繁荣，宪政政府有效运作，社会的识字率很高，文明与启蒙的程度堪比已知的任何社会。‘英国人在这方面花费了五百年才取得的成就，他们在一百年内就完成了，’该部门惊叹道。” [Noam Chomsky, Year 501, p. 231]

1883 年，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道斯（Henry Dawes）到访该地，并对自己所见之景赞不绝口：“在这个民族中，没有一个贫民，而且全民族没有任何债务。它自己建造了州议会大厦……它建造了自己的学校和医院。”没有一个家庭缺乏住房。然而，尽管如此（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因为如此），道斯却建议必须摧毁这一社会：“他们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达到的极限，因为他们的土地是共有的……这里没有驱使个人改善自己家园的动力。没有‘自私’，而‘自私’正是文明的根基。除非这个民族愿意放弃他们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公民，使每个人都可以独自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否则他们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quoted by Chomsky, Op. Cit., p. 231-2] 资本主义的引入——如同往常一样，是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的——最终导致了贫困与匮乏。这再一次表明，资本主义与高生活水平之

间的联系，并不如其支持者所声称的那样明确。

毫无疑问，能够自由获取生活所需的资源，使这些文化的成员无需将自己置于可能导致奴性人格结构的境地。由于他们无需服从雇主的命令，也就不必学会顺从他人，从而能够发展自身治理的能力。而这种自我管理，促成了一种在这些部落中被称为“非干涉原则”的习俗。在人类学中，该原则指的是捍卫某人表达对立观点的权利，并且是在部落世界中一条普遍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普世性。

非干涉原则是一条强有力的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个人层面，也延伸至政治领域，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的是，部落社会“尊重儿童的人格，就像他们尊重社区中成年人的人格一样。” [Bookchin,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115]）。如今，大多数人早已习惯于无处不在的等级制度，因此当他们意识到这一原则（已经）被践行的程度时，往往会感到震惊。然而，该原则已经被证明是无政府状态下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人们根本不会限制他人的行为（除非这种行为威胁到部落的生存）。实际上，这使得绝对的宽容成为了一种习俗（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区别值得去强调：法律是僵化的，而习俗是活的——参见 [1.7.3 节](#)）。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些社会理想化，因为它们在许多方面仍是不完美的无政府社会（最明显的一点是，其中许多社会最终演变为等级体制，表明非正式的等级关系确实存在，而这些关系无疑是宗教及其他因素的产物）。

作为习惯于服从权威的人，我们携带着大量关于“干涉”他人生活的观念，以至于对许多人来说，设想一个不再进行这种日常干涉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不妨认真思考这一点。首先，在一个人们不干涉彼此行为的社会里，这一简单的社会现实会让个体感受到信任和自主。他们的自尊心因此提高，因为他们被信赖，能够承担责任，并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这并非是虚构小说；个人责任恰恰是社会责任的核心要素之一。

因此，鉴于在那些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国家、几乎没有其他等级结构的部落社会中，个性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无政府主义不仅能够捍卫个性，甚至还能在资本主义所无法企及的层面上发展它？至少，我们可以说，“有可能”；而这，已经足以促使我们质疑“资本主义是唯一尊重个体的制度”这一信条。

1.7.2 无政府主义者崇拜过去或“高尚的野蛮人”吗？

不。然而，支持资本主义的人经常用这个指控攻击社会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则用它来攻击无政府主义者。两者都声称无政府主义是“后瞻的”，反对“进步”，并希望建立一个基于不适当自由观念的社会。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资本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建立在“高尚的野蛮人”这一理想之上（例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权威人物，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其著作《致

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就持这种观点）。

无政府主义者深知，他们在历史或社会中用作无政府主义趋势示例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局限性。他们同样清楚，以任何历史时期作为“无政府主义实践”示范的相关问题。例如，中世纪欧洲的“自由城市”曾被克鲁泡特金用来说明去中心化的邦联公社的潜力。因此，他有时因此被指责为“中世纪主义者”（威廉·莫里斯也曾受到类似指责）。然而他所做的，只是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于进步，并且曾经存在过鼓励自由的其他社会制度，而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却起到了限制作用。

类似地，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指责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并称他怀念前工业化时代的手工艺人和农民社会。当然，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蒲鲁东生活在一个以农民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前工业化法国，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基于当时劳动人民的现实需求。当他讨论大规模生产（如铁路、工厂等）时，他提出应由合作社协会来管理这些生产单位。这些协会将通过让工人掌控自身的劳动和产品，维持工人尊严，而这正是手工业者和农民生活的核心特征。因此，他利用“过去”（手工业生产）来分析当时正在发生的进程（工业化），并提出了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仅继承了过去被资本主义压制的自由（即生产中的工人自我管理），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自由。相较于向后回顾或者崇拜消逝的过去，蒲鲁东实际上是分析了过去以及现在，并尽可能地取两者所长，将他们应用于当下和未来。相比之下，马克思认为工业化（即无产阶级化）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而蒲鲁东则希望能在他活的时候，就见证工人阶级实现正义与自由，而不是等到资本主义完全发展后，才在某个未确定的未来实现。

许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无视对部落文化的研究所能获得的洞见，以及这些文化对资本主义与自由所提出的问题，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相反，他们回避这些问题，并指责社会主义者理想化“高尚的野蛮人”。然而，正如所指出的，这种指责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这种指控曾被针对卢梭（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高尚的野蛮人”理想化的奠基者），尽管他曾明确反问道：“难道社会必须被彻底废除？难道必须消灭‘我的’和‘你的’，然后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森林，与熊为伍？这完全是我的对手的推论，我宁愿预先揭露它，也不愿让他们以此自取其辱。”同样，卢梭常被认为是在理想化“自然人”，但实际上他写道：“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由于彼此之间没有道德关系或确定的义务，既不能算作善良，也不能算作邪恶；既不具备美德，也不具有恶行。”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p. 112 and p. 64] 然而，卢梭没有意识到，他的对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似乎毫无羞耻之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声称，他主张的观点与他真实的写作内容完全相反。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遭受这种对待（尤其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尤其是在我们回顾历史、从中汲取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潮时，往往会被指责为倒退的空想主义者。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指出，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关的原子化个体并非“自然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实际上削弱了个体性。针对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对过去社会的分析所进行的各种攻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者试图否认历史、并声称在资本主义中“进步”达到了其最终的形态。正如戴维·沃森所论

述的：

“当我们观察生活在地球上一些最恶劣、最严苛环境中的人们，却发现他们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时，我们就应该能够理解当代对文明优越性的质疑，而不是因此而愤怒。原始主义，不仅展现了国家兴起之前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对文明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合理回应……大多数人并非生活在原住民社会中，而大多数部落社会本身如今也正面临全新的处境，如果他们希望作为一个群体生存下去，就必须以新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历史提醒我们，存在着其他可能的生存方式。重新肯定我们原始过去，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自身历史的视角——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视角，但它是一个重要且合理的切入点，使我们能理性地探讨（并充满激情地回应）这个我们必须告别的世界。”

[Beyond Bookchin, p. 240]

对历史和现代社会进行深入研究，以探寻其他存在过或仍然存在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很容易忘记，在现代资本主义下存在的事物并非亘古不变（正如新古典经济学所展现的原子化、且去历史化的分析方式一样）。同时，也有必要记住，许多今天被人们视为“正常”的事物，过去并非如此。例如，正如我们在 F.8.6 节所讨论的，第一代工业雇佣奴隶曾痛恨这个制度，认为它既是残暴的，又是反自然的。研究历史、过去的文化、等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被压迫者对其的抵抗，不仅能丰富我们当前的分析与实践，也能帮助我们设想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预测它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探寻可能的解决方案。

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在于摧毁权力关系和支配体系，那么追根溯源就显得尤为重要。等级制度、奴役、强制、父权制等现象远远早于资本主义，所以仅仅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资本主义只是等级制文明当前最隐秘、最阴险的表现形式。同样，如果不去研究那些，在国家、等级制度和阶级出现之前就运作良好的文化和社区，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很难向人们证明，无政府状态是可取的或可能实现的。因此，历史分析、以及对部落社会和其他社会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同样至关重要。

此外，正如乔治·奥威尔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拒绝这种批判性分析、并指责其是在崇拜“高尚的野蛮人”的攻击，完全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首先，他[现代生活的辩护者]会告诉你，‘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然后他会指责你是中世纪主义者，并开始长篇大论地讲述中世纪的恐怖……事实上，大多数为现代性辩护的人对中世纪乃至整个过去的攻击，都偏离了核心问题，因为他们的基本伎俩是将一个现代人——带着他的神经质和高生活标准——投射到一个根本不具备这些观念的时代。但请注意，即便如此，这仍然不是一个答案。因为对机械化未来的厌恶，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任何时期怀有最微小的敬意……当人们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目标时，并不需要假装它曾真实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 [The Road to Wigan Pier, p. 183]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类对无政府主义者研究过去文化的攻击，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即这些文化完全没有任何优点，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极端的“全有或

全无”的现代观。这种观点拒绝承认过去（以及当代）文明，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而在其他方面是错误的，拒绝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而是采取了一种彻底不加批判的“要么接受，要么滚开”的态度。当然，众所周知，那些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人，极力推崇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生活和价值观（特别是考虑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或镀金时代的美国那种残酷的现实），但他们却从未因此被指责为“崇拜过去”。

因此，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指责他们支持“高尚的野蛮人”这一理想，实际上更多地揭示了这些反对者自身的问题，以及他们对审视自己所支持体系之现实影响的恐惧，而非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真正批判。

I.7.3 需要法律来保护个人的权利吗？

不，完全不需要。虽然显然地，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如果没有某些被普遍认可的道德原则，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习惯于欺骗同类；如果我们无法信守彼此的承诺与言辞；如果每个人都将同伴视为敌人，并认为一切战争手段皆正当——那么社会将无法存续。” [Anarchism, p. 73]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制度（伴随着官僚体系、既得利益和非人道性）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佳方式。

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替代方案并非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或基于宗教或“自然”法则的法律体系），而是“习俗” (custom)——即社会在特定时期内所认同的“经验法则”。然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一套公认的原则来决定公正的结果，那么这与法律又有何区别？

区别在于，“习俗的秩序”将取代“法律的统治”。习俗，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体系，并且得到社会成员的支持，而法律，则是一种成文的（可称之为“僵死的”）制度体系，它将社会控制与道德力量相分离。正如观察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所能证明的，这种分离使得所有人都感到疏离。在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人际冲突中，可以预期（但非必然出现）一个公正的结果，因为人们会相信自己能够自行解决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有当人们在一个道德与社会控制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矛盾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时——他们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义。然而，最核心的要素是社会对个体的信任，相信他们能够自主创造解决人际冲突的可行方案。这与当前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家通过强加一系列固定的社会结构，使人们无法培养自身独特的解决方式，从而将个体幼稚化。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习俗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曾经被认为是“正常”或“自然”的事物，可能会逐渐被视为压迫性的和可憎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善与恶的观念会随着智慧或知识的增长而变化。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 [Kropotkin, Op. Cit., p. 92] 只有摆脱过去的沉重束缚，社会的伦理基础才能随社会个体的成长而不断发展和进步。（关于无政府主义伦理的讨论，参

见 [A.2.19 节](#)。)

我们还想指出，法律（或“律法”）同样限制了个体伦理或道德感的成长。这是因为法律使个体不再需要对自身行为的是非做出判断，他们只需知道某种行为是否合法，而其道德性则变得无关紧要。这种伦理的“国有化”对资本家、统治者或其他剥削者而言，都极为便利。此外，资本主义也限制了个体伦理的发展，因为它创造了一种环境，使伦理道德可以被收买。正如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中所写：

“第二个凶手：我的良知仍有些许残存。

第一个凶手：等任务完成后，想想我们的报酬。

第二个凶手：呸！他死了，我差点忘了报酬。

第一个凶手：那现在你的良知在哪里？

第二个凶手：哦，在格洛斯特公爵的钱袋里。”

因此，所谓“律法”在捍卫个人权利的同时，实际上也创造了破坏个体伦理行为的条件（比如伦理的非人格化、财富的集中等），从而削弱了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正如英国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所言：“我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如下概括，即：法律上的所有权本质上是一种消极且反社会的东西，除非它受到人际关系的制约或纠正，否则几乎可以肯定它是**有害的**。事实上，当一个人最主要的辩护理由是‘法律允许’时，那你几乎可以肯定他正在进行某种不正当的勾当！”国家强迫个体进入与统治机构的关系之中。这意味着，正如无政府主义者 J. B. 史密斯（J. B. Smith）所言，这实际上是在“剥夺个体对自身生活及周围环境的直接兴趣……削弱他[或她]的道德感……教导他[或她]绝不能依靠自己……[而]必须依赖于那群被选出来掌控一切的少数人……[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他[或她]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引自 William R. McKercher, 《自由与权威》，第 48 页及第 67 页]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个人权利，只有在一个建立在自尊和同情基础上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习俗源自无数个体行动和思想的积累，反映（而且促进）了个人伦理标准的发展，从而也强化了一般性的相互尊重。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下，所有规则和法律都仅仅是陪审团裁决的参考建议，陪审团不仅要判断事实，还要评估法律本身的公正性、其适用于特定情境的合理性，以及其违反应当承担的惩罚或赔偿……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下，法律的灵活性将使其能适应每一种紧急情况与需求，而无需修改。法律的**公正性**将取决于其灵活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取决于其僵化程度。”[本杰明·塔克, 《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第 160-161 页] 塔克和其他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英国普通法^①传统中，陪

^① 普通法（Common Law，又称英美法系），起源于中世纪英格兰。其特点是判例法，即在审判过程中反复参考并遵循判决先例，最终，产生类似道德观念一般的普遍的、约定俗成的法律，因此又成为“非成文法”。

审团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后来逐步被国家架空。基于普通法或习俗的陪审团制度，可能成为自由社会中实现正义的手段。

对个体的宽容程度，更多地取决于该社会的整体态度，而不是其法律体系。换句话说，即使法律尊重个人权利，但如果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不认可某一行为，他们仍然可以并且会去采取行动加以阻止（或限制个人权利）。法律所能做的，只是尽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但鉴于社会习俗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干预往往是有限的，并且必须等到人们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后才能发挥作用。不言而喻，政府往往站在否认和无视个人权利的最前线，因此向政府诉求正义，至少可以说是相当成问题的！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深知社会习俗也可能具有压迫性，并且正如在 [1.5.6 节](#) 所讨论的，他们主张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应当采取直接行动，以对抗“多数人的专政”倾向。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绝不会低估个人的自我主张，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然而，这种自我主张“往往与某些作家所鼓吹的那种狭隘、无知的‘个人主义’或‘自我主张’完全不同，甚至远比其深刻和广泛得多。”他指出，“反抗的个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起来反抗的人，他们的目标是“净化旧有的互助制度，或探索出一种基于互助原则的、更高级的共同体形式”；另一类则是那些“企图摧毁互助的保护机制，而仅仅是为了增加自身的财富和权力。” [Mutual Aid, pp. 18-9] 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并鼓励前者。

然而，虽然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习俗可能带来的专制性，但仍然强调——首先，这种现象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组成部分；其次，与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强加给社会的法律、以及国家真正的暴政相比，这种习俗的压迫性显得微不足道。而这些事实，统治精英们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掩盖。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解释的：“我们所有的宗教、历史、法律和社会教育都渗透着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人类被任由其自身发展，他们将会退化为野蛮状态；没有权威的约束，人类将会互相残食；因为他们说，从‘大众’身上只能期待到野蛮和无休止的纷争。如果没有那些‘被选中的人’高居其上加以统治，人类就会毁灭……这些‘救世主’，据说正是为了防止‘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他指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一份针对社会和制度的科学地研究，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结论。事实证明，人类为了实现互助、共同防御以及总体上的和平，而创造出的习俗和惯例，正是由‘无名的大众’精心制定的。而正是这些习俗，使人类在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的生存斗争中得以存续。”“国家仅仅是人民的工具”的观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难以站得住脚。国家及其法律真正做的，是“将已经存在的社会习俗固定下来，或更确切地说，是使之僵化为一种永久性的形式”，同时又“加入了一些新的规则——这些规则确立了不平等，并强制大众屈从于武装的富人和好战少数派的利益。” [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p. 48-9] 因此，国家会扭曲社会习俗，以维护自身以及经济和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的统治——就毫不奇怪了：

主要由北美洲国家和英国等所采用。与之相对的是“民法法系”（Civil law），或称大陆法系、罗马法系。特点是以成文法，即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并通过的、一套成文的法则。主要由欧洲、亚洲和南美洲等所采用。近年来在两大法系的相互影响中，其特点也有相互交融。

“随着社会越来越明显地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一方试图建立自己的统治，另一方则挣扎求生，斗争便爆发了。胜利者急于将自己的统治成果以永久的形式固定下来，竭尽所能地使之不容置疑，并赋予其神圣和庄严的地位。法律在祭司的庇护下出现了，而战士的棍棒则为其服务。其作用便是使那些有利于少数统治阶层的习俗不可更改……然而，如果法律仅仅是一套为统治者服务的命令，它将难以确保人们的接受和服从。因此，立法者在法典中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习俗……即，一种是随着共同生活的实践而发展出的、体现道德原则与社会团结的准则；另一种则是用来维护不平等存在的命令。在法典中，真正维系社会存在的习俗，被巧妙地与统治阶级强加的行为准则交织在一起，并且二者都要求民众给予同等的尊重……这就是法律，它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这种双重性质。”

[Kropotkin, *Anarchism*, p. 205]

换句话说，法律“利用人类的社会情感，不仅使那些符合人类道德观念的准则得以通过，同时也让那些仅仅有利于少数剥削者、并可能引发人民反抗的命令得以施行。” [Kropotkin quoted by Malatesta, *Anarchy*, pp. 24-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国家机构不仅不是创建道德社会（即尊重个性的社会）所必需的，反而会积极破坏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声称，国家是自由社会和个人空间的必要条件，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统治精英“如果不假装自己对整体有益，就无法长期维持自己的地位……如果不伪装成所有人权利的守护者，他们就无法让人们接受少数人的特权。” [Op. Cit., p. 24] 因此，法律“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持政府运作，而政府的作用就是确保资本可以垄断和剥削所创造的财富”，并且“使资本家更容易剥削工人”。然而，“那些渴望自由的人，却尝试通过恳求他们的主子来获得自由，希望这些主子能仁慈地修改由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保护自己！” [Kropotkin, *Op. Cit.*, p. 200 和 p. 210]

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国家存在的真正原因。无论它宣扬什么样的个人权利和行动自由，其根本目的始终是保护强者免受弱者的威胁。国家所承认的人权，实际上是社会斗争的产物，是在阶级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而不是统治精英的仁慈使然。此外，资本主义本身也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因为它鼓励人们习惯于欺骗他人，并将他人视为竞争对手，而可以对竞争对手无所不用其极。因此，资本主义削弱了个体成长和实现真正自由所需的，基本社会环境和习俗。因此，毫不奇怪，一个强大的国家始终是推行自由市场的必要条件——首先，它要保护财富不被日益贫困化的大众所夺取；其次，它还要在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结构、瓦解社会凝聚力时，努力维持社会的完整性，以防社会变得难以为继。

关于这个问题，克鲁泡特金的经典文章《法律与权威》（收录于《无政府主义》和《一位反叛者的话》）是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I.7.4 资本主义是否保护个性？

鉴于许多人声称，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会摧毁自由（进而摧毁个性），因此值得探讨资本主义是否真正地保护了个性。答案必须是否定的。资本主义制造了一种标准化的模式，从而扭曲了个性；而之所以个性在资本主义下仍然存在，更多地是说明了人类精神的韧性，而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功劳。

那么，为什么一个表面上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制度，反而导致了个性的压抑？这主要有四个原因：

- 1) 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等级制度，在许多生活领域扼杀了自我管理能力；
- 2) 社会缺乏归属感，这使得个性的培养缺乏必要的支持；
- 3) “个人利益”被单纯地等同于金钱收益，这种心理影响阻碍了真正的个性发展；
- 4) 竞争导致从众心理和对权威的盲目服从。

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在多个场合讨论过（例如，参见 [B.4 节](#)）。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因此“个人的倾向和判断必须服从于主人的意志”。这自然会抑制个体的主动性、以及认识和表达自我思想的能力。这“使数百万人沦为无名之人，成为毫无创造力和主动性的行尸走肉……他们为他人积累起财富的金山，而自己却要忍受灰暗、乏味和悲惨的生活。”戈尔德曼强调说：“只要雇佣关系和商业考量在决定个人行为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Red Emma Speaks, p. 50] 因此，布克钦说到：

“随着社会逐渐被市场体系所掏空……我们也见证了人格本身的空洞化。正如那些，曾将人类联结为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的、精神与制度的纽带，被大众市场侵蚀一样——那些构成主体性、性格和自我定义的筋脉，也被剥夺了其形态和意义。‘现代性’所塑造的那种孤立的、看似自主的自我，不过是曾经相对完整的个体的空壳；而这种个体之所以可能完整，正是因为他或她曾扎根于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之中。”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211]

关于第一点，考虑到资本主义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它不仅无法促进个性，反而只能损害个性。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证的：“对个人或形而上实体的服从……会导致主动性的压抑和思想的奴性。” [Anarchism, p. 285] 至于第二点，我们在上文已有讨论，此处不再重复（参见 [I.7 节](#)）。至于最后两点，它们值得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下文展开分析。

首先来看第三点，当这种“贪婪”成为个体生活（以及他们所处社会）的主导因素时，他们往往最终会为它而牺牲自我。个人并未主宰自己的“贪婪”，反

而是“贪婪”主宰了他们，使得他们被自身的某一方面所占据。这种“自私”掩盖了实践它的个体自我的贫瘠。正如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希·弗洛姆，所指出的：

“自私并不等同于自爱，反而恰恰与自爱相对立。自私是一种贪婪。正像所有的贪婪一样，它包含着一种贪得无厌，其结果是个体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贪婪是一个无底洞，它让人不断地努力满足需求，却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这种类型的人本质上并不喜欢自己，反而对自己深恶痛绝。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很容易解释。自私，正是植根于对自身缺乏真正的喜爱……他缺乏内在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只能建立在真正的自爱和自我肯定的基础上。” [The Fear of Freedom, pp. 99-100]

换言之，“自私”的人让自己的贪婪主宰了自我。他们牺牲了自身的个性，以供奉这个新的“神明”。对此，麦克斯·施蒂纳早已敏锐地察觉并予以批判，他将其称为“片面化的、封闭的、狭隘的自我主义”，它导致个体的自我“被某种激情所奴役，并将自身的其余部分作为祭品供奉给它” [The Ego and Its Own, p. 76]。和所有的“幽灵”一样，资本主义导致个体的自我否定，从而造成个性的贫瘠。因此，一个表面上建立在“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制度，最终却削弱了个性，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第四点，竞争对个性的影响同样是破坏性的。事实上，“一个致力于制造标准化、专业化、可预测的人类组件的文化，只能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成竞争。但‘胜出’的结果并不会造就坚韧的个人主义者，而是塑造出循规蹈矩的机器人。” [George Leonard, quoted by Alfie Kohn,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p. 129]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竞争是以超越他人为基础的，而这只能在你与他人从事相同事务的前提下发生。然而，个性是最独特的事物，而“独特的特征在本质上无法被排名，而参与排名的过程则要求基本的服从性。”对竞争影响的广泛研究表明，它实际上“鼓励等级化的服从”，并且削弱了梭罗等自由思想者所推崇的“实质的、真实的个人主义”。[Alfie Kohn, Op. Cit., p. 130 and p. 129] 竞争，不仅通过强化服从来贫瘠个性，还使人们变得不再具有自由思考和反叛精神：

“在办公室或教室里进行的竞争，与对权威和普遍指挥的态度密切相关。如果我想在课堂上获得最高分，就不太可能质疑教师对所授内容的解释。久而久之，我甚至可能完全丧失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人们倾向于‘随波逐流，以求安稳’，那么当目标是成为第一时，这种趋同的动力只会更加强烈。在办公室或工厂里，竞争者是彼此的对手，而要在晋升竞争中击败其他人，就意味着必须取悦上司。竞争会熄灭那象征反抗精神的普罗米修斯之火。” [Op. Cit., p. 130]

在 [1.4.11 节](#) 中，我们曾指出，当艺术任务被转化为竞赛时，儿童的作品会明显缺乏自发性和创造力。换句话说，竞争减少了创造力，从而削弱了个性，因为创造力“本质上是反服从的：它无非是一种独特思维和冒险精神的过程。而竞争

会抑制这一过程。”因此，竞争将导致生活的狭隘化，人们不再去迎接新的挑战，而是执着于赢得胜利、获取“成功”。它“把生活变成一场接一场的竞赛，[并且]把我们变成谨小慎微、唯命是从的人。当我们陷入竞争时，我们无法作为独立个体闪耀光芒，也不会去拥抱集体行动。” [Kohn, Op. Cit., p. 130 and p. 131]

因此，资本主义非但没有捍卫个性，反而在个体表达自由的道路上设置了大量（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障碍。恰恰因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其支持者所宣称的自由社会，无政府主义才得以存在。

I.8 革命时期的西班牙是否证明了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是可行的？

是的。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革命时期的西班牙“向你展示了当人类试图以人的方式生活，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机器中的齿轮时，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George Orwell, *Orwell in Spain*, p. 254] 这场变革的核心是 CNT (the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全国劳工联盟, 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 和 FAI (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

“在西班牙，数百万人民将经济的大片领域掌控在了自己手中，将其集体化并进行自治，甚至废除了货币，按照共产主义的工作和分配原则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残酷的内战之中，但并未导致混乱，甚至没有出现那些威权主义‘激进派’所曾预言、并依旧坚持预言的严重失序。事实上，在许多集体化地区，企业运作的效率远远超过了类似的国有或私营企业。这一革命现实的‘绿芽’比起任何反对的理论论证都更具意义。在这一点上，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不切实际地幻想’，而是他们的反对者背弃了事实，甚至无耻地掩盖了事实。”
[“Introductory Essay,”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Sam Dolgoff (ed.), p. xxxix]

无政府主义者及 CNT 活动家加斯顿·勒瓦尔 (Gaston Leval) 评论道，在 1936 年 7 月 19 日成功击败法西斯叛乱的地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迅速展开，并主要基于无政府主义思想：

“在西班牙，尽管战争持续了近三年、夺去了百万人的生命，尽管遭遇政党势力的反对……自由共产主义的理念依然得以实践。很快，超过 60% 的土地由农民自行集体耕作，没有地主，没有老板，也没有资本主义竞争机制来刺激生产。在几乎所有行业、工厂、磨坊、作坊、交通运输服务、公共服务及公用事业领域，普通工人、他们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工团，重新组织并管理了生产、分配和公共服务，而无须资本家、高薪管理者或国家权力的干预。

“更重要的是，各种农业与工业集体立即实行了经济平等，贯彻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通过自由联合协调努力，在整个地区创造了新的财富、提高了生产力（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建立了更多的学校，并改善了公共服务。他们没有实行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而是建立了真正的基层自由意志民主，每个人都直接参与到社会生活的革命性重组中。他们用普遍的互

助实践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适者生存’的法则，并用团结互助取代了竞争对立……

“这一实践，有大约八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为那些一方面寻求资本主义反社会模式的替代方案、同时拒绝极权主义国家伪社会主义的人们，开辟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同上, pp. 6-7]

因此，尽管同时遭受着来自法西斯军队的军事进攻，以及共产主义者与共和派国家的攻击和破坏——但在西班牙革命短暂存续的时间里，大约八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一基于自由意志原则的新经济体系。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理念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

当然，读者可能会担心勒瓦尔和布克钦是否夸大了成就，同时忽略了西班牙集体化的缺陷。所以，在接下来的小节中，我们将提供具体细节，并回应那些常见但缺乏事实依据的批评意见。我们将尝试对这场革命进行客观分析，探讨它的诸多成功之处，同时也剖析其中的优势与劣势、犯下的错误、以及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然而，由于西班牙的集体化“在各个村庄乃至城市中的不同企业中，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式……带有相当大的即兴性，并受到了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即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因此]这些安排既有缺陷，也有优点。” [何塞·佩拉特斯（Jose Peirats），*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vol. 1, p. 223]

这场受自由意志主义影响的革命（普遍地）被历史学家忽视，或仅被一笔带过。某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和“客观调查者”不仅对其进行诽谤和歪曲，甚至在谈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的作用时，不是忽略就是直接撒谎。虽然，共产主义史学尤为——不可靠（如果要用一个委婉的词来形容他们的行径的话），但似乎几乎所有的政治视角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包括自由主义者、所谓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因此，任何试图调查在西班牙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努力，都面临着诸多的困难。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以及我们的理念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正面成果，也被刻意淡化，甚至被直接忽视。事实上，对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歪曲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杰罗姆·R·明茨所著的《卡萨比耶哈斯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J. 罗梅罗·毛拉的文章《西班牙的案例》[收录于J. Joll 和 D. Apter（编）的《今日无政府主义》]，其中反驳了许多历史学家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常见指控和曲解）。或许无需多言，由各类马克思主义者所编造的神话——最为庞大（关于部分常见谬误的回应，可参见附录“马克思主义者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

在这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对那场社会革命进行一个简要概述，并尝试打破围绕CNT和FAI在革命年代的活动所产生的一些谬见。必须强调的是，这只能算作对西班牙革命的简要介绍。因为我们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们将重点放在革命的经济与政治层面上。然而，我们也必须提及在非法西斯控制的西班牙所发生的社会变革。这场革命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包括男性与女性、成人与儿童、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CNT的武装派成员阿

贝尔·帕斯对此曾作出如下描述：

“工业掌握在工人手中，所有生产中心都高高悬挂着红黑旗，并张贴标语，宣告它们真正成为了集体化单位。革命似乎是普遍性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样显而易见。以往人为武断地隔绝男女之间的屏障已经被摧毁。在咖啡馆及其他公共场所，男女混杂在一起，这在过去是完全无法想象的。革命为社会关系注入了一种兄弟般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实践中不断加深，清楚地表明旧世界已经死亡。” [Durruti: The People Armed, p. 243]

社会变革赋权于个体，而个体反过来又改变了社会。无政府主义激进派成员恩里克塔·罗维拉，生动地描绘了革命所带来的自我解放：

“当时的氛围与感受，都非常特别。这太美好了。一种——我该怎么形容呢——力量的感觉，不是那种支配的含义，而是一种事情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掌控之中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可能性的感觉。我们拥有一切，我们拥有巴塞罗那——它属于我们。走上街头，街道是我们的——这里，是 CNT；而那里，是某个委员会。整个世界都截然不同，充满了可能性。这是一种我们可以共同，去成就大事的感觉，一种我们可以真正改变世界的感觉。” [引自 Martha A. Ackelsberg 和 Myrna Margulies Breithart, 《抗议的场域：罢工的城市女性》，收录于《我们的时代》第 19 卷第 1 期，第 164-165 页]

此外，在革命期间发生的社会变革，也扩展到了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中去。例如，革命催生了“一个卫生工作者工会，这是真正的社会化医疗实验。他们提供医疗援助，并开设了医院和诊所。” [胡安·戈麦斯·卡萨斯,《无政府主义组织：FAI 的历史》，第 192 页]。关于这一例子，我们将在 [1.5.12 节](#) 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因此此处不再赘述。我们仅需强调，本 FAQ 的这一部分只是对所发生事件的介绍，并未（事实上也不可能）涵盖革命的所有方面。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概述，展现革命的自由意志主义特征、工人自治的组织方式、集体化的组织和运作情况。

毫无疑问，革命过程中也犯下了许多错误。我们将在后续内容中指出并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此外，革命中许多实际的发展，并未完全符合某些人所认为的共产主义（无论是自由意志主义的还是其他形式的）革命的“必要步骤”。也必须强调的是，许多情况也未能完全符合革命前全国劳工联盟（CNT）所确立的目标。例如，在经济方面，工人集体的出现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发展；虽然它固然建立在自由意志主义原则之上，但同时也反映了 CNT 激进派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同样，尽管 CNT 寻求建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但实际上，大多数工人集体最终也未能超越互助主义或集体主义。在政治方面，对法西斯胜利的恐惧促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将与国家的合作视为“较小的恶”。然而，仅仅因为西班牙革命未能完全符合少数革命者在革命前设想的理想蓝图，就将其否定，这是宗派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荒谬行为。没有一场工人阶级革命是纯粹的，没有任何一场群众斗争是没有矛盾的，也没有任何社会变革是完美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曾正确指出的那样：“只有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 [《无政府主义》，第 143 页]。关键在于，革命是否创造了一套制度，使参与其中的人能够讨论他们所面临

的问题，调整已经作出的决定，并纠正他们的错误。在这一点上，西班牙革命显然是成功的，因为它创造了以工人阶级的主动性、自治权和力量为基础的组织。

关于社会革命的更多信息，萨姆·多尔戈夫所编的《无政府主义集体》（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是一个极好的起点。加斯顿·勒瓦尔的《西班牙革命中的集体》（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也是一部必读著作。何塞·佩拉茨所著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及其三卷本的准官方历史著作《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盟》（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也是关键性作品。弗农·理查兹的《西班牙革命的教训》（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是一部对西班牙革命及无政府主义者角色进行批判性分析的重要著作。《西班牙 1936-1939：社会革命与反革命》（Spain 1936-1939: Social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弗农·理查兹主编）收录了当时的重要文章。阿贝尔·帕斯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杜鲁蒂》（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最著名战士的经典传记（该书是其早期著作《杜鲁蒂：武装的人民》（Durruti: The People Armed）的扩展版）。艾玛·戈尔德曼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观点被收录在《烈焰中的愿景》（Vision on Fire）一书中。

罗伯特·亚历山大的《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是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和内战中的角色的综合概述，伯内特·博洛滕的《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也是如此。丹尼尔·盖朗所编的《没有神明，没有主人》（No Gods, No Masters）包含两个关于西班牙革命的章节，其中一个专门讨论了公社运动。诺姆·乔姆斯基的精彩文章《客观性与自由主义学术》（"Objectivity and Liberal Scholarship"），揭示了自由主义学者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籍中，是如何具有误导性、不公正，并本质上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这篇经典论文收录于《乔姆斯基论无政府主义》、《乔姆斯基读本》以及《美国权力与新官僚》）。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是该主题最好的入门读物（奥威尔曾在阿拉贡战线上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民兵，并在 1937 年五月事件期间身处巴塞罗那）。这本经典作品与奥威尔关于该冲突的其他著作，一起被收录在《奥威尔论西班牙》

（Orwell in Spain）一书中。默里·布克钦的《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The Spanish Anarchists）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但该书在革命爆发前戛然而止，因此需要与他的《铭记西班牙》和论文《回顾西班牙》一起阅读才能完整理解。斯图尔特·克里斯蒂的《我们，无政府主义者！》（We, The Anarchists!）是关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AI）的重要历史著作。

I.8.1 西班牙革命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模式了吗？

恰恰相反。参与革命的城市工人比农村人口更多。因此，尽管公社化在农村地区十分广泛，但这场革命同样对城市和工业部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所有地区中，受公社化“影响最深的是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在那里大约

70%的劳动者参与其中。在整个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农业领域的公社化劳动者总数接近 80 万，而工业领域的公社化劳动者则超过 100 万。在巴塞罗那，工人委员会接管了所有公共服务、石油垄断企业、航运公司、诸如 Volcano 这样的重型工程企业、福特汽车公司、化工企业、纺织工业以及大量较小的企业……水、电、燃气等公共服务，在阿塔拉萨纳斯兵营（Atarazanas）被攻占后数小时内便由新的管理机构接管……相关工厂被迅速转为战争生产，至 7 月 22 日，冶金企业已开始制造装甲车辆……加泰罗尼亚的工业工人是西班牙最熟练的工人之一……在战斗尚未完全平息、街道仍然布满垃圾和路障的情况下，公共交通系统依然得以迅速恢复，是当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之一。”战斗结束五天后，巴塞罗那共有 700 辆电车投入运营，比平时的 600 辆还要多，并且全部涂上了象征着 CNT-FAI（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黑色与红色。

[Antony Beevor, *The Spanish Civil War*, pp. 91-2]

西班牙约 75%的工业集中在加泰罗尼亚，而这里正是无政府主义工人运动的堡垒，工厂的广泛公社化正是在此发生的。正如萨姆·多尔戈夫所指出的，这一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原则不适用于工业化地区，即便适用，也仅限于原始的农业社会或孤立的实验性社区’这一指控。”[*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p. 7-8] 奥古斯丁·苏奇（Augustin Souchy）指出：

“在多个城市分布着数十家工厂、雇佣着将近 25 万名纺织工人的行业中，推行公社化，并将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绝非易事。然而，巴塞罗那的工团主义纺织工人工会，在短时间内便完成了这一壮举。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实验。资方的独裁统治被推翻，工资水平、劳动条件以及生产都由工人及其选举出的代表决定。所有管理人员必须执行工会成员的指示，并直接向工人和工会会议报告。纺织行业的公社化彻底粉碎了‘工人无法管理庞大而复杂的企业’这一谬论。”[*Op. Cit.*, p. 94]

此外，西班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并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尽管有时被错误地如此描述。1910 年至 1930 年间，西班牙的产业工人数量增长了一倍多，超过 250 万，占当时劳动人口的 26%（相比之下，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16%）。到 1930 年，仅有 45%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Ronald Fraser, *The Blood of Spain*, p. 38] 仅在加泰罗尼亚，就有 20 万工人受雇于纺织行业，另有 7 万工人从事金属加工及机械制造。这一状况与一战结束时的俄国截然不同，后者的城市工人阶级仅占总人口的 10%。

到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已渗透到西班牙的农村经济。随着农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大约 90%的农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Fraser, *Op. Cit.*, p. 37] 因此，到 1936 年，西班牙的农业主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雇佣了大量劳动力——他们要么没有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要么完全是无地的农民。正是这支庞大的农村雇佣劳动者群体，构成了西班牙乡村劳工运动的基础（例如，社会党控制的总工会（UGT）的土地工人工会，在 1933 年拥有 45.1 万名成员，占其总会员数的 40%）。相比之下，1917 年俄国革命时期的农业仍主要由自耕农经营，他们依靠小块土地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仅将多余部分进行易货交换或出售。

因此，西班牙革命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前工业社会的产物。城市公社化主要发生在西班牙最工业化的地区，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事实上，撇开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安慰的谎言”不谈，全国劳工联盟（CNT）在城市产业工人中的组织力量最为强大，而在其内部，农业工人始终是少数派（到1936年，CNT甚至在传统上属于社会党的工会UGT的据点，马德里，取得了进展；而讽刺的是，UGT在30年代的主要增长点反而是农村工人）。西班牙革命的主体（主要）是城市和农村的雇佣劳动者，他们联合贫苦农民，共同对抗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

总而言之，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者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工业落后的产物。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城市，因此社会革命不仅发生在农村，同时也发生在西班牙最为工业化的地区。

1.8.2 无政府主义者是如何在西班牙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的？

革命无政府主义于1868年由朱塞佩·法内利（Giuseppi Fanelli）引入西班牙。法内利是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同僚，他的思想在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一些历史学家幸灾乐祸地指出，巴枯宁居然派遣了一位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人去传播他的思想，但他们却忽略了拉丁语言之间的相近性。法内利完全能够被他的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听众所理解，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早已熟悉蒲鲁东的思想。

巴枯宁的思想在西班牙能够迅速获得支持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思想本就反映了西班牙工农阶级自身已经形成的观念。农民之所以支持无政府主义，是因为伊比利亚半岛上世代相传的农村集体主义传统。城市工人之所以接受无政府主义，是因为其直接行动、团结互助和自由联合的思想，符合他们在与资本主义和国家斗争中的需要。他们无需旁人告诉他们资本主义是如何压迫和剥削他们，也无需被提醒国家的存在正是为了维护这一阶级体系。此外，许多西班牙工人早已深知中央集权的危险，而西班牙的共和主义传统深受联邦主义思想的影响（部分源自蒲鲁东的理论，由皮·伊·马加尔（Pi y Margall）加以普及，他后来成为第一共和国的总统）。随着城市工会组织者和无政府主义行动派到访乡村，以及农民和无地农业工人涌入诸如巴塞罗那等工业城市寻找工作，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城乡之间不断传播。

因此，从一开始，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就与工人运动紧密相连（正如巴枯宁所期望的那样），这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实践其思想、传播其理念的现实领域。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贯彻自己的原则，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确保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广大民众中，成为一种司空见惯且被普遍接受的概念。

这种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度，与 CNT 及其前身组织的结构和策略密不可分。直接行动和团结互助的实践，促使工人依靠自身力量，识别并解决自身问题。无政府主义工会的分散式结构对其成员产生了教育作用。在工会大会上讨论问题、斗争、策略、理想和政治，使工会成员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并通过在斗争中的自我管理，为未来的自由社会做好准备。正是 CNT 的组织结构，确保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并推动了工会成员的政治发展。正如一位来自卡萨斯维耶哈斯（Casas Viejas）的 CNT 激进派所说，新加入的成员“要求太多，因为他们缺乏教育。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不用梯子就触及天空……他们才刚刚开始学习……他们有诚意，但缺乏教育。因此，我们会向大会提交各种想法，而不好的想法会被淘汰。” [quoted by Jerome R. Mintz,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 p. 27]

正是在工会会议的实践中，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了他们的工人同志。关于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无政府主义伊比利亚联合会（FAI）控制全国劳工联盟（CNT）的说法，是荒诞的。例如，并非所有 CNT 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 FAI 的成员。单几乎所有 FAI 成员同时也是 CNT 的基层成员，他们平等地参与工会会议。此外，也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并未加入 FAI，这本身也就能说明问题（FAI 并未以集权的方式主导 CNT）。何塞·博拉斯·卡萨卡罗萨（Jose Borrás Casacaro）证实道：“必须承认，FAI 并没有像其他政党在工会中那样自上而下、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干预 CNT。FAI 的影响是通过基层的激进分子实现的……决定 CNT 走向的决策，是在这些激进派的持续推动下作出的。”何塞·坎波斯（Jose Campos）也指出，FAI 的激进派“通常拒绝对工联委员会进行控制，仅在特定情况下才会接受……如果某人在大会上提出一项动议，其他 FAI 成员会支持它，通常也能够成功通过。这取决于在公开会议上的个体影响力。” [引自斯图尔特·克里斯蒂（Stuart Christie），*We, the Anarchists*, p. 62]

这正是无政府主义在 CNT 内部取得成功的关键。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原则和策略，在工会大会上被提出并获得认可，而不是被排除在外。换言之，组织的结构决定性地影响了决策的内容——工会成员讨论并采纳了那些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思想、策略和工会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CNT 的集会实践证明了巴枯宁关于工会自治的论点，即工人必须通过自身组织来掌控自己的命运。正如他所言，工会“的各部分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在工会官僚面前]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主权：工人们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在这些大型会议上，议程上的问题得到了充分讨论，最具进步性的意见最终占据上风。” [巴枯宁，*Bakunin on Anarchism*, p. 247] CNT 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群众大会”基础之上的，并产生了相同的激进化效果。它在实践中证明了，老板（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会官僚），都是不必要的——工人完全能够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作为一所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学校，CNT 无与伦比地展示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并非空想。由于 CNT 是以工人对阶级斗争的自我管理为基础的，因此它在事实上为革命和新社会的自我管理做好了准备。

西班牙革命同时也展现了无政府主义教育与媒体的重要性。在一个文盲率极高的国家，大量关于社会革命的文献被传播，并在会议上为不识字的人朗读。无政府主义思想被广泛讨论：“成千上万的书籍、小册子和传单被印发，广泛而大

胆的文化与大众教育实验（费雷尔学校^①）几乎覆盖了西班牙的每一个村庄和小镇。”[萨姆·多尔戈夫（Sam Dolgoff），*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27] 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的讨论持续不断，“工人中心 [地方工会大厅] 成为了讨论社会问题、畅想并筹划未来的聚集地。那些渴望识字的人围坐在一起……学习读写。”[明茨（Mintz），同上, p. 160] 一位无政府主义抗争者如此描述道：

“每当召开会议，演说者们都会受到热烈欢迎……那天晚上，我们谈论了一切：统治制度的不平等，以及人类如何有权利去追求一个没有自私、仇恨、战争和苦难的生活。后来我们再次受邀演讲，这次聚集的人比上次更多。就这样，人们开始觉醒，反抗现存制度，以争取能够维持自身的资源；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创造出一些人用书籍描绘、另一些人通过口述描述的社会。怀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阅读、辩论、讨论，并交流各种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佩雷斯·科尔登（Perez Cordon），引自 Mintz, 同上, p. 158]

报纸和期刊极为重要。到 1919 年，安达卢西亚已有 50 多个城镇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主义报纸。到 1934 年，CNT 的会员人数约达一百万，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已覆盖整个西班牙。在巴塞罗那，CNT 出版了一份日刊《工人团结》（*Solidaridad Obrera*），发行量达三万份。FAI 出版的杂志《土地与自由》（*Tierra y Libertad*）发行量达两万份。在希洪，有《工人生活》（*Vida Obrera*）；在塞维利亚，有《生产者》（*El Productor*）；在萨拉戈萨，有《行动与文化》（*Accion y Cultura*），这些刊物的发行量都相当可观。此外，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出版物。

无政府主义者不仅领导斗争、组织工会、出版书籍、报纸和期刊，还创办自由意志学校、文化中心、合作社、无政府主义团体（FAI）、青年组织（自由青年）以及女性组织（自由女性运动）。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践行自己的理念，使普通民众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切实可行并且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这正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强大之处。这是一个“除了拥有革命性意识形态[原文如此]之外，还[是一个]能够扎根于工人阶级生活和条件的目标，而发动行动的运动……正是这种能力，即定期地识别和表达广泛存在的需求与情感，再加上其在社区层面的影响力，构成了激进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基础，使其能够建立广泛的群众支持。”[Nick Rider, "The practice of direct action: the Barcelona rent strike of 1931", pp. 79-105, *For Anarchism*, David Goodway (Ed.), p. 99]

历史学家泰玛·卡普兰（Temma Kaplan）在研究安达卢西亚无政府主义者时强调了这一点。她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扎根于”社会生活，并创造了“一个牢牢植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运动”。他们“建立了工会、亲和力小组，例如家庭主妇小组；以及广泛的文化协会，如工人俱乐部。在这些场所，无政府主义出版物被阅读和讨论”。他们“最大的力量……在于将社区传统与激进工会传统相结合。在那些大多数居民从事农业的城镇，农业工人联合会往往与整个社区融为一

^① 费雷尔学校（Ferrer schools），是受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提出无政府主义教学法所启发，开设的自由意志主义学校。费雷尔在巴塞罗那设立了一座学院（*Escuela Moderna*），尝试不再使教育教条化，以理性主义的方式激发孩子的天然潜力，并强调理性、自尊、科学探究精神，鼓励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体……无政府主义……[曾]表明，农业工人和无产者的诉求可以与社区支持相结合，形成起义的形势……如果认为安达卢西亚的‘乡村无政府主义’与激进工会主义是彼此分离的，或者这一运动是某种宗教的替代品，那就错了。” [Anarchists of Andalusia: 1868-1903, p. 211, p. 207 and pp. 204-5]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在 CNT 成立前后，都在工厂内外为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斗争。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忽视生活的任何方面，这使他们能够找到许多愿意倾听其思想的群众，而这一思想的核心正是个人自由的理念。这种思想只能使工人阶级进一步激进化，因为“CNT 的诉求远远超出了任何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要求：它强调真正的平等、工人自治（autogestion）和工人阶级的尊严；无政府工团主义提出的要求，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根本不可能向工人让步的。” [J. Romero Maura, "The Spanish case", pp. 60-83, Anarchism Today, D. Apter and J. Joll (eds.), p. 79]

由于缺乏罢工基金，罢工的胜利依赖于互助，这种机制在 CNT 的成员中培养了强烈的团结感和阶级意识。罢工不仅仅是工人的事情。例如，赫雷斯的工人面对老板们从马拉加招募工人破坏罢工时，“使用了自己的武器——抵制使用工贼的雇主。最显著的抵制行动发生在赫雷斯附近，抵制那些既是地主又在城里拥有商业机构的雇主。工人及其妻子拒绝在这些店铺消费，妇女们甚至守在店门口，劝阻其他顾客进入购物。” [Mintz, Op. Cit., p. 102]

CNT 的组织结构和战术，促进了其成员的政治觉悟、主动性和组织能力。作为一个联邦制、去中心化的组织，CNT 的决策模式基于自下而上的直接讨论与决策（正如一位积极分子所说，“CNT 的传统就是讨论和审视一切”）。此外，CNT 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可行的、现实的社会组织模式——即由普通人民自己管理社会，证明了专门的统治权力既不受欢迎，也毫无必要。这塑造了一支世界罕见的革命工人阶级。正如何塞·佩拉特斯所指出的，“在工会层面之上，CNT 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一个煽动与起义的社会和革命组织。” [《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39] CNT 的组织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阶级意识。其组织形式基于“单一工会”（sindicato unico）原则，即将同一工作场所的所有工人整合到同一个工会中，而非按照工种划分工会，以避免工人被分割成多个彼此竞争的行业工会。这一策略确保了所有工人——无论是熟练工人还是非熟练工人——都属于同一组织，从而增强了工人内部的团结，提高了他们的斗争能力，并消除了由于行业分割而造成的内部矛盾。此外，所有地方工会组成地方联合会，各地方联合会再组成区域联合会，以此类推。正如 J. 罗梅罗·毛拉（J. Romero Maura）所论证的，“这种基于地域的组织联系模式，使一个地区的所有工人团结在一起，并在行业团结之外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 [Op. Cit., p. 75]

因此，CNT 的结构不仅鼓励了阶级团结与阶级意识，而且通过直接行动和自我管理的原则，使工人阶级在日常斗争中逐步掌握自身的事务，并习惯于自主行动。这种模式，使工人们为未来的自由社会中管理自身的个人和集体利益，做好了准备（正如革命时期建立的自主管理集体的成功所证明的）。因此，自我管理式的斗争与直接行动的过程，不仅为社会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建立做了准

备，而且——正如巴枯宁所强调的——在当下培育了未来社会的萌芽。

换句话说，“走向激进化的道路……来源于直接参与斗争，并设计替代性的社会机构。”每一次罢工和抗争都强化了参与者的自主，并构建了现有制度的可行替代方案。例如，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巴塞罗那的罢工与粮食抗议“虽未能推翻政府，但当时建立的组织模式却为未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提供了长期的借鉴。” [Martha A. Ackelsberg 和 Myrna Margulies Breithart, "Terrains of Protest: Striking City Women", pp. 151-176, 《我们的世代》(Our Generation), vol. 19, No. 1, p. 164] 这一点适用于每一次罢工，因为它们都印证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罢工不仅能够塑造阶级意识与自信，还能建立必要的组织结构，使工人不仅能够对抗资本主义，还能够取而代之。

总结而言，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参与群众斗争和运动，证明了其思想和理想适用于工人阶级的经验，从而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事实上，哪怕去探究无政府主义为什么能在西班牙获得支持，某种程度上也隐含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假设，即：只有国有社会主义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需求。在探讨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未能取代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时，历史学家 J·罗梅罗·毛拉指出，这一问题“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前革命社会中对工人斗争的理解，与现实的社会进程完全相悖（因此，人们总是试图用‘宗教式的’、‘弥赛亚式’的模式来解释它）。”在讨论并反驳了关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成功的五种常见解释后，他总结道，“要解释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在组织一个持续革命化的群众运动方面取得的成功，首先，应当从无政府主义对社会的理解及其实现革命的方式中，去寻找答案。” [Op. Cit. p. 78 and p. 65]

正是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的革命性，使其成员具有高度的积极性，并愿意运用直接行动来捍卫自由。不像那些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以集权模式组织并被训练成服从等级制度的德国工人，在面对希特勒时无动于衷；西班牙的工人阶级（正如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一样）走上街头，对抗法西斯主义。

西班牙革命并非是“偶然”事件，它是近七十年持续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和革命斗争的结果。这包括了一系列罢工、抗议、抵制、起义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这些都为农民和工人组织大众抵抗 1936 年 7 月的法西斯政变，以及在战胜政变后接管社会，做好了准备。

I.8.3 西班牙的工业集体是如何组织的？

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Martha A. Ackelsberg）对工业集体的组织方式做出了极为精炼的总结：

“工人组织的既有结构，使得工人能够接管大部分工业经济，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工厂委员会成立，以指挥生产并在同一行业内协调各个单位。工会组

织负责协调跨行业和跨地区的生产与分配……在大多数共有化的行业中，工人群众大会决定政策，而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则负责日常事务管理。” [Free Women of Spain, p. 100]

这些集体建立在工人对其工作场所的民主自主管理之上，生产资料由整个工人共同体托管，并通过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进行管理：

“西班牙内战期间组织的集体是工人的经济联合体，不涉及私人财产。由工作在其中的工人管理集体化的工厂，并不意味着这些工厂就成为了他们的私人财产。集体无权出售或租赁整个或部分的共有化工厂或作坊。其合法的托管者是 CNT，即全国劳工协会邦联。但即便是 CNT，也无权随意处置一切。所有事务必须由工人们通过会议和代表大会共同决定并加以批准。” [Augustin Souchy,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67]

在加泰罗尼亚，“每个工厂都选举出由最有能力的工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根据工厂规模的不同，这些委员会的职能包括工厂内部组织、统计、财务、通信，以及与其他工厂和社区的联系……在共有化实施几个月后，巴塞罗那的纺织工业状况远比资本主义管理时期更为良好。这再次证明了，从基层发展起来的草根社会主义不会扼杀人的主动性。贪婪，并不是人类社会关系中唯一的驱动力。” [Souchy, *Op. Cit.*, p 95]

因此单个的集体，是基于由所有在其中工作的人员组成的群众大会所运作的。这些大会提名管理人员，并授权其执行大会的决议，同时要求他们向大会汇报，并对其负责。例如，在卡斯特利翁-德拉普拉纳，“每个月，技术和行政委员会都会向工团的全体大会提交一份报告，如有必要，工人们会对其进行审查和讨论，最终由大会多数决定是否采纳。因此，所有活动都为全体工人所知晓和掌控。这是自由意志民主的一个实际范例。” [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303] 集体的权力基础在于基层，“所有重大决策均由工人大会议作出”，这些大会“定期召开，广泛参与……如果某位管理人员做出了未经大会授权的决定，他很可能在下次会议上被撤职。”这一机制的运作可在 Casa Rivieria 公司看到具体案例。在军队政变失败后，“巴塞罗那金属工人工会指定了一个‘控制委员会’（Comite de Control）来暂时接管企业的管理……7月19日后仅几周时间，该企业的工人们便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他们选举出一个‘企业委员会’（Comite de Empresa），以更为长期地接管企业管理……企业的四个部门——三家工厂及办公室人员——每周至少召开一次各自的群体大会。在这些会议上，工人们可以从最重要的事务，讨论到最琐碎的问题。” [Robert Alexander, *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vol. 1, p. 469 and p. 532]

总而言之，西班牙的集体化运动以工作场所的自我管理为特征。它们成功地实现了长期以来自由意志主义目标，即将工业从专制转变为民主，将雇佣劳动替换为基于平等者联合的自由劳动（参见 [1.3.1 节](#)）。然而，要是有人（许多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CNT 和 FAI 将建立自我管理的集体视为革命的最终目标——那就错了。事实远非如此。尽管这些集体体现了工人自我管理为核心的自由意志主义原则，但它们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具体历史情境相结合的

产物。CNT 并未寻求建立一个由生产者合作社组成的市场体系，而是致力于经济的全面社会化以及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从结果上看，这些集体应该被视为通往该目标的一个发展阶段，而非是最终目的。此外，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弗雷泽所指出的，“在此之前……CNT 是否认真考虑过工业的集体化，仍然值得怀疑。” [The Blood of Spain, p. 212] 例如，CNT 反对加泰罗尼亚政府颁布的集体化法令；因为该法令将革命自发取得的、集体组织体现出来的成果，正式化并加以控制。

因此，这些集体（最初）是一种“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自我管理模式，而我们认为，如果革命能够在我们的工会领导下全面推进，这种模式就不会出现。”换言之，革命虽然废除了雇佣劳动，但并未废除工资制度。因此，资本主义被互助主义所取代，而不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期望的社会主义（即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CNT 没有执行革命的政治方面，导致经济革命注定失败。正如加斯东·勒瓦尔所强调的，在“工业集体，特别是在大城市中的工业集体，情况会因各种矛盾因素及不同社会阶级所产生的社会思潮并存，而变得有所不同。” [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p. 227-8 and p. 227]

革命的初始形态与预期不符，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毕竟，没有任何社会变革会完全符合其倡导者的期望，而人民当时面临着更紧迫的任务，例如恢复生产和对抗佛朗哥。因此，集体化只体现了 CNT 和 FAI 目标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完全可以理解！此外，社会变革不会立刻带来完美的转变，工人们“必须建立新的消费与分配体系，重塑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创造新的生产模式。” [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51] 这一进程已经启动，尽管最初尚未完成。从行动来看，这些组织始终设想着更广泛的目标，例如，工会行动家试图进一步推动社会化的程度。因此，这依然符合自由意志主义理论，这些集体也表现出在行业内部及行业之间进行合作的愿望（参见 [1.3.5 节](#)）。关于这些联邦化与协调的尝试，以及从这些实验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探讨。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种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尝试，既有成就，也存在缺陷。

I.8.4 西班牙的工业集体是如何进行协调的？

各个集体尝试的合作方式差异甚大。最初，几乎没有进行超出工作场所范围的经济协调尝试。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当时最迫切的需求是恢复生产，将民用经济转变为战时经济，并确保平民和民兵能够获得必要的物资。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互助主义发展趋势，许多集体将自己劳动的产品投放市场进行销售。

这种情况引发了一些经济问题。因为缺乏在集体之间确保活动高效协调的制度框架，从而导致了集体之间无谓的竞争（而这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由于最初

没有集体的邦联组织，也没有互助银行或集体银行，这种状况使得集体间原有的不平等状况得以延续（因为工人既接管了富裕企业，也接管了贫困企业），并且使得集体之间的各种临时性的互助尝试变得困难且缺乏系统性。

鉴于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纲领承认，一个完全合作化的社会必须基于“生产为了使用”的原则，CNT 的激进派反对这种互助主义体系，并主张在各个工作场所之间进行协调。他们通过工会和集体内部的自由辩论和讨论，成功说服工人们认识到互助主义的局限性。因此，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社会化的程度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最初，在击败佛朗哥的军队后，几乎没有正式的协调和组织，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恢复生产。然而，协调的必要性很快变得显而易见（正如无政府主义理论和 CNT 纲领所预测的那样）。关于这一过程，加斯頓·勒瓦尔，以略布雷加特河畔的奥斯皮塔莱特（Hospitalet del Llobregat）的例子进行了说明：

“当地的工业，经历了在这场革命中几乎普遍采用的发展阶段……最初，[由]工人选出的委员会[进行组织]。各个工厂仍然各自进行生产和销售。但很快，人们意识到这种情况导致了工厂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制造了与社会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世界观不相容的对立。因此，CNT 发出了号召：‘所有工业必须纳入工会体系、全面社会化，并最终确立我们一直倡导的团结制度。’

“这一理念立即得到了支持。”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p. 291-2]

另一个例子是木工工会，该工会就社会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决定实行社会化（而商店工会也进行了类似的讨论，但大多数工人拒绝社会化）。据罗纳德·弗雷泽所述，一名“工会代表会走访各个小型作坊，向工人们指出这些作坊的工作条件既不健康又危险，并强调革命正在改变这一切；最终争取到他们的同意，关闭作坊，搬迁至由工会建设的‘双 X 工厂’和‘33 EU’。” [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222]

1936 年 12 月，各工团代表召开全体会议，制定了关于社会化的规范，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低效性。会议报告指出：

“大多数小型制造作坊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分散性以及缺乏技术和商业准备。这阻碍了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也妨碍了它们整合为更优质、更高效的生产单元，从而无法实现更好的设施条件与协调管理……对我们而言，社会化必须纠正这些缺陷，并改善各个行业的组织体系……要实现一个行业的社会化，我们必须按照一个整体的、有机的计划，将该行业的各个独立单元整合起来，以避免竞争及其他妨碍生产和分配良好高效组织的障碍。” [quoted by Souchy,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83]

正如苏奇所指出的，这份文件在集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工人们意识到，“工人必须考虑到，部分的集体化最终将退化为某种资产阶级合作社模式。” [Op. Cit., p. 83] 因此，许多工团并未彼此竞争以获取利润，而

是将盈余集中，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分配，而非局限于单个集体。

这一过程在众多工会和工团中持续进行，而且毫不意外地，不同地区和行业在协调方式上的选择也有所不同，这正符合自由社会的预期。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两种组织模式可以称为“工团化”（syndicalisation）和“邦联化”

（confederalism）（我们将在此忽略由集体化法令建立的组织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并非由工人们自行创建）。

“工团化”（syndicalisation，本文所使用的术语）意味着 CNT 的产业工会管理整个行业。这一方案曾在木工工会经过广泛讨论后得以实施。工会内部的“由 FAI 主导的”一派“坚持认为，无政府主义的自我管理意味着工人们应建立并运作自主的生产中心，以避免官僚化的威胁。”然而，支持工团化的一方最终占了上风，生产被纳入工会管理，行政职位和代表会议由基层工人选举产生。不过，该模式的“主要缺陷……（也正好印证了最初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意见），在于工会变得像一个庞大的企业”，其“结构变得日益僵化。” [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222] 一位激进派成员指出：“从外部来看，它开始像一个美式或德式的托拉斯^①”，工人们发现难以推动变革，并“感觉自己并未真正参与决策。” [quoted by Fraser, *Op. Cit.*, p. 222 and p. 223] 尽管如此，这并未阻止工人在第一次年度大会上几乎全体连任所有管理职位。

最终，工会管理的行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区别似乎仅在于：工人可以在相对固定的全体大会上投票选举（并罢免）行业管理层。尽管这相较于资本主义已是极大改进，但仍难称为最理想的参与式自我管理模式。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由西班牙内战及斯大林主义主导的反革命所引发的经济问题，显然对任何行业的内部结构都造成了影响。因此，我们无法断言导致工人被边缘化的责任，应该完全归咎于该组织模式本身。

另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可以称为**“邦联化”**（confederalisation）。这一体系基于各个工作场所之间（通过 CNT 工会）的横向联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我管理**以及**互助。这种合作形式在巴达洛纳的纺织工业中得到了实践（而在木工工会中则遭遇失败）。其基本原则是，每个工作场所由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负责运作，自主销售产品、接受订单并获得收益。然而，“每家工厂的所有活动都需向工会报告，工会负责追踪进展并统计数据。如果工会认为某家工厂的行为不符合整个集体化行业的整体利益，就会通知该企业，并要求其调整方向。”这一体系确保“既避免了大型‘工会托拉斯’的风险，也规避了原子化集体的弊端。” [Fraser, *Op. Cit.*, p. 229] 一位激进派成员指出，工会“与其说是一个直接的等级化执行机构，不如说更像是对集体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指挥者。”集体联合体还创建了“西班牙的第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包括退休金、免费药品、病假工资和产假工资。此外，还设立了一项补偿基金，“以帮助经济实力较弱的工团支付工人工资，每个工团的缴纳金额与其雇佣工人的数量成正比。” [quoted by Fraser, *Op. Cit.*, p. 229]

^① 托拉斯（Trust），一种资本主义下的企业垄断形式。

正如所见，工业工团在许多方面协调其活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上的成功。也可以预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并探索了各种解决方案，毕竟，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正如 H.2.5 节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清楚社会变革需要时间）。因此，CNT 的工人们面临诸多问题，并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发展他们的自我管理实验，这并不令人意外。不幸的是，由于法西斯势力的侵略以及共产党和共和派的背后捅刀，这一实验未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彻底解答我们关于其可行性的所有问题。然而，如果给予足够的时间，我们确信他们能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一社会实验不仅高度成功，而且充满希望。

I.8.5 西班牙的农业合作社是如何组织和协调的？

何塞·佩拉茨（Jose Peirats）对农民中的集体化描述如下：

“被剥夺的土地被移交给农民工团，然后由这些工团组织起最初的集体。一般而言，小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得到了尊重，前提是只有他们本人或其家庭成员才能耕作，不得雇佣劳动者。在加泰罗尼亚等地区，小农经济传统占主导地位，土地较为分散，缺乏大型庄园。许多农民与全国劳工联盟（CNT）一道，建立了集体，将各自的土地、牲畜、农具、家禽、粮食、肥料，甚至收获的作物都集中在一起。

“位于集体内部的私人农场会导致土地零散化，妨碍高效耕作。为了鼓励这些土地所有者搬迁，给予了他们位于集体外围的更多或更优质的土地。

“对于那些没有任何财产可贡献给集体的成员，他们仍然可以在集体中享有与他人相同的权利与义务。在一些集体中，加入者必须贡献他们的资金（如加泰罗尼亚的吉龙代利亚、阿拉贡的拉古纳罗塔以及瓦伦西亚的塞尔韦拉-德尔马埃斯特拉）。”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112]

多尔戈夫（Dolgov）观察到：“最高权力属于、并实际上由全体会员大会行使；所有权力均来自基层人民组织，并最终回归于基层。” [Op. Cit., p 119fn] 佩拉茨还指出，集体在决策过程中实行“极端民主”。例如，在阿德穆斯（Ademuz），“每周六都会召开大会”，而在阿尔科莱亚-德辛卡（Alcolea de Cinca），“大会在必要时随时召开。”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46] 亲历者加斯东·勒瓦尔（Gaston Leval）对这一自我管理的爆发进行了总结：

“定期的全体成员大会通常每周、每两周或每月召开一次……这些会议完全没有因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产生的紧张和指责——即便这些少数人是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大会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讨论。民主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不属于集体的‘个人主义者’也能参与讨论，并受到集体成员的倾听。”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119fn]

工作“通常是以合作的方式在小组内完成的。在较小的集体中，所有工人都会聚集在一起，讨论需要完成的工作以及如何分配任务。在较大的集体中，每个工作小组的代表会定期召开会议。集体的全体大会通常每周、每两周或每月召开一次，讨论的问题涉及工时、工资，以及食品和衣物的分配。” [Martha A. Ackelsberg in *Free Women of Spain*, p. 106] 正是在这些面对面的大会上，集体内部及外部的资源分配问题得以决定。在这里，当涉及互助的重要性时，人们会诉诸个体的同理心。正如一位活动家回忆道：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愿分享，他们认为每个集体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但他们通常会在大会上被说服。我们会尝试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与他们交流。我们会问：‘当地方头目 (cacique) 在工作不足时任由人们挨饿，你认为这公平吗？’他们会回答，‘当然不公平。’最终，他们都会接受这一观点。别忘了，在阿拉贡有三十万名集体成员，而我们中只有一万人曾是 CNT 的成员，我们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要做。” [quoted by Ackelsberg, *Op. Cit.*, p. 107]

此外，在西班牙的许多地区（例如阿拉贡和莱万特）都建立了集体的区域联合会。这些联合会，是在各地区集体派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上创建的。这些代表大会，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联合会运作方式、及其成员集体间相互承诺的基本规则。代表大会还选举出一个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大会制定的政策。莱万特联合会的组织结构如下：

“这 900 个集体被整合进 54 个市镇联合会，这些市镇联合会又进一步分为五个省级联合会，而在最上层，它们最终归属于地区委员会(Comite)……[这个委员会]由年度代表大会直接指定，对大会以及成百上千名由同伴选出的农民代表负责……同样，也是根据这些代表的倡议，莱万特联合会被划分为 26 个总部门，以适应不同的劳动专长及其他社会活动。这 26 个部门构成了一个整体，它或许是历史上首次在国家与政府体系之外，完整地包揽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体系。” [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54]

阿拉贡联合会的章程是在 1937 年 2 月中旬的成立大会上，由 500 名代表共同制定的。章程规定，将设立“若干县级联合会”，以确保集体的正常运作，并规定联合会“每六个月召开一次例行大会，此外还可根据需要召开特别大会。”新的集体可以在“集体居民的全体大会同意”后加入联合会。该联合会的目标是“协调本地区的经济潜力，并……按照自治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以团结互助为导向。” [quoted by Jose Peirats, *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vol. 1, p. 240]

这些联合会承担了许多任务。它们负责将集体的剩余产品分配到前线和城市，消除中间商，确保剥削的终结。同时，它们还协调集体之间的物资交换。此外，联合会使各个集体能够集中资源，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修建道路、运河、医院等），并投资于单个集体无法负担的生产资料。通过这种方式，各集体得以整合资源，扩大和改进生产资料、以及其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所有这些措施，再加上乡村和城镇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向前线抗击法西斯的民兵提供粮食供应，共同推动了整个地区的发展。

乡村的集体化，解放了原本在私有制下被浪费的农村工人和农民的创造潜力。群众大会使得社区问题和改善措施能够被直接发现和解决，人们可以在讨论和辩论中共享各自的经验与想法，从而丰富集体决策。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如果某些事情行不通，我们随时准备调整我们的想法，这正是我们的集体相比于俄国那种国家创建的集体的优势。我们是自由的。每个村庄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这种地方性的动力和地方性的自主性至关重要。” [quoted by 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357]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这一模式使西班牙农村摆脱了贫困和恐惧，迈向了更高的福祉和希望。

1.8.6 农业集体取得了哪些成就？

最基本而言，因为集体内的自我管理与合作相结合，使得农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就是生产力有所提高。正如历史学家本杰明·马丁所总结的：“尽管无法对所有乡村土地的接管行动进行概括，但毫无疑问，大多数参与合作社和集体的农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The Agony of Modernisation, p. 394] 另一位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也指出：“从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看，自我管理的集体似乎是成功的。它们还似乎促进了社区关系的和谐。” [The Spanish Civil War, p. 95]

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消费的增长上，还包括自由的增加。再次引用阿拉贡贝塞特集体的一名成员所言：“生活在集体中……真是棒极了。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村委员会的运作不令人满意，人们可以直接提出意见。委员会，是会在没有召集全体村民参加全体大会的情况下，作出重大的决定的。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美妙。” [quoted by 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288] 安东尼·比弗指出，“自我管理的集体即使并不比以前更富裕，仍然要幸福得多。关键在于劳动者能够自己管理集体——这与苏联国家集体化的灾难形成了鲜明对比。” [Op. Cit., p. 95] 以下是何塞·佩拉特斯提供的一些例子：

“在蒙特布兰克，集体成员清理掉了原本毫无用处的老葡萄藤，重新种植了新的葡萄园。通过使用拖拉机进行现代化耕作，土地得到了改良，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幅增长……阿拉贡的许多集体修建了新道路、并修复了旧道路，安装了现代化的面粉厂，并将农业和畜牧业的废弃物加工成有用的工业产品。许多这些改进都是由集体首先发起的。一些村庄，如卡兰达，修建了公园和公共浴场。几乎所有的集体都建立了图书馆、学校和文化中心。”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116]

加斯頓·勒瓦尔指出：“莱万特农民联合会……生产了西班牙全国超过一半的橙子，总产量接近四百万公斤（1公斤约合 2.25 磅）。该联合会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没有中间商）运输和销售了超过 70% 的作物。（该联合会的商业组织包括自己的仓库、卡车和船只。1938 年初，出口部门在法国设立了自己的机构，

分布在马赛、佩皮尼昂、波尔多、瑟堡和巴黎。)在西班牙全国用于水稻种植的 47,000 公顷土地中,瓦伦西亚省的集体就耕种了 30,000 公顷。” [Op. Cit., p. 124] 何塞·佩拉特斯进一步补充道:

“在农村西班牙,对文化和教育创新的关注是史无前例的。安波斯塔的集体组织了针对半文盲者的课程、幼儿园,甚至设立了一所艺术与职业学校。塞罗斯的学校对所有居民开放,无论他们是否属于集体。格劳建立了一所以其最著名市民华金·科斯塔命名的学校。卡兰达集体(人口仅 4,500 人)为 1,233 名儿童提供教育。成绩最优异的学生被送往卡斯佩的学校学习,所有费用由集体承担。阿尔科里萨(人口 4,000)的学校有 600 名儿童就读。许多学校设立在废弃的修道院中。在格拉纳代拉(人口 2,000),课堂设在被废弃的国民警卫队营房里。格劳还组织了一座印刷图书馆和一所艺术与职业学校,共有 60 名学生。该建筑还设有一所美术学院和一个高级博物馆。在一些村庄,电影院首次出现。佩尼亚尔瓦的电影院设立在一座教堂内。维拉德卡纳建造了一座实验农业实验室。” [Op. Cit., p. 116]

佩拉特斯总结了农业集体的成就如下:

“在分配方面,集体的合作社消除了中间商、小商贩、批发商和投机商,从而大幅降低了消费价格。集体消除了农村生活中大部分寄生性的因素,并且如果不是因为腐败官员和政党的庇护,这些因素本可以被彻底扫除。非集体化地区也间接受益于较低的物价,同时还享受了集体提供的免费服务(洗衣房、电影院、学校、理发和美容院等)。” [Op. Cit., p. 114]

勒瓦尔强调了以下成就(以及其他方面的进步):

“在农业集体中,团结精神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践。每个人不仅都能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且各地区的联合会越来越多地在集体间实行互助原则。为此,它们建立了公共储备,以帮助那些受自然条件限制的村庄。在卡斯蒂利亚,专门为此目的设立了特别机构。在工业领域,这种做法似乎最早在加泰罗尼亚医院区的铁路行业开始,随后在阿尔科伊得到了推广。如果不是政治妥协阻碍了公开的社会化,这种互助实践本可以更加普遍……一个极其重要的胜利是女性获得了生存权,无论其职业或职能如何。在大约一半的农业集体中,女性的工资与男性相同;在其他地方,女性的工资较低,似乎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女性很少独自生活……在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莱万特、卡斯蒂利亚、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所有农业集体中,工人们自发组织成劳动小组,分配土地或工作任务;通常,他们被指定到具体的区域。劳动小组选出的代表与农业集体的代表开会,规划生产工作。这种典型的组织形式是自发产生的,由地方主动地推行……此外……集体整体上每周、每两周或每月召开一次大会……大会回顾所选出的委员会成员的工作,并讨论特殊情况及突发问题。所有居民——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生产者还是非生产者——都参与讨论并共同作出决定……在土地耕作方面,最显著的进步包括:农业机械化和灌溉的迅速普及、更大的作物多样化以及植树造林。在畜牧业方面的成就,包括:牲畜品种的选择和繁育、适应当地环境的品种改良,以及大规模建设集体畜舍。” [Op. Cit., pp. 166-167]

正如格雷厄姆·凯尔西所指出的，集体化“使乡村社会得以合理化，并更高效地利用可用的经济资源。木匠和砖匠，不再因富有地主对他们的劳动力没有需求而闲置，而是被投入到建设农业设施、和提供村庄此前几乎难以想象的社会福利之中。”[由格雷厄姆·凯尔西所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自由共产主义与国家》，p. 169] 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对此作出了精辟总结：

“这些集体的成就极为广泛。在许多地区，[尽管大量年轻人奔赴前线作战，但]农业生产依然得以维持，甚至有所增长，并且往往引入了新的耕作和施肥方式……集体成员修建了鸡舍、牲畜棚以及其他用于照料社区动物的设施。集体联合会协调修建了道路、学校、桥梁、运河和水坝。其中一些基础设施，至今仍作为集体对西班牙农村的持久贡献而存在。集体还安排将富裕集体的过剩农产品转移至短缺的地区，或者直接在村庄之间进行调配，或者通过地区委员会设立的机制进行分配。” [由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所著的《西班牙的自由女性》，pp. 106-107]

除了这种集体间的互助，农村集体还向前线部队供应食物：

“各集体自愿向战斗部队提供了大量物资和补给。乌蒂尔向马德里前线运送了 1,490 升食用油和 300 蒲式耳的土豆（此外还提供了大量的豆类、大米、荞麦等）。波拉莱斯·德·图哈纳向前线运送了大量的面包、油、面粉和土豆，并向军医院提供了鸡蛋、肉类和牛奶。

“当我们考虑到这些集体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工人正奋战在战壕中时，他们的努力就显得更加意义重大。小小的维拉博伊集体就有 200 名成员在前线；维莱德坎斯有 60 名；安波斯塔有 300 名；卡兰达则有 500 名。” [由何塞·佩拉特斯所著的《无政府主义集体》，p. 120]

因此，这些集体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实现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团结互助成为现实，以往被边缘化的人们直接、充分地管理自己的社区事务，并按照自身的需求和愿望改造社会。

I.8.7 农村的集体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吗？

不是。关于农村集体是由无政府主义民兵通过“恐怖手段”建立、组织和运作的说法，是由西班牙共产党中的斯大林派编造的谎言。近年来，某些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又重新炒作并重复了这些斯大林派的虚构内容。无政府主义者自 1936 年以来一直在驳斥这些指控，而现在也有必要再次澄清这一点。正如弗农·理查兹所指出的：“无论斯大林主义今天看起来多么名誉扫地，事实仍然是，斯大林派对西班牙内战的谎言和解读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这大概是因为当前解读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们的政治偏见使然。” [“Introduction”, 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1] 因此，我们将在此提供证据，以反驳

有关农村公社是通过武力建立的说法。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农村集体是在西班牙多个地区自发形成的，例如黎凡特（900 个集体）、卡斯蒂利亚（300 个集体）和埃斯特雷马杜拉（30 个集体），而这些地区并不存在无政府主义民兵。在加泰罗尼亚，例如，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的民兵在前往阿拉贡的途中经过了许多村庄，但其中仅建立了约 40 个集体，而在阿拉贡却建立有 450 个集体。换句话说，农村集体化的进程与无政府主义部队的存在并无直接关联。全国 1700 个农村集体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无政府主义民兵未占主导的地区建立的。

一位历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似乎暗示阿拉贡的集体是被强加于当地居民的。他写道：“集体化是在 CNT 民兵纵队的总体保护下进行的，尽管未必是由他们直接实施的。这是革命少数派试图控制生产和消费，以实现平等主义目标并满足战争需要的举措。”需要注意的是，他并未直接声称无政府主义民兵**强行建立了**集体，因为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此外，弗雷泽在叙述中自相矛盾。一方面，他暗示“在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强制集体化的正当性更接近于战时共产主义，而非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集体的成员并未达到 100% 的覆盖率。如果集体化是强制性的，为什么仍然有人留在集体之外？同样，他提到，一些 CNT 民兵领导人以战争需要为由为“强制集体化”辩护，同时也承认 CNT 的官方政策是反对强制集体化的，而这一反对也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因为完全集体化的集体仅约 20 个（即总数的 5%）。[Blood of Spain, p. 370, p. 349 and p. 366] 他的著作中所采访的集体成员也不断强调，并非所有人都加入了集体！

因此，弗雷泽试图将阿拉贡的集体描绘为 CNT 强行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并声称集体化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强制性的，这种说法也与他自己提供的证据并不相符。

弗雷泽指出：“没有必要用手枪逼迫他们[农民]，[加入集体]：‘法西斯分子’被枪决所营造的胁迫性氛围已经足够。‘自发的’与‘强制的’集体并存；而在这些集体内，也既有自愿者，也有非自愿者。” [同上, p. 349] 因此，他暗示阿拉贡的集体是被强加于农村人口的论点，建立在当时阿拉贡存在“胁迫性氛围”这一观察之上。当然，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内战中，特别是在前线附近，这种“胁迫性氛围”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这并不能归咎于 CNT。正如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总结的那样，尽管确实发生了类似的处决事件，但 CNT 并未发起一场全面的恐怖行动：

“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努力区分活跃的政治敌人，与那些仅仅因出身、意识形态或经济职能而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人。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委员会，希望了解被指控的君主主义者或保守派做了什么，而不仅仅是他们怎么想的或者怎么投票的……承认革命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暴力行为，同时也认可其社会经济成果得到大多数该地区农民的支持，这两者并不矛盾。” [引自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 CNT》，第一卷，p. 146]

这是一场面对法西斯主义关乎生死的斗争：在法西斯势力控制的地区，他们正系统性地屠杀大量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因此，一些无政府主义部队未经审判，就处决那些支持并可能协助法西斯分子的人，实属意料之中。考虑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以及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的所作所为；CNT 民兵深知如果这场斗争失败，他们自己以及亲友将遭遇何种命运。

然而，问题在于，战争的存在和无政府主义民兵的接近，是否使得当时的环境极度胁迫到——以至于个人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事实本身已给出答案。在阿拉贡被解放的地区，农村集体化在其高峰时期涵盖了约 70% 的人口，而仍有约 30% 的人选择不加入集体——这一比例并不小。如果集体是通过恐怖或强制手段建立的，那么集体成员的比例应当是 100%。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表明集体化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自愿性质的（需要指出的是，亦有其他数据表明集体成员的比例更低，这使得“强制集体化”的论点更加站不住脚）。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尔（Antony Beevor）尽管承认“无疑存在压力；而且在起义后的狂热时期，某些场合下确实使用了武力”，但他也仅仅是在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每个村庄内既有集体主义者，也有个人主义者，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农民并没有被枪口胁迫进入集体。” [西班牙内战, p. 206] 此外，如果 CNT 民兵确实强迫了农民加入集体，我们应当预期集体成员数量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顶峰，而不是随着时间逐步增长。然而事实表明，集体成员的增长是渐进的：

“在 1937 年 2 月中旬于卡斯佩（Caspe）召开的地区集体代表大会上，近 80,000 名集体成员参加了会议，代表了该地区‘几乎所有的村庄’。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到 4 月底，集体成员人数上升至 140,000 人；到 5 月第一周结束时达到 180,000 人；到 6 月底更是增长至 300,000 人。” [格雷厄姆·凯尔西，“阿拉贡的无政府主义”，载于马丁·布林克霍恩编著的《1931-1939 年西班牙的冲突》，p. 61]

如果这些集体确是通过强制手段建立的，那么到 1937 年 2 月，其成员数量就应该已经达到 30 万，而不是在四个月后才稳步增长至这一数字。同样，也不能声称这一增长是由于新的村庄被集体化，因为几乎所有村庄在 2 月时都已派出代表。这表明，许多农民之所以加入集体，是因为共同劳动带来的优势、集体化，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资源；以及原先被少数人垄断的剩余财富，如今可以被用于提高整个社区的生活水平。

集体的自愿性质，还体现在许多集体允许人们选择不加入。据记载，“完全实现集体化的村庄很少。” [Beevor, Op. Cit., p. 94] 在阿拉贡，一位无政府主义的教师亲历者指出，强迫小农加入集体“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完全集体化、不允许个人退出的村庄不超过二十个。” [quoted by Fraser, Op. Cit., p. 366] 阿拉贡的集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占 95%），坚持他们的自由意志原则，允许那些不愿加入的人保持独立，而不是强迫村庄中的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因此，在 450 个集体中，只有大约 20 个属于“完全的”集体，而大约 30% 的人口选择不加入，并且他们感到足够安全。换句话说，在绝大多数集体中，加入者可以看到，未加入者仍然是安全的。这些数据表明，这场运动本质上是自发

和自愿的。而这一点，也反映在 1936 年 7 月 19 日之后新成立的市政委员会的组成上。正如格雷厄姆·凯斯利（Graham Kesley）所指出的：“从结果中可以立即看出，尽管该地区经常被贴上‘完全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排除其他所有政治势力’的标签，但实际上，CNT 远没有达到人们通常暗示或推测的那种绝对支配地位。” [Anarchosyndicalism,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p. 198]

在他的农村革命记录中，伯内特·博洛滕（Burnett Bolloten）指出，在被解放的阿拉贡地区，这场革命“影响了超过 70% 的人口”，并且“该地区的 450 个集体中，许多是基本自愿形成的”，尽管“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独特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邻近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兵的存在，他们绝大多数是 CNT 和 FAI 的成员。” [The Spanish Civil War, p. 74] 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并不否认。正如加斯东·勒瓦尔（Gaston Leval）所指出的：“确实，这些武装力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促进了这些建设性的成就，因为它们阻止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及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积极抵抗。”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90]

因此，民兵的存在改变了阿拉贡的阶级力量对比，他们通过摧毁资本主义国家（即地方权贵——“caciques”^①——无法再获得国家援助来保护其财产），使许多无地农民得以接管土地。民兵的存在确保了土地可以被接管，因为他们摧毁了革命前存在的资本主义“暴力垄断”（其权力将在下文进一步阐述），从而使阿拉贡人民有机会进行社会实验。这场农村中的阶级战争也被博洛滕所描述：“如果个体农民对农业迅速且广泛的集体化感到忧虑；那么无政府工团主义的 CNT 和社会主义的劳工总联盟（UGT）的农民工人，则将其视为新时代的开端。” [Op. Cit., p. 63] 这两个都是群众性组织，并且支持集体化。

因此，无政府主义民兵的存在，使农村工人阶级得以废除由私有制（并受国家强制执行）所制造的土地人为稀缺现象。农村地主阶级显然对他们无法再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感到恐惧（正如博洛滕所指出的，“农业的集体制度威胁到农村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使其失去雇佣工人。” [Op. Cit., p. 62]）因此，富农和大地主对集体化的憎恨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份关于瓦尔德罗夫斯（Valderrobes）地区的报告显示了集体化所获得的民众支持：

“集体化遭到了右翼反对者和左翼对手的抵制。如果那些一直游手好闲、如今被剥夺财产的人被问及对集体化的看法，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说这是一种抢劫，另一些人会说这是一种独裁。然而，对于那些年迈的工人、日薪工人、佃农以及一直受大地主和冷酷高利贷者压迫的小业主而言，集体化却被视为一种解放。” [quoted by Bolloten, Op. Cit., p. 71]

然而，许多历史学家忽视了农村内部存在的阶级差异，并将阿拉贡地区集体化的兴起（同时忽视其他地区的集体化）仅仅归因于 CNT 民兵的存在。例如，弗雷泽写道：

^① Caciques: 西班牙语，意为地方酋长、敌方头目

“集体化迅速扩散开来。这并不是 CNT 领导层的指示——就像巴塞罗那的[工业]集体化一样。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倡议都来自 CNT 的激进派；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CNT 的武装力量在后方创造了社会革命的‘氛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巴塞罗那街头的主导地位，在阿拉贡被 CNT 的民兵纵队重新上演——这些纵队主要由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组成。在那些已经存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村庄，他们抓住时机，开展期待已久的革命，并自发进行集体化。而在那些没有这种组织的村庄，村民可能会受到民兵相当大的压力去实行集体化。” [Op. Cit., p. 347]

弗雷泽暗示，这场革命主要是从加泰罗尼亚输入到阿拉贡的。然而，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除杜鲁蒂（Durruti）外，CNT 的纵队领导人都“反对”建立阿拉贡委员会（即集体化的邦联）。这就几乎无法被视为，是加泰罗尼亚 CNT 强行推行的社会革命！此外，阿拉贡的 CNT 本身就是一个广泛且有影响力的组织，这也表明认为集体化是由加泰罗尼亚 CNT 强行输入的观点，根本是错误的。弗雷泽还指出，“在一些地方[阿拉贡的村庄]里，CNT 蓬勃发展，在另一些村庄里，UGT 更为强大，而在许多地方根本没有工会组织。”[Op. Cit., p. 350 和 p. 348] 关键的问题在于，CNT 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证据表明，阿拉贡本地的农村 CNT 组织广泛、力量强大并不断发展，因此，将集体化归因于外来强加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事实上，到 1930 年代，“CNT 真正的农民基础……位于阿拉贡。”在萨拉戈萨，CNT 的增长“为自由意志主义者在下阿拉贡地区的激进宣传提供了跳板，特别是在那些贫困的劳动者和债务缠身的农民中。”[默里·布克钦，《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p. 203]

格雷厄姆·凯尔西（Graham Kelsey）在其关于 1930 年至 1937 年间阿拉贡的 CNT 社会史研究中，提供了更多证据。他指出，除了“自由意志主义团体的传播、以及 CNT 成员对自由意志主义理论日益增长的意识……促成了阿拉贡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发展”之外，“农业的动荡”的存在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最终导致了“阿拉贡 CNT 网络的复兴”。因此，到 1936 年，CNT 在“建立于 1933 年的基础之上”，并且“终于成功地将萨拉戈萨（Zaragoza）市区工会组织的巨大力量，转化为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区域性网络”。[Op. Cit., pp. 80-81, p. 82 and p. 134]

凯尔西指出，无政府主义在阿拉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然而，在 1910 年代之前，由于地方权贵（被称为 **caciques**）的强大影响力，CNT 在阿拉贡农村地区的进展甚微：

“省级阿拉贡的地方地主和小工业家，即 **cacique**，竭尽全力镇压这些最早的农村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成立于 1915 年后]。到了 1923 年夏天阿拉贡 CNT 邦联第一次农村代表大会召开时，该组织通过大量宣传活动所取得的进展，在其他地方却因镇压而遭到严重打击。” ["Anarchism in Aragón", Op. Cit., p. 62]

一名 CNT 活动家描述了这些地方权贵的势力，以及在阿拉贡成为工会成员的困难：

“镇压在大城市与在乡村是截然不同的。在乡村，每个人都彼此熟识，宪兵队会在第一时间得知同志的任何细微举动。无论是朋友还是亲属都无法幸免。凡是不遗余力地为国家镇压机关效力的人，都会被追捕、迫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遭到殴打。” [quoted by Kelsey, Op. Cit., p. 74]

然而，尽管在农村工会组织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即使在 1931 年，“宣传活动促成了数十个乡村工会组织的建立，但紧随其后的是来自乡村 **cacique** 的反攻，使得这些工会被迫解散。” [Op. Cit. p. 67] 即便面对这样的镇压，CNT 依然不断发展，并且“自 1932 年底起”，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成功扩展到了此前从未涉足的多个地区”。[Kesley, *Anarchosyndicalism,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p. 185] 这种增长在 1936 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农村地区的激进行动逐渐削弱了 **cacique** 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他们对法西斯政变的支持）。

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选举获胜后，多年来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得到了回报。在大选后的六周内，“农村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支持急剧增长”。这一趋势在阿拉贡 CNT 的四月代表大会的议程中得到了强调，并决定“关注农村问题”，而大会所通过的计划“正是四个月 after 阿拉贡解放区所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后，一系列密集的宣传运动在整个区域邦联的各个省份展开。许多从未听闻无政府工团主义宣传的村庄开始举办会议。这一策略极为成功，到 1936 年 6 月初，阿拉贡的工会数量已超过 400 个，而仅在一个月前，这一数字还是 278 个。[Kesley, "Anarchism in Aragón", Op. Cit., pp. 75-76]

工会成员数量的增长，反映了阿拉贡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加剧，以及他们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努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1935 年夏天，保守派天主教报纸《阿拉贡先驱报》（**Heraldo de Aragón**）的一名记者前往阿拉贡南部考察，并指出：“许多家庭正在挨饿，男人们无工可做，这种情况正在促使年轻人接受误导性的教导。” [quoted by Kelsey, Op. Cit., p. 74] 因此，凯尔西所指出的 CNT 成员数量的增长以及社会斗争的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阿拉贡的激进工团主义正在增长。在 1936 年 2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的五个月间，萨拉戈萨省发生了七十多起罢工，比此前任何一年记录的总数都多，而且其他两个省的情况显然也并无不同……这些罢工绝大多数发生在省内的城镇和乡村。罢工席卷了整个省份，并且至少有三起罢工演变成了全面的总罢工。” [Op. Cit., p. 76]

因此，在 1936 年春夏之际，CNT 的成员数量激增，而这一增长也反映了阿拉贡城乡人口日益激进的斗争。多年宣传与组织工作的积累，确保了自由意志主义影响力的扩大；而这种增长最终在革命时期的阿拉贡解放区，表现为集体的建立。因此，集体化社会的构建，直接根植于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五年间兴起的、以无政府主义原则为指导的大规模工团运动。这些合作社的建立遵循了阿拉贡 CNT 1936 年 4 月大会所通过的纲领，该纲领反映了阿拉贡农村工会成员的意愿（并且，由于 CNT 在此后的迅猛发展，它显然也反映了该地区的普遍民意）：

“阿拉贡在起义后的自由意志主义主导地位，直接体现了无政府主义者在战前所取得的主导地位；到 1936 年夏天，CNT 已在整个阿拉贡建立起一个严格遵循自由意志主义原则的大规模工团运动。而这一广泛而得到充分支持的网络，正是大规模合作实验的基础。” [Kesley, Op. Cit., p. 61]

此外，CNT 在阿拉贡农村地区拥有广泛支持的另一重要证据是，该地区成为了 1933 年 12 月 CNT 组织的起义的中心。正如布克钦所指出的：“只有阿拉贡的大规模起义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萨拉戈萨……许多村庄宣布遵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而最激烈的战斗可能发生在里奥哈（Rioja）葡萄园工人与当局之间。” [Op. Cit., p. 238] CNT 不太可能在一个自身影响力微弱的地区组织起义。因此，凯尔西认为：“正是那些在 1933 年 12 月起义中最为重要的地区”，才会在 1936 年“寻求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模式，以奠定自由意志主义阿拉贡的基础。” [Anarchosyndicalism,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p. 161]

因此，阿拉贡的大多数合作社是受 CNT（以及部分受 UGT）影响的工人，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创造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其特征是自愿性和直接民主。CNT 在阿拉贡农村并非一个陌生的组织，而是已经扎根并迅速发展：“从其城市基础向外扩展……CNT 首先在 1933 年，随后在 1936 年，更大范围成功地将一个本质上以城市为中心的组织，转变为真正的区域性邦联。” [Kesley, Op. Cit., p. 184]

现有证据表明，像弗雷泽这样的历史学家所暗示的“阿拉贡合作社是由 CNT 民兵强加给不情愿的农民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阿拉贡的合作社是长期无政府主义活动在阿拉贡农村地区发展的自然结果，并且直接与 1930 年至 1936 年间 CNT 的迅猛增长相关。因此，凯尔西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与农业合作化“并不是由城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特遣队，强行施加在强烈抵触人口身上的经济术语或社会原则。” [Op. Cit., p. 161] 这也并不意味着在战线的“胁迫性环境”下，完全没有人被迫加入合作社；或战前一些没有 CNT 工会的村庄，因为 CNT 民兵的存在而建立了合作社。然而，这些情况可以被视为个例，而非普遍现象。

此外，CNT 在处理这种情况时的方式也值得注意。弗雷泽提到了阿洛萨（Alloza）村的案例。1936 年秋天，CNT 地区委员会的代表前往该村，建议村民进行集体化（值得强调的是，途经该村的 CNT 民兵并未试图在当地建立合作社）。村民大会随即召开，CNT 成员向村民讲解了他们的理念，并提出了组织集体的建议。然而，加入合作社与否以及如何组织合作社，则完全由村民自己决定（CNT 代表“强调不得粗暴对待任何人”）。在集体之中，自我管理是基本原则。一位成员回忆道：“一旦工作小组在友好的氛围下成立，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每个人相处得都还不错。”“没有必要去使用强制手段，也不需要纪律约束或惩罚……组成集体并不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Fraser, Op. Cit., p. 360] 这个集体如同绝大多数其他集体一样，是自愿且民主的：“我不能强迫他加入，我们不是生活在独裁之下。” [quoted by Fraser, Op. Cit., p. 362] 换句话说，合作社的建立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其组织方式完全由当地人自行决定。

当然，与任何公共物品（如果用经济学术语来说的话）一样，整个社区的所

有成员都必须为战争努力做出贡献，并为前线的民兵提供粮食。正如凯尔西所指出的：“军事叛乱发生在农历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整个阿拉贡南部的田地里，粮食已成熟待收……在阿尔巴拉特-德-钦卡（Albalate de Cinca）的集会上通过的纲领，第一条就规定，该地区所有人——无论是独立农民还是集体成员——都必须为战争贡献同等的力量，这一点在叛乱后立即成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Op. Cit., p. 164] 此外，为了防止投机和通货膨胀，合作社控制了农作物的价格。然而，这些政策，以及独立农民和集体成员在战争中的平等义务，实际上是由战争形势所决定的。

最后，为了支持农村合作社的群众性，我们可以通过 1937 年 8 月，共产党镇压集体后农村经济的崩溃来说明问题。这一事件充分揭示了当时民众的真实态度。

1937 年 10 月，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农业改革代表团（Regional Delegation of Agrarian Reform）承认，“在大多数村庄，农业劳动陷入瘫痪，对我们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这一点得到了共产党党员、农业改革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arian Reform）秘书长何塞·席尔瓦（Jose Silva）的证实，他指出，在李斯特^①进攻阿拉贡后，“田间劳作几乎完全停止，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未能按时耕种。”在 1937 年 10 月 9 日阿拉贡共产党农业委员会的会议上，席尔瓦强调“整个农民阶层的劳动积极性极低”，并表示由于集体的解散，局势已经变得“相当严峻。”[quoted by Bolloren, Op. Cit., p. 530]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Jose Peirats）解释了这一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民众的抵制：

“当需要为下一季的收成做准备时，佃农们发现他们无法独自耕种那些被[共产党]分配给他们的土地。而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即坚持合作主义原则的集体主义者，则拒绝在私有制的体系下进行劳动，更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58]

如果集体制是不受欢迎的，并且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强行建立的，那么为什么镇压后经济会崩溃？如果李斯特推翻的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政权，为什么农民没有因此受益？难道不正是因为合作社是阿拉贡人民自发的组织，并且得到了大多数当地人的支持吗？这一分析得到了历史学家雅各布·奥维德（Yaacov Oved）的支持：

“那些推行这项[攻击阿拉贡集体的]政策的人坚信，农民会对此举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是被强迫加入集体的。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除了那些重新获得土地的富裕地主外，大多数农业集体的成员都表示反对。他们失去了劳动的动力，不愿再像过去一样投入农业生产。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政府和共产党农业部长都被迫放弃其敌对的政策。”[“Communismo Libertario” and Communalism in the Spanish Collectivisations (1936-1939), pp. 53-4]

即使在共产党的镇压之下，大多数集体仍然坚持运作。如果说这都不能证明

^① 安立奎·李斯特（Enrique Lister Forján, 1907-1994），西班牙共产党政客与军官

集体是受欢迎的群众性机构，那还有什么能证明的呢？奥维德指出：“通过集体成员对新政策的普遍抵制可以明显看出，大多数成员是自愿加入集体的。政策一旦有所松动，新的集体便迅速兴起。然而，历史无法倒流，集体与当局之间的信任已被破坏，任何新的合作尝试都受到限制。” [Op. Cit., p. 54]

何塞·佩拉特斯在共产党进攻集体并随后对其进行合法化后，对这一局势作出了如下总结：

“很可能，这一阶段的集体化更真实地反映了成员们的真诚信念。他们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那些坚持下来的人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者。然而，将在这一阶段退出集体的人，简单地归类为反对合作化的个人主义者，未免过于武断。恐惧、官方的强制以及不确定性，在阿拉贡农民的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Op. Cit., p. 258]

在集体仍然存在的时期，农业产量增长了 20%（而且这一数据是与战前的丰收年相比的） [Fraser, Op. Cit., p. 370]。然而，在集体被摧毁后，经济立即崩溃。如果集体真的是强加给不愿意接受的农民的，这种结果几乎不可能出现（反而是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强制集体化导致了大饥荒）。只有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才最终使得所谓“自然秩序”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在西班牙乡村得以恢复。那些欢迎共产党镇压集体的地主们，同样也欢迎法西斯分子的到来，因为后者最终确保了财产对自由的胜利。

因此，总体来看，证据表明，阿拉贡的集体与莱万特、加泰罗尼亚等地的集体一样，都是由农村人口自发创建的**群众性**组织，本质上是一次自发的、广泛的社会革命的产物。关于无政府主义民兵通过武力建立这些集体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尽管在革命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暴力行为，个别情况下也**确实**出现了强制手段（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做法违反了 CNT 的政策），但这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对此，伯洛腾（Bolloten）的总结最符合事实：

“尽管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面对现实政治权力时，始终难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取得平衡，但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存在一些强制与暴力的个例，1936 年 7 月的革命却以其普遍的自发性和广泛的集体化运动而独树一帜，并展现出道德与精神层面上的革新潜力。像这样的自发运动，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Op. Cit., p. 78]

I.8.8 但西班牙的集体有什么创新吗？

是的。与资本主义旧有的论调——即“没有私有制，就不会有人进行创新”——相反，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工人和农民表现出了比私人企业制度下更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加斯东·勒瓦尔（Gaston Leval）对瓦伦西亚省南部卡尔卡亨特（Cargagente）地区集体化成果的描述，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该地区的气候特别适宜种植橙子……所有被社会化的土地，无一例外，都被精心耕作。果园被彻底清除杂草。为了确保树木能够吸收到充足的养分，农民们不间断地清理土壤。‘以前，’他们自豪地告诉我，‘这一切都属于富人，由拿着微薄薪水的劳工来耕作。土地疏于照顾，于是地主们不得不购买大量的化学肥料，尽管如果他们愿意清理土壤的话，本可以获得更好的收成……’他们骄傲地向我展示了那些经过嫁接以生产更优质果实的树木。”

“在许多地方，我观察到橙树的树荫下还种植了其他作物。‘这是什么？’我问道。随后我了解到，因其聪明才智而闻名的莱万特（Levant）农民，在橙园间大量种植了土豆。这些农民展现出的智慧，远胜过农业部的所有官僚。他们不仅仅种植土豆，在整个莱万特地区，他们都会充分利用适宜的土壤种植各种作物。他们还充分利用稻田的四个月[休耕期]进行种植。如果农业部长能在整个共和区效仿这些农民的做法，那么粮食短缺的问题几个月内便能得到解决。”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153]

而这，只是众多关于工业和农村集体化成果的案例之一。我们在此前已经提及了一些西班牙革命期间，通过集体化实现的效率提升（见 [1.4.10 节](#)）。另一个例子是面包烘焙业。苏奇（Souchy）报告称：“正如西班牙其他地方一样，巴塞罗那的面包和蛋糕大多是在夜间、于数百家小型面包房里烘焙而成。这些面包房大多位于潮湿阴暗、充满蟑螂和老鼠的地下室里。这些面包房全都被关闭了。新的面包房配备了现代化的烤炉和其他设备，生产出了更多、更优质的面包和蛋糕。” [Op. Cit., p. 82] 在格拉诺列尔斯（Granollers），工团“始终是推动变革的核心动力。所有旨在改善当地经济运行和结构的举措，几乎都可归功于它。”被集体化的理发业、制鞋业、木工行业以及工程行业，都得到了改进。小而不健康且低效的作坊被关闭，取而代之的是更大、更舒适且更高效的工厂。“社会化与合理化并行推进。” [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87] 更多内容请参见 [1.8.6 节](#)，以及 C.2.8 节（在该部分，我们提供了更多案例，以反驳‘工人控制会扼杀创新’这一指控）。

现有的大量证据——而上述例子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都证明了集体成员能敏锐地意识到投资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通过创新可以提高生产力，使劳动变得更加轻松且更具吸引力；而集体化，则为这种意识的自由表达提供了空间。集体化表明，只要给予机会，每个人都会关心自身事务，并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来改善生活和周围环境。事实上，资本主义在等级制度下扭曲了创新的方向，使其仅仅服务于节省成本和最大化投资者的利润，而忽视了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正如加斯顿·勒瓦尔所指出的，自我管理反而能激励创新：

“自由经济的理论家和支持者声称，竞争能够刺激主动性，从而激发创造力和发明；否则，这些能力将陷入停滞。然而，笔者在集体、工厂以及被社会化的作坊中进行的众多观察，使他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一个集体中，每个人都因服务于同伴的愿望所激励，因此，对技术进步的探索 and 追求也同样受到鼓舞。这种氛围还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最初的创新者行列。此外，在当前社会中，当一位个人主义的发明者创造出某项新技术时，它通常只能为资本家或雇佣他的个人所用；而在一个社群化的社会中，发明不仅能被他人迅速接受和发展，还能立即

应用于公共利益。我深信，在社会化的社会里，这种优越性将很快显现。” [Op. Cit., p. 347]

因此，西班牙自我管理的实践支持了 [1.4.11 节](#) 所提出的观点：一旦摆脱等级制度的束缚，个人将能够以创造性的方式与世界互动，以改善自身境况。人类思维本质上是一个活跃的主体，除非受到权威的压制，否则它无法停止思考和行动——正如地球无法停止围绕太阳旋转一样。此外，集体化的经验也表明，自我管理能够让思想在讨论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自我管理的实践也验证了巴枯宁的观点：正是因为社会汇聚了多种多样的观点、经验和思想，社会整体的智慧要远胜于最聪明的个体。而资本主义则通过人为设定的界限和等级制度，使个人和社会陷入贫困。

1.8.9 为什么，如果它真的那么好，为什么没能生存下来？

仅仅因为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够存续。例如，华沙犹太区对纳粹的起义最终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起义是错误的，或者纳粹政权是正当的——恰恰相反。同样，虽然西班牙共和区广泛开展的工人自我管理和自由集体实验，是自由社会中最重要社会实验之一，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佛朗哥的军队以及共产党人掌握着更优越的武器和资源。

面对佛朗哥的侵略和恐怖统治，背后还有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强大军事支持，以及共产党的背叛，再加上西方“民主”国家的冷漠态度（这些国家宣称“中立”，但当本国公民帮助佛朗哥时却选择性地无视）——革命能够持续如此之久，已然令人惊讶。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自身错误的借口。众所周知，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选择与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和共和派工会合作，并最终导致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政府（详见[下一节](#)）。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革命的失败。尽管主要的责任，可以归咎于那些自认为不可替代的“领导者”（如同大多数领导者一样，他们开始将自己视为是不可或缺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基层运动的成员对此几乎没有加以阻止。当时，大多数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在前线作战，因此无法参与工会和集体的会议，也就无法对其他工人产生影响（毫不奇怪，激进的“杜鲁蒂之友”无政府主义团体，主要是由前民兵组成）。然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幻象显然让大多数 CNT 成员难以抗拒（见 [1.8.12 节](#)）。

仍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别无选择：尽管与政府的合作带来了不幸的后果，但这依然是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观点得到了萨姆·多尔戈夫（Sam Dolgoff）的辩护，并在加斯顿·勒瓦尔（Gaston Leval）、奥

古斯特·苏奇（August Souchy）以及其他革命参与者的著作中找到了部分支持。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种合作，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当时，持此立场的是大多数非西班牙籍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占相当比例的少数派；而随着合作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反对的少数派最终成为多数派）。这种观点最为有力的表达见于弗农·理查兹（Vernon Richards）的《西班牙革命的教训》（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部分观点也体现在何塞·佩拉茨（Jose Peirats）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胡安·戈麦斯·卡萨斯（Juan Gomaz Casas）的《无政府主义组织：FAI 的历史》（Anarchist Organis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FAI），以及阿贝尔·帕兹（Abel Paz）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杜鲁蒂》（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之中。此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之后撰写的小册子和文章。也持续地表达了这一立场。

因此，无论一个社会制度多么优越，客观事实最终都会超越这一实验。萨图尔尼诺·卡罗德（Saturnino Carod，阿拉贡战线上一支 CNT 民兵纵队的领导人）总结了这场革命的成功以及其客观上的局限性：

“我们始终提防着背后被捅刀子，我们始终清楚，如果我们制造了问题，唯一的受益者便是战线对面的敌人。这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来说是一场悲剧；但这更是一场更为深远的——对于整个西班牙人民而言的悲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通过展示他们在工业和农业上进行集体管理的能力，使得共和国能够坚持斗争三十二个月。正是他们建立了军工产业，确保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组建了民兵，后来又加入了正规军。没有他们的创造性努力，共和国根本不可能继续这场战争……” [quoted by 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394]

因此，无论这场革命带来了多少益处，无论它如何推动了自由和平等的提升——它最终仍然失败了。然而，这一事实不应让我们忽视革命的成就或其所展现的潜力。相反，我们应当从中汲取灵感，并总结经验教训。

I.8.10 为什么 CNT 会与国家合作？

众所周知，1936 年 9 月，CNT 加入了加泰罗尼亚政府，随后在 11 月又加入了中央政府。这一决定源于 1936 年 7 月 21 日的决议，即在佛朗哥被击败之前，不去提及“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换言之，CNT 决定与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和工会合作，共同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决定最初表现为，CNT 同意加入由加泰罗尼亚政府领导人路易斯·孔潘斯（Louis Companys）提议成立的“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多个反法西斯政党和团体的代表组成。从这一点来看，CNT 加入正式政府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当时并不存在其他协调行动的机制（详见 [I.8.13 节](#)）。

因此，一个关键的问题便浮现出来：为什么 CNT 最终选择与国家合作，放弃自身原则，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反革命以及战争的失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或反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文章中，也经常提出这个问题。CNT 未能在 1936 年 7 月 19 日之后实施无政府主义，是否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政治理论存在缺陷？或者，西班牙革命期间 CNT 和 FAI 的经历是否表明，这仅仅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极端困难的客观环境下犯下的错误，而非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的失败？更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否从中汲取了教训？不言而喻，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后者是正确答案。正如弗农·理查兹（Vernon Richards）所指出的：“[这一]批判的基础，并不是西班牙的经验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不可行的，而是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未能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反而采取了敌人的策略。”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4]

那么，西班牙内战期间，CNT 为什么会去与国家合作呢？简而言之，这并非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错误；而是源于 1936 年 7 月 20 日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现实局势。CNT 和 FAI 的主要激进派所处的客观条件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而他们之后又错误地以无政府主义理论来为自己的决定辩护。

那么，1936 年 7 月 20 日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面临的局势是什么？简而言之：他们所处的局势充满未知。正如 CNT 向国际工人协会（IWA）提交的报告所指出的：

“莱万特（Levante）毫无防备，局势不明……我们在马德里处于少数地位。安达卢西亚的情况不明……北方毫无消息，我们只能假定西班牙其他地区已落入法西斯手中。敌军驻扎在阿拉贡，兵临加泰罗尼亚城下。外国领事官员的紧张情绪导致大批军舰聚集在我们的港口周围。” [quoted by Jose Peirats,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80]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茨指出，根据该报告：“1936 年 7 月 19 日，CNT 在加泰罗尼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在莱万特地区的力量较弱，且在中央政府和传统政党占据主导地位的西班牙中部地区，力量更弱。而在西班牙北部，局势十分混乱。CNT 本可以单独发动起义，并‘很可能成功’，但这样的夺权行动将导致三线作战：既要对抗法西斯势力，又要对抗政府，还要对抗国外资本主义。考虑到这种行动的艰难性，与其他反法西斯团体合作是唯一的选择。”[Op. Cit., p. 179] 正如 CNT 的报告本身所言：

“面对这一艰难的抉择，CNT 展现出了极大的谨慎与克制：要么彻底摧毁加泰罗尼亚的国家政权，向叛军（即法西斯势力）、政府和国外资本主义宣战，并完全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要么与其他反法西斯派别合作，共同承担政府的责任。” [quoted by Robert Alexander, *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vol. 2, p. 1156]

此外，正如加斯顿·勒瓦尔（Gaston Leval）后来所论述的那样，当时大多

数民众的“普遍关注点”是“击败法西斯势力……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站出来反对国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激起……大多数民众的敌意，这些民众会指责他们与佛朗哥同流合污。”推行无政府主义革命，很可能还会导致“法西斯势力和民主国家立即关闭边界并实施海上封锁。武器供应将被完全切断，而无政府主义者将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这一灾难性后果的罪魁祸首。”[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52 and p. 53]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总是强调他们的英雄在俄国革命期间所处的客观环境，但他们很少提及1936年7月20日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局势。这种做法似乎颇具虚伪性——他们将俄国内战作为布尔什维克一切针对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罪行的辩解理由，却对西班牙内战初期CNT-FAI所面临的挑战保持沉默。如果CNT决定在加泰罗尼亚实施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法西斯势力（掌控着西班牙大部分军队）、共和政府（控制着剩余军队），以及加泰罗尼亚内部支持共和国的派别——然而，这一点却很少被提及。此外，CNT做出与政府合作的决定，正是在巴塞罗那成功镇压军队起义之后——当时全国局势仍然不明朗，而社会革命也才刚刚开始。斯图尔特·克里斯蒂（Stuart Christie）指出，当时CNT领导层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加泰罗尼亚的CNT-FAI-FIJI（无政府主义伊比利亚青年联合会）高层委员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社会革命、法西斯主义，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他们要么不论要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带来的困难，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社会革命；要么出于对法西斯主义（或民众）的恐惧，牺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和革命目标，以支撑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成为其一部分……面对这一不完善的局势，并在认为‘失败总好过惨胜’的情况下，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领导层以‘权宜之计’的名义放弃了无政府主义，并将西班牙社会变革的议程搁置。

“但CNT-FAI的领导层未能意识到，是否实施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定，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通过组织命令，就可以从理论转变为实践的事物……7月19日的自发防御运动已然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方向。”[We, the Anarchists!, p. 99]

考虑到支持法西斯的军队仍然控制着西班牙至少三分之一的领土（包括阿拉贡），且CNT在西班牙中部和北部并非主导力量，因此，人们认为在三个战线上作战只会对佛朗哥有利。此外，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及其他地区推行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很可能会导致工人民兵和自主管理的工厂被切断武器、资源和信贷供应。对于这种孤立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可以从阿巴德·德·桑蒂利安（Abad de Santillán）后来关于CNT为何加入政府的评论中看出：

“民兵委员会确保了人民武装的至高无上……但我们被告知，并且被一再强调——只要我们坚持保留这一机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坚持维护人民的权力，加泰罗尼亚就不会获得武器，我们也不会被授予外汇来从国外购买武器，我们的工业也不会得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而由于失败意味着失去一切，意味着回到斐迪南七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同时，基于‘我们及我们的人民所推动的变革，不可

能完全从新的经济秩序中消失’的信念，我们选择退出民兵委员会，加入加泰罗尼亚政府。” [quoted by Christie, Op. Cit., p. 109]

最终，CNT 决定与政府合作，并暂时放弃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直到战争结束。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它是可以理解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在为这一决定辩护，而是试图解释它，并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中。最终，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证明，共和国不仅遭到“民主”国家和法西斯政府的封锁，工人民兵和自主管理的集体也被切断资源和信贷供应；而且当国家自认为足够强大时，便在两个战线上作战——一方面与法西斯作战，另一方面试图镇压 CNT 及其成员所发起的半革命。大多数 CNT 成员没有预料到，在面对法西斯威胁时，自由派、右翼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竟会选择通过打击 CNT 来削弱反法西斯斗争。他们错了，而历史则完全证明了杜鲁蒂的正确性：

“对我们来说，彻底粉碎法西斯才是关键。是的，即便政府反对，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会与法西斯势力拼死斗争。当资产阶级感到权力正在从他们手中溜走时，他们便会诉诸法西斯主义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来早就可以让法西斯分子丧失力量，然而它却选择了妥协和拖延。甚至到现在，这个政府内部仍然有人想要对叛军手下留情。你永远无法确定——他笑着说——或许现任政府最终还会需要这些叛乱分子来镇压工人运动……

“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对我们来说，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苏联毫无意义：为了它的‘和平与安定’，斯大林牺牲了德国和中国的工人，让他们沦为法西斯野蛮人的牺牲品。而我们想要的是革命，就在这里，在西班牙；就在当下，而不是等到下一次欧陆战争之后。今天，我们的革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比整支苏联红军更为不安。我们正在向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展示，如何应对法西斯主义。

“我们不指望世界上任何政府会支持自由意志主义革命。或许，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对我们的斗争产生一些影响——这确实有可能……但在最终的分析中，我们不期待任何帮助，甚至不期待我们自己的政府提供帮助。”

[记者]范·帕森（van Paasen）说到：“即使你们胜利了，你们也只会坐在一片废墟之上。”

杜鲁蒂回答道：“我们一直生活在贫民窟和破败的角落里。我们知道如何暂时适应。你也切不可忘记，我们也会建设。正是我们，工人阶级，在西班牙、美洲和世界各地建造了这些宫殿和城市。我们可以再建造新的，甚至更好的！我们丝毫不害怕废墟。我们将继承整个世界；这一点毫无疑问。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资产阶级或许会炸毁他们自己的世界，将之沦为一片废墟。但我们在心中孕育着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此时此刻就正在成长。” [quoted by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p. 193-4f]

推动革命更进一步的愿望并不仅仅属于杜鲁蒂，这一点可以从 1936 年 8 月加泰罗尼亚 CNT 领导层的一份通告中看出。同时，这份通告也反映了促使他们做出决策的恐惧：

“我们还收到了来自其他地区的报告。有些同志表现得急躁，他们希望不仅仅是粉碎法西斯主义，而是更进一步。然而，就目前而言，西班牙整体的局势极为微妙。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境内的一个‘绿洲’。

“显然，没有人能够预见内战、及对仍处于反动叛军控制之下的西班牙部分地区的征服，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quoted by Jose Peirats, Op. Cit., pp. 151-2]

孤立状态、西班牙各地对自由意志主义革命支持程度的不均衡，以及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威胁，确实是现实存在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犯下错误的借口。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遗忘了基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应对西班牙人民所面临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方法。如果这些理念能够在西班牙得到贯彻，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的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尽管 CNT 与政府合作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但它在无政府主义理论层面上是无法被辩护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所讨论的，CNT 领导层试图用无政府主义原则来为这一决定辩护的努力，并不令人信服；而这种尝试本身，也只会让无政府主义变成一个笑话。

I.8.11 协作的决定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产物吗？

CNT 决定与资产阶级国家合作对抗佛朗哥，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证据，批评无政府主义，认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存在缺陷。对此，无政府主义者回应称，这种指控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决定并非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在法西斯主义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及全国其他地区局势的背景下做出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很少提及当时做出合作决定的具体环境。以下是典型到令人难过的马克思主义指责：

“国家权力问题，即哪一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动荡中，证明了它对革命者来说至关重要。在这里，无政府主义面临着其最大的考验和机遇，然而它在前者上失败了，因此错失了后者。

“当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在孔帕尼斯（Companys）的领导下承认自身无能，并提议解散政府，实际上是将权力移交给革命力量时，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了这一提议。CNT 的领导人，以及 FAI 的……激进分子加西亚·奥利弗（Garcia Oliver）解释道：‘全国劳工联盟和无政府主义伊比利亚联盟，之所以决定合作，并选择民主、放弃革命的极权主义，是因为这将导致革命被无政府主义和邦联的独裁所

扼杀。我们必须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独裁）与民主（这意味着合作）之间做出选择。’选择的结果是：要么保持国家政权的完整，从而为佛朗哥的胜利铺平道路；要么在加泰罗尼亚建立一个工人政府，使其成为击败佛朗哥、创建新工人国家结构的核心。在选择前者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区分资本主义国家与工人国家……这个起初拒绝建立工人国家的运动，最终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一过程中背叛了革命。” [Pat Stack, "Anarchy in the UK?", *Socialist Review*, no. 246]

这种论点存在四个核心缺陷。首先，在做出合作决定时的客观形势究竟如何？令人费解的是，斯塔克在讨论俄国革命时批评无政府主义者无视“物质条件”；但在分析西班牙时，他自己却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因此，他的批评纯粹是唯心主义的，完全没有尝试将其与 CNT 和 FAI 当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联系起来。第二，他引用的唯一证据，即加西亚·奥利弗的这段话，是在决定做出的一年之后才发表的。它并未真正反映 CNT 和 FAI 在当时的真实考量，而是那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自由意志主义原则的组织领导人，为其行为辩护的尝试。虽然这正符合斯塔克唯心主义的事件分析，但其运用此论据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第三，CNT 和 FAI 的决定显然无视了无政府主义理论。因此，当无政府主义者没有遵循自己的理论时，马克思主义者却反而指责无政府主义本身，这种做法本身就充满讽刺意味；然而，斯塔克的论述正是如此。最后，还有阿拉贡的反例，这一事实也能清楚地反驳了斯塔克的论点。

要理解全国劳工联盟（CNT）和无政府主义伊比利亚联盟（FAI）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就必须做斯塔克所未能做到的事情——提供历史背景。这一决定是在 1936 年 7 月 20 日巴塞罗那街头，军队被击败之后立即作出的：CNT 选择忽视无政府主义理论，没有摧毁国家政权，而是与其他反法西斯组织合作。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指出的，CNT 之所以选择与国家合作，是出于对孤立的恐惧。如果直接宣布建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他们可能不得不同时对抗共和政府、外国干涉以及军事政变——正是这种可能性，影响了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运动激进派的决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当时的局势下强行实施无政府主义，只会帮助佛朗哥，并迅速导致革命的失败。

因此，CNT 真正面临的选择，并非如斯塔克所说的“要么保持国家政权完整……要么在加泰罗尼亚建立一个工人政府，使其成为击败佛朗哥的核心”，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要么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合作，共同对抗佛朗哥，以确保统一战线，并在胜利后推进无政府主义；要么立即实施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同时可能需要在两个战线上作战——既要对抗佛朗哥，又要对抗共和政府（甚至可能面临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革命的干涉）。正是这一局势促使 CNT-FAI 决定加入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与其他反法西斯组织合作。如果忽视这些客观因素及其所造成的两难处境，而仅仅将这一决定归咎于无政府主义政治，那简直是荒谬可笑的。

同样，斯塔克引用的加西亚·奥利弗的言论是 1937 年 7 月的产物。这些言论是为了为 CNT-FAI 的行动辩护，并具有政治宣传的目的。因此，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真实的历史反映。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马克

思主义者，如斯塔克，不是选择讨论 CNT 实际面临的问题，而是选择仪式性地引用这一年后的言论，宣称它暴露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破产。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很少去探讨 CNT 在军事政变失败后的实际困境，也不会将这些言论与他们所声称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进行对比。

这背后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如果他们呈现 CNT 所处的客观环境，那么他们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尽管这一决定是错误的，但它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与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无关。其次，如果他们将这些言论与无政府主义理论进行对比，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巨大矛盾。事实上，加西亚·奥利弗在为自己的结论辩护时，实际上是以无政府主义的名义，提出了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完全相反的主张！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加西亚·奥利弗的说法呢？正如阿贝尔·帕兹所指出的：“很明显，这些解释……是为了政治效果而设计的，掩盖了做出这些决定时的真实氛围。这些声明是在一年后才发表的，而那时 CNT 已经远离了他们最初的立场。那也是他们开始参与政府合作政策，并最终加入中央政府的时期。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声明也揭示了那些参与历史性全体会议的人所承受的沉重压力。” [Abel Paz, *Durruti: The People Armed*, p. 215]

例如，在该决定做出时，革命尚未开始。街头战斗刚刚结束，全体会议决定“只要西班牙仍有部分地区掌握在法西斯手中，就不去谈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 [Mariano R. Vesquez, quoted by Paz, *Op. Cit.*, p. 214] 然而，革命实际上是在该决定作出后的几天内自下而上地展开的，完全独立于全体会议的意愿。正如阿贝尔·帕兹所描述的：

“当工人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场所……他们发现那里空无一人……主要的生产中心已被其所有者遗弃……CNT 及其领导层显然未曾预见到这种情况；否则，他们在取消大罢工并下令复工时，就应该给予工人适当的指导。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则完全是工人们自发决定掌控局势的结果。

“工人们发现工厂被弃置，而且没有任何来自工会的指示，于是他们决定自己操作机器。” [The Spanish Civil War, pp. 54-5]

CNT 的基层成员凭借自身的主动性，利用国家权力的崩溃，彻底改造了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帕兹强调：“并没有任何命令要求进行征用或集体化——这表明，直到 7 月 18 日之前仍然代表其成员意志的工会，实际上已经被事件的发展所超越。”“CNT 委员会的工会领导者面对着一场他们未曾预见的革命……工人和农民绕过了他们的领导者，采取了集体行动。” [Op. Cit., p. 40 and p. 56] 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德总结道：“革命的主动权并非来自 CNT 的领导委员会——既然自由意志主义革命已被正式‘推迟’，那它又怎么可能由委员会发起呢？——而是来自最激进的工团主义者推动的各个 CNT 工会。”因此，尽管加泰罗尼亚的 CNT “推迟了”自由意志主义革命……但在巴塞罗那，革命每天都在 CNT 的集体化和工会管理的产业中扎根。” [Blood of Spain, p. 139 and p. 179]

由于革命尚未开始，而 CNT 全体会议也决定不号召发动革命，因此很难理解“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即革命）会“导致革命（即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扼杀”这一说法。换句话说，加西亚·奥利弗提出的这一理由，无法反映 CNT 全体会议与会者的真实想法，显然只是事后的辩解。此外，当时作出的决定明确表示，一旦佛朗哥被击败，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将重新被提上议程。奥利弗的评论在佛朗哥被击败后同样适用，就如同 1936 年 7 月 20 日时的情况一样。

同样，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建立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本质上就反对专政。根据 CNT 在 1936 年 5 月萨拉戈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这一行政体制的基础将是自治的公社”，并且“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联合”。公社“将遵守在自由讨论后以多数票通过的所有一般性规范。” [quoted by Jose Peirats, *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vol. 1, p. 106] 这一决议强调了 CNT 所追求的自由社会：

“公社的居民将共同讨论其内部问题……各联合会将就影响国家或省份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议，并且所有公社都将在其聚会和集会上获得代表权，使代表能够传达各自公社的民主观点……所有相关的公社都将拥有发言权……在区域事务上，区域联合会有责任执行相关协议……因此，社会组织的起点是个人，然后是公社，再到联合会，最终形成邦联。” [quoted by Peirats, *Op. Cit.*, p. 107]

这显然不是“无政府主义独裁”的景象！事实上，它比奥利弗所称的“民主”——即资本主义国家——还要更加民主。因此，奥利弗在 1937 年的论点完全自相矛盾。毕竟，他在主张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一种基于自我管理的自由联合、自下而上组织和运行的社会）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独裁”，甚至比他在 1931 年至 1936 年间一直反对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还要不民主！此外，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激发了革命，因此，以资本主义民主取代自由共产主义，以防止“革命被扼杀”，这根本说不通。

显然，加西亚·奥利弗那些被频繁引用的言论，不能被轻易地当作是事实。他在 1937 年的言论，实际上是为了歪曲无政府主义理想，去为 CNT 领导层的反无政府主义行为辩护，而不是对 1936 年 7 月 20 日所作决策的合理解释。因此，对他的言论必须持极大的怀疑态度。倚赖他的言论来分析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或无政府主义的缺陷，完全是一种极其肤浅的视角。尤其当我们审视 CNT 的历史以及无政府主义理论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这一点可以从 CNT 向国际工人协会提交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出，该报告旨在为 CNT 放弃无政府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并加入政府的决定辩护。报告指出：“CNT，忠于自身的理想和其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本质，并未攻击国家形式，也未试图公开渗透或控制它……没有任何政治或法律机构被废除。” [quoted by Robert Alexander, *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vol. 2, p. 1156] 换句话说，根据这份报告，“无政府主义”理想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消灭国家，而只是忽视国家。然而，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仅仅是为了去为 CNT 领导层背弃自身理想的行为辩解。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回顾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以及战前 CNT 的实际行动。

根据无政府主义的理念，正如巴枯宁所言：“革命必须从一开始就彻底、完全地摧毁国家”，而这种“摧毁所伴随的、自然且必要的结果”将包括“解散军队、司法机构、官僚体系、警察和教会”，同时“没收所有生产资本和生产资料，并交由工人协会管理和使用”。国家将被“所有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联盟”所取代，而这些工人协会将“构成公社”。这些公社又将“组成起义联合会……并组织起一支能够击败反动势力的革命力量。”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70-1] 对于克鲁泡特金而言，“公社……必须打破国家，并以联邦制取而代之。” [Words of a Rebel, p. 83]

因此，无政府主义始终对如何处理国家问题有着明确的立场，而显然 CNT 的做法并不符合这一立场！CNT 无视了这些建议；因此，在它既没有摧毁国家，也没有建立工人委员会的邦联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将失败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理论？以无政府主义者未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为由，来证明这些政治理念的失败，显得十分荒谬，而这正是斯塔克等人的论调。

此外，CNT 也并非一直持这种立场。在内战爆发前，CNT 曾多次组织起义反抗国家。例如，在 1932 年 1 月 CNT 矿工的自发起义中，工人们“占领市政厅，升起黑红色的 CNT 旗帜，并宣布自由意志共产主义(*comunismo libertario*)。”同年，在塔拉萨，工人们再次“占领市政厅”，整个城市“爆发了街头战斗”。1933 年 1 月的起义以“无政府主义行动小组对巴塞罗那军营的袭击”拉开序幕……“在巴塞罗那的工人阶级街区(*barrios*)及其周边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塔拉萨、萨尔达尼奥拉-里波列特、莱里达，以及瓦伦西亚省的多个城镇(*pueblos*)和安达卢西亚地区，也相继爆发起义。”1933 年 12 月，工人们“筑起街垒，袭击政府大楼，并与政府军展开激烈巷战……许多村镇宣布自由意志共产主义。” [Murray Bookchin, 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225, p. 226, p. 227 and p. 238]

可见，CNT 领导层对“自身理想和纯粹无政府主义本质”的忠诚——即“不攻击国家的形式”——是一个极为后期的发展！

由此可见，那些在后来，被用来辩护对无政府主义理念和西班牙革命工人的背叛的理由，与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毫无关联。这些理由的产生，仅仅是为了合理化一种非无政府主义的反法西斯斗争策略——这种策略不是依靠自下而上的斗争，而是选择与上层的政党和工会结盟。然而，这种做法并非始终如一。在整个 1930 年代，西班牙总工会（UGT）和社会党（PSOE）一再拒绝 CNT 提出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联盟，而是选择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人联盟”，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控制工人运动。CNT 恰当地拒绝了这一立场，坚持推动自下而上的联盟。然而，到了 1936 年 7 月，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变得显而易见，而 UGT 仍然没有改变立场。因此，在巴塞罗那，虽然国家事实上已经被摧毁，但“在马德里，由于社会党的作用，资产阶级统治结构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巩固：一个半死不活的国家重新获得了生机，而工人阶级却没有建立起一个可以抗衡它的双重政权。” [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62]

与其在 1936 年 7 月试图在高层与其他组织建立统一战线，CNT 的领导层本应贯彻其无政府主义理念，号召被压迫者扩大和巩固他们的胜利（事实上，他们

曾这样做了)。这将释放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所有潜在革命力量——这种力量的存在已通过7月20日全体大会后自发进行的集体化,以及由工人志愿民兵组建的纵队,前往解放被佛朗哥占领的西班牙地区的行动,得到了充分证明。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就是“鼓动人民废除资本主义财产及其用以行使权力、剥削多数人的制度”,并且“支持、激励和推动社会革命的发展,挫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任何重组自身的企图,因为它势必会这样做。”这意味着“通过创建革命性组织,来摧毁资产阶级制度。”[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4, p. 46 and p. 193] 换句话说,就是要鼓励建立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社区与工厂的联邦。

事实上,这样的组织已经在巴塞罗那的CNT 街区防卫委员会中以胚胎形式存在,并且领导和协调了整个城市对抗军事政变的斗争。“这些社区委员会名称各异,但都秉持自由意志主义立场,并最终联邦化,创建了一个革命性的地方协调委员会。”它们“演变为革命委员会,并组成了所谓的‘街垒联合会’。那天晚上,巴塞罗那的权力正掌握在这些委员会手中。”[Paz, *Op. Cit.*, p. 470 and p. 445] 因此,CNT不与政治政党及UGT在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内部进行合作,而应当发展这些社区自我组织机构:

“7月20日,权力掌握在街头的武装人民手中……生活呈现出一种新的动力,它不仅在摧毁、也在创造:人民在街头为解决集体生活中的实际需求而奋斗,并希望继续——在街头活跃……街道和武装人民是革命的活力所在……防御委员会如今已转变为革命委员会,支持着这股力量。他们组织了所谓的‘街垒联合会’。站在这些街垒上的激进派,坚定地代表他们参与革命委员会。”[Paz, *Op. Cit.*, pp. 450-1]

而在这之后,应当召开由各个工厂(无论其先前是否属于工会)选出的代表会议,以组织起巴枯宁所描述的“所有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联盟”,这个联盟将“构成公社”,并与“街垒联邦”相辅相成。[*Op. Cit.*, p. 170] 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建立一个由工人委员会、工人武装和社区议会共同组成的联邦。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革命和反对佛朗哥战争都注定会失败。在当时,的确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一真正自由意志主义的解决方案,但遗憾的是,他们只是少数派。例如,Nosotros小组^①的成员(其中包括杜鲁蒂)认为,“有必要超越CNT与各政党的联盟,创建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应直接建立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的工会及革命委员会之上。这些团体将共同组成一个区域大会,作为革命的执行机构。”[Paz, *Op. Cit.*, p. 471] 这种发展方向,贯彻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思想(并实践CNT在5月关于自由共产主义的决议)——并非不可能实现。毕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CNT-FAI在阿拉贡就是按照这一模式组织起来的。

担忧加泰罗尼亚可能会被孤立于共和国其他地区之外,是许多CNT和FAI成员最关心的问题。如果实施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可能会爆发内战(从而帮助了佛朗哥)——这种担忧是真实存在的。不幸的是,从这种恐惧

^① 一个曾致力于抵抗里维拉独裁统治的无政府主义武装小组。Nosotros, 西班牙语, 中文意为“我们”。

中得出的结论——即应当先打赢对佛朗哥的战斗，然后再谈革命——是错误的。毕竟，当国家恢复了足够力量后，共和阵营内部的内战**确实**发生了。同样，对于外国政府可能对加泰罗尼亚进行封锁的担忧，也成为现实，这也证实了杜鲁蒂等活动家的分析是正确的。

如果在革命初期组织一次完整而正式的代表会议，让整个 CNT 成员讨论所有的观点和建议，也许在关于合作的问题上会得出不同的决定。毕竟，许多 CNT 成员正是通过在革命战争对抗法西斯，于实践中践行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这一点，可以从 CNT 和 FAI 的基层成员无视“推迟”革命而优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中看出。在整个西班牙共和国，工人和农民自发地没收资本和土地，并将其置于工人自治管理之下。他们完全是出于自身的主动性而行动的。同时，正如[下一节](#)将要讨论的，反法西斯团结或许仍会占据主导地位，并导致相同的决策。

然而，无论如何，CNT 领导层认为可以在战后再进行革命的想法，导致了两个错误。首先，他们本应意识到，自己的成员不会轻易错过这一实践自由意志主义理念的机会，因此他们的决定实际上是多余的（而国家主义的反扑也不可避免）。其次，他们背弃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念，未能理解对抗法西斯的斗争中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将永远无法取得真正的胜利。而这种参与不可能通过将战争置于革命之前、在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架构或国家体系内来实现。

事实上，尽管 CNT 的错误在当时可以理解，但仍无法被辩护，因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克鲁泡特金，早已预测到了这样的后果。几十年前，这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探讨巴黎公社的文章中，就驳斥了 CNT 领导层的两个基本假设——首先是将战争置于革命之前的观点，其次是认为可以通过威权结构或国家来进行斗争。他明确批判了那些主张“让我们先确保胜利，然后再看能做什么”的思维方式 and 逻辑：

“确保胜利！——仿佛在不触及财产的情况下，就有任何可能将社会转变为自由公社！仿佛在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的胜利不直接地感兴趣、无法见证物质、道德和知识福祉到来之前，就有任何可能击败敌人！他们试图先巩固公社，然后再进行社会革命，而唯一有效的方式——恰恰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巩固公社！”
[Words of a Rebel, p. 97]

克鲁泡特金的论点是正确的，而 CNT 最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等待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结果却迎来了失败（正如阿贝尔·帕斯所指出的，西班牙的工人“必须建立一个新世界，以巩固和保卫他们的胜利” [Op. Cit., p. 451]）。克鲁泡特金还揭示了 CNT 与国家合作并加入代议机构的必然后果：

“巴黎……派遣了她最忠诚的儿女进入 Hotel-de-Ville[市政厅]。然而，他们在那里被繁文缛节所束缚，当需要行动时却被迫进行讨论；并且由于切断与群众的持续接触而逐渐失去了敏锐性，他们发现自己变得无力。他们因远离革命的中心——人民——而变得麻痹，同时他们自身也削弱了人民的主动性。” [Op. Cit., pp. 97-8]

简而言之，这正是与国家合作的 CNT 领导激进派所经历的情况。克鲁泡特金的预见得到了证实，也证明了自巴枯宁以来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也是正确的。正如弗农·理查兹所说：对于 CNT 的决定，“没有任何借口”，因为“这不是判断失误，而是对 CNT 原则刻意的放弃” [Op. Cit., pp. 41-2]。当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立场恰好相反时，将 CNT 的决策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理论似乎站不住脚。那些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人引用加西亚·奥利弗 1937 年的话，来批判无政府主义理论，这反映的更多是他们自身的政治立场，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真实情况。

此外，尽管西班牙的经验从反面证明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但它也从正面提供了证据，即阿拉贡地区防御委员会（Regional Defence Council of Aragón）的建立。阿拉贡委员会是由 CNT 工会、乡村公社和民兵纵队的代表会议所创建的，其目的是保护阿拉贡人民正在建设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新社会。会议还决定推动建立一个全国防御委员会，以联系一系列按照阿拉贡模式组织起来的地区机构。杜鲁蒂强调，各集体“必须建立自己的自卫手段，而不能依赖自由意志主义纵队，因为这些纵队会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离开阿拉贡。他们需要自行协调，但同时也要警惕，不要像西班牙其他地区那样建立一个反法西斯政治战线。他们不应当重复他们同胞所犯的错误……人民大会必须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在一次 CNT 地区大会上，武装派决定“成立阿拉贡防卫委员会和阿拉贡集体联合会。” [Paz, Op. Cit., pp. 540-1] 这充分揭示了“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失败”的说法是错误的。在阿拉贡，CNT 确实贯彻了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废除了国家和资本主义。如果他们在加泰罗尼亚也这样做，西班牙内战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阿拉贡的经验，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及 CNT 在 1936 年萨拉戈萨大会上通过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决议》之间的延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地区防御委员会的成立，是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原则的坚定承诺。这种对革命性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坚持，与“西班牙内战表明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毕竟，在阿拉贡，CNT 不仅确实地遵循了无政府主义理论，还践行了自身的历史和政治主张。他们建立了一个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这正是巴枯宁所倡导的。如果我们对比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情况，就能看出斯塔克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样的组织、相同的政治理念，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既然无政府主义在阿拉贡得到了成功应用，那么又如何能将加泰罗尼亚的失败归咎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呢？这样的立场根本无法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讨论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无政府主义时，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会刻意忽略它在阿拉贡的经验。

因此，尽管 CNT 在内战期间的活动，确实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复杂局势下可能会做出错误决策的现实，但它并不能被用来否定无政府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强调这一事件并不奇怪，因为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当无政府主义在加泰罗尼亚被忽视（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却在阿拉贡得到了实践，我们又如何能说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革命中“失败”了呢？当阿拉贡防御委员会正是按照无政府主义政治理念建立起来的，又怎么能说这样的政治思想应该为加泰罗尼亚的失败负责呢？——显然不能。简而言之，西班牙内战所展现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失败，而是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在困境中未能贯彻其理念的失败。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指出的：“仅仅因为西班牙的领导同志辜负了无政府主义，就认为无政府主义本身有问题……这种推理是极其错误的……一两个个体

的失败，永远无法否定一种理想的深度与真理。” [Vision on Fire, p. 299]

用加泰罗尼亚的 CNT 来概括整个无政府主义理论是错误的，因为首先，这种做法忽视了决策所处的客观环境；其次，它完全漠视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历史。这种观点还暗示着，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必须仅凭一次历史事件就来加以衡量。乌克兰的马赫诺黑军、1920 年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中的意大利工人联盟 (USI) 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联盟 (UAI)、1930 年代 CNT 发动的起义、以及 CNT 在西班牙革命中建立的阿拉贡防卫委员会等历史经验——全部被忽略了。显然，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颇为便利。然而，从马赫诺运动和阿拉贡防御委员会的经验来看，无政府主义在革命的条件下，确实曾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成功地大规模实践过。

同样荒谬的，是那些企图将坚持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背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这种说法通常针对“杜鲁蒂之友” (Friends of Durruti, FoD) 这一无政府主义团体。正如帕特·斯塔克所言：

“有趣的是，在所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团体中，‘杜鲁提^①之友’发展出了最为复杂的批判。如[托洛茨基主义者]菲利克斯·莫罗指出：‘他们代表了一种对传统无政府主义反国家立场的、有意的背离。他们明确主张，在推翻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民主权力机构——委员会(juntas)或苏维埃，并采取必要的国家镇压措施来对抗反革命。’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严酷的抉择就是——要么是工人政权；要么是资本主义政权，继而是反革命的全面胜利。” [Op. Cit.]

斯塔克连杜鲁蒂的名字都拼错了，这足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分析。“杜鲁蒂之友”是 CNT 和 FAI 内部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他们与大量其他少数派同志一样，始终坚决反对“反法西斯团结”政策。他们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有意的背离”，而恰恰是对无政府主义自觉的回归。当我们将他们的论点与巴枯宁的主张进行比较时，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正如斯塔克提到的，“杜鲁蒂之友”主张在推翻资本主义时建立“委员会 (juntas)”，以防止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但这恰恰是自巴枯宁以来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倡导的策略（详见 H.2.1 节）。FoD 的理念，与西班牙内战前 CNT 的政治纲领以及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杜鲁蒂之友”所主张的，并不是对无政府主义的背离，而是对其传统立场的回归。如果斯塔克或莫罗真正了解无政府主义，他们就本应明白这一点。

因此，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并不是简单的“工人政权”与“资本主义政权”之间“严酷的抉择”，而是在真正的两难困境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是引入无政府主义（其本质上，是建立在工人权力、组织和自我管理基础上的）；还是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合作，共同对抗更大的敌人——佛朗哥及其法西斯反动势力。斯塔克未能看到这一点，说明他根本不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动态发展，而更倾向于用抽象的口号代替对实际问题的深入分析。他总结道：

^① 在这里，斯塔克错误地把 Durruti 拼写成了 Durutti

“最重要的教训是……无论个别无政府主义者抱有怎样的理想和直觉——无政府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实践中，都无法成为一条可行的人类解放之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承认无产阶级在政党的领导下的核心地位，才能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 [Op. Cit.]

针对这一论断，我们只需引用托洛茨基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应当采取的行动的看法，即可加以反驳。他指出：“由于 CNT 的领导人拒绝为他们自己建立专政，他们便为斯大林主义的独裁留下了空间。”这显然不能被视为“工人政权”！同年早些时候，他还表示：“一个革命政党，即便已经夺取政权（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尽管拥有无政府主义工人的英勇支持，却根本无力做到这一点），仍然绝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权统治者。”最终，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进一步证实了托洛茨基所持的信条，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专政……是一种客观的必要性……放弃自身专政的革命党（先锋队），实质上就是将群众拱手让给反革命势力。”相较于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工人委员会才是至关重要的观点，托洛茨基所坚持的实际上是“党的专政”才是决定性因素。[参见《列昂·托洛茨基文集 1936-37》，p. 514, p. 488 和 pp. 513-4] 在这种观点下，即便存在工人委员会，那也只是用来实现党的权力、并充当其统治的遮羞布（详见 H.3.8 节）。

显然，当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未主张“工人阶级在政党的领导下的核心地位”，而是主张“革命党”~~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托洛茨基的理论中，革命党才是革命政权的真正主体，而非工人阶级本身。那么，当一个政党对工人阶级实行独裁，并成为社会的“主权统治者”时，又能实现怎样的“胜利”呢？唯一的“战果”就是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列宁主义者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组织是工人自身管理社会的工具，而只是党用来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正如俄国革命所无可辩驳般证明的那样，在工人政权与党的政权的冲突中，列宁主义者始终会镇压前者，以确保后者的胜利。

可以说，按照斯塔克的观点，对俄国革命和西班牙革命最重要的教训反而在于：无论个别列宁主义者抱有何种理想与直觉，列宁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无法成为通向人类解放的可行之道。唯有无政府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和革命中的自我管理，才能确保真正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最后，我们可以认为，列宁主义者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标准的批判，与他们在俄国革命时期为布尔什维克专制辩护所使用的理由，类似。毕竟，像斯塔克这样的列宁主义者，也将列宁政权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即其孤立状态、内战及经济困难——作为其镇压行动的解释。然而，这种相似性只是表面的。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彻底贯彻自身思想；而在俄国革命中，失败则是布尔什维克实践其意识形态的结果。俄国革命所遭遇的困难，使布尔什维克在他们既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不用说，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本身，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问题）。正如我们在 H.6 节所讨论的，认为“客观环境”可以解释布尔什维克的专制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因此，总结而言，西班牙革命的经验并不是显示了无政府主义的失败，而是表明无政府主义者未能在实践中贯彻其理念。面对极端困难的局势，他们为了反法西斯统一而妥协了自己的思想。正是因为最后导致了革命和内战的双重失败，这些妥协不仅没有驳斥无政府主义理论，反而证明了其正确性。

I.8.12 协作的决定是被强加于 CNT 成员的吗？

有必要简要说明 1936 年 7 月 19 日之后，全国劳工联盟（CNT）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I）的发展情况。显然，这两个组织在本质上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两者变得更加集权化和官僚化，而其成员被排除在许多重大决策之外。正如佩拉特斯（Peirats）所指出的：

“在 CNT 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激进派中，一直有一种传统，即最严格地尊重基层大会的讨论和决策，毕竟这是联邦组织的基础。而那些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仅仅是这些决策的执行者。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决议，规定了邦联及其代表委员会必须遵守的基本义务和普遍义务，而这一义务适用于所有成员，无论其所在地区或地方如何。而制定这些普遍性决议的责任，直接归属于各工会；也就是说，它们通过各自的全体大会去通过决议。同样，地区或地方代表大会，也会确立仅适用于地区或地方层面的要求和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主权始终掌握在工人大会手中，无论是在工会内部还是在其各自的团体中。

“然而，在革命阶段刚刚开始时，这种严格的、日常的联邦主义程序便被突然修改……这种组织准则的修订，被解释为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因为这种事件要求更迅速的决策和决议；也就是说，这是对自下而上联邦主义程序的、不可避免的偏移。” ——《西班牙革命中的 CNT》，第一卷，第 213 页

换句话说，CNT 变得日益等级化，高层委员会从行政机构逐步演变成了决策机构，正如佩拉特斯所言：“可以肯定地说，组织中的重要决策是由委员会作出的，而群众几乎没有发言权。毫无疑问，形势要求组织做出快速决策，并需要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泄密。但正是这些需求，使委员会倾向于放弃组织原有的联邦主义程序。”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 188 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曾批评 CNT 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没有“夺取政权”（见上一节），但事实上，他们确实夺取了——只不过是自己的组织内部。这一转变最终带来了灾难，并进一步印证了无政府主义对等级制和中央集权组织的批判。CNT 的高层委员会与普通成员逐渐脱节，推行自己的政策，同时削弱并扼杀了基层成员正在开展的创造性工作——这一切正如无政府主义理论所预见的那样。

在任何革命形势下，决策都必须迅速作出，有时甚至无法征求组织基层的意见。然而，这些决策必须对成员负责，成员必须对其进行讨论并予以批准（例如，

在 CNT 民兵中的决策)。CNT 和 FAI 在无数次罢工、起义和斗争中的经验已经证明，去中心化的联邦制结构完全有能力推进阶级斗争——革命也不例外，因为革命正是阶级斗争最集中的形式。换句话说，CNT 和 FAI 的组织原则完全适用于革命形势。

因此，这种集权化倾向不能归咎于战争的特殊环境，而应该归因于合作的政策。与 1936 年 7 月 19 日之前的众多罢工和起义不同，CNT 的高层委员会开始在国家结构内运作。而这一点，从本质上就必然会催生等级化和集权化的趋势，因为参与其中的人不得不适应国家的基本架构和形式。CNT 政策的偏离，正是从最初为了“反法西斯统一阵线”而妥协的决定而开始的，随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每一次妥协，都使得 CNT 领导层更深地陷入国家的控制之中，这又加强了其等级化倾向，进一步使高层委员会与普通成员脱节，最终促使这些委员会继续推行妥协政策。

然而，这种集权化和等级化倾向，并不意味着 CNT 的高层委员会单方面将其意志强加给整个组织。事实上，最初 CNT 和 FAI 的大多数成员对合作决定持消极支持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内结束）。正如到访西班牙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福尔所指出的，尽管“工会内部以及 FAI 所属团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批准了参与中央权力的决定；但在许多地方，这一决定遭到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派的反对。因此，这一决策并未获得一致通过。” [quoted by Jose Peirats, *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vol. 1, p. 183]

佩拉特斯对此评论道：

“所有的激进派都持相同观点吗？……除了通过报刊、委员会、集会、全会和大会表达抗议的少数派之外，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大部分成员都受困于一种宿命论，而这种宿命论本身正是战争残酷现实的直接结果。” [Op. Cit., p. 181]

他还指出：

“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领域，激进无政府主义毫不畏惧地推进经济改造。毫无疑问——否则就是对 CNT 自由意志主义基层成员心理的无知——自从衰退开始后，一场隐秘的较量便在全会和大会上时有发生，并在某些报刊上有所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反对任何可能背离[无政府主义]战术和原则的意见群体，始终都能够依靠一批坚定的拥护者。” [Op. Cit., p. 210]

因此，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一股相当数量的少数派，他们反对合作政策，并在各种出版物和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虽然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自愿加入民兵，并因此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于工会，但仍有多个团体（例如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杜鲁蒂之友”、其他 FAI 的团体等）公开反对合作，并在街头、公社、组织会议等场合表达他们的立场。此外，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之外，两支规模极小的托洛茨基派团体也反对合作，西班牙工人党（POUM）的一些派别亦持相同立场。因此，根本无法断言说，CNT 的成员对反对主流政策的论点毫不知情。例如，在 1937 年五月事件之后，加泰罗尼亚

CNT 的高级委员会无法让工会大会或全体会议将“杜鲁蒂之友”开除，也无法阻止他们向反对合作的“自由青年”提供财政支持，更无法要求工人团体停止在公共交通系统或每日送奶过程中，分发反对派的出版物。[Abe Bluestein, "Translator's Note", Juan Gomez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FAI*, p. 10]

这表明，尽管存在中央集权的趋势，CNT 的高级委员会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群众影响与控制，不能被视为对其组织拥有独裁权力。虽然许多的决策，的确曾是作为既成事实提交给工会全体会议的（这些会议往往是委员会在短时间内召集的），这违反了 CNT 过去的程序；但全体会议并未被强行要求批准委员会想要的任何决定。战争的客观形势，即反对佛朗哥及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使大多数 CNT 成员和自由意志主义活动家相信，与其他政党和工会在国家体系内合作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认为，若不合作，就会在反佛朗哥阵营内引发另一场内战，从而削弱战争努力。尽管这一政策未能成功（当共和国政府有足够力量时，它的确向 CNT 发动了一场内战，严重地削弱了反法西斯的斗争），但不能说这项政策是强加给成员的，也不能说他们未曾听到过反对意见。遗憾的是，“反法西斯团结”的呼声主导了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思维。

在战争初期，大多数基层战士相信，战争将在数周内结束。毕竟，仅仅几天的时间，他们便已在巴塞罗那及其他工业中心击溃了军队。这使他们首先容忍（甚至支持）CNT 与“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合作；其次，他们开始没收资本主义财产，因为他们相信革命很快就会重新回到正轨（他们认为，无论 CNT 领导层的意愿如何，这都是一个推广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绝佳机会，不能错过）。他们坚信，革命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即当年五月 CNT 萨拉戈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的理念——是反法西斯斗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据此行事。他们选择忽视国家，而不是摧毁它，认为这只是短期的妥协，很快就能得到纠正。遗憾的是，他们错了——合作本身有其内在逻辑。而随着战争的拖延，这种逻辑变得越来越不利，最终已无可挽回。

这也表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以 CNT 的经验作为关键证据，对无政府主义加以批判——是多么肤浅。然而，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及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 CNT 成员，组织了公社、民兵，并开启了西班牙社会的变革。他们是在无政府主义的启发下，并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进行这些行动的。既肯定他们的实践，又批判“无政府主义”，显然是缺乏逻辑的。事实上，这些实践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更为契合，而非是 CNT 领导层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因此，仅仅通过少数领导人的反无政府主义举措来攻击“无政府主义”，却忽视大多数成员的无政府主义行动，这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总而言之，尽管 CNT 因与国家的合作而破坏了其内部结构，并增加了威权主义倾向，但它并未完全蜕变为高级委员会的附属物。工会大会可以并确实拒绝了 CNT 领导层提出的各种要求。虽然在 CNT 内部，“反法西斯团结”的呼声广泛存在（尽管有大量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的反对行动和论述），并最终体现在该组织所推行的合作政策上；但 CNT 的高级委员会并非拥有绝对权力，也并未彻底背离其成员的意愿。具有讽刺意味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CNT 背离其

过去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原则，反而最终印证了无政府主义理论——这种背离反而成为拖累革命、促成其失败的重要因素。

正如我们在 [I.8.11 节](#) 中所论述的，CNT 最初对国家的妥协、最初对无政府主义理论和自身政策的背叛——已然为后面的一切埋下伏笔。而且，这一经验不仅未能驳斥无政府主义，反而加以证实——中央集权的、等级化的组织，妨碍并最终摧毁了革命。CNT 与 FAI 的经验表明，那些主张**更加**集权和建立“民主”等级结构的人（如列宁主义者），不仅拒绝理解历史，更不用说试图从中汲取教训。CNT 内部日益加剧的中央集权，使领导层（少数派）获得权力，而使普通成员（多数派）被剥夺权力。革命的障碍并非联邦制，而始终是中央集权。

因此，尽管 CNT 与 FAI **内部**有相当数量的无政府主义少数派，反对“反法西斯团结”和政治合作这一主导政策；但这一政策基本上得到了 CNT 成员的认同，并非强加于他们。CNT 成员能够且确实拒绝过领导层的提议，因此，尽管合作政策导致了 CNT 内部权力的集中化，但仍不能说这一政策完全违背基层成员的意愿——尽管这一立场的后果，令人惋惜。

I.8.13 从这场革命中能学到什么政治上的教训？

西班牙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教训是：革命不能对现存的权力结构妥协。在这一点上，它再次证实了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基本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即：社会革命只有遵循无政府主义的道路，避免以对抗“更大的邪恶”为名进行妥协，才能取得成功。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一场半途而废的革命，注定很快就会被击败。”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2, p. 553]

1936 年 7 月 20 日，在法西斯政变于巴塞罗那被击败后，CNT 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会见加泰罗尼亚政府首脑。在政变的背景下，CNT 的工会代表全体大会决定，在佛朗哥被击败之前，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将被推迟（但基层成员无视这一决定，仍然集体化了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团拜访加泰罗尼亚主席，讨论当时的形势：

“代表团……态度坚定……要么孔帕尼斯[加泰罗尼亚主席]接受建立‘[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作为统治机构，要么 CNT 就去**咨询基层成员，并向工人揭示真实局势**。孔帕尼斯最终让步。” [Abel Paz, Durruti: The People Armed, p. 216]

然而，CNT 的委员会成员利用他们在西班牙社会中新获得的影响力，与其他组织和政党的领导层结盟，而不是与普通成员联合。这一过程导致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成立，其中包括了各个政党和工会的代表。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由各个工作场所、公社或街垒授权的代表，而是由各组织的委员会指定的代表。这也意味着，CNT 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邦联机构（即由工作场所、

民兵和社区大会选举产生，并接受问责的代表组成的机构)，而是创建了一个既不受工人大会监督、也无法反映工人阶级诉求的机构。国家和政府并未被工人自治所取代，而只是被忽视了。这是一个错误，很快“[许多人]就意识到：一旦他们加入了所谓的‘统一战线’，他们就再也无法回头了。换句话说，一个错误、走错了一步，必然会导致更多错误，就像往常一样。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如果同志们当初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会比现在更加强大。但我要重申，一旦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与其他力量联合，他们就被事件的逻辑推着走向更远的道路。” [Emma Goldman, *Vision on Fire*, pp. 100-1]

最明显的问题当然是，与国家合作确保了无法建立工人协会的联合会，从而无法协调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推动社会革命的斗争。正如斯图尔特·克里斯蒂所指出的：“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加他们的领导，这些党派委员会扼杀了迅速涌现的民众自主革命中心——基层工厂和地方革命委员会——并阻止它们证明自己是协调通信、防御和物资供应的有效可行手段。它们还阻止了地方革命委员会彼此整合，形成区域、省级和全国范围的联邦网络，而这一网络本可以促进社会和经济重建的革命任务。” [We, the Anarchists!, pp. 99-100] 在缺乏这样的邦联的情况下，CNT 最终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只是时间问题。

中央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成立于 1936 年 7 月 20 日）并非如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以费利克斯·莫罗为代表）所主张的那样，是“**二元政权**”的体制”或“新权力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而实际上是一个阶级合作的机构，对革命造成了阻碍。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 p. 85 and p. 83] 斯图尔特·克里斯蒂正确地称其为“人为的混血造物”，是一种“妥协，一种人为的政治解决方案，一个官方认可的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附属机构”，它“不可避免地将 CNT-FAI 的领导层卷入国家机构，而国家直到那时还是他们的主要敌人。” [Op. Cit., p. 105] 只有一个真正由乡村、工厂和工作场所的代表组成的联合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用巴枯宁的话来说）以“工人群众的社会（因此也是反政治的）权力”为基础的，组织框架。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97-8]

因此，CNT 忘记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国家的……摧毁”。相反，与巴黎公社类似，CNT 认为“为了对抗……反动势力，他们必须以反动的雅各宾方式组织自己，忘记或牺牲了他们自己本知道是革命社会主义的首要条件。”革命的真正基础，即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地构建，由工人的自由联合或邦联形成，首先是在他们的工会内，然后是公社、地区、国度，最终形成一个伟大的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邦联。” [Bakunin, Op. Cit., p. 198, p. 202 and p. 204] 由于没有这样做，不是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的邦联，而是选择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妥协机构内运作，CNT 领导层最终不可避免地牺牲了革命，转而优先考虑战争。

当然，即便召开 CNT 工会和各**街区**的防御委员会的全体代表大会，并邀请工人总联合会（UGT）及未组织化的工人代表参加，也无法保证最终的决策会完全符合无政府主义理论。当时民众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情绪非常强烈。然而，这一决定至少可以由工会的基层成员充分讨论，并受到后来加入民兵组织并奔赴前线的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考虑到当时席卷全国的集体化浪潮以及阿拉贡

的实际情况，决策很可能会有所不同，而第一步将是将这一全体会议转变为自由工人协会联合会的基础——即一个自治社会的框架——从而摧毁国家，并确保不会有新的国家取而代之。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即建立工人委员会邦联的必要性，被忽视了。以“反法西斯”团结的名义，CNT 与那些既憎恨他们又憎恨革命的政党和阶级合作。正如萨姆·多尔戈夫所说：“无论是在 7 月 19 日之前还是之后，镇压革命运动的坚定决心始终是共和政府政策背后的主旋律；无论当权的是哪个政党。”[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40] 在没有建立组织工人阶级“社会权力”机制的情况下，一旦国家重新组织起来，CNT 便无法抵御这些政党的攻击。

为了证明他们的合作是正当的，CNT-FAI 的领导人辩称，如果不合作，就会在内战中再引发一场内战，从而让佛朗哥轻易获胜。然而，实际上，共产党人和共和派一方面口头上宣称支持革命，另一方面却攻击集体化组织、谋杀无政府主义者、限制对集体化工业（甚至包括军工产业）的物资供应，并在拒绝向无政府主义民兵提供武器和弹药后、解散了这些民兵部队（他们更愿意武装后方的国民警卫队，以镇压 CNT 和革命）。因此，即使有合作，内战依然没能避免。当国家觉得自己足够强大时，内战仍然爆发了，而工人阶级成了牺牲品。

加西亚·奥利弗（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希望是最后一位“无政府主义”司法部长）在 1937 年表示，合作是必要的，CNT 已经“放弃了革命的极权主义，否则这将导致革命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邦联派[CNT]的独裁扼杀。我们相信一个加泰罗尼亚民主派人士”——康帕尼斯（他过去曾监禁过无政府主义者）——“的承诺和人品。”[quoted by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34] 这意味着，只有通过国家、政客和资本家合作，无政府主义革命才能真正是自由的！此外：

“这一论点包含……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许多 CNT-FAI 的领导人后来承认了这一点；但这不能成为借口，因为这并非判断失误，而是对 CNT 原则的有意背弃。首先，认为反对法西斯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在国家框架内进行，并将包括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在内的一切事务都服从于战争胜利——会是更为成功的策略。其次，认为与政党——也就是政客——合作，是必要且可行的，尤其是在当时权力掌握在两个工人组织手中的情况下……

“一切主动权……都掌握在工人手中。政客们就像没有军队的将军，在徒劳的荒漠中挣扎。与他们合作无论如何都无法增强对佛朗哥的抵抗。与此相反，显然，与政党合作意味着恢复政府机构，并将主动权从武装工人手中转移到一个拥有行政权力的中央机构。剥夺工人的主动权，就意味着将斗争的指挥权及其目标的决定权移交给一个统治阶层，而这必然会对革命战士的士气产生负面影响。”[Richards, Op. Cit., p. 42]

1937 年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独裁”或“合作”这一两难选择，根本上就是错误的。问题从来不在于，在无政府主义体系下会禁止政党或其他组织——远非如此。所有人都应享有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等权利，但政党的影响力只能来自它

们在工会、工作场所、社区和民兵大会上的实际作用——情况就应当如此！“合作”是必要的，但应该发生在基层群众之间，以及在按照无政府主义方式组织的机构内部。无政府主义并不尊重成为老板或政客的“自由”。在其关于 FAI 的历史著作中，胡安·戈麦斯·卡萨斯（一名 1936 年活跃的 FAI 成员）对此明确指出：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还能以何种方式实现？它必然意味着旧有的、以掌控制权力为目标的政党的解体，或者至少意味着使它们再无法推行其夺取权力的政治纲领。总会有人反对新的社会实验，因此也会有拒绝加入‘统一群众自发行动’的抵抗力量。此外，群众在工会和革命的经济组织中，以及在各地区和社区的政治组织中，也将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 [Anarchist Organis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FAI, p. 188f]

然而，CNT 和 FAI 的委员会并未采纳这种自下而上的“合作”方式，也就是通过工人协会联合会、社区大会和民兵纵队的联合来实现，这一方式自巴枯宁以来一直为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相反，他们选择了自上而下的“合作”。领导层无视国家的存在，与其他工会官员以及各政党的代表在中央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内进行合作。换句话说，他们为了反对他们认为的更大邪恶——法西斯主义，而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反革命铺平了道路，并最终导致民兵组织和集体经济的瓦解，因为这些组织缺乏独立于国家的协调机制。国家的持续存在，确保了集体之间的经济邦联（即在工团组织的指导下推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无法自然形成，也无法在所有地区得到充分发展。由于 CNT 的政治妥协，协调与互助的趋势也无法自由发展（详见[下一节](#)）。

显然，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并不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策略的失败，而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未能真正践行自己的理论和策略。CNT-FAI 没有摧毁国家，而是选择忽视它。要使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创建能够有效取代国家和市场的组织；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广泛的自由意志主义组织，使社会和经济决策由工人阶级自己主导。只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国家和资本主义才能真正被摧毁。

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摧毁旧世界。革命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言的那样，从本质上就带有“威权主义”的性质；但这仅仅是针对那些维护不公、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制度、结构和社会关系而言的。正如 H.7.4 节所讨论的，摧毁权威并不是“威权主义”，推翻暴君也不是暴政！最重要的是，革命必须在被压迫者的视角下，保持自由意志主义特征。也就是说，革命必须建立能够广泛吸纳大多数民众的组织，而这些民众过去曾被排除在社会和经济决策之外。事实上，革命本身就是最自由意志主义的事业。

杜鲁蒂之友曾主张，“革命需要工人组织的绝对主导权。” [“The Friends of Durruti accuse”, Class War on the Home Front, Wildcat Group (ed.), p. 34] 只有通过这一点，即建立切实可行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组织，才能确保国家与资本主义被彻底摧毁，并以一个基于自由、平等与团结的公正体系取而代之。正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众多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在数十年前所论述的那样（见 H.1.4 节）。因此，西班牙革命所提供的最重要经验教训，便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即：

必须通过自由联合的工人协会，来组织工人阶级的社会与经济力量，以摧毁国家。若无法实现这一点，革命便无法持久。正如戈麦斯·卡萨斯所正确指出的：“如国一个运动不去谴责那段[与政府合作的]经历，反而不断为其寻找借口，那么未来同样的道路仍会被重复……特殊环境将再次使……无政府主义屈膝于国家。” [Op. Cit., p. 251]

第二个重要教训涉及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CNT的领导层，以及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基层成员，完全被“反法西斯团结”这一问题所蒙蔽，使他们选择支持一个“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国家。然而，当工人阶级正在他们身边创造新世界，并以此激励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时，CNT领导人却选择与孕育法西斯主义的体制合作。尽管CNT领导层的反法西斯立场是真诚的，但他们的“盟友”却未必如此（这些盟友似乎更乐于破坏半革命的成果，而非真正抗击法西斯）。正如杜鲁蒂之友所澄清的：“是民主战胜了西班牙人民，而不是法西斯主义。” [Op. Cit., p. 30] 仅仅反对法西斯主义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反对资本主义。正如杜鲁蒂所强调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会与法西斯主义殊死搏斗。当资产阶级看到权力从自己手中滑落时，他们便会诉诸法西斯主义以维持自身统治。” [quoted by Vernon Richards, Op. Cit., p. 193f] 在西班牙，真正摧毁革命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反法西斯主义。苏格兰无政府主义者埃塞尔·麦克唐纳当时就指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并非某种全新的邪恶势力，它不过是资本主义这个旧敌人的新形态，披上了一个骇人的名称……‘反法西斯主义’是新的口号，借此，工人阶级正遭到背叛。” [Workers Free Press, October 1937]

第三，CNT提出的“自由共产主义必须等到战争结束后再实行”这一论断，也是错误的。法西斯主义只能通过摧毁其赖以生存的体系（即资本主义）才能被彻底打败。此外，就士气与斗志而言，反法西斯的斗争，唯有同时在为一个更美好的事物——即一个自由的社会——而斗争的情况下，才能真正鼓舞人心。为了维护一个曾镇压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去与法西斯斗争，这根本无法激励前线的战士。同样，工人自治的唯一希望，就是将革命推向极致，即在与法西斯作战的同时实现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等待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做法，最终只会将其牺牲于战争的需要之下，而这必然意味着革命精神与希望的消亡；但正是这种精神和希望，才能支撑战争的持续进行。否则，人们为何还要为了回归旧秩序而战？要知道，正是这个旧秩序才引发了他们在内战爆发前的反抗，并最终导致了法西斯政变的发生。

第四，在社会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始终是鼓励“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借用巴枯宁的常用表达），推动革命性组织的建立，以有效地摧毁国家。巴枯宁本人曾主张（见 [1.8.11 节](#)）建立工人委员会，并辅以社区集会（即街垒联合会）以及自我管理的民兵组织。这一模式至今仍然适用，并在阿拉贡地区由CNT成功实施。

因此，从CNT的经验中所获得的政治教训并不令人意外。这些教训只是重申了无政府主义理论中长期存在的立场。正如自巴枯宁以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坚持的观点：除非国家被摧毁、资本被剥夺，并建立起自由联合的工人协会作为自由社会主义的框架，否则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西班牙革命的经验并未否定无政

府主义，反而进一步证实了其正确性。

I.8.14 从这场革命中能学到什么经济上的教训？

革命最重要的经济教训在于，工人阶级成功地接管了工业管理，并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出色地维持了（甚至改进了！）生产（这一关键因素常常被无政府主义及革命的反对者所忽视）。不仅如此，工人们几乎凭空在加泰罗尼亚建立起了军事工业，同时改善了工作条件，并创新了新的技术和生产流程。西班牙革命表明，自我管理是可行的，并且，当人们受到理想的激励时，他们的创造性足以改变整个社会。

自我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创新和新思想的涌现。西班牙革命清楚地证明了无政府主义对等级制度的批判是正确的，并印证了伊萨克·普恩特的观点，即“在一个自由的集体中，每个人都能受益于所有人积累的知识和专业的经验，反之亦然。信息在其中不断地相互流通。”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32] 工人们摆脱了经济上的专制，开始重塑自己的工作场所及生产方式。

从个人自由的角度来看，显而易见，自我管理使得过去被边缘化的人们能够积极参与影响自身的决策。平等主义的组织结构为大规模的参与和个人自治提供了框架，而这在公社所进行的广泛创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斯蒂纳所说，“只有在联合体之中，你才能作为独特的个体确立自己；因为联合体不会占有你，而是你占有它，或者使其为你所用。”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p. 312] 艾玛·戈德曼在访问集体并与其成员交谈后，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当我询问工人们，通过集体化他们到底获得了什么时……他们的回答总是：首先，是更大的自由。其次，才是更高的工资和更少的劳动时间。而当我在俄罗斯的那两年间[1920-1921]，我从未听到任何工人表达出‘更大的自由’这一想法。” [由艾玛·戈德曼所著的《烈焰中的愿景》，p. 62]

正如无政府主义理论所预测的、并且在现实经验中得到印证的是：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大量尚未被开发的活力和主动性，而自我管理正是激发这些潜能的关键。集体的实践证明了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合作劳动更具生产力；并且正如他所言，如果经济学家想要证明“私有制优于其他所有形式的所有制”，那么他们就应该论证，在共有的土地上，永远不会由比私有土地上更为丰富的收成。但事实并非如此，观测到的恰恰的相反的情况。” [由克鲁泡特金所著的《面包的征服》，p. 146]

除此之外，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经验中，可以归纳出五个重要的教训：

首先，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而是受多种影响及客观条件

制约的产物。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集体的实践印证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见 [1.2.2 节](#)）。正如 [1.8.3 节](#) 所述，集体虽然建立在核心的自由意志原则之上，但其发展仍然是某种程度上的意外产物。它们既反映了革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也体现了自由意志主义理论，但在后者的影响下仍有所局限。然而，这些集体是由革命自下而上建立的，因此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每场革命的经验都表明，相较于由自封的先锋队为了人民建立制度所带来的结果，人民自己在解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要微不足道得多。西班牙革命是一个明确的例证，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集体化法令”并未带来多少益处，（反而和预期的一样，限制并控制了经济的变革进程）。但幸运的是，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了拥有犯错自由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在实践中尝试的众多不同形式的集体和联合会中看出。西班牙工业协调和社会化的实际进程，是由工人的意愿所决定的——这正是社会革命应有的样态。正如巴枯宁所言，“革命不仅应当为了人民而进行，更应当由人民自己进行。”[由巴枯宁所著的《没有神明，没有主人》，vol. 1, p. 141] 只有当工人阶级自己解决社会革命面临的问题时，解决方案才会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让工人阶级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而不是中央集权或国家控制/所有制。西班牙公社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管理的去中心化也至关重要。正如在 [1.8.4 节](#) 中讨论的，不同地区和行业尝试了不同的联合体形式。木工工会的经验表明，一个集体化的行业可能会变得中央集权化——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也可能导致普通工人被边缘化，最终引发冷漠的情绪。而这一点，早已被克鲁泡特金及其他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以及当时西班牙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所预测。尽管这种民主管理的行业无疑比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要更好，但它们仍然只是对无政府主义自我管理理念的近似实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集体化实验也表明，合作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央集权（如巴达洛纳的集体所示）。

第三，尽早建立工作场所之间的团结联系十分重要。虽然在法西斯暴动后，恢复生产的迫切性使得集体企业间的协调工作显得更为次要。然而，最初存在于各个工作场所之间的竞争，反而帮助了国家破坏自我管理的尝试（例如，国家“积极利用其对金融的控制，来遏制和扼杀激进的变革”[Graham Kesley, *Anarchosyndicalism,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p. 172]）。由于没有“人民银行”或一个联邦机构来协调信贷与生产，国家对信贷和黄金储备的掌控使共和政府得以利用这一点，通过控制集体、并最终将其（事实上地）国有化来削弱革命（杜鲁蒂及少数几人曾计划夺取黄金储备，但被阿瓦德·德·桑蒂良劝阻）。

对革命的攻击始于加泰罗尼亚政府在 1936 年 10 月颁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合法化（并因此控制）了集体（即臭名昭著的“集体化法令”）。反革命势力甚至拒绝向集体化的企业提供资金，哪怕是军工企业，除非它们同意接受国家控制。该法令所建立的工业组织，是无政府主义理念与其他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思想之间的妥协。正如加斯东·勒瓦尔所言：“这一法令的恶劣影响在于，它阻止了工人們的工团扩大他们的胜利成果。这使工业是革命倒退了。”[*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54]

最后，经济革命的成功必须建立在摧毁现存国家的基础上。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必然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结构。” [Anarchism, p. 181] 资本主义需要国家，社会主义则需要无治。没有新的政治结构，新的经济组织便无法充分发展。由于未能在政治上巩固革命，经济上的革命最终也随之失败。那项“合法化”集体化的法令，“从一开始就扭曲了一切。”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27] 这帮助削弱了革命，使集体的互助体系无法自由发展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由于这项法令，“集体失去了它们在革命初期赢得的经济自由”）。当然，集体试图去无视国家的干涉。正如一位目击者指出，CNT的“政策，因此与该法令所推动的方向并不一致。” [quoted by 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230 and p. 213] 事实上，阿瓦德·德·桑蒂良等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对这一法令：

“我是该法令的反对者，因为我认为它过于仓促……当我成为行政委员时，我根本无意考虑或执行这项法令：我的意图是让我们伟大的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灵感、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推进事业。” [quoted by Fraser, Op. Cit., p. 212fn]

然而，随着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CNT很快被迫妥协并支持该法令（CNT确实提出了更自由意志主义的工作场所协调形式，但这些方案被国家所破坏）。由于缺乏有效的互助组织，国家得以对集体取得控制，从而削弱并最终摧毁了自我管理。尽管工人阶级对经济的控制至关重要，但它并不会自动地去摧毁国家。换句话说，革命的经济层面不能脱离其政治层面而孤立地进行考虑。

不过，这些问题并未掩盖西班牙革命的成就。正如加斯东·勒瓦尔所言，“尽管”由于未能实现完全的社会化而“存在这些缺陷，重要的事实是：工厂仍在运转，车间和作坊仍在生产，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雇主、资本家、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完成的。”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28] 毫无疑问，在西班牙的这些经济自由时期，不仅证明了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工人阶级能够管理和运行社会，还证明了这一制度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并扩大自由。假以时日，并给予足够的发展空间，这一实验无疑能够克服其自身的问题。即便在内战的极端困难环境下（并且遭遇几乎所有其他政党和工会的抵制），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仍然证明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是可能的。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一个曾经只是愿景的世界——一个比资本家、管理者、政客和官僚所主导的社会，更加人道、更加自由、更加公平、更加文明的世界。